

社会学

第五版

SOCIOLOGY



Anthony
Giddens

〔英〕安东尼·吉登斯 / 著
李 康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学

第五版

SOCIOLOGY



安东尼·吉登斯的新版《社会学》是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使命。他把这本最好的社会学概论教材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使其更为出色。这是一部杰作。

——乌尔里希·贝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历经修订，已经出到第五版，为社会学学人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概论论述明晰，编排生动，视野新颖，素材丰富。当今世界顶尖社会学家亲手编著，成功地做到了深入浅出，融会新知。

第五版涵盖了社会学所有核心论题，融入了大量实质性的新材料，将学生直接引入前沿争论。全书自始至终将古典与当代的理论和数据密切融合，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例证。

第五版还包括

- 有关全球不平等、残障、老年化和生命历程、风险、网络社会和恐怖主义，以及其他许多此前遗漏或最新发展的话题；
- 各章皆有大量学习辅导，例如本章要点、思考建议、阅读指南，有助于巩固学生之所学；
- 添加了大量照片、图表、案例、漫画，让观念回归生活，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这部经典教材的第五版是大学本专科一年级学生的理想教材，是所有渴望一部生动、权威的社会学概论的学生的首选之作。

ISBN 978-7-301-15103-7



9 787301 151037 >

定价：86.00元

社会学

第五版

SOCIOLOGY



〔英〕安东尼·吉登斯 / 著
〔英〕西蒙·格里菲斯 / 协助
李 康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6-56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第五版)/(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英)西蒙·格里菲斯协助;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社会学经典教材译丛)

ISBN 978-7-301-15103-7

I.社… II.①吉…②格…③李… III.社会学 IV.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9239号

Sociology

Copyright © Anthony Giddens 2006

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Polity Press

ISBN 10: 0-7456-3379-X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书 名:社会学(第五版)

著作责任者:[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英]西蒙·格里菲斯 协助 李康 译

丛书策划:诸葛蔚东

责任编辑: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103-7/C·052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ss@pup.pku.edu.cn

印刷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55.75印张 1356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社会学经典教材译丛》总序

谢立中

一部好的教材，可以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起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教材建设在每一门现代科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都被当作一项核心的任务。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来说，自然也不例外。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日起，中国的社会学教育工作者就十分重视社会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毋庸置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各个学科中形成一套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与本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本土化教材体系，既是教材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也是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学科来说，不仅在重建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而且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社会学教材都应该是教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仍然处在重建过程之中的学科来说，“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补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学术发展水平还没有能够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之前，向发达国家学习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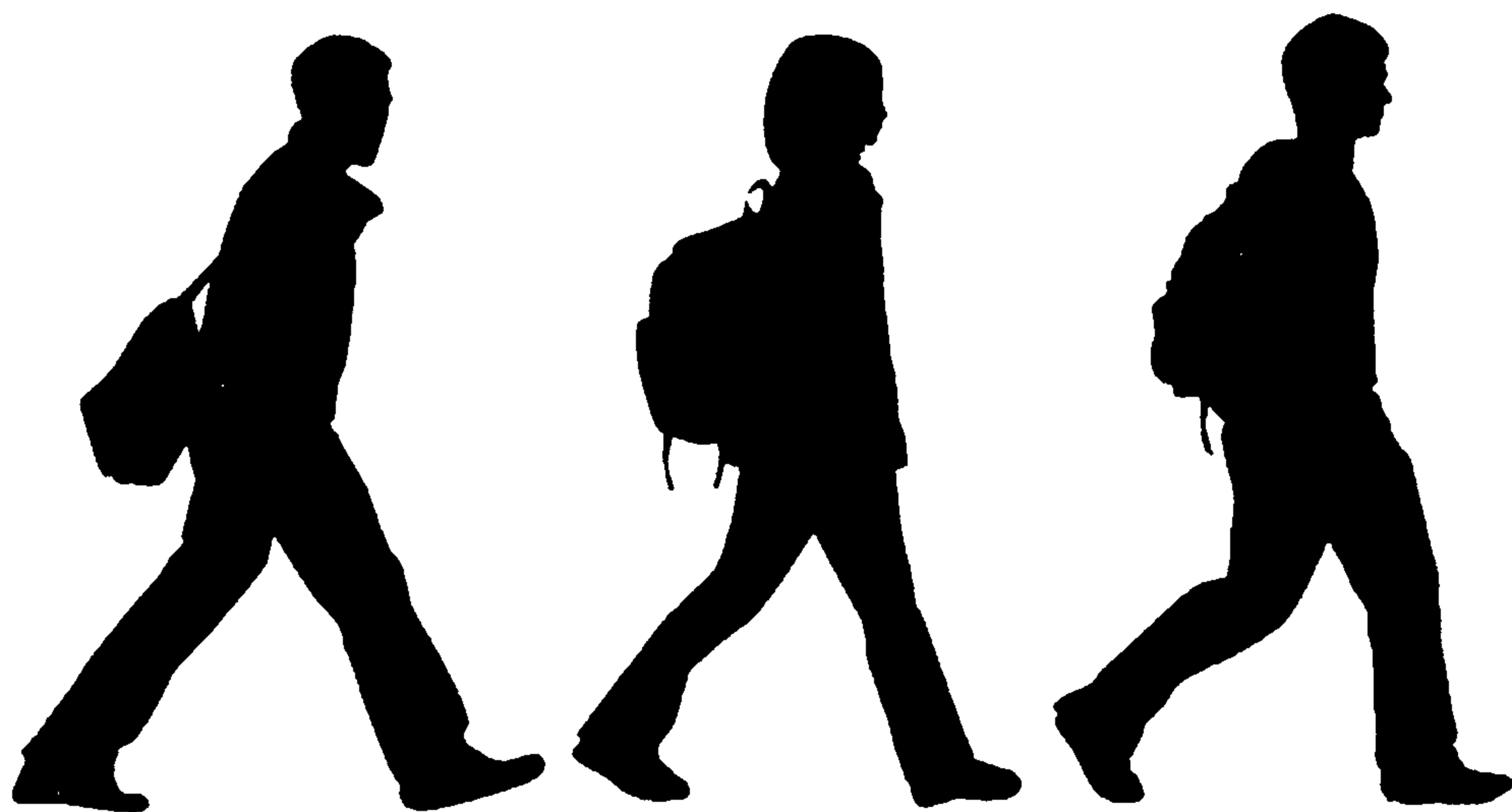
引进发达国家的教材可以有多种形式。从国内的实际情形来看，目前比较常见的形式至少有三种。一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教学需要，从若干国外优秀教材或原著中选择部分章节，在未经翻译的情况下重新改编成一本新教材；二是直接以影印本的形式将国外的优秀教材重新出版；三是将国外优秀的教材翻译成中文出版。前两种形式的优点是将外文著作直接以原文形式呈现给读者，使原作所具有的信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一批社会学经典教材的影印本）。但这两种形式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方面，至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我国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以及上这门课的学

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因此，以外文原文形式出版的教材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在范围上就必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认为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面），虽然外文本在保留原文信息方面有着自己的长处，但它却永远有着自己致命的一个短处，即它永远是以非汉语的形式存在，因而它永远不能成为汉语文化或汉语学术的一个有机部分。即使在未来，中国读者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了，情况也是如此。从这一角度来讲，外文著作（包括教材）的汉语译本在推动汉语文化和学术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地位是外文原文的改编本或影印本所无法取代的。因此，以中译本的形式引进国外优秀的社会学教材就不仅曾经是、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会是我们引进国外社会学教材的一个主要形式。并且，从这同样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说，虽然国内（尤其是近几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国外优秀社会学教材的中译本，但从国内在这方面的需要来看，现有的译本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推出了《社会学经典教材影印丛书》之后，又决定再编辑出版一套《社会学经典教材译丛》。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举措。这两套丛书结合起来，必将对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既需要更好地了解国外先进的文化和学术，与世界“接轨”，也需要不断地推进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术。前者是我们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必要途径，后者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而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教材，正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文化和学术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可能永远需要用“两条腿”走路：既要推出更多更好的外文原文影印本图书，又要推出更多更好的国外优秀著作的中译本。在这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第五版序言

本书第四版出版于2001年9月11日的系列事件之前。为了跟上当代社会世界和后“9·11”岁月的巨变步伐,本教材的第五版进行了细致修订和更新,添加了大量新材料。不过,一如此前各版,我力求让本书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同时也能反映学科前沿。本书首次详细讨论了全球不平等、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老年化和残障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话题。我在教材中将这些新的章节与历经检验的章节融合为一体,力求维护本书作为反映最新进展的社会学概论的声誉。



作者致谢

感谢本书成书过程中鼎力相助的每一个人。前一版的许多读者主动给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对此我深表谢意。没有西蒙·格里菲斯(Simon Griffiths)数个月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完成第五版。无论本书有什么样的优点,他都应该与我同等分享。我对他感激不尽。

我还要感谢读过本书各章草稿的所有学者。由于人数众多,难以一一列举,但他们的意见弥足珍贵。我特别要感谢 Polity 出版社的以下人士: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吉尔·莫塔利(Gill Motley)、内尔·德·柯特(Neil de Cort)及布雷芙妮·奥康娜(Breffni O' Connor)。埃玛·朗斯塔夫(Emma Longstaff)自始至终在整个计划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她是一位绝佳合作伙伴。萨拉·丹茜(Sarah Dancy)的文本编辑工作非常出色,我非常感谢她细致周到并富有想象的工作。

最后,我还要感谢阿蕾娜·莱德耶娃(Alena Ledeneva)的长期帮助与鼓励。

安·吉

本书说明

编写本书乃是坚信,社会学在现代思想文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我在第五版中的宗旨和前几版一样,仍然是要写一部书,能够把某种原创性与当今社会学者所感兴趣的所有基本问题结合在一起。本书并不试图引入过于精深的观念,相反,本书从头到尾都融合了来自学科前沿的观念和发现。我希望这不是一种有所偏袒的做法,因为我试图努力做到不偏不倚但并非不加区别地涵盖社会学中的重要视角,涵盖当前研究的重大发现。

重要主题

本书是围绕着一些基本的主题构筑起来的,每一项主题都有助于赋予本书某一点鲜明的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有关变迁中的世界(world in change)的问题。社会学因转型而诞生,这种转型是指摆脱先前各类社会典型的生活方式,急速转为西方工业化的社会秩序。由这些变迁所形成的世界,成为社会学分析所关注的主要对象。社会变迁的步伐一直在不断加快,而且现在我们有可能会恰好站在了像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所出现的那些重大转变的门槛上。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便是详尽描画过去已经发生的转型,把握当今正在发生的发展的主要脉络。

本书第二个基本主题就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globalizing of social life)。长久以来,主导社会学的观点是认为可以把社会当作独立的整体来研究。但是,即使是在过去,社会其实从来就没有孤立存在过。目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加速发展的全球融合的进程。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强调全球化,也密切关系到注重当今工业化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的相互依赖。1989年出版的本书第一版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开始讨论全球化的影响,而即使是在本学科中更具专业技术性的领域,这种考察当时也只是初现端倪。自那以后,有关全球化的论争大大激化,而全球化本身也已经大大推进了,就像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领域的某些变化。

第三,本书采取明确的比较(comparative)立场。仅仅理解任何一个特定社会的制度,是无法讲授社会学的研究的。尽管我偏重于特别讨论英国的问题,但为求平衡,这种讨论也总是会伴之以取自其他文化的丰富而多样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在西方其他国家所做的研究,但我也常常引到正在经历重大变迁的俄罗斯和东欧各社会。与此前其他社会学导论的通常做法相比,本书也更多地融入了发展中国家的材料。另外,我非常强调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关注点有着全面的交叠。由于现今世界各社会已经通过一些密切关联相互混融,并且许多传统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已经消亡,因而社会学和人类学就越来越变得难于区分了。

第四个主题是把历史的思路(historical approach)引进社会学的必要性,这还不单单是说考虑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过去几年社会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便是日益注重历史分析。这不仅仅是采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研究过去,而是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的制度。本书广泛讨论了历史社会学的晚近研究,它在绝大多数章节中都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框架。

第五,本书自始至终都特别关注性别话题(issues of gender)。一般都把性别研究看作是整个人类学中的一块特殊领域,本书也有一章专门探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第十二章)。然而,

有关性别关系的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至关重要,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一门分支学科。因此,许多章同样含有处理性别话题的专节。

第六项主题是微观与宏观的联结 (micro and macro link)。我在本书许多地方指出,微观层面背景中的互动会影响较大范围内的社会过程,而这种宏观层面的过程又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提请读者注意,同时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切入,来分析一种社会情境,就会获得更好的理解。

最后一项主题是社会范畴 (the social) 与个人范畴 (the personal) 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学的思考对于自我理解大有裨益,而自我理解反过来又增进了对于社会世界的理解。学习社会学应该是一种解放心智的体验:这个领域增强了我们的同情心和想像力,开拓了解释我们自己行为根源的新视角,并且塑造了一种不同于我们自己文化背景的意识。社会学的观念挑战教条,倡导重视文化多样性,并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社会制度的运作,有鉴于此,社会学的实践使人类更有可能获得自由。

书的框架

本书开始时并没有对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做太多抽象的讨论。书末附有增订过的全面的术语汇编,提供了有用的参考,将前面各章中重要的社会学术语收集在一起。术语汇编中的术语在本书正文中以粗体标出(中译改为楷体)。我力求通过具体实例来说明理念、概念和理论。虽然这些实例通常取自社会学的研究,但我也经常会用到其他来源的素材(比如报纸的报道)。我试图使文风尽可能地简捷明了,同时尽量使本书生动活泼,并“充满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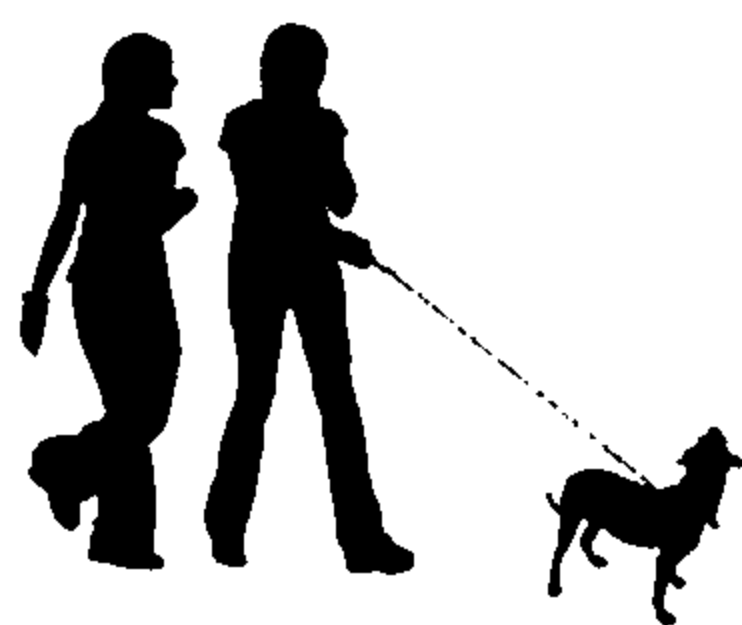
章节的排列顺序旨在帮助读者循序渐进,逐步把握社会学的不同领域,但我同样注意确保本书能够灵活使用,易于满足各门课程的个别需求。章节可以删减,或者以不同的顺序来学习,而不至于有太多的损失。每一章几乎都自成一体,同时在相关的论点,各章之间又有大量的相互参引。

在每一章的结尾处都提供了一些相关网站的链接,由此可以找到互联网所提供的有关人物和社会学的大量信息。本书的设计也是要配合其自身网站上丰富的附加材料,可见于<<http://www.polity.co.uk/giddens>>。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在那里找到丰富的资源以激发批判性思维,促进对于本书所探讨的各项主题的进一步研究。这一点为《社会学》(第五版)增添了一个重要的崭新维度,旨在让这个领域中的教学双方都有所获益。



要目

第五版序言	xvii
作者致谢	xviii
本书说明	xix
书的框架	xxi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学?	2
第二章 全球化与变迁世界	24
第三章 社会学问题的设问与解答	56
第四章 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	78
第五章 社会互动与日常生活	100
第六章 社会化、生命历程与老年化	130
第七章 家庭与亲密关系	165
第八章 健康、疾病与残障	206
第九章 分层与阶级	242
第十章 贫困、社会排斥与福利	278
第十一章 全球不平等	313
第十二章 性与社会性别	352
第十三章 种族、族群性与迁移	390
第十四章 现代社会中的宗教	432
第十五章 传媒	475
第十六章 组织与网络	522
第十七章 教育	561
第十八章 劳动与经济生活	606
第十九章 犯罪与越轨	649
第二十章 政治、政府与恐怖主义	692
第二十一章 城市与都市空间	735
第二十二章 环境与风险	774
参考文献	801
术语汇编	837
致谢	863
译后记	869





详目

第五版序言 xvii

作者致谢 xviii

本书说明 xix

书的框架 xxi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学? 2

第一节 社会学的视角 5

学习社会学 6

第二节 社会学思维的发展 7

1.2.1 理论与理论思路 7

1.2.2 早期理论家 9

1.2.3 现代理论思路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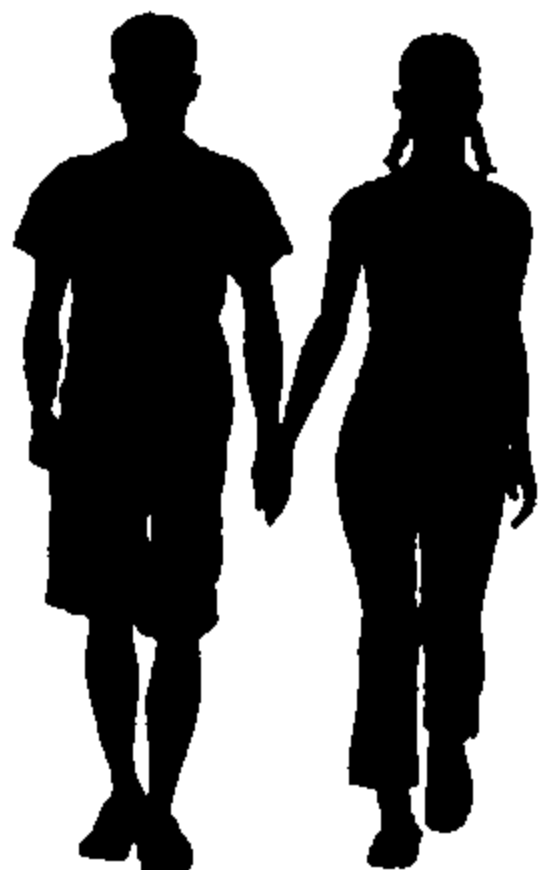
1.2.4 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 19

1.2.5 分析的层次: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 20

第三节 生活中社会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 21

本章要点 22

网络导航 23



第二章 全球化与变迁世界 24

第一节 社会的类型 27

2.1.1 正在消逝的世界:前现代社会及其命运 27

2.1.2 现代世界:工业化社会 31

2.1.3 全球发展 33

第二节 社会变迁 35

2.2.1 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 36

2.2.2 现代的变迁 37

第三节 全球化 39

2.3.1 推动全球化的因素 40

2.3.2 全球化之辩 46

2.3.3 全球化的影响 48

小结:全球治理之需 53

本章要点 53

思考建议 54

阅读指南 55

网络导航 55



第三章	社会学问题的设问与解答	56
第一节	社会学的设问	59
3.1.1	贯彻科学的取向	60
3.1.2	研究步骤	61
第二节	理解因果	64
因果与相关		6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6
3.3.1	民族志	66
3.3.2	问卷调查	67
3.3.3	实验	69
3.3.4	生活史	70
3.3.5	比较研究	70
3.3.6	历史分析	70
3.3.7	综合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	71
第四节	现实世界中的研究:方法、问题与陷阱	71
3.4.1	人类主体与伦理问题	72
3.4.2	社会学仅仅是重述显而易见之事吗?	72
3.4.3	社会学的影响	74
本章要点		76
思考建议		76
阅读指南		76
网络导航		77
第四章	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	78
第一节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81
第二节	四大理论问题	82
4.2.1	结构与行动	83
4.2.2	共识与冲突	85
4.2.3	性别问题	86
4.2.4	现代世界的塑造	88
第三节	晚近的社会学理论	90
4.3.1	后现代主义	90
4.3.2	米歇尔·福柯	91
第四节	四位当代社会学家	92
4.4.1	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与公共领域	92
4.4.2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风险社会	93
4.4.3	曼纽埃尔·卡斯特:网络经济	95
4.4.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反思性	96
小结		97

本章要点	97
思考建议	98
阅读指南	98
网络导航	98
第五章 社会互动与日常生活	100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研究	103
第二节 非言语沟通	104
5.2.1 “脸面”、姿势与情感	105
5.2.2 非言语沟通与性别	106
第三节 互动的社会规则	107
5.3.1 共享理解	108
5.3.2 加芬克尔的实验	108
5.3.3 “蓄意破坏互动”	109
5.3.4 反应性惊呼	111
第四节 互动中的脸面、身体与言说	111
5.4.1 接触	113
5.4.2 印象管理	114
5.4.3 个人空间	116
第五节 时空中的互动	118
5.5.1 钟表时间	119
5.5.2 社会生活与时空秩序安排	119
5.5.3 文化和历史视角下的日常生活	119
5.5.4 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学角度的论争	122
5.5.5 网络空间上的社会互动	123
小结:接近的冲动?	127
本章要点	127
思考建议	128
阅读指南	128
网络导航	128
第六章 社会化、生命历程与老年化	130
第一节 文化、社会与儿童社会化	133
6.1.1 儿童发展理论	133
6.1.2 社会化中介	135
第二节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138
6.2.1 父母与成年人的反应	138
6.2.2 社会性别习得	138
6.2.3 故事书与电视	139

	6.2.4 非生理性别化育儿的困难	139
	6.2.5 社会学角度的论争	140
第三节	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	142
	6.3.1 孩童期	143
	6.3.2 青少期	143
	6.3.3 青壮期	144
	6.3.4 壮年期	144
	6.3.5 老年期	144
第四节	老年化	145
	6.4.1 英国社会的老龄化	146
	6.4.2 人们如何步入老年?	146
	6.4.3 逐渐衰老:多种相争的社会学说明	150
	6.4.4 英国老年化的特征	151
	6.4.5 老年化的政治化	155
	6.4.6 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160
	本章要点	162
	思考建议	163
	阅读指南	164
	网络导航	164
第七章	家庭与亲密关系	165
	第一节 基本概念	170
	第二节 历史上的家庭	171
	7.2.1 家庭生活的演变	172
	7.2.2 我们从不像那样:传统家庭的神话	173
	7.2.3 世界范围内家庭模式的变迁	174
	第三节 英国的家庭与亲密关系	175
	7.3.1 整体特征	175
	7.3.2 家庭模式的演变与多样性	175
	7.3.3 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178
	7.3.4 亲人暴力	180
	7.3.5 家庭暴力	181
	7.3.6 离婚与分居	182
	7.3.7 家庭生活态度的变迁	187
	7.3.8 新型伴侣关系与继亲家庭	190
	7.3.9 传统婚姻与家庭生活形式的替代选择	192
	第四节 有关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理论视角	196
	7.4.1 功能主义	196
	7.4.2 女性主义思路	196

7.4.3	晚近的视角	197
	小结：家庭价值观之辩	201
	本章要点	203
	思考建议	204
	阅读指南	204
	网络导航	204
第八章	健康、疾病与残障	206
第一节	身体社会学	208
第二节	健康与疾病社会学	211
8.2.1	关于医疗的社会学视角	214
8.2.2	变迁世界中的医疗与健康	218
8.2.3	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学视角	220
第三节	健康的社会基础	223
8.3.1	阶级与健康	224
8.3.2	性别与健康	227
8.3.3	族群与健康	229
8.3.4	健康与社会结合	230
第四节	残障社会学	230
8.4.1	残障的个体模型	231
8.4.2	残障的社会模型	231
8.4.3	英国及全球的残障	235
	本章要点	239
	思考建议	240
	阅读指南	240
	网络导航	240
第九章	分层与阶级	242
第一节	分层体制	245
9.1.1	奴隶制	246
9.1.2	种姓制	246
9.1.3	等级制	248
9.1.4	阶级制	249
第二节	有关分层与阶级的理论	249
9.2.1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250
9.2.2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250
9.2.3	埃里克·奥林·赖特的阶级理论	251
第三节	测定阶级	252
9.3.1	约翰·戈德索普：阶级与职业	253

	9.3.2 评价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	254
第四节	今日西方社会的社会阶级划分	257
	9.4.1 上层阶级的问题	257
	9.4.2 中产阶级	260
	9.4.3 工人阶级性质的变迁	261
	9.4.4 底层阶级?	262
	9.4.5 阶级与生活方式	266
	9.4.6 性别与分层	268
第五节	社会流动	271
	9.5.1 流动的比较研究	271
	9.5.2 下向流动	272
	9.5.3 英国的社会流动	273
	9.5.4 英国是否属于能力至上制的社会?	274
	小结:阶级的重要性	275
	本章要点	275
	思考建议	277
	阅读指南	277
	网络导航	277
第十章	贫困、社会排斥与福利	278
第一节	贫困	281
	10.1.1 何谓贫困?	281
	10.1.2 贫困的测定	282
	10.1.3 谁是穷人?	287
	10.1.4 贫困的说明	289
	10.1.5 贫困与社会流动	291
第二节	社会排斥	292
	10.2.1 何谓社会排斥?	292
	10.2.2 社会排斥的实例	295
	10.2.3 犯罪与社会排斥	298
第三节	福利国家	300
	10.3.1 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	300
	10.3.2 福利国家在英国	301
	小结:变迁世界中的贫困与福利	308
	本章要点	310
	思考建议	311
	阅读指南	311
	网络导航	311

第十一章	全球不平等	313	
第一节	全球经济不平等	319	
11.1.1	高收入国家	321	
11.1.2	中等收入国家	321	
11.1.3	低收入国家	321	
11.1.4	全球经济不平等是否还在加剧?	322	
第二节	富国与穷国中的生活	324	
11.2.1	健康	324	
11.2.2	饥饿、营养不良与饥荒	324	
11.2.3	教育与读写能力	326	
第三节	穷国能否变富?	327	
11.3.1	关于发展的理论	332	
11.3.2	评估各种发展理论	338	
11.3.3	国际组织的角色与全球不平等	338	
11.3.4	变迁世界中的全球经济不平等	340	
第四节	世界人口增长	342	
11.4.1	人口分析:人口学	343	
11.4.2	人口变迁的动力	344	
11.4.3	马尔萨斯主义	346	
11.4.4	人口转变	346	
11.4.5	变迁的前景	347	
	本章要点	349	
	思考建议	350	
	阅读指南	350	
	网络导航	350	
第十二章	性与社会性别	352	
第一节	人类的性	356	
12.1.1	生物学与性行为	356	
12.1.2	对于性行为的社会影响	357	
12.1.3	性与生育技术	358	
12.1.4	西方文化中的性	360	
第二节	性取向	365	
12.2.1	性取向是天生还是习得?	366	
12.2.2	西方文化中的同性恋	367	
12.2.3	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369	
12.2.4	男女同性恋民权运动	370	
第三节	社会性别	372	
12.3.1	社会性别与生物学:自然差异?	372	

	12.3.2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373
	12.3.3 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	374
	12.3.4 女性特质、男性特质与社会性别关系	375
第四节	有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视角	379
	12.4.1 功能主义思路	379
	12.4.2 女性主义思路	381
小结:	社会性别与全球化	386
本章要点		387
思考建议		388
阅读指南		388
网络导航		388
第十三章	种族、族群性与迁移	390
第一节	核心概念	394
	13.1.1 种族	394
	13.1.2 族群性	396
	13.1.3 少数群体	398
第二节	偏见与歧视	399
	13.2.1 种族主义	401
	13.2.2 对于种族主义的社会学解释	403
第三节	族群整合与族群冲突	404
	13.3.1 族群整合的模式	404
	13.3.2 族群冲突	405
第四节	英国的迁移与族群多样性	407
	13.4.1 迁移	407
	13.4.2 族群多样性	413
	13.4.3 少数族群与劳力市场	415
	13.4.4 住房	419
	13.4.5 刑事司法系统	420
第五节	欧陆的外来移民与族群关系	422
	迁移与欧盟	423
第六节	全球迁移	425
	13.6.1 迁移运动	425
	13.6.2 全球化与迁移	427
	13.6.3 全球流散	428
小结		429
本章要点		429
思考建议		430
阅读指南		430
网络导航		431

第十四章	现代社会中的宗教	432
第一节	有关的社会学理论与观念	436
14.1.1	社会学角度的宗教研究	436
14.1.2	有关宗教的理论	437
第二节	现实世界的宗教	441
14.2.1	图腾崇拜与泛灵论	442
14.2.2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442
14.2.3	远东宗教	444
14.2.4	宗教组织	445
14.2.5	基督教、社会性别与性	450
第三节	世俗化与宗教复兴	452
14.3.1	世俗化	452
14.3.2	宗教在欧洲	454
14.3.3	宗教在英国	457
14.3.4	宗教在美国	462
14.3.5	评估世俗化命题	465
14.3.6	宗教原教旨主义	467
	本章要点	473
	思考建议	474
	阅读指南	474
	网络导航	474
第十五章	传媒	475
第一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480
15.1.1	传统媒体	480
15.1.2	新媒体	485
第二节	有关传媒的理论视角	491
15.2.1	功能主义	491
15.2.2	冲突理论	491
15.2.3	晚近学说	492
第三节	偏差与传媒：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小组	498
	电视新闻	498
第四节	受众与传媒效应	500
15.4.1	受众研究	500
15.4.2	传媒效应	501
第五节	传媒控制	504
15.5.1	政治控制	504
15.5.2	全球传媒与民主	508

第六节	全球时代的传媒	508
15.6.1	音乐	509
15.6.2	电影	511
15.6.3	传媒“超级企业”	512
15.6.4	传媒帝国主义?	514
15.6.5	对于全球传媒的抵抗与替代	515
小结		516
本章要点		519
思考建议		520
阅读指南		520
网络导航		521
第十六章	组织与网络	522
第一节	组织	525
16.1.1	作为科层机构的组织	526
16.1.2	组织的物理环境	532
16.1.3	跨越世界的组织	536
16.1.4	经济组织	539
第二节	超越科层制?	546
16.2.1	组织变迁:日本模式	547
16.2.2	管理的转型	548
16.2.3	网络研究	551
第三节	组织和网络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554
16.3.1	社会资本:联结的纽带	554
16.3.2	独自打保龄球:社会资本衰减的例证?	555
小结		557
本章要点		558
思考建议		559
阅读指南		559
网络导航		560
第十七章	教育	561
第一节	教育的重要性	566
第二节	英国的教育	566
17.2.1	起源与发展	567
17.2.2	中等教育与政治	570
17.2.3	高等教育	576
17.2.4	从比较视角看英国教育	579

第三节	有关学校教育与不平等的理论	581
17.3.1	伊凡·伊利奇:隐性课程	582
17.3.2	巴希尔·伯恩斯坦:语言符码	583
17.3.3	皮埃尔·布迪厄:教育与文化再生产	584
17.3.4	学做工:保罗·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分析	585
17.3.5	有关教育的后现代思路	587
第四节	不平等与教育	588
17.4.1	性别与学业成绩	588
17.4.2	族群与教育	593
17.4.3	智商与教育	594
第五节	教育与新型传播技术	599
17.5.1	教室中的技术	599
17.5.2	网络大学的来临?	599
小结:教育的未来		602
本章要点		603
思考建议		604
阅读指南		605
网络导航		605
第十八章	劳动与经济生活	606
第一节	何谓劳动? 有薪劳动与无薪劳动	609
第二节	劳动的社会组织	609
18.2.1	泰勒制与福特制	612
18.2.2	泰勒制与福特制的局限	613
第三节	劳动与劳动过程的性质变迁	614
18.3.1	女性与劳动	614
18.3.2	后福特制	625
18.3.3	当前职业结构趋势	628
第四节	工作无保障感、失业与劳动的社会意义	636
18.4.1	劳动的社会意义	638
18.4.2	工作无保障感的加剧	638
18.4.3	失业	641
小结:“品格的消蚀”?		645
本章要点		646
思考建议		647
阅读指南		647
网络导航		648

第十九章	犯罪与越轨	649
第一节	基本概念	654
第二节	说明犯罪与越轨:社会学理论	655
	19.2.1 功能主义理论	655
	19.2.2 互动理论	658
	19.2.3 冲突理论:“新犯罪学”	661
	19.2.4 控制理论	663
	19.2.5 理论总结	666
第三节	英国的犯罪模式	668
	犯罪与犯罪统计	669
第四节	犯罪的受害者与施行者	671
	19.4.1 性别与犯罪	671
	19.4.2 青少年与犯罪	675
	19.4.3 白领犯罪	677
	19.4.4 有组织犯罪	680
	19.4.5 网络犯罪	682
第五节	监狱:犯罪之解?	684
	小结:犯罪、越轨与社会秩序	686
	本章要点	689
	思考建议	690
	阅读指南	690
	网络导航	691
第二十章	政治、政府与恐怖主义	692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之辩	694
	20.1.1 政治、政府与国家	694
	20.1.2 权力	696
	20.1.3 威权制与民主制	698
第二节	民主的全球扩散	700
	20.2.1 共产运动的变革	700
	20.2.2 民主何以广受欢迎	703
	20.2.3 民主面临困境?	704
	20.2.4 全球治理	705
第三节	英国的政党政治	708
	新工党	709
第四节	政治变迁与社会变迁	714
	20.4.1 全球化与社会运动	714
	20.4.2 技术与社会运动	716

第五节	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的理论	717
20.5.1	民族主义与现代社会	717
20.5.2	没有国家的民族	718
20.5.3	少数族群与欧盟	720
20.5.4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720
20.5.5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722
20.5.6	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全球化	723
第六节	恐怖主义	723
20.6.1	恐怖与恐怖主义的起源	725
20.6.2	新旧恐怖主义	727
20.6.3	恐怖主义与战争	731
本章要点		732
思考建议		733
阅读指南		733
网络导航		734
第二十一章	城市与都市空间	735
第一节	都市风格的理论阐述	738
21.1.1	芝加哥学派	739
21.1.2	都市风格与创生环境	743
21.1.3	评估	744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	745
21.2.1	传统社会中的城市	746
21.2.2	工业化与城市化	746
21.2.3	现代城市的发展	748
21.2.4	英美晚近城市演变趋势	749
21.2.5	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化	757
第三节	城市与全球化	760
21.3.1	全球性城市	763
21.3.2	不平等与全球性城市	764
21.3.3	全球时代的城市治理	764
小结:城市与全球治理		770
本章要点		770
思考建议		771
阅读指南		772
网络导航		773

第二十二章 环境与风险	774
第一节 作为社会学问题的环境	777
第二节 我们共同的环境	778
22.2.1 是否有增长的极限?	778
22.2.2 可持续发展	779
22.2.3 消费、贫穷与环境	779
22.2.4 威胁之源	781
第三节 风险、技术与环境	786
22.3.1 全球变暖	787
22.3.2 转基因食品	792
22.3.3 全球“风险社会”	796
展望未来	797
本章要点	799
思考建议	799
阅读指南	799
网络导航	800
参考文献	801
术语汇编	837
致谢	863
译后记	869

社 会 学

第 5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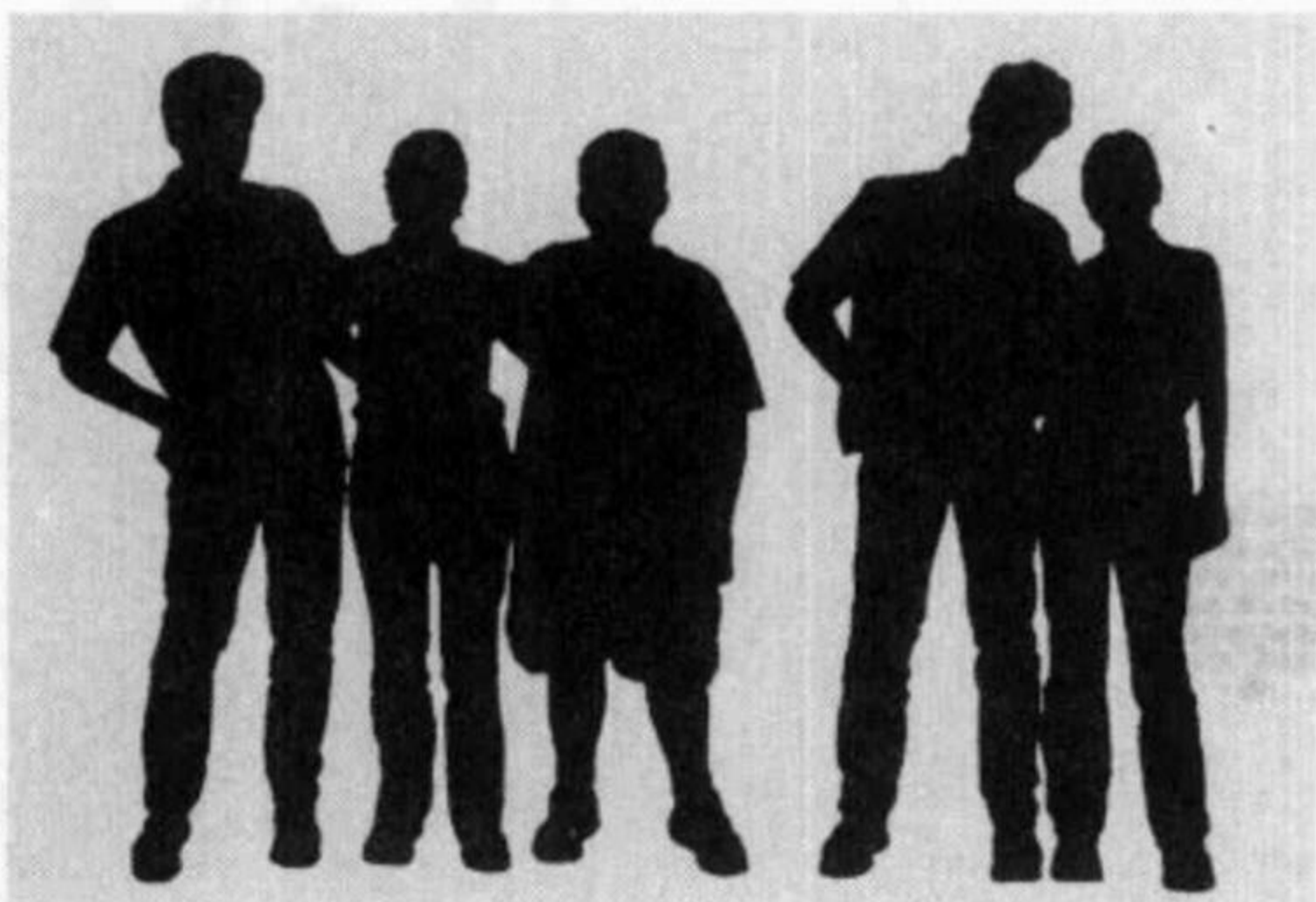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节 社会学的视角	5
学习社会学	6
第二节 社会学思维的发展	7
1.2.1 理论与理论取向	7
1.2.2 早期理论家	9
1.2.3 现代理论理路	16
1.2.4 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	19
1.2.5 分析的层次：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	20
第三节 生活中社会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	21
本章要点	22
网络导航	23



第一章

什么是社会学？



站 在 21 世纪的开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它既令人倍感困扰，又充满了有关未来的非凡承诺。这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界，充斥着深刻的冲突、张力和社会分隔，以及现代技术对于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纵使如此，我们依然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改善我们的生活，直至前人无法想像的程度。

这个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处境与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竟是如此迥异？未来变迁的方向将是什么？社会学首要关注的就

是这些问题，这门研究领域因此在现代思想文化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社会学就是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的科学研究。它是一项令人着迷而欲罢不能的事业，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我们自己的行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极为宽广，从分析街上行人之间的短暂接触，到探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之类的全球社会进程。

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依据自己生活中所熟悉的特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社会学则揭示了需要采取更为宽阔的视角，来看我们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又为什么会这样行事。它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认为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好的或是真的东西，可能并非如此。我们的生活中所谓的“给定因素”，其实受到历史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强烈影响。我们的个体生活其实通过细碎微妙但却复杂深刻的方式，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经验的背景。对于这些方式的理解，正是社会学眼光的基础。



与朋友聚在一起喝咖啡也属于一种社会仪式。



对于这些为南美一家公平贸易合作社工作的分拣咖啡豆的工人来说,咖啡就意味着他们的生计。

第一节 社会学的视角

学习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问题,换言之,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观察,意味着对于想像力的培养。学习社会学不能只是遵循获取知识的常规步骤。所谓社会学家,就是能够自如地跳出个人所处环境的直观性,将事情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社会学研究所依赖的,若是依照美国学者 C·赖特·米尔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所谓的社会学想像力 (Mills 1970)。

社会学想像力首先要求我们的,就是“想像自己脱离了”日常生活中那些熟悉的惯例,以便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它们。想一想喝杯咖啡这个简单的行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能从这样一个表面上枯燥无味的行为片段中说出些什么? 实在太多了。

第一,我们可以指出,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作为我们日常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它还具有符号价值。与喝咖啡相联系的仪式要比消耗这杯饮料本身这个举动重要得多。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早上这一杯咖啡是个人例行常规的核心,是开始新一天的重要的第一步。早上喝过咖啡之后常常接着白天与其他人一起喝咖啡,这是某种社会仪式的基础。约在一起喝咖啡的两个人更感兴趣的或许是聚在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实际喝了什么。事实上,社

会的饮食行为都是为社会互动以及仪式的实施提供场合,而这些都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丰富主题。

第二,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对大脑有刺激作用。许多人喝咖啡是因为它“特别提神”。通过喝咖啡的短暂休息,会让办公室的漫长白天和深夜的苦读好过得多。咖啡是一种会上瘾的东西,但在西方文化中,大多数人并不把嗜好喝咖啡的人看成是吸毒的人。咖啡就像酒精一样,是一种社会能够接受的毒品,而像大麻便不属于此类。然而,也有社会允许消费大麻甚至可卡因,却反对消费咖啡和酒精。社会学家对为什么会存在这类差异怀有兴趣。

第三,一个人一旦喝了一杯咖啡,就等于卷入了遍及世界的一组复杂的社会与经



对于 18 世纪英国的精英来说,咖啡馆就是谣言传闻和政治阴谋的中心。

济关系。咖啡是一种把地球上一些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产品。咖啡主要由贫穷国家生产,但却在富裕国家被大量消费。在国际贸易中,咖啡是仅次于石油的最有价值的商品,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外汇来源。咖啡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离不开距离喝咖啡的人数千英里之外的人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易。而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这种全球交易,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现在都受到世界范围的社会力量和沟通的影响。

第四,饮用一杯咖啡的举动足以推定过去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与茶、香蕉、土豆和白糖等在当今西方饮食中为人所熟知的物品一样,咖啡仅仅是从18世纪晚期才开始被广泛消费的(尽管此前在精英群体中喝咖啡已经颇为时髦)。这种饮品源于中东,大约从两个世纪以前的西方扩张时期才开始成为大众消费品。我们今天喝的几乎所有咖啡都源自曾经被欧洲人殖民的地区(南美和非洲),因而根本谈不上“自来就”属于西方的饮食。殖民时代留下的遗产至今仍然对全球咖啡贸易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五,咖啡这种产品是当代许多关于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的争论的焦点。随着咖啡的日益普及,它的消费已经变得“品牌化”和政治化了。消费者做出的喝哪种咖啡、到何处购买的决定已经成为代表生活方式的选择。人们可以选择只喝纯天然的咖啡,脱咖啡因处理的咖啡,或是经过“公平贸易”处理(即按照足额市场价格支付给发展中国家的小咖啡生产者的方案)的咖啡。他们可以选择光顾“独立的”咖啡厅,而不是像星巴克(Starbucks)那样“一体化”的咖啡连锁店。咖啡饮用者们可能会决定联合抵制来自某些人权和环境记录糟糕的国家的咖啡。社会学家有兴趣去了解,全球化是如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发生在地球遥远角落里的的问题,以及如何推动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依据所获得的新知识来

行事。

学习社会学

社会学想像力使我们看到,许多事件看似只与个体有关,其实反映的是更大的问题。例如,离过婚的人可能认为离婚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个人困扰。但米尔斯又指出,当谈到目前英国社会中有三分之一的婚姻将在10年内破裂,此时离婚又成为一项公共话题。另举一例:失业对于丢掉工作而又找不到新工作的人来说,可能是一场个人的悲剧。然而,当一个社会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处在相同的境地时,失业就不单单是个人失意的问题了,而成为一项体现着社会大趋势的公共话题。

不妨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你自己的生活。也不一定只考虑那些令人困扰的事情。例如,想想你究竟为什么会打开这本书,也就是为什么你决定学习社会学。你可能是一位不大情愿的社会学学生,修这门课仅仅是为了应付获得学位的要求。或者你可能满怀热情,想要对这门学科有更多的了解。但不管你的动机如何,你和其他学习社会学的人都很可能有大量共同点,只是不一定知道罢了。你的私人决定反映了你在大社会背景中的位置。

你具备以下这些特征吗?你是年轻人吗?是白人吗?来自专业人员或白领的家庭吗?你做过或者还在做着某种兼职来增加收入吗?你是否想在完成学业之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并没有具体想到要从事研究工作?你是否对社会学并没有切实的了解,只是认为它大概研究人们在群体中是如何表现的?你们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会对上述所有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但大学生并不能典型地代表整体人口,而往往来自比较优越的背景。并且大学生们的态度也经常反映出他们的朋友和熟人所持的态度。我们出身的社会背景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判断哪种决定才是恰当的。

但假定你对上述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那么你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少数群体或贫困的背景。你可能是人到中年或已是老年。但无论怎样,都可能进一步总结出以下结论:你可能是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达到现在的位置的;当你告诉朋友以及其他人要你去念大学时,你还曾不得不去克服来自于他们的敌视情绪;或者你可能是拖家带口,整天尽父母之责,但还要参加高等教育的学习。

虽说我们都受到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行为会完全被这些背景所决定。我们拥有并且还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个体性。而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社会对我们的塑造与我们对自己的塑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活动既在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的结构或其面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塑造。

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分类,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赋予结构或模式。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规律性。但是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结构,比如一栋建筑,后者独立于人的行动而存在。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被构筑社会的“一砖一瓦”——也就是你我这样的人——重新构造。

再以咖啡为例。一杯咖啡不会自动到你手上。你要选择比如进哪一家咖啡店,要一杯拿铁还是爱思巴苏^①。当你以及其他数百万人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就在塑造着咖啡市场。你的决定影响着或许远在数千英里之外地球另一边的咖啡生产者的生活。

第二节 社会学思维的发展

刚开始学习社会学时,许多学生会对他们所遇到的思路的多样性感到困惑。社会学从来就不是一门拥有一套人人都认为行之有效的观念体系的学科。社会学家经常互相争论如何从事人类行为的研究,以及如何使研究结果得到最好的解释。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社会学家不能更加持续地达成彼此共识,而自然科学家却似乎有能力如此?答案正在于这个领域自身的本质特性。社会学事关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行为,而研究我们自己正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

1.2.1 理论与理论思路

要想理解某种复杂的事情,比如工业化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提出了理论对于社会学的重要性的问题。事实性研究揭示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但社会学并不单单在于收集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可能有多么重要,多么有趣(比如,我今天早上买了一杯咖啡,花了一定数量的钱,咖啡豆原产中美洲,等等,这些都属于事实)。我们也希望了解事情为何发生,为此我们必须学习构筑说明性的理论。比如说,我们知道工业化对现代社会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工业化的起源和前提又是什么呢?我们为何会发现不同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各有差异呢?工业化又为何会伴随着犯罪惩罚方式的变化,或者家庭婚姻体制的变化?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就必须发展理论思维。

理论就要建构抽象的解释,可以用来说明

^① 拿铁(latte)就是牛奶咖啡,爱思巴苏(espresso)就是蒸馏的浓缩咖啡,大致来说,三分之一杯的浓咖再兑上三分之二杯的牛奶,就成了一杯奶咖了。当然,这样的译法更凸显了咖啡的种类(更重要的是咖啡的产地、制法和饮法)如何成为某些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资本的重要象征——请注意,那种咖啡叫爱思“巴”苏,而不是爱思“帕”苏。——译者注。本书中的下脚注部分如无附加说明皆为译者注,此后不再一一标出。



在这幅老勃鲁盖尔^①的画作中,一大堆民众正在从事各色活动,其中不乏怪异之举。这幅画乍看上去似乎不知所云。然而,画作的标题《尼德兰谚语》(*Netherlandish Proverbs*)却有助于说明其意义。画面实际上展现了一百多条谚语,都是16世纪创作此画时流行民间的。与此类似,社会学家也需要理论作为某种背景脉络,以帮助领会他们观察所见的内中深意。

广泛多样的经验情境。比如说,一种关于工业化的理论关注的就是确定工业发展的各种过程所共享的主要特征,并尝试揭示其中哪些特征在说明这类发展时最为重要。当然,事实性的研究和理论永远也不能完全分开。如果我们要发展有效的理论思路,就只能通过事实性研究加以验证。

我们需要理论来帮助我们把握事实。与通常的主张正好相反,事实并不会自己说话。许多社会学家主要是在做事实性研究,但除非他们得到某种理论知识的指导,否则他们的工作不太可能说明现代社会的复杂状况。

即便是做具有严格的实用目标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

“讲求实际的人”往往对理论家心存疑虑,也很可能自视为非常“脚踏实地”,不需要关注比较抽象的观念,然而,所有的实践决定都潜藏着某些理论假设。比如说一家企业的管理者,对理论可能没什么认识。然而,企业活动的每一种思路都包含有理论假设。因此,管理者会假定,雇员们之所以会努力工作,主要是受到金钱的促动,也就是其薪酬水平的促动。这不仅是对于人类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也是一种出于误解的解释,工业社会学的研究往往

^① 老勃鲁盖尔(约1525—1569)是16世纪最伟大的佛兰德斯画家,其作品大量展现了日常世态,画风粗犷朴素,屡有夸张变形,以悲观立场看待人生,在画作中常以俯视角度刻画所谓“芸芸众生”。

会揭示这一点。

如果没有一种理论思路,我们在开始一项研究或解释研究结果时,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尽管如此,理论在社会学中之所以占据首要位置,对于事实性证据的启迪也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理论思维必须回应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所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包括那些本质上属于哲学性的话题。要确定社会学应当在何等程度上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我们又如何能够对人类的意识、行动与制度做出最好的概括,这些问题并没有轻易的解答。在学科中涌现出的不同的理论思路下,它们都得到了多种方式的处理。

1.2.2 早期理论家

我们人类总是对自己的行为起源怀有好奇心。但是千百年来,我们理解自身的尝试都是仰赖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常常表现在宗教方面。(例如,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前,许多人相信诸神或魔鬼是地震之类自然事件的起因)尽管早期的作者已经就人类行为和社会发表了不少深刻见解,但对于社会的系统研究却是一种比较晚近的发展,其肇始可以回溯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社会学起源的背景是一系列全面变迁,引领潮流的便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这些变迁导致传统生活方式趋于瓦解,使得思想家们尝试发展一种对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全新理解。

一个关键的发展趋势就是用科学取代宗教来理解世界。人性为何?为什么社会有如此的结构?社会如何变迁,为何变迁?19世纪的这些思想家们致力于解答的这些问题,与当今的社会学家所要回答的问题如出一辙。但我们的现代世界已经迥异于过去的世界。而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未来有可能的面貌。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

一 奥古斯特·孔德

诚然,单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创建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的,早期的社会学思想发展是众人努力的结果。然而,通常会授予法国学者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这一殊荣,因为他创造了“社会学”这个术语。孔德最初用的是“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但与他同时代的某些论敌也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孔德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有别于其他人,就又创造了“社会学”这个词,来描述他所想要建立的学科。

孔德的思想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动荡的事件:法国大革命带给社会重大的变革,而工业化的发展则改变着法国大众的传统生活。孔德寻求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能够说明社会世界的法则,就像自然科学能够说明物质世界的运行一样。虽然孔德也认识到,每一门科学学科都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但他仍然相信,所有学科都共享一种旨在揭示普遍法则的逻辑和科学的方法。正如发现自然的法则能使我们控制和预测周遭的事件那样,揭示支配人

类社会的法则也会帮助我们塑造自身的命运,增进人类的福祉。孔德认为,社会基本就像物质世界一样,也遵从着一些不变的法则。

孔德的社会学观点属于一种实证(positive)科学。他相信,社会学应当像物理学或化学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物质世界一样,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只应关注可观察的实体,即可以直接通过经验了解的实体。人们基于细致的感官观察,可以推断出能够说明观察到的现象之间关系的规律。科学家通过理解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以预测未来的事件将如何进展。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路确信,在通过观察、比较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可以生产出关于社会的知识。

孔德的三阶段法则(law of the three stages)宣称,人类理解世界的努力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引领思想的是宗教观念,是有关社会是上帝意志的表达的信念。大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浮现出来的形而上学阶段,开始从自然的而非超自然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由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人的发现和成就引领的实证阶段,则鼓励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世界。孔德遵循这种观点,把社会学看成是继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之后,最后一门发展起来的科学,但在所有科学之中,最有意义,也最为复杂。

孔德晚年依据他的社会学观点,拟订了一些宏伟蓝图,意图重建法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他提倡建立一门“人道教”(religion of humanity),这种宗教崇尚科学理据,抛弃信仰和教条。而这门新宗教的核心将是社会学。孔德敏锐地意识到他所处的社会的状况。他关注着由工业化所产生的种种不平等及其对于社会结合(social cohesion)的威胁。在他看来,要想长期解决问题,就要建立一种道德共识,它将有助于调控社会或维系社会,抗御新的不平等模式。虽然孔德关于社会重建的展望从未实现,然而他在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系统化和一体

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后来社会学作为一种学科的职业化,却是意义重大。

二 埃米尔·涂尔干

另一位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的著作对于现代社会学产生的影响,要比孔德的著作更为持久。虽然涂尔干吸收了孔德理论的某些方面,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前辈中许多人的思想都太过思辨,含糊不清,况且孔德并没有成功地贯彻他基于科学的基础创建社会学的方案。涂尔干把社会学视为这样一门新的科学,可以用来通过经验的方式检验传统的哲学问题,从而阐明这些问题。与前辈孔德一样,涂尔干也认为,我们必须要以像科学家研究自然世界一样的客观性来研究社会生活。他那著名的社会学第一原则,就是“把社会事实当作物(things)来研究!”意思是可以把社会生活严格地当作自然界中的客体或事件来加以分析。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

涂尔干的著述涉及的论题多种多样。他着重探讨的三个主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重要性;个体的兴起和一种新型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社会中道德权威的来源和特征。当我们讨论宗教、越轨与犯罪、工作与经济生活时,还会遇到涂尔干的思想。

对涂尔干而言,社会学的主要学术兴趣就在于研究社会事实。社会学家采用社会学方法,不是用来研究个体,而是用来考察社会事实,即社会生活中那些塑造着我们作为个体的行动的诸多方面,例如经济状况或者宗教的影响。涂尔干相信社会有其自身的实在,也就是说,社会不仅仅包含其个体成员的行动和利益/兴趣(interests)。根据涂尔干的看法,社会事实是外在于个体的行事方式、思考方式和感觉方式,有其自身的实在,外在于作为个体的人的生活和感知。社会事实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们对个体施加某种强制性力量。然而,人们常常并不认为社会事实的约制性质是强制性的。这是因为,人们一般主动地遵从社会事实,相信他们的行事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涂尔干认为,事实上,人们常常只是简单地遵从其所处社会普遍的模式。社会事实能以多种方式约制人的行动,从直接的惩罚(例如犯罪的情况),到社会拒绝(行为不被接受时的情况),再到单纯的误解(语言误用时的情况)。

涂尔干承认,社会事实难以研究。因为社会事实看不见、摸不着,不能被直接观察。所以必须通过分析它们的效果,或者考虑它们的表达方式,诸如法律、宗教文本或书面的行为准则等,看其中蕴含的努力,才能间接地揭示社会事实的特性。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事实的时候,强调摒除偏见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科学的态度要求一种宽广的心智,接受一切感官证据,摆脱先入为主的外来偏见。涂尔干认为,科学的概念只能源自科学的实践。他呼吁社会学家如实(as they really are)研究事物,构造反

映社会事物真实性质的新概念。

涂尔干与社会学的其他创建者一样,对于发生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那些导致社会转型的变革,也是深表关注。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社会团结^①和道德团结,也就是维系社会并使之免于陷入混乱的因素。只有当个体成功地整合到社会群体当中,并且接受一套共享的价值和习俗的调控时,才能维持团结。涂尔干在他第一本重要著作《社会分工论》中,分析了社会变迁,认为工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一种新型团结的兴起(Durkheim 1984[1893])。涂尔干在论证这一观点时,对比了两种类型的团结,即机械(mechanical)团结和有机(organic)团结,并把它们联系到分工,即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别的增长。

根据涂尔干的说法,分工程度低的传统文化是以机械团结为特征的。由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行业相似,因而具有共同的经验和共享的信念,由此维系在一起。这些共享信念的力量是压制性的:任何人一旦挑战习惯上的生活方式,共同体(community)会迅速予以惩罚。这样一来,个人的分歧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因此,机械团结乃是基于共识,基于信念的相似性。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力量导致了分工增长,促成了这种团结的崩溃。涂尔干认为,在发达社会中,工作的专门化(specialization)和社会分化(differentiation)的加剧将会导致一种以有机团结为特性的新型秩序。以有机团结为特征的社会得以维系,靠的是人们在经济上的互赖(interdependence),以及认识到其他人的贡献的重要性。随着分工的扩展,人们变得愈加相互依赖,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由其他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经济互惠和相互依赖的关系逐渐取代了共享信念,来缔造社会共识。

然而,现代世界的变革过程是如此迅猛而深入,从而激发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难题。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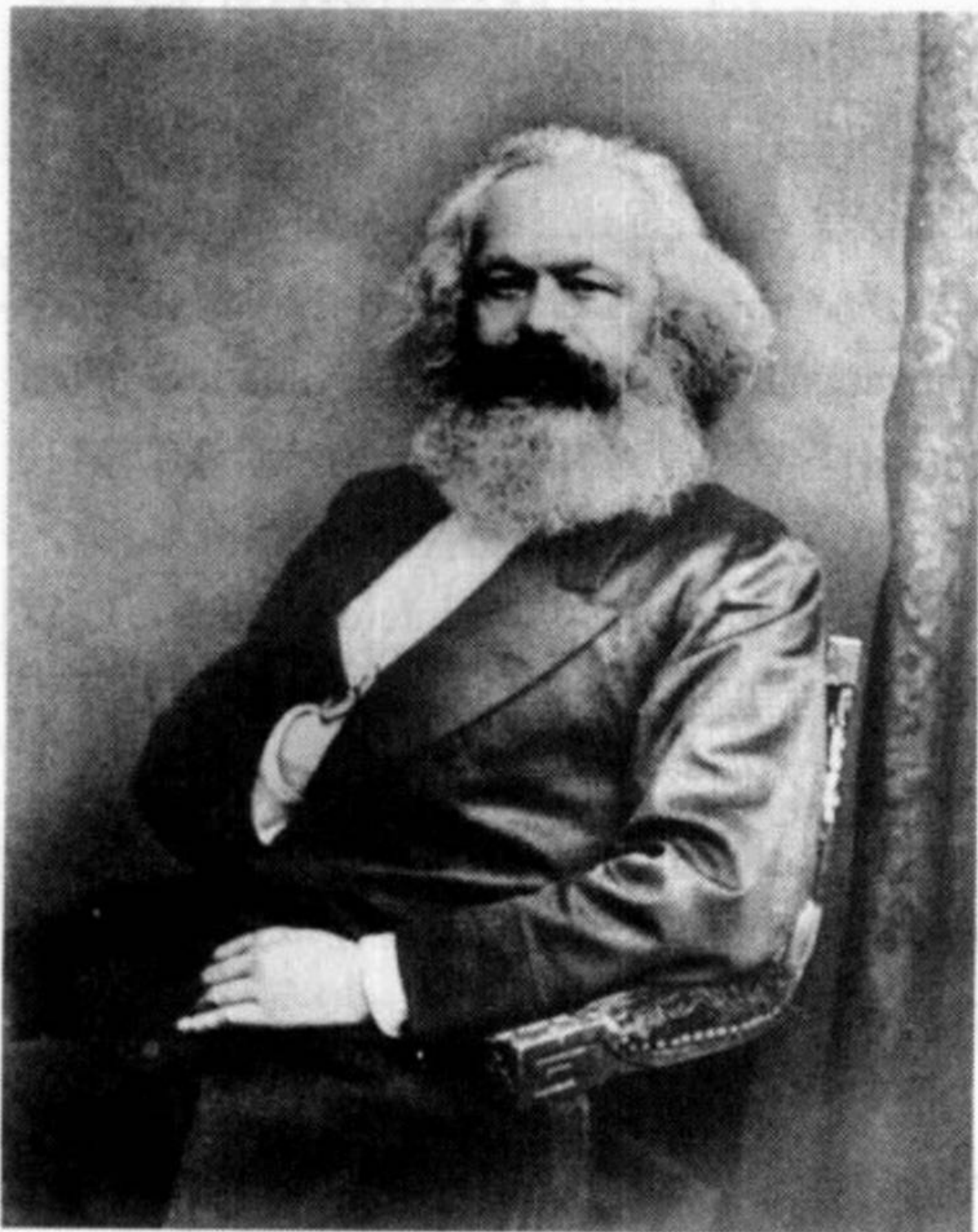
① 此处原文为“solidarity”,又译“连带”。

大大扰乱了传统的生活方式、道德、宗教信仰和日常典范,却没有提供明确的新价值观。涂尔干把这些令人困扰不安的境遇称为失范。这是一种由现代社会生活所激起的茫然感或者绝望感。现代社会的发展极大地动摇了过去由宗教所提供的传统道德控制和标准。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感到,他们日常的生活缺乏意义。

涂尔干最著名的研究之一就是有关自杀的分析(见图文框)。自杀似乎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由个人的极端不快所致。然而,涂尔干却揭示道,社会因素对自杀行为构成了一种根本性的影响,失范便是其中之一。年复一年的自杀率呈现出有规律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必须从社会学角度来加以说明。

三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的思想与孔德和涂尔干的思想截然相反。然而,马克思也和他们一样,力求说明工业革命时代发生在社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会中的变迁。马克思的政治活动使其与德国当局发生了冲突。他在法国短暂逗留,之后流亡英国,定居下来。马克思亲眼看到工厂越来越多,工业生产逐渐增长,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也愈益加剧。他的著作涉猎广泛,反映出他十分关注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集中探讨经济问题的,但由于他总是把经济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所以他的著作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富有社会学的洞察力。即使最苛刻地批判他的论者也认为,他的著作对社会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 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

尽管马克思对诸多历史阶段都有所著述,但他主要关注的还是现代的变迁。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变迁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是一种与此前历史中各经济体系截然不同的生产体系,因为它是面向广大消费者的物品与服务的生产。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两种要素。第一种是资本(capital),即任何资产,包括金钱、机器乃至工厂,可加以使用或投资以创造未来的资产。资本的积累与第二种要素即雇佣劳动力(wage-labour)密不可分。雇佣劳动力指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没有维持生计的手段,必须受雇于资本占有者。马克思相信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即资本家,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大多数人则构成了一个雇佣劳工阶级,或者说是工人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大量原本依靠土地劳作为生的农民迁入了不断扩张的城市,形成了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产业工人阶级。而这类产业工人阶级也被称为无产阶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冲突为阶级关系特征的阶级制度。虽然资本所有者和工人彼此相互依赖,即资本家需要劳动力,而工人需要工资,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是非常不均衡的。这两个阶级之间是一种剥削关系,因为工人对其劳动力的控制权很少,甚或

涂尔干有关自杀的研究

埃米尔·涂尔干对自杀的分析(Durkheim 1952[1897])是探讨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经典社会学研究之一。虽然人类视自己为具有自由意志、实施自由选择的个体,但其实他们的行为常常受到社会的安排和塑造。涂尔干的研究显示,即使像自杀这样高度个体化的行为,也受到社会世界的影响。

在涂尔干的研究之前,已经有过关于自杀的研究,但他是第一个坚持对自杀进行社会学说明的人。以前的著作承认了社会因素对于自杀的影响,但却诉诸种族、气候或精神错乱等方面的因素来说明个体自杀的可能性。然而,据涂尔干的想法,自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只有通过其他社会事实才能加以说明。自杀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集合体,而是具有模式化特征的现象。

涂尔干考察了法国官方的自杀记录,发现某些类型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自杀。例如,他发现男性中自杀的人比女性多;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富人比穷人多;单身者比已婚者多。涂尔干还注意到,战争期间自杀率较低,而当经济处于变革或不稳定期时,自杀率较高。

涂尔干基于这些发现而得出结论: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力量影响着自杀率。他把这种说明联系到社会团结的理念,联系到社会内的两类纽带(bond),即**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和**社会调控(social regulation)**。涂尔干认为,个体如果与社会群体充分整合,其欲望和抱负受到社会规范的调控,就不太可能会自杀。他根据整合和调控相对而言的在场(presence)或缺席(absence),区分出四类自杀:

利己型(egoistic)自杀的标志是与社会的整合程度低。当一个人离群索居,或者当他(她)与某个群体的联系被削弱甚或破裂,就会发生这类自杀。例如,天主教徒中自杀率低,或许可以用他们强势的社会共同体来说明,而新教徒的个人自

由和道德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独自面对”上帝。婚姻可以把个人整合进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从而避免自杀。相比较而言,单身者就会与社会较为隔绝。在涂尔干看来,战争期间的自杀率低,可以视为社会整合程度提高的迹象。

失范型(anomic)自杀是由缺乏社会调控引起的。在此,涂尔干指的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变革或动荡,造成人们“缺乏规范”,形成失范的社会状态。例如处于经济动荡时期或离婚等个人困扰里,规范和欲望丧失了一个稳定的参照点,就会破坏人们所处环境及其欲望之间的平衡。

利他型(altruistic)自杀发生在个人“过度整合”的时候,即社会纽带过于牢固,重视社会甚于重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为了“更高的善”所做出的牺牲。日本的神风飞行员或伊斯兰世界的“自杀炸弹”都属于利他型自杀。涂尔干认为,这些行为属于机械团结盛行的传统社会所特有。

最后一种自杀类型是**宿命型(fatalistic)**自杀。虽然涂尔干认为这种自杀类型与当代没有什么关联性,但他认为,这也是个人受社会过度调控的结果。个体所受的压抑导致人在命运或社会面前感到无能为力。

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自杀率。但是,长久来看,在每个社会内部都会显示出有规律的模式。涂尔干认为,这证明了有一些持续的社会力量在影响着自杀率。这项对自杀率的考察揭示了如何能够在个体行动中发现一般社会模式的问题。

自从《自杀论》发表以来,这项研究遭到了许多异议。特别是涂尔干在使用官方统计资料的时候,没有考虑自杀的非社会影响因素,并且还坚持把所有类型的自杀放在一起进行分类。然而,这项研究仍然是经典的。他的基本论断仍然站得住脚:即使是看似个人行为的自杀,也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

没有,雇主可以通过占有工人劳动的成果获取利润。马克思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争夺经济资源的阶级冲突将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2 社会变迁: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观点是以他所称的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根据这种史观,社会变迁的主要根源并非是人类所持有的理念或价值观。相反,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是经济力量。阶级之间的冲突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它们是“历史的发动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部分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虽然马克思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但他还是探讨了社会是怎样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体系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转移有时是渐进的,有时则因为经济上的矛盾而要通过革命来完成。他勾勒了历史阶段的演进,从狩猎和采集者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古代奴隶制度和以地主与农奴的区分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商人和工匠的出现标志着商业或资产阶级开始取代土地贵族。与其历史观相一致,马克思认为,就像资本家曾经联合起来推翻了封建秩序那样,他们同样要被取代,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制度:共产主义。

马克思相信,必然会爆发一场工人阶级的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开创一个没有阶级、没有贫富之间巨大区分的新社会。他并不是说个体之间的所有不平等都会消失,而是指社会不会再分裂成一个由垄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少数人所组成的阶级,以及从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中获利殊微的人民大众。经济体系将实行公有制,将要建立一个比我们今天所知更为人道的社会。马克思相信,在这种未来社会中,生产将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加先进、更有效率。

马克思的著作对 20 世纪的世界有着深远

的影响。直至不到 20 年前,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像苏联和东欧国家这样的社会中,其政府都声称从马克思的思想中获得了灵感。

四 马克斯·韦伯

与马克思一样,马克斯·韦伯(发音为‘Veybur’,^①1864—1920)也不能简单地冠之以社会学家。他的兴趣和关注点也跨越了许多领域。韦伯出生在德国,并在那里度过大部分学术生涯。他学识渊博,其著作除了社会学,还涵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比较史学等诸多领域。他的大部分著作关注的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现代社会是如何不同于早先的社会组织形式。韦伯通过一系列经验研究,提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确定了一些即使对今天的社会学家而言仍然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核心争论。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① 因此还有“维贝尔”、“维布尔”等中译,目前的“韦伯”也是约定俗成。

韦伯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也试图理解社会变迁的性质和起因。他虽然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同时也对马克思的某些主要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他反对唯物史观,并且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阶级冲突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在韦伯看来,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是理念和价值观也对社会变迁具有同样的影响力。韦伯受到广泛讨论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 1976)提出,宗教价值观,尤其是与清教有关的那些价值观,对于缔造一种资本主义眼光而言至关重要。韦伯与其他早期的社会学思想家不同,认为社会学应该关注社会行动,而不是结构。他坚信人类的动机和理念是变迁背后的动力,观念、价值和信仰具有推动转型发生的力量。根据韦伯的观点,个体有能力自由行动,塑造未来。他与涂尔干和马克思不同,不相信结构外在于或独立于个体而存在,而认为社会中的结构是由行动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形塑的。而社会学的工作正在于理解那些行动背后的意义。

韦伯最有影响的一些著作在分析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各大文明的独特之处时,也反映了对于社会行动的这种关注。他研究过中国、印度和近东的宗教,并且通过这些研究对宗教社会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韦伯将中国和印度的主导宗教体系与西方的做了比较,然后得出结论,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某些特征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强烈的影响。他认为,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眼光的兴起并不像马克思所提出的那样,仅仅源自经济变迁。在韦伯看来,文化观念和价值观有助于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的个体行动。

韦伯的社会学视角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关于理念型的理念。理念型是用来理解世界的概念模型或分析模型。在真实世界里,理念型几乎不存在,即使存在,通常也只是呈现它们的部分属性。然而这些假设的建构非常有用,

因为对于真实世界里的任何情形的理解都可以通过与理念型的对比来完成。这样一来,理念型就成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有必要指出,韦伯所说的“理念”型并不是指这个概念就是值得想望的完美目标,而是指一种特定现象的“纯粹”形式。^①韦伯在他关于科层制形式和市场的著述中都利用了理念型这一概念。

理性化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兴起伴随着社会行动模式的重要转变。他认为,人们正在逐渐摆脱基于迷信、宗教、习俗和悠久的习惯的传统信念,转而青睐强调效率和未来结果的理性的、工具性的计算。在工业社会里,无论是情感,还是仅仅因为世世代代都是那么做的就去做某事,都没有什么容身之地。韦伯将科学、现代技术和科层制的发展整体描述为理性化,即依据效率原则,以技术性知识为基础,来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里,宗教和悠久的习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那么现代社会的标志则是从政治到宗教再到经济行为,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趋于理性化。

在韦伯看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一个更广泛的理性化趋势的明证。支配资本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阶级冲突,而是科学和大规模组织即科层制的兴起(有关科层制,详见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一小节)。韦伯视西方的科学性质为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科层制作为唯一能够把众多的人进行有效组织的方法,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扩展。韦伯使用了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来描写现代世界的科学思维是如何涤荡往昔传袭下来的情感性力量的。

然而,韦伯对理性化的结果并不完全乐观。他担忧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系统,试图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压迫人类精神。他

^① 也因此我们没有像许多中译那样译作“理想类型”。

一位被忽视的奠基者

虽然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无疑是社会学的奠基性人物，但同时代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思想家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像许多学术领域一样，社会学也不能总是履行其理念——充分承认其著作具有内在价值的每一位思想家的重要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古典”时期里，女性和少数种族群体的成员很少有机会成为专业社会学家。此外，即使其中少数人有机会做出了意义长久的社会学研究，也常常被这个领域所忽视。像哈丽雅·玛蒂诺这样的人，理应得到今日社会学家们的承认。

哈丽雅·玛蒂诺

玛蒂诺(1802—1876)被称作“第一位女社会学家”，但就像马克思和韦伯一样，不能把她简单标定为社会学家。她在英国出生并接受教育，写过50多本书和大量文章。玛蒂诺翻译了孔德的社会学奠基之作《实证哲学教程》，并因此在今天被誉为将社会学介绍到英国的人(Rossi 1973)。此外，19世纪30年代，她游历了整个美国。在此期间，她对美国社会进行了系统的第一手研究，并以此为主题写成了《美国社会》一书[Martineau 1962 (1837)]。基于以下原因，玛蒂诺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她认为在研究一个社会时，必须

关注该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主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制度。第二，她认为社会分析必须包括对于女性生活的理解。第三，她第一个把社会学的眼光转向了一些以前被忽视的问题，包括婚姻、儿童、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以及种族关系。她曾经写道：“儿童室、闺房和厨房都是了解一个民族道德风俗、礼仪举止的上好学校。”[Martineau 1962 (1837)]最后，她认为社会学家不能只是观察，还应该采取有益于社会的行动。因此，玛蒂诺积极支持女权运动和废奴运动。



哈丽雅·玛蒂诺(1802—1876)

尤其担心科层制潜在地会产生压抑性和非人性化的效应，以及它对民主制命运的影响。18世纪启蒙时代的议程，即拒绝习俗与迷信，崇尚科学和技术，以此推动进步、积攒财富、增进幸福，也会产生其自身的危险性。

1.2.3 现代理论思路

早期的社会学家的共同愿望就是试图理解他们所处的变迁中的社会。可是他们并不只想简单地描述和解释他们时代的重大事件。更

重要的是,他们力求提出研究社会世界的方式,以便能够从整体上说明社会的运行,特别是说明社会变迁的本质。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见,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研究社会世界时采用的思路非常不同。例如,涂尔干和马克思都强调外在于个体的因素的力量,而韦伯则把个体创造性地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能力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了经济问题的突出地位,而韦伯则认为还有更多的因素也是意义重大的。这类思路上的差异贯穿整个社会学的历史。即使社会学家就研究对象达成了共识,也常常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

下面考察的晚近三种最主要的理论视角,即功能主义、冲突思路和符号互动论,分别与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有联系。在整本书中,你将见到借鉴和阐释这些理论思路的众多主张与理念。

在第四章我们将回过头来更详细地介绍社会学的一些主要理论思路,并考察社会学思想中更为晚近的一些理论进展。

一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协同工作,产生了稳定和团结。根据这种思路,社会学这门学科应该研究社会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部分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例如,分析一个社会的宗教信仰与习俗,我们可以从揭示它们是怎样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相关联的来入手,因为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彼此紧密关联。

要研究某一社会实践或制度的功能,就要分析其对于社会延续所做出的贡献。包括孔德和涂尔干在内的功能主义者经常使用某种有机体类比(organic analogy),把社会的运行比

做一个活的有机体的运转。他们认为,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像人体的各个部分一样,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协同工作。要研究一个身体器官,比如心脏,我们必须说明它是如何与身体的其他部分相联系的。心脏把血液输送到全身,因而它对于维持有机体生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样,要分析一种社会事项的功能,就意味着揭示它对于延续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健康所起的作用。

功能主义强调道德共识^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重要性。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分享共同的价值观时,就存在道德共识。功能主义者认为,秩序和平衡是社会的常态。而这种社会均衡乃是基于社会成员当中存在道德共识。例如,涂尔干认为,宗教强化了人们遵从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而有助于维持社会结合。

直至20世纪60年代,功能主义思想或许是社会学中最主要的理论传统,在美国尤其如此。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和罗伯特·K.默顿(1910—2003)对涂尔干颇多借鉴,是两位最著名的功能主义拥护者。默顿的功能主义主张影响尤其深广。他区分了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就是特定社会活动类型中的参与者所知晓并意欲的那些功能。而潜功能就是参与者未曾意识到的那些活动后果。默顿为了具体说明这一区分,以美国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的霍皮人部落(Hopi Tribe)所施行的祈雨舞为例。霍皮人相信,这种仪式将会带来他们的作物所需要的雨水(显功能),因此他们组织这场仪式并参与其中。但是默顿根据涂尔干的宗教学说指出,祈雨舞本身也具有增进霍皮人社会结合的效应(潜功能)。默顿认为,社会学说明的一项主要内容就在于揭示社会活动和制度的潜功能。

默顿还区分了功能与反功能。所谓探寻社会行为的反功能特性,就是说关注社会生活中

^① 原文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中无此词条。英文为“moral consensus”。

对事物既存秩序构成挑战的那些特性。比如说,如果假定宗教始终是发挥功能的,只会有助于社会结合,就是一种误解。一旦两个群体各自支持不同的宗教,甚至是同一宗教的不同形式,就会导致重大社会冲突,引发广泛的社会动荡。因此,战争常常发生在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之间,比如欧洲历史上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斗。

近年来,因为功能主义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所以不再像从前那样广为流行。许多功能主义思想家(例如帕森斯)过分强调了有助于社会结合的因素,忽视了导致分裂和冲突的因素,不过默顿并不如此。对于稳定和秩序的强调意味着社会中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因素的分裂或不平等被最小化了。此外,功能主义也没有充分重视社会内部的创造性社会行动的作用。许多批评者指出,功能分析赋予了社会它所不具有的社会性质。功能主义者经常提到社会也有“需要”和“意图”,尽管这些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人类个体时才有意义。

二 冲突视角

采用冲突理论的社会学家们和功能主义者类似,也强调社会内部结构的重要性。他们也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模型”,以说明社会是怎样运作的。不过,冲突理论家拒绝接受功能主义对于共识的强调,转而突出社会中分化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集中探讨权力、不平等和斗争的问题。他们往往把社会看作是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群体组成的。存在不同利益,就意味着始终有可能爆发冲突,而某些群体将比其他群体获得更多的利益。冲突理论家考察社会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张力,并力图理解控制关系是如何得以确立并维持的。

冲突理论中一种深具影响的思路就是马克思主义,名称来自卡尔·马克思,他的著作强调阶级冲突。对于马克思的主要观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直到今天,依然有众多理论立场迥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但不管是哪

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社会学传统,因为其作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学分析与政治改革的融合。马克思主义据称要产生一套激进政治变迁的方案。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冲突理论都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有些冲突理论家也受到了韦伯的影响。当代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年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达伦多夫在已经成为经典著作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Dahrendorf 1959)指出,功能主义思想家只考虑了社会的一个侧面,即社会生活中那些和谐、共识的方面。然而,那些以冲突和分裂为标志的领域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达伦多夫认为,冲突主要源自个人和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利益。马克思主要是从阶级的角度来谈利益差别,而达伦多夫则把它们与权威和权力宽泛地联系起来。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握有权威的人与几乎被权威排斥的人的分化,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化。

三 符号互动论

美国哲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的著作对社会学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通过一种称作符号互动论的视角。符号互动论源自对于语言和意义的关注。米德宣称,是语言使我们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个体性,能够像别人观察我们那样从外部认识自己。这个过程的关键元素就是符号。所谓符号,就是用来代表另外一种东西的某种东西。例如,我们用来指称特定对象的词汇,实际上就是代表我们意思的符号。“勺子”这个词就是用来描述我们用以喝汤的器具的符号。非言语的手势或者沟通方式也是符号。向某人挥手或做出粗鲁手势都具有符号价值。米德认为,人类在互动中依赖共享的符号和理解。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因此人类个体之间几乎所有的互动都涉及某种符号的交换。

符号互动论使我们注意到人际互动的细节,以及如何利用这些细节体会其他人的言行。受符号互动论影响的社会学家通常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面对面互动。他们强调这类互动在创造社会及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韦伯对这种理论思路具有重要的间接影响,尽管他也承认诸如阶级、党派、地位群体等社会结构的存在,但他认为这些结构是个体的社会行动的产物。

虽然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我们行动的本质方面,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提出了许多洞见,但是人们一直批评它忽视了一些更大的问题,有关社会中的权力和结构,以及它们是如何约制个体行动的。

有些符号互动论也的确考虑了我们社会中权力和结构的问题,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阿莉·霍克希尔德的《人类情感的商业化》(Hochschild 1983)。霍克希尔德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她旁听了三角洲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空姐培训中心的课程,并访谈了参训人员。她注意到,航班服务员们在接受培训时,除了学习其他技能,还要学会经管她们的情感。霍克希尔德回忆起一位机长兼教员在培训课程上的言论:“现在,姑娘们,我想让你们上机,并且要真正地微笑,”机长教导参训者,“你们的微笑是你们最大的财富,我想让你们上机去用它。微笑。真正的微笑。再用点劲儿。”

霍克希尔德通过她的观察和访谈发现,由于西方经济越来越仰赖于提供服务,因此有必要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的情感风格。对于曾经在商店、餐馆或酒吧等服务行业工作过的人来讲,或许会对霍克希尔德有关航班服务员中的“客服”培训的研究感到十分熟悉。霍克希尔德称这种培训为培训“情感劳动”(emotional work),这种劳动要求你经管自己的情感,以便创造一种大家能够察觉(并能够接受)的面容展示和身体展示。根据霍克希尔德的观点,你所服务的公司不仅有权要求你调动体力,同

时还有权要求你付出情感。在你工作期间,它们拥有你的微笑。

霍克希尔德的研究开启了生活中特殊的一面,大多数人自认理解,但却需要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她发现,服务业劳动者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常常会对自己在工作中出卖的某种特定属性存有距离感。例如,体力劳动者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臂像是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只能偶尔感觉到是那个移动手臂的人身体的一部分。与此类似,服务业劳动者常常告诉霍克希尔德,微笑在她们脸上,但并不属于她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觉得与自己的情感有距离感。如果我们考虑到,事实上,人们通常认为情感是我们身上深层的、人性的成分,这一点就更加耐人寻味。

霍克希尔德的书是符号互动论的一次深具影响的应用。自她的书出版以来,其他许多学者借鉴并发展了她的观点。尽管霍克希尔德是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体系”之一美国开展的研究,但她的研究发现仍然适用于当今时代的许多社会。服务性工作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迅速扩展,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场所投入“情感劳动”。在有些文化里,比如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Inuit),并没有像西欧和北美那样的出于公众礼仪而微笑的传统,已经证明这项任务颇有些艰难。在这些国家,有时要求服务业雇员们参加特殊的“微笑培训课”,这与三角洲航空公司的空姐们所参加的培训课程差别不大。

1.2.4 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

本章至此,我们关注的都是一些理论思路,指的是对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一些广泛的总体取向。然而,我们可以将前文所讨论的理论思路与理论相区分。理论的关注更加集中,体现出试图说明特定的社会状况或事件类型。它们常常构成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建议研究应当致力于考察什么问题。本章前文所

提到的涂尔干的自杀理论就是一个范例。

在社会学家工作的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已经发展出的理论不胜枚举。这些理论有时候阐述得相当精确,甚至偶尔还会用数学的形式表达,尽管这种形式在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的应用比社会学更为普遍。

而有些理论也比其他理论涵盖面宽广得多。至于社会学家在理论探索上追求宏大宽泛是否可取或是否有益,则是众说纷纭。例如,默顿坚决主张,社会学家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所称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上(Merton 1957)。我们应该发展一些更加谨慎的理论,而不要只想着创造宏大的理论图式(比如像马克思那样)。

中层理论很具体,足以通过经验研究得到直接检验,但极为一般化,足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现象。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就是一个例子。该理论认为,人们如何评估他们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们拿自己与什么人相比。因此,剥夺感与个体所体验到的物质贫困水平并不直接对应。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家庭,周围人人情形都差不多,相比于住房条件类似,但邻里大都是豪宅大院、富裕人家的家庭,体验到的剥夺感倒很可能会淡一些。

诚然,一个理论越是宏大宽泛、雄心勃勃,就越是难以从经验的角度加以检验。然而,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应该限定在“中层”。

要评价社会学中的理论,尤其是评价社会学中的理论视角,这项任务颇具挑战性,并且令人生畏。按照定义,理论争论要比更具经验性的争议抽象得多。社会学并不是受单一一种理论思路主导的,这一事实似乎反映了这一学科的弱点。但实质并非如此。彼此竞争的多种理论思路 and 理论相互碰撞,正是社会学事业生机勃勃的表现。在研究人类也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时候,理论的多样性使我们避免了教条。人类行为是复杂而多侧面的,单一一种理论视角远远不能涵盖其方方面面。理论思维的多样

性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研究中加以援用,可以激发想像能力,而这对社会学工作的不断进步至关重要。

1.2.5 分析的层次:

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

本章我们已经讨论到的不同理论视角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各自所指向的分析层次。有关面对面互动情境下的日常行为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微观社会学。而宏观社会学分析的则是大规模的社会系统,比如政治系统或经济秩序。它也包括对长期变迁过程的分析,比如工业主义的发展。粗略看来,好像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彼此界限分明。但事实上,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Knorr-Cetina and Cicourel 1981; Giddens 1984)。

如果我们要理解日常生活的制度背景,宏观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受到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的重大影响。像中世纪时那种文化中的日常活动循环周期,相比于工业化都市环境中的生活,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始终会与陌生人打交道。这种接触可能是间接的、非人身化的。然而,不管我们今天介入到多少间接关系或电子化关系中去,他人的在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在最为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可以选择给熟人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也可以选择不远千里坐飞机去与朋友共度周末。

反过来,微观研究对于描绘宏大的制度模式也是很有必要的。显然,面对面互动是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基础,不管这种组织规模有多么庞大。假设我们研究的是一家商业公司,只需观察面对面的行为,就能大大丰富对于其活动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分析董事会的会议室中各董事之间的互动,各科室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或者工厂车间员工之间的互动。由于有些事务是通过印刷材料、函件、电话或计算机来办理的,因此通过以上方式我们并

不能描绘出整个公司的图景来。不过,我们当然还是能够大大增进对于这一组织如何运作的理解。

在以下各章中,我们还将接触到更多的实例,看看微观情境中的互动是如何影响了更大的社会过程,反过来,宏观系统又是如何影响了更为有限的社会生活背景。

第三节 生活中社会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

正如上文所言,米尔斯在论证其社会学想像力的观点时强调(本章第一节),社会学对

现代理论思路

符号互动论强调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符号交换。符号互动论不同于其他理论,强调小规模的个人互动,而不是整体的社会。

功能主义探讨的是整体的社会,强调一种社会活动对于社会的贡献。默顿的功能主义观尤其影响,强调显功能有时候还不如潜功能重要,前者指的是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所意欲的功能,后者指的是某项社会行为的意外后果。默顿认为,社会学说明的主要内容就是揭示社会行为及制度的潜功能。

当代许多社会理论家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发展出许多冲突理论。而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就是使用阶级概念来研究不平等。

考虑社会学中的理论思路的一种方式就是从分析层次入手。微观社会学就是研究面对面互动情境中的日常行为。宏观社会学则是分析大规模的社会系统。两者是密切关联的。

于我们的生活具有许多切实的意义。

首先,社会学赋予我们某种对于文化差异的意识,使我们可以从许多视角出发探求社会世界。一般说来,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理解别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如果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没有清醒的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几乎不会成功。比如说,如果一个白人社会工作者在伦敦南区一个拉美人为主的社区工作,如果不能培养出对于英国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社会经验的差异的敏锐感受,就不能获得社区成员对他的信任。

其次,社会学研究为评估政策创议的成果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一项实践改革计划可能根本无法实现其设计者所要追求的目标,或者可能会产生不幸的意外后果。例如,二战之后,许多国家在城市中心建起大型公共住宅区。当初这样的设计是想为居住在贫民区的低收入群体提供高标准的住宅,并提供便捷的购物等市政服务。然而,日后的研究表明,许多人从老屋搬进大型公寓楼后都感到孤独和不快。而且,穷人区的高层公寓楼和购物中心经常是年久失修,并滋生了抢劫等暴力犯罪。

第三,从某些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学能够为我们提供自我启蒙,即增进自我理解。我们越是了解自己为何如此行事,越是了解我们社会的整体运行,就越有可能影响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应该把社会学仅仅看成是帮助政策制定者,即有权势的群体,做出清醒的决策。不能假定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总会考虑无权无势者或者弱势人群的利益。自我启蒙的群体经常能够从社会学研究中获益,运用所得到的信息,有效地应对政府的政策,或形成他们自己的政策创议。像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 Anonymous)这样的自助群体,以及环保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都属于直接致力推动实际改革并获得一定成功的社会群体。

最后,还应当指出,许多社会学家作为职

业人员,本人都直接关注实际话题。在产业顾问、都市规划师、社会工作者、人事管理者及其他许多工作岗位上,都能找到接受社会学培训的人。对于社会的理解也将有助于法律、新闻、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职业生涯。

在研究社会学与促进社会良知之间,常常有着某种关联。社会学家是否应当亲身积极倡导并推动改革方案或社会变迁?有些人认为,只有当社会学家在道德和政治论争中可以保持中立,社会学才能够维护其思想上的独立。然而,对当前论争袖手旁观的学者,在评价社会学话题的时候,就一定比其他人更加不偏不倚吗?任何在社会学方面比较成熟的人,对于当今世界上存在的种种不平等,都不会浑然不觉。如果社会学家对于政治话题没有立场,倒是有些奇怪。而要禁止他们依赖自己的专业技

能对政治话题有所表示,也是不合逻辑的。

本章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学这门学科里,我们常常抛开个人对于世界的看法,更加细致地考察那些塑造我们的生活以及其他生活的因素。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努力出现了,而且对于这类社会的研究仍然是其主要的关注点。但是,对于社会互动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性质这些范围广泛的问题,社会学家也怀有浓厚的兴趣。

社会学不只是一块抽象的思想领域。它对人们的生活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学习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不应该是一种乏味的学术努力。要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最佳的途径就是要以一种富有想像力的方式来研究这门学科,并将社会学的观念和发现与你自己的生活情境联系起来。

本章要点

- 1 可以把社会学看成是对人类社会的系统研究,尤其注重现代工业化体系。
- 2 社会学的实践包括进行想像性思考的能力,以及摆脱有关社会生活的固有成见的的能力。
- 3 为了理解过去两三百年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远变迁,诞生了社会学。其中不但包括那些大规模的变迁,也包括人们生活中那些最为私密和个人化的特性的转变。
- 4 在社会学的经典奠基人中,有四个人特别重要: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19世纪中期从事研究的孔德和马克思确立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论题,后来又由涂尔干和韦伯做了进一步阐发。这些论题关心的是社会学的本质,以及现代化给社会世界带来的变迁的后果。
- 5 在社会学中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理论思路。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的争论也难于平息。而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因为要研究我们自己的行为,涉及许多复杂问题。
- 6 社会学中主要的理论思路是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二战以后社会学的发展。
- 7 社会学是一门有着重要实践意义的学科。它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对社会批评以及实际的社会改革做出贡献。首先,增进对于特定社会处境的理解常常会使我们有机会更好地控制它们。与此同时,社会学提供了增强我们文化敏感性的手段,从而有可能在清醒意识到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实际上,我们可以调查采纳特定政策方案之后的效果。最后,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学带来了自我启蒙,为群体和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

网络导航

有关本书的辅读与参考 (Extra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book)

<http://www.polity.co.uk/giddens5/>

政治出版社的社会学新书 (New Sociology books from Polity)

<http://www.polity.co.uk/sociology/>

社会科学信息门户——社会学领域 (Th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Gateway from Sociology)

<http://www.sosig.ac.uk/sociology/>

英国社会学学会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britsoc.co.uk/>

目录

第一节 社会的类型	27
2.1.1 正在消逝的世界:前现代社会及其命运	27
2.1.2 现代世界:工业化社会	31
2.1.3 全球发展	33
第二节 社会变迁	35
2.2.1 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	36
2.2.2 现代的变迁	37
第三节 全球化	39
2.3.1 推动全球化的因素	40
2.3.2 全球化之辩	46
2.3.3 全球化的影响	48
小结:全球治理之需	53
本章要点	53
思考建议	54
阅读指南	55
网络导航	55



第二章

全球化与变迁世界



人类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 50 万年。而作为定居的必要前提的农业，却只有大约一万两千年的历史。至于文明，更不会先于大约六千年以前。如果我们把迄今为止人类存在的全部时间跨度想像为 1 天 24 小时，那么农业诞生于这一天的 23 点 56 分，而文明则出现在 23 点 57 分。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始自

23 点 59 分 30 秒！然而人类在这一天的最后 30 秒内发生的变化，却可能与此前所有时间内发生的变化一样多。

如果我们看一看技术发展的速率，就会感受到现代的变迁步伐。根据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的想法：

现代技术不仅是生产得更多、更快，而且是制造出往日手工艺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的物体。印度最好的纺纱工纺出的纱线，也不如走锭纺纱机那样精致齐整。18 世纪整个基督教王国的所有铁匠铺，也比不上一台带钢轧机做出的钢板那么数量巨大、表面光滑、质地均匀。最重要的是，现代技术创造出了前工业时代难以设想的许多东西：照相机、汽车、飞机、从收音机到高速计算机等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核电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结果便是产量巨



透过一家必胜客 (Pizza Hut) 门店的橱窗眺望吉萨 (Giza) 金字塔，这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与 21 世纪生活的并置。

大增长,物品和服务极大丰富,单凭这就比火的发明以来任何东西都更大地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1750年的英国人在物质方面更接近当年恺撒大军的士兵,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孙辈。(Lan-des 1969)

现代世界特有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制度与哪怕是最近的过去也截然不同。仅仅在两、三百年之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之间,人类社会生活就脱离了已经持续数千年的社会秩序类型。

我们所要面对的未来,比起此前任何世代的处境都更加不确定。诚然,世世代代的先人们的生活处境也始终是不安定的,人们遭受着自然灾害、瘟疫和饥荒的摆布。然而,尽管我们今天生活在工业化国家里的人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瘟疫与饥荒,却不得不应对我们自己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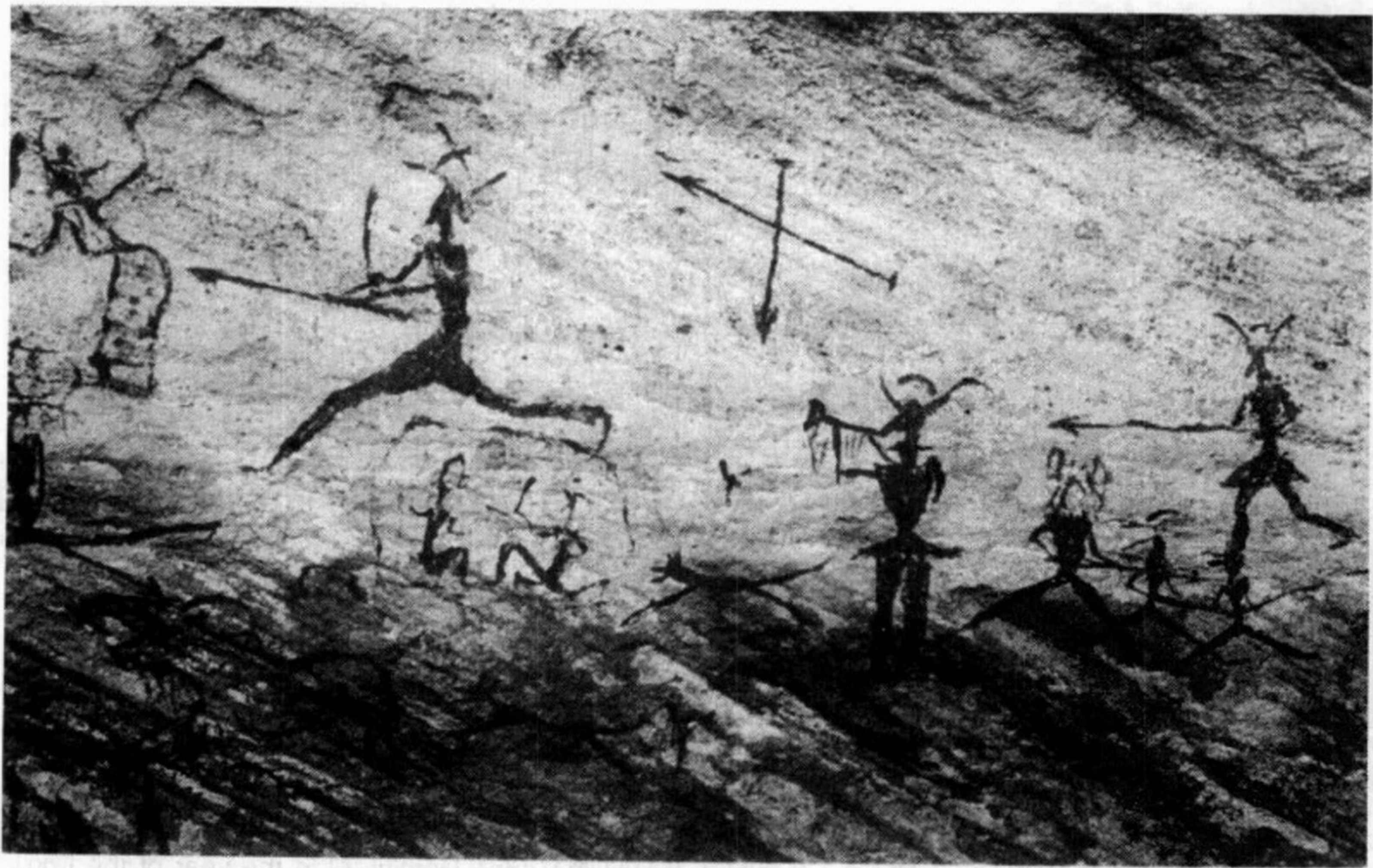
我们在本章接下来将讨论上面概括的广

泛深远的社会变迁的某些原因,并介绍围绕今日最重大的社会变迁即全球化的有关争论。不过,我们首先要来分析往昔曾经存在、今世依然留存的主要社会类型。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那些拥有成千上万的社会,其中许多人还聚居在都市区域。但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远低于现在,只是在过去几百年里,才出现了城市居民占到人口大多数的社会。要想理解现代工业形态之前存在的各种社会形式,我们就必须诉诸社会学想像力的历史向度。

第一节 社会的类型

2.1.1 正在消逝的世界:前现代社会及其命运

欧洲在其地理大发现时代派出的各类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遇上了形形色色的人。人



史前洞穴壁画向我们揭示了最早的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片段。

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其《食人番与国王》中写道：

在有些地方，比如澳大利亚、北极地区、南美和南部非洲的最南端，他们发现有些人群依然生活在非常类似欧洲自身早被忘却的石器时代先祖们的状况之中：二三十人成一群，散居在广阔的地域上，迁徙不定，完全靠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这些狩猎——采集者似乎属于濒危稀有物种。而在其他有些地方，像北美东部的林区，南美的雨林，东亚，人口就要密集一些，有比较持久的定居村落，以农耕为基础，包含一两处大型公有设施，但其武器和工具依然是史前时期的遗存……当然，在其他

地方，探险家们还遇到充分发达的国家和帝国，由专制君主和统治阶级所管治，有常备军防卫。正是这些大帝国，是它们的城市、纪念物、宫殿、庙宇和财富，最初吸引了形形色色的马可·波罗和哥伦布们，不惜穿越瀚海与浩漠。中华帝国，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一块广袤而发达的区域，它的领袖们对来自化外之地的穷国僻土的这些乞求通商者嗤之以鼻，称之为“红面生番”。而在印度，牛是神物，倍受尊崇，人生负累苦乐不均，只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有其前世今生，积德作孽。当时还有印第安人建立的一些国家和帝国，个个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艺术和宗教：印加人建造了宏大的石堡、吊桥、雕饰精美的谷仓，建立

表 2.1 前现代人类社会的类型

类型	存在时期	特点
狩猎与采集社会	公元前*50000 年至今。目前濒临灭绝。	人数不多，以狩猎、捕鱼和采集可食植物为生。 几乎不存在不平等。 等级差异仅限于年龄和性别。
农耕社会	公元前 12000 年至今。目前大部分从属于更大的政治实体，其鲜明特征正在丧失。	以小的农业共同体为基础，没有城镇或城市。 以农业为生，并常常辅以狩猎和采集。 不平等程度甚于狩猎和采集社会。 由酋长统治。
游牧社会	公元前 12000 年至今。目前大多数从属于更大的国家；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瓦解。	规模从几百人到成千数万人不等。 依靠饲养家畜来维持生计。 存在明显的不平等。 由酋长或尚武的国王来统治。
传统社会或文明	公元前 6000 年至 19 世纪。所有传统国家都已消失。	规模庞大，有的有数百万人口（尽管比起更大的工业化社会来讲仍然是小型的）。 存在一些城市，成为贸易和制造中心。 主要以农业为基础。 不同阶层之间有重大的不平等。 有明确的政府机器，由国王或皇帝来领导。

* 许多史学家现在使用公元前[BCE, 即“before the Common Era”(在公共纪元前)]和公元[CE, 即“Common Era”(公共纪元)], 而不是 BC[before Christ (基督诞生前)]和 AD(anno Domini, 即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或 since Christ was born, 基督诞生后)。——作者原注

了国家控制的经济；阿兹特克人膜拜食人心脏的嗜血神灵，不停地找寻生灵祭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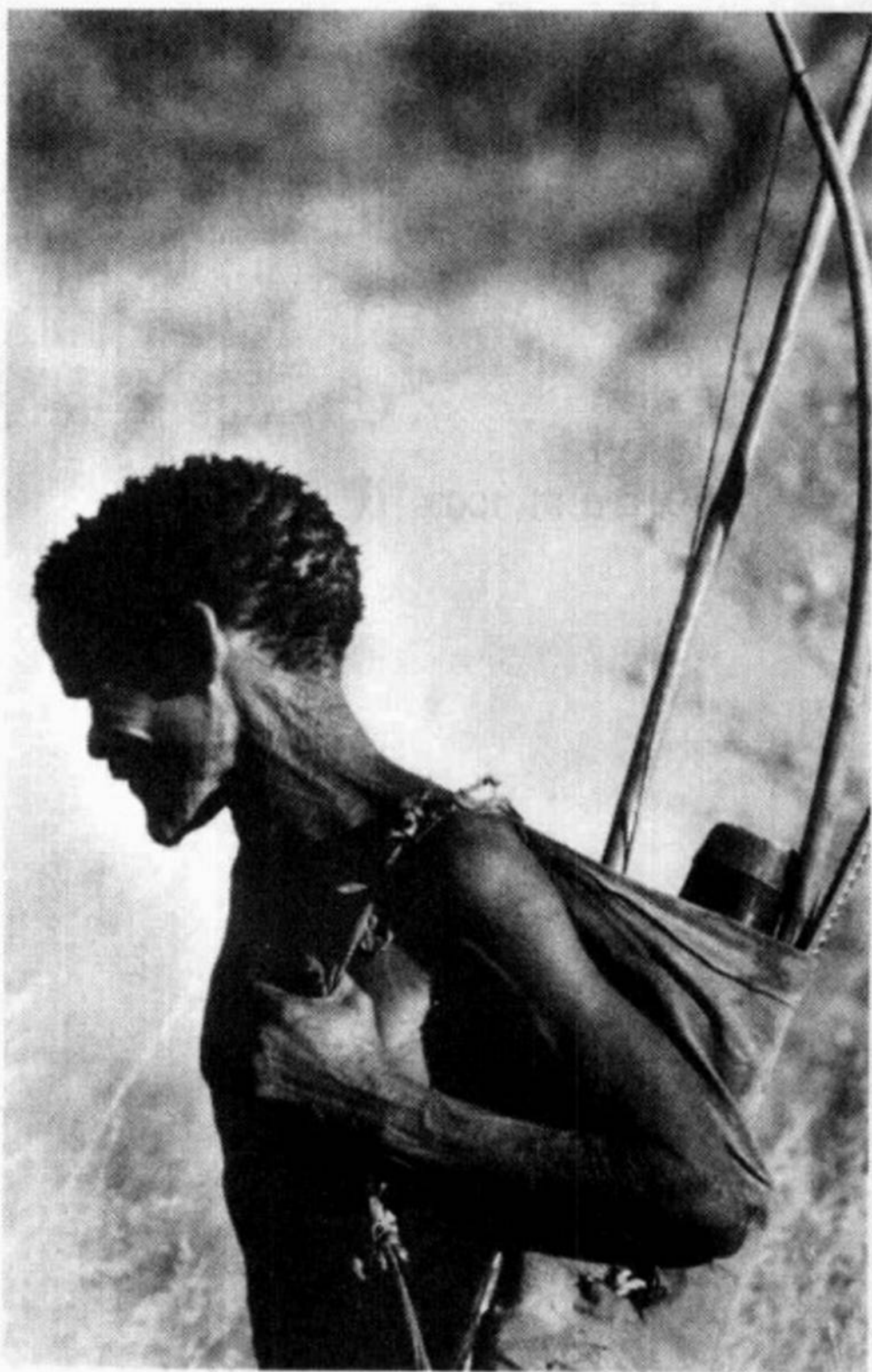
(Harris 1978)

如此看来，前现代社会的种类似乎纷繁无尽，但其实可以归为三种主要类型。按照哈里斯的描述，这三种分别为狩猎与采集社会（“hunters and gathers”，哈里斯在上文描述中称之为“hunter-collectors”）；较大的农耕社会或游牧社会（具有农业或饲养家畜）；非工业文明或传统国家。我们依次来看看这些社会类型的主要特征（参看表 2.1）。

一 最早的社会：狩猎者和采集者

绝大多数人类都曾经生活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狩猎者和采集者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可食植物为生。这些文化仍在世上某些地方存在，比如非洲的一些干旱地区、巴西和新几内亚的丛林地区。然而，大多数狩猎和采集文化都已经遭到了西方文化（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文化）传播的破坏或吞噬，那些保留下来的文化也不太可能长久保持不受侵蚀。目前，世界上只有不到 25 万人以狩猎和采集维持生计，只占世界人口的 0.001%（参看图 2.1）。

相比于更大的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这样的现代社会，大多数狩猎和采集群体中几乎不存在不平等。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狩猎者和采集者对于积累物质财富基本没有兴趣。通常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宗教价值观念以及仪式和庆典。他们所需的物品仅限于狩猎武器、挖掘和筑造工具，一点儿私人衣物以及烹调用具。因此，无论是物质占有的数量还是种类，社会成员之间都不存在多少差别，不存在任何贫



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寥寥无几，例如博茨瓦纳的桑人^①。

富分化。社会位置或等级方面的差异往往仅限于年龄及性别：男人几乎总是狩猎者，而女人负责采集野生作物、做饭和带孩子。不过，男女之间这种分工意义重大：男人往往主导公共和庆典的位置。

狩猎者和采集者并不仅仅是一些“原始”人类，其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并非不再有任何意味。研究他们的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某些制度远远称不上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特征。当然，我们不应该把狩猎和采集者所生活的环境理想化，但至少他们远离战争，没有财富和权力上巨大的不平等，注重合作而非竞争，这些都富有启示，提醒我们看到，现代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世界并不必然等同于“进步”。

^① 原文此处为“San bushmen”，桑人是布须曼人的自称。

.....



图 2.1 狩猎和采集社会的衰落
资料来源:Lee and De Vore (1968)



这些来自坦桑尼亚的马萨伊(Masai)武士属于今世尚存的少数游牧人群。

二 游牧与农耕社会

大约两万年以前,一些狩猎采集群体开始饲养家畜,开垦固定的小块田地,以此来维持生计。游牧社会是指那些主要依靠家畜而生存的社会,而农耕社会则是种植庄稼(从事农业)。许多社会兼有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

游牧者依据他们所生存的具体环境,饲养和放牧牛、绵羊、山羊、骆驼和马等动物。现代世界仍然存在不少游牧社会,尤其集中于非洲、中东和中亚地区。这些社会常常位于有着丰茂草地的区域,或是在沙漠、山区。这类区域不适于发展丰饶的农业,但可以养活多种牲畜。游牧社会经常随着季节变化在不同地区之间迁徙。由于游牧的习性,这些社会的人们即使生活方式在物质方面比狩猎和采集者更为丰富,通常也不积攒很多的物品。

从某一时期开始,狩猎与采集群体开始播

种自己的庄稼,而非只是简单地采集野生的植物。这一活动便是通常所谓“园艺”的开始,人们使用简单的锄头或挖掘工具来开垦小片园地。园艺类似于游牧,比狩猎和采集提供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因此能够供养更大的共同体。由于并非迁徙无定,靠园艺种植为生的人们就可以比游牧、采集和狩猎的共同体有更多物质财富上的储备。世上有些人群依然主要以园艺种植维持生计(参看表 2.2)。

三 非工业化文明或传统文明

自公元前 6000 年起,我们发现证据存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与早期的社会类型有明显的区别(参见图 2.2)。这些社会以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在权力和财富方面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不平等,并与国王或皇帝的统治维系一体。由于它们使用书写文字,并且科学和艺术也繁荣起来,因此常常被称作文明(civilizations)。

最早的文明发轫于中东地区,大多位于肥沃的河流流域。中华帝国始自公元前约 2000 年。在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当时也有强大的国家。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也存在过一些大规模的文明,像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人,以及秘鲁的印加人。

大多数传统文明社会也是帝国,它们通过征服和吞并其他民族来达到如此规模(Kautsky 1982)。例如古代的中国和罗马即是如此。罗马帝国在公元一世纪的鼎盛时期,疆域从欧洲西北部的不列颠直至中东以远。而绵延两千多年、直至 20 世纪初的中华帝国,其疆域包括了现代中国目前领土所拥有的亚洲东部广阔地区的大部分。

2.1.2 现代世界:工业化社会

是什么破坏了主宰整个历史直至两个世纪以前的社会形态呢? 答案一言以蔽之,就是

表 2.2 依然留存的某些农耕社会

国家	农业劳动力百分比
卢旺达	90
乌干达	82
尼泊尔	81
埃塞俄比亚	80
孟加拉国	63
截然不同的工业化国家	
日本	5
澳大利亚	5
德国	2.8
加拿大	3
美国	0.7
英国	1

工业化,这个术语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介绍过了。工业化指的是以使用无生命的动力资源(如蒸汽或电力)为基础的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工业社会(有时也被称为“现代社会”或“发达社会”)与以前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迥然不同,其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

的起源地欧洲。

即使在最为发达的传统文明中,大多数人从事的仍然是土地耕作。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只能允许一小部分人摆脱农业生产的束缚。与此相反,当今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部分就业人口都在工厂、办公室、商店里工作,而非从事农业生产(即如我们在表 2.2 中之所见)。90%以上的人居住在城镇和都市,这里拥有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并且还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大都市在规模上要比传统文明中的城市住区大得多。在城市里,社会生活要比以前变得更加非人身化和匿名化,而且,我们日常遇到的往往是陌生人而不是熟人。大型组织,比如工商企业或政府机构,开始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

关于城市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的作用,参阅第二十一章第三节。

现代社会的另一特征与其政治体制有关。比起传统国家的政府形式,这些政治体制更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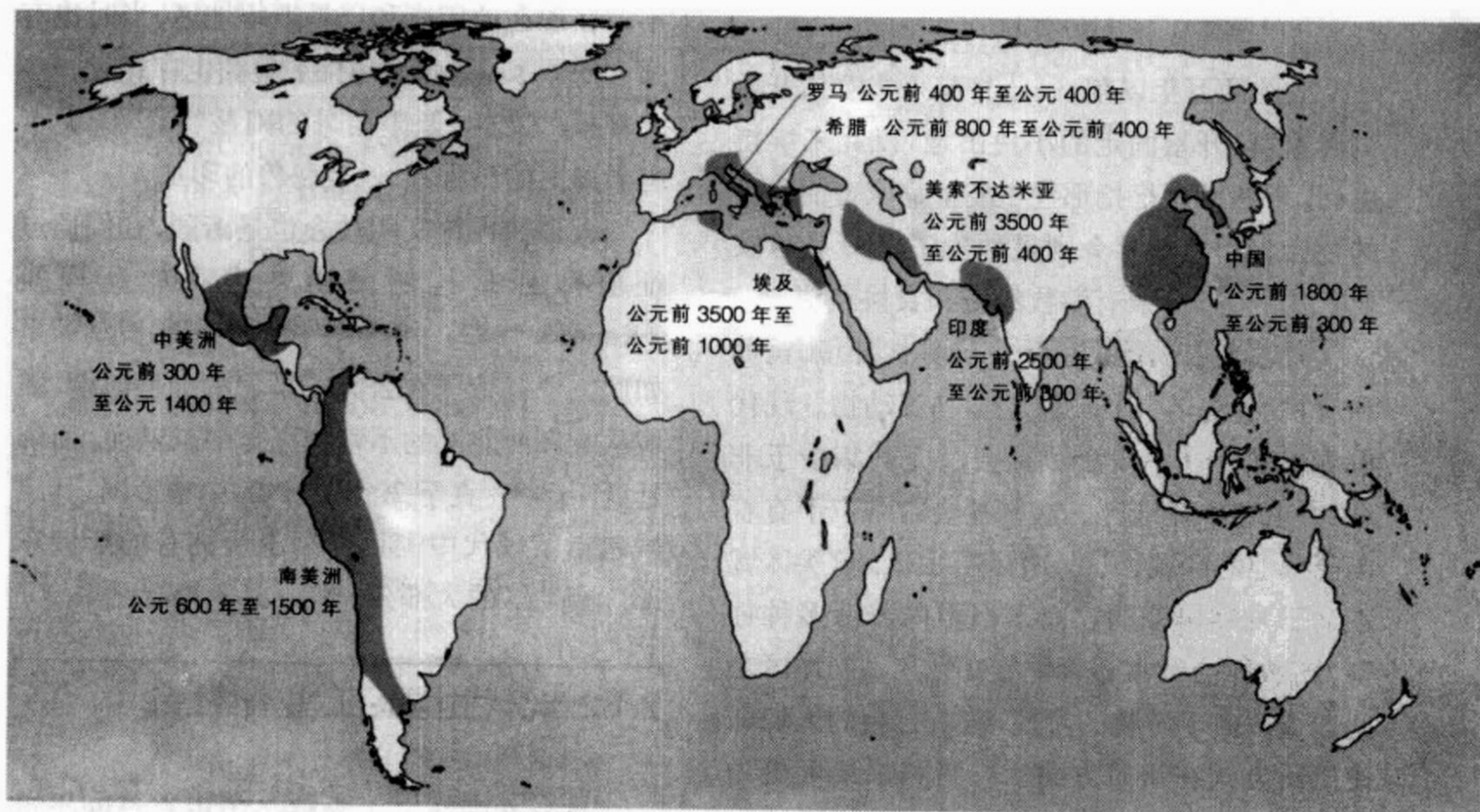


图 2.2 古代世界各大文明

发达、更趋集中。在传统文明中,政治权威(王室或帝王)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相对自治的地方村落的臣民来说,几乎不能直接影响他们的风俗习惯。伴随着工业化,交通和通信变得非常迅捷,由此形成了一个更为整合一体的“国族”(national)共同体。

工业社会是第一批出现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彼此之间有明确划定的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不像传统国家那样由模糊的边疆区域隔开。国家政府对其公民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权力,制定适用于所有居住在疆域内的人的法律。英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工业技术的运用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这样的和平进程。从工业化进程伊始,现代生产过程就被用于军事方面,这就彻底改变了发动战争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武器以及军事组织形式远比那些非工业文化发达。胜出一筹的经济实力、政治凝聚力和军事优势,这几方面加在一起,使得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似乎不可阻挡地扩展到世界各地。

2.1.3 全球发展

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在曾经由传统社会占据的众多地区建立起了殖民地,在有必要的地方运用了优势的军事力量。虽然到了今天,这些殖民地几乎都已经赢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依然是形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全球社会版图的核心进程。我们在前一章谈到咖啡贸易的发展时,已经提到了殖民主义(第一章第一节)。在某些曾经是狩猎和采集群体居住的人烟稀少的地区,例如北美、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欧洲人成为主要居民。而在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当地居民仍占多数。

这些类型中的第一类社会,包括美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那些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基本上低得多,常常被称作欠发达社会,或发展中世界。这类社会包括中国、印度、大部分非洲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加纳和阿尔及利亚)以及南美国家(例如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由于这些国家许多都位于美国和欧洲的南部,有时被统称为南方,相对于较为富裕、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北方。

你可能常听人说发展中国家,指的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第三世界一词起初是20世纪初期划分三个主要社会类型时提出来的。^①第一世界的国家当时包括(现在也是)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含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和美拉尼西亚)、南非和日本。几乎所有的第一世界国家都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第二世界的社会指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和匈牙利等国。第二世界的社会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只允许极少数的私有财产或竞争性的经济企业存在。第二世界国家也是一党制国家:共产党既控制政治体制也控制经济体制。在大约75年的时间里,一种全球性的对抗影响了世界历史,对抗的一方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另一方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日本。现在这种对抗已经结束了。随着冷战结束,共产体制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第二世界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即使在社会学的教科书中有时还在使用这种三个世界的划分,但不管它曾经是一种多么有用的描述世界各国的方式,如今也已寿终

^① 原文如此。一般认为此名词最先由经济学家 Alfred Sauvy 于 1952 年提出。冷战时期,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为表示并不靠拢北约或华约任何一方,用“第三世界”一词界定自己。更有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相继出现的国际运动作为第三世界团结的标志。中国人更为熟悉的是毛泽东 1974 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划分的三个世界。

正寝了。一方面,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国组成的第二世界已经发生了变革,即使是像中国这样的例外,也正在迅速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可以说,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样的等级排列,反映了一种价值评判,其中的“第一”意味着“最佳”,而“第三”意味着“最差”,因此最好避而不用。

一 发展中世界

许多发展中社会都位于曾经受过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少数一些殖民地区很早就赢得了独立,比如海地,早在1804年1月就成立了第一个黑人自治的共和国。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地于1810年获得独立,巴西则在1822年摆脱了葡萄牙人的统治。然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获得独立,并且常常经过了反击殖民统治的浴血斗争。这样的例子包括印度以及其他一系列亚洲国家(如缅甸、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和非洲国家(例如肯尼亚、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和阿尔及利亚)。

发展中国家里的有些人们或许仍然以传统的方式生活,但是这些国家已经与早期的传统社会形式截然不同。它们的政治体制效仿的是最初在西方社会建立的体制,也就是说,它们属于民族国家。尽管大部分人口都还居住在乡村,但很多社会正在经历迅速的城市化进程。(第二十一章将讨论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增长)虽然农业仍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但现在生产农作物经常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销售,而不是为了在当地消费。发展中国家并非仅是“滞后于”更为工业化的地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同西方工业制度的接触之中,而这种接触瓦解了早期更为传统的体系。

近年来,这些社会中最为贫困的一些状况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目前仍有大约1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

第十一章将深入讨论全球贫困。

世界上的穷人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但这些地区之间也存在某些重大差别。例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贫穷程度在过去10年间下降了,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穷程度则上升了。在1990年代,这个地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41亿增加到3.15亿(World Bank 2004)。南亚、拉美和加勒比海等地部分地区的贫穷程度也有显著的增加。世界上许多最穷的国家还遭受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偿还外债利息的数目经常多于政府在健康、福利和教育方面的开支。

二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但有一部分已经成功地踏上了工业化的进程。它们有时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拉美的巴西和墨西哥,以及东亚的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最成功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例如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率是西方工业化经济体的几倍。1968年,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位列世界上前30名出口国,但在25年后,韩国已经跻身前15名。

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展现出非常持久的经济繁荣。它们既促进国内增长,也大举投资国外。韩国的钢产量在过去10年翻了一番,而其造船业和电子业也位居世界前列。新加坡正在成为东南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中国台湾地区在制造业和电子业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所有这些发展直接影响到美国这样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钢产量在世界钢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30年里已经明显降低。(现代世界诸社会类型的概括参看表2.3)

第二节 社会变迁

我们在本章伊始已经看到,截然不同于哪怕是最近的过去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特征。社会变迁很难定义,因为它含有万事万物无时不变的意思。日日新,时时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经指出,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第二次踏入时,河流已经不同了,因为水是流动的,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这一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通常我们所说的,当然还是同一个人前后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河流在形

状或形式上保持了充分的连续性,而那个被河水打湿了脚的人,在体格和个性上也保持着充分的连续性,因而可以说,两者在变化发生期间仍然是“同一的”。有鉴于此,社会学家如何说明业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迁过程?

要分辨显著的变迁,就要揭示在一定时期内某一对象或情境的根本结构的改变程度。以人类社会为例,为了弄清系统的变迁程度和变迁方式,我们就必须揭示在某一特定时期,基本制度有何种程度的改变。所有关于变迁的说明也都包括指出什么东西稳定不变,以之作为测量变化的基线。即使是快速变动的今日世界,也与遥远的过去有一脉相承之处。例如,主

表 2.3 现代世界中的社会

类型	存在时期	特征
第一世界社会	18 世纪至今	以工业生产和大体自由的企业为基础。 大多数人生活在城镇和都市,极小部分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 虽然不如传统国家那样明显,但阶级之间仍然存在重大不平等。 鲜明的政治共同体或民族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第二世界社会	20 世纪早期 (1917 年俄国革命后)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同样以工业为基础,但经济体制属于中央计划。 小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人住在城镇和都市。 较大的阶层不平等仍然存在。 鲜明的政治共同体或民族国家。 到 1989 年为止,包括苏联和东欧。但社会和政治变迁开始使这些国家按照第一世界社会模式向自由企业的经济体制转变。
发展中社会(第三世界社会)	18 世纪(大部分是殖民地)至今	大多数人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农业生产。 一些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 一些国家存在自由企业制度,另一些国家则实行中央计划体制。 鲜明的政治共同体或民族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以及绝大多数非洲和南美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	以工业生产和大体自由的企业为基础的前第三世界国家。 大多数人生活在城镇和都市,小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 阶级之间存在重大不平等,比第一世界的社会更加明显。 人均收入比第一世界社会要少得多。 包括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巴西和墨西哥。

要的宗教体系,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源自两千多年前的观念和仪轨依然保持着联系。不过,现代社会中大多数制度的变迁速度显然要大大快于传统世界。

2.2.1 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社会理论家们始终致力于创立一套说明社会变迁性质的宏大理论。但是,人类社会从狩猎和采集及游牧社会到传统文明,最后到今天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没有任何一种单因理论可以说明这种发展的多样性。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举出持续影响着社会变迁的三点主要因素:文化因素、物质环境和政治组织。

一 文化因素

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首先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包括宗教、沟通系统和领袖行为等的效应。宗教在社会生活中既可以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也可以是一种革新的力量(参看第十四章)。某些形式的宗教观念和仪轨尤其强调要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仪式,从而制约了变迁。不过,韦伯也曾强调指出,在引发社会变迁的诸多压力中,宗教信念常常起到动员的作用。

影响变迁的特征和速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因素,就是沟通系统的性质。例如,文字的发明为记录的留存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可能不断加强对物质资源的控制,发展起大规模的组织。此外,文字还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关系的认识。一个能够通过书写来记录过去事件的社会,也就知晓了他们自己的历史。知晓历史便能够形成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总体动态或轨迹的认识,从而积极地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领袖行为也应当归入文化因素。领袖个体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只要想一想伟

大的宗教人物(如耶稣)、政治和军事领袖(如尤利乌斯·恺撒)或者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创新者(如艾萨克·牛顿),我们就能知道实情确实如此。一位领袖如果能执行充满活力的政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或者彻底改变原来的思想模式,就可以推翻此前确立的秩序。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考察了克里斯玛领袖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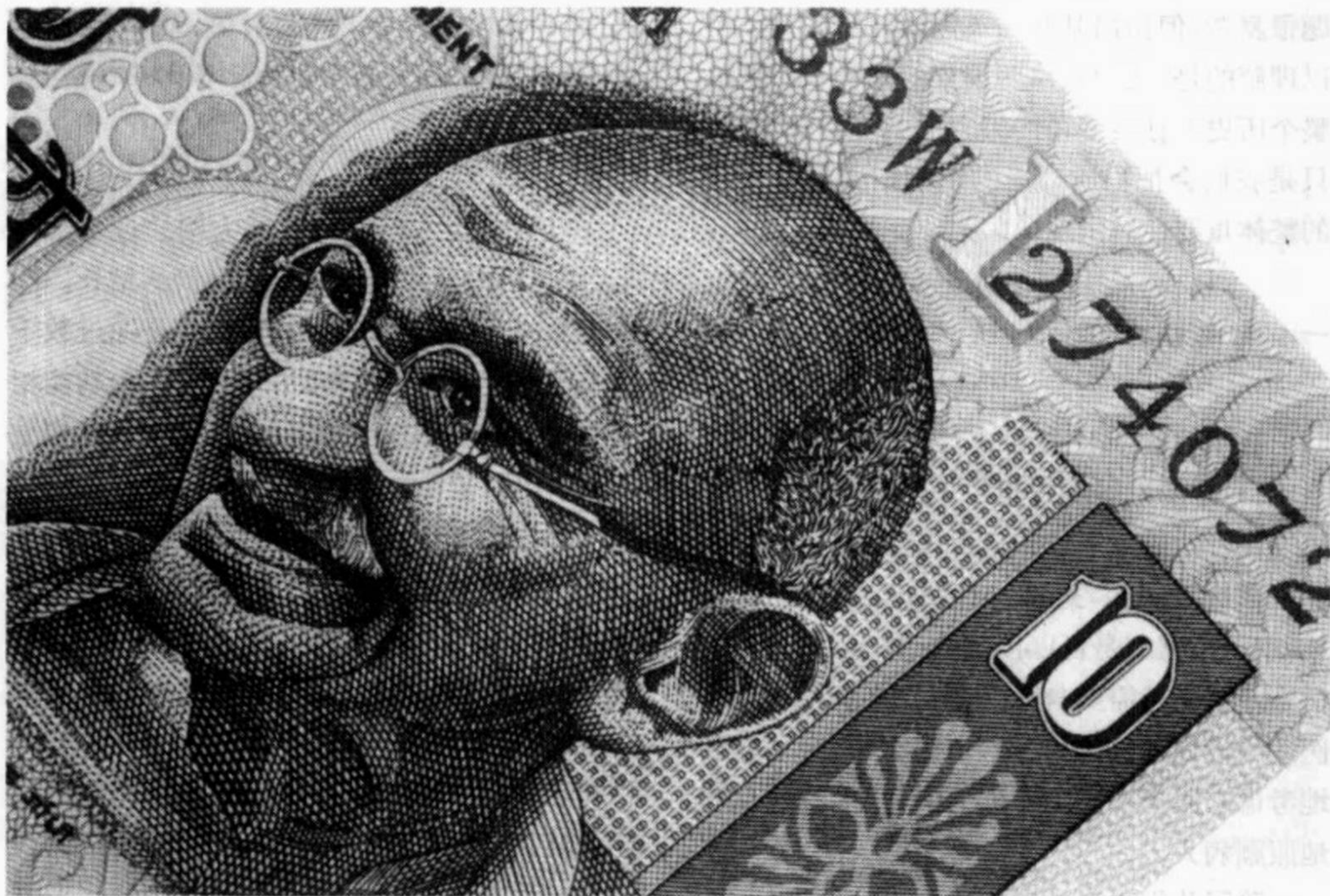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第二节第四小节讨论了韦伯的领袖观。

然而,只有存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个人才能登上领袖地位并发挥作用。例如,阿道夫·希特勒之所以能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攫取权力,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困扰这个国家的张力和危机。如果不存在那些情势,他可能只是一个政治小帮派里鲜为人知的人物。稍晚一些,圣雄甘地,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著名的和平主义领袖,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战争和其他事件已经动摇了印度现存的殖民制度,甘地才有能力将他的祖国从英国的统治中独立出来。

二 物质环境

其次,物质环境也会对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在人类必须依据气候状况组织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环境条件下,这一点最为显著。居住在两极地区的居民,必然形成不同于亚热带居民的习惯和习俗。阿拉斯加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遵循的社会生活模式,往往不同于生活在暖和得多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们。除了短暂的夏季外,阿拉斯加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室内,由于居住环境恶劣,他们安排室外活动十分小心。

不那么极端的物质条件也会影响社会。澳洲土著一直都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因为这块大陆上几乎没有什么本土植物适宜常年培育,



图为一张印度钞票上的圣雄甘地头像,是他促成了印度摆脱英国统治而获得独立。

也没有什么动物可以驯养来发展游牧业。世界的早期文明大多起源于拥有肥沃农业用地的地区,如河流三角洲。是否拥有便利的陆路交通和海岸线也十分重要:那些被崇山峻岭、茂密丛林或浩瀚沙漠分隔孤立的社会,常常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相对的稳定。

然而环境对社会变迁的直接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人们经常能够在并不怎么宜人居住的地区生产出可观的财富。例如阿拉斯加人就是如此,尽管环境严酷,他们仍能开发石油和矿产资源。相反,狩猎和采集文化通常存在于尚未涉足畜牧或农业生产的非常富饶的地区。

三 政治组织

第三点强烈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是政治组织的类型。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这种影响极小,因为不存在可以动员整个共同体的政治权威。然而,在其他各类社会中,存在多种鲜明

的政治力量,如酋长、地主、国王和政府,极大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政治制度并非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基础性的经济组织的直接体现:生产制度相似的社会中可能存在迥异的政治秩序类型。比如,一些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曾经是威权主义的(例如纳粹德国和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时的南非),而另一些则要民主得多(例如美国、英国或瑞典)。

军事力量在大多数传统国家的建立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并同样从根本上影响着这些国家随后的生存和扩张。但是生产力水平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同样是间接的。例如,即使会使其余大部分人口陷入贫困,统治者也可能选择把资源投入军事建设。

2.2.2 现代的变迁

在最近 200 年来的现代性时期,社会变迁的速度急剧加快,如何说明这种现象? 这个问

题很复杂,但指出某些相关因素并不困难。可以理解的是,我们对这些因素的归类与对影响整个历史上社会变革的因素的归类方式类似,只是我们会把物质环境的影响归入经济因素的整体重要性。

一 文化影响

在现代影响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中,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世俗化都有助于形成现代视角的批评性和创新性特征。我们不再会仅仅因为风俗习惯的背后有古老的传统权威,就认为它们是可以接受的。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需要一种“理性”的基础。例如,医院的设计不再主要考虑传统趣味,而是更多地考虑它服务于医院目标的能力,也就是有效地照顾病人。

除了我们思考的方式,观念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自我完善、自由、平等和民主参与的理念,大部分是过去两三个世纪的产物。这类理念有助于动员社会和政治变迁(包括革命)。这些理念不容于传统,但却昭示了人类在追求改善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虽然这些理念最初产生于西方,但却在实践应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真正普遍的,推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变迁。

二 经济影响

在各类经济影响中,工业资本主义的后果最为深远。资本主义与此前存在的生产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蕴含着生产的不断扩大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在传统生产体制中,生产水平由于受到习惯性、常规性需求的限制而相当静滞。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科学也日益渗入到这个过程之中。现代工业中技术创新的速度远远快于此前任何类型的经济秩序。

我们在第十一章将进一步探讨经

济因素对于社会变迁的影响,尤其是探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该章第三节第一小节)。

以信息技术目前的发展为例。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的力量有了成千上万倍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的一台大型计算机,是通过数千条手工连接线连接起来的。而今日一台功能相当的装置不仅体积小得多,并且只需要寥寥数个集成电路元件。

科学技术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可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经济因素起作用的,但它同时也延伸到经济领域之外。科学技术既影响政治和文化因素,同时也被政治和文化因素所影响。例如,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收音机和电视机等现代传播形式的创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电讯传播形式近年来已经给政治领域带来了某些变化。收音机、电视机及其他电子传媒也开始改变了我们思考和感受世界的方式。

三 政治影响

现代时期对于变迁的第三类主要影响在于政治发展。在过去二百年间,国家之间扩张权力、扩充财富、以武力压制竞争者的斗争,一直是充满能量的变迁源泉。传统文明中的政治变迁通常仅局限于精英。举例来说,一个贵族家族能够取代另一个成为统治者,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则保持相对的稳定。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却不是这样,政治领袖和政府官员的活动经常会影响到大众的生活。无论就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实质而言,政治决策都比从前更多地推动和指引着社会变迁。

可以肯定,在过去两三个世纪里,政治发展对于经济变迁的影响,与经济变迁对于政治的影响不相上下。现在政府在刺激(有时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起到主要作用,而且在所有的工业化社会中都存在国家对于生产的

高度干预,政府无疑已经成为最大的雇主。

军事力量和战争也一直具有深远的重要性。17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使它们的影响遍及世界,同时也为西方生活方式向全球的传播提供了根本的后盾。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影响深远:许多国家遭到重创,其重建过程带来了重要的制度变迁。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即是如此。甚至连英国这样的战胜国,也因为战争对经济的影响而经历了重大的内部变迁。

第三节 全球化

最近几年,在政治、商业和传媒领域的争论中,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十年前,全球化这一词语还相对不为人知,现在则几乎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全球化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世界

中,因而个人、群体和国家都越来越相互依赖。

全球化经常被单纯地描绘成一种经济现象。有关跨国公司的作用已多有论述。它的大规模活动超越了国境,影响着全球生产过程和国际劳力分配。另外一些人谈到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电子一体化和规模庞大的全球资本流动。还有一些人着重强调了世界贸易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涉及的商品和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虽然经济力量是全球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如果认为它是全球化唯一的动因则是错误的。全球化是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由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所推动的,这种发展使得全世界人们之间互动的速度加快,范围拓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一届足球世界杯赛,由于全球电视网络,有几场比赛的全世界观众以数十亿计。



街头网吧为那些家里不能上网或出门在外的人提供了上网渠道。

2.3.1 推动全球化的因素

如何说明全球化的兴起?正如我们所见,对于所有社会变迁的说明都是复杂的,但也不难指出一些有助于当代社会中全球化的兴起的因素,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兴起,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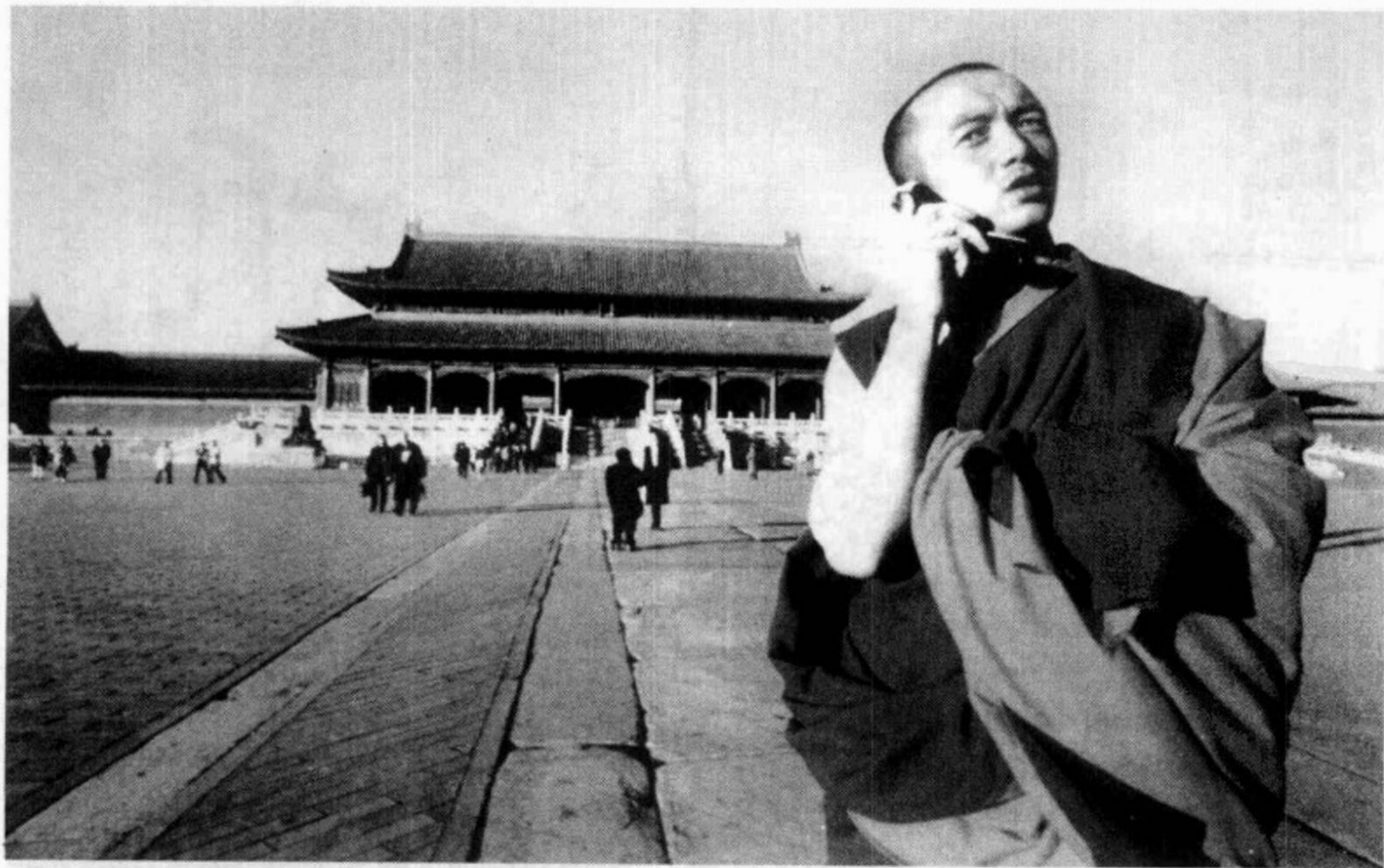
一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兴起

技术和世界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重要进展,推动了全球通信的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电信流在范围和强度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电话通信主要借助机械纵横制交换机,通过电线和电缆传送模拟信号,而现在则是通过集成系统,把数量庞大的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压缩并传送。电缆技术已经变得更有效,也更廉价。光纤电缆的发展极大地扩充了所能容纳的信道的数量。最早穿越

大西洋的电缆铺设于20世纪50年代,最多容纳不到100条声道;而到1997年,单单一一条越洋电缆已经能够容纳大约60万条声道(Held et al. 1999)。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通信卫星的广泛应用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通信的发展。今天,200多个卫星所组成的通信网络促进了全球信息的传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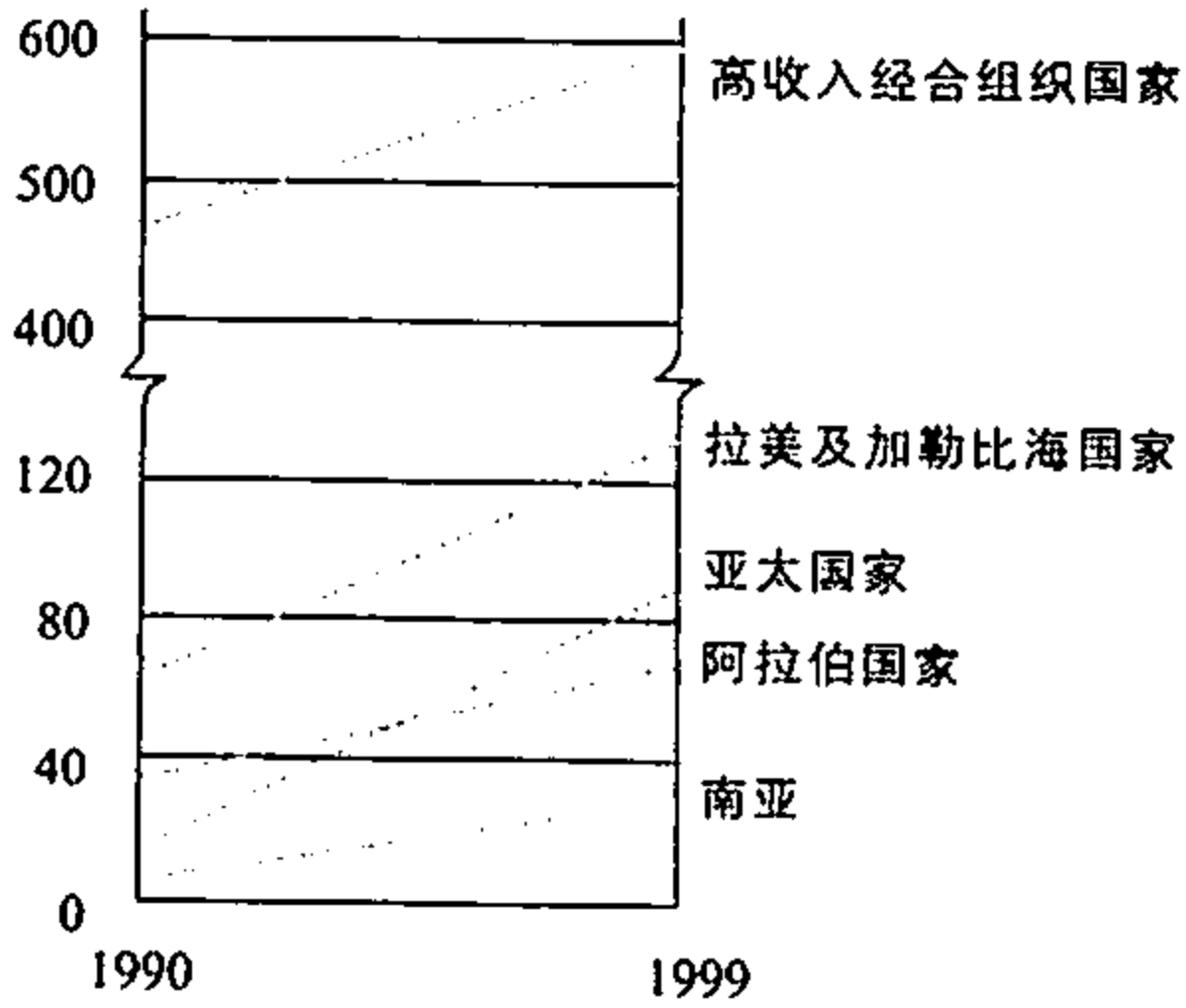
这些通信系统的影响是令人惊愕的。在电信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无论居家还是办公都与外部世界有多种连接,包括电话(含座机和手机),数字电视、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成为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通信工具,1998年中期全世界大约有1.4亿人在使用,而到2005年,估计约有10亿人在使用(参看图2.3)。

这些技术形态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位于地球两端——如东京和伦敦——的两个人,不仅可以实时交谈,还可以借助卫星技术向对方发送文件和图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使用加速并深化了全球化过程。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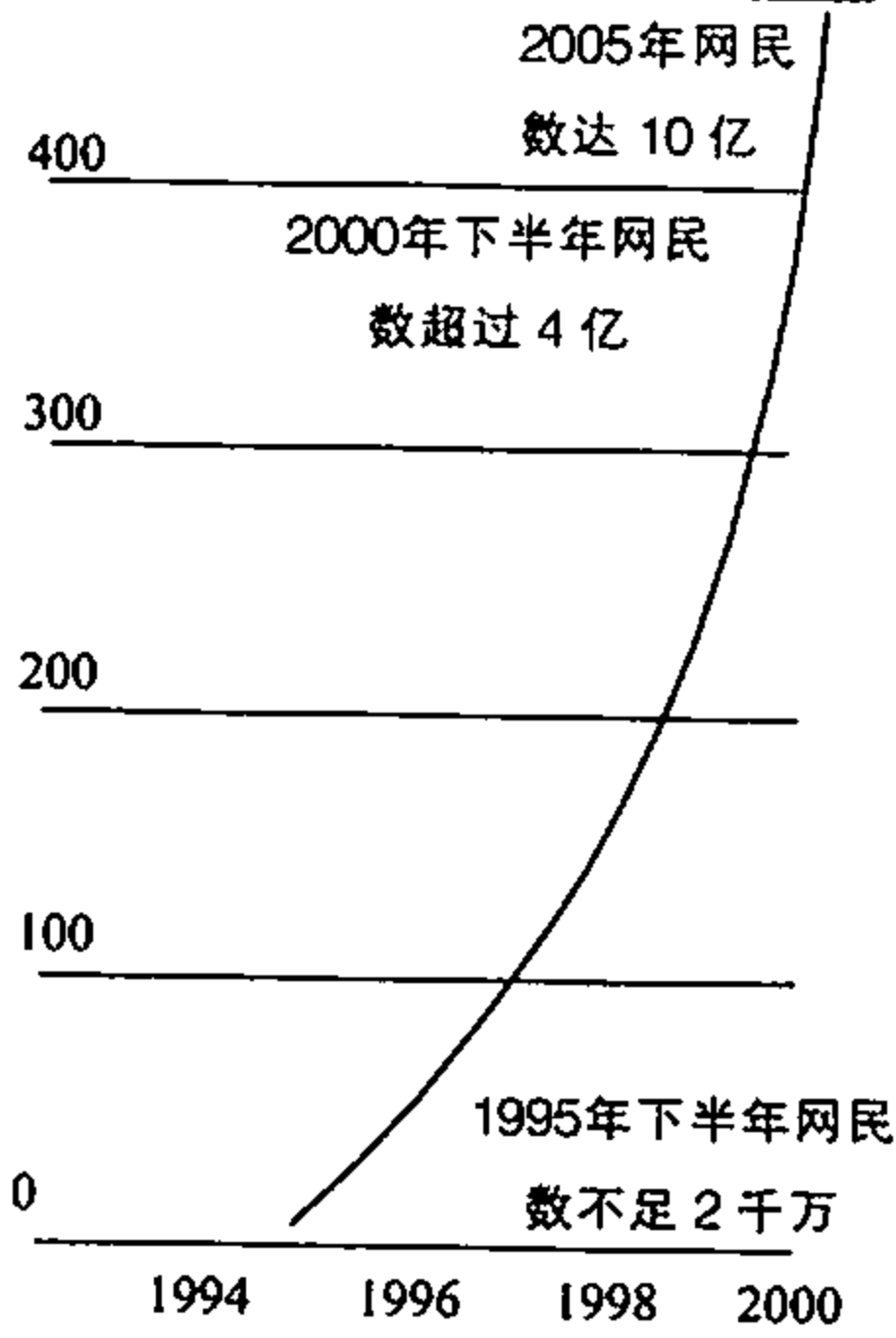


手机拥有量的激增进一步压缩了时间与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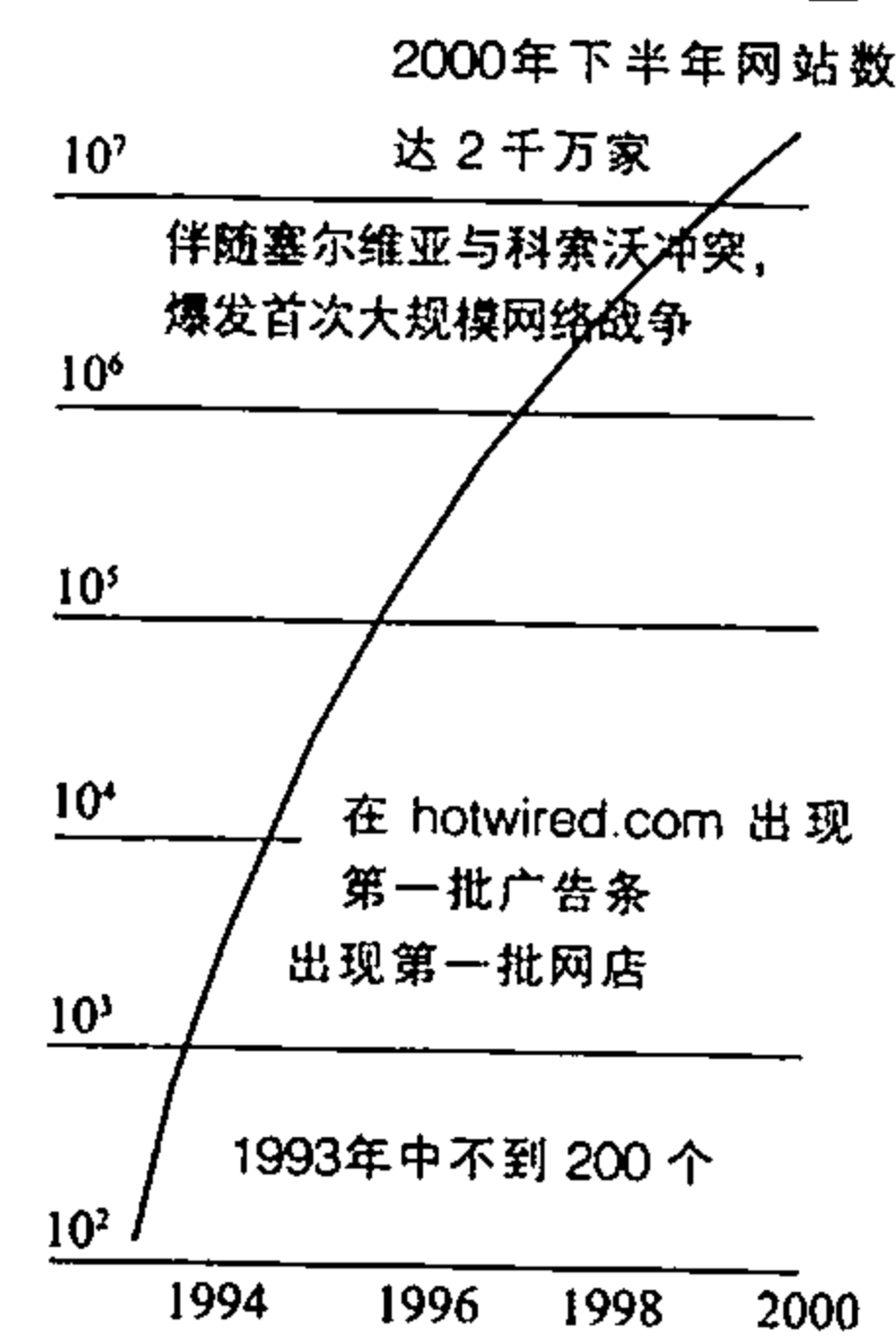
电话
每千人电话主线数



更多的人能够上网……
成百万计的网民



……获得更多的信息……
网站数



……以更低的代价
传输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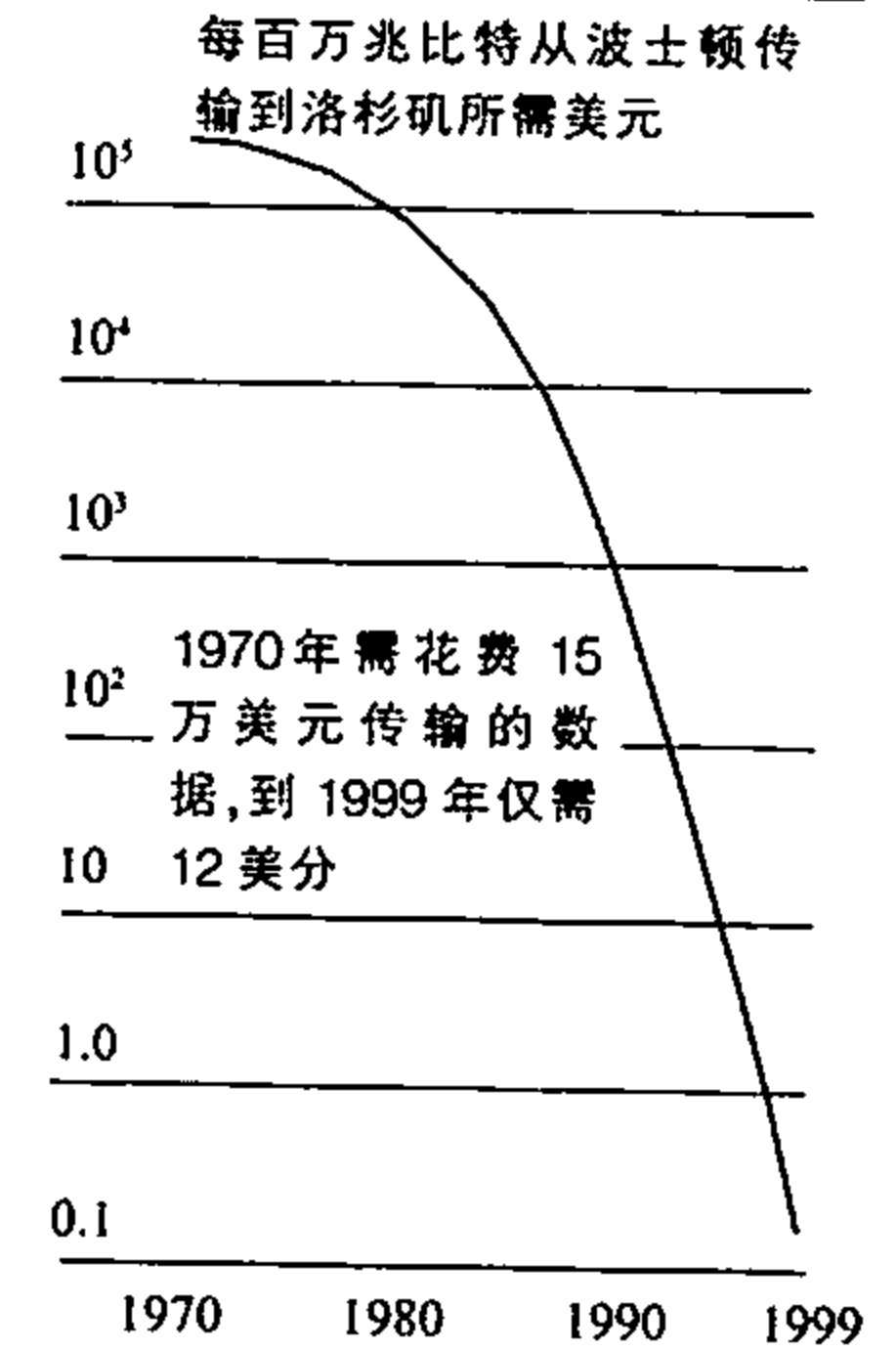


图 2.3 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兴起
资料来源:UNDP (2001), 页 32、页 41

的人通过使用这些技术而相互联系起来,并且是在那些原本隔绝或传统电信服务落后的地区(参见图 2.3)。虽然电信基础设施在全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能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接入国际通信网络。

信息流

如果说正如我们所见,信息技术的普及已经增加了全球各地人们之间接触的可能性,那么它也促进了有关相隔甚远的人和事的信息流动。每天,全球媒体把新闻、图像和信息传送到人们的家里,把他们直接而又不间断地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过去 20 年间一些最引人

注目的事件,诸如柏林墙的倒塌、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等,都通过媒体展示在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观众面前。这些事件以及其他数以千计不那么戏剧性的事件,导致人们的思想重新定位,从民族国家层面转向全球舞台。与往昔相比,个人更加意识到与他人的相互关系,更愿意把他们自己与全球问题和全球进程联系在一起。

这种向全球眼光的转变有两个重要维度。首先,作为全球共同体的成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责任并非仅限于国界之内,而是延伸到了国外。地球另一边的人面临的灾祸与不

公,并非只是不得不忍受的苦难,而是采取行动和干预的合法理据。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国际共同体有义务在危机时刻采取行动,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人的人身安乐或人权。对于自然灾害,这种干预采取人道主义救济和技术援助的形式。近些年,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的地震、莫桑比克和孟加拉国的洪水、非洲的饥荒以及中美洲的飓风已经成为全球援助的焦点。

近些年来,对战争、种族冲突和侵犯人权进行干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虽然这类动员比在自然灾害的情形下问题更多。而像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前南地区(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暴力冲突这种情况,许多坚信必须捍卫人权和国家主权的人相信,军事干预是正当的。

第二,全球眼光意味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民族国家以外寻找形成其自我认同感的源泉。这种现象是全球化过程带来的,而后又加速了全球化过程。随着民族国家传统上的掌控力经历巨变,世界上许多地方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也正在迅速复兴。例如,在欧洲,苏格兰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居民可能更愿意视自己为苏格兰人或巴斯克人,或干脆自认为欧洲人,而不是英国人或西班牙人。在许多地方,由于地区层面及全球层面上的政治转型弱化了人们对于所居住的国家的倾向性,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源泉的意义也趋于减弱。

二 经济因素

世界经济一体化也推动了全球化。与以往各时代相比,全球经济的基础不再主要是农业或工业,而是逐渐为“无重量的”和无形的活动所主导(Quah 1999)。在这种无重量经济(weightless economy)中,产品是基于信息的,如计算机软件、媒体和娱乐产品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有许多词汇描绘这种新经济形态,包括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以及新经济(new

economy),我们会在第十八章更详细地讨论(参看该章第二节第三小节)。知识社会的兴起与基础广泛的消费者群体的发展相关,他们具备科技素养,渴望把计算机技术、娱乐和电信方面的新进展引入其日常生活。

正是全球经济的运行,反映了信息时代所发生的变化。经济的许多方面是通过跨越国界而非止于国界的网络运转着的(Castells 1996)。在全球化状况下,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和公司都进行了结构调整,增强了自身的灵活性,减少了内部等级。生产活动和组织模式变得更为灵活,与其他公司的伙伴关系更为寻常,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市场中做生意,参与世界性的分配网络已经成为必然条件。

1 跨国公司

在推动全球化的诸多经济因素中,跨国公司的作用特别重要。所谓跨国公司,就是在不止一个国家生产商品或提供市场服务的公司。



可口可乐是一家全球大企业,向整个世界出售其产品。图为在位于中东的约旦销售的健怡可乐(Diet Coke)

跨国公司可以是只有一两家工厂在国外的相对较小的公司,也可以是生意纵横全球的巨型国际企业。一些最大的跨国公司世界闻名,如可口可乐、通用汽车、高露洁 (Colgate-Palmolive)、柯达和三菱等公司。即使当跨国公司明显地以一国为基地时,它们追求的也是全球市场和全球利润。

跨国公司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它们占据了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推动了新技术在全球的扩散,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角色。一位观察家曾经指出,它们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支柱”(Held et al. 1999)。2001年,

约有 500 家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超过了 100 亿美元,而同期只有 75 个国家可以夸耀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此值。换句话说,世界上顶尖的跨国公司就经济规模而言大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参见图 2.4)。事实上,全世界跨国公司五百强的销售总额达到 14.1 万亿美元,将近全世界产出的商品与服务总值的半壁江山。

跨国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战后最初开始是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的扩张,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公司也开始不断增强海外投资。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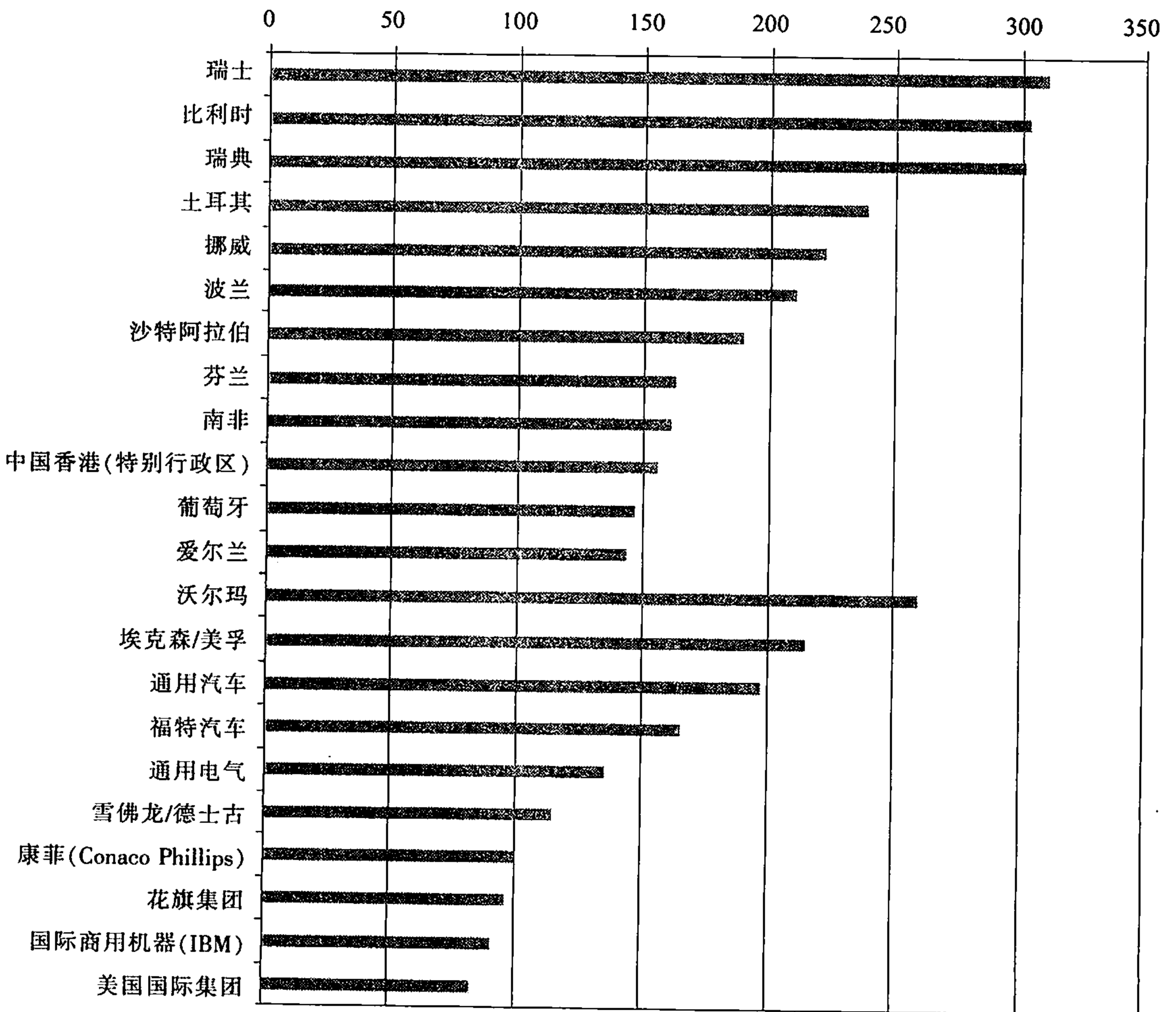


图 2.4 世界最大企业收入与某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照(单位为 10 亿美元)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2003 年 9 月 11 日)

芭比与全球商品链的使用

有史以来最挣钱的玩具芭比娃娃的制造就能体现全球商品链。每两秒钟就有 40 多个青少年玩偶售出,给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美泰公司 (Mattel Corporation) 带来超过 10 亿美元的年收入。尽管芭比娃娃的销售主要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但在全世界 140 个国家也都能找到。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全球公民 (Tempest 1996)。芭比的全球性不仅在于销售,而且在于其出生地。芭比从来也不是在美国制造的。第一个玩偶是 1959 年在日本制造的,当时该国仍处于逐步从二战中恢复的阶段,工资较低。随着日本的工资提升,芭比转向亚洲其它低工资国家。今天,她的多重出身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全球商品链运作的事情。

芭比是在美国设计的,它的营销和广告战略是在美国制定的,而大部分利润也是在美国赚得的。但芭比的物理部分唯一属于“美国制造”的就只有其纸板包装,还有一些用来装饰玩偶的油彩。

芭比的身体和衣饰的出身遍及全球:

- 1 芭比的生涯始于沙特阿拉伯,那里提炼出油并精炼成乙烯,用来制造其塑料身体。
- 2 中国台湾的国营石油进口商中华石油公司购买乙烯,并转卖给中国台湾的台塑企业,这是用于玩具制造的聚氯乙烯塑料在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台塑将乙烯加工成聚氯乙烯颗粒,后者将被注塑为芭比的身体。
- 3 这些颗粒然后通过船运送至制造芭比的四家亚洲工厂之一,其中两家在华南,一家在印尼,一家在马来西亚。至于注塑芭比身体的注塑机,也就是芭比制造流程中最为昂贵的部分,则是在美国制造并船运至这些工厂的。
- 4 芭比的身体注塑完成后,就会戴上来自日本的

尼龙头发。她的棉织衣饰是中国制造的,并且确实是产自中国的棉花,这也是芭比身上唯一一种真正来自绝大多数芭比的制造国的原材料。

- 5 香港在中国芭比的制造流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制造芭比时使用的几乎所有材料都是通过船运进入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香港,然后通过货车运往中国内地的工厂。芭比的成品也是通过原路输出。大约有 2 万 3 千辆货车每天往返于香港和华南的玩具厂之间。

那么,芭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包着“第一次约会”芭比的纸板包装和玻璃纸盒确实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制造出芭比的材料中,几乎没有一样真的来自该国。这



“全球芭比娃娃”

一款芭比在美国的零售价为 9.99 美元 (约合 6 英镑),但中国只能拿到其中大约 35 美分,主要是付给在两家工厂中组装她的 11000 千名打工妹的工资。而在另一头,回到美国后,美泰公司会拿到 1 美元的利润。

而当芭比以 9.99 美元售出时,剩下的那些

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在它的制造过程中用到的那些塑料、布料、尼龙及其他材料只需要 65 美分。大部分的钱用在支付机器设备、越洋船运、国内货运、广告营销、零售店租金上,当然,还有玩具反斗星(Toys 'R' Us)等零售商的利润。

三个强大的地区市场的建立,跨国公司又有了极大的扩张,这三个地区市场即欧洲市场(欧洲单一市场[Single European Market])、亚太市场(《大阪宣言》[Osaka Declaration]规定,到 2010 年实现自由和公开的贸易)和北美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也逐步解除对于外资的限制。到 21 世纪初,世界上已经很少再有经济体处于跨国公司的影响之外了。过去 10 年间,以工业化经济体为基地的跨国公司非常积极地扩展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业务。

有关制造业愈益全球化的观点,常常表达为全球商品链,即产生最终产品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的世界网络。这些网络包括了各种中枢性生产活动,形成密切关联的“链条”,这个链条从制造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一直到其最终的消费者(Gereffi 1995; Hopkins and Wallerstein 1996; Appelbaum and Christerson 1997)。

制造业占到了全世界从 1990 年到 1998 年期间经济增长总额的将近四分之三。其中最明显的增长是在中等收入国家:1990 年,制造业只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 54%;而在仅仅八年之后,就已经占到了 71%。中国之所以从低收入国家上升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作为制造业产品出口国的角色,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说明了何以出现这种趋势。不过,商品链中最有利可图的活动,比如管理、设计与广告,往往集中于核心国家,而最

无利可图的活动,比如工厂生产,却往往集中于边陲国家。(图文框说明了芭比娃娃的生产过程中全球商品链的应用)

2 电子经济

“电子经济”是支撑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因素。银行、企业、基金经理和个人投资者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在国际范围内转移资金。然而,这种即时转移“电子经济”的新型能力也带来很大风险。大量资本的流动会造成经济动荡,带来像 1998 年席卷亚洲各小龙乃至俄罗斯和其他地区的国际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的愈益一体化,世界某一地方的金融崩溃会对相隔遥远的经济体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面描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诸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从强度和范围上讲都史无前例的现象。我们在本章下文将要看到,全球化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但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近年来提出的关于全球化的主要观点上来。

三 政治变迁

在当代全球化背后的第三种驱动力事关政治变迁。这包括几个方面:首先,1989 年东欧发生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并以苏联 1991 年的解体为顶点,前苏联阵营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波罗的海诸国、高加索和中亚国家等,开始向西方模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转变。它们不再与全球

共同体相隔绝,而是逐渐融入其中。这一发展意味着“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相分离的冷战时期存在的体制走向终结。归根结底,在全球传媒的时代,在世界经济走向电子一体化的时代,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开始面临挑战。

第二个强化了全球化的重要政治因素是国际性和地区性治理机制的发展。说到把各个民族国家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政治论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和欧盟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联合国作为单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而做到这一点,而欧盟则是一种更具探索性的跨国治理形式,其成员国放弃了部分国家主权。单个的欧盟成员国政府受到共同的欧盟各机构的指示、规定和法庭判决的限制,但也从参与这一地区联盟中获得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利益。

最后,全球化受到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亦参见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三小节)。国际政府组织是由参与国政府建立起来的机构,被赋予调控或监管某一特定的跨国活动领域的职责。最早的这类组织是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创立于1865年,此后又创立了一大批类似的机构,以调控从民航、广播到危险废物处理等领域的问题。1909年,有37个国际政府组织调控跨国事务,而到1996年,则达到260个(Held et al. 1999)。

正如其名所示,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同于国际政府组织之处,就在于它们并不附属于政府机构。相反,在政策制定和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它们是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独立组织。某些最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红十字会(Red Cross)和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致力于环境保护和人道主义努力。但还有成千上万不太有名的团体的活动也把多个国家和社区联系在一起(参见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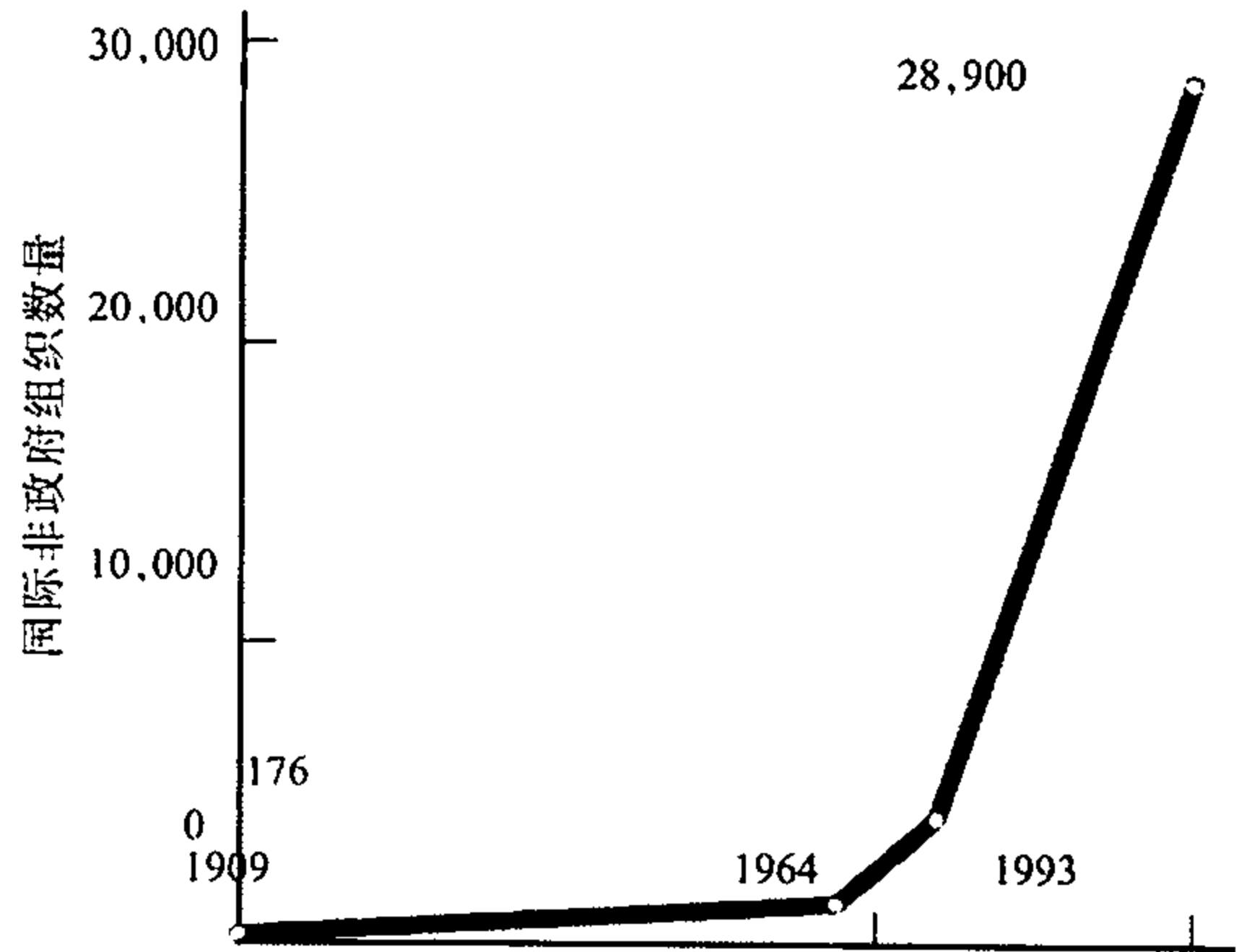


图 2.5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增长,1909 年至 1993 年
资料来源:UNDP (1999)

2.3.2 全球化之辩

近年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讨论主题。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的周围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但对于这种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由“全球化”来说明,则是意见不一。这也不足为怪。全球化是一个无法预期并且动荡混乱的过程,不同的观察者对其认识和理解差异很大。大卫·赫尔德和他的同事(Held et al. 1999)仔细研究了有关争辩,把论辩各方划分为三股思潮:怀疑论者(sceptics)、极端全球化论者(hyperglobalizers)和转型论者(transformationalists)。表 2.4 概括了全球化论辩中的这三种倾向。

一 怀疑论者

一些学者提出,全球化的观念有些言过其实,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全球化论辩中的怀疑论者认为,目前的经济互赖程度并非史无前例。他们援引 19 世纪世界贸易和投资的统计数据,认为现代的全球化只是

国家之间在交往的强度上不同于过去而已。

怀疑论者一致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接触现在或许比过去更多,但在他们眼里,现在的世界经济并未充分整合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经济体。这是因为大部分贸易发生在欧洲、亚太和北美这三个地域集团的内部。比如说,欧盟国家主要在联盟内部进行贸易,其他地域集团也与之相似,这就使单一全球经济的观念不能成立(Hirst 1997)。

许多怀疑论者强调世界经济内部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过程,诸如重要的金融和贸易集团的出现。对怀疑论者而言,区域化的发展证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降低而非提高了(Boyer and Drache 1996; Hirst and Thompson 1999)。他们提出,与一个世纪前盛行的贸易模式相比,世界经济在地理范围上更不具全球性,并且更加集中在少数活动。

怀疑论者反对极端全球化论者(见下文)等某些学者所持的观点,即所谓全球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政府的作用,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国家政府的核心地位下降。在怀疑论者看来,国家政府仍然是主要的角色,因为它们积极参与协调和管控经济活动。例如,许多贸易协议和经济自由化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正是政府。

二 极端全球化论者

极端全球化论者所持的立场与怀疑论者相反。他们主张,全球化是一个切切实实的现象,其影响几乎处处都能感受到。全球化被视为与国界无关的一个过程。它正在造就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并在跨境贸易和生产的洪流冲击下向前发展。最著名的极端全球化论者之一曰

表 2.4 全球化的概念化:三种倾向

	极端全球化论者	怀疑论者	转型论者
什么是新的?	全球时代	贸易集团	史无前例的全球联系程度
主导特征	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治理 全球市民社会	弱于前期的地缘治理 世界的互赖性还不如 19世纪90年代	(深度上和广度上)“浓厚的” 全球化
国家政府的权力	逐渐衰落或销蚀	强化或提升	重构或重组
全球化的驱动力	资本主义和技术	政府和市场	相互结合的多种现代性力量
分层模式	旧的等级制度解体	南方不断趋于边缘化	世界秩序的新格局
主旋律	麦当劳、麦当娜 等	国家利益	政治共同体的转型
对于全球化的概念理解	重组人类行为框架	作为国际化和区域化	重组相距遥远的地区间关系和行动
历史轨迹	全球文明	地域集团 / 文明的冲突	前途未卜:全球整合与分裂
论点概要	民族国家的终结	国际化需依赖政府的默许和支持	全球化改变着政府权力和世界政治

资料来源:改编自 Held et al. 1999, 页 10

本作家大前研一认为,全球化正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即市场力量比国家政府更强大的世界(Ohmae 1990,1995)。

极端全球化论者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大多数都集中在民族国家角色的转变上。他们认为,随着世界贸易的巨大增长,单个国家已经不再能够控制自己的经济。据称,国家政府和其中的政治家们越来越不能控制跨越国境的问题,例如金融市场的波动和环境威胁。公民们认识到政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能力有限,并因此失去了对现存治理体制的信心。有些极端全球化论者认为,国家政府的权力也正受到诸如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新的地区性和国际性机构的挑战。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对极端全球化论者而言预示着全球时代的到来(Albrow 1997),这时的国家政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下降了。

三 转型论者

转型论者更多地采取中间立场。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正在塑造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变迁背后的核心力量。根据他们的观点,全球秩序正在转型,但许多旧有的模式依然存在。例如,尽管全球互赖的程度加强了,但政府仍然把持着很大的权力。这种转型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领域中也同样显著。转型论者主张,现在全球化的水平正在打破内部和外部、国际和国内之间的固有界限。为了适应这种新秩序,各社会、机构和个人都不得不在原有结构已被撼动的环境中进行探索。

转型论者不同于极端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易受影响、易于改变的动态开放过程。它在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发展着,所包含的一些倾向往往是互相对立的。某些人提出,全球化不是一种单向的过程,而是图像、信息和影响的双向流动。全球移民、媒体和电信推动了文化影响的扩散。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全球

性城市”完全是多元文化的,不同的族群与文化交融和共存。根据转型论者的观点,全球化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反思性的过程,该过程以多方向的联系和文化流动为特征。因为全球化是众多交织在一起的全球网络的产物,所以不能把它看作是从世界某一具体部分产生的。

转型论者认为,为了回应不以领土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和社会组织(比如企业、社会运动和国际机构),国家正在发生重构,而不是像极端全球化论者认为的那样,国家正在丧失主权。他们认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上;在全球化的复杂条件下,政府被迫采取更加积极和外向的立场来实施治理(Rosenau 1997)。

哪一派的观点最正确?几乎可以肯定,是转型论者的观点。怀疑论者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低估了世界正在改变的程度,例如,世界金融市场在全球层面上组织起来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相反,极端全球化论者过多地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并且过于将其视为单向的过程。实际上,全球化要比这复杂得多。

2.3.3 全球化的影响

在第一章中我们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社会学的主要研究焦点在于工业化社会。那么,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是否能就此坦然地忽视发展中世界,把它留给人类学?当然不能。工业化社会和发展中社会的发展是相互联结的,在今天这种相互联结的程度更甚于以往。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我们依赖于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制成品,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反过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有赖于将它们与工业化国家绑在一起的贸易网络。我们只有参照发展中世界诸社会的背景,才能充分理解工业化秩序。无论如何,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世界。

你下次去逛本地的商店或超市时,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生活在西方社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雷鬼(reggae)乐

流行音乐的内行们听一首歌曲时，通常能够辨别出它在成型过程中所受的风格影响。毕竟，每一种音乐风格都体现出节奏、旋律、和声与歌词等方面的一种独特组合。虽然摇滚乐、R&B^①和民谣之间的差异并不需要天才才能分辨，但音乐家们在作曲的时候经常融合多种风格，要分辨出这些融合的成分就很困难了。不过，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种努力常常是值得的。不同的音乐风格往往源自不同的社会群体，研究各种风格的组合和交融，对于勾画不同群体之间文化接触大有裨益。

一些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了雷鬼乐，因为它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缔造出全新音乐形式的极好例证。雷鬼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非。在17世纪，大量西非人沦为英国殖民者的奴隶，并被装船运到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田中劳动。虽然英国人禁止奴隶们弹奏传统的非洲音乐，害怕它会成为召集起义的口号，但奴隶们还是想方设法延续了非洲的鼓乐传统，有时将非洲鼓乐与奴隶主强加给他们的欧洲音乐风格加以结合。在牙买加，一种名叫布儒(Burru)的奴隶群体的鼓乐因为有助于协调劳动的步调，而得到奴隶主的公开容忍。牙买加在1834年最终废除了奴隶制，但布儒鼓乐的传统保存了下来，即使后来许多布儒男人从乡村地区迁到了金斯敦^②的贫民窟。

正是在这些贫民窟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宗教崇拜，后来证明这种崇拜对雷鬼乐的发展至关重要。1930年，一个名叫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男人加冕成为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世界各地反对欧洲殖民主义的

人都在为塞拉西的登基而欢呼，而许多西印度群岛人开始相信，塞拉西是上帝，是被派到尘世领导被压迫的非洲人走向自由的。塞拉西的名字之一便是“罗斯·塔法瑞(Ras Tafari)王子”，而崇拜他的西印度群岛人便自称为“罗斯塔法瑞人”。罗斯塔法瑞崇拜不久与布儒鼓乐合并，而罗斯塔法瑞人的音乐也与以压迫和解放为福音主题的布儒鼓乐风格结合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西印度群岛的音乐家开始把罗斯塔法瑞人的韵律和歌词与美国爵士乐、黑人节奏和布鲁斯混合起来。这些结合最终发展成为“斯卡”(ska)音乐，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成为雷鬼乐，节拍较慢，强调低音，叙述城市贫困和集体社会意识的力量。许多雷鬼乐艺术家，比如鲍勃·马利(Bob Marley)，获得了商业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在听雷鬼乐。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雷鬼乐与嘻哈乐[hip-hop，也称饶舌乐(rap)]融合后，产生了新的乐调(Hebdige 1997)，这在武当派(Wu-Tang Clan)、夏奇(Shaggy)或西恩·保罗(Sean Paul)等组合的作品中都可以听到。

因而，雷鬼乐的历史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接触的历史，也是那些群体通过他们的音乐表达政治、精神和个人等方面意义的历史。全球化强化了这些接触。例如，现在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年轻乐人有可能是听着伦敦诺丁山地下室的男男女女们搞出来的音乐长大的，^③也可能深受通过卫星实况广播的来自墨西哥城的墨西哥街头乐队表演之类的影响。如果说群体之间交往的频率是音乐演化步伐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可以预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未来若干年内将会出现新音乐风格真正的繁盛。

① 即 Rhythm & Blues, 可译为“节奏布鲁斯”或“节奏怨曲”。

② 金斯敦(Kingston)于18世纪初成为牙买加的商业中心,19世纪成为其政治首都。可参考经典民谣 Jamaica Farewell。

③ 伦敦诺丁山(Notting Hill)是大量非洲及加勒比裔黑人初到英国时的落脚之地。

会的我们拥有丰富多彩的商品,对于那些购买力强的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有赖于遍及世界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关联。商店里的货品是在一百多个不同国家制造的,或者是使用了来自一百多个不同国家的配料或元件。这些配料或元件必须通过定期的全球运输,同时必须有持续的信息流,以便协调数量以百万计的日常工作。

随着世界迅速趋向一种单一的、一体化的经济,越来越多的工商企业和各类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新的市场和经济机会。其结果,文化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发生了变化:人际网络跨越国家边界甚至跨越洲界,构筑了各自出生地和移居国之间的文化关联(Appadurai 1986)。这个星球上曾经有数千种语言在流通,而今只有十几种语言居于主导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取而代之。

文化作为孤岛而存在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当今世上即使真有一些偏僻之地,能够逃脱收音机、电视机、飞机——及其所带来的成群结队的旅游者——以及计算机的传播所及,那也是少之又少。仅仅一代人之前,还有一些部落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受世界其他地方的侵染。而今天,这些人群已经使上了美国或日本制造的大砍刀之类的工具,穿上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或危地马拉的制衣厂出品的T恤衫或短裤,服用德国或瑞士生产的药品,以抵抗由于和外来人接触而感染的疾病。这些人还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向世界各地的人广播他们的故事。再过一代人,至多两代人,全世界所有曾经与世隔绝的文化都将接触到全球文化,并为此发生转型,尽管它们始终努力维持自身古老的生活方式。

本书通篇都将讨论产生这种全球文化的各种力量,包括:

1 电视,它将英国的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文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音乐电视网(MTV)或《老友记》(*Friends*)之类

的网络和节目)日复一日地带进世界各地的家庭,同时也吸收了来自荷兰[例如《老大哥》(*Big Brother*)]或瑞典[例如《鲁滨逊探险》(*Expedition: Robinson*),后来发展为《幸存者》(*Survivor*)]的文化产品献给英美观众。

- 2 全球一体化经济的兴起,企业的工厂、管理结构和市场常常纵跨多个大陆和国家。
- 3 “全球公民”,比如大公司的管理者,花在全球旅行上的时间和呆在家的时间一样多,认同全球普世文化,而不是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
- 4 一大批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各机构,地区性贸易组织和共同防卫组织,多国银行及其他全球金融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和卫生组织,全球关税贸易协定,缔造了一套全球政治、法律和军事框架。
- 5 电子传播(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互联网、万维网)带来了即时沟通,使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都属于商业世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 互联网是否促进了一种全球文化?

许多人相信,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迅猛增长将会加速一种全球文化的传播。这种文化类似于欧洲和北美的文化,目前已经被将近四分之三网民所熟悉(参见图2.6)。男女平等,言论自由,民主参政,我消费我快乐(pursuit of pleasure through consumption),对于这类价值观的信念通过互联网很方便地传遍全世界。不仅如此,互联网技术本身也似乎助长了此类价值观:全球沟通,似乎无穷无尽(并且不受稽查)的信息,即时满足,这些都是新技术的特征。

然而,要就此得出结论,说互联网将涤荡各种传统文化,用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取而代之,似乎还为时过早。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的传播,有证据表明,它以许多方式与传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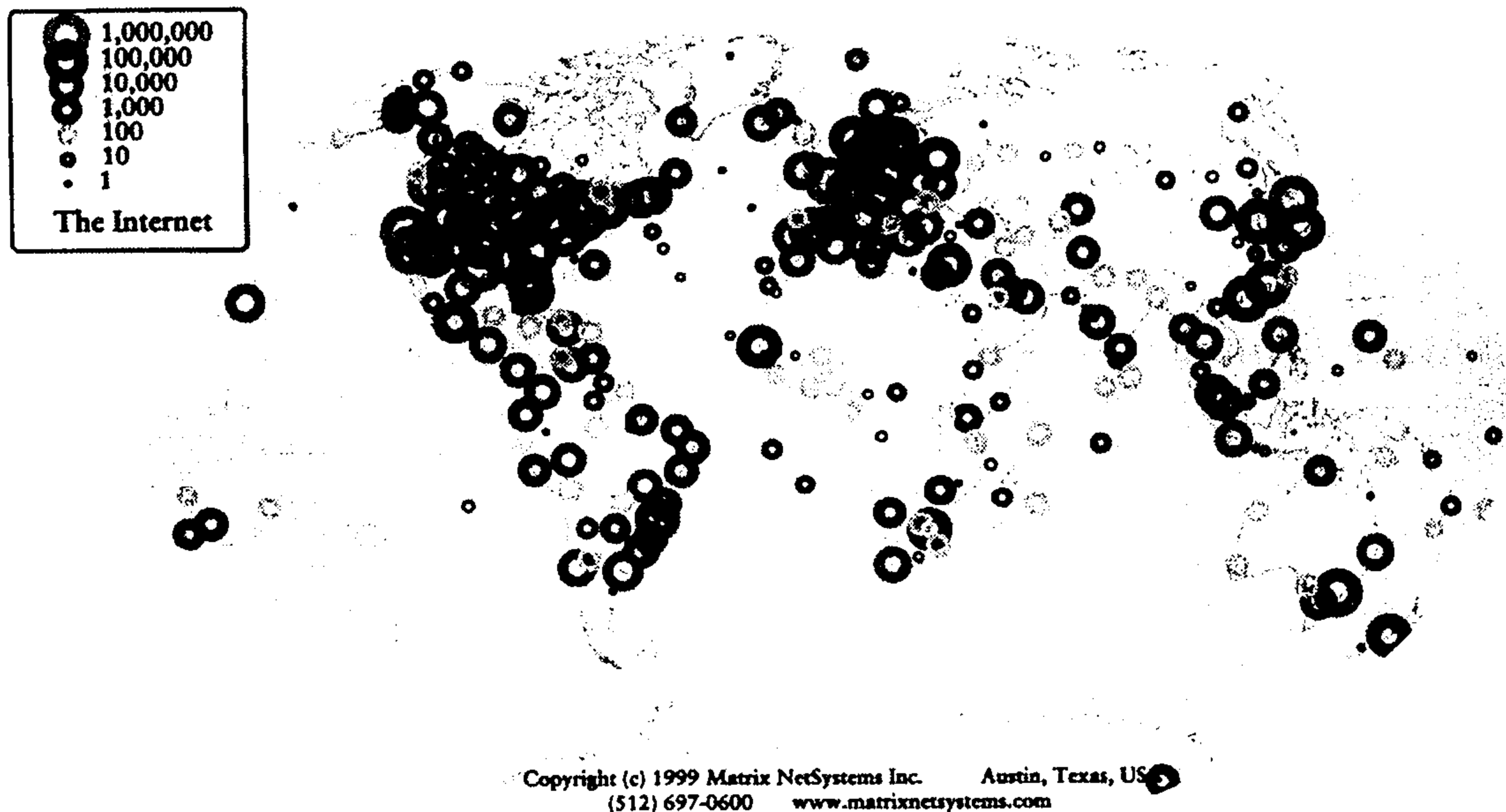


图 2.6 全球互联网连接状况:互联网服务器台数,1999 年 1 月

资料来源:John Quarterman 及其同事于 Matrix Information Directory Services (MIDS)。<www.geog.ucl.ac.uk/casa/martin/atlas/mids_intrworld9901_large.gif>

价值观念和谐共处,甚至成为增强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

试以中东国家科威特为例。这个传统的伊斯兰文化,晚近经受了欧美的强烈影响。科威特是盛产石油的波斯湾国家,属于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提供直至大学的免费公立教育,因此无论男女都有很高的识字比例和教育程度。科威特的电视常常转播美国的橄榄球赛之类的节目,虽说这些转播常常会按时被传统的穆斯林祷告所中断。科威特全国两百万人口,其中半数不到 25 岁。他们中许多人就像欧洲和北美的同龄人,在互联网上冲浪,寻求新的观念、信息和消费品。

尽管科威特在许多方面像一个现代国家,但男女不同对待的文化规范还是相当牢固的。女性一般要求穿戴传统衣着,只暴露面部和双手在外,夜间禁止出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看到与配偶或亲戚之外的男子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

惠勒 (Wheeler 1998) 花了一年的时间研

究互联网对于科威特文化的影响。互联网在科威特越来越普及,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网民中几乎有一半生活在这个袖珍国家。科威特的报纸常常刊载关于互联网和万维网的故事,而科威特大学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让其学生接上互联网的大学。

惠勒报告,科威特的青少年们成群涌进网吧,而大部分上网时间则消磨在聊天室或是访问情色网站,而这两种活动是冒传统伊斯兰文化之大不韪的。根据惠勒的描述:

许多年轻人向我讲述了他们和异性在网络空间上的遭遇。甚至有专门的键盘符号来代表亲吻(*)、亲嘴(:*)和难为情的笑(LOL),这些互动和反应都会让求爱更令人激动,在这种情况下,也更加安全。(Wheeler 1998)

在一个严格限制男性和女性在婚外彼此交谈的社会里,新型沟通技术显然促成了他们

进行此类沟通。惠勒还注意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网吧里男性和女性是分区入座的。不仅如此,她还发现,科威特人在网上非常慎于表达强硬意见或政见。除非讨论保守的伊斯兰宗教信仰,这在互联网上是自由散布的言论,其他情况下科威特人在网上相当拘束。惠勒把这种现象归因为一种文化信念——过多暴露自己的信息是危险的:

在科威特,信息与其说是一种增强个人力量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它是一种用来对付你的敌人的武器,一种保持遵从的工具,或是用来巩固对于日常生活的管控……这些态度,以及保护个人声誉的欲望,影响了科威特转向信息时代。这就阻碍了互联网产生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惟有方便了科威特伊斯兰主义话语在网上的兴盛……在科威特,人们普遍觉得,公开陈说具有和/或宣扬某种政见是不好的。没有人希望自己的话被录音或引用。这种想法使人担惊受怕,神经过敏。只有那些位列精英的人才觉得自己能够自由而公开地发表言论。(Wheeler 1998^①)

威勒就此得出结论,科威特的文化已经有了数百年历史,不太容易仅仅接触了互联网上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就轻易转变。诚然,确有少数年轻人参与了全球聊天室,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威特文化正在采纳美国的性观念,哪怕只是采纳西方社会男女之间的日常关系形态。从这些新型技术中最终兴起的文化不会与美国文化如出一辙,它将具有科威特的特色。

二 个人主义的兴起

虽然全球化经常与宏大系统内的变化相

联系,诸如世界金融市场、生产和贸易以及电信,但是在私人领域同样能强烈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在那边”的东西,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与个人事务不相干。全球化是“在这里”的现象,它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私密的个人生活。通过传媒、互联网和大众文化这类非个人的渠道,以及通过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个人接触,全球化力量进入到我们的本地情境、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个人生活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全球化正在彻底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经验的性质。由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作为社会支撑的既存制度已经不再适用。这就迫使我们生活中私密的、个人的方面重新定义,包括家庭、性别角色、性问题、个人认同、与其他人的互动和与工作的关系。全球化也在深刻改变着我们考虑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方式。

在现阶段,个人比从前有更多的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传统和习俗曾经对人们的生活轨迹施加了巨大的影响。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甚至宗教信仰之类的因素能够阻断某些人的道路,或是为其他人开辟了道路。举例来说,一位裁缝的长子很可能会子承父业,终其一生继续操持裁缝这门手艺。传统认定,妇女的圈子天生是在家里;她的生活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她丈夫或父亲的生活和身份所决定的。在过去,个人的自我认同是由他们出生的共同体背景所塑造的,该共同体通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提供了相对固定的标准,人们据此而生活。

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面临着趋向一种新型个人主义,人们开始积极地构造自己的认同。随着地方共同体与全球新秩序的相互作用,传统和既有价值观念的重要性正在减弱。从前指导人们做出选择和展开活动的社会准则已经宽松了许多。例如,今天裁缝的长子

^① 原文误为 1988。

可以从多条道路中有所选择,以打造自己的未来,妇女不再被限制在家中,其他许多塑造人们生活的路标也已经消失。传统的认同框架正在瓦解,新的认同模式正在兴起。全球化正迫使人们以一种更为开放、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根据变动不居的周遭环境而不断做出反应和调整。作为个人,我们置身所处的大环境的演变之中,并随其演变而演变。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琐屑的决策,比如如何穿着打扮、如何休闲消费、如何养身健体,都属于创造和再创造我们的自我认同的持续过程。

小结:全球治理之需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模式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管理一个充满跨越国境的挑战的世界。单靠某一个政府的力量,无法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无法遏制全球变暖,也无法调控金融市场的动荡。影响世界各地社会的许多过程已经脱离了现行治理机制的掌控。考虑到现行治理之不足,有些人呼吁建立以全球方式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治理新形式。有鉴于越来越多的挑战超越了单个国

家的层面,人们认为,要应对这些挑战,活动空间就必须跨越国界。

虽然现在讲超越民族国家层面的治理还有些不切实际,但在创建全球民主结构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比如联合国和欧盟的建立。特别是欧盟,可视为对全球化的一个创造性反应,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其他联系紧密的区域建立类似组织的楷模。新的全球治理形式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普世主义的全球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诸如捍卫人权之类的国际行为的透明规则 and 标准将得以制定和遵守。

冷战结束已过十年,其显著特征是世界上许多地区充满了暴力、国内冲突和混乱的转型。虽然有人持悲观的看法,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危机和混乱,但另外一些人则看到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去争取更多平等、民主和繁荣的关键机会。全球互赖和快速变迁把我们所有人都前所未有地联系了起来,在这样一个时代,向全球治理以及更有效地调控机构转型当然不能算不合时宜。重申我们对于社会的愿望,这并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事实上,这一任务正是21世纪伊始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需要和最大挑战。

有关全球治理,详见第二十章。

本章要点

- 1 可以区分出几种前现代社会的类型。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人们不种庄稼也不养家畜,而是靠采集植物和猎杀动物为生。游牧社会以饲养驯化的动物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农耕社会依赖固定地块上的种植。更大、更发达的城市社会则形成传统国家或文明。
- 2 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和西方世界的扩张,通过殖民主义征服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彻底改变了相袭已久的社会体制和文化。

- 3 在工业化社会中,工业生产(其技术也应用于食品生产)成为经济的主要基础。工业化国家包括西方各国,再加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所生活的发展中世界,几乎都是前殖民化地区。人口的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其中一部分已经与世界市场维系一体。

- 4 社会变迁可以界定为一个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文化的历时而发生的转型。现代时期尽管只是人类历史的一小段,但已经展现出迅猛而重大的变迁,并且变迁的步伐愈益加快。

5 从狩猎和采集社会,到农耕社会,再到现代工业社会,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发展复杂多样,任何一种社会变迁单因理论都无法说明。至少可以举出三类宽泛的影响。一是物质环境,包括气候、沟通路线的可利用性(河流、山口);这些都很重要,特别是当它们影响到早期的经济发展时更是如此,但也不能过分强调。政治组织(特别是军事力量)对所有社会都有影响,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不过狩猎和采集社会或许例外。文化因素包括宗教(可能牵制变迁)、沟通体系(比如文字的发明)和领袖个体。

6 对于现代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经济影响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它有赖于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变革,并反过来促进后者。科学技术也会影响政治因素(并被其所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比较有效的治理形式的现代国家兴起。文化影响则包括科学技术的另一项效应:现代思维的批判性和创新性,它将不断挑战传统和文化习惯。

7 全球化经常被描绘为一种经济现象,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全球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展加快了世界各地人们之间互动的速度,拓展了这种互动的范围,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首要因素。

8 好几项因素有助于推动全球化。首先,冷战的结束,苏联模式共产体制的解体,以及国际性和区域性治理形式的发展,已经把世界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次,信息技术的普及推动了信息的全球流动,并促使人们采取全球眼光。第三,跨国公司的规模扩大,影响增强,构筑起跨越全球、连接各经济市场的生产和消费网络。

9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项热门的讨论主题。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的观念言过其实,目前的互赖程度并非史无前例。有些怀疑论者则主要关注区域化进程,认为它强化了主要的金融和贸易集团的内部活动。极端全球化论者持相反的立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真实而有力的现象,有在整体上削弱国家政府作用的危险。第三派是转型论者,认为全球化正在改变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在内的现行全球秩序的许多方面,但旧的模式依然存在。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一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包含着有时方向相反的多种力量的作用。

10 全球化正在引发超越国界、超出现行政治结构之权限的挑战。因为个别政府不足以处理这类跨国问题,所以需要新的全球治理形式,能够以全球的方式应对全球的问题。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世界中重申我们的意志,或许是21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

思考建议

1. “伟大领袖”在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作用有多大?
2. 全球化如何也能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
3. 全球化同时导致了苏东体制的转型吗?
4. 随着个人主义意识的增强,我们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发展,还是要为选择所困扰?
5. 跨国公司真的比政府强大吗?
6. 全球化是否将导向一种全球文化?

阅读指南

- Ulrich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9). 《什么是全球化?》
- R. Cohen and P. Kennedy, *Global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2000). 《全球社会学》
- Peter Dicken, *Global Shift: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1998). 《全球转变:世界经济的转型》
- John Gray,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虚幻的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觉》
-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3) 《全球转型读本》(第二版)
-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0). 《全球化读本》
- 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2002). 《全球化及其缺陷》
- J. Timmons Roberts and Amy Hite (eds),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99).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发展与社会变迁面面观》
- Sarah Owen Vandersluis and Paris Yeros (eds), *Poverty in World Politics: Whose Global Era?*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世界政治中的贫困:谁的全球时代?》

网络导航

全球化文献资源 (Globalization resource)

<http://www.polity.co.uk/global>

全球化国际论坛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http://www.ifg.org/>

贸易观察 (Tradewatch)

<http://www.sosig.ac.uk/sociology/>

世界银行全球化网页 (World Bank Globalization Pages)

<http://www1.worldbank.org/economicpolicy/globalization>

1999年以来有关全球化的睿思讲座 (Reith Lectures on Globalization from 1999)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static/events/reith_99/default.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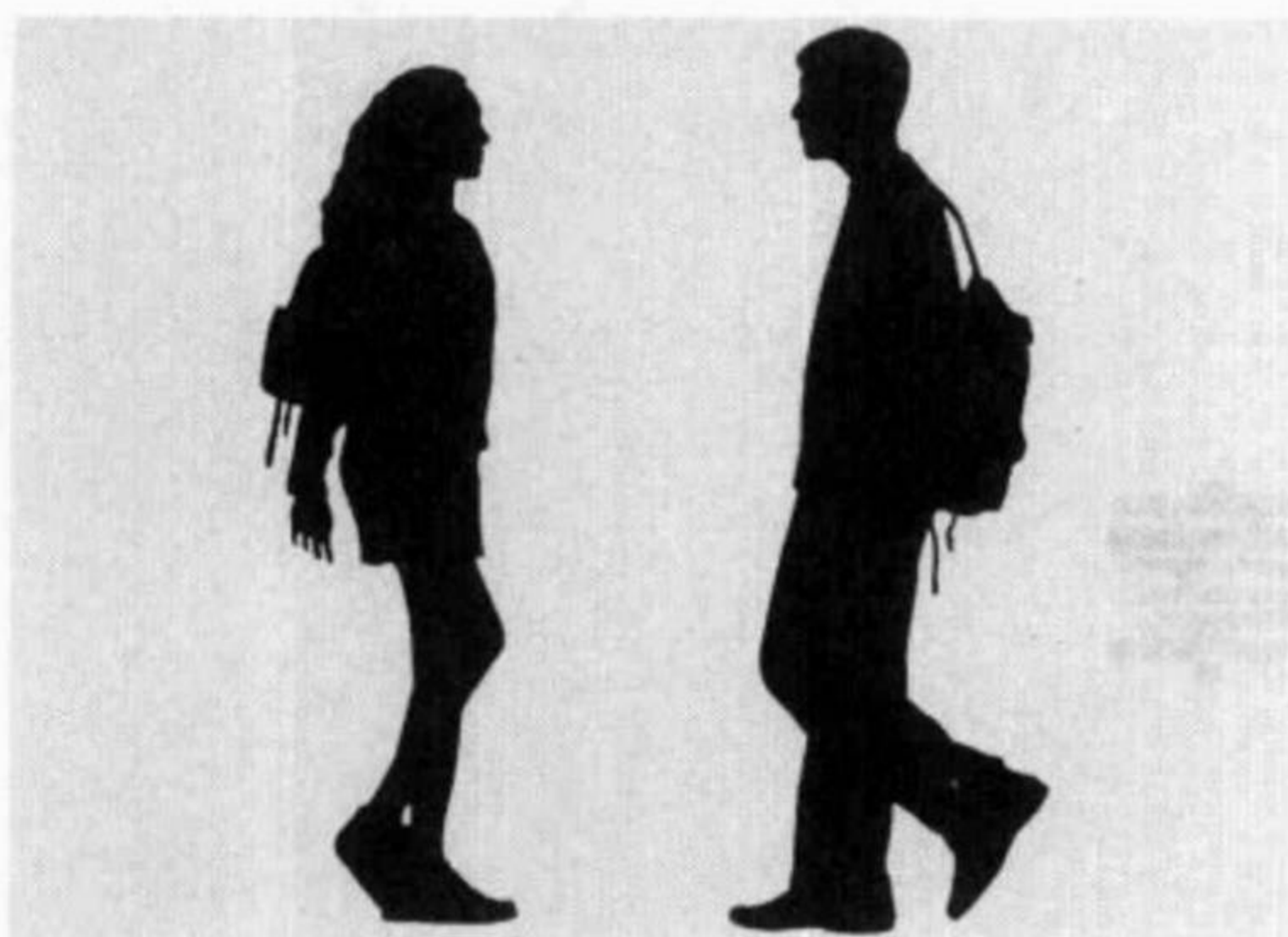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节 社会学的设问	59
3.1.1 贯彻科学的取向	60
3.1.2 研究步骤	61
第二节 理解因果	64
因果与相关	6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6
3.3.1 民族志	66
3.3.2 问卷调查	67
3.3.3 实验	69
3.3.4 生活史	70
3.3.5 比较研究	70
3.3.6 历史分析	70
3.3.7 综合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	71
第四节 现实世界中的研究:方法、问题与陷阱	71
3.4.1 人类主体与伦理问题	72
3.4.2 社会学仅仅是重述显而易见之事吗?	72
3.4.3 社会学的影响	74
本章要点	76
思考建议	76
阅读指南	76
网络导航	77



第三章

社会学问题的设问与解答



这个地方来？

这些人来上这个厕所，没有一个是冲着建造厕所的正式理由。他们是为了“速配的性”（instant sex）而来的。这种活动在英国被称作“搞同志”（cottaging）。许多男人，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有自视非同性恋也有自视同性恋的，都来此找寻与陌生人之间的性交往。他们希望体验性的激动，可又不想陷得太深。除了在这个公厕会发生的特殊遭遇，他们不想有任何牵连。

一个工作日行将结束，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某个公园里的公厕突然变得惊人的拥挤。一个身着灰衣的男人走进来；另一个头戴棒球帽，脚踏跑鞋，上穿T恤，下着短裤；第三位还没换下车行的技工制服，他已经在那儿修了一整天车了。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肯定还有别的厕所更近便的。除了厕所本身，是否还有什么别的共同兴趣把这些人引到

男人之间找寻这种匿名、即时的性交往，发生在世界各地，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这种现象却始终是一种广为盛行却很少研究的人类互动形式。在美国，同性恋社群称有这类活动的厕所为“茶室”（tearoom）。社会学家劳德·汉弗莱斯探访了这些公厕，对参与者进行了研究，并以此撰成《茶室交易》一书（Humphreys 1970）。不难想见，此书出版后引



为何厮混于公厕？

起广泛争议,对有些人来说,这个话题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难处理的。汉弗莱斯的研究方法也遭到严厉批评,比如指其有违伦理,因为他的实地调查是秘而不宣的,并未征求被研究者的知情同意。(本章第四节第一小节还将进一步讨论汉弗莱斯的研究伦理问题)不过,由于汉弗莱斯的研究是在“茶室”里做的,所以能够以崭新的视野,揭示那些被迫隐匿其性倾向的男人的挣扎。他指出,许多男人在其他方面都过着“正常”的生活,也就是所谓邻家男人,却要想方设法既参与这些令人羞窘的行为,又不会危及其职业生涯或家庭生活。汉弗莱斯的研究是在30多年前做的,当时男女同性恋的身份认同所带有的污名远比今天多,警方还在积极推动有关法律禁止此类行为。在严厉的执法下,许多人的生活就此断送。

汉弗莱斯在这类公厕中耗费了大量时间,因为理解社会过程的上佳途径,就是参与其中,亲眼观察。他还进行了调查访谈,从而收集到比单单观察公厕更多的信息。汉弗莱斯的研究为生活中特殊的一面开启了一扇窗,单单其存在本身就会使许多人大受震动,当然,还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得到理解。他的著作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但也渗透着一份悲情。

汉弗莱斯指出,对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迫害导致这些男人过着苦楚的生活,只能诉诸绝对的隐秘,诉诸常常带有危险的活动。他的研究是在艾滋病袭击人类之前进行的,这类活动在今天就更加危险了。他主张,对于同性恋亚文化持宽容态度,将使同性恋者能够互敬互助、免受折磨。

第一节 社会学的设问

《茶室交易》中所研究的厕所,极好地体现了成为社会学家所问的许多种问题的主题现象。比如说,汉弗莱斯在讨论公厕中发生的

令人吃惊的活动时,实际上是在问,社会的运作方式如何不同于有关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官方版本,我们视为平凡无奇的东西,比如公厕,其实是如何以社会性的方式被建构的,端赖于它是如何被使用的。

还有必要指出,现代理论思路的一些要素有助于我们理解汉弗莱斯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互动论者或许会问:这种行为是如何通过互动过程发生的?发生了哪些类型的互动?汉弗莱斯发现,进入“茶室”的人们从别人那里学会了保持沉默。这就是针对无需牵连其中而享受隐私的要求所做出的回应。另一项发现则是:进入厕所的男人如果对最初的性挑逗无所回应,就不会再受到此类挑逗了。要促成一种具有性意味的情境,总得两厢情愿才是。而功能主义的思路则会问:“茶室”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继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答案是:它提供了性活动的发泄渠道,如果隐秘地进行,就使参与者和会社会其他成员能够继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人,而不会对已被普遍接受的事物秩序构成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也许会问:在“茶室”中是否凸显了有关经济性的阶级关系的思维?汉弗莱斯发现,“茶室”中非个人化的性活动具有某种民主的性质。男人们不分社会阶级,无论种族肤色,在这些地方汇聚一室,进行性的交往。最后,女性主义的思路会问:在这项对于全部为男性的群体的研究中,如何能够考虑女性的生活?在汉弗莱斯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女性主义这种思路还不成气候。但今天的女性主义者会问:女性,或许是对其配偶的活动一无所知的妻子,她们的生活是如何遭受到“茶室”中这种隐秘活动的影响。下一章我们会回来讨论上述理论思路中的一些取向。

《茶室交易》初版至今已近40年。在此期间,社会对于同性恋的认同以及性活动已经宽容得多了。在此书出版后,汉弗莱斯投身促成这种变化的政治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他运用其研究发现,说服法院和警方减轻对于从

事同性性活动的男人的迫害,从而减缓这种隐秘性活动所带来的危险的副作用。

社会学研究的事业,大致上就是要像汉弗莱斯所做的那样,超越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表层理解。好的研究应当能够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以及所得出的发现应该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奇。社会学家无论是进行理论阐述还是从事具体研究,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关注的问题常常也困扰着其他许多人,但这类研究的结果却常常与我们的常识信念相悖。

种族或性别角度上的少数群体的生活环境如何?在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的世界上,为什么还是存在大规模的饥饿?互联网的愈益普及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是不是正在开始瓦解?社会学家试图为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提供答案。他们的发现绝不是盖棺论定。尽管如此,摆脱普通人通常思考此类问题的臆测方式,一直是社会学理论阐述和具体研究的目标。好的社会学研究努力使问题尽可能精确,并力求在得出结论前搜集事实性证据。为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须知道,适用于某个特定研究的最为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如何才能最好地分析结果。

社会学家在具体研究中所提出的常常是一些经验性问题或曰事实性问题。比如,性行为的许多方面,例如汉弗莱斯所研究的那些方面,需要得到直接而系统的社会学考察。因此我们可能要问:进入“茶室”的人们当中最常见的职业和家庭安排是什么?涉足“茶室”的人被警方抓捕的比例有多大?这类事实性问题常常难以回答。关于“茶室”不会有什么官方统计存在。就连官方有关犯罪的统计,在反映犯罪活动的真实水平时其价值也是令人怀疑的。对犯罪水平有过研究的人发现,仅有一半的严重犯罪会报告给警方。

当然,有关一个社会的事实性信息并不是总能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件不同寻

常的事件,还是属于很普遍的影响。社会学家常常想询问一些比较性问题,把某一社会中的某一社会背景同其他社会中的另一例证或相对立的例证相联系。比如,美国和英国的社会体制以及法律体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提出一个典型的比较性问题:在这两个国家中犯罪行为以及法律实施的模式有多大程度的不同?

在社会学中,我们不仅需要拿现存的社会彼此参照来考虑,而且还要对它们的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社会学家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就是发展性问题。我们要想了解现代世界的本质,就得考察先前的社会形式,并分析已经发生的变迁进程的主要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监狱的起源以及它们的现状。

事实性调查,或者说社会学家通常更乐于所谓的经验调查,关注的是事件如何发生。然而社会学并不仅仅在于收集事实,无论这些事实可能是多么重要、多么有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去解释这些事实的意味,为此我们必须学会提出理论性问题。许多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的是经验性问题,但除非他们具备一些理论知识来指导其研究,否则他们的工作不可能具有启示意义。(参见表 3.1)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还力求不单为理论知识本身而探求理论知识。通常认为,不应当允许价值渗入以致结论偏差,但社会研究也应当与现实世界的关注保持相关。本章我们将探问,是否有可能生产客观的知识,以此深入探讨这类话题。我们首先将强调社会学的科学性,然后考察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一些实际研究,以此对应用得最广泛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比较。我们将会看到,理想中的研究开展方式与实际进行的研究之间,常常有着重大的差异。

3.1.1 贯彻科学的取向

涂尔干、马克思以及社会学的其他创建者

表 3.1 一个社会学家的设问思路

事实性问题	发生了什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生在学校中获取的教育成就要优于男生。
比较性问题	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吗?	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还是只发生在英国,或者只发生在英国的某一个地区?
发展性问题	这种现象是长期发生的吗?	女生的教育成就模式发生了什么历时性的变化?
理论性问题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为什么现在女生在校表现得更好?我们可以用什么因素来说明这种变迁?

都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科学。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吗?汉弗莱斯对于“茶室交易”的观察真的具有科学性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词语的意思。什么是科学?

科学就是为发展有关某一特定主题的知识体系而系统地运用一系列方法,包括经验调查、数据分析、理论思维,以及对于各种论点的逻辑评估。根据这个定义,社会学是一种科学努力,因为它包含了经验调查、数据分析以及基于证据及逻辑论证的理论评估等系统方法。

然而,研究人类不同于观察物质世界的事件,不应当把社会学径直看作是一门自然科学。人类不同于自然界中的客体对象,而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存在,能够赋予其所作所为意义和目的。除非我们首先把握了人们在行为中所运用的观念,否则我们甚至不能确切地描述社会生活。例如,要把一次死亡说成是自杀,就意味着要了解当事人在临死那一刻的意图。只有当个体主动想要毁灭自己,才会导致自杀行为。一个人偶然被车撞死,我们就不能说他是自杀。

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研究自然界中的客体对象的方法去研究人类,这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学是有利的。社会学研究者得益于能够向他们的研究对象——其他人——直接提问。但在其他方面,社会学家也遇到了自然科学家不会碰到的困难。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正处于他人观察之下,往往就不再以通常

的方式行事。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用不同于寻常态度的方式来描述自己。他们甚至还会尽力给出自认为研究者所期待的相应反应,以期“帮助”研究者。

3.1.2 研究步骤

让我们先来看看在研究工作中通常包括的各个阶段。研究步骤从调查开始到结果出版或者形成文字之间,包括许多不同的步骤。



“迈克,我是个社会科学家。这就是说,我没法说明电之类的东西。可你要是想了解关于人的事情,那找我算是找对了。”

一 界定研究问题

所有的研究都是从一个研究问题开始的。有时这是一块事实盲区：我们可能仅仅希望增进我们关于某个制度、社会进程或文化的知识。一个研究者可能会从回答这类问题着手：抱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是多少？今天的人们真的对“大政府”不满吗？女性的经济地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滞后于男性？

不过，最好的社会学研究是从那些伤脑筋的难题开始的。难题不仅仅是信息的缺乏，而且也是我们理解上的差距。开发出有价值的社会学研究的技巧，主要就在于正确地识别难题。

解决难题式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回答“这里正发生着什么？”的问题，而是力求帮助我们理解事件为什么会如此发生。因此我们会问：为什么宗教信仰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参加选举投票的民众比例下降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地位较高的职位上女性少得可怜？

没有一项研究步骤是单独存在的。研究问题是在研究的持续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如果一项研究计划所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者以前没有认识到的，那它将很容易引发另一项研究。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在书籍或专业期刊中阅读其他研究者的作品，或通过察觉社会中的特定趋势，从中发现难题。比如，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项目寻求让精神病人继续生活在社区里加以治疗，而不是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这可能会促使社会学家提出疑问：是什么使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发生了这种转变？这对病人自己以及社区其他成员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二 核查证据

一旦问题得以确认，研究过程的下一步通常就是核查该领域中可以利用的证据。以前的研究可能已经令人满意地阐明了问题。如果不是的话，社会学家就需要筛选所有现存的相关

研究，确定其对于自己的目的到底有多大用处。以前的研究者是否已经发现这个难题？他们如何去努力解决它？他们的研究对该问题还有哪些方面没有分析到？社会学家吸取他人的观点，有助于明确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在研究中可能运用的方法。

三 明确问题

第三个阶段需要明确阐述研究问题。如果已经有了相关文献，研究者就可以从图书馆中带回关于如何切入问题的好的思路。在这个阶段，关于问题性质的预感有时能转化为明确的假设，也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有根据的猜测。如果研究行之有效，就必须以这样的方式阐述假设，即搜集到的事实素材所提供的证据要么支持它，要么驳斥它。

四 研究设计

然后，研究者必须决定如何搜集研究资料。有好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选择哪一种，既取决于研究的总体目标，也有赖于所要分析行为的各个方面。为了某些目的，调查法（其中一般要用到问卷）可能是适合的。在一些情况下，比如汉弗莱斯所作的研究，访谈或观察式的研究可能是恰当的。本章下文我们还将详细了解各种研究方法。

五 实施研究

在真正实施研究的时候，很容易突然冒出一些未能预见到的实际困难。有时会无法联系上问卷发送的对象或研究者想要采访的对象。某家企业或政府机构可能不愿意让研究者实施计划中的研究。诸如此类的困难就有可能引起研究结论的偏差，诱发她做出错误的解释。比如，如果研究者正在研究工商企业如何遵守女性机会平等的法案，那么没有遵守的公司就



可能不想被研究。结果导致该研究的发现可能出现偏差。

偏差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渗入研究过程。比如说, 如果一个研究是以对于参与者观点的调查为基础的, 那研究者就很容易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推进讨论[例如, 问一些符合其特定偏见的引导性问题, 就像下面杜恩斯伯里 (Doonesbury) 漫画所刻划的一样]。另一方面, 被访对象也有可能躲避他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回答的问题。使用措辞限定的问卷, 有助于消减访谈偏差 (interview bias), 但并不会将其彻底消除。当自愿问卷之类的调查中的潜在参与者决定不参与填写时, 就产生了另一种偏差。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不回应偏差 (non-responsive bias)。一般情况下, 样本中不回应的比例越高, 基于那些确实回应的样本的调查就越有可能掺入偏差。即使在调查中想方设法减少偏差, 社会学家在实施研究时做出的观察也很有可能反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假定。要清除这种观察者偏差 (observer bias) 是很困难的, 甚或是不可能的。本章下文我们将介绍社会学研究中的另外一些陷阱和困难, 并将讨论其中的一些该如何避免的问题 (参见第四节)。

六 解释结果

即使已经收集齐了有待分析的资料, 研究者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它们可能刚刚开始! 得出所搜集数据的隐含意义, 以及回过头来把

它们与要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 基本上不会很容易。就最初的问题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也是有可能的, 但许多研究到最后也没有圆满的结论。

七 报告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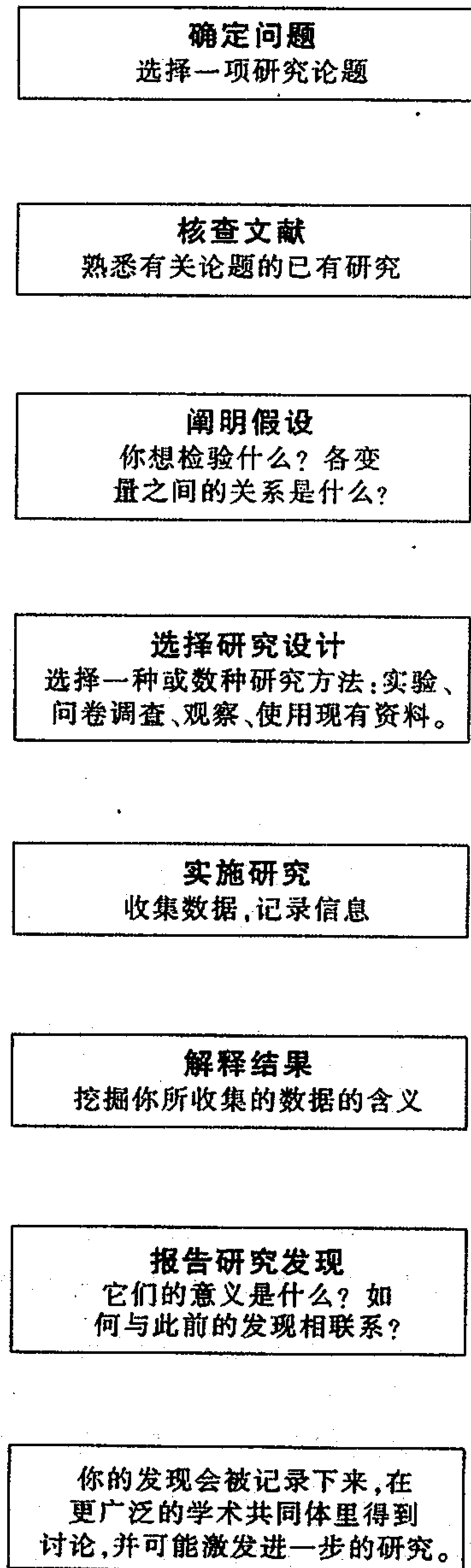
研究报告通常发表为期刊文章或书籍, 描述研究的性质, 并力求验证所得的任何结论。在汉弗莱斯的案例中, 这种报告就是《茶室交易》一书。这是最后一个阶段, 但这只是就单个研究计划而言。大多数报告会指出那些仍未解答的问题, 并对将来可能取得进展的后续研究提出建议。所有单个的研究都属于社会学共同体中持续不断的研究进程的一部分。其他学者已经在汉弗莱斯的研究结论基础上添砖加瓦。

八 现实干扰!

前面关于步骤的次序是实际研究设计中的一个简化说明 (参见图 3.1)。在实际社会学研究中, 这些阶段很少是如此清晰地一个接着一个, 几乎总会有一些敷衍了事。这就有点类似烹饪书上所略述的食谱和准备一道菜的实际过程之间的差异。许多有烹饪经验的人根本不是从食谱开始, 而他们可能比那些按食谱做的人做得还要好, 按部就班可能会束手束脚。实际上, 大多数出色的研究并不严格遵照这个次序, 尽管也会用到其中大部分步骤。

第二节 理解因果

在研究的方法论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分析原因和结果。两个事件或情境之



间的所谓因果关系，就是一个事件或情境引发另一事件或情境的一种关联。如果在汽车下坡时松开手闸，汽车将滑下斜坡，同时速度将越来越快。松开手闸导致此一事件。通过参照相关的物理原理，不难理解这种情形发生的缘由。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学也依靠凡事必有其因的假设。社会生活并不是毫无规律和缘由而发生的一堆随机事态。社会学研究以及理论思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原因和结果。

因果与相关

因果不能直接从相关中推导出来。相关意味着在两组事件或变量之间存在一种规律性的关系。所谓变量，就是个体或群体在此方面各见差异的某一向度。年龄、收入差异、犯罪率以及社会阶级差别都属于社会学家研究的变量之列。乍看起来，当我们发现两个变量紧密相关时，其中一个必定是另一个的原因；但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变量之间有许多无因果关系的相关。例如，自二战以来的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吸烟人数的下降与经常看电影的人数减少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很明显，其中一个变化并没有导致另外一个。我们甚至很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哪怕是远距的因果关系。

然而还有许多事例，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其中所观察到的相关并不意味着某种因果关系。这样的相关对于不太警惕的人来说就是陷阱，容易导致得出可疑的或者虚假的结论。涂尔干在1897年所著经典著作《自杀论》（参阅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中揭示，自杀率与季节轮转相关。在涂尔干所研究的那些社会中，从1月到6、7月间自杀率水平不断上升，而在其后至年底又逐渐下降。或许可以假定，温度或气候的变化与个体的自杀倾向有因果的关系。或许，随着温度的上升，人们变得越发冲动，头脑发热。然而，在这儿所提的因果关系并不是指与温度或气候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大部分人在春天和夏天参与的社会活动

图 3.1 研究过程的各个步骤

远比冬天多。离群索居或郁郁寡欢的个体,在他人的活动频率增加的时候,其消极的情感体验也往往会加剧。因此他们在春夏季节比在社会活动节奏放慢的秋冬季节更容易感受到剧烈的自杀倾向。无论是要评估相关是否涉及因果,还是确定因果关系的方向,我们都始终必须保持警惕。

一 因果机制

找出相关中所涉及的因果关联常常是个很难的过程。比如说,现代社会中在教育成就水平和工作成功程度之间存在强相关。在学校里分数越高的人,越有可能找到薪水优厚的工作。如何说明这种相关呢?研究倾向于指出,学校经历本身并不是主要的,学业成就更多的是受本人家庭类型的影响。来自于条件优越家庭的孩子,父母十分关注他们的学习方法,并且家里有丰富的藏书,他们的表现因而更有可能好于那些家庭中缺乏此类条件的孩子。这里的因果机制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家里所提供的学习条件。

社会学中的因果关联不应该用过于机械化的方式去理解。人们所持的态度,以及其所作所为的主观原因,也属于社会生活中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因果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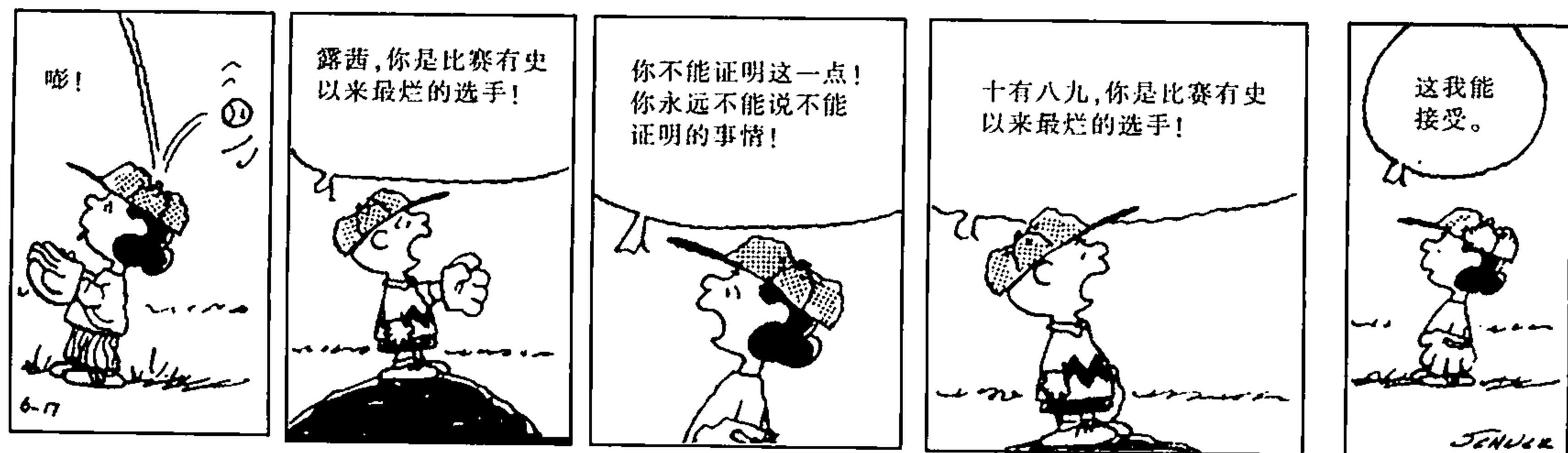
二 控制

在对说明相关关系的一个或几个原因进

行评估时,我们需要把自变量与因变量区分开来。自变量就是能够对另一个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而受影响的变量就是因变量。在上文提到的例子中,学业成就是自变量,工作收入是因变量。这种区分为我们所研究的因果关系指明了方向。同一个因素可能在一项研究中是自变量,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就成为因变量。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分析的因果过程。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工作收入的差异对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工作收入将会成为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

为了找出变量之间的相关是不是因果关联,我们就要运用控制手段。控制意味着我们保持某些变量不变,以察看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在所观察到的相关关系的各种说明之间做出判断,从而把因果关系与非因果关系区分开。例如,研究儿童发展的研究者提出,婴儿期母爱的剥夺与成年后的严重人格问题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母爱剥夺”的意思是说婴儿在其生命早期与其母亲长期分离,比如几个月甚至更长)我们如何检验在母爱剥夺与日后的人格障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呢?可以通过控制或“排除”其他那些可以说明相关的可能影响来达到目的。

母爱剥夺的来源之一是把一个孩子长期留在医院里,在此期间与父母分离。然而,真的是对母亲的依恋在起作用吗?或许,在婴幼儿期间,如果孩子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爱和关注的话,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健全而稳定的人。为了调查这些可能的因果关联,我们还必须比较两组案例,一组是被完全剥夺他人正常照顾的



孩子,一组是同母亲相隔离却得到他人的爱和关注的孩子。如果第一组孩子产生了严重的人格困难,而第二组没有的话,我们将可以推断,在婴幼儿来自某些人的正常照顾是关键,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他母亲。(事实上,只要同照顾他们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充满关爱的稳定关系,孩子确实看起来是正常成长的。这个人并非必须是他母亲本人)

三 确定原因

在说明任何相关时都可能涉及大量可能的原因。我们如何能够确信我们已经涵盖了全部?答案是我们不可能如此确信。如果我们不得不去测试所有想像到的潜在相关因素的影响,就根本不可能开展一项社会学研究,并令人满意地解释其研究结果。确定因果关系通常是由对于所探讨领域的前有研究来指导的。如果我们对相关中涉及的因果机制事先没有什么合乎情理的想法,可能会发现很难找到真正的因果关系。我们会连去测试什么都搞不清楚。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在相关中确定因果关系是如何困难。这就是吸烟和肺癌的多年研究史。研究一直表明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吸烟者往往比不吸烟者更容易患肺癌,而严重吸烟者又比轻微吸烟者更容易患肺癌。这种相关也可以换其他方式来表现。患肺癌的大部分人是吸烟者,或者曾经有过长期吸烟史。已经有众多研究证实了这些相关,普遍认为其中存在因果关联。但精确的因果机制还远没有弄清楚。

无论就一个问题进行过多少相关研究,对于一些可能的因果关系总会存有疑问。关于相关也可能有其他说明。例如,曾有人指出,易患肺癌的人也容易染上烟瘾。这种观点认为,并不是吸烟导致了肺癌,而是一些先天的生理倾向导致了吸烟和癌症。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社会学家在工作中普遍运用的许多研究方法(参看表 3.2)。

3.3.1 民族志

汉弗莱斯以民族志(运用参与观察或访谈的实地调查,或对人们所做的直接研究)作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调查者同一个群体、组织或社群一起闲逛、工作或生活,可能还直接参与其活动。民族志要是做得成功,就能提供大量的有关这些群体、组织和社群中的人的行为以及有关这些人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行为的信息。一旦我们看到某个群体内部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不仅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并且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超出所研究的情境的社会过程。

在民族志的传统著作中,并没有提供太多
在远方



“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来啦!”

此画刻画了研究已有自我觉察的对象时的一些陷阱。

关于观察者信息的描述。这是因为,人们相信民族志工作者能够提供所研究的事情的客观图景。近些年来,民族志工作者越来越倾向于谈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同所研究的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例如,考察一个人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如何影响该研究,或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权力差异如何扭曲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长期以来,对于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通常都不会去说明必须克服的各种危险或问题,但是近些年来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实地调查日记对此有了更多的展露。许多情况下,必须要应对孤独的感觉,要融入并非是你真正所属的社会背景或社群,并不是很容易的。研究者可能会不断受挫,因为该群体的成员会拒绝坦率地谈论自己;直接提问在某些情况下是受欢迎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就可能会遭遇到

冷淡的沉默。某些类型的实地调查甚至带有人身危险;例如,一位研究犯罪团伙的研究者可能被看作是警方线人,或者可能无意中卷入同敌对团伙的冲突中去。

民族志研究还有其他一些重大局限。它仅能研究很小的群体或社区,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获得有关个人信任的技巧。没有这种技巧,研究有可能根本开始不了。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研究者可能开始同群体太过认同,以至过于成为“局内人”而失去了作为外部观察者的视角。

3.3.2 问卷调查

解释实地研究常常涉及概括的问题。因为所研究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人,我们不能确信,在一种情境中所发现的东西是否也会适用于

表 3.2 社会学研究运用的四种主要方法

研究方法	长处	局限
实地调查	通常能够获得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并且有深度的信息。 民族志能提供有关社会过程的更广泛的理解。	只能用来研究相对小的群体或社区。 结果仅能应用于所研究的群体或社区;基于单纯的实地调查难以进行概括化。
问卷调查	有可能有效地搜集大量的个体数据。 允许对答卷者的回答进行精确的比较。	所搜集的资料可能是肤浅的;如果调查问卷高度标准化,就可能忽略答卷者的观点之间的重要差异。 答案可能是人们声称认为而非实际所认为的。
实验	研究者可以控制特定变量的影响。 通常更容易被以后的研究者所重复。	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不能带进实验室。 那些被研究者的反应可能受其实验情境的影响。
文献研究	根据所研究文献的类型,不仅能提供大量的数据,还能提供有深度的原始资料。 当一项研究整体上是历史性研究或具备明确的历史维度时,这种方法很重要。	研究者依赖于现存资料,而这些资料可能是片面的。 资料可能难以解释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真正趋势,就像某些官方统计那样。

其他情境,甚至不能确信两个研究者研究同一个群体是否会得出同一个结论。而这个问题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中通常没有那么严重。在问卷调查中,通过递送或者在访谈中直接处理的方式,将问卷呈现给经过选择的一组人,其人数有时多达数千人。这组人被社会学家称为总体。实地研究最适合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进行深度研究;问卷调查得出的信息往往不太详尽,但适用范围通常更为广泛。

一 标准化问卷与开放式问卷

在问卷调查中使用两类问卷。一类问卷包括一套标准化问题或限定选择式问题,对问题可能的回答仅限于固定的范围。比如,“是/否/不知道‘或者’很可能/可能/不太可能/很不可能”。这种调查的优点在于回答易于比较和统计,因为仅涉及了少量的回答类别。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因为它们体现不出观点和语言表达的精微差别,由此而产生的信息即使没有产生误导,也可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另一类问卷是开放式的。答卷者有更多的机会用自己的话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不会被限制着去做固定选择的回答。开放式问卷一般会比标准化问卷提供更详尽的信息。研究者能够通过答案,更深入地探究答卷者的所思所想。但另一方面,缺乏标准化意味着可能更难以在统计上比较各种回答。

问卷题目的安排一般是要使一组访谈员能以同一个预定顺序提问并记录回答。所有题目都必须容易被访谈者和被访者所理解。政府机构和研究组织定期开展的全国性大型调查,通常差不多在全国是同时开展访谈的。如果处理访谈和分析结果的人们总是不得不就问题或答案的模糊之处逐个互核的话,就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

问卷也应当考虑到答卷者的特点。他们会看出研究者在问某个问题时的意图吗?他们有

足够的信息来给予有效的回答吗?说到底,他们会回答吗?答卷者可能不太熟悉问卷中的术语。例如,“您的婚姻状况如何?”这类的问题就可能令一些人感到困惑。这样问可能更恰当:“你是单身、已婚、分居还是离异?”大多数问卷调查事先进行试点研究,目的是为了发现那些调查者未曾想到的问题。试点研究就是尝试着仅让少数一些人作答问卷。这样一来,在主调查进行之前,有什么困难也就能够消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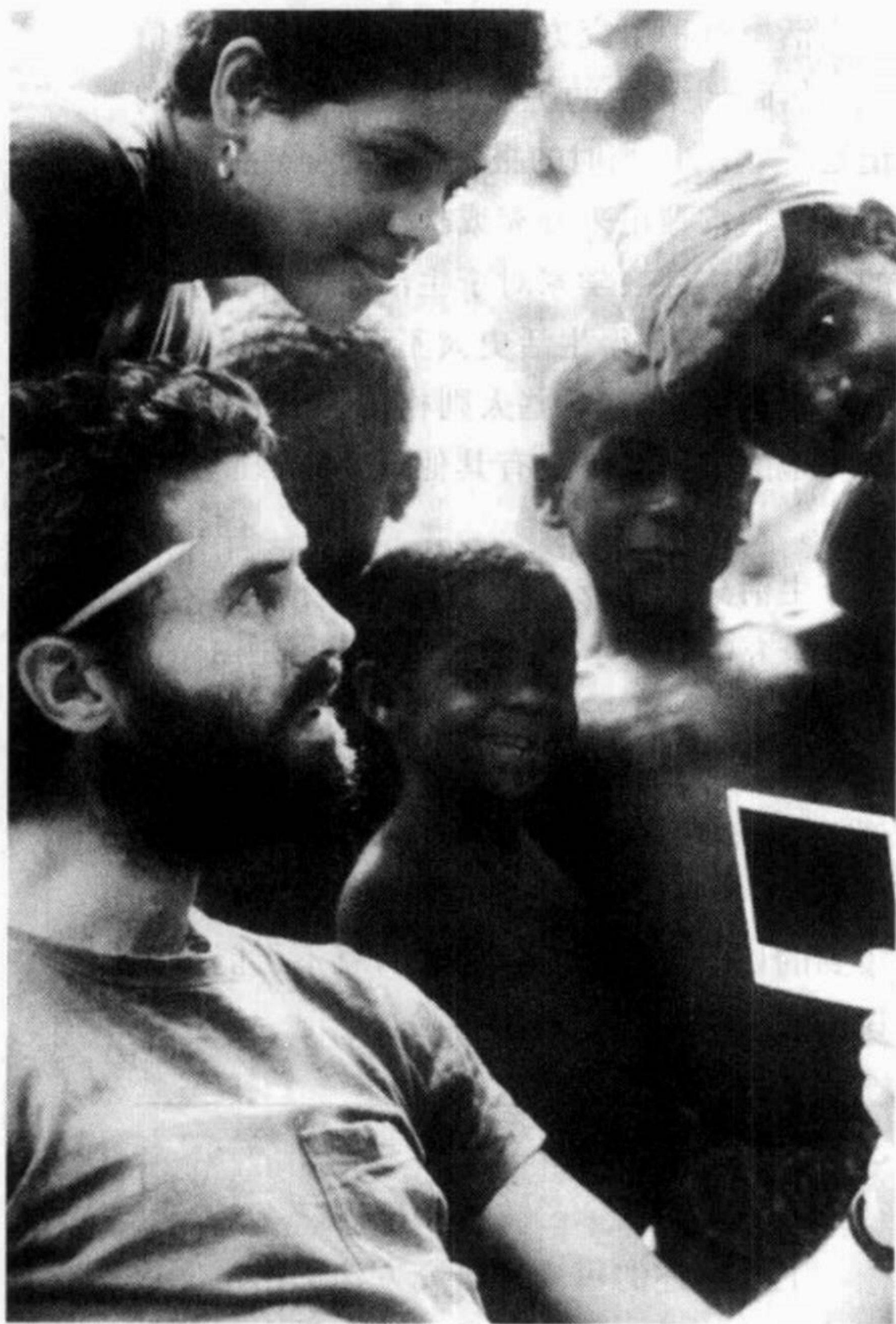
二 抽样

社会学家常常对大量个体的特征感兴趣,比如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国民众的政治态度。直接对所有这些人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采取抽样,即集中研究一个样本,或者说抽取整个群体的一小部分。人们通常相信,来自总体的一个样本的结果可以推广到总体上,只要样本是通过适当选择得出的。例如,仅仅通过研究两三千个投票者,就可以很精确地揭示人口整体的态度和投票意向。但是要获得如此高的精确性,样本就必须具有代表性,即所研究的个体群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总体必须具有典型性。抽样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统计学家已经探索出了一系列的规则,以确定选取样本的规模和性质。

随机抽样就是用来确保样本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程序。在随机抽样中,总体的每个成员被选中的几率相同。取得一个随机样本的最精致的方法,就是给总体的每个成员一个数字,然后,用计算机产生一个随机序列,从这个序列中产生这种样本。例如,在随机序列中,每隔10个数字选取1个数字作为样本。

三 “人民的选择?”

问卷调查研究早期最著名的实例之一是“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它



在实地调查时，社会学家必须与所要研究的社群打成一片，但不能完全沉浸其间，失去了自己作为旁观者的眼光。

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一些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Lazarsfeld, Berelson et al. 1948)。这项研究调查了1940年美国总统一战中俄亥俄州伊利(Erie)县居民的投票意图，开创了在今天的问卷调查研究中仍在使用的几种主要技术。为了比单个问卷探究得更深入一点，调查者在7个不同场合对每一个投票者样本进行了访谈。其目的是追溯投票态度的变化，并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这项研究提出了许多明确的假设。其一是在一个社区中同投票者紧密相连的人际关系和事件比相隔遥远的世界大事更能影响投票意图，总体上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发展了复杂的测量技术来分析政治态度；不过，他们的工作也对理论思维做出了显著的

贡献。他们帮助引入了“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和“两级传播”(two-step flow of communication)等概念。该研究显示，某些个体，即意见领袖，往往会影响自己周围人的政治观点。人们的观点不是直接形成的，而是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意见领袖对政治事件做出反应；第二步，那些领袖影响周围的人，即他的亲戚、朋友和同事。这些观点由意见领袖表达，并通过人际关系渗透，从而影响着其他个体对时事政治问题的反应。

四 问卷调查的优缺点

问卷调查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得益于以下几点原因。问卷的回答比用其他大多数方法获得的资料更容易量化和分析；可以研究大量人员；如果得到足够的基金，研究者还可以雇佣一个专门从事问卷调查的代理机构来搜集问卷。科学方法是这类研究的样板，因为问卷调查使研究者能够从统计上测量他们正在做的研究。

然而，许多社会学家对调查方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大多数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回答相对肤浅，因此在运用调查法时，可能给那些准确性值得怀疑的结果赋予了一种精确的外表。调查的不回应率有时很高，如果通过邮局寄送和回收问卷就更是如此。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会努力去与不回应者重新联系，或以其他人来代替，但是有些研究从刚刚超过一半样本数的调查中分析出结果并发表，这也并不罕见。对于那些在问卷调查中选择不作回应或拒绝接受采访的人，我们知之甚微，但问卷调查的研究确实常常让人觉得扰人、耗时。

3.3.3 实验

实验可以定义为尝试在研究者确立的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检验一个假设。实验常常用在自然科学中，因为它们同其他研究程序相比具

有很大的优点。在实验情境中,研究者直接控制被研究的状况。同自然科学相比,在社会学中运用实验法的范围相当有限。只有小群体的个体能被带进实验室情境,并且在这样的实验中,人们知道他们正在被研究,行为可能表现得不太自然。研究主体行为中的这些变化被称为“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20世纪30年代,研究者在芝加哥附近的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霍桑工厂进行了一项有关工作效率的研究。他们吃惊地发现,无论施加什么样的实验条件(光线明暗、休息模式,工作组规模等等),工人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攀升。工人意识到正在被仔细观察,因而加快了他们正常的工作速度。

虽然如此,但在社会学中偶尔运用实验方法还是有益的。例如菲利普·津巴多所做的一项极具创意的实验。他设置了一座假监狱,指定一些学生志愿者扮演看守,另一些志愿者扮演囚犯(Zimbardo 1972)。他的目的是想看看,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会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结果令研究者震惊。扮演看守的学生迅速表现出威权专制的姿态;他们对囚犯显示出真正的敌意,任意驱使他们,在言语上凌辱、威吓他们。与之相反,扮演囚犯的人常常表现出冷漠与反抗相混合的态度,而这种反应常常表现在真正的监狱犯人身上。这些影响如此显著,紧张程度如此之高,因而他不得不早早地终止了实验。无论如何,实验的结果意味深长。津巴多的结论是,监狱里的行为受监狱情境本身的影响比受监狱中有关个体的特征影响更大。

3.3.4 生活史

与实验形成反差的是,生活史纯粹属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它们不会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生活史包括搜集关于特定个体的传记资料,这通常指个体自己所回忆的资料。关于信仰和态度的历时发展,其他研究程序通常不能

像生活史这种研究方法那样获得如此多的信息。然而,生活史的研究很少完全依赖人们的记忆。像信件、当时的报告和报纸记述之类的资料,通常被用来补充或检验个体提供信息的有效性。社会学家对于生活史的价值看法各异:有些人觉得生活史太不可靠,难以提供有用信息;但其他一些人则相信,它们提供的有见地的资料几乎没有其他研究方法能够比得上。

生活史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于许多意义重大的研究中。早期一项著名研究成果是由W.I.托马斯与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所著的《身在欧美的波兰裔农民》,该书共五卷,于1918年到1920年间首次出版(Thomas and Znaniecki 1966)。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要是没有这些收集到的访谈、信件和报纸文章,就不可能更敏锐、更细致地记叙移民的体验。

3.3.5 比较研究

上文描述的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常常应用于比较的背景。比较研究在社会学中至关重要,因为通过比较使我们能够搞清楚特定研究领域中的事态。我们不妨以英国的离婚率为例,也就是每年核准离婚的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英国每年的离婚数不超过3万例。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一数字上升到每年大约16万例甚至更多。这些变化是否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某些特性?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离婚率来求得解答。这类比较揭示道,相比于其他大多数西方社会,大致的趋势是类似的。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离婚率都经历了稳步的攀升。

3.3.6 历史分析

正如第一章中所言,在社会学研究中贯彻历史视角常常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断需要一种时间视角来理解我们关于某个特定问题

所搜集的资料。

社会学家常常想直接调查过去的事件。有些历史时期能够直接研究,如果仍有当时的幸存者,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大屠杀(Holocaust)。口述史的研究意味着就人们生命早期某个时刻所见证的事件去访问他们。显然,这种研究工作最多仅能回溯大约六七十年。至于更早阶段的历史研究,社会学家就要依赖于文献和书面记载,这些东西常常存放于图书馆或国家档案馆的特藏中。

社会学家安东尼·阿什沃思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堑壕战的研究,就是使用历史文献的一个有趣的实例(Ashworth 1980)。阿什沃思想要分析的是,不得不在连绵炮火中挤在一起、忍耐数周的那些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利用了各式各样的文献资料,如战争的官方历史,包括那些对各级各部队队伍的记载;当时的官方出版物,还有士兵个人非正式留下的笔记和记录,以及个人有关战争体验的描述。阿什沃思利用这些丰富多样的资料,能够丰富而又详尽地描述战壕生活。他发现,绝大多数的士兵有自己的主意,来决定与敌人交火的频率,而常常有意无视长官的命令。例如在圣诞节,德军和盟军士兵停止了敌对,双方甚至还在一个地方进行了一场非正规的足球比赛。

3.3.7 综合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

阿瑟沃思的研究集中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而对于研究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且在历史背景下运用比较分析的调查,我们可以以西达·斯考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为例(Skocpol 1979),这是关于社会变迁的著名研究之一。斯考奇波为自己定下一个雄心勃勃的任务:以详尽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提出一套关于革命起源及其本质的理论。她考察了三种不同历史背景下的革命过程: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场革命使共产党

人掌握了政权并建立了最终于1989年解体的苏联),以及1949年的中国革命。

斯考奇波分析了多种多样的文献资料,据此提出了一种有关革命变迁的有力说明,强调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条件。她指出,社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非预期后果而造成的。例如,在俄国革命之前,各种政治群体都在努力推翻现有政权,但是没有—一个群体预料到日后发生的革命,其中也包括最终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们。一系列的冲突和对抗所引发的社会转型过程,其激进程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测。

第四节 现实世界中的研究: 方法、问题与陷阱

正如前文所强调的,所有研究方法都各有其长短优劣。因此,在一项研究中结合使用多种方法是很常见的,使用每一种方法去补充和检验其他的方法,这个过程被称为三角测量法。回头再来看汉弗莱斯的《茶室交易》,我们就能看出组合使用多种方法的重要价值,更广泛地说,就能看出实际的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陷阱。

汉弗莱斯想要解答的问题之一是:“哪些类型的男人会去‘茶室’”?但他要回答这一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在公厕里所能做的就只是观察。公厕里的沉默规则使得提任何问题都很困难,更别说交谈了。此外,如果他开始询问骨子里希望保持匿名的人一些个人问题,就会显得非常怪异。

汉弗莱斯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问卷调查法,更多地了解“茶室”中的男人。他守在公厕的门口,记下开车来公园并进公厕寻求性乐的人的车牌号。然后,他把车牌号交给自己在机动车管理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以此获得那些男人的地址。

几个月后,汉弗莱斯工作的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校区实施了一次有关性习性的逐

户问卷调查。汉弗莱斯请求此次调查中的主要调查者,把自己有关“茶室”参与者的样本的姓名和地址加进去。汉弗莱斯就此装扮成一名调查者,去这些男人的家里访问了他们,假装只是询问问卷上的问题,但其实也更多地了解了他们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他发现,这些男人中绝大多数已经成婚,在其他方面过着非常合乎传统的生活。他还多次访问了他们的妻子和家庭成员。

3.4.1 人类主体与伦理问题

所有关注人类的研究都会带来伦理上的困境。社会学家都认为,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研究给研究对象们带来的风险,是否还要大于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

汉弗莱斯在写《茶室交易》时承认,自己对于研究其行为的那些人不够坦诚。他说自己在观察“茶室”时,并没有揭示自己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身份。进入“茶室”的人假定,他之所以来到此地,也是出于和他们一样的缘由。他的在场是可以依照表面意义被接受的。尽管他在观察“茶室”时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撒谎,可是他也没有表明自己在场的真实原因。那么他的行为的这一特性是否合乎伦理?答案是:总体来说,他的研究的这一特性并没有使任何一名研究对象承担风险。汉弗莱斯并没有根据他在“茶室”中的观察所得,搜集可能暴露其身份的有关参与者的信息。他们对他们的了解,大致相当于“茶室”中其他所有人之所知。由此观之,他的在场并没有使这些人陷入比其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更多的风险。与此同时,如果汉弗莱斯在每一个研究阶段都彻底坦诚,那么研究的进展就不会那么顺利。事实上,如果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向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说明研究计划,那么社会学家所搜集到的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或许就不可能搜集到了。

如果这只是汉弗莱斯的研究计划所引出

的唯一困境,那它就不会成为社会研究的伦理考虑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了。引发更大争议的是,汉弗莱斯记下了进入“茶室”的人的车牌号,从在机动车管理局工作的朋友那里获得了他们的家庭住址,然后假装进行中立性的问卷调查而对他们进行了家访。就算汉弗莱斯并没有向这些男人的家庭泄露任何他们在“茶室”里的活动,甚至煞费苦心保守资料的秘密,但他所获得的信息总有可能造成危害。由于他所记录的活动是非法的,警察有可能要求他提供研究对象的身份信息。而调查者如果不是那么训练有素,也同样有可能在访谈研究对象的家庭时泄露秘密。又或者汉弗莱斯可能把他的笔记搞丢了,然后被别的什么人捡到。在研究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能出岔子,有鉴于此,研究者们不认为这种方案是合法的。在世界各地,面向社会学研究的政府基金机构,比如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以及职业组织,比如英国社会学学会(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现在都对从事社会学实验的研究者制定了严格得多的伦理准则。

汉弗莱斯属于第一批研究男同性恋的社会学家。他的记叙是一种合乎人道的探讨,远远超出了对于这些性社群的既有知识库存。尽管汉弗莱斯的研究对象中没有一位确实因为他这本书而蒙受了苦痛,但他日后也接受了在核心伦理争论中批评他的人的意见。他曾说,要是再做一遍这项研究,就不会追踪车牌号或进行家访。相反,在公共“茶室”搜集到素材后,他有可能尝试结识其中一些人,在足够熟悉后,告知他们自己的研究目的,然后请求他们谈谈这些活动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

3.4.2 社会学仅仅是重述显而易见之事吗?

由于社会学家所研究的事情,常常是我们有某种亲身体会的,因此有时不免有人感到疑

统计术语

社会学中的研究在分析结果时常常要运用到统计技术。有一些统计技术相当深奥而复杂,但那些最常用的却不难理解。最常见的技术是集中趋势测量(计算平均数的方法)和相关系数(计算一个变量同另一个变量相关的紧密程度)。

计算平均数的方法有三种,各有其长短优劣。例如13个人拥有的私人财产数量(包括所有的财产,如房子、汽车、银行账目和投资等),假设这13个人拥有的财产数量如下:

1. 000 英镑(零资产)
2. 5 000 英镑
3. 10 000 英镑
4. 20 000 英镑
5. 40 000 英镑
6. 40 000 英镑
7. 40 000 英镑
8. 80 000 英镑
9. 100 000 英镑
10. 150 000 英镑
11. 200 000 英镑
12. 400 000 英镑
13. 10 000 000 英镑

均数对应的是平均数,通过把全部13个人的个人财富累加之和除以13而得。总额为11 085 000 英镑,除以13,我们得到852 692.31 英镑的均数。计算均数常常很有用,因为它是建立在所提供的全部数据基础上的。但如果一个或数个个案与大多数个案有很大差别,平均数就可能产生误导。在上面的例子中,均数实际上并不是集中趋势的恰当测度,因为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数值,即10 000 000 英镑,扭曲了整体

图像。用均数来概括这批数据,人们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大多数人拥有远多于他们实际所拥有的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要运用到另外两种测度中的一种。众数是在一组给出的数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数值。在我们的例子中,众数是40 000 英镑。众数存在的问题在于它没有考虑到数据的总体分布,也就是数据覆盖的范围。在一组数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数据并不一定能代表整体的分布,因此它可能不是一个有用的平均数。在这个例子中,40 000 英镑太接近于数值的低端。

第三种是中位数,它指任何一组数据的中间数值。在这个例子中,它是第7个数字,同样是40 000 英镑。我们的例子给出了奇数个数据,13个。如果是偶数个数据,比如12个,中位数的计算需要取第6个和第7个数字的均数。像众数一样,中数没有考虑到所测量的数据的实际范围。

有时,研究者要使用不只一种集中趋势的测量,以避免得出关于平均数的不可靠描述。人们通常是计算所讨论数据的标准差,即计算一组数据的离散度(degree of dispersal)或范围——在上例中是从0到10 000 000 英镑。

相关系数是衡量两个(或更多)变量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的有用方法。当两个变量完全相关时,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正相关,表示为1.0。如果在两个变量之间没有发现任何联系,即它们之间根本没有紧密的关联,那么其系数为0。当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是完全的逆相关,就是存在一个完全负相关,表示为-1.0^①。在社会学中从没有发现过完全相关。当等级相关达到0.6甚至更高,无论正负,通常认为所分析的变量之间存在着强相关。例如,社会阶级背景和投票行为之间就可能会发现这种水平的正相关。

① 原文误为“21.0”。

惑,社会学是否只是“煞费苦心地阐述显而易见之事”(a painful elaboration of the obvious, Wright 2000)。那么,社会学是否单单是以抽象的专业术语,重新阐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是否仅仅是对我们已经熟悉的社会现象进行冗赘的界定?最糟糕的社会学可以哪一条都算得上,但以最糟糕的从业者的所作所为来评断任何学科都永远不会是公允的。事实上,好的社会学要么能够增进我们对于显而易见之事的理解(Berger 1963),要么能够彻底转换我们的常识。无论哪一种情况,好的社会学都既不是冗赘的,也不是重述显而易见之事。在本教材中对于一项新话题的讨论,有时候是从对于你可能已经理解的事情的界定开始的。对于任何学科而言,界定其术语都是必须的。尽管如此,当我们把家庭界定为一种相互联系的人的单元,这并不是大功告成,而只是刚刚起步。我们常常没有界定我们所使用的术语,因而不能随后将理解的层次推向深入。但好的社会学从来不会以界定术语本身为其目的。

3.4.3 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很少是只能引起社会学家这个思想共同体的兴趣,而且其研究成果通常传播到整个社会。必须强调的是,社会学并不仅仅是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它也是那些社会的绵延生活中的重要成分。比如英国的婚姻、性与家庭的转型(在第七章和第十二章讨论)。由于社会学研究的普及,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很少有人不对这些变迁有所了解。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社会学知识复杂而常常很微妙的影响,就此重新塑造着社会学研究这块领域本身。用社会学的技术概念来描述这个现象,就是社会学与研究其行为的人类之间存在着反思性的关系。我们在第四章中会看到(该章第四节第四小节),反思性描述了社会学研究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学的发现经常同常识有紧密的相关,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惊讶。其原因不只是在于社会学获得的发现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更在于社会学研究不断地影响着关于社会究竟是什么的常识知识。

阅读表格

阅读社会学文献时你经常会遇到表格。它们有时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如果你遵循下面所列的一些基本步骤,就会很容易破译它们。通过不断练习,这些步骤会变成自动行为(参看表3.3的示例)。不要屈从于跳过表格的诱惑;表格浓缩着信息,这些信息阅读起来有可能比以文字表述的同样资料更为快捷。一旦你能够熟练地解读表格,也将能够检验作者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有多少是确凿的验证。

1 完整地阅读标题。表格的标题经常很长,研究者在其中努力准确阐明所欲传达的信息的性

质。表3.3的标题首先给出数据涉及的研究对象,其次说明表格提供了供比较的资料,再次说明所给出的数据仅限于几个国家。

2 查看关于数据的说明性注释或注解。注解可以说明资料是如何收集的,或者资料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展示。本书中的许多表格都附有说明性的注解。比如第七章第三节的表7.2就附有几个注解,详细介绍所给出的数据是如何得出的。如果数据不是由研究者收集的,而是基于其他的原始报告的结果,则需要给出资料来源。有时资料来源会使你对信息的可靠程度有所把握,并表明在何处可以找到原始数据。在我们的表格中,资料来源

的注释表明数据取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出版物。

- 3 沿着表格的顶端和左边读标题。(有时表格把“标题”安排在底部而不是顶端)这些会告诉你每行和每列所包含的信息类型。在阅读表格时,当你浏览数字时要记住每一组的标题。在我们的示例中,左边的标题给出的是所涉及的国家,而在顶端的标题指的是汽车拥有水平和所给出数据的年份。
- 4 分辨所使用的单位;表格主体中的数字可以代表案例数、百分比、平均数或者其他测度。有时,把数字转化成其他对你更有用的形式也不无裨益:例如,如果没有提供百分比,那或许有必要把它们计算出来。
- 5 考虑一下从表格的信息中可能得出的结论。大多数的表格会得到作者的讨论,当然应该

记住她说的一些观点。但是你也应该问一下,基于数据还可以提出哪些更进一步的话题或疑问。

从我们这份表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几股有趣的趋势。第一,不同国家之间汽车拥有量的水平差异很大。2002年美国每千人拥有的汽车量是土耳其的五倍多。第二,一个国家的汽车拥有量与其富裕水平之间有着明显联系。事实上,我们也许能用汽车拥有比例作为不同繁荣程度的一个粗略指标。第三,几乎在全部所选国家里,汽车拥有水平在1990年和2002年之间都有了增长,但是,一些国家的增长速率高于其他国家。这也许表明各个国家成功取得经济增长或经济赶超的程度差异。

表 3.3 道路机动车每千人拥有量:几个国家的比较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奥地利	462	463	503	515	528	543	495	509	529	544	555	565	537
比利时	432	442	441	454	464	487	494	482	490	500	511	517	520
加拿大	600	619	627	595	569	565	565	564	580	566	569	572	581
德国	527	527	427	478	523	540	547	551	556	564	570	582	589
希腊	248	246	257	271	283	298	313	328	351	378	406	428	450
葡萄牙	310	370	407	439	438	501	533	569	610	654	698	711	756
土耳其	57	47	53	61	64	68	97	105	111	116	124	148	148
英国	443	433	453	441	439	428	448	458	474	486	493	516	533
美国	842	718	779	725	719	771	783	784	792	798	810	816	807

资料来源:OECD Factbook (2005)

本章要点

- 1 社会学家通过提出独特的问题以考察社会生活,并且试图通过系统研究解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事实性的、比较性的、发展性的或者理论性的。
- 2 所有的研究都始于令调查者感兴趣或困扰的一个研究问题。研究问题可以由现有文献中的空白、理论争议或者社会世界中的实际问题而引发。在研究策略的发展中能够区分出许多明晰的步骤,尽管在实际研究中很少严格地遵循。
- 3 两个事件或情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一个事件或情境会导致另一个事件或情境。这一点比它乍看起来要麻烦得多。因果必须和相关区分开来,相关指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关系。变量可以是年龄、收入、犯罪率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还需要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自变量就是对另一个变量产生某种效应的变量。社会学家经常使用控制法去确定某种因果关系。
- 4 在实地研究或参与观察中,研究者耗费很长时间与所研究的群体或社区共处。第二种方法即问卷调查研究,它包括把问卷寄发或分发给从较大总体中抽取出来的样本。文献研究从档案或其他资料中选取书面材料作为信息资源。其他研究方法还包括实验法、生活史的使用、历史分析以及比较研究。
- 5 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有鉴于此,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常常综合两种或更多种的方法,分别用来检验或补充用其他方法所获得的资料。这个过程就叫做三角测量法。
- 6 社会学研究常常引出伦理上的困境。这些困境要么出自于研究对象被研究者所欺骗,要么出自于研究结果的公开出版可能会对那些被研究者的情感或者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但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对他们引出的困境有敏锐的认识。

思考建议

1. 如果大部分的研究课题是从研究问题开始的,那么由谁来确定该研究哪些问题?
2. 为什么确立能够被支持或被否定的特定假设非常重要?
3. 为什么研究进程很少依照计划进行?
4. 研究者如何使发生错误或偏差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5. 某些研究方法要比其他的方法更为科学吗?
6. 为什么区分相关和因果至关重要?

阅读指南

Alan Bryman,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社会研究方法》

Joel Best,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Untangling Numbers from the Media,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彻头彻尾的谎言与统计学:破解传媒、政

客与活动分子提供的数字》

Ruth Levitas and Will Guy, *Interpreting Official Statis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6).《解释官方统计数据》

Martin Hammersley and Paul Atkinson,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5).《民族志实践原则》

Lee Harvey, Morag MacDonald and Anne Devany, *Doing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92).《社会学实践》

Tim May, *Social Research: Issues, Methods and Process*, 3rd ed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社会研究的问题、方法与步骤》

网络导航

市场与舆情研究国际 (Market and Opin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MORI)

<http://www.mori.com>

社会科学信息门户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Gateway)

<http://www.sosig.ac.uk/sociology>

英国国家统计局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http://www.statistics.gov.uk>

英国数字档案馆 (UK Data Archive)

<http://www.data-archive.ac.uk/>

目录

第一节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81
第二节	四大理论问题	82
4.2.1	结构与行动	83
4.2.2	共识与冲突	85
4.2.3	性别问题	86
4.2.4	现代世界的塑造	88
第三节	晚近的社会学理论	90
4.3.1	后现代主义	90
4.3.2	米歇尔·福柯	91
第四节	四位当代社会学家	92
4.4.1	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与公共领域	92
4.4.2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风险社会	93
4.4.3	曼纽埃尔·卡斯特:网络经济	95
4.4.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反思性	96
小结		97
本章要点		97
思考建议		98
阅读指南		98
网络导航		98



第四章

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



评价社会学中的理论视角这项任务富有挑战，令人生畏。理论争论就其定义而言就比更具经验性的争议更为抽象。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立场能够主宰整个社会学，这或许像是体现了这门学科的缺陷。但其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互相竞争的多种理论思路和理论的混战正体现出社会学事业的生机活力。在研究人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过程中，正是理论的多样性使我们避免了教条。人的行为是复杂多面的，单靠一种理论眼光，基本不可能涵盖其方方面面。理论思维的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观念源泉，供具体研究所借鉴，并且激励了诸般想像力，而这对于社会学研究的进步至关重要。

在社会学家工作的多种多样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出了难以计数的理论。有些理论阐述精致，甚至偶尔表述为数学形式，当然，这在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都比社会学常见。

有些类型的理论试图比其他理论有更广泛的说明范围。至于社会学家本人关注广泛多样的理论努力是否可取或有益，则是意见不一。比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他就坚定地主张，社会学家应当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其所谓“中层理论”（Merton 1957）。我们不应企图创建宏大的理论图式，而应当更谦逊

一些。

中层理论足够具体，能够通过经验研究直接加以检验；同时又足够一般，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现象。相对剥夺理论即为一例。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如何评价其处境，取决于他们拿自己和谁相比。因此，剥夺感并不与个体所经历的物质贫困水平直接相关（参看第十章第一节第二小节）。如果一户家庭住在贫民区的小屋子里，周围人人情况都差不多，而另一户人家住着类似的小屋子，但其邻里大部分的房子都大得多，富裕得多，前一家的剥夺感很可能比后一家淡。

确实，一种理论越是涵盖宽广，雄心勃勃，就越是难以从经验上验证。但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认为，社会学中的理论思维就应当局限在“中层”。要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妨以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研究为例（Weber 1976）。



罗伯特·K·默顿

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已经介绍了韦伯的思想，我们还将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再次谈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一节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着手解决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而非其他地方得到了发展？在古罗马衰落之后大约有 13 个世纪，其他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比西方文明更占优势。事实上，欧洲当时在全球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区，而中国、印度以及近东的奥斯曼帝国都很强大。特别是中国人，就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一直领先于西方。然而自 17 世纪以来，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呢？

韦伯分析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揭示是什么因素使现代工业有别于早期的经济活动类型。我们在许多文明中发现了一种积累财富的欲望。这一点并不难说明：人们因为财富能带来舒适、安全、权力和享乐而看重它。人们希望免于匮乏，而且通过积累财富，就可以利用它来使自己过得更舒适。

韦伯提出，如果我们看一下西方经济的发展，就会发现某种很特殊的东西：一种在历史上不曾出现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对待财富积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由最初的资本主义商人和工业家所持有的一套信念和价值观。这些人有一种强烈的积累个人财富的驱动力。然而，同其他地方的富人非常不同，他们并不打算用积累的财富来追求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克己和节俭的。他们节制而平静地生

活，并不炫示自己的富有。韦伯试图表明，这种非同寻常的特性组合对于西方经济的早期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不同于早期和其他文化中的富人，这些群体并不挥霍他们的财富，而是反复投资，以促使他们主掌的企业不断地扩张。

韦伯理论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包含的态度源自宗教。整体上的基督教在培育这种观点上起了作用，但提供根本的驱动力还得算新教的影响，尤其是新教的一个派别清教（Puritanism）。早期资本家大多是清教徒，而且许多人赞同加尔文主义的观点。韦伯认为，某些加尔文派的教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直接源泉。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人是上帝在尘世的工具。上帝需要人履行天职（vocation），即为了上帝的莫大荣耀的一种职业。

加尔文主义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预定（predestination）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只有某些命中注定的个体才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可以升入天堂。在加尔文的原初教义中，人在尘世中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自己是否有幸进入选民的行列，这是由上帝预定的。然而，这种信义也因此在此后的追随者中造成了许多焦虑，于是后来被修订成可以让信徒领悟这种获选的某些信号。

在一项天职中赢得工作成功，以物质上的丰足为指示，这成为一个人确实位列上帝选民的重要信号。于是，在受这些观点影响的群体中，产生了追求经济成功的巨大原动力。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信徒需要过一种有节制的节俭生活。清教徒认为奢侈是一种罪恶。这样一来，积累财富的驱动力就同一种严苛而素朴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了一起。

早期的企业主很少意识到，他们正在促进社会产生重大的变革。他们首先是由宗教动机所推动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也就是克己的生活方式，后来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内在部分。正如韦伯所言：

清教徒是以工作为天职。而我们去工作则是出于被迫。这是因为,一旦禁欲主义从修道院的斗室里被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主导世俗道德,它在形成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世界方面就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自从禁欲主义开始着手重新塑造世界,在世界中宣扬它的理念,物质产品就对人类的生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而且残酷无情……天职中的责任感就如同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徘徊。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观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当不需要把责任仅仅视为是经济的冲动的时候,个体通常也就根本不会试图寻找尽责的理由了。在实现责任感最高发展的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经常和纯粹世俗的激情相关联……

(Weber 1976)

韦伯的理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例如,一些批评认为,在人们知道加尔文主义之前很久,就可以在早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看到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眼光。还有人则声称,在天主教的信仰中也有韦伯认为属于新教的一个关键概念,即“以工作为天职”。然而,韦伯的基本论述仍然被许多人接受,并且他的论著与刚完成的时候一样,仍然引人注目、富有启迪。如果韦伯的命题有效的話,就是说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乍看起来似乎与之相去甚远的某种事物的决定性影响,那就是一套宗教理念。

韦伯的理论符合社会学中理论思维的几个重要标准。

1 它是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它提出一种摆脱了常识推断的解释。该理论就此在所涵盖的问题上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韦

伯以前的大多数学者很少考虑到,宗教观念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会有可能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 2 这个理论解释了一些否则令人不解的事情:为什么个体竭尽全力积累财富,却还愿意节俭地生活。
- 3 这个理论能够对更广泛的情境有所启发,而不仅限于最初提出理论试图理解的那些情境。韦伯强调,他只是试图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起源。虽然如此,也似乎有理由假定,在其他出现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的情境中,也包含有类似于由清教所灌输的那些价值观的观念。
- 4 一个好的理论并不仅仅是恰好有效的。它在产生新观念以及激发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方面也应该是富有成果的。韦伯的理论在这些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大量的后续研究和理论分析提供了出发点。

第二节 四大理论问题

就像关于韦伯著述的其他方面的争论一样,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由经典思想家以及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晚近理论视角所创立的观点,继续引发不同的意见。

有几个基本的理论困境都是旷日持久的争论或分歧的主题。这些观点的冲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其中一些关注的是非常一般性的话题,涉及我们应该如何解释人类活动和社会制度。在此,我们将要讨论四种这样的困境。

- 1 一种困境是关于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问题如下:我们作为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状况?或者,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大多是超出我们控制的一般社会力量的结果?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将社会学家一分为二,并还

将继续如此。例如,韦伯和符号互动论者强调人类行为积极主动的、创造性的成分。其他思路,比如涂尔干的思路,则强调施加在我们行动上的社会影响的约制性。

- 2 第二点理论争议是关于社会中的共识与矛盾。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学中的一些观点,包括功能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内在的秩序与和谐。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持续性和共识,无论这些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其他社会学家则强调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他们认为社会中充满了分裂、张力和斗争。对他们来说,要说人们在绝大多数时间往往会彼此和睦相处,只是一种幻觉。他们认为,即使没有公开的对抗,人们之间也会存在严重的利益分歧,到某个程度就容易引发积极的冲突。
- 3 第三个基本的理论困境几乎很难在正统的社会学传统中显现,但却不能忽视。这就是如何在社会学分析中融入有关性别^①的令人满意的理解。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之所见,社会学的创建人物都是男性,并且他们在著述中基本上没有注意到,人类事实上是有性别差异的。即使那些曾经参与社会学的女性,直到最近也基本上是被忽视的(比如可以参看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有关玛蒂诺的图文框)。在早期男性社会学家的作品中,人类个体仿佛是“中性的”,是抽象的“行动者”^②,而不是有区别的女性和男性。因为我们极少把性别问题与社会学中理论思维的既有形式进一步联系起来,所以这可能是目前四个理论困境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同性别相联系的主要理论困境之一如

下:我们会在社会学思维中把“性别”确立为一个一般范畴吗?或者换种思路,我们是否有必要在分析性别问题时,把它们拆解成更加具体的影响因素,看其如何作用于不同背景下的女性和男性的行为?另一种提问方式是: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依据其身份认同和社会行为来区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吗?或者,性别差异是否一直主要是从划分社会的其它差异(例如阶级划分)的角度来说明的?

- 4 第四个难题不怎么涉及人类行为或者作为整体的社会的一般特征,而是涉及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它主要关心影响现代社会起源及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源自马克思主义取向和非马克思主义取向之间的差异。这个困境集中于以下问题:现代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被马克思指出的经济因素,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的机制所塑造的?另一方面,在现代,其他影响因素(如社会、政治或者文化因素)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发展?这是一组对社会学理论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比较细致地考虑一下由它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

4.2.1 结构与行动

涂尔干和其后另外许多社会学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我们作为其成员的社会对我们的行动所施加的社会约制。

涂尔干的思想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已经有所介绍。

涂尔干认为,社会优先于个体的人。社会

① 本书术语表中的“gender”译作“社会性别”。在“sex”与“gender”并置对比时(特别是第十二章),分别译作“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而在“gender”单独出现时,比较简洁地译作“性别”,但这种范畴引入社会学,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关注到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另一个比较棘手的词是随着福柯思想而兴起的“sexuality”,如果没有特指,我们把这个蕴含了“性观念”、“性认同”、“性行为”、“性意识”等意涵的词笼统译作“性”,而不是像在以前一些译作中那样选择“性本性”这个译法,虽然它似乎更符合构词法。

② 原文此处为“actor”,意思是“男演员”,而不与“actress”(女演员)相区别。

远远大于个体活动的总和。它具有一种堪比作物质环境中的结构的“稳定性”或“固定性”。想像有一个人置身于有几个门的房间里。房间的结构限制着此人可能的活动范围。比如,墙和门的位置限定了进出的路线。依照涂尔干的观点,社会结构以类似的方式约制着我们的活动,对我们作为个体所能做的事情做出了限制。对我们来说,它是“外部的”,正如房间的墙壁一样。

涂尔干对这种观点有一段很著名的表述:

当我尽自己作为一名兄弟、丈夫或公民的职责,实施我所订立的承诺时,我是在履行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义务。这种义务存在于我自己和我的行为之外……与此类似,信徒自出生就发现社会上早就有了他这种宗教生活的信仰和仪轨;如果说它们是在信徒之前就存在着的,也就是说存在于信徒个人之外。我用于表达思维的符号系统,用于结算债务的货币制度,用于商业往来的信贷手段,以及从事职业活动的规范,诸如此类,都是不受我利用它们的方式影响的功能。(Durkheim 1982)

尽管涂尔干所表达的这种观点有很多追随者,但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问道:如果“社会”不是许多个体行动的结合体,那它又是什么?如果我们研究一个群体,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集合体,只会看到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的一些个体。“社会”不过是彼此联系的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许多个体。根据批评者(包括大多数受符号互动论影响的社会学家,这种理论思路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中有介绍)的观点,作为人,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有理由。我们处在一个被文化意义所渗透的社会世界里。根据他们的观点,社会现象准确

来讲并不类似于“物”,而是依赖于我们赋予所做事情的符号意义。我们不是社会的造物(creatures^①),而是它的创造者(creators)。

评价

这种争议好像不会得到彻底解决,因为自从现代思想家开始试图系统地说明人的行为,它就已经存在了。不仅如此,它并不只是社会学中的争论,而是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学者的困扰。读完本书之后,你必然会对哪种立场更正确有自己的看法。

然而,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或许是言过其实。如果两者都不可能完全正确,我们能很容易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涂尔干的观点显然在某些方面是有效的。社会制度确实先于任何特定个体的存在。它们显然对我们施加了约制。例如,我的确没有发明英国的货币制度。如



欧文·戈夫曼

① 这个词的常见译法正是“动物”、“人”。

果我希望拥有那些用钱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我也无法选择是否要使用钱。货币制度就像其他所有已经确立的制度,独立存在于社会的任何个体成员之外,并约制着个体的活动。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假定社会以类似于物质世界的方式“外在于”我们,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不管人类是否生存,物质世界都会继续存在。而这样来说社会,却显然是荒谬的。单拿一个个体来说,社会是外在的,但是根据定义,社会不会外在于结合在一起的所有个体。

另外,尽管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可能约制我们所做的事情,但并不能决定我们所做的事情。只要下定决心,我们就能选择不使用金钱的生活,即使这可能表明一天天地维持生存很艰难。作为人,我们确实是在做出选择,而不只是被动地回应周围的事件。要想跨越“结构”与“行动”取向之间的鸿沟,就要认识到,在我们日常活动的过程中,我们能积极地塑造和重新塑造社会结构。比如,我们使用货币制度这一事实,就在以一种微小而又必需的方式,促进了这种制度的存在。如果每个人,或者只是大多数的人,在某一时刻决定避免使用货币,货币制度就会瓦解。

第一章中已经提到,对于分析积极塑造以及重新塑造社会结构的过程来说,结构化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这个概念是笔者(吉登斯)在近些年引入社会学的。“结构”与“行动”必然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共同体或者群体之所谓有“结构”,只是就人们以常规的、基本可预测的方式来行事而言的。另一方面,“行动”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大量被社会结构化了的知识。说明这一点最好是以语言为例。语言要想存在,就必须接受社会的结构化。每一位说话的人都必须要遵守所使用语言的属性。例如,除非遵循某些特定的语法规则,否则,一个人在任何场合讲的话都不会有意义。然而,只有当使用语言的个体在实践中切实遵守那些规则,语言的结构特征才能存在。语言始终处于结构化的过程之中。

欧文·戈夫曼等研究社会互动的学者(在第五章讨论)相当正确地指出,人类行动者都具有高度的知识能力。作为人类,我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主要是因为我们遵守着一套复杂的习俗。例如,陌生人在大街上遭遇时所遵守的仪式。另一方面,当我们在行动中运用知识能力,就会赋予我们所利用的规则和习俗本身以力量和内涵。结构化始终以笔者所称的“结构二重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为前提。这意味着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以有结构存在为前提。同时,结构也以行动的存在为前提,因为“结构”依赖于人类行为的规则性。

4.2.2 共识与冲突

在比较共识和冲突的观点时,以涂尔干为引子也同样有效。涂尔干把社会看作是一组相互依赖的部分。实际上,绝大多数功能主义思想家都把社会看作是整合一体的整体,由相互紧密交织的结构所组成。这同涂尔干对于“社会事实”的约制性、“外在”性的强调很是符合。然而,这里不是拿一座建筑物的墙壁来作类比,而是拿身体的生理学作类比。

身体是由各种专门化的部分(如脑、心、肺、肝等)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助于维持有机体的生命。它们的工作必须相互协调,否则有机体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根据涂尔干的观点,社会也是如此。因为一个社会有一个长期延续的存在,其专门化的制度(如政治制度、宗教、家庭和教育制度)必须相互协调地工作。因此,一个社会的延续依赖于合作,而合作又必须以社会成员对于基本价值观有普遍共识或赞同为前提。

那些主要关注冲突的学者则有非常不同的眼光。以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论述为例,可以很容易勾勒出他们的指导性假设。

马克思有关阶级冲突的论述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讨论。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被划分成拥有不平等资源的阶级。由于存在这些明显的不平等,所以出现了“融入”社会制度的一些利益划分。这些利益冲突发展到某个程度就会爆发成积极的变革。不过,并非所有受这种观点影响的人都像马克思那样看重阶级。在助长冲突方面,其他划分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比如各种族族群或政治派别之间的划分。无论以哪种冲突群体为重点,社会被看作是本质上充满张力的;即使是最稳定的社会制度,也代表了对抗群体之间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评价

像结构和行动的情况一样,彻底终结这方面的理论争论是不可能的。然而,还是要再次指出,共识与冲突观点之间的差异有些言过其实。这两种立场绝不是完全无法共处的。所有社会都可能就价值观达成某种普遍共识,当然也都包含冲突。

不仅如此,作为社会学分析的一个普遍规则,我们总是要考察在社会体系中,共识和冲突之间的联系。不同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它们的成员所追求的目标,常常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对立利益的混合。例如,甚至在马克思关于阶级冲突的描述中,不同的阶级除了相互对立之外,也会拥有一些共同利益。因此,就像工人需要资本家给他们提供工资一样,资本家也依赖劳动力在他们的企业里工作。在这样的情境中,公开的冲突是不会持续的;有时候双方反倒都倾向于超越他们的差异,而在其他情境中,情况恰好相反。

意识形态是有助于分析冲突与共识关系的一个概念,即指以损害较为弱勢的群体为代价来保护较为强势的群体地位的价值观和信仰。权力、意识形态和冲突总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权力能带来回报,所以许多冲突都是围绕着权力。那些握有最多权力的人,可能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影响来维持自己的支配,但如果必要的话,也经常有能力使用强力。例

如,在封建时期,贵族统治是由一小部分人是“天生治人”的观念所支撑的。但是贵族统治还是常常诉诸暴力,以对付那些敢于对抗他们权力的人。

4.2.3 性别问题

在那些确立现代社会学框架的重要人物的著述中,性别问题很少成为核心话题。然而,他们确实论及性别问题的那么一点点文字,至少也可以使我们明确这个基本的理论困境的轮廓,即使在他们的著述中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一困境。通过对照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著述中偶尔出现的一个主题,我们便能生动地描述这一困境。涂尔干在他关于自杀的探讨过程中曾经指出,男性“几乎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而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产物”。基于这些考虑,他谈到男性的“品味、抱负和脾性在很大程度上有一个集体性的起源,而他的女伴在这些方面会更直接地受到其机体的影响。因此,男性的需要与女性非常不同”(Durkheim 1952)。换言之,因为女性较少社会化,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因此女性和男性具有不同的认同、品味和倾向。

今天,没有人会接受明确以这种方式表述的观点。女性的认同受社会化塑造的程度同男性一样。然而,假如对涂尔干的说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关于性别形成和本质的可能观点。也就是说,性别差异基本上依赖于男性和女性在生物学上被赋予的差别。这样一种观点并不必然意味着相信大部分性别差异是天生的。相反,它设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主要是由她们对于生育和抚养儿童的参与所塑造的。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所有社会中都深深根植着性别差异。女性和男性之间在权力上的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生儿育女,并且是子女们主要的照顾者;而男性则活跃在政治、工作和战争等“公共”领域。

马克思的观点与此有实质分歧。在马克思看来,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和地位上的性别差异主要反映的是其他划分,在他眼里尤其指阶级划分。依据他的看法,在人类社会最早期的形态中,既没有性别划分也没有阶级划分。男性对于女性的权力只是随着阶级划分的出现而出现的。女性成为男性通过婚姻制度而拥有的一种“私有财产”。一旦阶级划分被克服,女性就会摆脱受奴役的处境。另外,今天几乎很少有人接受这样的分析,但是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概括,能使其成为一种更加合理的观点。阶级并不是塑造影响男女行为的社会划分的唯一因素。还包括族群与文化背景等其它因素。例如,有人认为,一位少数族群的女性(比如美国的黑人女性)与该族群中男性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这些女性与多数族群中的女性(即白人女性)之间的共同点。或者也可能是,来自一种特殊文化(如小型的狩猎与采集文化)的女性与这种文化中的男性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于这些女性与工业化社会中女性之间的共同点。

近几十年来女性运动的兴起已经引发了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内部的巨大变化。女性主义广泛抨击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男性偏见,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本身所体现出的男性偏见。不仅社会学中的男性支配受到了挑战,而且也有呼声,要对学科本身进行全面重建,既要重建构筑社会学核心的问题本身,也要重建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的表现形式。

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强调,性别问题是分析社会世界时的核心话题。虽然女性主义观点繁复多样,难以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同意,知识在整体上是同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问题相关的。因为男性与女性的经验不同,观察世界的视角也不同,所以她(他)们建构对于世界的理解的方式也不相同。女性主义者常常指责传统社会学理论否认或忽视了知识的“性别化”特征,而是设计出男性支配的社会世界

观。根据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男性在传统上占据着社会中权力和权威的位置,并要勉力维持他们的特权角色。在这种状况下,已经性别化了的的知识就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力量,以维持既定的社会安排,使男性的支配合法化。

女性主义的诸多思路将在第十二章第四节第二小节中进一步讨论。

一些女性主义者已经指出,假定“男性”与“女性”是拥有各自兴趣和特征的群体是错误的。其中有一些研究者,如朱迪丝·巴特勒(Butler 1999),已经受到后现代思维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所讨论(参看本章第三节)。根据巴特勒的观点,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范畴,而是一个流变的范畴,不是展现为人们之何所是,而是展现为人们之何所为。巴特勒主张(Butler 2004),如果说性别是某种被“构筑”起来的东西,那么当它被一个群体用于对另一个群体施加权力时,我们也应当奋力去“拆毁”它。巴特勒的研究及其对于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影响,在第十二章第二节第四小节还将进一步讨论。

苏珊·法吕迪也研究了相似的主题。在她最近关于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研究《搞拧了:现代男人露了馅》(Faludi 1999)中,法



朱迪丝·巴特勒

卢迪揭示道,男人支配所有领域的观念只是个神话。相反,在假定由男性享有并推动的世界中,现在有一场男性特质危机。男性中的一些群体仍然充满自信,觉得自己有控制力。而其他许多男性则发现已经被边缘化了,缺乏自尊。至少有一些女性已经获得成功,这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个现象,但是工作性质的诸多转变也是个中的原因。例如,信息技术的影响已经使得许多技能欠佳的男性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是多余的。

在第十七章第三节第四小节中将结合教育来讨论“男性特质危机”。

评价

第三个困境所涉及的问题相当重要,直接关系到女性主义者对社会学提出的挑战。过去大量的社会学分析要么忽略了女性,要么就是对于女性认同和行为所给出的解释极不充分,对此没有人能严肃地提出反驳。尽管过去的20年间,社会学中关于女性展开了众多新研究,但是有关女性的独特活动和关注,仍然有众多领域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不过,“把女性研究带入社会学”本身并不等于处理性别问题,这是因为性别问题关系到男性和女性的认同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其他社会学概念(阶级、族群、文化背景等)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性别差异,或者反过来说,其他社会划分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从性别角度来说明,目前都还未有定论。未来社会学中一些重要的说明任务,当然将有赖于有效地处理这个困境。

4.2.4 现代世界的塑造

一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马克思的著作对社会学分析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没有被人们忽视。从他那

个时代至今,许多社会学的争论都集中于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观点。如前所述,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社会变革背后的驱动力就是面对不断的经济转型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资本主义这个经济体系的动力比先前任何形态都要强劲得多。资本家彼此竞争,向消费者出售产品,并且为了在竞争市场上生存下去,厂商不得不尽可能廉价而高效率地生产他们的产品,所以导致不断地技术创新,因为企业能确保胜过竞争对手的途径之一,就是提高用于某一生产过程的技术的效率。

寻找新的市场以出售商品,获取廉价原材料,以及使用廉价劳动力,在这些方面资本主义也具有很强的动力。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个向全世界无限扩张的体系。这就是马克思对西方工业向全球扩散的说明。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影响的解释赢得了许多支持者,而且后来的学者对马克思本人的阐述也做出了相当的改进。另一方面,许多批评者也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就塑造现代世界的影响因素的问题给出了另外的分析。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资本主义对于创造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的确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他社会学者对下面两点都提出了辩驳,其一便是马克思夸大了纯粹经济因素对于产生变革的作用,还有就是资本主义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关键。马克思坚信社会主义体系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大多数学者对此也存有怀疑。

1989年后的短短几年间,苏联和东欧的变革,使得很多人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危机”,这似乎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所持有的怀疑主义(Gamble 1999)。尽管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否弃了他们常说的俄国等地的“实存的社会主义”,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长久延续,还是让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觉得有证据表明,对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二 韦伯的观点

马克思最早也是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就是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研究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有所介绍。

韦伯的著述实际上已经被说成是与“马克思的幽灵”,即马克思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做毕生的斗争。韦伯所提出的替代立场至今仍然很重要。韦伯认为,非经济因素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观点之一。宗教价值观,尤其是那些同清教相联系的宗教价值观,在缔造资本主义眼光方面至关重要。这种观点并没有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是在经济变革中发展出来的。

韦伯对现代社会性质的理解,对于西方生

活模式扩展到全世界的原因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理解有着实质上的差异。根据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组织经济企业的一种独特方式,只是在现代阶段塑造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科学和科层制的影响支撑着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比这种机制更为基本。科学已经塑造了现代技术,并且被认为会在将来任何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发挥这种作用。科层制是有效组织许多人的唯一途径,因此无疑将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成长而扩张。科学、现代技术和科层制的发展被韦伯合称为“理性化”。理性化是指在技术知识的基础上,依照效率原则来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

评价

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得出的关于现代社会的解释,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又可以将学者们一分为二。下面的图文框列出了这些差异。(必须记住的是,每个阵营里都会有一些变异,因此,并不是每个理论家都会

马克思与韦伯比较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 1 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扩张是现代发展的主要动力。
- 2 阶级不平等分裂了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最根本性质的基础。
- 3 主要的权力划分,比如影响男女不同地位的权力划分,归根结底源于经济不平等。
- 4 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种过渡类型。我们可以期望它们在将来会从根本上重组。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
- 5 西方的影响扩展到全世界,这主要是资本主义企业扩张趋势的结果。

广义的韦伯主义观点

- 1 生产的理性化是现代发展的主要动力。
- 2 阶级只是现代社会许多不平等——例如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中的一种。
- 3 经济体系中的权力不同于其他来源。例如,男女不平等就不能从经济角度来说明。
- 4 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理性化在未来都注定会更加发展。所有现代社会都依赖于社会经济组织的统一的基本模式。
- 5 西方的全球化影响来自于它对工业资源的控制,以及军事力量的优势。

接受本阵营所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对立涉及社会学的许多领域。它们不仅影响到我们如何分析工业化社会的本质,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欠发达社会。此外,这两种视角也与不同的政治立场相联系。左派学者基本上接受第一方的观点,自由主义或保守派接受第二方的观点。然而,相比于其他困境所包含的那些因素,这个困境所涉及的因素更具有直接经验的性质。对现代社会以及欠发达国家的演进道路进行事实性研究,有助于我们评估变迁模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某一派或是另一派的观点。

第三节 晚近的社会学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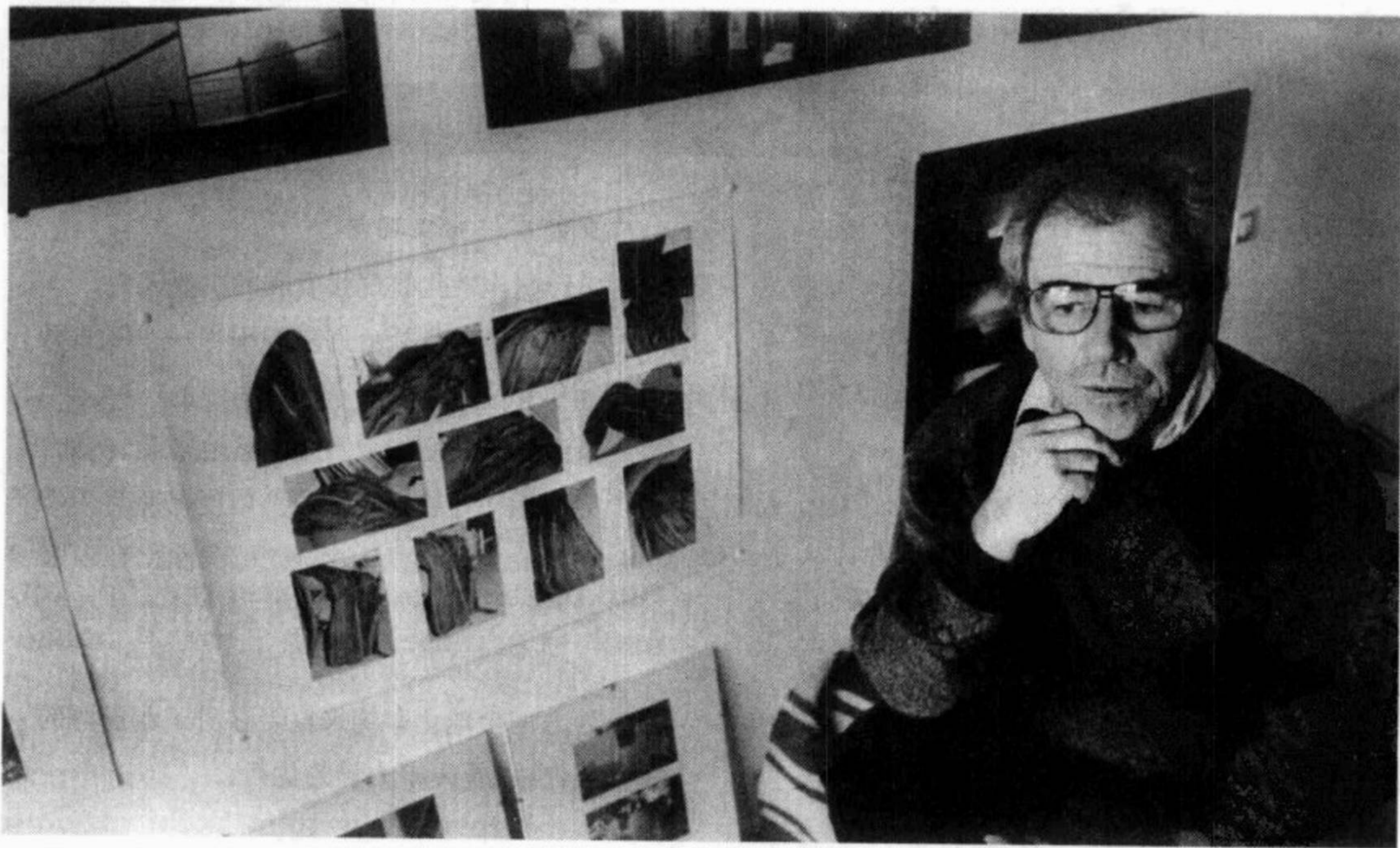
关于现代世界是如何塑造而成的,上面提出的困境仍很重要,但是更晚近的理论家已经开始努力超越马克思和韦伯。随着1989年东

欧的变革,马克思的观点似乎不如许多人曾经认为的那样切合于当代世界。虽说仍有一批学者继续使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思路,来探讨面对现代世界的社会学问题(Gamble 1999)。

许多社会学家,包括一些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现在都全盘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马克思打算找到一般历史模式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结合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应该彻底放弃马克思和韦伯寻求发展的各种理论,即对社会变迁做出整体解释。

4.3.1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倡导者声称,古典社会思想家的灵感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念:历史具有一种特定的形态,这种形态“去往某处”,从而带来进步。但是,现在这种观念也已经崩溃了。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者元叙事,也就是关于历史或者社



让·布希亚

会的整体概念 (Lyotard 1985)。不仅没有可以为之辩护的普遍进步观,也没有历史之类的东西。后现代世界并非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注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新媒体支配的世界,将我们“拔出自己的过去”。通过数不清的电影、录像、电视节目和网站,意象在整个世界流通。我们开始接触到许多观念和价值,但是这些同我们所居住地区的历史殊少关联,或者其实同我们自己的个人历史都很少有联系。一切都似乎流变不居。正如一群研究者所言:

我们的世界正在被重塑。大众生产,大众消费者,大都市,老大哥式 (big brother) 的国家,蔓延的房地产,以及民族国家,都在趋于衰落:灵活性,多样性,分化,以及流动,沟通,去中心化,国际化,则在不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自我感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都在发生转变。我们正朝向一个新时代过渡。(Hall. et. al. 1988)

后现代性的重要理论家之一是法国作家让·布希亚(第十五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将讨论他的著述)。布希亚认为,电子媒体已经摧毁了我们同自己过去的关联,并创造了一个混沌、空洞的世界。布希亚在早年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然而,他认为电子通信与大众传媒的蔓延已经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力量塑造社会的定理。反之,社会生活首先是由符号和意象所影响的。

布希亚说,在一个受媒体支配的年代,意义是由意象流 (flow of images) 所创造的,比如在电视节目中。我们的世界大部分变成了一种虚构的领域。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对媒体意象而不是真实的人或地点做出反应。因而,当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在 1997 年去世的时候,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爆发出巨大的悲伤。然而,人们是在悼念一个真人吗?布希亚会

说并非如此。戴安娜王妃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通过媒体而存在的。就人们的体验方式而言,戴安娜的死不是一桩真实事件,而更像是一出肥皂剧。布希亚谈到,“生活消解在电视之中”。

4.3.2 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 (1926-1984) 尽管拒绝称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还是大量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努力去刻画理解的转换。这种转换使我们在现代世界的思维有别于此前各时代的思维方式。福柯在他关于犯罪、身体、癫狂和性 (sexuality) 的著作中,分析了在控制与监视社会人口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的监狱、医院和学校等现代制度的出现。他想要揭示的是,启蒙观念在个体自由之外还有另外一面,即关注规训 (discipline) 与



米歇尔·福柯

监控 (surveillance)。福柯提出了同现代组织体制相关的权力、意识形态和话语之间关系的重要观念。

在社会学中,权力的研究至关重要,即个体或群体如何阻止他人的目标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经典创建者当中,马克思和韦伯特别强调权力。福柯在他们所开创的一些思路继续前进。话语的作用是他关于社会中权力和控制的思考的核心。他利用这个术语来指通过共有假定而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特定主题。例如,福柯揭示了癫狂话语从中世纪直到当前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在中世纪,发疯通常被认为是无害的。一些人认为发疯者甚至可能在知觉方面“天赋异禀”。然而,在现代社会,“癫狂”已经成为一种医学化了的话语,强调疾病和治疗。医生、医学专家、医院、专业协会以及医学杂志等组成一个高度发达、富有影响的网络,支持并维护着这种医学化话语。

第八章第二节第一小节还将详细介绍福柯的著述。

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是通过话语的作用,塑造对于犯罪、癫狂或性等现象的普遍态度。由具备权力或权威的人所建立的专家话语,经常只能由相与竞争的专家话语来反对。这样一来,话语就能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限制另外的思维或言说方式。知识变成了一种控制力。福柯作品中贯穿的一个显著主题,就是权力与知识是如何同监控、实施与规训的各种技术相联系的。

福柯的社会理论新取向立场激进,与关于科学知识本质的普遍共识截然对立。这一取向是他许多早期著作的特征,已经以福柯的“考古学”而著称。其他社会科学家是想通过与熟悉的事物做类比,试图以此了解不熟悉的事物,而福柯和他们不同,从反方向着手研究:通过考察发掘过去而弄清熟悉的事物。福柯有力地抨击了“当前”(the present),那些想当然

而接受的概念、信念与结构,正因为是熟悉的,所以基本上反而是不可见的。例如,他探究了为何“性”(sexuality)的观念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经由社会发展过程被创造出来的。对于我们当今关于正常与越轨行为、精神健康与癫狂等方面的观念,也可以有类似的评论。福柯努力揭示我们当前通行的信念和实践背后的假定,并通过从过去切入它的方法来使当前变得“可见”。不过,我们不会得出关于社会、社会发展或现代性的普遍理论;我们只能理解其中的片断。

第四节 四位当代社会学家

其他许多思想家受到了福柯的影响。监控,即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而保管有关他们的信息,在以大众传媒的兴起为标志的社会中是一种始终存在的现象。绝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家都承认,信息技术与新型通信系统,连同其他技术变迁,正给我们所有人带来重大的社会转型。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同意后现代主义者和福柯的核心观点。后现代主义者和福柯认为,我们理解社会世界中的普遍过程的努力,就像我们能把世界变得更好的观念一样,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曼纽埃尔·卡斯特,尤尔根·哈贝马斯,乌尔里希·贝克,连同笔者(安东尼·吉登斯),都主张我们像过去一样需要发展有关社会世界的普遍理论,并且这样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积极正面地介入以塑造社会世界。即使同意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梦想已经破灭,一些驱动社会主义者方案——诸如社会共同体、平等与关注弱势群体的方案——的价值观念依然是很有活力的。

4.4.1 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与公共领域

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到,



尤尔根·哈贝马斯

马克思的许多观点已经陈旧,并转向韦伯另寻可替代的观点。然而,他也认为,激发马克思著述的基本原则当中,有一些还是值得维持的。没有也不应该有代替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已经证明有能力产生巨大的财富。虽然如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找出的一些根本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它产生经济萧条或经济危机的趋势。我们需要重新确立我们对于经济过程的控制。现在,更多的是这些经济过程在控制着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着它们。

哈贝马斯建议,要实现强化的控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对复兴他所称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实质就是民主的框架。哈贝马斯认为,正统的民主程序,包括议会和党派,并没有向我们提供集体决策的充足基础。我们通过改革民主程序,通过社区机构和其他地方群体更坚定的参与,就能够革新公共领域。现代沟通媒体的确发挥了一些布希亚等人所说的影响,但它们也能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为推动民主做出贡献。例如,由商业利益支配的电视

和报纸无法关注民主的讨论。然而,公共电视和广播,再加上互联网,就为发展公开对话和讨论提供了许多机会。

哈贝马斯由于没有充分重视性别和民主之间的关联,遭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批评。批评者指出,民主经常被假定基本上是一个男性领域。她们认为,哈贝马斯应该探讨一下,民主通过哪些方式趋向于排斥女性的充分参与。例如,绝大多数议会中仅有一小部分是女性成员。许多政治争论也往往忽略应特别关注的女性问题。哈贝马斯的重要著作《沟通行动理论》(Habermas 1986—1988)中基本没有讨论性别的问题。南希·弗蕾泽指出(Fraser 1989),哈贝马斯在讨论民主时,把公民身份看作是中性的。但是,公民身份通常是以对男性比对女性更有利的方式发展的。例如,家庭中女性的地位仍旧主要从属于男性的地位。所以说,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直接关系到公共民主。

4.4.2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风险社会

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也拒绝接受后现代主义。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他所称的“第二现代性”,而不是生活在一个“超越现代”的世界。第二现代性是指现代制度事实上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性的,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正在摆脱传统和习俗的束缚。旧的工业社会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风险社会”。后现代主义者视之为混沌或缺乏模式的东西,在贝克看来则是风险或不确定性。全球秩序的首要特征就是对于风险的管控。

贝克的意思并不是说,当今世界比以往各时期更具有风险。而是说,我们必须面对的风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风险不怎么源自自然危险或者灾难,而更多地源于我们自身的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不确定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推进,产生了迥异于以前年代的新的风险情境。显然,科学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益处。然而,它们也产生了许多难以计算的风险。例如,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转基因或纳米技术之类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转基因作物的支持者们宣称,弄得好的话,可以让我们有可能彻底解决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营养不良问题,为每一个人都提供廉价的食物。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指出,这些作物有可能对健康产生意外的危险后果。

第二十二章第三节第三小节还将详细探讨贝克的风险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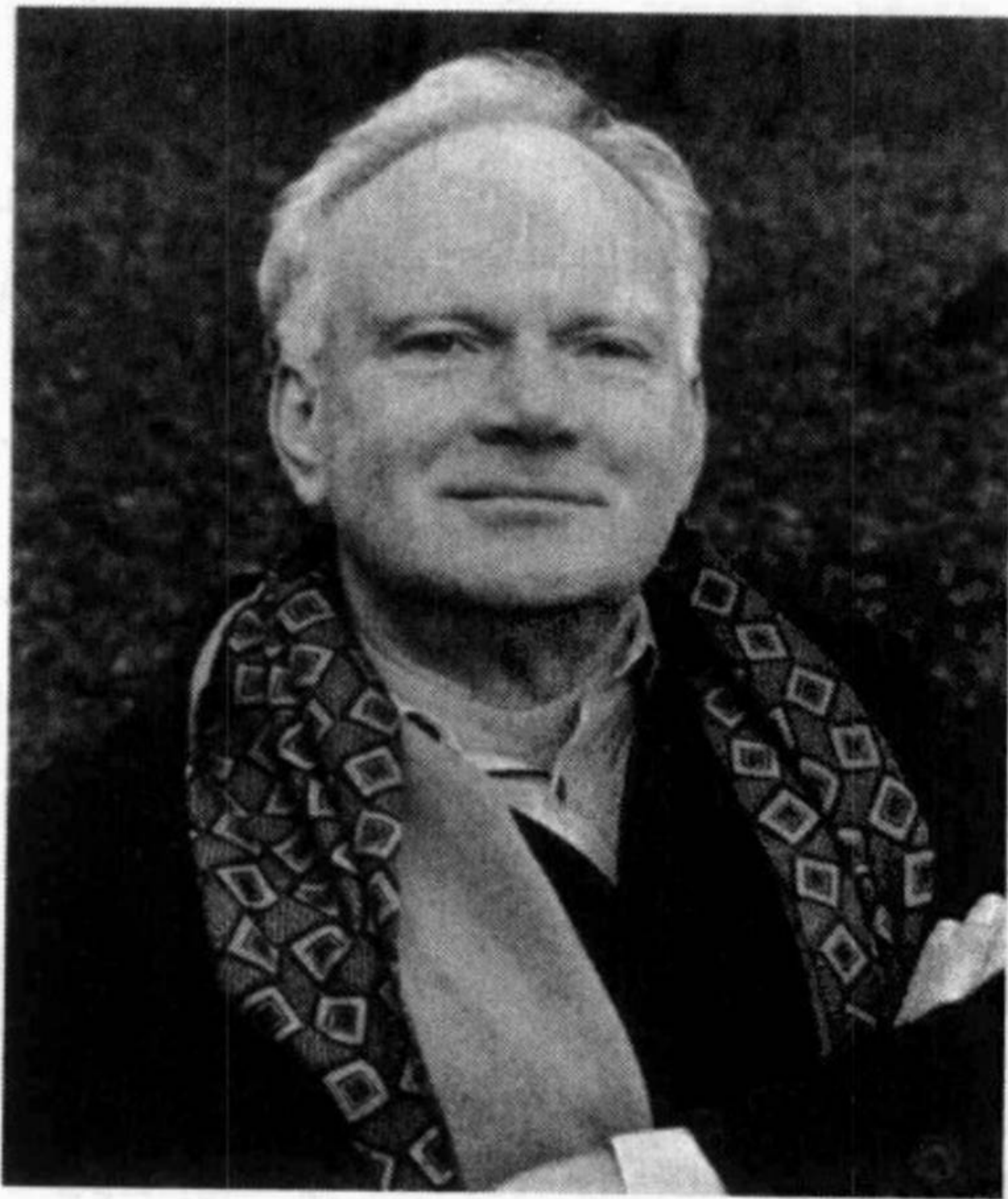
根据贝克的观点,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危害不受空间、时间或社会的限制。今天的风险会影响到所有的国家以及所有的社会阶级;它们的后果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许多形式的人为风险,诸如那些与恐怖主义或污染有关的风险,是跨越国境的。关于这一点,1986年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的爆炸就是明证。生活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所有人,不论年龄、阶层、性别或地位,都暴露在危险的放射水平之中。同时,这次事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切尔诺贝利本身,在爆炸发生以后很久,在欧洲及以外的地区还能检测到高于正常水平的放射性污染。

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决定也变得充满风险。比如说,风险与性别关系实际上是紧密关联的。许多新的不确定性也融入到两性关系之中(我们在第七章中还将讨论这一话题)。以爱情和婚姻领域为例。一代人以前,在发达社会里,婚姻是一个相当直接的生活变迁过程,即一个人从未婚变为已婚,并且这被假定为一个相当持久的状态。今天,许多人不结婚而同居,而且离婚率也很高。任何人打算同另一个人建立亲近关系都必须考虑这些事实,此人也就因此卷入风险计算之中。在这种不确定的背景下,

个体必须判断自己获得幸福和安全的可能性。

恐怖主义的威胁是风险影响我们的社会的另一例证。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袭击,改变了人们认为自己社区有可能蒙受恐怖分子袭击的风险的程度。对于恐怖主义的忧惧给全世界带来了经济上的停顿,尤其是在“9·11”之后的那几个月,因为工商企业在进行大规模投资之前变得犹豫不决。恐怖主义袭击还改变了国家在其公民的自由与安全之间平衡取舍时做出的评估。

贝克提出,民族国家不再有能力应对一个全球风险的世界。相反,在国与国之间必须建立跨国合作。当民族国家处理全球变暖之类的新型风险时,它们的狭隘眼光就成为一种障碍。贝克认为,等到要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战,我们就必须搞清楚,我们在和什么样的对象作战。他的理想是以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和接受为基础,确立一种普世主义的体制。普世主义国家不仅与恐怖主义作战,而且要对抗全世界的恐怖主义事业。在贝克看来,这类普世主义国家为应对全球问题提供了最为积极的途



乌尔里希·贝克

径,这些问题在个别国家的层面上似乎是不可解决的,但通过合作却是可以管控的。

贝克同意哈贝马斯的观点,近几十年来我们社会中的变迁并没有宣告社会与政治改革方面的努力徒劳无益。恰恰相反,出现了新形式的行动主义。我们看到出现了被贝克称为“亚政治”(sub-politics)的一个新领域。这是指在民主政治的正式机制之外进行的群体或机构的活动,诸如生态组织、消费者组织或人权组织。风险管控的责任不能都留给政治家或科学家。其他公民群体也需要介入。无论如何,在亚政治舞台上发展的群体和运动会对正统的政治机制产生很大影响。例如,对于环境的责任以前是生态积极分子的领域,现在已经被认为属于常规政治框架。

4.4.3 曼纽埃尔·卡斯特:网络经济

曼纽埃尔·卡斯特开始其学术生涯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位都市问题专家,他力图把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到城市研究之中。

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看到卡斯特的更多观点。

然而近些年来,卡斯特已经脱离马克思主义。他像布希亚一样,开始关注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影响。卡斯特认为,信息社会是以网络和网络经济的兴起为标志的。这种以全球传播所促成的联系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当然是资本主义式的。然而,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已经远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的扩张不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主要以工人阶级或物质商品加工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电子通信与计算机成为生产的基础。

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还将充分地讨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观念。

卡斯特并没有过多展示这些变迁是如何影响性别关系的。然而,他确实谈了很多它们对于个人认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在网络社会里,个人认同变成一件相当公开的事情。我们不再从过去获取自己的认同:我们不得不在同他人的互动中积极主动地制造它们。这直接影响到家庭的领域,也更广泛地影响到男性认同与女性认同的结构化过程。男性与女性不再是从传统的角色中获得自己的认同。因此,女性的“位置”曾经是待在家中,而男性的位置是“外出工作”,这种划分现在已经被打破了。

卡斯特把新型全球经济称为“自动机制”(automaton)。像哈贝马斯一样,他也认为我们不再能够完全控制我们所创造的世界。卡斯特的表述在此回应了韦伯在一个世纪前所做的解读。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发展会将我们全部囚禁在一个“铁笼”之中。而根据卡斯特的说法,“眼看着我们的机器控制着我们这个世界,这种人类的噩梦似乎正在变成现实。这并



曼纽埃尔·卡斯特

非是指以机器人的形式来取消人力工作,或政府计算机监管着我们的生活,而是指一种电子化的金融交易系统。”(Castells 2000:56)

然而,卡斯特并没有完全忘记他的马克思主义根基。他认为,也许可能重新实现对于全球市场的更有效的控制。这不会通过任何形式的革命,而是通过在调控国际资本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的那些国际组织与国家的集体努力。卡斯特总结说,信息技术常常能够作为地方增权(local empowerment)以及社区振兴的一条途径。他引用芬兰的个案为例。芬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信息社会。该国的所有学校都有互联网接入端口,并且绝大多数人口都会使用计算机。同时,芬兰还有一个完备且高效的福利政府,已经为满足新型经济的需求做出了调整。

4.4.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反思性

我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就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变迁提出了一种理论视角。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我所称的“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中,这是一个以贝克所诊断的那种新型风险与不确定性为标志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把信任概念同风险概念放在一起考虑。信任是指我们对个体或制度的信赖。

在一个快速转型的世界中,传统的信任形式趋于瓦解。在过去,对于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地方共同体的基础上。然而,生活在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素未谋面的人们的影响,他们可能生活在远离我们的世界的另一端。信任意味着对“抽象系统”的信赖,例如,我们不得不信赖负责食品管理、水质净化的机构,不得不信赖银行系统的有效性。信任和风险紧密维系。如果我们要直面周遭的风险,并以有效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就需要信赖诸如此类的权威。

在我看来,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就意味着社会反思性的强化。社会反思性是指我们事实上一直在思考或反思我们的生活环境。社会



安东尼·吉登斯

越是固守习俗和传统,人们就越会以非常缺乏反思性的方式,追随业已确立的行事方式。对我们来说,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在前几代人的生活中只能是想当然地接受,而现在则需要经过开放的决策。例如,千百年来,人们没有限制自己家庭规模的有效方式。随着现代避孕形式以及生殖中其他形式的技术介入,父母不仅能选择要多少孩子,甚至能决定生男还是生女。当然,这些新的可能性也会带来新的伦理困境。

我们并没有不可避免地失去对于自己未来的控制能力。在一个全球时代,国家当然失去了它们曾经拥有的某些权力。例如,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然而,政府还是保留了大量的权力。如果联合行动的话,各国还是能够一起来重新确立它们对于失控的世界的影响的。贝克所指出的群体,即在正式的政治框架之外运作的机构和运动,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不会替代传统的民主政治。民主仍然很关键,因为“亚政治”领域的群体的诉求和利益各不相同。例如,这样的群体既可以包括那些积极运动以赞同允许堕胎的人,也包括那些完全持对立立场的人。民主政府必须对这些各见其异的要求和关注

予以评估并做出反应。

民主不能局限于哈贝马斯所界定的那种公共领域。日常生活中正在兴起一种颇具潜力的“情感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情感的民主指的是男性与女性以平等方式参与家庭生活的形式。几乎所有传统形式的家庭都是以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为基础的,这种支配通常还有法律的保障。两性之间的愈益平等不能局限在投票权上,它也必须包括个人和私密的领域。个人生活将不断地趋于民主化,使得相互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沟通和宽容的基础上。

本章要点

- 1 在社会学中(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理论思路。个中原因并不特别费解:即使在自然科学中,理论争议也是难以解决的。而在社会学中,我们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因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也成为了研究的对象。
- 2 社会学中观点的碰撞使我们注意到几个基本的理论困境。一个重要困境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把人类行动与社会结构相联系。我们是社会的创造者还是由它所创造?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并不像它乍看起来那样刻板。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社会生活的这两方面联系起来。
- 3 第二个困境是应该把社会描述成和谐有序的,还是应当把持续的冲突视为其标志?这两种观点同样不是完全对立的。我们需要揭示共识与冲突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 4 第三个基本困境关注的是性别,尤其是我们是否应当把性别作为一个普遍范畴融入我

小结

今天我们或许正处在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经典思想家的观点都形成于社会与经济经历重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变迁的时期,而这也许与早先的变迁一样深远,但更广泛地被全世界所感受到。我们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来理解今天正在转变我们的社会的这些新发展。这里所分析的理论正是这种努力中最重要的一些贡献。

们的社会学思维。女性主义理论家不仅已经改变了社会学家所思考的内容,也已经改变了社会学家思考的方式。

- 5 社会学中第四个持续争论的焦点是有关现代社会发展的分析。现代世界中的变迁过程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塑造的,还是由其他因素包括非经济因素所塑造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受到不同社会学家所持有的政治信仰和态度的影响。
- 6 在处理社会发展问题时,晚近的理论家努力超越马克思和韦伯。后现代思想家否认我们能够发展出关于历史或社会的任何普遍理论。
- 7 其他理论家则对后现代主义持批评态度,认为我们仍然能够发展出关于社会世界的全面理论,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干预这个世界并将其塑造得更好。他们包括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概念,贝克及其“风险社会”概念,卡斯特及其“网络社会”概念,以及吉登斯所提出的社会反思性概念。

思考建议

1. 为什么理论思维在社会学中如此重要?
2. 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是一个单一理论还是一系列中层理论?
3. 语言的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哪些关于社会研究的问题?
4. 性别问题真能与现有的理论视角结合在一起吗?
5. 社会学理论中的各种“困境”真的像它们所呈现的那样难以解决吗?
6. 社会学理论中晚近的发展有多少是归功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洞见的?

阅读指南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Malden, MA: Polity, 1999). 《世界风险社会》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9).
《性别困扰:女性主义与认同颠覆》

Judith Butler, *Undoing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破解社会性别》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1989). 《以马克思主义驳后现代主义》

Manuel Castells, *End of Millenniu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千年终结》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n (Oxford: Blackwell, 2000). 《网络社会的兴起》(第二版)

Peter Dews (ed.), *Habermas: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9). 《哈贝马斯评论集》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rev.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修订版)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89). 《后现代性的状况》

网络导航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http://foucault.info/>

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http://www.theory.org.uk/ctr-butl.htm>

尤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http://www.habermasonline.org/>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sociology/whoswho/beck.htm>

曼纽埃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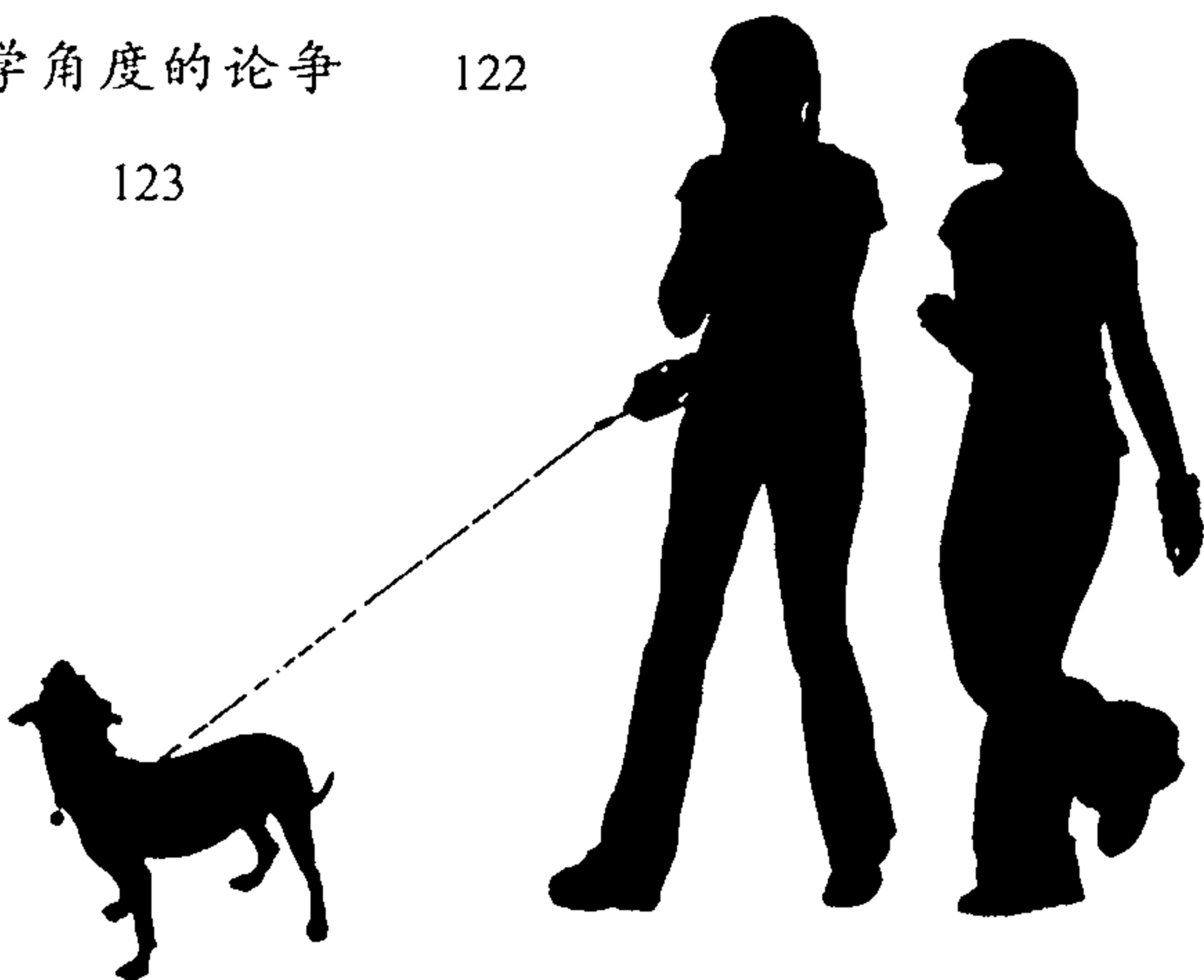
<http://sociology.berkeley.edu/faculty/castells/>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http://old.lse.ac.uk/collections/meetthedirec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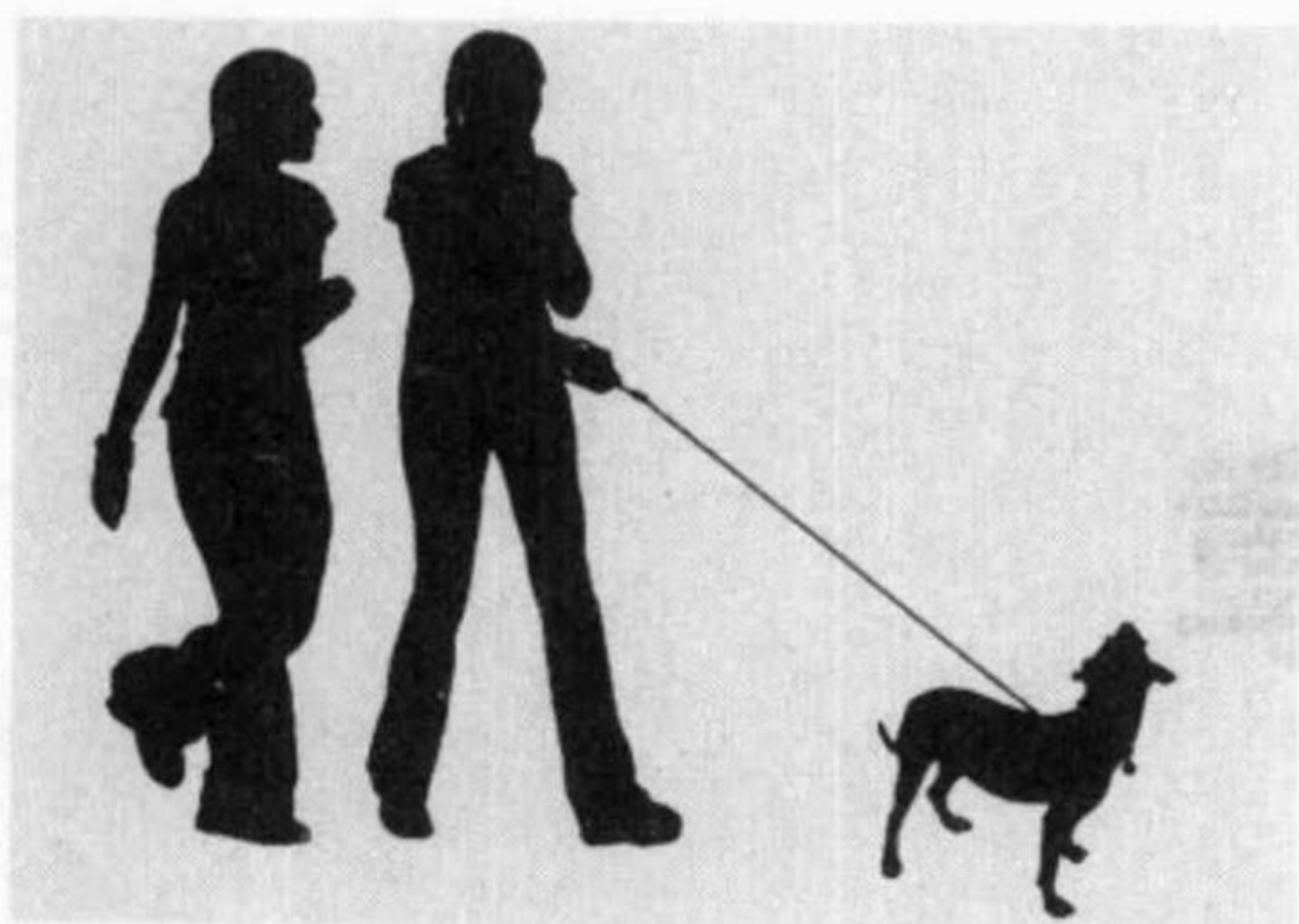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研究	103
第二节 非言语沟通	104
5.2.1 “脸面”、姿势与情感	105
5.2.2 非言语沟通与性别	106
第三节 互动的社会规则	107
5.3.1 共享理解	108
5.3.2 加芬克尔的实验	108
5.3.3 “蓄意破坏互动”	109
5.3.4 反应性惊呼	111
第四节 互动中的脸面、身体与言说	111
5.4.1 接触	113
5.4.2 印象管理	114
5.4.3 个人空间	116
第五节 时空中的互动	118
5.5.1 钟表时间	119
5.5.2 社会生活与时空秩序安排	119
5.5.3 文化和历史视角下的日常生活	119
5.5.4 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学角度的论争	122
5.5.5 网络空间上的社会互动	123
小结:接近的冲动?	127
本章要点	127
思考建议	128
阅读指南	128
网络导航	128



第五章

社会互动与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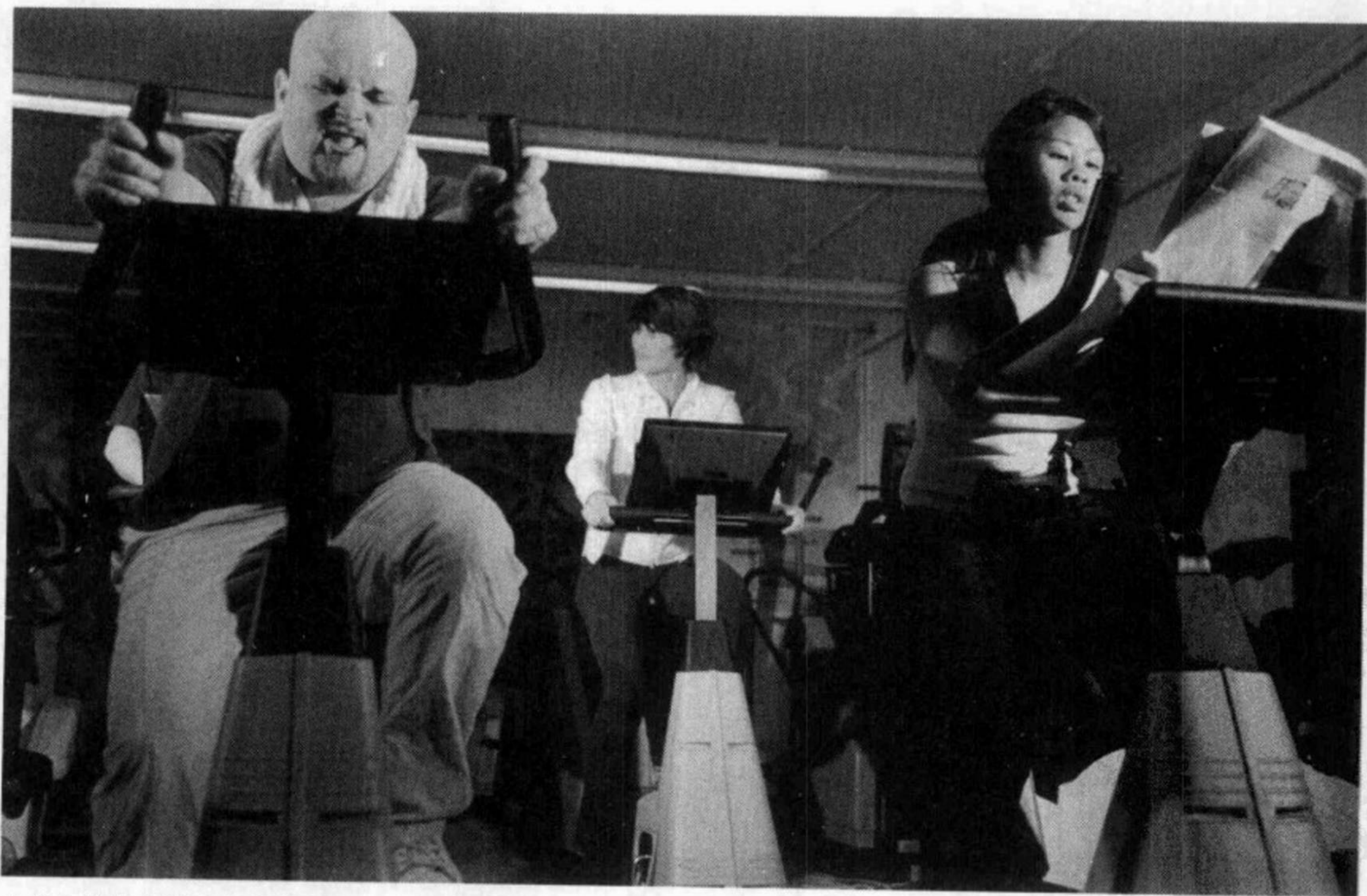
埃里克在一家城市高级健身俱乐部里担任健康指导，他在那儿已经工作多年。长久以来，他结识了成千上百位在健身房锻炼的人。有些人初次来馆，他就和他们一起锻炼，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器械。他还担任“旋转”课程（自行车锻炼小组环节）的指导，认识了其他好多人。还有些人他是偶然结识的，因为有许多人每周固定时间来锻炼。

健身房里的个人空间是很有限的，因为锻

炼器械摆放得很近。比如说，在力量训练区，一个区域里设置了彼此紧挨着的好多器械。俱乐部成员得和来锻炼的其他人挨得很近，换器械的时候还老是穿过别人的路。

埃里克在这个物理空间里无论走到哪儿，都几乎不可能不和自己至少碰过面的什么人交流眼神。如果是这一天头一次看见这些顾客，他会对其许多人打招呼。但再往后，他们会各忙各的，不像开始那样相互示意，这通常是可以理解的。

当两个路人迅速相互瞥视一下，然后把眼光转开，这就是在示范欧文·戈夫曼（Goffman 1967; 1971）所称的许多情境下我们彼此都需要的有礼貌的不关注。有礼貌的不关注与干脆漠视别人并不是一回事。每一个人都会表明认识到别人的存在，但也都要避免出现任何可能被对方认为过于冒犯的姿势。有礼貌的不关注他人是我们多少有些无意识状态下所做的事



人们在健身房里的行为常常很好地体现了所谓有礼貌的不关注。



要坐我边上,就自己小心;我们搭公共汽车时,会竭力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

情,但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存在至关重要。社会生活必须有效率地推进,并且没有恐惧,即使有时是在完全的陌生人之间。当偶遇的陌生人之间发生有礼貌的不关注时,其中一个人就是在向另一个人发出暗示:她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意图,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有敌意,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要避开他。

要看出这一点的重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想,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另一个人,任由自己的脸上公开表现出某种特别的情绪,通常这会是针对恋人、家人或密友。至于陌生人或偶然结识的人,无论是在街上、工作场所还是在派对上接触,几乎都不会以这种方式凝视对方。如果真这样做,可能被当成表达敌意;比如说,种族主义者会对属于其他族群的路人抱以“厌憎的瞪视”。

即使是亲密交谈中的朋友,也需要留意他们该如何相互注视。每个人都要不时地看着对

方的眼睛,以表现出对于谈话的关注和投入,但不能凝视。看得太明显,有可能被当作表明对别人说的话有所怀疑,或者至少是不能理解。而如果交谈各方都根本不互相留意对方的眼神,那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有所躲避、难以捉摸或者颇为古怪。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研究

为什么我们应当关注社会行为中看似如此琐碎的方面?在街上与某人擦肩而过,或者和某个朋友聊上几句,这些活动看起来微不足道,也没什么意思,我们每天都要做上无数次,也不曾对它们有什么细究。但事实上,研究这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社会互动的形式在社会学中十分重要。它远非枯燥无味,而是社会学所有研究领域中最有吸引力的领域之一。之所以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们那些几乎是持续不变地与他人互动的日常例行活动,赋予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定的结构和形式。通过对其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对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我们自己,对于社会生活本身,有丰富的了解。把我们的生活组织起来的,就是这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而类似的行为模式的不断重复。比如,想想你昨天做了些什么,前天又做了些什么。如果这两天都不属于周末休息,那么很可能你每天在同一时间起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行活动)。如果你是个学生,一大早你可能就要赶去上课,可能要从家里到学校,你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走这段路。你可能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吃午饭,下午你又会返回教室或者自己的研究室。然后,你又原途返回家中,或许晚上与另外几个朋友一同出去。

当然,我们每天所遵循的例行活动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周末的活动模式常常迥异于工作日的活动模式。当我们在生活中做出重要改变,比如走出校门开始工作,我们日常例行活动中的某些改变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又会确立一套新的并且是相当有规律的习惯。

第二,研究日常生活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人类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行为来塑造现实的。虽然社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角色、规范和共同期待之类的力量引导的,但个体仍然能够依据他们的背景、兴趣和动机而对现实有不同的感知。因为个体有能力进行创造性的行动,所以他们通过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而不断地塑造着现实。换句话说,现实不是固定或静止的,而是通过人类的互动创造出来的。在第一章介绍的符号互动论视角那里,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观念处于核心地位。本章第五节第四小节还将进一步谈论这种观念。

第三,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有利于我们理解更大的社会系统和社会制度。事实

上,所有大规模的社会系统都依赖于我们每天所从事的社会互动模式。这一点是很容易证明的。再看看两个陌生人在街上擦肩而过的情形。这类事件似乎与更大规模、更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我们对诸多此类互动加以考虑的话,情况便不是这样了。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镇,并不断与那些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城市生活有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转瞬即逝的非个人接触,有礼貌的不关注同其他许多机制一起,赋予了城市生活现有的特征。

本章我们将讨论我们与别人互动时都会使用的非言语提示(包括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然后我们会分析日常言说,也就是我们怎样使用语言来与别人沟通,传递我们希望传递的意义。最后,我们将关注日常例行活动以怎样的方式构造着我们的生活,尤其关注我们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行动的。本章我们还将发现,从事社会互动研究的社会学家对于细微的日常实践的研究,与本书下面一些章节所考察的所有大范围的话题,比如性别或阶级,并不是相互脱离的。相反,我们发现它们是密切关联的。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两个图文框还将给出两个示例,描绘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之间的关联。

在第四章第四节第四小节,我们从一种理论的立场考察了日常社会互动与更大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第二节 非言语沟通

社会互动需要有多种形式的非言语沟通,即借助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行为举止等来进行的信息和意义的交换。非言语沟通有时被称为“身体语言”,但这是一个误导,因为我们使用这些非言语提示,主要是为了消解或者扩展

用言语所表达的内容。

5.2.1 “脸面”、姿势与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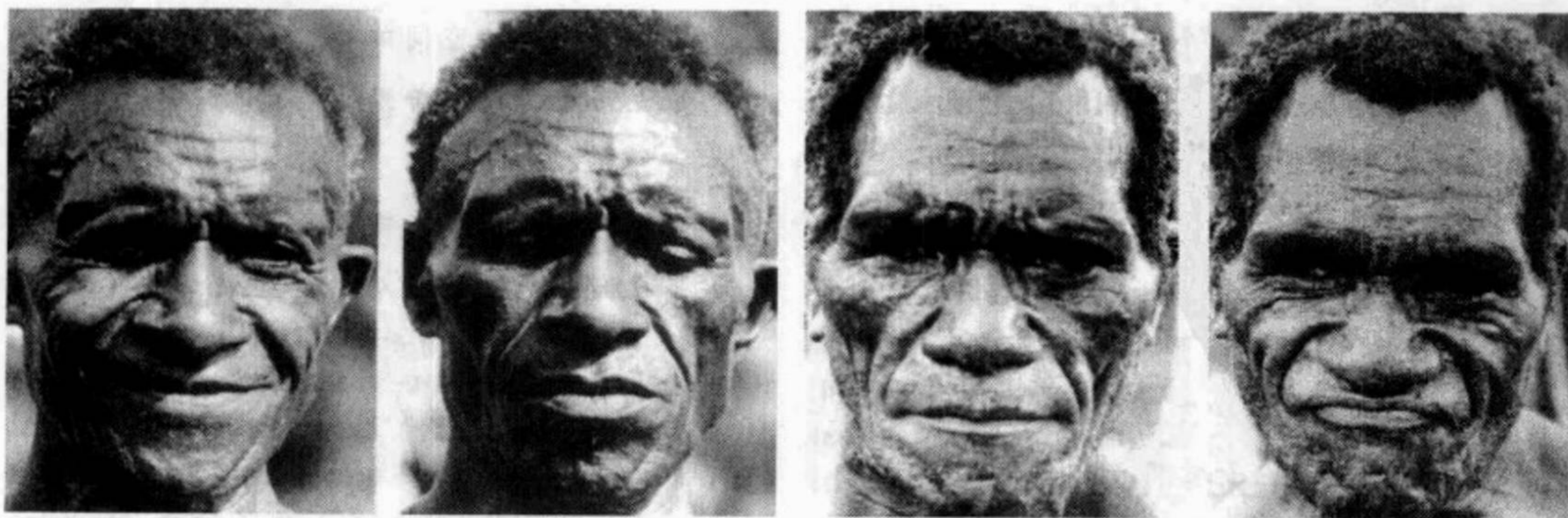
非言语沟通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表现情感的面部表情。保罗·艾克曼及其同事们已经总结出了一种他们所谓的面部活动编码系统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FACS), 用来描述产生特定表情的面部肌肉运动 (Ekman and Friesen 1978)。这个领域以其充满互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释而著称, 因为对于情感是怎样被分辨和分类的, 基本没有什么共识。而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其更精确一些。进化论的创始者查尔斯·达尔文宣称, 人类情感表达的基本类型都是一样的。尽管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但是艾克曼对来自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研究却似乎证实了这一点。艾克曼和弗里森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偏远社区进行了一项研究。这个社区的居民以前极少跟外人接触。当把表达 6 种情感的面部表情 (高兴、悲伤、愤怒、厌恶、恐惧、惊奇) 的照片给他们看时, 这些新几内亚人都能分辨出来。

按照艾克曼的说法, 他自己的研究以及对不同人群所做的类似研究都支持认为, 人类情感的面部表情以及对于这些表情的解释都是与生俱来的。他固然承认, 自己的证据并不能

确凿地证明这一点, 其中可能还包括许多人们共有的文化习得经验, 但不管怎么说, 他的结论也为其他许多类型的研究所证明。I·艾布尔——埃贝斯费尔特 (Eibl-Eibesfeldt 1973) 研究了 6 位先天性失聪兼失明的儿童, 目的是要看一看在特定的情感状况下, 他们的面部表情与那些视觉和听觉都正常的人相比到底相差多远。他发现, 他们参与那些明显让人开心的活动时就会微笑; 闻到一种并不习惯的物体的气味时就会惊讶地扬起眉头; 而当把一种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不断地拿给他们时, 他们就会皱眉头。由于他们从来就不可能看见别人的此类举止, 因此看来这种反应想必是由先天决定的了。艾克曼和弗里森使用面部活动编码系统, 确定了一些独立的面部肌肉活动, 在新生儿和成年人的情感表达中同时有所发现。例如, 婴孩对酸涩的味道似乎会表现出一种类似于成年人的厌恶表情 (撇嘴和皱眉)。

不过, 尽管情感的面部表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个体与文化因素却也影响着面部活动的具体形式以及被认为得体的发生语境。例如, 人们怎样微笑, 嘴唇和其他面部肌肉的细微运动, 以及微笑的持续长短等等, 各种文化之间都存有差异。

没有一种姿势或体态能够被证明代表所有文化或者只是大多数文化的特征。例如, 在



保罗·艾克曼拍的这些面部表情照片, 来自新几内亚一个几乎不与外人接触的社区的一位部落男子, 有助于证明, 情感表达的基本类型在各民族当中是一致的。此例中, 告诉对象, 如果你是以下场合中的人, 脸上会有什么表情: (最左) 朋友来了, 很高兴; (中左) 孩子死了; (中右) 非常生气, 准备战斗; (最右) 瞧见在那儿躺了好些日子的一头死猪。

某些社会中,当人们表示不同意时,他们就点头,这与英美人的做法完全相反。欧美人往往大量采用的某些姿势,如指指点点,在某些人群中似乎并不存在(Bull 1983)。与此类似,食指伸直放在脸颊中央并转动,在意大利的一些地区是一种表示赞许的姿势,在别的地方却不曾听闻。与面部表情一样,姿势和体态也往往被人们用来补充某些言辞,同时在我们实际并没有说什么的时候传情达意。上面这三种方式都可以用来开玩笑、讽刺或者表示怀疑。

我们常常是无意中传递的非言语印象,显示出我们所说的并不完全与我们真实的含义相一致。羞愧脸红也许最明显地证明,生理反应与我们明说的意思可以是多么的不同。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更细微的迹象可以被其他人察觉出来。例如,受过训练的人能够通过观

察非言语提示察觉出是否在欺骗。脸上冒汗、局促不安、眼神发直或游移不定,以及面部表情僵硬(真实的面部表情往往只能持续四五秒钟),都可以反映出某人在欺骗。因而,在言语沟通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别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进一步验证他们所说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我们是否应当信任他们。

5.2.2 非言语沟通与性别

日常社会互动是否存在一个性别维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存在。既然互动受到较大的社会背景形塑,我们就不必惊讶男性和女性对言语和非言语沟通有不同的感知和表达。对性别和性别角色的理解受到社会因素的极大影响,并且与社会中的权力和地位问题具有广泛的

公共场合中的女人和男人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看到,微观社会学,即对于面对面互动情境下的日常行为研究,与宏观社会学,即对于阶级或性别不平等之类广泛的社会特性的研究,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Knorr-Cetina and Cicourel 1981; Giddens 1984)。在本图文框中,我们来看看一个实例,一名在街上行走的妇女受到一伙男人的言语骚扰,这个事件似乎是微观社会学的典型案例,但却关系到构成宏观社会学的更大的一些话题。

卡罗尔·布鲁克斯·加德纳在题为《路过:性别和当众骚扰》的研究(Gardner 1995)中发现,在许多种场景中,特别有名的是在建筑工地旁边,都会发生这些令人讨厌的互动类型,经常令妇女觉得受到某种羞辱。

对个别妇女的受骚扰,虽然也可以通过观察个别的互动,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但这种简单化的观察方法并不会有大

大成效。这类骚扰一般都发生在彼此都是陌生人的男女之间的街头谈话(Gardner 1995)。如果不同时探讨社会中性别不平等这种更大的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互动。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加德纳把女性受男性的骚扰与更大的性别不平等体制相联系,其标志就是男性在公共空间的特权,女性在身体上更易受伤害,以及普遍存在的受到强奸的威胁。

如果不这样联系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我们就只能获得对于这些互动的狭隘的理解。尽管这些互动类型似乎是孤立的事例,或者似乎通过教育人们举止文雅就可以避免。但是,理解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使我们看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就需要着力消除产生这类互动的性别不平等形式。

联系。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规范的互动中,这些动态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以眼神接触这种最常见的非言语表达为例。个体的眼神接触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常常是为了引起某人的注意,或开始一次社会互动。许多社会中,男性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整体上都比女性更占优势,男性在与陌生人发生眼神接触时,就会比女性感到更加自然。

凝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眼神接触,体现出同样一种非言语沟通形式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一个男人凝视一个女人被视为“自然的”或“清白的”行为;如果这个女人感到不自在,她可以移开目光回避这种注视,或者选择中断互动。反之,如果一个女人凝视一个男人,则常常被认为是有意挑逗的意味。单个来看,这类情况或许无关紧要,但总的看来,它们却有助于强化性别不平等的模式(Burgoon et al. 1996)。

在非言语沟通中还有其他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男性的坐姿往往比女性更放松。男性往往往后倾靠,双腿张开;而女性的身体往往比较前倾,腰板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两腿交叉。与人交谈时,女性与谈话者之间往往靠得比男性更近。男性在与女性交谈时,会对其使用非常频繁的身体接触(而女性也一般被期待视此为正常)。研究还表明,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明显地(通过面部表达)表现其情感,更经常地主动寻求和中断眼神接触。社会学家指出,这些微观层次上的互动看似细小,但是巩固了我们社会中更广泛的宏观层次上的不平等。在站立或坐着的时候,男性比女性控制了更大的空间,因为他们往往与谈话对象保持更大的距离,坐着的时候也往往四肢舒展,并且通过更频繁的身体接触来展示控制。而女性据说是通过眼神接触和面部表达来寻求赞同。当男性进行眼神接触时,女性比另一个男性更有可能移开目光。因此可以说,对于非言语沟通形式的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细微的线索,以揭示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的权力

(Young 1990)。

第三节 互动的社会规则

尽管在我们自己的行为中以及理解别人的行为时,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使用各种非言语提示,但是我们的互动大部分还是通过与他人非正式的对话中使用的交谈,即随意的言语交流。社会学家始终都认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最近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特别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普通情境中是怎样使用语言的。

所谓常人方法学,就是研究“常人方法”,即俗民的或非专业性的方法。人们用此方法来领会(make sense of)他人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领会他们所说的话。这个术语是哈罗德·加芬克尔创造的,下文我们会讨论他的著述。我们都在使用这些方法,但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对它们有自觉的意识。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有了解了言辞本身并没有表现出来的社会背景,才能领会谈话的内容。请看下面的对话(Heritage 1985):

甲:我有个14岁大的儿子。

乙:噢,没问题。

甲:我还有一只狗。

乙:啊,那就抱歉了。

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对话双方是什么关系?如果告诉你,这是一位想要租房的人和房东之间的谈话呢?这样对话就可以理解了。一些房东能够接受房客带着孩子,但是不允许他们养宠物。而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社会背景,就会觉得乙的反应好像跟甲所说的话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意思的一部分在于言辞本身,另一部分在于意义如何从社会背景中凸现。

5.3.1 共享理解

即使是最琐屑的日常谈话形式,也是以言说者起用的复杂的共享知识为前提的。实际上,我们的闲聊也是极为复杂的。所以迄今已经证明,即使是用最发达的计算机设计程序,也不可能同人进行可信的交谈。日常谈话中所使用的词语并不总是具有明确的意义,而且我们通过不曾明言的背景假设来“确定”我们想说的话。假如玛利亚问汤姆,“你昨天干什么了?”问题中的言辞本身并没有指点明确的答案。一天的时间可就长了,汤姆要这样回答也是符合逻辑的:“哦,我7点16分醒来;7点18分起床,再去卫生间,刷牙。7点19分我开始冲澡……”只要了解玛利亚,了解什么样的活动是她和汤姆认为重要的,了解汤姆在一周的某一天一般干些什么,等等,我们就能理解问题所期望的回答类型。

5.3.2 加芬克尔的实验

加芬克尔用学生志愿者所做的一些实验(Garfinkel 1963),凸显了我们用来组织日常交谈的“背景期待”(background expectancies)。加芬克尔要求这些学生找一位朋友或亲戚交谈,并坚持对一些随意的议论或者一般性的评论作积极的追问,以使其要表达的意义更加明确。假如有人说:“祝你今天过得好!”学生就要回答:“究竟怎么才算好?”,“你指的是今天什么时候?”,如此等等。其中有一段对话是这样展开的(S是朋友,E是学生志愿者):

S:你好!

E:我的哪一方面好?我的健康,我的经

济,我的学业,我的心境,我的……?

S:(涨红了脸然后突然不能自制)嘿!

我不过是客气罢了。说实话,我才不在乎你是好是坏呢!

为什么当表面上微不足道的谈话惯例没有被遵守时,人们会变得如此不安?答案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和富有意义,依赖于我们对说什么和为什么说共享有不曾明言的文化预设。如果我们不能认为这些预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有意义的沟通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对于一场对话中的任何问题或评论,都加上加芬克尔的实验对象被告知采取的那种不厌其烦的“追问步骤”,那这种互动马上就会破裂。所以,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谈话惯例,已经证明对于社会生活的构造本身至关重要,因此打破这种惯例才会变得如此严重。

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会假装对未曾明言的信息一无所知。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拒绝他人,和他们开玩笑,使他们尴尬窘迫,或者着重强调所说的东西语带双关。下面我们来看看家长与十几岁的孩子之间这种典型的对话:

家长:你去哪儿?

孩子:出去。

家长:干什么去?

孩子:不干什么。

这个孩子的反应与加芬克尔实验中的志愿者的应答恰好相反。孩子不是在一般情况下不问的时候不停地追问,而是根本就拒绝给出适当的回答。他其实就是在说:“你别管我!”第一个问题在另一种情境下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不同的反应:

甲：你去哪儿？^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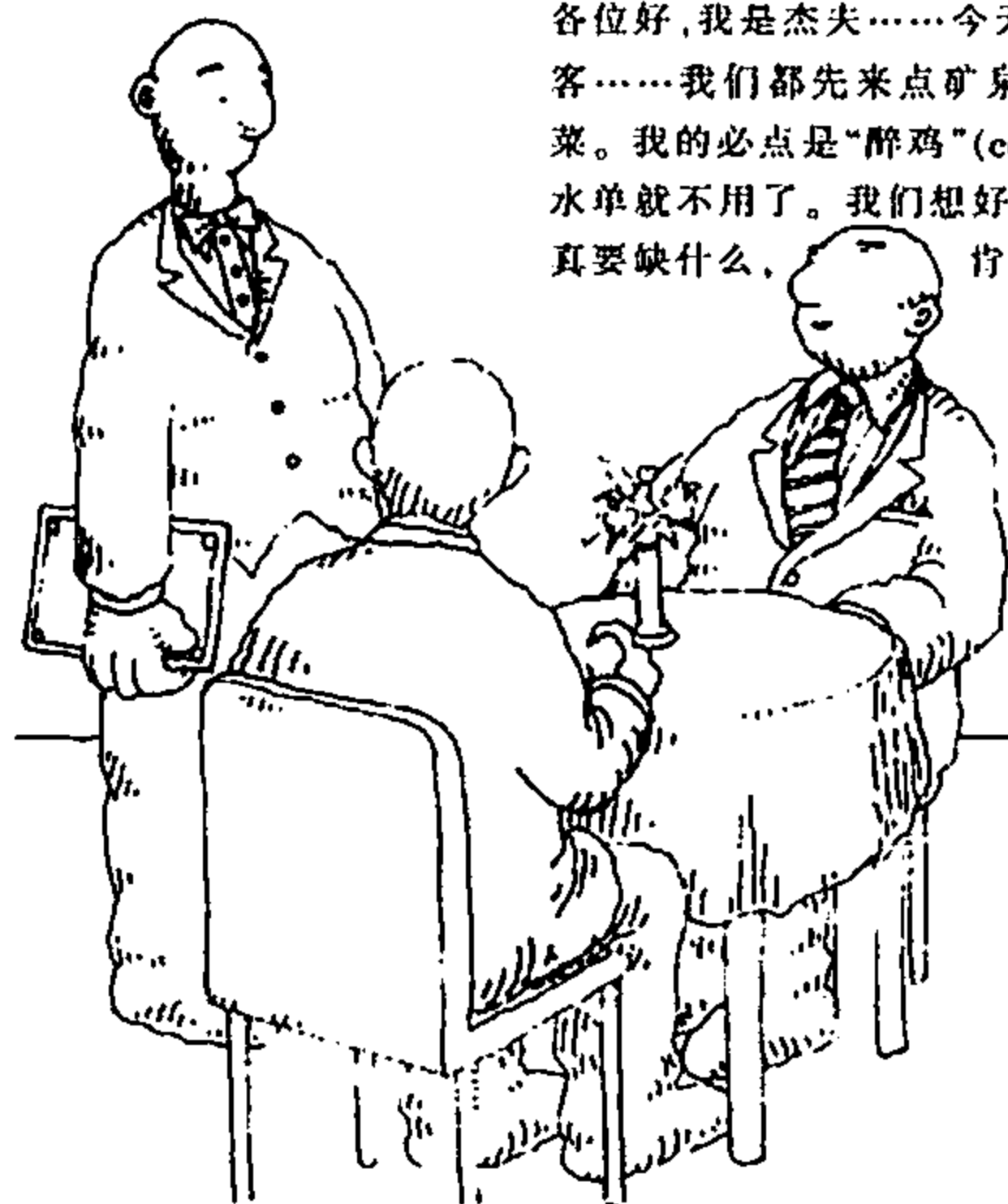
乙：我闲得发疯。

乙故意要误读甲的问题，目的是要讽刺性地表达忧虑烦躁或灰心丧气。喜剧和笑话就是充分利用了对谈话中不曾明言的预设的这种故意误解。只要当事人明白这只不过是博一笑，也就没有什么威胁性了。

5.3.3 “蓄意破坏互动”

我们已经看到，谈话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得以保持稳定连贯的主要方式之一。当闲聊的默认的惯例得到遵守时，我们感觉非常自在；而当它们被打破时，我们则会感受到威胁、困惑和不安。在大多数日常交谈中，谈话者仔细留意别人给出的提示，诸如语调的变化、微小的停顿或姿态等，以使谈话能够顺畅地进行下去。由于彼此都明白，交谈者能够“协力合作”，开始互动，结束互动，轮流讲话。但如果其中一方讲话时“不合作”，互动就会产生紧张。

加芬克尔社会学实验的一部分，就是学生通过故意破坏谈话规则，制造出紧张的情境。但是在真实世界里，人们通过对话实践“找麻烦”的情境又是怎样的呢？美国的一项研究考察了纽约市的行人与街头游民之间的言语交流，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这样的互动经常会被过路人认为是有问题的。研究者采用了一种被称为谈话分析的技术，来比较一组从日常交谈样本中抽取出来的街头交流。谈话分析这种方法试图通过考察谈话的所有方面以获取意义，从最琐屑的填充词（像“嗯”和“啊”），到谈话交替的确切时间安排（包括



各位好，我是杰夫……今天我是你的顾客……我们都先来点矿泉水，一边点菜。我的必点是“醉鸡”(coq au vin)，酒水单就不用了。我们想好好享用一番，真要缺什么，肯定会叫你的。

日常谈话中的许多所谓“规则”，只有当有人破坏它们时才显现出来。

暂停、打断和交叠)。

这项研究考察了黑人男性和路过他们的白人女性之间的互动。在这些黑人男性当中，有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酗酒的或吸毒的。这些男人经常通过喊叫、奉承和提问来与路过的女性搭讪。但这些谈话中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因为这些妇女很少像在正常互动中那样做出回应。即使男人的话在语调上很少有敌意，这些妇女也会加快脚步、直视前方。下面是一个叫马德瑞克的将近60岁的黑人男性吸引女性交谈的尝试(Duneier and Molotch 1999)：

[马德瑞克]当一个看上去25岁左右的白人妇女稳步走来时开始了这场互动：

1. 马德瑞克：我爱你宝贝儿。

她双臂抱在胸前，加快脚步，不搭他的茬儿。

^① 另一意思是“你会搞到什么程度？”、“你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2. 马德瑞克:嫁给我吧。

接下来是另两个也有二十五六岁的白人妇女。

3. 马德瑞克:嗨,姑娘们!你们今天看起来都很漂亮。带钱了吗?买些书吧。她们不理他。

下面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

4. 马德瑞克:嗨,心肝儿。嗨,心肝儿。她不搭理他,继续走路。

5. 马德瑞克:别生气!别生气!我知道你听见了。

然后他开始对一个30多岁的白人妇女讲话。

6. 马德瑞克:我正看着你呢。你很漂亮,知道吗?

她对他视而不见。

谋求对话善“始”善“终”是都市礼仪的基本要求。但对话中这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上面的男女之间都很成问题。女人拒绝男人发起谈话的努力,而男人则无视女人的拒绝,一再坚持。与此类似,如果男人成功地开始了谈话,他们常常会拒绝回应谈话过程中女人发出的结束谈话的暗示:

1. 马德瑞克:嗨,心肝儿。
2. 妇女:嗨,你好。
3. 马德瑞克:你好吗?
4. 马德瑞克:你看上去很漂亮。我喜欢你簪头发的模样。
5. 马德瑞克:你结婚了吗?
6. 妇女:嗯。
7. 马德瑞克:嗯?
8. 妇女:嗯。
9. 马德瑞克:你的戒指呢?
10. 妇女:放家里了。
11. 马德瑞克:放家里了?
12. 妇女:嗯。
13. 马德瑞克: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14. 马德瑞克:我叫马德瑞克,你呢?

她没答话,走开了。

(Duneier and Molotch 1999)

在这个例子里,互动中的14句话里有9句是马德瑞克说的,用来发起对话,并引发那位妇女进一步的反应。单从文字记录来看,很明显这位妇女对交谈不感兴趣;如果对录音带进行对话分析,她的不情愿甚至更为明显。她即便做出回答也都是迟缓再三的,而马德瑞克却总是回应很快,有时甚至等不及她说完就接话了。谈话中的时间安排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指标;在大多数日常互动中,哪怕晚回答几分之一秒,也足以让人觉得你希望改变谈话的进程。马德瑞克通过违背这些默认的社交规则,在以一种“技术性无礼”(technically rude)的方式展开谈话,而那位妇女也采用“技术性无礼”,装作不明白马德瑞克反复努力把她引入谈话。正是由于这些街头交流的“技术性无礼”的性质,使它们被过路的人当成有问题来对待。一旦开始和结束谈话的标准暗示未被遵守,个人就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深的不安全感。

蓄意破坏互动这个术语就是用来描述这些情形,其中居于臣属地位的人打破了被更具权势的人所珍视的日常互动的默认规则。街头男人彼此之间交谈,或是与当地店员、警察、亲戚、熟人交往时,一般还是遵守日常的言谈形式。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推翻日常交谈的默认惯例,让路人不知如何是好。蓄意破坏互动甚至比身体攻击或粗话辱骂更使受害人有口难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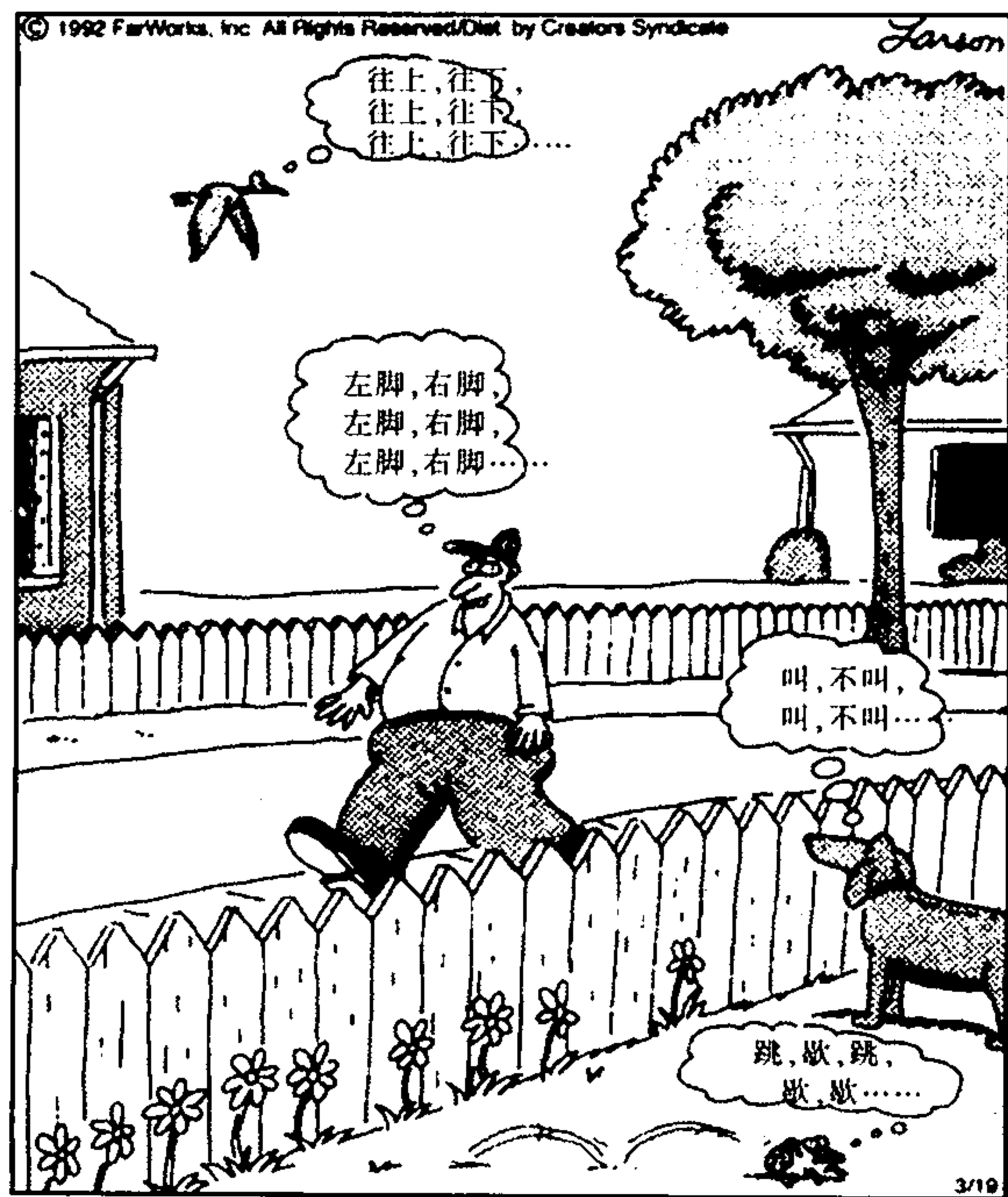
关于蓄意破坏互动的这项研究,为微观层次的互动和在宏观层次上起作用的力量之间的双向联系提供了另一例证。对街头男人而言,那些无视他们发起谈话的种种努力的白人妇女难以亲近、冷漠麻木、缺乏同情心,她们是这类互动的合法“目标”。与此同时,妇女们则经常认为这些男人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是

危险人物,最好回避。蓄意破坏互动是与君临一切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结构紧密相连的。在此类日常互动中产生的畏惧和焦虑有助于建构外部的地位和力量,而这些地位和力量反过来又对互动本身产生影响。蓄意破坏互动因此参与构成了相互猜疑、相互无理的自我强化体系。

5.3.4 反应性惊呼

某些发音不是交谈,而是由含糊不清的惊呼组成的,即戈夫曼所说的反应性惊呼(Goffman 1981)。比如露茜弄洒了一杯水,发出“哎哟!”的惊呼。“哎哟!”这一惊呼似乎仅仅是一种对于意外的不假思索的反射性反应,很像是当一个人猛然把手伸向你的脸部时你眨眼睛的反应。然而,这却不是一种反射性反应,因为事实上,人们独处时并不经常发出这种惊呼。“哎哟!”通常是喊给在场的别人听的。惊

在远方



基本生活:如果我们不得不对日常管理的一点一滴都作特意思考,那日常生活就不可能进行下去了。

呼是向在场的人证实,这只是一个微小的过失,并且很快就会过去,而无须怀疑露茜是否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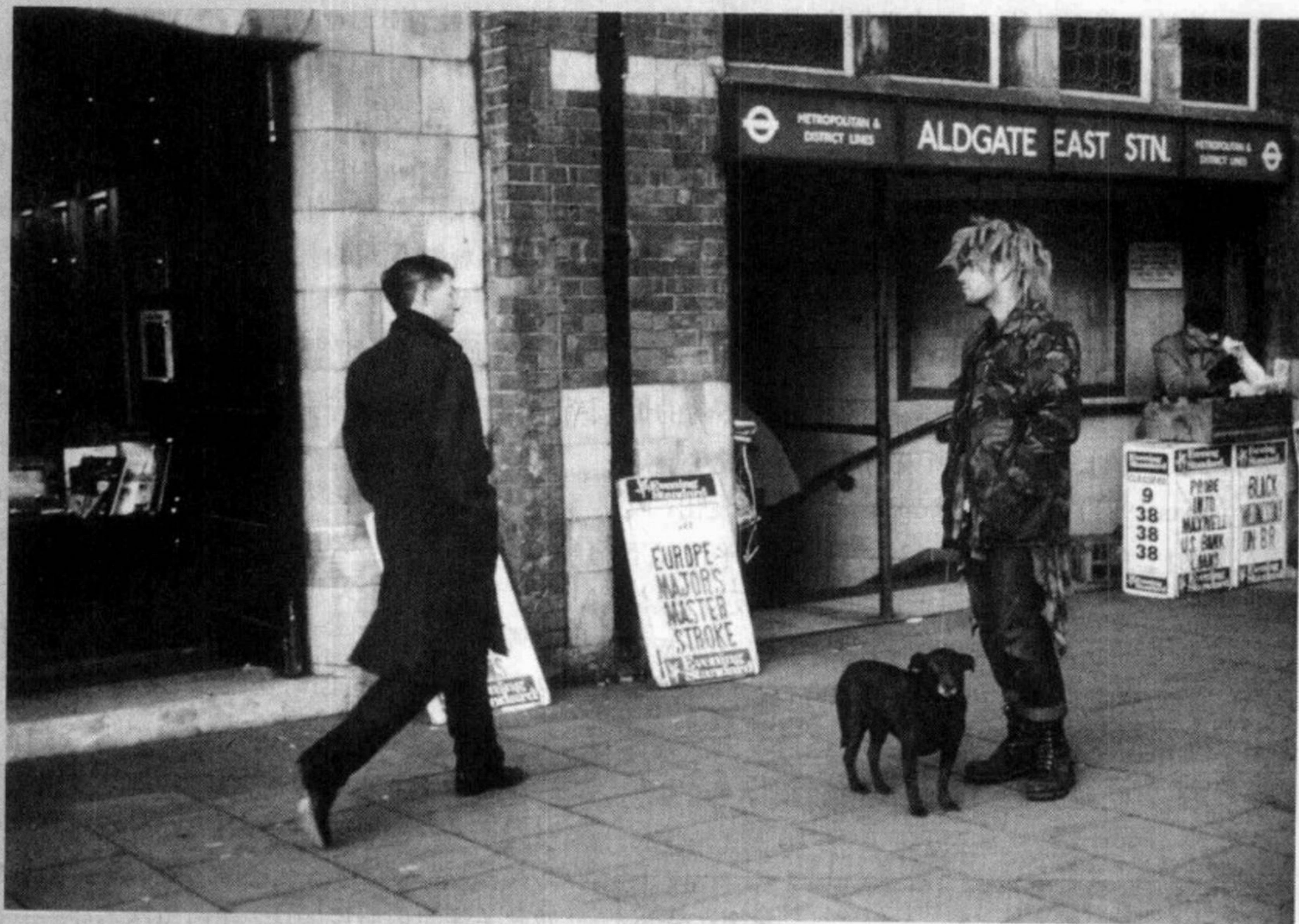
“哎哟!”惊呼只能用在微小失误的情境中,而在重大事件和灾难的情境中很少运用。这一点也能证实,惊呼是我们对社会生活细节的控制性管理的一部分。此外,这个词也可能被正在观察露茜的某个人而不是露茜自己所使用,或者作为对于另一个人的警示。“哎哟!”通常是一声短促的呼叫,但在某些情境中“哎——”可能拖得很长。这样的话,可以通过拉长声音来填补完成一项任务的紧要时刻。比如说,当家长逗孩子玩,把孩子往空中抛的时候,家长可能发出拖长了的“哎哟!”或“哎哟——啊——宝贝儿!”。当孩子可能感到失去控制的时候,这一声可以填补短暂的一瞬,使他重新放心,或许同时还让他更加理解了反应性惊呼。

这一切听起来都可能很勉强,很夸张。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细致地去研究如此无足轻重的发音呢?我们当然不会像例子中显示的那样如此关注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不会——但只是说不会有意识地这样做。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实际上却非常复杂,并且持续不断地控制着我们的外表和行为。在互动情境中,人们从来也没有期望我们只是在场而已。他们期望我们表现出戈夫曼所称的“有控制的警惕”(controlled alertness),正如我们对别人也有如此期望。所谓做人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例行常规中,不断向他人证明自己做人的资格能力(competence)。

第四节 互动中的脸面、身体与言说

现在不妨来概括一下已经了解到的东西。日常互动有赖于我们通过面部、身体和

街头世故 (Streetwise)



当你觉得受到身后或迎面走来的某个人的威胁时，是否曾经横穿马路走到街道对面？一位社会学家试图理解这类简单的互动，他就是伊莱贾·安德森。

安德森首先描述了美国两个邻近的城市街区街道上的社会互动。他在《街头世故：一个城市社区中的种族、阶级与变迁》(Anderson 1990)中认为，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可以说明，社会秩序是如何通过作为个体基石的无数微观层面上的互动创造出来的。他尤其感兴趣的是理解至少有一方被认为是具有威胁性的互动。安德森发现，街头许多黑人和白人的互动方式与种族刻板印象的结构有很大关系，而后者又与社会的经济结构相联系。这样，他便揭示了微观互动与更大的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

联系。

安德森先是回顾了戈夫曼所描述的在特定情景或地点，社会的角色与地位是如何形成的。戈夫曼写道(Goffman 1959)：

当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他们一般都会竭力获得有关此人的信息，或者启用已有的信息……有关这个人的信息有助于界定这一情境，能够使其他人预先知道他对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可能对他的期望。

效仿戈夫曼的做法，安德森探问，是什么类型的行为暗示和标志构成了公共互动的词汇？(Anderson 1990)他得出结论说：

肤色、性别、年龄、同伴、衣着、首饰,以及人们携带的东西,都有助于辨识他们,因而可以形成假设并使沟通发生。动作(敏捷或是迟钝、虚伪或是真诚、清楚明白或是难以捉摸)进一步使这一公共互动精致化。像日头早晚或“说明”一个人在场的一项活动等因素,也能够影响“陌生人”形象被抵消的方式和速度。如果一个陌生人不能通过审查并被评定为“安全”,抢劫者的形象便会凸显,旁边的路人就可能一直跟那个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安德森指出,最可能通过审查的是那些没有落入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危险人物的刻板印象中的人:“儿童轻易就通过了审查,白人妇女和男子通过得要慢一些,再下来是黑人妇女、黑人男子,黑人男性青少年在所有人中通过得最慢。”通过揭示互动紧张源自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外在身份,安德森认为,如果仅就微观互动本身来看,是不能获得对情境的完整理解的。他就是这样把微观互动和宏观过程联系在一起。

言语表达所传递的东西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通过别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来补充他们通过言语的沟通,并核查他们的言语是否真诚。在与其他人进行的日常互动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严格而持续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和动作,只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说,面部、身体管理和言说被用来传递特定的意义,并隐藏另一些意义。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还会在社会生活的情境中组织我们的活动,从而达到同样的目的。

5.4.1 接触

在许多社会情境中,我们都在与别人进行

安德森认为,当人们发展出“躲避艺术”一类的技巧,以应对面对暴力和犯罪时的脆弱感时,他们是具有“街头世故”的。根据安德森的观点,缺乏街头世故的白人识别不了不同类型黑人之间的差异(如中产阶级青年与帮派成员之间的差异)。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样改变步伐,以便走在“可疑”之人的后面,或者如何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绕过“危险街区”。

安德森和加德纳(参见上一个图文框)之类的研究表明,微观社会学对于揭示作为宏观社会学之内容的广泛的制度模式也是非常有用的。面对面互动显然是所有社会组织形式的主要基础,无论这种组织的规模多么大。单从这些故事本身,我们还无法构筑起对于我们社会中性别与种族的充分描述,但我们肯定可以大大改进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在随后各章中,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许多示例,表明微观情景中的互动是如何影响了更大的社会过程,而宏观系统又是如何影响了更为有限的社会生活框架。

着戈夫曼所说的无焦点的互动。一旦在场的个体们表现出彼此之间的相互觉察,无焦点的互动就发生了。在大批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比如在繁忙的大街上,在拥挤的剧院里,或者在聚会的场所中,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的。当人们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候,即使并没有直接说话,他们也会通过体态、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等来进行非言语沟通。

一旦个体直接关注别人的言行,有焦点的互动就发生了。社会互动常常兼具有焦点的交流和无焦点的交流。戈夫曼把有焦点的互动这种情况称为接触,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都体现为与家人、朋友、同事等他人的接触,这种接触也经常发生于与在场的他人无焦点互动的背景中。闲聊、研究班上的讨论、游戏,以及各

种日常例行的面对面接触（与售票员、招待员、营业员等等），都属于接触的例子。

接触总是需要“开端”，表明有礼貌的不关注被放弃了。当陌生人在一次聚会上相遇并开始交谈时，停止有礼貌的不关注那一刻总是有风险的，因为对于正在确立的接触的性质，人们很容易产生误解（Goffman 1971）。因此，最初的眼神接触可能模糊不定，意在试探。如果这一开场白并没有得到对方回应的话，寻求眼神接触的这个人此时就可能会装作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举动。在有焦点的互动中，每一个人都既要使用实际的言语交流，也要在同等程度上使用面部表情和姿势。戈夫曼区分了个人“给出”（give）的表达和“发出”（give off）的表达。前者是人们用来给别人留下特定印象的语词和面部表情，后者则是他人可以用来检验其是否真诚或真实的线索。例如，一位餐厅老板带着礼貌的微笑，倾听食客说他们是多么喜欢这里的饭菜。同时，她会留意食客们发出的信号：比如他们吃饭时看上去有多高兴，是不是剩下很多饭菜，以及他们用以表达满意的语气。

当然，服务业中的侍者及其他工作人员被告知，在他们与顾客的社会互动中要保持微笑和礼貌。霍克希尔德在其对航空业的著名研究中，描述了这种“情感劳动”。

第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讨论了霍克希尔德有关空姐们如何接受与乘客互动的训练的阐述。

5.4.2 印象管理

戈夫曼及其他研究社会互动的学者，在分析中常常从戏剧中借用概念。比如社会角色这个概念，就是从戏剧场景中发展出来的。角色就是由社会界定的期望，并要求处于某一特定

地位或者社会位置的人去遵循。成为一个老师就是去占据某一特定的位置；老师的角色就是由老师对待其学生的一系列特定行为方式所组成。戈夫曼把社会生活看作是由演员^①在某一个或者多个舞台上的演出，因为我们如何演出有赖于我们在某一特定时刻所要扮演的角色。人们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是很敏感的，他们使用多种形式的印象管理，迫使别人能够依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对其做出回应。尽管我们有时可能是以一种精心计算的方式去做的，但通常这些都属于我们在并无特意关注的情况下完成的。当菲力普参加商业会议时，他总是西装革履、举止优雅；而在晚上放松下来与一些朋友看足球时，他却穿着牛仔裤和无领运动衫，满嘴没个正经。这就是印象管理。

即如上文所言，我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相当依赖于我们的社会地位。根据具体的社会背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有所变化。比如说，作为一名“学生”，你具有某种特定的地位，当你和教授们在一起时，被期望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而作为一名“子女”，你的地位与学生不同，社会（尤其是你的父母）对你也有不同的期望。与此类似，作为一名“朋友”，你在社会秩序中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位置，你所承担的角色也会随之改变。显然，一个人同时具备许多种地位。社会学家把你所享有的这群地位称为地位丛。

社会学家还喜欢区分先赋地位和获致地位。先赋地位是基于种族、生理性别或年龄等生物属性而“指定”给你的。因此，你的先赋地位可能是“白人”、“女性”和“青少年”。而获致地位是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你的获致地位可以是“大学毕业生”、“运动员”或“雇员”。虽然我们可能愿意相信，获致地位是最重要的，但社会或许并不认同。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地位比其他一切地位更重要，通常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总体位置。社会学家称这类

①“演员”（actor）也就是“行动者”。

地位为主导地位 (Hughes 1945; Becker 1963)。最常见的主导地位是基于社会性别和种族的。社会学家已经揭示道,在接触中,性别 (gender) 和种族是人们彼此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 (Omi and Winant 1994)。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种族和性别深刻塑造了我们的社会互动。

一 前台与后台

戈夫曼说,很多的社会生活都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个人扮演正式角色的社会场合或接触;他们在进行“台上表演”。在创造前台表演时就经常包括剧组工作 (teamwork)。同一党派两个有名政客哪怕私下里彼此憎恨,但在电视摄像机前也可能会精心表演一场团结友好的戏剧来。一对夫妇会小心翼翼地在孩子面前掩饰彼此的争吵,维持和谐的前台,只有在孩子熟睡时才开始大吵特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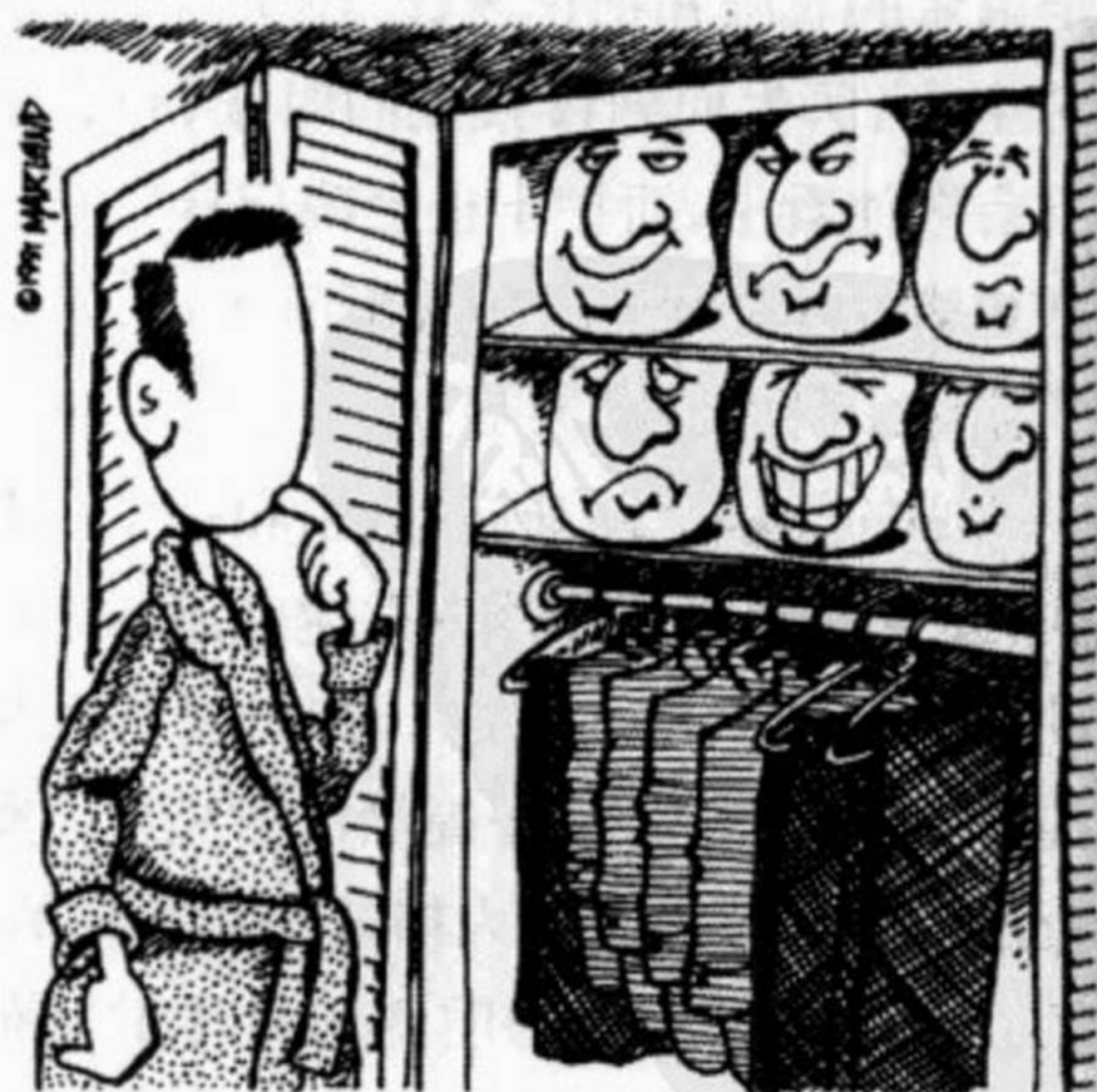
后台则是人们组装道具 (props) 并为更正式场合的互动做好准备的地方。后台类似于剧院的幕后或者拍电影时的镜外活动。当人们安全地避往幕后,就能放松下来,把在前台小心克制的感情和行为风格发泄出来。(在本节末尾的图文框中,我们将看到社会学家斯宾塞·卡希尔是如何应用戈夫曼的拟剧论分析,研究公厕中的后台社会互动的。)在后台人们可以“目无尊长,满口黄腔,切磋控制技巧……衣着随便、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张口方言,闭口俚语,忽而嘀嘀咕咕,忽而大喊大叫,打打闹闹,‘耍笑逗乐’,不理睬别人细微但具有潜在象征意义的行为,还有众多不拘小节之处:哼哼小曲、吹吹口哨、嚼嚼吃食、咬咬东西、打打饱嗝、放放胀气什么的。”(Goffman 1973) 因此,侍者在招待食客的时候可能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人,但当他一进厨房的门,就会大呼小叫,非常放肆。如果食客们能够看见厨房里都在干些什么的话,大概就没几个会继续上餐馆吃饭了。

戈夫曼在社会互动研究方面写了许多重要著述。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将讨论他研究污名和被损害的身份的作品。

二 承担角色:私密检查

有关同样从戏剧中借鉴来的印象管理中的团队合作,我们不妨通过详细讨论一项具体的研究作为示例。詹姆斯·汉斯林和梅·比格斯研究了一种非常特别、极其微妙的互动类型:一位妇女去看妇科医生 (Henslin and Biggs 1971, 1997)。在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绝大多数骨盆检查是由男医生进行的。因此在当时(现在有时还是这样),这一经历对于医患双方来说都充满着潜在的暧昧和尴尬。在西方,男人和女人通过社会化后,都会认为生殖器是身体上最为私隐的部分,观看另一个人的生殖器,特别是触摸另一个人的生殖器,一般是和私密的性接触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女性就是因为一想到骨盆检查就非常焦虑,所以拒绝去看医生,不管是男医生还是女医生,即使医生觉得有明确的医学理由需要检查。

汉斯林和比格斯分析了比格斯作为一位



“呃……今天我该穿什么呢? ……”

训练有素的护士,从大量的妇科检查中收集上来的资料。他们把所观察到的现象分为几个典型的阶段。通过采用拟剧论隐喻,他们提出每一个阶段都可以视为独立的一幕来探讨,其中演员所扮演的角色随着情节的展开而不断更换。在序幕中,妇女进入候诊室,准备担任患者的角色,暂时放弃她在外面的身份。接着她被叫进了诊察室,开始扮演“患者”的角色,这时第一幕展开。医生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专业风范,并把病人作为举止得体、具有资格能力的人来对待,和她保持着眼神接触,彬彬有礼地听着她的陈述。如果他认为需要进行检查,便告诉她,而自己则离开诊察室;第一幕结束。

他离开后,护士就进来了。护士在即将拉开的主要场景中是一位很重要的舞台工作人员。她能给患者以安慰,既做她的知心朋友,了解某些“女人不得不忍受的事情”,而在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中,又是一位合作者。这位护士关键的作用,则是在下一幕关键场景中,帮助患者从一个正常的“人”(person)转变为“非人”(non-person)。在这一场景中,主打的是身体,是有待检查的那一部分身体,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汉斯林和比格斯的研究中,护士不仅要负责指引患者脱衣服,而且还接管了正常情况下由患者控制的方面。就这样,她拿走患者的衣服并把它叠好。绝大多数的女性都希望,当医生回到诊察室的时候,自己的内衣不会被看见,而护士也会确保这一点。护士把患者引上诊察台,在医生回来前,用一条单子盖住患者身体的大部分。

核心的一幕就此开启,医生和护士一起上场。护士的在场有助于确保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动不会有性方面的联想,同时,要是医生被指控有非专业行为,也好提供法律见证。整个检查进行得好像患者的人格并不存在似的;裹住她的那条单子把她的阴部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而她的体姿也不允许她观察检查活动本身。医生坐在一张她视线之外的矮凳上,除了询问医疗方面的具体问题之外,对她

视而不见。患者是通过变成一个暂时的非人来参与合作的,不主动搭话,并尽量减少动作。

在这一幕与终场之间的幕间休息时,护士又扮演起了舞台工作人员的角色,帮助患者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医生离开诊察室后,护士和患者可能又会开始交谈,患者也会表现出检查完毕后松了一口气。患者穿好衣服,重新整装,准备去面对终场那一幕。医生又进入诊察室,与患者讨论检查的结果,并重新将患者作为一名有责任能力的完整的人来看待。医生仍然表现出一种彬彬有礼的专业风范,以便传递给患者:他对她的反应并没有因为与她身体有过私密接触而有丝毫改变。当她离开医生的诊所,终场一幕也就演完了,她又恢复了自己在外部的世界中的身份。患者和医生就这样进行了合作,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管理互动,管理每位参与者彼此留下的印象。

5.4.3 个人空间

对于个人空间的界定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当人们与别人进行有焦点的互动时,他们之间一般至少要保持三英尺远的距离;当他们并排站立时,这个距离就稍近一些。在中东,人们站在一起时彼此的距离比西方人所能接受的距离通常要更近一些。到这些地方来的西方人可能会为这种始料未及的身体接近而感到不自在。

爱德华·T.霍尔对非言语沟通有过广泛的研究。他区分了四种个人空间区域。一是私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相距至多1.5英尺,这只限于极少数的社会接触。只有那些允许经常发生身体接触的关系中的人,比如爱人之间、亲子之间,其活动才能在这块私密空间区域内进行。其二是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从1.5英尺到4英尺之间,是与朋友和熟人之间接触时正常的空间间隔。这里允许某些亲密接触,但是往往受到严格限制。其三是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从4英尺到12英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公共卫生间中的后台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斯宾塞·卡希尔领导一个研究小组，考察了购物中心、大学校园、餐馆酒吧等处的公共卫生间(或“洗手间”)中的社会互动。这里我们来看看，卡希尔在他的研究中，是怎么运用戈夫曼对于前台和后台的描述的。卡希尔发现，戈夫曼(Goffman 1959)所谓的整个“表演剧组”(performance teams)，如果一次集体表演出了岔子，有时就会退到公共卫生间中，隐藏尴尬。

下面三个年轻女性的谈话是在大学校园学生中心的公共卫生间中录音的。尽管没有观察到引发此次谈话的意外事件，但该事件显然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尴尬。

甲：太难堪了。居然会出这种事儿。[众笑]

乙：他肯定觉得我们这帮子蠢透了。

甲：我居然叫那么大声儿，所有人都听得见。

丙：其实根本没那么响。我保证他没听见。

乙：嗯——我们没马上瞧他。我是想告诉你来着，可你忙着说话，我……

甲：居然会出这种事儿。我觉得蠢透了。

乙：别担心啦。至少他现在知道你是谁了。没事儿吧？

甲：我难堪到家了。他要还在那儿该咋办？

乙：你待会儿去瞄瞄他。

这个示例表明，这些防卫性的策略除了掩盖一时间失去控制，还给个人和表演剧组争取了时间，聚在一起打气，然后再一次面对前台观众……

根据戈夫曼的观察(Goffman 1959)，作为例行常规，表演剧组会利用后台聚集打气，并商量……此次集体表演在舞台上出现的问题：“在这里，面前没有任何观众，剧组可以进行排练，检

查是否有言语冒犯。而剧组中的新手在这里……可以得到调教，或者从表演中拉下来。”

比如说，在上面复述的谈话中，乙和丙不仅试图减轻甲此前举动的丢脸意涵，而且乙还在调教甲关于集体表演的舞台艺术。照乙的看法，假如甲能够更多地关注剧组其他成员的提示，原本可以避免这场令人尴尬的事件。

除了因为某次集体表演演砸而后退回公共洗手间，表演剧组这样做还是为了采取预防措施，以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在公共洗手间，剧组可以协调暗示信号，演练计划中的表演，交流策略信息。比如说，在酒吧洗手间里，有时能听到表演剧组讨论其成员的性暗示所针对的目标，她/他们所收到的暗示，这类暗示的来源，以及可能的回应。当然，一个人通过向剧组其他成员提供这类策略信息，既可以阻止她/他们插手自己的个人计划，也可以干脆让大家一起帮忙，搞定计划。

不仅如此，有时候发生在公共洗手间里的后台讨论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某个剧组成员乃至整个剧组的士气。比如，在前面讨论的这三个女人之间的谈话中，乙和丙一方面减轻甲此前举动的丢脸意涵，一方面鼓励她“演下去”，试图以此给甲打气。

资料来源：Cahill et al. (1985)

问题：

- 1 戈夫曼的拟剧论阐述为什么有助于分析公共洗手间中的社会互动？
- 2 角色承担、有礼貌的不关注、个人空间等概念在研究餐馆酒吧的公共卫生间里的社会互动时是否有用？
- 3 你通常所经历的后台区域是什么？

尺,这通常是采访之类的正式场景中所维持的区域。第四种区域是公共距离(public distance),在12英尺开外,面对听众讲话时的人 would 维持这种距离^①。

在日常互动中,最使人焦虑的区域是私密距离和个人距离的区域。如果这些区域受到侵犯,人们就会起而重新夺回他们的空间。我们往往盯着入侵者,像是要说,“滚开!”或者把他挤到一边。当人们被迫比他们所希望的距离挨得更近时,他们就有可能制造出某种有形的边界。比如坐在拥挤的图书馆桌子旁边的读者,可能会在其周围放些书,以便从物理上划出一片私人空间来。

这里,性别问题也起了作用,同在其他形式的非言语沟通中的情形基本上是一样的。在空间的使用上,男人传统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包括可以走到女人的个人空间中去,尽管这个女人不一定是他的密友,甚至可能连熟人都不是。同女人并肩前行时男人会挽其胳膊,把她让出门时会手扶其腰,男人这样做可能只是一种表示关心或礼貌的姿势。但是如果相反,一个女人进入一个男人的个人空间,那么她往往被理解为调情或性引诱。许多西方国家关于性骚扰的新的法律和规则,都在力图防止人们——包括男人和女人——的个人空间被自己不期望的他人的触摸或接触所破坏。

本章讨论的问题有许多关系到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塑造的。第八章讨论了社会学与身体的关系。

第五节 时空中的互动

理解人们的活动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中分布的,对于分析接触乃至理解整个社会生活

都是至关重要的。所有的互动都处于一定的情境中,即它们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并有特定的一个时段。我们一天的行动,往往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分区”的。比如说,绝大多数的人们大都花费一天时间中的一个区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来从事工作。他们每周的时间也被分区,他们很可能是在工作日工作,而在周末呆在家里,并在周末的时候改变他们的活动模式。随着我们度过一天时间的一个个时间分区,我们常常同时也在不同空间之间移动:去上班时,我们可能要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或者从郊区通勤到市区。因此,当我们分析社会互动的背景时,看一看人员穿越时空的流动,常常会有助益。

区域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生活是怎样在时空中分区的。以一座私宅为例。现代住宅可以分区为房间居室和门厅过道,如果不只一层以上的还会有楼层楼梯。这些空间并不只是物理上分离开的区域,它也是一种时间上的分区。起居室和厨房基本上是白天使用的地方,而卧室却是夜晚使用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互动,既受到时间的约束,也受到空间的约束。房屋的一些区域形成后台,而其他区域成为进行“表演”的前台。有时整座房子都可以成为后台。这一观念也再一次被戈夫曼出色地捕捉到了:

星期天的早晨,全家人可以利用环绕着自家设施的围墙加以隐藏,在这里着装可以随便、行为不必拘谨。这种通常只限于厨房和卧室中的非正式性扩展到了所有房间。与此类似,在美国的中产阶级居住的街区,每天下午母亲们把住所和儿童的游乐场之间的界限视为后台,来回经过时可以穿着牛仔裤、休闲服,也不需要什么化妆……当然,被精心设计成前台来进行特定常规的

^① 换算成公制,私密距离约为45厘米以内,个人距离约为45厘米至1米2,社会距离约为1米2至3米65,公共距离约为3米65开外。

例行表演的区域,在每次表演开始前和结束后,也往往充当着后台。因为在这些时候,我们可能要对平时的布置进行维修、复原或者重置,演员也可能要进行彩排。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看看一家餐馆、商店或者家庭,在这些设施对我们敞开它们新的一天之前的几分钟是个什么样子就清楚了。(Goffman 1973)

5.5.1 钟表时间

在现代社会中,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分区受到钟表时间的强烈影响。如果没有钟表,不对活动及活动的空间协调进行精确的计时,那么工业化社会将不可能存在(Mumford 1973)。今天,人们用钟表对时间的测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标准化,使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复杂的国际交通运输系统和国际电信传播成为可能。世界标准时间是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多国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自那以后,全球被划成了24个时区,每个时区相隔1小时,而国际通用日的确切开始时刻也被固定下来。

14世纪的修道院是最早试图严格规定修道士每天和每周的活动时间安排的组织。而到了今天,几乎没有哪一个群体或组织不是这样做的了,而且所涉及的人数和资源越多,时刻表就必须安排得越精确。埃维厄塔·泽鲁巴维尔(Zerubavel 1979, 1982)在他有关现代大医院时间结构的研究中证实了这一点。医院必须24小时就诊,这样员工和资源的协调就成了高度复杂的事情。比如,护士某个时间段在甲病房值班,而另一个时间段在乙病房值班,等等,并且还要在日班和夜班之间进行倒换。护士、医生和其他员工,还有他们所需要的资源,都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整合。

5.5.2 社会生活与时空秩序安排

互联网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证明社会生活的形式与我们对于时空的控制是如何密切相关。互联网使我们有可能与身处世界任何角落的我们从未见过或从不认识的人进行互动。这类技术变迁“重新安排”了空间,使我们无需站起身来就可与任何人互动。它也改变了我们的时间体验,因为电子高速公路上的沟通几乎是即时性的。直到大约50年前,绝大多数跨越空间的沟通都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你给国外的某个人寄一封信,信件要借助邮轮、火车、邮车或飞机长途携运,才能送达收件人,这中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当然,人们今天仍然用手写信,但即时通信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基本要件。没有它,我们的生活几乎难以想像。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打开电视看新闻,给世界另一端的朋友打个电话或发封电子邮件,以至于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

5.5.3 文化和历史视角下的日常生活

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人所分析的社会互动机制中,有些似乎是普遍性的。但戈夫曼对于有礼貌的不关注以及其他一些互动类型的讨论,有许多基本关注的是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司空见惯的社会。那么,那些规模很小的传统社会,没有任何陌生人,绝大多数场合中都不会同时聚集十来个人以上,情况又如何呢?

要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互动之间的某些差异对比,我们不妨以世界上依然留存的技术角度上最不发达的文化之一为例。这就是昆族(!Kung,有时也被称作布须曼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国际旅游

你是否曾经与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有过面对面的交谈？你是否浏览过国外的网站？你是否曾经到过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旅行？如果你对这些问题里的任何一个回答“是”，那么你就已经见证了全球化对于社会互动的影响。全球化虽然只是一种比较晚近的现象，但已经改变了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这些互动的频率和性质。事实上，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正是从这些方面来界定全球化的。根据蒂利的说法，“全球化意味着具有地方意义的社会互动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张”（Tilly 1995）。换句话说，伴随着全球化，我们的互动中有更多的部分开始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其他国家的人们。

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又有什么特点呢？致力于旅游社会学领域的那些社会学家，已经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旅游社会学家指出，全球化既激发了人们对于异国的兴趣，也便利了跨国旅行者的出行，因而极大地扩展了国际旅游的可能性。从1982年到2002年，外国居民入境英国的旅游人次翻番，而旅游花费则上升了两倍。这些旅游者现在每年给英国经济注入几乎120亿英镑。而英国人出国旅游的人数也不断创下纪录（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4b）。

国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当然会带来不同国家人们之间面对面互动频率的增加。社会学家



英国人到了国外照样找寻熟悉的快乐，汉堡薯条或全天候早餐^①之类。

① 原文为“an all-day breakfast”，指英国特色的全天供应的早点套餐，包括烤面包、腊肠、培根、薯条、豆子等，热量充足。

约翰·厄里(Urry 1990, 2001)认为,许多这样的互动是被“游客凝视”(tourist gaze)塑造的,即游客对自己在国外旅行期间将会获得“奇异”经历的期待。厄里把游客的凝视与福柯的医学凝视概念(第八章第二节第一小节将予讨论)相比较,指出,游客的凝视正是由职业专家进行社会组织的,被普遍地、系统地应用,和医学凝视一样冷静超然。只是这里的组织乃围绕着对于“奇异”经历的追求。这些经历有违于我们日常对于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互动以及如何与物质环境进行互动的期待。

比如说,对于到美国旅游的英国人来说,发现美国人居然靠道路右侧行车是挺好玩的。与此同时,这类行为对于来自英国的司机来说又是不协调的。我们的交通规则在我们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旦系统地违反,我们就会体验到陌生、古怪或奇异。然而,作为游客,我们也能从这种陌生中获得乐趣。在某种意义上,除了要看帝国大厦或是埃菲尔铁塔,这也是我们花钱希望看到的。试想你去另一个国家旅游,结果却发现那里与你生于斯长于斯的城镇几乎一个模子,你该会多么失望。

然而,游客大都也不希望他们的经历过于奇异。举例来说,在巴黎最受年轻游客尤其是美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之一,正是麦当劳快餐店。

有些人是来瞧瞧,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里的台词是否确有其事。电影里说因为法国人有特别的度量衡制,麦当劳的“四分之一磅起司”汉堡被称为“豪华装起司汉堡”(顺便说一句,果真如此)。英国人在国外旅游时,经常会忍不住在英式或爱尔兰式的酒馆里吃喝。有时这种消遣是好奇心使然,但是,人们通常是更喜欢熟悉环境中熟悉的饮食带来的那份舒适。追求奇异和追求熟悉,这两种矛盾的要求正是游客凝视的核心所在。

游客凝视可能会给其与当地人的面对面互动带来紧张。因为海外游客能带给旅游地经济利益,所以作为旅游业一部分的当地人可能会对它们持欢迎态度。但是游客的苛刻要求,或是在著名旅游景区经常会出现的畸形发展,可能会使另外一些当地人对游客心存厌恨。游客可能会详细询问当地人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饮食、工作和休闲习惯等。这样做有可能增进他们对其他文化的了解,但也有可能使他们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做出负面的判断。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旅游业在不断发展,社会学家也将不得不仔细研究出现在旅游者和当地人之间的主要互动模式,并就这些互动主要是友好还是敌对等问题做出评估。

人),生活在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境内卡拉哈迪(Kalahari)沙漠地区(Lee 1968, 1969;惊叹号指的是在发音前的吸气音)。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在随着外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其社会生活的传统模式依然是很明显的。^①

昆族过着三四十人一组的群居生活,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流动居住。他们生活的环境中食

物稀缺,必须长途跋涉,四处觅食。普通一日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游荡上。妇女儿童常常呆在营地,但整个群体也常常一起整天整天地跋涉。共同体的成员们白天有时散布在百余平方英里的范围里,晚上回到营地吃饭睡觉。在白天大部分时间里,男人们都是独自一人,要不也只是三五成群。不过,一年中有一段时期,他们的日常例行活动会发生变

① 本小节有关昆族的描述,从生活起居、群体结构到与外界关系,基本都能从电影《上帝也疯狂》(或《上帝发疯了》)及其续集中看到鲜活的展现。

化:冬天是雨季,水源富足,觅食容易得多。这段时期昆人的日常生活是以仪式庆典为核心的,准备工作和具体实施都很费时间。

大多数昆族群体的成员从未看到过任何他们不怎么熟悉的人。只是在近些年来,与外界的接触变得更为常见。此前他们根本没有词汇来表达“陌生人”的意思。尽管昆族人,尤其是昆族的男人,白天可能有大量的时间接触到别人,但在共同体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保持私密的机会。各家睡在薄薄的开放式屋子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没有人在研究昆族时脑子里想到了戈夫曼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但不难看出,他的研究的某些方面难以用于昆族的社会生活。比如说,很少有机会创造前台和后台。房间墙壁、独立的建筑物、城市的各种邻里社区,这些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对于不同集会和接触的分隔,对于昆族人的活动来说都是天方夜谭。

昆族人的社会互动形式与现代城市里发生的互动非常不同。城市生活迫使我们几乎不停地与陌生人互动。

有关城市中的社会互动,一个著名的阐述出自社会学的早期创建者格奥尔格·齐美尔,第二十一章第一节的图文框将讨论其著述。

5.5.4 现实的社会建构:社会学角度的论争

在社会学里,有许多种理论框架被用来说明社会现实。这些理论对社会现象的说明各不相同,但都接受共同的假设,即社会现实的存在与人们如何议论它或者如何在其中生活无关。但这种假设已经受到一大批被称为社会建构论的社会学思想的挑战。

社会建构论者认为,那些被个体与社会体会和理解为现实的东西,其本身正是一种建构

(construction),也就是各个体和群体的社会互动的某种产物。因而,试图“说明”社会现实,将导致这些现实被建构的过程遭到忽视和物化(也就是被当作既定事实)。因此,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社会学家需要记录和分析这些过程,而不是只给出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现实的概念。社会建构论已经被视为社会学中后现代思潮的一种重要影响。

有关后现代主义,详参第四章第三节第一小节。

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勒克曼在他们1966年的经典研究《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考察了常识知识,也就是个体想当然认为真实的那些东西。他们强调,社会现实的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当中可能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文化内部的不同人群中也可能不同。因此任务就变成了分析个体借助哪些过程,开始把对他们而言“真实的”东西领会为真实的。

社会建构论者用伯格和勒克曼的观念来考察社会现象,以描绘社会成员通过哪些方式,了解真实并同时创造真实。虽然社会建构论者研究了医学和医疗、性别关系以及情感等各式各样的话题,但他们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探讨的是社会问题,比如犯罪“问题”。

阿龙·西库雷尔的著作(Cicourel 1968)提供了一个社会建构论者在青少年犯罪领域的研究实例。有时候,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和案发数的数据被视为给定的(即真实的),由此创造出一些理论,来说明数据中观察的模式。例如,关于被捕和出庭的数字乍看起来似乎表明,来自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比来自双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可能出现越轨行为。有些社会学家就此提出了对这一观察到的关系的说明:或许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缺乏管教,或者缺少适当的角色模型。

与此相反,西库雷尔观察了对被怀疑犯罪

的青少年的逮捕和分类过程,也就是说,他观察了“官方”犯罪数据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结果他发现,警方处理青少年犯法者的程序,依赖于对什么是“真正的”青少年犯法者的常识理解。

例如,当来自下层阶级家庭的青少年被逮捕时,警方更有可能把他们的犯法行为视为管教不当或缺乏适当的角色模型的结果,并正式拘留他。而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犯法者则更可能被释放,交还父母照看。警方和父母都认为,在家里,这些青少年能够得到适当的管教。因而,警方的做法促使来自下层阶级家庭的青少年比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更经常地被正式贴上“青少年犯”的标签,即使他们所犯的过错类似。而这种指派所产生的数据,本身又反过来证实了常识观点所认为存在的那种关系,即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更可能犯罪。西库雷尔的研究表明,通过与社会中其他人之间的互动,我们把自己关于现实的常识观念转换成关于它们自身有效性的独立而“客观”的证据。

在第十九章,你还将看到对于犯罪“问题”之建构的更细致的讨论。

社会建构论并非没有批评者。社会学家斯蒂夫·伍尔加和多萝西·保鲁希就指出,社会建构论者旨在揭示社会现实的主观创造,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有选择性地把某些特征视为客观的,而把另外一些特征视为建构出来的。例如,在那些考察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青少年的分析中,社会建构论者经常认为,最初报告的青少年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因而,一些青少年被贴上越轨的标签,而另一些未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这其中的差异必定是由于标签本身的建构。批评者认为,社会建构论者前后矛盾地认为,最初的行为是客观的,而贴标签的过程则是主观的(Woolgar and Pawluch 1985)。

还有些社会学家也提出批评,说社会建构

论者不愿意承认,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确实对可观察到的社会后果具有巨大的影响。例如,一些批评者认为,虽然现实可以是被构造出来的常识信念的延续,但这些信念本身却可能是由资本主义或父权制之类现存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

说到底,社会建构论为理解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迥异于其他大多数社会学思路的理论取向。社会建构论者不是假定社会现实在客观的意义上存在,而是记录并分析社会现实被建构出来的过程,而这种建构有助于确认其自身作为社会现实中的地位。

5.5.5 网络空间上的社会互动

现代社会与本节第三小节所讨论的昆族截然不同——在随后各章中还会进一步探讨——我们要不断地与我们以前从来不曾遇见或认识的人进行交往。我们几乎所有的日常交易,比如购物或存款,都会让我们与可能在数千里之外生活的人发生接触,但这是一种间接的接触。

既然对于工业化国家中的许多人而言,电子邮件、即时信息、网上社群和聊天室已经成为生活中的现实,那么这些互动具有什么特性呢?它们又增加了哪些复杂性呢?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间接沟通蕴含着面对面社会互动中不曾发现的大量问题。根据卡茨等人的研究:“敲键盘不能体现为人,置身网络空间也并非置身现实;这些都是虚饰,都是异化,是对真实的东西的糟糕替代。”(Katz et al. 2001)具体来讲,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以计算机为中介的沟通技术过于局限,不能防止使用者隐藏在虚假的身份背后(参看下面的图文框)。这也滋长了欺骗、纵欲、操纵、玩弄感情之类的行径:

问题在于人类沟通的实质。我们认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网络空间上的社会互动问题

下面一节摘自一篇写于互联网早期的文章，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疑问，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我是在1983年的暮春“遇见”琼的，那时我刚把自己的个人电脑联上一个“猫”，进入了网上沟通的奇异新世界。……她的“网名”(handle)叫“聊天小姐”(Talkin' Lady)。根据媒体的惯例，当人们进入拥有很多使用者的“公开”频道，都有一个(通常是轻浮逗笑的)网名；而当两个人选择进入一种私人谈话模式，常常会交换关于自身的真实信息。我很快就了解到，她的真名叫做琼·苏·格琳，不到30岁，在纽约学习神经心理学，在一次车祸中严重毁容，都怪那司机喝醉了酒。她的男朋友也在那场车祸中丧失。琼自己在医院里住了一年，治疗脑伤，脑伤使她的说话和走路都受到了影响。琼无法说话，固守轮椅，常常忍受着剧烈的背疼和腿痛。因此琼起初似乎对自己的残障痛心不已，基本不打算活下去了。

然后，她的导师，以前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给她带来一台计算机，一个“猫”，还订了一年的“计算机服务”(CompuServe，第一个提供实时聊天的网上服务)，专门供琼那时要做的事情使用——在网上交友。一开始，她的网名叫做“安静女孩”(Quiet Lady)，指她不能说话。但琼可以打字，说到底，人在计算机上就是这样“聊天”的。她生气勃勃，活泼开朗，善良宽宏，在这个不计较生理特性的媒体上如鲜花般盛放。琼变得大受欢迎，她的新网名“聊天小姐”，就是她对自我

的新感觉的写照。在随后的两年中，她成为网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为其他残障女性鼓劲打气，也使那些四肢健全的人深受鼓舞，成见云消。她通过结交许多知心的网友和(偶尔的)网恋，改变了好几十位女性的生活。

因此，这一年年初的时候，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事件，琼被揭露说根本就没有残障，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震荡。不仅如此，琼事实上根本不是位女性。她其实是个男人，我们可以叫他阿力克斯，五十出头，是纽约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他在搞一场怪异的实验，让各方都全神投入，看看做一个女人感受如何，也体验一下女性私密的友谊。

即使是那些不怎么了解琼的人，也被阿力克斯的欺骗搞得不知所措，在一定程度上更是觉得遭到了背叛。我们网上的许多人愿意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属于未来的乌托邦共同体中，而阿力克斯的实验则向我们所有人证明：技术不是抵御欺骗的盾牌。我们即使还留有几分信念，也就此丧失了天真。

在阿力克斯的受害者中，有一名女性与真实生活中的阿力克斯有了一段恋情，而她是琼介绍给他的。对于这些受害者中的某些人来说，这场实验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思想强奸”。(事实上，有几位确实尝试是否有可能对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阿力克斯提出指控，尽管客观而言，这类案例并无先例)对于另外一些受害者来说，阿力克斯与其说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不如说是个无法自制的胆大妄为者。(其中有几位尝试与阿力克斯维持友情，照一位女性的说法，“联络的是那个人的那颗心，而不是那个性。

那颗心一如既往。”)不管是哪种方式,这都是一段别具一格的现代故事,一个男人利用了我们某些最先进的技术,玩弄了我们对于性别角色最古老的假设。

资料来源:Gelder (1996)

问题:

- 1 网络空间上的社会互动相比于会面,有何重要差异?
- 2 网上互动相比于会面,有何长短优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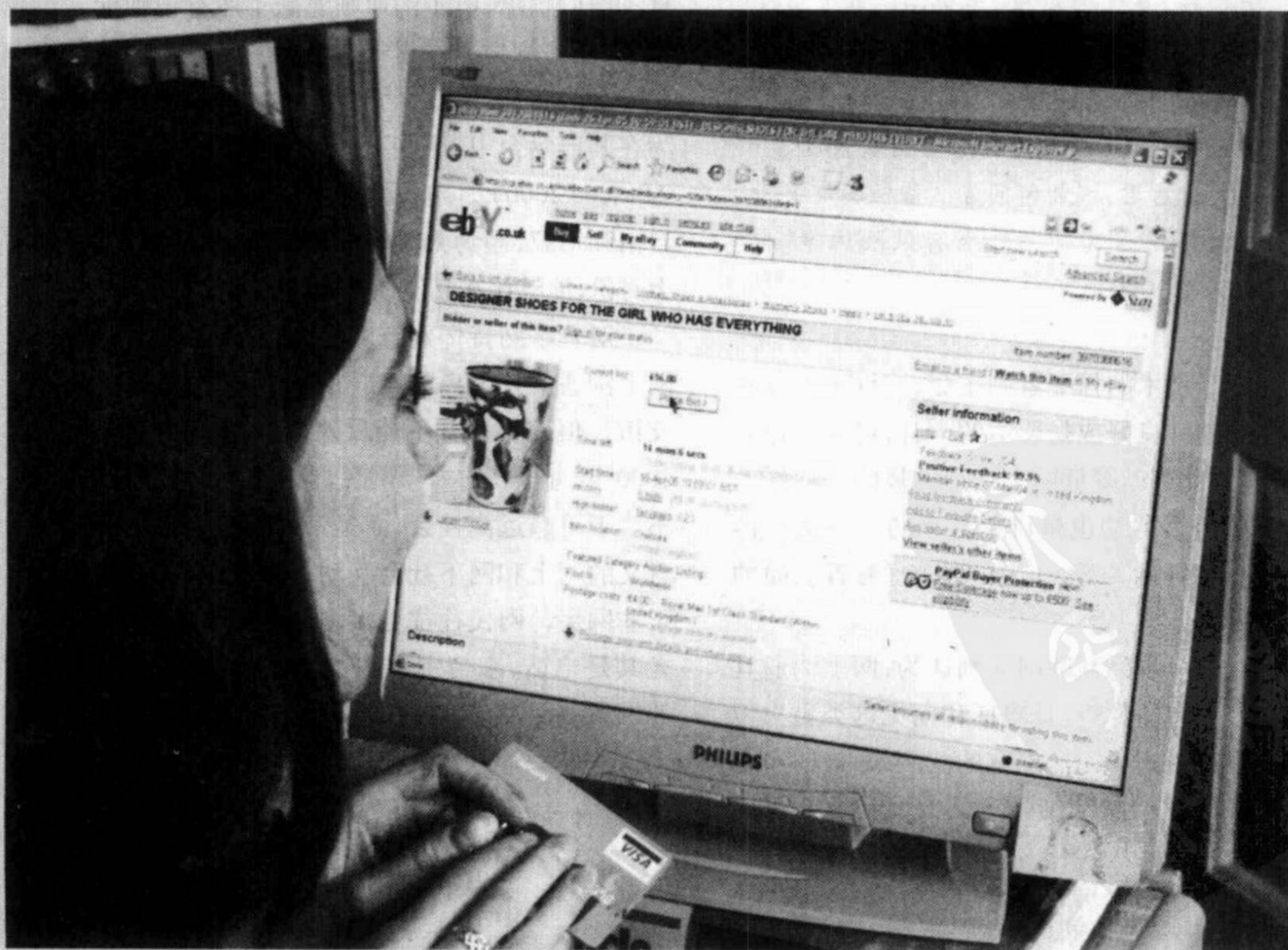
在网络空间上确立信任:易趣网反馈体系

易趣网是目前最大的点对点拍卖场所,也是历史最久的之一(创建于1995年9月)。到2005年,易趣网已经吸引了全世界超过一亿的人次在其网站上买卖产品。令人瞩目的是,易趣网对其拍卖的任何物品都不提供任何担保证书或担保人,买卖双方承担交易当中的一切风险,易趣网只充当提供名录的机构。这样一个市场似乎充满了大规模欺诈的可能性,然

而,通过易趣网完成的交易当中的欺诈比例却显得很低。无论是易趣网,还是参与其市场的人,都要给网站上一个制度化的声誉体系评级,称为反馈论坛(Feedback Forum),使得达成成功交易的比例相当高。

在每一位卖主或买主的名后都在括号内有一个数字。以一位卖主为例,信息呈现如下:

卖主姓名(265☆)



这个数字是一个人在易趣网市场上的声誉的概括指标。注册用户被允许发布对于与其交易的用户的正面、负面或中性评论。每一则正面评论加1分,每一则负面评论减1分,而中性评论不影响一个人的分数。一旦达到某些特定的水平,市场参与者还会被授予一颗彩星,标示他们已经获得的正面评论的净值……

点击姓名,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另一个人;而点击某人姓名后的数字,就会看到他们完整的反馈概况。你会发现完整的评论目录,并且附有每一位评论者的电邮链接和评分值(这样就可以追踪评估者和被评估者双方的声誉)。典型的正面评论可以是“包装精良,投递迅捷,郑重推荐。A+。”……

反馈评分值高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财富。许多参与者表示,他们更愿意与那些评分高的人做交易,甚至只愿意和那些评分高的人做交易。在这个意义上,有些交易者能够创出身份品牌,增加他们的成交量,甚至提高他们能够出售的价格……即使只有寥寥数则负面评价,也会大大损害声誉。因此交易者一般都会非常细心地保护自己的评分,办法就是诚实地交易,并且迅速地执行。在经常光顾的参与者中,最操心的就是一则负面评论的潜在危害……你可以选择不公开自己整个反馈概况,但在一个依赖这些声誉的市场上,这是一种大大的缺陷。

资料来源:Kollock (1999)

为它是头脑的产物,但实际上是由身体的各部分完成的:表情的变化、声音的抑扬、身体的摇摆、手势……在互联网上,头脑在出场,但身体不见了。接收者几乎得不到有关人个性和情绪的任何线索,只能猜测信息为何被发出,是什么意思,该如何回应。信任实质上被抛弃了。这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Locke 2000)

但新技术的捍卫者则主张,有许多种方式可以来建立良好或是恶劣的声誉,可以来建立信任,因此可以降低网上沟通的风险。在网上社群中最著名的也是讨论甚多的一种信任体制就是易趣网(eBay)上的拍卖(参看上面的图文框)。

更进一步的互联网迷则认为,网上沟通具有许多固有的优势,是电话和面见这类更为传统的互动形式所无法拥有的。例如,人的声音虽然在表达情感和细微意义方面具有无可比

拟的优越性,但是也会传达说话人的年龄、性别、族群或社会位置等可能对说话人不利的信息。他们指出,电子沟通则遮蔽了所有识别标志,保证注意力严格集中于信息的内容上。这对妇女或其他传统上的弱势群体特别有利,因为在其他场合中,这些人的意见不时会被轻视(Pascoe 2000)。电子互动常常被认为有助于自由和增权,因为人们能够创建属于自己的网上身份,能够比在其他任何地方讲话都更自由。

对互联网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指出,间接的网上沟通助长了离群索居,有碍于形成真实的友谊。但这似乎并不能反映现实。1995年至2000年间开展的一项网民调查显示,上网远不等于更趋远离社会,而是带来越来越多富有意义的网上和网下社会互动。调查发现,相比于非网民,网民往往更多地通过其他的媒介,尤其是电话,来与别人沟通,与朋友见面也比非网民多,整体上就是与别人有更多的互动(Katz et al. 2001)。

小结:接近的冲动?

即使间接沟通越来越多,人类似乎仍然珍视直接接触。例如,有时明明通过电话会议或视频连接做生意更加省钱也更有效率,可是做生意的人还是不断地开会,有时还要飞越半个地球去开会。家庭成员可以通过电子实时沟通来安排“虚拟”团聚或假日聚会,但我们都明白,那将缺乏面对面欢聚的温暖和亲密。

戴尔德利·博登和哈维·莫洛奇对这一现象给出了一种说明。他们研究了所谓的接近的冲动,即个体有一种在大家共同在场或者面对面互动的情境下与别人相见的需要。博登和莫

洛奇说,人们自己主动出来参加会面,是因为出于戈夫曼在其有关互动的研究中所列出的理由,关于别人如何思考,如何感受,是否真诚,共同在场的情境所能提供的信息比任何电子沟通形式都要丰富得多。只有通过实实在在地站在那些其决策对我们有重大影响的人面前,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才有把握用我们的观点和诚意打动他们。博登和莫洛奇说,“共同在场使我们能够运用身体上‘从不撒谎’的那个部分——眼睛,也就是‘心灵的窗户’。眼神接触本身就表明某种程度的亲近和信任;共同在场的互动各方都在不断地监控着身体这一最敏感部位的细微运动”。(Boden and Molotch 1994)

本章要点

- 1 我们的日常行为中很多看似琐碎的方面,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是社会互动中复杂而重要的方面。一个例子就是凝视,即盯着某人看。在绝大多数互动中,眼神的接触都是一瞥而过的。盯着另外一个人看,既有可能被当成是怀有敌意的征兆,在某些场合下,又有可能被当成是示爱。在社会学中,有关社会互动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可以说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 2 人脸可以传达各种各样的表情。一般认为,面部表情的基本方面是天生的。跨文化的研究也证明,不同文化的成员在面部表情和对人的面部情绪的解释上都相当接近。
- 3 对日常说话和交谈的研究后来被称为常人方法学。这一术语是加芬克尔首创的。常人方法学分析的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尽管通常是理所当然地——理解他人言行的意义。
- 4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反应性惊呼”(呼叫)而了解许多有关谈话实质的东西。
- 5 无焦点的互动是指在大型集会中,个体之间在彼此没有直接交谈的情况下的相互觉察。有焦点的互动可以分成独立的接触或者说互动片段,出现在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体直接关注对方或其他更多人的言行的时候。
- 6 采用拟剧论模型可以对社会互动进行富有启发的研究,也就是把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当成有场景和道具的舞台上的演员。像在剧院中一样,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背景都有前台(舞台本身)和后台的明确划分,而后台则是演员们演出前准备和演出后放松的场所。
- 7 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确立特定情境的。我们可以通过结合考察我们的活动如何在确定的时段发生,如何同时又包括空间上的活动,来分析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被“分区”的。

8 社会互动的某些机制可能是普遍性的,但许多也不是。比如非洲南部的昆族人,以小型流动群体的形式生活,没有什么私密性,因此也没有什么机会创造前台和后台。

9 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缺乏任何共同在场

形式的间接的人际交往为特征的(比如银行存款)。这就导致了所谓接近的迫力,即只要有可能就希望与人会面的倾向,原因或许在于这更容易搜集有关他人如何思想和感受的信息,并实现印象管理。

思考建议

1. 如果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共享的背景假设,社会生活是否可能?
2. 一个游客对你家乡的看法会与你有何不同?
3. 在教室中实施“蓄意破坏互动”有多容易呢?
4. 你怎样才能“看上去充满自信”?
5. 在酒吧和咖啡馆,女性这方面会使用哪些策略来表明她们希望独处?
6. 电子沟通能够取代面对面互动吗?

阅读指南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 《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一探》

Stanley Cohen and Laurie Taylor,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95). 《逃避的努力:抵抗日常生活的理论与实践》

Erving Goffman,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公共场所中的行为》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Phil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戈夫曼与现代社会学》

网络导航

非言语沟通网页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ages)

<http://www.natcom.org/ctronline/nonverb.htm>

符号互动论介绍 (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http://web.grinnell.edu/courses/soc/s00/soc111-01/IntroTheories/Symbolic.html>

Ethno/CA 动态 (常人方法学和谈话分析的网上资源) [Ethno/CA News (online resource for ethnomethodolog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http://www2.fmg.uva.nl/emca/>

欧文·戈夫曼网站 (Erving Goffman Website)

<http://people.brandeis.edu/~teuber/goffmanbio.html>

目录

第一节 文化、社会与儿童社会化	133
6.1.1 儿童发展理论	133
6.1.2 社会化中介	135
第二节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138
6.2.1 父母与成年人的反应	138
6.2.2 社会性别习得	138
6.2.3 故事书与电视	139
6.2.4 非生理性别化育儿的困难	139
6.2.5 社会学角度的论争	140
第三节 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	142
6.3.1 孩童期	143
6.3.2 青少期	143
6.3.3 青壮期	144
6.3.4 壮年期	144
6.3.5 老年期	144
第四节 老年化	145
6.4.1 英国社会的老龄化	146
6.4.2 人们如何步入老年?	146
6.4.3 逐渐衰老:多种相争的社会学说明	150
6.4.4 英国老年化的特征	151
6.4.5 老年化的政治化	155
6.4.6 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160
本章要点	162
思考建议	163
阅读指南	164
网络导航	164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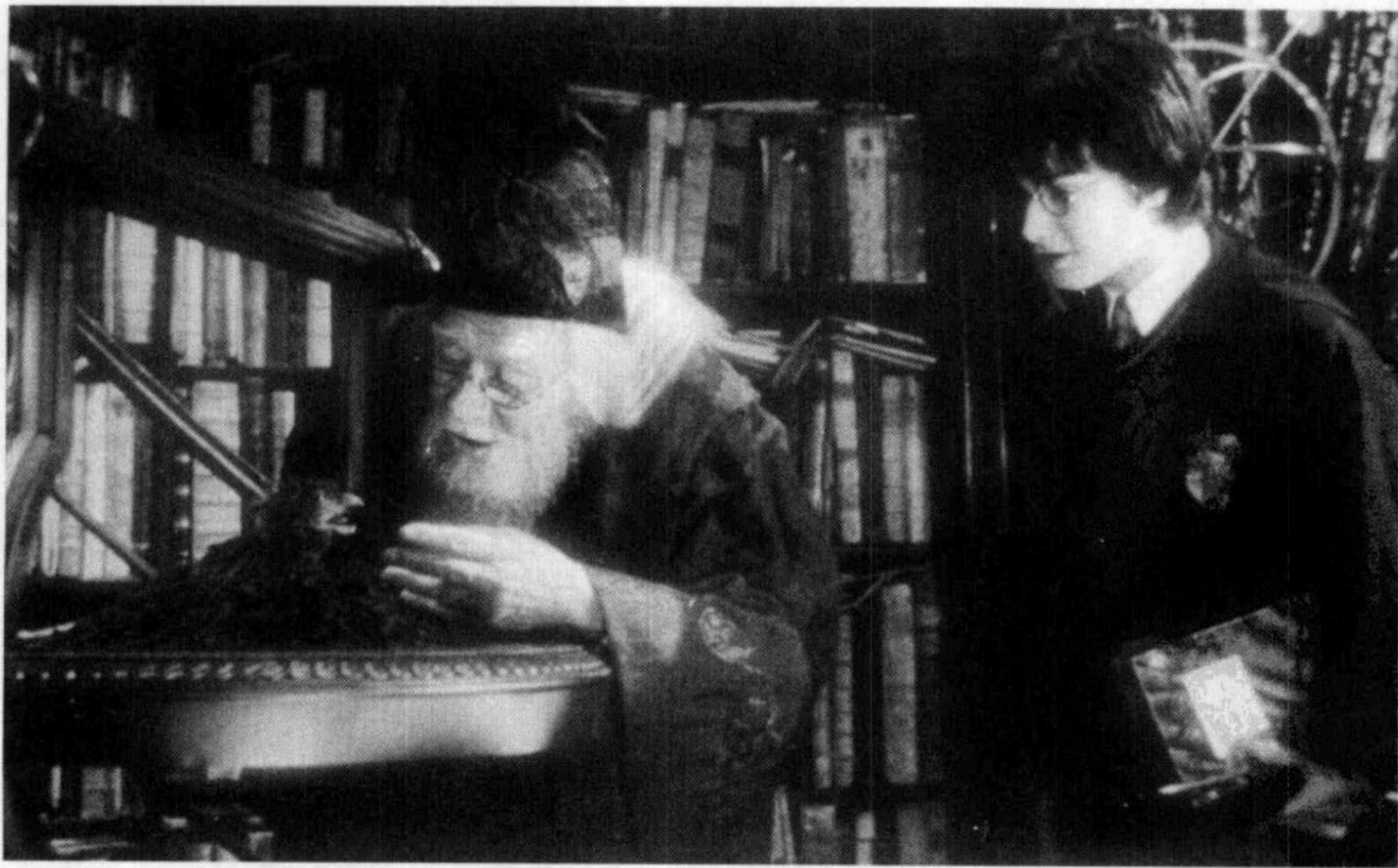
社会化、生命历程与老年化



在 J.K. 罗琳写的哈利·波特历险记第一卷《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的开头, 精明的魔法师邓不利多把刚刚失去双亲的孤儿哈利留在他不懂魔法[或者叫做“麻瓜”(muggle)]的叔叔婶婶的屋门口。哈利已经展现出自己有异乎寻常的法力, 可是邓不利多担心, 如果继续呆在魔法世界, 哈利就不能健康地成长。他说: “不能把一个孩子弄得忘乎所以就算了。他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就出名了! 为着他根本不会记得的东西! 你难道看不出, 如果在成长中摆脱所有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的东西, 他

会变得好得多么?” (Rowling 1998)。

哈利·波特小说系列每一本写了哈利的一学年, 所根据的原则就是: 最大的历险就是成长本身。尽管哈利上的是霍瓦茨魔法学校 (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但它毕竟还是所学校, 因为里面每一个人, 哪怕是法力巨大的年轻魔法师, 也需要别人帮助培养一系列的价值观念。我们都经过这些重要的生命阶段: 从儿童过渡到青少年, 再从青少年过渡到成年。因此, 随着哈利·波特系列的推进, 哈利感受到了性冲动的萌发, 对此, 他的反应是一种完全同于常人的困惑。对于许多孩子来说, 游戏都是学习了解友情和抱负的一块重要场所, 因此哈利也玩魔法游戏“魁地奇”^①。罗琳喜欢使用超自然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看到, 在日常生活的状况背后, 隐藏着摄人心魄的复杂性。在她笔下的世界中, 猫头鹰准确无误地传递着信件: 这难道真比邮政系统或电子邮件更加奇怪吗? 所有经典的儿童故事都具有帮助理解成长过程的功能, 无论它们是发生在一个童话世界中, 还是发生在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



① 原文为 Quidditch, 按照罗琳的说法, 是巫师在飞天扫帚上玩的球类运动。

中，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正是哈利·波特系列的新颖之处。

社会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无助的婴儿逐渐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有认知能力的人，并熟练掌握他或她生于其中的文化的习俗。年轻人中的社会化促成了更加宽泛的社会再生产现象——社会积累起结构延续性的长期过程。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生命的早期，儿童向其年龄大的人们学习习俗，并就此延续了后者的价值、规范和社会惯例。所有的社会都具有许多长期延续的特性，即使它们的成员作为个体生生死死，变动不止。就像英国社会，就有许多别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特性世代相传，主要说的是英语这一事实就是一例。

本章我们将会看到，社会化使不同的世代相互联结。一个婴孩的出生改变了那些负责养育他的人的生活，而且这些人自己也开始经历新的习得体验。所谓为人父母，就是要在他们以后的生命中把自己作为成年人的活动与孩子联系在一起。当然，老年人在当上了祖父母之后还仍旧是父母，由此而造就了把不同的世代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一套关系。尽管婴儿期和儿童早期的文化习得过程比日后要密集深入得多，但习得和调适会延续整个生命周期。

以下各节将讨论“自然与教化”(nature versus nurture)这一主题，这是社会学中常见的一项争论。我们还将考察不同的论者就儿童如何发展和为何如此发展提出的主要理论解释，包括说明我们如何发展出性别认同的理论。然后我们将讨论，从儿童期到日后，在人的一生当中，影响社会化的主要群体与社会背景。最后我们将要看看一些最重要的有关老年化的社会学话题。

第一节 文化、社会与儿童社会化

6.1.1 儿童发展理论

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最独特的性质之一就是人类是自觉的(self-aware)。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自我感的形成，即意识到个体具有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的认同？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婴儿对于人与自己周遭环境中的物质客体之间的区别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也没有丝毫自我意识。儿童直到两岁或者更往后，才开始使用“我”(I)、“自己”(me)和“你”之类的概念^①。他们只是逐渐才认识到，其他人的认同、意识和需要都与自己的不同。

自我的形成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各种矛盾对立的理论视角对此的看法也是非常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有关儿童发展的最有名的一些理论各自强调了社会化的不同方面。美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关注的主要是儿童如何学习使用“我”和“自己”的概念，瑞士儿童行为学家让·皮亚杰研究了儿童发展的许多方面，但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关于认知的，也就是儿童通过哪些方式学习思考自身及其环境。

一 G.H.米德与自我的发展

因为米德的观念构筑了符号互动论这股宽泛的理论思维传统的主要基础，所以对社会学的影响非常广泛。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通过符号以及对于意义的解释而发生的(参看第一章)。但除此之外，米德的研究还阐述了儿童发展的一些主要阶段，尤其

^① 即“主我”/“主体我”与“客我”/“客体我”/“宾我”的概念。

关注自我感的形成。

根据米德的说法,婴幼儿首先是通过模仿周围人的行动,发展为社会存在的。这个过程发生的方式之一就是玩耍(play)。在玩耍中,幼儿常常模仿成年人之所作所为。幼儿看过成年人做馅饼,就会用泥巴做馅饼,看过别人除草松土,就会用小勺小铲挖洞。儿童的玩耍会从简单的模仿演进为比较复杂的游戏(game)。在游戏中,一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就会扮演一种成年人的角色。米德把这种“扮演他人角色”称为学习站在另一个人的角度上考虑。只是在这个阶段上,儿童才获得了一种有一定发展的自我感。儿童通过从别人的眼中看自己,开始把自身理解为各个分离的行动者(agents),也就是“客我”。

在米德看来,一旦我们学会区分“主我”与“客我”,也就获得了自我觉知。“主我”是未经社会化的婴儿,是一堆自发需要和欲望的聚合。而米德所使用的“客我”这个术语,则是社会自我。米德认为,个体通过以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发展起自我意识。根据他的说法,儿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在八九岁的时候。儿童在这个年龄往往会参与有组织的游戏,而不是散漫的玩耍。他们在这个时期开始理解社会生活赖以开展的整体上的价值与道德。而要学会有组织的游戏,儿童就必须理解游戏规则,理解公正和平等参与的观念。这个阶段的儿童学会把握米德所称的一般化他人概念,也就是儿童在其中发展的那个文化的一般性价值和道德规则。

二 让·皮亚杰与认知发展各阶段

皮亚杰非常强调儿童积极领会世界的的能力。儿童们并不是被动地吸收信息,而是对他们从周遭世界中看到、听到和感到的东西有所选择并解释。皮亚杰描述了几个独立的认知发展阶段,儿童通过这样的认知发展学会思考他们自身及周遭环境。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获得

新的技能,并有赖于前一个阶段的成功完成。

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延续到大约两岁,皮亚杰称之为感觉运动阶段,因为婴儿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触碰客体对象、把弄它们,从物理上探究它们的周遭环境。在约摸四个月大之前,婴儿还不能把自己和周遭环境区分开来。比如说,一个儿童不会认识到,正是她自己的运动导致了她的小床栏边发出响声。物体对象还没有和人分开,而婴儿也对任何不在其视线之内的东西没有觉知。婴儿是逐渐学会把人和物体对象区分开来,开始认识到,无论是人还是物体对象,都具有某种独立于自己的直接感知的存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在于,儿童在该阶段结束时理解了自己的周遭环境具有独立而稳定的特性。

下一个阶段称为前运演阶段。这也是皮亚杰重点研究的阶段。该阶段从两岁持续到七岁。在此阶段中,儿童们获得了对于语言的把握,开始能够以符号象征的方式,使用词语来表示物体和形象。比如说,一个四岁大的孩子可能会用大幅度的挥手动作来表示“飞机”这个概念。皮亚杰之所以称该阶段为“前运演”,是因为儿童还未能够系统地运用他们尚在发展中的心智能力。这个阶段的儿童是自我中心性的。根据皮亚杰的用法,这个概念指的不是自私,而是儿童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世界的倾向。比如说,这个时期的儿童还不理解,其他人看待客体对象的视角是与自己的视角不同的。儿童会直举着一本书,询问里面的一幅图画,而没有意识到,坐在对面的另一个人只能看到书的背面。

处在前运演阶段的儿童还没有能力与另一个人展开连贯的对话。在自我中心的言说中,每个儿童所说的东西与另一个人所说的多少有些缺乏联系。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对于成年人往往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思维范畴,比如因果、速度、重量或数目之类的概念,儿童却没有任何一般性的理解。假如儿童看到水从一个高而窄的容器倒入一个矮而宽的容器,她并不

会理解到水量保持不变,而会得出结论,认为水变少了,因为水位变低了。

第三个时期叫做具体运演阶段,从七岁持续到十一岁。在这段时期,儿童把握了抽象逻辑观念。他们有能力不太费劲地处理因果性之类的观念。除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儿童会认识到,所谓宽的容器比窄的容器盛的水少,这种想法所蕴含的推理是错误的,即使水位确实有所不同。她开始有能力进行减、乘、除的数学运算。儿童到了这个阶段,自我中心性就弱得多了。在前运演阶段,如果问一个女孩“你有几个姐妹?”她或许会正确地回答“一个”。而如果问她“你的姐妹有几个姐妹?”她或许会回答“没有”。因为她还不能从她姐妹的立场出发来看她自己。而具体运演阶段的儿童回答这类问题就不用费什么力气。

从十一岁到十五岁这几年属于皮亚杰所称的形式运演阶段。在青春期,发展中的孩子开始有能力把握高度抽象和假设性的观念。当这个阶段的孩子面对一个问题时,有能力评论所有可能的解决方式,从理论上预演一遍,以便求得解答。处在形式运演阶段的年轻人有能力理解为什么有些问题是骗人的把戏。对于“什么动物既是卷毛狗又是犬?”某人或许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但会理解为什么正确的答案是“卷毛狗”,并且能够体会个中的幽默。

根据皮亚杰的看法,头三个发展阶段是普遍的。但并不是所有成年人都会达到第四个阶段即形式运演阶段^①。形式运演思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学校教育的过程。而教育成就有限的成年人在思维的时候,往往继续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并且留有更多自我中心主义的痕迹。

6.1.2 社会化中介

社会学家经常说社会化发生在两个宽泛

的阶段,涉及许多不同的社会化中介。所谓社会化中介,指的是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化过程在其中发生的那些群体或社会背景。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发生在婴儿期和童年期,是文化习得最集中的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儿童习得了语言和基本的行为模式,为以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家庭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中介。次级社会化(secondary socialization)发生在儿童阶段晚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期。在这个阶段,其他社会化中介接管了家庭的某些职责。学校、同龄群体、组织、媒体,最后是工作场所,成为个人社会化的主要力量。在这些背景中的社会互动帮助人们学习组成其文化模式的价值观、规范和信仰。

一 家庭

由于家庭体制千变万化,所以说,婴儿所体验到的家庭接触的具体程度如何,在各文化之间绝不是标准如一的。一般情况下,无论什么地方的母亲都是儿童早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但在母子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却受到她们接触的形式和频率的影响。而这又进而受到家庭制度的性质的调节,受到家庭制度与社会中其他群体之间关系性质的调节。

在现代社会中,最早的社会化发生在小范围的家庭背景中。大部分英国儿童都是在一种家庭单元中度过自己的早年,包括母亲,父亲,或许还有另外一两个孩子。与此相反,在其他许多文化里,三姑六姨,叔伯舅舅,爷奶姥姥,常常都属于一整个大家庭,甚至从婴儿很小开始就负责照看。即使在英国社会里,在家庭背景的性质方面也有许多变异。有些孩子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而有些孩子则受到了两个母方行动者和父方行动者的照看(已离异的父母和继父母)。家庭中的女性现在有很高

^① 原文误为第三个阶段。

的比例是先在家外面就业,并在孩子出生后很快回到有薪劳动的岗位上。尽管有这些变异,但在一般情况下,家庭始终还是社会化的主要中介,从婴儿期,到青春期,乃至更往后,这正是关乎世代继替的发展顺序。

我们将在第七章中更详细地讨论有关家庭的话题。

在一个社会里的各项制度中,家庭的“定位”不尽相同。在绝大多数的传统社会里,一个人出生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在此后一生中的社会位置。而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位置并不是以这种方式生而继承的。不过,一个人出生的家庭所属的地区与社会阶级仍然对社会化的模式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儿童不经意之间学会了他们父母以及邻里或社群中其他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

我们将在第九章中更深入地探讨与阶级有关的话题。

在大规模的社会不同区域,儿童的养育与调教模式各有不同,而所蕴含的价值与期望也差别甚远。比如一个孩子生长在穷困的少数民族家庭,居住在一座城市的衰败地区,而另一个孩子出生在郊区的富裕白人家庭,比较两者,如果我们想想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就不难理解家庭背景的不同类型所产生的影响(Kohn 1977)。

当然,即使真的有孩子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其父母的眼光,那也是屈指可数的。现代世界变迁如此普遍,情况就尤其是这样。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化中介,这本身就导致了儿童、青少年和父母辈之间眼光的许多分歧。

二 学校

学校是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化中介。学校教育是一种正式过程:学生们完成确定的必修科目体系。但学校之所以作为社会化中介,还体现在一些更微妙的方面。孩子被期望在课堂上保持安静,按时完成作业,遵守学校规章。他们被要求接受教员的权威并做出回应。而教师的反应也会影响孩子们对于自己的期望。这些期望又会与他们离开学校后的工作经历相联系。学校中常常形成同龄群体,而依照年龄给孩子们分班的体制更加强了同龄群体的影响。

我们将在第十七章中详细讨论教育中的社会化。

三 同龄关系

另一种社会化中介是同龄群体。由年龄相似的孩子组成同龄群体。在有些文化里,特别是那些小型的传统社会里,同龄群体被正式划为年龄等级(通常限于男性)。常常会有一些特定的典礼或仪式,标志着男人从一个年龄等级到另一个年龄等级的过渡。处在某一特定的年龄等级中的那些人,一般一生都会维持密切的友谊关系。典型的年龄等级序列包括儿童期、初级武士期、高级武士期、初级长辈期、高级长辈期。男人在历经这些年龄等级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整个群体。

家庭在社会化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婴幼儿的经验多少可以说是完全在家庭中形成的。但同龄群体的重要性究竟如何,却不那么明显,对于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即使没有正式的年龄等级,孩子过了四五岁,通常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和同龄的朋友们呆在一起。现在有相当比例的女性

进入了劳动大军，而小孩们在幼儿园一起玩耍，有鉴于此，今天的同龄关系比以往就更加重要了(Corsaro 1997; Harris 1998)。

社会学家芭莉·索恩在其《性别游戏》一书(Barrie Thorne 1993)中就是从这个角度讨论了社会化。她和此前的其他学者一样，也希望搞清楚孩子们怎样了解到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儿的(你将在本章稍后的第二节第五小节了解到关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化的三种经典理论)。但芭莉不是把孩子看成从其父母和老师那里被动习得性别的意义，而是探讨孩子们在彼此的互动中，如何积极主动地创造和再创造性别的意义。学童们一起完成的社会活动可以发挥和其他社会化中介一样重要的作用。

索恩花了两年的时间，在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两州的两所学校观察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她和学生们一起上课，并观察他们的课外活动。她观察了“抢亲嘴”(chase and kiss)之类的游戏，在英国这个游戏叫做“抢嘴亲”(kiss-catch)。她想从中了解孩童们是怎样在课堂上、在游乐中建构并体验性别意义的。

索恩发现，同龄群体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化影响巨大，当孩子们谈论他/她们身体上的变化时尤其如此，而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话题。这些孩童所创造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的身体变化是又羞又窘还是得意洋洋。根据索恩的观察(Thorne 1993)：

如果最受欢迎的女性们都月经初潮，或者开始戴胸罩(即使她们还并不需要戴)，那么其他女孩也都想要发生这些变化。可是，如果最受欢迎的女性还没有戴胸罩，还没有……定期来潮，那这些发育就会被视为不怎么值得追求了。

索恩的研究有力地提醒人们注意，孩童也是社会行动者，积极主动地创造着自己的社会

世界，影响着自己的社会化。当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还是具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孩子们的活动及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都受到他/她们的家庭及传媒等因素的强烈作用。

同龄关系很可能在孩童期和青春期结束后还维持重要的影响。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其他情境中，年龄类似的人们所组成的非正式群体都常常发挥持久的重要作用，塑造个人的态度和行为。

四 大众传媒

从19世纪初期开始，新闻报纸和期刊杂志在西方有了蓬勃的发展，但它们的读者面还比较有限。直到一个世纪之后，这些印刷材料才进入千百万大众的日常经验，影响了他们的立场和意见。印刷文本方面的大众传媒普及不久之后，就伴随着电子传播——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和录像机。晚近调查发现，英国的男人和女人平均每天花费在看电视、录像或光碟上的时间分别为2.41小时和2.17小时(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05)。传媒在塑造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评价电视节目对于它们影响到的受众特别是孩童所产生的效果，已经做了许多研究。或许最常见的研究课题就是关于电视对犯罪和暴力倾向的影响。耗时最长的研究是由乔治·格布纳及其合作者们实施的。他们自1967年以来，每年都对美国各大电视网在黄金时间和周末白天播出的电视节目内容进行抽样分析。他们将各种暴力行为及情节出现的数量及频率按电视节目的不同类型分表列出。在这项研究中，暴力被定义为对自我或他人使用武力，并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在各类节目中，电视剧具有比较高的暴力倾向：平均有80%的电视剧包含有暴力情节，平均每小时出现7.5个暴力镜头。在儿童类电视节目中虽然凶杀的场面相对少些，但暴力镜头出现的频率却更高。卡通片中的暴力行为及情节是所有电视节

目类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Gerbner 1979)。

大致而言,有关电视对于受众的效应的研究,往往认为儿童对于自己看到的东西的反应是被动的,是不加分辨的。但罗伯特·霍奇和大卫·特里普强调,儿童在看电视时的反应,不仅是简单地注意到电视节目的内容,更会对所看到的東西进行解释或“解读”(Hodge and Tripp 1986)。他们指出,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到儿童心智活动过程的复杂性。看电视,即使是看一些内容简单的节目,也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本质上不费脑子的活动。孩子们会将电视节目与他们日常生活中其他一些意义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解读。根据霍奇和特里普的看法,对行为产生效应的并不是暴力本身,而是如何表现和解读暴力的总体态度框架。

第十五章第四节将讨论传媒受众的反应。

第二节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各种社会化中介在孩童如何习得性别角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现在来看看对于社会性别的社会化的研究,即借助家庭和传媒等社会因素来习得性别角色。

6.2.1 父母与成年人的反应

有关性别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关于母婴互动的研究揭示了,即使父母认为他们对于男孩和女孩的反应是一样的,其实也是有差异的。如果要求成年人评定一个婴儿的人格特征,根据他们认为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回答就会不同。在一项实验中,观察了五位年轻的母亲

是如何与一名叫贝丝(Beth)的半岁女婴互动的。她们常常对她微笑,给她娃娃玩。她被看成是“甜甜的”,“哭得柔柔的”。而第二组母亲对一个叫亚当的同龄男婴的反应则有明显的不同。亚当很可能得到一列火车之类的“男性玩具”来玩。实际上,贝丝和亚当是同一个婴儿,只是穿着不同的衣服罢了(Will et al. 1976)。

6.2.2 社会性别习得

婴儿的社会性别习得几乎可以肯定是无意识的。在孩童能够准确地标定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之前,就已经接收到了一系列前言语的暗示。比如说,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对于婴儿的处置方式通常是不一样的。女性使用的化妆品所带有的气味,不同于婴儿有可能学会与男性联系在一起的气味。服饰、发型等方面的系统差异为婴儿在习得过程中提供了视觉上的线索。到了两岁,孩子就会对社会性别的涵义有了一定的理解。他们知道自己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并且通常也能准确地为别人归类。不过,一个孩子要等到五六岁,才会知道一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不会变的,^①每个人都有一种社会性别,而女孩与男孩之间的生理性别差异则有着解剖学上的基础。

小孩子们接触到的玩具、图画书和电视节目往往都会强化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之间的差异。玩具店和邮购商品目录通常会根据社会性别来对它们的商品进行分类。即使有些玩具看起来是社会性别中立的,但在实践中则并非如此。比如说,玩具小猫和小兔会推荐给女孩,而玩具狮子和老虎会被认为更适合男孩。

菀达·露西娅·詹穆娜(Zammuner 1986)研究了意大利和荷兰两国七岁到十岁之间孩童的玩具选择偏好。研究分析了孩童对于一系列玩具的态度,既包括在刻板印象中属

① 此处原文如此。

于男性特质的玩具和女性特质的玩具,也包括被视为不具有社会性别类型的玩具。同时询问了孩童本身及其父母,什么样的玩具分别适合于男孩和女孩。成人和孩童之间有着密切的共识。就平均而言,意大利的孩子比荷兰的孩子更经常地选择社会性别分化的玩具来玩。这个结论也是符合预期的,因为相比于荷兰社会,意大利文化更倾向于坚持一种比较传统的社会性别区分观念。和其他研究的情况类似,来自这两个社会的女孩选择社会性别中立的玩具或男孩的玩具来玩的情形,都远远多于男孩选择女孩玩具的情况。

6.2.3 故事书与电视

30多年前,莱奥诺雷·韦茨曼和她的同事们(Weitzman 1972)做了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最流行的学龄前儿童书籍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并发现了这方面一些明显的差异。在故事和图画中,男性比女性扮演的角色分量要大得多,比例高达11比1。而如果考虑动物中的社会性别认同比,则比例更达95比1。男性的活动与女性也不一样。男性从事更具冒险性的探索,进行户外活动,要求独立和力量。而在出现女孩的地方,就会被描绘为被动的,基本上限于室内活动。女孩为男性烧水做饭、洗衣扫地,或者就是等着他们的归来。故事书里所体现的成年男人和女人也基本如此。女人如果不是妻子和母亲,就会是想像中的生灵,比如女巫或仙女。在所分析的书中,没有一位女性在家庭外面有一份职业。与此相反,男性都被描绘成战士、警察、法官、国王等等。

更晚近的研究表明,情况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儿童文学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一样(Davis 1991)。比如说,童话故事体现出传统上如何看待社会性别,如何看待女孩和男孩被期待拥有什么样的目标和抱负。“会有那么一天,王子来到我身边”——多少个世纪以来,在各式各样的童话故事里,这个意象通常

都意味着,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也可以梦想财富与幸运。而在今天,它的意义则更紧密地联系到对于浪漫之爱的理想。有些女性主义者也试图重写一些最有名的童话故事,扭转它们通常强调的重点:“我真没注意到,他的鼻子也太可笑了。他要是穿上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肯定还会好看得多。比起那个晚上他的样子,他的魅力差远了。所以我想,我只能假装这只水晶鞋太紧了。”(Viorst 1986)然而,和这个新版《灰姑娘》一样,这些重写的故事主要收在面向成年读者的书里,对于难以计数的儿童书籍中讲述的故事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对于面向儿童的电视节目的分析尽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也基本符合从儿童书籍中得出的结论。对于观众最多的卡通节目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男性主导着积极的探索活动。而在节目播放过程中出现的商业广告里,看到的也是类似的形象。

6.2.4 非生理性别化育儿的困难

琼·斯泰瑟姆(Statham 1986)研究了一群奉行非生理性别化育儿模式(non-sexist child-rearing)的父母的经历。来自18个家庭的30位成年人参与了研究,他们的子女年龄从半岁到十二岁不等。这些父母都属于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从事的是中小学教师或大学教授之类的学术工作。斯泰瑟姆发现,大多数父母在试图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时,并不只是简单的让女孩看起来更像是男孩。他们是想培养一些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融合产物。他们希望让男孩对他人的感受更加敏感,有能力表达关爱,而女孩则被鼓励主动寻求机会去学习和自我改进。所有的父母都发现,很难挑战既有的社会性别习得模式。他们劝说孩子们玩那些没有社会性别定型的玩具,这方面倒还算成功,但就连这一点也比他们中许多人原本预想的要困难。有一位母亲这样告诉研究者:

你要是走进玩具店,里面给男孩玩的都是战争玩具,给女孩玩的都是居家玩具。这概括的正是社会的样子。孩子们就是这样被社会化的:教给男孩打打杀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很可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能不进玩具店就不进,我恼了。

现在是有了一些故事书,里面能看到主角中有坚强有力、独立自主的女孩,但不按传统路数来描绘男孩角色的还是几乎没有。一个五岁大男孩的母亲谈了当她给儿子讲故事时,倒转了人物的生理性别,她儿子是如何反应的:

我在讲一本书的时候,书里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非常传统的角色,但我把所有的“他”都换成了“她”,所有的“她”都改成了“他”。说实话,孩子有些不舒服。我刚开始这么干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你不喜欢男孩,只喜欢女孩。”我只好解释说不是这样的,就因为写女孩的东西不够多。(Statham 1986)

小说家兼评论家艾莉森·皮尔逊 (Pearson 2002) 也发现,当她尝试给自己女儿一个解剖学上正常一些的娃娃,而不是女儿喜欢的芭比娃娃的时候,才觉得社会性别的社会化是如此的强大:

为了对抗这种有害的趋势,有一天,我拿回家一个北欧娃娃,看起来像是由一个女性主义委员会设计的芭比娃娃:这个娃娃英姿飒爽,胸部平平,一身卡其布,明显是在发展中国家做什么有益的事情。唉,这个可怜的社会民主党人根本就没有遇上芭比娃娃。“这是个男孩!”我女儿厌恶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把这个开明的折中之物扔进了她小

哥哥用来淹蜗牛的桶里。

显然,社会性别的社会化非常强劲,要挑战它会让人沮丧不已。一旦被“指定”了社会性别,社会就会期待个体的行为举止有“女人味”、“男子气”。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这些期望得到了履行和复制 (Bourdieu 1990; Lorber 1994)。

6.2.5 社会学角度的论争

一 弗洛伊德的理论

有关社会性别认同的形成,最有影响也是最具争论的理论,或许就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Freud 1856—1939) 的理论。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婴儿和幼儿时期关于性别差异的学习,焦点就在于有没有阴茎上。“我有个小鸡鸡”就等于“我是个男孩”,而“我是个女孩”就等于“我没有小鸡鸡”。弗洛伊德认真地说,这里的关键不仅仅是解剖学上的差别,而且有没有阴茎也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象征。

该理论认为,在大约四五岁的时候,男孩开始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威胁,父亲要求他要有纪律性和自主性,他还会想像父亲要拿掉他的小鸡鸡。在部分是有意识、而多半则是无意识的层面下,男孩把父亲当成与他竞争母亲关爱的对手。在压抑对母亲的性爱情感、接受父亲作为地位更高的存在的过程中,男孩认同了父亲,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男孩出于一种认为父亲会阉割他的无意识恐惧,放弃了对于母亲的爱恋。而在另一方面,女孩恐怕就要承受一种“阴茎妒羡”(penis envy),因为她们并不拥有外在可见的可以区别于男孩的器官。在小女孩的心目中,母亲的价值也被降低,因为母亲看来既没有也无法提供一个小鸡鸡。当女孩与其母亲相认同时,她是将其作为“退而求其次”(second best) 的选择而温顺地接受的。

一旦这个阶段结束,孩子就学会了压抑其性爱情感。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从大约五岁至青春期这段时间是一个潜伏期,性的活动一般被悬置起来,直到青春期的生理变化直接激活了性爱的欲望。这个潜伏期涵盖了整个学龄早期和中期,也是同性的同龄群体在孩子生活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时期。

对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已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但也有许多来自其他方面的论家(Mitchell 1975; Coward 1984)。首先,弗洛伊德似乎过于将社会性别认同视为对生殖器的意识,而其他更微妙的因素肯定也应该涉及。其次,该理论似乎依赖于阴茎比阴道优越(后者被认为仅仅是男性器官的缺失)这一看法。那么为什么不认为女性生殖器优越于男性生殖器呢?第三,弗洛伊德把父亲看成是主要的规训中介,然而在许多文化中,在强加规训方面起着更重要作用的却是母亲。第四,弗洛伊德认为,社会性别习得集中在四、五岁,而多数后来的研究者却强调从婴儿期开始的早期习得的重要性。

二 乔多萝的理论

虽然许多学者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思路来研究性别发展,但他们通常在一些主要方面对其进行修改。一个重要的实例就是社会学家南茜·乔多萝(Chodorow 1978; 1988)。乔多萝认为,学习感觉是男性还是女性,来自于婴儿早年对父母的依恋。与弗洛伊德相比,她更强调母亲而不是父亲的重要性。小孩子在感情上往往更依恋母亲,因为她很容易成为孩子早期生活中最具主导性的影响源。这种依恋到某一程度会被打破,以便孩童获得一种独立的自我感,即要求孩子成为不过于依赖的人。

乔多萝指出,这个打破的过程在男孩和女孩身上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的。女孩仍然对母亲保持较为亲近的举动,比如能够继续抱她、吻她、模仿她的举止。因为小女孩以及到后来

长大成人,与母亲之间一直没有明显的断裂,并形成了一种与他人更为连贯的自我感。她的认同更可能是通过融合或依靠另一个人的认同而形成的,这个人先是她的母亲,后来是一个男人。根据乔多萝的观点,这有助于形成女性敏感和富于同情心的性格特点。

而男孩的自我感却是通过更彻底地抗拒自己对于母亲的最初依恋而获得的,他们从女性特质的否定方面来逐步锻造自己对于男性特质的理解。他们学着不要“娘娘腔”,或不要成为“妈咪的小乖宝”。结果,男孩相对来说就不太善于与他人亲近;他们养成了以更具分析性的方式来观察世界。他们更积极主动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强调成功,但是他们却压制了理解自己及他人情感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乔多萝倒转了弗洛伊德的着重点。是男性特质而不是女性特质被界定为缺失,即割弃对于母亲的持续性亲密依恋。男性认同是通过分离而形成的。因而,男人在此后的生活中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如果他们陷入与他人密切的感情关系中,他们的认同就会陷入危险。而另一方面,女人觉得要是缺乏与另一个人的密切关系,自己的自尊就会受到威胁。这些模式之所以被世代相传,是因为女性在儿童早期社会化中扮演了首要角色。女性主要是依据与别人的关系来表达和定义她们自己。而男人则压抑这些需求,对世界采取一种更具操纵性的姿态。

乔多萝的作品招来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比如,珍妮特·塞耶斯(Sayers 1986)就认为,乔多萝并没有说明妇女尤其在当代争取个人自主独立的斗争。她指出,女人(及男人)在心理构成上都比乔多萝的理论所蕴示的更具矛盾性。女性特质可能掩盖了咄咄逼人或武断自信的情感,这些情感仅在特定的背景下展现,或者只是模模糊糊地显现(Brennan 1988)。也有论者批评乔多萝的家庭观念狭隘,只是基于中产阶级白人的模式。比方说,在那些单亲家庭里,或在孩子由不止一个成人照看的许多奇卡

诺人家庭里,^①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Segura and Pierce 1993)

这些批评意见并没有贬低乔多萝的思想,它们仍然很重要。这些观念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女性特质的本质的东西,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被称为男性表达无能^②——男人在向别人表露情感时的困难——的根源 (Balswick 1983)。

三 吉利根的理论

卡罗尔·吉利根 (Gilligan 1982) 进一步发展了乔多萝的分析。她的研究焦点在于成年女性和男性对于自身及其成就的想像。她同意乔多萝的观点,也认为女性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界定自身的,并参照关爱他人的能力来判断自己的成就。传统上,女性在男性生活中的地位就是照看者和好伴侣。但在这些任务中培养起来的那些品性,在男人眼中又常常是不屑重视的。他们只认为自己对于个体成就的重视是“成功”的唯一形式。在他们看来,女性这方面对于关系的关注是一种缺陷,而不是事实上的长处。

吉利根对大约 200 位美国妇女和男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她/他们来自不同的年龄和社会背景。她向所有被访者都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其道德眼光和自我概念的问题。女性和男性的观点之间表现出一贯的差异。例如,被访者被问到“说一样事情合乎道德或违背道德是什么意思?”男性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诉诸义务、正义和个体自由等抽象理念;而女性一般都会提到帮助别人这一主题。因此,一位女大学生才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它(道德)肯定和责任、义务和价值有关,但主要是价值。……在我自己的生活情境里,我把道德和人际关系放在一起,它必须尊重别人和我自己。”访谈者问道:“为什么要尊重别人呢?”回答是:“因为她们有意识,有情感,可能受到伤害,一种可能受伤的自觉意识。”(Gilligan 1982)

在做道德评判的时候,女性比男性更具尝试性,更能看到,在严格的道德规则和避免伤害别人之间,有可能存在矛盾。吉利根提出,这种眼光反映的是女性基于关爱关系中的传统处境,而不是男性那种“积极外向”的立场态度。在过去,女性一般是听从男性的评判,同时也意识到她们具备绝大多数男性所不具备的品性。她们对于自身的看法是基于是否成功地达成了他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个体的成就沾沾自喜 (Gilligan 1982)。

第三节 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

个体一生所经历的各种过渡转换,乍看起来似乎是受生物性因素限定的,从孩童期到成年期,最后走向死亡。然而,人的生命历程各阶段既是生物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Vincent 2003)。它们既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也受到给定的社会类型中人生活的物质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在现代西方社会,死亡通常被视为与老年人有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能活过 70 岁。但在过去的传统社会,更多的人年轻轻的就死了,等不及活到老年。

① 奇卡诺人(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操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美国人。

② 原文此处无特殊格式,但书后术语表中有此词条。

6.3.1 孩童期

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孩童期是一生中一个明确的、独立的阶段。孩童有别于襁褓婴儿或学步幼儿,孩童期介于婴儿期和青少年期之间。不过,孩童期同今日社会生活中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也只是在近两三百年以来才形成的。在早先的社会里,年轻人直接从漫长的婴儿期进入共同体中的工作角色。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Ariès 1965)指出,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的所谓“孩童期”,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在中世纪欧洲的绘画中,孩童被刻划成小大人,面容成熟,衣着

式样一如其长辈。孩童承担和成年人一样的劳作,参与和成年人一样的活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想当然认为的玩些儿童游戏。

在西方大多数国家里,直到12世纪,孩子们还是从现在看来非常早的年龄就开始干活。事实上,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不少国家,其中的小孩子承担着全日的劳作,有时候甚至是在物理条件恶劣的环境里(比如煤矿)。所谓儿童有其独立的权利,使用童工在道德上令人义愤横生,这些都是相当晚近的发展了。

第十一章第二节末图文框将讨论童工问题。

由于我们今天认为有一个漫长的孩童期,所以说当今的社会在某些方面比传统社会更以孩童为中心。但是也必须强调,一个社会以孩童为中心,并不等于其中所有的孩童都能体验到来自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爱与关怀。在当今社会的家庭生活中,对于儿童的身体乃至性方面的虐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只是最近才逐渐为人所充分知晓。虐待儿童与我们今天眼中前现代欧洲大量存在的对于儿童的不当处置之间,显然是有关系的。

作为现代社会中目前正在发生的变迁的结果,孩童的独立特性有可能再一次趋于消逝。有些观察家已经指出,现在的孩童成长速度非常快,这种消逝趋势已经是现实了。他们指出,即使是很小的孩子,看的电视节目也可能和成年人一样,因此,相比于前辈世代,他们很早就对成人的世界非常熟悉了。

6.3.2 青少期

“青少年”这个概念^①,今天的我们非常熟悉,却也是直到晚近才存在的。青春期里有关的生理变化(一个人在这个阶段开始有能力



在现代西方社会,十四五岁的孩子(young teenagers)彷徨游移于儿童与成年之间。

^① 这里的“青少年”(teenager)一般指的是13岁至19岁的青春期男女。这是本节的通用术语。

进行成年性活动和生育活动)是普遍的。但在许多文化里,这些生理变化并不会造成在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当中常常看到的那种程度的焦躁和迷惘。比如说,在培养年龄等级的文化里,具有独特的典礼仪式,标志着一个人转向成年,那么心理和性方面的发育过程通常就显得比较容易度过。由于变迁的步伐较慢,对于这类社会中的青少年来讲,^①“弃旧习新”的要求就比较少。在这段时期,西方社会中的孩童被要求不再是孩子了,要把玩具收起来,和孩子气说再见。而在传统社会里,儿童已经在和成年人一起干活了,这个弃旧习新的过程通常会顺利得多。

在西方社会,青少年晃荡在两端之间:他们常常试图效仿成人的做派,但在法律上又被视为孩子。他们可能想要参加工作,但又被约束呆在学校里。西方社会的青少年生活在孩童期与成年期之间,成长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之中。

6.3.3 青壮期

在现代社会,青壮期(young adulthood)似乎越来越成为个人发展和性发育方面的一个特定阶段(Goldscheider and Waite 1991)。特别是在比较富裕的群体里,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花大量时间四处旅行,从性方面、政治上到宗教上广为尝试。这种延缓承担成年期责任的现象意义重大,并且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许多人现在经历的教育年限越来越长。

6.3.4 壮年期

当今西方社会绝大部分的青壮年能够期待得享高寿。而在前现代的时候,很少有人可以如此自信地指望这种未来。无论在哪个群体里,因病或是受伤而死的比例都比今天高得

多。女性的风险尤其大,因为难产率相当高。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一些紧张压力,在从前却不那么明显。相比于今天更具流动性的人口,从前的人们与其父母和亲友之间常常维持着更密切的关系。但今天的人所遵循的工作常规却和前辈没什么两样。目前,婚姻、家庭生活和其他社会背景中诸多重大不确定因素都必须加以缓解。我们必须比过去的人们更加多地“打造”我们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性爱与婚姻的纽带缔造现在有赖于个体的主动进取和积极选择,而不是父母包办。这体现出个体更加自由了,但责任本身也会带来艰难。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到中年而继续保持前瞻,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一辈子都做同样的事情,这和传统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没什么区别。那些以全副精力打造一种职业生涯的人,到了中年会觉得自己所达到的层面不尽如人意,缺乏更进一步的机会。那些把自己的青壮期奉献给了生儿育女的妇女们,当子女长大离家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所谓“中年危机”的现象对于许多中年人来说都是切切实实的。一个人或许会觉得自己抛弃了生活曾经给予的机会,或者再也不能实现儿时珍视的目标。不过,年华渐老也不一定导致默然顺从或灰心绝望,摆脱儿时幻梦也是一种解脱之道。

6.3.5 老年期

在传统社会,老年人常常备受尊崇。在包括年龄等级的文化中,年长者对于共同体的重要事务通常有着主要的发言权,并且经常是决定权。与此相反,在工业化社会里,老年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共同体中,都往往缺乏权威。一旦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就可能比此前一生中任何时候都要穷困。同时,

^① 这里的“青少年”(adolescents)一般指16岁以下的青春期中男女。

总人口中 65 岁以上的人的比例也有巨大的增长,我们在下一节会看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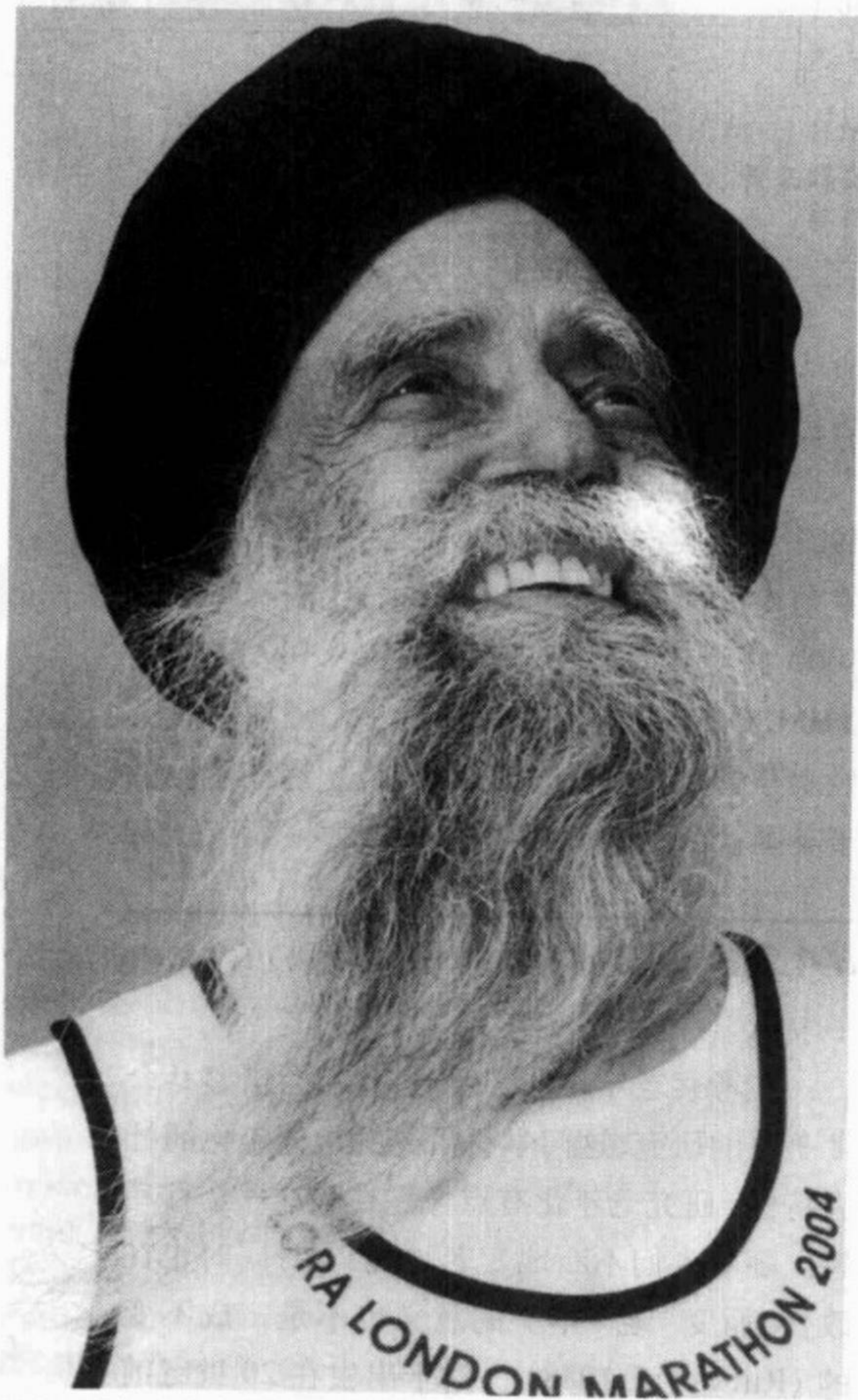
在传统文化中,转向老年人这个年龄等级往往标志着地位达到一个人所能达到的巅峰。而在现代社会中,退休则意味着相反的后果。老年人不再和自己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常常已经从有薪劳动中退休,也许会发现很难使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富有意义。人们习惯于认为,有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老年,是因为转而诉诸其内在资源,减少对于社会生活曾经提供的物质回报的关注。情况的确往往是这

样的,但在一个许多人到了老年依然身体健康的社会里,那种积极外向的眼光也有可能越来越盛行。退休了的人们可能会在所谓的第三龄^①中重焕生机,可以开始一个新的教育阶段(亦参第十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中有关终生教育的图文框的讨论)。在下面一节,我们来更详细地看看有关老年化的社会学问题。

第四节 老年化

法亚·辛格在 2000 年第一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时年 89 岁。他花了 6 小时 54 分跑完全程。而他上一次这样高强度的跑步还是 53 年前的事情。2001 年,他又以几乎一样的时间写下了一次马拉松纪录,发现自己把 90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世界纪录提高了几乎半个小时。到了 2002 年,他把自己的时间缩短至 6 小时 45 分。而在那一年,有 407 位参赛者落在辛格后面完成了伦敦马拉松,其中许多人只有 30 多岁。而辛格在他 30 多岁的时候,跑的是他祖国印度的全国比赛。1947 年印度赢得了独立,新的好机会让辛格在 36 岁上挂靴。到了暮年,辛格失去了妻子,住在伦敦东区的伊尔福德(Ilford)。他有 4 个儿女,13 个孙辈,5 个重孙辈,散居在三个大洲。这时候他开始寻求新的挑战。他开始在每天例行的散步中,间或来几段慢跑。他的双腿很快恢复了曾有的力量。正好辛格看到了一个有关马拉松的电视节目,大为激动。自那以后,他参加了世界各地的马拉松比赛,并募得了数千磅的善款(Askwith 2003)。

相比于以往任何时候,人们现在的寿命都更长,身体更健康,子女也更多。国家越富裕,情况就越是如此。1952 年伊丽莎白女皇登基,向全国的百岁老人发出了 273 份生日贺电。而现在这一数字上升到每年超过 3000 份(Cayton,转引自 Kingshill Research Centre 2002)。步入老年可以是一种富有成就感和意义感的



法亚·辛格九十多岁还在跑马拉松。

^① 原文此处无特殊格式,但书后术语表中有此词条。

体验,就像上面说的这位老人一样;但也可能是生理角度上痛苦萎靡,社会角度上孤僻寡落。而对于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老年体验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本节我们将考察老年化的性质,探究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上步入老年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简要了解一下英国人口是如何变老的,然后考察老年化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特性。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人们是通过哪些方式适应衰老的,至少社会学家是怎么看这个过程的。这将使我们进一步讨论英国的老年化,重点是老年人所面临的一些特殊挑战与问题。我们还要探讨与英国人口的老年化有关的一些政治话题,随着老年人越来越多,这些话题也将越来越重要。最后,我们将讨论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6.4.1 英国社会的老龄化

在世界各地,各社会都在经历老年化。全球人口中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活到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乃至更加长寿,这个过程很可能在 21 世纪延续下去 (Lloyd-Sherlock 2004)。英国的人口也不例外。正如图 6.1 所示,从 1851 年到 1911 年的历次人口普查中,英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均为 5% 左右。而在 20 世纪这一比例增长了两倍。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很多。现代农业、卫生系统、流行病防控、医学发展,这些都有助于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率的降低。在当今绝大多数社会里,婴幼儿夭折的少了,而更多的成年人活到了老年。

根据变动中的人口统计数据,一些社会学家和老年学家提出了人口的“老龄化”(greying, Peterson 1999)。“老龄化”是工业社会中两股长期趋势的结果:一是家庭的子女数趋于降低(第七章将讨论这一话题),一是事实上人们也更加长寿了。英国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900 年时的 45 岁,上升到今天的 76 岁。至于英国女性,在同一时段中的预期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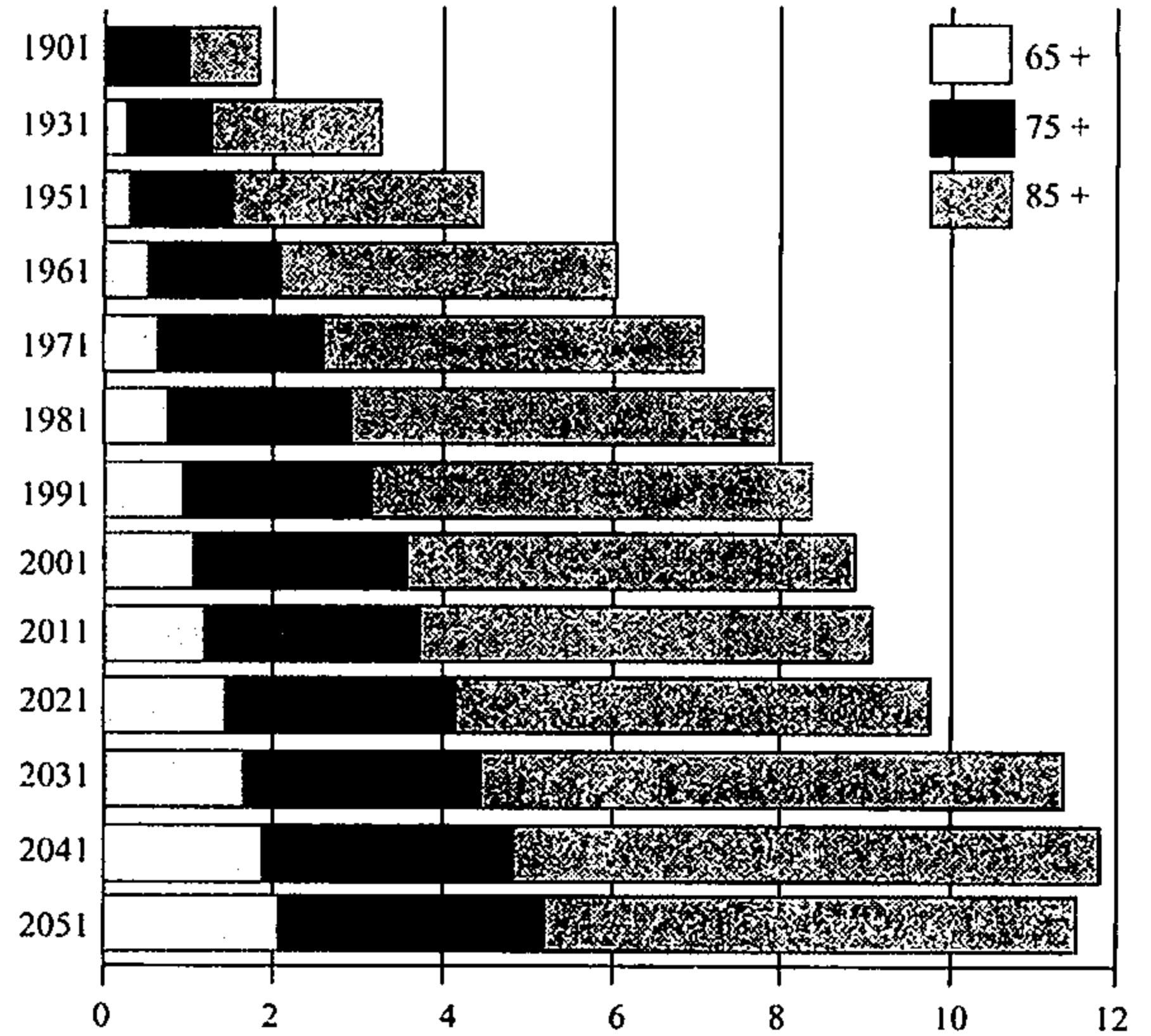


图 6.1 英国的老年人口,1901 年至 2051 年

资料来源:OPCS,转引自 *Sociology Review* 8.2 (1998 年 11 月号),封底,Crown Right

命从 48 岁上升到了 80 岁(参看图 6.2)。这些增长大部分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取得的,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年轻人中存活机会的提高。1921 年,英国每 1000 名婴儿中有 84 例在一岁前死亡,而到了 2002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每 1000 例活产儿中仅有 4.8 例在一岁前死亡 (HMSO 2004)。到 2003 年,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上升到 80.5 岁 (HMSO 2005)。这些趋势对于英国社会的未来意义极其重大。

6.4.2 人们如何步入老年?

在考察老年化的实质时,我们会借鉴社会老年学的研究,这门学科研究的是老年化的社会特性。研究老年化有点像是在瞄准一个移动靶。随着人们不断地变老,社会本身同时也在改变,而变“老”本身的意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Riley et al. 1988)。对于出生在 20 世纪前 25 年的英国人来说,大多数可以获得的工作岗位并不一定需要受过中等教育,而绝大多数的人也并不指望在五十多岁以后还能活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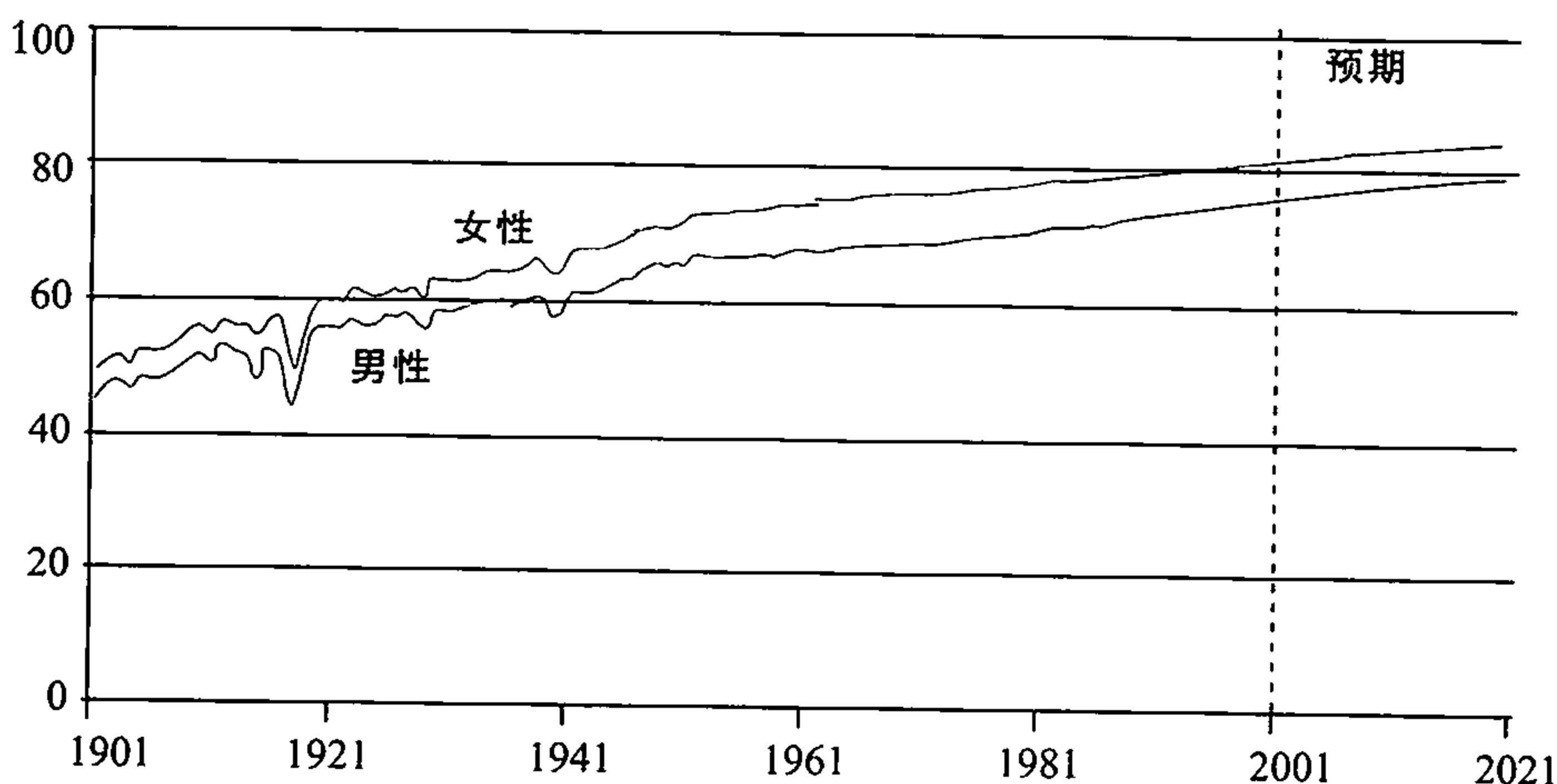


图 6.2 英国的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 <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ssdataset.asp?vlnk=7420>

真要到那时候,也会以诸多的不灵便为代价。而在今天,同样是这群英国人,发现自己都已经活到了七八十岁,许多人还颇为健康,不情愿什么工作也不做,什么社会生活也不参加,还需要有比曾经梦想需要接受的更多的学校教育。

步入老年意味着什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可以把老年化(ageing)界定为当人们衰老时影响他们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过程(Abeles and Riley 1987; Atchley 2000)。这些过程体现出三种彼此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发展“钟”: (1) 一种生物钟,指的是生理上的身体; (2) 一种心理钟,指的是思维与心智能力; (3) 一种社会钟,指的是与年龄有关的文化规范、价值和角色期待。下面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三种过程中都存在巨大的变异。我们有关老年的意义的观念正处在迅速变迁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晚近的研究消除了有关老年化的许多迷思,另一方面是因为营养和健康方面的进展使许多人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长寿,更加健康。

一 生物性老年化

老年化在生物学上会产生明显的效应,尽管说发生这些效应时确切的实足年龄人与人之间相差甚远,就看他们的遗传特征和生活方式。大体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生物性老年化具有如下典型意义:

- 随着眼球晶状体失去其弹性,视力衰退(对于大多数 50 岁以上的人来说,看小字号很吃力);
- 听力丧失,首先丧失对于高频音调的听力,然后丧失对于低频音调的听力;
- 皱纹,因为皮肤的皮下组织越来越脆弱(大量使用护肤油和越来越常见的面部除皱术都只能暂时延缓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 肌肉块消退,同时伴随着脂肪的积聚,特别是腰腹部(你 25 岁的时候,锻炼可以抵消饮食习惯的不良影响;但到了你 50 岁,它们又回来纠缠你了);

- 心血管机能减退,因为运动时的氧气摄入量 and 利用量降低(30岁时六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即使一生坚持锻炼,到60岁的时候一英里八分钟能跑下来就很知足了)。

老年化的正常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良好的健康状况、适当的饮食营养和合理的锻炼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偿或抵消(John 1988)。无论对于什么年龄的人,生活方式的不同都能够造成显著的健康状况差异。对于许多人来说,老年化的生理变化并不会明显地阻碍他们去过一种积极而独立的生活,直到八十多岁。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如果坚持适当的生活方式,加之医学技术领域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过上相对摆脱疾病的生活,直至活到生物学上的极限,只会在临死前经历短暂的患病期(Fries 1980)。但是关于在遗传学角度上我们什么时候注定要死亡,甚至有没有这种限定,尚有争论(Kirkwood 2001)。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大约90到100岁似乎是遗传学角度上限定的年龄分布上限,不过也有些人主张这种上限可以迟至120岁(Fries 1980; Rusting 1992; Treas 1995; Atchley 2000)。有官方纪录的全世界最长寿的人是法国老妇让娜·卡尔门特,她于1997年去世,享年122岁。她在100岁的时候还骑过自行车,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与梵高见过面。^①其他还有些人宣称更长寿的,只是无法证实他们的年龄。

英国的老年人中大部分并没有任何显著的身体损伤,身体还能够积极活动,尽管如此,所谓“羸弱的老人”的那些不幸的刻板印象却依然存在(Heise 1987)。这些刻板印象更多地牵涉到西方文化中老年化的社会意义而不是生物意义。在西方文化中,令人着迷的是年轻活力,故而十分担忧衰老和濒死。



说到底,生物性老年化是不可避免的。

二 心理性老年化

相比于老年化的生理效应,老年化的心理特性就远远谈不上已经很明确了,虽说对于老年化心理学的研究正在不断扩展。尽管人们广泛假定,记忆、习得、智力、学习技能与学习动力之类的东西,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但有关老年化心理学的研究却表明,这个过程远不是那么简单(Birren and Schaie 2001)。

比如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只要还没有太老,记忆与学习能力并不会会有显著的下降。当然,一个人回想事情或分析信息的速度或许会有一些变缓,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觉得大脑受到了损伤。对于大多数生活依然丰富

^① 梵高 1853 年生,1890 年去世,年仅 37 岁。

多彩的老年人来说,只要还没有太老,学习动力、思维清晰、求解能力之类的心智能力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下降(Baltes and Schaie 1977; Schaie 1979; Atchley 2000)。

当前的研究重点在于记忆丧失在什么程度上与其他变量有关,比如健康、人格或社会结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指出,智力的衰退并不一定是不可逆转的,并正在探索通过一些方式辨别出有危险的老年人,以便采取医疗干预,延续智力机能维持在较高水平上的时间(Schaie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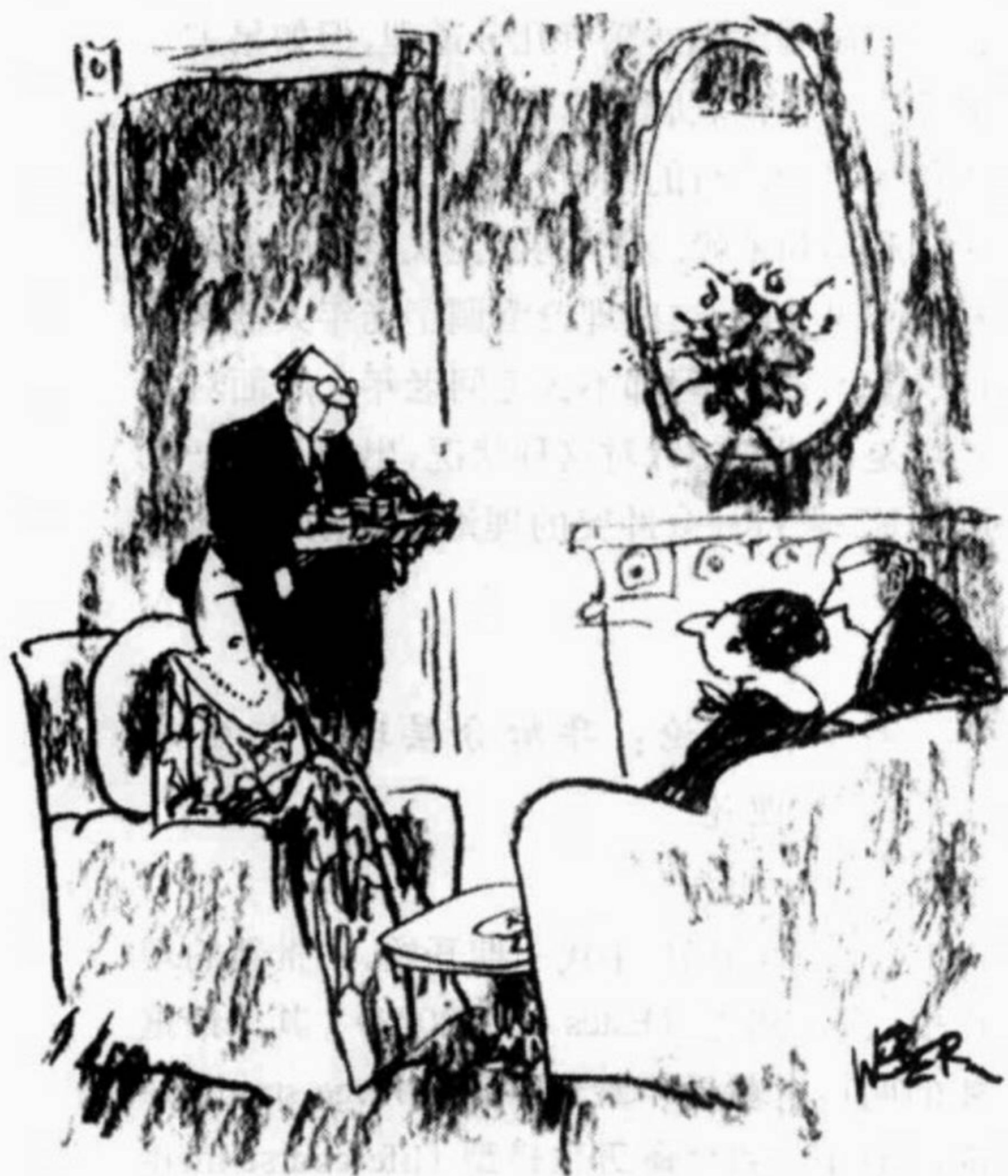
早老性痴呆症^①,即脑细胞的逐步退化,是造成老年痴呆的主要原因。即使是这种病,在75岁以下的非住院人员中也是比较罕见的,尽管它可能会折磨几乎一半超过85岁的人们。晚近的研究,特别是在充满争议的干细胞领域,已经显现出一种希望,或许早老性痴呆

症有朝一日可以治愈。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于2004年去世,他或许是晚近最著名的早老性痴呆症病例。他的妻子南希·里根就曾公开支持干细胞研究。

三 社会性老年化

所谓社会年龄,包括在文化上与某一特定的实足年龄相维系的规范、价值和角色。有关社会年龄的观念各个社会皆有不同,至少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也是随时间而变的。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社会有着尊老的传统,认为他们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智慧。而英国和美国之类的社会则更可能轻视他们,视之为不具生产能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依赖人士。这既是因为他们不太可能拥有年轻人非常注重的高科技技能,也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文化对年轻活力更感兴趣。赌注现在放在了号称能永葆青春的处方药品、整形手术和家庭治疗上。这些措施包括了腹部抽脂术、面部除皱术、抗秃药或毛发再生精,以及声称能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的药。在美国,治阳痿的药伟哥在1998年上市三周以后,占据了所有处方药销售额的94%(Hotz 1998)。

角色期待是一个人的个人认同非常重要的源泉。在英国社会里,与老年化相维系的一些角色大致上是正面的:德高望重的尊者,阅历丰富的顾问,满怀慈爱的祖父母,虔敬赤诚的长辈,睿智的精神导师。其他一些角色或许有伤害性,会导致自尊心下降,孤僻寡落。在英国文化中存在一些对于老年人的刻板角色,具有相当的污名化效应。比如“古里古怪”、“稀里糊涂”、“唠哩唠叨”、“邋里邋遢”的老头或是老太(Kirkwood 2001)。事实上,老年人和所有人一样,并不只是消极被动地扮演被指派的社会角色,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和重新界定自身(Riley et al. 1988)。



“我们很少看电视。我们绝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用在男欢女爱上了。”

① 早老性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又译阿耳茨海默氏症。

下文（本章第四节第五小节）我们将讨论对于老年人的歧视。

6.4.3 逐渐衰老：多种相争的社会学说明

有关英国社会中老年化的性质，社会老年学家已经给出了不少理论。最初的一些理论强调个人如何适应当一个人逐渐衰老时社会角色的变化。后来的理论集中考虑的是社会结构如何塑造老年人的生活，并关注生命历程这个概念。而最近的理论则更为多样化，关注老年人通过哪些方式，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中积极创造自己的生活。

一 第一代理论：功能主义

最初的老年化理论体现了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在社会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功能主义思路。它们强调个人如何适应他们衰老后社会角色的变化，而这些角色又是如何有助于社会。最初的理论常常假定，老年化会带来生理上、心理上的衰退，社会角色的变动必须考虑到这种衰退（Hendricks 1992）。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最有影响的一位功能主义理论家。他认为，社会需要为老年人找到符合年龄增长的角色。他关注的是，尤其在美国，因为注重年轻、回避死亡，未能提供充分利用其老年公民的潜在智慧和成熟的角色。不仅如此，考虑到社会的老龄化甚至在帕森斯的时代就已经很明显了，他认为，这种欠缺非常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灰心丧气，脱离社会。帕森斯主张（Parsons 1960），为了实现一种“健康的成熟”，老年人需要从心理上适应他们改变了的处境，而社会则需要重新界定老年人的社会角色。旧的角色（例如工作）必须抛弃，而新型的生产性活动（比如志愿服务）则需要得到认定。

帕森斯的观点预见到了后来的脱离理论，

该理论认为，当某些人逐渐衰老时，社会解除他们的传统角色，从而将那些角色腾出来给别人，这是具有功能的（Cumming and Henry 1961; Estes et al. 1992）。根据这种视角，由于老年人越来越羸弱多病，依赖他人，如果他们再继续占据传统的社会角色，而这些角色他们已经不再能充分履行，那就会越来越具有反功能了。因此，老年人应当退休，放弃公民生活，最终连其他活动也一并放弃了。脱离据说对广泛的社会发挥了功能，因为它将此前被老年人占据的角色开放给了年轻人，而年轻人据说将会以新鲜活力和新型技能来履行这些角色。而对于老年人，脱离据说也发挥了功能，因为这使得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的衰退，承担的纳税角色也更少了。事实上，的确有一批关于老年人的研究指出，大部分人觉得退休蛮好的，声称这使他们精神改善，快乐多多（Palmore 1985; Howard 1986）。

脱离理论显然颇有几分道理，但如果主张老年人应当彻底脱离广泛的社会，那是因为想当然地接受流行的刻板印象，认为老年人必然走向羸弱和依赖。对于功能主义老年化理论的批评意见认为，这些理论强调了老年人需要适应既有的条件，但却不去追问老年人所面对的环境是否公正。针对这种状况，出现了另一批理论家，来自社会冲突的理论传统（Hendricks 1992）。

二 第二代理论：年龄分层理论与生命历程理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新的理论引入了老年学（Estes et al. 2003）。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贡献是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 theory）和生命历程模型（life-course model）。年龄分层理论关注的是，对于个体老年化的过程，对于老年人在社会中的整个分层，退休政策之类的社会结构所扮演的角色与产生的影响。年龄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结构滞

后的概念 (structural lag, Riley et al. 1994)。这个概念描述了结构是如何没能跟上人口与个体生命中的变迁步伐。比如说在英国,二战后不久的退休年龄还定在 65 岁,而那时的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远不如今天 (参看图 6.2)。

类似于年龄分层思路,生命历程视角也不再单纯从个体适应的角度看待老年化。(本章第三节开头介绍了有关生命历程的观念)这种视角将老年化看作一生中的一个阶段,由生命历程中早先各年龄段发生的历史、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所塑造。因此,生命历程模型将老年化看成是一个由出生到死亡的延续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此前单纯强调老年人是一个独特群体的各种理论形成对比。这种理论考察了心理状态、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从而沟通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 (Elder 1974)。

三 第三代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

近些年来,研究老年化的最重要派别之一,就是政治经济学视角,为首的就是卡罗尔·埃斯蒂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了国家和资本主义对于老年人被支配和边缘化的体制发挥了什么作用。

政治经济学集中考虑的是,在塑造和再生产社会中盛行的权力安排和不平等方面,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社会政策,比如在收入、健康、社会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政策,被理解为社会斗争、冲突和此时居于支配位置的权力关系的结果。影响到老年人的政策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分层、种族分层和阶级分层。老年化和老年的现象直接关系到他们所在的广泛的社会,不能脱离其他社会力量来孤立地考察 (Estes and Minkler 1991; Estes et al.

2003)。

6.4.4 英国老年化的特征

尽管老年化是一个展现出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但它也伴随着一系列陌生的挑战。随着人们逐渐变老,他们同时面临着生理上、情感上和物质上的诸多问题,难以应对。退休就是一个标志着重大转型的挑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拿钱,它还有助于形成个人认同感。在这一点上,退休不仅意味着收入的丧失,还有可能导致地位的丧失,许多人对此难以适应。许多老年人面临的另一项重大转型是丧偶。鳏寡可能意味着丧失了一位共处四五十年的配偶,而那人一向是伙伴和支持的主要源泉。好莱坞电影《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 2002)中,由杰克·尼科尔森出演的片名主角就是一个尽力应对自己生活中的变化的男人。

老年人口也反映了本书通篇都有讨论的英国社会中的多样性。老年人中贫富不均;族群多样;有的独居,有的与各式家庭合居;政治价值和倾向五花八门;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不仅如此,和英国其他人群一样,他们的健康也是状况各异。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老年人有多少能力维持其独立自主和整体幸福。

和上面指出的老年人的多样性类似,“老年”本身现在所涵盖的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广。人们常常区分出一生中的第三龄和第四龄。第三龄的涵盖范围是从 50 岁到 74 岁,在此期间的人们有能力去过积极的、独立的生活,逐渐摆脱了为人父母的日常责任和劳动力市场。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人拥有时间和金钱来支撑愈益扩张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英国萨迦 (Saga) 集团专门针对 50 岁以上消费者市场,主攻旅游,兼营其他产品,这家公司的成功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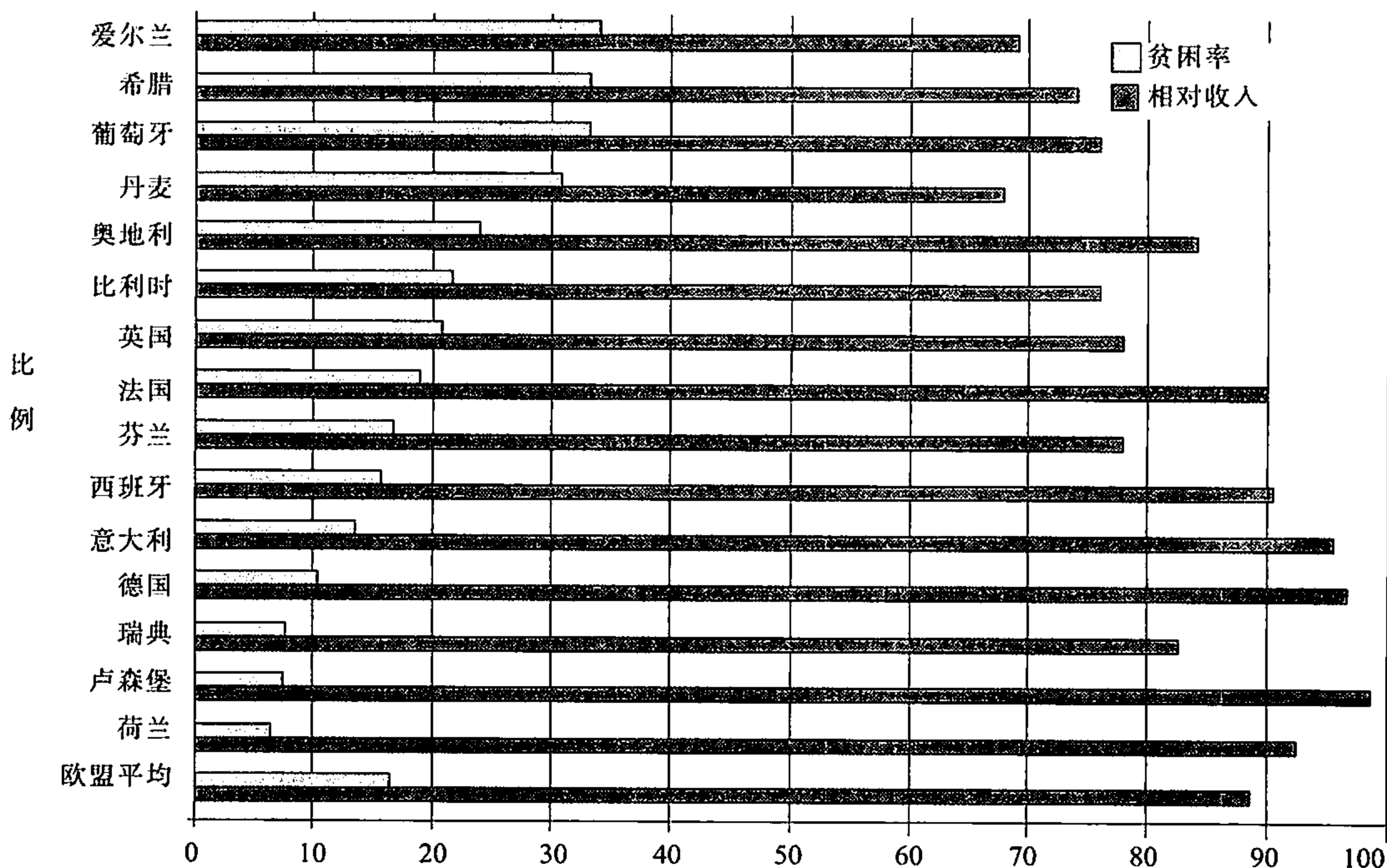


图 6.3 1998 年欧盟各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贫困率^a与相对收入^b比较

a: 即收入低于全国人口中位收入之 60% 的人数比例

b: 即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中位收入占 64 岁及以下人口中位收入的比例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7

是“老龄狂潮”(grey pound)的力量与日俱增的明证。与此相反,第四龄则是指人们的独立性和充分自我照顾的能力都受到更严重挑战的那一段生活岁月。

本节我们将讨论不平等、性别和族群对于英国老年化体验的影响效应。

一 不平等与老年人

总的来说,在英国,老年人在物质上往往比人口中其他人群更加不利。正如我们在图 6.3 中所见,其他欧盟国家也都有这种局面。不过,老年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水平的主观感受并不仅仅基于物质因素,而是依据了他们自比的其他参照群体。他们有可能拿关于自己早前生活的记忆作对比。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可能对物质角度上与过去的比较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尽管在道德角度和社会角度就未必如此)。

不过,他们也会比较自己退休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而在物质角度上退休前很可能好于现状。老年人还可能拿自己和整个社会或其他退休者的平均生活条件相比较。因此,老年人当中并不存在有关不平等的共同的主观经验(Vincent 1999)。

当人们停止有薪劳动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不平等常常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老年人的不平等加剧意味着,老年人中的妇女、少数族群和体力劳动者比中年组的同类人群更加贫困。退休可能导致收入的丧失,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在工作期间有多少能力积累私人职业养老金或个人退休金,是决定养老金领取者中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此前就业时是专业人员或经营人员的老年人,到了晚年往往每周总收入是最高的。

我们将在第十章第一节第三小节



对于有些人来说,老年时光意味着一贫如洗,体弱多病,抑郁消沉,寂寞孤单。

中进一步详细讨论老年人中的贫困问题。

肯特大学做了一项关于英国 1317 名老人生活方式的调查 (Milne and Harding 1999), 发现有证据表明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由退休不久的人所组成, 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 领取职业退休金, 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组成第二个世界的人则年过八旬、独居、积蓄不多, 受着严重贫困的折磨。在被调查者当中, 对于金钱的焦虑是次要的, 他们最为担忧的还是健康的恶化。

二 晚年的女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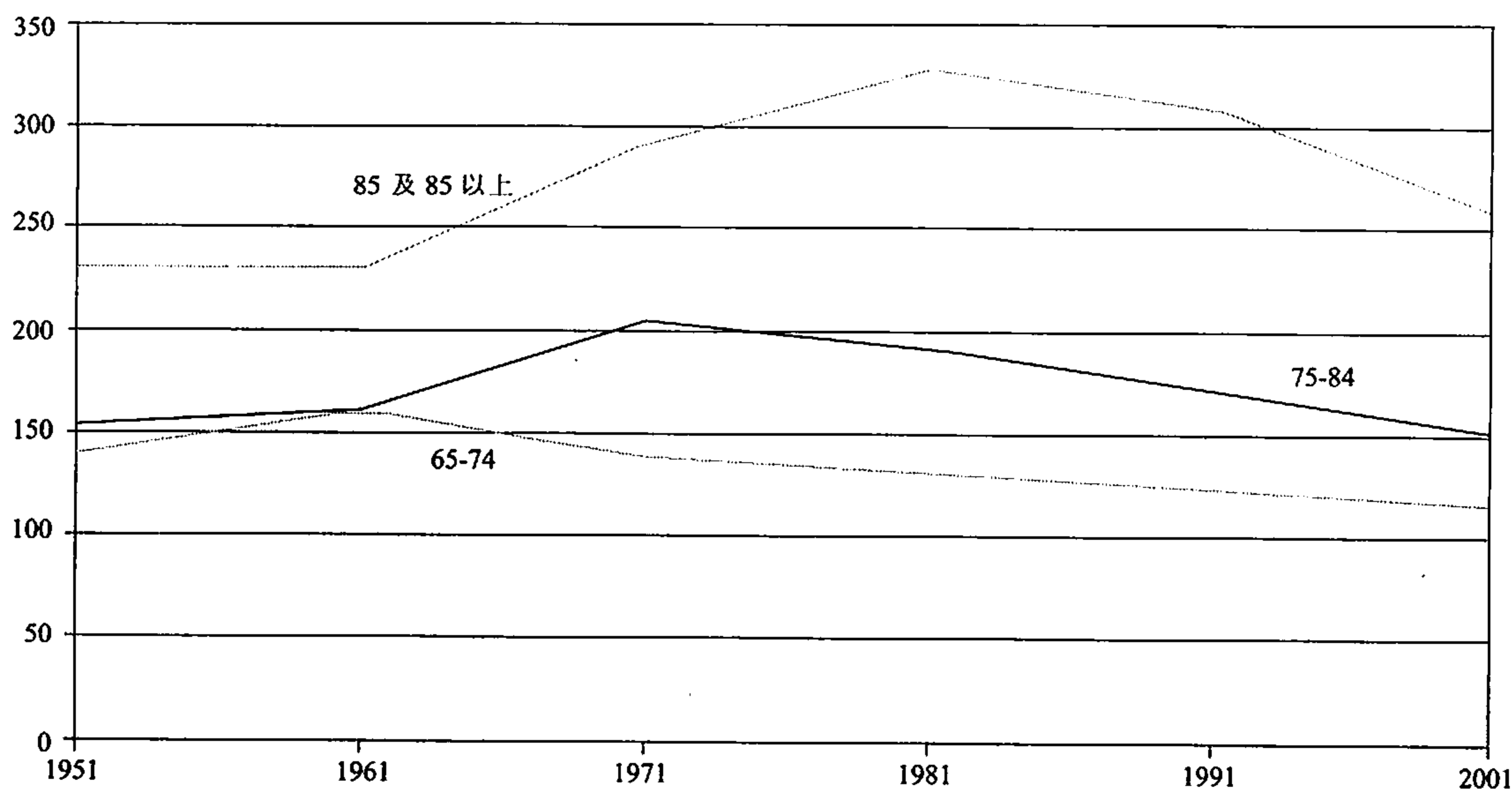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长寿。在英国, 2003 年的女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比男性几乎多出五年 (National Office of Statistics 2004a)。有鉴于此, 老年妇女中孀居属于正常现象。65 岁及以上女性中几乎一半属于孀居, 而 85 岁及以上女性中这一比例达到五分之四。与此相

反, 65 至 69 岁之间的男性有超过四分之三依然夫妻俱在, 而到 80 至 85 岁组时这一比例也只是降至 60% (HMSO 2004)。女性的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被描述为“晚年的女性化”。

尽管在整个 20 世纪下半叶的英国, 晚年都是女性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 但女性对男性的比例也有所波动, 现在正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目前在英国, 90 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是男性的三倍多。但到 2021 年, 这一数字预测将下降到两倍。女性对男性的数量比例之所以下降, 原因之一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很多年轻男性参军战死。这一代的女性最初在 1961 年的人口普查中达到退休年龄, 使得性别比的不平衡程度急剧上升。老年男女比例不平衡程度下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 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 65 岁以上男性而非女性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图 6.4 展示了 1951 年以来老年人口性别比是如何波动的。

老年妇女比起老年男性更有可能生活贫困。我们在上面看到, 积累私人养老津贴的能

英格兰与威尔士,每 100 名男性所对女性数

图 6.4 老年人中的性别比例:以年龄分组,1951 年至 2001 年^a

a: 基于年中人口估计数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7

英国	领取比例		私人养老金中位数 (每周英镑)		百分比 私人养老金收入女 性对男性比 (%)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婚姻状况					
已婚/共居	74	28	92	34	37
单身	52	61	65	70	108
丧偶	70	56	61	46	75
离异/分居	57	36	78	48	62
社会经济群体					
专业/经管 人员	90	64	172	95	55
中间	60	51	84	43	51
日常体力工 作	62	34	50	28	56
总体	71	43	83	44	53

图 6.5 65 岁以上人口的私人养老金(a)领取情况:根据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群体分组(b),2001—2002 年度

a: 职业养老金或个人养老金,包括遗属养老金

b: 基于本人职业,分类根据国家统计社会经济分类标准(NS-SeC)。参见标准附一。数据未经加权。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11

力是老年人中财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女性拥有像男性那样的养老津贴的机会要少得多,这既是因为在薪酬上的性别差距,也是因为由于生儿育女而丧失的终身所得。只有43%的老年妇女拥有某种来自私人养老金的收入(这还包括了基于其亡夫私人养老金的寡妇养老金),而男性的这个比例为71%(HMSO 2004)。图6.5展示了65岁以上领取私人养老金的人数以及有此项收入者实际领取的中位数的分性别比例。

研究显示,老年妇女的个人收入低于男性,并且在拥有诸如汽车等其他资源上也承受着不平等的处境。75至84岁之间的女性只有42%拥有一辆汽车,而男性的这项比例为66%。汽车拥有比例的差异可能看上去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却可能大大限制了老年妇女的总体流动,限制了她们获得医疗保健、购物以及与其他人接触的可能性。

与男性相比,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忍受残障的情况也更多见。这就意味着,即使只是完成日常事务和料理个人生活,比如洗澡和上下床,她们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也更多。然而,将近一半的英国老年妇女独自生活,而男性的这项比例只有五分之一。因而,老年人口可以获得的照顾模式也就带有了特殊的性别含义(Arber et al. 2003)。

三 老年与族群

英国老年人口中来自少数族群的人的收入也往往低于同龄白人,并且更严重地依赖资产测查补助(Berthoud 1998)。在汽车拥有和住房保有等其他财富测算指标上,来自少数族群的老年人也处在劣势(尽管印度裔和华裔等某些特定群体的房屋拥有量与白人不相上下)。总体而言,在英国的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相比其他群体的贫困率更高,并且这种模式会延续到晚年。

吉恩和阿伯尔(Ginn and Arber 2000)考

察了老年人口中个体收入的族群差异与性别差异。他们发现,亚裔老年妇女往往处在特别弱势的地位。退休后的少数族群人士常常不能靠某种职业退休金或私人养老金来补充其得到的政府养老金。缺乏私人养老金反映出许多问题:对于大部分属于移民的老年族群人口来说,在英国的就业纪录比较短,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到歧视,在少数族群定居区域能找到的工作类型和数量都有限,有时候也是因为英语不够流利。对于某些少数族群的老年妇女来说,经济上的劣势可能也是因为文化规范阻碍了早年的就业。

6.4.5 老年化的政治化

一 “全球老年化危机?”

在1850年的英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大约5%。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超过15%,并且还将继续增长。人口中年龄分布的这种显著转变对英国以及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都提出了一些特别的挑战。要理解个中原因,一种方法就是考虑一下依赖比,即劳动年龄人口与孩童和退休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图6.6展示了联合王国几个地区依赖比的增长)由于老年人口的比例还将持续增长,因此对社会服务和保健系统的需求也将增长。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养老金的支付年数也要比现在长(参见图6.7)。

然而,对老年人口的供养方案是由劳动人口提供资金的。随着老年依赖比的提高,有些人认为,可利用资源所受到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按照人口学的预测,政府、利益集团和决策者必须未雨绸缪,找到满足变化中人口之需要的方案。有些养老金组织正在发出警告,目前的养老金支付方案不是可以无限持续的。他们呼吁提高养老金领取的最低年龄,无论女性(由现在的60岁提高到65岁)还是男性(由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未来真能长生不老？

麦克·赫普沃思在其《老年化的故事》一书中(Hepworth 2000),使用了文学素材,鼓励其读者“将小说作为充满想像力的资源,以理解社会里面老年化体验的意义的多样性”。在下面这节文字中,赫普沃思讨论了科学和技术如何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老年化的理解:

几百年来,在西方文化中,老年化一直被想像成一种生存处境,人类只有借助超自然力量才能解脱。诚然,始终有人在探求延续有生命力的生活,但直到最近,这种追寻也依然是一种梦想而非现实。如果有人已经体验了永恒的生活,也更多的像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祝福。比如永世流徙的犹太人和永世漂流的荷兰人的传说。(在文学中,有时候)超自然的力量确实干预了表面上自然的事物秩序,以遏制生理性老年化的正常过程。比如浮士德(Fielder 1946),他和魔鬼立约,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而在奥斯卡·王尔德刻画道德败坏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道林·格雷是一个外表极好的唯美主义者,无论面容还是身躯,都不可思议地不曾留下沉溺声色犬马的痕迹;他的纵欲放荡(在这个故事里就属于一种早熟的老年化)的一切外在迹象都神秘地转移到他的画像上。当他最终用一把刀子刻向画像,企图毁灭自己过去的证据,也只是成功地毁灭了自己,因为画像和他自己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在他死的一刻,画像又重新回到了年轻时的原貌——“他那令人惊叹、精致无比的年轻和俊美”(Wilde 1960:167),却留下一具难以辨识的老人尸体,“干瘪枯萎,满是皱纹,让人望而生厌”(同上)。

走出传说和浪漫想像的领域,在西方文化

里,直到最近,即使你足够幸运,能够活到老年,老年化也只有一种未来:人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死亡,死后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基督教观点。基督教思想中的身心二元分离观,将身体在尘世的老年化看作是死后无知境界中永恒灵魂生命的短暂考验之所。肉体的腐坏解放了灵魂或本质自我,通向超越时间的来世存在。天堂是对充满荣耀或讲求德性的老年的补偿,不能通过与魔鬼立约来寻求延续一种年轻而积极的生命。

但是时代迅速变迁,现代的科学医疗与技术已经提供了另一种承诺可供选择:在此世而不是来世就可以解放老年化的身体(Katz 1996)。这种发展趋势最有意思的特性之一就在于,有关长生不老的未来在当代已经变成主要是生物性的模式,而不是本质精神性的模式(Cole 1992)。现在流行的信仰乃是:能够遏制老年化过程、延续青春生命的是有关生物性身体的科学,而不是有关非物质性的永恒灵魂的宗教。著名社会老年学家亚伯·F.古布里姆(Gubrium 1986)讨论了在当代社会,为什么我们不情愿接受一种生物学角度上有限的生命跨度乃是“正常现象”。人们普遍信仰科学具有无限的潜能,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促使我们满怀期待地求诸医疗科学,能把老年化从一种生命历程的自然终点,转变成一种有可能治愈的疾病。用这种乐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老年化的未来,与晚年有关的那些生物学风险就会是能够治愈的,而人类生命跨度就能够大大超过《圣经》上说的70岁,有朝一日,当人们找到了那些伴随着衰老而来的疾病的治愈方法,那些产生伤痛、丧失功能的身体部件可以被替换,老年化将会从人的议程中消失。

抵御老年化过程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人成为

电子人^①,或者说具备一种“后人”身体,一部分是生物性的,一部分是技术性的(Featherstone 1995)。[这不同于德鲁·莱德提出的“病现身体”(Leder 1990),就是使身体的呈现让人联想到疼痛、疾病和功能障碍]这种未来观是使病现身体(dysappearing body)真的消失(disappears)了。任何导致晚年痛苦的身体内部部件都会被摘除,通过遗传工程或移植换上一个替代品。这样一来,老年化身体的故事就不是个体如何面对或应付这种身体的局限,而是科幻小说梦想成真。身体将成为一台机器,老年化的意义可能不再引人

关注。

资料来源:Hepworth 2002,页 124—125

问题:

- 1 青春永驻的欲望是否是歧视老年人的社会所造成的?
- 2 如果我们能够消除老年化对于身体所产生的效应,那么讨论老年化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 3 你是否同意某些社会学家所宣称的我们能够预想一个长生不老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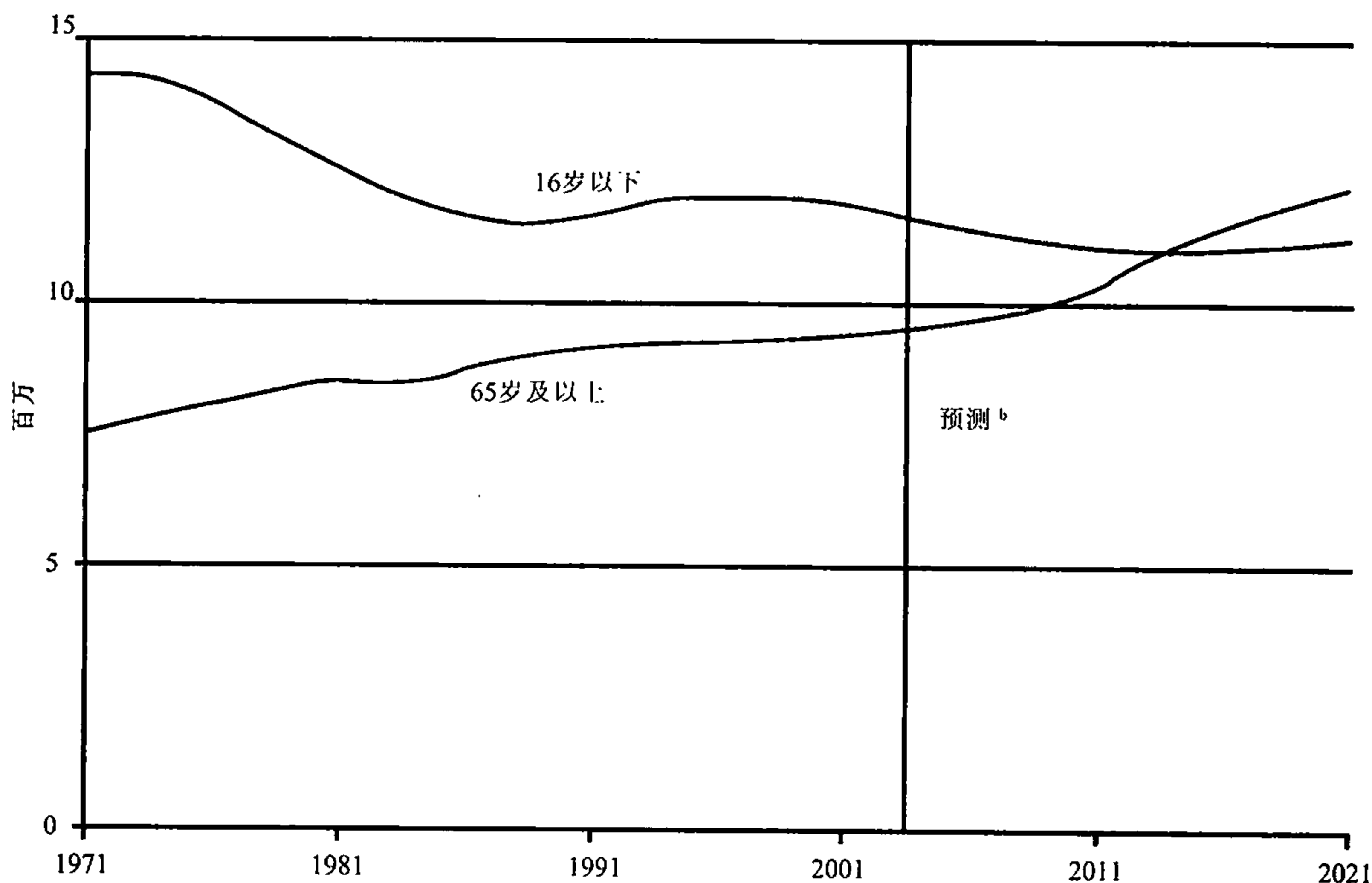


图 6.6 英国 1971 年至 2021 年按年龄分组的依赖人口^a

a: 以 2001 年为基数的预测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17

① 电子人(cyborg): 亦译半机械人,注意不是机器人,而是人本身,只是为了适应特定的困难情境(比如勘探、军事、太空探险等),借用电子装置或电动机械装置代行部分人体功能(也可以是其它生物体)。此词在社会理论中的使用,参看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现在的 65 岁提高到 70 岁),以抵消寿命的延长。(有关人口老年化和福利开支的争论,参见以下图文框的讨论)

近来,将老年人视为“依赖人口”的观念已经遭到了批评。把一个群体描绘成“依赖”的,意味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的问题。克里斯·吉利尔德和保罗·希格斯(Gil- leard and Higgs 2005)指出,一种新型的富裕已经普及了整个社会和整个生命历程。尽管他们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无一例外地身体健康,衣食无虞,但对于许多展望退休后生活的人来说,晚年生活已经改善了。传统上应用于人在晚年的处境的概念中,有许多现在看来已经不足成立了,比如说他们脱离社会,依赖于政府。具体来看,如今达到退休年龄的这一代成年人,是在二战以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而那时候的青年文化是受时装、音乐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con- spicuous consumption)所主导的。步入老年,他们还保持着年轻时养成的习惯,继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消费者,享受着独立的生活方式。

阿伯和吉恩也指出(HMSO 2004),依赖的观念现在需要重新思考了。首先,用来界定依赖的年龄跨度(16 岁以下和 64 岁以上)已经不再能够反映英国实际的就业模式。在 16 岁就进入全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少了,相反,往往愿意留在正规教育中更长时间。而大部分劳动者在 65 岁以前数年就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女性现在进入有薪就业,抵消了男性就业期限的缩短。

第二,阿伯和吉恩认为,有益于经济的活动并不仅限于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有证据表明,老年人并非一种负担,而是为经济和社会做出了许多生产性的贡献。老年人常常为能力欠缺的配偶提供无薪的、非正式的照看,这大大减少了政府在供应保健和个人照看方面的开支。他们还是照看孙辈的重要资源,使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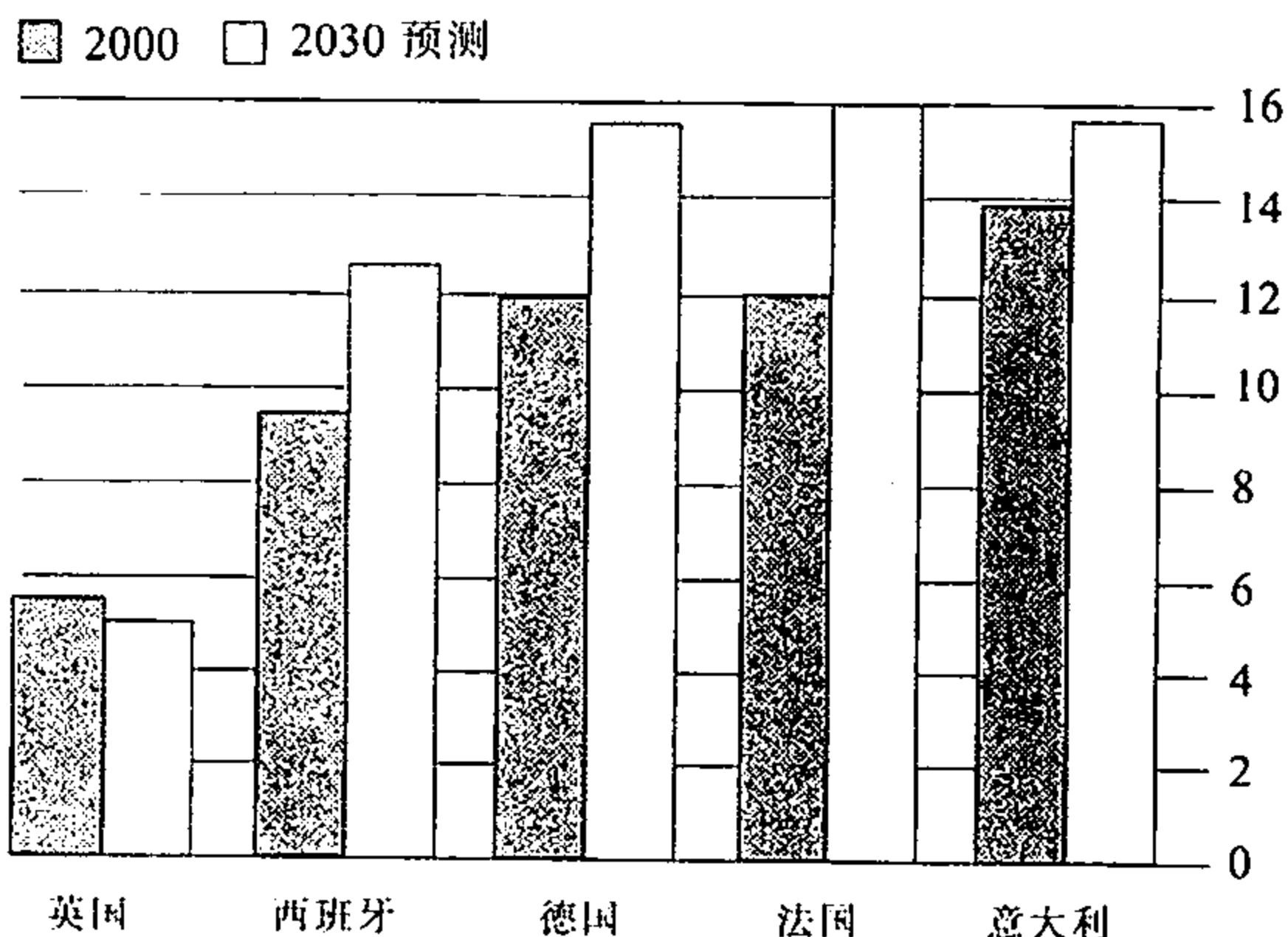


图 6.7 2000 年与 2030 年(预测)一些国家养老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The Crumbling Pillars of Old Age”, *The Economist* (2003 年 9 月 27 日)



“你们好,我们是新时代的养老金领取者。”

及儿媳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老年人还积极参与志愿组织。阿伯和吉恩提出,老年人还可以成为资助其成年子女的重要资源,比如借钱给他们,提供教育费用,赠送或协助住房。许多研究也已经发现,老年父母继续在向他们的成年子女提供情感支持,尤其是在艰难的时候,比如离婚。

老年化与福利国家：引而待发的定时炸弹？

人口老年化对于福利国家意味着什么？在《避免老年危机》的报告中（World Bank 1994），世界银行认为，老年人比例的剧增将意味着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方面的福利开支在财政上会越来越难以为继。无论是发达世界还是发展中世界，都存在这种局面，但富裕国家会更早陷入麻烦。在那些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与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目前是 4 比 1，到 2030 年将减半为 2 比 1。劳动人口将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纳税负担，以支撑越来越多有权领取养老金的人。报告发表以来，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书籍、会议和政策倡议，讨论如何应对这个问题（*The Economist* 2000）。

晚近几位理论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迪安·贝克和马克·韦斯布罗特的《社会保险：虚假危机》（Baker and Weisbrot 1999）是对美国养老金体系进行的一项研究，论证了即使是基于高度保守的经济增长假设，美国社会保险体系在 30 年内也极不可能发生预测中的破产。他们认为，将体系私有化的压力大部分是来自华尔街。这是因为，如果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体系被私人养老金所取代，那么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将会赢得 1.3 亿个新的投资帐户。

与此类似，英国社会学家罗宾·布莱克本的《为死亡储蓄》一书对世界各地的养老金供应做了历史考察（Blackburn 2002），认为所谓人口老年化将会导致一场养老金危机，这类

担忧正是由各种金融利益和政治右派所传播的，以推动自由市场取代政府养老金。这已经传播了并还在传播着人们对于自己退休后的资金安全的不安。布莱克本还批评了私营公司经营养老基金的方式。他称这类私营公司为“老龄资本主义”（grey capitalism）的世界，其中的雇员储蓄帐户被移交给养老基金经理，以谋求从其投资中得到最大的短期回报，而不是养老金持有者的长期安全。

英国社会学家菲尔·马伦在《幻觉中的定时炸弹》一书（Mullan 2002）中指出，有些人相信人口老年化是一枚引而待发的定时炸弹，将会带来一系列灾难性的社会问题，他们是陷入了一系列迷思，而他自己就是要来拆除引信。马伦认为，以医疗保健为例，所谓人口老年化将意味着疾病和依赖的迅猛增长，这只是一种迷思。他反驳道，老年化并不是一种疾病，绝大多数老年人既没有疾病也没有残障。人们之所以越来越长寿，原因之一就在于过去这个世纪里生活条件的改善，他认为如果这种改善趋势延续下去，老年人就会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强壮、更加健康。马伦攻击的第二个“迷思”是相信人口老年化会使政府养老金方案陷于破产，乃至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从政府的预扣所得税制度转为私营方案。马伦指出，政府的养老金供应往往比私营方案更有效率，因此这种改革毫无依据。

二 年龄歧视

一些激进群体已经开始反对年龄歧视,即基于人的年龄而对其产生歧视。他们在力求倡导一种积极的观点来看待老年和老年人。年龄歧视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对待老年人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也存在很多错误的刻板印象。例如,人们常常认为上年纪的工人不像年轻工人那样能干了;大多数年过65岁的人都会呆在医院或养老院;大部分老年人老迈昏聩。但所有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年过60岁的工人的生产能力和出勤记录都超出年轻人组的平均水平。年过65岁的人中有95%居住在私人住宅里;而65岁至80岁的人中只有7%显示出明显的衰老状。在英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些方案,禁止年龄歧视,可以涵盖招聘、培训(包括进入高等教育)、晋升、薪酬、留职,以及非常重要的一项,退休。

在一项研究中(Levin 1988),大学生们被要求看同样一个人分别在25岁、52岁和73岁时的照片,然后从多种人格特征的角度给此人打分。给那个被说成是73岁的人评的分显然更具否定性。当他在照片上看起来老态,学生们就更有可能从否定的角度来理解他,即使他们对他一无所知。他只是更老一些,但单凭这一事实就足以触发否定性的文化刻板印象。关于“古里古怪的老头”的广泛共享的文化刻板印象,可能导致伤害老年人的私人意见。

社会学家比尔·拜瑟韦已经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第五章第五节第四小节讨论了这一思路),就年龄歧视给出了一套理论阐述(Bytheway 1995)。拜瑟韦首先质疑了“老年”和“老年人”这些术语是否确有其事。他提出,我们假定这些术语具有某种普遍现实,但其实它们并不具有这样的对应。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对我们说“老年”这个词(old age)是什么意思提出了疑问:“它是一种状况、一种生命阶段、一种思维状态还是别的什么?”有什么



老年人常常为他们所在的社区提供急需的帮助,比如照看孙辈。

科学证据能证明存在某种东西可以叫做老年吗?如果真的存在老年,那么人们是如何进入老年的,是如何变成老年人的?在拜瑟韦看来,我们用来描述老年化的那些范畴,比如“上岁数的”(the elderly)、“上年纪的”(the old),本身就带有年龄歧视的意味。它们是通过社会建构出来的,是为了将支配群体的某些做法合法化,支配群体借助从与年龄歧视有关的不平等中获得的好处,根据人们的实足年龄,对他们加以分隔和管理。

6.4.6 世界人口的老龄化

“老人激增”正在席卷今日世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8年的报告(UNFPA 1998)指

出,全世界 65 岁以上人口仅 1998 年便增长了大约 900 万。而到 2110 年,这一人口将年增 1450 万。到 2050 年,更将年增 2100 万。65 岁以上人口组最迅速的增长将发生在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于较贫困的国家,那里的家庭子女较少,而人们的寿命又更长。在工业化国家里,老年人口的比例从 1950 年时的 8% 增长到 1998 年时的 14%,并预计将在 2050 年增长到 25%。而在 21 世纪中叶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将步此后尘,经历各自的老人激增。

世界各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口老年化都是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的结果,尽管说贫困国家的人口由于贫困、营养不良和疾

病,生命跨度依然较短(参看第十一章)。根据联合国的估计(UNFPA 1998),全世界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1950 年时的 46 岁,增长到 1985 年时的 50 岁,而到 2025 年的时候预计将达到 71 岁。到那时候,大约会有 8 亿人超过 65 岁,比 1990 年的数量增长了将近 3 倍(参看图 6.8)。老年人(85 岁以上)最需要医疗和服务,其数量在北美将增长一半,而在中国将增长一倍,在西非将增长将近一倍半(Sokolovsky 1990)。(下面的图文框讨论了老年化人口给中国带来的问题)这一增长对许多国家的资源都提出了愈益增多的要求,而那些国家已经太过贫困,无法充分支撑其人口了。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中国的老年化人口

中国拥有 1.3 亿老年居民,但刚刚越过其人口的 10%。不过,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动,根据数字预测,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超过 31%。之所以如此,是由于 1979 年开始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中国激增的人口。根据法令,居住在城市里的每对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系少数民族,或皆为独生子女。

中国的人口增长

1950 年 5.63 亿

1960 年 6.50 亿

1970 年 8.20 亿

1980 年 9.85 亿

1990 年 11.4 亿

2000 年 12.6 亿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署

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一对夫妇可以在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法令在城市里是非常严格的,实行强制绝育、晚期流产,并对违犯法

规定的夫妇实施处罚,这些都常常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但是该政策引发了严重的副作用,使劳动人口为供养那些已经退休的人而挣扎。

怨恨

越来越多的年轻单身现在发现自己面对着可怕的前景:要赡养父母双亲再加四位祖父母辈,这个现象即所谓 4-2-1 家庭。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随着社会主义福利体系在经济改革的压力下迅速解体,许多人现在发现越来越难以赡养自己的长辈。那些有能力赡养的人也开始将自己的传统责任,即在家照看亲人,转移给私人养老院。这种趋势本身就已经引发了某种怨恨。中国的老年人传统上受到尊重,今天的老年人口也期望得到照看。有些人甚至起诉自己的家庭把他们扔下不管。

根据官方估计,到 2030 年,对于据估算达 3 亿的老年人的赡养将消耗整整 10% 的国民收入。专家认为,除非采取进一步行动,否则照看老龄化人口的负担将开始成为对于中国发展速度的重要阻碍。

资料来源:英国广播公司(2000 年 9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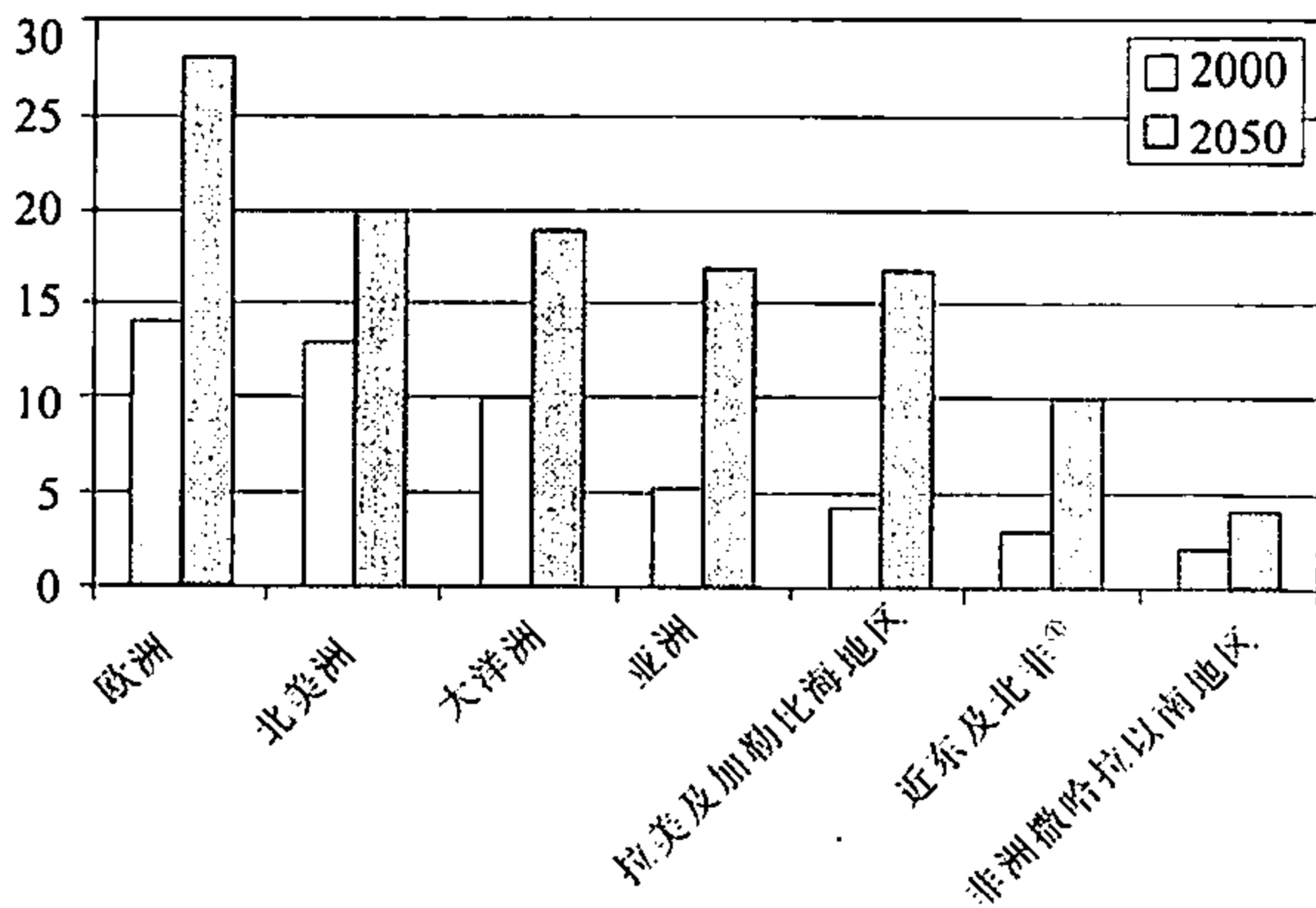


图 6.8 2000 年与 2050 年(预测)以区域分组的 65 岁以上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 UNFPA (2004)

这一爆炸性的形势对于社会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后果。目前有超过 150 个国家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或其遗属提供公共协助。老年人尤其可能需要得到花费高昂的保健服务。他们在数量上的迅速增长将会使得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医疗体系不堪重负,为老年人提供的保健开支很可能超出政府预算。

至于如何应对日渐增长的老年人口,各国差异甚大。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主要依赖政府养老金和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

vice) 来构筑一个安全网,满足老年人的资金与健康需要。其他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服务则更为多样。比如说在日本,男性和女性到了老年都还很活跃,因为日本文化鼓励这种活动,并且企业的政策也常常支持退休后仍为退休前的同一家公司工作。在日本有一些国家法律支持老年工人的就业与培训,而私有企业也支持再培训。

老龄化和全球化两相叠合,将会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塑造全世界老年人的生活。由于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仍在不断让位于全球企业的农

场、办公室和工厂中的劳动,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将会受到挑战。(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第三节第八小节有关“豆杆家庭”的讨论,家庭模式在西方世界已经处在变迁之中)就像 20 世纪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所有的社会都会受到挑战,要为自己的老年公民找到新的角色。这种挑战将包括确认新的经济支持手段,这常常是由政府方案来资助的。它还将包括找到一些方式来利用老年人可观的经验储备和才干资源,从而融合而不是孤立老年人。

本章要点

- 1 社会化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无助的婴儿通过与其他人接触,逐渐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有认知能力的人,并熟练掌握给定文化和环境的习俗。
- 2 根据米德的看法,孩童通过观察他人在社会背景中如何对待自己而逐渐理解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在下一个阶段,孩童参加组织化游戏,学习游戏规则,开始理解“一般化他人”,也就是一般性的价值和文化规则。

- 3 皮亚杰区分了孩童理解世界的能力发展的七个主要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了获取新的认知技能,并有赖于前一个阶段的成功完成。根据皮亚杰的观点,这些认知发展阶段是社会化的普遍特性。
- 4 社会化中介是社会化的重要过程发生于其中的结构化的群体或背景。在所有的文化中,家庭都是孩童在婴儿期间主要的社会化中介。其他影响还包括同龄群体、学校和大众传媒。

① 原文此处误为北美。接近东一般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包括非洲东北部和亚洲西南部,有时还包括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

- 5 大众沟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化中介的范围。大众印刷媒介的普及之后，就是电子沟通的运用。电视机的影响尤其巨大，每天定时触及各个年龄的人群。
- 6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几乎从婴儿诞生伊始就开始了。即使父母认为自己对孩子一视同仁，也往往会对男孩和女孩反应不同。这些差异又被其他许多文化影响进一步增强。
- 7 社会化会持续整个生命周期。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存在有待做出的转型或有待克服的危机。这包括直面作为生理存在之终结的死亡。
- 8 生物性老年化、心理性老年化和社会性老年化并不是一回事，在各文化内部和之间也有相当的差异。不将一个人的社会年龄与其实足年龄相混淆是很重要的。生理性老年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通过恰当的营养、饮食调节和锻炼，能够在年老时依然保持良好的健康。
- 9 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均走低，西方社会正在迅速走向老龄化或老年化。老年人口占据的比重很大，并且仍在迅猛增长。而这一人群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差异极大。不过，还是有可能区分出第三龄和第四龄，分别代表“小老人”和“老老人”。
- 10 功能主义老年化理论最初主张，让老年人脱离社会是可取的。脱离理论认为老年人应当放弃自己传统的社会角色，让年轻人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不久后就开始强调，积极参与、充实节奏是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源泉。关于老年化的冲突理论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常规运作如何产生了老年人当中形形色色的不平等。最近的理论则认为老年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在政治和经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 11 老年人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在物质上处于劣势。老年妇女比其男性同龄人更有可能承受贫困。而少数民族群的老年成员也更有可能比老年白人承受贫困。老年妇女比老年男人多许多，尽管这种不平衡正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减弱。
- 12 人口的老龄化已经导致了“依赖比”的上升。这也引发了有关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资金问题的新争论。
- 13 全球化威胁了老年人在许多社会中的传统角色。全世界的老年人的角色都正处在迅速转型之中。

思考建议

1. 社会化与思想灌输或洗脑的区别是什么？
2. 自我认同和我们的社会认同之间是什么关系？
3. 在复杂并迅速变迁的社会中，初级社会化有多么重要？
4. 一个人的老年化是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塑造的？
5. 除了生理特性，男孩和女孩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6. 是否存在一场“全球老年化危机”？
7. 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是否看见过年龄歧视的例子？

阅读指南

- Simon Biggs, *Understanding Age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理解老年化》
- R. Blackburn, *Banking on Death, or Investing in Life* (London: Verso, 2002). 《为死亡储蓄还是为生命投资》
- B. Bytheway, *Age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老年歧视》
- Chris Gilleard and Paul Higgs, *Contexts of Ageing: Class, Cohort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2005). 《老年化的背景——阶级、同期群与社群》
- Phil Mullan, *The Imaginary Time Bomb: Why an Ageing Population Is Not a Social Problem* (London: A. B. Taurus, 2000). 《幻觉中的定时炸弹：为何说人口老年化尚未构成社会问题》
- P. Laslett, *The Third Ag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9). 《第三龄》
- Peter G. Peterson, *Gray Dawn: How the Com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an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银色破晓：老年潮将至会如何改变美国乃至世界》
- John Vincent, *Old Age* (London: Routledge, 2003). 《老年》
-
-

网络导航

老年化政策中心 (The Centre for Policy on Ageing)

<http://www.cpa.org.uk/ageinfo/ageinfo.html>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老年化事业 (OECD—international work on ageing)

http://www.oecd.org/topic/0,2686,en_2649_37435_1_1_1_1_37457,00.html

联合国老年化计划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Age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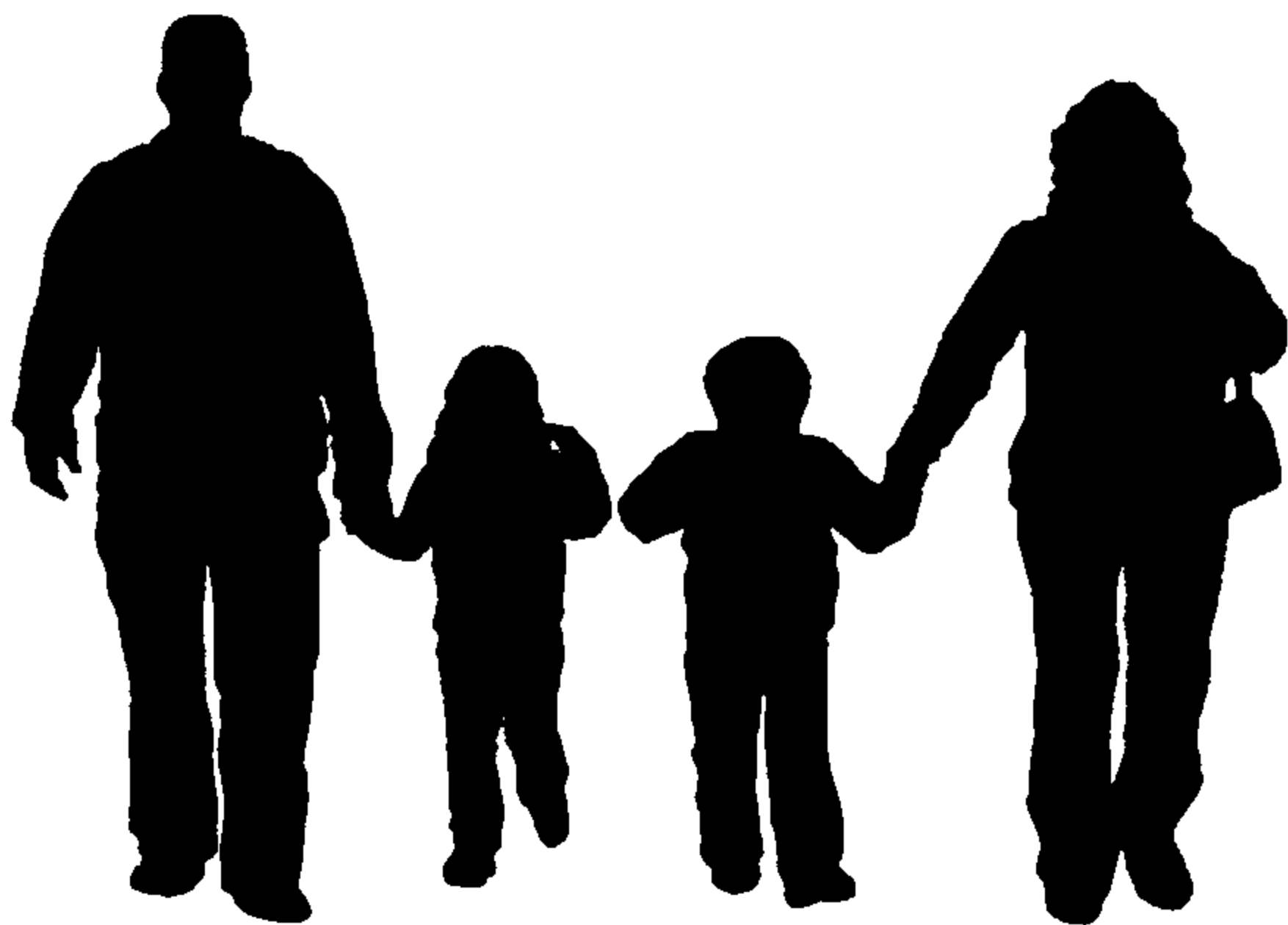
<http://www.un.org/esa/socdev/ageing>

世界卫生组织老年化与生命历程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 Ageing and the Life—Course)

<http://www.who.int/ageing/en/>

目录

第一节 基本概念	170
第二节 历史上的家庭	171
7.2.1 家庭生活的演变	172
7.2.2 我们从不那样:传统家庭的神话	173
7.2.3 世界范围内家庭模式的变迁	174
第三节 英国的家庭与亲密关系	175
7.3.1 整体特征	175
7.3.2 家庭模式的演变与多样性	175
7.3.3 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178
7.3.4 亲人暴力	180
7.3.5 家庭暴力	181
7.3.6 离婚与分居	182
7.3.7 家庭生活态度的变迁	187
7.3.8 新型伴侣关系与继亲家庭	190
7.3.9 传统婚姻与家庭生活形式的替代选择	192
第四节 有关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理论视角	196
7.4.1 功能主义	196
7.4.2 女性主义思路	196
7.4.3 晚近的视角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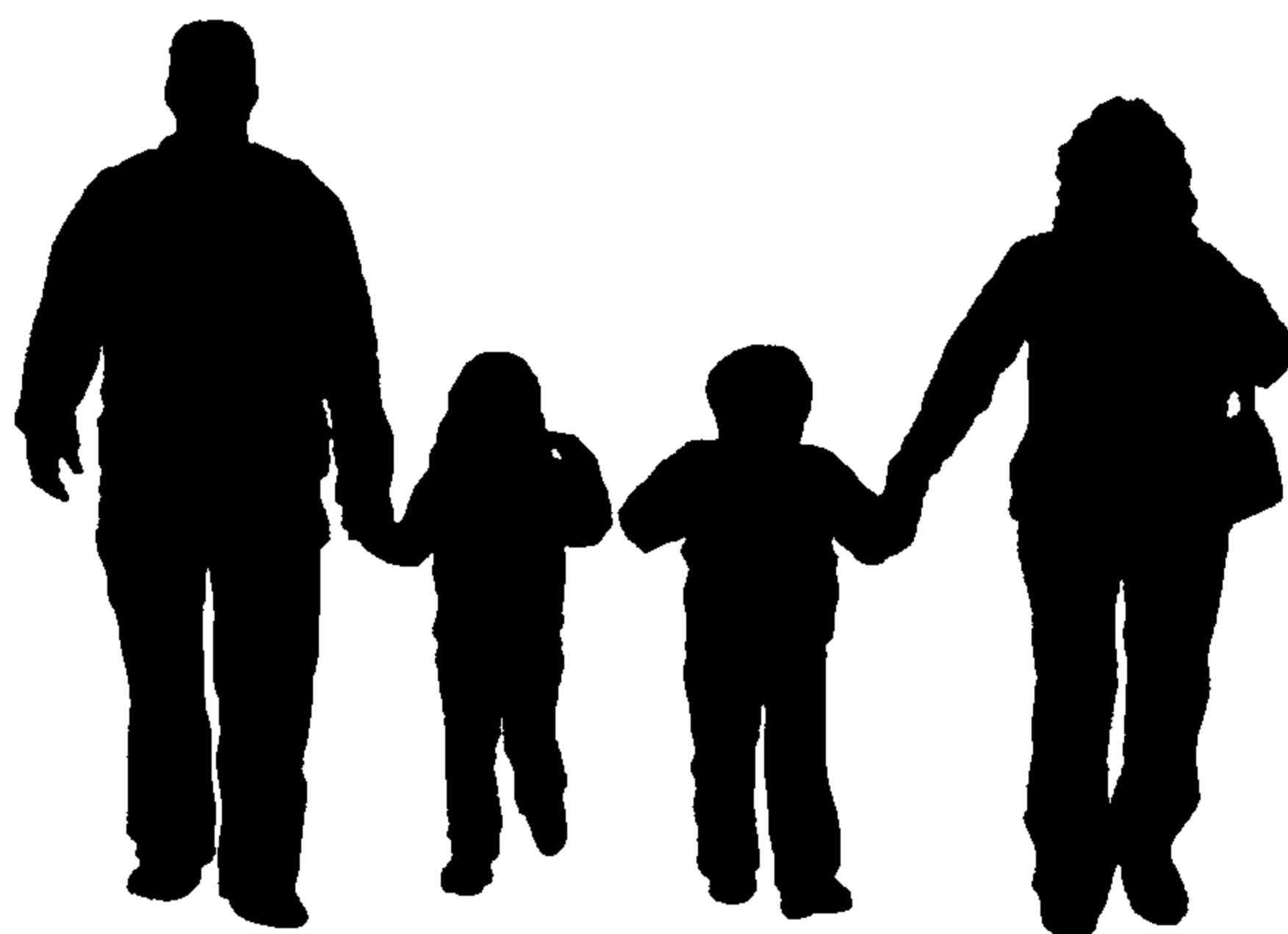
小结:家庭价值观之辩 201

本章要点 203

思考建议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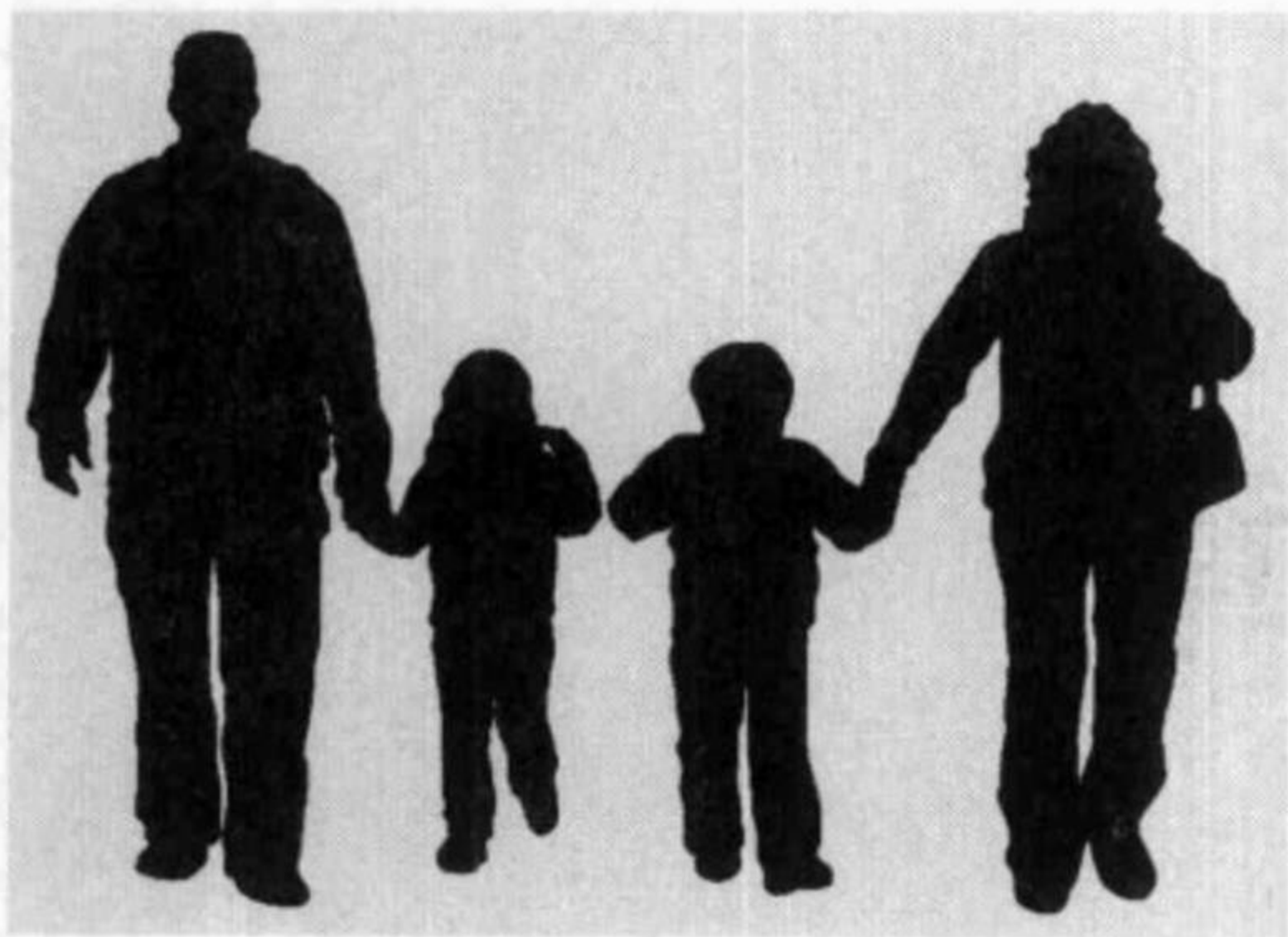
阅读指南 204

网络导航 204



第七章

家庭与亲密关系



你恋爱过吗？几乎可以肯定你有过。绝大多数的人从十来岁开始就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儿。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爱情和浪漫提供了我们曾经历过的最深切的一些情感。那么为什么人们会陷入爱河呢？答案乍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爱情表现的是两个人彼此之间感到的一种身体上的（physical）相互依恋。现如今，我们或许会对爱情“永恒”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但我们往往还是会认为，陷入爱河是源于普遍的人类情感的一种经历。陷入爱河的一对儿希望在这种关系中满足个人和性方面的需求，或许是通过结婚，以及 / 或者生儿育女，这似乎是很自然的。

然而，这种今天在我们看来似乎很“自然”的情形，其实是很不寻常的。与一个你所爱恋的人确立一种长期的伴侣关系（partnership），或者生儿育女，并不是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们的经历。比如说，在英国的某些亚裔社群中，包办婚姻依然是通例。在这些情况中，很少认为恋爱与婚姻或和生儿育女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所谓将长期的伴侣关系建立在浪漫之爱的基础上，这种想法只是在非常晚近的时候才在我们的社会普及开来，而在大多数其他文化中，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只是在现代，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爱情和性才被视为密切相关。欧洲中世纪史学家约翰·博斯韦尔曾经指出，我们关于浪漫之爱的现代观念是多么不同寻常。在中世纪的欧洲，

几乎没有任何人结婚是为了爱情。事实上，中世纪有一句俗话说：“喜欢自己老婆，还要带着感情，只有通奸才会。”在那时候，以及此后的多少个世纪，男男女女结婚主要是为了把财产留在家中，或者生儿育女来添补家庭农场的人手。结婚以后，他们也可以成为亲密的同伴。但是，这发生在结婚之后，而不是结婚之前。人们有时会有婚外性行为，但这些行为很少引发我们今天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情感。浪漫之爱被视为充其量也是一种缺陷，弄不好就成了一种病。

而我们今天的态度则几乎是完全相反。博斯韦尔很准确地指出了“现代工业文化对于”浪漫之爱的“近于执迷”：



那些沉浸于这一“爱河”的人往往视之为理所当然……当代仍旧处于前现代或非工业化阶段的文化中，极少会同意在西方世界不存争议的一种说法，即所谓“男人就是用来爱女人，女人就是用来爱男人。”绝大多数的人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和地点都会发现，这样来衡量人类价值实在是浅薄！

(Boswell 1995: 页 xix)

只是到了18世纪晚期，浪漫之爱的概念才开始崭露头角。浪漫之爱不同于多少有些普遍的激情之爱的冲动，是要将它的对象理想化。浪漫之爱的观念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小说的兴起基本上是同时的，而浪漫小说的传播也在浪漫之爱观念的传播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Radway 1984)。尤其是对于女人来

说，浪漫之爱就是要告诉自己一些特别的故事，关于这种关系怎样能够导致个人的实现。

因此，不能把浪漫之爱理解为人类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相反，它是由广泛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塑造而成的。对于当今英国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一对配偶 (couple)，无论是已婚的夫妇，还是未婚的情侣，这就是所谓家庭的核心。一对配偶之所以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因为家庭的经济角色逐渐衰微，而爱情，或者说爱与性的吸引力，成为形成婚姻纽带的基础[尽管我们在本章下文会看到，“家庭”这个词绝不应当只理解为包含一对异性恋的夫妻 (couple) 和他们的孩子]。

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良好的关系是建立在情感沟通或亲密性 (intimacy) 的基础上的。亲密性的观念，就好像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其他许多熟悉的观念一样，也是晚近才有的。我们已经看到，婚姻在过去从来也不



英国广播公司(BBC)翻拍的简·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讲述了一个不畏困境追求浪漫之爱的经典故事。

是建立在亲密性和情感沟通的基础上的。它对于美满婚姻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并非后者的根本基础。对于现代的配偶来说它才是。沟通首先是建立良好关系的手段,也是保持这种良好关系的主要依据。一种良好的关系必须是相互平等的,双方拥有平等的权利,履行平等的义务。在这类关系中,双方相互尊重,也相互期待。交谈或者说对话是使关系运转的基础。如果人们不尽力掩藏,关系就会运转得很好,因为必须得有相互的信任。而信任也是需要努力开发的,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最后一点,一种良好的关系是摆脱了任意武断、胁迫强制乃至暴力的(Giddens 1993)。

本书大部分内容所讨论的主题就是社会变迁。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起伏跌宕,艰辛重重,并且新奇陌生。这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界,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应对。上文有关浪漫之爱的讨论表明,这一看法用在个人与感情生活的领域,比用在其他任何领域中

都更为贴切。

那么,我们如何着手理解这些变迁及其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的性质呢?我们只有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了解其他社会中的人现在是怎样生活的,才有可能理解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家庭如今究竟怎么了。因此,本章中我们将来看看婚姻与家庭的历史发展。然后我们将探讨今日英国的家庭与亲密关系。本章最后一节将讨论一些试图说明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理论视角,最后介绍当前有关“家庭价值”的争论。

第一节 基本概念

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尤其是家庭、亲属制度以及婚姻的概念。所谓家庭,就是直接由亲属关系联结起来的一群人,其成年成员负责照料孩子。所谓亲属制度纽带,是指



在这张不同寻常的全家福上,有犹他州的多偶婚奉行者汤姆·格林和他的五位妻子,以及他总共 29 个孩子中的一部分。

个体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或是通过婚姻而形成,或是通过连接血亲(母亲、父亲、同胞、子嗣等)的血统关系而确立。所谓婚姻,可以被界定为两个成年个体之间被社会所承认与许可的性的结合。当两个人结婚时,他们便彼此成为对方的“亲属”;不过,婚姻纽带还把更大范围内的亲属连接起来。通过婚姻,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血亲便成为配偶的亲戚。

家庭关系总是在更宽泛的亲属制度群体内得到确认的。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里,我们都能够识别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之为核心家庭的群体组织:两个成年人与他们亲生或领养的孩子一起住在一个家户(household)里。在绝大多数传统社会中,核心家庭还属于某种更大的亲属关系网络。当住在同一家户中的不只是一对已婚夫妇及其子女,而且还有近亲,或是彼此之间有一种紧密而又持续的关系时,我们便称之为扩大家庭。一个扩大家庭可能包括(外)祖父母、兄弟及其妻子、姐妹及其丈夫、姑娘和甥侄。

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婚姻因此连带家庭都是与单偶婚相关联的。对于一个男子或女子来说,在任何一段时间内与一个以上的人结婚都是违法的。然而,并非处处如此。乔治·默多克(Murdock 1949)对20世纪中期几百个社会做了著名的比较研究,发现80%以上的社会容许多偶婚,也就是一个丈夫或妻子可以有一个以上的配偶。多偶婚有两种类型:一夫多妻制与一妻多夫制。在一夫多妻制中,一个男子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的女子结婚。而一妻多夫制则要罕见得多。在这种婚姻制度中,一个女子可以同时拥有两个或更多的丈夫。西方社会中实施一夫多妻制最有名的群体就是原教旨主义的摩门教徒,大部分以犹他州为基地。犹他州在美国,而美国这种习俗是违法的,但也没有什么迫害。一个世纪前,随着犹他州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犹他州的主流摩门教徒放弃了

拥有许多妻子的做法。据估计,犹他州约有3万原教旨主义者还在奉行一夫多妻制。

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我们不能讲单数的“家庭”(the family),因为这样一来,好像存在一种多少具有普遍性的家庭生活模式似的。而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有许多种家庭形式:双亲家庭(two-parents families)、继亲家庭(step-families)、单亲家庭(lone-families)等等。社会学家戴安娜·吉廷斯(Gittins 1993)指出,说复数的“家庭”(families)而不是单数的“家庭”会更合适些。说复数的“家庭”就强调了家庭形式的多样性。虽然为简便起见我们经常讲单数的“家庭”,但决不应该忘记其中包含的多样性。

第二节 历史上的家庭

社会学家曾经认为,在现代之前,西欧家庭的主导形式是扩大家庭。但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由一对父母及其抚养中的孩子所组成的核心家庭,似乎长期占据了显著地位。前现代的家户规模确实比今天要大,但差异并不那么显著。比如说在英格兰,从17世纪到19世纪,家户的平均规模为4.75人。而英国目前的家户平均人口则为2.4人(HMSO 2004)。鉴于早期的数字还包括了家仆,可见家庭规模的差异并不大。

前现代欧洲的孩子常常从七八岁就开始劳动,帮助他们的父母在农场干活。至于那些没有继续留在家庭经营中的孩子,也常常很早就离开父母,去别人家里做家务或是去做学徒。去别人家里劳动的孩子们很少会再见到自己的父母。

其他因素也导致了家庭群体比现在更加不稳定,虽然现在的离婚率很高。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一年中每千人死亡的数目)都要高

得多。在现代早期的欧洲,超过四分之一的婴儿不到一岁就夭折了(相形之下,如今这一比例远不到百分之一)。而妇女也常常死于难产。孩子的夭折或是配偶一方或双方的亡故,常常会使家庭关系彻底瓦解。

7.2.1 家庭生活的演变

历史社会学家劳伦斯·斯通勾勒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欧洲家庭生活形式的一些变迁。斯通把16世纪到19世纪的家庭演变区分为三个阶段:

1 在这个时段的早期,主要的家庭形式是一种核心家庭,生活在比较小的家户之中,但与包括其他亲属在内的整个社区维持着深层的密切关系。这种家庭结构与社区并没有明确的分离。根据斯通的看法(尽管有些史学家已经提出了质疑),当时的家庭

并不是家庭成员情感依恋或依赖的焦点。我们今天与家庭生活维系在一起的那种情感亲密性,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体验到,也不曾寻求过。婚姻之内的性并不被视为快乐之源,而只是繁衍子嗣之必需。个人在婚姻及其他家庭生活事务方面的选择自由从属于父母、其他亲属乃至整个社区的利益。贵族集团内部有时会积极鼓励情欲或浪漫之爱,但在这些集团之外,道德家和神学家们会把这些东西看作弊病。按照斯通的说法,这一阶段的家庭“是一种目标不定、低调克制、缺乏情感、权威主义的制度,……它也非常短命,常常因为丈夫或妻子的死亡、孩子的夭折或很早离家而解体。”(Stone 1980)

2 在这种家庭类型之后继之而起的,是一种过渡形式,从17世纪早期延续到18世纪之初。后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社会的上层,但它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



核心家庭真的成为过常态吗?

从它发端的那些态度后来四处传播，几乎成为普遍的立场。核心家庭成为更具分离性的实体，有别于与其他亲属和当地社区之间的纽带。对于夫妻之爱、亲子之爱，也越来越强调其重要性，尽管父亲的权威力量也有增长。

- 3 在第三个阶段，逐渐发展出了我们今天在西方世界最熟悉的那种家庭制度类型。这种家庭是由密切的情感纽带维系起来的群体，享有高度的家内私密性，对子女的抚养非常重视。它的典型标志就是情感性个体主义的兴起，就是在性的吸引力或浪漫之爱的引导下，基于个人选择而结成婚姻纽带。爱情中性方面的意味在婚姻自身内部而不是婚外关系当中得到美化。随着与居家相分离的工作场所越来越普及，家庭愈益紧密地围绕着消费而不是生产。妇女们开始与家务联系在一起，而男人们成为赚钱养家的人。近几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出外工作，所谓男性赚钱养家者在家里“做主”的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而家庭结构也还在不断多样化。（我们将在本章下文进一步考察这些变迁）

本章开篇提到的历史学家博斯韦尔也曾经指出：

在前现代的欧洲，婚姻最初常常是一种财产安排，中间基本上是抚养孩子，到最后才事关爱情。事实上，没几对夫妻是“因爱”成婚的，倒有许多是先共同经营家户，抚养子嗣，共享生活经历，在此过程中逐渐培养出彼此之间的爱情的。几乎所有留存下来的写给亡故配偶的墓志铭都展露出深切的依恋。

与此相反，以爱情开启的婚姻，中间也基本上是抚养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而到最后常常只是事关财产，爱情到此时已不再出场，或是只剩下缥缈的记忆。（Boswell 1995: 页 xxi）

7.2.2 我们不像那样：传统家庭的神话

许多人士，一般是那些基于保守立场著书立说的人，认为家庭生活正在遭受危险的破坏（我们将在本章结语考察目前有关家庭价值的争论）。他们将自己眼中的家庭之衰落与较为传统的家庭生活形式两相对照。但过去的家庭真像许多人回忆的那样和谐安宁吗？抑或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虚构？斯蒂芬妮·孔茨在其《我们不像那样》一书（Coontz 1992）中指出，如果我们回顾往昔时代，看看真实的情形，涂抹在所谓“传统家庭”上的玫瑰色彩就会脱落，就像有关过去黄金时代的其他图景一样。

许多人羡慕维多利亚时代家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风纪（discipline）和稳定。然而，由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承受着特别高的死亡率，因此婚姻的平均长度不足12年。有超过一半的孩子在21岁之前至少看到过双亲之一去世。维多利亚时代家庭之所以风纪井然，令人羡慕，根源在于父母对子女享有严格的权威。依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权威的实施方式会被视为过于严苛。

即使我们考虑20世纪50年代的维多利亚式家庭，也看不到什么理想的家庭。^①在这一时期，妻子们多少被强制限于家务。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妇女被认为应当谨守妇德，而男人们在性方面则可以放纵淫逸。许多人寻花问柳，是妓院的常客。事实上，妻子和丈夫之间常常没什么交往，只通过孩子沟通。不仅如

① 1851年的英国水晶宫大博览会开幕，使长达60多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进入巅峰，而这十年结束之时，1861年，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也去世了。维多利亚本人生了九个孩子，但她痛恨怀孕和分娩，讨厌婴儿，一有孩子在跟前就不舒服，而就在这个女王统治下的这个时期的英国社会，却把母性和家庭都理想化了。

此,对于这一时期的较为贫困的群体来说,连家务都不能作为一种选择。在工厂和工场中,整个家庭终日工作,没什么时间投入家庭生活。童工在这些群体中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我们最近的记忆让我们认为,20世纪50年代也是理想家庭的年代。在这段时期,妇女们只在家中劳动,而男人们负责赚钱养家。然而,许多女性并不真的想要退回到纯粹居家的角色,觉得这样可怜可悲,会受到束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备战应战的一部分,许多女性拥有有薪工作。而当男人们复员归家,她们也就丧失了这些工作。不仅如此,男人们在情感上也与妻子们颇为隔膜,在性方面常常遵守着明显的双重标准,自己在外沾花惹草,却给自己的配偶定下严格的规则。

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写过一部畅销书《女性的奥秘》,于1963年出版,不过它的研究针对的是20世纪50年代。当弗里丹谈起“默默无闻的问题”(problem with no name),也就拨动了成千上万的女性的心弦:养儿育女烦琐不堪,家务劳动单调乏味,还有一个丈夫只是偶尔出现,却不可能有多少情感沟通,居家生活被这些东西所缠绕,具有压迫的性质。而许多妇女所忍受的,还比这种压迫性的居家生活更为严酷:许多家庭都要承受酗酒和暴力,而那个时代的社会尚未充分准备好应对这些问题。

7.2.3 世界范围内家庭模式的变迁

今日世界的许多社会中都存在着多样化的家庭形式。在有些地区,比如更为遥远的亚洲、非洲和环太平洋地区,传统的家庭体系并没有多少变化。但在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迁。这些变迁的起源是复杂的,但可以挑出几点特别重要的因素。其一便是西方文化的传播。比如说,西方的浪漫之爱理念就已经传入了一些从前对此闻所

未闻的社会。另一个因素是在一些此前由许多自治小社会组成的地区发展起了集权政府。民众的生活就此不得不因为卷入一个全国政治体制而受到影响。不仅如此,政府还积极尝试改变传统的行为方式。由于迅速扩张的人口增长成了大问题,比如说在中国(参看本章结语的讨论),国家常常引入一些行动方案来倡导小家庭、使用避孕措施等等。还有一种更进一步的影响,就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男人常常去往城镇都市打工,把妻儿老小留在农村老家。另一种选择是整个核心家庭群体迁往城市。无论哪一种情形,传统的家庭形式和亲属体系都可能被削弱。最后一点,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业机会脱离土地,在政府机关、矿山、种植园或大农场乃至工业企业——如果有的话——等组织中,此前以当地社区中的土地耕作为核心的家庭体制受到了破坏性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些变迁正在创造一股全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扩大式家庭体制和其他亲属群体类型趋于瓦解。威廉·J·古德在其《家庭模式的世界革命》一书(Goode 1963)中最先记叙了这种趋势,而后续研究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晚近的发展

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迁如下:

- 1 家族和其他亲属群体的影响力正在衰落。
- 2 自由择偶渐呈普遍趋势。
- 3 无论是婚姻的缔结,还是家中的决策,妇女权利都愈益得到广泛承认,
- 4 包办婚姻越来越少见。
- 5 先是男性后是女性,在那些曾经非常限制的社会中都正在发展起程度比较高的性自由。

- 6 儿童权利的扩展已经成为普遍趋势。
- 7 同性伴侣关系愈益被人们接受。

夸大这些趋势,或是认定它们在全世界的发生情形千篇一律,都会是一种误解,其中有许多还正在奋争之中,并且遇到强烈的抵制。(例如第二十章第二节第一小节讨论的阿富汗在1996年到2001年塔利班统治期间对于妇女权利的压制,说明这些趋势并非毫无二致)与此类似,也不能假定无论何处的扩大家庭都处于衰微之中。在今日大多数社会中,正常形式依然是扩大家庭,而传统的家庭习俗还在延续。不仅如此,变迁的发生速度也各有不同,也会出现回潮和逆流。

第三节 英国的家庭与亲密关系

有鉴于今日英国在文化上的多元性,英国在家庭和婚姻方面也有相当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包括白人与非白人的家庭模式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来考察为何会如此。然后我们将结合当代家庭生活模式,来探讨离婚和再婚的有关话题。不过,我们不妨首先来描述英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共享的一些基本特征。

7.3.1 整体特征

在英国,家庭整体而言具有如下特性:

- 1 像其他西方家庭一样,英国家庭也是一夫一妻制的,法律确立了这种单偶婚制。然而,有鉴于英国现在存在的高离婚率,有些观察家指出,英国的婚姻模式应当称为系列单偶婚制(serial monogamy)。也就是说,个体被允许接连拥有好几个配偶,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同时拥有超过一

个妻子或丈夫。当然,要把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与实际的性活动混为一谈,就是一种误导。很显然,有相当比例的英国人与自己配偶之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

- 2 英国的婚姻是以浪漫之爱的观念为基础的。情感性个体主义已经蔚然成风。夫妻双方被期待发展出基于个人吸引力与亲和力的相互依恋,作为订立婚姻关系的基础。浪漫之爱作为婚姻的一部分,在当代英国已经“自然化了”,似乎成为人类经验的寻常通例,而不是现代文化的特有属性。当然,现实与这种观念形态还是有差异的。对于婚姻中个人满足的强调提升了期待,有时候不能得到满足,这也是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原因。
- 3 英国家庭实行父系制和新居制。所谓父系传承,包括孩子沿承父姓。在过去,这还意味着财产通常延循男方谱系传承,只是今天这种习俗少见得多了。(世界上有许多社会是母系制的,姓氏是延循女方谱系传承,财产常常也是如此)所谓新居制模式,就是一对已婚夫妇搬进一处脱离各自家庭的居所。不过,新居制并不是英国一成不变的特性。英国有许多家庭,尤其是那些比较贫穷的家庭、工人阶级家庭或亚裔社区家庭,实行从妻居,新婚夫妻住在离新娘父母不远的地方。(如果夫妇住在新郎父母附近甚至住在公婆家,则叫做从夫居)
- 4 英国家庭常常被描述为核心家庭,包括父母一方或双方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个家户中,尽管说核心家庭单元与其他亲属纽带绝不是彻底隔绝的。无论如何,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核心家庭的主导地位正在遭到侵蚀。

7.3.2 家庭模式的演变与多样性

根据拉波波特等人的看法,“今日英国的家庭正处在变迁之中,从一个对于家庭应当怎



亚裔扩大家庭常常表现出牢固的家庭纽带。

样有着单一主导规范的社会,到一个承认有多种合法并且其实也是可取的规范的社会。”

(Rapoport et al. 1982: 476) 他们为了具体说明这一观点,区分了五种多样化类型:组织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阶级多样性、生命历程多样性和同期群(cohort)多样性。我们还可以再加上性的多样性。拉波波特等人所区分的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在今天比她^①20多年前写书时要更为明显。

第六章第三节也讨论了生命历程。

家庭如何组织它们各自的个人家庭义务,如何组织其与广泛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结,方式多种多样。在“正统”家庭里,妇女是“家庭主妇”,丈夫是“赚钱养家的”。这种家庭与父母都出外工作的家庭、与单亲家庭之间的对比,就能体现这种多样性。从文化上说,有关家庭的好处和价值的多样性比以往大多了。少数族群(比如下文要讨论的亚裔或加勒比裔)的凸显,女性主义之类运动的影响,导致了家庭形式方面呈现出相当可观的文化多样性。穷

人,有熟练技能的工人阶级,以及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当中各类群体,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的阶级划分,也在家庭结构方面维持了重大的差异。在生命历程中的家庭经历方面的变异也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出生于一个双亲俱在并共居的家庭,然后自己成家了,然后又离婚了。而另一个人可能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后来结了好几次婚,每一次还都留下了孩子。

同期群这个术语指的是家庭内的代际群体。比如说,父母辈和祖父母辈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可能比以往淡漠了。另一方面,得享高寿的人现在也更多了,因此有可能出现三个“持续中的”家庭共存,彼此关系密切。已婚的孙辈、他们的父母以及祖父母辈。家庭组织领域在性方面的多样性也比以前更大了。随着同性恋在许多西方社会中愈益得到接受,伴侣关系和家庭的基础不仅是异性配偶,也可以是同性配偶了。

第十二章引言将讨论同性恋婚姻。

① 原文如此,应为“她们”。

一 南亚裔家庭

在英国家庭的多种类型中,有一种模式与其他大多数模式存在着显著区别,这就是与南亚裔群体相联系的家庭模式。英国的南亚裔人口有一百多万。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移民主要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三块区域:旁遮普(Punjab)、古吉拉特(Gujarat)和孟加拉。^①在英国,这些移民形成了以宗教、来源地、种姓以及最重要的一项即亲属制度为基础的社群。许多移民发现,他们关于荣誉与忠于家族的观念在本土英国人中几乎完全不存在。他们努力维护家庭的统一完整,但住房条件却很成问题。在破落衰败的地区可以找到比较大的旧房子;而搬进高档住房则意味着要搬入较小的房子里,并拆散扩大家庭。

今天,在英国出生的南亚裔孩子常常生活在两种迥异的文化之中。在家里,他们的父母期望或要求他们遵从合作、恭敬与忠于家庭的规范;而在学校里,人们则期望他们在一个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追求学业上的成功。由于他们很看重与传统家庭生活相联系的亲密关系,因此大多数人从其族群亚文化的角度来组织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但是,与英国文化的牵扯已经带来了一些变化。西方“为爱”而结婚的传统经常与亚裔社群包办婚姻的习俗相冲突。这种由父母和家庭成员包办的婚姻,是以相信婚后一起过日子自然会有爱情为前提的。而年轻一代无论男女,现在都要求在其婚事的安排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协商。

政策研究所(Policy Study Institute)进行的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调查的统计结果(Modood et al. 1997)显示,印度裔、巴基斯坦

裔、孟加拉裔和非亚混血种是最可能结婚成家的少数族群。2001年,在全部有受抚养孩子的家庭中,65%的亚裔或英亚通婚独立家户(one-family households)包括一对已婚夫妇,而在白人和非洲及加勒比裔人^②中,这一比例则较低。有孩子的亚裔和英亚通婚配偶中,同居的比例也比其他族群低(参看表7.1)。虽然在英国的南亚裔家庭中也有某些变化的迹象,比如年轻人希望在婚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离婚与单亲家庭略微增多,但总的来说,在英国的南亚族群仍然拥有相当坚固的家庭纽带。

二 黑人家庭

英国的非洲及加勒比裔家庭同样有一种不同的结构。在20至45岁的黑人妇女中,与丈夫一起生活的人要比同年龄组的白人妇女少得多。非洲及加勒比裔的离婚和分居率也高于英国其他族群。单亲家户在非洲及加勒比裔中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更为常见。然而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是,非洲及加勒比裔的单身母亲更可能有工作(Modood et al. 1997)。从下面的表7.1可以看到,黑人或英黑通婚者相比于其他族群,单亲家庭的比例更高。

在英国,同样的因素似乎也在影响伦敦和其他城市贫民区中的黑人家庭。许多关于黑人家庭的讨论只关注正式婚姻的比例较低这一点,但一些论家指出,这种强调是错位的。黑人家庭的结构不像其他群体的家庭那样必须通过婚姻关系来构成。在加勒比裔群体中,扩大的亲属制度网络是很重要的。相对于婚姻纽带来说,这种扩大的亲属制度网络要比在英国大多数白人社群中重要得多。一个在单亲家庭中

① 二战后这些地区有过不同程度的分割,分属过巴基斯坦、印度和1971年才成立的孟加拉国。旁遮普和孟加拉不能简单对应于如今的印度旁遮普邦和孟加拉国。古吉拉特现为印度西南部邻接巴基斯坦的一个邦。印度另有西孟加拉邦。

② 原文为“African-Caribbeans”,即西印度群岛人,我们译为加勒比裔。

表 7.1 有受抚养孩子的英国家庭:分族群统计,^a2001(%)

	独立家户			有受抚养孩子的其他家户	合计
	已婚配偶家庭	同居配偶家庭	单亲家庭		
白人	60	12	22	6	100
混血	38	11	39	12	100
亚裔或英亚通婚					
印度裔	68	2	10	21	100
巴基斯坦裔	61	2	13	24	100
孟加拉裔	63	2	12	23	100
其他亚裔	66	3	12	19	100
亚裔或英亚通婚合计	65	2	11	22	100
黑人或英黑通婚					
加勒比裔黑人	29	11	48	12	100
非裔黑人	38	7	36	19	100
其他黑人	24	9	52	15	100
黑人或英黑通婚合计	32	9	43	15	100
华裔	69	3	15	13	100
其他族群	67	3	18	12	100
所有族群合计	60	11	22	7	100

a: 依照户主所属族群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2004), 页 28

当家的母亲很可能会有一个亲密的、能从中获得支持的亲戚网络借以依赖。许多非洲及加勒比裔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在养育幼儿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Chamberlain 1999)。这与那种认为黑人单亲及其子女必然形成不稳定家庭的观念相矛盾。

没有孩子, 或者想不想要孩子 (现在这种问法在英国和美国都成了不合法的)。而对于男性求职者, 他们几乎从来不问这种问题。他们在这么问的时候, 会对答案有两点想法: 有孩子的女人会在学校放假或孩子生病的时候额外请假, 照顾孩子的责任是母亲的而不是父亲的问题。

7.3.3 家庭内部的不平等

一 工作家庭何以两全

影响妇女职业生涯的主要因素之一, 就是男人对于女性雇员的观念, 认为她们总会把生儿育女放在第一位, 而工作则是次要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国做的一项研究 (Homans 1987), 考察了一些管理人员在面试应聘医疗卫生领域技术职员岗位的女性求职者时的观点。研究者发现, 面试官总是会问这些女性, 有



英国的非洲及加勒比裔人中单亲家庭比例很高。

有些管理人员觉得,他们的问题体现出对于女性雇员的“照顾”。但绝大多数的管理人员认为,这种提问思路属于他们的职责,要评估一个女性求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明是一位值得依赖的同事。所以有一位管理人员这样说道:

这是有点属于私人问题,我也知道,可我觉得这事儿必须考虑。这事儿其实不会发生在男人身上。不过我觉得它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公平。这不是一种机会平等,因为男人从不觉得自己还有个家庭。(Homans 1987)

尽管男人不能在生物学的角度上,以养育子女的意义而“拥有一个家庭”,但他们有可能充分参与和负责照顾孩子。而研究中的所有管理人员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针对女性的晋升也有同样的态度。女人不管可能达到多么高级的职位,也会被认为有可能因为照顾小孩而打断其职业生涯。在这项研究中,少数几位身居高管职位的女性都是没有孩子的,其中有几位计划未来还要孩子,不过坦言准备离职,或许以后还会重新培训,去从事其他的职业。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发现?女性的工作机会受限,是否主要因为男性的偏见?有些管理人员表现出这样的观念,认为有孩子的女人就不应当工作,而应当专心照顾孩子,打理家庭。不过,大多数管理人员还是接受这样的原则:女性和男性应当拥有同样的职业机会。这些管理人员态度上的偏差与工作场所本身没什么关系,而是更多地涉及为人父母的家庭责任问题。只要绝大多数的人想当然地认为,为人父母的责任不可能由女人和男人平等分担,那么女性雇员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始终存在。正如一位管理人员所言,女性与男性相比,在职业机会上身处劣势,这始终会是严峻的生活现实。

此外,正如我们在早前看到的,就业女性

的平均工资比男性要低一大截,尽管在过去30年间,这种差距已经有所缩小。即使在同样的行业里,女性的平均薪酬也低于男性。

特里·阿普特在其《职业妇女没有妻子》一书(Apter 1994)中提出,女性觉得自己是在和两种相互矛盾的力量搏斗。她们期望并且需要经济上的独立,但同时又想要做好孩子的母亲。两种目标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成家的男人可以让妻子承担家务的主要责任,自己成就事业,而成家的女人却不能如法炮制。提高职业生活的弹性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让男人们改变他们的态度则要困难得多。

二 家务

尽管在近几十年来的英国,妇女的地位已经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包括女性进入曾经由男性主导的专门职业,但有一块工作领域却远远落在后面:家务。由于已婚妇女出外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及随之而来的地位的改变,男人会加大对于家务的奉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整体而言,这并非实情。尽管男人们现在比30年前做的家务多了些,女性的负担也少了些,但依然是不均衡的。英国最近的一些调查发现,女性依然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在这些事情上平均每天花费4小时3分钟,而男性则为2小时17分钟(HMSO 2005)。有些社会学家提出,女性已经在有新部门工作,这种额外的工作事实上就成了“夜班兼职”(Hochschild 1989; Shelton 1992)。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类似的发现使得霍克希尔德将男女关系的状况称之为“被阻缓的革命”。为什么家务始终是女人的事情?这个问题始终是晚近大量研究的探讨焦点。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对于这一现象最好的说明,就是视之为经济因素的结果。家务劳动乃是作为经济支持的交换。由于女人挣得比男人少,她们更有可能在经济上始终依赖其丈夫,因此就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一旦收入差距

缩小,女人就可能保持独立地位。霍克希尔德提出,女人因此受到男人的双重压迫,“日班正职”(first shift)时受一次压迫,“夜班兼职”(second shift)时又受一次压迫。但是,尽管这种依赖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家务的社会性别化特征,但碰上妻子挣得比丈夫多的情况,这种模式就站不住脚了。比如说,霍克希尔德所研究的那些丈夫中,有些挣得也比妻子少,却没有一个平摊家务。

有些社会学家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追问家务的做还是不做是如何关系到社会所创造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比如说,霍克希尔德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发现家务活儿的分派明显遵循了社会性别化的界限。妻子们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日常杂活儿,比如买菜做饭,洒扫庭除;而丈夫们往往承担比较偶然的任务,比如修葺草坪、修理工具或整修房屋之类。这两类任务的主要差别在于做活儿的时候个体有多少程度的控制。女人在家里做的事情往往把她们困在一套限定的时刻表上,而男人做的家务活儿并不那么有规律,比较能够自由处置。

社会学家玛乔丽·德沃在其《养育家庭》一书中(Devault 1991),讨论了家庭内部的照顾活动是如何被社会建构为女人的事情。她提出,女性之所以承担大部分家务,是因为家庭“把照顾活动与女性在家里的地位牢固并比较持久地融为一体”。德沃观察了做饭的责任分工,认为煮饭和吃饭的社会性别化关系“传递了一种信息:提供服务是做一个女人的分内之事,而接受这种服务根本上也是做一个男人的分内之事”。即使是在男人分担家务的家庭里,配偶之间的家务劳动平等分工也会在有了孩子以后受到极大的妨碍:孩子需要持续地照看,而他们的照看时刻表常常是无法预测的。母亲们花在育儿事务上的时间要比其配偶多得多(Shelton 1992)。

社会学家提出,支撑着这种不均衡的任务分配的是这样一种理解:男人和女人负责不同

的领域,也应当在不同的领域里活动。男人被期待成为一个挣钱养家的人,而女人被期待成为照料家庭的人,即使她们又当母亲又出外挣钱工作。这样的期待增强了在孩童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再生产这些角色,男人和女人“贯彻了社会性别”(do gender),增强了作为社会区分男人与女人的一种手段的社会性别。

7.3.4 亲人暴力

由于家庭或亲属关系构成了每个人生存的一部分,家庭生活几乎涵盖了情感体验的方方面面。家庭关系,即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或者远亲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温暖的、令人满足的,但它们同样可能充满着极为明显的紧张,令人绝望,或者使他们极其焦虑,愧疚不已。电视广告及大众媒体的其他地方经常强调家庭生活的那种和谐融洽的美好图景,而家庭生活的这一面揭示了这种图景的虚假之处。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是两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

儿童性虐待

儿童性虐待可以非常方便地定义为成年人对承诺年龄(age of consent)(在英国,承诺年龄为16岁)以下的孩童实施的性举动。而乱伦是指近亲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是所有的乱伦都是儿童性虐待。例如,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是乱伦,但却不符合关于虐待的界定。在儿童性虐待中,成人基本上是为了性的目的而利用幼儿或儿童。但是,最常见的乱伦形式是那种父亲与年少女儿之间的乱伦关系,它同时也属于儿童性虐待行为。

乱伦,以及更为普遍的儿童性虐待,只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才被“发现”的现象。当然,人们早就知道有这种性行为的发生,但大多数

社会观察家一直认为,由于存在强烈反对此类行为的禁忌,那么这种现象应该是极为罕见的。但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表明,儿童性虐待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令人不安。虽然它更可能在比较贫穷的家庭中被发现,但却存在于各个社会等级,以及各种机构之中。我们下面将看到这一点。

尽管就其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来看,儿童性虐待的性质非常清楚,但要得到深入全面的了解,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然而,无论是对于普遍意义上的儿童虐待,还是对于特殊意义上的儿童性虐待,都还没有达成研究者或法庭取得充分共识的定义。1989年《儿童法》(Children Act of 1989)中有一款述及了因为缺乏合理的照顾而引起的“重大的伤害”,但对于什么是“重大的”仍然语焉不详。英国全国防治虐待儿童协会(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NSPCC)界定了四种虐待类型:“不管不问”、“身体虐待”、“情感虐待”和“性虐待”。性虐待被定义为“发生在成年人与儿童之间的以该成年人的性满足为目的的性接触”(Lyon and de Cruz 1993)。

许多乱伦案例中都有强力或暴力威胁的成分。在有些案例中,儿童多多少少是自愿的参与者,但这种情况似乎非常罕见。当然,儿童是有性的存在,彼此之间经常进行一些轻微的游戏或性探索。但大部分被迫与成年家庭成员发生性接触的儿童都会发现,这种经历令人厌恶、羞耻或不安。现在,有相当多的材料表明,儿童性虐待对其受害者可能具有长期的影响。对妓女、青少年违法乱纪者、青春期离家出走者及吸毒者的研究表明,这些人中有很高的比例曾经遭受过儿童性虐待。当然,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这证明的只是这些类型的

人在儿童时期曾经受到过性虐待,但并不表明这样的虐待就是对其后来行为有因果影响的因素。可能有多种因素与此有关,比如家庭冲突、父母的不管不问和身体上的暴力等。

7.3.5 家庭暴力

我们可以把家庭暴力定义为由一个家庭成员对另一个或另一些家庭成员所进行的身体虐待。研究表明,身体虐待的首要对象是孩子,尤其是幼童。一个名叫维多利亚·克琳比埃的八岁女童,在2000年2月被可怖地杀害了,引起了公众对于针对儿童的极端家庭暴力的关注。维多利亚从西非移居欧洲,她的姑婆玛丽·特蕾西·考奥及其男友卡尔·曼宁对她要么百般折磨,要么不管不问,几个月后,维多利亚终因体温过低而死亡。虐待她的两个人在2000年11月被判终生监禁。审判期间,警方、医疗与社会服务机构均遭到批评,指其错过了拯救小女孩的机会。政府启动了一项调查,由拉明勋爵主持,检讨了各有关专业人士的角色,并就如何预防此类悲剧重演向政府提供了建议(Laming 2003)。

丈夫对妻子施暴是第二类非常常见的家庭暴力。在英国,每周有两名妇女被其伴侣^①杀害。每时每刻,都有10%的妇女正在遭受家庭暴力。大约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一时期遭受过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针对女性的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种,来自自己家里或亲朋好友中的男人的暴力危险比来自陌生人的更大(Rawstorne 2002)。

由于女性主义团体在“受虐妇女”(battered women)庇护中心方面所做的工作,家庭暴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公众和学界的关注。在那以前,像虐待孩子这类家庭暴力现象被老于世故地忽略了。女性主义者对于

^① 本书中许多地方使用“partner”而非“spouse”,后者是狭义上的已婚夫妻,而前者是已成普遍现象的同居伴侣。

家庭暴力的研究提请人们关注,家庭中针对妇女的暴力是何等的普遍,何等的严重。警方接报的绝大多数夫妇间暴力事件都涉及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而妇女对她们丈夫施暴的报告案例要少得多。女性主义者指出,这一统计数据支持了她们的论点,即家庭暴力是男性控制女性的一种主要形式。

有关男权制和支配的一些视角,
参见第十二章第四节第二小节。

而持保守立场的评论者们对女性主义的论点提出了反驳,认为家庭暴力并非像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男权制的权力相关,而是与“家庭功能失调”有关。对妇女施暴反映了家庭危机日趋加剧,道德水准渐遭侵蚀。他们对妻子针对丈夫的暴力很罕见这一结论提出质疑,认为男人比起女人,更不愿意主动报告受到来自妻子的暴力的事例 (Straus and Gelles 1986)。

这类论断遭到女性主义者及其他学者的强烈批评,认为不管怎么说,女性所实施的暴力要比男性更有节制,更为零星,因而能引起持久性身体伤害的可能性也就小得多。她们认为,单看家庭内部暴力事件的“数量”是不够的,相反,更重要的还要看暴力的意图、背景和效应。“揍老婆”属于由丈夫对妻子进行经常性的身体残害,这种情况反过来就不是一回事儿了。研究发现,女性对其男性伴侣施加的暴力往往属于防御性而非侵犯性的,而女性之所以诉诸暴力,只是因为长期遭受反复的攻击 (Rawstorne 2002)。那些对孩子进行身体虐待的男性,比这样做的女性更有可能一以贯之,从而引发长期的伤害。

为什么家庭暴力比较普遍呢? 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家庭生活特征的强烈情感投入与个人亲密感相结合。家庭关系纽带通常充满着强烈的情感,常常是爱恨交加。在家庭

环境里所爆发的争吵,能够引发在其他社会情境中不可能有类似感受的对抗。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琐事,也可能引起伴侣之间或亲子之间迸发出全面的敌对情绪。一个男人可以容忍其他女性的怪癖行为,但如果自己妻子在宴会上喋喋不休,或者泄露他希望保密的隐私,他可能就会大为光火。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家庭内的许多暴力,其实是为人们所容忍甚至赞同的。尽管社会上所认可的家庭暴力,其性质相对来说属于并不严重的,但却很容易发展成为更为恶劣的攻击形式。在英国,许多孩子挨过父母一方的耳光或被揍一顿,哪怕只是轻轻的。这样的行为常常得到其他人的普遍赞同,甚至可能从未被看成是“暴力”。当然,来自有些群体的压力也不断增加,要求英国仿效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立法禁止对儿童实施体罚。

社会阶级

尽管没有任何社会阶级能够免于配偶之间的虐待,但有几项研究表明,在低收入的配偶之间,这种虐待更为常见 (Cherlin 1999)。30 多年前,古德 (Goode 1971) 就曾经提出,低收入的男人可能更倾向于暴力,因为他们缺乏其他手段来控制自己妻子,比如比较高的收入或教育水平。此外,贫穷和事业所引发的较高的压力,也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家庭内部暴力。可以支持这些论断的是,盖利斯和康奈尔发现 (Gelles and Cornell 1990), 失业男性侵害自己妻子的比例几乎是就业男性的两倍。

7.3.6 离婚与分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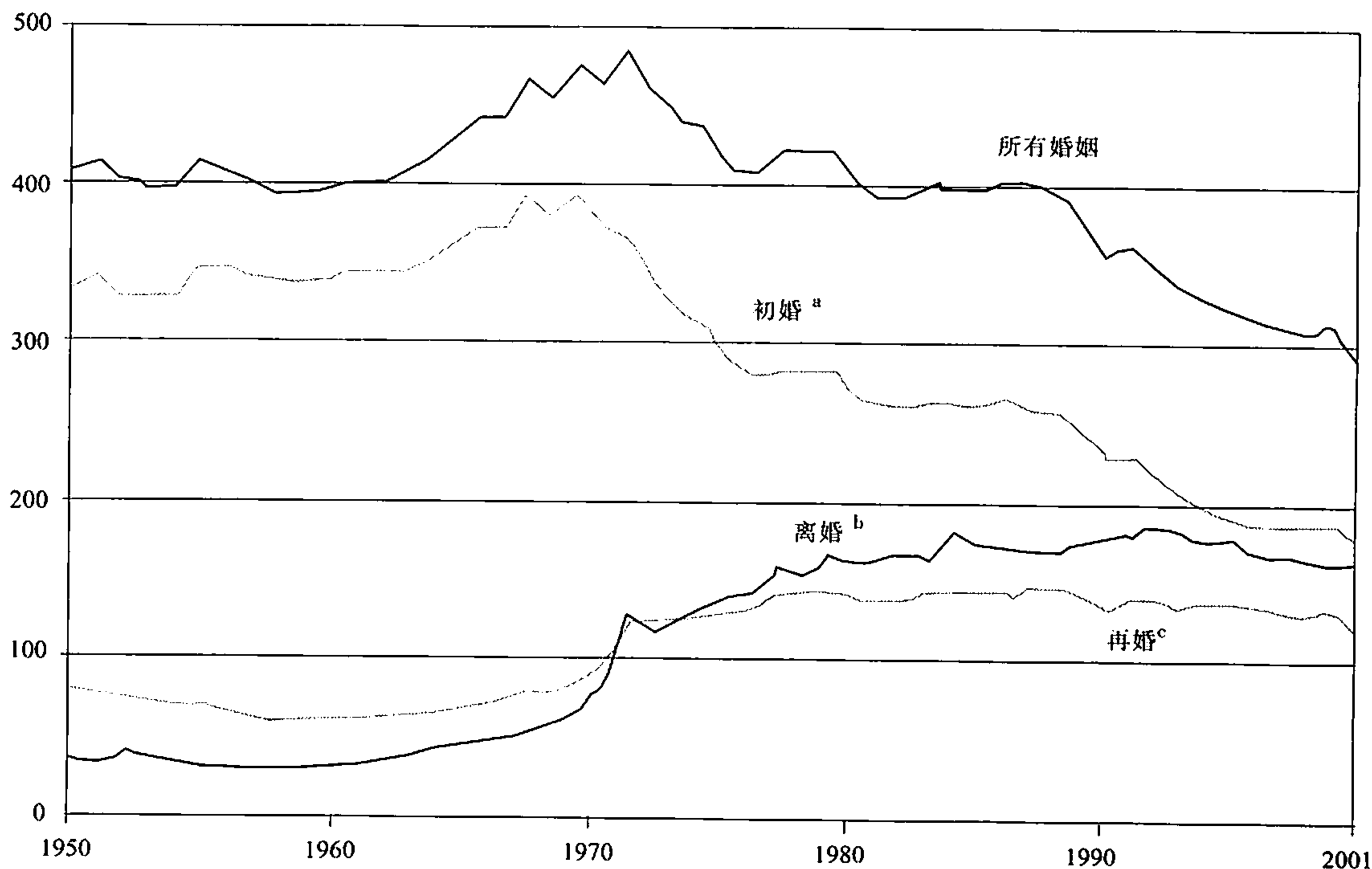
一 离婚的增多

在西方世界,许多世纪以来,婚姻被看成

是几乎不可废除的。只是在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比如在尚未完婚之时,才允许离婚。有一两个工业国家直到现在仍然对离婚不予认可。然而这种情形现在已很鲜见。大多数国家已经在向使离婚更容易的方向迅速迈进。所谓抗辩制(adversarial system)曾经是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特征。离婚要想得到准许,配偶一方必须对另一方提出指控(比如有残暴行为、遭到遗弃或与人通奸等行为)。第一批“无过失”(no fault)离婚法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一些国家引入的。自那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竞相采用此类法规,只是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英国,1969年通过了《离婚改革法》(Divorce Reform Act),并于1971年开始生效。这

一法案使得夫妇双方能够更容易地达成离婚,并包含有“无过失”的条款。在1996年通过的一项新法案中,“无过失”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1960年到1970年之间,英国的离婚率以每年9%的比例稳定增长,在这十年中翻了一番。而到1972年,又增加了一倍,这部分是由于1969年法案的结果,它使那些处在长期“名存实亡”的婚姻中的夫妇得以更容易地离婚。从1980年以来,离婚率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下来,但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仍处于很高水平。英国目前所有婚姻中大约五分之二是以离婚而告终的。图7.1可以看出每年成婚数的下降和离婚数的上升。



a: 就伴侣双方而言

b: 包括因结婚手续不合法而遭法定注销。1950年至1970年间的数仅指英伦三岛^①。

c: 包括伴侣一方或双方。

图 7.1 英国的婚姻与离婚(单位:千)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31

^① 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不包括北爱尔兰。

显然,离婚率并不是婚姻不幸福的直接指标。首先,离婚的比率并未包括那些已经分居但没有在法律上离婚的人。不仅如此,那些婚姻不幸的人可能还是选择呆在一块儿,因为他们相信婚姻的神圣性,或者对家庭破裂后可能造成的经济或感情上的后果有所顾虑,或者希望仍与对方生活在一起,以便能给孩子营造一

个“家一般”的住所。

为什么离婚越来越常见呢?这涉及与更广泛的社会变迁有关的好几项因素。除了比例极小的一部分富人以外,婚姻在今天已经不再与让财产与地位世代沿袭的愿望有多大联系。由于妇女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婚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伙伴关系。总

戴安娜·沃恩论“分手”:离异的体验

离婚率走高,在社会层面上产生诸多好处与坏处,要开出一份清算单来,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态度更宽容一些来看,这意味着一对配偶能够终结一份回报不值的^①关系,而不会招来社会的排斥。另一方面,一份婚姻的离异,无论是对配偶双方,还是对他们的孩子,几乎都会在情感上产生重重的压力,也有可能对配偶双方或一方带来经济上的困难。(在下一个图文框里,我们将来看看卡罗尔·斯马特和布伦·尼尔有关离婚后挣钱养家的体验的研究)

沃恩在其《分手:亲密关系的转折点》一书中(Vaughan 1990),分析了伴侣双方在分居或离婚的过程中的关系。她对一百多位新近分居或离婚的人士(主要来自中产阶级背景)进行了一系列访谈,记录了从一起生活到分开生活的过渡。“分手”这个观念(uncoupling)指的是一种长期的亲密关系的解散。她发现,在许多个案中,物理意义的分开之前就已经有了某种**社会意义的分居**,伴侣双方至少会有一方发展出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在另一方不在的场合,有了新的追求,交了新的朋友。这通常意味着向另一方保守秘密,当然,特别是有关情人关系的秘密。

根据沃恩的研究,分手在一开始往往是无意的。其中一个人,沃恩称之为**发起者**(initiator),比另一人对关系感到更不满意,创造出独立于配偶双方共同参与的活动的一块“领地”。

而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发起者可能已经尝试过改造伴侣,令其表现得更让人接受,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如此等等,但未能成功。从某一时刻开始,发起者觉得尝试已经失败了,关系也在根本上出现了裂痕。自此以后,发起者就开始对关系的缺陷或另一方的毛病耿耿于怀。沃恩提出,这就是关系开始时“坠入爱河”的过程的反面,那时候一个人只看到另一方身上有魅力的地方,那些不怎么让人接受的东西就放过一边了。

发起者认真考虑着解散关系,与对方广泛而明确地讨论他们的关系,并“交换意见”。在此过程中,他们权衡着分居的代价与好处。我自己能挺下去吗?朋友和父母会怎么反应?孩子们会不会很难受?我在经济上能不能不借钱度日?考虑过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后,有些人会决定再试一次挽救关系。而对于那些继续决定要分居的人来说,这些讨论和思考也有助于使散伙不那么让人望而生畏,树立起自信,告诉自己没有做错。绝大多数发起者会开始确信,他们首先是有责任自我发展,然后才是对于另一方的义务担当。

当然,分手并不总是由一个人完全主导的。伴侣的另一方也可能决定不再挽救关系。在某些情形下,会发生角色的突然转换。此前想要挽救关系的人成了决定终结关系的人,而曾经一度的发起者却期望延续下去。

体上更大程度的富足意味着,与过去的情形相比,当感情破裂时,更容易分家另过。事实上,现在离婚很少会被打上污名,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些发展的结果,但它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发展。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其所能给予个人满足感的程度来对婚姻进行评价。离婚率的升高似乎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婚姻本身有一种深深的不满,而是表明人们更有决心使其成为一种值得去做的、令人满意的关系。

二 单亲家户

近几十年来,单亲家户已经越来越常见。在英国,生活在单亲的独立家户中的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4%上升到2003年的12%(参看表7.2)。有必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单亲家庭由妇女当家。一般来说,她们在当代社会中属于最贫困的群体。许多单亲父母,不管其是否曾经结婚,仍然既要面临经济上的无保障问题,

又要承受社会的不赞许态度。不过,从前诸如“被人甩了的老婆”、“没爹的家庭”和“破碎的家”之类更具评判性的用语正在趋于消失。

单亲家户这一范畴内部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半数以上的守寡母亲住的房子业主就是自己,而绝大部分从未结过婚的单身母亲,住的是租来的房子。单亲父母身份往往容易变动,其边界相当模糊:有多种渠道可以进入或者脱离单亲状态。就丧偶者而言,这种断裂是明确的,虽说如果其伴侣在去世前曾经住过一段医院的话,另一方实际上可能已经在独自生活了。不过,今天约有60%的单亲家户都是由于分居或离婚而造成的。

在英国的单亲家庭中,增长最快的类型是单身、未婚母亲。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们占全部拥有受抚养孩子家庭总数的9%(参看表7.3)。在这里面,很难弄清楚有多少是主动选择要独自抚养孩子的。大部分人都不希望成为单身父母。仍在进行中的千禧年同期群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目前正在追踪本

表 7.2 英国家户:以家户和家庭类型分组,1971-2003(%)

	1971	1981	1991	2001 ^a	2003 ^a
独立家户					
独居	6	8	11	12	13
有配偶					
无子女	19	20	23	25	25
有受抚养子女 ^b	52	47	41	39	38
只有非受抚养子女	10	10	11	8	8
单亲	4	6	10	12	12
其他类型家户	9	9	4	4	5
所有私人家户(100%)人数(百万)	53.4	53.9	55.4	—	—
私人家户以外人数(百万)	0.9	0.8	0.8	—	—
总人口(百万) ^c	54.4	54.8	56.2	57.4	57.6

a:春季统计。这些估计数据未经季节调整,尚未根据2001年普查结果予以调整。

b:可能也包括非受抚养子女。

c:1971年至1991年数据系人口普查数据,2001年和2003年^①数据系年中估计数。

资料来源:Social Trends 34(2004),页31

①原文为“2002年”,根据图表改为2003年。

表 7.3 以单身父母为户主的英国家庭占全部有受抚养孩子家庭的百分比^a:以婚姻状况分组

	1971	1976	1981	1986	1991-1992	1996-1997	1998-1999
单身母亲							
单身	1	2	2	3	6	7	9
寡居	2	2	2	1	1	1	1
离婚	2	3	4	6	6	6	8
分居	2	2	2	3	4	5	5
单身母亲	7	9	11	13	18	20	22
合计							
单身父亲	1	2	2	1	1	2	2
已婚配偶/同居配偶 ^b	92	89	87	86	81	79	75
有受抚养孩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家庭合计							

a: 受抚养孩子指在家庭单元里并住在家中的 16 岁以下的人或 16 至 18 岁并接受全日制教育的人。

b: 包括其丈夫未被界定为住在家户中的已婚女性。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0(2000), 页 37

世纪头几年出生的一些孩子的生活,已经发现年轻女性更有可能成为单身母亲,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婚内生育。研究还揭示,单身母亲中有 85%是在无计划的状态下怀孕的,而同居配偶中这一比例是 52%,已婚女性中这一比例则为 18%。对于大多数未婚母亲或有待结婚的母亲来说,婚外生育率同贫困与社会剥夺的指数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在说明英国的加勒比裔背景家庭中有很高比例的单亲家户这一现象时,这些影响就非常重要。不过,尽管仍是少数,但越来越多的女性现在选择在没有配偶或伴侣支持的情况下要一个或几个孩子。“选择作单身母亲”是对某些单身母亲的恰当描述,她们通常拥有充裕的资源,单亲家户也能过得顺心如意。

克罗和哈代提出(Crow and Hardey 1992),进入和脱离单亲家庭的“路径”多种多样,这

意味着单身父母从整体上来看不是一个统一的或内聚的群体。虽然单亲家庭可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物质劣势和社会劣势,但它们没有什么集体认同。路径的多元性意味着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单亲父母的身份界限难以明确,需求难以定位。

三 “缺席父亲”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段时间,有时被称为“缺席父亲”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父亲因为服兵役而难得见到自己的孩子。在战后的那段时期,在相当多的家庭中,妇女并不从事有薪劳动,而是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父亲是挣钱养家的主要人物,因而整天在外工作,只有在晚上和周末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

随着近些年来离婚率的上升和单亲家户

数量的增加,缺席父亲这一主题开始表现出某种不同的意义。它逐渐被人们用来指那些由于分居或离婚而只能与孩子保持偶尔联系或完全失去联系的父亲。英国和美国的离婚率在世界上均属最高之列,缺席父亲的这一状况也都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已经宣称这是“老爸之死”(death of the dad)。

社会学家和评论家基于各种相互对立的视角,抓住无父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点作为关键,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从犯罪率的升高,到孩子抚养方面福利开支的激增。有些人主张,孩子除非在其周边小环境中始终接触到协商、合作与和解的榜样,否则就不能成为社会群体的合格成员(Dennis and Erdos 1992)。在这种观点看来,男孩如果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自己日后要成为成功的父亲就要费点劲了。

那些在争论中表现突出的美国学者,对该问题在英国引起的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卫·布兰肯霍恩在其《没有父亲的美利坚》一书中(Blankenhorn 1995)主张,离婚率高的社会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父亲的丧失,而且还有为父之道观念本身的衰落,这一点会在社会层面上产生致命的后果,因为现在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一位权威人物,能够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所依靠。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中的婚姻与为父之道都提供了一种手段来疏导男人的性及攻击能量。如果没有它们,这些能量就很可能表现为犯罪和暴力。正如布兰肯霍恩那本书的一位评论者所言,“就算老爸干完让人讨厌的活儿,回家就窝在电视前面灌啤酒,总比好过根本没有老爸”。(The Economist 1995)

不过,情况真是这样吗?缺席父亲的话题与那些关于离婚对孩子的影响等更为一般性的问题交迭在一起,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关于可得到的证据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还很不清楚。正如刚才那位评论者所说:“难道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吗?难道不是有些父亲对家庭有害吗?”一些学者已经提出,关键的问题

并不是父亲在不在家,而是他对于家庭生活和养育孩子有多么尽心尽力。换句话说,家庭的组成构造并不比其成员给予孩子的照料、关爱和支持的质量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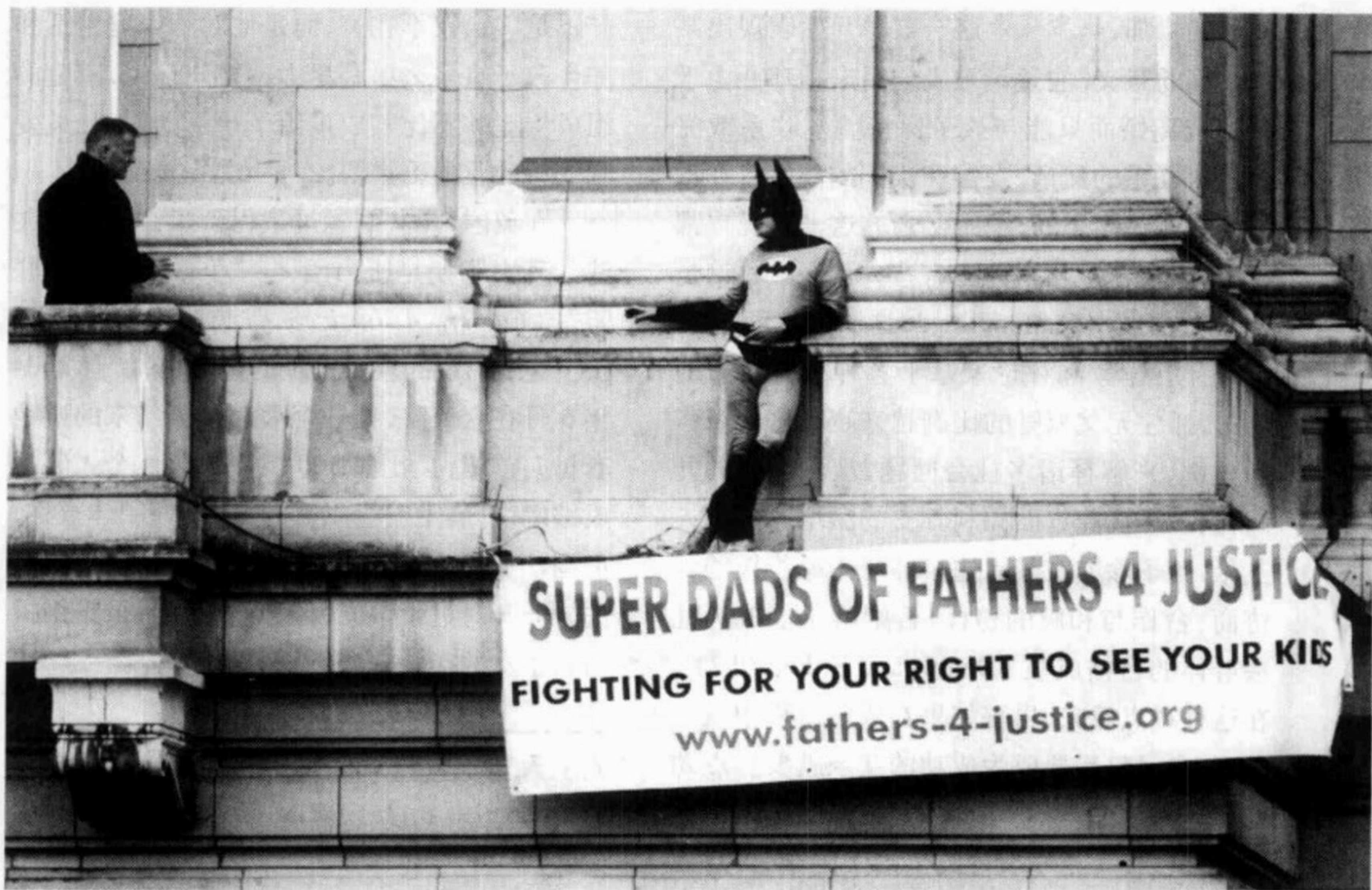
在英国,无父问题近来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其由头便是压力团体“争取正义父亲联盟”(Fathers 4 Justice)高调招摇的惊险噱头。这个组织的成员们干的事情里,就有2004年5月在众议院,把一个灌满紫色粉末的避孕套扔向首相,又比如2004年9月,一个人装扮成蝙蝠侠,攀上白金汉宫的宫墙。该团体宣称,英国法律旨在促进孩童的“最佳利益”,但当夫妇分开时过于偏向母亲一方,父亲很难维持与其子女的接触。

7.3.7 家庭生活态度的变迁

似乎有一些实质性的阶级差异,影响着人们如何回应家庭生活特征变动不居以及离婚率走高的现象。莉莲·鲁宾在其《断层线上的家庭》一书中(Rubin 1994),对32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她得出结论说,相比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工人阶级的父母往往更为传统。许多中产阶级父母都已经接受的准则,比如公开的婚前性行为,在工人阶级中却遭到更加普遍的反反对,即使被访者并不虔信宗教。因此,在工人阶级的家庭中,也更容易发生代际冲突。

在鲁宾的研究中,年轻人承认他们关于性行为、婚姻和社会性别分工的态度与父辈明显不同。但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并非只想着寻欢求乐,只不过是与老一代人的价值观不同而已。

鲁宾发现,她所采访的年轻女性对婚姻问题的看法远比其父母一代来得暧昧。她们对男人的缺陷有着敏锐的认识,并表示要积极探求多种可能性,过一种比自己母亲更充实、更开放的生活。而男性态度的代际转变就不像女性这么明显。



诸如此类高调招摇的惊险噱头意在提请人们关注父亲们在家庭里、法庭上和政策中“感到被边缘化”。

卡罗尔·斯马特与布伦·尼尔：家庭碎片？

从1994年到1996年，斯马特和尼尔对来自西约克郡(West Yorkshire)的60位父母进行了两轮访谈，他们在1989年《儿童法》(Children Act)通过后分居或离婚。此法案废除了“监护权”(custody)和“探视”(access)的旧概念，从而改变了离婚时父母和孩子面临的境况，使父母不再老觉得不得不去争夺孩子。这一法案意味着孩子和他们父母的合法关系不因离婚而改变，它还鼓励父母共同抚养孩子，并要求法官和其他人更多地倾听孩子的看法。斯马特和尼尔很想知道，离婚后的养育模式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它又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在调查中，他们比较了分居时父母对于离婚后孩子抚养的期望与一年后他们的“现实”情况。

斯马特和尼尔发现，离婚后的抚养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而这一点是许多父母始料不及也因而准备不足的。作为双亲团队一部分时运转良好的抚养技能，到了单亲家庭就不一定成功。无论在影响孩子的“重大决定”上，还是在现今发生在两个而非一个家庭中抚养孩子的日常方面，父母都被迫不断地重新评估他们的抚养方法。离婚后，父母面临两个相反的需求，又需要分居并远离以前的配偶，又需要保持联系以共同承担抚养责任。

斯马特和尼尔发现，离婚后的实际抚养情况极不稳定并随时间而改变。分居一年后接受访谈时，许多父母能够回顾单独抚养的最初阶段，并能评价他们做出的抚养决定。父母经常会

根据其理解的变化,重新评价自己的行为。例如,许多父母担心离婚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但却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担心和内疚感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这使得一些父母把孩子管得太紧,或者像对待“成年”知己那样对待孩子;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会导致父母和孩子相互隔膜,关系疏远,缺乏有意义的沟通。

根据两位作者的观点,在媒体和某些政治场合中存在一种隐含的(有时候是明确的)假设,即离婚后成年人就会抛弃道德,做事开始自私自利。灵活、慷慨、宽容和敏感的特点都突然消失;以前做出有关家庭和福祉方面的决定时所依据的道德框架被抛弃。斯马特和尼尔通过对离异父母的访谈,否定了这一观点。她们宣称,父母确实是在一个道德框架里抚养孩子的,但这一框架最好理解为照顾的道德,而不是基于一套原则或信念的明确的道德推论。斯马特和尼尔认为,当父母照料孩子时,确实会做出“该做的事情”的决定。但这些决定是高度情境化的,父母必须仔细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决定对孩子的影响,是否合时宜,以及可能对共同抚养关系产生的负面意义。让我们看看下面一位单身母亲的谈话,她的前夫向她要求孩子的监护权:

我说,“你看,如果你确实确实觉得能整天照料这些孩子。难道你不认为应该拿出一个周

末和他们呆在一起吗?那样你就能知道感觉是什么样了。可能过了个周末之后,你会继续说打算和他们呆整整一周,看看你如何应付他们。”他听了就只有勃然大怒,因为在他脑子里,他是在给我做临时保姆,所以他说:“不。”我说:“看,这样我根本就不打算和你讨论,因为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这有多难。你已经有三年没有全天照料过孩子了,我确实觉得你有点外行了。(我觉得你应该照料他们)每天按部就班,送他们上学,接他们回家,给他们做饭、洗澡,洗衣服熨衣服,帮他们做作业,如果他们病了,你还得看护。做完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再来评评。”(Smart and Neale 1999)

这位母亲试图在权衡多重因素之后再来决定“该做的事情”。她与前夫关系紧张,又要维护自己在独立发展中取得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她仍试图在关系孩子的利益上与前夫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斯马特和尼尔的结论是,离婚促使那些原来几乎不能“直截了当”做出一次性了断的情况发生了转变。离异后的共同养育要想成功,就需要始终保持协商与交流。虽然1989年的《儿童法》对于当今离婚后父母角色的安排增加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但由于其强调儿童的福祉,可能会因此忽视离异父母之间的关系质量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虽然鲁宾的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但她的结果却与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非常贴近。海伦·威尔金森与杰夫·马尔根对英国18至34岁的男女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研究(Wilkinson 1994; Wilkinson and Mulgan 1995)。她们也发现,年轻女性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来说,这一年龄组的价值观

与英国老辈人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年轻女性中,有一种“家庭工作两不误来追求自主自立与自我实现的愿望”,以及“积极接受冒险、刺激与变化”。从这些角度来看,男性的传统价值观和女性的新兴价值观正在逐渐地趋同。威尔金森和马尔根指出,年轻一代的价值观由自己自由的选择决定。对于前

几代人来说,这些自由中的大部分,比如女性有权参加工作和控制自己的生育,男女两性都有个人流动的自由以及决定自己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都是无法实现的。这些自由带来更多的开放、宽松和包容;但也可能会引起一种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并缺乏对于他人的信任。在该研究样本中,29%的女性和51%的男性想“尽可能晚生孩子”。在60^①至24岁年龄组的女性中,有75%的人认为单身父母也能像一对配偶那样把孩子抚养成人。这项研究发现,对于这一年龄组的男女两性来说,婚姻都正在失去吸引力。

7.3.8 新型伴侣关系与继亲家庭

一 再婚

再婚(remarriage)可以包括多种情况。有些再婚夫妇刚刚20出头,双方都没有带孩子进入这一新的关系。而一对在将近30、30多岁或40出头时再婚的夫妇,每一方都可能带来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一个或更多的孩子,住在一起。那些晚年再婚的人可能会有成年子女,这些子女不会住在父母新建的家里。再婚父母也



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终成眷属,恰恰证明了英国社会中婚姻的重要性依然持存。他们或许是当今英国最有名的一对继父母了。

① 此处原文为“sixty”,疑为“sixteen”(16岁)之误。

可能会再有孩子。此外,新夫妇中每一方以前都可能曾经是单身、离异或寡居,加到一起就有八种可能的组合方式。因此,尽管有些一般性的观点值得提出,但要概括再婚的情形必须相当谨慎。

在1900年,英国大约有十分之九的婚姻是初婚。大部分的再婚中至少有一方是寡居者。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再婚的人数也开始攀升,越来越多的再婚婚姻开始涉及离婚者。在1971年,20%的婚姻属于再婚(伴侣双方中至

少一人),而到2001年,这一数字则超过了40%(参看图7.1)。

尽管可能有些奇怪,但对男女两性来说,最大限度地增加结婚机会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前结过婚!与相应年龄组中准备初次结婚的单身者相比,那些曾结过婚又离了婚的人,更可能再次结婚。在所有的年龄层次上,离婚男子都要比离婚女子更有可能再婚:每四位离婚女子中有三位再婚,而每六位离婚男子中则有五位再婚。至少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再婚不如初

豆杆家庭

朱莉娅·布兰嫩提出(Brannen 2003),在英国,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豆杆家庭”(bean-pole family)的时代。布兰嫩认为,家庭门户只是亲属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这种网络愈益包含好几代人。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她提出,50岁年龄组的英国人口中有五分之三的人,父母双亲至少还有一方健在,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自己已经身为祖父母。四代同堂的家庭,也就是有曾孙辈的家庭,数量也有增长。

预期寿命的增长固然增强了家庭代际之间的“纵向”关联,但同代内部的“横向”关联却

趋于衰微,因为离婚率在上升,生育率在下降,人们有的孩子越来越少。布兰嫩因此把当代家庭概括为瘦长型的“豆杆结构”(参看图7.2)

布兰嫩发现,祖父母辈越来越要提供代际服务,特别是为他们的孙辈提供非正式的照料。单亲家庭对于代际支持的需求尤其高,老辈人还常常在需要的时候提供情感支持,比如离婚的时候。反过来,“中枢一代”,就是夹在老辈与小辈之间的一代,常常需要同时照顾自己(渐入老年)的父母、子女甚或孙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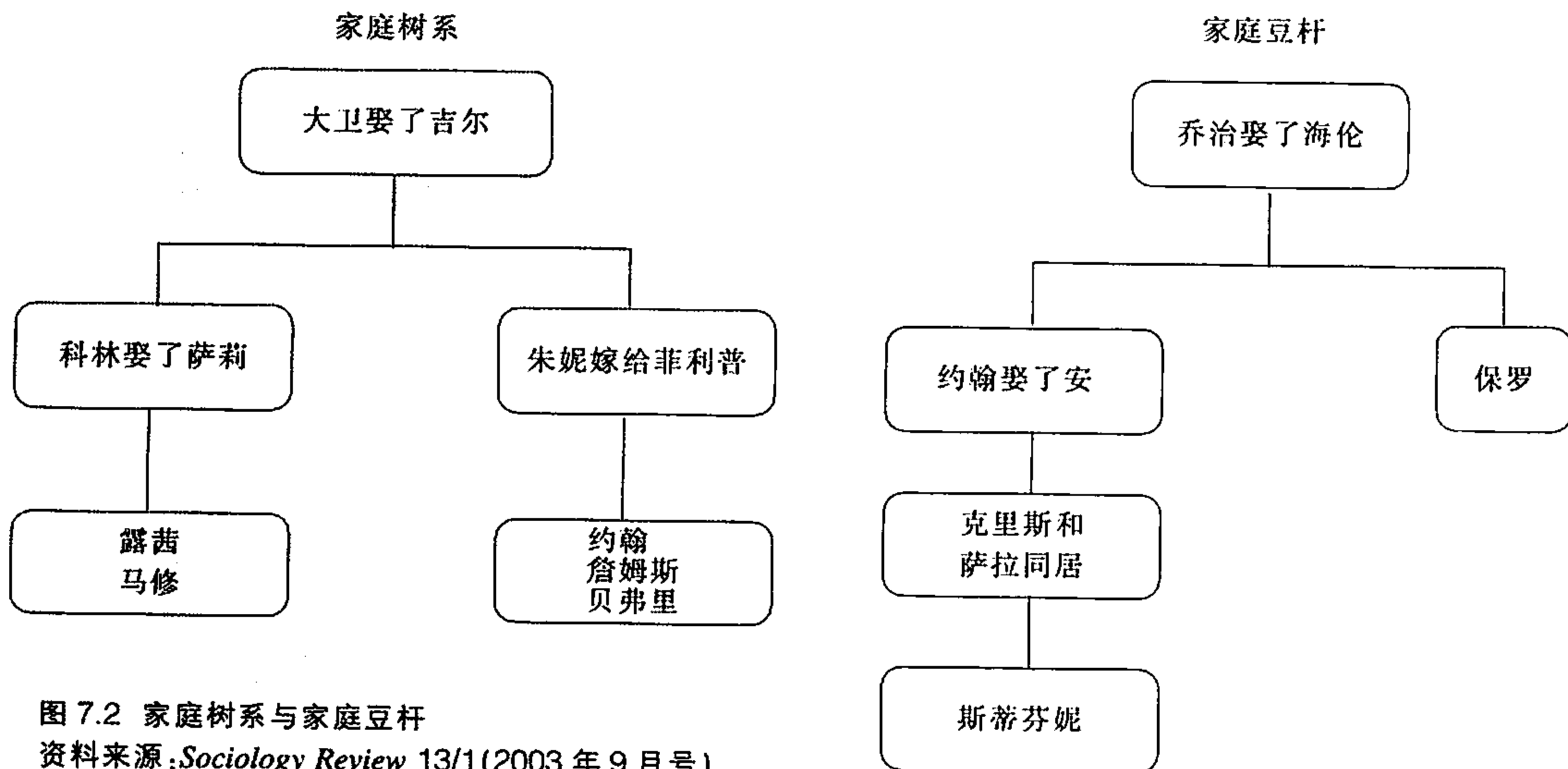


图7.2 家庭树系与家庭豆杆
资料来源: *Sociology Review* 13/1 (2003年9月号)

婚圆满。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要比初婚的离婚率高。

这并不表明第二次婚姻注定要失败。离过婚的人对婚姻的期望值可能比未离过婚的人高，因而他们比那些只结过一次婚的人更容易解散新的婚姻。而那些维持下来的第二次婚姻，一般来说可能要比第一次婚姻更令人满意。

二 继亲家庭

继亲家庭这一术语，指的是至少有一方成年人带来前一次婚姻或婚恋关系的孩子的这种家庭。社会学家常常将这样的群体称为重组家庭。重组家庭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家庭的增长无疑有其乐趣和利益，但某些困难也往往会随之而生。首先，通常有一个生活在别处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或母亲，可能仍然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当离婚双方或一方再婚时，其间的合作关系常常会变得很紧张。比如一位妇女有两个孩子，嫁给了一位同样也有两个孩子的男人，大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外面的”生身父母坚持要孩子们像以前那样经常去看他们，那么，那些与凝聚这一新建家庭相关的重大张力便会被加剧。比如，这可能意味着这个新家庭已不可能在周末聚在一起了。

第三，重组家庭把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孩子可能对于家庭内的适当行为有不同的期望。由于大部分继子女“属于”两个家户，其习惯与观点发生冲突碰撞的可能性相当大。一位继母因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而分居。她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的：

实在是太内疚了。你不能像通常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这样你就会觉得内疚，可是，如果你真的对孩子做出正常反应，发了脾气，你也会为此感到不安。你总是非常担心自己做事会不公

正。我和她(继女)爸爸意见不一样，如果我管教她，他就会说我唠唠叨叨。他越是不去管她，我就好像越是啰嗦……我想为她做点什么，想填补她生活中失落的什么东西，但我可能不够灵活。

(Smith 1990)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很少有既定的规范。孩子对其新的继父母是应该直呼其名呢，还是叫“爸爸”或“妈妈”更恰当？继父母是否应该像孩子的生身父母那样对他们进行管教呢？当继父母接孩子时，该怎样对待以前伴侣的新配偶呢？

重组家庭是正在发展中的亲属关系类型，在现代西方社会还属于新鲜事物；由离婚后再婚所引起的问题也是全新的。这些家庭的成员发觉自己正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尚无人探索过的境况之中，因而也正在摸索自己该如何适应这种境况。今天有些论者在谈双核家庭，意思是离婚后所形成的两个家户仍然因为孩子的牵扯而构成一个家庭系统。

面对如此多种多样和令人困惑的转变，或许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恰当的结论就是：虽然婚姻关系因离婚而解体，但从总体来看，家庭关系却并未解体。尽管重新构筑的家庭关系是通过再婚而形成的，但原来的许多关系纽带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涉及孩子的地方。

7.3.9 传统婚姻与家庭生活形式的替代选择

一 同居

所谓同居，是指一对男女并未结婚，但以性关系方式居住在一起。在西方大多数国家中，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如果说从前婚姻是界定两个人联盟的基础，那么现在人们则不再这么认为了。现在讲结合(coupling)和分手(uncoupling)可能更为合适，就像我们前

文讨论离婚时那样。越来越多保持长期关系的双方选择不结婚,而是住在一起,共同养育孩子。

在英国,直到最近,同居现象一直被普遍认为是有点羞耻的事情。“综合家户调查”(General Household Survey)这一英国最主要的家户模式数据源,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列入了有关同居的问题。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对同居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当被问及对于“结合的一对生活在一起而不打算结婚没什么不妥”这句说法的意见,目前18至24岁年龄组中有88%表示赞成,而65岁及以上年龄组受访者仅有40%表示赞成(HMSO 2004)。在近几十年间,未曾结婚的男性和女性组成一个家户的数量急剧上升。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只有4%曾经同居,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就有19%,而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同居比例却占了将近一半。到了2001至2002统计年度,全部60岁以下女性中未婚同居的比例为28%,而男性中这

一比例为25%(HMSO 2004)。25至29岁年龄组女性的同居比例最高,而30至34岁年龄组男性的同居比例最高(参看图7.3)。虽然同居越来越普遍,但研究显示,婚姻还是更为稳定一些。未婚同居者比已婚者分手的可能性要大三到四倍。

今天,虽然婚前同居的时间延长,并且越来越多的一对儿选择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形式,但同居在英国似乎大多是婚前的一个试验性阶段。年轻人通常是不知不觉地便开始住在一起,而不是经过特意的计划。已经有了性关系的一对恋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最后便有一方放弃了原来的家。住在一起的年轻人几乎总是期望有一天能够结婚,但却不一定是和现在的伙伴。在这些伴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把财产合到一起。

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于1999年开展了一项研究,社会学家访谈了一组有11岁或11岁以下孩子的已婚或同居的配偶样本,以及一组他们仍然在婚的父母样本。他们关注的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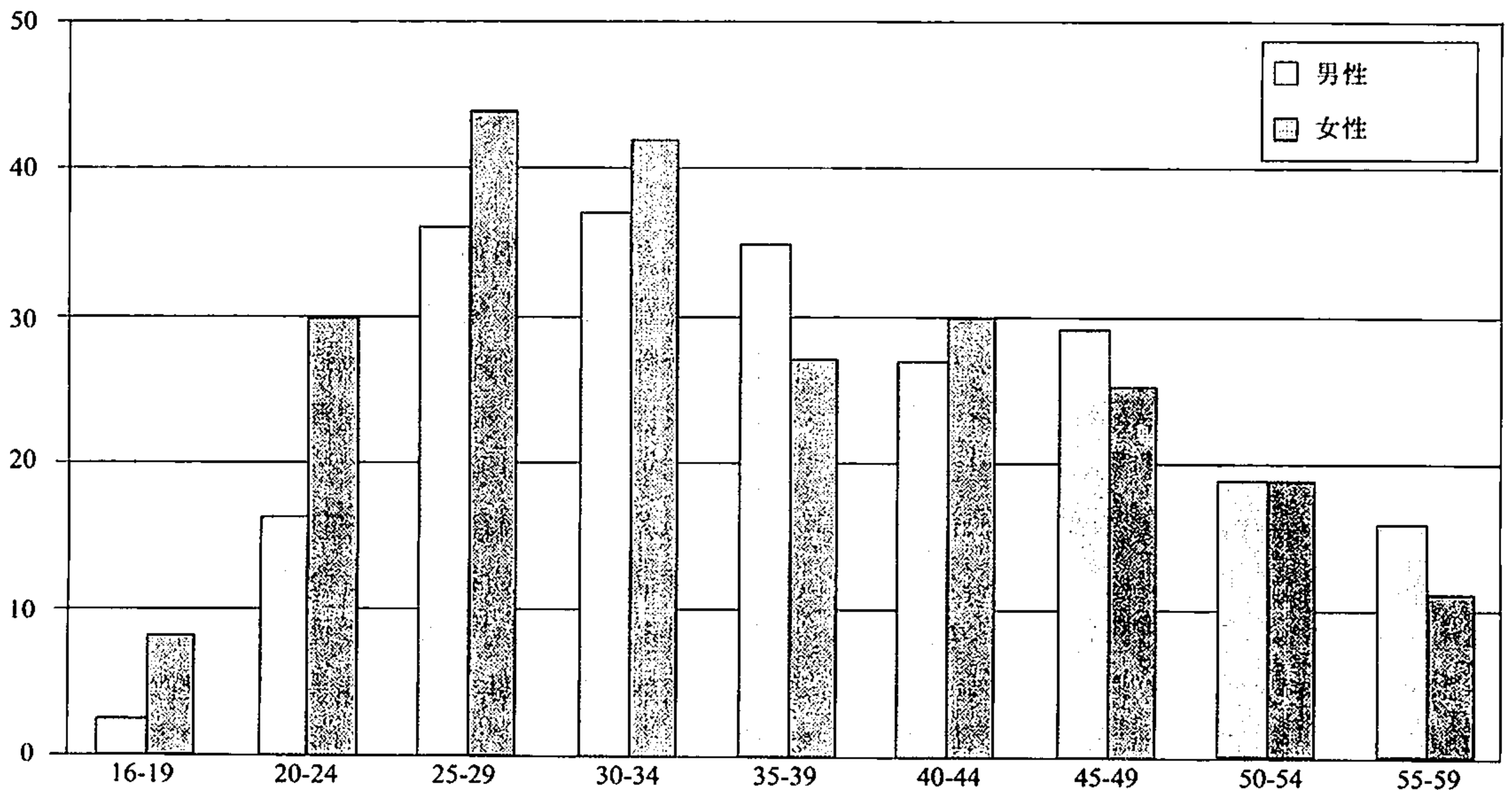


图 7.3 英国未婚同居的人数,以性别和年龄分组,2001/02 统计年度 a(%)

a: 16 岁至 59 岁的男性与女性,包括那些自述现已分居的被调查对象。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33

长的已婚人士与年轻一代的配偶们在立场方面的差异。研究者发现,年轻的已婚或同居配偶之间通常要比他们与父母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年长的一代人视婚姻为责任和义务,而年轻的一代则强调自由赋予的承诺。年轻被访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希望通过婚姻使他们的承诺获得公认(Dyer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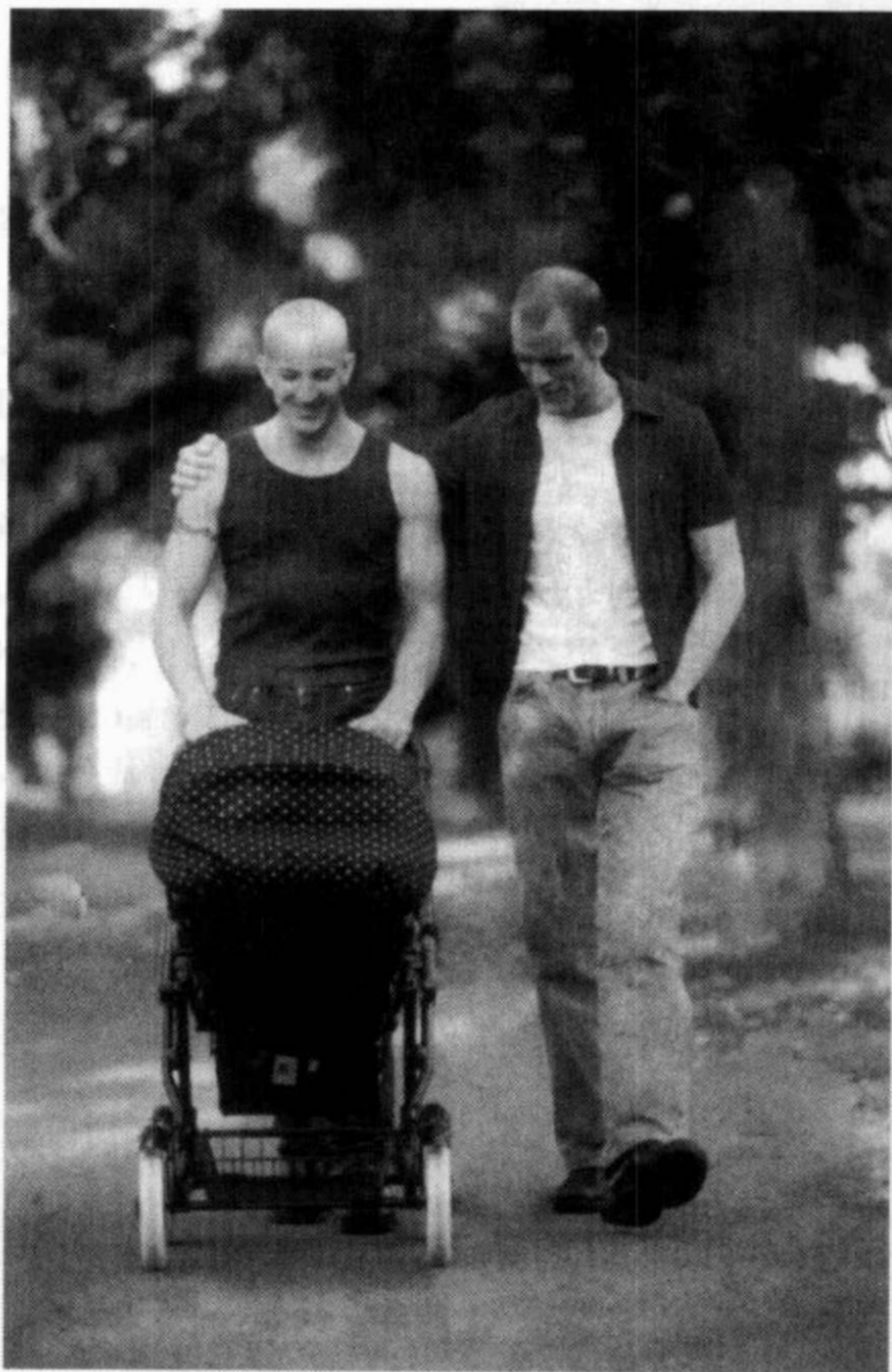
二 男女同性恋伴侣

现在许多同性恋的男性和女性,都以一种稳定的伴侣关系共同生活。但是因为大多数国家仍然不核准同性恋者之间的婚姻,所以男女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个人承诺和相互信任而非法律。“基于选择的家庭”这个词有时被用于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以反映同性恋伴侣逐渐可以共同追求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日常生活形式。传统异性恋伴侣关系的许多特征,诸如生病时的相互支持、照料和负责,统一的财务等等,正在以从前不可能的方式融入男女同性恋者的家庭中。

第十二章会深入讨论同性恋,其中引言会讨论同性恋婚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男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社会学家开始把同性恋关系视做私密和平等关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关系不同于异性恋伴侣之间的关系。因为男女同性恋者已经被婚姻制度排除在外,并且传统社会性别角色不太容易适用于同性伴侣,因此同性恋伴侣关系必须依据不同于指导许多异性恋结合的规范和准则来加以构造和商定。一些人认为,艾滋病是导致同性恋伴侣中间产生出独特的照顾与承诺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威克斯等(Weeks et al. 1999)指出了男女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三种主要模式。第一,有更



社会规范变动不居,意味着目前在某些国家,同性配偶可以公开地一起养育其孩子。

多的机会达成伴侣间的平等,因为他们不受支撑异性恋关系的文化和社会假设的左右。男女同性恋伴侣可以选择有意识地塑造他/她们的关系,以避免许多异性恋配偶中典型存在的各类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第二,同性恋伴侣商定他们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内部运作方式。如果说异性恋配偶受到根植于社会的性别角色的影响,那么同性恋伴侣则较少面对在关系内谁应该做什么的预期。例如,如果说在异性恋婚姻中,女性要更多地承担家务和育儿的责任,在同性恋关系中则没有这样的期望。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这样就可能导致双方更平等地分担责任。第三,男女同性恋伴侣关系显示了一种缺乏制度支持的特殊的承诺形式。相互间的

信任,解决困难的愿望,分担“情感劳动”的责任,这些似乎成了同性恋伴侣关系的标志(Weeks et al. 1999)。

随着以前那种对同性恋的不宽容态度趋于松动,法庭越来越愿意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处于同性恋关系中的母亲。人工授精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女同性恋无须任何异性接触就可以生育孩子,并形成同性恋双亲的家庭(gay-parent families)。在英国,几乎每一个有孩子的同性恋家庭都有两名妇女;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在美国的几个城市中,社会福利机构却把无家可归的同性恋男青少年的监护权判给了男同性恋配偶。后来主要是由于公众的反对,这一做法才被终止。

最近同性恋配偶取得了许多法律上的胜利,这表明他/她们的权利正在逐渐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

第十二章的引言将深入讨论同性恋伴侣的一些新的法律权利。

在英国,1999年一个里程碑式的裁决宣布,一对关系稳定的同性恋伴侣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家庭。这一把同性恋伴侣算作“家庭成员”的归类将会影响迁移、社会保险、税收、继承和孩子抚养等法律门类。

1999年,一家美国法庭支持了一对男同性恋配偶的家长权,^①他们要求在他们由代孕母亲(surrogate mother)生出的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共同署名。提出这一诉讼的男人之一说:“我们将庆祝这一法律上的胜利。我们所知的那种核心家庭正在发生演化。强调的重点不应该再是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而应该是充满爱心、关怀备至的家长,不管是单身母亲,还是彼

此承诺共同生活的同性恋配偶。”(Hartley-Brewer 1999)

三 保持单身

家户构成方面晚近的趋势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正在成为一个单身民族?英国单人家户的比例从1971年的18%上升为2003年的29%(HMSO 2004)。有好几项因素合在一起,使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独身人士数量增加。一是晚婚趋势,2001年,英国人结婚的平均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推迟了6年(如表7.4所示)。另一点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即离婚率的上升。但还有一点,就是人口中丧偶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在第六章第四节第四小节中有所讨论)。英国几乎一半的单人家户是只有一个领养老金的人。

保持单身这件事,在生命历程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味。20多岁的人中未婚的比从前多了,但到了三十五六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中都只有少数人从未结过婚。介于30岁到50岁间的单身人士中,大部分属于离异者或处在两次婚姻“之间”。而50岁以上的大多数单身者则属于丧偶者。

表 7.4 平均婚龄: 英格兰与威尔士, 1971—2001

	初 婚	
	男性	女性
1971	24.6	22.6
1981	25.4	23.1
1991	27.5	25.5
2001	30.6	28.4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2004), 页 32

^① 原文为“paternal rights”,显然我们在这里译成父亲权或是父母权都是不合适的,即使是双亲,也不是我们通指的父母亲,可以指同性恋伴侣,甚至可以指单身母亲或父亲。

第六章第三节讨论了生命历程的概念。

相比于以往,现在的年轻人离开家庭,更多地是为了开始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不是结婚成家(这在过去曾是最常见的一条离家之路)。因此,“保持单身”或自己过活的趋势似乎属于整个社会的一种趋势,崇尚独立自主,却牺牲了家庭生活。但是尽管独立或“保持单身”越来越成为离开父母家的一条常见之路,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结婚的。

第四节 有关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理论视角

立场相异的社会学家对家庭和家庭生活的研究各不相同。许多几十年前刚刚采用的理论视角,从现在的研究和社会世界的重要变化来看,已经不那么令人信服了。然而,在转向当代家庭研究思路之前,还是值得简单追溯一下社会学思想的演进。

7.4.1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视角把社会看作是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分别执行专门的功能,以确保连续性和共识性。根据这种视角,家庭在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执行着重要使命。奉行功能主义传统的社会学家认为,核心家庭在现代社会中履行着某些专门化角色。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家庭作为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其职能更多集中在生殖、育儿和社会化上面。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观点,家庭的两项主要功能就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Parsons and Bales 1956)。所谓初级社会化,就是儿童学习诞生其中的那个社会之

文化规范的过程。因为这发生在孩童时期的早期,所以家庭是人格发展最重要的领域。而所谓人格稳定化,指的是家庭在情感上对于成年家庭成员的协助。成年男女之间的婚姻是支持和保护成年人人格健康的一种安排。在工业化社会中,家庭在稳定成年人人格方面的角色被认为非常重要。这是因为,核心家庭经常远离其扩大的亲属网络,不能够像工业化以前的家庭那样利用较为广泛的亲属纽带。

帕森斯认为,核心家庭是最能够满足工业化社会需要的单元。在“传统家庭”中,一个成年人可以离家工作,而第二个成年人则理家育儿。实际上,这种核心家庭内角色的专门化就是让丈夫接受作为挣钱养家者的“工具性”角色,而妻子则在家庭环境中承担“情感性的”、情绪性的角色。

在我们这个时代,帕森斯的观点被认为并不充分,也不合时宜。功能主义的家庭理论遭到严厉的批评,因为它把男女之间家庭的分工看成是自然如此的,不成问题的。不过,看一下历史背景,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些理论。在战后那些年里,女人重新回到传统的家庭角色,而男人则重新承担起独力挣钱养家的责任。然而,我们可以基于其他理论来批判功能主义的家庭学说。理论家们由于强调家庭在执行某些功能上的重要性,忽视了政府、传媒和学校等其他社会制度/机构在儿童社会化方面的作用。这类理论也忽视了不符合核心家庭模式的家庭形式变异。不符合白人、郊区、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都被看作是不正常的。

7.4.2 女性主义思路

对许多人来说,家庭充当了慰藉、安适、爱和友情的重要源泉。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见,它也可能是充满剥削、孤独和深层不平等的渊藪。有观点认为家庭是一个和谐、平等的领地,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对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70和80年

代,女性主义视角主导了大多数关于家庭的争论和研究。如果说先前的家庭社会学研究集中在家庭结构,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的历史发展,以及亲属纽带的重要性,那么女性主义则成功地把注意力转向家庭内部,考察在家庭环境下妇女的体验。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对家庭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扶持的合作单位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她们试图揭示,家庭里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味着某些家庭成员往往比其他成员获益更多。

女性主义者的撰述论题广泛,但有三个主要的论题尤其重要。其一是家庭分工,即一个家户内部成员之间任务的分配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十八章中进一步深入讨论。女性主义者中对于这种分工的历史起源意见不一。虽然有些女性主义者视其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但其他人则主张它与男权制有关,因而出现在工业化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庭分工在工业化之前即已存在,但似乎资本主义生产明显带来了家庭领域和劳动领域之间更为鲜明的区分。这一过程导致了“男性领域”、“女性领域”以及直到今天都能感受到的权力关系的具体化。直到最近,男性挣钱养家的模式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一直都很普遍。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已经对男女之间诸如育儿和家务等家庭工作的分担方式作了研究。她们调查了一些说法的有效性,比如“对称家庭”的说法(symmetrical family, Young and Willmott 1973),即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将在角色和责任的分配上越来越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较之以往,事实上有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进入有薪就业,但女性仍然继续承担着家庭事务的主要责任,闲暇时间比男性要少(Hochschild 1989; Gershuny 1994; Sullivan 1997)。一些社会学家研究了一个相关的主题,分析有薪劳动和无薪劳动的不同领域,特别是女性的无薪家务劳动对总体经济的贡献(Oakley 1974)。另外有人考察了家庭成员之

间的资源分配,以及对家户财力的使用和支配模式(Pahl 1989)。

第二,女性主义者提请人们关注许多家庭内部都存在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家庭暴力这一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女性主义者宣称,长久以来,无论是学术界中,还是司法和政策圈里,都忽视了家庭生活中的暴力和虐待等问题,因而“揍老婆”、婚内强奸、乱伦和儿童性虐待都引起了公众更广泛的关注(参见前面的^①本章第三节第四小节)。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力图搞清楚,家庭是如何成为性别压迫甚至身体虐待的领域的。

对照顾活动的研究是女性主义者做出重大贡献的第三块领域。这一广阔领域涵括了多种多样的过程,从照顾一个生病的家庭成员,到长期照料一位老年亲属。有时候照顾只不过是满足其他人的心理安康——已经有几位女性主义作者关注亲属关系中的“情感工作”。女人不只是承担诸如洒扫庭除和抚养孩子一类具体的工作,她们还在维持人际关系上投入大量的情感劳动(Duncombe and Marsden 1993)。虽然照顾活动是基于爱和深厚情感的,但也是一种需要有能力积极倾听、感受、协商和创造性行动的工作。

7.4.3 晚近的视角

过去几十年间,从女性主义视角开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使得学界以及大众对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兴趣日增。像“夜班兼职”,指女性在工作 and 家庭中的双重角色,这样的词语已经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语汇。但是由于经常集中关注家庭领域内的具体问题,女性主义者对于家庭的研究有时不能反映发生在家庭以外的广泛趋势和影响。

最近十年,出现了大量研究家庭的社会学文献,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视角多有借鉴,但又不墨守成规。其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家庭形式方面,即家庭和家户的形成和解体方面,发生的

^① 原文为“后面的”,系新版中本章大幅改写后顺序调整,未能相应调整说法之故。

广泛转型,以及人们对于个体私人关系方面期待的演变。离婚率的提高,单亲家庭的增多,“重组家庭”和同性恋家庭的出现,以及同居的流行,这些都是关注的主题。然而,要理解这些转型,就不能脱离发生在我们这个晚期现代的广泛变革。如果我们想要把握个人的转型与广泛的变迁模式之间的关联,就必须注意发生在中国甚至全球层面上的转变。

一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转型

笔者在自己的著述中,特别是在《亲密关系的转型》中(Giddens 1993),探讨了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迁。本章引言展现出,前现代社会中的婚姻并不是普遍以性的吸引力或浪漫之爱为基础的,而是更多地关系到缔造一个家庭或促成财产传承的经济背景。对于农民来说,生活的特点就是没完没了的艰辛劳作,不太可能助长性的激情,虽说男人们也有数不清的机会卷入婚外的勾搭。

浪漫之爱不同于多少属于普遍存在的激情之爱,是在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一如我们在本章引言中所见)。尽管浪漫之爱承诺在相互吸引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但在实践中它往往导致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对于许多男人来说,值得敬重的浪漫之爱与不可遏制的激情之爱之间张力的解决办法,就是区分吾妻吾家的温馨舒适与情妇妓女的性感妖娆。这里的双重标准就在于,女人就应当谨守处子之身,等待着她的如意郎君到来,而男人则根本没有这一类的规范。

我认为,在现代性的最近一个阶段,亲密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另一种转型。这就是可塑的性。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性活动的时间、频率和对象等方面的选择前所未有地活泛(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看到)。有了可塑的性,生理性别就可以与生育脱离关系。这部分是因为避孕手段的改进,大大解脱了女性对于反复不断的(也是威胁生命的)怀孕和生产

的担忧。不过,导致可塑的性兴起的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发展,关键还在于一种自我感的发展,认为自我是可以积极主动地选择的。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社会反思性的增长,第四章第四节第四小节有更详细的讨论。

随着可塑的性的兴起,爱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我认为,浪漫之爱的理念正在破碎,被浪子之爱所取代。浪子之爱是积极主动、偶遇而生的,与浪漫之爱的那种天长地久、从一而终的性质格格不入。浪子之爱的兴起有助于说明本章前面讨论过的分居和离婚现象的增多。浪漫之爱意味着一旦人们结婚,无论关系发展如何,两个人通常就紧紧相随了。而现在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离婚在从前是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已婚人士如果关系不复从前,也不再必须死守在一起。

现在的人们不再将关系建立在浪漫激情的基础上,而是越来越追求纯粹关系的理念,其中的配偶之所以依然相厮相守,只是因为他们选择如此。随着浪子之爱的理念已经逐渐巩固,成为一种切实的可能性,找个如意俊郎或如意娇娘的观念逐渐衰落,而找到可心的关系的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要维持纯粹关系,伴侣双方都要接受,“在另行通知之前”,各自都会从关系中获得足够的好处,以使关系值得维持下去。爱的基础在于情感的亲密性,是这种亲密性产生了信任。爱的发展有赖于伴侣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准备敞露心怀,倾吐需求,相互依靠。伴侣关系中的双方始终留意他们所关注的东西,看看是否从关系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足以将其延续下去。

纯粹关系的形式多种多样。婚姻可以是一种纯粹关系,尽管(随着同居伴侣数量的增多)它越来越是一种对于已经存在的此类关系的表达,而不是一种实现此类关系的途径。不过,纯粹关系肯定不仅限于婚姻,事实上,也不仅限于异性恋伴侣。在某些形式中,同性恋关系以其公开和协商的地位,比异性恋关系更切近纯粹关系的理念。

有些批评者认为,被视为成年人之间关系的纯粹关系是不稳定的,而也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习俗是很复杂的,两者之间形成对照,前者忽略了一种(异性恋)关系终结之时,男性与女性的体验往往是不同的。批评者指出,纯粹关系的观念将注意力放在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上,反映出的是孩子和孩童期在社会学思想中的边缘化(Smart and Neale 1999)。

《亲密关系的转型》中具有许多观念,在贝克和贝克-格恩珊姆这一对夫妻档的作品里也能看到。他们也主张,现代生活,尤其是个体选择的普及,已经导致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实施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型。以下,我们来详细谈谈他们的思想。

二 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格恩珊姆:已呈常态的爱之混沌

贝克和贝克-格恩珊姆在《已呈常态的爱之混沌》一书中(Beck and Beck-Gernsheim 1995),考察了迅速变迁的世界中个人关系、婚姻和家庭模式的混乱特性。他们提出,曾经主导个人关系的那些传统、规则和方针已经不再起作用了,现在的个体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选择,用来建构、调适、改进或者拆解他们与其他人形成的联系。婚姻关系的形成已经不再是为了经济目的或者因为家庭敦促,而是出于两厢情愿。但这一事实既带来了自由,也带来了新的张力。两位作者的结论就是,婚姻实际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勤恳工作和努力。

贝克夫妇眼中的我们这个时代,在家庭、工作、爱情以及对个人目标的自由追求之间,充斥着相互抵触的利益。这种抵触在个人关系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特别是在有两份而不是一份“劳力市场简历”需要去打造的时候。两位作者这样说的意思是,在男性之外又有日益增多的女性在其生命历程中追求职业生涯。先前的情况是,妇女们在外做的很可能只是兼职,或者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去抚养孩子。这些

模式不再像从前那样稳定了,现在的男性和女性都很看重其职业上的和个人的需求。贝克夫妇的结论是,我们现代时期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远非关系本身。现在,不仅爱、性、子女、婚姻以及家庭责任等都成为可以协商的话题,而且就连工作、政治、经济、职业以及不平等之类也都属于关系的范畴。对从世俗的到神圣的各种问题的不同选择,如今都摆在了现代配偶的面前。

因此,男性和女性之间对抗的日益升温也许就不足为怪了。贝克夫妇主张,“两性之战”是“我们时代的重头戏”,其证据就在于婚姻咨询产业、家庭法庭、婚姻自助群体的发展以及离婚率的增长。但是,即使婚姻和家庭生活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对人们来说,它们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离婚固然越来越司空见惯,但同时再婚率也很高。出生率可能在下降,但对于治疗生育能力的需求也很旺盛。选择结婚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希望和某个人结成配偶生活在一起的人数肯定会保持平稳。如何能够说明这些相互对抗的趋势呢?

照这两位作者的观点来看,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他们断言,今天的“性别之战”可能是人们“渴求爱情”最为鲜明的表露。人们结婚是为了爱,离婚也是为了爱;他们陷入了对爱的憧憬、懊悔和重新再来的无尽循环之中。一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但同时,对于找到真爱和满足的可能性,人们仍然怀着深切的希望和信念。

你可能认为,对于我们现时代的复杂性而言,以“爱”来做回答未免过于简单了。但是贝克夫妇认为,正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如此势不可挡、如此非个人化、如此抽象,又如此变化迅猛,所以爱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照两位作者的观点来看,爱是人们真正能够找寻到自己并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唯一场所。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中,爱是切切实实的,他们如此写道:

爱是一种对自我的找寻,是一种真正能跟我和你接触的渴望。彼此分享身体、分享思想,彼此邂逅之时不畏缩藏掖,坦诚相见、互谅互让,理解、认可和支持彼此的过去和现在,渴望拥有家庭、渴望彼此信赖,共同抵御现代生活所造成的疑惑与焦虑。即使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或者安全的,即使在一个被污染的世界里,甚至连呼吸都要冒风险,人们也会坚持这场误入歧途的爱的追梦,直到这些幻梦突然化为噩梦。(Beck and Beck-Gernsheim 1995:175—176)

他们认为,爱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种抚慰。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服从于自身的规则,将自身的信息铭刻进人们的期望、焦虑和行为模式”。在我们这个起伏不定的世界中,爱成了一种新的信念之源。有些论者批评贝克夫妇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异性恋上,因为他俩提出两性之战是“我们时代的重头戏”。而论家指出,这样等于将同性恋关系边缘化了(Smart and Neale 1999)。

三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之爱

社会学家鲍曼在其《流动之爱》一书中提出(Zygmunt Bauman 2003),当今之关系已是“街谈巷议,俨然唯一值得投入的游戏,尽管众所周知其风险四伏。”他的书写的是“人类纽带之脆弱”,这种脆弱往往会导致不安全感,以及我们的反应。

鲍曼写道,他的书的主人公乃是“没有纽带的人”(the man without bonds)(例如家庭、阶级、宗教或婚姻等纽带),或者,至少是没有不可解脱的固定纽带的人。鲍曼笔下主人公确实所具有的那些纽带也是松散的,一旦环境有变,同样可以立即解开。而在鲍曼看来,环境会

经常发生变化,他用“流动的”这个比喻来描述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变动不居、缺乏持久的纽带。

鲍曼主张,在一个“个体化”横行的世界里,关系之中凝聚着众多方面的寄望,充满了相互冲突的欲望,被四下拖拽。一方面,有一种欲望朝向自由,朝向只要我们选择如此就能够挣脱的松散的纽带,朝向个体化;另一方面,有一种欲望朝向更大的安全,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加固我们与伴侣之间的纽带。鲍曼认为,实际上,我们在安全与自由这两极之间歧路彷徨。我们常常求诸专家,比如治疗专家或专栏作家,看他们如何建议我们把这两极结合起来。在鲍曼看来,这就相当于“拿一块蛋糕吃,只取关系中甜美怡人的部分,而舍去其中更为艰难但更有益处的部分。”

其结果,便是社会中充满“若即若离的配偶”,处于“即用即取的关系(top pocket relationships)”。所谓“即用即取的关系”,鲍曼指的是有些东西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而不需要的时候就深藏在衣袋里。鲍曼甚至将人们对于“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关系的态度比作利宾纳(Ribena)这种饮料,浓缩原汁喝起来让人恶心,最好的是稀释了喝。

我们对于“人类纽带的脆弱性”的反应是在我们的关系中以数量换取质量。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关系的深度,而是我们所拥有的接触的数量。鲍曼认为,这里的原因部分在于,我们始终是通过手机在交谈,把短信相互发来发去(甚至用半截儿句子来输入文本信息,以求提高输入速度)。重要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信息的不断循环周转,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被排斥在外。

鲍曼注意到,人们现在谈的更多的是关联(connections)和网络(networks),而不是关系(relationships)。处在一种关系之中,意味着相互的投入,而处在一个网络之中,则意味着片刻的接触。在网络中,关联可以按需生成,如愿解除。关联是虚拟的关系而非实际的关系。

在鲍曼看来,真正能够象征流动的现代关系的
就是电脑红娘^①。他引用了对一位 28 岁男子的
访谈记录,此人说电子关系最关键的好处就在
于“你随时可以按清除键”。

也常常有人批评鲍曼,说他在讨论我们的
亲密关系晚近所发生的转型时,态度过于悲
观。他的评断是否正确?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变
迁,会影响到晚近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
题。以下,我们将来谈谈尚在进行中的有关家
庭价值是否衰微的争论。

小结:家庭价值观之辩

“家庭正在瓦解!”考察了过去几十年里
所发生的变迁,家庭价值观的提倡者们发出如
此惊呼。这些变迁包括:对性的态度更加自由、
开放,离婚率急剧攀升,普遍追求个人幸福而
牺牲旧的家庭责任观念。他们提出,我们必须
恢复一种对于家庭生活的道德感。我们必须恢
复传统的家庭,我们大多数人发现自己正身处
纷杂混乱的关系之网,相比起来,传统家庭要
稳定得多,有序得多(O' Neill 2002)。

这些主张并不仅仅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影
响个人领域和情感领域的那些变迁已经超越
了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国界。我们几乎处处都
能发现类似的话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要看
它们发生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以中国为
例。国家正在考虑增加离婚的难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通过了一些非常开明的婚姻法
规。婚姻相当于一份工作合同,“夫妻双方自
愿”,就可以解除。即使伴侣有一方反对,只要
婚姻中没有了“共同感情”,离婚就可以得到
批准。经过两周的等待并交纳一小笔管理费
后,夫妇双方就各自独立了。相比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离婚率还算是低的,但也正在迅速上

升。亚洲其他发展中社会也有这种情形。在中
国的城市,不仅是离婚,连同居都已经越来越
常见了。与此相反,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一
切都有所不同。婚姻和家庭都更为传统。尽管
官方的政策是奖罚并举来限制生育。婚姻是两
个家庭之间的一项安排,由父母而不是个人的
意愿来决定。最近对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甘肃
省的一项研究发现,大约 60%的婚姻仍然是由
父母包办的。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说,“相个
面,点个头,就结了”。这就是迈向现代化的中
国一段讽刺性的故事。今日城市地区的离婚,
大多是发生在以农村的传统方式结婚的夫妇
之间。

在中国,有许多人在谈保护“传统”家庭。
而在许多西方国家,争论甚至更加激烈深入。
捍卫传统家庭形式的人提出,强调关系就会牺
牲家庭作为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这些批评家
中有许多现在谈的是家庭的解体。如果真的发
生这种解体,那么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家庭
汇聚了一系列影响全社会的趋势,包括两性之
间日益增进的平等,妇女广泛加入劳动力,性
行为与性期待的变化,以及家庭和工作的关系
的变化。在今天持续发生的所有这些变迁中,
最重要的莫过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变
迁,从性、情感生活到婚姻和家庭。我们如何思
考自身,我们如何塑造与他人的纽带与关联,
这些方面都正在进行着一场全球性的革命。这
场革命在全球的不同区域进展不一,并且阻力
重重。

“胡扯!”其他论者回答。家庭并没有趋于
瓦解,只是变得多样化而已。他们认为,我们应
当积极鼓励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和性生活,而
不是认定所有人都要被压到同一个模子中去
(Hite 1994)。

哪一方是正确的呢?也许对二者的观点我
们都应该有所保留。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中去是

^① 原文为“computer dating”,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安排“单身男女”交往,所谓“电脑择偶”、“同城约会”之类。

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传统家庭本身从未存在过，或者是因为在过去的家庭中有太多的压抑性，从而使其不能成为今天的范例。而且还因为，那些促使婚姻与家庭的早期形式发生转型的社会变迁基本上不可逆转。妇女们历尽艰辛才使自己解脱出家庭情境，是不会蜂拥着回去的。今天的性伴侣关系和婚姻未来无论好坏，都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个样子了。情感上的沟通，更确切地说，关系的积极创造与维持，已经成为我们个人和家庭生活领域的中心。

结果将如何呢？离婚率可能已经从此前的遽升中稳定下来，但它并没有下降。所有关于离婚的测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估计，但是，根据过去的趋势，我们可以猜测，在目前所结成的婚姻关系中，大约60%的婚姻在10年内可能会以离婚而告终。

我们已经看到，离婚并不总是不幸的反映。以前那些对维持不幸婚姻可能感到无奈的人，现在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些影响着性、婚姻与家庭的发展

趋势，一方面为有些人带来获得满足与自我实现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其他人产生了深深的焦虑。

一些人主张，当今存在的纷繁多样的家庭形式应该受到欢迎，因为它们把我们过去的限制与磨难中解放出来，这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男人和女人可以随己所愿独身生活，而无须面对社会上那种一度对于单身汉甚或老姑娘的不赞许态度。处于同居关系中的伴侣不再面临更“体面”的已婚朋友们的社会排斥。同性恋夫妇可以共同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而不再面临其过去可能会受到的同等程度的敌意。

既然已经谈了这些，就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将来会导致长久婚姻或伴侣关系进一步的衰落吗？我们会越来越生活在一个受苦痛和暴力所伤害的情感与性的境遇中吗？没有人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学分析强烈表明，求助于过去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把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愈益看重的个人自由，与同他人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关系的需要相协调。

本章要点

- 1 亲属制度、家庭与婚姻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来说是紧密联系的意义重大的术语。亲属制度由遗传关系纽带或婚姻引起的关系纽带组成。家庭是负责抚育孩子的亲属群体。而婚姻则是指以一种社会所允许的性关系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之间的联结。
- 2 核心家庭是指一对已婚配偶（或单亲）与亲生或领养的孩子一起生活于其中的家户。当一对已婚配偶与其子女及子女以外的亲属住在同一家户中，或是彼此间有密切、持久的关系时，我们便称之为扩大家庭。
- 3 在西方社会中，婚姻与单偶婚（一种为文化所允许的一男与一女之间的性关系）相联系，家庭也因此与单偶婚相联系。其他许多文化容忍或鼓励多偶婚，即一个人可以同时与两个或更多的对象结婚。
- 4 在 20 世纪，大多数工业化社会中传统核心家庭的主导地位被逐渐侵蚀了。现在存在多种多样的家庭形式。
- 5 不同少数民族的家庭形式有很大差异。在英国，南亚裔和非洲及加勒比裔的家庭就与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类型不同。
- 6 在战后离婚率不断上升，初婚人数下降。其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单亲家户中。
- 7 再婚的比例很高。再婚导致重组家庭的形成，即家庭中至少一个成年人有来自前次婚姻或关系的孩子。“缺席父亲”这个词指分居或离婚后很少（或根本不）与他们的孩子接触的父亲。
- 8 婚姻不再是两个人之间联合的既定基础。同居（一对配偶以婚外性关系的方式住在一起）在许多工业国家中已经越来越普遍。随着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越来越宽松，男女同性恋者逐渐可以以配偶名义住在一起。在有些情况下，同性恋配偶还获得了认定为家庭的法律权利。
- 9 家庭生活决非总是一幅和谐幸福的画卷；其中时有发生性虐待和家庭暴力。大部分儿童性虐待和家庭暴力是由男性实施的，而且似乎与男人染指的其他暴力行为类型相联系。
- 10 对于任一性别来说，婚姻已经不再是获得经常的性体验的条件；它也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及性的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蓬勃发展。婚姻和家庭仍然是牢固确立的制度，但也正经受着巨大的紧张与压力。

思考建议

1. 是否所有的家庭形式在现代社会都以同等的程度被接受?
2. 离婚率的升高如何表明婚姻关系更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
3. 随着男性挣钱养家者角色的衰落,男人在家庭中有哪些新角色?
4. 爱足以维持家庭制度吗?
5. 家庭价值观是否正在衰落? 这要紧吗?

阅读指南

G. Allan and G. Crow, *Families, Households and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2001).《家庭、家户与社会》

Linda Hantrais and Marlene Lohkamp—Himminghofen (eds), *Changing Family Forms, Law and Policy* (Loughborough: Cross—National Research Group,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1999).《变迁中的家庭形式、法律与政策》

Gordon Hughes and Ross Ferguson (eds), *Ordering Lives: Family, Work and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2000).《安排生活秩序:家庭、劳动与福利》

Richard M. Lerner and Domini R. Castellino (eds), *Adolescents and their Familie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Parent—Youth Relationships* (New York: Garland, 1999).《青少年及其家庭:结构和功能和青少年与父母关系》

Jane Lewis, *End of Marriage: Individualism and Intimate Relations* (Cheltenham: E. Elgar, 2001).《婚姻之终结:个体主义与亲密关系》

D. Newman and E. Grauerholz, *Sociology of Families*, 2nd edn (London: Sage, 2002).《家庭社会学》

E. B. Silva and C. Smart (eds), *The 'New' Family* (London: Sage, 1999).《“新型”家庭》

L. Steel and W. Kidd, *The Family* (Palgrave Macmillan, 2001).《家庭》

Helen Wilkinson (ed.), *Family Business* (London: Demos, 2000).《家庭产业》

网络导航

政策研究中心——旨在促进家庭、企业、个人主义和自由的思想库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a think-tank created to foster the family, enterprise, individualism and liberty)

<http://www.cps.org.uk>

公民论坛 (Civitas)

<http://www.civitas.org.uk/>

儿童、青年和家庭政策国际发展信息交流中心 (Clearinghouse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Child, Youth and Family Policies)

<http://www.childpolicyintl.org/>

民众论坛——研究社会排斥、家庭和贫困的思想库 (Demos—a think-tank covering research on social exclusion, the family and poverty)

<http://www.demos.co.uk>

家庭研究委员会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http://www.frc.org/>

目 录

第一节 身体社会学	208
第二节 健康与疾病社会学	211
8.2.1 关于医疗的社会学视角	214
8.2.2 变迁世界中的医疗与健康	218
8.2.3 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学视角	220
第三节 健康的社会基础	223
8.3.1 阶级与健康	224
8.3.2 性别与健康	227
8.3.3 族群与健康	229
8.3.4 健康与社会结合	230
第四节 残障社会学	230
8.4.1 残障的个体模型	231
8.4.2 残障的社会模型	231
8.4.3 英国及全球的残障	235
本章要点	239
思考建议	240
阅读指南	240
网络导航	240



第八章

健康、疾病与残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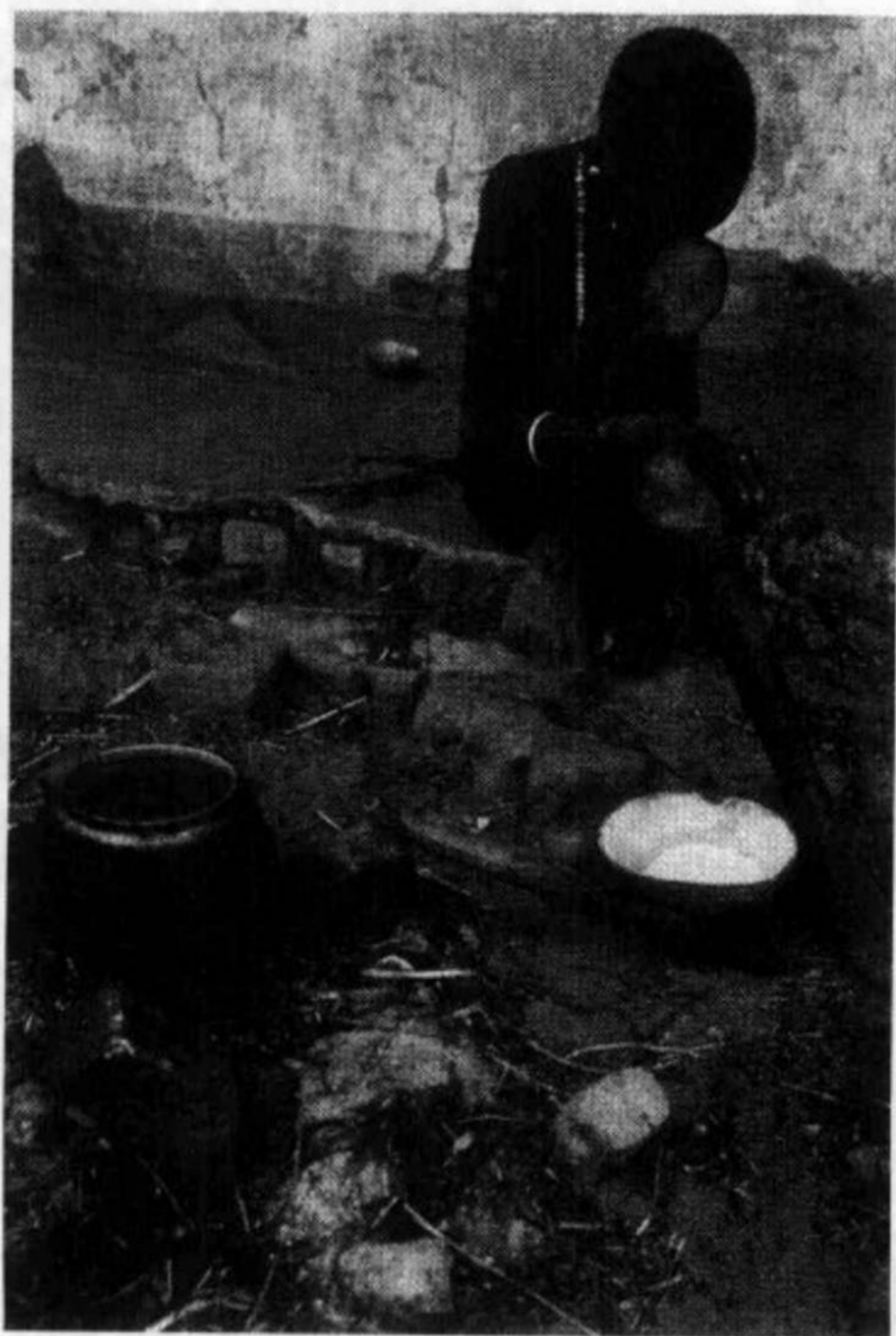
看看下面这两张照片。同样是形容沮丧，同样是形貌消瘦，影像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左边这位非洲少女就是因为缺乏食物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右边这位年轻女性是一名英国青少年，她之所以在死亡线上挣扎，却是因为身处一个食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她选择了不吃东西或吃得极少，以至于危及自己的生命。

这两个例子中所包含的社会动力是截

然不同的。因为缺乏食物而陷入饥饿，是由于外在于人的控制的因素而导致的，并且影响的仅仅是赤贫者。而那位英国少女，生活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却受到厌食症(anorexia)的折磨，人们对这种病的生理起因一无所知。她一心想要实现身材苗条的目标，最终彻底放弃了吃任何东西。厌食症之类的饮食失调都属于富贵病，和那些吃不够甚至根本没得吃的人无关。在像索马里这样的食物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这类病症闻所未闻。

第一节 身体社会学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确实有少数人经过考虑，出于宗教原因而选择了严格节食，比如圣者或神秘主义者。但是，厌食症与宗教信仰毫无关系，并且影响的主要是女性。它是一种身体的疾病，因此我们或许会认为，必须寻找生物学因素或生理学因素来说明它。但



是健康和疾病就像我们所研究的其他话题一样,也受到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影响,比如要保持身材苗条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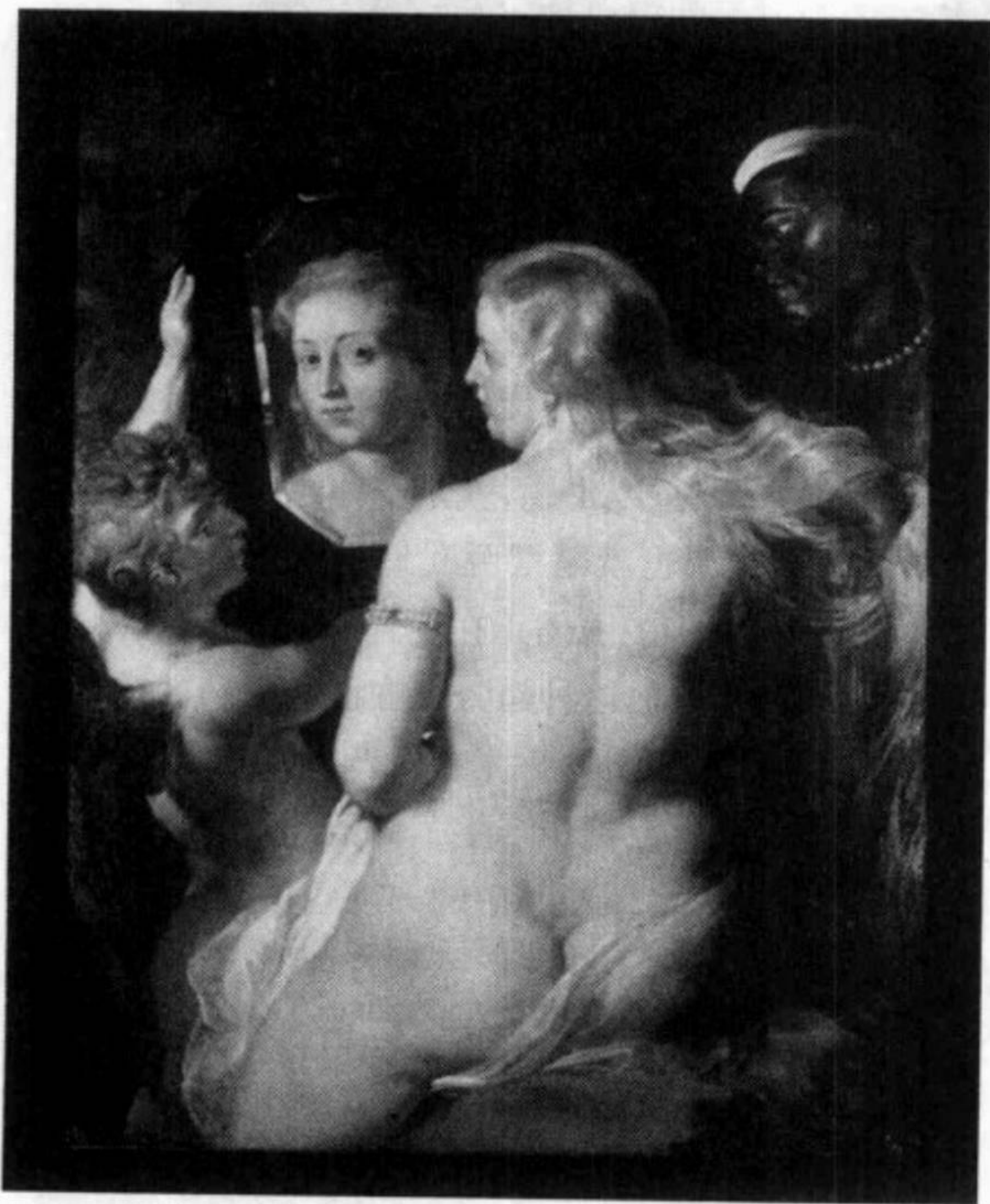
尽管厌食症是一种表现为生理症状的疾病,但它与控制饮食的观念密切相关,而这种观念又关系到现代社会里不断变化中的对于身体魅力尤其是女性身体魅力的观念。在绝大多数前现代社会里,女性的理想形体是丰满肉感。瘦削根本不被认为是值得想望的,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让人联想到缺吃少喝,因此就等于贫穷。甚至到了17、18世纪的欧洲,理想的女性形体也是匀称适中。任何人只要看过那一时期的绘画,比如鲁本斯的作品(见下),就会注意到画中描绘的女性是多么的丰满(甚至有些肥胖)。把苗条视为理想的女性形体,这

样的观念源于19世纪晚期的某些中产阶级群体,但只是到了晚近才普及为大多数女性追求的理想。

因此,厌食症的起源在于现代社会晚近历史中发生变化的女性身体意象。它最早被确定为一种失调,是在1874年的法国。但直到最近三四十年前,它还是不为人注意的(Brown and Jasper 1993)。自那以后,它越来越成为年轻女性当中的常见现象。与此类似的还有贪食症(bulimia),就是食欲过盛,吃完后自己又想吐出来。厌食症和贪食症常常被发现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有些人可能会经过一段饥饿疗法而变得极瘦,然后进入一段大吃大喝时期,然后又通便灌肠,以便维持正常体重,接下来又是一段非常瘦的时期。

在现代社会,厌食症之类的饮食失调不再是不为人注意的疾病形式。对于18岁至24岁之间英国女性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对自己的体重感到满意;39%的人说天天操心自己的体重;10%的人说自己经常节食(Flour Advisory Bureau 1998)。根据饮食失调学会(The Eating Disorders Association)的估计,英国男性和女性合计起来,被确诊和未确诊患有某种饮食失调的有115万人。

对于苗条的过分关注,以及由此导致的饮食失调,并不仅限于欧美女性。随着西方对于女性美的意象传播到世界各地,与它们相关的疾病也跟到了世界各地。比如说,日本最早记录到饮食失调是在20世纪60年代,也是该国经济迅猛成长、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的一种后果。现在大约有1%的日本年轻女性被发现患有厌食症,这个比例与美国发现的大致相当。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的都市地区,在年轻人特别是富裕的年轻女性当中,开始普遍出现饮食方面的问题



这幅画是由鲁本斯于1613年左右完成的,描绘的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



在英国和其他富国的每一条商业大街上,现在都能够买到来自全球的各种食品,令人目不暇接。

(Efron 1997)。根据医学景观数据库 (Med-scape) 的《大众医学》杂志 (*General Medicine* 2004) 所报道的一项研究,西方各国女性中贪食——厌食症的发病率从 0.3% 到 7.3% 不等,而与之相比,非西方世界的发病率为 0.46% 到 3.2% (ANFED 2005)。

我们又一次看到,在饮食方面遇到困难,对自己的外形感到绝望,这种看起来似乎属于纯粹的个人困扰的事情,证明是一桩公共议题。如果我们不仅限于威胁到生命的厌食症,而把那些对于饮食调节和身体外表的过度关注也算进来,那么饮食失调现在已经成为千百万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今天,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能发现它们。

饮食失调的传播令人震惊,让人看清社会因素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社会互动能力的影响。被称为身体社会学的领域所考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以哪些方式受到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作为人类,我们显然都拥有一个身体,但这个东西并不只是我们单纯地拥有的,不仅仅是外

在于社会而存在的物质性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深受我们所属群体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也深受我们的社会经验的影响。

本章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身体越来越摆脱所谓“自然”,也就是摆脱我们的周遭环境和生物节律。我们的身体正在受到科学力量和技术力量的侵入,而这种趋势正在创造出新的困境。比如说,整形外科手术愈益普及,固然带来了新的选择机会,但也产生了激烈的社会争议。本章我们将会谈谈其中的一项争议,是关于为脸部有缺陷的人做整形手术的问题。

在这里,“技术”这个词不应当太狭隘地理解。就其更为基本的意义而言,它指的是物质技术,比如现代医学中包含的那些,像扫描仪,让医生能够在婴儿出生前检测其发育情况。但我们也必须考虑福柯所称的作用于身体的“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 Foucault 1988)。所谓“社会技术”,他指的是身体越来越成为一种我们必须去“塑造”而不是简单接受的东西。社会技术就是我们作用于自身身体

功能运作的任何类型的常规干预,以使用特定的方式改变其运作。饮食控制就是一例,这是厌食症的重要一环。

下面,我们将首先分析饮食失调为何如此普遍。由此我们将进一步从更为广泛的社会维度来考察健康。然后,我们将转向残障社会学,尤其是要探讨对于残障的社会文化建构。

第二节 健康与疾病社会学

要搞明白饮食失调在当代为什么变得如此常见,我们就得回想本书前面所分析过的那些社会变迁。因此,本章另一项重要主题就是社会变迁对于身体的影响。厌食症其实反映的是某些特定类型的社会变迁,包括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

饮食失调在西方社会中的兴起,直接对应于食品生产的全球化,后者在过去三四十年内迅猛增长。新型冰箱的发明加上集装箱运输的运用,使得食品能够长时期储藏,并从世界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超级市场从世界各地进货,(为那些负担得起的人,现在是西方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储藏食品。绝大多数食品可以常年供应,而不像以前那样属于季节性的地方特产。

在过去大约十年间,英国及其它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开始更周到地考虑他们的日常饮食。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拼命想要变瘦。正相反,当各种各样的食品都几乎是随时可以得到时,我们就必须决定吃什么,换句话说,设计某种日常饮食,这里的“日常饮食”(diet)指的是我们习惯消费的食物。要设计出日常饮食,我们在决定该吃些什么的时候,就必须结合科学现在向我们狂轰滥炸的许多新的医学信息,比如胆固醇含量是导致心脏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食物丰足的社会里,我们第一次有能力结合自身的生活习惯(比如慢跑、自行车、游泳和瑜伽)来设计我们的身体,设计我

们该吃些什么。这种情形既带来了机遇,也产生了深切的张力,这就是造成饮食失调的根源。

为什么饮食失调对于女性影响比较明显,对于年轻女性影响最为显著?首先,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陷入饮食失调的人都是女性,其中大约有10%是男性(Eating Disorders Association 2000)。只是男性不像女性那样经常性地染上厌食症或贪食症,其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广泛持有的社会规范更加强调女性而不是男性的身体魅力的重要性,另有部分原因在于男性值得想望的身体意象不同于女性。琼·雅各布斯·布伦伯格研究了过去两百年的美国女孩的日记,认为在今天,当美国的青春期女孩自问“我是谁?”和“我想要成为谁?”之类的问题时,其答案相比于一百年前,更有可能以身体为核心。布伦伯格提出,“商业利益”从女孩们的身体忧惧中渔利。她的结论是:身体现在是美国女孩的自我感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已经成为她们的核心规划(Joan Jacobs Brumberg 1997)。

厌食症之类的饮食失调反映出,在目前情形下,女性在广阔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比以往大得多,但人们在评判她们时,依然是不仅看其成就,也同样看其外表。饮食失调的根源就是对于身体的羞耻感。个体自觉不够宜人,不够完美,对别人会如何看她深感焦虑,这些都会汇聚到她对于自己身体的感觉上。这样一来,苗条的理念就会让人执迷,减肥成为让自己的一切都能从此顺心遂意的手段。一旦她开始强迫自己节食和锻炼,就会陷入一种完全拒绝进食或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的模式而欲罢不能。如果不能打破这种模式(这方面有些心理治疗和医疗处置已经证明颇为有效),患者会真得饿到死去。

饮食失调的传播反映出科学和技术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只有在技术的进展下,才有可能计算卡路里。但是,技术的影响始终会通过社会因素来调节。我们对于身体的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替代医疗

简·梅森以前活泼健康。但当她开始感到极度疲乏和压抑的时候，才发现常给她看病的医生已经帮不了她什么大忙了：

从前，我是个非常健康的人。我游泳、打壁球、跑步，现在突然一切都改变了。我去看医生，但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全科医师说那叫腺热^①，给了我一些抗生素，服了以后我生了严重的口疮。然后他就老是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做过各种身体检查。我真的很难受。就这么过了半年。我还是病着，而他们也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转引自 Sharma 1992:37)

简的医生认为她是由于承受压力的缘故，建议她试一试抗抑郁药。虽然简也承认，身体不能确诊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但她知道抗抑郁药并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后来简听到一个广播节目，然后就怀疑自己的无精打采可能是感染了后疲劳综合症^②造成的。在朋友的建议下，她求助于顺势疗法医师 (homeopath)——一种替代医疗的从业人员。他们认为，一种疾病的征候就属于身体的自愈过程，因此先对整个身体的状况进行评估，然后使用极小剂量的药物，“以毒攻毒”进行治疗。简找到了一位其方法对她来说比较适应的顺势疗法医师，并且对所接受的治疗很满意 (Sharma 1992)。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非正统的医疗方法

引入自己日常的医疗保健，简只是其中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间，许多工业化社会里的人们都对替代医疗的潜力兴趣日益高涨。作为可供选择的医疗形式，替代医疗从业者的人数在增长。从草药到针灸，从反射疗法^③到按摩疗法 (chiropractic treatments)，现代社会正经历着卫生保健替代手段的激增，这些新的手段超出了“正规的”^④医疗系统，或者与其交迭。据估计，四分之一的英国人曾经找替代医疗从业者诊治过。而在寻求替代治疗的人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女性、中青年以及中产阶级。

工业化国家拥有许多世界上最发达、资源最丰富的医疗设施。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抛弃卫生保健体系，转向诸如芳香疗法^⑤和催眠疗法等“非科学的”^⑥治疗方法呢？首先，有必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每个使用替代医疗手段的人都把其作为正统医疗的替代品（虽然有些替代疗法，如顺势疗法，彻底否定了正统医学的基础）。许多人是把两种方法的要素结合起来的。由于这一原因，一些学者宁愿把非正统技术称作补充 (complementary) 医疗，而不愿称其为替代 (alternative) 医疗。(Saks 1992)

有许多原因导致个人寻求替代医疗从业者的服务。一些人认为正统医疗不敷实用，或者不能缓解那些出于压力和焦虑的慢性的、恼人的痛苦或症状。也有人是不满意现代卫生保健制度的运作方式——众多的候诊者、在一连串的专家中辗转、手头不宽裕等等。与此相关的是担忧药物的毒副作用，害怕外科手术的强行

① 此处原文为“glandular fever”，正式学名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② 此处原文为“Post-viral fatigue syndrome”，系病毒感染引起的肌痛性脑脊髓炎。

③ 此处原文为“reflexology”，指按摩手、脚、头部等处以松弛神经的方法。

④ 此处原文为“official”，也就是官办的，可以参考本章下文福柯的论述来体会这两种释义的隐秘关联。

⑤ 此处原文为“Aromatherapy”，指使用油脂、香料等芳香物质治疗皮肤病的疗法。

⑥ 此处原文为“unscientific”，注意我们没有直接译为“不科学的”，以此凸显“科学”之作为一种知识系统。

侵入,而药物和手术这两项技术都受到现代卫生保健制度的偏爱。医生和病人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是一些人之所以选择利用替代医疗的关键所在。他们觉得,“被动的病人”(passive patient)角色不能保证他们充分地投入治疗并得到康复。最后,一些人出于宗教和哲学的原因而反对正统医疗,认为正统医疗把人的身心两方面割裂开来对待。他们认为,正统医学的做法经常考虑不到健康和疾病的精神维度和心理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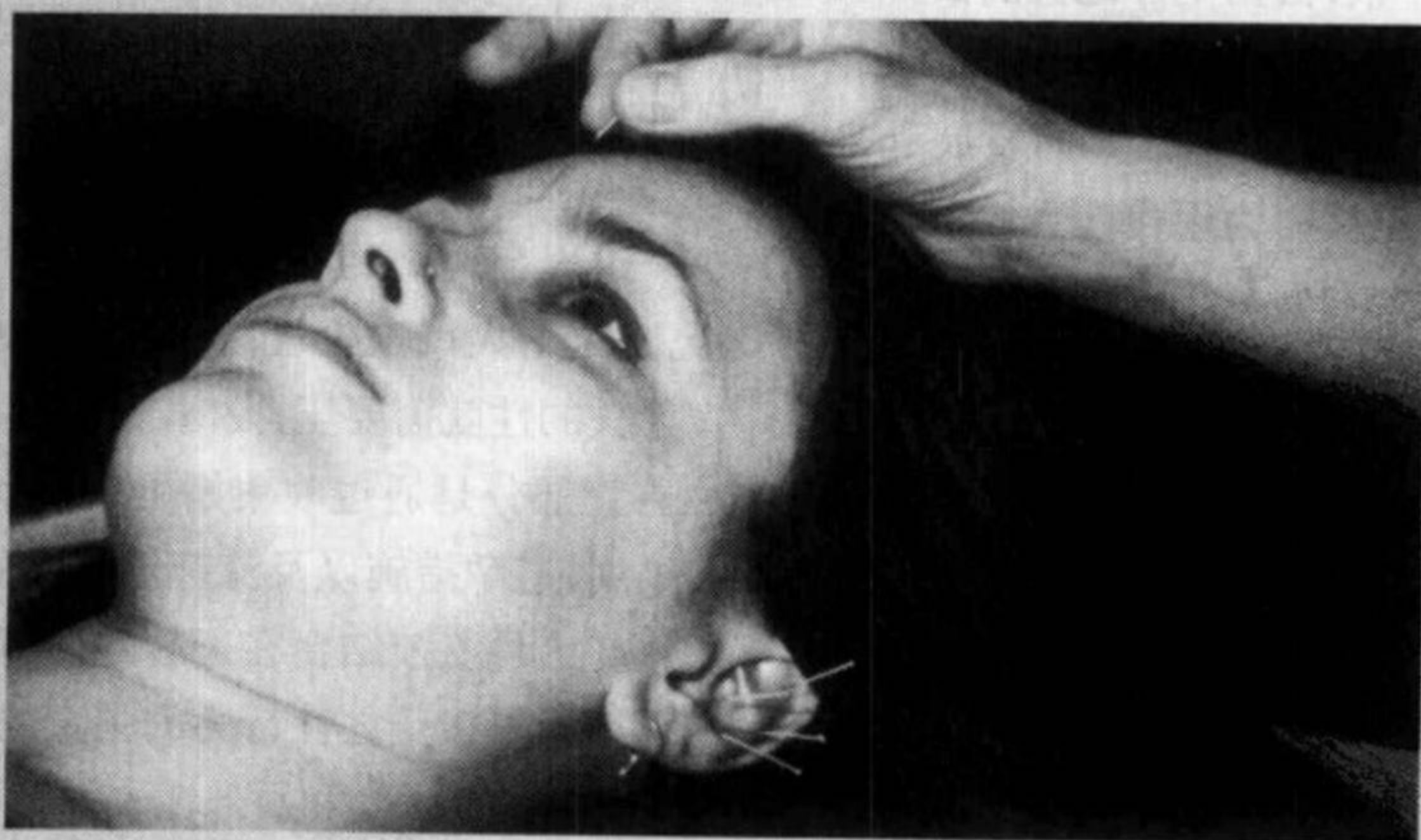
替代医疗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可供社会学家思考的有意思的问题。首先,它耐人寻味地反映了发生在现代社会内部的一些转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可供我们用来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的信息量越来越多,信息渠道也是多种多样。在这一点上卫生保健也不例外。个人日益成为“健康消费者”^①,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采取积极的立场。我们不仅能够决定看哪种类型的医生,而且还可以要求更多地参与自己的保健和治疗。这样,替代医疗的发展就与自助运动的扩展联系起来,后者包括支持群体、学习小组和自助图书。人们现在比以前更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积极地改造之,而不是

依赖其他人的指导或意见。

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与晚期现代健康和疾病的变迁中的性质有关。人们寻求替代医疗的许多疾病和身心状态,似乎正是现代时期自身的产物。在工业化社会中,(由关节炎、癌症和其他疾病所造成的)失眠、焦虑、压力、抑郁、疲劳和慢性疼痛都在增多。虽然这些情况由来已久,但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它们现在似乎正在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更大的危害。最近的调查显示,现在,压力已经超过了普通感冒,成为人们缺勤的最常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预言,在20年内,抑郁将会成为世界上最能致人衰弱的疾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性的这些后果似乎是正统医学很难对付的。虽然替代医疗还不可能彻底取代“正规的”医疗手段,但有迹象表明,其作用将继续加强。

问题:

- 1 为什么替代医学体系和治疗手段在近些年来有如此显著的增长?
- 2 支撑生物医学健康模式(见下节)的那些假定与替代医疗的假定有何不同?



有些人更为积极主动地关注自己的治疗,质疑生物医学健康模式,会选用许多补充性的医疗手段,针灸就是其中之一。

^① 此处原文为“health consumers”,即消费健康的人,注意不是“healthy consumers”。

自主控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处境创造出新的积极正面的可能性,也产生了新的焦虑和问题。目前的情形属于社会学家所称的自然的“社会化”。这个术语指的是曾经属于“自然的”或在自然中给定的现象,现在变成为社会的,有赖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决定。

8.2.1 关于医疗的社会学视角

一 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的兴起

像我们这本书中探讨过的许多观念一样,“健康”与“疾病”这两个术语也是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界定的。不同的文化对健康和正常的理解不同。所有文化都有关于身体健康和疾病的概念,但我们现在承认属于医学的概念,绝大多数都是过去三百年以来西方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前现代文化中,家庭是应对疾病和痛苦的主要机构。同时也总是存在一些专门治病的术士,他们把物理治疗与巫术治疗结合起来,今天在世界各地的非西方文化中仍然留着不少此类传统的治疗体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前文所讨论的替代医疗的范畴。

大约近两百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医学观念被表述为生物医学健康模式。对健康和疾病的这种理解是与现代社会一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它可以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它的出现与科学和理性战胜对于世界的传统说明或宗教说明紧密相关(参阅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有关韦伯和理性化的讨论)。在更详细地讨论生物医学健康模式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地考察一下产生它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公共卫生

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传统社会的成员主

要依靠民间代代相传的药物、诊断和疗法。他们经常从巫术或宗教的角度看待疾病,并把病因归为恶鬼附体或“罪”(sin)。对农民和普通的城镇居民而言,没有任何外部的权威机构能够像今天的国家和公共卫生系统那样关心他们的健康。健康曾经是私人的事情,而非公众的话题。

然而,民族国家和工业化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有明确边界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改变了对本地民众的态度:本地民众不再只被视为这块土地上的居民,而是被视为在中央权威机构统治下的人口。人口被看成是一种有待监管和调控的资源,这属于国家尽力扩张其财富和权力的过程。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其人口的健康,因为国民的福祉关系到国家的生产力、繁荣程度、防卫能力和成长速度。人口学的研究,即对人口的规模、构成和动态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大为提高。开始有了人口普查,以便记录和监控人口中发生的变化。各类统计数据都被收集起来并加以计算,包括出生率、死亡率、平均婚龄和育龄、自杀率、预期寿命、饮食内容、常见病、死因等方面的数据。

福柯(1926—1984)提请人们注意国家对于身体的控制和规训,从而对理解现代医学的兴起做出了颇具影响的贡献(Foucault 1973)。他认为,性(sexuality)和性行为对于这一过程至关重要。性既是人口繁衍增长的途径,也是对人口健康与福祉的潜在威胁。与生育无关的性就需要压抑和控制。国家对性的这种监管部分是通过收集婚姻、性行为、婚生与非婚生、避孕措施以及流产等方面的数据进行的。与这种监控结合在一起的,是宣扬关于性道德以及可接受之性行为的强大的公共规范。例如,同性恋、手淫和婚外性关系等性“倒错”^①都会被贴上标签并受到谴责(参见第十二章)。

^① 此处原文为“perversions”,福柯是要揭示这些数量上的少数、统计上的非常态如何变成道德上的非正常,变成错乱或倒错,乃至于此词直接可译为“性变态”。

从消灭人口(亦即“社会机体”)中的“病理”现象的努力之中,形成了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的概念。国家开始承担改善人口生活条件的责任:建成了卫生设施及上下水系统以防治疾病;铺设了道路,对住房也更为注意;对屠宰厂和食品加工设施逐步进行规范;监督殡葬措施以确保其不会对人口产生健康方面的威胁;在对人口进行监督、控制和改造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系列的机构,比如监狱、收容所、劳动救济所、学校和医院等等。

二 生物医学模式

医疗实践与上述社会变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将科学应用于医疗诊断与治疗,是现代卫生保健系统发展的主要特征。人们在界定疾

病的时候,开始基于客观的角度,根据身体上可以辨认的客观“体征”,而相对于患者本人所体验到的症状。由受过训练的“专家”施行的正规的医疗保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治疗身心疾病的方式。医学成为改造从犯罪、同性恋到精神病等“越轨”行为或状态的工具。

生物医学健康模式有三点主要的预设。首先,疾病被视为人体内导致偏离“正常”状态的故障。18世纪晚期提出的细菌致病说认为,在每一种疾病的背后,都有具体的可以辨认的致因(agent)。为了使身体康复,必须分离出病因并加以治疗。

第二,心和身可以分别处置。患者相当于一副病体,即一种病状,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着重点在于疾病的治疗,而不在于个人的安康。生物医学模式认为,可以不必考虑其他



根据生物医学健康模式,在医学专业看来,病人所呈现出来的只是“病体”(sick bodies)。

因素,孤立地对病体进行操作、检查和治疗。医疗专家们采取一种“医学凝视”(medical gaze),即以冷静超脱的方式观察并处置病人。治疗是以中立的、价值无涉的方式展开的,有关信息从临床的角度被收集和记录在患者正式的档案中。

第三,受过训练的医疗专家被认为是治疗疾病的唯一专家。医学职业作为一个整体,符合公认的伦理准则,并且是由成功完成了长期训练的经过资格认证的人组成的。自学成才的术士或“非科学的”疗法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医院才是治疗严重疾病的适宜环境,这些治疗常常需要依靠技术、药物或手术的某种结合。表 8.1 概括了医疗模式的主要预设及其批评。

三 对于生物医学模式的批评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上文描述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式日益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首先,一些学者认为,科学的医学的效力被“过分夸大了”。尽管现代医学获得了威望,但整体健康状况的改进更多地应该归因于社会和环境的改变,而不是医术。特别是在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减少儿童早夭方面,有效的卫生设施、更好的营养条件以及经过改进的排水设备和卫生保健条件更为重要(McKeown 1979)。直到进入 20 世纪之后好久,药品、手术的进步以及抗生素的使用才开始使死亡率明显降低。抗生素在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才首次被用来治疗细菌性感染,而免疫接种(预防小儿麻痹症这样的疾病)出现的时间更晚。伊万·伊利奇甚至提出,由于医原病发生(iatrogenesis)或者说“自致性”(self-caused)疾病,现代医学实际上是弊大于利。伊利奇提出有三类医原病发生:临床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临床性医原病发生指的是医疗处置导致患者病情恶化或产生新的病况。社会性医原病发生指的是随着医药普及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导致了对于医药的人

为需求。伊利奇认为,社会性医原病发生会进一步引起文化性医原病发生,医学说明和替代医疗越来越削弱了应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的能力。在像伊利奇这样的批评者看来,应当大大削减现代医学的应用范围(Illich 1975)。

第二,人们指责现代医学忽视了作为其治疗对象的患者本人的意见和感受。由于医学的基础据说是客观地、科学地理解特定的身体疾病的致因和疗法,因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聆听患者个人是如何解释自身的状况的。每一位患者都是有待处置和治疗的“病体”。然而,批评者认为,只有当病人被当作有思想、有能力的存在,具有自身有效的理解和解释时,才可能展开有效的治疗。

第三,批评者认为,科学的医学自居于其他任何替代形式的医学或治疗之上。有一条信念长期存在,相信任何“非科学的”东西一定是劣等的。我们已经看到,那种认为现代医学是更有效的知识形式的看法,正在因为顺势疗法和针灸等替代医疗形式的日益普及而受到削弱。

第四,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医学界在界定什么构成疾病、什么不构成疾病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它能够运用其作为“科学真理”仲裁者的地位,把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置于医学控制之下。一些持此观点的最强烈的批评者来自女性。她们认为,怀孕和生育的过程已经被现代医学占据和“医学化”了。分娩现在是在医院进行的,并主要由男性专家指导,而不再是由女性掌握,在家中由接生婆帮助完成。怀孕本来是一种平常而自然的现象,但却被当作充满风险和危险的“疾病”对待。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已经失去了对这一过程的控制,因为她们的意见和知识在现在主管生育过程的专家看来是不相干的(Oakley 1984)。与此类似,对于“正常”状况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关注还包括儿童多动症(参见下面

的图文框), 忧愁或轻度抑郁(通常借助百忧解^①等药品加以调节), 以及疲劳[常被称为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第五, 批评者们指出, 支撑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的那些预设遭到了严重的政治操弄, 尤其是借助优生学^②(eugenics), 试图通过所谓“优选优育”, 从遗传学的角度“改善”人种。纳粹德国的科学“专家”和“医学”专家, 就是宣称他们已经确定了一个优越的种族, 就是皮肤白皙的“雅利安”种, 从而把这些政策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优生学方案最终导致了属于被纳粹视为生物学上劣等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等群体的数百万人遭到种族屠杀, 以及对于超过 25 万的残障人士的系统谋杀^③(参见 Burleigh 1994)。

尽管纳粹德国对优生学政策的运用是迄今为止最为残忍的, 但应当牢记, 在 20 世纪,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也运用了优生学, 只是常常描述成所谓“人口政策”, 用来对付人口中特定的一些群体, 特别是残障人士。这些政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对那些所谓“弱智”的女性实行强制绝育。在美国的几个州, 从 1907 年到 1960 年, 就对 6 万人实施了强制绝育, 其中的黑人女性比例明显高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反映出了对于黑人女性的种族歧视。在北欧各国, 政治领导人和遗传学家都接受了强制绝育政策, 因为他们担心趋势已现的福利国家将会鼓励那些“不适者”生儿育女, 从而削弱了“国民人种”。仅在瑞典, 从 1934 年到 1975 年, 有 6.3 万人被强制绝育, 其中 90% 是女性。而比瑞典小得多的挪威, 在同一时期内则有 4.8 万人被强制绝育。^④与此相反,

英国和荷兰的医疗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采纳的则是自愿绝育政策, 伴之以对那些“弱智者”实行大规模收容(institutionalization)和隔离(Rose 1999)。

今天, 医疗技术日新月异, 也给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人不断提出新的难题。现在大量的科学工作致力于遗传工程的扩展, 期望有可能对胎儿的遗传构成实施干预, 从而影响其进一步的发育。围绕遗传工程的争论常常使各派论者两极分化。批评者认为, 上文讨论的 20 世纪优生学历史已经使这种努力名誉扫地, 支持者则认为不要把这和那些历史事件扯在一起(Kerr and Shakespeare 2002)。根据这些支持者的看法, 遗传工程将会带来巨大的机遇。比如说, 将有可能识别使某些人特别容易感染某些疾病的遗传因子。基因重组(genetic reprogramming)将确保这些疾病不再代代相传。2004 年, 英国有一组患有某种遗传性肠癌的人得到了政府的人类生育与胚胎学管理局(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的授权, 可以选择已经去除可导致后代疾病的基因的胚胎。这个决定意味着, 只有那些取出了可导致癌症的基因的胚胎会被移植到母亲的子宫当中。如果不经过筛查过程, 婴儿将有 50% 的可能性遗传此病(《泰晤士报》, 2004 年 11 月 1 日)。核准胚胎的选择时, 事先规定只能用于那些孩童期病症或不治之症, 比如囊肿性纤维化或杭廷顿斯舞蹈病。^⑤(《泰晤士报》, 2004 年 11 月 6 日)另一方面, 人类生育与胚胎学管理局的管理更加剧了围绕所谓“人工设计婴儿”(designer babies)的争议。它开创了一个先例, 将会允许医生根据比目前广

① 百忧解(Prozac): 一种抗抑郁药的商标名。

② 此处原文格式如此, 但书后术语表无此词条。

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于犹太人被屠杀的集体记忆塑造(Holocaust)也参与了对于其他类型人群遭遇的历史建构(消抹)。

④ 目前挪威的总人口大致相当于瑞典的一半。

⑤ 囊肿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是一种遗传性胰腺病。杭廷顿斯舞蹈病(Huntington's disease 或 Huntington's chorea)是由美国医师乔治·杭廷顿最先发现的遗传性慢性舞蹈症。

表 8.1 生物医学模式的假设及对该模式的批评

预设	批评
疾病是由某种生物原因引起的人体的故障。	疾病是由社会建构的，而不是可以通过所谓“科学真理”加以揭示的东西。
病人是被动的存在，其“病体”可以与其精神分开处置。	病人对于疾病的意见和体验对治疗是至关重要的。病人是主动、“完整”的存在，其整体的安康——而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
医疗专家拥有“专业知识”，提供对疾病惟一有效的治疗。	医学专家并不是健康和疾病方面知识的惟一来源。替代性的知识形式同样有效。
适合进行治疗的地方就是医院，在那里集中了医疗技术并有最好的应用。	康复并非只能在医院进行。治疗所使用的技术、药物和手术不一定是最先进的。

泛得多的特性来“优选”胚胎。比如说，在科学的角度上，目前已经有可能从肤色、发色、眼睛、体重等方面在出生前“设计”身体。

上文讨论的这些对于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的批评，有几种也适用于有关遗传工程的争论。那些担忧生物医学模式的人中，有许多也会质疑医疗专家行使他们对于技术的权威的角色。医疗干预是否会产生意外后果？未来的父母在决定胚胎的选择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算不算（传统上为男性的）医疗专家对于（显然是女性的）未来母亲给出权威性医学建议的又一个例子？在胚胎的选择中，应当设置什么样的防护机制，以避免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残障歧视（disablism）？况且，这些范畴又当如何界定呢？遗传工程不太可能比较便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有能力负担费用的人将有可能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去除任何他们认为不为社会所欢迎的特性？那些受到更多剥夺的群体，他们的孩子将继续保持自然生育，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一些社会学家已经指出，对于遗传工程的获取机会是有差异的，这有可能导致出现一个“生物性底层阶级”（biological underclass）。那些不具备遗传工程可以带来的生理优势的人，将有可能遭受那些拥有这些优势的人的偏见和歧视。他们会在就业、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等方面遇到困难

（Duster 1990）。在社会学家看来，新型医疗技术进展神速，提出了越来越多新鲜而棘手的问题。

8.2.2 变迁世界中的医疗与健康

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不仅仅是医学专家拥有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知识和理解。通过对自己身体的了解，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锻炼、消费模式和整体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解释和打造我们自身的安康。有关健康的大众思维中出现的这些新趋向，连同以上概括的对于现代医学的其他批评，正在促成现代社会中卫生保健制度的一些深刻转型（参看图 8.1）。它们也说明了前文讨论过的替代医疗或补充医疗的兴起。

然而，这里还有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疾病本身的性质和范围也一直在变化。早先，主要的疾病是肺结核、霍乱、疟疾和小儿麻痹症这类传染性疾病，它们通常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会威胁到整个人口。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这类急性传染病已经成为较次要的致死原因，其中有些已经基本被消灭。工业化国家中现在最常见的导致死亡的疾病是非传染性的慢性病，比如癌症、心脏病、糖尿病或循环系统疾病。这种转变被称为“健康转型”（health

多动症的“医学化”



在过去的十年间,包含利他林^①(Ritalin)的处方呈指数增长。在美国,年龄在5到18岁之间的儿童有将近3%在服用利他林。在英国,1998年共开出了125000多例利他林处方,而1993年仅为3500例。专家预计,到2007年,将有七分之一的孩童服用此药(《观察家报》[Observer],2003年5月)。那么,什么是利他林?为什么社会学家应当关注它?利他林这种药是开给患有注意力缺乏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许多医生和精神病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失调,会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在学校里学习时精力涣散、能力低下。利他林被说成是一种“灵丹妙药”,它能帮助儿童集中精力,安静下来,并提高学习效率。有些教师说,从前在教室里调皮捣蛋的问题儿童,一旦服用利他林,就

变成了“小天使般的”学生。

然而,批评利他林的人认为,这种药品绝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无害的“灵丹妙药”。尽管最近几年该药在美国和英国的处方数越来越大,但关于它对儿童的大脑和身体的长期效应,却没有任何综合性研究。人们可能更多的是担心,利他林已经成了解决问题的方便之“策”,而这些问题事实上根本不是身体问题。反对使用利他林的人认为,注意力缺乏多动症的所谓“症状”,其实是现代儿童对所承受的越来越大的紧张和压力(日益加快的生活步伐、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锻炼的缺乏、高糖饮食和家庭生活中的冲突等)的反应。据传,通过使用利他林,医学界已经成功地把儿童多动症和注意力缺乏给“医学化”了,而不是提请人们注意可观察到的症状背后的社会原因。

① 利他林(Ritalin):盐酸哌醋甲酯,一种神经中枢兴奋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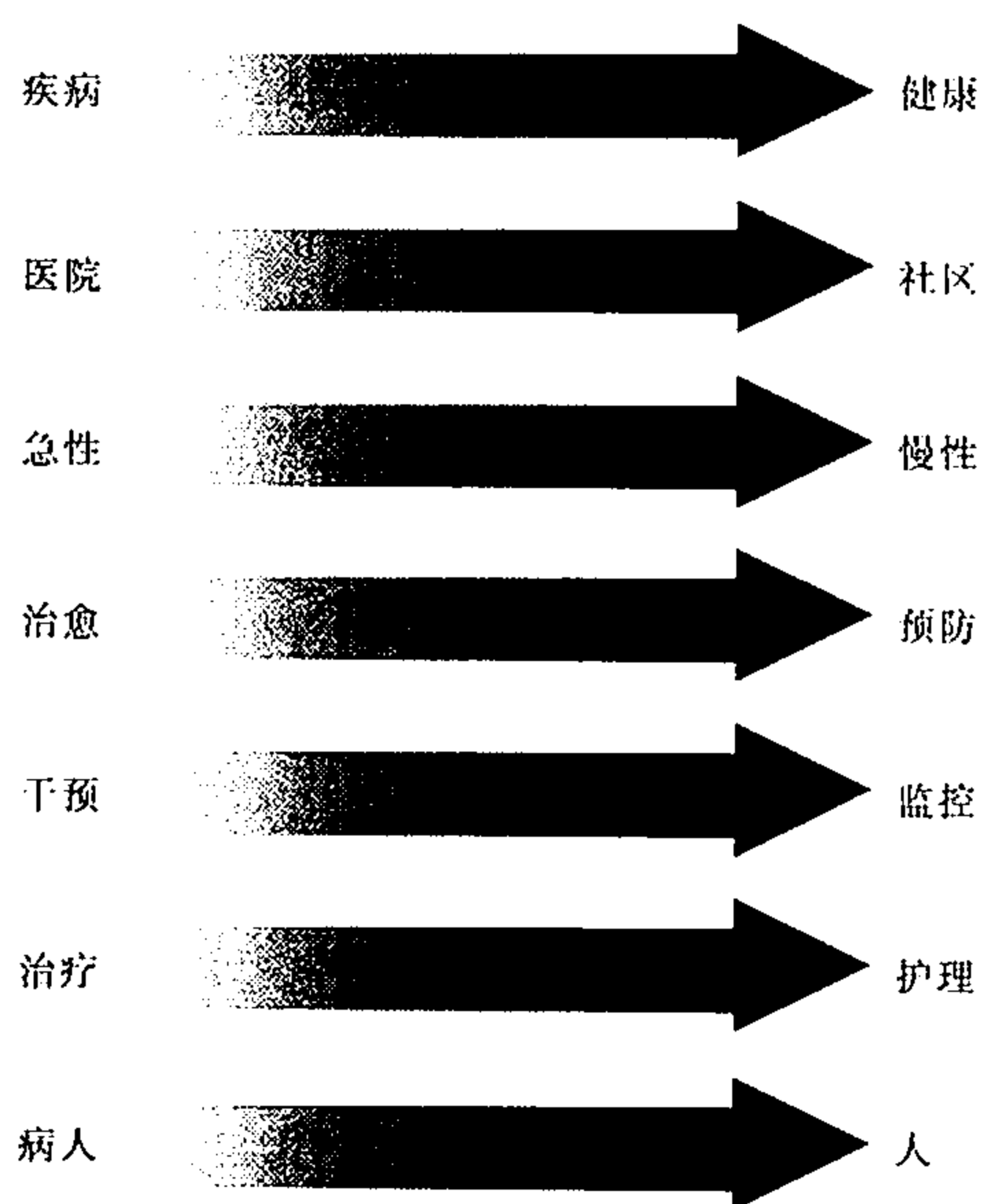


图 8.1 健康与医疗的当代转型
资料来源: Nettleton 2006

transition)。在前现代社会中,婴幼儿的死亡率最高,而在今天,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因为现在人们更为长寿,并且主要患慢性的变性疾病^①,所以需要以新的思路来考虑保健和护理。人们还越来越强调对于吸烟、锻炼和饮食调节之类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认为这些选择影响着许多慢性病的发生。

当代这些保健方面的转型,是否会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将导致一种新的“健康范式”以取代生物学模式,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这个时期,现代医学以及人们对它的态度正在发生着重大而迅速的变化。

8.2.3 关于健康与疾病的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家主要的关注之一,就是考察对

于疾病的体验。社会学家要问,像前文讨论过的厌食症那样的疾病,病人及其所接触的人是如何体验和解释的。如果你曾经生过病,哪怕只是短期的,你也会知道日常生活的模式被暂时改变了,你与他人的互动也改变了。这是因为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转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但却是经常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依赖于自己的身体按照其应有的方式运作;我们期望自己的身体会促进而不是阻碍我们的社会互动和日常活动,而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期望之上的。

疾病兼具个人的和公共的维度。当我们生病时,不仅我们自己会体验到痛苦、不适、困惑和其他考验,而且其他人也会感受到这些。与我们过往密切的人可能会表示同情、提供照料和支持。他们会尽力去弄明白我们生病意味着什么,或者设法将这一事实融入他们自己的生活模式之中。与我们交往的其他人也会对疾病做出反应,而这些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解释,并给我们的自我感觉带来挑战。

在社会学思想中,有两种理解患病体验的方式最有影响力。第一种与功能主义学派相关,提出了个人生病时被认为会遵行的行为规范。第二种观点受到符号互动论者的支持,试图更宽泛地揭示对于疾病的解释,以及这些意义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动和行为的。

一 病人角色

著名的功能主义思想家帕森斯提出了病人角色的概念,用来描述病人为了尽量减小疾病的破坏性影响而采取的行为模式(Parsons 1952)。功能主义思想认为,社会通常以一种平稳而有共识的方式运转。因而,疾病被视为一种会干扰这种正常存在状态流转的负功能。例如,病人可能没有能力担负其通常的责任,或者不如以前可靠和高效。因为病人不能扮演他们的正常角色,所以周围人的生活也被打乱

^① 变性疾病(degenerative diseases):伴随年老或器官衰退而发生的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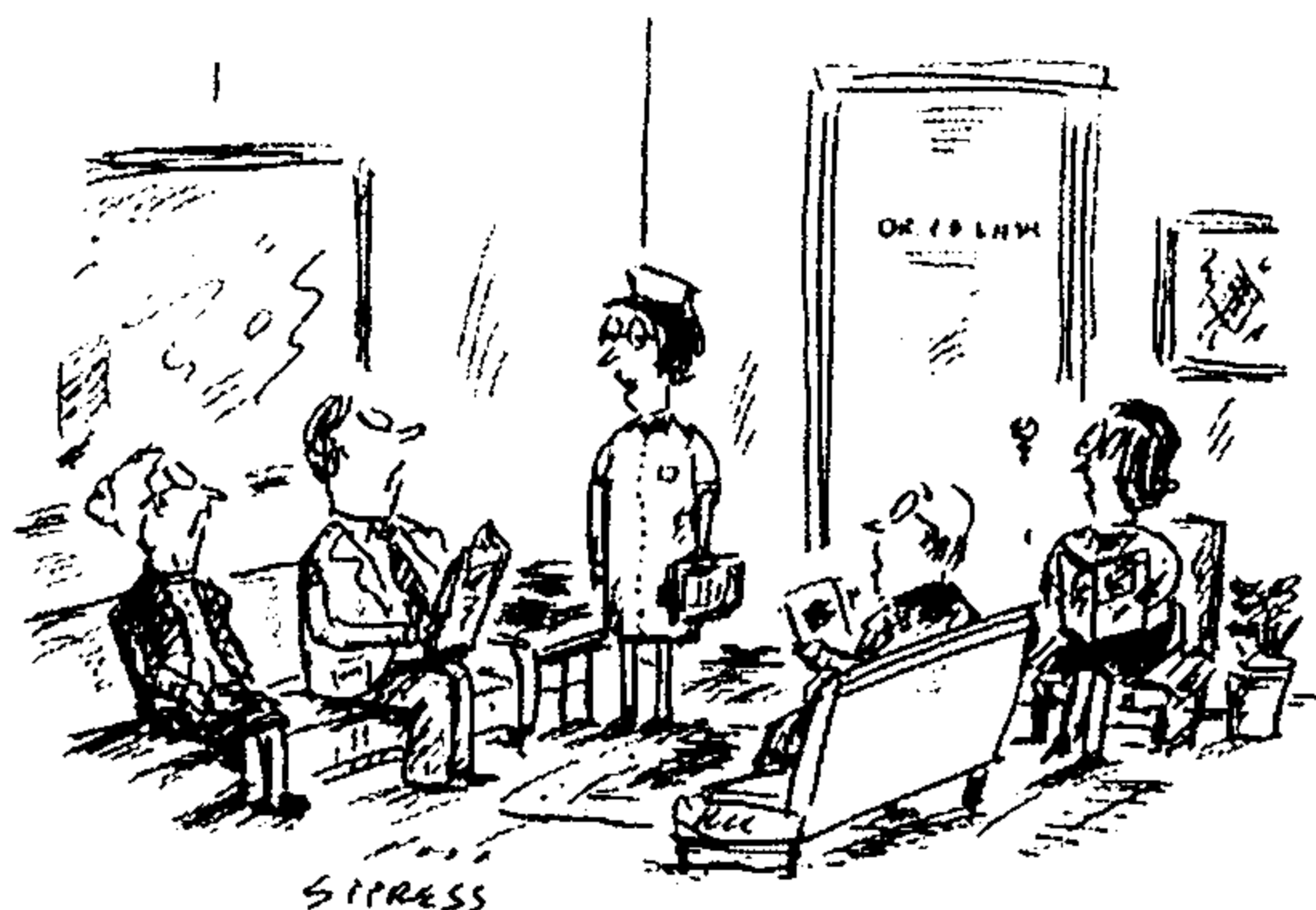
了,比如分配的工作未完成、给同事带来压力、未尽家庭责任,等等。

有关功能主义,详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

在帕森斯看来,人们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学习病人角色的,当他们生病的时候,在别人的配合下,就会扮演这一角色。病人角色有三大支柱:

- 1 病人对生病不负个人责任。疾病被视为是超出个人控制之外的生理原因的结果。疾病的发作与个体的行为或行动无关。
- 2 病人被赋予某些权利和特权,包括免除通常的责任。因为病人对生病不负任何责任,因而被免除了其他情况下不能免除的某些义务、角色和行为。例如,病人在家里能被“豁免”通常应尽的义务。不礼貌或不像平常那样周到的行为可以得到原谅。比如,病人获得了躺在床上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权利。
- 3 病人必须看医生并且同意成为“病人”,以便尽快康复。病人角色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取决于病人是否积极地努力康复。为了获得病人角色,病人必须获得一位医学专业人员的认可,后者可以使一个人宣称自己患病的说法合法化。专家意见对于疾病的确认使得病人周围的人接受病人宣称的有效性。患者被期望遵从“医嘱”,为了自己的康复而采取配合的态度。如果病人拒绝看医生,或者不遵照医学权威的建议,其病人角色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其他社会学家进一步探讨了帕森斯的病人角色概念。他们认为,就病人角色而言,并非所有的疾病都是“同样的”。他们认为,病人角



“我们的时间有些拖后了。所以我想让你们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我是真的生病了呢,还是只是来浪费大夫宝贵的时间?’”

色的体验因疾病的种类而异,因为人们对病人的反应是受疾病严重程度以及他们对疾病的感知影响的。因而,病人并不能普遍地体验到作为病人角色一部分的额外的权利和特权。弗赖森(Freidson 1970)区分出三种病人角色,对应于不同的疾病类型和程度。条件性的(conditional)病人角色适用于暂时患病、可以康复的人。病人被期望“好转”,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获得某些权利和特权。例如,患支气管炎的人能够比患普通感冒的人获得更多好处。无条件地合法的(unconditionally legitimate)病人角色指的是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病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康复,因而自动地就被赋予了病人角色。无条件地合法的角色可以适用于患秃头症(头发全部都脱落了)或满脸粉刺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特权,只是被承认个人无需对疾病负责),也可以适用于患癌症或帕金森症的人(这类疾病会导致拥有重要的特权和放弃许多甚至大部分义务的权利)。最后一类病人角色是非合法性的(illegitimate)角色。当一个人染上被别人污名化的疾病或陷入此种处境,就获得了非合法性的病人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会认为个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为其患病负责,所以不一定再授予额外的权利和特权。酗酒就是一种被污名化

的疾病,会影响到患者获得病人角色的权利。

戈夫曼(Goffman 1963)主张,所谓污名,就是使某个人失去资格获得社会充分认可的一种贬损关系。污名可以表现为许多形式,比如生理污名(参看本章第四节第二小节保罗·亨特有关残障的讨论),生平污名(比如留有犯罪记录),或是背景污名(比如“结交流氓团伙”)。污名所依据的理解很少是正确的,它们来源于刻板印象,或者说是错误的或只是一知半解的理解。污名化常常出现在医疗背景中(参看本章第四节第二小节关于面部缺陷的个案研究)。戈夫曼认为,污名化过程中必然带有社会控制的因素。将某些群体污名化是社会控制其行为的一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污名永远不能移除,而被打上污名的人也永远不能被社会充分认可。(中世纪受麻风病折磨的人就是如此,他们被大众排斥,被迫居住在隔离起来的麻风病患者聚居区。晚近艾滋病人的遭遇也是如此)在医疗机构中,污名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确定医疗专家对于患者的态度。被污名化的患者(比如吸毒成瘾的人)如果问医务人员问题,或想要搞清楚与自己的治疗有关的信息,可能会被置之不理。其结果,便是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对于患者的医疗支配。

二 对于“病人角色”概念的批评

病人角色模型已经成了颇有影响的理论,它清楚地揭示了病人如何是更大的社会背景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也有许多针对它的批评。一些作者认为,病人角色“程式”(formula)不能把握有关疾病的体验。另有些学者则指出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例如,病人角色理论不能解释医生和患者在某一诊断上存在不同意见或利益相悖的情况。另外,接受病人角色并不总是一个毫无反复的过程。有些人常年受慢性疼痛或多次误诊的症状的折磨。在病情确诊之前,他们的病人角色被否认。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种族、阶级与性别之类的社会

因素能够影响病人角色是否被承认,承认的过程是艰难还是轻易。谈病人角色,不能脱离它周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

生活和患病的现实要比病人角色概念所认定的复杂得多。在我们所处的现时代,人们越来越强调生活方式和健康,这就意味着个人被认为对他们自己的幸福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这与病人角色的第一个假设相矛盾,即个人不应因其疾病而受到责备。此外,在现代社会中,常见病由急性传染病逐渐转向慢性病,也使病人角色更不适用。虽然病人角色在理解急性病上或许有用,但对于慢性病的情况就不那么有用了,没有一个慢性病患者或残障人士可以遵循的程式。病人及其周围的人在体验和解释带病的生活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符号互动论学派的社会学家尝试理解患病体验的一些方法。

三 作为“生活体验”的疾病

符号互动论者关注人们解释社会世界的方式以及赋予其上的意义。许多社会学家已经将这种思路应用到健康和疾病的领域,以此来理解人们是如何体验自己生病或者感知其他人生病的。人们对于罹患重病的消息作何反应?怎样调适?疾病如何塑造个体的日常生活?身患慢性疾病如何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自我认同?

我们在有关老年化的讨论中(第六章)已经知道,工业化社会中的人们现在更加长寿,但晚年大多患有慢性疾病。医学能够减轻与这些状况相伴而来的疼痛与不适,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面临着一个问题:疾病会长期缠身。社会学家们所关心的是在这类情况下,疾病是如何融入到个体的个人“生平”中去的。

社会学家们所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慢性病患者如何学会应对他们所患疾病引起的实际问题和情绪问题。有些疾病需要定期的治疗

或护理,这就会对个体的日常起居造成影响。透析、注射胰岛素或者吃大量药片,这些都需要个体调整他们的时间安排以回应疾病。其他疾病则会对人体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突然大小便失禁或者剧烈呕吐。遭受这些病况之苦的个体,不得不在其日常生活中形成应对这些疾病的策略。这些策略中既有对实际情况的考虑,如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总是会留意厕所的位置,同时也包括对处理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两方面的人际关系技能的考虑。尽管疾病的症状可能会使人感到窘迫或烦乱,但人们还是能够找到应对的策略,使生活尽可能过得跟往常一样(Kelly 1992)。

与此同时,疾病的体验能够对人们的自我认识构成挑战并引发转型。出现这种状况,既是通过其他人对疾病的实际反应,也是通过想像到的或者感知到的反应。对于慢性病患者或者残障人士来说,本来对于许多人而言属于日常例行的社会互动,在他们那里都染上了一层带有风险或不确定性的色彩。一旦牵连到疾病或者残障这样的因素,支撑标准的日常互动的共享理解就不再总会出现了,而对于共同情境的解释也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差异。比如,一位病人可能需要帮助,但并不想表现出依赖性。一个人可以对某位被诊断患有某种疾病的人抱以同情,但却不能确定是否能和病人直接谈论病情。社会互动的背景发生了改变,可能会促使自我认同的转型。

一些社会学家已经研究了罹患慢性病的个体如何在他们整体的生活背景中应对疾病(Jobling 1988; Williams 1993)。疾病会花费人们大量的时间、能量、力气以及情感储备。科尔宾和施特劳斯(Corbin and Strauss 1985)研究了患有慢性病的人如何形成一套健康管理,以组织其日常生活。他们确认了包含在人们日常策略中的三类“作为”。疾病作为(illness work)是指应对诸如疼痛、病理检查或者身体治疗等情况的那些活动。日常作为(everyday work)适合于对日常生活的操控,即保持与他

人的关系、做家务以及对职业兴趣和个人兴趣的追求。生平作为(biographical work)包括病人用来建构或者重构其个人叙事的那部分活动。换言之,这个过程就是把疾病融入一个人的生活之中,把握其中的意义,并形成一套向他人做出说明的方式。这种过程能够帮助人们在获知自己得了慢性疾病之后,把意义和秩序重新注入自己的生活。考察了疾病如何影响个人,我们现在来看看社会中的疾病与健康模式,讨论一下健康的表现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有怎样的差异。

第三节 健康的社会基础

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中的人,其预期寿命在20世纪里有了明显而全面的提高。在英国,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在1901年时男性为45岁,女性为49岁,而到了2003年,男性为75岁,女性为80岁。小儿麻痹症、猩红热和肺结核等疾病已经基本上被根除。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健康和安乐的标准相对较高。公共卫生领域取得的这些进展中,有许多应该归功于现代医学的威力。人们普遍认为,在揭示疾病的生物学原因方面,以及在发展出有效的医疗方法来控制这些疾病方面,医学研究已经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增长,我们将有希望看到在公共卫生方面持续而稳定的改进。

虽然探讨健康和疾病的这一思路极有影响,但却不太令社会学家满意。因为它忽视了社会与环境因素对于健康和疾病模式的重要影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公共卫生固然有了全面改善,但并不能掩藏一个事实:健康和疾病在总人口中的分布并非均匀。研究显示,某些人群所享有的健康和保健好于另外一些人群,这些健康不平等似乎与广泛的社会经济模式相关联。

社会学家和社会流行病学专家(研究疾

病与不适的分布和发生的科学家) 试图说明健康与社会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和地理分布等变量之间的关联。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健康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存在相关,但对于这种关联的性质,对于应当如何解决健康不平等,却是各执一词。争论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个人变量(诸如生活方式、行为、饮食和文化模式)与环境或结构因素(像收入分布和贫困)的相对重要性上。在本节中,我们将从社会阶级、性别和族群等角度来考察英国健康模式的差异,并评述一些说明其何以持续存在的不同观点。

8.3.1 阶级与健康

对健康和阶级的研究已经提示,(疾病)死亡率和发病率模式与个体的社会阶级之间具有清晰的联系。在英国,一项重要的全国性研究《黑皮书》(DHSS 1980)将基于阶级的健康不平等的程度公诸于世,意义重大。许多人觉得其结果令人震惊。虽然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趋于好转,但不同阶层之间仍存在着极大

的分化,从出生体重、血压到得慢性病的风险等各项健康指标都有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平均来说更健康、更高大和更强壮,比那些来自较低社会等级的人更加长寿。这样的差异最显著地体现在婴儿死亡率(在出生后一年内死亡的儿童)和儿童死亡率上,但其实在所有年龄段上,较穷的人的死亡风险都要大于更富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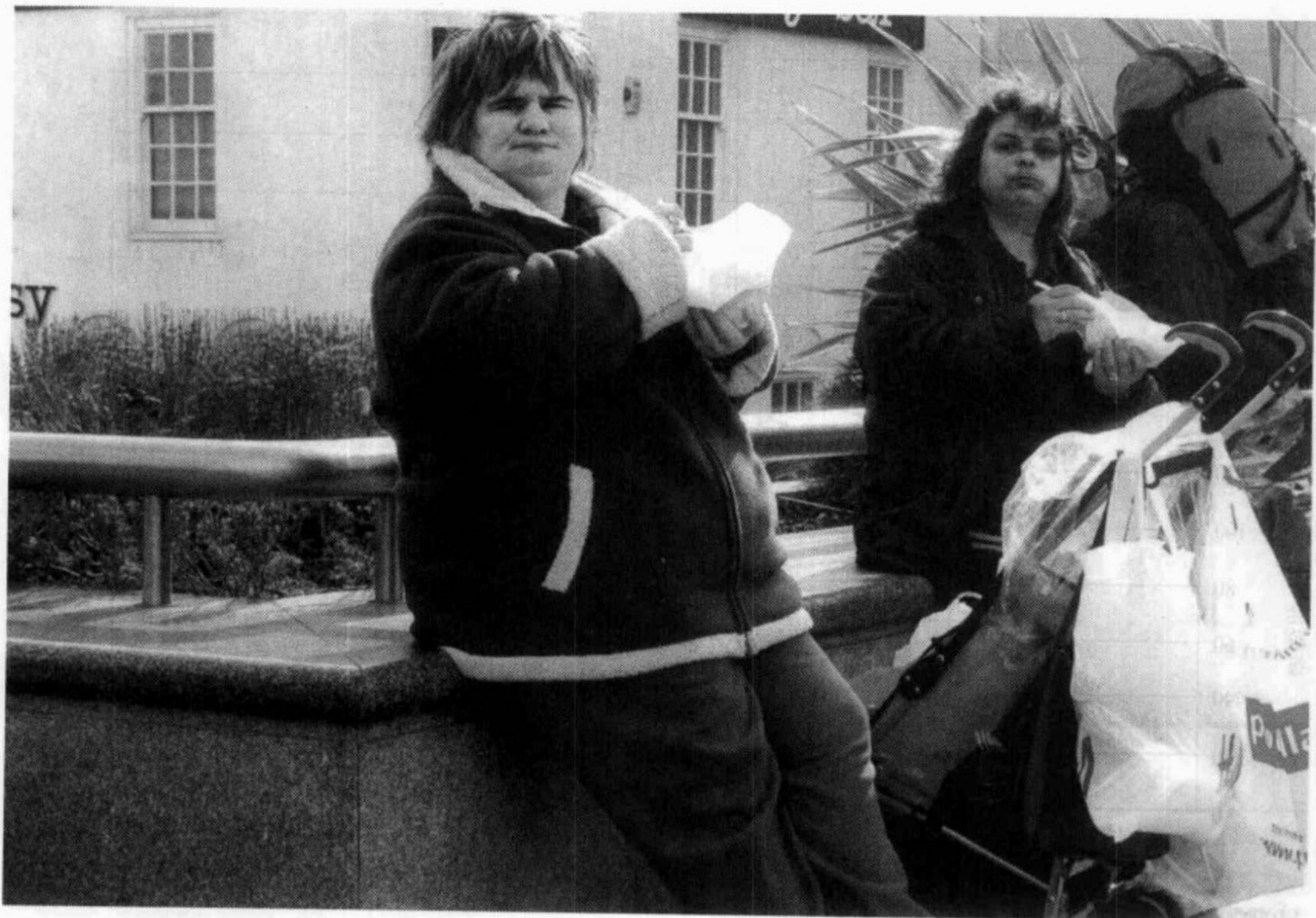
布朗和伯特里尔(Browne and Bottrill 1999)总结了一些主要的基于阶级的健康不平等。它们包括:

- 1 处在职业阶级序列最底层的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在退休年龄前死亡的可能性,是处于职业阶级序列最顶层的专业白领劳动者的两倍。
- 2 非熟练技能型人员的家庭中死产或出生一周内死亡的婴儿是专业人员家庭的两倍(参见表 8.2)。
- 3 生于最高行业阶级(专业白领劳动者)的人,比起生于最低行业阶级(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的人,平均可能要多活 7 年。
- 4 大约 90% 的主要死因在最低的两个行业阶

表 8.2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婴儿死亡率,以社会阶级分组(每千例活产儿)^a

	婚 内		婚 外	
	1991	2001	1991	2001
专业人员	5.1	3.6	4.2	4.5
管理和技术人员	5.3	3.6	6.6	4.0
熟练技能型非体力劳动者	6.1	4.5	8.5	5.3
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	6.2	5.0	7.7	5.8
半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	7.1	6.2	9.6	6.7
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	8.2	7.2	11.0	7.5
其他	11.6	6.7	21.2	10.8
总体平均	6.3	4.6	8.8	6.1

a: 婴儿死亡率是指一周内婴儿的死亡例数;社会阶级是依据死亡登记上的父亲职业而定。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2004)



在英国最受剥夺的人群当中,饮食习惯不良只是健康不良的致因之一。

级中都比较高的三个行业阶级中更为常见(参见图 8.2)。

- 5 工人阶级比专业人员更常去看医生,病种也更广。顽症在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中要比在专业人员中多 50%。
- 6 基于阶级的健康不平等在长期失业者中甚至更显著。工作的人往往比无工作的人更为长寿。

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开展的研究已经证实,在健康方面存在明显的阶级梯度差异。有些学者相信,最穷和最富的社会成员之间相对的健康不平等正在扩大。然而,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力求揭示健康不平等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但学者们还是不能成功地确定连接两者的真正机制。对于相关关系背后的原因,人们已经提出了几种力度不相上下的说明:

《黑皮书》受政府委托,分析了健康不平等的有关数据,并就政策及后续研究提出了建议。它主要集中在对健康不平等的物质论说明上。物质论或者环境论的说明认为,健康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广泛的社会结构,诸如贫困、财富和收入分配、失业、住房、污染和恶劣的工作条件。阶级之间健康不平等的模式被视为物质剥夺的结果。只有解决整体的社会不平等这一根本原因,才能减少健康不平等。虽然没有轻视其他观点可能的效度,但《黑皮书》还是强调,为了消除健康不平等,有必要采取综合性的消除贫困战略,改善教育。

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无视《黑皮书》的发现,断言该报告所要求的公共支出既不切实际,也不可预料。撒切尔政府(1979—1990)往往对健康不平等采取文化论和行为论的说明。文化论与行为论说明强调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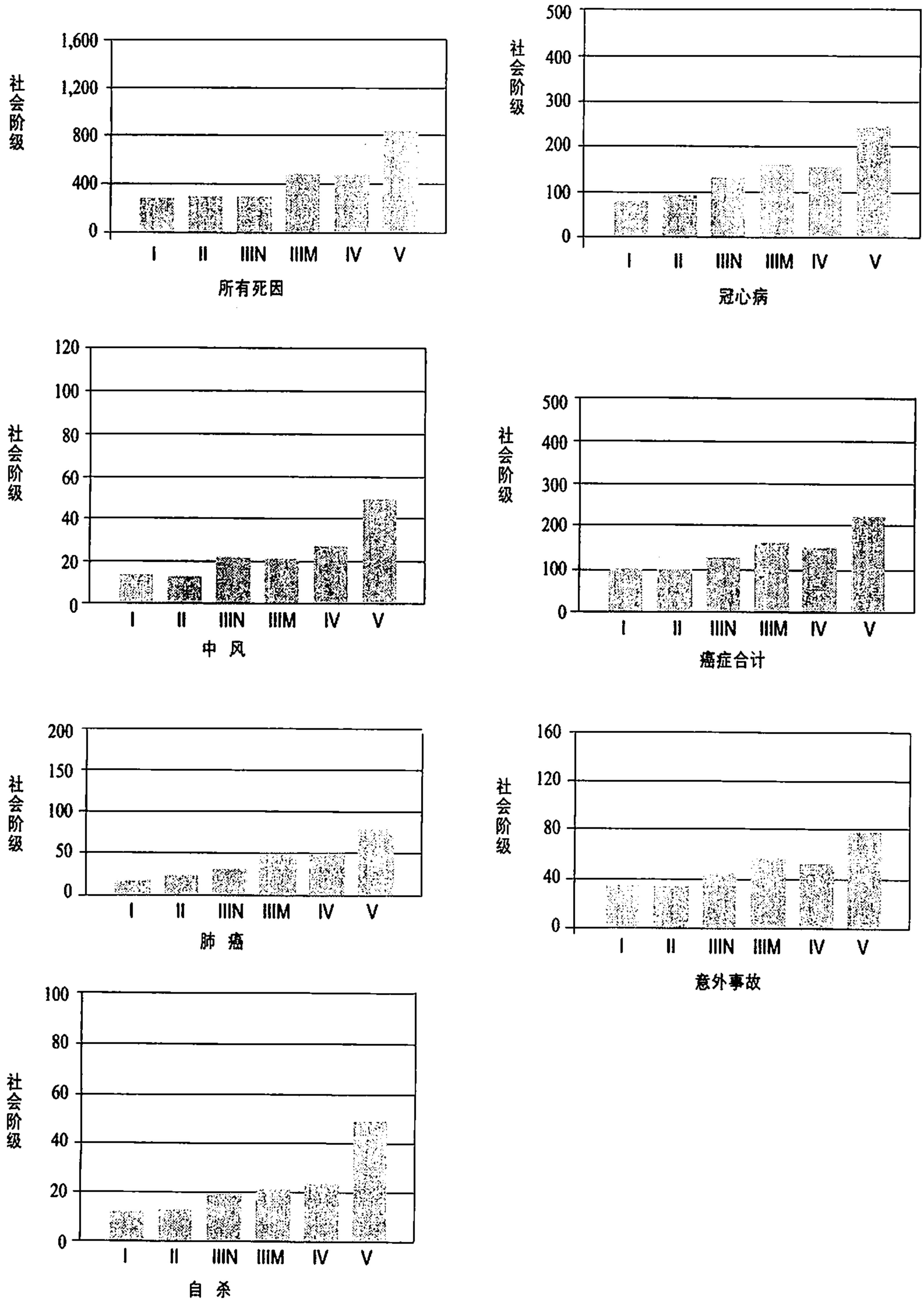


图 8.2 英国 20 岁至 64 岁男性死亡率,以死因和社会阶级分组,1991 年至 1993 年(十万分之一)
资料来源:ONS (2001)

人生活方式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较低的社会阶级往往从事某些损害健康的活动,诸如抽烟、饮食无度和酗酒。这种观点认为,个人应该对健康不良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有那么多生活方式可以自由地选择。有些支持这一思路的人也认为,这些行为根植于社会阶级背景之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完全控制之下。不过,他们也把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看作是健康不良的主要原因。此后各届政府继续把重点放在通过开展公共卫生运动来影响个人的生活方式选择上。禁烟倡议、健康饮食与锻炼计划就是塑造公众行为的这类努力中的两个例子。这类运动劝诫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幸福负起责任来,但很少注意社会地位是如何限制人们的选择和潜能的。比如说,作为健康食谱核心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要比富含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许多食物贵得多。研究显示,高收入群体对健康食品的消费最高。

1997年选举上台的工党政府对于健康不平等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思路,同时承认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对人们健康的重要性。政府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健康不平等进行独立调查,

由唐纳德·艾奇逊爵士任主席。1998年11月,《艾奇逊报告》(Acheson Report)公布,明确指出,就健康的许多特性而言,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不平等的状况普遍趋于恶化。基于《艾奇逊报告》中的证据,政府于1999年7月颁布了一份题为《增强国民体质》(*Our Healthier Nations*)的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强调,社会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等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健康不良(其中有些体现于图8.3)。它还提出了一系列政府倡议,将健康与失业、不达标住房和教育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探讨健康不良的症状,而且也要探讨其致因。

8.3.2 性别与健康

研究中也注意到了男女之间的健康差异。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女性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长(UNDP 2004)。在英国,死因和疾病模式表明男女之间存在某些差异(参见图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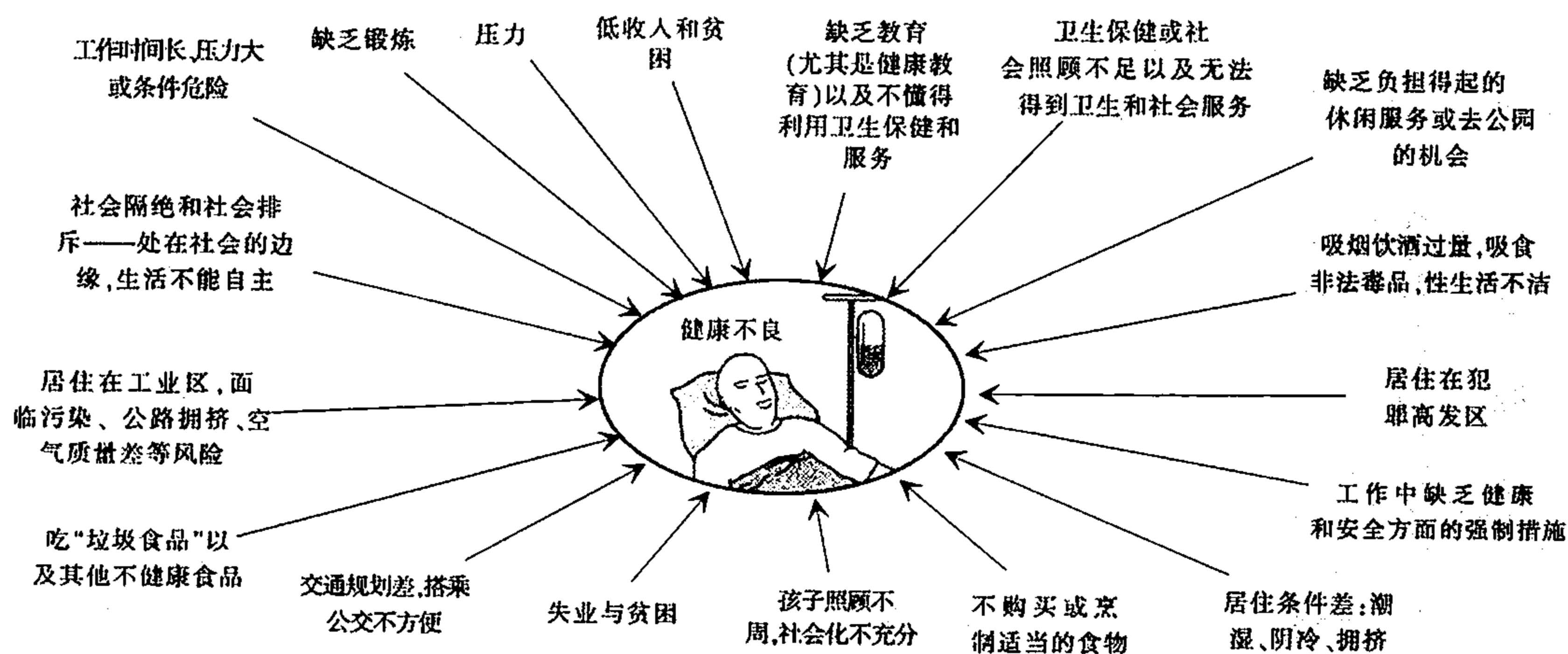


图 8.3 文化与物质方面对于健康的各种影响
资料来源: Browne (2005), 页 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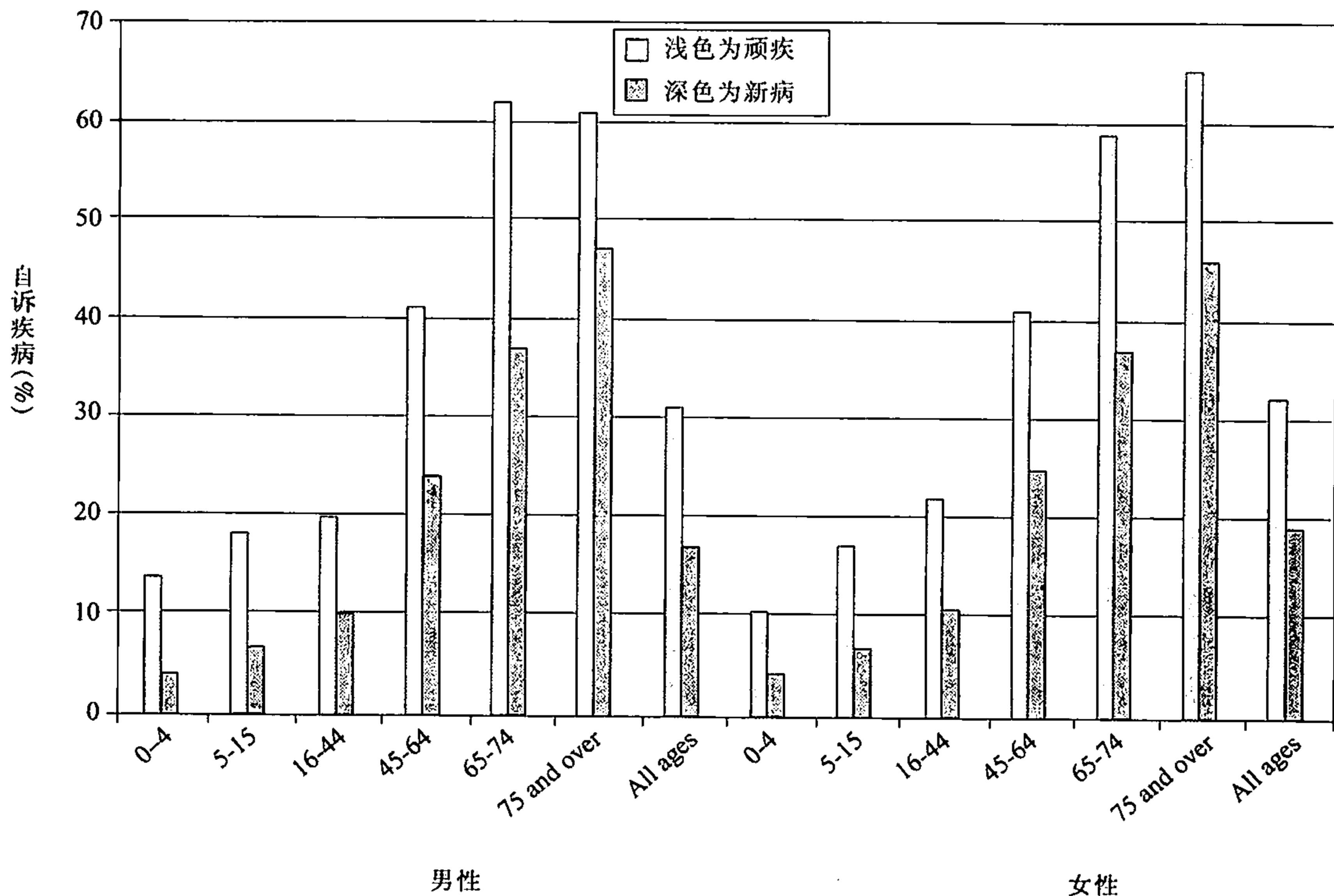


图 8.4 自诉疾病,以性别和年龄分组,2003—2004 统计年度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5 (2005)

尽管心脏病影响男性比女性要多,但对于 65 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它都是最常见的死因。不过,男性死于事故和暴力的比例更高,也更容易陷入毒品依赖和酒精依赖。

物质环境似乎影响着女性的健康状况,但在这方面一向是个很难测量的因素。许多研究在给女性分类的时候,往往是根据她们丈夫的社会阶级,从而导致所描绘出的女性健康图景是被扭曲的(参看第九章)。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确实知道,女性更有可能去寻求医疗服务,自诉患病的比率也高于男性。

工业化国家的女性自诉的焦虑和抑郁是男性的两倍。根据一些观察家的看法,女性往往要履行多重角色,从家务、育儿到职业责任,从而有可能增加所承受的压力,导致高发病率。莱斯利·多亚尔指出(Doyal 1995),要说明

女性的健康和疾病模式,最好是结合构成女性生活的主要活动领域。在通常所履行的角色和职责方面,女性的生活与男性存在固有的差异,包括家务、性的繁殖、分娩与育儿、计划生育等等。(尽管也可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这一点越来越不成立了)根据多亚尔的观点,“这些不同劳动的累积性效果,就是女性健康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任何对女性健康的分析都应当考虑社会影响、心理影响和生物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

希瑟·格拉汉姆研究了压力对于白人工人阶级中女性健康的效应。她强调指出,事实上,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低端的女性与中产阶级女性相比,在遇到生活危机时更不易接触到支持网络。她尤其提到,工人阶级女性比起其他群体,往往更容易遇到生活危机(比如失业、离

婚、被赶出家门或丧子),但一般来说应对能力却较弱,宣泄焦虑的渠道也较少。这样,不仅造成的压力有害身心,而且为消除压力而采取的某些应对措施——比如吸烟——也是有害的。格拉汉姆认为,吸烟是人们在个人资源和物质资源濒临崩溃时用来缓解张力的一种方式。因此,吸烟在女性生活中的作用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它增加了女性及其孩子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又使她们能够设法应对困难局面(Graham 1987;1994)。

安妮·奥克利及其同事挑选了英国四个城市,研究社会支持对于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和儿童健康的作用。她认为,压力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既适用于重大的生活危机,也适用于较小的问题,这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体现得尤其显著。奥克利注意到,诸如咨询服务、热线或家访之类的社会支持,能够对女性通常体验到的压力对健康的不利影响起到“缓冲器”的作用(Oakley et al 1994)。其他研究显示,在帮助人们调适疾病和不适方面,社会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Ell 1996)。

8.3.3 族群与健康

虽然工业社会中的健康具有族群化的模式,但我们对族群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有局部性的理解。这个领域的社会学研究越来越多,但所得到的证据仍然不能做出确定的结论。在一些情况下,归于某个族群的全体成员的趋势,有可能忽略了其他或许也相当显著的因素,如阶级或性别。

不过,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在非洲及加勒比裔和亚裔中确实较高。在英国,这些人患肝癌、肺结核和糖尿病的死亡率要比白人高。非洲及加勒比裔患高血压和镰状细胞性贫血(sickle-cell anaemia,一种影响红细胞的遗传性障碍)的比例高于英国的一般水平。印度次大陆来的人心脏病的死亡率较高。

有些学者已经转向文化论和行为论来说

明族群健康模式。类似对基于阶级的健康不平等的文化说明,他们把重点放在被视为导致健康不良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方式上。人们常常认为,这些生活方式与宗教或文化信条有关,比如饮食的规定和烹调习惯、血亲关系(家族中第二代堂表兄妹之间的通婚习俗)。但批评者认为,文化说明没能找出真正的问题,即影响族群的结构不平等,以及他们在保健制度中遭受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对于健康的族群模式的社会结构论解释,把焦点放在非洲及加勒比裔和亚裔在英国生活的社会环境上。非洲及加勒比裔和亚裔常常处在多重的弱势,不利于他们的健康。这些弱势可能包括恶劣的或过于拥挤的居住条件,高失业率,过多从事工作环境危险、收入低的行业等。然后,种族歧视的效应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物质因素。这种种族歧视的体验要么是以暴力、威胁或歧视的直接形式,要么是以“制度化”的形式。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在卫生保健供应方面的制度性种族歧视(Alexander 1999)。有些族群可能会体验到获取保健服务方面存在的不平等或困难。如果信息不能够得到有效传递,那么语言障碍就可能会带来麻烦。保健服务机构中的专家通常都不会考虑到,不同文化对于疾病和治疗有其特殊的理解。国民保健服务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已经受到了批评,因为它没有要求其职员更加关注文化与宗教信仰,也没有对主要发生在非白人人口中的疾病给予充分的注意。

关于制度性种族歧视,详见第十三章第二节第一小节。

关于族群和健康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还没有一致的意见。确实,大量的研究仍有待展开。不过,要考虑族群和健康不平等的问题,显然必须结合影响英国少数族群体验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8.3.4 健康与社会结合

为了揭示健康不平等的原因,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支持和社会结合在促进健康中的作用。你也许还记得在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学?》)中我们对涂尔干的讨论,社会团结是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涂尔干把一种文化中团结的程度与类型视为该文化最关键的特征之一。例如,他在对自杀的研究中发现,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的个体和群体与其他人相比,更不可能轻生。

理查德·威尔金森在几篇文章中,以及在其随后的著作《不健康的社会:来自不平等的痛苦》(Wilkinson 1996)中认为,世界上最健康的社会并不是最富裕的国家,而是那些收入更为均等、社会整合程度最高的国家。根据威尔金森的观点,国家财富多并不必然会转换成人口更健康。他依据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调查所取得的数据,注意到死亡率和收入分配模式之间的鲜明关系。日本和瑞典之类的国家被认为属于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其国民的健康水平平均要高于像美国这样贫富差距更为显著的国家。

在威尔金森看来,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破坏了社会结合,并使人们更难应对风险和挑战。社会孤立程度的提高,应付压力方面的失败,都会反映在健康指标上。威尔金森认为,社会接触的强度,社群内部的联系,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以及一种安全感,这些社会因素是一个社会相对健康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

威尔金森的理论引起了积极的回应。一些人宣称,他的著作应当列为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的必读书目。他们同意威尔金森的观点,认为现在过于看重市场关系和使经济走向繁荣的驱动力。这种做法导致许多社会成员遭受挫

折,现在应该考虑更人道的、对社会更负责的政策,以支持处于弱势的人。另有一些人批评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认为他没能揭示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良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Judge 1995)。批评者认为,疾病可能是由其他中介因素引起的。他们认为威尔金森的论点的经验证据充其量只有启发性的意义。

本章前文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些历史上奠定了正统的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的预设。这些预设中有许多也确立了英国及其它发达国家对于残障的传统理解。与此类似,我们前文所讨论的对抗生物医学健康模式的一些晚近趋势,比如怀疑医疗专家总是最清楚的人,要求更多地考虑患者本人的意见与体验,也已经融入了最近对于这种传统的残障观的否弃。我们现在就来讨论有关残障的一些话题。

第四节 残障社会学

诗人西蒙·布里森登在他的《献给完美之人的诗篇》(*Poems for Perfect People*)一书里,精妙地概括了许多残障人士从正统医学和医疗从业者那里感受到的排斥感。他问道:“那个切开你的皮肤 / 在里面翻搅的人 / 他身上可有任何疤痕?”有许多残障人士的作品导致了重新评估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对于残障的传统理解,布里森登就是其中的一位。这种讨论的大部分发生在一个新的领域,叫做残障研究^①(disability studies)。本节当中,我们将考察有关残障的主导理解,也就是讨论现在所说的个体模型。然后,我们将看看这个模型是如何遭到有关残障的社会模型挑战的,尤其是残障人士本身的挑战,并简要地评估这种挑战。最后,我们将简单地看看英国乃至全球的伤残(impairment)的规模与背景。不过,

① 原文此处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无此词条。

我们首先要谈谈关于残障的语言。

社会学家认为,我们对于社会话题的意识和理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所使用的词汇所塑造的。在最近几十年,人们历史上用来讨论残障的那些用语遭到了批判,这种批判对于该领域的那些著述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比如说,“残疾人”(handicapped)在相当程度上已遭弃用,因为据说此词让人联想到“沿街乞讨”^①、慈善施舍、叫化乞怜。最初用来描述某些伤残的其他用语也遭弃用,因为它们现在用起来主要是一种侮辱,例如“痉挛的”或“跛足的”。^②有些比喻仍在日常使用之中,比如“视若无睹”或“充耳不闻”,^③也遭到了批评,因为它们含有某种排斥感。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是我们对于“残障”这个词的理解方式,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8.4.1 残障的个体模型

在像英国这样的西方社会里,有关残障的个体模型历史上一向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模型认为,个体的局限是残障人士所体验到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残障的个体模型里,身体上的“异常”被视为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残障”或者说功能局限,比如一个“患有”四肢瘫痪的人就不能行走。人们认为,以这种功能局限为基础,一个人被更广泛地归类为“不健全的人”(an invalid)。而支撑残障的个体模型的,则是以“个人不幸的思路”来看待残障。残障的个体被视为某个意外事件的不幸的受害者。医疗专家对于个体模型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针对残障个体所承受的“问题”,给出治疗和康复的诊断。有鉴于此,个体模型常常被说成是“医学模型”。本节开始的那首诗中,布里森登所抨击的对象,正是

医疗专家对于残障人士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下文我们将会看到,最近几十年,这种残障的个体模型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8.4.2 残障的社会模型

较早对于残障的个体模型的重要挑战是亨特编辑的文集《污名:残障的体验》(Hunt 1966)(有关戈夫曼对于污名的讨论,参看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亨特认为,“残障的问题不仅在于功能的伤残及其对于我们的个人角度的效应,更重要的是,还在于我们与那些‘正常’人的关系。”亨特是英国残障运动早年岁月的活动分子领袖,后来成为身体伤残者反隔离联盟(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UPIAS)的创盟成员。联盟在其宣言《残障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1976)中,提出了一种替代残障的个体模型的激进方案,主张严格区分“伤残”与“残障”(身体伤残者反隔离联盟提出的完整定义参看下面的图文框)。

身体伤残者反隔离联盟对于伤残和残障的界定

伤残

“肢体的一部分或全部缺失,或者身体的某一肢体、器官或机制有缺陷。”

残障

“某个当代社会组织对有身体伤残的人士有欠考虑乃至完全漠视,导致这些人士的活动处于弱势或受到限制,从而排斥其参与社会主流活动。”

① 原文此处为“cap in hand”,引号系原文所有,此短语现在口语中作“卑躬屈膝”解,但在此首先用作实指,然后才有连带的刻板印象。

② “痉挛的”(spastic)意谓“笨拙无能的”;“跛足的”(cripple)意谓“严重削弱的”。

③ “视若无睹”(turning a blind eye)意谓“瞎子的眼睛”;“充耳不闻”(turning a deaf ear)意谓“聋子的耳朵”。



这位残奥会(paralympic)游泳选手属于残障人士吗?

联盟基本上还是接受了将身体“伤残”界定为个体的生物医学属性（尽管他们随后又扩展了定义，包括了非肉体、感官、智力等形式的伤残）。不过，“残障”却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界定的。这就对这个词的传统理解提出了挑战。残障不再被理解为个体的问题，而是从患有伤残的人们在充分参与社会时所面临的社会障碍的角度来理解的。在下一个图文框中，我们将看到迈克·奥利弗是如何重新书写英国人口、普查与调查局（UK Office of Population, Censuses and Surveys, OPCS）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用来评估“残障”的问题，从而转变了残障的个体模型的预设。奥利弗是最先明确区分残障的社会模型与个体模型的理论家（Oliver 1983）。（表 8.3 清楚地概括了这些区分）通过维克·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 1980, 1981）、柯林·巴恩斯（Barnes 1991）和奥利弗本人（Oliver

1990, 1996）等人的著述，残障的社会模型在学术上进一步站稳了脚跟。

社会模型的理论家们需要说明，针对残障人士的社会、文化或历史障碍为何会发展起来。有些倡导社会模型的学者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认为需要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残障（有关唯物主义，详见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比如说奥利弗（Oliver 1996），他就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针对残障人士的障碍是在工业革命期间确立起来的，当时残障人士被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因为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厂开始将个体雇佣劳动作为就业的基础。奥利弗提出，随着这种历史进程的发展，“如此多的（残障人士）没有能力保住饭碗，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最初反应都是严厉制止、收容隔离”。即使到了今天，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残障

表 8.3 两种残障模型

个体模型	社会模型
个体不幸模型	社会压迫理论
个人问题	社会问题
个体处理	社会行动
医学化	自助
专业主导	个体与集体责任
专业技能	体验
个体认同	集体认同
偏见	歧视
护理	权利
控制	选择
政策	政治
个体调适	社会变迁

资料来源:改编自 Oliver 1996, 页 34

用社会模型来转换英国人口、普查与调查局调查问题的预设

调查局的问题

- “您能说说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吗？”
- “是什么疾病导致您难以抓取、把握或转动东西？”
- “您在理解人们时遇到的困难是否主要是因为听力问题？”
- “您有没有某种污痕或缺陷限制了您的日常活动？”
- “您是否由于某种长期的健康问题或残障而上过专门学校？”
- “您的健康问题或残障是否妨碍了您像您所喜欢的那样经常外出交际？”
- “您的健康问题或残障是否使您难以搭乘巴士旅行？”
- “您的健康问题或残障是否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您眼下的工作？”
- “您的健康问题或残障是否意味着您需要与亲戚或其他有可能帮助或照料你的人住在一起？”
- “您现在的居所是否因为您的健康问题或残障而有所改造？”

奥利弗的问题

- “您能告诉我社会有什么不对劲吗？”
- “瓶瓶罐罐之类的日常设备的设计中有什么缺陷使您难以对付它们？”
- “您在理解人们时遇到的困难是否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与您沟通？”
- “其他人对于您的某种污痕或缺陷的反应是否限制了您的日常活动？”
- “您是否由于您所属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而上过专门学校，即有您这样的健康问题或残障的人士就得送去这类地方？”
- “你所处的周边环境中有什么使您难以与邻里相处？”
- “有什么交通或资金上的问题妨碍您像自己所喜欢的那样经常外出？”
- “您是否在工作中由于物质环境或他人态度而遇到一些问题？”
- “社区服务是否非常糟糕，以至于您需要依靠亲戚或其他能够提供给您合适的私人协助的人？”
- “您的住房是否设计糟糕，意味着您需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您的需求？”

资料来源:Oliver (1990)

人士都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第三小节看到这一点）。

对于社会模型的评价

社会模型对于塑造我们今天谈论残障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社会模型最初源于英国，但正逐步获得全球性的影响。它被描述成英国残障运动的“重大理念”（Hasler 1993）。社会模型把焦点放在去除对于充分参与的社会障碍上，使残障人士能够集中考虑某种政治策略。这就导致了一些人提出，残障人士接受了社会模型，也就等于形成了“一种新社会运动”（Oliver and Zarb 1989）。社会模型取代了个体模型，不再将个体的“病残”定为残障的致因，而是认为残障是压迫的结果，因此被一些残障人士看作是“解放性的”（Bereford and Wallcraft 1997）。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针对社会模型，已经提出了几种批评的思路。首先，有人认为它忽视了常常充满苦痛或令人不适的伤残体验，而这在许多残障人士的生活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莎士比亚和沃森提出，“我们不仅是残障人士，我们还是患有伤残的人，对此假装无视，就等于忽视了我们的生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Shakespeare and Watson 2002）针对这种指责，拥护社会模型的人指出，社会模型并没有否定伤残的日常体验，只不过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于残障人士充分参与社会所设置的社会障碍上。

其次，许多人认可了自己患有伤残，但并不希望被标定为“残障”。在最近对领取政府残障补贴的人士所做的一项调查中，自己选择定为残障的人还不到一半。许多人拒绝接受这个用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健康问题是与疾病有关，而不是残障。或者，他们并不认为病得很重，能够如此归类（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02）。但不管怎么说，巴恩斯指出，如果一个社会里的残障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异常，那么，一些患有伤残的人士拒绝“残障”这个标签，也就不令人奇怪了（Barnes 2003）。

最后，医学社会学家特别倾向于否定社会模型，认为这种模型所依据的伤残与残障之间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批评者认为，社会模型将从生物医学角度界定的伤残与从社会角度界定的残障分割开来谈。医学社会学家往往会主张，残障和伤残都受到了社会的结构塑造，具有密切的关联。莎士比亚和沃森指出，如果有人问，“怎样算是伤残，怎样就算是残障？”那么伤残与残障之间的区分就会瓦解。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区分是直接明了的，比如说，在设计建筑物时，未能考虑合适的轮椅通道，显然就制造了对于轮椅使用者的社会建构的残障障碍。然而，更有许多例子中是不可能去除所有的残障来源的，因为这些残障并非社会中的压迫处境所致。批评社会模型的医学社会学家可能会说，像持续不断的伤痛或重大的智力局限这样的伤残，使个人没有能力（disables）充分参与社会，而这种障碍并不是社会变迁所能够去除的。这些批评者还指出，要充分说明残障，就必须结合考虑伤残所导致的残障，而不仅仅是社会所导致的那些残障。

支持社会模型的人则提出，最后这种主张乃是基于模糊残障与伤残之间的区分。他们认为，这种区分的根源就在于支撑残障的个体模型的生物医学思考模式。这些学者回应道，社会模型当然不否认伤残可以是苦痛的致因，也不否认某些事情个人由于某种伤残而无法独力完成。实际上，支持残障的社会模型的卡罗尔·托马斯（Thomas 1999, 2002），用“伤残效应”这个词来考虑伤残对于残障人士的持续的心理——情感性蕴涵。

考虑到“残障”这个词的性质聚讼不已，考虑到与残障相关的伤残多种多样，要说清楚

英国乃至全球的残障人士的数量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下面就要来谈这些话题。

8.4.3 英国及全球的残障

在英国,《反残障歧视法》(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DDA)于1995年获颁通行,给予残障人士特定的法律保护,以对抗某些领域里的歧视,包括就业和获取商品与服务。1999年通过了进一步的立法,并据之设立了残障权利委员会(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其工作宗旨乃在于“消除针对残障人士的歧视”。《反残障歧视法》对于残障人士的界定是“患有某种身体伤残或精神伤残,并对其从事一般的日常活动的的能力产生了实质性的、长期的负面效应”。具体来说,这种残障定义既包括了脸部变形的人,也包括了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它避免了通常的一种误解,即认为残障主要指的是运动伤残或基本是先天性

的。事实上,大约有77%的残障人士是在16岁以后才成为残障人士的(Employers' Forum on Disability 2003),而残障人士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随着年龄组的增长而增长(参看图8.5)。

根据《反残障歧视法》的界定,英国至少有850万人(占总人口大约10%)属于残障人士,其中又有680万人处于劳动年龄(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2)。但在后一群人中,只有大约300百万的人是真正就业的(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 2002)。尽管如此,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符合《反残障歧视法》的残障界定的人中,有93%认为有一份工作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患有被联系到残障的伤残的人依然属于英国最处劣势的人群之一。相比于体格健全的人,他们更有可能失业;并且,那些患有被联系到残障的伤残的人即使有工作,也往往挣得更少些。1998年,残障雇员的平均实得薪酬是每周196英镑,而非残障劳动



残障抗议人士正在伸张他们的权利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我为什么要你看我的脸？



维基·卢卡斯并不希望人们看到她就转开视线、倒抽凉气或害怕不已，而是要他们明白，她的脸是使她之所以为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她在下文所说明的那样，她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我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叫做巨颌症(cherubism)，影响了我的脸。我大约4岁的时候被诊断得了此病。那时我还太小，不记得出了什么事，但从那以后，求医问药就成了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大约到了6岁，我的脸才开始真的改变了形状，尽管如此，我还是记不起来曾经看似常人的那一段时光。

脸部变形的成长岁月是很不容易的。青春期开始了，所有通常的发育都如期而来，只是有一点点特别——我的脸变得非常大，我的眼睛受到的影响更大。

再看一眼

我的青少年时期非常艰难。人们有时候会盯着我看，或者回头再看一眼。有些人根本就是下流鬼，直接辱骂我。

有时候人们会说，“哦，你真可怜！”即使这样，他们的怜悯也伤害了我，而这种伤害会久久

伴随着我。我开始变得内向孤僻，担心自己出门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但是，久而久之，我逐步开始培养起我的自尊和自信，开始感到，我不应当就因为别人对我的态度而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16岁的时候，我上了社区学院，学习电影、媒体研究和摄影之类的科目。我开始研究，传媒中是如何表现毁了容的人的。

我研究了电影中是如何刻画脸部变形的人，是的，毫不奇怪，人们不知道应该对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猛鬼街》(*Nightmare on Elm Street*)里的恶魔弗莱迪(Freddy Krueger)，《蝙蝠侠》(*Batman*)里的小丑(the Joker)，还有黑帮电影里带有各种污痕的歹徒……举不胜举。

不良的预设

既然带着这类刻板印象，那人们假设，如果你的脸与众不同，那么你的内心也会有些“与众不同”或“不良的东西”，也就基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转折点，因为我意识到，脸部变形不仅是个医学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我开始认识到，自己之所以这么郁郁寡欢，并不是因为我的脸，而是因为有些人对我的脸的反应方式。我确定自己要改变的并不是我的脸，而是社会的态度。我并不想反对整容手术。不做手术只是我的个人选择。

现在，我24岁了。我常常会从镜中看自己的脸，觉得挺不错的。尽管我很希望去除头痛和复视，也不喜欢在身体角度上不能眨眼睛，但我可以努力地通过晃动脑袋和眯缝眼睛，来克服这种特别的残障。

可我的脸是我之为我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待我的方式，还有我学会如何度过我一生的方式，塑造出今天这个我。

缺乏想像力

我爱我的脸给我带来的那些真诚的朋友，我

喜欢它以这种方式让我渴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还交了个男朋友，他觉得我看起来像只猫。我不能确信自己也同意他的说法，但我肯定不是在抱怨！

现在，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说我很丑，我只会可怜他们，因为他们缺乏想像力。对于每一个叫我“肥下巴”的人，我都认为“不！这只不过是因为你自己的下巴实在太小了。这叫做下巴妒羨”^①！

对于我所得到的任何一个发乎自然的惊异盯视，我都回报以友善的微笑。如果他们不在我的十秒限定内回以微笑，我就给他们大大地皱一下眉。

上个礼拜，我和男朋友在逛街，有个男人迎面向我走来，惊呼“偶呕哦~~~噢”！（Urghhhh-hoooooh!）

直面

这与其说是一个单词，不如说是一种奇怪的喉音，只有面容古怪的人才会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我很恼火，就冲着他去了。

我不想细谈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不妨这么说，那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在街上对一个面容古怪的女人发出奇怪喉音了。

两分钟后，我们正往家走，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追上我，讨些零钱。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挺好！”然后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怔了一会儿，马上又笑了，说“我希望你触痛了他！”我们都乐了。

某些陌生人竟然可以如此的无情，给人如此伤害，而另一些人，一些你根本没有指望的人，一些你通常会视若无睹的人，居然能这样给人温暖，这样和善，这确实很有意思。

那确实能很好地概括我的生活。我从遇到最恶劣的人，到体验最美好的人，常常只在五分钟之内！它使我的生活更加具有挑战性，但也很有意思。这样的生活，给我整个世界我都不换。

资料来源：《BBC 新闻周刊》(BBC News Magazine)(2003年8月6日)

问题：

- 1 脸部变形的人属于残障吗？
- 2 这则新闻报道是否让你对伤残与残障之间的区别有所了解？
- 3 这则新闻报道是否让你对残障的社会模型有所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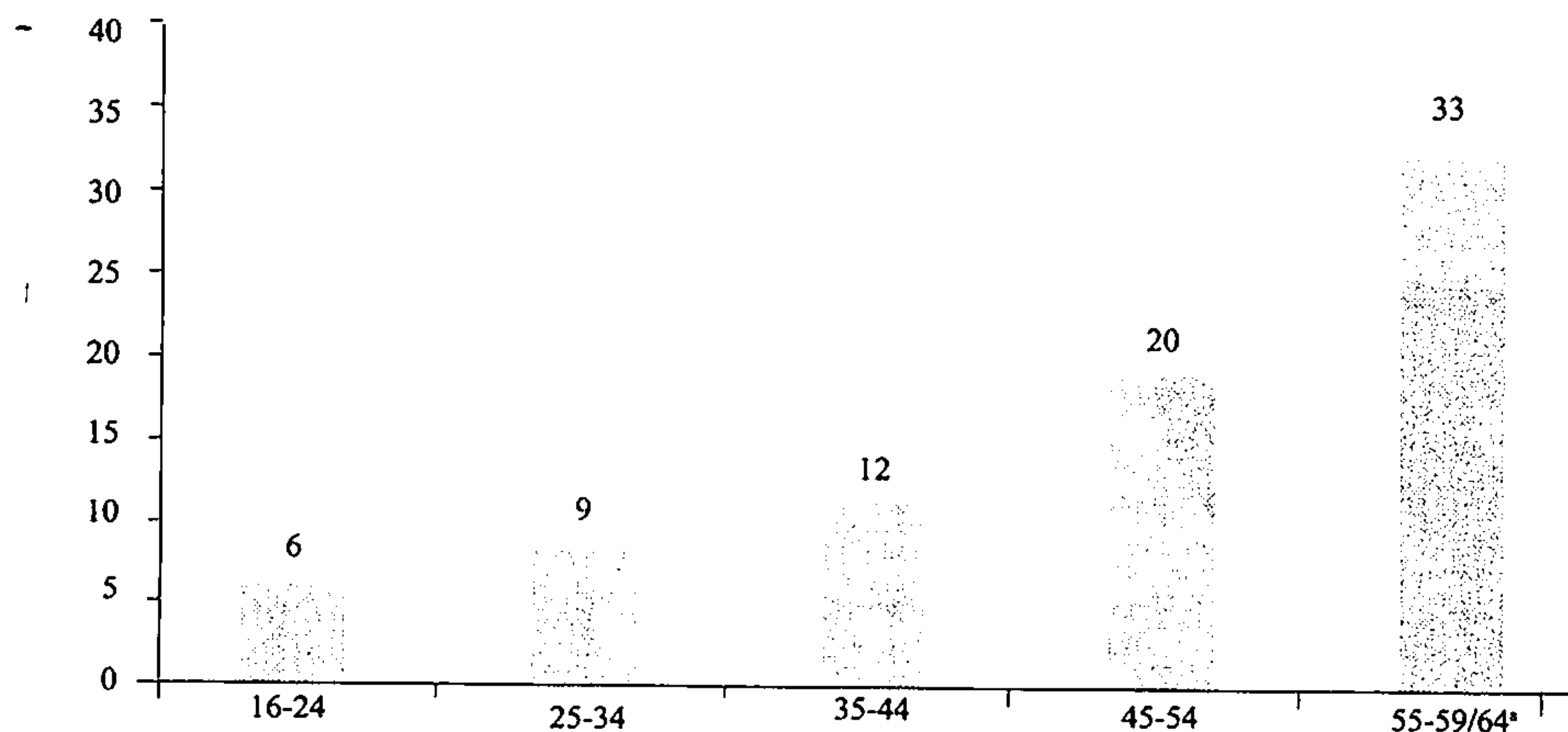


图 8.5 英国的残障人士，以年龄分组(占该年龄组百分比)

a: 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

资料来源：“From Exclusion to Inclusion”, Final Report of the Disability Rights Task Force (1999)

^① 原文为“chin envy”，仿照弗洛伊德提出的“阳具妒羨”(penis envy)。

者的平均实得薪酬是每周 212 英镑 (NOP 1998)。不过,与其他许多领域的开销相比,与残障事业相关的政府开支还是比较高的。英国政府每年的伤残与残障补贴开支超过 190 亿英镑 (BBC, 2002 年 4 月 9 日)。到 1999 年,最富裕国家在残障相关项目上的花销,至少两倍于他们在失业补偿上的开支 (OECD 2003)。

据估计,全世界将近有 5 亿“残障”人士,其中 80%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 (The World Bank Group 2002)。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发展中国家“慢性病与长期伤残”的主要原因就是贫困、卫生不良、营养缺乏和居住条件恶劣。像骨折这样的损伤,在发展中国家常常会导致长期的伤残,而如果能够得到治疗和康复设备,就像西方世界通常的情况,原本不至于如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导致女性残障的伤残的主要原因,就是缺铁、“贫血”和慢性盆腔炎 (有时候是由女性割礼造成的)。据估计,每年大约有 25 万的儿童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而失明,这种成分多见于

绿叶蔬菜。有人认为,只要改善有关政策,挑战贫困、营养不良、卫生、饮用水和就业条件,减少意外事故,全世界的伤残中有多达一半是可以预防的 (Charlton 1998)。战争及其后果 (比如未清除的地雷) 是造成伤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不仅如此,在比较贫困的国家,残障儿童相比其他孩子,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更加剧了他们日后生活的贫困。基于以上证据,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展中国家,贫困创造了伤残,塑造了残障,其方式能够使残障与西方世界所体验到的非常不同。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伤残与残障的迥异体验,刻画出本章所反映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观念:我们对于自身身体的体验,我们与他人之间的互动,不管是体格健全还是身有残障,不管是有病在身还是体质健康,都受到我们所处的变动不居的社会背景的塑造。为了发展一种对于疾病、健康和残障的社会学视角,我们就需要考察塑造我们对于人类生活这些方面的理解的社会变迁与技术变迁。

本章要点

- 1 西方医学是以生物医学健康模式为基础的,即认为疾病可以从客观的方面加以定义,病体可以通过有科学基础的医治得以康复。生物医学健康模式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与它相联系的,还有人口学——对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动态的研究——的兴起,以及国家对于促进公共卫生的日益关注。科学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对现代卫生保健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2 生物医学健康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有人提出,科学的医学并不像据说的那样有效,医学专家也不重视接受治疗的患者的意见;医学界自认为正统方法优于任何替代治疗形式。
- 3 社会学家关注对于疾病的体验,即病人及其周围的人如何体验不适、慢性病或残障。帕森斯提出的病人角色概念认为,病人采取某些特定的行为形式,以尽量减小疾病的破坏性影响。病人被赋予某些特权,如豁免正常的责任,但反过来也必须遵从医嘱,争取尽快康复。
- 4 符号互动论者考察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疾病和慢性病。对于疾病的体验能够引起他们个人的自我认同和日常例行习惯的改变。身体的这一社会学维度已经适用于越来越多的社会。人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寿,也更容易遭受慢性衰竭而非急性疾病的折磨。
- 5 社会学研究揭示了疾病和不平等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工业国家中,比较贫穷的群体较之比较富裕的阶层,平均预期寿命要短一些,并且更容易染上疾病。比较富裕的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比较贫穷的国家高一些。一些人认为,像饮食和生活方式这类文化和行为因素可以说明基于阶级的健康不平等。其他人则把重点放在失业、不达标住房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等结构性因素上。
- 6 健康和疾病模式也有性别和种族的维度。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女性总体来说比男人更长寿,但她们所体验到的疾病发病率则高于男性。某些疾病在少数族群中比在白人中更常见。人们已经提出了遗传角度的说明,来解释在健康方面的性别和种族差异,但单凭这一点还不能说明这些不平等。虽然某些健康状况具有一些生物学基础,但健康和疾病的整体模式必须把社会因素和群体之间物质条件的差异考虑在内。
- 7 残障的个体模型认为,个体局限是残障人士所体验到的问题的主要致因。在个体模型中,身体上的“异常”被视为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残障”或功能局限。这种功能局限被认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广泛的分类,把一个人界定为“不健全的人”。支撑个体模型的是以“个人不幸的思路”来看待残障的。
- 8 残障的社会模型将残障的致因定在社会之中,而不在于个体。导致残障的并不是个体的局限,而是社会对于残障人士充分参与社会所设置的障碍。
- 9 在绝大多数富裕国家中,残障相关项目的政府开支都要远远高于失业补偿方面的花销。尽管如此,残障人士在发达国家中也依然是社会上最具劣势的群体之一。大多数患有伤残的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思考建议

1. 怎样做才能减少卫生保健方面的不平等?
 2. 怎样用男女生活中的差异说明其对于健康不良的体验上的差异?
 3. 你会建议采取怎样的政策使得全国卫生服务系统更能考虑到患者的文化背景?
 4. 对怀孕和不愉快之类的状况采取医学化的处理,是否会在减少病人的权力的同时增加医疗机构的权力?
 5. 你所在的社区或教育机构中的残障人士是以哪些方式成为残障人士的?
-

阅读指南

- Lesley Doyal, *What Makes Women Sick* (London: Macmillan, 1995). 《女性为何患病?》
- Jenny Morris, *Pride Against Prejudice: A Personal Politics of Disability* (London: Women's Press, 1991). 《以骄傲对抗偏见:个体层面上的残障政治学》
- Sarah Nettleton,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健康与疾病社会学》
- C. Barnes, G. Mercer and T. Shakespeare, *Exploring Disability: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9). 《残障社会学研究初论》
- C. Barnes, M. Oliver and L. Barton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2002). 《当代残障研究》
- C. Barnes and G. Mercer, *Disability* (Cambridge: Polity, 2003). 《残障》
-

网络导航

欧洲卫生体制与政策观测网 (European Observatory on Health Systems and Policies)

<http://www.euro.who.int/observatory>

国际公共卫生网 (International Public Health)

<http://www.ldb.org/iphw/>

维尔康医学历史和知识图书馆 (Wellcome Library on the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

<http://www.wellcome.ac.uk/knowledgecentre/wellcomesites/>

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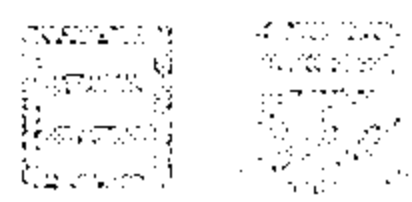
<http://www.who.int>

利兹大学残障文献库 (Leeds University Disability)

<http://www.leeds.ac.uk/disabilit—studies/archiveuk/index.html>

英国广播公司残障杂志 (BBC Disabilities Magazine)

<http://www.bbc.co.uk/ou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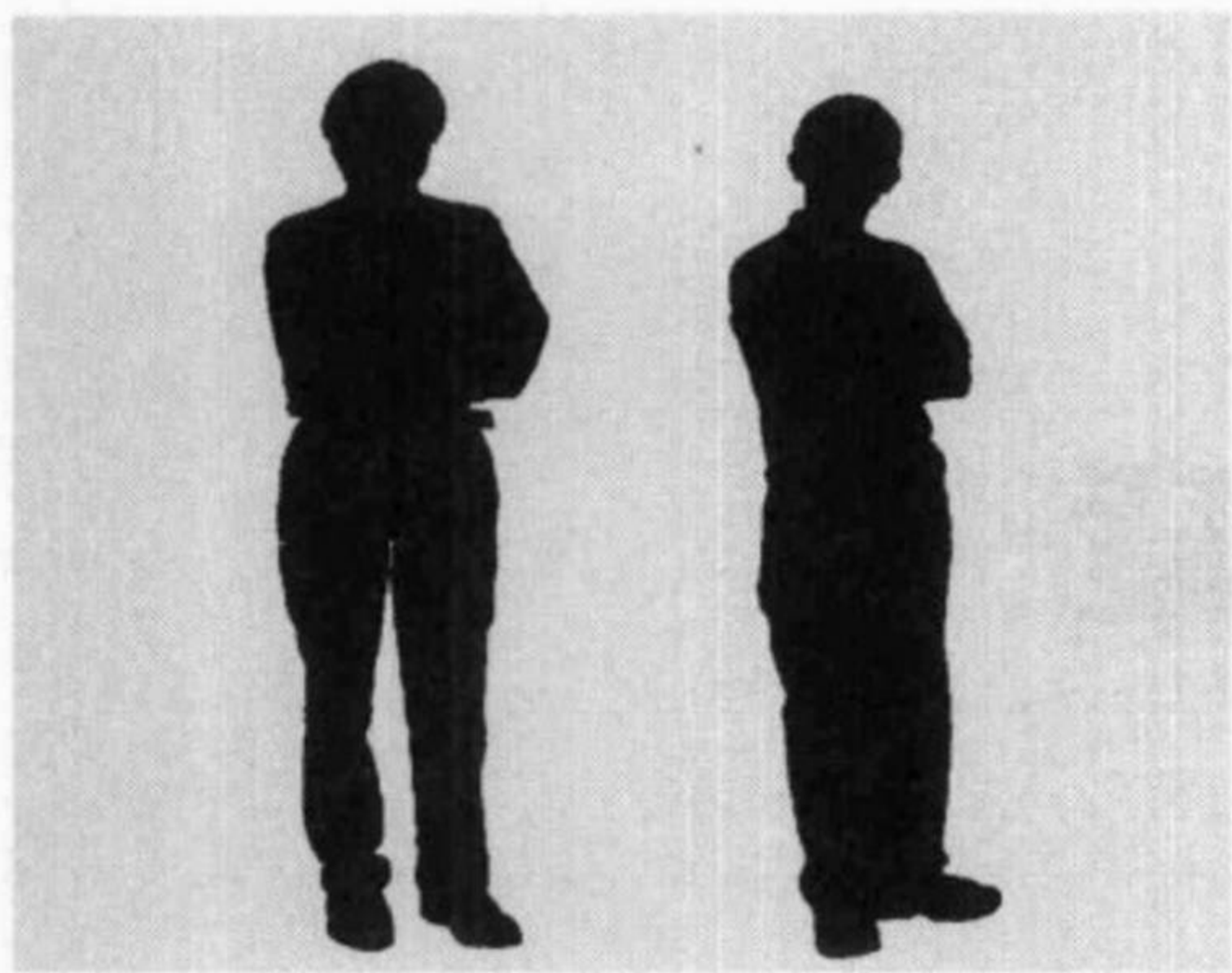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分层体制	245
9.1.1 奴隶制	246
9.1.2 种姓制	246
9.1.3 等级制	248
9.1.4 阶级制	249
第二节 有关分层与阶级的理论	249
9.2.1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250
9.2.2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250
9.2.3 埃里克·奥林·赖特的阶级理论	251
第三节 测定阶级	252
9.3.1 约翰·戈德索普：阶级与职业	253
9.3.2 评价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	254
第四节 今日西方社会的社会阶级划分	257
9.4.1 上层阶级的问题	257
9.4.2 中产阶级	260
9.4.3 工人阶级性质的变迁	261
9.4.4 底层阶级？	262
9.4.5 阶级与生活方式	266
9.4.6 性别与分层	268
第五节 社会流动	271
9.5.1 流动的比较研究	271
9.5.2 下向流动	272
9.5.3 英国的社会流动	273
9.5.4 英国是否属于能力至上制的社会？	274
小结：阶级的重要性	275
本章要点	275
思考建议	277
阅读指南	277
网络导航	277



第九章

分层与阶级



你是否曾经在一家英国超市中买过印度燕麦粉?如果买过,那很有可能是由努恩食品(Noon Products)出产的。该公司主要是向连锁大超市专供印度食品,年营业额大约为9千万英镑。根据2004年度《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Sunday Times Rich List*)的估计,公司创建人吴拉姆·努恩爵士已经积聚了5千万英镑的财富。

吴拉姆出生于印度。他的家庭在孟买开了一家糖果店,店号“皇家糖果”(Royal Sweet)。他们虽然算不上富裕,但当吴拉姆七岁上父亲去世时,家境还算过得去。此后的日子非常艰难,十几岁的吴拉姆不得不半工半读,在店里帮忙。从学校毕业后,他完全投入了家庭的生意。吴拉姆不久便改变了经销模式,扩了店,又开了厂。不过,他的野心可不仅限于区区一个“皇家糖果”,其他投机事业接踵而来,包括投资印刷业和建筑业。

吴拉姆对自己在印度的成功还不满足,转向英国开拓他的经历。他在伦敦绍索尔(Southall)开办了“皇家糖果”,并从印度带来了厨师,生意就这么开始运转了。短短一年内,又在伦敦和莱斯特(Leicester)两地的亚裔社区周边开办了九家分店。今天,“皇家糖果”连锁店已经拥有40家分店,年营业额为9百万英镑。

“皇家糖果”取得成功之后,又开展了其



查尔斯王子与吴拉姆·努恩爵士

他商贸投资。1989年,创建了努恩食品。吴拉姆察觉到市场上的一个空白:“超市里能够买到的所有散装速食燕麦粉都淡而无味,非常难吃。我想我能做得更好。”这门生意最初开始做时只有11名雇员。但不久以后,他们就开始把货真价实的印度食品卖给速冻食品公司鸟眼,然后又开始卖给连锁超市威特罗斯和森斯伯瑞。^①

现在,努恩食品配餐的种类已经超过了100种,在三家工厂中生产,雇员有1100人。每天制成的配餐在25万至30万份之间。产品的范围已经从印度食品扩展到泰国风味和墨西哥风味等多国食品。2002年,吴拉姆因为对食品工业的贡献而获颁爵位。吴拉姆爵士在思考是什么激励他的一生时总结道:“我这个人白手起家,但学得很快!万事来之不易,就看你去不去做。”

我们当中极少人能够指望像吴拉姆现在所拥有的这种财富。但他从一介贫民到商业巨头的的生活史却给社会学家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会在英国各地屡屡重演,无非不如这一次令人注目?出身贫寒的人有多少机会能够登上经济阶梯的顶峰?我们的社会中每出一个吴拉姆,又会有多少人从富变穷,从经济阶梯上下滑?吴拉姆爵士的生活史所提出的财富与贫困的话题,把我们带向了更广泛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中会存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究竟怎样?什么样的社会因素将会影响你在社会中的经济位置?如果你是女性,机会会有什么不同吗?经济的全球化是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机会?这些问题只是社会学家提出并试图解答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它们将是本章的讨论重点。对于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研究是社会学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我们所拥有的物

质资源决定了我们的大部分生活。本章中,我们首先来看看社会学家谈论的分层与阶级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来谈谈社会学思想中一些最具影响的阶级理论和测定阶级的尝试,然后再更细致地看看今日西方社会中的社会阶级。最后,我们将简要讨论社会阶级对于帮助我们理解周遭世界所具有的持久的重要性。

第一节 分层体制

社会学家用社会分层来描述人类社会的个体和群体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通常我们想到的分层是就资产或财富而言的,但分层也可以基于其他属性,比如性别、年龄、宗教归属或军阶。

不同的个体与群体根据各自在分层图式中的位置,获得报酬的机会也是不同的(不平等的)。因而,最简单的分层定义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化不平等。如果将分层比做地球表层岩石的地质层级,会大有助益。可以将社会视为由等级序列中的“层”所构成,比较有优势的人在顶层,而没有什么特权的人则接近底层。

所有的社会分层体制都具有三点特性:

- 1 地位等级(rankings)应用于人群的社会范畴,这些人享有某种共性,但不一定发生互动,也不一定彼此认同。比如说,女性的地位等级不同于男性,或富人的地位等级不同于穷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来自某一特定范畴的个体就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等级,而是意味着,即使个体离开了该地位等级,进入另一个社会范畴,原范畴也继续存在。

^① 鸟眼(Birds Eye)系英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建于1938年。其创始人 Clarence Birdseye 被称为“冷冻食品之父”。威特罗斯(Waitrose)和森斯伯瑞(Sainsbury's)皆属英国最大连锁超市之列,其中前者号称英国皇家御用超市。

- 2 人们的生活体验和机会严重依赖于他们的社会范畴是如何定级的。是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上层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就你的生活机会而言差别会非常大，常常和你的个人努力或好运（比如中彩票）一样大。
- 3 不同社会范畴的等级变动起来往往会非常缓慢。比如说，在英国社会，女性只是在晚近才开始实现与男性平等。

有关男女之间的平等，详参第十二章。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分层的社会已经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变而发生了变化。在早先以狩猎和采集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中，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分层。这主要是因为要通过财富或其他资源来进行分割，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农业的发展产生出的财富要多得多，其结果，分层也大大加剧了。农业社会中的社会分层越来越表现得像一座金字塔，大量的人处在底部，越靠近顶部，人数就越少。而到了今天，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情形则极其复杂，它们的分层更像是一滴泪珠，大量的人处在中等和中下等级（即所谓中产阶级），位于底层的人数略少，而到了顶层，人数则非常少。

从历史上的角度来讲，可以区分出四种基本的分层体制：奴隶制（slavery）、种姓制（caste）、等级制（estates）和阶级制（class）。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以及18世纪60年代内战之前的美国南方，就同时存在着阶级制度与奴隶制度。

9.1.1 奴隶制

奴隶制是不平等的一种极端形式，这种制

度下的某些人可以将另外一些人作为其财产而占有。奴隶所有权的法律处境在不同的社会之间有相当的差异。有时候，奴隶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几乎所有权利，就好像美国南方种植园里的情形。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奴隶们的地位更类似于仆役。比如，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有些奴隶占据着负有相当责任的位置。他们不能从政，不能当兵，但其他大部分行业类型还是接受他们的。有些奴隶识文断字，担任了政府管理人员。许多奴隶接受了手工业技艺训练。不过，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奴隶都能指望有如此好运。对于那些不太走运的奴隶来说，他们必须终日在矿井中进行艰苦的劳动。

纵观历史，奴隶常常反抗自己的臣属地位。内战之前美国南方的奴隶反叛即为一例。由于这类抵抗，奴隶劳动的体制往往是不稳定的。要想达到较高的产出，只能通过持续的监管和野蛮的惩罚。奴隶劳动体制最终瓦解，部分原因在于其所激发的斗争，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动力会促使人们生产出比直接强迫的情形下更多的东西。奴隶制根本就不具有经济角度上的效率。不仅如此，从大约18世纪以来，欧洲与美国的许多人士开始认为奴隶制是违背道德的。今天，奴隶制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不合法的，但它依然在某些地方存在着。晚近的研究留有记录，有些人被强力所迫，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带走并拘押。从巴基斯坦的砖窑奴工^①到泰国的性奴，再到英国和法国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中的家奴，奴隶制依然是今日世界上一种重要的侵犯人权的现象（Bales 1999）。

9.1.2 种姓制

在种姓制这种社会体制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毕生注定的。因此，在一个种姓社会里，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都是封闭的。这样的话，

① 原文如此。



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和白人在社会上相互隔离的。

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必然维持在出生时的那个社会层级上。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基于个人的特性,比如公认的种族或族裔(常常基于肤色之类的身体特征)、父母所持的宗教或父母所属的种姓。这些都是出生时的偶然,因此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人出生在某个种姓,就会终生停留在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种姓社会可以看作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特殊类型,其中的阶级位置从出生时就被先赋指定了。种姓社会一般存在于尚未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农业社会,比如印度农村或1992年结束白人统治之前的南非。

现代之前,种姓体制遍及全世界。比如说,在欧洲,犹太人就常常被当作一种与众不同的种姓,强制居住在边界限定的社区,禁止与非犹太人通婚(有些情况下甚至禁止相互交往)。“隔离住区”(ghetto)这个词据说就是源于威尼斯人说的“铸造厂”,是欧洲最早的官定犹太人隔离住区之一,由威尼斯政府于

1516年设立。这个词后来用来指欧洲城镇中根据法律强制犹太人居住的那些区域,很久以后,才用来描述美国城市中的少数族裔社区,这些社区的种族隔离和族群隔离也带有种姓的性质。

在种姓体制中,与其他种姓的成员之间的亲密接触是受到强烈排斥的。要维护一个种姓的这类“纯洁”,常常是通过族内婚的规则,即习俗或法律要求在某人所属的社会群体内部通婚。

印度与南非的种姓制

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寥寥数个种姓体制正在受到全球化的严重挑战。比如说,印度的种姓体制反映了印度的宗教观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根据印度教信仰,主要有四大种姓,每一个都大致联系着宽泛的职业群体。这四大种姓中,处在顶层的是婆罗门(Brahmins,学者与精神领袖),接下来是刹帝利(Kshatriyas,

武士与统治者),吠舍(Vaisyas,农夫和商人),首陀罗(Shudras,苦力与手工业匠人)。在这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贱民”(Dalits,即被压迫的人)。^①如其名所示,最后这类人无论如何是必须避免接触的。不可接触者只能去做社会中那些最低劣的工作,比如挑粪工。他们也常常需要去乞讨和翻垃圾堆来找寻食物。在印度的传统地区,高等种姓的一些成员依然认为,与不可接触者的身体接触是非常肮脏的,一旦碰了一下,就得进行清洁仪式。早在1949年,印度已经立法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但这种体制的许多特性今天仍然在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乡村地区。

随着印度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将来自不同种姓的人们维系在一起,不管是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同一架飞机还是同一家餐馆,要维持延续种姓体制所必需的严格壁垒是越来越困难了。随着印度的越来越多部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似乎有理由假定,印度的种姓体制还将会进一步削弱。

南非的种姓体制,称为种族隔离,于1992年被废除。此前,这种体制把非洲黑人、印度人、“有色人种”(种族混血儿)和亚洲人与白人严格隔离开来。^②在这种体制下,种姓完全建立在种族的基础上。白人虽然仅占总人口的15%,但却控制了全国几乎所有的财富,占有绝大部分可用地,经营主要的工商贸易,并垄断政治权力,因为黑人缺乏投票权。黑人占了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被隔离在贫瘠的“班图斯坦”[bantustans,即“(黑人)家园”],只有在为白人少数族群工作时,才允许外出。

种族隔离政策,广泛的歧视和压迫,在白人少数族群与黑人、混血种族和亚裔多数族群

之间制造了激烈的冲突。数十年常常充满暴力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成功。最强大的一个黑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动员全球抵制南非企业,在经济上产生了摧毁性的后果,强迫南非白人领袖解除了种族隔离政策,并由南非白人在1992年举行公投予以废除。1994年,这个国家举行了首次多种族的选举,黑人多数族群赢得了政府的控制权,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在被白人政府囚禁27年之后,当选为总统。

9.1.3 等级制

等级制是欧洲封建制的组成部分,但也存在于其他许多传统的文明。封建等级制度由不同的阶层(strata)构成。每个阶层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义务和权利,这些差异中有些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在欧洲,最高的等级由贵族和士绅构成,神职人员构成另一个等级,地位稍低,但拥有多种特权。后来被称为“第三等级”的是平民,包括农奴、自耕农、商人和匠人。与种姓制不同的是,等级之间一定程度上的通婚和流动是可以容忍的。比如说,平民可以受爵,作为对于王室的特别贡献的回报。商人有时也可以购买封号。英国还保留着一些这种体制的痕迹,世袭封号还被承认(尽管从1999年以来,贵族已经不再自动获得上议院^③投票权),而商界领袖、公务人员和其他人士也会因其贡献而荣获爵位。^④

在过去,只要存在以高贵出身为基础的传统贵族制,就往往会发展出等级制度。在封建制下,比如在中世纪时候的欧洲,等级制与庄园共同体紧密维系,形成一种地方性而不是全

① 以上诸词皆源自梵语,意思分别为“祈祷者”、“权威”、“拓殖者”、“被征服者”、“被压迫者”。

② 原文如此。与白人相区分的是三类:班图人(非洲黑人)、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和有色人种(混合种族)。

③ 上议院(House of Lords):亦称贵族院。

④ 本书作者吉登斯即为上议院议员,于2004年获得“终身贵族”称号。

国性的分层体制。而在更具中央集权性的传统帝国,比如中国或日本,等级制是在更具全国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有时候,等级之间的差异是通过宗教信仰获得正当性理据的,虽说很少会像印度种姓体制那样严格。

9.1.4 阶级制

阶级体制与奴隶制、种姓制或等级制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将阶级界定为由分享共同经济资源的人们所组成的一种大型群体,这些经济资源强烈影响了他们有能力过的生活方式类型。形成阶级差异的主要基础在于财富的所有权以及职业。阶级与以前的分层形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1 阶级体制是流动的。与其他类型的分层不同,阶级并非由法律规定或宗教信条所确定。阶级之间的界限从来没有明确的划分。并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来限制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通婚。
- 2 阶级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获致的。个体的阶级地位不像在其他类型的分层体制下那样,在出生时就已“注定”。社会流动,即阶级结构中的上向流动与下向流动,比其他类型要普遍得多。
- 3 阶级是以经济的角度为基础的。阶级有赖于个体所属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差异,即拥有物质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在其他类型的分层制度中,非经济因素(如前南非种姓制度中的种族因素)一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 4 阶级体制是大规模的、非人身性的。在其他类型的分层体制中,不平等性主要表现为奴隶和主人或种姓低和种姓高的人之间人身性的义务或责任关系。与此相反,阶级体制则是通过非人身性的、大规模的关联来

运行的。例如,阶级差别存在的一个主要基础在于报酬与工作条件方面的不平等。

种姓会让位于阶级吗?

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终结受法律保护种姓体制。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官方正式的种姓体制已经让位于基于阶级的体制。上文提到的南非,就是晚近最显著的一个实例(Berger 1986)。现代工业生产要求人员的自由流动,能够做任何自己适合去做或有能力做的工作,并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而经常变动工作。种姓体制下的严格限制有碍于这种必要的自由。不仅如此,随着整个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单元,种姓般的关系将越来越受到经济压力的影响。不过,即使是在后工业社会中,也仍然留存着一些种姓的成分。比如说,有些移居西方社会的印度移民还力图按照种姓的界限,为自己的孩子包办传统婚姻。

第二节 有关分层与阶级的理论

马克思和韦伯所提出的理论形成了绝大多数关于阶级和分层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

第一章介绍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并讨论了他们的“理论”宗旨何在。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观念,其他学者则尝试细化韦伯的思想。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和韦伯提出的理论,然后再来分析埃里克·奥林·赖特提出的新马克思主义思路。

9.2.1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涉及分层,特别是社会阶级。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对阶级这一概念作系统的分析。马克思临终前正在撰写的一份手稿(后来作为其主要著作《资本论》的一部分出版),恰恰在他提出“什么构成阶级?”这样一个问题的地方嘎然而止。因此,不得不从马克思的著作整体体系中重新构建他的阶级概念。因为他论述阶级的许多行文并不始终完全一致,所以,围绕着“马克思究竟是什么意思”,学者之间就产生了许多争论。不过,他的观点的主要轮廓还是相当清晰的。

阶级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阶级就是对生产资料有相同关系的一群人。人们通过生产资料来谋生。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用来耕作或放牧的土地和工具。因此,在前工业社会,主要存在着两大阶级:拥有土地的阶级(贵族、绅士或奴隶主)和积极从事土地生产的阶级(农奴、奴隶和自耕农)。在现代工业社会,工厂、办公室、机械以及购买这些东西所需要的财富或资本变得更加重要。两大主要阶级是:拥有这些新生产资料的人,也就是产业家或资本家;靠向前者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也就是工人阶级,或者,用马克思有时喜欢用的、现在已经有些过时的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在封建社会,剥削常常表现为从农民到贵族的产出直接转移的形式。农奴被迫将自己产品的固定一部分交给贵族领主,或者每个月固定一段时日的耕作出产必须提供给领主及其侍从消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剥

削产生的源泉不如以前那样明显,所以马克思致力于揭示其本质。根据马克思的推理,在劳动日中,工人们所生产的要多于雇主雇用他们的开销的实际所需。这种剩余价值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可以将其占为己有。例如,制衣厂的一群工人每天可以生产100套衣服,销售其中的75%,所得的收入就足够支付制造商付给工人的工资、工厂和设备的开支。而剩余服装的销售收入就变成了利润。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感到震惊。尽管早期的贵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与农民的日子有天壤之别,但农业社会整体上还是比较贫穷的。即使没有任何贵族,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可避免地煞是可怜。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财富的生产达到空前的程度,然而工人却几乎不能得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当有产阶级逐渐积累财富的时候,工人仍然是相对贫穷的。马克思使用贫困化这个词来描述工人阶级相比于资产阶级的日益贫困的过程。即便在绝对的意义上,工人变得更加富有,但是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差距却是越来越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本质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注意到,现代工厂的发展以及生产的机械化是如何意味着工作会经常变得极端的枯燥乏味和沉闷压抑。劳动作为我们财富的源泉,却常常使人们劳累其筋骨,贫乏其心智。就像一名工厂的工人,他的工作就是在一个不变的环境中,日复一日地执行着例行的任务。

9.2.2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韦伯研究分层的思路以马克思的分析为基础,但做了补充和完善。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也认为社会是以围绕权力和财富的冲突为特征的。但是,马克思把两极化的阶级关系和经济问题视为所有社会冲突的核心,而韦伯则发展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多维度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韦伯认为,社会分层并非只与阶级有关,其

形成还涉及另外两个方面,即地位和党派。这三个相互重叠的分层要素在社会中产生了众多可能的位置,而不只是马克思提出的更为刻板的两极模式。

虽然韦伯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是在客观给定的经济条件下确立的观点,但是他看到,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经济因素要比马克思认识到的因素为多。根据韦伯的看法,阶级划分不仅源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或缺乏控制,而且源自对财产没有直接影响的差别。这类资源包括许多,尤其是影响个体可获得的工作类型的技能、文凭或资格等资源。韦伯相信,一个人的市场位置(market position)强烈影响其整体上的生活机会。例如,那些从事管理性或专业性职业的人比从事蓝领工种的人收入高,工作环境更好。他们所拥有的资格,比如他们获得的学位、文凭和技能等,使他们比其他没有这类资格的人更“有销路”。而在社会的低层,如蓝领工人之间,熟练技能型工人有能力确保拿到高于半熟练技能型或非熟练技能型工人的工资。

韦伯理论中的地位一词,指的是社会群体被他人赋予的尊崇或声望的差异。在传统社会中,地位通常是基于对一个人的第一手认识而决定的,这些认识是在不同背景中历经多年,通过多种形式的互动逐步获得的。然而,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已经不可能总以这种方式来赋予地位。相反,在韦伯看来,地位开始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住宅、衣着、言谈和职业,这些地位标志与地位象征都有助于形成一个人在其他人眼中的社会位置。地位相同的人构成一个具有共享认同感的共同体。

马克思相信,地位的区分是社会中级级分化的结果;而韦伯认为,地位常常独立于阶级划分而发生变化。拥有财富的人一般都有较高的地位,但也存在一些例外。“贫苦不辱斯文”(genteel poverty)一语就是其中一例。在英国,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即便已经失去其财产,也仍

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相反,“暴发户”(new money)却常常受到那些名门世家的蔑视。

韦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党派的形式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独立于阶级和地位而影响分层。党派是由具有共同背景、目的或利益从而共同工作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党派经常以一种有组织的形式,为了根据党派成员的利益所确定的特定目标而努力。马克思往往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明地位差别和党派组织。而韦伯认为,虽然这两者都受阶级划分的影响,但确实不能将它们化约为阶级划分。地位差别和党派组织反过来都能够影响个体和群体的经济状况,进而影响阶级。党派可能会诉求跨越阶级界限的关注话题。例如,党派可能会建立在宗教归属或国族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试图从阶级的角度出发,来说明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因为在工人阶级岗位上的天主教徒要多于新教徒。而韦伯的追随者则可能认为,这样的说明站不住脚,因为许多新教徒也是工人阶级。人们所加入的党派既表达了阶级差别,也表达了宗教差异。

韦伯关于分层的著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说明了除阶级之外,还有其他分层维度显著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马克思试图把社会分层化约为阶级区分,而韦伯则关注作为社会分层的独立维度的阶级、地位和党派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为分析分层提供了比马克思更灵活的基础。

9.2.3 埃里克·奥林·赖特的阶级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融合马克思和韦伯的思路,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的阶级理论(Wright 1978; 1985; 1997)。赖特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对于经济资源的控制存在着三个维度,这使我们可以分辨现存的主

要阶级。

- 1 对投资或货币资本的控制。
- 2 对物质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工厂或办公室）的控制。
- 3 对劳动力的控制。

控制生产系统的各方面的人属于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成员则无法控制这一切。然而，在这两大主要阶级之间，存在一些位置更加暧昧的群体，例如上文提到过的管理人员和白领工人。这些人能够影响生产的某些方面，但不能控制其他的方面，因此赖特称这些人所处的是矛盾性阶级地位。比如说，白领雇员与从事专业性职业的雇员不得不通过契约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主，以求谋生，就和体力劳动者一样。但与此同时，比起绝大多数从事蓝领工作的人，他们对工作有更大的控制权。赖特把这些工人的阶级位置说成是“矛盾性”的，是因为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体力劳动者，但又具有两者的某些共同特征。

赖特认为（Wright 1997），占人口 85%到 90%的很大一部分人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属于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群。然而，这部分人口内部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从传统的体力劳动阶级到白领工人。为了在这群规模庞大的人口中进一步细分阶级定位，赖特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是与权威的关系，一是对于技术或专业技能的占有。首先，赖特认为，许多中产阶级工人，如经理和监工，与权威的关系更接近，与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相比享有更多的特权。这些人通过监视雇员的工作或负责人事考核和评估等办法，帮助资本家控制工人阶级，而他们也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定期的提升，作为对其“忠诚”的回报。然而，与此同时，这些人仍然处于资本所有者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他们既是剥削者，也是被剥削者。

在中产阶级中细分阶级定位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对于技术和专业技能的占有。赖特认为，具有劳动力市场所需求的技术的中产阶级

雇员，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挥一种特殊形式的权力。倘若他们的专业技能供应短缺，他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信息技术专家在新兴的知识经济中处于有利位置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赖特还认为，由于拥有知识和技术的雇员更难以监督和控制，雇主被迫通过提供相应的回报，以确保他们的忠诚和合作。

第三节 测定阶级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已经考察了阶级地位与选举模式、教育成就和身体健康等社会生活其他维度之间的联系。然而，我们已经看到，阶级的概念远远谈不上清晰明了。无论在学术圈中，还是在一般用法上，对于“阶级”这个词都有多种方式的理解和使用。那么，出于经验研究的目的，社会学家和研究者们怎样才能测定类似阶级这种不精确的概念呢？

本书许多地方讨论了社会阶级与其他话题之间的关联，浏览索引就会看到这一点。一些重要的讨论可以参见：

- 社会阶级与健康：参阅第八章第三节第一小节；
- 社会阶级与性别：参阅第九章第四节第六小节；
- 社会阶级与族群：参阅第十三章第四节第三至四小节；
- 社会阶级与家庭暴力：参阅第七章第三节第五小节；
- 社会阶级与高等教育：参阅第十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
- 社会阶级与宗教：参阅第十四章第三节第三小节；
- 社会阶级与失业：参阅第十八章第四节第三小节。

在研究中,当一个像阶级这样的抽象概念被转化为一个可测定变量时,我们就说这个概念被操作化 (operationalized) 了。这意味着它的定义足够清楚和具体,能够通过经验研究加以验证。社会学家通过多种图式对阶级进行操作化,以勾画社会的阶级结构。这些图式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可以借此把个体归入各个社会阶级范畴。

大多数阶级图式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以职业结构为基础。社会学家认为,阶级分化大体上对应于与就业类型相联系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发展有一个特征,就是劳动分工的日益强化和职业结构的日趋复杂。职业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作用巨大,但仍然是一个人的社会位置、生活机会以及物质舒适度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社会科学家相信,职业相同的个体往往会体验到相似的社会优势或劣势,维持近似的生活方式,共享相似的生活机会,所以他们广泛地使用职业作为社会阶级的指标。

基于职业结构的阶级图式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在本质上,有些方案主要是描述型的。它们只是反映了社会中职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形态,而不涉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支持这类模型的学者,比如那些遵循功能主义传统的学者,会认为分层本身不存在问题,属于自然的社会秩序。

第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介绍了功能主义。

而其他图式通常吸收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更具有理论上的思考,而且通过说明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分析阶级。奉行冲突范式的社会学家往往偏好这类“关系型”阶级图式,以便揭示社会内部的区分和张力。赖特的阶级理论(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就

是关系型阶级图式的一例,因为它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来描述阶级剥削的过程。

9.3.1 约翰·戈德索普:阶级与职业

有些社会学家已经不满意于描述型的阶级图式,认为它们只是反映了阶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和物质不平等,而不是寻求说明产生这些不平等的阶级过程。怀着这样的目的,社会学家约翰·戈德索普在有关社会流动的经验研究中创立了一套图式。戈德索普阶级图式 (Goldthorpe class scheme) 没有设计成等级序列,而是反映了当代阶级结构的“关系型”性质。

戈德索普的理论影响广泛。本节将讨论他的阶级阐述。而他有关社会流动的著述将在本章第五节第三小节讨论。

虽然戈德索普现在没有强调有什么明确的理论在影响其图式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3),但社会学家们经常把戈德索普的图式看作是新韦伯主义阶级图式的例证。这是因为,戈德索普最初的图式是根据两个主要因素来识别阶级定位的,一是市场处境 (market situation),一是工作处境 (work situation)。个体的市场处境是指其薪酬水平、工作安全和晋升前景,强调物质报酬和一般性的生活机遇。而工作处境与此相反,集中在职业内部的控制、权力和权威的问题上。个体的工作处境关注的是工作场所的自主程度和影响雇员的总体控制关系。

戈德索普以相对的市场处境和工作处境为基础,通过进行职业评估的办法设计其图式。最后得出的分类见表 9.1。戈德索普的分类图式包括 11 种阶级定位,比其他许多分类图

表 9.1 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

阶级		雇佣关系	
专业服务与 公务人员	一	高级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和官员；大企业经理和业主	雇主或服务关系
	二	低级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和官员；小企业经理和业主	服务关系
中间	三	行政或商业机构中的普通非体力雇员（大部分为文员）；服务业中的普通员工	中间
	三 b	较低级的普通非体力雇员（销售和服务）	中间（男），劳动合同（女）
	四	小业主和自主经营的手艺人	雇主
工人	四 b	小业主和没有雇员的手艺人	自主经营
	四 c	农民和小农场主，其他自主经营的农业劳动者	雇主或自主经营
	五	低级技师、体力劳动者的监工	中间
	六	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	劳动合同
	七	半熟练技能型和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	劳动合同
	七 b	农业工人	劳动合同

资料来源：改编自 Crompton (1998), 第 67 页

式更为详细。但一般在使用时将这些阶级定位压缩成三个主要的阶级层级：“专业服务与公务人员”^①阶级（service class, 阶级一和阶级二）、“中间阶级”（intermediate class, 阶级三和阶级四）以及“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阶级五、阶级六和阶级七）。戈德索普也承认，在图式的最顶端，存在一个作为财富拥有者的精英阶级，但认为它只构成社会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在经验研究中作为一个范畴没有什么意义。

在最近的著述中，戈德索普开始在他的图式中强调雇佣关系（employment relations），而不再是上述的工作处境的概念（Goldthorpe and Marshall 1992）。戈德索普以此把注意力转向雇佣合同的不同类型。劳动合同以具体的界定和限定，预定了工资和努力之间的交换；

而服务合同则包含“预期的”成分，比如涨薪或升职的可能性。戈德索普认为，工人阶级以劳动合同为特征，而服务阶级以服务合同为特征，中间阶级的位置体验到的则是雇佣关系的中间类型。

9.3.2 评价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

戈德索普的阶级图式被广泛应用在经验研究中。它有助于突出以阶级为基础的不平等，比如与健康和教育相关的不平等，并反映出在选举模式、政治观点和普遍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以阶级为基础的维度。但有必要注意到，戈德索普的这类方法有几点明显的局限，以告诫我们不要不加批判地使用它们。

职业阶级图式很难应用于经济上不活跃

^① 这个词目前的两种中译都不能完全切合原意。一种译法是“服务”阶级（原中译本所用），当然不是中文习惯上所指的是那种“服务员”层面的“下层”，而更多的是指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律师、医师等；但另一种译法“公务人员阶级”范围也太小。把这两种意思合在一起，才是戈德索普此词的完整意涵。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阶级之死？

近些年来，在社会学内部，围绕着“阶级”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些社会学家，比如雷·帕尔，甚至质疑它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是否还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在主张阶级不再是理解当代社会的关键概念的学者当中，澳大利亚学者简·帕库尔斯基和马尔科姆·沃特斯令人瞩目。他们在《阶级之死》(Pakulski and Waters 1996)一书中主张，当代社会已经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不再可以精确地视为“阶级社会”。

社会变迁的时代

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主张，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着一段社会剧变的时期。在我们所处的这段时期，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都在下降。工业社会已经从组织化的阶级社会转向一个新的阶段，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称之为“地位约定论”(status conventionalism)。两位作者用这一术语来表明，不平等固然还存在，但只是因为地位(声望)方面的差异，因为此类地位群体所偏好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的差异。阶级不再是塑造一个人的认同的重要因素，扬和威尔莫特对于贝瑟纳公园(Bethnal Green)的研究所例示的那种阶级共同体已是昨日黄花(Young and Willmott 1973)。这些变迁意味着，诉诸阶级来说明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尝试也已经过时了。看起来，阶级确实已经不存在了。

财产所有权

这种巨变的原因之一在于，财产所有权方

面出现了重要的变迁。据称，对于产权的限制现在要宽松得多。这就意味着，在厂商之间出现更多的竞争，因为厂商越多，居于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或管理阶级就越没有机会再生产并传承其特权给自己的下一代。当然，不平等还存在，但在确实出现不平等的地方，也是因为群体未能获致更高的地位而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群体的阶级位置(它们在劳动分工中的位置)。

消费者权力的增长

这些变迁也伴随着消费者权力的增长。在越来越具有竞争性的分化的市场上，厂商不得不更加敏锐地倾听消费者的期望。因此，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权力平衡出现了转换。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低下者，即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所称的“被先天剥夺权利的底层阶级”(ascriptively disprivileged underclass)，其特征就是没有能力参与“地位消费”，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购买轿车、时装、住宅、度假及其他消费商品。

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认为，当代社会确实是分层的，但这种分层是通过文化消费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劳动分工中的阶级位置实现的。他们似乎是要主张，以下两个人之间的差异纯粹是地位问题：一个是来自卢顿的熟练技能型工人，开着一辆福特护卫者(Ford Escort)，住在价值8万到10万英镑的半独立式住宅里，跟旅行社去西班牙做包价旅游；另一位是在牛津剑桥受过教育的律师，居住在汉普斯塔德，开的是奔驰，住的房子价值20万英镑，假期时会去托斯卡纳私人租赁的度假别墅。^①这并不是说这两个人属于不同阶级的成员，完全是风格、品位、地位

^① 卢顿(Luton)：英格兰中南部城市，以汽车工业著称。汉普斯塔德(Hampstead)：伦敦北区上流居住区。托斯卡纳(Tuscany)是意大利地区名，著名的旅游胜地。

(及声望)的问题,而不在于劳动分工中的位置。

全球化的进程

从组织化阶级社会到地位约定论,这种转换被说成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也就是经济、技术和政治等方面的变迁所造成的。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主张,全球化导致了一种新型国际劳动分工,其中的“第一世界”越来越趋向后工业化,标志着过去那个“组织化阶级社会”的体力型工人阶级职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在全球化世界里,民族国家的自给自足性逐渐淡化,无论是对于其人口,还是对于其市场力量,都越来越不能像以往那样统治。分层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但其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国家性的,不如说是全球性的。我们所看到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远比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显著。

“第一世界”社会中的经济组织对于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的依赖已经大大降低。工作对于技术和知识的要求层次越来越高。生产技术反映的正是后福特主义的说明,强调需要一支高度技术化并富有弹性的劳动大军,为小众市场(niche market)生产定制化商品。随着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大军趋于衰落,服务业上升,并转向“知识经济”。

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

这些变迁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如前所述,集体性的基于阶级的共同体业已瓦解。就英国而言,这个过程就是采煤业之类的老旧工业“规模削减”,人口逐渐转向南部更加富庶的地区。地理流动程度加剧,导致了家庭结构方面的变迁,英国的单人家庭比例上升。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提出,在地理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家庭作为阶级再生产之场所的重要性(就像

在扬和威尔莫特的研究中那样)现在已经大大削弱了。

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借鉴了贝克的著述,宣称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个体化”的社会。人们现在不是把自己看作某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而往往是自视为单纯的个体。他们的认同会通过他们的消费模式,以及其种族、性别、年龄或地区/国家认同等因素,越来越受到其地位的影响。

理论而已?

这些主张都是实质性的,但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似乎满足于提出主张,而不带有多少经验论据。他们的书带给读者的几乎都是理论观点。许多社会学家也会同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社会剧变的时期。但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对于这场剧变的描述是否精确呢?

批评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的学者往往会把焦点放在他们界定阶级的方式上。罗丝玛丽·克朗普顿提出,传统的阶级定义往往会忽视性别、种族和地位差异之类的文化因素,而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的定义并无助益,混淆了阶级与地位。约翰·斯科特和莉迪娅·莫里斯也提出,需要区分个体的阶级定位与社会阶级这一集体现象,前者即个体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而通过后者,人们可以表达对于某个群体的归属感,并拥有共享的认同感和价值观。最后这种阶级认识(一种更具有主观性和集体性的认识),在一个特定时间的特定社会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有赖于众多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近些年来,最后这方面的阶级特性似乎也已经衰微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位和分层的文化特性现在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阶级的经济特性毫不重要了。事实上,流动研究和财富

的不平等都表明，情况正好相反。阶级并未死亡——它只是正在变得更加复杂！

资料来源：Abbott (2001)

的人口，例如失业者、学生、囚犯和儿童。失业者和退休者的归类经常以其从前的工作活动为依据，尽管这对于长期失业者或经常打零工的人是很成问题的。学生有时可以根据他们的专业归类，但这只有在研究领域与具体职业紧密相关（比如工程或医学）的情况中才更为适用。

基于职业特性的阶级图式也不能反映财产所有权和财富对于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单单凭职业头衔尚不足以作为衡量个体财富和总资产的指标，对于社会中最富裕的那部分成员来说尤为如此，包括企业家、金融家和“世家”（old rich）。他们的“董事”或“经理”等职业头衔会把他们与那些资产远不如他们的专业人员归为一类。换句话说，从职业范畴得出的阶级图式并没有准确地反映财富在“经济精英”中的高度集中。由于把这种个体与其他上层阶级的专业人员归在一起，因而职业阶级图式减弱了社会分层中产权关系的相对权重。

社会学家约翰·韦斯特加德质疑戈德索普的观点，反对戈德索普所说的富人的数量如此之少，以至于可以把他们从描绘阶级结构的图式中排除掉。韦斯特加德认为：

正是由于权力和特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使这些人登上顶端。他们总体的社会结构分量与他们的人数之少完全不成比例，使得他们居于顶层的这个社会成为一个阶级社会，而无论在他们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区分模式。（Westergaard 1995:127）

问题：

- 1 社会阶级是否像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所主张的那样业已“死亡”？
- 2 你认为自己属于某个阶级的成员吗？如果属于，它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我们已经看到，绘制能够可靠地“描绘”社会的阶级结构的阶级图式，会牵涉到很多复杂因素。即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结构中，要想测定和勾画社会阶级，也是困难重重。而工业社会中发生的迅速的经济变革使得对于阶级的测定更成问题，甚至导致有些人怀疑阶级作为一个概念是否还有效。新的职业范畴不断涌现，形成一个从工业生产向服务型 and 知识型工作的总体转型。并且，在最近几十年，大量的女性加入到劳动力队伍中。职业阶级图式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适应由这些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阶级形成、流动和变迁的动态过程。

第四节 今日西方社会的社会阶级划分

9.4.1 上层阶级的问题

韦斯特加德和戈德索普，谁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否仍然存在一个基于财富和财产所有权的截然不同的上层阶级？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根据戈德索普的建议，更多地探讨一个更广泛的服务阶级？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考察财富和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程度。

关于财富分配的可靠信息是很难获得的。有些国家的统计会比其他国家准确，但是始终会含有大量的猜测。富人们常常不公开他们全部的固定资产。人们常常说，我们对穷人的了解远远超过对富人的了解。可以肯定的是，财

富确实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在英国,1%的顶层人物拥有所有可销售财富的大约23%。人口中10%最富裕的人占有可销售财富总额的一半多,而财富较少的另一半人口只拥有总财富的5%(参见表9.2)。

股票和债券的占有量比总体财富的占有量更不平等。在英国,处在社会顶层的1%人口拥有私人所持企业股票中的大约75%,而顶端5%的人口拥有总量的90%多。不过在这方面,变化也较大。已经有大约25%的人口拥有股票,而在1986年只有14%。在1979年上台的保守党政府推行的私有化运动过程中,很多人首次购买了股票。假如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这一增长甚至更为显著,因为在1979年,仅有5%的人口持有股票。大多数人的持有量较小(按1991年价格计算,其价值不超过1000英镑),而由公司掌握的其他公司的股票即集团

股,则比个人股增长得更快。

所谓“富人”,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也不构成一个静态的类别。个人会遵循不同的途径获得财富或失去财富。有的富人出生于有“祖业”的世家,指财富已是代代相传,十分稳固。其他富人则是靠“白手起家”,从一个比较卑微的起点开始,成功地积聚财富。最富裕的社会成员的生平千差万别。仅次于世家子弟的是音乐和电影明星,运动员,以及那些随着计算机、电信和互联网的发展与兴起而致富的“新贵”的代表。像贫困一样,财富必须结合生命周期的背景来考虑。有些人一夜暴富,但马上又落得个两手空空。另外一些人的资产则是长期稳步累积或减少。

虽然很难收集有关富人的资产和生活的精确信息,但追踪社会中最富裕人群的构成的大致变化还是有可能的。近些年来,英国出现

表 9.2 英国的财富分配,1991年—2002年^a(%)

	1991	1996	2000	2001	2002
可销售财富					
所占有的财富比例 ^b					
最富的1%	17	20	23	22	23
最富的5%	35	40	44	42	43
最富的10%	47	52	56	54	56
最富的25%	71	74	75	72	74
最富的50%	92	93	95	94	94
可销售财富总额(10亿英镑)	1711	2092	3131	3477	3464
可销售财富减去房产价值					
所占有的财富比例 ^b					
最富的1%	29	26	33	34	35
最富的5%	51	49	59	58	62
最富的10%	64	63	73	72	75
最富的25%	80	81	89	88	88
最富的50%	93	94	98	98	98

a:各年度估计值应当谨慎处理,因为有抽样误差和当年具体的死亡趋势。

b:18岁及以上成年人口。

资料来源:Social Trends 35(2004),页80

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首先,“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头讨论的吴拉姆·努恩爵士,似乎在最富裕的个人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2004年,英国大富豪中有超过75%不是靠继承致富,而是靠自力更生。第二,富人行列中的女性尽管仍然比较少,但数量越来越多。1989年,在最富的英国人中只有6名女性。到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78人。第三,近些年来,许多最富裕的社会成员十分年轻,仅有二三十岁。2000年,有17位30岁以下的英国人拥有3000万英镑以上的财富。第四,少数族群,特别是亚裔族群,在超级富翁行列中的人数正在增加(《星期日泰晤士报富人榜》2000年度^①)。最后,英国最富的人中有许多人,包括首富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并非出生于这个国家,但却决定在此定居,原因各种各样,包括对于超级富翁所征收的税率相对较低。根据2004年度的榜单,表9.3列出了英国最富的个人。

虽然富人的组成肯定是变化不定的,但如果认为现在不再有一个可以明确辨认的上层阶级,这种观点是值得追问的。斯科特认为,

当今的上层阶级虽然面目有所改变,但仍维持着显赫的位置(Scott 1991)。他指出有三个独特的群体,在控制大企业并从中获利的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利益格局。大公司里的高级主管并不一定拥有自己所在的公司,但他们常常能够不断积累股份,这样就把他们和老式的企业家与“金融资本家”联结在一起。金融资本家这个范畴包括了经营保险公司、银行、投资基金以及其他作为大集团股东的组织的人。在斯科特看来,这些人就是当今上层阶级的核心。

20世纪80年代鼓励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及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狂潮,带来靠商业和技术进步致富的人进入上层阶级的新浪潮。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家庭手中所持公司股票的增长也扩大了公司所有权的范围。然而,权力和财富集中于上层阶级的状况仍未改变。虽然公司所有权的模式或许比早先更为分散,但能够从股权中大量获利的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既需要上层阶级的概念,也需要专业服务及公务人员

表 9.3 英国十大富豪

	姓名	市值	产业
1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75.00 亿英镑	石油、足球、投资业
2	威斯敏斯特公爵	55.00 亿英镑	房地产
3	汉斯·劳辛一家	50.00 亿英镑	食品包装
4	菲利普·格林	36.10 亿英镑	零售业
5	拉卡什米·马泰	35.00 亿英镑	钢铁
6	理查德·布兰森爵士	26.00 亿英镑	运输业、移动电话
7	克尔斯滕·劳辛与琼·劳辛	25.75 亿英镑	继承、纯种马、投资业
8	埃克尔斯通夫妇	23.23 亿英镑	赛车
9	夏莲娜·卡瓦霍与米歇尔·德·卡瓦霍	22.60 亿英镑	继承、酿酒、银行业
10	大卫·罗本与西蒙·罗本	22.00 亿英镑	房地产、金属贸易

资料来源:《星期日泰晤士报》富人榜 2004 年度

^① 原文如此,但上下文许多地方的资料已经更新为 2004 年度。



当今之世,很少能有人拥有像不久前去世的德文郡公爵^①这样的贵族声望和财富。在这幅照片上,他的爵府庄园大小仆役肃立道旁,向灵柩行注目礼。

阶级的概念。所谓上层阶级,由既拥有财富又拥有权力,并能把他们的特权传给子女的一小部分人组成。上层阶级可以粗略地确定为1%的顶层财富拥有者。该阶级之下就是专业服务与公务人员阶级,如戈德索普所称,由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高级行政人员组成。戈德索普称之为“中间阶级”的那些人或许可以直接称为中产阶级。我们不妨来更细致地谈谈这个阶级。

9.4.2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短语包括许多不同职业中的各色人等,从服务行业里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乃至医疗专业人员。有些论者宁愿讲作为复数的“各中产阶级”,以强调用以概括该阶级成员特征的职业、阶级和地位处境、生活机

会等因素的多样性。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当今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大部分属于中产阶级。这是因为经过20世纪,白领工作比例上升的幅度大大高于蓝领工作(参阅第十八章)。

中产阶级的成员与体力劳动者相比,凭借其教育文凭或技术资格,所占有的位置能够提供物质上和文化上的更多好处。与工人阶级不同,中产阶级的成员为了谋生,可以出卖他们智力上的劳动力以及体力上的劳动力。虽然这种区分有利于粗略地划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但是,职业结构的动态性质,上向社会流动与下向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使得精确地界定中产阶级变得十分困难。

由于其成员多种多样,利益千差万别,中产阶级内部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致的(Butler and Savage 1995)。中产阶级肯定不像工人阶

^① 此处指安德鲁·罗伯特·布克斯顿·卡文迪许(1920—2004),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又译德文希尔公爵,该爵位是英国布朗特和卡文迪许家族封爵头衔。

级那样同质，也不像上层阶级的顶层成员那样，在多数情况中共享相同的社会背景或文化视角。不过，中产阶级的“松散”结合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这是自19世纪早期中产阶级兴起以来它的一贯特征。

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等职业是中产阶级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之所以如此，有几点原因。第一点原因与现代社会中大规模组织的重要性有关（参阅第十六章）。科层制的扩展为雇员在机构环境中工作提供了机会和需求。医生和律师之类的个体在早先很可能是自主经营的，现在则往往在机构环境中工作。第二，专业人员的增加反映了在政府发挥重大作用的经济部门中工作的人数增加。福利国家的出现导致许多执行有关职能的专业的巨大增长，包括社会工作者、教师和卫生保健专家。最后，随着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深化，对法律、金融、会计、技术和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专家服务的需求也持续增长。在这种意义上，专业人员既可以视为现时代的产物，也可以看作是现时代的进化和发展的关键推动者。

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高级行政人员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凭证（credentials），如学位、学历和其他资格证书。整体而言，他们的职业生涯比较安定，并且报酬丰厚。近年来，他们与其他从事更常规性的非体力工作的人的分离可能越来越明显。有些学者已经看到，专业人员和其他高级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一个专门的阶级，即“专业/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Ehrenreich and Ehrenreich 1979）。然而，他们与其他白领工人之间的分化程度似乎既不够深刻也不够明确，尚不足以支撑这样一种观点。

另有一些作者考察了白领专业人员通过哪些方式团结起来，以便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保障高水准的物质报酬和声望。医疗专业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Parry and Parry 1976）。医疗专业中的某些群体，比如医生，成

功地进行了自我组织，以确保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高水平的物质报酬。专业化（professionalism）的三个主要标准保证了这一点的实现：只有那些符合严格的既定标准（专业资格认证）的人，才能进入这项专业；专业协会监督和约束其成员的行为和业绩；只有专业内部的成员才有资格行医的观念被广为接受。通过这些渠道，自我管理的专业协会不但能够把不想要的人排除在专业之外，而且还能提高其成员的市场地位。

9.4.3 工人阶级性质的变迁

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即那些在制造业中工作的蓝领劳动力，人数会变得越来越多。他据此认为，工人阶级将会创造出给社会带来革命性转型的动力。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变得越来越少。仅仅在25年前，还有大约40%的劳动人口从事的是蓝领工作，而今天，在英国，只有18%的人从事蓝领工作，并且这个比例还在下降。此外，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英国社会像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一样，也有相当数量的穷人。然而，大多数从事蓝领职业的人不再生活在贫困之中。如前所述，从20世纪初开始，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可以为所有阶级所获得。目前约有50%的蓝领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大部分家庭都有汽车、洗衣机、电视和电话。

我们将在第十章中更详细地考察这一话题。

工人阶级富裕的现象意味着可能有另一条通往更加“中产阶级的社会”的道路。随着蓝领工人越来越富裕，他们或许会越来越中产阶级化。这个观念用社会学家典型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资产阶级化命题。资产阶级化的意思

是“变得更加具有资产阶级的特性”，是一个马克思式的术语，指的是“变得更加具有中产阶级的特性”。20世纪50年代这个论题第一次提出来时，它的支持者认为，许多蓝领工人挣的薪酬与中产阶级相当，也会采纳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点和生活方式。人们广泛认为，工业社会的进步会对社会分层的形貌产生有力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戈德索普及其同事们进行了一项日后非常有名的研究，以检验资产阶级化的假设。他们在执行这项研究时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化命题能够成立，那么在工作态度、生活方式和政治方面，富裕的蓝领雇员与白领雇员应当没有什么实质分别。该研究是以对卢顿的汽车和化工行业工人的访谈为基础，最后以三卷本出版。人们常称之为“富裕工人”（Affluent Worker）研究（Goldthorpe 1968—1969）。为了便于比较，总共研究了229名体力劳动者和54名白领工人。很多蓝领工人都是为了寻求报酬更高的工作而迁移到那一地区的。与其他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相比，他们的收入其实很高，挣得比绝大多数底层白领工人还多。

戈德索普及其同事集中考察了工人阶级态度的三个方面，发现几乎没有支持资产阶级化命题的证据。就经济观点和工作态度而言，作者们同意，根据其收入和所拥有的消费品，许多工人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然而这种相对的富裕是从福利微薄、升职渺茫、内心几无工作满足感可言的位置上取得的。研究者们发现，富裕工人对于他们的工作持工具性取向：他们视工作作为一种实现目的的方法，而这个目的就是要挣更高的工资。他们从事的工作大多重复机械、枯燥无味，他们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投入。

研究中的工人尽管富裕水平与白领雇员相当，但在休闲时间里则和白领工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不想沿着阶级阶梯向上爬。戈德索普及其同事发现，绝大多数社交发生在家

里，是与直系家庭成员或亲属，或是与其他工人阶级邻居。基本没有迹象表明，工人会趋向中产阶级的规范和价值观。就政治观点而言，研究者们发现，工人阶级的富裕程度与对于保守党的支持之间存在负相关。而支持资产阶级化命题的学者曾经预言，随着工人阶级富裕程度的提高，将会削弱传统上对于工党的支持。

作者们认为，研究得出的结果十分清楚：资产阶级化的命题是错误的。这些工人并未处于变得更加具有中产阶级特性的进程中。然而，戈德索普及其同事确实承认，在底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在某些方面出现混同的可能性。富裕工人与他们的白领同事们共享相同的经济消费模式，以家庭为中心的私人化观念，在工作场所支持工具性集体主义（instrumental collectivism，通过工会采取集体行动，以提高工资和改善条件）。

自那以后的这些年里，没有做过任何可以严格比较的研究。即使戈德索普等人得出的结论在当时是有效的，今天在多大程度上依然有效就不清楚了。人们通常认为，随着制造业的衰退和消费主义的影响，老式的、传统的工人阶级共同体已经趋于分散，甚或完全瓦解。然而，这种分散的进程如何，仍然有待争议。

9.4.4 底层阶级？

底层阶级这个术语经常用来描述处于阶级结构最底层的那部分人口。底层阶级成员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口。这是一个以多重劣势为特征的群体。他们中有很多人长期失业，或者是工作时有时无。有些人是无家可归者，或是没有固定住处。底层阶级的成员可能长期依赖政府的福利救济。底层阶级经常被描写成被“边缘化”或“排斥”，脱离大多数人所维持的生活方式。

底层阶级常常让人联想到处于劣势的少数族群。关于底层阶级的争论大多源于美国，那里大量生活在内城区（inner-city areas）的贫

穷黑人推动了关于“黑人底层阶级”的讨论 (Wilson 1978, Murray 1984, Murray 1990, Lister 1996)。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美国。在英国,黑人和亚裔在底层阶级中所占的比例特别高。在一些欧洲国家,那些在20年前大繁荣时期找到工作的移民工人现在成了这部分人口的主体。例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的情况就是如此。

“底层阶级”这个词聚讼不已,处在一场激烈的社会学争论的核心。尽管这个术语现在已经进入日常用语,但是许多学者和评论家还是对使用它持谨慎态度。这个概念涵盖了广泛的意义,有些含义还带有政治的意味以及负面的内涵。欧洲的研究者大多数宁愿使用“社会排斥”的观念。

第十章第二节详细讨论了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比底层阶级要宽泛,其优点在于强调了过程,也就是排斥的动力机制,而不单单是状态。

底层阶级的概念由来已久。马克思提到过一种“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包括那些始终处于经济生产与交换的主导形式之外的人。后来,这个概念也指所谓“危险阶级”,包括穷人、小偷以及拒绝工作而作为“社会寄生虫”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流浪汉。近些年来,又一次主要归功于查尔斯·莫里的著作,人们重新将底层阶级看作是依赖福利救济、被剥夺了主动性的人。我们下文将讨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一 底层阶级之辩的背景

由美国社会学家出版的有关内城区贫困黑人地位的几本重要著作,推动了晚近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种族意义的衰落》一书中 (Wilson 1978),根据

在芝加哥进行的研究提出,在美国,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黑人中产阶级,即黑人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员。威尔逊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黑人都仍然生活在城市贫民区里。此外,即使仍然生活在那里,与其说是因为受到积极的歧视,不如说是因为经济因素,也就是说,这是由阶级因素而不是由种族因素造成的。昔日的种族主义障碍正在消失。黑人之所以仍然困在贫民区,是由于在经济上处于劣势。

莫里也同意,大部分的大城市都存在黑人底层阶级。然而,根据莫里的观点,恰恰是由于帮助他们改善自身处境的福利政策,美国黑人才发现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这种观点是在重述所谓“贫困文化”的论调。就是说,人们开始依赖福利救济,因此没有多少积极性去主动地找工作,建设坚实的社区,或是建立稳定的婚姻 (Murray 1984)。

第十章第三节第二小节还将进一步讨论福利依赖的观念。

在回应莫里的主张时,威尔逊再一次通过在芝加哥所进行的研究,重复并发展了他以前的观点。他提出,许多白人从城市转移到郊区的趋势,城市工业的衰落,以及其他的城市经济问题,使得美国黑人男性大量失业。至于莫里所指出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解组,包括黑人中高比例的未婚母亲,威尔逊用“能够成家”(有份工作)的男性数量的减少来说明。

在更近期的工作中,威尔逊考察了这类社会过程扮演了何种角色,创造出空间上高度密集的都市贫困地块,聚居着一群所谓的“贫民区穷人”(ghetto poor)。贫民区穷人的成员主要是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墨西哥裔美国人,遭受着多重的剥夺,从教育水准低下、健康水平低下,到犯罪受害率居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薄弱也会给他们带来不利,包括公共交通、社区设施以及教育机构的匮乏,都会进一步减少

他们从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角度融入社会的机会 (Wilson 1999)。^①

二 底层阶级、欧盟与迁移

在美国,关于底层阶级的大多数争论都是围绕着它的族裔维度来展开的。而在欧洲,情况也愈发如此。目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带有美国特性的经济分工与社会排斥的趋势似乎愈加强劲。底层阶级与种族、族群和迁移等问题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伦敦、曼彻斯特、鹿特丹、法兰克福、巴黎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里,都有某些地区显著地表现出严重的经济贫困。如果根据人均收入来衡量,汉堡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并且拥有百万富翁的比例在德国也最高。但是,它的领取福利与失业人口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高于全国水平 40%。

在西欧各国,大多数贫困和失业人口都是本国的居民。但处于贫困的人中也有许多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深陷日趋衰败的城市社区。例如,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人口规模,在这些国家中各自发展壮大。那些移民原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水平而来,却常常屈尊忍辱,从事一些零工,工资不高,也没有什么职业前途。不仅如此,为了资助留在祖国的家庭成员,移民还经常把收入寄回家。新移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会低到危险的程度。

如果家庭成员为了家庭团聚而企图非法移民,就非常有可能产生排斥与边缘化。缺乏合法身份的移民没有资格领取政府的福利救济,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支持,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在遇到危机或不幸的时候,这类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陷于非常受限制的处

境,没有多少求助渠道。

三 英国是否存在一个底层阶级?

莫里在最初关于美国的著述之后,又开始用他的论点来讨论英国 (Murray 1990)。根据他的看法,英国也存在一个底层阶级,尽管尚未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但是正处于迅速“强化”之中 (Murray 1994)。英国的底层阶级不仅会包括少数族群的成员,而且也包括来自于社会解组日益加剧的贫困地区的白人。莫里的作品受到政治右派的欢迎,包括保守党里的许多人士,因此有关他的理论的争论被高度政治化了。

莫里重点研究了三个领域,即失业、犯罪和非婚子女增多,以支撑他关于英国存在一个底层阶级的主张 (Murray 1990; Herrnstein and Murray 1994)。莫里并不认为高失业率本身是个问题。在他看来,问题在于人们(特别是年轻男性)拒绝从事艰苦的工作。他将经历了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大萧条的一代与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失业青年作了对比。老一代人极力想要避免莫里眼中的失业之耻,而眼下这代人可不会这样。其原因就在于福利国家的变相激励,政府向失业者提供了福利,有效地支付了人们可以不去工作。莫里还认为,日益升高的犯罪率也有助于形成一个底层阶级。由于犯罪率居高不下,社区内部存在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陷于瓦解,社区愈益衰弱,更加分裂。

有关犯罪率的更为持中的描绘,参见第十九章。

最后,莫里 1994 年又论述了底层阶级在英国的进一步强化。他在其中指出,最重要的是,非婚子女 (illegitimacy, 婚姻之外出生的

^① 原文如此。在 2001 年英文第四版中确有此文献,为一篇文章,但在 2006 年英文第五版中已经调整为 1996 年的一本书,内容基本一致但更容易找到。

孩子)的比例越来越高,培养出来的孩子没有任何纪律感,没有任何家庭或父亲去控制他们。

第七章讨论了家庭结构的变动,其中第三节第六小节谈到了婚外生育的增长。

莫里又将婚外子女的增多归因于福利国家的变相激励。他指责给予单身母亲的补贴比给家庭的还多,并认为底层阶级的强化可以归因于那些追求这类激励的人不讲道德。

然而,莫里的论述一直受到在英国工作的其他社会学家的严厉批评。绝大多数人拒绝接受底层阶级这个概念,至少不能接受莫里所描述的这种底层阶级概念。社会学家邓肯·加利就提出,所谓拥有一种独特文化的底层阶级的概念根本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分析“社会变迁与经济生活行动”(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所得出的数据,加利认为,就政治观点或工作经历而言,工人阶级个体与长期失业者之间并不存在多少区别。在他看来,长期的失业者可能会经历更为严重的隔离与贫困,但是仍然会认同于广泛的工人阶级。他发现,长期失业的人要比其他人更重视工作的概念(Gallie 1994)。

莫里斯考察了英格兰东北部城市哈特尔浦^①的贫困的空间分布特点。正是在哈特尔浦这样的地区,制造业衰落,同时失业大量增加,才有可能出现底层阶级。然而,莫里斯的研究并没有确定会出现一个独特的底层阶级。据她看来,底层阶级的概念过于简单化(并且政治化),所以不能反映当代社会中的贫困与社会弱势的复杂性。莫里斯研究了三个失业工人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丈夫至少失业12个月的配偶;第二个群体是丈夫至少在过去12个月里从事着同样工作的配偶;第三个群体是丈夫在

最近12个月里开始有新工作的配偶。

就在个体和家庭是否存在可以依赖的支持网络而言,莫里斯发现这三个群体之间没有多少区别。那些失业一年多的人所关心的仍然是找工作。他们并没有产生一种反工作的文化。这些男性之所以有如此处境,是因为该地区经济长期衰退,本人又缺乏熟练技能,再有就是比较缺乏有可能帮助他们寻找当地就业机会的基于工作的非正式接触。然而,莫里斯也确实发现,大多数长期失业人员的伴侣也失业,而且他们拥有失业朋友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不过,她得出的结论仍然是认为,“在我的研究中,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底层阶级’有一种独特的文化”(Morris 1993:410)。

莫里斯的研究决非无可置疑。它只是涉及这个国家的一个地区,而且该地区也是少数民族比例不高的地区。加勒比裔和亚裔男性要比白人男性更多地集中在半熟练技能型工作上,平均失业率也要比白人男性高。

四 评价

我们如何理解对于底层阶级的这些相互对立的研究取向呢?社会学研究是否支持这种理念,认为存在着一个由生活机会相似的弱势人群联合起来的独特阶级?

底层阶级的理念是从美国引进的,并仍然在美国具有最大的意义。美国的贫富悬殊要比西欧明显。尤其是在经济剥夺和社会剥夺与种族区分汇合的地方,处于劣势的群体往往会发现自己被关在更广泛的社会之外。

尽管在这类情形下,底层阶级的概念似乎是有用的,但在欧洲国家,它的用场就很值得质疑了。当欧洲存在类似的劣势处境的时候,这些劣势似乎不如美国那么明显。那些生活在明显被剥夺处境下的人,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并没有达到相同的分离程度。

^①哈特尔浦(Hartlepool)于1835年通铁路后成为重要煤港,后相继发展起钢铁、造船和轮机制造工业。港口现为北海油田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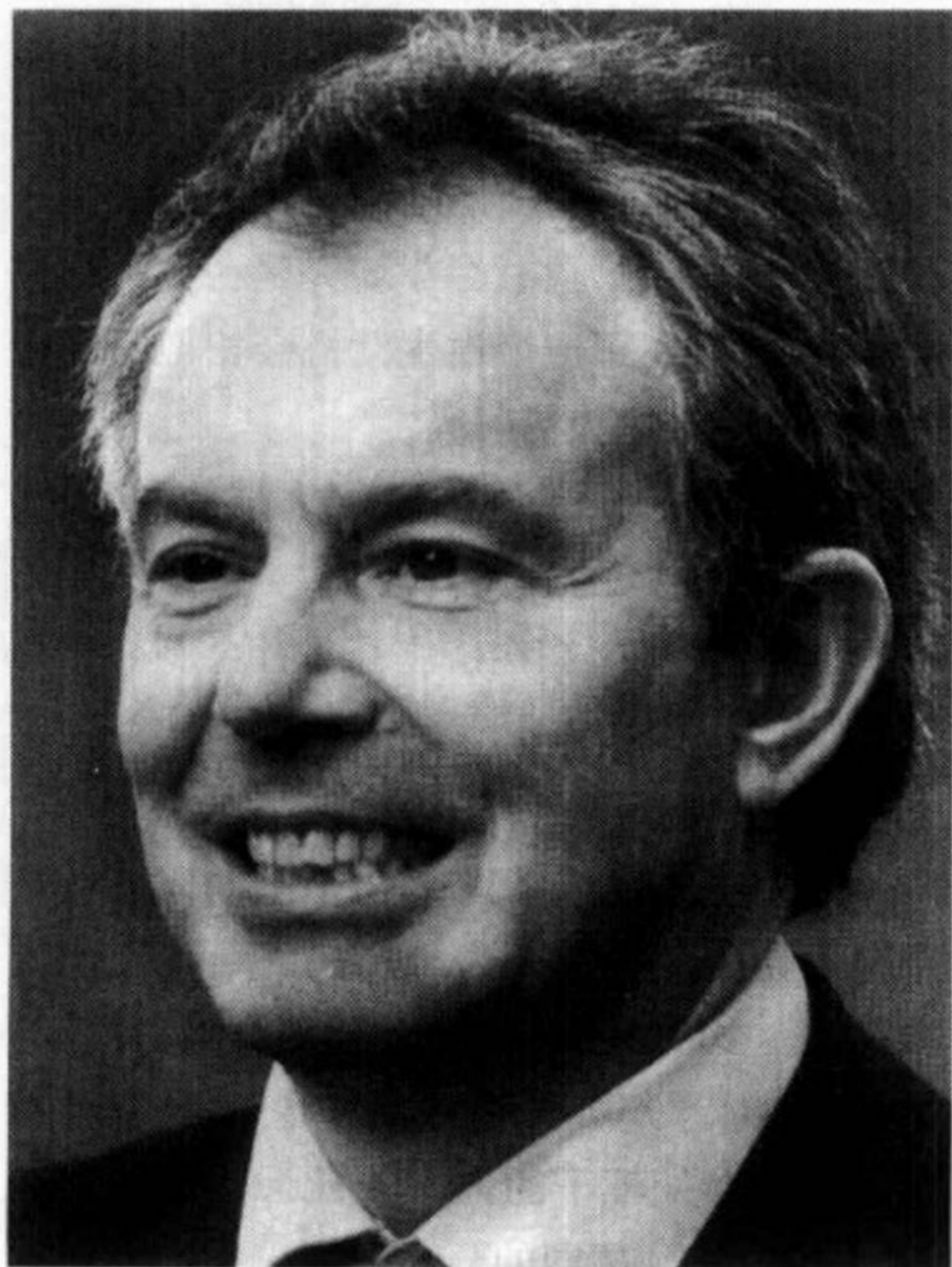
不过,即使是在美国,晚近的研究也已经表明,尽管城市贫民是一个缺乏流动的层级,但要说什么“失败的、断裂的(disconnected)底层阶级”,未免夸大其词。因此,晚近对于快餐业工人和无家可归的街头小贩的研究已经提出,城市贫民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分离并不像研究底层阶级的学者所认为的那么大(参看 Duneier 1999; Newman 2000)。

9.4.5 阶级与生活方式

社会学家在分析阶级定位时,传统上依靠一些习惯上的阶级定位指标,比如市场地位、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职业。然而,近年来有些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单纯依据甚或只是主要依据经济和就业状况来评估一个人的阶级定位,也要考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之类的文化因素。根据这种思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中,与消费相关的“符号”和标志在日常生活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个体的认同在更大的程度上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中心来形塑,例如,穿什么、吃什么、如何照顾自己的身体、到哪里去放松等等,而不再像以前那么以就业之类较为传统的阶级指标为中心。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也认为,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重要的阶级指标。布迪厄提出,经济资本,包括财产、财富和收入等物质资产,固然很重要,但他认为这种资本只能让我们对阶级有部分的理解。布迪厄的社会阶级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参看 Crompton 1993)。他区分了标志阶级定位特征的四种形式的“资本”,而经济资本只是其中的一种,其他资本形式还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Bourdieu 1986)。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因素,而是基于文化资本,包括教育、艺术鉴赏、消费和闲暇嗜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推销各种商品和服务——无论是符号性的还是实



英国是一个能力至上制的社会吗?无论是托尼·布莱尔,还是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上的都是费用高昂的公学和牛津大学。

贝弗莉·斯克格斯论阶级和性别的形成

布迪厄论述阶级的著作(参看本章第四节第五小节)影响深远,已经被许多社会学家用来研究阶级。英国社会学家贝弗莉·斯克格斯在其对于英格兰西北部女性的研究中,借用了布迪厄关于阶级和文化的阐述,来考察阶级和性别的形成。斯克格斯(Skeggs 1997)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跟踪了83位工人阶级女性的生活,她们都曾经在某个时候就读当地一家继续教育学院的护理课程。斯克格斯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发现自己所研究的这些女性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都较低。她们的薪酬都很低,在正规教育方面成就有限,与有权势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关系,在较高的社会阶级看来,她们的地位也较低。斯克格斯认为,自己研究的女性群体当中缺乏各种形式的资本,反映出工人阶级女性在英国普遍缺乏积极的认同。(斯克格斯认为,与此相反,工人阶级男性在获得一种积极的认同时并未遇到同样的困难,这种积极的认同常常是通过参与工会运动而获得的)因此,斯克格斯提出,对于女性来说,被唤作“工人阶级”就等于被标定为肮脏、卑微和危险。

斯克格斯主张,正是这种理论背景,说明了自己研究的女性为什么非常不情愿把自己

描述成工人阶级。她们都很清楚那些针对工人阶级女性的文化嘲弄,像“white stilettos”、“Sharons”、“Traceys”。^①斯克格斯在访谈中发现,女性往往“不认同”把她们视为工人阶级。比如说在讨论性问题的时候,女性会极力避免被指责为“花枝招展”(tarty),以免自己作为年轻待嫁的女人这点儿有限资本也贬值了。在这个群体中很重要的是,她们是具有性的魅力的,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找个男人嫁了”。婚礼和婚姻提供了受到尊敬和承担责任的机会。如果选择一生照料他人,就会强调这些方面的关注:受训成为一个护理,教会女性慈母之道,这样一来,尽管失业,但在经过资格认定之后,仍有可能获得一份值得尊敬的有薪劳动。

虽然这群女性试图不认同将她们视为工人阶级,并且常常认为阶级在她们生活中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斯克格斯认为,对于她们的生活方式,阶级其实是至关重要的,而她们试图与一种工人阶级认同保持距离的努力更加固了这种地位。斯克格斯对于英格兰西北部一群女性的生活的描述揭示了,阶级是如何与其他形式的认同——这个案例中就是性别——密切相关。

质性的——的所谓“需求商人”(need merchants)大量繁生,为个体投入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推波助澜。广告商、专卖商、时装设计师、时尚顾问、装修设计师、个人健身教练、特定疗法专家,网页设计师,如此等等,都影响着一个人日益扩大的消费者社群的文化品位,刺激其生活方式的选择。

布迪厄的阶级分析中社会资本也很重要,

指的是一个人的朋友圈、交往圈。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借助由多少制度化的相互认识和承认的关系组成的一套可持续发展的网络”而获得的资源(Bourdieu 1992)。社会资本的概念是当代社会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而布迪厄对于这个词的讨论标志着该概念发展中的重要一步。现在这个概念常常让人联想到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

^① 这些都是嘲笑埃塞克斯工厂女孩的绰号。

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二小节将讨论
普特南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

最后,布迪厄还提出,包括拥有一份好名声在内的符号资本是社会阶级的最后一项重要指标。符号资本的概念类似于地位。

在布迪厄的阐述中,每一种类型的资本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某种资本就有助于追求其他类型的资本。比如说,一个腰缠万贯(经济资本)的商人或许对于艺术没有什么高雅的品位,但可以付得起钱,让自己的孩子上鼓励这方面追求的私立学校(这样他的孩子就获得了文化资本)。商人的钱可以让他与商界要人建立新的交往关系,而他的孩子也会接触到其他富裕家庭的孩子,这样,他和他的孩子们都会获得社会资本。与此类似,一个交游广泛并且关系稳固(社会资本)的人就有可能在公司里升得很快,并且在高位上应付自如,从而获得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

其他学者也同意布迪厄的说法:阶级区分是与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相联系的。因而,萨维奇等人在谈到中产阶级内部的群体时,以文化品位和“资产”为基础,区分出三个部分。公共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员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但经济资本较低,往往会追求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包括锻炼、较少饮酒、积极参与文化活动和社区活动等。与此相反,管理人员和科层人员代表着“平庸乏味的”^①消费模式,包括不积极锻炼或缺乏锻炼、较少参与文化活动、偏好传统风格的家居和时装。第三组是所谓“后现代派”,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明确原则,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可能是传统上不能兼容的。因而,一个喜欢骑马和古典文学的人,可能同时会迷恋攀岩这样的极限运动,热衷锐舞派对和摇头丸(Savage et al. 1992)。

总之,几乎可以形成定论的是,阶级内部的分层,以及阶级之间的分层,不仅越来越有赖于职业差别,而且也有赖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差别。考察社会的整体趋势,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服务业经济及娱乐休闲产业的快速扩展反映了工业化国家中对于消费的日益强调。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消费社会,以物质产品的获取为驱动力。在某些方面,消费社会就是一种“大众社会”。在这里,阶级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因而,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人完全有可能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或者在同一条商业街的商店里购买衣物。然而,阶级差别也可能通过生活方式和“品位”的差异而得到强化(Bourdieu 1986)。

然而,考虑这些转变的时候,不可能忽略经济因素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基本上,体验到极度的社会剥夺和物质剥夺的个体是不能把这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的。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境况受到与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相关的因素的限制(Crompton 1998)。

9.4.6 性别与分层

多年来,有关分层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性别盲点”。论述起分层来,仿佛女性是不存在的。或者,在研究权力、财富以及声望的区分时,女性好像是不重要的,或是没有分析的价值。然而,性别本身却是分层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范例。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所有社会的男性都比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

研究现代社会中的性别与分层,提出的重大问题中有一条听起来简单,但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主要依据阶级区分来理解性别的不

^① 原文为“undistinctive”,即千篇一律的,不出彩的,也就是没有区隔(distinction)的。

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不平等是否趋于衰落?

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晚近之前,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体制都越来越向阶级之间的运动开放,从而降低了不平等的程度。1955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提出了一项假设,此后被称为库兹涅茨曲线:这个公式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平等增长,然后消减,最终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Kuznets 1955;亦参图 9.1)。对于欧洲各国、美国 and 加拿大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高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消减,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大体平稳(Berger 1986;Nielsen 1994)。二战以后不平等趋于下降,其原因部分在于工业社会中的经济扩张,这为处在底层的人们创造了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是因为政府健康保险、福利及其他旨在减少不平等的计划的效果。尽管如此,库兹涅茨的预测很可能证明只适用于工业社会。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后工业社会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兴起已经带来了不平等的增长(参见第十章),对库兹涅茨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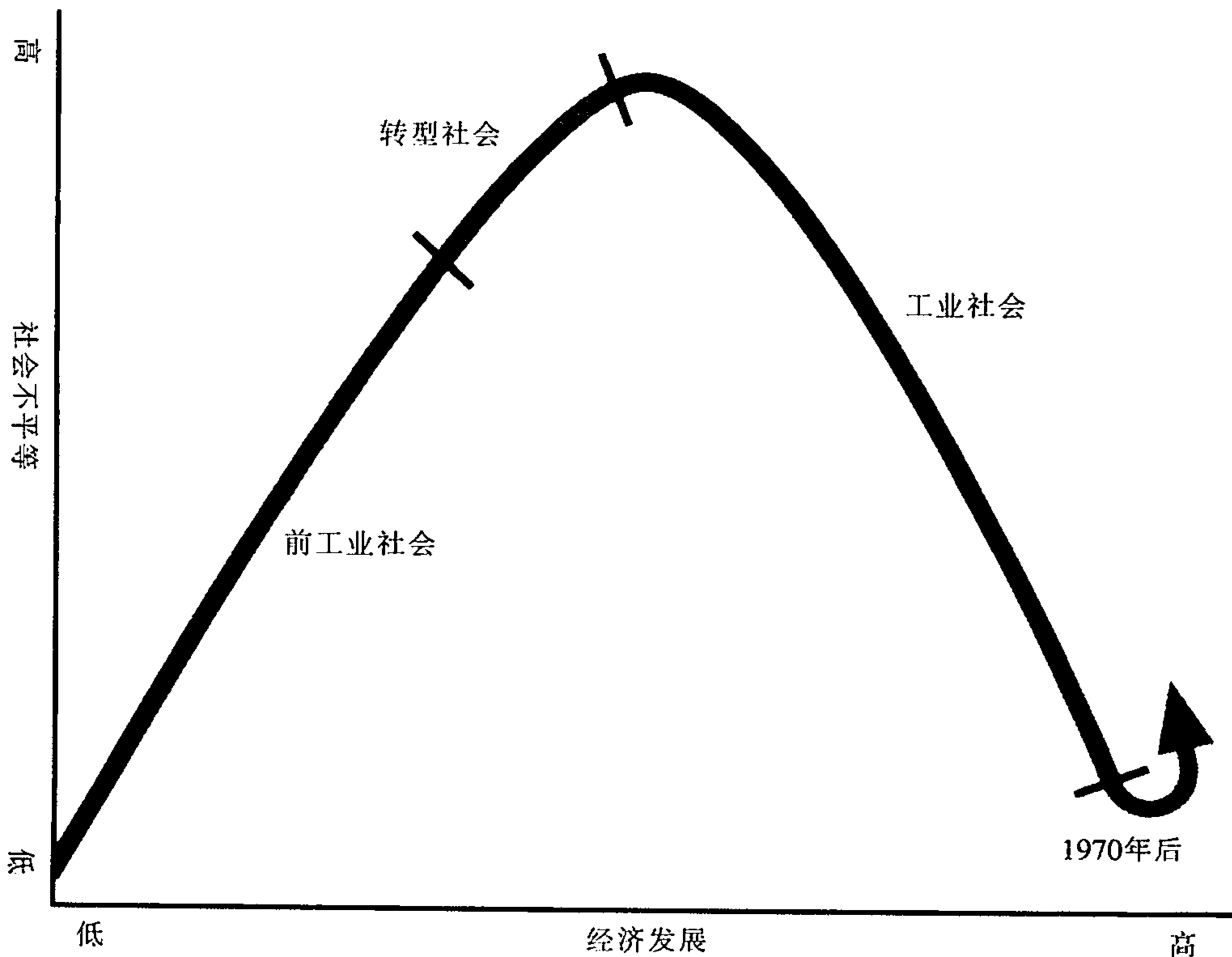


图 9.1 库兹涅茨曲线

资料来源: Nielsen (1994), 页 654—677

平等。与阶级体制相比,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更为悠久。甚至在不存在阶级的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男性就拥有超越于女性之上的地位。然而,阶级区分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们与性别不平等无疑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大多数女性的物质定位往往反映出她们的父亲或者丈夫的定位,因此可以说,我们必须主要从阶级的角度来说明性别不平等。

一 确定女性的阶级定位

长期以来,那种认为阶级不平等在相当程度上主导性别区分的观点常常是一种未曾明言的假设。但是,女性主义者的评论,以及许多西方社会中女性经济地位无可否认的变化,已经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公开争论的话题。

阶级分析中的所谓“约定地位”(conventional position),指的是女性的有薪劳动与男性相比显得不太重要,因此可以把女性看作与其丈夫处于同一阶级(Goldthorpe 1983)。戈德索普自己的阶级图式最初就是基于这种观点建立的,按照他的看法,这种观念并不是以有关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相反,它认识到,绝大多数女性发现自己在劳动大军中处在从属的地位。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从事非全日制的工作,而且由于要花很长时间回家生育和照顾孩子,所以她们的有薪就业常常是断断续续的(参看第十八章)。由于大多数女性传统上在经济方面依赖于丈夫,因此,她们的阶级定位常常取决于丈夫的阶级处境。

可以从几个方面对戈德索普的观点进行批评。第一,在相当比例的家庭中,女性的收入是维持其家庭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关键。在这类情形下,女性的有薪就业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阶级地位。第二,妻子的就业有时候可能确定了整个家庭的定位标准。即使一位女性所挣的钱少于她的丈夫,但她的工作处境可能还是影响她丈夫所属阶级的“首要”因素。例如,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丈夫是非熟练技能型或半熟练技能型蓝领工人,而妻子则可能



基于一名妇女的丈夫所属阶级来评估她本人的阶级位置,这种做法已经受到批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在经济上依赖丈夫,这只是传统上往往如此。

是商店的经理。第三,只要有“跨阶级的”(cross-class)家庭存在,即丈夫与妻子所从事的职业分别属于不同范畴,那么就会出于某些原因,认为更符合现实的做法是把男性和女性看作是处于不同的阶级位置,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第四,女性是唯一挣钱养家者的家庭比例不断上升。单身母亲和没有子女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就证明了这个事实。这些女性从定义上说就决定了自己所在家庭的阶级地位,除非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女性得到了与前夫处于同一经济水准上的赡养费(Stanworth 1984; Walby 1986)。

戈德索普等人一直为约定地位进行辩护,但他的图式中还是融入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用较高阶级的伴侣一方来归类整个家庭,不管这一方是男性还是女性。现在决定家庭的分类的,是“主导的挣钱养家者”,而不是“男性挣钱养家者”。此外,为了反映女性在低级白领工作中所占的优势,戈德索普的图式中的阶级三被分成两个子类。当图式应用于女性时,阶级三b(销售和服务方面的非体力劳动者)被当作阶级七对待。这

被看作是更准确地反映了在劳动力市场中从事非熟练技能型和半熟练技能型工作的女性的地位。

二 超越家户?

随着有关阶级地位归类的争论的进一步深入,有些学者提出,在决定个体的阶级地位时,不应该考虑家户因素。换句话说,社会阶级应该基于个体独立从事的职业来评估,不需要特别参考其家庭环境。例如,戈登·马歇尔及其同事对英国阶级体制的研究就采取了这种思路(Marshall 1988)。

然而这种视角也遇到了问题。它没有考虑那些未参加有薪就业的人,不仅包括全职家庭主妇,还包括退休者和失业者。后面这两类人可以根据其此前最后的职业加以归类,但是如果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这就很成问题了。而且,这似乎有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人们完全忽视家户。个体是单身还是有伴侣,也会造成他们所面临的机会的极大差别。

三 女性就业对阶级划分的影响

女性进入有薪就业对家庭收入有显著影响,但对于这种影响的体验是不均衡的,并且有可能导致加剧家户之间的阶级区分。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专业性和管理性职位并赚取高薪。这种情况导致了某种两极分化,一端是高收入的“两人挣钱家庭”,另一端是“一人挣钱”或“没人挣钱”的家庭(参看第十八章)。

研究显示,收入高的女性往往有高收入的伴侣。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妻子们的收入高于其他职业女性伴侣。婚姻往往会产生两个人在职业成就方面都比较居于优势或劣势的伴侣关系(Bonney 1992)。

平均育龄提高的事实加剧了这种两人挣钱伴侣关系的影响,在职业女性当中尤其如此。两人挣钱却没有小孩的夫妇人数不断增加,也助长了最高薪酬家庭和最低薪酬家庭之

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第五节 社会流动

在研究分层时,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地位或职业之间的差别,而且还要考虑在占据了这些地位的个体身上所发生的事。“社会流动”一词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运动。垂直流动的意思是社会经济层级之间的上下运动。那些获得财产、收入或地位的人,可以说是上向流动的(upwardly mobile),比如吴拉姆·努恩爵士,本章开头概述了他的传奇一生。而那些向相反方向移动的人则是下向流动的(downwardly mobile)。在现代社会里,还有大量的水平流动,这是指不同社区、城镇或区域之间的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例如,在某个城市某个公司工作的人可能被提升到另一个城镇甚至另一个国家的分公司担任更高的职位。

研究社会流动有两种途径。第一,我们可以考察个体自身的职业生涯,看一看他们在工作期间在社会层级上向下或向上移动的程度。这通常被称为代内流动。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分析子女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与其父母或祖父母同一类型的职业。代与代之间的流动被称为代际流动。

9.5.1 流动的比较研究

一个社会的垂直流动量是衡量其“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它表明社会中有多少出身低微却富有才华的人能够沿着社会经济阶梯向上爬。在这方面,特别是在信奉所有公民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观点的国家,社会流动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工业化国家中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究竟如何呢?英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平等吗?

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已经开展了 50 多

年,并经常涉及国际性的比较研究。一项早期的重要研究是由彼得·布劳和奥蒂斯·达德利·邓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Blau and Duncan 1967)。他们的研究至今仍是一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最详尽的一次调查。(尽管这次研究也是涉及广泛,但和其他绝大多数社会流动研究一样,持有前文所述的一种立场:所有的被研究对象都是男性)布劳和邓肯基于全国2万名男子的样本,收集了大量信息。他们的结论是:美国有很多垂直流动,但是,几乎所有这些流动都发生在极为接近的职业位置之间。所发现的“大幅流动”很少。尽管在个体的职业生涯与代际流动中都确实发现有下向流动,但比上向流动要少得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白领和专业性的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蓝领工作岗位,这个转变为蓝领工人的子弟进入白领工作开辟了道路。布劳和邓肯强调教育和培训对于个体赢得成功机会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上向社会流动一般是整个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合。

有关社会流动的国际研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和莱因哈德·本迪克斯所做的研究(Lipset and Bendix 1959)。他们分析了英国、法国、西德、瑞典、瑞士、日本、丹麦、意大利和美国等9个工业化社会的数据,并集中探讨男性从蓝领工作向白领工作的流动。与他们的预期相反,他们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比欧洲各社会更为开放。跨越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垂直流动的总量,在美国为30%,而在其他社会则从27%至31%不等。李普塞特和本迪克斯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白领工作岗位扩张方面的同样的变迁。这就导致所有社会在可比较的方面出现“上向流动潮”。其他学者对他们的发现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进一步考虑下向流动,如果也能考虑大幅流动,就会发现各个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异(Heath 1981; Grusky and Hauser 1984)。

绝大多数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例如上述

这些研究,都以流动的“客观”维度为重点,也就是说,大概有多少流动存在,以什么方向流动,涉及人口的哪一部分。戈登·马歇尔和大卫·弗思(Marshall and Firth 1999)在他们关于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采取了不同的思路,调查了人们对于改变中的阶级地位的“主观”感受。两位作者在设计此项研究时,针对了他们所称的社会学家当中“未经证实的推测”,即关于社会流动对个体幸福感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虽然有些人认为社会流动产生了失衡感、隔绝感和漂泊感,但其他人的态度更为乐观,认为适应新阶级的渐进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马歇尔和弗思运用了来自包括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德国、波兰、俄罗斯、斯洛文尼亚、美国 and 英国在内的10个国家的调查资料,考察了阶级流动是否与对家庭、社区、工作、收入以及政治等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满意感或不满意感的加剧有关。作者们发现,基本上没有找到多少证据证明,被访者的阶级体验与其总体上的生活满意度有关。不仅那些从工人阶级出身而进入中产阶级位置的人如此,下向流动的人也是如此。

9.5.2 下向流动

尽管下向流动不如上向流动那样普遍,但它仍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现象。代内的下向流动也很普遍。这种流动经常会带来心理问题和焦虑。这是因为个体发现自己不能维持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被解雇是下向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失去工作的中年人要么很难找到新的工作,要么只能找到比以前收入低的工作。

长期以来,人们很少研究英国的下向流动现象。然而,无论是就代内还是代际而言,英国与美国的情况一样,下向流动或许都在不断增加。在美国,最近出现了对于这一现象的几项研究。从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自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中层白领岗

位的平均实际收入(扣除通胀因素后的所得)整体下降的现象。因此,即使这类岗位相对于其他工作类型仍在不断扩张,但它们也许并不能支撑曾经可以实现的那种生活方式期望。

公司重组与“压缩规模”是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许多公司一直在裁员。白领工作和全职蓝领工作都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薪酬微薄的兼职工作。

有研究表明,在美国,带有孩子的离异或分居女性中,下向流动的现象特别普遍。结婚时享受相对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女性,离婚后经常发现她们只能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许多案例中的赡养费都是很少甚或根本没有。那些挣扎于工作、抚养孩子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女性,会发现难以维持收支平衡(Schwarz and Volgy 1992)。

9.5.3 英国的社会流动

在二战以后的英国,对于整体流动水平有着广泛的研究,尽管说几乎所有这类研究仍然是以男性为重点。一项早期研究是由大卫·格拉斯指导的(Glass 1954)。格拉斯的著作分析了截止到20世纪50年代的长时期的代际流动。他的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国际数据一致(大约30%流动是从蓝领岗位到白领岗位)。事实上,那些做国际比较的学者广泛借鉴了格拉斯的研究。总的来说,格拉斯认为英国不是一个特别“开放”的社会。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流动,但其中大多是小幅流动。上向流动比下向流动多得多,而且大多集中在阶级结构的中间层次。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往往保持不变。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子弟有将近50%仍然从事与其父辈相同的职业。格拉斯还发现,这一人群中相当比例是通过“自聘”的方法进入社会的精英地位的。

另一项研究是由戈德索普及其同事基于1972年的一项调查做的,被称为“牛津流动研究”(Oxford Mobility Study, Goldthorpe et al. 1980)他们试图了解,自格拉斯的研究之后,

社会流动的模式发生了多大变化。他们的结论是:男性流动的整体水平实际上比以前要高,并且注意到了更多的大幅流动。然而,导致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同样不是职业体系变得更加平均主义化。变迁的根源在于比蓝领工作更高的白领工作数量的增长在不断加快。研究者们发现,非熟练技能型和半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二同样从事体力劳动。大约30%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工人阶级出身,而只有4%的男性蓝领工人出身于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家庭。

尽管发现了绝对社会流动比率提高的证据,但“牛津流动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英国人口中不同人群流动的相对机会仍然非常不平等,并且这种机会不平等主要源于阶级结构。

基于10年之后新收集到的材料,最初的牛津流动研究后来又做了更新(Goldthorpe and Payne 1986)。研究证实了前期工作的主要发现,但也有某些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出生于蓝领家庭的男性获得专业岗位或管理职位的机会已经增多。同样,这也要归结于职业结构的改变。相对于较为高级的白领工作而言,蓝领职业已经削减。

马歇尔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戈德索普及其他人的发现。在“埃塞克斯流动研究”(Essex Mobility Study)中,作者们发现大约有一三分之一的高级白领或专业人员出身于蓝领家庭。这样的发现证明,在英国社会,确实存在大量的流动。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论就代内流动还是就代际流动而言,个体的确可以在社会等级序列上往上爬。但是,流动的层级仍然对女性不利。因为女性大都从事常规的非体力劳动,所以她们流动的机会受到阻碍。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主要源于其向高职位移动的趋势。马歇尔及其同事得出结论:“越来越多的‘顶层空间’并不是按照机会均等的原则获得。”(Marshall 1988, 页138)。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前面提到的一点:流动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单单一代人还看不出其完全

性别与社会流动

虽然如此多的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都集中于男性,但近些年来,对于女性的流动模式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当女孩在学校里“表现好于”男孩,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超过男性时,人们不免会认为,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已经不那么严重(有关这一点,详参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一小节)。是职业结构已经变得对女性更加“开放”了,还是她们流动的机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家庭和社会背景所主导?

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最近开展的一项同期群研究“20岁:20世纪90年代掠影”(Twenty-Something in the 1990s),追踪了9000名在1970年同一星期内出生的英国人的生活。在最近一次对被访者的调查中,被访者的年龄已是26岁。结果发现,无论男女,家庭背景和阶级出身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最成功地应付了进入成年期的过渡的年轻人,一般获得了较好的教育,推迟了婚育年龄,父亲从事专业性职业。来自不利背景的人更可能还是处于不利的境地。

研究发现,总的来说,目前的女性获得的机会比相应的前一代女性多得多。中产阶级女性从上述转型中获益最多:她们进入大学和毕业后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与其男性同龄人差不多。她们与12年前出生的类似一群女性同期群相比,变得更加自信,更加自尊,也反映出这一更为平等的趋势。

尽管女性进入理想职业生涯的机会在增多,但仍然面临两大主要障碍。男性的管理人员和雇主仍然歧视女性求职者。他们这样做,至少是因为他们相信“女性对职业生涯并不是真正感兴趣”。一旦她们有了家庭,便很可能离开工作岗位。此外,养育孩子确实仍然对女性的事业机会产生重要影响。这倒不是因为孩子减少了她们对职业的兴趣,而是因为她们必须在工作发展和抚育孩子之间做出抉择。男性很少愿意承担全部家务和照看孩子的责任。尽管为了追求事业,现在有更多的女性开始有权安排家庭生活,但是她们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障碍。

的效应。

尽管如此,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布兰登、阿利沙·古德曼、保罗·格雷格和斯蒂芬·梅钦等人2002年出版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上述进程正在出现逆转。他们比较了英国两个群体的代际流动。其一都出生在1958年3月,其二都出生在1970年4月。虽然这两个群体在年龄上仅仅相差12岁,但研究揭示,从第一个群体到第二个群体,经济地位方面的代际流动出现了显著下降。研究发现,与1958年出生的那个群体相比,1970年出生的群体的经济地位与其父母所处经济地位的关联要强得多。作者们认为,从第一个群体到第二个群体的代际

流动下降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的教育成就的提升,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的裨益要大于不那么富裕的家庭的孩子。

9.5.4 英国是否属于能力至上制的社会?

彼得·桑德斯(Saunders 1990,1996)是英国的社会流动研究传统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这种传统包括了格拉斯和戈德索普之类的研究。在桑德斯看来,英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能力至上制的社会,因为回报自然地给予了那些“表

现”和成就最好的人。他认为,职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能力和努力,而不是阶级背景。桑德斯运用了“全国儿童发展研究”(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的经验数据来证明,聪明与刻苦的孩子无论会体验到什么样的社会优势或劣势,都将取得成功。在他眼里,英国可能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却是一个公正的社会。

针对这些论点,理查德·布林和戈德索普从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批评了桑德斯(Breen and Goldthorpe 1999)。他们指责桑德斯在分析调查数据时带有偏见,比如排除了失业的被调查者。布林和戈德索普对桑德斯使用的同一数据作了另一种分析,得到的结果非常不同,证实了他们自己所坚信的阶级壁垒对于社会流动很是重要。作者们的结论是:个体的优点在决定其阶级地位方面固然是一个有用的因素,但“阶级出身”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布林和戈德索普认为,为了获得相同的阶级地位,来自不利背景的孩子必须比来自有利背景的孩子显示出更多的优点。

小结:阶级的重要性

虽然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就人们的认同而

言,阶级的传统影响力确实减弱了,但是,阶级划分仍然是现代社会中核心的经济不平等的关键。阶级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并且阶级成员资格涉及一系列的不平等,从预期寿命和整体健康状况,到获得教育和高报酬工作的渠道。

在过去的30年,英国的贫富之间的不平等加剧了。趋于恶化的阶级不平等是否属于保障经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假设在1979年之后的撒切尔政府时代特别盛行。理由是对财富的追求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鼓励革新和奋斗的动力。但许多人认为,当今之世,全球化和对于经济市场的放权正在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级不平等的“固化”。

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行动从来不是完全由阶级区分所决定的,很多人都会经历社会流动。我们在本章开头已经介绍了企业家吴拉姆的传奇人生,这就是社会流动的一个特别生动的例证。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获得职业资格的渠道不断增加,以及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兴起等等,都成为上向流动的新型重要渠道。这些发展进一步瓦解了旧的阶级与分层模式,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也更符合能人治理的秩序。

本章要点

- 1 社会分层是指社会分割成一些层次或层级。当我们谈论社会分层时,强调的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不平等。各个社会都存在按年龄和性别的分层。在较大的传统社会以及当今工业化国家中,都存在着财富、财产以及物质和文化产品获取等方面的分层。
- 2 分层体制可以分为四类:奴隶制、种姓制、等级制和阶级制。前三种制度是受到法律或宗教认可的不平等。阶级划分则不是“官方”认可的,

而是源于各种影响人们生活的物质环境的经济因素。

- 3 最令人瞩目、最具影响力的分层理论是由马克思和韦伯提出的。马克思主要强调阶级,认为阶级是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客观给定的特性。他发现,在资本所有者和不拥有资本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韦伯接受了相似的观点,但又区分出分层的其他两个方面,即地位和党派。地位是指个体或群体被赋予的赞赏或“社会尊崇”;党派是指为达到特定目标而积极动员的团体。

- 4 职业经常被用作区分社会阶级的指标。职业相同的个体往往体验到程度相似的社会优势或劣势,享受着类似的生活机会。社会学家传统上使用职业阶级图式来勾画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图式对于勾勒广阔的基于阶级的不平等和模式是有价值的,但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却很有限。例如,很难把阶级图式用于经济上不活跃的人口,也不能反映财产所有权和财富对于社会阶级的重要性。
- 5 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比前几代人都更加富裕,但财富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上层阶级由一小批既有财富又有权力的人所组成,并且他们有机会把特权传给下一代。富人是一个多样化的并且多变的群体。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女性和年轻人进入了富人的行列。
- 6 中产阶级主要由从事白领职业的人组成,比如教师、专业医务人员和专业服务行业中的雇员。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中产阶级现在都占人口的大多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专业性、管理性和行政性职业的增加所致。中产阶级的成员与工人阶级不同,通常拥有相当的教育文凭或技术资格,使他们能够同时出卖自己的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求谋生。
- 7 工人阶级是由从事蓝领工作或体力劳动的人所组成。随着制造业的衰落,工人阶级在 20 世纪大大减少了。工人阶级的成员比 100 年前富裕得多。
- 8 底层阶级是人口中的一个部分,生活在极其劣势的处境中,位于社会的边缘。底层阶级的观念最初是在美国提出来的,用来描述都市区域中贫穷的少数族群的定位。尽管底层阶级的观念已经用到英国,但这个概念或许在美国的背景下更为有用,那里的被严重剥夺的人群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分隔要更大。不过,即使是在美国,这也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
- 9 近来有一些作者认为,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这类文化因素对于阶级地位发挥着重要影响。根据这种观点,个体认同现在更多的是围绕生活风格的选择而形成结构的,而不再以职业这类传统阶级指标为核心。
- 10 分析分层传统上主要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假定,性别不平等不过是反映了阶级差异。这种假设受到很大的质疑。在现代社会,性别对分层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阶级的。
- 11 个体的阶级地位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获致的,而不是出生伊始就“注定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包括在阶级结构中的上向移动和下向移动。
- 12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人们区分了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前者是指个体在就业生涯中,在社会层次上的上向或下向移动。后者是指代与代之间的移动,比如蓝领家庭出身的子女成为专业人员。大部分的社会流动范围有限。尽管近几十年来,白领岗位的扩张提供了小幅上向流动的大量机会,但大多数人基本还是维持在与其出身家庭的地位相近的位置上。
- 13 社会资本指的是使人们能够彼此协作、互惠互利、扩大影响的那些知识与联系。有些社会科学家提出,在 20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社会资本在美国已经衰落了,并担心这个过程标示着美国公民参与的衰落。

思考建议

1. 分层的哪种理论思路看起来最切合你的日常经验?
2. 为什么如此多的社会学家使用职业作为社会阶级的测度?
3. 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更常见的是上向流动而不是下向流动?
4. 社会学家所谓的“关系型”阶级图式指的是什么?
5. 个体和家庭, 哪一个为阶级分析的适宜单位?
6. 如果人人都能丰衣足食, 那么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是一件坏事情吗?

阅读指南

- Rosemary Crompton,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Debat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阶级与分层: 当代论争初探》
- Michael Lavalette and Gerry Mooney (eds),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Welfare* 《阶级斗争与社会福利》
- Charles Murray et al., *Charles Murray and the Underclass: The Developing Debate* (London: 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unday Times, 1996). 《莫里与底层阶级论争》
- Sally R. Munt (e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Cassell, 2000). 《文化研究与工人阶级》
- Christine Zmroczek and Pat Mahony (eds), *Women and Social Clas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UCL Press, 1999). 《女性与社会阶级: 女性主义视角的国际讨论》

网络导航

社会阶级研究文献 (阿姆斯特丹大学) (Bibliography on social clas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http://www.pscw.uva.nl/sociosite/CLASS/bibA.html>

社会不平等研究 (Explorations in Social Inequalities)
<http://www.trinity.edu/mkearl/strat.html>

马克思主义者网络文库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http://www.marxists.org>

肯尼迪政府学院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跨学科培养项目 (Multidisciplinary Program in Inequality and Social Policy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ttp://www.ksg.harvard.edu/inequality/>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00 年各国发展报告 <http://www.unicef.org/pon00/>
<http://www.unicef.org/pon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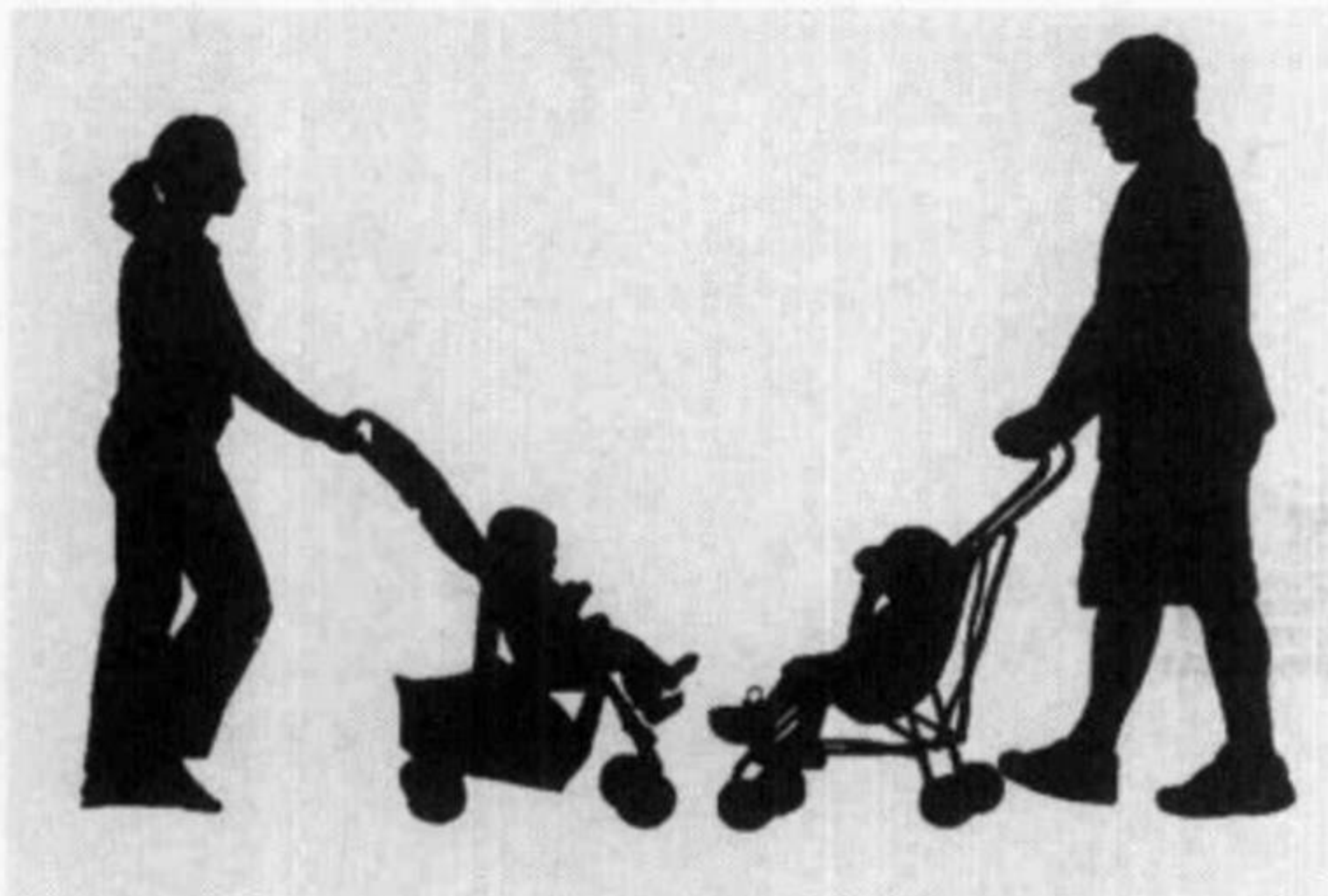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节 贫困	281
10.1.1 何谓贫困?	281
10.1.2 贫困的测定	282
10.1.3 谁是穷人?	287
10.1.4 贫困的说明	289
10.1.5 贫困与社会流动	291
第二节 社会排斥	292
10.2.1 何谓社会排斥?	292
10.2.2 社会排斥的实例	295
10.2.3 犯罪与社会排斥	298
第三节 福利国家	300
10.3.1 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	300
10.3.2 福利国家在英国	301
小结:变迁世界中的贫困与福利	308
本章要点	310
思考建议	311
阅读指南	311
网络导航	311



第十章

贫困、社会排斥与福利



卡罗尔^①是一位 24 岁的女性。她在一个电话呼叫中心工作，任务是给想通过电话安排旅行的人提供信息与客户服务。她上班时间很长，经常工作到很晚。在这个呼叫中心里与她一起工作的都是女性。在一间大屋子里，她们坐成一长列，彼此间用灰色的隔板隔开。这些女性一边从面前的计算机终端输入与检索信息，一边对着头戴式受话器说话。

像许多同事一样，卡罗尔是一个单身母亲。她以自己微薄的工资抚养着她的两个小孩。大多数月份她都会从前夫那里得到少量的儿童赡养费，但是这似乎从来也不足以支付所有的花销。她花大量时间和儿童援助机构沟通，争取保障正常的费用给付。卡罗尔很少能够省下钱来。每周有三个上午，她从事一份副业，在她公寓附近的一所办公楼里当清洁工。从这份兼职中获得的报酬使她能够及时地支付大部分的账单，给孩子买衣服，偿付装修公寓时贷的款，并且支付照顾孩子的费用。作为一个政府廉租房的住户，一位单身母亲，一个低收入者，卡罗尔还能获得一份救济金，这也弥补了她的收入。但是，尽管有这些所得，尽管超时工作，卡罗尔每个月还是要勉力入为出。她的主要目标就是攒够钱，使自己和孩子们能够搬出位于住宅小区里的政府廉租公寓，搬到一个更安全、更理想的地区。

每当卡罗尔在呼叫中心工作到很晚才下班时，她就不得不从工作场所赶到她母亲那里接两

个孩子。每天下午日托中心下班后，由她母亲负责照顾他们。因为卡罗尔上班通勤的公共汽车常常不能按时到达，所以她常常迟到。如果她走运，孩子们一回到家就会睡觉。但是很多晚上，让他们上床睡觉要费好大的劲儿。等到孩子们睡着以后，卡罗尔已经困乏不堪，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她没有多少时间去买食品或者做一顿像样的饭菜，因而她和孩子们只好吃大量的速冻食品。她大部分的购物都是在最近的一家廉价超市，但来回仍然需要坐公共汽车，提着大包小包，走路煞是艰难。等到把东西拎回家，她通常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她知道更加均衡的饮食对她的一家有益，但是廉租小区附近没有商店。即使有，她也无力承担购买许多新鲜食品的费用。



① 耐人寻味的是，卡罗尔(Carol)是一个男女皆用的名字，意思是“男子气概的”。

卡罗尔也担心照顾孩子的时间太少,但她看不到任何解决目前困境的途径。与丈夫离婚后,她先是与孩子们在家里呆了一年半,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尽管为了应付目前的处境,她不得不拼命工作,但她仍然不想依靠救济。卡罗尔希望在呼叫中心工作若干年后,她能够晋升到一个更加重要、报酬更好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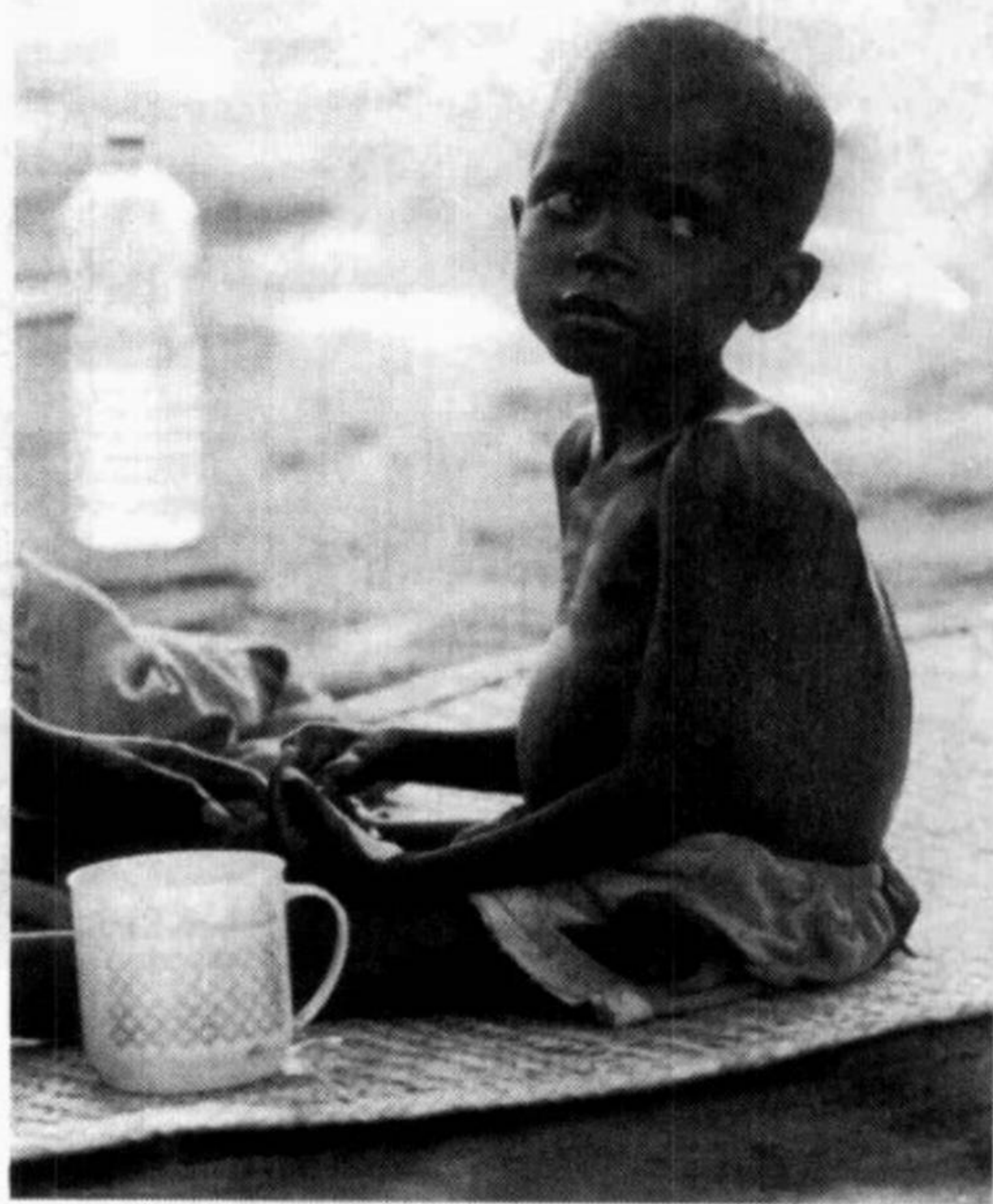
遇到类似卡罗尔这种情况的人时,许多人可能会对她的生活做出某种假设。他们可能断定,卡罗尔的在社会中的贫困以及卑微是她本身的能力所造成的,或者说是她自己的个人教育的结果。还有人可能会责备卡罗尔没有足够努力地工作以克服她的困难局面。社会学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这些观点中哪一种最准确?社会学的工作就是分析这些假设,发展出一种更加开阔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社会,以便理解卡罗尔这类人的体验。

卡罗尔和她的孩子只是英国许多处于贫困中的家庭的一个例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看法,在发达世界中,英国是贫困状况最突出的国家之一。许多人都会为英国的这种相互矛盾的特征而感到震惊。比较富裕的人经常对在他们中间存在的贫困程度知之甚少。本章中我们将更加细致地考察贫困的概念与体验。我们还将讨论社会排斥这个更宽泛的概念。在最后一节,我们将谈谈福利国家是如何为了应对贫困而发展起来的,并将探讨晚近一些改革福利国家的尝试。(本章将集中考察英国的贫困,第十一章将结合全球背景来谈贫困和不平等的话题)。

第一节 贫困

10.1.1 何谓贫困?

贫困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社会学家与研究人员偏爱两种不同的研究贫困的思路:绝



谁是穷人?是难民营中的这个孩子……

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概念以维持生存(subsistence)的观念为基础,指为了维持身体的健康存在而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缺少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例如充足的食物、住房以及衣服,这样的人就生活在贫困之中。绝对贫困的概念被视为是普遍适用的。人们认为,所有年龄相似、体格相仿的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人类生存的标准基本上应该是一样的。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如果其生活低于这个普适标准的话,就可以说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将会看到,当今世上的许多人仍然终生处在绝对贫困之中。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有可能确定这样一种标准。他们提出,使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更加合适,也就是把贫困与在一个特定社会中通行的整体生活水平相联系。倡导相对贫困概念的人认为,贫困要从文化上来定义,而不应该根据某些普遍的剥夺标准来测度。不能错误地假定每个地方的人类需要都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它们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和不同社



还是废弃房子里的这些孩子？

会之间都会不同。在一个社会被看作是必需品的东西,在另一个社会可能就是奢侈品。例如,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自来水、抽水马桶以及日常消费水果和蔬菜被看作是健康生活的基本必需。在生活中没有它们的人可能被认为是贫困的。然而,在许多发展中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普遍拥有这些条件,因而根据具备或不具备这些条件来测量贫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表述都存在一些困难。测量绝对贫困的一种常见技术,就是根据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物品的价格,来确定一条贫困线。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体或家庭就被认为是生活在贫困之中。然而,使用单一的贫困判断标准也可能有问题,因为这种定义没有考虑到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人的需要的差异。例如,在同一个国家内,一些地区的生活开支要比其他地区昂贵,基本必需品的费用也因地区而异。又比如,在室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营养需求可能要多于整天坐办公室的人。单一的贫困判断标准往往意味着把一些实际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估计在贫困线之上。

然而,相对贫困的概念也显示出自身的复

杂性。最主要的一点是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相对贫困的理解也必须有所改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相对贫困的标准逐渐向上调整。例如,汽车、冰箱、集中供暖系统以及电话,曾几何时都被看作是奢侈品。但今天,在大多数工业化社会,这些都被视为完整生活、积极生活的必需品。一些论者已经提醒注意,相对贫困概念的使用经常偏离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社会中最不富裕的那些成员,现在也要比以前富有了。他们怀疑在社会中是否可以说存在“真正的”贫困。比如目前的英国,几乎每家都有像电视机与洗衣机这样的消费品。为相对的贫困概念辩护的人则认为,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基本物品,比如有营养的食物和良好的保健,那么获得消费品也没有什么价值。

下一节我们将考察英国所使用的测定贫困的一些主要方法。

10.1.2 贫困的测定

一 贫困的官方测定

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有一条官方的

“贫困线”。与此不同,在英国并不是由政府来解释贫困。因为缺少一个关于贫困的官方定义,英国的研究者只好依赖于其他的统计指标,比如以救济金的分配来测定贫困水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研究者们遵循了埃布尔-史密斯和汤森的方法,把那些收入等于或低于生活补助金 (supplementary benefit) 的人定义为生活“在贫困中”。生活补助金是政府在经过资产测查后,发给收入低于某个水平的人的现金。这个水平是由议会根据其所认为在英国维持生存应当达到的适宜收入来确定的。1988年,低收入补助金 (income support) 取代了生活补助金。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收入不平等都是目前最常用的测定贫困的方法。贫困被界定为生活在收入中位数60% (含60%) (或者,在以前的测定方法中,是50%) 以下的家户数。根据这种测定标准,生活在贫困中的

人在20世纪80年代急剧增加,在1991至1992统计年度达到顶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 (参见表10.1)。2004年,劳动与养老金部根据这一标准统计,全国共有95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总人口的16%。

二 彼得·汤森:相对剥夺

一些研究者认为,上面讨论的这种官方测定并不能真实地描绘贫困。已经有几项重要研究在操作时把贫困界定为剥夺。这方面的先驱之一就是彼得·汤森。自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他的著述促进了英国对于贫困的公众意识。汤森的研究不再依赖于收入统计数据,开始转向人们对于贫困的主观理解。在其经典研究《英国的贫困》(Townsend 1973)中,汤森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全英国范围内

表 10.1 生活在收入 (未扣除住房开支) 低于中位数 60% 的家户中的人数与比例

年度	数量 (单位: 百万)	比例
1979	6.5	12
1981	6.9	13
1987	9.3	17
1988/1989	10.9	19
1990/1991	11.4	20
1991/1992	11.7	21
1992/1993	11.4	20
1993/1994	10.5	18
1994/1995	9.8	18
1995/1996	9.4	17
1996/1997	10.3	18
1997/1998	10.3	18
1998/1999	10.2	18
1999/2000	10.0	18
2000/2001	9.7	17
2001/2002	9.7	17

资料来源:劳动与养老金部,《低于平均收入家户统计,1994/95年度至2001/02年度》,转引自 Flaherty et al. 2004,页43

家户填写的两千多份问卷的回答。除了收入,被调查者还详细填写了有关其生活方式的信息,包括生活条件、饮食习惯、休闲与民事活动。从这类信息中汤森选择了他认为关系到整个人口而非特定群体的十二点事项,并计算了被剥夺这些事项的人口比例。(结果参见表 10.2)

基于剥夺指数 (deprivation index), 汤森给每个家户打了一个分数, 分数越高, 表明这个家户越是受到剥夺。然后, 他将这些家户的指数位置与其总收入做比较, 并结合考虑每个家户中的人数, 成年人是否有工作, 孩子们的年龄, 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身患残障。汤森的结论是: 自己的调查揭示了一种收入水平的门槛, 在此门槛之下, 剥夺的程度骤然加剧。汤森把门槛之下的这些家户说成是遭受贫困的。根据他的计算, 这些家户占据总人口的 22.9%。远远高于此前数据的估计。汤森基于这些发

现, 认为政府定的资产测查补助低了 50% 还多, 完全达不到一个家庭充分而有意义地参与社会所需要的最低限。汤森的研究表明, 当收入下降时, 家庭就会避免参与日常家庭会做的事情, 成为“被社会排斥的”, 这个概念我们在下文还将讨论 (本章第二节)。

尽管汤森的思路已经证明影响广泛, 但我们将会看到, 它也受到了一些评论者的批评。比如说, 大卫·皮亚肖就曾提出, 汤森选择计算剥夺指数的一些事项 (参见表 10.2) 显得武断: “不太清楚它们为什么与贫困有必然联系, 也不清楚它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Piachaud 1987) 汤森的剥夺指数里的几项范畴与其说关系到剥夺, 不如说关系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决策。如果有人选择吃素或者不做早饭, 又或者决定不频繁社交, 不外出度假, 此人是否遭受贫困, 倒也不是显而易见的。

表 10.2 汤森的剥夺指数 (1979)

特征	人口比例
1 过去一年中没有离家外出的假期	53.6
2 仅指成年人。过去一月中没有请过任何亲戚朋友来家聚宴或便餐	33.4
3 仅指成年人。过去一月中没有外出去任何亲戚朋友家聚宴或便餐	45.1
4 仅指孩子 (15 岁以下)。过去一月中没有与任何朋友一起玩或吃茶点	36.3
5 仅指孩子。上一个生日没有举办派对。	56.6
6 过去半月中没有在下午或晚上外出消遣娱乐。	47.0
7 一周至少有四天没有吃鲜肉 (包括在外吃饭)	19.3
8 过去半月中至少有一天没有吃过热食。	7.0
9 一周内大部分时口吃不上热的早餐。	67.3
10 家里没有冰箱	45.1
11 不经常吃周日肉卷 ^① (一个月一次)	25.9
12 家里没有单独使用的四种生活设施 (可抽水冲洗的厕所、洗涤槽或盥洗池及冷水龙头、固定的浴缸或淋浴头、煤气灶或电炉)	21.4

资料来源: Townsend 1979, 页 250

① 周日肉卷 (Sunday joint): 包括下文的“roast joint”, 都是英国传统的家常菜。

三 乔安娜·麦克与斯图尔特·兰斯利： 领救济的英国人

汤森将贫困定义为剥夺，在此基础上，乔安娜·麦克和斯图尔特·兰斯利已经对英国的相对贫困进行了两项重要研究，一次是在1983年，另一次是在1990年。麦克和兰斯利为一个叫“领救济的英国人”（Breadline Britain）的电视节目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以此来确定人们认为要想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其“必需品”是什么。根据这些回答，他们提出一份包括22项基本必需品的清单，有超过50%的被调查者认为它们对于正常生活来说是重要的。而他们把贫困界定为至少缺乏名单中的三项或以上的处境。

麦克和兰斯利没有要求被访者从名录中选择必需品，而是询问被访者他们认为什么是必需品。这样就避免了皮亚肖等人对于汤森最初的研究所提出的批评，即他对于构成剥夺指数的那些事项的选择是任意武断的。麦克和兰斯利还在调查中包括了这样一个问题：被访者所缺乏的事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还是必需品的匮乏。如果被访者回答这纯属个人选择，那么他们就不会被归为被剥夺了这一事项。

麦克和兰斯利通过他们于1983年所做的第一次调查，估计英国有大约75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约占总人口的14%。他们所用的计算方法不同，使他们得出的数据大大低于汤森有关英国贫困程度的研究，不过仍然蔚为庞大。然后，麦克和兰斯利在1990年又测了一次。他们的结果表明，贫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增加。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在1990年的调查中被定义为缺少26项必需品中的3项或更多）上升到1100百万，而生活在严重贫困中的人数（缺少7项或者更多必需品）从260万上升到350万（Mack and Lansley 1985, 1992）。

四 大卫·戈登：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

大卫·戈登及其同事借鉴了此前的“领救济的英国人”调查，以及汤森的开拓性著作（它也影响了该项调查），在2000年展开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名为“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一般称之为PSE调查）。戈登及其团队像麦克和兰斯利一样，通过问卷调查来确定，在现代的英国社会，要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什么是人们所认为的“必需品”。基于这些问卷回应，他们得出了一张包含35款事项的名录，都是超过50%的人认为对于正常生活来说很重要的东西。超过半数被访者认为“必需”的那些事项的名录可见表10.3。

从这份名录中，研究团队发现，有六款事项，即电视机、冰箱、人人都有床和被子、洗衣机、医生开的药、冷藏冰柜等，不足以区分穷人与富人，因而不能增加必需品剥夺的定义的信度或效度，所以在分析时剔除。戈登及其同事就此基于是否被迫缺乏两项或更多必需品，再加上低收入，设置了一道遭受剥夺与否的门槛。

“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依据必需品的占有情况，发现大约有72%的人只是因为负担不起而缺乏名录上的一款事项，甚至一款都不缺。尽管说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了大约10%的人，他们的收入表明很有可能沦入贫困。样本中剩下的28%的人缺乏两款或更多的事项。不过，调查者也发现，这里还包括大约2%的人，他们的收入足够高，现在已经摆脱了贫困。剩下的26%人口可以被归类为穷人。（表10.4概括了调查结果）

由于戈登及其同事采取的方法类似于前文讨论的麦克和兰斯利早前两项“领救济的英国人”调查，因此也能够利用他们的数据，比较在这段时间里英国的贫困程度有多大的变化。比较2000年发表的“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与两项“领救济的英国人”调查，

表 10.3 对于成年人必需品的认知以及有多少人缺乏这些东西 (所有数值皆为占成年人口的比例)

	该事项被视为		被访者对于该事项	
	必需	不必需	没有, 因为不想要	没有, 因为负担不起
人人都有床和被卧等	95	4	0.2	1
家中生活起居区域有供暖设备	94	5	0.4	1
居所防潮	93	6	3	6
朋友或家人住院时前去探访	92	7	8	3
一日两餐	91	9	5	1
医生开的药	90	9	5	1
冰箱	89	11	1	0.1
每日都有新鲜水果和蔬菜	86	13	7	4
温暖、防水的外套	85	14	2	4
坏的电器能够替换或修理	85	14	6	12
探望朋友或家人	84	15	3	2
庆祝圣诞节之类的特别时刻	83	16	2	2
有钱把家居装饰得体面一些	82	17	2	14
在运动会之类的日子里探访学校	81	17	33	2
参加红白喜事	80	19	3	3
隔天吃一次肉、鱼或素食者的对应食物	79	19	4	3
家庭财产保险	79	20	5	8
消遣爱好或休闲活动	78	20	12	7
洗衣机	76	22	3	1
从学校接孩子回家	75	23	36	2
电话	71	28	1	1
招聘面试时的合适着装	69	28	13	4
冷藏冰柜	68	30	3	2
起居室和卧室里铺上地毯	67	31	2	3
定期存钱 (每月 10 镑) 以备不时之需或退休之虞	66	32	7	25
两双全天候可穿的鞋	64	34	4	5
与朋友或是家人一起聚餐	64	34	10	6
每周在家用之外有一点自己的零花钱	59	39	3	13
电视机	56	43	1	1
每周一次肉卷或素食者的对应食物	56	41	11	3
每年送朋友或家人一次礼物	56	42	1	3
每年一次不带亲属的外出旅游	55	43	14	18
更新旧家具	54	43	6	12
字典	53	44	6	5
出席社交场合的一套正装	51	46	4	4

资料来源: Gordon et al. 2000, 页 14

戈登等人发现, 缺乏三款或更多社会公认的必需品 (这个数目是麦克和兰斯利的研究中设置的贫困门槛) 的家户数在这段时间里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从 1983 年的 14% 上升到 1990 年的 21%, 再到 1999 年的 24%。因此, “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 调查发现, 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来, 英国人口整体而言变得富裕了许多, 但到了 2000 年, 就被迫缺乏必需品这个方面来说, 底层的人们陷入贫困的比例

表 10.4 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结果, 2000 年度

贫困分类	百分比 (取近似整值)
贫穷	26
濒贫	10
脱贫	2
不穷	62

资料来源: Gordon et al. 2000, 页 18

却有了显著的增长。(本章稍后我们将要谈谈工党治下在反贫困方面的进展,参看第三节第二小节)

10.1.3 谁是穷人?

贫困的面目多样,变动不居,因此很难刻画一幅“穷人”的肖像。不过,就整体而言,在英国,某些类别的人群相比于其他人群,更容易生活在贫困之中。具体来说,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处于劣势或遭受歧视的人更有机会成为穷人。本节我们将来看看英国的贫困是如何形成一定模式的,简要地谈谈相比整体人口而言有更高比例遭受贫困的几个群体:儿童、女性、少数族群和老年人。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贫困的区域特征。

在英国,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穷,但是正像1999年12月的一份政府报告所强调的,“地区内部的差异至少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一样大。”(Cabinet Office 1999)记者波莉·汤因比在最近一部描述“低薪英国人”生活的作品中,描绘了富人当中的一群群穷人。她搬出了位于伦敦南区克拉珀姆(Clapham)的豪宅,迁入位于英国最穷住区之一的公寓,并先后干过一系列薪酬微薄的工作。公寓离她自己家的正门步行不到十分钟。她之所以选择住得离家不远,是因为“贫困并不在别处,并不在北边的巴罗(Barrow)或贾罗(Jarrow),它就在邻街,和财富缠绕交错……这远远谈不上是什么南北之间或地区之间深层的财富差距,而就是每一个地区内部能够发现的巨大的社会分隔”。(Toynbee 2003)

生活在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60%的户里的儿童比例,从1979年到1996/97年度翻了一番多,由14%上升到34%。工党政府1997年上台执政之后,提出的最具雄心的承诺之一就是到2020年消灭儿童贫困,而他们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参见本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儿童,比起其

他那些儿童,往往会因为许多原因而造成健康不良。他们出生时更有可能体重不足,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更有可能受伤(乃至死亡)(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是行人,并且不太可能享有安全的游乐区域或花园地带),也更容易遭受虐待,更容易自残乃至试图自杀。比较贫困的孩子在学校里也较不容易表现出色,倒是更容易成长为新一代穷困的成年人(Flaherty et al. 2004)。

女性比男性也更容易成为穷人,尽管她们的贫困常常被那些把焦点放在“男性户主的家户”的研究所遮蔽(Ruspini 2000)。

戈登及其同事们所做的“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Gordon et al. 2000)发现,女性占处于贫困的成年人口的58%。女性贫困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项重要的因素在于家庭内外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家务劳动的负担,养育子女、照料亲属的责任,依然过多地压在女性身上。这就对她们在家庭外部的抱负和工作能力产生了重要效应。它意味着她们担任兼职而非全职有薪就业的可能性远比男性为高,结果就是挣得要少。尽管说目前英国进入有薪就业的女性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但在“男人的工作”与“女人的活儿”之间的劳动力职业分隔依然很牢固。在收入不太高的行业中,女性的比例特别高(Flaherty et al. 2004)。

少数族群成员在穷人中的比例也特别高。特别是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比起其他族群的个体,收入低于平均数的60%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参见表10.5)。之所以如此,原因部分在于英国所有少数族裔的失业率都很高,就业率都很低。比如说,2002年,非裔和巴基斯坦与孟加拉裔的失业率比白人高三倍。在2002/03年度的冬天,来自少数族群的人中只有58%就业,而白人人口中这个比例则为76%。劳动力市场分隔的程度也很高。巴基斯坦裔高度集中在从前的重工业制造区域和棉纺工业区,比如约克郡和伯明翰,这些行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陷入衰退。加勒比裔黑

表 10.5 英国 2001/02 年度扣除住房开支后的收入五分位组的人口比例,按族群分组

	比例					总人数 单位: 百万
	5 (末位组)	4	3	2	1	
白人	18	20	20	21	21	52.1
加勒比裔黑人	34	21	17	13	16	0.8
非加勒比裔黑人	43	22	14	12	9	0.6
印度裔	26	15	26	16	17	1.0
巴基斯坦/孟加拉裔	61	20	11	6	3	1.0
其他	37	18	15	12	18	1.5
总数	20	20	20	20	20	57.0

资料来源: 劳动与养老金部,《低于平均收入家户统计,1994/95 年度至 2001/02 年度》,转引自 Flaherty et al. 2004, 页 188

人男性在体力劳动中比例也很高,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华裔和孟加拉裔在餐饮业中特别集中。有证据表明,某些职业分隔之所以会存在,

是因为少数族群认为某些行业是“白人专有的”,或雇主是“白人”,而有些雇主则把少数族群看作是“招聘目标群之外”(Perform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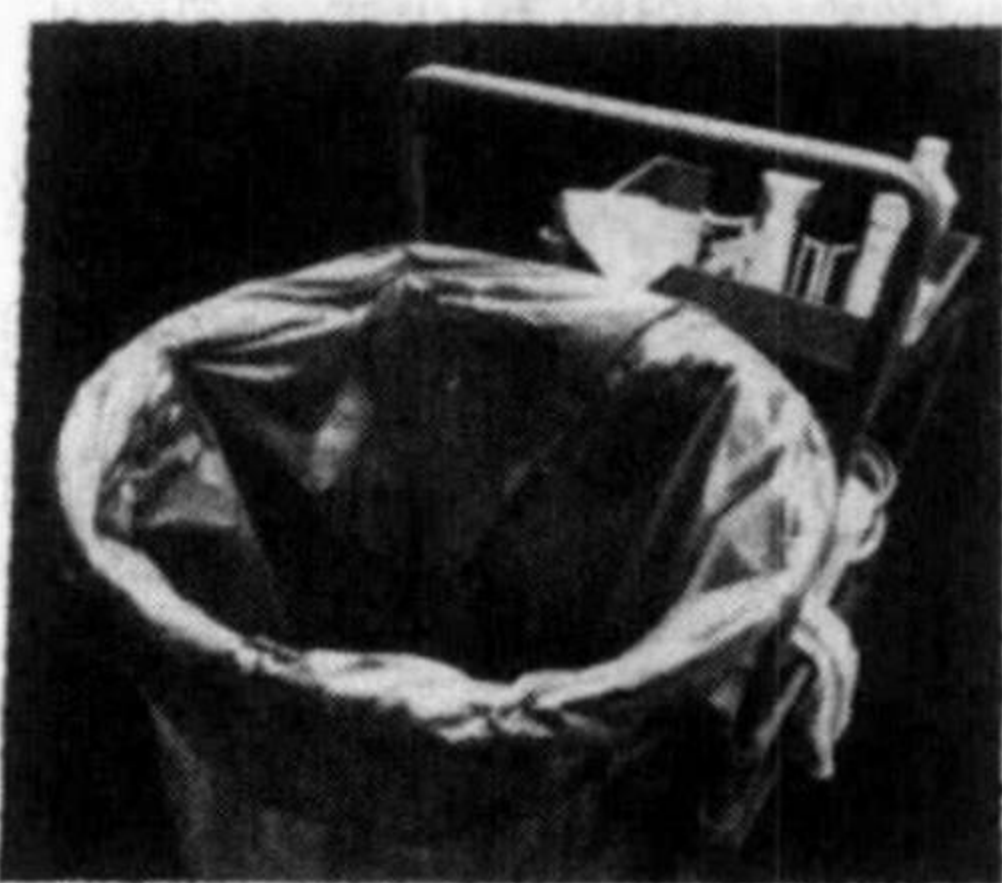
WHO SAYS ETHNIC MINORITIES CAN'T GET JOBS? THERE ARE OPENINGS EVERYWHERE.

Lavatory attendant. Office cleaner. Somebody has to do all the low-paid, menial jobs, but why is it so often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ies? Prejudic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are denying people the choice of job they deserve. It's unjust and unfair. More than that, it's a terrible waste of British talent.



Setting out a toilet for cleaning is not enough for anyone these days. For a man, cleaning a toilet is not a job. It's a job. It's a job that is often done by ethnic minorities. It's a job that is often done by people who are not given the choice of job they deserve. It's a job that is often done by people who are not given the choice of job they deserve. It's a job that is often done by people who are not given the choice of job they deserve.

There is a lot of talk about ethnic minorities not getting jobs. But there are openings everywhere. It's just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s. It's just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s. It's just that some people are no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s.



It's not always obvious why som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jobs. It's not always obvious why som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jobs. It's not always obvious why som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jobs. It's not always obvious why som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jobs. It's not always obvious why some people are not getting jobs.



少数族群的民众属于西方社会中最穷困之列,常常是因为高失业率所造成的。

and Innovation Unit 2002; Flaherty et al. 2004)。英国的少数族群也更有可能是干着薪酬微薄的工作,在学校里勉强对付,居住在贫困凋敝的区域,房屋破败失修,健康状况不佳(Flaherty et al. 2004)。

许多人在工作生涯中完全可能拿过不菲的薪酬,却在退休后收入(以及地位)骤减。如果他们在工作时没有投资或者买不起私人养老金,情况就愈发如此。人口的老年化给政府养老金供应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预期寿命的增长,人口中老年人的数量也在增多。从1961年到2001年,英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翻了一番多,达到940万人。目前65岁的男性可以指望平均再活15年,而女性更是可以再活20年。

第六章第四节第一小节更详细地讨论了英国的预期寿命。

近些年来,研究表明,养老金领取者比就业人口处于持续贫困的可能性要高许多。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18%的养老金领取者处于持续贫困之中,相比之下,就业人口中这一比例为7%。并且,收入较低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数量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研究也发现,在最近几十年中,老年女性和那些少数族群老年人比其他养老金领取者更有可能陷入贫困。

诸如此类的发现使得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2002年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在全国消灭领取养老金者的贫困”。2003年10月建立了一项养老金信贷,确保60岁以上人口获得一份最低收入,并承诺将使英国该年龄组中所有领取养老金者的一半提高收入,从而向实现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当然,这项政策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还要看那些有权获得补助的人是否都真的提出了申请(Flaherty et al. 2004)。

10.1.4 贫困的说明

对于贫困的说明可以归为两组主要命题。一组理论认为穷人个体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任。另一组理论认为贫困是社会中的结构力量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这两组思路相与竞争,有时候分别被叫做“归咎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理论与“归咎制度”(blame the system)理论。我们将依次简要考察两组理论。

认为穷人要为自己的劣势位置负责的看法由来已久。早期应对贫困后果的努力,比如19世纪的济贫院(poorhouses),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贫困是因为个体的缺陷或病态所造成的。穷人被看作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由于缺乏技能,道德或身体方面的缺陷,缺少动机,或者能力低于一般水平,而无法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社会地位被看作是对一个人的才能和努力的反映。那些应该成功的人确实成功了,同时其他能力不足的人注定要失败。“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存在被认为是严酷的生活现实。

我们在下文关于福利国家兴起的讨论(本章第三节)中将会看到,把贫困说成主要是一种个体失败的阐述,在20世纪中期变得不再流行,但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有所复兴,因为政治上对于企业家和个人抱负的强调鼓励了在社会上“成功”的那些人,并且认为,那些未能取得成功的人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要说明贫困,经常是诉诸穷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伴随的假定他们持有的态度和观点。关于这个命题,有一种说法很有影响,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提出的(第九章第四节第四小节详细介绍了他的研究)。莫里认为(Murray 1984),存在一个底层阶级,其中的人必须为自己的贫困负责。这个群体参与形成了依赖文化(参见本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图文框“福利依赖”)。莫里用这个词来指那些依赖政府福利

救济金却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穷人。他提出,福利国家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一种亚文化,削弱了个体抱负和自助能力。福利依赖者(welfare dependent)不是面向未来,努力打拼以改善生活,而满足于接受施舍。莫里认为,他认为福利已经腐蚀了人们工作的动力。莫里区分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必须为自己的贫困负责的人,一类是“非因其咎”而成为穷人的人,比如鳏寡孤独,或者残障人士。

诸如此类的理论似乎在英国人中产生了共鸣。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人认为,穷人要为自己的贫困负责,并且质疑那些“免费”依靠“政府施舍”生活的人。许多人相信,如果靠福利生活的人下决心找工作的话,他们是能够找到的。然而,这些观点已经脱离了贫困的现实。在英国,大约有四分之一生活在贫困中的人都在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因为收入太少而无法脱贫。其余不工作的人中,大多数都是14岁以下的儿童、65岁和65岁以上的老人、病人或残障人士。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骗取福利的现象相当广泛,但其实只有不到1%的福利申请涉及欺诈行为,这个比例远远低于所得税申报表的欺诈。据估计,由于申报错误或有意逃税,英国流失的所得税超过了10%。

说明贫困的第二种思路强调,是更为广泛的社会过程制造了个体难以克服的贫困处境。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内部的结构因素,例如阶级、性别、族裔、职业地位、教育成就等等,塑造了资源分配的方式。支持对贫困进行结构性说明的学者认为,人们经常把穷人缺乏抱负看成是“依赖文化”,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他们受处境束缚造成的一种后果,而不是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他们提出,减少贫困并不只是改变个体眼界的问题,而是需要致力于在全社会更加平等地分配收入和资源的政策措施。育儿津贴(child care subsidies),最低小时工资(minimum hourly wage),以及家庭收入保障线(guaranteed income levels for families),这些都属于力图弥补持续社会不平等的政策措施

的例证。

美国社会学家威尔逊写了一本《当工作消失:城市新穷人的世界》,就这种“结构”论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的重要说法(Wilson 1996)。威尔逊的立场可以描述为“经济重构”假设。他提出(Wilson 1987,1996),持续的城市贫困主要是源于内城经济的结构转型。对于那些早早离开学校以求挣钱养家的人来说,制造业的衰落,就业的“郊区化”,以及低薪服务业的兴起,都大大削减了他们能够得到的工作数量。经济转型所引起的高失业率导致了“能够成家的”(经济上有能力养家的)男性群体规模缩减。这样一来,对于女性穷人来说,结婚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非婚生孩子的数量不断增长,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大量出现。一代代新生的孩子们生于贫困,长于贫困,这种恶性循环就这么不断延续。威尔逊认为,美国黑人之所以承受了特别多的苦难,就是因为过去受到的歧视,由于他们集中在特别容易受到经济重构影响的地区和行业。

威尔逊指出,伴随这些经济变迁而来的,是贫困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于美国黑人居住区。他觉得,这种新的贫困地理学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那场运动给了黑人中产阶级新的机会,能够迁出贫民区。中产阶级家庭迁出了贫民区,留下的是一个荒弃无望的社区,缺乏在后工业社会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制度、资源和价值观念。威尔逊也承认,这类住区缺乏本地可以利用的培训和教育,曾经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的那些地方组织从政府和私人两方面给过的支持也都趋于消解,令社区独自承受苦难。就这样,民权政策,经济重构,以及歧视的历史遗产,在这几方面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孕育出城市底层阶级。

评价

上文简述的关于贫困的两种说明都得到

了广泛的支持,而且,在关于贫困的公共辩论中,每种观点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一直是针锋相对。批评贫困文化观点的人指责其所谓“个体化”贫困的主张,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超出穷人控制能力的环境。他们把穷人看作是受害者,而不是滥用这个制度的寄生虫。然而,我们也要谨慎,不能不加反思地接受把贫困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社会结构本身的那些主张。这种思路等于是说,穷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艰难处境。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事实远非如此。

10.1.5 贫困与社会流动

过去,大多数有关贫困的研究都把焦点放在人们是如何陷入贫困的,并逐年测定贫困的总体水平。传统上,人们很少注意贫困的“生命周期”,也就是人们随着时间变化而脱贫(并且经常返贫)的轨迹。

对于贫困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它是一种持久的状态。然而,成为穷人并不一定意味着陷入贫困的泥沼。无论什么时候,处于贫困的人中都会有相当比例的人曾经拥有过优越的生活条件,或者能够指望有朝一日可以摆脱贫困。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显示,入贫和脱贫的流动量相当大。相当多的人成功地脱离了贫困,与此同时,也有比从前更多的人意识到,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他们要生活在贫困

之中。

来自于英国固定家户追踪调查(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BHPS)的统计结果表明,1991年收入处于最低五分位组的人,只有稍稍多于一半在1996年还处于同样的类别(参看表10.6)。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经过下一个五年,这些人仍然处于同样的位置。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处于这个层次,但其他人可能摆脱了最低五分位组,或者又返回该组位。固定家户追踪调查也反映出,在该调查进行的6年中的五年期,仅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始终处于最贫穷的20%人口(即最低五分位组)。而在整个调查期间,有60%的成年人从来没有进入过最低五分位组。总之,这些发现表明,在属于最低五分位组的成年人中,有将近一半无论何时都受到持续的低收入状况的困扰。同时,其他一半人随年份不同而进进出出最穷的群体(HMSO 1999)。

从1984年到1994年的德国收入模式的相关数据也反映了入贫和脱贫的流动是显著的。在调查持续的10年中,有超过30%的德国人至少在某一年是穷人(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即低于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这个数据意味着比任一给定年份的穷人数的最高值还要高出三倍多(Leisering and Leibfried 1999)。在那些“摆脱”贫困的人中,所达到的平均收入水平大约要高于贫困线30%。然而,在10年期间,这些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至少

表 10.6 1991年至1996年间英国成年人收入分布变动情况(%)

	1996年收入分组					全体成年人
	最低五分位组	次低五分位组	中间五分位组	次高五分位组	最高五分位组	
1991年收入分组						
最低五分位组	52	26	12	7	4	100
次低五分位组	25	35	22	12	6	100
中间五分位组	11	21	33	23	12	100
次高五分位组	7	12	20	37	23	100
最高五分位组	4	6	11	21	59	100

资料来源:英国固定家户追踪调查,社会经济研究所,引自 *Social Trends*, 29(1999), 页 98

有一年又会重新返贫。

阿比盖尔·麦克奈特 (McKnight 2000) 利用英国的所得追踪调查新数据库 (New Earnings Survey Panel Dataset) 等资料来源的数据, 分析了 1977 年至 1997 年英国的所得变动趋势。麦克奈特追踪了低薪工人的几个群体, 发现低薪的持续性是很明显的。她的调查表明, 在最低四分位收入组中, 有大约五分之一的雇员六年后依然在那一组中。麦克奈特还发现, 属于英国最穷群体的失业者们即使真的找到工作, 也最有可能是薪酬最低的部门就业; 而低薪的雇员比起高薪的雇员也更有可能会经历失业。

学者们强调, 我们应该审慎地解释这些发现, 因为那些希望削减福利开支或根本避免将贫困作为一项政治与社会话题的人很容易利用它们。社会排斥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的约翰·希尔斯已经提醒人们, 不要接受“彩票模式” (lottery model) 的收入决定观。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把贫困看作是人们在收入等级中移动时几乎是随机遇到的一个“一次性”的结果, 这种看法值得我们怀疑。这种观点意味着, 社会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不是非常严重。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胜利者或失败者, 所以贫困的观念不再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按照这种观点, 一些不走运的人可能连续几年收入都较低, 但是从本质上讲, 低收入只是一个随机现象。

正像希尔斯所指出的 (Hills 1998), 英国固定家户追踪调查确实反映出, 生活在贫困中的那些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小幅流动。例如, 在最穷的十分位组中, 只有 46% 的人在下一年依然留在此组。这表明, 在最穷的十分位组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成功地脱了贫。然而, 再细看一步就会发现, 有 67% 的个体仍然留在最后的两个十分位组。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的进展超出了这个范围。在最低五分位收入组中, 有 65% 的人在一年以后还处于这个组别, 同时, 有 85%

的人仍然属于最后的两个五分位组。这些发现意味着, 在低收入者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本质上是“暂时性的”, 而其他三分之二则是长期性的。根据希尔斯的观点, 如果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逐渐地“混杂”到各个十分位收入组中, 那是一种误导性的看法。相反, 很多脱贫的人并没有进一步上升, 最终又一次返贫。那些停留在最底层超过一年的人, 其“脱贫率”却进一步降低了 (Hills 1998)。

尽管脱贫确实面临重重挑战和障碍, 但研究的发现表明, 入贫和脱贫的流动通常要比想像的更加活跃。贫困并不只是诸般社会力量作用于消极被动的人口口的结果。就算是处于严重劣势的人, 也有可能抓住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人类行动促成变迁的力量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弱势个体和社群的行动潜能, 社会政策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在本章随后有关福利的讨论中, 将关注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它们旨在通过强化劳动力市场, 增加教育和培训机会, 提高社会凝聚力, 来扶贫减困。

第九章第五节也讨论了社会流动。

第二节 社会排斥

10.2.1 何谓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的概念已经被政治家所接受, 但最初是由社会学领域的作者提出的, 指的是造成新的不平等的根源。社会排斥指的是通过某些方式, 有可能阻隔个体全面参与社会。例如, 人们如果生活在面临废弃的住区, 学校破败不堪, 就业机会寥寥, 实际上可能就失去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的自我改进的机会。

社会排斥的概念引发了个人责任的问题。毕竟“排斥”指的是某个人或某件事正遭到另

一个人或另一件事的拒绝。当然,这些情况属于个体被超出自己控制能力的决定所排斥。银行可能拒绝给居住在某个邮政编码区域的人提供活期帐户或信用卡。保险公司可能依据申请人的个人历史和背景而拒绝一项投保申请。一个中年以后被裁减的人可能会因为其年龄而无法找到新工作。

但是,社会排斥并不单纯是人们被排斥所造成的,也可能是人们自我排斥主流社会的某些特性所造成的。个体可以选择辍学,放弃就业机会并且在经济上变得不活跃,或者在政治选举时不去投票。我们在研究社会排斥现象的时候,同样必须意识到以下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人的行动与责任,另一方面是社会力量在塑造人们所处的环境时所起的作用。

第九章第四节第四小节详细介绍了莫里的底层阶级理论,莫里在其中提出了人们排斥自身充分参与社会的观念。

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比贫困来得宽泛,当然也包括了贫困在内。它关心的是一系列妨碍个体或群体拥有对人口中大多数人开放的机会的广泛因素。戈登及其同事所做的“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参见本章第一节第二小节)区分出社会排斥的四个维度:贫困,或者说充分收入或资源排斥(也就是我们前文讨论的内容);劳动力市场排斥;服务排斥;以及社会关系排斥(Gordon et al. 2000)。下面我们来看看社会排斥的后面三个要素。

一 劳动力市场排斥

对于个人来说,劳动之所以重要,不仅仅

是因为它提供了充分的收入,而且因为参与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互动的重要领域。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可以导致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贫困、服务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其结果,政治家们在考虑这个话题时,增加从事有薪劳动的人数一向是减少社会排斥的重要途径(参见本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话说回来,不应当把“没有工作的家庭”必然联系到失业。“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发现,有43%的成年人(50%的成年女性和37%的成年男性)并未从事有薪劳动。在没有活跃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人中,退休者明显属于最大群体(占有成年人中的24%)。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活跃的其他人群还包括从事家务劳动和照料活动的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或许是因为残障,还有就是学生。总之,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贸然宣称在劳动力市场的不活跃就等于社会排斥本身的迹象,因为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属于这一类。不过我们可以说,劳动力市场的排斥会大大增加社会排斥的风险。

二 服务排斥

社会排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获得基本服务的渠道,无论这些基本服务是在家中(比如水电供应)还是家外(比如获取交通、购物或金融服务的渠道)。服务排斥可能是个体排斥(一个人因为负担不起而无法享用某项服务),也可能是集体排斥(整个社区无法享用一项服务)。“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发现,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排斥享用两项或更多的基本服务(参看表10.7的名录),同时只有稍稍多于一半的人能够获取全部的公营或私营服务。表10.7分别展示了每一项服务的集体排斥和个体排斥的程度。

表 10.7 被访者所享有的公营和私营服务(%)

	集体排斥			个体排斥	
	充分享用	不充分享用	不用(没机会或不合适)	不用(用不起)	不用(不想用或用不着)
公营服务					
图书馆	55	6	3	0	36
公共运动设施	39	7	5	1	48
博物馆和美术馆	29	4	13	1	52
夜间课程	17	2	5	3	73
社区公共会所	31	3	9	0	56
有急诊部的医院	75	13	2	0	10
医生	92	6	0	0	2
牙医	83	5	1	0	11
配镜技师	78	3	1	1	17
邮局	93	4	0	0	2
私营服务					
宗教礼拜场所	30	1	2	0	66
公共汽车服务	38	15	6	0	41
火车站或地铁站	37	10	10	1	41
加油站	75	2	2	1	21
药店	93	3	1	0	3
便利店	73	7	8	0	12
去大超市的交通工具	92	4	2	0	2
银行或建屋互助会 ^①	87	7	1	0	4
酒吧	53	4	2	2	37
电影院或剧院	45	6	10	5	33

资料来源:Gordon et al. 2000, 页 58

三 社会关系排斥

人们被排斥出社会关系可以有多种方式。第一,这类排斥意味着个体没有能力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比如走亲访友,年节志庆,消遣娱乐,朋友聚餐,休闲度假。第二,如果人们与亲朋好友相隔绝,也就被社会关系所排斥。

“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调查发现,有 2%的人无论是与自己的哪一位家人,还是自己家外的某位朋友,都没有任何联系,哪怕只是一年寥寥几次。社会关系排斥的第三个特征是在需要的时候缺乏实际上的以及情感上的支持,比如有个人帮忙做屋里或花园里的重活儿,或者心情抑郁的时候有个人说说话儿,又或者面临人生重大转折时有个人给点建议。第四,人们

^① 建屋互助会(building societies):接受会员存款并贷款给拟建屋或购房的会员。

被排斥出社会关系，先是体现为缺乏公民参与。所谓公民参与，包括投票、参与本地政治或全国政治、给报纸写信、为自己感触颇深的某项话题鼓与呼等等。最后一点，有些人之所以被社会关系排斥，是因为他们离群索居，或是因为身患残障，或是负责照料他人，或是觉得在市井人流之中不安全。

10.2.2 社会排斥的实例

社会学家研究了个体与社群所经历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研究关注了多种多样的话题，包括住房、教育、劳动力市场、犯罪、年轻人和老年人等等。我们现在将简要考察已经在英国和其他工业化社会引起注意的三例排斥。

一 住房与住区

社会排斥的本质可以在住房方面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工业化社会里，当许多人生活在宽敞舒适的住房里的时候，其他人则居住在过分拥挤、供暖不足或结构不牢固的房子里。个体在进入住房市场时，可以根据他们已有的和预期的资源获得住房。因而，一对夫妇如果没有孩子，又是两人挣钱，将更有机会获得一笔抵押贷款去购买位于上等区域的住房。近几十年来，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东南部），房屋价格的上涨要比通胀率高得多，这就确保了业主居住者从自己的财产中获得丰厚利润。与此相反，一家人里如果成年人失业，或是从事低薪工作，就可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去租房子，或者住政府廉租房。

住房市场当中的分层发生在家庭与社区两个层次上。正如处于劣势的个体被排斥了选择理想住房的机会一样，整个社区也可能被排斥了社会当中其他社区所拥有的机会和活动。排斥可以表现出空间的维度：就安全、环境状况以及获取服务和公共设施的便利性而言，各

住区之间的差异相当大。例如，低标准住区所拥有的银行、食品店和邮局等基础服务往往要比更为理想的住区少。公园、运动场所和图书馆之类的社区空间可能也非常有限。然而，生活在不方便地方的人经常只好依赖这些有限的可利用的设施。他们不像更富裕地区的居民，可能没有交通工具（或资金）以便到其他地方购物和享用服务设施。

在受到剥夺的社区，人们比较难以克服排斥，难以采取措施更加充分地参与社会。这里的社会网络可能比较薄弱，因此减少了有关工作、政治活动以及社区事件的信息流通。失业率高和收入水平低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压力。犯罪以及青少年越轨破坏了住区的总体生活质量。低标准住宅区的住户周转率往往较高，因为许多居民试图搬到更好的房子里，与此同时，新进入到住房市场的弱势者又会陆续到来。

二 农村地区

尽管更多的关注给予了城市中的社会排斥现象，但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也可能遭到排斥。一些社会工作者和照顾者认为，农村地区面临排斥的挑战即使不比城市更为严峻，至少也是相差无几。在小村庄和人烟稀疏的地区，获取商品、服务和设施的渠道就不如居民密集的地区那么广泛。在大多数工业化社会，医院、学校、政府服务可以就近得到，被认为是积极、丰富和健康的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在农村，居民就近获得这些服务的机会经常很有限，更多的是依赖当地社区可能提供的设施。

是否有机会获得交通服务是影响农村排斥的最大因素之一。如果一个家庭拥有或能够获得一辆小汽车的话，它就较容易保持与社会的融合。例如，家庭成员可以考虑在其他城镇工作，可以安排去有许多商店可供选择的地区进行定期的购物之旅，并且更容易探访住在其



破败的房产可能是高度社会排斥之地,众多因素汇聚起来,阻碍了充分的社会参与。

他地区的朋友或亲属。年轻人可以在聚会后回到家里。然而,如果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就只好依赖公共交通,而在农村地区,公共交通服务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例如,在一些村庄,一天的公交车服务可能只有几次,周末和假日时会更少,并且一到晚上就没有公交车了。

三 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是一种最极端的排斥形式。没有稳定住所的人可能无法从事许多他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日常活动,比如上班、拥有一个银行账户、招待朋友,甚至是通过邮局收信。

绝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居住在某种临时住所里,尽管说还有好多人只能露宿街头。一些无家可归者是有意选择在街上游荡,露宿街头,无家产之系,无钱物之累。但是大多数人完全没有这种愿望,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把他

们逼到走投无路,只能无家可归。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一处稳定的住所,他们的生活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艰辛与剥夺的循环加剧之中。

在英国,是谁睡在大街上? 答案非常复杂。比如说,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医疗保健政策的改变,有精神健康问题和习得障碍的人开始被收治机构放出来。在此之前,这些人原本会成年累月生活在当时所谓的精神弱智或心理低能者长住医院。这个去机构化的过程是由几个因素所引起的。其一,政府希望节省开支。在精神健康机构住院治疗的花费很高。再者,一个更加说得出口的动机是精神病专业的权威们相信,长期住院治疗往往是弊大于利。因此,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医院外得到照顾,那么就应该这样做。然而,结果并不像那些将去机构化看作是一步积极举措的人所期望的那样。一些医院将一些无处可去的人,或者可能已经多年未曾生活在外部世界的人,一概强



制出院。而且,实际上常常也没有提供恰当、具体的院外护理(SEU 1998)。^①

调查显示,在露宿街头的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曾经在精神健康机构呆过一段时间,或者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因此,相关医疗保健政策的改变像是对无家可归现象的发生频率产生了特别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并没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酗酒成瘾者或非法毒品的长期消费者。他们之所以流落街头,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个人的不幸,并且常常是因为祸不单行。沦为无家可归者很少是由于某种直接的“因果效应”。如果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些不幸,就有可能造成一种难以遏制的下向循环。例如,一位女性可能离婚,而且在失去家的同时也失去了工作。一个年轻人可能在家里遇到麻烦,在没有谋生途径的情况下闯进大城市。研究表明,最容易沦为无家可归者的人,是那些来自较低层工人阶级背景的人,

没有特别的工作技能,收入也非常低。长期失业是一个主要的指标。与亲朋好友的关系破裂似乎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尽管大多数无家可归者能够在为他们提供的临时收容所里过夜,或是遭到暂时的栖身场所,但露宿街头的人常常处在危险之中。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PPR)调查了伦敦、格拉斯哥、斯旺西(Swansea)^②的无家可归和街头犯罪的情况,提供了无家可归者在街头所受迫害程度的第一手材料。而在英国最主要的犯罪统计指标“英国犯罪调查”(The British Crime Survey)中,并没有把无家可归者列为其访问对象。在《不安全的街道》一书中(IPPR, 1999),公共政策研究所揭示道,每五位露宿街头者中就有四位至少有一次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他们当中几乎有一半人遭到过袭击,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选择向警察报案。从这些情况中浮现出

① 原文第四版此处无此参考文献,第五版补上,但在书后书目中却又忘记补上。

② 三个城市分别位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以英国的标准衡量,人口规模分别属于超大型、大型和中型。

来的图景是：无家可归者是频繁的街头暴力的受害者，而且也被排斥出本来有可能提供一些帮助的法律体系和警察保护。

尽管把无家可归问题列入当务之急已经受到普遍的称赞，但对于如何使人们从街上回到长期的住处并过上更加稳定的生活，并没有达成多少共识。为无家可归者辩护的人都认为，需要采取一种更为长远的思路，包括提供咨询、中介服务、职业培训以及交友扶助计划等等。然而，与此同时，许多慈善团体却强烈反对中止短期措施，比如给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提供汤水、睡袋和保暖衣服等。这个问题因此聚讼不已。为了提请人们关注长久解决之道的必要性，政府方面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无家可归者负责人”（homelessness tsar）路易斯·卡塞提到：“本意好心的人们花钱解决街头的问题，其实等于花钱把问题留在那里”（转引自 Gillan 1999）。这种说法得到许多住房行动群体的赞同。然而，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之类的慈善及延伸服务群体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只要有人还在露宿街头，他们就会去帮助这些人，提供他们所能给予的帮助。

研究这个问题的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提供更加合适的住房形式，不管是否由政府直接资助，即使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于处理无家可归者的多重问题仍然是至关重要。正如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在他的《无家可归者》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无论人们为什么流落到街上，我们可以为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通常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处居住的地方，能够有一点点私密性和稳定性。没有稳定的住房，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太可能起作用。”（Jencks 1994）

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则强调，只有 20% 的无家可归问题与“房子”有关，而 80% 则与家庭破裂、暴力与虐待、毒瘾、酗酒以及抑郁有关。一位年近六十的男性无家可归者迈克（Mike）对此表示赞同：“我觉得，大多数人的情况要比表面上更复杂。问题常常涉及他们对

自己、对自我价值的信念。许多流落街头的人比较缺乏自尊。他们不相信自己能把什么事情做得更好。”（转引自 Bamforth 1999）

10.2.3 犯罪与社会排斥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工业化社会中，犯罪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他们指出，现代社会中有一种趋势，背离（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包容性的目标，转而趋向那些承认甚至助长对某些公民的排斥的制度安排（Young 1998, 1999）。犯罪率也许可以反映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没有被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重视，或者感到与这个社会没有利害关系。

美国社会学家埃利奥特·柯里研究了美国的社会排斥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存在于年轻人中的这种关联。柯里提出，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天然实验室”，已经展示出受市场驱动的社会政策“危机隐伏的阴暗面”，例如贫困与无家可归现象的日益增加，毒品泛滥，以及暴力犯罪的剧增等等。他指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成长属于放任自流，缺乏他们所需要的来自成年人的指引与支持。年轻人尽管面对着市场与消费品的诱惑，但他们也面临着在维持生活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日趋减少的挑战。这种局面可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希望诉诸非法的手段来维持中意的生活方式。

根据柯里的看法，在犯罪增加与社会排斥之间存在着几种主要关联。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转型，以及政府税收和最低工资政策的变化，造成了美国人口中无论是相对贫困还是绝对贫困的程度都出现了巨大增长。第二，丧失稳定的生计，流动人口增加，房价日趋昂贵，社会凝聚力减弱，承受着这些问题的地方社区可以感觉到社会排斥的加强。第三，经济剥夺与社群分裂给家庭生活造成了压力。为了维持生存，许多贫困家庭的成年人不得不干好几份活

上层社会排斥

行文至此,我们所考虑的关于排斥的例证所关注的始终是这样一些个体或群体,他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不能充分参与多数人所享用的制度或活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排斥案例都发生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身上。近些年来,正在出现“上层社会排斥”的新动向,指的是位于社会顶层的少部分人由于自身的财富、影响力和社会联系,可能会“主动退出”参与主流制度。

上层社会的排斥可能有许多形式。富人可能更愿意接受私人服务和照顾,从而完全退出公立教育和保健服务领域。富人住区越来越与社会其他部分相隔绝,成为掩藏在高墙大院和安检岗位之后的所谓“封闭式社区”。通过精心的管理以及私人金融顾问的帮助,可以大幅减少他们的纳税和财政义务。尤其在美国,精英不再主动参与政治,而常常代之以向被视为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候选人提供大批捐赠。顶级巨富可以进入一个几乎与社会其他部分相分离的封闭的私人领域,从而采取许多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财政责任。正如“底层”的社会排斥破坏了社会的团结和凝聚力一样,



豪富大腕,包括像詹妮弗·洛佩兹这样的名人,也在搞他们自己的社会排斥,并且也会有不良效应。

“上层”的社会排斥也同样有害于一个整合的社会。

儿,这种处境造成了持续的压力、焦虑乃至离家出走。其结果,儿童的社会化和培养也遭到削弱。整个社群的“社会贫困化”意味着父母没有多少机会向其他家庭或亲戚寻求支持。第四,国家已经“削减”了许多可能“重新融合”遭受社会排斥者的计划与公共服务,例如儿童早期干预、儿童照顾以及心理保健等等。

最后,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不能够通过合

法途径满足社会鼓励的经济地位和消费水平。柯里回应了莫顿早先有关“张力”的看法(参看第十九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社会排斥与犯罪之间的这种关联中最成问题的一面,是避开合法的变迁渠道,而偏好非法的变迁渠道。相比于许多可替代的途径,例如政治体制或社区组织,人们更偏好走犯罪这条路(Currie 1998)。

第三节 福利国家

在大多数工业化社会,底层的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福利国家而得到缓解。为什么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发展成了福利国家?我们如何说明不同国家所偏爱的福利模式的差异?虽然福利的形式各国皆有不同,但总的说来,工业化社会已经将它们的大部分资源用于满足公众需要。

10.3.1 关于福利国家的理论

当今世上,绝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和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都是福利国家,意思是说,政府在福利的提供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为此要通过一种体制,提供某些服务和补贴,以满足人们对于保健、教育、住房和收入等方面的基本需要。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应对人们在其一生中所面临的种种风险:疾病、残障、失业以及年老。福利国家所提供的服务种类以及开支的规模各国皆有不同。有些国家具有相当完善的福利制度,而且把国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这方面。例如,在瑞典,税款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53%。与之相比较,其他西方国家收的税要少得多。在英国,税款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38%,而美国还不到 30% (Townsend 2002)。本章我们将重点考察福利国家在扶贫减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有关福利国家在提供这些服务和补贴方面所起的作用的讨论,其实是贯穿全书的。第八章就介绍了福利国家与医疗保健的提供。第十七章介绍了福利国家在教育提供方面的作用。而第六章则介绍了福利国家与提供给老年人的各种服务与补贴。

为了说明福利国家的演进,已经发展出许

多理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是维持资本主义体系之所必需,而功能主义理论家则认为,在发达工业化的条件下,福利制度有助于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整合社会。尽管这些看法以及其他观点多年以来已经各自赢得了支持,但对于福利国家理论最有影响的贡献,或许要算是 T.H. 马歇尔与高斯达·埃斯平-安德森的著述。

一 T.H. 马歇尔:公民资格的权利

马歇尔的著述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把福利看作是公民资格^①的权利 (citizenship rights)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渐进发展的结果。马歇尔采取历史的视角,追溯了英国公民权的演进,并区分出三个关键的阶段。根据马歇尔的观点,18 世纪是获得公民权利 (civil rights) 的时代,主要包括一些重要的人身自由权利 (liberties), 比如言论自由 (freedom)、思想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以及得到公平的法律处置的权利。19 世纪是获得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s) 的时代,即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第三种权利即社会权利 (social rights), 是在 20 世纪才获得的。通过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养老金以及其他服务实现的公民获得经济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权利,在福利国家中开始得到尊重。社会权利与公民权概念的融合意味着,不管在社会上的位置如何,每个人都有资格过上一种完整而又积极的生活,都有权获得一份合理的收入。有鉴于此,与社会公民权相维系的权利大大推动了人人平等的理念 (Marshall 1973)。

马歇尔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中关于公民权的本质以及社会包容与排斥问题的讨论。权利和责任的概念与公民权的观念是密

① “Citizenship”包含了公民权利、公民责任、公民身份、公民资格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意义,在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词来统合。很多中译笼统地译为“公民权”。不过这里的麻烦是后面紧跟着“rights”。

切交织的。在目前关于如何促进“积极公民权”的讨论中,这些观念大行其道。然而,尽管马歇尔关于公民权的著作仍然同目前的讨论有关,但它的适用性是有限的。批评者们已经提出,马歇尔在发展关于公民资格的权利的观点时,只关注了英国,至于其他社会的福利是否以类似的方式演进,尚有待明确。

二 高斯达·埃斯平-安德森:福利的三个世界

丹麦学者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是对福利国家理论的较新补充(Esping-Anderson 1990)。在这本重要著作中,埃斯平-安德森对西方福利制度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福利体制”的三分类型。埃斯平-安德森在提出这套分类的时候,评价了福利的去商品化程度,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福利服务摆脱市场的程度。在一个高度去商品化的体系中,福利是由公共提供的,而且不以任何方式与个人的收入或经济资源相联系。而在商品化的体系中,福利服务的处置更类似于商品,也就是说,它们与其他任何商品或服务一样在市场上售卖。通过比较各国在养老金、失业以及收入资助等方面的政策,埃斯平-安德森区分了下面三类福利体制:

- 1 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是高度去商品化的。福利服务由国家实行补助,所有公民都可以获得(普遍补助)。绝大多数北欧国家都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
- 2 保守法团主义的在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保守法团主义国家,福利服务可能是高度去商品化的,但它们未必具有普遍性。一个公民有资格获得的补助数额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类型的福利体制可能并不是

为了消除不平等,而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家庭的牢固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 3 自由主义的美国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范例。福利是高度商品化的,通过市场售卖。对于亟需的人,有资产调查补贴可以用,但是会被高度地污名化。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被期望通过市场来购买自己的福利。

英国并没有明确地属于这三种“理念型”中的任何一种。从前,它更接近于社会民主模式,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福利改革已经使它更接近具有较高商品化水平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

10.3.2 福利国家在英国

各种福利模式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整个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诸项补助。在提供普遍补助的福利制度中,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用一种权利,就是每当需要的时候享有福利,而不论其经济地位如何。在英国,这方面的例子就是向所有16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提供育儿补助,而不论其收入或储蓄水平。建立在普遍补助基础上的福利制度旨在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福利需要可以得到持续的满足。在瑞典的制度下,普遍补助的比例要高于英国,因为后者更多地建立在资产调查补助的基础上。所谓“资产调查”(means-testing),是指一种行政过程,由政府来鉴定某位福利申请者的实际收入(或资源),是否符合其标准化的比例,如果有所亏缺,就予以补足,作为一项社会保险补贴,或者提供某种服务。在英国,资产调查补助的实例有收入资助(Income Support),住房补贴(Housing Benefit),以及工薪家庭课税扣除(Working Family Tax Credit)。资产调查服务的实例有地方当局的

社会服务部门提供的服务,比如住区护理,或者作为社区护理的一部分,配套提供。

普遍补助与资产测查补助之间的这种区别,其实是从政策层面上体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福利观。支持福利制度论(institutional)的人认为,获得福利服务应该是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一种权利。而主张剩余论(residualist)的人则认为,福利只应该提供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但却没有能力满足其福利需求的社会成员。

主张福利制度论和主张福利剩余论的两派人之间的争论也常常表现为关于税收的争论。福利服务必须通过征税来提供基金。倡导“安全网福利国家”(safety-net welfare state)思路的人强调,只有最贫困的人,并且通过资产测查得到证明,才应当成为福利补助的受益者。主张福利剩余论的人认为,福利国家开支庞大,效率低下,而且太官僚化。另一方面,有些人觉得,因为福利国家需要充裕的基金,所以应该提高税收规模。他们认为,即使这意味着税负较重,也应当维持甚至扩张福利国家,以便国家能够制约严重两极分化的市场效应。他们主张,任何文明国家都有责任供养和保护它的公民。前福利改革事务大臣弗兰克·菲尔德就强烈批评资产测查法和福利剩余论,他的报告“我国的新目标”(New Ambitions for our Country, 1998)下文还将讨论(本小节)。菲尔德与财政大臣布朗之间有过一场争论,此后便于1998年退出政府。他认为布朗阻挠了自己的福利改革方案,太倾向于将资产测查作为调控补助发放的手段。

福利制度模式与福利剩余模式之间的这种差异是目前有关福利改革争论的核心。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福利国家的未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全球化、迁移、家庭与就业的变化以及其他根本的转变,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因此福利的本质也必须发生变化。在下一部分,我们将考察福利国家在英国的形



英国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推行国民健康服务方案,旨在增强全民健康和福祉。

成,它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它进行改革的尝试。

一 英国福利国家的形成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国家是在20世纪创建的。然而,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601年的《济贫法》^①和修道院的衰亡。修道院为穷人提供赈济,失去了这种供应,绝望的赤贫以及由此导致的病人几乎得不到丝毫照料,促生了《济贫法》。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家庭与社区内部传统形式的非正式支持开始瓦解。为了维

^① 请注意原文是“Poor Laws”,这实际上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在1597年至1601年期间颁行的一系列法令的合称。

持社会秩序,并且减少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不平等,就有必要为那些发现自己处于市场经济边缘的社会成员提供帮助。这样就产生了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根据该法案,建造了一批劳动救济所(workhouses),所提供的生活标准低于外面可以获得的任何生活水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觉得济贫院(poorhouses)里的生活条件要使人们竭尽所能摆脱贫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作为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过程的一部分,国家开始在对于贫困者的管理中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到了19世纪后期,开始对教育与公共卫生的全国性管理进行立法,成为20世纪将会出现的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方案的先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自由党政府治下,福利国家进一步地扩展,创设了诸多政策,包括养老金、健康与失业保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对于福利体系的改革与扩展。福利的焦点不再只是集中于赤贫者和病人,而是扩大到所有的社会成员。对整个国族来说,无论贫富,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创伤体验。它产生了一种团结感,令人认识到不幸和悲剧并不只限于弱势者。

从选择性福利观到普遍性福利观的这种转变,浓缩在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中。这份报告常常被视为现代福利国家的蓝图。它致力于根除五大邪恶:贫(Want)、病(Disease)、愚(Ignorance)、脏(Squalor)、惰(Idleness)。二战后的工党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开始把这个设想逐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几项主要的法案奠定了新的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核心。战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于1944年提出了《教育法》(Education Act),处理的是失学问题。1946年的《国民健康法》(National Health Act)旨在提高人口的健康质量。“贫”的问题是由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提出来的。该法案设立了一个计划,用以保护由于失业、

健康不佳、退休或丧偶所造成的收入损失。1948年的《国民援助法》(National Assistance Act)为那些没有被《国民保险法案》所涵盖的人提供资产测查补助。其他法律则把焦点放在家庭的需要(1945年的《家庭补贴法》[Family Allowances Act])以及改善住房条件的需要(1946年的《新城镇法》[New Towns Act])。

英国福利国家的形成,乃是基于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并伴随着关于社会性质的某些流行观念。福利国家的建立需要三个前提。首先,福利国家将工作等同于有薪劳动,并且以坚信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为依据。最终目标则是要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对于其中大多数人来说,有薪劳动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福利也会满足那些由于失业或残障等不幸而处于市场经济之外的人的需要。与此相联系,福利国家的设想是以家长制的家庭观念为依据的,也就是指靠男性挣钱养家,妻子则照料家务。各项福利计划都是围绕着这种传统家庭模式设计出来的,而第二层次的服务才是针对那些没有男性挣钱养家者的家庭。

其次,福利国家被认为促进了国民团结。通过把全体人口牵扯到一系列共同的服务中,整个国族被融合到一起。福利是一条增进国家与国民之间联系的途径。再次,福利国家致力于应对作为生命历程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出现的风险。就此而言,福利被视为一种保险,可以用来抵抗在不可预测的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潜在麻烦。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失业、疾病与其他不幸都可以通过福利国家予以应对。

在二战之后的30多年里,这些原则支撑了福利国家的巨大扩张。随着制造业经济的发展,福利国家代表了一种成功的阶级之间的“讨价还价”。它既满足了工人阶级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经济精英的需要,后者依赖于一支健康、高效的劳动力。然而,正如我们在下面几部分将要看到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意见分化成福利制度论与福利剩余论两大



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1979—1990)严厉抨击英国所谓的“依赖文化”。

阵营。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承认,形成福利国家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贝弗里奇报告》中有关福利的看法已经过时,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二 改革福利国家:保守党的“削减”

20世纪70年代,有关福利国家宗旨的政治共识开始瓦解,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政府都试图“削减”福利国家,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削减福利的尝试的核心在于几种主要的批评观点。第一种批评涉及不断攀升的财政开支。普遍的经济衰退,越来越多的失业,以及臃肿的福利官僚机构的出现,意味着福利支出持续稳步增长,并且高于总体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关福利开支的辩论引发了关于削减的倡

议,针对的正是福利体系所面临的飞涨的经济压力。政策制定者强调,“人口定时炸弹”给福利体系造成了潜在的巨大危害。随着整个人口的老年化,依赖福利服务的人数不断增加,然而处于劳动年龄的年轻人的数量却正在减少,可正是这批人在支付着福利体系。这就预示了一场潜在的财政危机。

第六章第四节第一小节讨论了人口的“老龄化”。

第二种批评的路数与福利依赖的观念有关。批评现有福利制度的人认为,人们开始依赖于原本是要让他们能够打造一份自立而有意义的生活的那些计划。这些人不仅在物质上变得有依赖性,而且在心理上也依赖福利给付的到来。他们对生活不是采取一种主动的态

度,而往往被动消极,听天由命,指望福利体系来资助他们(参看下一个图文框)。

在英国,有关福利依赖的讨论是与对于“保姆国家”(nanny state)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术语是指政府尽心尽责(但是没有必要)地照顾着公民的每一种需要。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鼓励把个体的主动性和自立自足作为核心的价值观。通过一系列福利改革,不再助长依赖被称为“来自国家的施舍”的行为,作为向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变的一部分。只有缺乏能力购买自己的福利的人,才会获得国家的协助。1988年的《社会保险法》(Social Security Act)通过提高收入资助、工薪家庭课税扣除以及住房补贴等计划的资格标准,使得国家有可能削减福利开支。

保守党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福利改革,把公共福利的责任逐步从公营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志愿组织以及地方社区。以前由国家以较

高补助率提供的服务现在被私有化,或者需要经过更加严格的资产测查。20世纪80年代政府廉租房的私有化进程就是一例。1980年的《住房法》(Housing Act)允许地方当局大幅提高政府廉租房的租金。这为大规模抛售政府廉租房奠定了基础。在住房供给方面转向福利剩余论,对那些刚刚超过住房补贴的资产测查资格线的人尤其不利。因为他们不再能获得公有廉租房,但又无力承担以市价出租的商品房。(本节前文介绍了福利剩余论的模式)批评者认为,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政府廉租房的私有化大大促使了无家可归者的增加。

另一项尝试是将市场原则引进公共服务的供应,以此减少福利开支,并提高其效率。保守党政府主张,在保健和教育等福利服务中引入一定程度的竞争,将给公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并且确保高质量的服务。实际上,消费者可

福利依赖

福利依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而且有些人否认这种依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他们说,“靠福利生活”一般被视为一种耻辱,大多数处于这种处境的人都会尽可能主动地想法避免,越远越好。

卡罗尔·沃克分析了一些研究,内容是靠收入资助过活的人如何打理他们的生活。但她的发现迥异于那些研究者所描绘的图景,后者认为靠福利生活不过是一种偷懒轻省的选择。在一项对失业人员的研究中,有80%的人自从靠福利生活以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趋于下降。对几乎所有人来说,生活都更像是一场战斗。另一方面,对少部分人来说,社会救助倒是可能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例如,一位失业者一旦达到60岁,就被重新标定为“养老金申领人”,并可能申请高于以往30%的补助。

诚然,在那些处境能够得以改进的人中,确实包括单身父母。研究表明,至多有三分之一的单身父母,其中几乎都是单身母亲,在婚姻解散之后要比以前过得更好。然而,大多数人还是会变得更糟糕。

20世纪90年代,只有12%的靠社会援助过活的人说自己“日子过得不错”。大多数人他们说只是“将就着”或者“有麻烦”。提前作计划是很难的。他们不能为未来储蓄,并且时时要操心账单。当手头拮据的时候,吃的东西尽管很重要,但还是经常被当作可以削减的东西。沃克的结论是:“尽管有那些耸人听闻的报章标题,但大多数人如果有真正的替代选择,是不愿意选择靠社会援助生活的。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处于那种处境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不幸事件:失去工作、失去伴侣或者健康状况开始变差。”(Walker 1994:9)

以通过选择学校或保健提供者来“用脚投票”^①。提供不合格服务的机构,将被要求改进或被迫关闭,就像企业一样。这是因为,在给一个机构提供基金的时候,将以选择使用其服务的学生或病人的数量为依据。但是批评者指责,公共服务中存在的“内部市场”将会使服务质量不升反降,形成一种分层化的服务供应体系,而不是保障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服务的价值观念。

三 对保守党削减政策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党政府在削减福利国家方面取得了多少成功呢?克里斯托弗·皮尔逊在《取消福利国家?》(Pierson 1994)一书中,比较了英国和美国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统治时期福利“紧缩”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经历保守党时代的福利国家仍然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皮尔逊指出,尽管两个政府都是带着大幅削减福利开支的明确意愿而上台执政的,但是,削减福利的障碍最终还是超出了两个政府所能够克服的程度。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相关社会政策是经过长时间的逐步展开的。自从实施以来,福利国家及其各项制度都孕育出了特定的选民群,积极地捍卫各自所获得的利益,以对抗减少福利的政治努力。从有组织的工会到退休人员协会,各个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复杂网络整个被动员起来,以支持福利国家。

根据皮尔逊的观点,指引有关紧缩福利的决策的因素,主要是对于公众呼声和反对的担忧。政治家们发现,削减福利国家远非彻底地反对福利扩张。其结果,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活动:通过补偿“受到损失的”群体,或者努力阻止利益群体之间的联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抗。皮尔逊写到,“围绕社会政策的斗争远不局限于福利国家扩张的时代,这种斗争

是有关政策变化的原因和结果的信息的斗争”(Pierson 1994:8)。真正大幅削减的那些社会政策,比如失业补助,一般都是成功地阻止了利益群体的动员。

皮尔逊认为福利国家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是拒绝承认它已经“身处危机”。他提出,社会开支已经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而且福利国家的所有核心成分都得以保存。他并不否认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改革大大加剧了不平等。但也指出,总的来说,社会政策的改革幅度并不像产业关系或调控政策的力度那么大。在英国,大多数人依然依赖着公共保健和教育服务,而在美国,福利的供应则更加剩余化了。

四 新工党与福利改革

对于1997年在英国开始执政的新工党政府来说,福利改革仍然是当务之急。新工党已经在某些方面与对于福利的保守党批评者取得了共识(并且与传统的左派政治分道扬镳),但还是提出,新福利政策除了改善保健和教育之外,还需要处理贫困与不平等的问题。福利国家本身经常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伸出的是“施舍之手”(hand-out),而非“扶持之臂”(hand up)。这就导致了臃肿的官僚机构,现在竭力应付已经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而不是防患于未然。这种思路并未成功地在全体人口中减少贫困或重新分配收入。据说,贫困的减少与其说是社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财富总额的增长。

福利体系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产生它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福利国家是在充分就业的时代创建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男性挣钱养家的夫权观念不再适用。大量女性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单亲家户也日渐增加,这就对福利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福利国家需要应付的风险类型也有显著的转变。

^① 指以退出或离开表示不赞同、不满意。

本节第一小节讨论了把国家视为聚合力量应对风险的手段的概念。而第四章第四节第二小节则讨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以及风险社会对于福利国家的意义。

比如说,福利国家已经表明不足以用来应对环境污染或吸烟之类的生活方式选择所带来的有害后果。

政府上台不久,就发布了一份报告《我国的新目标:一份新的福利契约》(1998),评价了福利国家,描绘了一幅“积极福利”(active welfare)的图景,旨在从人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两方面予以培力^①。这份报告基本上是当时的福利改革大臣菲尔德的手笔,前文(本小节)已经讨论过他反对福利剩余论的立场。新工党声称解决贫困与不平等的旧办法已经不再适用,提出了国家和公民之间以权利与责任为基础的“福利契约”设想。国家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获得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而不只是当他们被劳动力市场排斥在外的时候才伸出援手。与此同时,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公民必须信赖他们的行动潜能,而不是坐等福利补助发放。

就业成为新工党社会政策的一块基石,而在福利改革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劳动力市场能够扮演何种角色,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回头看来,增加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的目标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至2003年6月,就业年龄人口的就业率连续三个月达到75%,这是十三年来的最高点。这种思路背后的理念在于,市场不仅产生不平等,而且也可能减少不平等。让人们从事工作,并给家庭带来收入,这是可能采取的减少贫困的主要举措之一。新工党领导下最重要的福利改革之一就是福利上岗计划(welfare-to-work programmes)(参见下

一个图文框),其真正的意图就是让人从接受福利到接受有薪工作。福利上岗补助旨在鼓励多种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给25岁以下的年轻人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而不是接受国家的收入资助。向单亲父母授予工薪家庭课税扣除,以资助育儿开支。给长期失业人员提供相关课程,培训如何在工作面试时向雇主展示自我。

除了上面讨论的福利上岗计划,新工党也利用福利国家来提升那些从事低薪工作的人的收入。1999年开始设立了最低工资。同时,在所得税的基本税率方面也有削减。2003年,为没有孩子的低收入者建立了工作课税扣除(working tax credit)。1999年,工党政府承诺要在2020年之前彻底消灭儿童贫困。除了上述变化,儿童补贴以及为11岁以下儿童制定的资产测查补贴率都有所提高,更直接地针对了儿童贫困问题。最近的一些评估表明,政府已经部分实现了它的目标,至2002年,儿童贫困数减少了100万(Piachaud and Sutherland 2002)。尽管如此,也有人指出,即使2010年儿童贫困数减半的十年目标最终能够实现,贫困儿童的规模也依然高于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之时(Flaherty et al. 2004)。

新工党也支持旨在减少贫困的地方性举措,以此致力于提高个人和社区“自助”的社会能力。已经在全国设立了一批健康行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社区培力特区,使地方决策者能够设计适合本地居民需要的解决方案。这种思路有几点好处:更直接地针对援助对象,可以引进小规模的创新计划,而且提高了地方的决策参与。这类计划使福利的形式更加积极主动,公民在其中可以与国家共同努力,为自己打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尽管对有必要变革这一点已经达成了普遍共识,但是,关于福利改革的讨论并未消退。新工党的思路并非没有批评者。一些人认为,

^① 培力(empowerment):又译增权。

评价福利上岗方案

1997年以来,工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旨在将人们从福利推向工作。针对残障人士、长期失业者、年轻人和50岁以上人群,已经设置了一批“新政”计划。类似的计划在美国也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机会能够研究其产生的影响。但英国采用就业福利方案只是最近的事,所以还不可能充分判断它的全部结果。丹尼尔·弗里德兰德和加里·巴特莱斯就研究了旨在鼓励福利接受者寻找有薪劳动的四项不同的政府促动计划。这些计划大致方向类似。它们除了提供求职技巧指导以及教育和培训机会,还为主动求职的福利接受者提供经济补助。目标人群主要是作为受抚养孩童家庭援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接受者的单亲户主。该计划是全国最大的现金福利计划。弗里德兰德和巴特莱斯发现,这些计划确实有效果。参与这些计划的人能够比没有参与的人更快地就业或开始工作。四项计划所取得的收益是净成本的好几倍。然而,对于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即长期没有工作的人,所谓长期失业者,它们基本没有效果(Friedlander and Burtless 1994)。

一些统计数据表明,尽管福利上岗计划成功地将美国的福利申请减少了将近40%,然而

结果并非都是有益的。在美国,不再接受福利的那些人中有大约20%不但没有工作,而且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而那些确实找到工作中的人,几乎有三分之一在一年之内又返回来申请福利。不再接受福利而开始工作中的人,大致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发现,他们的收入还赶不上以前的补助水平。在美国第一批实施福利上岗计划的威斯康星州,不再领取福利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Evans 2000)。针对这种发现,批评者们提出,表面来看,福利上岗措施成功地减少了福利个案的绝对数量,但却掩盖了那些失去福利的人的实际体验中一些令人困扰的趋势。

还有人质疑地方培力“特区”(local empowerment “zones”)在与社会排斥进行斗争时是否有效。他们提出,贫困与剥夺并不只是集中在那些指定的地区,然而这些计划的目标却似乎意味着所有穷人都生活在一起。在英国,政府自身的社会排斥部门的发现就支持了这种说法:1997年,也就是工党上台时,有三分之二的失业人员并不居住在全国44个最贫困的市镇。质疑者指出,地方化的举措不能代替全国性的反贫困战略,因为有太多的人并不住在指定的培力区域。

福利上岗计划等于是冷酷无情地削减社会开支。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尽管接受了培训和育儿奖励,但仍然有失去福利补助的危险。尽管这些计划的宗旨原本在于削减助长福利依赖的条件,但可能最后会迫使那些失去补助的人沦入犯罪、卖淫或无家可归的生活。

小结: 变迁世界中的贫困与福利

支撑撒切尔夫人与约翰·梅杰两届政府(1979—1997)各项政策的理论,就是认为减

轻个体和企业的税率,将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其成果将会“滴入”穷人。^①而在美国,从里根到老布什的几届总统任期(1980—1992),以及小布什治下(2000年至今),也实行了类似的政策,但结果都大致相仿。并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滴入”论。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不一定能够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其结果却往往扩大了贫富之间的差异,增加了陷入贫困的人数。无论是基于收入的贫困测定,还是基于必需品剥夺的贫困测定,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都大大加剧了。

职业结构和全球经济的变迁也都助长了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的不平等趋势。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力减少,对于收入分配的模式和失业的模式都产生了重要效应。事实上,从事非熟练技能型或半数练技能型工作的工人,常常发现很难重新进入一个迅速变迁中的劳动力市场,其对于教育资格和技术能力的要求都越来越高。尽管在服务业领域的机会会有显著的扩张,但其中大部分岗位薪酬微薄,并且没有什么晋升的前景。

左翼政治家传统上力求通过将富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贫困者的办法来根除不平等(增加结果平等)。福利国家和高税率是进行这方面尝试的两种做法。然而,这些思路并未能消除贫困,而且往往产生意外的后果。在二战以后英国建造的大型政府公屋,有时候是为重新安置贫民窟居民而建造的,已经成为英国受社会排斥程度最严重的一些区域。与此类似,1945年以后福利国家的扩张却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福利依赖。

新的平等观念正在逐渐发展,摆脱了以前“左翼”或“右翼”的社会政策议程。平等观念正在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方式来修正,强调机会平等,强调多元主义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重要

性。我们对于不平等的理解也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经济不平等继续存在,但在其他方面,我们的社会正变得日趋平等。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女性都要比前几代享有更多的平等。同时,在少数族群中,法律和社会方面也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以两人挣钱为特征的“就业充裕”(work-rich)家庭和没有人活跃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匮乏”(work-poor)家庭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女性挣的钱对于家庭收入的意义比从前更加重要。同时,随着女性所占据的重要的高薪岗位越来越多,对于她们收入的危害也有了很大的权重。事实上,两人挣钱家庭的成功,特别是那些没有孩子的两人挣钱家庭的成功,就是收入分配模式转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两人挣钱、单人挣钱和无人挣钱几类家庭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

但是,在此背景下,我们的社会也面临着新的风险和威胁。而这些风险的影响对于贫者和富者是一视同仁的。污染、环境破坏以及城市的过度增长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这些威胁的形成,应该是人人有责,如果要对它们加以管理,就要求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要发生变化。

一旦我们开始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国家与福利服务的角色必然受到审视。福利不只与物质繁荣有关,而且也与全部人口的整体幸福有关。社会政策致力于提高社会凝聚力,培育相互依赖的网络,并且尽可能提高人们的自助能力。权利和责任正表现出新的重要意义,它们所针对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正试图摆脱福利而参加工作的人,而且也包括那些位于顶层的人,他们的财富并没有使他们有资格逃避公民义务、社会义务与财政义务。

^① 滴入(trickle down):亦译“垂滴”,一种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与其将财政津贴直接用于福利事业或公共建设,不如交由大企业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之手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本章要点

- 1 理解贫困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绝对贫困指的是缺乏维持健康和有效的身体机能所需要的基本资源。相对贫困指的是评价一些群体的生活条件与大多数人享有的生活条件之间的差距。
- 2 在许多国家，官方对于贫困的测定参照了一条贫困线。在这个水平之下的人就可以说是生活在贫困中。而主观角度的贫困测定乃是基于人们对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水平需要何等条件的理解。
- 3 贫困在富裕国家也普遍存在。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英国取得了发达世界中最糟糕的贫困记录之一。政府的政策，职业结构的变迁，以及失业，都大大加剧了贫富之间的不平等。
- 4 穷人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处于弱势或遭受歧视的人（例如老人、儿童、女性以及少数族群）更有可能成为贫困者。
- 5 有关贫困的说明可以采用两种主要思路。“贫困文化”和“依赖文化”的论点宣称，穷人要为自己的弱势负责。由于缺乏技能、缺少动力或道德上的缺陷，穷人没有能力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其中一些人变得依赖于外部的援助，例如福利救济，而不是自助。第二种思路提出，贫困乃是源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过程。个体行动既会增强这样的过程，也会受到它们的影响。
- 6 社会排斥是指个体可能被切断全面参与更广泛的社会的过程。社会排斥这个用语比贫困更为宽泛，尽管缺乏资源和收入也是社会排斥的一个方面。社会排斥的其它方面还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服务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无家可归是最极端的社会排斥形式之一。没有固定住处的无家可归者可能无法从事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日常活动。
- 7 所谓福利国家，就是政府通过救济或补助某些商品和服务，在减少人口内部的不平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福利服务各国皆有不同，但常常包括教育、保健、住房、收入资助、残障金、失业金和养老金等内容。
- 8 在提供普遍补助的福利国家，不管收入水平或经济地位如何，当需要时享受福利是所有人平等享有的一种权利。与此相反，资产调查补助只有某些人可以获得，他们的资格是因为收入很低、储蓄甚微甚至根本没有。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福利救济的未来正面临争论。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应该更好地为福利提供资金并且将其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福利只应该作为安全网，为不能真正从其他途径获得帮助的人服务。
- 9 目前的英国福利国家是在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党政府治下的扩张时期。它的宗旨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的福利。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福利国家因为效率低下、官僚作风和开支过高而受到批评。也有对福利依赖的担心，指人们过度依赖原本是要帮助他们过上独立生活的那些计划。
- 10 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试图通过把公共福利的责任从公营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志愿组织和地方社区，以削减福利国家。去机构化

是指让原本由国家（在机构中）照顾的个体重新返回家庭和社区的过程。

11 新工党政府推行了众多福利改革措施，包括旨在让福利接受者从事有薪工作的福利上岗计划，以及减少儿童贫困。

思考建议

1. 再看一看本章的开场白：卡罗尔为什么贫穷？
2. 为了“充分而有意义地”参与社会，你需要什么样的收入水平？
3. 为什么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贫困率提高了？
4. 福利依赖能够说明贫困的持续吗？
5. 什么是造成无家可归现象的原因，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6. 为什么减少福利开支的努力基本上失败了？

阅读指南

- Jet Bussemaker (ed.), *Citizenship and Welfare State Reform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9). 《欧洲的公民权与福利国家改革》
- H. Dean, *Welfare Rights and Social Policy* (Harlow: Prentice-Hall, 2002). 《福利权利与社会政策》
- Jan Flaherty, John Veit-Wilson and Paul Dorman, *Poverty: The Facts, 5th edn*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2004). 《贫困实情》
- Gordon Hughes and Ross Ferguson (eds), *Ordering Lives: Family, Work and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2000). 《规制生活：家庭、劳动与福利》
- Ruth Lister, *Poverty* (Cambridge: Polity, 2004). 《贫困》
- 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公民权与社会阶级论集》
- J. Pierson, *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应对社会排斥》
- T. Ridge, *Childhood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2). 《儿童贫困与社会排斥》
- Robert Walker (ed.), *Ending Child Poverty: Popular Welfa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ristol: Policy Press, 1999). 《消灭儿童贫困：21 世纪的大众福利？》

网络导航

社会排斥问题机构 (Social Exclusion Unit)

<http://www.socialexclusion.unit.gov.uk>

儿童贫困行动小组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http://www.cpag.org.uk/>

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监测网 (Monitor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http://www.poverty.org.uk/>

机会共享网 (Opportunity for All)

<http://www.dwp.gov.uk/ofa/>

社会市场基金会 (The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http://www.smf.co.uk/>

目录

第一节 全球经济不平等	319
11.1.1 高收入国家	321
11.1.2 中等收入国家	321
11.1.3 低收入国家	321
11.1.4 全球经济不平等是否还在加剧?	322
第二节 富国与穷国中的生活	324
11.2.1 健康	324
11.2.2 饥饿、营养不良与饥荒	324
11.2.3 教育与读写能力	326
第三节 穷国能否变富?	327
11.3.1 关于发展的理论	332
11.3.2 评估各种发展理论	338
11.3.3 国际组织的角色与全球不平等	338
11.3.4 变迁世界中的全球经济不平等	340
第四节 世界人口增长	342
11.4.1 人口分析:人口学	343
11.4.2 人口变迁的动力	344
11.4.3 马尔萨斯主义	346



11.4.4 人口转变 346

11.4.5 变迁的前景 347

本章要点 349

思考建议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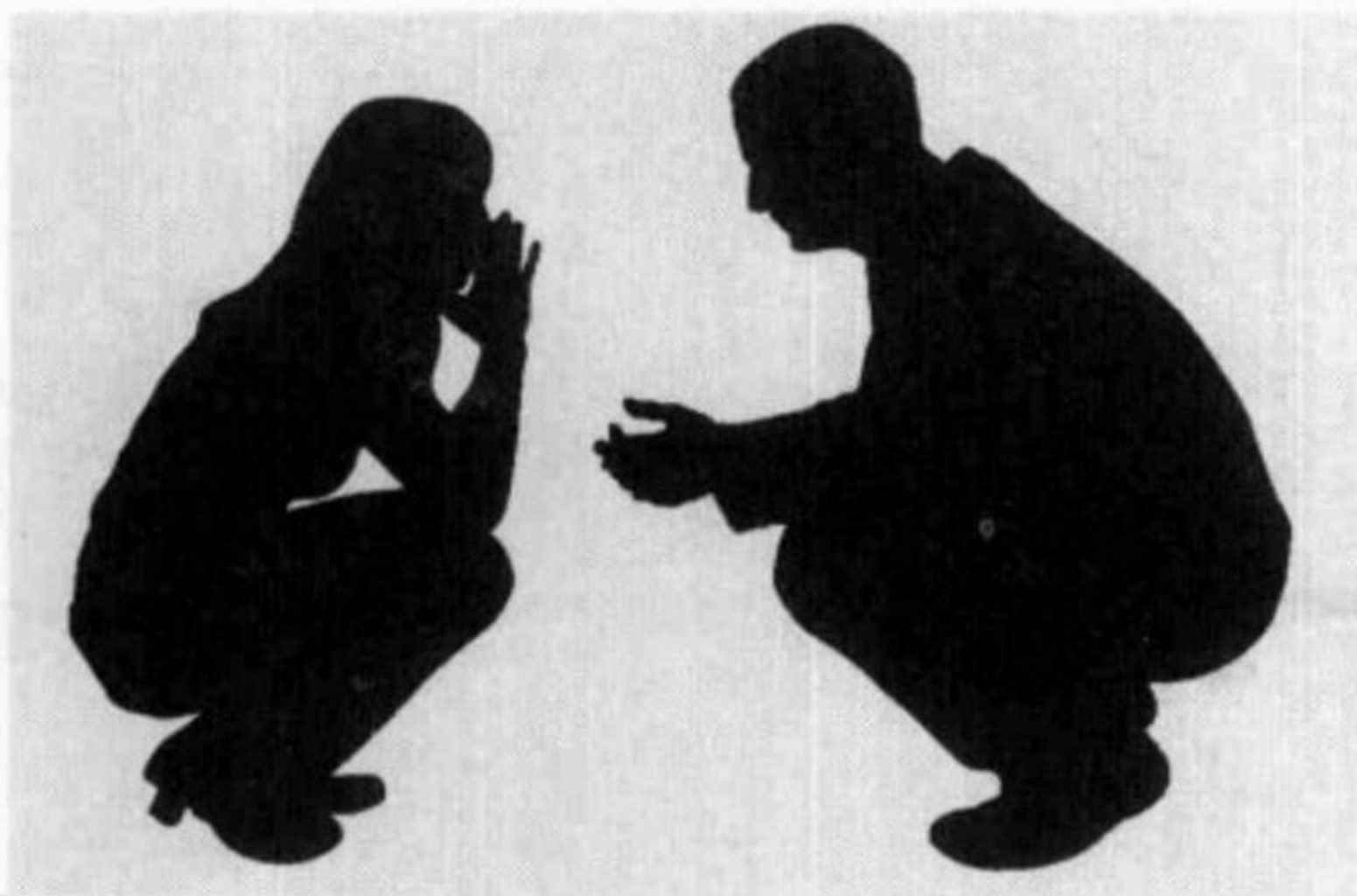
阅读指南 350

网络导航 350



第十一章

全球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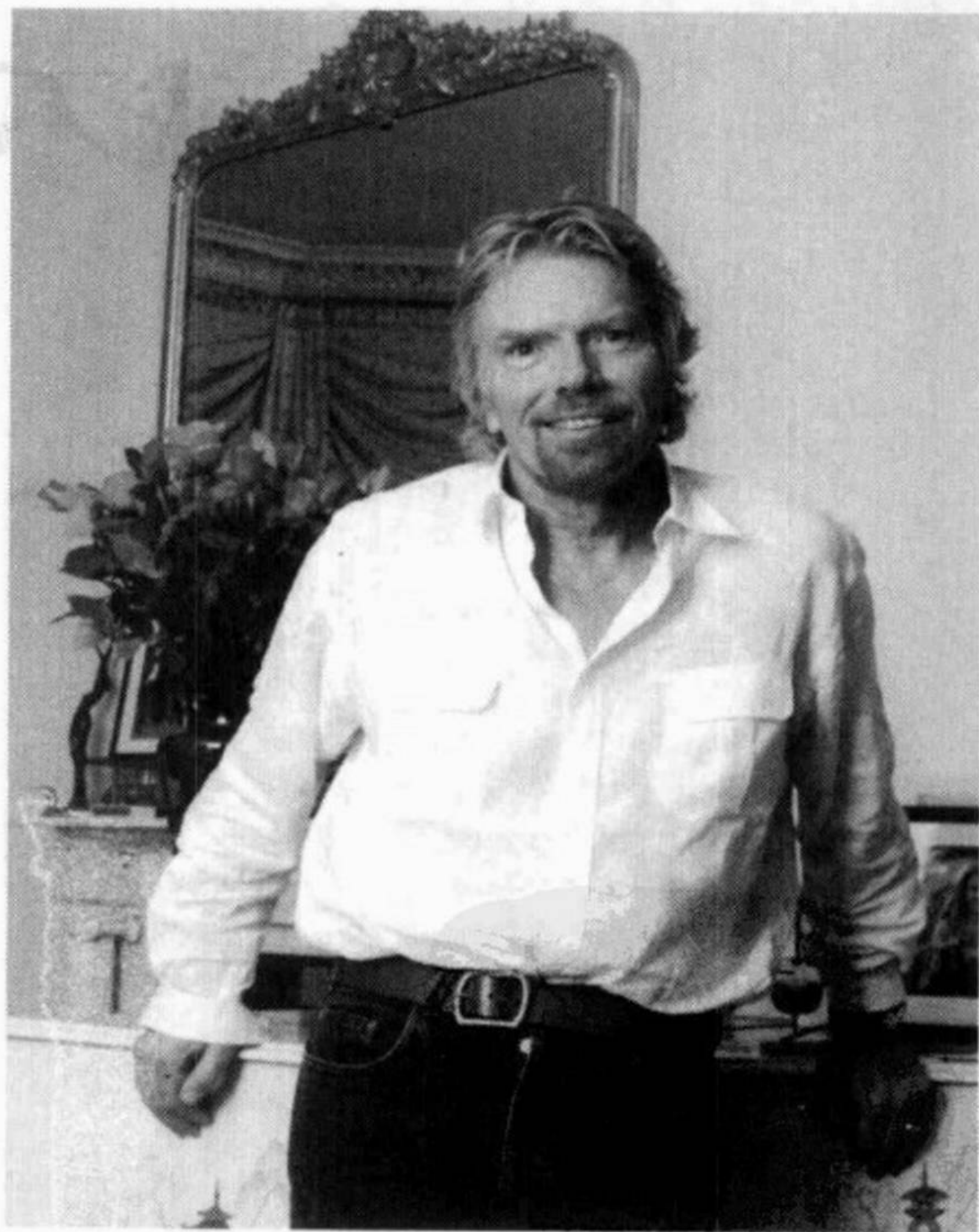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已经看到，出现了规模史无前例的全球亿万富翁。截止到 21 世纪之初，全世界共有 573 名亿万富翁，其中 308 位在美国，114 位在欧洲，88 位在亚洲^①，32 位在拉丁美洲，15 位在加拿大，13 位在中东，3 位在澳大利亚 (Forbes 2000) (本书中，亿万富翁的定义为至少拥有 10 亿美元财富的人)。他们在 2000 年年中的资产总额估计为 1.1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代表全球人口三分之一强的 87 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额 (根据世界银行 2000 至 2001 年度统计计算)。

在 2004 年，全世界首富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其资产净值为 253 亿英镑 (参看表 11.1)。盖茨的财产主要基于其持有的自己公司的股票，他俨然成了企业精神的人格化身：这个迷恋电脑的呆子成了资本家，他的软件为几乎所有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盖茨的资产净值大约为 1 千亿美元。但在达到这一巅峰之后不久，微软股票的这一高值开始走低，使盖茨的财产大大缩水，但仍足以位列全世界最富的个人 (Forbes 2004)。

而在 2004 年，英国首富是阿布拉莫维奇，资产 75 亿英镑，他以切尔西足球俱乐部主人的身份而闻名全英。阿布拉莫维奇来自俄罗斯，出身贫寒，四岁就沦为孤儿，曾经靠卖汽车轮胎来挣钱糊口。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

解体之后，他从俄罗斯石油产业私有化的进程中大发其财。威斯敏斯特公爵在英国富豪榜上位列第二，资产为 55 亿英镑，在伦敦地价高昂的两个区段梅费尔 (Mayfair) 和贝尔格莱维亚 (Belgravia) 拥有大量地产。其他位列十大富豪的人还有菲利普·格林，阿卡迪亚 (Arcadia) 零售集团主人，以 36 亿英镑名列第四，该集团旗下拥有精品店 (high street outlets) “British Home Stores”、“Top Man”，“Top Shop”和“Miss Selfridges”；理查德·布兰森爵士，排名第六，其维金集团的收入来自音乐、铁路、航空、抵押、移动通信乃至婚礼礼服，使其个人资产达到 26 亿英镑 (参看第九章第四节第一小节表 9.3)。

在 2004 年全世界最富的前 40 位个人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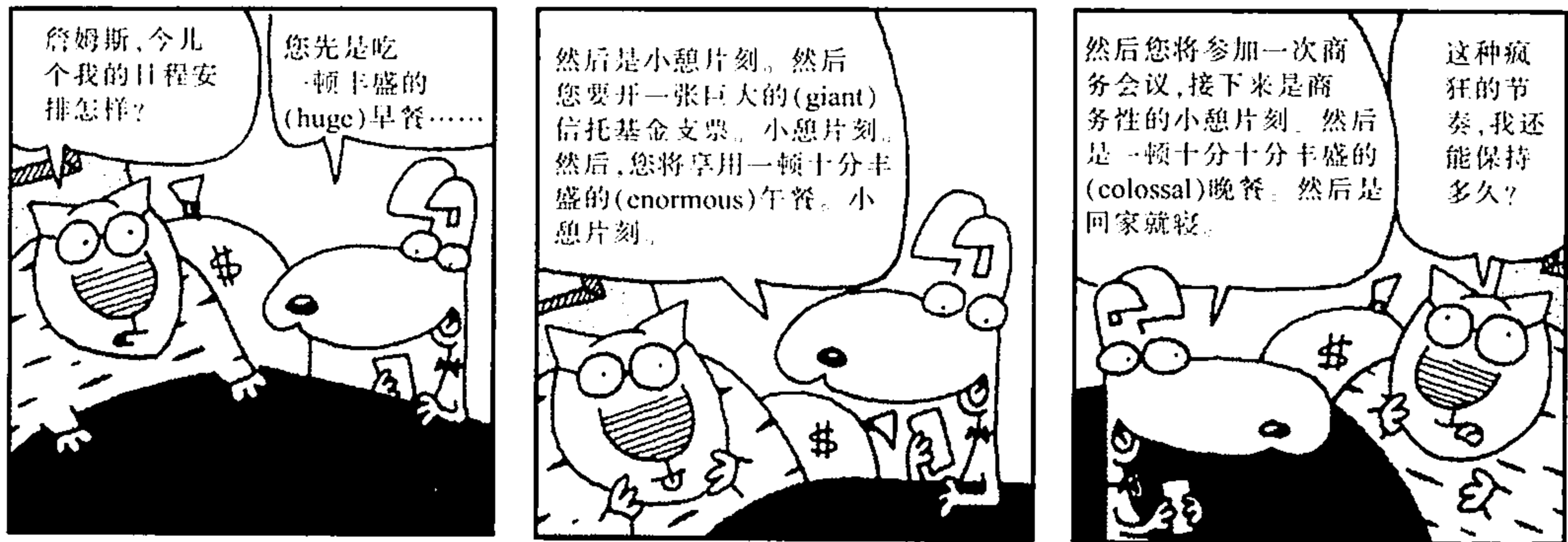
理查德·布兰森爵士是英国顶尖巨富之一，不过比起比尔·盖茨这等人物来，他的财富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① 原文如此，本书指亚洲时往往不包括中东，而所谓中东倒往往包括北非。

表 11.1 2004 年全世界前 40 位富豪及富豪家族

	姓名	国家或地区	行业	财富(亿英镑)
1	罗布森·沃尔顿及其家族	美国	零售(沃尔玛)	542
2	比尔·盖茨	美国	软件(微软)	253
3	沃伦·巴菲特	美国	投资	233
4	阿尔布莱希特兄弟及其家族	德国	超市	223
5	小弗雷斯特·玛尔斯和约翰·玛尔斯及家族	美国	甜品加工	169
6	法赫德国王及其家族	沙特阿拉伯	石油	135
7	芭芭拉·科克斯·安东尼与安妮·科克斯·钱伯斯	美国	传媒	121
8	阿尔瓦利德王子	沙特阿拉伯	投资	116
9	保罗·艾伦	美国	软件(微软)	114
10=	阿布扎比酋长(Sheikh of Abu Dhabi)	阿布扎比(阿联酋)	石油、投资	108
10=	约翰娜·匡特及其家族	德国	轿车(宝马)	108
12	利利雅娜·贝当古	法国	化妆品	102
13	拉里·埃里森	美国	计算机(甲骨文)	101
14	英格瓦·坎普拉德	瑞典	零售(宜家)	100
15	肯尼思·汤姆森	加拿大	传媒、石油	93
16	萨缪尔·纽豪斯与唐纳·纽豪斯	美国	出版	83
17	罗伯特·普瑞茨克与托马斯·普瑞茨克	美国	旅店、投资	82
18=	科威特埃米尔(Emir of Kuwait)	科威特	石油	81
18=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俄罗斯	石油	81
20	阿比盖尔·约翰森与爱德华·约翰森	美国	投资	80
21	文莱苏丹(Sultan of Brunei)	文莱	石油	77
22=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	英国	石油、投资	75
22=	卡洛斯·斯利姆·埃卢	墨西哥	电信	75
24	迈克尔·戴尔	美国	计算机(戴尔)	70
25=	史蒂夫·巴尔默	美国	软件(微软)	67
25=	布伦宁梅耶家族	荷兰	零售	67
25=	李嘉诚	中国香港	工业	67
28	伯纳尔·阿尔诺	法国	奢侈品	66
29	郭氏兄弟(The Kwok Brothers)	中国香港	地产	62
30	约翰·克鲁格	美国	传媒、电话	57
31=	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	意大利	传媒	54
31=	马赫托姆酋长	阿联酋	石油、金融服务	54
33=	布瑞吉特·劳辛及其家族	瑞典	包装	50
33=	威斯敏斯特公爵	英国	地产	50
35=	查尔斯·埃尔根	美国	卫星电视	49
35=	阿曼西奥·奥特加	西班牙	时装	49
35=	汉斯·劳辛及其家族	英国	包装	49
38	萨姆纳·雷德斯通	美国	传媒	48
39=	奥瑞/霍夫曼家族(The Oeri/Hoffmann family)	瑞士	制药	47
39=	斯蒂芬·佩尔森	瑞典	零售	47

资料来源:《星期日泰晤士报》(2004年4月18日)



家族中,有 16 位来自北美,15 位来自欧洲(包括俄罗斯),6 位来自中东,2 位来自中国香港,1 位来自墨西哥(Forbes 2004)。如果说比尔·盖茨代表了西方式的高科技企业家,那么香港的李嘉诚——他在榜单上名列第 25 位——就是作为许多亚洲商人成功标志的白手起家(rags-to-riches)的传奇英雄。李(这是他的姓)最初是做塑料花入行的,而到了 2004 年,他的个人财富达到 67 亿英镑,来自亚洲各地的各种房地产和投资,包括对于星空电视(STAR TV)的家族所有权,这颗电视转播卫星覆盖了半个世界。

全球化,即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愈益相互联结的进程,已经产生了难以想像的财富机会。只需看一看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富人士的榜单,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把自已的财富说成是“新兴企业财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迅速积累起来。[榜单中很少人士是依靠代代相传的遗产继承而成为富人的,尽管也有例外,比如英国第二富豪威斯敏斯特公爵(六世)]无论是英国首富阿布拉莫维奇,还是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新兴企业财富。这两位超级亿万富翁(multi-billionaires)在各自国家的出身背景都相对平平,后来才赢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两人都受益于全球化:阿布拉莫维奇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趁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出售其国有化产业之机,买断了俄罗斯石油行业的

某些部分;而盖茨则是参与了推动全球化的一些新信息沟通技术。(第二章介绍了全球化的观念)

但全球化的益处分配并不均匀,并不是人人得享的。比如说维拉·塔莎格,在泰国曼谷工作的一位 24 岁的制衣工,她和泰国其他 100 多万制衣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工——一样,每周工作 6 天,每天从上午 8 点工作到晚上 11 点,挣的钱却仅仅相当于每小时 2 英镑多一点(Dahlburg 1995)。数十亿像塔莎格这样的工人正在沦为全球劳动力,许多人的工作条件充满压迫性,如果按照英国的就业法规,比如对于最低工资的要求,即使不是不可想像的,也是让人不能接受的。而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尽管有许多国家,比如俄罗斯,已经发现参与全球经济在社会角度和经济角度上都是问题重重,起步之初尤其如此,但对于那些尚处世界经济之外的社会中的人口来说,日子还要糟糕得多。

在前一章中,我们考察了英国的贫困与社会排斥,点明了个人之间在收入、财富、工作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整个世界,其程度甚至更有甚之。我们可以讨论一国之内的富人与穷人,也同样可以讨论世界体系中的富人与穷人或富国与穷国。在本章中,我们将来看看 20 世纪晚期与 21 世纪初期的全球不平等。我们首先简要讨论一下对于“全球不平等”这个词的理解,看



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受雇于全球各地的“血汗工厂”，工时长，条件差，报酬低。

看我们对于这个术语的界定如何改变了我们对于它的思考。我们要考察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生活方式的经济水准的差异。然后，我们将转向世界上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理解哪些国家和地区正在改善它们的命运，又为什么会如此。这将使我们讨论试图说明全球不平等为何存在、能够如何应对的不同理论。本节最后，我们将估测全球世界中经济不平等的未来走向。考察完全球不平等，我们将阐述全球人口增长，在世界上最为贫困的一些国家，这个趋势也最为剧烈。

经济不平等只是全球社会不平等的形式之一。由于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也因为一本这种类型的书必然是篇幅有限，所以本章将只集中探讨经济不平等，而放过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地位方面的不平等，比

如与污名化和排斥有关的那些不平等，在其他章节有所论述。（例如，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讨论了污名化的概念）权力方面巨大的不平等，也是这个世界的典型特征，在专制政权下尤其如此。这种权力不平等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都存在，是世上许多根深蒂固的冲突的重要源泉。（我们将在第二十章讨论政治权力与不平等）

第一节 全球经济不平等

全球经济不平等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y)^①主要指国与国之间在财富、收入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国与国之间的这些差异是与一国之内的这些差异同时

^① 原文此处格式如此，但书后的术语表中并无此词条。

存在着的：当今之世，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穷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而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也正在生产出许多世界巨富。社会学的挑战不仅仅在于分辨出所有这类差异，而且在于说明它们为何会发生，又如何有可能予以克服。

从全球不平等的角度来给各国分类，方式之一就是比较它们的经济产出。而经济产出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或称GDP。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一国之经济在某一特定年份生产出的全部有记录的物品与服务。而个人或企业在海外挣得的收入则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另一个重要测量指标是国民总收入，或称GNI。[国民总收入的正式称法是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或称GNP]。国民总收入不同于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了个人或企业在国外挣得的收入。对于经济活动的测量指标，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总收入，常常还要按照人均来显示，这就使我们能够比较一国之内处于平均水准的居民的财富。而为了比较不同的国家，我们就需要使用某种共同货币。绝大多数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使用的是美元。

世界银行是一家国际贷款组织，为比较贫困的国家的发展计划提供贷款。它使用人均国民收入，将各国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等几类。这一分类体系将有助于我们更方便地理解，在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水准上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世界银行（2003）把132个国家——包含了将近60亿人口——分为三类经济等级。（世界上另有74个经济体，大约包括1亿7千8百万人，世界银行未提供数据，原因是缺乏数据，或者是该经济体的人口少于150万人）全世界40%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同时只有15%的人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不过要记住，这种分类是基于各国的平均收入；因此，它掩盖了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这类差异可能非常显著，只是我们本章不把重点放在这

方面。比如说，世界银行把印度归为低收入国家一类，因为它在199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50美元。然而，尽管印度的贫困普遍流行，却也有规模可观并且还在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在1999年被重新归类，从低收入国家改为中等收入国家，因为它在该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780美元（提醒一下，世界银行为中等收入国家规定的低限为756美元）。不过，即使中国的平均收入现在达到了中等地位，却仍有上亿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话说回来，单单基于收入来比较各个国家，或许会有误导性，因为国民总收入只包括了生产出来供现金售卖的物品和服务。而低收入国家的许多人是限于自给自足或进行物物交换的农夫或牧民，没有什么现金交易。他们的作物和牲畜的价值未被统计在内。不仅如此，经济的产出也并非一个国家的全部。各国都拥有独特的语言和传统，千差万别。贫穷的国家在历史和文化的丰富程度绝不比它们的富裕邻国逊色，即使其人民的生活要艰苦得多。

即使我们仅仅基于经济统计来比较各个国家，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比较，也很可能影响我们的结论。比如说，如果我们选择通过比较家户消费（household consumption，包括食品、药品或其他产品的消费）的水平而不是国民总收入来研究全球不平等，就有可能得出另一种关于全球不平等的结论。我们还能考虑其他的因素。比较几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也很不错，但它未能考虑一个国家中真实的开销。比如说，如果两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基本相当，但在第一个国家中，一个家庭普通的一顿饭只需花几美分，而在第二个国家里，一顿饭要花几美元，那么我们就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再要说它们是同等富裕的具有误导性：不管怎么说，在第一个国家里，你的钱可以换来更多的东西（实际生活中，差异不太可能如此悬殊）。因此，调查者可能转而选取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 PPP），以消

除两国之间的价格差异。《经济学家》杂志使用了一个著名的购买力评价测量指标,即它看似轻松的“巨无霸指数”(Big Mac Index),比较不同国家中购买我们将在第十六章引言中看到的同等配料汉堡包的价格。而在本章当中,我们将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国民总收入,不过你始终应当意识到,通常还使用其他几种测量指标。

11.1.1 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一般是那些最先工业化的国家,这个进程开始于大约 250 年前的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只是在 30 年前,日本才加入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而新加坡、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则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进入这一范畴。至于这些亚洲工业化后来者为何会取得成功,在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当中有大量争论。我们在本章稍后再来谈谈这些原因。

高收入国家仅占世界人口的 15% (大约 8.91 亿人),但却占有全世界年度财富产出的 79% (根据世界银行 2000—2001 年度报告推算)。高收入国家提供了体面的住房、充足的食物、干净的饮水,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不曾听闻的舒适生活。尽管这些国家也常常有大量穷人,但它们的绝大多数居民都享有世界大部分人口不能想像的生活水准。

11.1.2 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主要是在东亚和东南亚,中东与北非的产油国,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古巴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南

美洲),以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及其东欧盟国等国家。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是在 20 世纪才较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因此其工业化程度还不像高收入国家那样发达(也不那么富裕)。另一方面,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化程度很高,只是在苏联和东欧解体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它们的生活水准有所衰退。比如说,在俄罗斯,普通人的工资在 1998 年^①至 1999 年之间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而退休金下降了将近一半:数百万人,其中许多是老人,突然发现他们陷入赤贫(CIA 2000)。

1999 年,中等收入国家涵盖了世界人口的 45% (27 亿人),但仅占该年财富产出的 18%。尽管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比他们在低收入国家中的邻居要优裕得多,但大多数人根本不享有高收入国家常见的的生活水准。世界上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 1999 年到 2000 年期间有所扩张,至少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体系是这样,拥有 13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 22%)的中国由于其经济成长而被重新归类,从低收入国家改为中等收入国家。不过,这一重新归类颇有些误导性,因为中国 2003 年的年度人均收入为 1100 美元,离低收入国家的分界线(766 美元)很近,并且其大部分人口事实上生活在世界银行标准中的低收入范畴。

11.1.3 低收入国家

最后,低收入国家包括大部分东非、西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少数几个东亚国家;南亚的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格鲁尼亚和乌克兰等中东欧国家;西半球的海地和尼加拉瓜。这些国家大多数属于农业型经济,只是在晚近才

^① 此处原文如此,疑为“1989 年”之误。

开始工业化进程。它们的工业化为何姗姗来迟,贫困为何普遍存在,学者们多有争论,我们在本章稍后将会看到。

1999年,低收入国家占到世界人口的40%(24亿人),但只生产了世界年度财富产出的3%。更有甚者,这种不平等还在进一步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要比其他地方高得多,因为在这些地方,大家庭可以提供额外的农业劳动力,或者以别的方式有助于家庭的收入。(而在富裕的工业社会,孩子们更有可能去上学而不是下地,大家庭的经济收益下降,因此人们养的孩子也往往少些)有鉴于此,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印度是个主要的例外^①)增长速度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多(World Bank 2003)。(有关全球人口增长,详见本章第四节)在许多这类低收入国家中,人们与贫困、营养不良乃至饥饿作斗争。大多数人生活在乡村,不过,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变化。数以千万计的人们正源源涌向规模巨大、人口拥挤的城市,在那里,他们要么生活在废弃的房屋之中,要么干脆睡在大街上(参看第二十一章)。

11.1.4 全球经济不平等是否还在加剧?

全球不平等是正在加剧还是正在缓解,这个问题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了两极化的意见分歧。抗议者们认为全球化制造了不平等,而捍卫者们则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上的贫富两方之间一种重要的均衡力量。全球不平等中最初的重大变迁发生在两个多世纪之前,当时是工业革命,先是欧洲,然后是其后地区,经历了迅速的经济扩张,使世界其他地方在财富方面远远落在后面。

那些认为全球不平等正在加剧的人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化已经使得随着工业化而开始的不平等趋势愈发恶化。批评全球化

的人们援引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UNDP 1999)的统计数据,其中指出,1960年,生活在富裕国家的20%世界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世界人口的30倍;而到了1997年,前者的收入是最穷的20%世界人口的74倍(转引自《经济学家》2002年7月18日)。

与此相反,其他人则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间,全世界的总体生活水准已经取得缓慢的上升。衡量世界最穷人口的生活水准的许多指标呈现出改善趋势。文盲率下降,婴儿死亡率和营养不良率正在降低,人们更加长寿,贫困状况(常常界定为生活在每天不到1或2美元标准下的人数)也在下降。

但不管怎么说,国与国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些收益中有许多属于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许多最贫穷国家中的生活水准已经下降。事实上,对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就是美国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繁荣增长的年代。但2003年度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却发现,在这十年间,有五十多个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由于饥荒、全球艾滋病流行、冲突以及经济政策的失败,而经历了生活水准的下降。

正如上述争论所显示的那样,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测量全球不平等,会大大影响我们就该问题得出的结论。经济学家斯坦利·菲舍尔比较了看待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只是比较国与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而第二种则同时考虑了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口数。第一种看待全球不平等的方式可见第一幅图。它表明了1980年至2000年期间,选择的一些穷国和富国的平均收入,每一个国家在图中都以一个标准的圆点来表示。该图显示,在这一期间,世界上最穷国家的平均收入增长要远远慢于最富国家的平均收入增长。因此,(黑线所显示的)趋势似乎表明,由于位于图右方的富裕国家经济增长要快于(位于左方

^①原文如此,但印度人口基数已经非常大。

的) 贫穷国家, 不平等在加剧。(如果最穷国家的
增长快于最富国家, 那么黑线所显示的趋势
就会从左到右下倾) 所以说, 世界各国中最富
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的差距似乎正在增长。

第二幅图考虑了各国的人口规模, 呈现出
对于全球不平等的一种相当不同的观点。图中
显示的是同一张图表, 但这一次, 代表每一个
国家的圆点是根据生活在该国的人口数量规
模按比例绘制的。该图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 即中国和印度, 它们
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自 1980 年以来
已经大大增加了各自的经济规模。由于这两个
国家的规模庞大, 基于第二幅图绘制的经过人
口加权的最佳拟合线 (line of best fit) 将会下
倾, 意味着随着最穷国家的人口的平均收入逐
步赶上, 全球不平等正在减缓。

一旦我们考虑到, 事实上, 中国和印度从
1980 年以来, 尤其是从 1990 年以来, 在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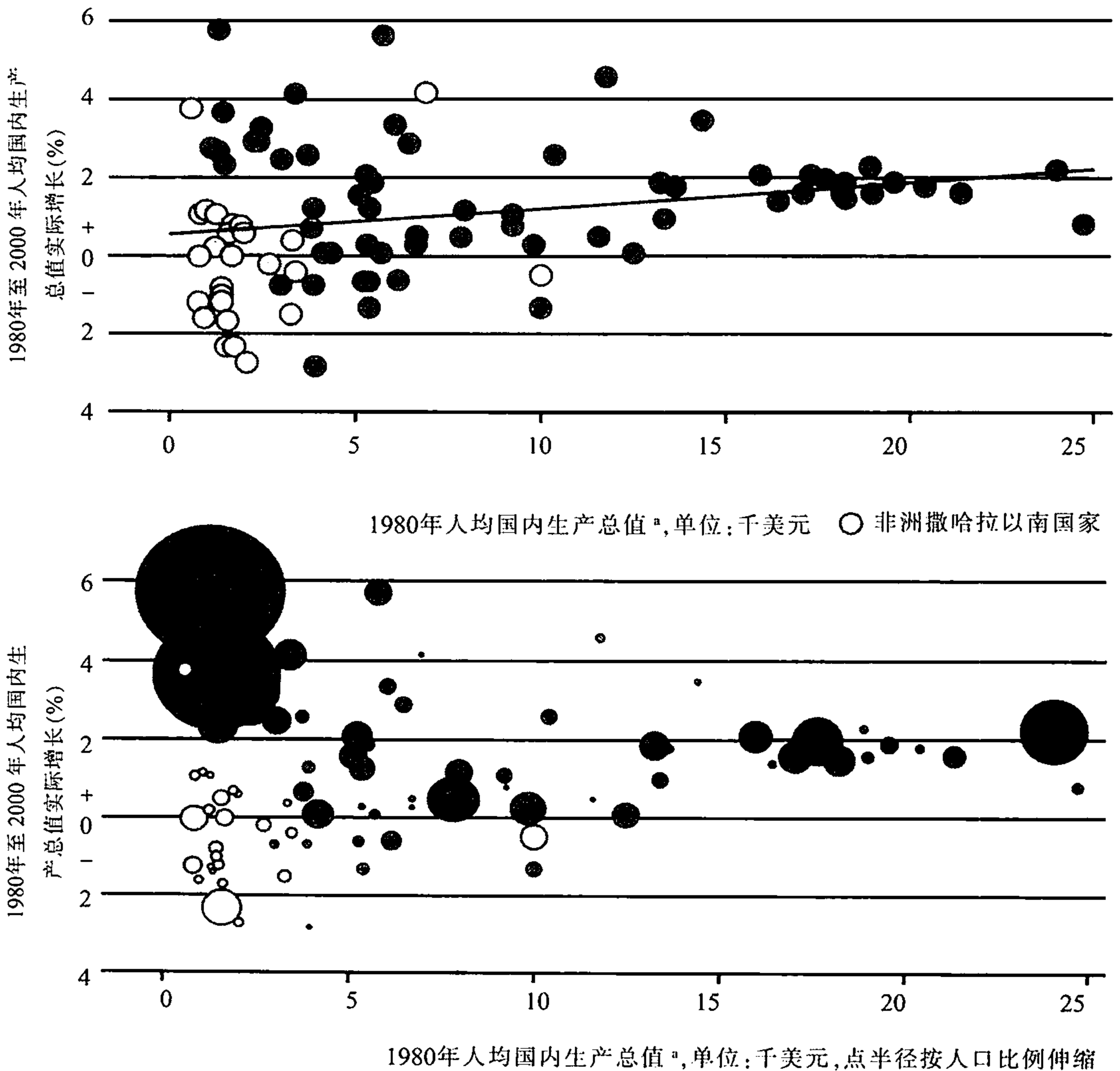


图 11.1 看待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两种角度
a: 以 1996 年价格折算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2004 年 3 月 11 日)

上表现优异；同时考虑到，这两个国家事实上拥有世界上一大部分最穷的人，那么，全球贫困的趋势看起来就比较稳定了。在1980年以来这一时期经济上表现最为优异的那些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和越南，也往往是那些最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但在近几十年来经济上突飞猛进的那些国家内部，也依然能够发现巨大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有些批评者所发出的质问：融入全球经济，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第二节 富国与穷国中的生活

生活水准方面的巨大鸿沟，横在富裕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与他们那些生活在穷国中的伙伴之间 (Harvard Magazine 2000)。财富与贫困从方方面面影响着生活。比如说，全世界的穷人中有大约三分之一营养不良，他们几乎都是文盲，缺乏渠道接受学校教育，哪怕是初级教育。尽管全世界大多数的人仍然生活在乡村，但在十年之内，城市穷人的数量很可能超过乡村穷人。

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第五小节详细讨论了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化。

许多穷人来自部落，或不同于其所在国家主流群体的种族与族裔群体，他们的贫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歧视所造成的。

本节我们来谈谈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在健康、饥饿与灾荒、教育与读写能力等方面的差异。

11.2.1 健康

高收入国家中的人们要比他们在低收入

国家中的伙伴健康得多。低收入国家普遍存在卫生设施不足的问题。它们也有医院或诊所，但这些设施很少为最穷的人提供服务。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中的人们也缺少适当的卫生设备，饮用水受污染，感染传染性疾病的风险也高得多。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营养不良、饥饿和灾荒。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身体虚弱和健康不佳，使低收入国家中的人很容易染上病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许多非洲国家发现的艾滋病感染高发率，有部分原因在于贫民的健康不良 (Stillwagon 2001)。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相比于高收入国家中的人们，低收入国家中的人们就更有可能在婴儿期夭折，也更不可能长寿。低收入国家中的婴儿出生死亡例数比高收入国家大11倍，即使他们在出生时存活下来，也很可能在平均寿命上少18岁 (参看表11.2)。孩童们常常死于一些在富裕国家很容易治好的疾病，比如麻疹或腹泻。在世界上的有些地方，比如非洲撒哈拉以南，一个孩子在5岁之前夭折的可能性还要大于接受中等教育的可能性 (World Bank 1996)。当然，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比如说，从1980年到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从 (每千名活产儿) 97例下降到68例，而中等收入国家则从60例下降到31例。

在过去30年间，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国家和部分低收入国家的状况都有所改善。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了一半，平均预期寿命则增长了10岁还多。现代医疗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卫生设备的改进，收入的增长，都是这些变迁的原因所在。

11.2.2 饥饿、营养不良与饥荒

饥饿、营养不良和饥荒是健康不佳的主要全球致因。令人感到新鲜的只是它们的程度——事实上，当今世上有那么多的人似乎正

表 11.2 全球生活质量在过去 30 年间已经有所上升

生活质量指标	1968	1998
文盲率	53	30
女性平均育儿数	6	3
周岁内婴儿夭折数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每年婴儿死亡数	1200 万	700 万
营养不良人数	四成	二成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50 岁	61 岁
人均年收入	约 700 美元	约 1100 美元
生活费日均不足 1 美元的人口比例	约 50%	约 25%

资料来源: Salter 1998

处在饥饿的边缘。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 的一项研究 (UNWFP 2001) 估算, 每天都有 8.3 亿人处于饥饿之中, 其中 95%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该署将“饥饿”定义为每天摄入热量不高于 1800 卡路里, 这个数量不足以提供成年人积

极健康的生活所需要的养分。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研究, 全世界的饥饿人群中有 2 亿人是 5 岁以下的儿童, 由于缺乏充足的食物, 他们的体重不足。每一年, 饥饿都会夺去大约 1200 百万孩童的生命。一位来自西非国家加蓬的 10 岁孩子告诉世界银行的



每年死于饥饿——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的儿童大约一千二百万。

研究者：“我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一点儿早饭都没吃。中午也根本没有午饭。晚上我会吃点儿晚饭，但那也吃不饱。所以，我一看见另一个小孩儿在吃东西，就会盯着他看，如果他不分给我点儿，我觉得自己就会饿死。”（Narayan 1999）然而，在生活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所有营养不良的5岁以下儿童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儿童所生活的国家实际上是有粮食盈余的（Lappe 1998）。另据估计，美国人口每年花在宠物食品上的数量（130亿美元）就将解决世界人口饥饿的大部分问题（*Bread for the World Institute* 2005）。

今天的绝大多数饥荒和饥饿都是天灾与人祸的综合结果。单单是干旱就影响到当今之世大约1亿人。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干旱与内战两相作用，对粮食生产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饥饿乃至死亡。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5300万人（占人口的11%）营养不良，这个数字在非洲撒哈拉以南上升到1.8亿人（占人口的33%），而在亚洲更达到5.25亿人（占人口的17%）（UNWFP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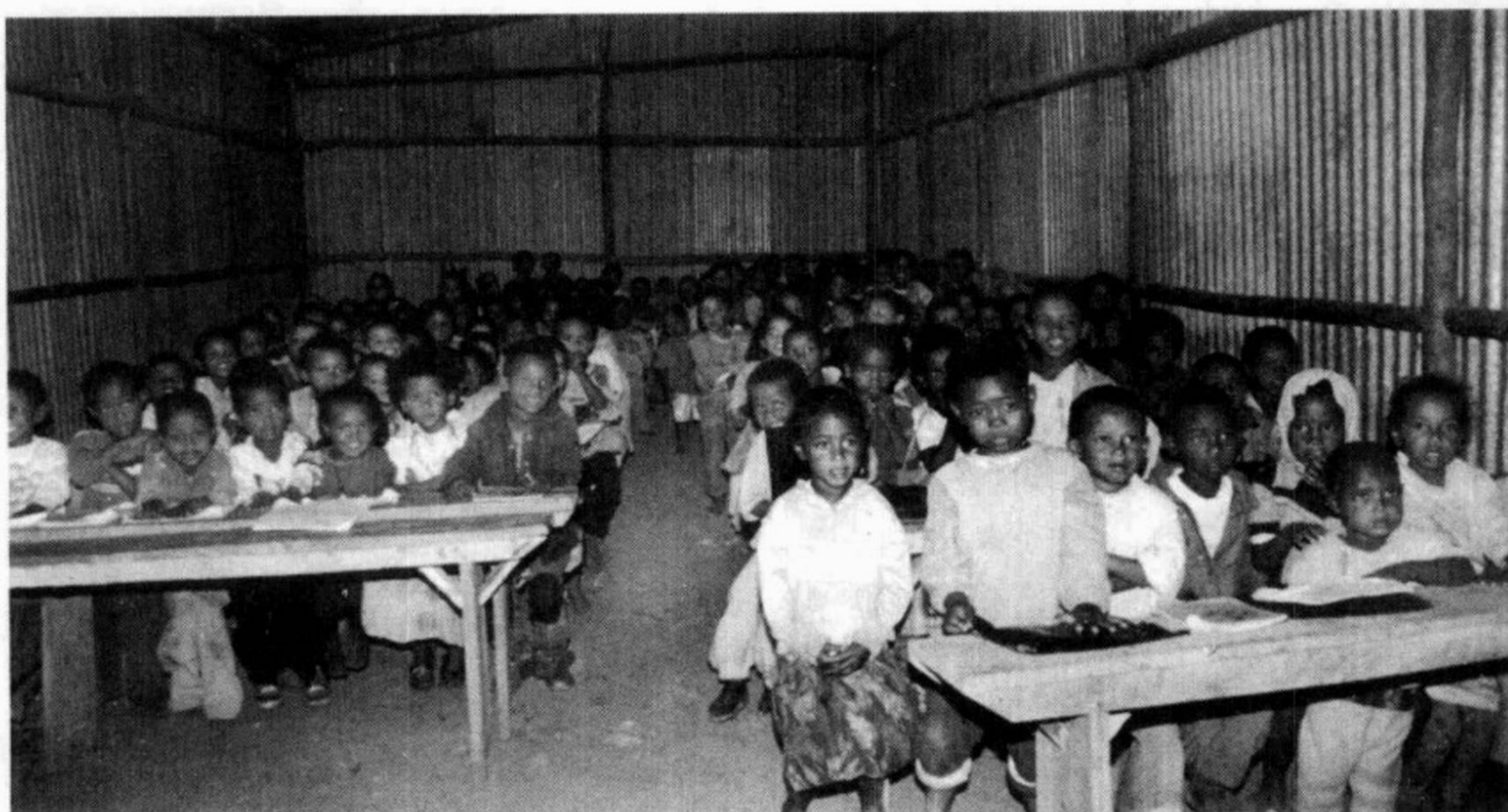
艾滋病的流行也加剧了粮食短缺和饥饿的问题，夺去了众多正处在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生命。联合国粮农组织（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FAO）预测，到2020年，流行程度最严重的10个非洲国家因艾滋病感染致死的人数将会减少多达26%的劳动力。在全球大约2600万感染艾滋病毒的人中，有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流行病对于营养状况、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都会产生摧毁性的打击，危及“整个社会自我维持、自我再生产的能力”（UN FAO 2001）。

受饥荒和饥饿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太过贫穷，没有能力偿付原本可以增加其粮食产量的新技术。它们也负担不起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足够的粮食。与此同时，悖谬的是，世界饥饿状况固然在不断加剧，但粮食生产却也在持续增长。比如说，从1965年到1999年，世界谷物产量翻了一番。即使考虑到这一期间世界人口的显著增长，1999年全球人均谷物产量也比34年前提高了15%。然而，这种增长在世界范围内的分配并不均匀。比如说，在非洲大部分地区，人均粮食产量近年来趋于下降。美国之类的高收入国家固然有粮食盈余，但最需要的那些国家很少买得起。

11.2.3 教育与读写能力

教育与读写能力是通往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在这一点上，低收入国家又一次处于劣势，因为它们很少能够负担得起高质量的公共教育体系。其结果，高收入国家中的儿童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性要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中的儿童，而高收入国家中的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的可能性也要高得多（参见表11.3）。1997年，高收入国家中几乎所有处于中等教育年龄的男性和女性都仍然正在接受全日制教育，但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比例却只有71%，而低收入国家更是只有51%。在低收入国家，30%的成年男性和几乎一半的成年女性不具备读写能力。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教育方面的公共开支存在可观差距：高收入国家花在教育方面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大大高于低收入国家（World Bank 2000—2001）。

教育从好几点原因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如前所示，它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接受



教育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低收入国家的学校常常资金匮乏。

表 11.3 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在教育与读写能力方面的差异

	收入水平		
	低 收入	中等 收入	高 收入
1997年(各国规定)法定中等教育年龄孩童全 日制教育入学比例	51	71	96
1997年教育领域的公共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比例	3.3	4.8	5.4
1998年15岁以上男性文盲率	30	10	0
1998年15岁以上女性文盲率	49	20	0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00—2001

了完善学校教育的人为高薪行业提供了必需的熟练技能型劳动。其次,教育为摆脱艰苦的工作条件与贫困之间的循环提供了唯一的希望,因为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只能从事薪酬微薄的非熟练技能型工作。最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太可能生养一大堆孩子,这样就减缓了全球人口爆炸,而后者正可以加剧全球贫困。

第三节 穷国能否变富?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亚有一批低收入国家经历了工业化进程,似乎威胁到美国和欧洲的全球经济主

童工

当今之世是否还存在童工？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UNILO)的统计,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有超过2.5亿的5岁至14岁男女儿童在从事劳动,占世界儿童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有大约5000万到6000万的5岁至11岁孩童在危险状况下从事劳动。童工在整个发展中世界都能找到,从亚洲(61%的儿童在从事劳动)、非洲(32%)到拉美(7%)。他们之所以被迫劳动,是多方面原因综合所致,因为家庭贫困,因为缺乏教育,也因为许多国家的一些人当中,传统上对于那些穷人或少数族群的困境漠不关心(ILO 2000; UNICEF 2000)。

有三分之二的童工是在从事农业,其他孩童则分布在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餐馆和旅店,以及各式各样的服务,包括给富裕家庭做佣人。这些孩子工作很长时间,充其量也只能拿到一点报酬,因此不能上学念书,不能发展起一些最终有可能使他们摆脱贫困生活的技能。不过,话说回来,简单地发布命令,立即禁止一切童工,即使真能这么做,其效果也有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相对于儿童卖淫或忍饥挨饿,童工还算是一种更好的替代选择。挑战不只是终结童工,也在于将孩子们从劳动转向教育,确保他们在学龄期间能够衣食无忧。与童工作战的方

式不能导致对孩子们更多的伤害。

最糟糕的那些童工形式充满危险,也充满剥削。从事工作的条件近乎奴隶,孩子们遭受着各式各样的疾病和伤害。国际劳工组织的概括令人震惊:“伤口,肢体部分的骨折或彻底截肢,烧伤和皮肤病,视觉和听觉受损,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发烧,由于田间或工厂的酷热而导致的头痛”(ILO 2000)。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提供了几个例证:

在马来西亚,孩童可能在橡胶园里每天工作长达17小时,并且承受着蛇虫叮咬。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他们采集咖啡豆,吸入杀虫剂。在葡萄牙,年仅12岁的孩子们就要从事建筑业的重体力劳动,并遭受这个行业的各类危险。在摩洛哥,他们在织布机前长时间弯腰曲背,报酬低微,编织着供出口用的奢侈地毯。在美国,孩童们在制衣业的血汗工厂中遭受剥削。在菲律宾,男童们在危险的状况下潜水,帮助布网进行深海捕鱼。

许多工厂中的条件令人感到恐怖:

来自化学药剂的粉尘,以及贮藏室和锅炉房里的气体,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发



现有 250 个孩童,绝大多数不到 10 岁,在一个用砖砌成一格一格的长方形大厅里劳动。一行一行的孩子们,有些刚过五岁,都在从事劳动。(UNICEF 1997)

有一种形式的童工近乎奴役,那就是“抵押劳工”。^①在这种体系中,年仅八九岁的孩童被其父母抵押给工厂主,以换取小额借款。这些孩子的报酬非常低,因此从来也不曾成功地减缓债务,注定终生被抵押。有一例抵押劳工的个案引起了国际关注,一个名叫伊克巴尔·马希的巴基斯坦小孩,年仅 4 岁就被其父出售为奴,只为了借 600 卢比(大约 16 美元)为自己的大儿子操办婚事。在 6 年时间里,伊克巴尔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被锁在一家制毯机前,一天到晚织着细结。在 10 岁逃离工厂后,他开始向工会组织和学校诉说自己的经历。伊克巴尔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惨痛代价:13 岁时,他在家乡骑自行车时遇害,据说是被地毯厂所雇的代理人射杀。(www.freethechildren.org; Bobak 1996)

要想废止剥削性的童工,就需要世界各国实施针对这一习俗的强硬法规,并有意志去推行这些法规。国际劳工组织之类的国际

导地位(Amsden 1989)。这一进程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开始的,但很快扩散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增长迅速的经济体,尤其是在东亚,不过在拉美也有一些。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香港,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②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也开始跟上,其中最引人注目

组织已经勾勒出一套标准供此类法规遵行。1999 年 6 月,国际劳工组织正式通过第 182 号公约,吁求废止“最恶劣的童工形式”。这些形式的界定如下:

- 一切形式的奴役或近似奴役的习俗,比如出售或贩卖儿童,债务抵押和奴役,强迫或强制劳动,包括强迫或强制征召儿童参与武装冲突;
- 使用、购买或提供儿童卖淫、参与色情产品生产或色情表演;
- 使用、购买或提供儿童进行非法活动,尤其是生产和贩卖相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毒品;
- 工作的性质或从事工作的环境很可能伤害儿童的健康、安全或道德。(ILO 1999)

各国还必须提供免费的公共教育,并要求儿童全日制入学就读(UNICEF 2000)。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至少有一部分着落在那些使用童工制造物品的全球企业身上,并且,归根结底,着落在购买这些商品的消费者身上。

的是中国大陆,但也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这类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而像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已上升到高收入范畴。

图 11.2 比较了 1980 年至 1999 年七个东亚国家(包括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这七个国家在仅仅两代人之前都还是贫穷之地。在该时期,东亚地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① 原文为“bonded labour”,又译“债役工”,类似我们熟知的“包身工”。

② 原文有时统称“经济体”,未区分国家和地区,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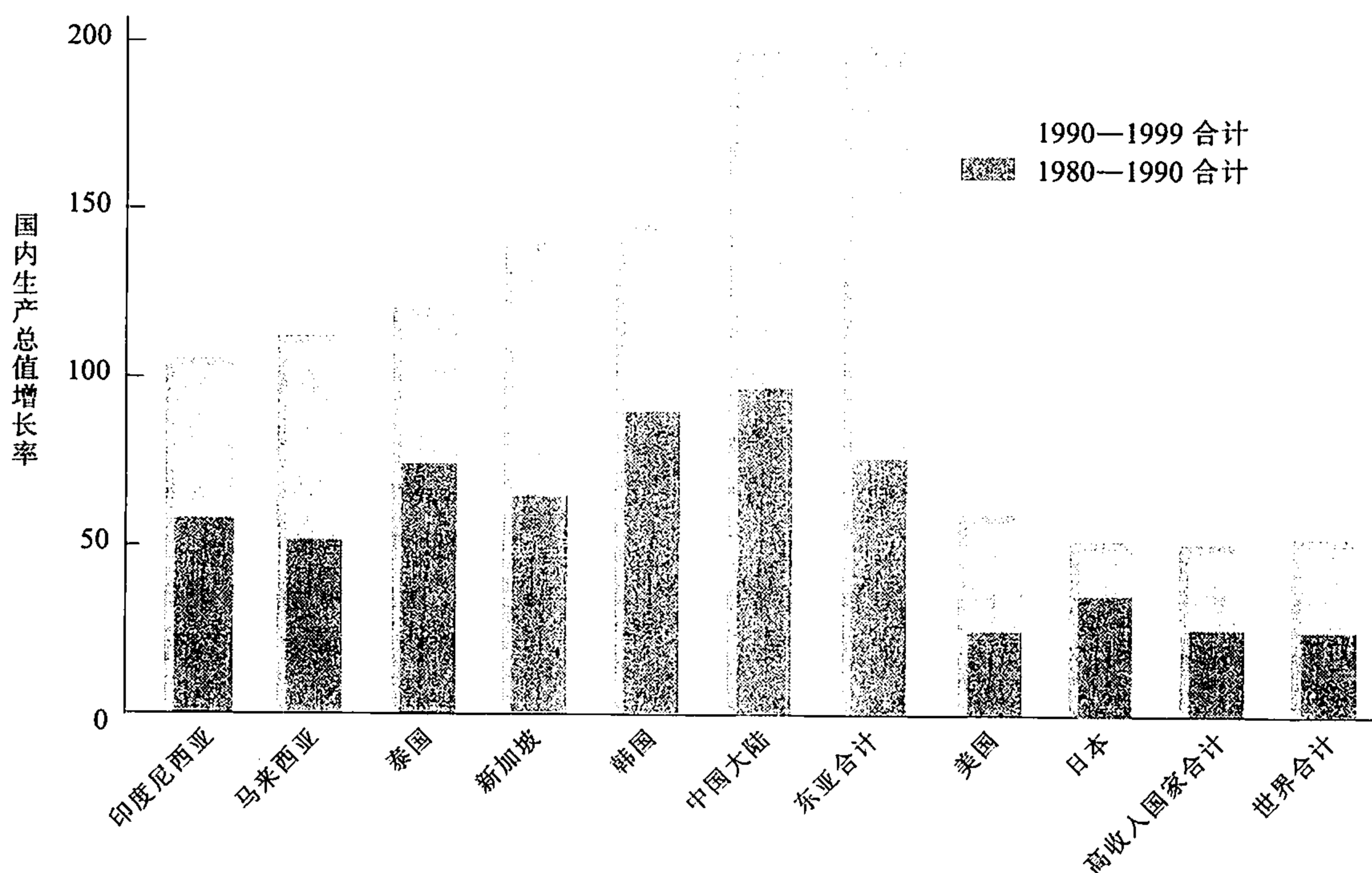


图 11.2 一些东亚国家、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80—1990 及 1990—1999
资料来源:World Bank (2000—2001);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

经济体整体而言平均每年增长 7.7%，这个比率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显得卓尔不凡 (World Bank 2000—2001)。到 1999 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与美国相当。而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全球增长最为迅速的经济体之一。从 1980 年到 1999 年期间，中国大陆经济达到年均 10% 的增长率，总量翻了一番。

东亚的经济发展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其中包括压制劳工权利和公民权利，有时甚至是暴力镇压；工厂条件极其恶劣；剥削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剥削来自贫困邻国的移民劳工；环境恶化日益蔓延。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过去数代工人的牺牲，这些国家中的一大批人正在走向富足。

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

快速增长，尤其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增长，社会科学家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可能会对别处那些希望效仿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给出一些重大启示。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有部分原因在于独特的历史因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能够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全球不平等的致因。要想理解这一地区的迅速发展，我们就需要在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时候，既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结合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背景。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功可以归之于一系列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有些因素是历史性的，包括世界政治和经济变迁所产生的效果。有些因素是文化性的。还有些则与这些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有关。以下是

有助于它们取得成功的一些因素：

- 1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曾经有殖民地经历，而这种经历尽管施加了诸多艰难困苦，却也有助于铺平通往经济增长的道路。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曾经被纳入日本帝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是前英国殖民地。日本消灭了反对工业化的大地主，英国和日本都在这些特殊的殖民地区扶持工业发展，建造道路和其他交通体系，并打造起相对高效的政府科层机关。英国还积极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发展成为贸易中心（Gold 1986；Gumings 1987）。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说拉美和非洲，今天贫穷的国家在与更加富裕也更加强大的国家打交道时，遭际就没有这么好了。
- 2 东亚地区得益于世界经济的一段长期增长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为服装、鞋袜和电子器件提供了可观市场，而这些产品逐渐转向东亚主产，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不可错失的良机”。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周期性衰退也迫使企业削减劳力成本，刺激了工厂重新布点，迁往低工资的东亚国家（Henderson and Appelbaum 1992）。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World Bank 1995）发现，从1970年到1990年，在那些以向富裕国家出口产品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工资年均增长3%，而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方，同期的工资则未能增长。
- 3 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在冷战高潮时开始起飞的，当时的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建立一道针对中国大陆的防线，提供了大量经援和军援。直接的援助和借款为晶体管、半导体及其他电子器件之类的新技术注入了充裕的投资，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军事援助也常常有利于强硬的（常常是军管的）政府如其所愿，强力压制，保持低廉的劳力成

本（Mirza 1986；Cumings 1987,1997；Castells 1992）。

- 4 有些社会学家主张，日本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取得经济成功，有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它们所共享的儒家哲学。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Weber 1977）提出，新教对于节俭、简朴、勤谨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韦伯的主张已经被用来说明亚洲的经济史。儒家学说据说培养人尊老敬上，崇尚教育，辛勤劳作，以被证明的成就作为出人头地的关键，乐于以今日的牺牲换取明日更大的回报。韦伯式的观点进一步认为，由于具有这些价值观念，亚洲的劳动者和管理者都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公司，顺从权威，工作勤奋，具有很强的成功导向。工人和资本家据说都很俭朴。他们很可能把财富进行再投资，以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用在自己奢华的生活上（Berger 1986；Wong 1986）。

这种说明有一定的价值，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亚洲，经商并不总是受人敬重的。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日本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韩国也是如此。所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和工人们都曾经反对他们觉得不公正的政治经济政策，常常冒着被捕入狱的风险，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Deyo 1989；Ho 1990）。不仅如此，在日本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随着在近年的迅速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炫耀性消费，而不是艰苦朴素和生产投资，诸如节俭之类的儒家核心文化价值似乎都在趋于衰微（Helm 1992）。

- 5 东亚的许多政府奉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强硬政策。它们的政府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保持低廉的劳力成本，通过减税及其他经济政策鼓励经济发展，提供免费公共教育。本

章稍后我们将讨论东亚政府政策的作用。

这些经济体的成长是否还将持续下去,情况尚不明朗。在1997年至1998年,糟糕的投资决策,贪污腐化,世界经济的局势,合在一起,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扩张戛然而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市场崩盘,货币贬值,并且危及整个全球经济。中国香港的经历颇为典型:在经历了长达37年的持续增长之后,经济陷入停滞,股票市场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市值。至于1998年初的报纸所称的“亚洲灾难”(Asian meltdown),究竟是会对整个地区产生长期效应,还是其晚近增长中的短暂杂音,还有待观察。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一旦它们目前的经济问题得到解决,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将会重新开始增长,不过可能不再能够维持过去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

11.3.1 关于发展的理论

是什么导致了全球不平等?如何才能克服它?在以下的图文框中,我们将来看看贫困国家所面临的一些话题。本节当中,我们还将考察多年以来四种说明发展的不同理论:市场导向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国家中心理论。这些理论都各有其长短优劣。但它们共有的一个缺陷在于,常常忽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不管怎么说,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应当能够回答在高收入国家之外生活的85%世界人口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能够在世界经济中迎头赶上?

一 市场导向理论

40年前,英美两国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关于全球不平等的理论,极具影响,就是市场导向理论。这些理论假定,如果个人能够不受任何形式的政府约束限制,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就能够获得最佳的经济后果。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如果任其充分发

展,据说将会通向经济增长。政府科层机构不应当对生产什么货品、标定什么价格或如何偿付工人之类的问题发号施令。根据市场导向理论家们的看法,政府对于低收入国家经济的指导阻碍了经济发展。由此观之,当地政府应当对发展袖手旁观(Rostow 1961, Warren 1980, Ranis 1996)。

这类理论的早期倡导者中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就是W.W.罗斯托,他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其观念帮助形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于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罗斯托的说明属于市场导向思路的一种形式,称为“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低收入社会只有放弃它们的传统方式,采纳现代经济制度、技术和强调储蓄与生产性投资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在经济上取得发展。

根据罗斯托的观点(Rostow 1961),低收入国家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妨碍了它们的经济效率。比如说,在罗斯托看来,低收入国家中的许多人缺乏一种坚定的工作伦理;他们宁愿把钱今天就消费掉,而不愿意为未来投资。大家庭也被视为对所谓“经济落后”负有部分责任,因为如果一个挣钱养家者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很难指望他把钱存下来留作投资。

不过,在现代化理论家们看来,低收入国家还有更为深层的问题。根据这一理论,这类国家的文化往往支持“宿命论”,也就是把受苦受难看作不可避免的生活困境的一种价值体系。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命运,就不能鼓起劲来辛苦劳动,勤俭节约,以求改变自己的命运。由此看来,一个国家之所以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自身的文化缺陷。而政府规定工资,限定价格,从整体上干预经济运作,这些政策更加剧了诸如此类的缺陷。那么,低收入国家又如何能够摆脱它们的贫困呢?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历经几个阶段,他把这比作飞机的航程:

1 传统阶段。这就是上文所描述的阶段。其特

全球不平等的有关话题

贫困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世界银行划分的最低收入一类，每年人均国民收入少于 765 美元。埃塞俄比亚和布隆迪最低，人均国民收入仅为每年 90 美元。

即使是加蓬和博茨瓦纳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北非的情况整体上要好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一区域，各经济体较为稳定，贸易和旅游相对发达，艾滋病也不那么流行。

发展运动积极分子敦促八国集团改革债务、援助和贸易等方面的规则，以帮助更多的非洲国家摆脱贫困。

债务

重债穷国计划 (The 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 HIPC) 于 1996 年创立，旨在减轻最穷国家的债务。

如果穷国面临难以为继的债务，无法通过传统手段减债，就有资格入选该项方案。它们也同意遵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界定的某些善治 (good governance) 政策。

一旦确立了这些政策，该国就处在“决策点” (decision point) 上，可以确定减免债务的额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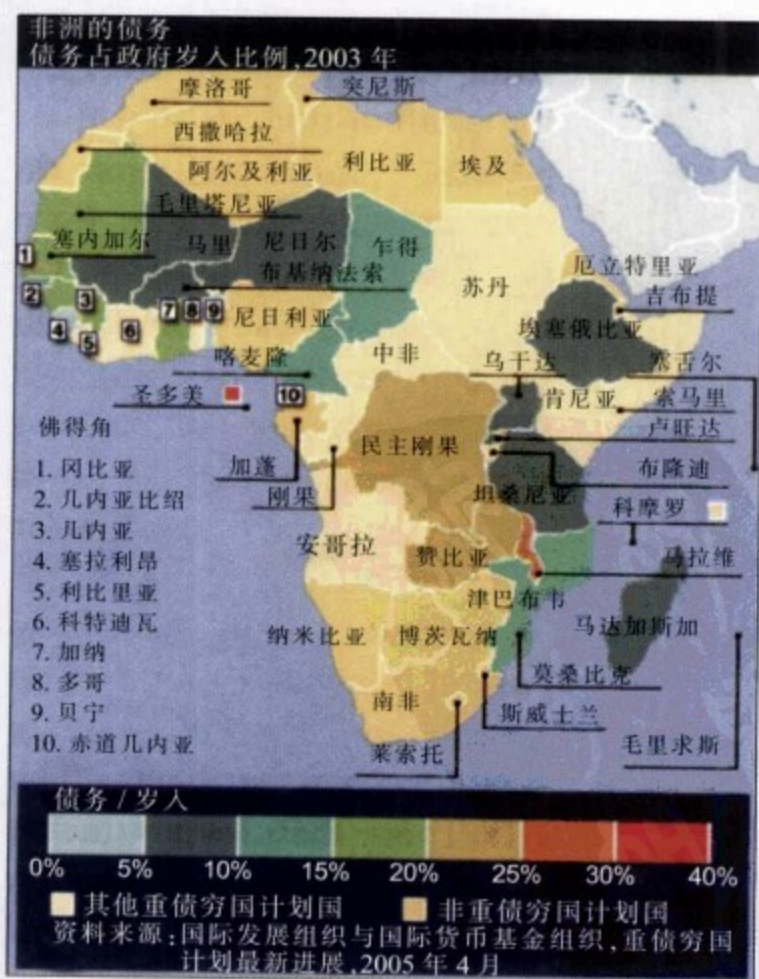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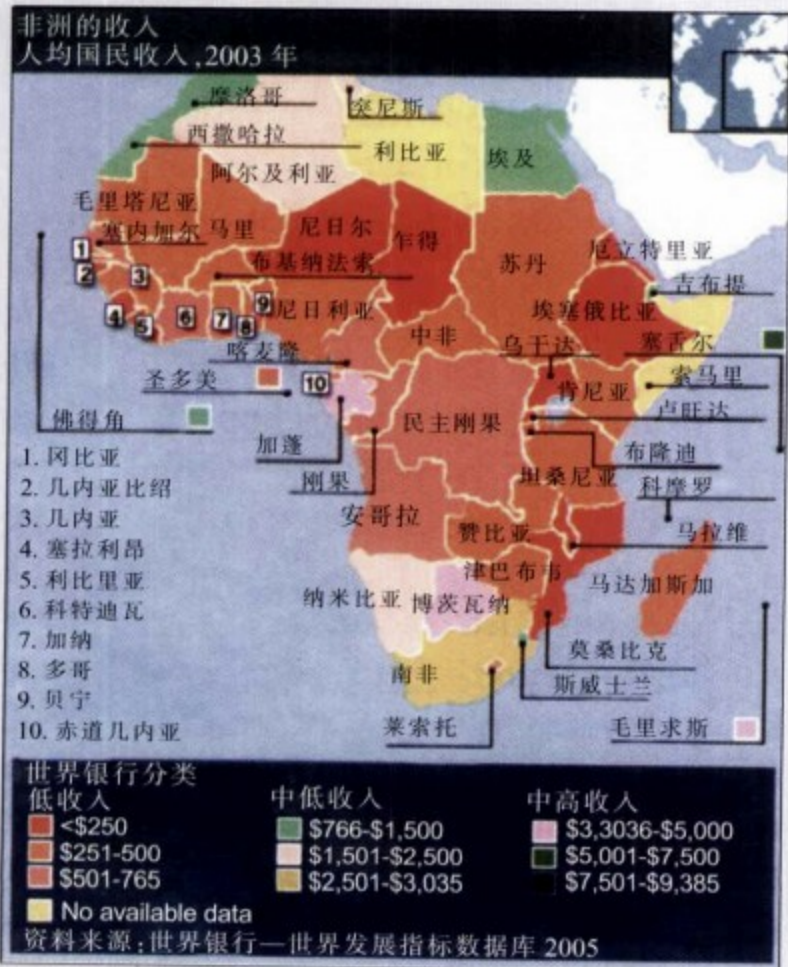
批评此项方案的人认为，衡量标准过于严格，应当有更多的国家有资格入选重债穷国计划以减免债务。

这幅地图显示出，达到“决策点”的重债穷国计划国在偿付债务和利息方面开支有多大。

根据八国集团财长签署的一项新的计划，将会对参与重债穷国计划的 14 个非洲国家彻底免除其债务。

援助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中，非洲接受了大约三



资料来源: http://news.bbc.co.uk/1/shared/spl/hi/africa/05/africa_economy/html/poverty.stm
http://news.bbc.co.uk/1/shared/spl/hi/africa/05/africa_economy/html/aid.s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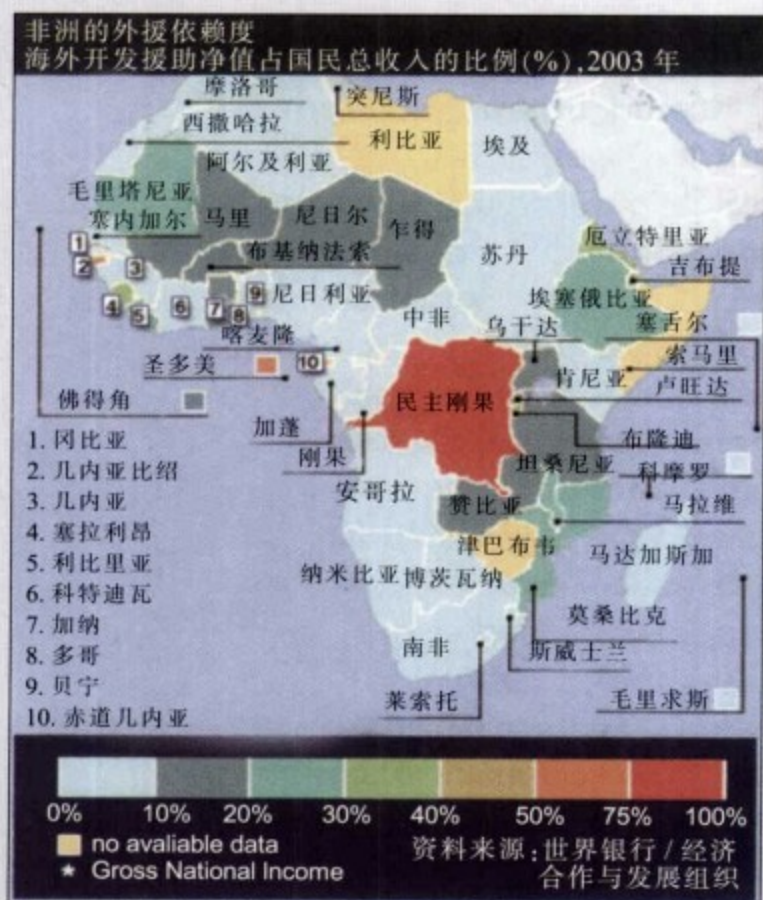
分之一。

这些援助中大部分是带有附加条件的,意味着政府要想得到援助,就必须实施某些特定政策,或者必须花钱购买捐助国的货品和服务。

世界银行正在评估它的条件性政策,认为援助如果伴之以改善治理,效果会好得多,也不容易被贪污。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富国在对外援助方面的相对开支大大降低。

“让贫困成为历史”运动(The Make Poverty History campaign)正在敦促八国集团每年筹集额外的 500 亿美元用于援助,并履行此前的诺言:发达国家将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用于对外援助。



资料来源:http://news.bbc.co.uk/1/shared/spl/hi/africa/05/africa_economy/html/debt.stm
http://news.bbc.co.uk/1/shared/spl/hi/africa/05/africa_economy/html/trade.stm

贸易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矿产、木材和石油,但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贸易却常常很困难。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包括:基础设施薄弱,政府不稳定,贪污腐化,艾滋病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影响。

穷国和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①之类的机构也认为,国际贸易规则有欠公正,有利于发达世界。

它们指出,富国通过与本地生产商削价竞争,向发展中国家“倾销”接受政府补贴的产品。

它们还指责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强迫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其它地方开放其市场,却未能降低富国的关税壁垒以作为回报。

但世贸组织回应道,低收入国家已经得到了特殊待遇,包括免除某些施用于富国的规定。



① “Oxfam”, 全称为“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征是储蓄率低,据说缺乏一种工作伦理,以及所谓的宿命论式的价值体系。飞机尚未离开地面。

- 2 经济增长的起飞。罗斯托认为,传统阶段可以让位于第二阶段:经济起飞。当穷国开始抛弃其传统价值和制度,着手为未来储蓄和投资,这个阶段就到来了。而像美国这样的富国的角色,就是促进这一增长。为此,它们可以资助生育控制方案,为电气化、道路建设和机场建设提供低息贷款。
- 3 趋向技术成熟。根据罗斯托的看法,有了高收入国家的资金和建议的协助,经济增长这架飞机将沿着跑道滑行,逐渐加速,并开始升空。国家就此将趋向技术成熟。以航空学的比喻来说,飞机将缓慢攀升到巡航高度,改进其技术,把晚近获得的财富重新投资到新兴工业当中,并采纳高收入国家的各项制度和价值观念。
- 4 大众高消费。最后,国家将达到大众高消费阶段。现在民众有能力实现较高的生活水平,从而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飞机(也就是国家)在自动导航状态下巡航飞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罗斯托的观念依然很有影响。事实上,当今经济学家中的流行观点即新自由主义就认为,通过尽量减少政府对于工商业的限制而实现的自由市场力量,是通往经济增长的唯一道路。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自由贸易将使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能力走向繁荣:清除政府管制被视为产生经济增长之必需。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呼吁终结对于贸易的限制,并常常质疑最低工资等劳动法规,以及对于工商业的环保限制。

而在另一方面,社会学家把焦点放在罗斯托理论的文化方面:某些特定的信仰和制度究竟是否妨碍了发展,又如何妨碍了发展(Davis

1987; So 1990)。其中包括宗教价值观念,道德信念,对于巫术的信仰,民间传统和习俗。社会学家也考察了其它一些抵制变迁的条件,尤其是地方文化所持有的信念:道德败坏和社会动荡将伴随工商贸易而来。

二 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有一批理论家质疑从市场导向的思路来说明全球不平等,比如现代化理论。这些批评者中有许多是来自拉美和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拒绝认为他们国家的经济欠发达是因为自己文化或制度上的欠缺。相反,他们基于马克思的学说,后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将会创造出一个受强权国家操纵的国家等级,就好像各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将导致对于工人的剥削一样。这些被人称为依附理论家的人认为,低收入国家之所以贫困,其根源正在于富裕国家和以富裕国家为基地的跨国企业对它们的剥削。在他们看来,全球资本主义使他们的国家深陷剥削与贫困的恶性循环。

根据依附理论的说法,这种剥削的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在这种政治经济体系下,强权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确立对于弱势民众或国家的统治。强权国家对于其它国家的殖民,通常是为了获得自己工厂所需要的原材料,并控制那些工厂中制造出来的产品的市场。比如说,在殖民统治下,通过以高收入国家为基地的工商业,从低收入国家榨取工业经济所需要的石油、铜、铁、粮食产品。尽管典型的殖民主义就是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建立殖民地,但有些亚洲国家(比如日本)也同样曾经拥有殖民地。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宣告终结,但剥削并未停止:跨国企业继续从它们在低收入国家的分支企业抽取巨额利润。根据依附理论的看法,这

些全球公司常常得到有势力的富国银行与政府的支持,在穷国设立工厂,使用廉价劳动力和便宜原材料,尽可能降低^①生产成本,而不受任何政府干预。接下来,为劳动力和原材料所设定的低价使穷国无法积累起自身工业化所必需的利润。原本有可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本地工商业被限制住了手脚。由此观之,穷国不得不向富国举债,从而加剧了它们的经济依附地位。

因此,低收入国家不被视为欠发达(underdeveloped),而是被视为误发达(misdeveloped, Frank 1966; Emmanuel 1972)。除了极少数服务于外国企业利益的本地政客和商人,人们普遍陷于贫困。农民被迫在两种出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忍饥挨饿,要么以近乎挨饿的工资在外国控制的种植园、矿山和工厂里工作。由于依附理论家相信,这类剥削使他们的国家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所以普遍呼吁进行革命性变革,将外国企业彻底驱出他们的国家(例见 Frank 1969)。

市场导向理论家们常常忽视政治军事权力,而依附理论家们则认为权力的行使是推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核心所在。根据这种理论,无论本地领导人何时质疑这种不平等的安排,他们的声音都会被迅速压制。工会化通常是被法律禁止的,而劳工组织者会被捕入狱,有时更会被杀害。当民众选举出一个政府来反对这些政策,政府也很有可能被该国的军事武装所推翻,后者常常得到工业化国家本身武装力量的支撑。依附理论家们举出了许多例证:在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马派政府,1973年颠覆智利马派政府,以及20世纪80年代破坏对于尼加拉瓜左派政府的支持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依附理论看来,全球经济不平等因此可以说是受武力支撑的:穷国的经济精英得到他们在富国的伙伴的撑腰,使用警力和军力来维持对于本地人

口的控制。

巴西社会学家恩里克·费尔南多·卡多索曾经是一名杰出的依附理论家,早在25年前就提出,尽管如此,一定程度的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也还是可能的,在某些特定的状况下,穷国仍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发展,虽说只是以它们对于富国的依赖为特征(Cardoso and Faletto 1979)。具体来说,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在驾驭依附与发展的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Evans 1979)。而当卡多索于1995年至2003年担任巴西总统时,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呼吁让巴西更加融入全球经济。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社会学家们越来越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尽管也常常是充满冲突的)经济体系。虽说依附理论家也认为,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彼此维系,但深受依附理论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则主张,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仅仅是各个独立国家彼此结成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后的集合体,而是必须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整体。世界体系思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及其同事的著述(Wallerstein 1974, 1990等)关系极为密切。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长久以来就是作为一个全球经济体系而存在的,其源头就是15、16世纪欧洲的市场与贸易的扩张。世界体系被认为由四个相互重叠的要素所组成(Chase-Dunn 1989):

- 一个货品与劳力的世界市场;
- 人口分割为不同的经济阶级,尤其是资本家与工人;
- 在最有权力的国家中间形成由正式与非正式的政治关系组成的国际体系,这些国家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形成世界经济体;以及
- 世界被切分为三块不平等的经济地带,富裕地带剥削贫穷地带。

^① 原文此处为“尽可能提高”(maximize),疑为“minimize”之误。

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把这三块经济地带分别称之为“核心”、“边陲”和“半边陲”。世界体系中的所有国家据说都属于这三类范畴中的一种。所谓核心国家,就是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攫取了最大份额的利润。这些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和西欧诸国。所谓边陲国家,包括那些低收入国家,大部分是农业国,它们常常受到核心国家基于自身经济优势的操纵。边陲国家的实例遍及非洲,在较小程度上也普遍见于拉美和亚洲。和利润的流向一样,农产品、矿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也从边陲流向核心。而核心反过来又向边陲出售制成品,又赚取一笔利润。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指出,核心国家在这种不平等贸易中使自己变得富裕,与此同时,却限制了边陲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后,所谓半边陲国家,占据着中间位置:这些国家属于半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从更具边陲性的国家榨取利润,反过来又为核心国家提供利润。半边陲国家的实例包括北美的墨西哥,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以及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半边陲地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核心地带控制,但也有能力剥削边陲地带。不仅如此,半边陲地带的经济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也给边陲地带带来了取得类似发展的希望。

尽管世界体系往往变动缓慢,但曾经强势的国家最终也会丧失其经济力量,被其他国家取而代之。比如说,大约500年前,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支配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后来它们被荷兰人取代,然后是英国人,现在则是美国人。今天,在一些世界体系理论家看来,美国的支配地位正在让位于一个更趋“多极化”的世界,经济力量由美国、欧洲和亚洲所分享(Arrighi 1994)。

三 国家中心理论

关于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些最新的说明,强调了国家政策在促进增长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与市场导向理论截然不同,国家中心理论认为,适当的政府政策并不会妨碍经济发展,反而能够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现在已有一大堆的研究表明,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比如东亚,经济的成功发展一向是国家主导的。就连长期以来坚定倡导自由市场的发展理论的世界银行,也已经改变了它对于国家角色的看法。在其1997年的报告《变迁世界中的国家》里,世界银行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强大的政府以多种方式促进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Appelbaum and Henderson 1992; Amsden, Kochanowicz et al. 1994; World Bank 1997):

- 1 东亚有时候以强力手段确保政治稳定,同时保持低廉的劳力成本。而实现这一点则是通过镇压之举,比如将工会定为非法,禁止罢工,囚禁工运领袖,并从整体上压制工人的声音。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尤其频频采取此类行动。
- 2 东亚各政府常常致力于以所期望的导向驾驭经济发展。比如说,国家机构常常为投资政府所偏好的产业的工商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税负减免。有时候这种战略的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导致政府持有不良贷款(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造成该地区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有些政府阻挠企业将其利润投资国外,强迫它们投资国内的经济增长。有时候政府拥有并因此控制核心产业。比如说,日本政府就拥有铁路、钢铁和银行业,韩国政府拥有银行,新加坡政府拥有航空、军工和修船业。
- 3 东亚各政府常常积极参与廉价住房、普及教育之类的社会规划。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公屋体系(除了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就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那里的政府补贴维持了相当低廉的租金。其结果,工人

不需要有很高的工资来解决住房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新兴全球劳力市场上更好地与欧美的工人展开竞争。在新加坡这个拥有非常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地方,在资金充裕的公共教育与培训帮助下,工人获得了在新兴全球劳力市场上有效竞争所需的技能。新加坡政府也要求企业和公民个体都要将其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以储蓄,以便投资到未来的增长。

11.3.2 评估各种发展理论

刚才讨论的有关全球不平等的这四套理论,每一种都各有其长短优劣。但合而观之,它们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不平等的形成原因与疗治之道。

市场导向理论建议采取现代资本主义各项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就像东亚的晚近实例所证明的那样。它们还进一步认为,各国要想在经济上取得发展,就必须开放其边界以供贸易,并且它们也能举出例证来支持这一观点。但市场导向理论也未能考虑穷国与富国之间各式各样的经济纽带,在某些条件下,这些纽带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往往怪罪低收入国家自身造成其贫困,而不是诉诸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更具强势的国家的工商运作。市场导向理论也忽视了政府有能力通过某些方式,与私营部门展开合作,刺激经济发展。最后,它们未能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经济上成功起飞,而另一些国家却始终深陷贫困与欠发展。

依附理论探讨了被市场导向理论所忽视的地方,把焦点放在富国如何在经济上剥削穷国上,由此考察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纽带。然而,

尽管依附理论有助于阐述拉美和非洲的大部分经济落后现象,却不能说明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之类的低收入国家中偶尔出现的成功故事,也不能说明东亚迅速扩张的经济体系。事实上,有些国家曾经位列低收入范畴,但即使面对多国企业的存在,也依然在经济上取得腾飞。甚至是一些前殖民地,比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者都曾经依附于大英帝国,但也都谱写出不容忽视的成功篇章。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致力于以此克服依附理论的欠缺。世界体系理论家们不是以个别国家为出发点,而是探讨一个复杂的全球网络,由同时影响穷国和富国中的发展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所组成。

国家中心理论强调政府在培育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它们既有效地替代了盛行的市场导向理论,后者强调国家作为经济的阻碍;也有效地替代了依附理论,后者把国家看作是全球工商精英在剥削穷国的过程中的盟友。国家中心理论一旦综合了其他理论,尤其是世界体系理论,就能够说明目前正在转变世界经济的激烈变迁。

11.3.3 国际组织的角色与全球不平等

有一批国际组织的活动影响到全球贫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银行都被视为布雷顿森林机构,^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立的。它们的总部都设在美国的华盛顿,成员国包括世界各地的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含184个国家,其主要工作就是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当它被要求出面解决严重债务危机时是最

^①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就预期德国和日本战败后战后世界金融问题做出安排。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对急需外援的国家提供长期贷款;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短期贷款,调剂国际支付方面的不平衡现象,以稳定外汇汇率。

引人注目的，比如2001年到2003年在阿根廷。它还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合作，改善它们的经济管理，但恰恰是这样的咨询工作，常常被批评为导致了穷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例见Stiglitz 2002）。

世界银行集团^①的使命是与贫困作战，提高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准。这是一家开发银行，向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贷款、政策咨询、技术援助和知识共享服务，以减轻贫困。世界银行由一批账户组成，为其成员国政府提供相对低廉的金融服务，主要是贷款。近来，世界银行也开始为特定规划向政府提供拨款。除了贷款和拨款，它还提供专业技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被指责推动了有害于穷国和穷人的市场驱动的改革，但近年来，两者也都努力更多地关注消除贫困。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来采取的新思路的一个实例，就是向许多最贫困国家提供减债计划（即所谓HIPC，重债穷国计划）。在过去几十年间，一些国家大举贷款，利息高涨，乃至无法偿还。如果要它们完全清偿，则有可能耗尽这些国家的政府用于教育、健康及其他基本服务的资源。重债穷国计划于1996年启动，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富国政府的资助下，为那些国家提供充分的减债额度，使它们在应付债务负担的同时，还能处理贫困问题。该计划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要求所有参与国制定并实施一项减贫战略文件（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至2004年，已有25个国家参加了重债穷国计划进程。

联合国或许是最著名的国际组织，包括一系列的基金和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应对贫困的致因和后果。这方面的实例包括总部都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总部设在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总部设在

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这些组织都在世界各地设立驻各国办事处。它们都旨在应对贫困的不同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焦点在于女童教育，儿童保护与免疫，以及提供清洁饮水和卫生设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穷国政府合作，改善政府治理，包括法治、司法、基本服务的国家供应以及应对腐败。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再举出另外十家联合国组织，也很可能有各组织之间的复杂组合，涵盖一批相互关联的议题。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它对于经济、健康、制度/机构能力、家庭和社会领域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关键的关注话题。为此至少牵涉到四家联合国组织处理这一问题。相比于两家布雷顿森林组织，这些联合国组织普遍受制于核心基金之不足。有些联合国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也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开展研究工作。

近些年来，联合国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始终处在世人瞩目焦点之下，它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它的总部设在日内瓦，通过其148个成员国之间的谈判，以及一套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来调控国际贸易。2001年在卡塔尔多哈启动的目前这一轮谈判，被有些人称为“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于穷国有欠公平，正在限制它们的经济的发展。这些谈判的首要宗旨，就是通过改善这些国家的货品和服务进入其他市场的渠道之类的措施，对不公平状况有所矫正。

上述组织被描述成多边组织，因为它们涉及许多国家，事实上是大多数国家。所谓的双边捐助国（bilateral donors），也参与了全球减贫。在英国，政府的国际开发局（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与特定的穷国合作，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这些目标

^① “World Bank Group”：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际开发协会共同组成。

是国际社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制定的,包括一系列的具体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一是从 1990 年到 2015 年,日均收入少于 1 美元的人口比例减半,一是确保到 2015 年,所有儿童都将能够完成全程初等教育。这些目标中有几项看来不太可能实现。在英国,国际开发局的工作包括为穷国提供拨款和专业技能,以及在国际层面上实施政策和倡议,消除减贫工作的一些结构性障碍(比如债务、贸易规则和资源剥削)。

11.3.4 变迁世界中的全球经济不平等

目前来看,导致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的那些社会经济力量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当今之世,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最大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迅速采纳许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也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至于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会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目前做出定论还为时尚早。他们最终将采取彻底的市场导向经济,还是国家控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融合?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都同意一点:一旦中国以其 12 亿人口^①充分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的影响将震动整个世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其中有许多受过良好的培训和教育,而现在又拿着非常微薄的薪酬,有时候还不到工种相当的英国工人挣的二十分之一。这样一支劳动力在全球经济中将会极具竞争力,并将迫使从洛杉矶到伦敦的薪酬都趋于下降。

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不平等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任何社会学家有确定的答案,不过存在着许多可能的图景。其中之一,我们的世界将可能被大型的全球企业所主导,世界各地的工人为某种全球性薪酬而相互

竞争。这种图景可能会预见,今天的高收入国家中有大批民众的工资要下降,而低收入国家的少数民众的工资会上升。平均收入将有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出现大致拉平的趋势,尽管其水准要大大低于英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目前所享有的层次。在这幅图景中,各国内部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两极化将会加剧,而整个世界也越来越被分割为全球经济的受益者与受损者。这样的两极化会激化族群之间甚至国族之间的冲突,因为那些承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苦难的人会把自已的困境归咎到其他人头上(Hirst and Thompson 1992; Wagar 1992)。

另一方面,一种全球经济也可能意味着人人都得到更多的机会,因为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刺激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根据这一颇具乐观主义色彩的图景,更为成功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只是初露端倪。马来西亚和泰国之类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很快将会跟上,同时还有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印度作为全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已经自豪地拥有了大约 2 亿中产阶级,约占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虽说大约也有同样多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Kulkarni 1993)。

不过,也有一种趋势与此针锋相对,那就是分割富国与穷国的技术鸿沟,今天看来似乎愈益加宽,使得穷国更加难以赶超。全球技术鸿沟是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差距所造成的,但它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差距,加宽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穷国很难承担得起现代技术,但要是缺乏这些现代技术,它们又会面临克服贫困的重大障碍。它们陷入了一种很难摆脱的恶性循环。

杰弗里·萨克斯是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

^①本章下文已经更新为 13 亿,这里疏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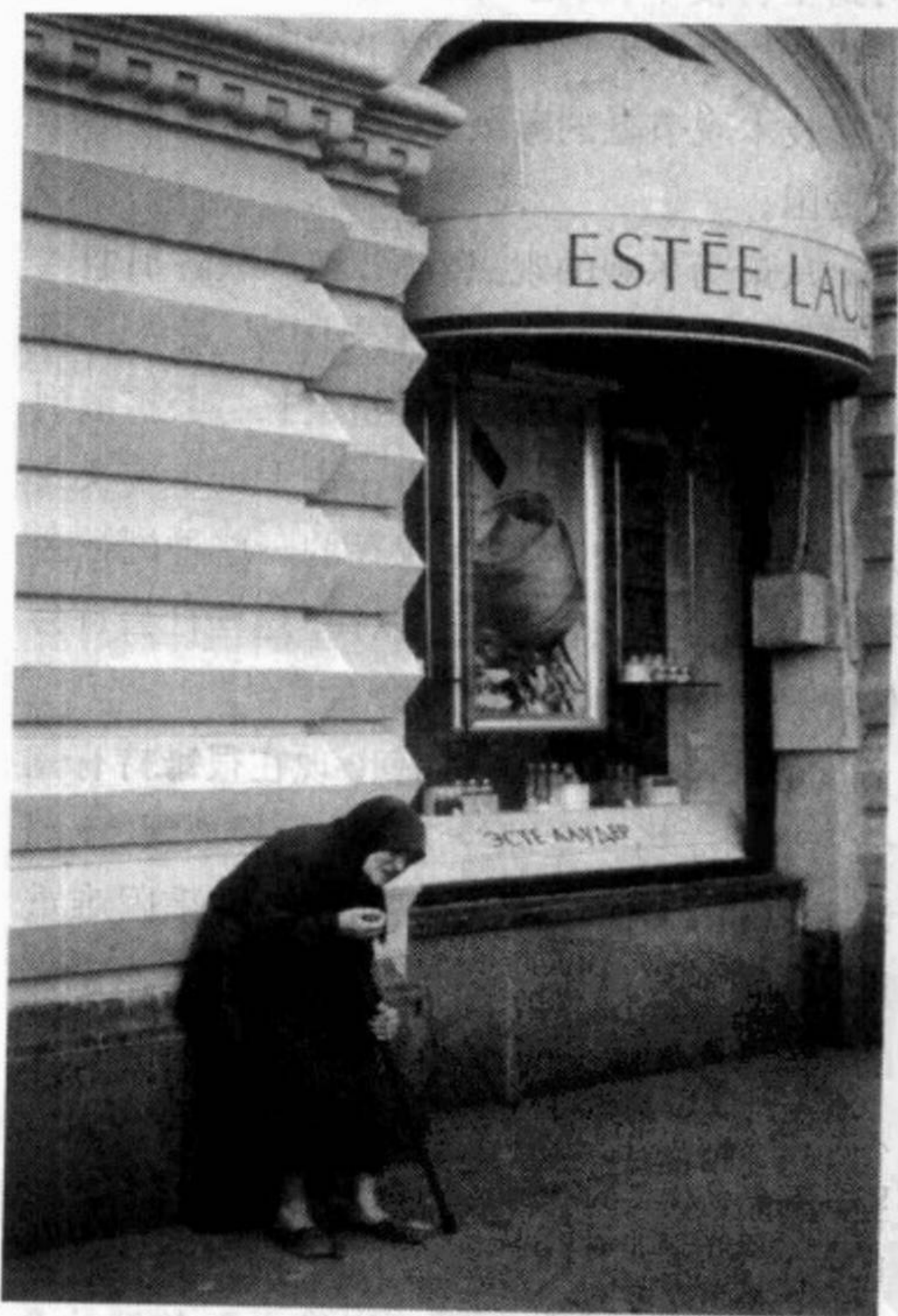
学地球研究所 (Earth Institute) 所长,也是许多东欧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色顾问。他宣称,这个世界被分割为三个等级:技术创新者 (technology innovators), 技术采纳者 (technology adopters), 还有技术脱节者 (technologically disconnected) (Sachs 2000)。

所谓技术创新者,是那些提供了世界上几乎全部技术创新的地区,而它们所拥有的人口不超过世界总人口的 15%。所谓技术采纳者,是那些有能力采纳别处创造出来的技术并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地区,它们占有世界总人口的 50%。最后是所谓技术脱节者,是那些既不能创新技术也不能采纳别处发展出来的技术的地区,它们占了世界总人口的 35%。请注意,萨克斯说的是地区而不是国家。在当今这个边界愈益消失的世界上,技术应用(或技术排斥)并不会始终尊重国界。比如说,萨克斯指出,属于技术脱节者的地区包括“墨西哥南部和热带中美洲的小块地区;安第斯诸国,^①巴西热带地区的大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热带地区;除了贴近欧亚市场的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前苏联区域;亚洲的内陆部分,比如印度的恒河河谷诸邦;位于内陆的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内陆腹地”(Sachs 2000)。这些贫困地区缺乏市场渠道,也缺乏重要远洋贸易航线。它们深陷于萨克斯所称的“贫困陷阱”(poverty trap), 困扰于“热带传染病、农业生产率低下和环境退化,而所有这些都要求得到它们力所不及的技术解决”(Sachs 2000)。

创新要求有观念和技术的显著聚集以形成自我维持之势。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所谓“硅谷”就是一个例证,表明技术创新如何往往集中在拥有大量大学和高科技公司的地区。硅谷是围绕着坐落在旧金山南部的斯坦福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教育科研机构而发展起来的。

穷国就缺乏发展此类高科技区域的条件。萨克斯计算得出,完全或部分位于热带的 48 个国家,其总人口为 7.5 亿,在 1997 年美国授予外国发明者的 51000 千项专利中,却只占有 47 项。绝大多数穷国的政府甚至缺乏一位科学顾问。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因为太穷,难以进口计算机、移动电话、传真机、数控机床仪表或其它类型的高科技。它们也没钱从持有专利的外国公司那里购买技术许可。

那么,要想克服横亘在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这种技术鸿沟,又能做些什么呢?萨克斯呼吁那些拥有高科技的富裕国家向穷国提供比现在更多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比如说,疟疾、麻疹和腹泻之类致命的传染病每年都要夺去



俄罗斯社会现在呈现出巨大的贫富差距。^②

① 指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

② 乞丐老妇背后的专卖店招牌是高级化妆品“雅诗兰黛”。

穷国以百万计的人命。要根除这些疾病所必需的现代医疗技术每年只需花费 100 亿美元,如果均摊下来,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中的人们每人还不到 15 美元。

萨克斯敦促富国政府和国际贷款机构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贷款和拨款。萨克斯指出,穷国用来支持研发的钱少得可怜。世界银行作为穷国开发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每年只有 6000 万美元用以支持热带、农业或健康等方面的研发。相比之下,制药业巨头默克(Merck)公司用于自己产品研发的费用是这个数字的 35 倍(21 亿美元)。就连富国的大学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设立海外研究和培训机构,培育合作研究项目。从计算机和互联网到生物技术,所谓“国家财富”越来越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只要世界上的主要地区还停留在技术脱节者的等级上,就不太可能根除全球贫困。

从最为乐观的观点看来,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各前社会主义国家,最终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经济增长将会扩散到拉美、非洲及世界其它地方。由于资本主义要求工人是流动的,世界上仅存的一些种姓社会将会被基于阶级的社会所取代。这些社会将会体验到上向流动的更多机会。

全球不平等的未来如何?现在很难持有完全乐观的立场。全球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亚洲许多曾经充满希望的经济体现在似乎困难重重。俄罗斯的经济在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许多陷阱,使许多俄罗斯人比过去穷了许多。世界各国是否将会相互借鉴,齐心协力,为各自的民众创造更好的生活,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过去这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见证了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转型。这场转型在下一个 25 年中所产生的效应,将会触及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人的

生活。

如果说全球不平等是当今之世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那么另一个就是全球人口在最近几十年间的迅猛增长。全球贫困和人口增长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正是在全世界最穷的一些国家里,人口增长也最为剧烈。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一现象。

第四节 世界人口增长

据估算,地球上的第 60 亿位居民出生在 1999 年的 10 月 12 日。全世界的人口在激增,从 1960 年以来,它已经翻了一番。根据美国人口研究专家保罗·埃利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估算,如果当时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去,在 900 年以后(相对于整个世界史来说这段时期并不漫长),地球上将有 60000000000000000 (也就是 6 亿亿)人!这意味着地球表面无论陆地还是水面,每一平方码就有 100 人。^①

物理学家 J.H. 弗雷姆林计算出,要为此等规模的人口提供居所,需要在整个地球表面上毫无间隙地盖上两千层的楼房。即使是这样一幢大得惊人的建筑,里面每个人占有的面积也只有三四码^②(Fremlin 1964)。

当然,这样一幅图景只是梦魇般的虚构,用以提醒人们注意,人口增长持续下去将会带来多么灾难性的后果。现实的问题是,在未来的 30 或 40 年里将会发生什么。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各国政府及其他一些机构重视了埃利希等人的警告,引入了人口控制计划,因此有理由认为,世界人口增长态势开始放缓(参见图 11.3)。20 世纪 60 年代对于世界人口可能规模的估算,到了 2000 年看来是不准确的。世界银行估算的 2000 年世界人口刚刚超过 60 亿,相比之下,早期一些估算超过了 80 亿。然

① 约合每平方米 120 人。

② 原文如此,应为平方码,1 平方码等于 0.8361 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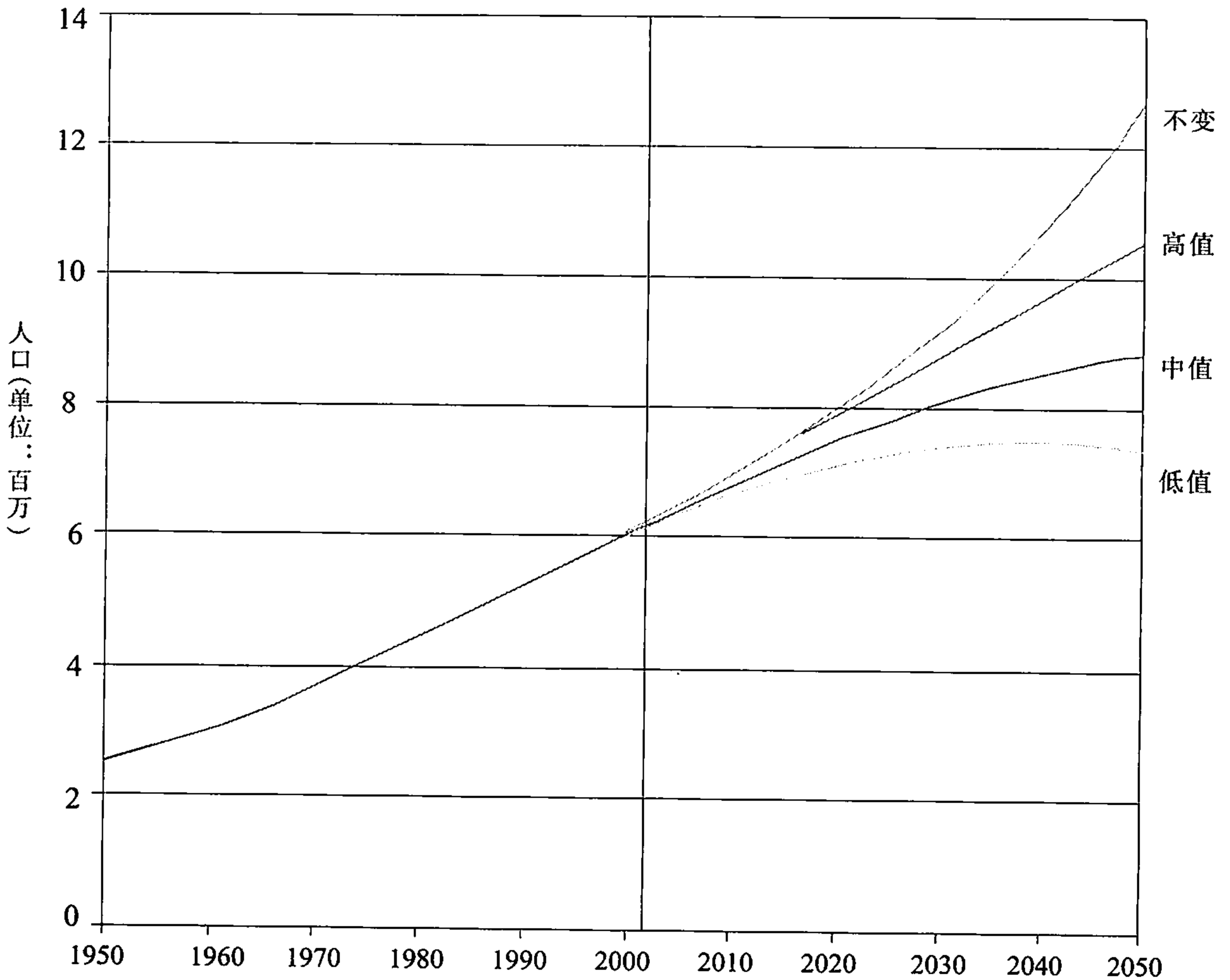


图 11.3 不同预测下的世界人口估计数与预测值, 1950 年至 2050 年
资料来源: UN (2003a)

而, 想想一个世纪之前, 实际上只有 15 亿人口, 这依然表现出惊人的增长率。不仅如此, 支撑人口增长的因素绝对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所有的估算都必须谨慎解释。

11.4.1 人口分析: 人口学

有关人口的研究被称为人口学。这个术语发明于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 那时各国开始对人口的性质和分布进行官方统计。人口学关注的是测量人口的规模, 并对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做出说明。人口模式受三个因素支配: 出生、死

亡和迁移。人口学习上被当作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因为在一个给定的群体或社会中, 对出生和死亡水平以及人口迁移造成影响的因素, 主要是社会与文化方面的。

人口学工作往往是统计性的。今天,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通过实施人口普查 (为摸清一个给定国家的整体人口状况而设计的系统调查), 汇集并分析关于各自人口的基本统计数据。尽管当今的数据搜集模式颇为精确, 但即使在这些国家, 人口统计也并不完全精确。在英国, 自从 1801 年以来, 就每隔 10 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旨在尽可能精确, 但出

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有些人或许没有登记在官方人口统计中,比如非法移民、无家可归者、暂住人口,以及其他出于种种原因逃避登记的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近来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人口统计数据更加不可信赖。

11.4.2 人口变迁的动力

用一个给定期限内每千人中的出生人数减去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就可以测出人口增长或下降的比率,通常是按年进行这种计算的。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出现负增长,换句话说,它们的人口在减少。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都低于0.5%。在18、19世纪的欧洲与美国,人口增长率较高,但是自那以后已经趋于平稳。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在2%到3%之间。这些数据看起来与工业化国家

的比率没有多大区别,但实际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

究其原因,在于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式的。古代波斯的一则传说有助于刻画这一点。一位廷臣请统治者付给他服务的酬劳,第一次在一个棋盘的第一格上放一粒米,以后每次服务,就付给他两倍于上次数目的米粒。国王觉得很划算,就命令从自己的仓库里拿出米粒来支付。但到了第21格的时候,仓库已被搬空;到了第40格,就得放100亿粒米(Meadows 1972)。换句话说,从1个单位开始翻番,再对其结果翻番,一直进行下去,会很快得出巨大的数字:1:2:4:8:16:32:64:128……在7次运算以后,数字已经增加到了原来的128倍。同样的规律也完全适用于人口增长。我们能够通过翻番时间,即人口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长度,来测量这种效果。1%的人口增长率在70年内会使人口翻一番。2%的人口增长



世界上许多最穷国家正经历着人口激增。

人口学基本概念

在人口学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粗出生率、生育率、生育力和粗死亡率。所谓粗出生率,就是人口中每年每千人当中的活产数。之所以称为“粗”出生率,是因为这些统计十分笼统。比如说,粗出生率并没有告诉我们,一群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如何,或一群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人口中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相对比例)。如果统计数据在收集时将出生率或死亡率与这类范畴联系起来,人口学家就会说“特定”的比率而不是“粗”略的比率。比如说,特定年龄出生率就可以具体指明不同年龄组当中每千名女性的出生数。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人口模式的任何细节,特定出生率所提供的信息通常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粗出生率对于在不同群体、社会和地区之间进行整体比较还是有用的。所以说,英国 2002 年的粗出生率为千分之十一,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这一比率较低,比如在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均为千分之九。而在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粗出生率要高得多,比如在印度,粗出生率达千分之二十四,埃塞俄比亚则达千分之四十三(<<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index.html>>)。

出生率是女性生育率的一种表现。所谓生育率,指的是女性平均活产儿数。生育率通常由每千名育龄妇女生育的平均数目来计算。

生育率不同于生育力。生育力指的是女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可能生育婴儿的潜在数目。一个正常的妇女在其有能力怀孕的时期里,从生理上说有可能每年生育一个孩子。生育力会根据女性达到青春期和绝经期的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两者在不同国家和不同个体之间都不相同。虽然可能出现一个妇女生育 20 个或者更多孩子的家庭,但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因

素限制了生育,使得实际当中的生育率始终大大低于生育力。

所谓粗死亡率[也称作“死亡率”(mortality rate)],计算的方式类似于出生率,即人口中每年每千人的死亡数目。同样,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发展中世界,许多社会中的死亡率正逐渐降低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英国 2002 年的死亡率为千分之十,而印度为千分之九,埃塞俄比亚为千分之十八。少数几个国家的死亡率要高得多。比如在塞拉利昂,死亡率为千分之三十。粗死亡率类似于粗出生率,只能提供非常笼统的死亡率指标(一群人口中的死亡数)。特定死亡率给出的信息要精确得多。有一种特别重要的特定死亡率,就是婴儿死亡率,就是在任一年中,每千名活产儿在周岁内死亡的数目。支撑人口爆炸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

婴儿死亡率的不断下降,是致使预期寿命提高的最重要因素。预期寿命就是人们预期能够存活的平均岁数。2003 年,出生于英国的女性的出生预期寿命是 81 岁,男性则为 76 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 1901 年出生的女性和男性,其出生预期寿命分别为 49 岁和 45 岁。当然,这并不等于说,1901 年出生的人们大多数在四十来岁就死了。如果婴儿死亡率较高,就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那么就会拉低平均预期寿命,因为这是一种统计上的平均。影响预期寿命的其它因素还包括疾病、营养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预期寿命必须与极限生命区别开来,后者指的是一个个体能够存活的最长年限。尽管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的预期寿命都有提高,但极限生命却保持不变。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能够长命百岁。

率将使人口在 35 年内翻一番,而 3% 的增长率则只需要 23 年就可翻一番。本节开头提到的埃利希,之所以对人口增长如此忧虑,正是因为世界人口的翻番时间已经在以加速度缩短。从史前直到 1850 年,人口达到了第一个 10 亿。在下一个 80 年,到 1930 年,人口翻番到 20 亿。他正确地预测出,下一次翻番,即达到 40 亿,将发生在 1975 年。

11.4.3 马尔萨斯主义

用今天工业化世界的标准来看,前现代社会的出生率很高。然而,在 18 世纪以前,人口增长始终十分缓慢,因为出生数与死亡数在总体上基本平衡。数量的总体趋势是在上升,有时也会出现人口显著增长的时期,但随后便会有死亡率的上升。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收成不好的时候,婚姻往往会推后,受孕的机会减少,而同时死亡数会增长。这些补偿性的趋势减少了有待供养的人口数量。没有任何前工业社会有能力摆脱这种自我调控的节律 (Wrigley 1968)。

随着工业化的兴起,许多人盼望出现一个物质匮乏一去不复返的新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将会造就一个富足的新时代。但托马斯·马尔萨斯在其名著《人口原理》当中,批评了这些观点,引发了一场关于人口与食物资源的关联的争论,并一直持续至今 (Malthus 1976; 初版于 1798 年)。在马尔萨斯写作的时代,欧洲的人口急剧增长。马尔萨斯指出,人口的增长是指数式的,但食物的供应却只能依赖于固定的资源,只能通过开垦新的土地来扩展。因此,人口增长往往会超出可以利用的支撑手段。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饥荒,它与战争和疫病合在一起,成为对于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马尔萨斯预言,人类如果不能履行他所说的“道德约束”,就将始终生活在悲惨与饥饿的情形中。他为人口过度增长开

出的药方就是:人们要严格限制他们的性生活频数。(他认为避孕是一种“邪恶”)

马尔萨斯主义有一段时间曾被忽视,因为正如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的那样,西方各国的人口发展遵循了一种与他的预测截然不同的模式。在 19、20 世纪,人口增长率有所放缓。事实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下降表示严重关切。然而,20 世纪世界人口的激增从一定程度上再次印证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虽然很少有人支持他原本的说法。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扩张似乎使他们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养活自己的公民。

11.4.4 人口转变

人口学家常常把工业化国家自 19 世纪以来在出生死亡比率上的变化叫做人口转变。这一概念最早由沃伦·S. 汤普森提出,他描述了一个由三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一个社会达到比较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种人口稳定类型将最终被另一种人口稳定类型所取代 (Thompson 1929)。

所谓第一阶段,指的是绝大多数传统社会的典型状况,其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较高,婴儿死亡率特别高。由于高出生数多多少少被高死亡数所抵消,人口即使有增长,也是微乎其微。所谓第二阶段,在 19 世纪早期肇始于欧洲和美国,不过各地之间也有着较大差异,发生在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高水平的条件下。因此,这是一个人口显著增长的阶段。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生率下降到使人口相当稳定的水平,这时第二阶段将被第三阶段所取代。

至于应当如何解释这种变迁序列,第三阶段可能持续多长时间,人口学家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在过去大约一百年里,西方各国的生育率并不完全稳定;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在这些国家的各个阶级或地区之间,生育率始终存

在着显著差异。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序列准确地描述了现代社会人口特征的重大转型。

人口转变理论与马尔萨斯的观念针锋相对。对马尔萨斯而言,财富的增加会自动带来人口的增加,而人口转变理论却强调,由工业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会导致人口在一个新的平衡点达到稳定状态。

11.4.5 变迁的前景

在发展中世界的各个社会里,生育率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始终维持着对于家庭规模的传统态度。子女成群常常仍被视为值得想望,因为这为家庭式运作的农场提供了劳动力来源。一些宗教要么反对生育控制,要么肯定多子多福。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领袖,以及在中南美洲势力显著的天主教会,都反对避孕。即使是政府当局也并不总能满足减少生育的动力。在1974年,阿根廷禁止避孕,以此作为使国家人口尽快翻番计划的一部分;这被视做发展其经济与军事力量的一种手段。

然而在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水平终于还是下降了。中国就是一个典型,它现在有大约13亿人口,几乎是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所有国家中最为广泛的人口控制计划,旨在把国家人口的数量尽可能稳定在现有水平。政府设立了激励措施(比如较好的住房,免费医疗和教育)来鼓励独生子女家庭,而多于一胎的家庭则面临特殊的困难(生了第三胎的人会被降薪)。在有些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政策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意外后果。传统上偏好生儿子,相信养儿防老,而生了女儿,嫁出去就“归”别人的了。这就导致一些家庭不愿面对生育二胎的惩罚。尽管如此,有证据表明,中国的产前政策无论看起来有多么不近人情,总还是对限制该国人口增长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中国的计划需要有高度的中央集权控制,

其程度对于其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要么是不可接受的,要么不具有可行性。比如说在印度,曾经尝试过许多促进计划生育和使用避孕的方案,但相对来说成效不大。1988年,印度的人口为7.89亿;而到了2000年,它的人口越过10亿大关。就算它的人口增长率就此下降,到2050年,印度也将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15亿人。

有人声称,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口变化相比,下一个百年的人口变化将更加剧烈。要想准确地预测世界人口将以什么样的比率增长是很困难的,但联合国展示了几种可能的生育率图景。在“高”图景中,至21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250亿!在联合国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中等”生育率图景中,假设生育率水平将稳定在刚刚达到每个妇女只生育两个孩子,那样的话,到21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18亿。

这种全面的人口增长掩盖了两种不同的趋势。首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经历前文所述的人口转变过程。由于死亡率下降,这将导致人口的激增。印度和中国可能分别达到15亿人口。在人口最终稳定之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将会经历迅速的增长。

第二种趋势涉及已经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这些社会即使仍能维持人口增长,也将是非常低的。相反,将会出现老年化的过程,年轻人的绝对数量下降,而人口的老年部分将大幅上升。这将对发达国家产生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比如依赖比增长,健康与社会服务的压力激增。不过,随着老年人数目的增加,他们也将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分量,可能推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计划和服务的高投入。

第六章第四节讨论了人口老年化。

这些人口变化的结果将会怎样呢?一些观察家看到了社会大变动的形成,尤其是正在经



某些家庭追求的就是多子多福,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的这家塔吉克难民。

历人口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当大量农村人口出外找工作时,将会造成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从而促成大范围的国内人口迁移。城市的迅速膨胀将可能导致环境的破坏、新的公共健康危机、基础设施超载、犯罪率上升和贫民区的出现。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饥荒和食物短缺。我们在(前文)关于全球不平等的讨论中已经看到,世界上已经有 8.3 亿人处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的状态。当人口增加时,食品产出的水平也需要相应地增长,以避免大范围的食物匮乏。然而很难看到如何能够实现这一点: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中有很多受到缺水、耕地减少和土

质退化的严重影响,这些因素将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几乎可以确信,食物产量不可能高到保证自给自足的水平。大量的食品和谷物需要从粮食富余地区进口。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到 2010 年,工业化国家的谷物产量将达到人均 1614 磅,而发展中世界的人均产量却只有 507 磅。^①

农业与工业的技术进步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无人能确知这个世界最终有可能养活多大规模的人口。但即使以现有的人口水平,全球资源也已经大大不足于让欠发达世界创造出与工业化国家相当的生活水准。

① 分别折合 733 公斤和 230 公斤。

本章要点

- 1 世界各国可以根据各自的人均国民收入加以分层。目前,全世界人口中有 40%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相比之下,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中的人口只有 16%。
- 2 据估计,当今世界约有 13 亿人,或将近四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来,这个数字出现了增长。许多人是基于种族、族裔或部落归属的歧视的受害者。
- 3 整体而言,高收入国家的人们所享有的生活水平要比他们在低收入国家中的伙伴高出许多。他们可能有更多的食物可吃,忍饥挨饿或营养不良的可能性较小,也更有可能长寿。他们识文断字和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要大得多,并因此更有可能拥有技能更高、薪酬更优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也不太可能子女成群,而他们的子女死于婴儿营养不良或儿童疾病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 4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情势,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归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性,而最重要的则是得益于它们的政府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鉴于这些国家或地区中有一些目前面临经济困难,这种增长是否还将持续下去,目前有待争议。
- 5 有关全球不平等的市场导向理论,比如现代化理论,认为对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障碍可以说明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由此观之,要消除贫困,就必须克服宿命论的态度,终止政府对于经济事务的干预,鼓励高储蓄率和投资率。
- 6 依附理论认为,全球贫困是穷国受富国剥削的结果。依附发展理论主张,即使穷国的经济命运归根结底是由富国所决定的,但在依附性资本主义关系内部,还是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发展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如果我们希望领会全球不平等,就必须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整体而不只是单个的国家来理解。世界体系理论关注核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关系,以及全球经济的长期趋势。
- 7 国家中心理论强调政府能够在培育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这些理论以迅速增长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历作为范例。
- 8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全球不平等在未来将会加剧还是缓和。随着富国工资的下降和穷国工资的上升,世界范围内会有可能出现工资的某种拉平趋势。有朝一日,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结果,世界各国也有可能取得共同的繁荣。
- 9 人口增长是全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最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之一。马尔萨斯主义首先是在两个世纪以前由马尔萨斯所提出的,认为人口增长往往会超出可以利用的支撑资源。他提出,除非人们限制他们的性生活频数,否则过多的人口增长将必然使未来陷入悲惨与饥饿之中。
- 10 对人口增长的研究被称为人口学。人口学的许多工作需要统计,但人口学家也试图说明为什么人口模式会呈现出特定的形式。在人口分析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和生育力。
- 11 人口模式的变化通常是从人口转变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的。在工业化之前,出生率和死亡率

都很高。在工业化开始的阶段,因为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下降,所以会出现人口的增长。最后,当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相平衡,就会达到一种新的均衡。

12 世界人口到 2150 年预计将超过 100 亿。大多数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世界,这些国家将经

历人口转变,人口在达到稳定之前将迅速增加。而在发达世界,人口将只会缓慢增长。相反,会发生老年化过程,年轻人的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些人口趋势将对劳动力市场、福利体系、食物与水的供应、自然环境和城市地区的状况等产生深远影响。

思考建议

1. 如果生活在最贫穷国家中的人们能够摆脱绝对贫困,这同存在全球的亿万富翁又有什么关系呢?
2. 穷国能够变富吗? 如果可以,如何致富? 如果有阻碍,那么阻碍因素是什么?
3. 终结全球贫困的责任是在富国民众还是穷国民众?
4. 人口学的研究为什么是社会学角度的?
5. 马尔萨斯说的话到底对不对?

阅读指南

- Titus Alexander, *Unravelling Global Apartheid: An Overview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1996). 《破解全球性种族隔离:世界政治概观》
- Vic George and Robert Page (eds), *Global Social Problems* (Cambridge: Polity, 2004). 《全球社会问题》
- Jorge Larraí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apitalism, Colonialism and Dependency* (Cambridge: Polity, 1989). 《发展理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依赖》
- Geoffrey McNicoll, *Population We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 1999). 《人口在国际秩序中的分量》

网络导航

经济学家论不平等 (Economist Inequality papers)

<http://www.economist.com/inequalitypapers>

全球网 (The Global Site)

<http://www.theglobalsite.ac.uk>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The IMF)

<http://www.imf.org>

“让贫困成为历史” (Make Poverty History)

<http://www.makepovertyhistory.org>

联合国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

世界银行全球化主页 (The World Bank Globalization Homepage)

<http://www.worldbank.org/economicpolicy/globalization/>



第一节 人类的性 356

- 12.1.1 生物学与性行为 356
- 12.1.2 对于性行为的社会影响 357
- 12.1.3 性与生育技术 358
- 12.1.4 西方文化中的性 360

第二节 性取向 365

- 12.2.1 性取向是天生还是习得? 366
- 12.2.2 西方文化中的同性恋 367
- 12.2.3 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369
- 12.2.4 男女同性恋民权运动 370

第三节 社会性别 372

- 12.3.1 社会性别与生物学:自然差异? 372
- 12.3.2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373
- 12.3.3 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 374
- 12.3.4 女性特质、男性特质与社会性别关系 375

第四节 有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视角 379

- 12.4.1 功能主义思路 379
- 12.4.2 女性主义思路 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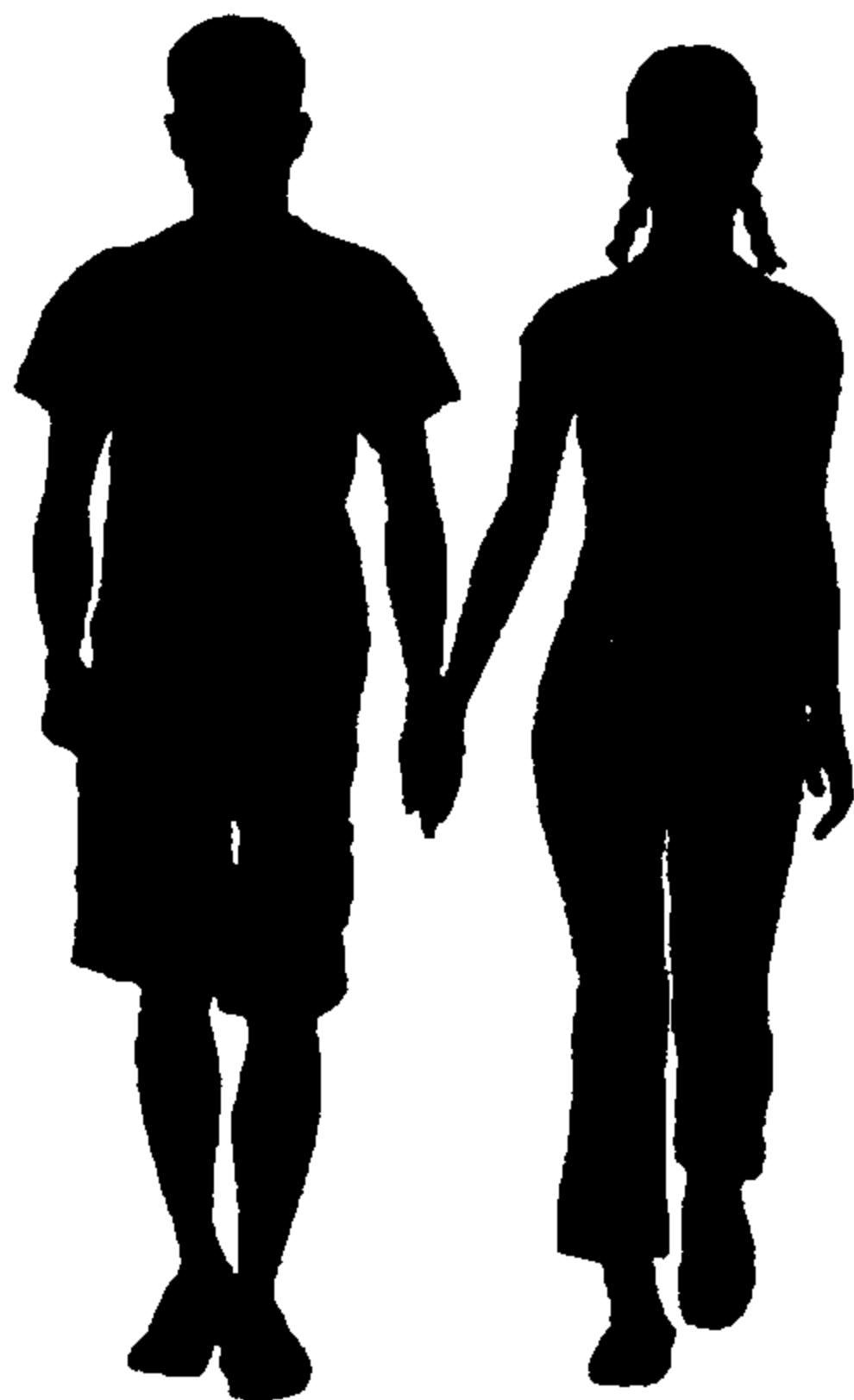
小结:社会性别与全球化 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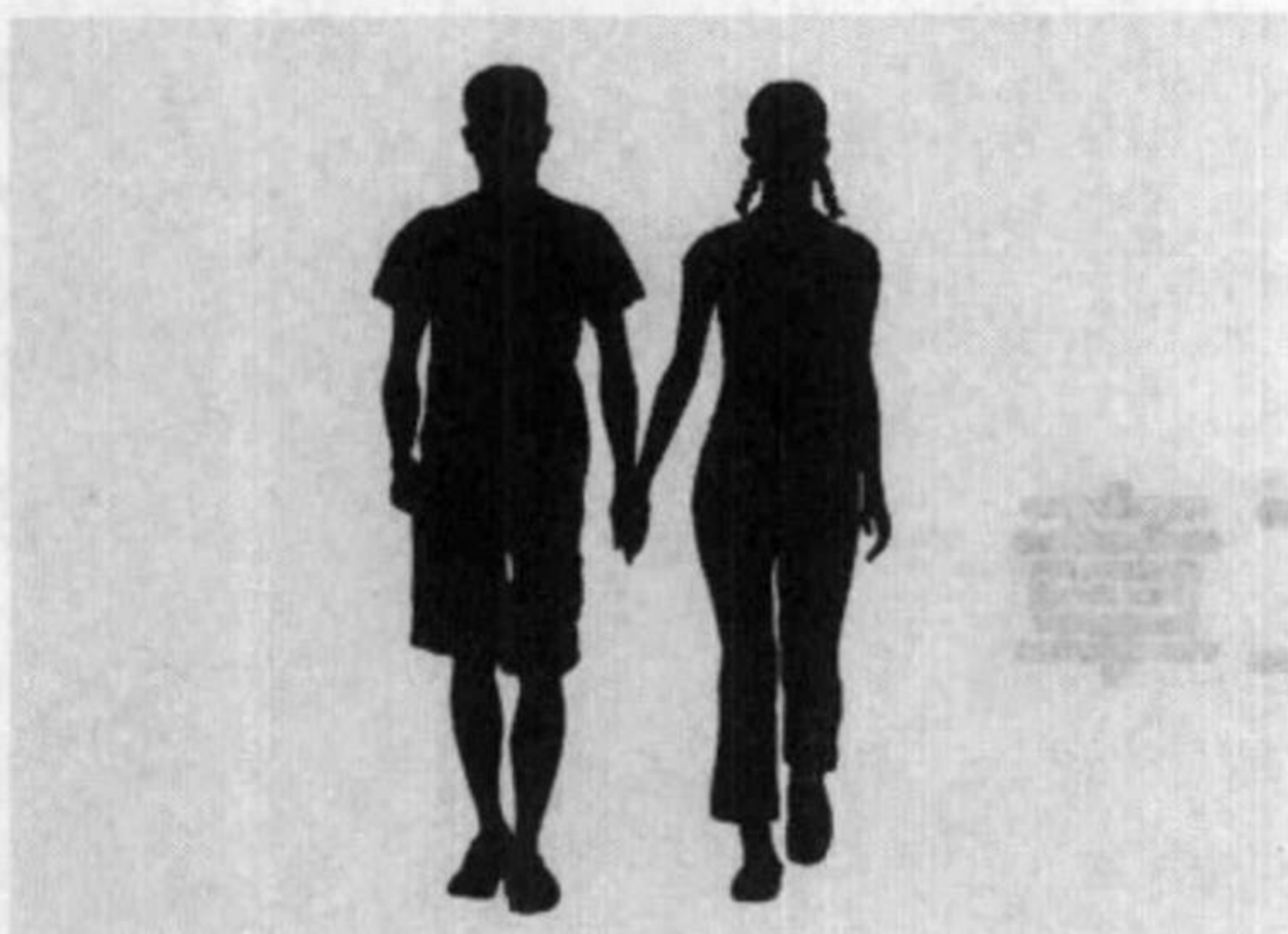
本章要点 387

思考建议 388

阅读指南 388

网络导航 388





“**现**在，根据马萨诸塞州授予我作为治安法官的权力，最重要的是，根据你们自己的爱的权力，我现在宣告，你们遵照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成婚。”2004年5月17日上午9时刚过，市政厅书记官玛格丽特·德鲁莉庄严宣布：“你们可以以吻作为婚姻的封印。”一对新人深情拥抱。玛西娅·卡蒂丝，这位已经和她的伴侣相知相守18年的人，欣喜若狂：“我实在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她说道。“充满了爱。你难道看不出我浑身都洋溢着爱吗？”而她的

伴侣则说觉得像是“中了彩票”。

但这桩婚姻在美国引起了激烈争议。基督教团体“重视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的领导人詹姆斯·多布森说：“马萨诸塞州范围内签署的文件可以在题头宣示‘婚姻证明’，但它们其实是婚姻制度的死亡证书。”争议的起因在于，卡蒂丝的长期伴侣也是一位女性——塔尼亚·麦克洛斯基。这对配偶属于根据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新法规结婚的第一批同性配偶。这一天从早到晚，一对又一对同性配偶接连步出地方市政厅，手里握着新签署的核准其成婚的文件。而在市政厅外，聚集着数以千计的人们，向这些对配偶鼓掌志庆，宣示他们当中许多人视为不言自明的权利。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常常成为开明改良的领头羊。2004年5月，在经过州上诉法院内外长达数月的激烈交锋之后，马萨诸塞州成为第一个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尽管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确实认为，同性恋者之间的婚姻应



这就是马萨诸塞州首例获颁结婚证的同性配偶，她们在市政厅外整整排了24小时。

当由法律认可为有效,但大多数人(2004年5月的民调显示为55%)还是坚持反对这一点(Gallup 2004)。而马萨诸塞州则加入了荷兰、比利时以及加拿大大部分地方的行列,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几处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地方。

在许多方面,同性恋已经变得更加正常化——更加成为日常社会所接受的一部分。有几个国家已经通过了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南非1996年颁布新宪法,就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在宪法上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国家。而欧洲的许多国家,包括丹麦、荷兰和西班牙,现在都允许同性伴侣登记注册,诉求绝大部分婚姻权利。2004年11月,英国政府也通过类似的立法,让男女同性恋配偶都有机会获得作为已婚配偶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只要他们/她们选择通过民事仪式注册其伴侣关系。这些权利包括社会保险和养老补贴,不动产租赁权,对于配偶之一的子女所可能担负的双亲责任,完全承认其人寿保险资格,有责任为配偶及子女提供适当的抚养,给予已婚配偶同样的税负待遇,以及医院探视权。

在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同性恋活动分子正在吁求同性恋婚姻的完全合法化。他们/她们为什么在乎这一点?说到底,正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讨论过的那样,在异性夫妻之间,婚姻似乎已经日趋衰微。活动分子们之所以在乎,是因为他们/她们想取得与其他任何人同样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今天的婚姻首要的是一种感情的承诺,但根据国家对其的认可,它也具有确定的法律含义。它赋予伴侣双方重要的权利和责任,比如英国规定的民事结合^①所赋予的权利和责任。“承诺仪式”(ceremonies of commitment),即与法律无涉的婚姻,在美国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中间都已经变得很流行,但却不能授予这些权利和义

务。当然,反过来说,这些法律权利与义务也是许多异性恋伴侣现在决定推迟婚姻或者根本就不结婚的原因之一。

而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人则谴责它轻浮草率或有悖自然。他们认为,这等于是在使一种国家应该全力制止的性取向合法化。美国有一些压力群体致力于使同性恋者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而与异性结婚。有些人仍将同性恋看成是变态,因而强烈反对任何可能会使其正常化的法律条款。

然而大多数同性恋者都只想被看成是普通人。他们/她们指出,同性恋者与其他人在同等程度上需要经济保障和情感保障。安德鲁·沙利文在他的《其实很正常》一书中(Sullivan 1995),强有力地论证了同性恋婚姻的优点。沙利文既是一名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同性恋者,因此为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相协调而备受折磨。他认为,同性恋至少部分是自然赋予的,但不是通常所谓被简单“选定”的事情。要求某人放弃同性恋,就是要求其放弃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机会。那份爱情应该能够体现在婚姻关系中。他的结论是,如果同性恋者不想成为被疏离的少数群体,同性恋婚姻就必须得到合法化。

法律上的同性恋婚姻的可能性展示出,有关性的观念在近几十年来已经发生了多么彻底的变化。无论如何,仅仅是在1967年,男同性恋才在英国获得合法化。同性恋婚姻也提出了性取向方面的问题:性取向在何等程度上是天生固有的,又在何等程度上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在本章所考察的主题中有许多是与第七章中提出的问题重叠的。人类的性^②是与我们有关爱的观念和如何塑造良好关系的问题维系在一起的。耐人寻味的是,人们认为一种良好的关系就必须是地位平等的。只有通过一场

① “civil partnership”,亦称“civil union”,是一些国家对于同性恋婚姻的承认形式。

② “sexuality”这个词很难有统一的译名,包括了性取向、性特征、性观念、性活动、性行为、性关系等等,在福柯的作品中这个重要的术语也被译为“性本性”等。我们暂且统称为“性”,请注意与“sex”(生理性别)和“gender”(社会性别)相区别。本章中另外还有“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术语辨析。在本书其它章节,术语译法或许没有如此细致分辨。

反对仍在持续的歧视和不平等的斗争,同性恋婚姻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本章开头,我们先来讨论人类的性,看看西方社会中的性行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迁。然后,我们将更具体地谈谈性取向,尤其是与西方世界中的同性恋有关的话题。这将把我们带向有关社会性别的更广泛的话题,并且引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做一个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最后,我们将探讨社会性别不平等,看看女性平等如何越来越确立起全球性的表达。

第一节 人类的性

有关性的观念正在发生巨变。西方各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人们的性生活的一些重要特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传统社会里,性与生殖过程密切维系,但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两者已经分离。性已经成为生活中有待每一个体探索和塑造的一个维度。如果说人们曾经从婚姻关系中的异性恋和单偶婚的角度来“界定”性,那么现在,正如我们在上文有关同性恋婚姻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人们越来越接受多种情形下纷繁多样的性行为和性取向。

本节我们将讨论有关人类性行为的一些话题:生物性影响相对于社会性影响的重要性,社会如何塑造性活动,以及生育技术的影响。然后,我们将考察西方社会中人类性行为的一些晚近趋势。

12.1.1 生物学与性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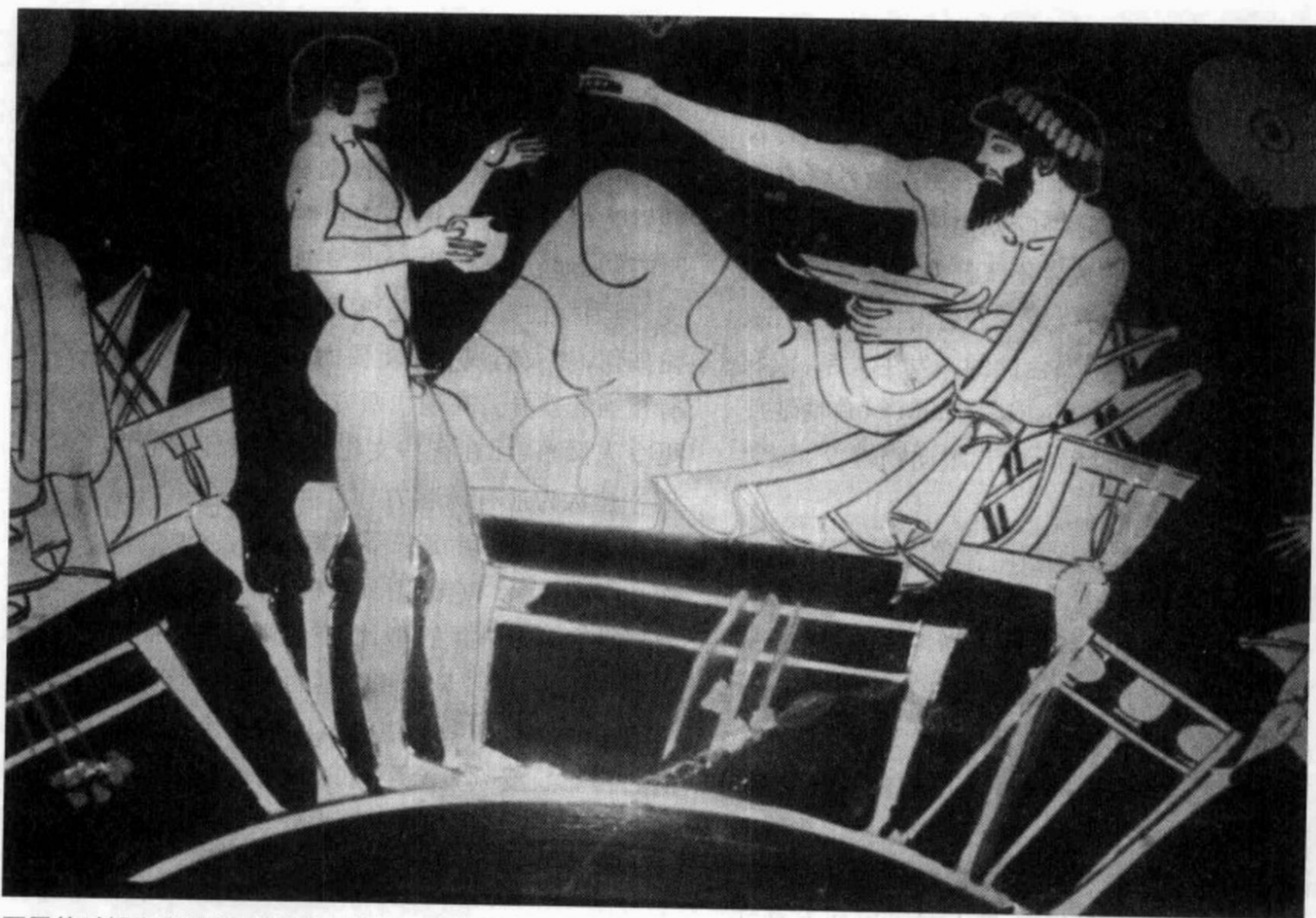
性长久以来都被视为一个高度私人化的主题。因此,对于社会学家而言,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直到最近,我们关于性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生物学家、医学研究者和性

学家。学者们也研究动物世界,以期获得对人类性行为更多的理解。

显然,性有着生物学的基础,因为女性的解剖结构不同于男性。生物学上还存在着生殖的必然要求,不然,人类物种将会灭绝。一些社会生物学家,比如大卫·巴拉什,对为什么男人比女人在性方面更倾向于乱交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进化论的说明。他的论点是:男人从生物学上倾向于使尽可能多的妇女怀孕,而女性则愿意有稳定的伴侣,来保护她们的孩子所获的生物遗传。这是因为,尽管男性一生当中能够产生数百万颗精子,但女性却只能产生几百颗卵子,并且体内每怀一个胎儿,都必须长达9个月。许多关于动物性行为的研究证实了他的论点,这些研究都称,在同类物种之中,雄性在性方面一般都比雌性更倾向于乱交。

许多评论者不接受这种进化论的思路。比如说,斯蒂文·罗斯就曾经提出,人类的行为与绝大多数的动物都不相同,更多地受到环境的塑造,而不是遗传编码的本能的决定:“人类婴儿出生时,已经确定的神经通路是比较少的”(Rose et al. 1984)。罗斯主张,人类相较于其他动物,婴儿期特别长,使他们有比其他物种长得多的时间来从经验中习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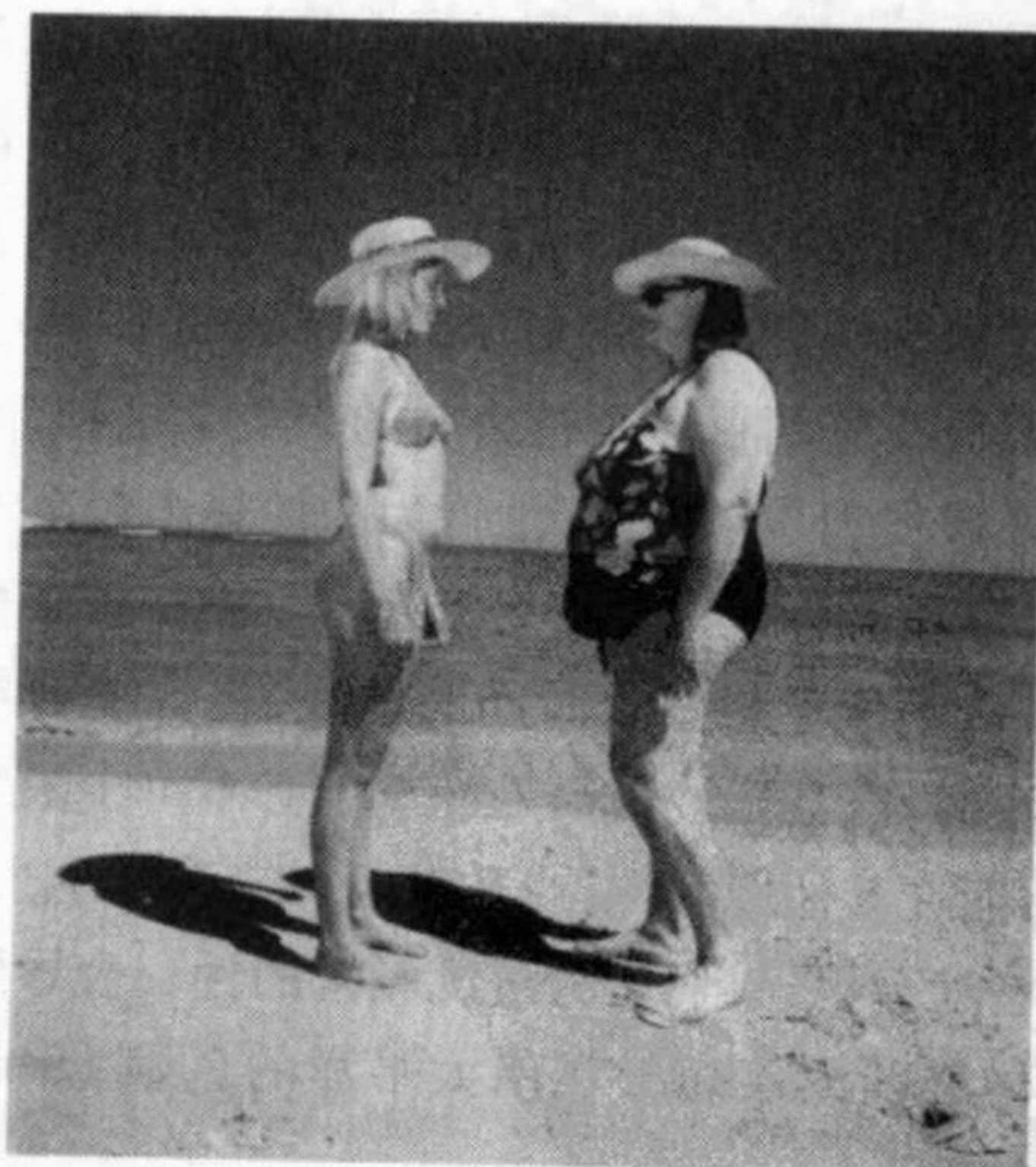
巴拉什之类的社会生物学家的主张受到了猛烈抨击,考虑到对于人类性行为的含义的时候就尤其如此。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把人和动物明确区分开来:人类的性行为是充满意义的,也就是说,人类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使用和表达他们的性。对人类而言,性活动绝不仅仅是生物性的。它是符号性的,反映着我们是谁,我们正在体验什么样的感情。我们将要看到,性实在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完全将之归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特性,而必须从人类赋予其上的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理解。



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不同的性规范。在古希腊,成年男子和男孩之间有那种关系是一种普遍接受的规范。

12.1.2 对于性行为的社会影响

在所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他们从异性那里寻求感情投入和性的愉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异性恋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是婚姻和家庭的基础。然而,也有许多属于少数人的性趣 (tastes) 和性向 (inclinations)。朱迪斯·洛伯就区分出多达十种的性认同 (Lorber 1994): 正统的^①(异性恋的) 女人、正统的男人、同性恋的女人、同性恋的男人、双性恋的女人、双性恋的男人、易装癖的 (transvestite) 女人 (经常打扮成男人模样的女人)、易装癖的男人 (经常打扮成女人模样的男人)、变性 (transsexual) 女人 (变成女人的男人) 和变性



谁的身体最有魅力? 在有些文化里,追求的是女性体形的曲线美而不是骨感美。

① “straight”: 即符合传统常规的,也就是非同性恋的,目前在口语中有径自称为“直的”。

男人(变成男人的女人)。而性行为本身甚至还更为多样。

下列情况都属于可能的性行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能与几个女人、男人或男女两性皆有性关系。一个人可以跟自己发生性关系(即手淫[masturbation]),或者不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禁欲^①)。有人可以跟变性者发生性关系;或跟通过易装才能诱发色欲的人发生关系;或利用色情描写或性器械;或者玩SM^②(色情地使用捆绑和痛苦折磨);或者跟动物性交,等等(Lorber 1994)。

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一些性规范赞成某些行为,而对另外一些行为不予鼓励乃至提出谴责。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化来学习这些规范。例如,在最近几十年间,西方文化中的性规范已经与浪漫之爱和家庭关系的概念联系起来。然而,此类规范在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很大差别。同性恋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有些文化在特定的情境下对它表示宽容,甚或予以积极鼓励。比如说,在古希腊人中,男人对于男童之爱就被理想化为性爱的最高形式。

文化不同,人们接受的性行为类型也有相当差异,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的性反应是后天习得的,而不是先天固有的。50年前,克莱伦·福特和弗兰克·比奇做了一项极为广泛的研究(Ford and Beach 1951)。他们分析了两百多个社会中的人类学证据,发现在被视为“自然的”性行为和性魅力规范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比如说,在有些文化中,认为值得想望长时间的前戏,也许要持续数小时,这甚至被认为是性交前必不可少的阶段;而在其他地方,前戏几乎根本就不存在。在有些社会里,人们认为过度频繁的性交会导致身体衰弱或疾病。在南太平洋的色娘(Seni-

ang)部族,做爱间隔多久才好的建议是由村中长者提供的,而且他们还相信,白发人就可以合法地夜夜交欢。

在多数文化里,(女性和男性所具有的)性魅力的规范更多地关注女性而非男性的体形容貌,而在西方,这种情况似乎正在逐渐改变,因为女性日益活跃于家庭以外的领域。无论如何,被人们视为最重要的女性美的特征也有相当的差异。在现代西方,苗条玲珑的身体更令人倾慕;而在有些文化里,丰腴壮硕的体形才被认为最有诱惑力(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见)。有时乳房并不被看成是性刺激源,而在有些社会,它们则具有极大的色欲意味。有些社会非常注重脸型,而有的则强调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或者鼻子和嘴唇的大小与形状。

尽管性是由我们生活期间的社会所塑造的,但它也受到社会中可以利用的技术的塑造。下面,我们就来考察技术变迁影响性行为的一些方式。

12.1.3 性与生育技术

数百年来,子女的生产与养育支配了大多数女性的生活。在传统社会中,避孕是没有多少效力的,在有些社会中甚至不曾知晓。即使在欧洲和美国,迟至18世纪,女性还常常怀上20次孕(常常伴随着流产和婴儿夭折)。避孕方法的改进从根本上促成了这种情形的改变。在工业社会里,女性再要是怀上那么多次的孕,就远远谈不上什么自然现象,几乎就是闻所未闻了。避孕技术的发展使大多数女性和男性能够控制是否要孩子,什么时候要孩子。

避孕只是生育技术的一种。下面描述了其他一些已经变成社会性的自然过程。

① 原文此处用的是“celibacy”,但如今已非中世纪,简单的守单身或发誓不论婚嫁,并不意味着符合作者此处的意思。

② “sado-masochism”:施虐—受虐狂。

一 分娩

医疗科学并不全程介入从生到死的各大生命转变。随着土郎中和接生婆被产科专家所取代,怀孕和分娩也就慢慢医学化了。今天,在工业化社会,绝大多数的分娩是在医院里进行的,有一组专业化医疗团队协助。

有关身体的医学化,详参第八章。

过去,新生儿父母必须等到分娩那一天才能知道自己宝宝的生理性别,知道宝宝是否健康。而在今天,可以使用超声扫描(用超声波检测出的胎儿影像)和羊膜穿刺术(从胎儿周围抽取一些羊水)之类的产前检查,在宝宝出生之前来检测结构异常或染色体异常。这类新技术对配偶双方和整个社会都提出了伦理和法律方面新的决策问题。如果检测出不正常,配偶双方就面临着是否留下宝宝的决策,因为知道这有可能造成终生的严重残障。

二 遗传工程:设计婴儿

近来,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致力于扩展遗传工程的应用,也就是说,干预胎儿的遗传构成,以影响其后续的发育。遗传工程有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正开始引发几乎与堕胎问题之争同样激烈的争议。按照支持遗传工程的人的看法,遗传工程将能给我们带来众多益处。比如说,有可能识别出造成某些人易于染上某些特定疾病的遗传因子。基因重组将确保这些疾病不再代代相传。还有可能在产前“设计”宝宝的肤色、发色、眼睛颜色、体重等等。

要说自然的愈益社会化为我们创造了众多机遇,也同时带来了诸多问题,遗传工程可谓最好的例证了。如果父母能够设计自己的宝

宝,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又应该对这些选择做出怎样的限制?遗传工程不太可能很便宜。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将有能力通过遗传编码,去除自己孩子身上任何他们认为不受社会欢迎的特性?而那些更处劣势的群体的孩子将继续自然生产,又会怎样?

有些社会学家主张,获得遗传工程的机会差异有可能导致出现一个“生物学底层阶级”。那些不具备遗传工程能够产生的生理优势的人,将可能受到那些享有这些优势的人的偏见和歧视。他们在找工作、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等方面可能会遇到麻烦(Duster 1990)。

三 堕胎之争

现代生育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所造成的最具争议的伦理困境,或许就是以下这一问题:在什么状况下,应当让女性实施堕胎?堕胎之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在美国尤为甚之,正是因为它的焦点乃在于难以轻易求解的基本伦理问题。那些“反对堕胎合法化”^①的人相信,除了个别极端情况,堕胎终归是不对的,因为这无异于谋杀。在他们看来,伦理问题首先受制于必须赋予人类生命的价值。而那些“支持堕胎合法化”(pro-choice)的人则主张,必须优先考虑的应当是母亲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也就是她有权利过上一种值得去过的生活。

争论已经导致了众多激烈冲突的事件。究竟能否解决这一争端?至少有一位杰出的社会理论家和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已经指出,可以解决(Dworkin 1993)。他认为,反对堕胎合法化的一方和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一方之间的激烈分歧,掩盖了两方之间更深层的共识基础,而这一点正是希望之源。在此前各历史时期,生命常常是比较廉价的。而到了现代,我们已经非常强调人类生命之神圣不可侵犯。

^①“pro-life”:与反对堕胎的立场一脉相承,此词还指反对安乐死。以下类推。



INTERIOR OF A WEST-END BROTHEL.

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个男人可以有固定情妇或者去找妓女,而不会受到惩罚。而女人要是也这样,就会认为完全不可接受。^①

两方都同意这一价值观念,只是解释有所不同,一方强调孩子的利益,而另一方则注重母亲的利益。德沃金的建议是:如果能够说服两方认识到共享同样的伦理价值,就有可能形成更具建设性的对话。

12.1.4 西方文化中的性

近两千年来,西方对待性行为的态度主要是基督教所塑造的。尽管基督教中的不同教派和宗派对性在生活中究竟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意见不一,但基督教会的主导观点则是,除非是生育所必需,其他一切性行为都是值得质疑的。在一些时期,这种观点造成了整个社

会中的过分拘谨,而在另外一些时期,许多人就无视甚或反抗教会的教义,通常会做出一些被宗教权威禁止的事情(比如通奸)。很少有人认为,只能够并且只应该通过婚姻来寻求性的满足。

在19世纪,宗教角度对于性的推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医学角度对于性的推定所取代。然而,早期医生们关于性行为的绝大多数著作一如教会的观点一般严厉。有些人提出,与生育无关的任何类型的性活动都会严重损害身体。据说手淫会导致失明、癫狂、心脏病及其他的失调,而口交会导导致癌症。在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着性方面的假道学。人们相信,贞洁的妇女对性会比较淡漠,接受丈夫的宠幸仅仅

^① 画中文字为“西区妓院内景”,伦敦西区(west-end)至今仍是伦敦夜生活中心,是高档住宅区、商业区和剧院区。

是出于责任。但是,在迅速扩张中的城镇,卖淫盛行,而且常常得到公开的容忍,“放荡”女人被看成是与她们正派体面的姐妹们完全不同的一个群体。

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男人,表面看来是节制有度、行为端正的公民,是忠于妻子的丈夫,但也常常去嫖妓或养情妇。这类行为被宽容。而“正派体面的”女人如果有情人,并且被曝光,就会被视为是丑闻,在社交圈中被排斥。对男性与女性的性活动的不同态度形成了一种双重标准,这种标准长久存在,至今仍萦绕不去 (Barret-Ducrocq 1992)。

在现时代,对于性问题的态度是传统与开明并存,而开明的态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发展尤为强劲。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受到基督教义影响的人,相信婚前性行为是错误的,也普遍不赞同婚内异性性活动之外的所有性行为模式,尽管现在有更多的人也认可了性快感是一种值得想望的重要感受。相反,有些人则宽恕甚至鼓励婚前性行为,并对不同的性活动模式持容忍的态度 (参看表 12.1)。可以肯定的是,过去 30 年以来,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待性的态度都变得更为宽容。在影视戏剧中,屡屡出现此前根本不能被人接受的场景,而色情材料对于绝大多数有所欲求的成人来说,也实在是

不难得到。

一 性行为:金赛的研究

我们可以非常确信地谈论与性有关的公共价值观,却不能同样确定地谈论私人的性活动,因为从本质上讲,这类活动多半不会有文本记录。当阿尔弗雷德·金赛于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在美国开始他的研究时,这还是第一次对实际的性行为进行的重大研究。金赛和他的合作研究者遭到了宗教组织的谴责,报纸上和国会中也有声音痛斥他的研究不道德。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最终记录下了 18000 人的性生活史,完全可谓美国白种人口中有代表性的样本 (Kinsey 1948, 1953)。

金赛的研究结果使绝大多数人觉得意外,也令不少人倍感震惊,因为结果显示,当时流行的公众对性行为的期望与实际性行为之间具有巨大差异。他发现,几乎 70% 的男人嫖过妓,84% 的男人有过婚前性体验。然而,遵循着双重标准,40% 的男人期望他们的妻子在结婚时还是处女。90% 以上的男性有过手淫,将近 60% 的男人有过某种形式的口交活动。在女人中,大约 50% 有过婚前性体验,尽管绝大多数是跟她们未来的丈夫。大约 60% 的女人有过

表 12.1 英国对于性关系的态度,1998 年(百分比)^a

	始终不对	大多数情况下不对	有时候不对	很少不对	根本没错	其他 ^b	合计
一男一女婚前发生性关系	8	8	12	10	58	5	100
一位已婚人士与非配偶发生性关系	52	29	13	1	2	4	100
16 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发生性关系	56	24	11	3	3	3	100
两位同性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	39	12	11	8	23	8	100

a: 基于一份从“始终不对”到“根本没错”的五分量表,询问 18 岁及以上的人,他们是否认为不同类型的性关系是不对的。

b: 包括未回答者、回答“不知道”者以及回答“看情况”或“不一定”者。

资源来源: *Social Trends* 30(2000)

手淫，同样比例的女人有过口唇—生殖器的接触。

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二战刚刚结束，公众广为接受的态度与金赛的研究所证明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别可能尤其显著。性开放时代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开始，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感觉自己挣脱了主宰前辈们的严苛的道德准则。性行为可能也改变了很多，但涉及性的问题却不是以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方式来公开讨论。那些参与过在公众层面上仍被强烈反对的性活动的人都有所隐瞒，没有充分意识到有多少人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活动。而更为宽松自由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则揭启了公开态度更加符合实际行为的时代。金赛 1956 年去世，但他曾执掌的性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 至今仍在从事其研究。1981 年，它更名为金赛性、性别与生育研究所 (Kinsey Institute for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以纪念他的研究贡献。

二 金赛研究之后的性行为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些挑战现存事物秩序的社会运动，比如那些与反文化或“嬉皮”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社会运动，也打破了现存的性规范。这些运动宣扬性自由，而女用避孕药的发明也使得性快感明显地与生育相分离。女性团体也开始努力争取更大程度上独立于男性的性价值观，拒绝接受双重标准，认识到女性需要在男女关系中获取更大程度上的性满足。

直至最近，我们仍难以确切地了解，自金赛研究的时代之后，性行为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莉莲·鲁宾对 1000 名年龄在 13 到 48 岁之间的美国人进行了访谈，试图查明在过去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们的性行为和性态度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根

据她的研究结果，的确有一些重大变化。初次性活动的年龄一般比上一代的典型情形更早一些。不仅如此，青少年的性实践往往像成年人一样丰富多彩。虽然还存在着双重标准，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影响力了。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女性已经开始在两性关系中期待并积极追求性快感。她们正期待着得到性满足，而不仅仅是提供性满足。鲁宾提出，这种现象对男女两性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Rubin 1990)。

与以前的情况相比，妇女在性方面更加解放。但伴随着这一令多数男人为之欢呼的解放，却出现了令许多男人难以接受的新的自信主动。鲁宾访谈的男人常说，他们“觉得力不从心”，担心自己会“没一次够劲”，发现“如今让女人满足已是不可能了” (Rubin 1990)。

男人觉得力不从心吗？这难道不与我们现在所期望的一切相矛盾吗？在现代社会中，男人在大多数领域内继续处于支配地位，而且他们一般对女性都比女性对男性更具暴力性质。这类暴力实质旨在控制女人，维持女人的从属地位。然而，正如我们在下文对于鲍勃·康奈尔 (Bob Connell)^①以及社会性别秩序的考察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学者已经开始提出，男性特质既是一种奖赏，也同样是一种负担。一些学者更是指出，许多男子的性都带有强迫意味，不能令人满意。如果男人不再利用性作为控制手段，那么不仅是女人，就连男人自己，都会有所获益。

关于性的理论阐述

金赛研究所的两位研究者，约翰·加尼翁和威廉·西蒙，开始对他们所处理的数据产生了更具理论性的兴趣。两位作者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性的举止》中，提出脚本 (script) 的比喻有助于理解人类的性行为 (Gagnon and Simon 1973)。

脚本的比喻以戏剧的比喻为基础，以说明

^① 正如文献所示，实为 Robert W. Connell，鲍勃为罗伯特之昵称。

日常的社会互动，这是戈夫曼最先提出来的。（在第五章我们考察了戈夫曼的拟剧论分析，并讨论了适用这个比喻的许多社会互动实例）加尼翁和西蒙认为，戏剧的比喻也能有效地分析性的问题。有一套精致的规则、仪式和比喻脚本来告诉我们，“我们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方式、地点、时间乃至原因”。

根据金赛及其团队的研究，性行为的可能活动方式多种多样：异性或同性之间的短暂接触，卖淫，与长期伴侣之间的性关系，等等。对于人类来说，所有这些性举动的发生事先都是带有一定的思索或准备的。每一种性举动都涉及性的脚本，以使性举动可以理解。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妓女之间的会面为例。性接触将包含寻找合适的伴侣（对象）、就性的举动和价格进行协商（方式）、寻找一处场所，比如旅店或妓院（地点）、就会面达成共识（时间），或许还包括对于行动的某种说明或辩解，比如寂寞难耐、关系障碍或寻求友谊（原因）。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妓女之间的性接触，但可以适用于任何性的举动。

在加尼翁和西蒙看来，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人类的性，对于性脚本的读解就是至关重要的。两位作者提出，这些脚本采取了三种重要形式：“个人脚本”（personal scripts）是在个人头脑中铺陈的，提供有关自己的性欲望的信息；“互动脚本”（interactive scripts）是性伴侣之间协商而成的，涉及对于各自角色的说明；而“历史文化脚本”（historical-cultural scripts）则存在于广泛的文化之中，提供文化中有关个人的角色和性期待的（常常是无意识的）信息。

加尼翁与西蒙的研究被视为奠定了研究性的“社会建构论”思路。有关社会建构论的讨论，详参第五章第五节第四小节。

三 一种新的忠贞？

在1994年，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了《性的

社会组织：美国的性习俗》一书，这是自金赛以来在所有国家中对于性行为进行的最为广泛的研究。令许多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人中实际上存在着性方面一种根本上的保守立场。比如，他们的被试中83%的人在此前一年仅有一个伴侣（或根本没有），而在已婚者当中，这一比例上升至96%。对配偶保持忠贞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仅有10%的女人和不到25%的男人承认一生当中有过一次婚外恋的经历。根据这项研究，美国人终生平均仅有3个伴侣。尽管行为的性质看似确定，但从这项研究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独特的变化，其中最具有意义的就是婚前性体验比例的持续增长，这尤其表现在女性之中。实际上，今天超过95%的美国人在结婚前就已经有过性的体验（Laumann 1994）。

研究者在美国所发现的对于性忠贞的佐证，似乎也能在英国找到证据。2000年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有72%的人认为与伴侣之外的某人发生性关系是“非常错误的”，另有21%的人认为这“比较不对”。虔信宗教的人相比于不信宗教的人，丧偶者相比于独身者，认为其错误的比例更高，这或许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但有意思的是，如果说人们在性方面更加忠贞，那么英国的生活将有所改善，那么最有可能赞同这种说法的却是最年轻的群体（15岁至24岁之间）（参看Mori 2000）。有关亲密关系的讨论，详参第七章。

对性行为的调查困难重重。我们完全不了解，人们在被研究人员询问关于自己性生活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究竟有多少真实可信。《性的社会组织》一书似乎显示，比起金赛报告的那个时代，现在的美国人在性生活方面不太愿意冒险了。这有可能是金赛报告本身不太准确，但也有可能是对艾滋病的恐惧导致许多人约束自己性活动的范围，还有可能是现在人们出于某种原因，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性活动的某些方面。对此我们无法确定。

性行为调查的效度最近成了激烈争论的

卖淫

卖淫(prostitution)可以界定为为了挣钱而给他人提供性服务。“娼妓”(prostitute)一词在18世纪晚期才开始广泛使用。在古代,大多数为经济回报而提供性服务的人都是交际艺妓(courtesans)、姘妇小妾(concubine)或奴隶。在传统社会中,交际艺妓和姘妇小妾的地位常常不低。

现代卖淫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女性与其主顾之间一般彼此不认识。尽管男人可能会成为“常客”,但最初关系的建立都不是基于个人之间的相识的。不过,在早先为获得物质利益而提供的大多数性服务形式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小型社区的解体,大型非人性化城市区域的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商业化,都与卖淫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小型传统社区中,性关系因为其招摇可见而深受控制。而在新兴城市地区,比较容易建立起更具匿名性的社会关系。

当今的卖淫

今天在英国,像过去一样,妓女主要来自比较贫困的社会背景,但已经有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加入其中。离婚率不断增高,促使一些新近变穷的妇女加入到卖淫的行列。另外,有些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妇女会暂时在按摩院或应召女郎网络中工作,同时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

联合国1951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那些组织卖淫或从妓女活动中抽取利益的人,但并没有禁止卖淫本身。包括英国在内共53个成员国已经正式接受了这项决议,尽管它们有关卖淫的立法差异很大。在有些国家,卖淫本身就是非法的;另有一些国家,比如英国,仅仅禁止某些类型的卖淫,比如站街拉客或儿童卖淫。有些国家或地方政府准许官方认可的妓院或带有色

情服务的发廊等场所营业,比如德国的“性爱中心”(Eros centres)、阿姆斯特丹的性屋(sex houses)等。1999年10月,荷兰议会把卖淫定为正式职业,包括了大约3万名从事性产业的女性。现在,所有售卖性的场所都要受到当地政府的管理、核准和监督。仅有几个国家为男妓颁发许可。

反对卖淫的法律很少惩罚嫖客。那些购买性服务的人不会被逮捕或起诉,并且在法庭程序中他们的身份可以得到隐瞒。与对性的出卖方的研究相比,对性的购买方的研究要少得多。人们常常会明确或含蓄地指出,妓女在心理上不太正常,但很少有人这么说嫖客。研究上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显然体现了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对于性的正统刻板印象,依据这种刻板印象,男人主动寻求种种性宣泄都是“正常的”,而那些迎合这些需求的女人却要受到谴责。

全球“性产业”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比如泰国和菲律宾,卖淫是买春观光产业的一部分。旨在买春的旅游套餐(package tours)吸引着男人们从欧洲、美国和日本来到这些地区,并且常常是寻找雏妓发生性关系,尽管这些观光方式在英国是非法的。

远东地区的买春观光源于韩战和越战时期,向美国军队提供妓女服务。当时在泰国、菲律宾、越南、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建立了“休闲娱乐”中心。有些地区,尤其是菲律宾,仍保留有此类场所,给当地驻军以及组团观光常客提供服务。

卖淫常常涉及儿童。一项对美国、英国和西德儿童卖淫的研究表明,多数卖淫儿童都是离家出走者,他们没有收入,只得通过卖淫以谋求

生计。

国际劳工组织 1998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东南亚的卖淫活动和性产业已经具备了充分发育的商业部门的特征。全球旅游日益低廉,亚洲和国际货币之间汇率差价不断扩大,使得买春观光对于外国人而言更加负担得起,并且更具有吸引力。不仅如此,性产业还与经济困境有关。一些家庭陷入绝境,被迫逼自己的孩子去卖淫。其他一些年轻人则是轻信了“艺人”和“舞者”的广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骗进了性贸易。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迁移模式是导致性产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许多女性渴望能抓住一切机会,离开传统而压抑的家乡。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警告,许多性产业发达的国家并没有一套法律框架或社会政策来处置它所带来的许多后果。卖淫与艾滋病和性传染病的蔓延密切相关,也常常涉及暴力、犯罪、毒品贸易、剥削和侵害人权等(Lim 1998)。

对于卖淫的说明

为什么会存在卖淫?当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政府对其屡禁不止。它也几乎总是女

焦点(Lewontin 1995)。刚刚讨论过的那项研究的批评者断言,这类调查无法提供有关性习俗的可信信息。一部分争论集中在老年受访者的回答上。研究者们报告说,年纪在 80 至 85 岁之间的男人中有 45% 透露,他们与伴侣之间还有性生活。批评者认为这明显言过其实,甚至令人怀疑整个调查的结果。而研究人员则明确反驳指责,并且得到了老年研究专家的一些支持,那些专家们斥责批评者对老年持有负面的刻板印象。他们指出,在一项针对不在养老院生活的老年男子的研究中,有 74% 的人在性

性向男性售卖性服务,而不是相反,尽管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如在德国的汉堡有“欢乐屋”(houses of pleasures),男性为女性提供性服务。当然,也有男童或男人为其他的男人提供性服务。

没有单一的因素可以说明卖淫。男人似乎比女人性欲更强或更为不懈,因而需要卖淫活动供其宣泄。但这种说明是站不住脚的。和同龄男人相比,绝大多数的女性似乎更有能力以强烈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性欲。不仅如此,如果卖淫活动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性需求,那么肯定会有许多男妓来满足女性。

能够得出的最有说服力的一般性结论是:卖淫体现出男人倾向于把女人当成出于性的目的而可以“使用”的对象,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维持这种倾向。在特定的背景中,卖淫表现出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也在起作用。有些人由于生理上的弱点或道德准则的束缚,找不到其他的性伴侣,而卖淫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性满足的方式。对于那些离家的男人,寻求无须承诺的性接触的男人,或有别的女人无法接受的奇特性趣的男人,妓女则迎合了他们的需要。但这些因素只是关系到卖淫发生的程度,却没有涉及其总体性质。

方面仍然积极主动。实际上,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多数男人即使到了 90 岁高龄也仍维持对性爱的兴趣。

第二节 性取向

性取向指的是某人对于性魅力或浪漫魅力的寻求方向。人们有时候错误地使用“性偏好”(sexual preference)这个词,而不是性取向,这就带有误导性,要予以避免,因为它意味

着某人所关注的性魅力或浪漫魅力完全属于个人选择的事情。但您将会在下文看到,在所有文化中的性取向都是源于诸多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至今尚未为人所充分知晓。

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文化中最常见的性取向,就是异性恋,即被异性的性魅力或浪漫魅力所吸引[“异”(hetero)这个前缀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另一个”或“不同的”]。而同性恋就是被同性的性魅力或浪漫魅力所吸引。在今天,“男同性恋”(gay)这个词被用来指男性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而女同性恋(lesbian)则指女性之间的同性恋关系。^①而“bi”则是双性恋(bisexuals)的简称,即被同性或异性的性魅力或浪漫魅力都可以吸引的人们。

与其他同性之间的性活动或性情感的取向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某些群体内的同性恋关系是被接受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例如,北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人(Batak)允许男性婚前的同性恋关系。男孩在青春期离开父母,与十几位年长男性睡在一处,他们会引导新来者开始同性恋实践。然而在许多社会,同性恋是不被如此公开地接受的。例如,在西方世界,有关同性恋的流行概念就是指因性趣与大多数人不同而被明确标示出来的人。

福柯在其对于性的研究中表明(Foucault 1978),18世纪之前,同性恋者这个概念似乎基本不存在。鸡奸的行为会遭到教会权威和法律的谴责;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几个国家,更是该当死罪。然而,鸡奸却没有被专门定义为一种同性恋犯罪。鸡奸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动物以及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②“同性恋”这个术语是在19世纪60年代创造出来的,从那时起,同性恋者才日益被当成独特的

一类人,具有特定的性畸变(Weeks 1986)。同性恋被纳入“医学化”的话语,从临床的角度,被说成是精神上的失调或某种反常,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罪”(sin)。同性恋者以及其他“性变态者”,诸如恋童癖者(paedophiles)和易装癖者,均被视为乃是源于某种生物性的病态,威胁到主流社会的健康。

有关医学化视角,详参第八章第二节第一小节。

对“有悖自然的行为”课以死刑的做法在美国独立以后就被废除了,而在欧洲各国则要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然而,直到几十年前,同性恋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却仍被视为犯罪活动。同性恋者由社会边缘转向社会主流虽然还不彻底,但近年来还是可以看到取得了显著进展,就像本章开头讨论的同性恋婚姻所显示的那样。

12.2.1 性取向是天生还是习得?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现在都认为,一个人的性取向,不管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别的什么取向,都是源于诸多生物性因素和社会习得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由于异性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属于规范,因此有大量研究把焦点放在有些人为什么会成为同性恋的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生物性影响,预先决定了某些人从出生就成为同性恋者(Bell et al. 1981)。对于同性恋的生物学说明包括了许多方面的差异,比如同性恋者的大脑特性(Maugh and Zamichow 1991),母亲怀孕期间的宫内激素分泌对于胎儿发育的影响(McFadden and Champlin 2000)。这类研究由于所

① 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还程度不同地流行着“同志”、“女同志”或“拉拉”等称法,在未有统一译名(或许也不可能,因为这里涉及语言之外的认同政治问题)之前,本书采取了比较保守的译法。

② “sodomy”仅译作鸡奸其实是受到今天观念的影响。《旧约·创世纪》中因罪孽深重而被上帝焚毁的古城“所多玛”(Sodom),成为罪恶渊藪的代名词。

依据的案例数较小,得出的结论远远称不上定论(也极具争议)(参看 Healy 2001)。要想区分决定某人的性取向的生物性影响与社会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基于有关双胞胎的研究来理解同性恋是否有什么遗传基础,还是有些希望的,因为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基因是相同的。贝利和皮亚尔在两项相互联系的研究中(Bailey and Pillard 1991; Bailey 1993),考察了 167 对孪生兄弟和 143 对孪生姐妹,每一对都是在同一个家庭中抚养成长的,并且其中至少有一个自称同性恋。这些孪生子中有些是同卵双生^①(全部基因相同),有些是异卵双生(fraternal twins,部分基因相同),还有些是收养的兄弟姐妹(没有基因相同)。研究者们推断,如果性取向完全受生物特性决定,那么所有的同卵双生子都应该是同性恋,因为他们的基因构成完全相同。而在异卵双生子当中,有些双胞胎可能是同性恋,因为有些基因是相同的。至于收养的兄弟姐妹,预计同性恋的比例最低。

此项研究的结果似乎表明,同性恋属于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的综合结果。在所研究的男性和女性当中,大致有二分之一的同卵双生子是同性恋,相比之下,五分之一的异卵双生子和十分之一的收养兄弟姐妹是同性恋。换言之,如果一个女人或男人的同卵双生的同胞是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相比于其仅仅有收养关系的兄弟姐妹是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其本人是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的可能性要高四倍。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生物性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基因相同的比例越高,兄弟或姐妹都是同性恋的概率也就越大。然而,由于大约一半的同卵双生子并不像其同胞兄弟或姐

妹那样是同性恋,这里就势必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习得的成分。否则的话,应当预测所有的同卵双生子中,如果一方是同性恋,则其同胞的兄弟或姐妹也是同性恋。

显然,即便是研究同卵双生子,也不能完全分割生物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甚至从婴儿期开始,同卵双生子相比于异卵双生子,就更有可能得到父母、同龄群体和教师同样的对待,而异卵双生子得到同样对待的可能性又高于收养的兄弟姐妹。因此,同卵双生子之间的共性可能不仅限于基因:他们还可能共享更多相类似的社会化体验。

12.2.2 西方文化中的同性恋

肯尼斯·普鲁默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把现代西方文化中的同性恋区分为四种类型(Plummer 1975)。^②所谓偶然同性恋(casual homosexuality),是指一个人有过同性恋的偶然经历,但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其整个性生活的结构。例如学校里男孩抱在一起相互手淫。所谓情境性活动(situated activities),指的是同性恋行为在特定的情景中定期发生,但并没有成为个人的首要偏好。在有些环境下,如在监狱或军营里,男人的生活中缺乏女性,因而这类的同性恋行为相当普遍,并被当成是对异性性行为的替代,而非偏好前者。

所谓人格化同性恋(personalized homosexuality),是指有些人对同性恋活动有偏好,但又与能轻松接受这类行为的群体隔离。这一类的同性恋是秘密活动,对朋友和同事都要隐瞒。而所谓作为生活方式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 as a way of life),是指有些人已经“出柜”,^③

① “identical twins”,亦译“全等双生”。

② 本书第五版的文献中删除了第四版文献中有的这本书,应为 *Sexual Stigma: An Interactive Accou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③ “Come out”,在英文的众多含义中有两层相关含义:一是指对自己“暴露”,意即认识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二是指向他人“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一词语更多是在第二层意义上使用的,在中国同志群中习称为“出柜”(come out of the closet)。



“我们没为今年的同志大游行作任何准备。我们就这样，我们是酷儿，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并且已经将与其他有类似性趣的人之间的联系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人通常属于同性恋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同性恋活动被整合为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这些社群通常会促成集体性的政治行动，以增进同性恋者的权益。

有过同性恋体验或感受过强烈的同性恋倾向的人口比例（包括男性和女性），很可能要大大高于那些公开遵循同性恋生活方式的人口比例。人们是在金赛的研究发表之后，才初次了解到同性恋在西方文化中的规模。根据他的研究结果，如果按照他们在青春期以后的性活动和性倾向来判断，则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男人是完全的异性恋。在金赛的样本中，有8%的男人有过长达3年或以上的排他性同性恋关系。另有10%的男人同性恋和异性恋活动大致相当。金赛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37%的男人至少有过一次达到高潮的同性恋体验。另有13%的男人曾经感受到同性恋的欲望，只是没有付诸行动而已。

金赛的研究还表明，同性恋在女性中的比例较低。大约2%的女性属于排他性的同性恋。有13%的女性有过同性恋的体验，另有15%的女性承认产生过同性恋的愿望，只是没有付诸行动。金赛及其同事们为其研究所显示的同性

恋规模感到震惊，所以又用不同的方法对结果进行了复查，但结论还是一样（Kinsey 1948, 1953）。

《性的社会组织》一书的结论（Laumann 1994）对金赛有关同性恋流程度度的研究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与金赛的37%这个比例相比，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仅有9%的男人有过达到高潮的同性恋接触，仅有约8%的男人有过同性恋的愿望（相比于金赛的13%），只有不到3%的男人在此前一年曾与另外一个男人有过性接触。正如后来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们所承认的那样，可能是依然附在同性恋上的污名导致人们普遍低报自己的同性恋行为。一位批评者指出，这些作者的随机样本未能考虑到同性恋者在地理上集中于大城市，在那里，他们可能占了总人口的将近10%（Laumann 1994）。

女同性恋

相对于女同性恋，即女性之间的同性恋依恋或活动，男性的同性恋整体上受到更多的注意。女同性恋群体往往不如男同性恋亚文化那样高度组织化，偶然同性恋的比例也较低。在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中，人们常常觉得女同性恋活动群体在利益上与男性组织无异，因此没有给予区别对待。然而，虽然有时在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之间有密切的合作，但他们之间也存有差异，尤其是女同性恋者积极涉足女性主义运动。一些女同性恋者觉得，男同性恋解放运动只反映了男性的利益，而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和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满脑子只是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所关心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一股独树一帜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旨在宣扬“女性价值”，挑战男性异性恋的既有支配制度。许多同性恋女性很少把女同性恋视为一种性倾向，而更多的将其视为一种对其他女性的承诺和团结的方式，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还是个人关系上（Seidman 1997）。



村民乐队展示了一种对于各类“猛男”类型的男性特质的极端戏仿。

12.2.3 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过去对同性恋的不容忍态度一直是非常鲜明的,直到近些年,有关这个主题的一些迷思(myth)才有所消散。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同性恋长久以来遭到了污名化。(有关“污名”概念的讨论,参见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同性

恋恐惧症这个词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创造出来的,指的是对于同性恋者及其生活方式的厌恶或憎恨,并伴随着由此而生发的反应行为。同性恋恐惧症是一种偏见,不仅反映在对于男女同性恋的憎恨和暴力等外在行为上,而且体现在英国文化中也很普遍的多种形式的语言谩骂上,比如说,使用“柴棍”、“怪儿”之类的字眼^①来辱骂异性恋男子^②,或者用与女性

① “柴棍”：“fag”或“faggot”，是对男同性恋的蔑称，类似于“基佬”、“玻璃”之类。“怪儿”：“queer”，本指变态、怪物、怪胎，以往是异性恋者贬损同性恋者的字眼。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比如1990年美国成立同性恋组织“queer nation”），这个词成为对抗主流的学者挪用的意象，以这个词自称，颠覆主流价值观对这个词的负面解释，可译作“酷儿”。

② 此处原文如此，显系吉登斯笔误，应为“同性恋男子”。

相关的一些冒犯性的词,比如“娘娘腔”(sis-sy)或“脂粉男”(pansy),来贬损男同性恋者。虽然同性恋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在西方社会的许多领域,同性恋恐惧症仍然根深蒂固;在许多人的情感态度中仍然存在着对于同性恋的敌意。暴力袭击乃至谋杀同性恋者的实例仍然频频发生。

参看第十九章第四节第一小节中引出的话题。

有些种类的男同性恋行为可能被视为企图改变男性特质与权力之间通常的联系,这可能是异性恋社群经常视他们为威胁的原因之一。男同性恋者往往拒绝接受那种一般与他们相联系的女人气形象。他们以两种方式摆脱这个形象,一种是通过培养肆无忌惮的女性气质,即“装腔作势的”男性特质(“camp” masculinity),以戏仿(parody)刻板印象。另一种是通过培养一种“猛男”(macho)形象。这也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男性特质,男人打扮成摩托骑士或牛仔的模样,再次以夸张的方式来戏仿男性特质,就像20世纪70年代唱《YM-CA》的乐队组合“村民”。^①(Bertelson 1986)

一些社会学家调查了艾滋病流行如何影响公众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他们提出,这种传染病已经动摇了异性恋男性特质的一些主要意识形态基础。例如,从由政府基金支持的性安全运动,到媒体对于艾滋病扩散的报道,性和性行为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艾滋病使公众注意到社会中盛行着婚前性关系、婚外情和非异性恋关系,已经威胁到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艾滋病使同性恋者更加显现,对异性恋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并且还表明,传统核心家庭的替代形式是存在

的(Redman 1996)。然而,人们对此的回应有时候却采取了歇斯底里和类似妄想狂的形式。同性恋被描绘成威胁“正常社会”(normal society)道德健康的变态。为了保持异性恋男性气质的“正常/规范”(norm)地位,就有必要将所认为的威胁边缘化,予以贬损(Rutherford and Chapman 1988)。

12.2.4 男女同性恋民权运动

直到最近,绝大多数同性恋者还是隐瞒他们/她们的性取向,担心一旦“出柜”,将会丧失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朋友,并使她们/他们遭受公开的言语谩骂乃至身体袭击。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同性恋者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且如同我们在本章开头有关同性恋婚姻的讨论中所见,在有些地方,男女同性恋的生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正常化了(Seidman et al. 1999)。伦敦、纽约、旧金山、悉尼,还有世界各地其他许多大都会地区,各种男女同性恋社群正在勃兴。“出柜”不仅对于这么做的人很重要,或许对于广泛社会中的其他人也很重要。此前“隐匿身份的”(closeted)男女同性恋们开始认识到,他们/她们并不孤单;与此同时,异性恋者也不得不接受自己曾经敬仰、羡慕的人是同性恋者。

目前风行全球的男女同性恋民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产物,那些社会运动非常重视种族认同和族群认同。1969年6月在美国发生石墙骚乱,纽约市的同性恋社群被警方没完没了的骚扰所激怒,与纽约市警察局激战了两天。这次公开行动对于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否同性恋者)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Weeks 1977; D'Emilio

^①“The Village People”是1977年成立的美国同志乐队组合,六人分别以戏仿方式装扮成传统符合男性特质的建筑工人、警察、士兵、摩托骑士、牛仔和印第安酋长的模样。领导全球同志音乐风潮,销量超出6500万张。有“YMCA”(基督教青年会)、“Macho Man”(肌肉猛男)、“San Francisco”(旧金山—世界同志之都)等作品。

1983)。^①石墙骚乱成为同性恋骄傲的象征,引领着男女同性恋者“出柜”,不仅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要彻底终结对于他们/她们生活方式的污名化。1994年,值石墙骚乱25周年之际,10万人参加了“为确认男女同性恋人权向联合国国际大进军”(International March on the United Nations to Affirm the Human Rights of Lesbian and Gay People)。重大进展的步伐显然已经迈出,但对于许多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来说,歧视与不加掩饰的同性恋恐惧症依然是她们/他们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至于同性恋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法律的惩戒,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说,在非洲,男同性恋行为问题在少数国家已经合法化,但女同性恋却根本就很少在法律中提到。在南非,前白人政府的官方政策是把同性恋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精神问题。然而,黑人政府掌权之后,就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充分的平等。在亚洲和中东,^②情形大致相仿:男同性恋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包括所有伊斯兰教主导的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具有某些全世界最为开明的法规:同性恋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合法化,如同我们前文所见,有几个国家更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同性之间的婚姻。

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场方兴未艾的

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运动。国际同性恋者协会(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 ILGA)于1978年创立,今天已经在大约90个国家拥有超过400个成员组织(ILGA 2004)。协会召开国际会议,为世界范围内各种男女同性恋社会运动提供支持,以及对各国际组织进行游说活动。比如说,它说服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要求其各成员国废除禁止同性恋的法规。整体而言,在那些强调个人权利和开明政策的国家,行动取向的男女同性恋者社会运动往往会获得蓬勃发展(Frank and McEneaney 1999)。

同性恋者权利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增进导致了酷儿理论的兴起。酷儿理论的基础便是加尼翁和西蒙所提出的对于性问题的社会建构论思路(参见本章第一节第四小节),并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了第四章讨论过的巴特勒的著述。“酷儿”这个词原先是某种辱骂,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男女同性恋者的自我概括。酷儿理论认为,社会学偏向异性恋,因此必须将非异性恋的声音带向前台。酷儿理论家们主张,每一个社会学重大话题(宗教、身体、全球化等等),和其他科目一样,比如文学,甚至是男女同性恋研究(lesbian and gay studies),^③都应当把酷儿的声音置于核心,以挑战支撑大部分当代思维的异性恋立场的假设(Epstein

① 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开始于1969年6月27日周五,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住所石墙酒馆外,被视为美国乃至世界现代同性恋民权运动的起点,第一次有同性恋者拒捕。此前,警方对同性恋酒吧和夜总会的搜捕行动是城市同性恋者生活中的常态。警方登记出席者的姓名以便见报,然后把尽量多的同性恋者押上警车。接吻、牵手甚至在同性恋酒吧出现都是被捕理由。当晚7个便衣警察和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进入酒吧调查。被赶出酒吧的人开始向警方投掷硬币。当时大约400名同性恋者聚集在酒吧外面,接下来情况开始失控。警察开始用警棍殴打拒捕者。有一些人被送入医院,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被警方在车门上打断两个手指。人群开始向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警方到酒店里暂避。一些人试图点燃喷射液体。聚居这个地区的很多同性恋者开始聚集,高唱“同志力量”(Gay Power!)的歌曲:“我们都是石墙女孩//我们的长发装点着刘海//我们把内衣统统甩掉//定要秀出我们的阴毛//我们穿着那个工装裤//里面是我们娇柔的膝骨”。警方增派本来是受训处理反越战示威的“战术巡逻队”。但人群继续向他们投掷石块。场面最终平息,但人群在第二天晚上又聚集起来,派发传单“让黑手党和警察滚出同性恋酒吧!”。示威持续几个晚上。多年的积怨化为动力,骚动后的一年中,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在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建立类似组织,共有超过400万同性恋者参加各地游行。纽约市同志大游行(Gay Pride)定在每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举行,以纪念石墙骚乱。

② 原文如此,本书屡屡出现这样的地理分区观念。

③ 意思是说,就连这种研究也有可能是异性恋中心主义的。

2002)。

以上我们讨论了男人和女人的性,但我们还没有问:做一个男人,或者,做一个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社会性别,由此寻找对于这个问题乃至其他问题的一些解答。

第三节 社会性别

你可能认为,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完全取决于我们出生时那个物质性的身体的生理性别。但像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许多问题一样,男性性质和女性性质并不是那么容易归类的。本节将考察男性与女性之间差异的由来。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做一重要区分。大致上,社会学家使用生理性别这一术语来指限定男人和女人身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差异。与此相反,社会性别则是指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心理、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社会性别关系到社会建构出来的男性特质(masculinity)和女性特质(femininity)概念。它并不一定是一个人生理性别的直接产物。比如说,有的人认为自己出生时的身体是一种错误,想要在人生的半道上改变社会性别,或者说遵循另一种生理性别的生活方式或衣着打扮,以此“把事情纠正过来”。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许多差异在起源上并非是生物性的。要想说明社会性别认同的形成,以及基于那些认同的社会角色,已经出现了众多相互对立的思路。争论其实在于习得的成分有多大:在分析社会性别的差异时,有些学者相比其他人更加凸显社会影响。

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这个问题上,有关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各种社会学解释采取了大不相同的立场。下面将探讨三种大致

的立场。首先,我们将来看看认为男女之间的行为差异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观点。然后,我们将转而关注着重强调社会化与社会性别角色之习得的理论。最后,我们将介绍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观点: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都不具有生物学基础,而完全是由社会建构的。

12.3.1 社会性别与生物学:自然差异?

女人与男人之间的行为差异,多大程度上是由生理性别而不是由社会性别所造成的呢?换句话说,有多少是由生物性的差异而造成的呢?正如我们在“生物学与性行为”(本章第一节第一小节)所见,有些学者认为,人类生物特性的各个方面,从激素到染色体,从大脑容量到基因,是形成男女之间行为的先天差异的原因。他们宣称,这些差异在所有的文化里都能够以某种方式观察到,意味着自然因素造成了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的社会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这类研究人员可能会注意到,比如说,事实上,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参加狩猎和战争。他们指出,这难道不是表明,男人具有女人所缺乏的生物学基础上的攻击性倾向?

但许多研究人员还是没有被这种论点所说服。他们说,男性攻击性的程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很大。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期望女人温柔顺从(Elshtain 1987)。批评者指出,“自然差异”理论所依据的常常是动物行为的资料,而不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人类学或历史学的证据,这些证据揭示了随时间和地点不同而产生的变异。而且,他们补充到,不能因为某种特性多少带有普遍性,就推出其具有生物学的起源;也还可能存在产生这类特征的一般性的文化因素。比如说,在绝大多数文化中,多数妇女都会把她们一生的相当一部份时间花在养

儿育女上,因而不能轻易地参加狩猎和战争。

尽管我们不能马上放弃生物性因素决定着男女行为模式的假设,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为确定这一影响的生理学起源而进行了众多研究,却始终未能成功。尚无任何证据表明,存在一种机制,关联着这类生物性的力量与人类男女所显示的复杂的社会行为(Connell 1987)。认为个体只是顺从某种先天倾向的理



这位沃达比族(Wodaabe)男青年,来自尼日尔的杰里沃尔(Gerewol),正在参加一场正式舞蹈仪式。他的嘴唇和眼睛涂上了眼圈粉^①,再加上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在沃达比族的女青年看来,更增添了几分性感魅力。

论,忽视了社会互动在形塑人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12.3.2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

理解社会性别差异之由来的另一种途径,是研究社会性别的社会化,也就是在家庭、传媒等社会中介的协助下,习得社会性别角色。这一思路明确区分了生物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的社会性别,婴儿出生时就有了前者,随后发展出后者。通过与初级和次级社会化中介的接触,儿童逐渐将被认为与其生理性别相符的社会规范和期望加以内化。社会性别差异不是由生物学所决定的,而是文化的产物。根据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因为男人和女人被社会化为不同的角色。

社会性别社会化的理论特别为功能论者所看重,他们认为,所谓男孩和女孩,就是习得“生理性别角色”以及相应的男性认同和女性认同,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参看本章下面的第四节第一小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受到正向或负向的制约——即在社会的角度上对行为实施酬报或约束的力量——的引导。例如,一个小男孩能够因其行为而受到正向制约(“你真是个勇敢的男孩!”),或者接受负向的制约(“男孩子不要玩洋娃娃”)。这些正向或负向的强化帮助男孩和女孩习得并遵从期望的生理性别角色。如果一个人形成的社会性别实践与其生物性的生理性别不符,即它们是背离的,就用社会化不充分或不规范来说明。根据这一功能论的观点,社会化中介通过监督新生代的社会性别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起着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这种对于生理性别角色和社会化的刻板解释受到不少方面的批评。许多学者认为,社会性别的社会化本身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不

^① 此处原文为“kohl”,一般是阿拉伯等东方妇女用来涂黑眼睑和睫毛的化妆品,通常为硫化锑粉。

同的“中介”，比如家庭、学校和同龄群体，可能会彼此不一致。不仅如此，社会化理论还忽视了个体抵制或调整围绕生理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的能力。正如康奈尔所言：

“社会化中介”不能对成长中的人产生机械效应。它们所做的只是引领孩子参与给定条件下的社会实践。这种引领或许是强迫性的，而且经常是强迫性的，伴随着接受和别无选择的强大压力……然而孩子们确实在抗拒，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社会性别的领域里开始独立行事。他们可能拒绝异性恋……他们可能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成分混合起来，如女孩子总是在学校里玩竞争性的体育运动；他们可能在自己生活中发生分裂，如男孩子在私下里男扮女装。他们可能构造一个与其实际行为不符的虚幻生活——这可能是所有做法中最常见的一种。(Connell 1987)

人类并不像某些社会学家所言，是性别“程序设计”的被动客体或不加置疑的接受者。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人是自行创造和调整角色的积极能动者。我们应该对全盘采纳生理性别角色的思路持怀疑态度，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性别认同是社会影响的结果。

社会影响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社会性别认同；就连在养育孩子上奉行“非生理性别化主义”的父母也会发现，既有的社会性别习得模式很难抗拒(Statham 1986)。比如说，对于亲子互动的研究已经表明，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异，哪怕父母相信自己对于男孩和女孩的反应是一样的。幼童们所经历过的玩具、图画书和电视节目往往都会凸显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之间的差异。尽管现在情况正

在有所改变，但在大部分儿童书籍、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男性角色一般都会多于女性角色。男性角色往往更为积极主动，富于冒险，而女性角色则被描绘成消极被动、满怀期待、注重家庭(Weitzman 1972; Zammuner 1987; Davies 1991)。女性主义研究者已经揭示，以年轻受众为市场的文化和传媒产品，是如何体现了对于社会性别的传统态度，对于期望女孩和男孩所具有的那些目标和抱负的传统态度。

显然，社会性别的社会化极其有力，要想挑战它，可能会令人沮丧。一旦被“指派”了某种社会性别，社会就会期待个体行为举止像个“女人”或“男人”。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这些期待得以履行并再生产(Bourdieu 1990; Lorber 1994)。

有关社会性别社会化的讨论，详参第六章第二节。

12.3.3 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社会建构

近些年来，社会化和社会性别角色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不是把生理性别看作是由生物学决定的，而社会性别是通过文化习得的。不仅社会性别是没有固定“本质”的纯粹的社会创造，人的身体本身也以多种方式受到社会力量的形塑和改变。我们能够赋予我们的身体多种意义，挑战通常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建构和重构他们的身体，从锻炼、节食、穿孔、个人时尚，直到接受整形外科手术和变性手术。

有关个人如何越来越多地选择建构自己的身体，详参第八章。

技术正在模糊我们的物质性身体的界限。因而,可以进一步认为,人的身体和生物特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受制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人的能动作用和个人选择。

根据这种视角,关注社会性别角色和角色习得的学者实质上接受了社会性别差异具有生物学基础这一立场。在社会化的思路中,生理性别之间的生物学区分提供了一个框架,在社会当中受到“文化雕琢”。与此相反,相信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社会建构的理论家则不承认社会性别差异有任何生物学基础。他们认为,社会性别认同的出现与社会中所理解的生理性别差异有关,这些认同反过来又协助塑造了这种差异。例如,如果一个社会认为,所谓男性特质的特点就是身体强壮,态度“强硬”,就会鼓励男人培养一种特有的身体形象和行为做派。换句话说,社会性别认同和生理性别差异在个人身体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Connell 1987; Scott and Morgan 1993; Butler 1999)。

12.3.4 女性特质、男性特质与社会性别关系

考虑到女性主义者非常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我们可能就不会奇怪,早期有关社会性别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只关心女性和女性特质的概念。男性和男性特质被认为相对而言简单明了,不成问题。人们很少下功夫研究男性特质、做男人的感受或男性认同的形成。社会学家们更关心的是,怎样理解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以及他们在男权制的维系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的批判性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注意。有一场根本的变化影响了工业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和家庭模式,引发了有关男性特质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作用的变化的问题。在晚期现代社会中,做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在

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对于男人的传统期待和压力正发生着怎样的转变呢?男性特质处在危机中吗?

近些年来,社会学家越来越关注男人在形塑他们的广泛秩序中的位置和体验。在有关社会性别与性的社会学中发生的这一转变,导致人们重新强调,在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模式化的男女互动背景之下,研究男性和男性特质。社会学家致力于把握男性认同是如何建构的,社会指定的角色对于男人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R.W.康奈尔:社会性别秩序

鲍勃·康奈尔在《社会性别与权力》(1987)、《男人与男孩》(2001)以及《男性特质》(2005)中,提出了对于社会性别最完整的理论阐述之一。他的思路把男权制和男性特质概念整合为一套综合性的社会性别关系理论,因此对于社会学特别有影响。在康奈尔看来,男性特质是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部分,不能同社会性别秩序或者同与之相伴的女性特质分开理解。

康奈尔关注男性把持的社会权力如何创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不平等。他强调,关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经验性证据并非仅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堆砌”,而是揭示了把女性维持在从属于男人的地位的“人类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组织化领域”的基础(Connell 1987)。他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性别关系仍然是由男权制权力所决定的。从个体层次到制度层次,各种类型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安排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前提: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

在康奈尔看来,社会性别关系是日常互动和实践的产物。普通人在其个人生活中的举止行为与社会中的集体性社会安排直接相关。这些安排历经人的一生,历经世世代代,被不断

麦尔丹·麦克安海尔：教育与男性特质和性的形成

麦克安海尔曾在英国的一所公立中学里开展民族志研究，考察那里的“社会性别体制”，即在学校范围内社会性别关系的表现方式。

麦克安海尔借鉴了康奈尔的研究，关注学校如何积极地在学生中创造一系列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虽然他尤其关注的是异性恋男性特质的形成，但也调查了一组同性恋男生的体验。麦克安海尔的研究结果发表于《男人的形成》(Mac an Ghail 1994)一书，揭示了学校自身即是以社会性别化和异性恋模式为特征的机构。

盛行的“体制”促使学生中建构出与广泛的社会性别秩序相符合的社会性别关系，也就是说，在学校范围内也能找到支配性与从属性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等级秩序。多种多样的社会影响和实践，包括纪律措施、课程安排、教师——学生和教师——学生的互动以及监督，都有助于异性恋男性特质的形成。

麦克安海尔注意到，在学校的场景中，出现了四类男性特质。一是小男子汉(macho lads)，是一群工人阶级出身的白人男孩儿。他们无视学校权威，蔑视学习过程和学业优秀的学生(亦参第十七章第三节第四小节)。麦克安海尔的结论是，由于不再找得到曾被他们视为确定自己未来身份的体力活和非熟练技能/半熟练技能型工作，小男子汉们正在经历着一场“男性特质的危机”。这导致这帮小伙子对于他们的未来陷入了心理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这种困境对于他们来说，既难于领会，更难以排解。

第二个群体是学习尖子(academic achievers)，他们视自己为未来的专业人员。这些男孩儿被“小男子汉”(以及老师)赋予了娘娘腔、“书呆子”的刻板印象。麦克安海尔认为，尖子生对付恶意刻板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保持自信，相信他们的刻苦学习和优异成绩将保障他们有安全的未来。这形成了他们男性特质认同的基础。

第三个群体是未来企业家(new enterprisers)，即那些注重计算机科学和商业研究之类新职业课程的男孩儿。麦克安海尔认为，他们是在撒切尔时代培育出来的新“企业文化”的孩子。这些男孩更重视市场和对未来功利性的打算，因而认为在考试中得优相对来说没有什么用。

最后一个群体是讲求实际的英国人(real Englishmen)。他们是麻烦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因为他们对学业态度暧昧，但却自视为“文化仲裁”，对老师提供的任何东西都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打算从事某种职业，因而“讲求实际的英国人”的男性特质就包括表现出轻松拿下学业的样子。

麦克安海尔在有关同性恋男生的研究中发现，在所有涉及社会性别和性的课堂讨论中，一系列明显属于异性恋立场的基于传统关系和核心家庭的规范和价值观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导致同性恋男青年在建构社会性别和性认同时陷入“混乱与矛盾”的困境，既感到被他人忽视，又觉得被他人标示。

再生产出来,但也会发生改变。

康奈尔提出,社会的三个方面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性别秩序,即社会中流行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根据康奈尔的观点,劳动、权力和倾注(cathexis)(私人的/性的关系)是社会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三者既共同起作用,又互相改变。这三个领域代表了建构和约束社会性别关系的主要场所。劳动是指劳动的生理性别分工,既包括在家庭内部(比如家庭责任和养育孩子),也包括在劳动力市场(比如职业分隔和报酬不公一类问题)。权力是通过机构、国家、军队和家庭生活中的权威、暴力和意识形态之类社会关系起作用的。倾注是指婚姻、性、育儿等私密性、情感性的个人关系中的动力。

在这三个社会领域中实施的社会性别关系,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性别秩序中,在社会层次上组织起来的。康奈尔用社会性别体制这一术语指代小范围内发生的社会性别关系,如在某一特定的机构内。因而,一个家庭、一个邻里和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社会性别体制。麦尔丹·麦克安海尔做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探讨男性特质如何在学校这一社会性别体制中形成(参见图文框)。

一 社会性别等级

康奈尔相信,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在社会的层面上,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是按等级序列来安排的,并围绕着一个确定的前提: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参见图12.1)。康奈尔在他的等级序列中使用了模式化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理念型”。在等级序列的顶端是霸权式男性特质,支配着社会

上其他所有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所谓霸权式,指的是霸权(hegemony)这一概念,即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主导地位,但其实施并非借助赤裸裸的强力,而是通过延伸到私人生活和社会领域的文化动力。因此,传媒、教育和意识形态均可作为确立霸权的渠道。根据康奈尔的观点,霸权式男性特质首先涉及异性恋和婚姻,但也包含权威、有薪劳动、力量和身体健壮等。具有霸权式男性特质的男人的例子包括动作片影星、现美国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说唱乐手“五角”^①、企业家唐纳德·特朗普^②。

虽然霸权式男性特质被认为是男性特质的理想形式,但社会上能达到那样标准的男人却很少。然而,许许多多的男人仍然从霸权式男性特质在男权秩序中占主导地位而获益。康奈尔称此为“男权制的回报”,并认为那些从中获益的人体现出共谋的男性特质。

与霸权式男性特质存在从属关系的是许多从属性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在从属性的男性特质中,最重要的是同性恋的男性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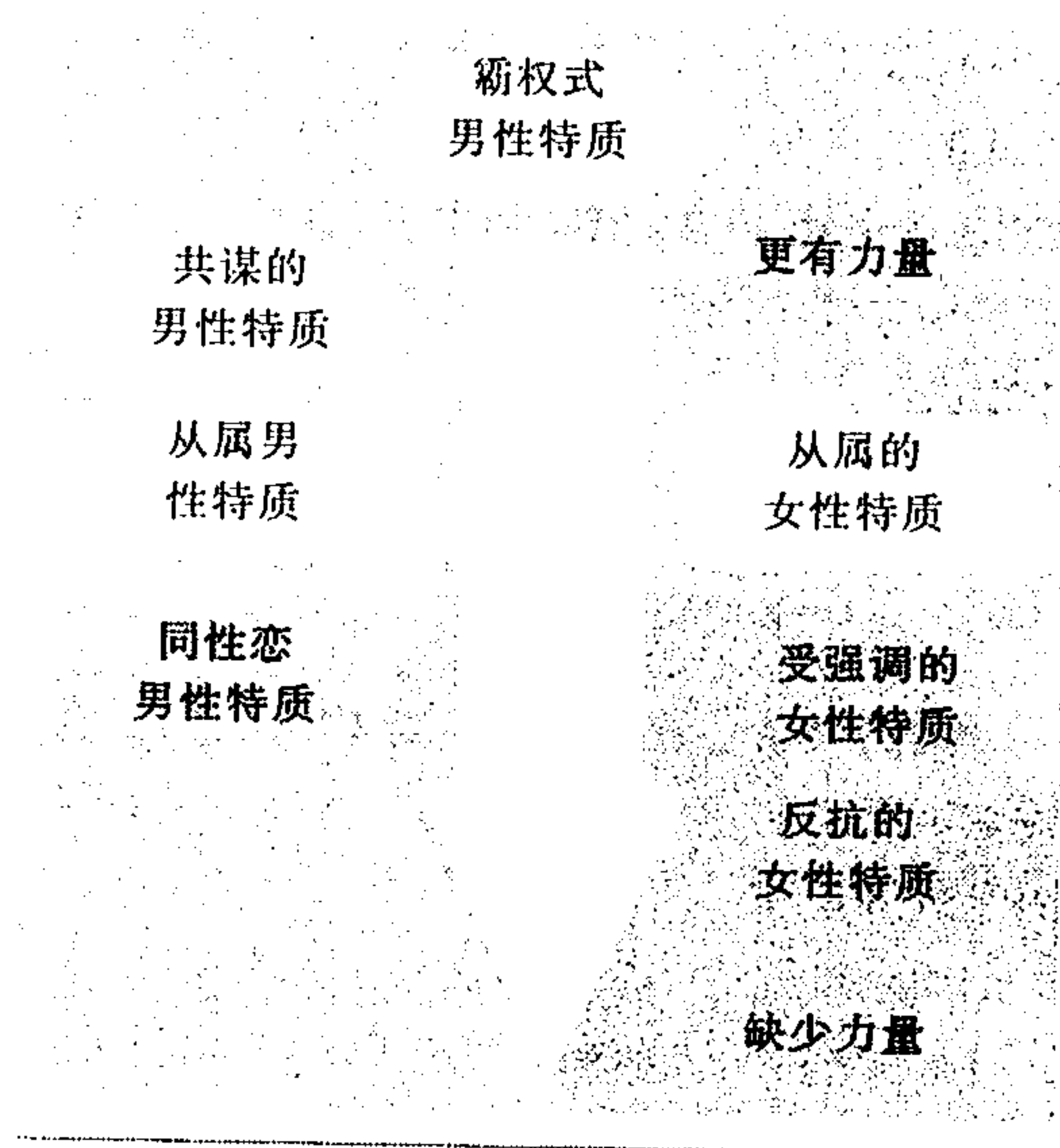


图 12.1 社会性别等级秩序

① “50 Cent”:1976年出生于纽约皇后区一处大毒窟,12岁开始在街头贩卖毒品,学习街头硬汉的生存法则。
② 美国地产界巨鳄。

在霸权式男性特质主导的社会性别秩序中,同性恋者被视为与“真男人”完全不同,他们不符合霸权式男性特质的理想,并且经常具有许多为霸权式男性特质所“摒弃”的特性。同性恋的男性气质蒙受污名,处在男性的社会性别等级的底端。

康奈尔认为,所有的女性特质都形成于霸权式男性特质的从属位置。受强调的女性特质是女性特质的形式之一,也是霸权式男性特质的重要补充。它倾向于满足男人的利益和欲望,以“低眉顺眼、关心体贴、善解人意”为特征。在年轻女性中它与性接受能力^①相关,而在中老年妇女那里则与母性相关。康奈尔称玛丽莲·梦露为受强调的女性特质的“典型和讽刺”。他着重指出,受强调的女性特质形象在传媒、广告和市场营销中仍然广为流行。

最后,从属性的女性特质中还有一些是不同于上面勾勒的受强调的女性特质的。然而,总体来讲,人们把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坚持认为受强调的女性特质作为社会的传统规范,这意味着其他抗拒传统的从属性的女性特质未能发出声音。形成非从属性的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女性包括:女性主义者、女同性恋者、老处女、接生婆、女巫、妓女和女工。然而,这些反抗的女性特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被从历史中隐去”。

二 社会性别秩序的变迁:危机趋势

虽然康奈尔提出了一个结构清晰的社会性别等级序列,但他拒绝认为社会性别关系是固定或静止的。相反,他相信社会性别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因而易于发生改变,受到挑战。康奈尔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社会性别秩序。因为他相信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所以他认为,人们可以改变他们/她

们的社会性别取向。他这么说,并不一定指人们可以转换他们的性倾向,从同性恋转到异性恋,或者相反。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确实发生了这种转换,但他指的是人们在不断地调整社会性别认同和观点。例如,曾经接受“受强调的女性特质”的女性,也有可能培养起一种女性主义的意识。这种始终存在的变化可能使得社会性别关系模式容易受到干扰,受到人类能动作用的影响。

虽然有些社会学家提出,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社会性别危机”,但康奈尔认为,我们只不过是面临着强烈的危机趋势。这些危机趋势呈现出三种形式。其一,是制度化的危机(crisi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康奈尔这么说的意思是,传统上支持男性权力的一些制度,即家庭和国家,正在逐步瓦解。离婚,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以及税收和养老金等经济问题,通过这些方面的立法,男性支配女性的合法性正在减弱。其二,是性的危机(crisis of sexuality)。这一危机中,霸权式异性恋的主导地位不如从前了。女性和同性恋者在性方面的力量不断增长,使得传统的霸权式男性特质承受着压力。最后,是利益形态危机(crisis of interest formation)。康奈尔认为,社会利益有了与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相矛盾的新的基础。已婚女性的权力,同性恋运动,还有男性中“反性别歧视”态度的增长,都对目前的秩序造成了威胁。康奈尔认为,个人和群体的行动能够带来社会性别秩序的改变。可以利用现存秩序中已经十分明显的危机趋势,来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Connell 1987, 2005)。

最近,康奈尔开始考察全球化对于社会性别秩序的影响。他提出,社会性别本身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在这个过程中,此前各具特色的地方性社会性别秩序相互作用,同时,也创造出超越各地方范围的社会性别关系的新领域。

^① 此处原文为“receptivity”,如果说的是雌性动物,指的是处于发情期的可交配状态。

康奈尔认为,在社会性别的全球化进程中,有几块关键性的社会性别关系新领域起到了作用:一是跨国和多国企业,它们往往具有牢固的社会性别分工和男性特质的管理文化;二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比如联合国各机构,也是社会性别化的,主要由男性来掌控;三是国际传媒,它们同样具有牢固的社会性别分工;并通过其输出产品传播着有关社会性别的特定理解;最后,是(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力等方面的)全球市场,它们往往也强烈地受到社会性别化的结构塑造,并越来越有能力渗入地方经济。

在康奈尔看来,社会性别的全球化导致了地方性社会性别秩序与上述社会性别关系新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现在有可能来谈一种“世界社会性别秩序”。他认为,现在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提供的背景中,来思考男人们的生活,思考男性特质在未来的建构与实施。

第四节 有关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视角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创造的概念,它赋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认同。然而,就像康奈尔和麦克安海尔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社会性别差异很少是中立的,在几乎所有社会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分层的一种主要形式。社会性别是构造个人和群体所面对的机遇和生活机会类型的关键因素,并强烈影响着个人和群体在从家庭到国家等社会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因文化而异,但我们还没有发现在哪一个社会中,女性比男性更强大。相比于女性的角色,男性的角色通常被赋予更高的价值,获得更多的回报: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女性承担生育女和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而男性则传统上负有挣钱养家的责任。生理性别之间普遍的劳动分工导致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所占据的位置都不平等。

尽管女性地位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得到了提高,但社会性别差异仍旧是社会不平等的基础。考察并阐释社会性别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的一项核心关注。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理论视角,来说明男性在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领域对女性的长期支配地位。本节当中,我们将评述这些在社会层面上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之性质的主要理论思路,至于一些具体背景和制度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讨论,将放在本书的其他一些章节(参见图文框)。

12.4.1 功能主义思路

我们在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学”)中已经看到,功能主义思路把社会视为一个由相互联系各个部分组成的系统,当系统平衡时,就可以平稳地运转,形成社会团结。因此,有关社会性别的功能主义视角以及受功能主义启发的视角,都致力于揭示社会性别差异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合。虽然这种观点曾经得到过广泛的支持,但因为它忽视了有损于社会共识的社会张力,传播一种保守立场的社会世界观,受到了猛烈抨击。

赞同“自然差异”的思想流派的学者往往认为,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女人和男人各自从事那些从生物学上讲最适合她们/他们的工作。因而,人类学家默多克认为,女性应该专注于家务和家庭责任,而男人在外工作,这既切合实际,也方便可行。默多克基于一项对200多个社会的跨文化研究,得出结论:劳动的生理性别分工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Murdock 1949)。然而,这并非生物学“程序安排”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社会最合乎逻辑的组织基础。

帕森斯是首屈一指的功能主义思想家,十分关注工业社会中家庭的作用(Parsons and Bales 1956)。他对儿童的社会化特别感兴趣,并认为稳定的、支持性的家庭是成功的社会化的关键。在帕森斯看来,劳动的生理性别分工

探索社会性别不平等

社会学家把社会性别不平等定义为男性和女性在群体、集体和社会中的地位、权力与声望的差异。在考虑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时，我们可以提出下列问题：女性和男性是否有平等的机会获取食物、金钱、权力和时间之类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女性和男性是否拥有类似的生活选择？女性和男性的角色与活动是否同样受到尊重？随着我们逐一探讨引起社会学家兴趣的主要论题，这些根本问题也会在教材中多处被论及。你可以在下列地方找到有关社会性别问题的详细讨论：

- 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性别：第四章第二节第三小节；
- 非言语沟通与社会性别：第五章第二节

第二小节；

-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第六章第二节；
- 社会性别与健康：第八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 社会性别与阶级：第九章第四节第六小节；
- 宗教与社会性别：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五小节；
- 社会性别与学业成就：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 社会性别与犯罪：第十九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平等也是第七章“家庭与亲密关系”贯穿始终的核心话题。

职责分明，这样的家庭运转最有效率。其中的女性扮演表达性 (expressive) 角色，负责照料孩子并为其提供情感支撑。而男性则扮演工具性 (instrumental) 角色，负责挣钱养家。由于这一角色要承担压力，因而女性的表达性和关爱性的倾向也应该用来抚慰男性。这种相互补充的劳动分工源自生理性别之间的生物性分别，将会确保家庭的团结。

另一种关于养育孩子的功能主义视角是由约翰·鲍尔比提出来的 (Bowlby 1953)，他认为母亲是孩子初级社会化的关键。如果母亲不在，或者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开，即处于所谓母爱剥夺的状况，孩子将极有可能社会化不足。这将对其以后的生活造成社会性和心理性的严重困扰，诸如反社会倾向和精神变态倾向等。鲍尔比认为，只有通过与母亲之间紧密、亲身和持续的关系，孩子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才能得到最大的保证。诚然，他也认为生母不在时，“代母” (mother-substitute) 可以

取代其位置，但建议代母最好也是女人，这无疑表明了他的观点：养儿育女的角色完全是女性的责任。已经有人根据鲍尔比的母爱剥夺命题认定，在职母亲忽视了自己的孩子。

评价

女性主义者尖锐地批评了相信劳动的生理性别分工具有生物学基础的主张，认为社会中的职能分配绝非自然而为或不可避免。女性并不因为任何生物学的特性而不能进入某些职业领域，正相反，人类是经由社会化而进入文化所期望的角色的。

一系列可靠的证据表明，母爱剥夺命题是不可靠的。研究显示，当父母双方都至少有部分时间离家工作时，孩子的教育成就和个人发展事实上表现更佳。帕森斯关于“表达性”女性的观点同样受到女性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学家的攻击，她们认为这一观点无视家庭中女性

的支配。那种认为“表达性”的女性对于家庭的平稳运转必不可少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倒不如说,倡导这一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男人的方便。

12.4.2 女性主义思路

女性主义运动产生了大量试图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理论,并将克服那些不平等提上了议事日程。女性主义理论在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上彼此之间有着显著分歧。相互竞争的各种女性主义流派都力图通过多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过程,诸如男性至上主义(sexism)、男权制和资本主义,来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我们首先来看看20世纪在英国流行的三种主要的女性主义派别——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不同派别之间从来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区分,不过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引导。到了最近几十年,随着借鉴并跨越早先派别的一些新型女性主义形式的引入,这种三分法也不那么有用了(Barker 1997)。我们在本节最后会简要探讨两种重要的新近理论:黑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

一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从社会和文化立场方面寻求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做出说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早期的一项重要贡献,来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论著《论女性的从属地位》(Mill 1869),其中呼吁两性之间的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包括投票权。不同于我们下面将要讨论其研究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女性

主义者不把妇女的从属性看作是一个更大体制或结构的组成部分。相反,她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造成男女不平等的许多分散的因素上。例如,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呼吁消除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传媒中的男性至上主义和对女性的歧视。她们往往致力于通过立法和其他民主手段,建立和保护女性的机会均等。在英国,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积极支持法律方面的改善,例如《同工同酬法》(Equal Pay Act, 1970)和《反性别歧视法》(Sex Discrimination Act, 1975)。她们认为,尊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消除歧视女性十分重要。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在现存体制内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改良。由此而言,她们的目标和方法比大多数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更为温和,后两类人是号召推翻现存体制的。

虽然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对上个世纪的妇女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批评者指责说,她们没能成功地解答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本致因,没有意识到社会中对女性压迫的系统性质。由于把焦点放在女性所遭受的个别剥夺,如男性至上主义、歧视、“玻璃封顶”^①、不平等报酬等,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不能看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全貌。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指责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其实是在鼓励女性接受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及其竞争性质。

二 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从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有介绍)发展而来的,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社会性别不平等没有什么论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被认为没

^①“glass ceiling”:指没有实存外形但确实存在的上限,是女性、少数族群等在职业升迁等机会上似无还有的上升障碍。

有能力看到,社会中存在强有力的利益,极力排斥给予女性平等。这一点对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是致命的(Bryson 1993)。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与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同时作战(Mitchell 1966)。马克思的朋友和同事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阐述了社会性别不平等。

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下,物质因素和经济因素支撑了女性对于男人的屈从地位,因为男权制(类似阶级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男人手中,从而强化了男权制,也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支配。资本主义比此前的社会体制更加强了男权制,因为它创造了与历代相比更显巨大的财富,将权力赋予既作为挣工资的人也作为财产所有者和继承人的男性。其次,资本主义经济要想成功,就必须把民众尤其是女性界定为消费者,说服她们,其需求只能通过日益增长的商品货物消费来满足。最后,资本主义仰赖于女性在家中无偿劳动,照料家人,清理家务。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通过低工资来剥削男性,也通过不付工资来剥削女性。对于家务劳动付给报酬是许多女性主义者信念中的重要元素,在第十八章中还将进一步讨论。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主张,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改良目标是不够的。她们呼吁重新调整家庭的结构,终结“家内奴役”,引入某种集体方式来进行养育子女、照料家庭和料理家务。许多人遵循马克思的立场,主张通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这些目标,革命将会带来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旨在满足全体人的需求,并创造真正的平等。

三 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

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核心是认为,男性造成了对女性的剥削并从中获益。这一女性主义派别的核心关注就是分析男权制,也就是男

性对于女性的系统支配。男权制被认为是跨越时代和文化而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经常把家庭作为社会对女性进行压迫的主要来源之一。她们认为,女性在家庭中提供了免费的家务劳动,而男性依赖于这种劳动,以此来剥削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男性还剥夺了女性在社会中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途径。

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对于男权制的基础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涉及对于女性身体和性的某种形式的占有。一位早期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苏拉米特·菲尔斯通认为(Firestone 1971),男性控制了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孩子上的角色。因为女性从生物学上讲具有生育孩子的能力,所以在物质上要依赖男人以获得保护和生计。在社会上,这种“生物学上的不平等”被组织在核心家庭之中。菲尔斯通提到“生理性别阶级”,用来描述女性的社会位置,并且认为,只有废除家庭及作为其标志的权力关系,女性才能赢得解放。

其他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指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男性主导地位的核心。根据这种观点,家庭暴力、强奸和性骚扰都属于对妇女系统化压迫的一部分,而不是有其自身的心理或犯罪根源的个别案例。甚至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比如非言语沟通,倾听和打断的模式,以及女性在公开场合如何才算得体,都助长了社会性别不平等。此外,这种观点还认为,关于美丽和性感的流行观念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其目的是形成某种特定类型的女性特质。例如,有些社会和文化规范强调女性要身材苗条,对男性关心体贴,这样的规范有助于维持女性的从属地位。通过传媒、时尚和广告对女性的“客体化”,把女性的主要角色变成娱悦男人的性对象。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通过改良或渐变,女性是不可能从性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她们认为,因为男权制是一种系统化的现象,因此只有彻底颠覆男权制秩序,才能获得社会性别平等。

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普遍使用男权制的概念来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断言,“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因而将注意力扩展到女性受压迫的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她们对于男性暴力和女性客体化的强调,已经使这些问题成为对女性从属地位的主流讨论的核心。

然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也引发了许多异议。其中主要的异议或许是,男权制概念至今的使用方式不足以对女性受压迫做出一般化的说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往往认为,男权制的存在乃是自古就有,四海皆然,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批评者们指出,这样一种男权制的观念没有考虑到历史和文化上的变异。它也忽视了种族、阶级或族裔可能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性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不可能把男权制看成是普遍现象,如果这么做就可能陷入生物学还原论,即把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所有复杂表现都归于男女之间的简单区别上。

西尔维娅·沃尔比提出了对于男权制的一套重要的重新阐述(参见图文框)。沃尔比认为,如果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来使用的话,男权制的概念仍然是一种有价值、有效力的说明工具。

四 黑人女性主义

上述各种版本的女性主义,对于白人女性和非白人女性的体验是否同样适用?许多黑人女性主义者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并非如此。她们认为,主要的女性主义思想流派定位于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的困境,但并没有考虑到女性当中的族群分隔。她们指出,基于某一特定女性群体的经历,概括出关于女性总体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理论,这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认为存在被所有女性同样感受到的“统一”形式的社会性别压迫,这样的观念也是有

问题的。

对现有女性主义形式的不满导致了一种新的思想派别的出现,关注黑人女性所面临的特殊问题。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首字母永远以小写拼写)在其个人回忆录的前言中指出:

现在,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在书中描写或谈论少女时代时,喜欢说黑人女孩比白人女孩的自尊心更强。这种差异的测度标准常常在于,黑人女孩更为果敢、善谈和自信。然而在传统南方特色的黑人生活中,女孩过去和现在一直被期待直言坦率,为的是维护我们的尊严。父母和老师总是要求我们落落大方,言语清晰。这些特性都是为了提升整个种族的素质。它们并不一定牵涉到树立女性的自尊。一个直言坦率的女孩仍会因为自己皮肤不够白或发质不够好而自觉卑微。当白人研究者拿着基于白人经验的价值观而设计的尺度去测量黑人女性的自尊时,这些变量是她们常常考虑不到的。(hooks 1997)

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作品往往强调历史,过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了解黑人妇女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作品则强调,奴隶制,种族隔离,以及围绕黑人社群中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民权运动,这些强有力的遗产影响深远。她们指出,早期的妇女选举权论者中的黑人虽然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但也意识到种族问题不能忽视:黑人妇女正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近些年来,黑人妇女已经不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坚,其原因部分在于,种族观念比“女性身份”更多地主导了她们的认同。

胡克斯认为,白人女性主义者所偏好的说明框架,例如视家庭为男权制的支柱,可能并不适用于黑人社群。黑人社群中的家庭代表了

西尔维亚·沃尔比：有关男权制的理论阐述

女性主义者对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许多解释都是以男权制观念为核心的。但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它也因为不能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变化和多样性而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我们肯定不能提出一个适用于整个历史的一致而稳定的压迫体制，不是吗？沃尔比是相信男权制概念对于分析社会性别不平等十分重要的一位理论家。但她也同意，对这个概念的批评很多是正确的。沃尔比在《男权制的理论阐述》一书中(Walby 1990)，提出了一种比先前更为灵活的对男权制的理解方式。它考虑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族裔和阶级方面的差异。

对沃尔比而言，男权制是“一种男性支配、压迫和剥削女性的社会结构和实践的体制”(Walby 1990:20)。她把男权制和资本主义视为不同的体制，依据历史条件而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有时相互协调，有时则处于紧张状态。她认为，通过劳动的生理性别分工，资本主义一般能从男权制中获益。但有时候，资本主义和男权制彼此不一致。例如，在战争期间，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和男权制的利益就不相吻合。

沃尔比区分出男权制运作的六种结构。她认识到，早期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弱点是往往集中在女性受压迫的一个“本质”原因上，比如男性的暴力，或者女性在生育中的角色。因为沃尔比关注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深层性和相互关联性，所以她把男权制看作是由既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六种结构组成的。

- 1 **家庭内部的生产关系** 女性承担无偿的家庭劳动，比如家务和育儿，被其丈夫(或同居者)占有。
- 2 **有薪劳动** 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被排斥在某些类型的工作之外，收入较低，并且被隔离在较不熟练的工种里。
- 3 **男权制国家** 国家在其政策措施和优先考虑

上，对男权利益有着系统化的偏向。

- 4 **男性暴力** 虽然男性暴力经常被视为由个人主义行为组成，但却是模式化和系统化的。女性惯常地经受这种暴力，并以标准的方式受其影响。除了少数特例，国家一般采取不干涉的做法，有效地宽恕了这种暴力。
- 5 **性状态中的男权关系** 这明确体现在“强迫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和男女之间性的双重标准(对性行为采取不同的“规则”)中。
- 6 **男权制文化制度** 许多制度和实践，包括传媒、宗教和教育，都制造出女性“处于男权凝视(gaze)之中”的表征(representation)。这些表征影响了女性的认同，预先规定了行为举止的可接受标准。

沃尔比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男权制形式。私人男权制是发生在由个别男性家长控制的家庭内部对女性的支配。这是一种排斥策略，因为女性基本上被禁止参加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公共男权制更具集体形式。女性可以涉足公共领域，比如政治和劳动力市场，但仍然被隔离在财富、权力和地位之外。

沃尔比承认，至少在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至今，男权制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某种转变。她特别提到，工资差距的缩小和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都显示出男权制程度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权制已经被打败。如果说从前对女性的压迫主要限于家庭，那么现在已经遍布整个社会，在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女性都处于被隔离和从属的位置。换句话说，男权制在形式上已经由私人转为公共。正如沃尔比的讽刺：女性从家庭解放出来后，开始拥有整个社会以接受其剥削。

一种反抗种族歧视的团结核心。也就是说,黑人女性所受的压迫可能与白人妇女所受的压迫有不同的体现场所。

所以,黑人女性主义者主张,任何社会性别平等理论若是不考虑种族歧视,就别指望充分说明黑人妇女所受到的压迫。对许多黑人妇女而言,阶级因素是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一些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黑人女性主义理论的长处就在于它把焦点放在种族、阶级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她们认为,黑人女性因其肤色、生理性别和阶级位置而面临着多重劣势。当这三个因素交互作用时,它们会彼此加固和强化(Brewer 1993)。

五 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像黑人女性主义一样,也质疑了认为有一种所有女性共享的认同与体验的统一基础观念。

参见第四章第三节第一小节对于社会学中的后现代思路的介绍。

这一流派的女性主义借鉴了艺术、建筑、哲学和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部分根源可见于德里达(Derrida 1978, 1981)、拉康(Lacan 1995)和波伏娃(de Beauvoir 1949)等欧陆哲学家的作品。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拒绝认为,可以有一种宏大理论来说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或者存在什么单一、普遍的“女性”本质或范畴。因此,这些女性主义者拒绝接受其他人用来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阐述,比如男权制、种族或阶级,视之为“本质主义”(Beasley 1999)。

事实上,后现代主义鼓励同时接受许多不同的立场,视之为同等有效的。女性身份并不存在某种本质性的核心,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个人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体验(异性恋者、同性恋者、黑人女性、工人阶级女性等等)。在

这些纷繁复杂的形式当中,不同群体与个人的“它者性”得到了倡扬。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强调“它者性”的积极一面,象征着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现实的真相有许多,现实的角色有许多,现实的建构也有许多。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于(性、年龄和种族等方面)差异的承认。

除了承认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还强调了“解构”的重要性。具体说来,她们致力于解构男性语言,解构男性特质的世界观。有时候,后现代女性主义还致力于创造流变的、开放的术语和语言,能够更贴近地反映女性的体验。在许多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男人是从对子或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比如“好与坏”、“对与错”、“美与丑”)。她们认为,男人把男性说成是正常的,而女性是偏离的。比如说,现代精神病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就认为,女人就是男人少了阳具,因此提出女人对男人拥有一根阳具嫉羨不已。在这种男性特质的世界观里,女性始终被塑造成“它者”的角色。解构就是要攻击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以新的积极的方式重新塑造它们的对立面。

有关弗洛伊德论社会性别的社会化,参看第五章第二节第五小节。

后现代女性主义据说与上文讨论过的此前各派女性主义关系非常紧张(Carrington 1995, 199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女性主义者或许受到误导,认定有可能就女性的受压迫提供一种君临一切的说明,并逐步予以解决。

女性主义运动对于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它越来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性别不平等提出挑战。最后,我们简单地谈谈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里的社会性别问题。

小结:社会性别与全球化

在本章中,我们绝大多数的讨论都集中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的社会性别概念上。我们已经看到,妇女运动是如何催生了一大批社会学理论,旨在把握持久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并积极推动把克服这种不平等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活动,也不仅仅局限于北美和西欧。在当今这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上,那些已经积极投入英国妇女运动的人碰上了大好机遇,可以接触到在国外致力于其他女性主义斗争的女性。

可以肯定,妇女运动绝不是单纯的西欧或北美的现象。例如,在中国,女性正致力于确保“平等权利、就业、妇女参加生产、妇女参政议政”(Zhang and Xu 1995)。在南非,女性在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继续奋斗,以改善“被压迫的大多数的物质状况;那些被剥夺了接受教育、体面住房、健康设施和工作的途径的人”(Kemp et al. 1995)。在秘鲁,几十年来,积极分子们一直在致力于给予女性更多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Blondet 1995)。而“在俄罗斯,女性的抗议促成了阻挠通过俄罗斯议会1992年拟议的立法,即鼓励妇女留在家中,履行‘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Basu 1995)。

虽然妇女运动的参与者们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与其他国家积极分子的联系,但这类接触已经随着全球化而越来越频繁,并且越来越重要。确立跨国联系的主要论坛就是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Women),自1975年以来已经举办过四届。(目前有提议在2010年以前举办第五届)大

约有五万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女性,参加了1995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来自18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还有来自数千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一同出席了会议。为了寻找途径以“确保妇女有平等机会取得经济资源,包括土地、信贷、科技、职业培训、信息、通讯和市场”,^①与会者用10天时间听取了关于世界各地妇女状况的发言,讨论改善她们状况的方法,并建立彼此之间的专业联系和个人联系。与会者之一玛丽卡·杜特在《女性主义研究》杂志上撰文指出,“对于来自美国的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北京之行大开眼界,傲气顿挫,脱胎换骨。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分析深刻,条理清晰,论调铿锵,让美国女性为之震撼。”与此同时,按照杜特的说法,许多与会者在离开北京时,深感“全球团结、自豪与自信”(Dutt 1996)。

与会者最后一致通过《行动纲要》(Platform for Action),呼吁世界各国的政府解决以下问题:

- 妇女持续且日益沉重的贫穷负担;
- 对妇女的暴力;
- 武装或其他种类冲突对妇女的影响;
- 男女在分享权力和决策方面不平等;
- 对妇女采取陈规定型的看法;
- 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两性不平等;
- 持续歧视女童并侵犯女童的权利。^②

妇女运动是否必须具有国际取向才有作用?世界各地妇女的利益根本上是否一致?女性主义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女性意味着什么?随着全球化继续飞速发展,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正在引起广泛热议。

① 此句乃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第35款内容,中译文据“中国政府新闻网”(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1992/52202/3640016.html)。

② 此乃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第三章“重大关切领域”第44条部分子项的节选。中译文据“中国政府新闻网”(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1992/52202/3640020.html)。个别术语与本书其他地方不对应。

本章要点

- 1 虽然人类的性显然有着生物学的基础,但大多数性行为似乎是习得的而非天生的。性习俗在各文化之间以及文化内部都有很大不同。在西方,基督教对于塑造性的态度十分重要。在性规则严厉的社会中,双重标准和假道学是很普遍的。有关性行为的研究已经揭示,在规范和实际行为之间可以有着天壤之别。在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于性的压抑态度让位于更为宽容的观点,其影响在今天仍很明显。
- 2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的,然而也有许多少数群体的性趣和性向。同性恋似乎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近些年来,人们对它的态度也更为宽容。在一些国家还通过了承认同性恋者结合和赋予同性恋配偶与已婚者相同权利的法律。
- 3 社会学家区分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指的是男性与女性身体之间的生物性差异,而社会性别则是指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心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差异。
- 4 有些人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是由遗传决定的,然而,尚无结论性的证据证明社会性别差异具有生物性的基础。
- 5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是指在家庭和传媒之类社会化中介的协助下,习得社会性别角色。婴儿甫一落地,社会性别的社会化据说就已开始。儿童习得并内化那些被视为符合其生理性别的规范和期望。他们以这种方式采纳与他们相称的“生理性别角色”,以及男性认同和女性认同(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
- 6 有些社会学家相信,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塑造和改造。不仅仅是社会性别缺乏固定的“本质”,就连人的身体这一“基质”,也能够通过社会影响和技术干预而被改变。
- 7 社会性别不平等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在各种背景下享有的地位、权力和声望的差异。功能主义者在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做出说明时,强调社会性别差异和劳动的生理性别分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整合。而各种女性主义思路则拒绝认为社会性别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从社会和文化态度的角度,比如男性至上主义和歧视,来说明社会性别不平等。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正是男性通过男权制,即男性对女性的系统化支配,剥削了女性。而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除了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等因素也是理解非白人女性所经历的压迫所不可或缺的。
- 8 社会性别关系指的是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社会模式化的互动。一些社会学家提出,存在一种社会性别秩序,其中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表达被组织在一套有助于男性支配女性的等级序列中。
- 9 近些年来,人们对男性特质的性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些观察者认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正在引发一场男性特质的危机,男性的传统角色正在受到侵蚀。

思考建议

1. 是否有可能及是否有必要消除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差异?
 2. 是否有可能在维持社会性别差异的同时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
 3. 阶级、族群和性取向之类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社会性别体验?
 4. 未来数十年间将会出现怎样的新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以回应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
 5. 社会互动是以何种方式围绕着假定的异性恋规范被结构化的?
-

阅读指南

Joe Bristow, *Sexualit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性的面面观》

R. W. Connell,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2002). 《社会性别》

John Horton and Sue Mendus (eds), *Toleratio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宽容、认同与差异》

Michael S. Kimmel and Michael A. Messner, *Men's lives* (Boston, Mass: Allyn and Bacon, 1998). 《男人的生活》

Lynne Segal, *Why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1999). 《女性主义的缘由》

A. Stein and C. Williams, *Sexuality and Gender* (Malden, MA: Blackwell, 2002). 《性与社会性别》

网络导航

社会科学信息门户——社会性别与性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Gateway on Gender and Sexuality)

<http://www.sosigacuk/roads/subject-listing/World-cat/socgend.html>

福西特图书馆,现在被称为女性图书馆^① (Fawcett Library, 现称 Women's Library)

<http://www.thewomenslibrary.ac.uk/>

酷儿资源联结 (Queer Resource Directory)

<http://www.qrd.org/>

① 福西特夫人 (Dame 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 1847—1929) 是英国女性运动领导人,领导该运动长达 50 年。1869 年参与创办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为英国第一所大学附设女子学院。1897 年任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主席。福西特协会 (Fawcett Society) 在英国倡导女性主义,宣扬男女平权,为纪念福西特夫人而改此名。协会下设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名为福西特图书馆,现归入设在伦敦城市大学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的女性图书馆。

穿梭之音^① (Voice of the Shuttle)

<http://vos.ucsb.edu/browse.asp?id=2711>

英国广播公司同性恋婚姻之辩 (BBC Debate on Gay Marriage)

<http://www.bbc.co.uk/religion/ethics/samesexmarriage/index.shtml>

① 提供大量人文社科学术资源联结的网站,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英文系华裔教授 Alan Liu(刘爱伦)设立。

目录

第一节 核心概念	394
13.1.1 种族	394
13.1.2 族群性	396
13.1.3 少数群体	398
第二节 偏见与歧视	399
13.2.1 种族主义	401
13.2.2 对于种族主义的社会学解释	403
第三节 族群整合与族群冲突	404
13.3.1 族群整合的模式	404
13.3.2 族群冲突	405
第四节 英国的迁移与族群多样性	407
13.4.1 迁移	407
13.4.2 族群多样性	413
13.4.3 少数族群与劳力市场	415
13.4.4 住房	419
13.4.5 刑事司法系统	420
第五节 欧陆的外来移民与族群关系	422
迁移与欧盟	423
第六节 全球迁移	425
13.6.1 迁移运动	425
13.6.2 全球化与迁移	427
13.6.3 全球流散	428
小 结	429
本章要点	429
思考建议	430
阅读指南	430
网络导航	431



第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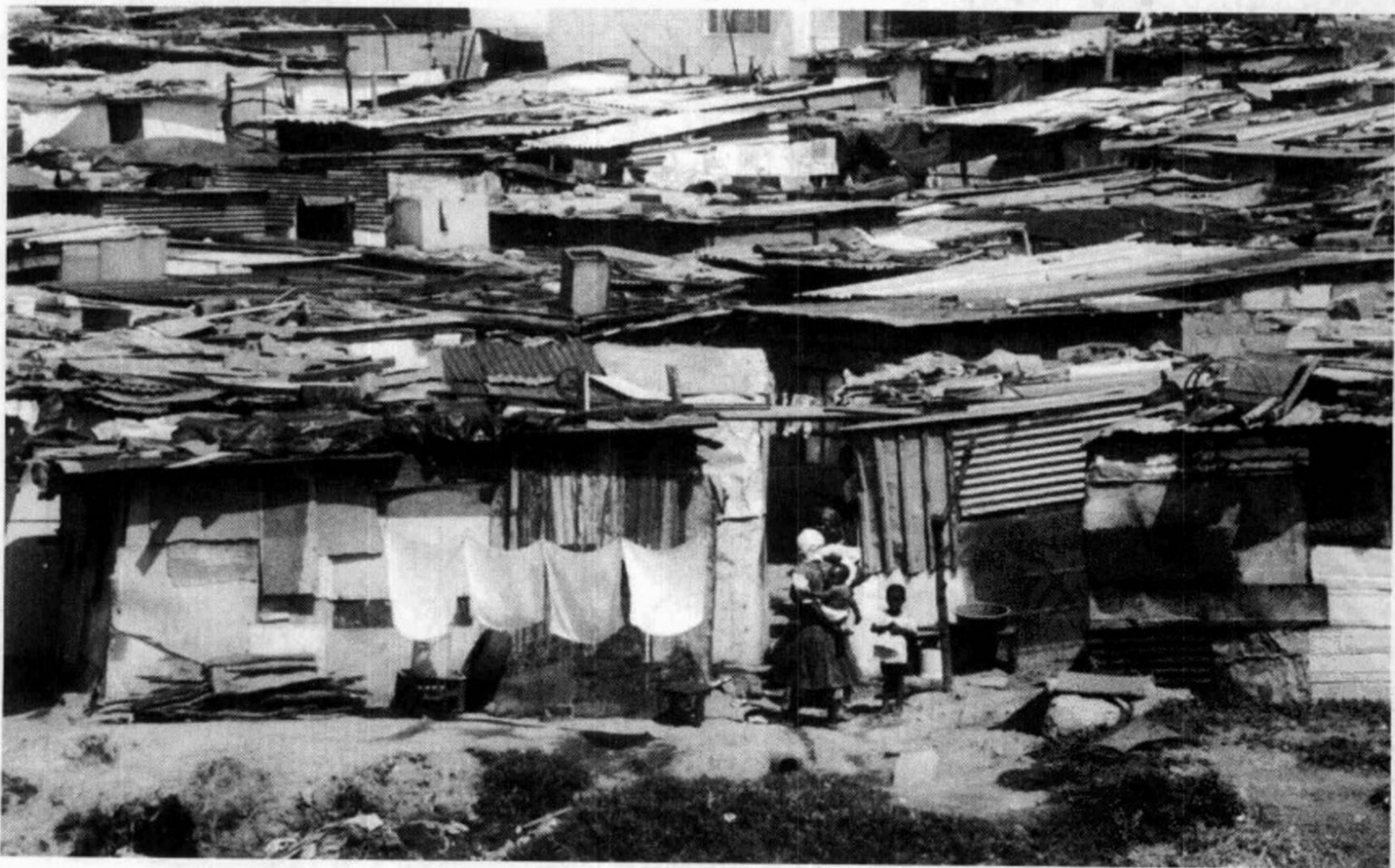
种族、族群性与迁移



就 在 10 多年前，南非还处在种族隔离制度的统治之下，就是一种强迫性的种族分隔制度。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每个南非人都分别被归入以下四个类别之一：白人（欧洲移民的后裔）、“混血儿”（coloured，他们的血统来源可以追溯到一个以上“种族”的成员）、

亚裔和黑人。白人是南非的少数族群，占总人口大约 13%，却统治着占多数的非白人族群。非白人没有投票权，在中央政府里没有代表。从卫生间和火车车厢这类公共场所，到邻里和学校，社会的所有层面都实施了隔离。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被赶进远离主要城市的所谓“黑人家园”^①里，作为流动工人在金矿和金刚石矿中工作。

虽然种族隔离制度被写进法律，但却是通过野蛮暴力得以实施的。南非国民党 1948 年开始掌权后，正式建立种族隔离制度，通过执法机关和安全机关来压制对于种族隔离政权的一切反抗。各反对团体均被宣布为非法，持不同政见者未经审讯即被拘禁，并经常遭受拷打。和平示威经常被暴力镇压。在经过多年的国际谴责、经济和文化制裁以及日渐高涨的国内反抗后，种族隔离政权逐渐衰落。1989 年德



像这样的黑人区^②就是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千百万黑人的家园。

① “homeland”：在当地语言中为“Bantustan”，即分布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班图人（Bantu）的家园。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二小节。

② 原文为“township”，不是一般的城镇，在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特指黑人或混血儿的居住区。

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时,继承的是一个深陷危机、几乎无法治理的国家。

1990年,德克勒克总统取消了对主要反对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的禁令,并结束了该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长达27年的囚禁生涯。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谈判,为在南非举行第一次包括白人和非白人在内的全民大选铺平了道路。1994年4月27日,非洲人国民大会获得了压倒性的62%选票。曼德拉成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首任总统。

曼德拉和非国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这个拥有3800万人口的国家里,9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2000万人的生活中没有电。失业现象十分普遍。黑人人口中超过一半是文盲。黑人中的婴儿死亡率比白人高十几倍。但是,南非不仅在物质方面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数十年来奉行的基于种族优越性信念的意识形态,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深重创伤,亟须和解。种族隔离政权的暴行需要偿还,种族压迫的文化需要清除。而非裔人口内部的族群紧张更是引发了暴力冲突,并险些导致内战。

在1999年到期的总统任期内,曼德拉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的多族群社会的基础。1996年通过的宪法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宪法之一,宣布了基于种族、族群或社会出身、宗教和信仰、性取向、残障和怀孕的一切歧视均属非法。曼德拉不断呼吁一种“新爱国精神”,以将“不安定的白人”和“不耐烦的黑人”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国家建设计划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如以祖鲁族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 IFP),也被政府接纳,以缓解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族群与政治紧张。

曼德拉任期内发生的最值得一提的大事之一,就是试图解决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遗留问题。从1996年4月到1998年7月,真相

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在南非各地许多社区举行听证会,审查种族隔离制度下对于人权的侵害。诺贝尔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①领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了1960年至1994年间所犯的侵害和虐待,获得并记录了二万一千多份证词。听证会对大众公开,并由媒体作详尽的报道。该委员会之所以要举行听证会,是为了揭露种族隔离时代的种种实情,从恐怖至极的暴行,到司空见惯的常态,都公之于众,但并不是充当审判或给予惩罚。那些在种族隔离时代犯下罪行的人,包括警察和安全机关,只要诚实呈供并“彻底揭露”所有相关信息,就可以获得赦免。

1998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长达3500页的结果报告。不出所料,种族隔离政府被认定为是侵犯人权的主要作恶者,但报告也提及了包括非国大在内的其他组织的犯罪行为。有些人批评该委员会只不过是种族隔离时代罪行的档案保管员,不能对已发生的“罪行进行矫正”。但是另外许多人相信,从施虐者和被虐者那里收集证词的过程本身,就已经使种族隔离时代的不公正昭显于世。

当然,仅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己之力,还不能克服长达数十年的种族分隔和歧视。南非仍然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仍需与顽固和不宽容做斗争。2000年通过的一系列“过渡法案”(transformation bills)宣布憎恨性的言词为非法,并建立一系列“平等法庭”以审理对于种族歧视的指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是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这段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建立了一个新标准,以坦诚布公的态度处理种族分隔问题。委员会以身作则,努力使公众注意到种族仇恨的危险后果,展示了和解过程中交流与对话的力量。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种族”和族群性的概念,以及为什么种族和族群的分裂会如此

^①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1931年生,南非圣公会领袖,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获得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



纳尔逊·曼德拉在 27 年铁窗生涯之后,于 1994 年宣誓就任南非总统。

频繁地导致社会冲突,就像在南非和其他许多社会一样。考察完社会科学家理解和使用种族与族群性概念的方式,我们将把话题转向偏见、歧视和种族主义,并讨论有助于说明它们何以挥之不去的社会学解释。然后,我们将探讨族群融合的模式,研究族群冲突的实例。在本章最后几节,我们将转到英国乃至欧洲的族群多样性和族群关系,并特别关注移民的趋势和族群不平等的模式,最后将探讨全球层面上的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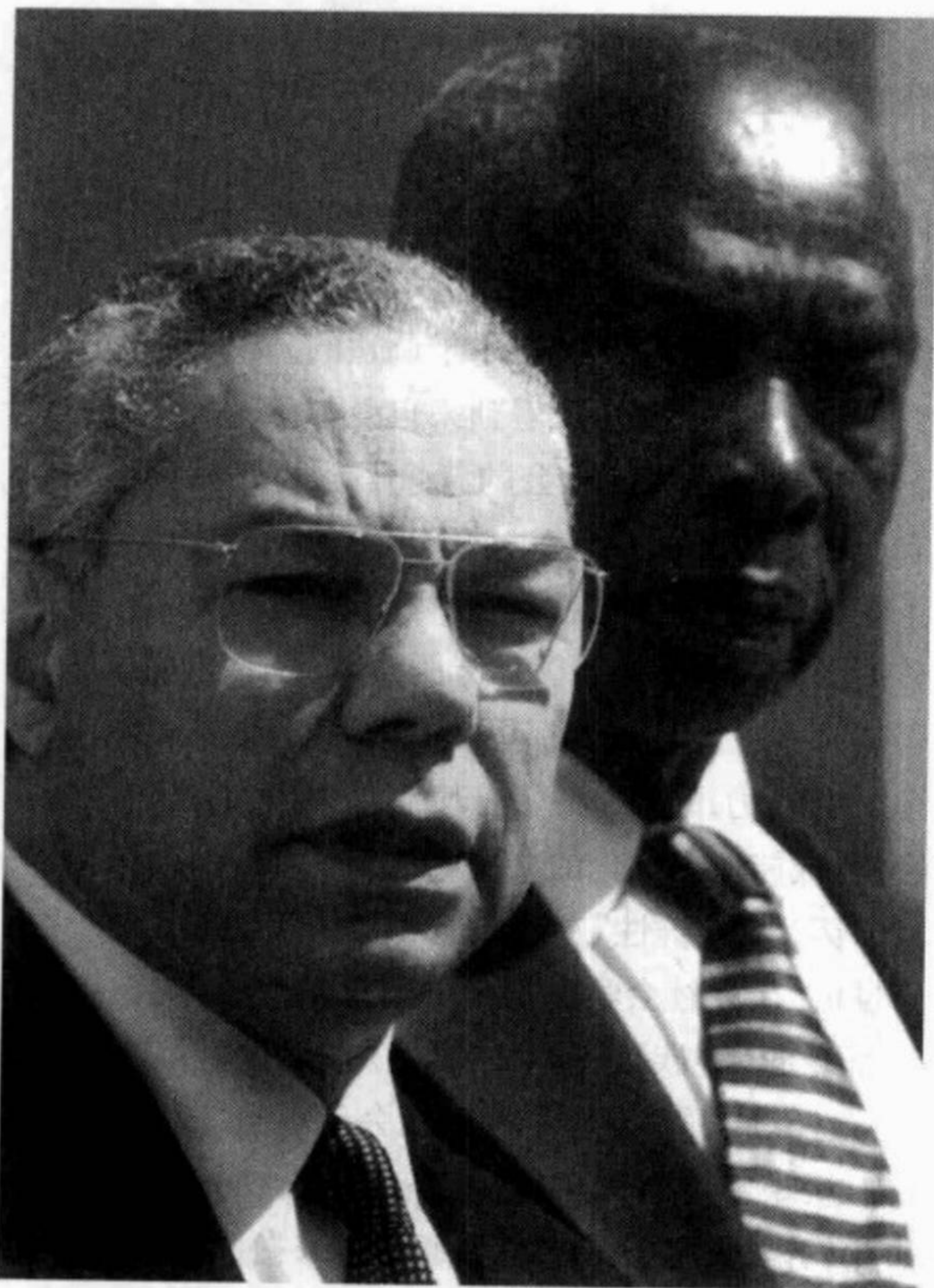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核心概念

13.1.1 种族

种族是社会学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日常用法有悖于其科

学基础(或因此缺乏科学基础)。今天有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人类可以很容易地按照生物学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族。这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不仅是学者,还有政府,比如(上文所述)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前的南非政府,都曾经屡屡尝试,以确立全世界各民族的种族类型学。有一些学者区分出了 4 个或 5 个主要种族,另一些人则提出了多达 36 个种族。

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出现了科学面目的种族理论。随着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强大帝国,管辖诸多被征服的属地和民族,这些种族理论就被用来证明正在兴起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约瑟夫·阿瑟·德·戈宾诺伯爵(1816—1882)有时候被称为现代种族主义之父,他曾经提出存在三大种族:白种人(高加索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和黄种人(蒙古人种)。在戈宾诺看来,白种人拥有更为优越的智力、道德和意志力。正是这些遗传下来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一是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一是肯尼亚前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可以看出，同样被界定“黑人”，实际的肤色差距何其大矣。

的素质，支撑着西方的影响传遍整个世界。与此相反，黑种人是最低能的，带有鲜明的动物本性，缺乏道德，而且情绪不稳定。后来，戈宾诺和其他科学种族主义支持者的理念影响了阿道夫·希特勒，他把这些观点变成纳粹党的意识形态；还影响了其他奉行白人至上观点的群体，例如美国的三K党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种族科学”的名誉已经彻底扫地。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不存在界限分明的“种族”，只有人类身体上一定范围的差异。人类群体之间在身体类型上的差别源于人口的近交，会依据不同社会群体或文化群体之间的接触程度而各见差异。人类的人口群体是一个连续统。具有外在共同体征的人

口群体，其内部的基因多样性与人口群体之间的基因多样性是同样复杂的。基于这些事实，科学界已经基本抛弃了种族的观念。许多社会科学家也一致提出，种族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学术界沿用这一概念，只能是延续种族具有生物学基础这一普遍持有的观念（Miles 1993）。其他社会科学家则有不同意见，认为种族作为一个概念，即使其生物学基础已经站不住脚，但对许多人而言它仍是有意义的。他们认为，对于社会学的分析而言，种族即使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概念，也仍然至关重要。所以，一些学者选择使用带引号的“种族”，以体现它通常的用法是带有误导性的。

如果说种族不是指生物类别，那么种族是什么？在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体差异，其中有些是遗传的。然而，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另一些身体差异会引起社会的歧视和偏见，这个问题与生物学毫无关系。所以，应当把种族差异理解成这样一些身体差异，被一个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们选择出来，视为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例如，肤色的差异被视为举足轻重，而发色的不同则无足轻重。种族可以被理解为一组社会关系。个体和群体据此得以定位，并基于生物学的特征，被赋予不同的属性或能力。种族差别不仅是描述人类差异的方式，也是社会内部权力和不平等模式的再生产的重要因素。

按照对于种族的理解，对个体或人群进行分类，这个过程叫做种族化。在历史上，种族化意味着根据某些人群先天所具有的体征，将其贴上构成独特的生物群体的标签（像戈宾诺伯爵所提出的观点那样）。15世纪以来，随着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欧洲人开始努力通过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进行归类 and 说明，以使知识变得系统化。非欧洲人通过“种族化”，成为“白种人”的对立面。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种族化采取“法规化”的制度形式，比如美国拓殖地的奴隶制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然而，更常见的是，日常的社会

体制以既成事实的方式被种族化。在种族化的体制内,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就业、人际关系、住房、卫生保健、教育和法律代表,都被他们在那个体制中的种族化位置所塑造和约束。

13.1.2 族群性

虽然种族的理念错误地暗示了某些东西是固定的,生物性的,但族群性^①这个概念的含义则纯粹是社会性的。族群性指的是使某个给定的人类共同体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文化实践和观点。族裔群体的成员们把自己看作是在文化上与社会中其他群体不同的人;同样,其他群体也这样看待他们。区分不同的族群时可以依据不同的特征,但是最常使用的是语言、历史或血统(真实的或想像的)、宗教以及服饰风格。族群差异完全是习得的,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直到我们记起来,一些群体是多么经常地被视为“天生治人”、“得过且过”、“愚蠢弱智”之类。事实上,族群性毫无先天固有之处。它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通过社会化,年轻人被其所属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规范和信念所同化。

对许多人而言,族群性是个体和群体认同的核心,但其意义对于每个人皆有不同。它能提供与过去相延续的重要脉络,并经常通过文化传统的实践而永葆活力。比如说,年复一年,狂欢节的兴奋刺激和才艺表演振奋了伦敦诺丁山街上的加勒比裔。再举一例,第三代爱尔兰裔美国人尽管毕生都生活在美国,但是仍然

会骄傲地认同为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尔兰的传统和习俗经常在家庭乃至更大的爱尔兰共同体内世代相传。虽然族群性在传统的范围内延续着,但它并非静止不变。相反,它在变动不居的环境面前是灵活流变、乐于调适的。以爱尔兰裔美国人为例,可以看到来自爱尔兰的民间习俗是如何在美国社会的背景下维持下来但有所转变的。在许多美国城市里举行的喧闹的圣帕特里克节^②游行就是一例,展示了爱尔兰传统如何被鲜明的美国品味所改造。类似的例子遍及全世界,只要那里的人口由于迁移、战争、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或其他原因而相互融合,形成族群多样化的共同体。

因为“族群性”这个概念的含义完全是社会性的,所以社会学家常常更愿意使用这一术语而不是“种族”(见上文讨论)。然而,诉诸族群性和族群差异时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題,当它们意味着与“非族群的”规范相对比时尤其如此。例如,在英国,族群性通常用来指称那些不同于“本土的”英国习俗的文化习俗与传统。“族群的”(ethnic)这个词被用于烹饪、服装、音乐和邻里关系等各种领域,指称哪些是“非英国的”习俗。但如果以这种集合体的方式使用族群标签,就会产生正在制造“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裂的风险。仿佛人口的某些组成部分被视为是“族群的”,而其他部分则不是。事实上,族群性是人口中所有成员而非某些特定部分所具有的属性。然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实际生活中,族群性总是与一个人口中的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③

① 这个词在本书其它章节,如果不与“族裔群体”并列出现,则大多简称“族群”。本章会明确区分族裔群体(简称族群)和族群性(比如族群意识、族群地位等等)。

② 每年3月17日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爱尔兰人的节日,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活动于五世纪,将基督教传入爱尔兰,是爱尔兰的主保圣人和民族使徒。到七世纪末成为传奇人物。

③ “ethnic”这个词在英文中具有多重相互关联的意义,汉语的单一译名不足以体现出作者在这一段乃至这一章里蕴含的意思:与生物性的种族(race)相对之社会性的种族(的);与基督教相对的异教徒的,非基督教的;与现代正统标准化文化相对的原始的、土著的;与本国人相对的外国人的;与主流民族相对的少数民族的(试想中国人讲民族风情,一般不会是指汉族)。

“黑人”认同

这些年在描写个体和人群时,对“黑人”这个词的使用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仍然充满争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人”是一个由白人强加的贬损性的标签。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非裔美国人和英国人才“重新诉求”了这个词,并以正面的方式用它来描述自己。“黑人”成为自豪和认同的源泉,而不再是种族中伤。“黑即是美”的口号,触动人心的“黑人权力”概念,成为黑人解放运动的核心。这些观念被用来对抗“白”对“黑”的符号支配。随着“黑人”这个词日益被英国社会所接受,它也开始被用到不是非裔的非白人身上,特别是亚裔。然而,“黑”这个词不单只是个标签,更包含着

深层的政治信息。因为所有的“黑”人都经历过白人治下的种族主义和排斥,所以要号召他们围绕共同的黑人认同行动起来以推进变革。^①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和少数族群成员开始质疑用“黑人”这个词指称所有的非白人人。虽然承认非白人受到某些共同的压迫,但他们认为“黑人”这个词模糊了族群之间的差异。

反对使用这个词的人认为,应该更多地注意各少数族群的独特经验,而不是假定一种共享的经验。为首的批评者之一塔里克·穆多德指出,“黑人”这个词使用得太随意了,有时候仅指非裔,而有时候又笼统地包括亚裔。他认



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在领奖台上致礼,彰显其对于黑人认同的自觉意识,引发诸多争议。

^① “black”一词含义丰富,其中有“暗淡的”、“毫无希望的”、“灾难深重的”的意思。

为,这个词过于强调基于肤色的压迫,而忽视了大量基于文化的种族主义。在穆多德看来,由于“黑人”这个词与非裔的体验之间存在强烈的涵义关联,所以亚裔往往不把自己视为“黑人”。最后,穆多德指出,“黑人”意味着一种本质上的认同,而这样的观念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虚设的。非白人中存在有许多不同的认同,就如同所谓“白人”人口中的群体一样(Modood 1994)。

在社会学中,关于如何使用“黑人”这个词,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共识。虽然穆多德等人提出的批评确实有道理,但在谈到大多数非白人所遭遇到的白人种族主义的共同经验时,“黑人”这个词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然而,社会学近来所出现的一些趋势,似乎在支持穆多德的关注。与后现代思潮有关的论者往往强调各种少数民族群之间的差异,而不是详述集体性的“黑人”认同的意义。

13.1.3 少数群体

少数群体(常常称作少数族群^①)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被广泛使用。它并不仅指在数量方面的区别。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存在着许多少数群体。那些身高超过6英尺的人或者鞋码大于12码的人,^②根据社会学的定义,都不能算作少数群体。在社会学里,一个少数群体的成员与主导群体(拥有更多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群体)相比,处于劣势,并且拥有群体团结(group solidarity)感或归属感。作为偏见或歧视的对象,通常的经历通常会强化共同效忠和共同利益的感觉。

因此,社会学家经常按照非字面的方式使用“少数”这一术语,用来指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而非其数量表现。在许多情况里,“少数”实际上是多数。在市中心^③之类的地理区域里,少数族群虽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却被称为“少数群体”。这是因为,“少数”这个词捕捉的是他们所处的劣势地位。女性有时被描写为少数群体,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里,她们在数量上却占多数。不过,因为女性与男性(“多数群体”)相比往往处于劣势,因而这个词也被用在她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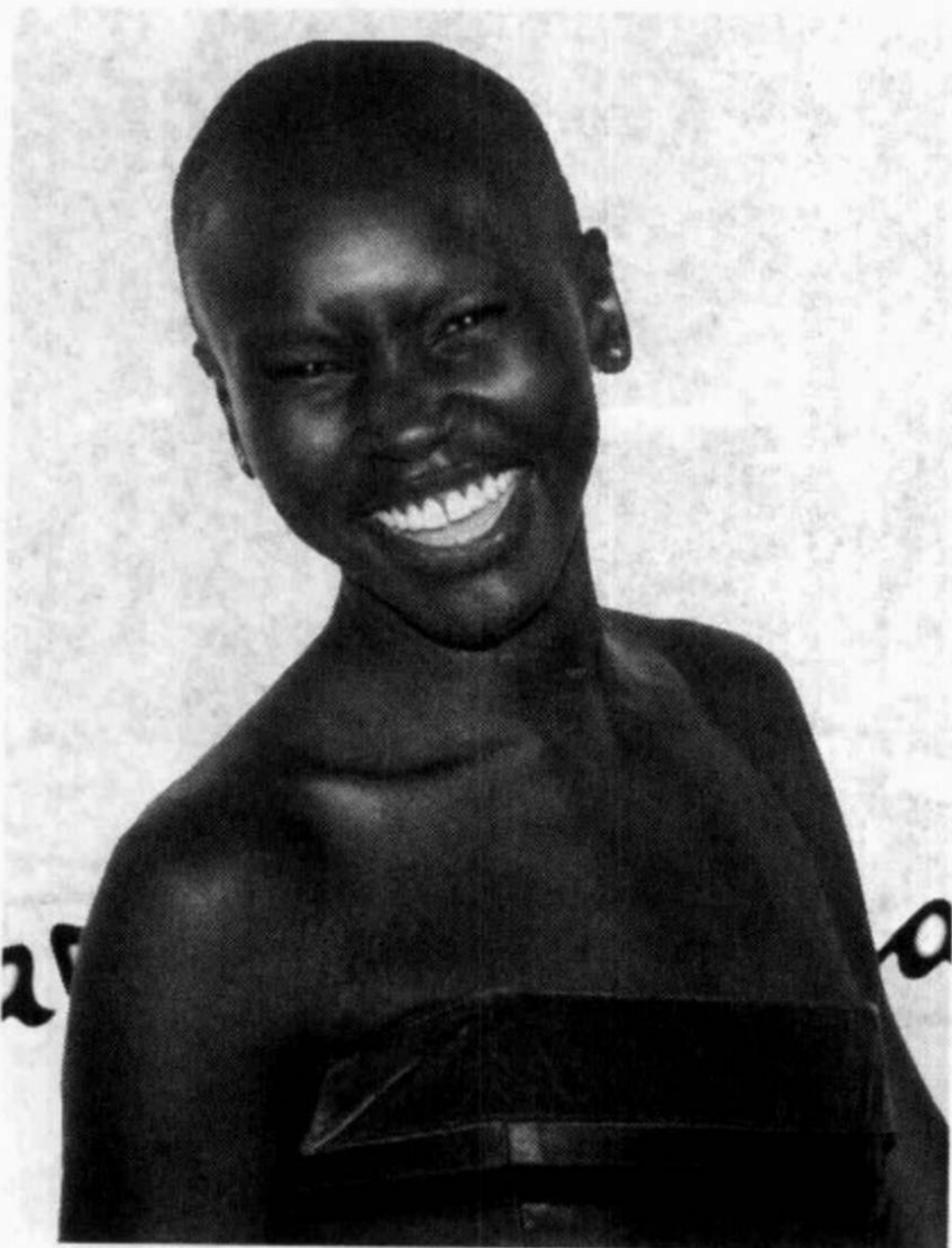
少数群体的成员常常倾向于将自己视作游离于多数群体之外的人。他们常常在身体的角度和社会的角度与较大的社群隔离开来。他们往往聚居在特定的街区、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某些区域。在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的成员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少数群体成员之间,很少发生通婚的现象。少数群体中的人有时会积极鼓励族内婚(群体内的婚姻),以使他们的文化特性永葆活力。

一些学者喜欢用“少数群体”来泛指在由“多数群体”掌控的社会中遭受偏见的群体。“少数群体”这个术语通过强调社会中各种从属群体的经验的共同性,提请人们关注歧视的普遍存在。例如,对于残障人士的歧视、反犹太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和种族主义具有许多共性,并显示出对不同群体的压迫是如何能够采取类似的形式。不过,笼统地使用“少数群体”也可能导致歧视和压迫的一般化,从而不能准确地反映特定群体的经验。在伦敦,虽然同性

① 原书此处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中并无这一词条。

② 折合为身高超过1.82米,鞋码超过47码(英制转为中国习用的欧制)。

③ 与中国读者的当下认识不同的是,这里的市中心或内城(inner cities),在欧美发达国家往往是随着白人中产阶级逐渐迁居环境优美、人口适度的郊区,在市中心逐渐形成的建筑破败、人口拥挤、就业无着、罪案频发的贫民区。



苏丹模特儿亚历克斯·薇是西方时装界里罕见的黑人面孔。

恋者和巴基斯坦裔都是少数群体，但他们在社会中感受从属的方式绝非一致。

很多少数群体在族群的角度和身体的角度上与人口中其他人都不一样，例如英国的加勒比裔和亚裔，美国的非裔、华裔和其他群体。如上所述，实际上，将一个群体或一套传统界定为“族群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虽然加勒比裔在英国和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无疑都属于少数族群，但意大利或波兰血统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不大可能被当作少数族群。身体上的不同，比如肤色的差别，经常被作为确定少数族群的界定因素。就像我们在这一章中将看到的，族群之间的差异很少是中性的，它往往与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相联系，而且伴随着群体之间的对抗。

第二节 偏见与歧视

种族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而偏见与歧视在

人类历史上十分普遍，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偏见指的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对另一个群体所持有的观念或态度。一个带有偏见的人所持有的先入之见往往是基于传闻，而不是直接的证据，甚至在面对新的信息的时候也顽固不变。人们可能会包容那些对于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有利的偏见，以及对于其他群体的负面的偏见。对某个特定群体持有偏见的人，就不能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成员。

偏见常常源自刻板印象，就是对某一人群的固定的、僵化的特征概括。刻板印象常常被用于少数族群，比如认为所有黑人都有运动天赋，所有东亚人学习都勤奋刻苦。有些刻板印象也包含一定的真实性，但其他的刻板印象则只是一种移置机制，其中的厌憎或愤怒之情所针对的对象，其实并非那些情感的真正起源。刻板印象在文化观念中根深蒂固，即使明显歪曲了现实，也很难被侵蚀。认定单身母亲依赖社会福利，拒绝工作，其实就是缺乏根据却挥之不去的刻板印象的范例。相当多的单身母亲是有工作的，接受社会福利的人许多都宁愿去工作，只是因为找不到地方照看孩子。当两个被剥夺的族群为了经济报酬而彼此竞争时，寻找替罪羊的现象就很常见。例如，直接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攻击的人，其经济地位往往与被攻击的族群相似。最近的一项民调发现，在觉得“世道艰难”的那些人中，有一半人相信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正在拿走他们的的好处（MORI 2003; *The Economist* 2004年2月26日）。他们把怨气撒在少数族群身上，但其困境的真实起因却在别处。

寻找替罪羊通常是针对那些容易区分而且比较无权的群体，因为他们是比较容易攻击的目标。纵观西方历史，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意大利人、非洲黑人、穆斯林、吉普赛人等群体，在不同阶段里都曾很不情愿地扮演过替罪羊的角色。寻找替罪羊常常包含投射（projection），指无意识地把自已的欲望或特征归因于其他人。研究一向表明，当某个主导



图为对于德国一处犹太墓园的反犹攻击。

种族主义的持续

种族主义为什么会盛行?原因有好几点。导致现代种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种族概念自身的创造和扩散。准种族主义态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但种族作为一套固定的特征,这一观念则是随着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种族科学”的兴起而出现的。白种人优越性的观念虽然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但一直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关键成分。

现代种族主义兴起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欧洲人建立起来的与非白人各民族之间的剥削关系。如果不是欧洲人广泛地相信黑人属于劣等种族,甚至是进化程度上低于人类的种族,奴隶贸易或许就不会发生。种族主义有助于把对非白人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并且否定他们参政的权利,而这是白人在他们的欧洲祖国已经赢得的权利。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不给予公民资格仍然是现代种族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

第三点原因涉及少数族群大规模地迁入英国、欧陆和北美,而这些地区此前主要是白人(除了北美的原住民)。随着二战以后的经济繁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变得步履蹒跚,绝大多数西方经济体从劳力短缺(以及相对开放的边界)变为大量人口失业,本国人口中的一些成员开始认为,外来移民正在涌入有限的工作岗位,并诉求自认为有权享有的福利。外来移民成为心怀不满的本国人很容易找到的替罪羊,并且还常常受到传媒的鼓动。实际上,这种普遍持有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迷思。移民劳工往往并不取代本地劳工,而更有可能从事那些本地人拒绝承担的工作,提供有价值的附加技能,或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从而起到补充作用。与此类似,外来移民一旦被允许工作,很有可能作为纳税人而给政府预算带来净收益。

群体的成员对某个少数群体成员实施暴力和性侵害时,往往是认为这个少数群体自己在炫示这些招致性暴力的特征。比如说,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白人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看法:黑人男性性能力非常强,而黑人女性性交往很随便。黑人男性被认为对白人女性构成性方面的高度危险,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性侵害罪案都是由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发动的(Simpson and Yinger 1986)。

如果说偏见刻画的是态度和意见,那么歧视则指的是针对其他群体或个体的实际行为。剥夺某一群体成员获得对其他群体来说是开放的机会,例如,一个英国黑人求职被拒绝,因为这份工作是为白人特设的,在诸如此类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偏见的存在。虽然偏见通常是歧视的基础,但两者可以独立存在。一些人可能带有偏见的态度,但他们并不采取行动。同样重要的是,歧视行为也并不一定直接出自于偏见。例如,白人购房者可能会不愿意购买黑人街区的产业,但并不是因为对那里的住户可能怀有敌意,而是担心产业将来会贬值。在这个事例中,带有偏见的态度确实引发了歧视,但却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

13.2.1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一种普遍流行的偏见,是基于有社会显著意义的身体差异的偏见。种族主义者相信,由于种族化差异的存在,某些个体优于或劣于其他个体。种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某些个体或群体所具有的行为或态度。一个人可能只是接受种族主义信念,或者参加一个群体,比如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组织,以积极推进种族主义行动议程。然而,许多人认为,种族主义并非只是一小撮顽固分子所持有的观念。相反,种族主义深深嵌入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之中。制度性种族主义的观念意思是说,种族主义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弥漫在

整个社会结构中。根据这种观点,警治、健康设施和教育体系之类的制度都在推行有利于某些群体而歧视另一些群体的政策。

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思想是由美国民权运动者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展出来的。他们相信,种族主义不仅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意见,而且支撑着社会构造本身(Omi and Winant 1994)。在随后几年里,在许多场合,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存在得到广泛接受乃至公开承认。由于斯蒂芬·劳伦斯命案(参见图文框),对伦敦大都会区警察局(London 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的警务惯例做了一项重要的调查,发现在警察队伍和刑事司法系统中,普遍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Macpherson 1999)。而在文化艺术方面,制度性种族主义也体现在电视广播(节目中对少数族群负面的刻画或表现不足)和国际模特行业(对非白人时装模特的全行业偏见)等领域。

从“老种族主义”到“新种族主义”

就像生物学的种族概念已经名誉扫地一样,在当今社会,基于体征差异的老式“生物学”种族主义也很少再被公开表达。美国合法隔离状态的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解体,都是拒斥“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的重要转折点。以上两个个案都通过把体征与生物学上的劣等性直接相连来表明种族主义的态度。今天,只有在暴力仇恨的罪案中,或是某些极端主义群体的纲领中,才偶尔会听到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观念。但这并不是说种族主义的态度已经从现代社会中消失了。相反,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它们被一种更高级的新种族主义(或者文化种族主义)所取代,后者利用文化差异的理念来排斥某些群体(Barker 1981)。

那些认为一种“新种族主义”已经出现的人宣称,现在是采用文化论据而不是生物学论据来达到对人口中某些部分的歧视。根据这种观点,高等和劣等的等级是根据多数群体的文

斯蒂芬·劳伦斯命案与麦克弗森报告

1993年，黑人青少年斯蒂芬·劳伦斯与一个朋友一起在伦敦东南区一个公共汽车站等车，受到五名白人青年出于种族动机的攻击而死。这些年轻人无缘无故地攻击劳伦斯，插了他两刀，并把他扔在人行道上直至死亡。但没有任何人被判谋杀，这被视为是正义的彻底失败，证明了在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

负责审查本案的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对劳伦斯命案的调查从一开始就处置不当 (Macpherson 1999)。到达现场的警官没有积极追捕袭击劳伦斯的人，对他的父母也缺乏尊重，并且拒绝告诉他们本应有权得知的案情。最后做出了错误的推断：劳伦斯不是一次毫无来由的种族主义攻击的无辜受害者，而是牵扯进一场街头争吵。警方对嫌疑犯的监视组织不力，执行起来“拖拖拉拉”。例如，尽管已有线索显示武器可能隐藏在哪里，但对嫌疑犯住所的搜查仍然很不彻底。能够干预本案改正此类错误的高级警官也未能履行职责。在调查和随后的审查期间，警方隐瞒关键信息，互相包庇，并拒绝为错误承担责任。

由于劳伦斯父母的执著，在1996年，其中的三名嫌疑犯受到审判，但由于法官裁定一名证人提供的证据不被采用而败诉。1997年，时任内政大臣的杰克·斯特劳宣布对劳伦斯案进

行全面审查，审查结果公布在1999年的《麦克弗森报告》(Macpherson Report)中。报告的作者们明确指出：“根据与斯蒂芬·劳伦斯的种族主义命案调查相关的所有证据，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毫无疑问的是调查中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渎职、制度性种族主义和高级警官领导不力等因素破坏了这次调查。”

这次审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谴责(见上文讨论)。报告作者们得出的结论是，不仅伦敦大都会区警方，还有包括刑事司法系统在内的其他许多机构，都涉嫌“集体性的过失……根据人们的肤色、文化或族裔来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由不经意的偏见、无视、疏忽和不利于少数族群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而导致歧视的过程、态度和行为中，都可以看到或察觉到这一点”(Macpherson 1999)。《麦克弗森报告》得出结论：“每一个机构都有义务检视其政策和政策的后果”，以确保人口中任何一部份都不会因此陷于劣势。报告提出了多达70条建议以改进处理种族主义犯罪案件的方式。其中包括训练警官的反种族主义意识，严肃警纪以清除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警官，更加明确地界定种族主义事件，增加警察队伍中黑人和亚裔警官总人数。

化的价值观构造的。那些远离多数群体的群体会因为拒绝被同化而被边缘化或遭到贬损。据称，“新种族主义”有着明确的政治性。能够看到新种族主义的显著例子包括：一些美国政客为颁布“只说英语”的官方语言政策而努力；希望戴着穆斯林头巾去上学的女孩在法国所

引起的风波(有关这场争论，详参第十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种族主义的实现越来越基于文化依据而不是生物依据，这一事实使得一些学者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歧视有着不同的体验(Back 1995)。

13.2.2 对于种族主义的社会学解释

上面所讨论的一些概念,比如刻板印象思维、移置和投射,都有助于通过心理学机制说明偏见与歧视。它们阐述了偏见与种族主义态度的性质,以及族群差异为什么对人如此重要;不过,它们没能告诉我们多少种族主义当中涉及的社会过程。要想研究这些过程,我们必须利用社会学的理念。

一 族群中心主义、群体封闭与资源配置

与整体层面上的族群冲突相关的社会学概念有族群中心主义、族群封闭和资源配置。所谓族群中心主义,就是对群外人满怀疑虑,并且倾向于根据自身的文化标准来评价其他群体文化。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族群中心主义。而族群中心主义与上文讨论过的刻板印象思维(本节第一小节)之间有何密切关系,也是不难看出的。群外之人被视为异类,蛮族,或是道德低劣、心智低下者。比如说,大多数文明都这样看待较小文化的成员,而正是这种态度引发了历史上无数的族群摩擦。

族群中心主义和群体封闭或族群封闭往往同时出现。“封闭”指的就是各群体努力维持使自己与其他群体分离的一些界限的过程。这些界限通过排斥的手段形成,而这些手段加剧了各个族群之间的分裂(Barth 1969)。这些手段包括限制甚或禁止群体之间的通婚,限制群体之间的社会接触或贸易之类的经济交往,以及群体之间的物理分隔(比如族群贫民区)。美国的黑人就承受了所有这三种排斥手段:有些州宣布种族通婚为非法;南部各州制定了法律来保持经济分隔和社会分隔;在绝大多数大城市中至今仍有被分隔的黑人贫民区。

有时候,权力相等的群体也会相互实施封闭界限:成员们各自保持分隔,但哪一方也不能支配另一方。但更为常见的是一个族群占有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的权力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族群封闭是与资源配置相符合的,在财富和物质分配方面确立不平等。

族群之间发生的尖锐冲突,有些是以族群之间的封闭界限为核心的。这正是因为,这些界限标志着财富、权力或社会位置等方面的不平等。族群封闭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使各人类社群相互分离的明显的或隐伏的差别。这不仅仅是理解为什么一些群体的成员遭到枪杀、私刑、殴打或骚扰,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能得到满意的工作、良好的教育或体面的居所。财富、权力和地位都属于稀缺资源,某些群体获得的要比其他群体多。为了维持这种独特的地位,占据优势的群体有时会诉诸暴力,以对抗其他群体。与此类似,处于劣势的群体也可能转而使用暴力,作为改善自身处境的手段。

二 冲突理论

与此相反,冲突理论一方面关注种族主义与偏见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关注权力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种族主义研究早期的冲突思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者将经济体制视为决定社会其他所有方面的因素。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认为统治阶级以奴隶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为手段来剥削劳动(Cox 1959)。

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些早期的论述过于僵硬和简单化,强调种族主义并不单单是经济力量的产物。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在1982年发表系列文章“帝国的回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从一种更为宽广的视角探讨种族主义的兴起。约翰·



这是英国的一道深受喜爱的名菜,算是它的“熔炉”文化的一种象征吗?

索罗默斯、保罗·吉尔罗伊等人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时指出,形形色色的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导致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英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种族主义。他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多侧面的复杂现象,涉及少数族群与工人阶级的不同认同和信仰的相互作用。在他们看来,种族主义绝不仅仅是权力精英针对非白人人口所实施的一系列压制性的观念 (Hall 1982)。

第三节 族群整合与族群冲突

当今之世,许多国家都有多族群人口共处的特点。而这些共处人口常常是经过几个世纪才演变形成的。例如,中东和中欧一些国家,像土耳其和匈牙利,族群的多样化都是长期的边界变动、外国势力占领和地区移民所造成的。而在另外一些社会,通过有计划地鼓励移民的

政策,或者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的遗产,更为迅速地形成了多族群共处。

在全球化和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族群多样性所带来的丰厚利益与复杂挑战。全球迁移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一体化而加速。在未来的一段岁月,人口的运动和混合似乎肯定会加强。但与此同时,族群紧张与冲突继续在世界上的许多社会爆发,有可能导致一些多族群国家的分裂,而在另一些多族群国家,则预示着漫无宁日的暴力。如何能够适应族群多样性,又如何能够避免爆发族群冲突呢?在多族群的社会中,少数族群与多数人口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多族群社会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曾经采纳过三种主要的族群融合模式:一是同化,一是所谓“熔炉”,最后是文化多元主义 (cultural pluralism) 或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三种模式都只是理念型,实际上并不容易实现。

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讨论了理念型。

13.3.1 族群整合的模式

第一种途径就是同化,意思是外来移民放弃了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根据多数群体的价值和规范来塑造自己的行为。同化论思路要求外来移民整合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包括改变他们的语言、服饰、生活方式和文化观点。在以“移民之国”立国的美国,一代又一代的外来移民受制于以此方式“同化”的压力,其结果,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有许多成为多少可谓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英国的大多数官方政策也旨在将外来移民同化到英国社会之中。当然,即使少数群体一心想被同化,也有可能无力遂心,要么被种族化,要么遭受冷遇,大如就业,小如约会,抑或是其他什么场合。

第二种模式被称作熔炉。不是外来移民消

解自身的传统以迎合既有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群,而是所有的人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不断演进的文化类型。不仅有纷繁多样的文化价值和规范从外部“引进”一个社会,而且当各个族群适应了他们发现自身所在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也同时缔造了多样性。关于熔炉文化,有一个真实的例子被广泛引述,就是咖喱香料鸡(chicken tikka masala)。这是在英国的印度餐馆发明的一种菜的品种。咖喱鸡(chicken tikka)是印度菜,而加入香料酱(masala sauce)则是为了满足习惯在肉上浇一层肉卤汁的英国人的口味。2001年,英国前外交大臣罗宾·库克(1946—2005)称这道菜为“英国国菜”,一时广为流传(British national dish, Cook 2001)。^①

许多人相信,熔炉模式是族群多样性最值得想望的成果。移民人群的传统和习俗不被抛弃,却有助于形成一种常变常新的社会氛围。混生形式的烹饪、时装、音乐和建筑都是熔炉思路的例证。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模式生动体现了美国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尽管“盎格鲁”文化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但它的某些特征已经反映出现在构成美国人口的许多不同群体的影响。

第三个模式是文化多元主义。其中各族群文化被赋予充分的资格以各自独立存在,同时参与广泛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多元主义的一种晚近发展是多元文化主义,其中各族群独立并且平等地存在。这种观点认为最合适的路线是发展一个真正多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承认各种不同“亚文化”的合法性。从许多方面来讲,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是多元主义的,但

是族群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不平等相联系,而不是国民共同体中平等而独立的成员资格。看起来,创造一个各族群独立并且平等的社会,至少有这种可能性,瑞士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法裔、德裔和意大利裔各群体共存于同一社会。

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大多数少数族群的领袖们都越来越强调多元主义道路。争取“独特并且平等”的地位需要艰巨的斗争,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许多人仍然把少数族群看作是一种威胁,威胁到他们的工作、安全和所谓“国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把少数族群当作替罪羊是一种难以根除的倾向。通常西欧国家的年轻人仍然持有和老一代人相似的偏见,在一种充满紧张和焦虑的社会氛围中,大多数国家的少数族群还会在未来面对挥之不去的歧视。

13.3.2 族群冲突

族群多样性能够使这些社会丰富多彩。多族群国家在居民们形形色色的贡献之下,常常是生机勃勃,富有活力。但是,这样的国家也可能十分脆弱,在面临内部动乱和外部威胁时尤其如此。语言、宗教和文化等方面歧异多样的背景都可能会成为断层线,从而导致族群之间公开的对立。一些社会能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实现了族群宽容和融合,有时候却可能迅速陷入族群冲突,即不同族群或社群之间的敌意。

以多族群的丰富遗产而著称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巴

^① 咖喱鸡原是一种南印度菜,配料一般包括鸡肉、番茄、椰浆(或奶油)、酸奶、咖喱等。事实上,2005年英国出品了一部电影名叫《Chicken Tikka Masala》(《这是一种咖喱鸡》,通译为《我要和我的伴郎结婚》),以喜剧风格描写了一位印度裔英国青年的“文化”遭遇。作者恰好举素来为人轻视的英国饮食文化为例,而即使在此方面自视绝高的中华饮食文化,在美国中餐馆里,也流行着国人莫名其妙的“名菜”“左宗(棠)鸡”。虽然那不是“Chinese food”,而是“Americanized chinese food”。但更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正是从又甜又酸又辣的左宗鸡,从结合中华求签占卜文化与英语俗谚的饭后“幸运饼”(签饼),形成他们心目中对于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的。

尔干长久以来就是欧洲的十字路口。数百年来的人口迁移,走马灯式的帝国统治,产生了一个多元混合的人口,主要包括斯拉夫人(比如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穆斯林和犹太人。自1991年以来,伴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变革,出现重大政治与社会转型,与此同时,前南斯拉夫数个地区的族群之间爆发了致命的冲突。

前南地区的冲突包含了族群清洗的企图,是指通过大规模地驱除其他族群来创造族群同质化的地区。^①比如克罗地亚,经过一场惨烈的战争,成千上万的塞尔维亚人被驱赶出国,成就了一个独立的“单一族群”国家。1992年,在波斯尼亚爆发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其中就包含了塞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进行的族群清洗。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男人被赶进集中营,而对于穆斯林女性,则发动了一场系统化的强奸“战役”。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发动,就是因为指控塞族武装正在对科索沃的阿族(阿尔巴尼亚人,穆斯林)进行族群清洗,驱除出该省。

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种族冲突都国际化了。成千上万的难民越过边境,涌入邻国,更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局势。西方各国不仅施以外交干预,而且加诸军事干涉,以保护已经成为族群清洗目标的那些族群的人权。短期来看,这些干预成功地扑灭了系统化的暴力。不过,它们也带来了意外后果。波斯尼亚固然维持着脆弱的和平,但只是借助了维和部队的驻在,以及将国家分割成各自分离的族群聚居区。而在科索沃,1999年北约对其实施轰炸,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一个“反向族群清洗”进程。

族群清洗涉及通过有针对性的暴力、骚

扰、威胁和恐怖活动,迫使族群人口迁徙。与此相对,族群灭绝是指由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进行的系统化消灭。“族群灭绝”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写南北美洲的原住民人口在欧洲探险者和殖民者到来后所遭受的大规模屠杀。疾病、强迫迁徙和暴力战争消灭了许多当地人口,当然,这在何等程度上是成系统、有计划的,尚存有争议。

20世纪见证了“有组织的”族群灭绝的兴起,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族群灭绝”最严重的世纪——不过也不好说。在1915至1923年间亚美尼亚的族群灭绝中,超过100万亚美尼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杀害。纳粹的大屠杀(Holocaust)导致超过600万犹太人的死亡,并留下了一个族群有计划地灭绝另一个族群的最可怕的例证。1994年,卢旺达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Hutu)对占少数的图西族(Tutsi)实施了带有族群灭绝性质的攻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夺走了超过80万人的生命。另有二百多万卢旺达难民涌入邻国,^②加剧了布隆迪和扎伊尔(即现刚果民主共和国)^③等国的族群紧张。再到晚近,2003年,西达尔富尔州的一些黑人发生骚乱,军队的报复导致至少七万人丧命,并使大约二百万人无家可归(据联合国数字,BBC News,2005)。

人们已经注意到,全球范围内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基于族群分割,卢旺达和苏丹即为明证。战争中只有一小部分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大量的冲突都是带有族群色彩的内战。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又充满竞争的世界里,在国外就能鲜明感受到“内部的”族群冲突的影响的时候,国际因素在塑造族群关系方面变得格外重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族群冲突吸引了国际关注,有时还会招来实际的干预。已经

① 已经非常固定的日常用语和传媒用语一般称为“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无论如何,要实施清洗乃至灭绝,关键都在于建构、凸显和延续群体之间的界限,从族群到种族,最终可以到“人”与“非人”之别。

②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说法是死亡据估计为20—50万。1993年卢旺达全国总人口为758万。

③ 扎伊尔是卢旺达的西部邻国,1997年改国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其西边另有刚果共和国。英文同为原文此处的“Congo”。

成立了多个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并开始着手调查和审判应该对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族群清洗和族群灭绝负责的人。如何应对并且阻止族群冲突,成为不但是个别国家而且是国际政治结构需要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虽然常常是在地方层面上经历、解释和描述族群紧张,但这些问题却越来越具有国家性甚或国际性。

第四节 英国的迁移与族群多样性

13.4.1 迁移

虽然我们可能认为,向英国的移民只是20世纪的现象,但其实这个进程可以溯源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最早阶段乃至更早。今天英格兰人中有许多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姓氏,使我们记起传统上从“凯尔特外缘”^①涌向英格兰的城市中心地带的人口流动。在19世纪初期,早在大量移民从相隔遥远的殖民地迁来之前,发展中的英格兰城市就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列颠群岛^②上不繁荣地区的移民。

然而,工业化的普及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内部的迁移模式,也改变了迁入英国的国际

迁移模式。随着乡村地区家户生产的衰落,城市地区就业机会增加,推动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趋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给国外来的移民提供了新的推动力。虽然在工业革命以前,在英国早就有爱尔兰人、犹太人和黑人社群,但机会的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迁移的规模和范围。荷兰人、华人、爱尔兰人和黑人的移民浪潮此伏彼起,有助于转变英国的社会经济气候。

更近的一次迁入英国的移民大潮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的纳粹迫害使得整整一代欧洲犹太人向西逃亡以求安全。一项调查估计,在1933年至1939年间,大约有6万犹太人移居英国,但真实的数字可能远远不止于此。1933年至1939年间,大约8万名来自中欧的难民抵达英国,战争期间另有7万人到来。到1945年5月,欧洲面临着史无前例的难民问题:数百万人成为难民,其中数十万人定居在英国。

二战后的英国经历了规模巨大的移民迁入潮。新居民中绝大多数来自英联邦国家^③,目的是寻求就业机会。战后的英国劳动力严重短缺。雇主一度渴盼着吸引外来移民劳动力。除了在战争破坏之后重建国家和经济,工业的扩张也使英国工人具备了空前的流动性,并创造了大量的非熟练技能型工作和体力劳动的职位需求。统治集团的人受到大英帝国遗留观念

① 此处原文为“Celtic Fringe”,统指苏格兰高地居民、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康沃尔人(Cornish),以及这些人所居住的地区。环绕在英格兰的北边、西边和西南边。不过此词通常带有贬义。前一版中译本作“凯尔特边区”。

② 此处原文为“British Isles”,包括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两个大岛及周围五千五百多个小岛,有英国和爱尔兰两个国家。前一版中译本译为“英伦三岛”,此词其实只是大不列颠大岛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部分的合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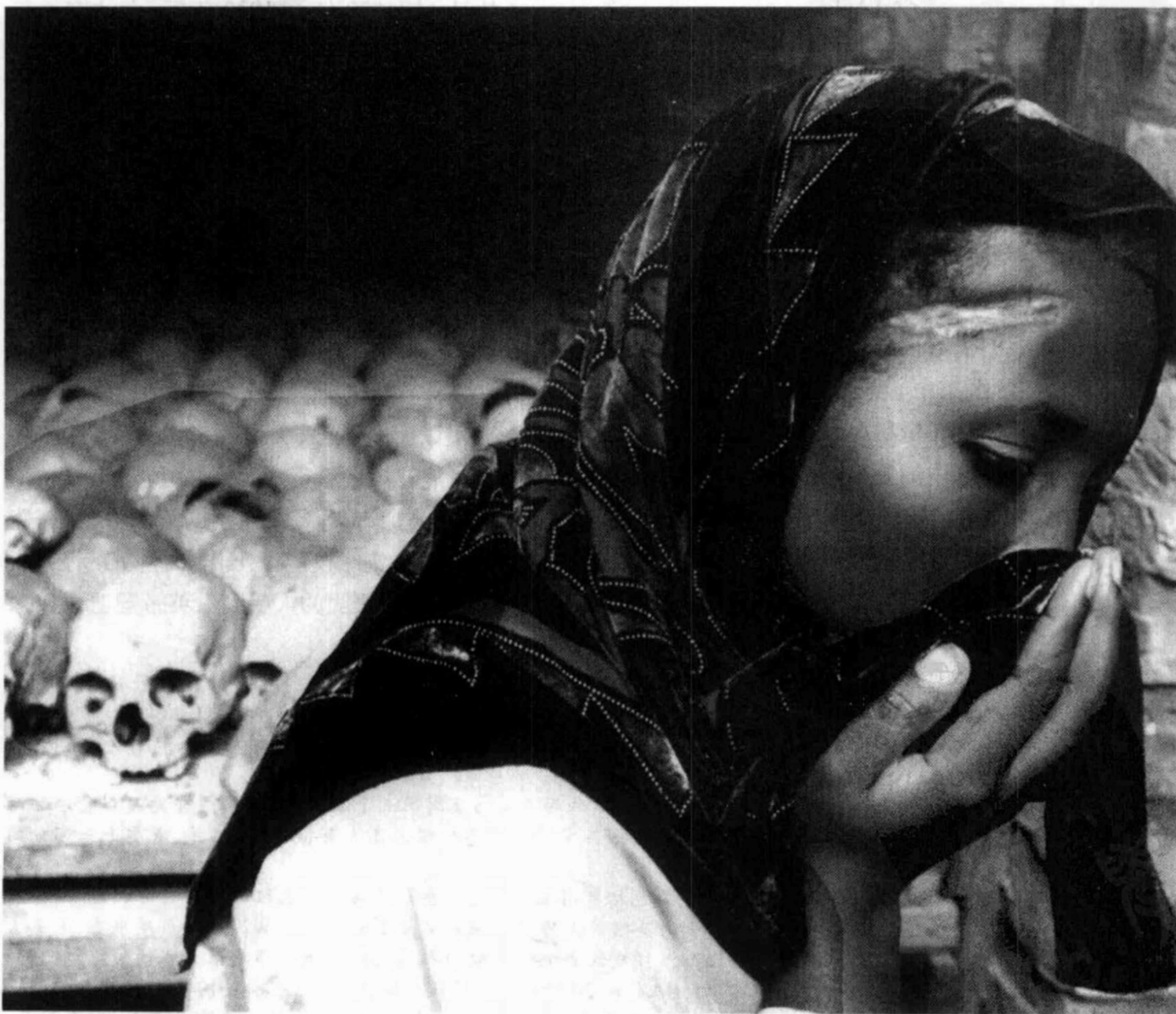
③ 此处原文为“Commonwealth countries”,是包括英国及其以前一些属地在内的主权国家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选择维持友好关系和实际合作,并承认英国国王为这个联盟名义上的元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大英帝国发展的结果,帝国殖民地中几个以习惯议会统治的欧洲人为主的附属国享有很程度的主权,1931年《威斯敏斯特条例》中即有英联邦的提法。但20世纪以来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1947年印度独立这一标志性事件,导致联邦的定义不断松散化、自由化。英联邦国家中除英国本身外主要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加纳、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新加坡,及众多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国。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把握本书许多章节中有关英国少数族群(尤其是南亚裔)的问题的由来。

的影响,觉得来自加勒比海诸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前英属殖民地的人都是英国的子民,有权定居英国。1948年通过的《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推动了移民的流入,因为该法案赋予英联邦国家的公民拥有优先移民权。

伴随着每一次外来移民潮,少数族群也彻底改变了英国的宗教组成结构。尤其是英国的城市,现在成了多族群、多宗教的地方。在19世纪,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使英国的天主教人数陡增,许多移民定居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

市尤其如此。到了二战之后,来自亚洲的大规模移民也增加了英国的穆斯林(其中许多人来自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和印度教徒(绝大多数来自印度)。迁移导致了新的问题:做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族裔和宗教意义上的少数群体如何能够充分整合到英国社会之中?

有关英国的宗教多样性,详参第十四章。



在1994年的种族灭绝事件中,卢旺达的多数族群胡图族屠杀了超过80万的图西族人。



这是一位黑皮肤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肖像,显示出关于做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外来移民会给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新的观念。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英国移民政策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张大英帝国的居民有权利移民英国并获得公民权的观念开始逐渐退缩。虽然对于移民进行的新的限制可能与劳动力市场大势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限制也反映了许多白种英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反对移民涌入。特别是在较为贫困的地区,那里经常是移民聚集的地方,生活在此的工人阶级对于移民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干扰十分敏感。因此,对新来者的态度经常是充满敌意的。1958年,白人居民攻击黑人移

民的诺丁山暴乱 (Notting Hill riots) 就证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态度的力量。

有关都市地区的暴乱,详参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第四小节。

呼吁控制移民的声音逐渐形成合唱,也体现在保守党前座^①大臣伊诺克·鲍威尔的名言中。1962年,鲍威尔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说中,正视了英国非白人人口显著增长的问题:“像罗马人一样,我似乎看到‘台伯河血流成河’。”^②一次盖洛普民调显示,有75%的人大体同意鲍威尔的看法。

反种族主义积极分子和学者认为,英国的移民政策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歧视非白人。从1962年的《英联邦移民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s)开始,英国批准了一系列限制非白人入境权和定居权的措施,但却保护了白人相对自由地进入英国的能力。甚至在英联邦国家的公民内部,移民法也歧视以非白人为主体的“新英联邦”国家的居民,保护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老英联邦”国家的移民的权利。1968年《英联邦移民法案》引入了“家长原则”(patriality principle),意味着想获得英国公民资格,一个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必须在英国出生、被收养或在英国长大,或者父母或祖父母之一满足上述标准。总的来说,这些要求使得白人的移民机会比非白人大得多。

1981年通过的《英国国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s)加强了对来自英国从前或现在的附庸地区的人进入英国的限制,区分了英国公民权与英国附庸地的公民权。并创造了“英国海外公民”这个范畴(British Overseas Citizens)。此范畴主要指居住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他们无权在英国定居,其子

① “front-bench”:英国议会中由内阁大臣和反对党领导人坐的前座。

② 典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最后一卷。鲍威尔以此喻指未来的族群冲突将导致巨大规模的仇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自英联邦的移民大量涌入英国,以填补全国的劳力短缺,但他们常常面临种族歧视。外来移民后来受到了限制。

女也不能继承他们的公民权。以前英联邦的公民在英国居住满五年之后就可注册为英国公民,现在则必须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相同的条件下申请归化入籍。还增加了其他一些对入境和居住权的限制。而1988年和1996年通过的立法则对这些限制增加了更多的内容。

随着移民入境的机会下降,英国也减少了寻求庇护者入境的可能性。一个人要想获得庇护资格,就必须能够声称,一旦被强制离境,就会破坏政府基于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Convention and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而对他们应尽的义务。根据这项1951年签署的条约,各国均有义务保护那些逃避自己国家的迫害的难民,至少给予他们境内其他外国人同等的待遇。1991年通过的关于庇护的立法对诉求难民身份的人设立了严

格的审查,包括进行指纹鉴定,减少享受免费法律咨询的人数,对搭载无合法签证乘客的航空公司处以加倍的罚款。1993年的《庇护和移民申请法》(Asylum and Immigration Appeals Act)导致了更多的人被拒绝申请,而长期被拘禁在拘留所的寻求庇护者也大量增加。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自2003年到2005年,外来移民人数下降了61%。

近些年来,有关族群性和移民的话题已经大大推动了英国的政治议程(其他一些富裕国家也是如此,参见下文)。调查表明,英国人当中认为“种族”或“移民”是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话题的人数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大约5%不断上升,在2002年5月达到39%的最高峰(参看图13.1)。这使得种族和移民问题成为当时仅次于国民保健服务制度的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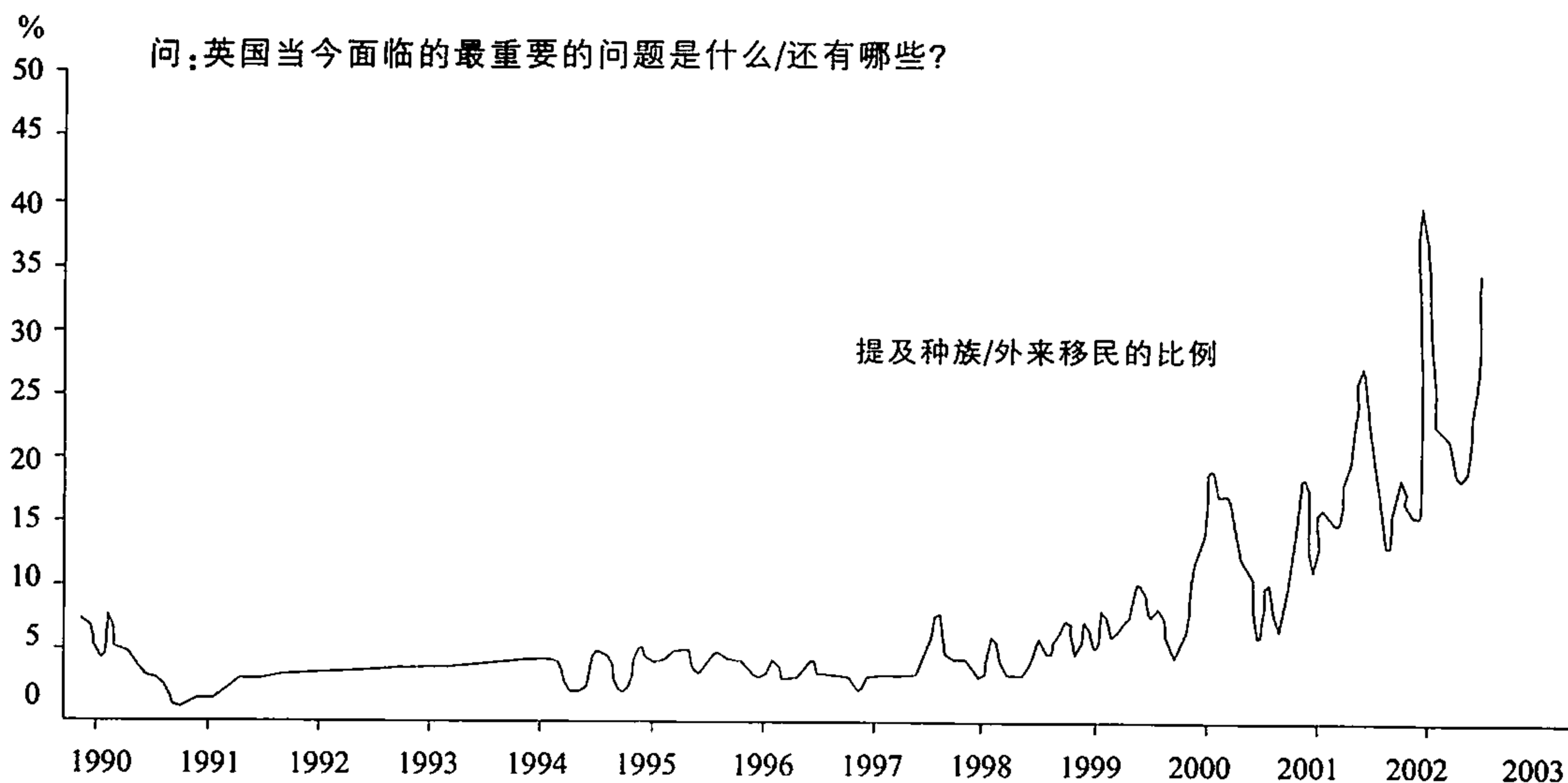


图 13.1 对于种族和外来移民的公共关注呈上升趋势(基于大约两千名英国成年人)
资料来源: MORI(2003年2月10日)

话题。由于能够作为移民进入英国的机会被削减,寻求避难的人数大大上升。有关“冒牌”^①的寻求庇护者“大量涌入”英国的种种报道,特别是那些耸人听闻的通俗小报上的描述,帮助创造出一幅被歪曲的移民与避难图景。调查发现,尽管英国仅仅容留了全世界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中的 1.98%,但公众所估计的数字却要比这高十倍,平均下来,相信英国容留了全世界将近四分之一(23%)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MORI,2002年6月17日)。调查还发现,被访者普遍高估了在英国寻求庇护的人所接受的财政援助,估计每一位寻求庇护者每周都能拿到 113 英镑来维持生计。但事实上,在 2000 年进行调查时,每一位寻求庇护的成年人每周只能拿到 36.54 英镑(当时还只是代金券),并且在指定的商店消费(MORI,2000年10月23日)。

新工党自 1997 年选举上台以来,已经引入了三项有关移民和庇护的新立法。1998 年的《移民与庇护法》(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收紧了用来确定寻求庇护者是否被允许留在境内的标准,并试图提高庇护审查过程的

效率。2002 年的《国籍、移民与庇护法》(Nationality, Immigration and Asylum Act)基于政府的白皮书《确保边境线、安定庇护所、融入多样性》(Secure Borders, Safe Haven: Integration with Diversity,2002),对申请英国公民资格的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对于英国生活的基本了解、公民礼仪和宣誓效忠。该法还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住所,即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膳宿中心。但这项措施受到了难民群体的广泛批评。法案还废止了代金券制度,它使寻求庇护者只能拿到代金券而不是现金,广受指责,认为是对难民的污名化。

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讨论了污名化的概念。

进一步的一项立法,即 2004 年的《庇护与移民法》(Asylum and Immigration Act),加剧了庇护申请的难度,同时也力图提高该系统的效率,对于那些参与人口贩卖的人设立新的刑罚。在 2005 年的大选竞选中,移民控制成为一项重要的话题。

① 此处原文为“bogus”,有“免费”、“非配额”之意。

大卫·古德哈特：要族群多样性还是要福利国家？

《前景》(Prospect)杂志的编辑大卫·古德哈特2004年2月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文章指出，一方面是一个族群多样化的社会，另一方面是一个社会拥有公民之间的团结，使它能够在建立一套体面的福利制度，保护有需求的人，这两方面之间存在某种平衡。在古德哈特看来，民众是愿意纳税的，比如为了养老金或失业补贴，前提是他们得相信，他们正在纳税帮助那些在某种角度上与他们类似的人，这些人至少享有相同的价值和预设。古德哈特称这种平衡为“进步的两难”，这是那些想要多样的社会和团结的社会兼得的人都要面对的。

作为这种平衡的证据，古德哈特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例，比如瑞典和丹麦，纵观历史，它们拥有全世界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体制。但他认为，之所以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建立大规模的福利体制，是因为它们在社会和族群的角度上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因此人们乐于缴付重税。与此相反，在美国这样的更具族群分割性的国家，福利国家体制就要脆弱得多。

古德哈特问道，在英国属于某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少于十分之一)与美国的这一比例(将近三分之一)之间，是否存在某个“引爆点”^①，会创造出某种完全不同的美国式社会，即族群分割明显，福利国家脆弱？他认为，要想避免这一引爆点，让对于新来者的团结感不至于衰竭，关键在于，对于允许进入国家的人数得有限制，庇护和移民的审核程序被认为透明有序(Goodhart 2004)。

古德哈特的命题招来猛烈抨击。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认为，移民的整合终究是会实

现的，大致来说，移民今天要被接受，面临着与过去几百年同样的困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所有社会都曾经长期吸收众多——即使不是全部——大规模的外来移民群体。过去的经验表明，从“他们”转变为“我们”，往往只需花一两代人的时间。这样的共同体是能够体验到古德哈特分析中的那种团结的(Sassen 2004)。

政治理论家巴哈库·帕雷库也抨击了古德哈特的命题。他提出的观点之一是认为，古德哈特错误理解了团结与福利国家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古德哈特相信，团结是再分配的必要前提。但帕雷库认为，这话半对半错。如果说再分配产生忠诚、创造共同生活体验等等，从而为团结铺路，也同样站得住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古德哈特在其文章中所认为的要复杂(Parekh 2004)。

另一位是政治理论家伯纳德·克里克，曾经担任前内务大臣大卫·布伦基特的顾问。他质问古德哈特：“谁之团结？”克里克指出，古德哈特讨论的是英国的团结，可是如果他说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不列颠)，可能会提醒他注意到，我们早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国家。双重认同这种东西，我们许多人都习惯生活在其中了。而在今天，做一个英国人，同时做一个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或英格兰人，这种双重地位是被完全接受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团结还是丧失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认同在于做不只一个群体的成员：英国性可以接受的多样性，要高于古德哈特所认识到的程度(Crick 2004)。

^① 此处原文为“tipping point”，指小事件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因难以承受而终于爆发。

13.4.2 族群多样性

少数族群现在占到了英国总人口的几乎8% (HMSO 2004)。我们已经看到,移民是形成国家的族群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有必要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移民也是造成少数族群人口比例下降的原因。无论是哪一个少数族群,其子女现在出生在英国的可能性都要比年长成员大得多。这标志着从“移民人口”到拥有完整公民资格权利的非白人英国人口的重要转变。

1991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要求被访者自行划分自己的族群归属。在此之前,关于人口的族群构成的数据都是根据“户主”的出生地信息来确定的。然而,随着少数族群人口在英国出生的比例不断提高,这种确定方法绝对是不充分的。区分族群成员身份的“自我归类”法已经成为大多数官方调查和研究的标准。劳

动力调查 (Labour Force Survey, LFS) 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各项研究中所使用的族群分类方法并不总是相互对应的,因而,比较各项研究的资料就变得比较困难 (Mason 1995)。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属于最大的一些少数族群的人口数可见于图13.2。和通常的情况一样,要对官方统计数字的准确性持谨慎态度。例如,比起调查中列出的“选项”或类别,被访者对其族群的理解要复杂得多 (Moore 1995)。特别是具有混合族群背景的个人,情况更是如此。

200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英国的少数族群人口现在已经超过460万,主要集中在英格兰人口极为稠密的都市区域(参看图13.3)。超过75%的少数族群生活在大伦敦区 (Greater London), 中西区 (the West Midlands), 约克郡与亨伯区 (Yorkshire and Humbershire), 西北与默西塞德区 (the North-West and Merseyside)。^① (Strategy Unit 2003) 而在伦敦,全部

单位: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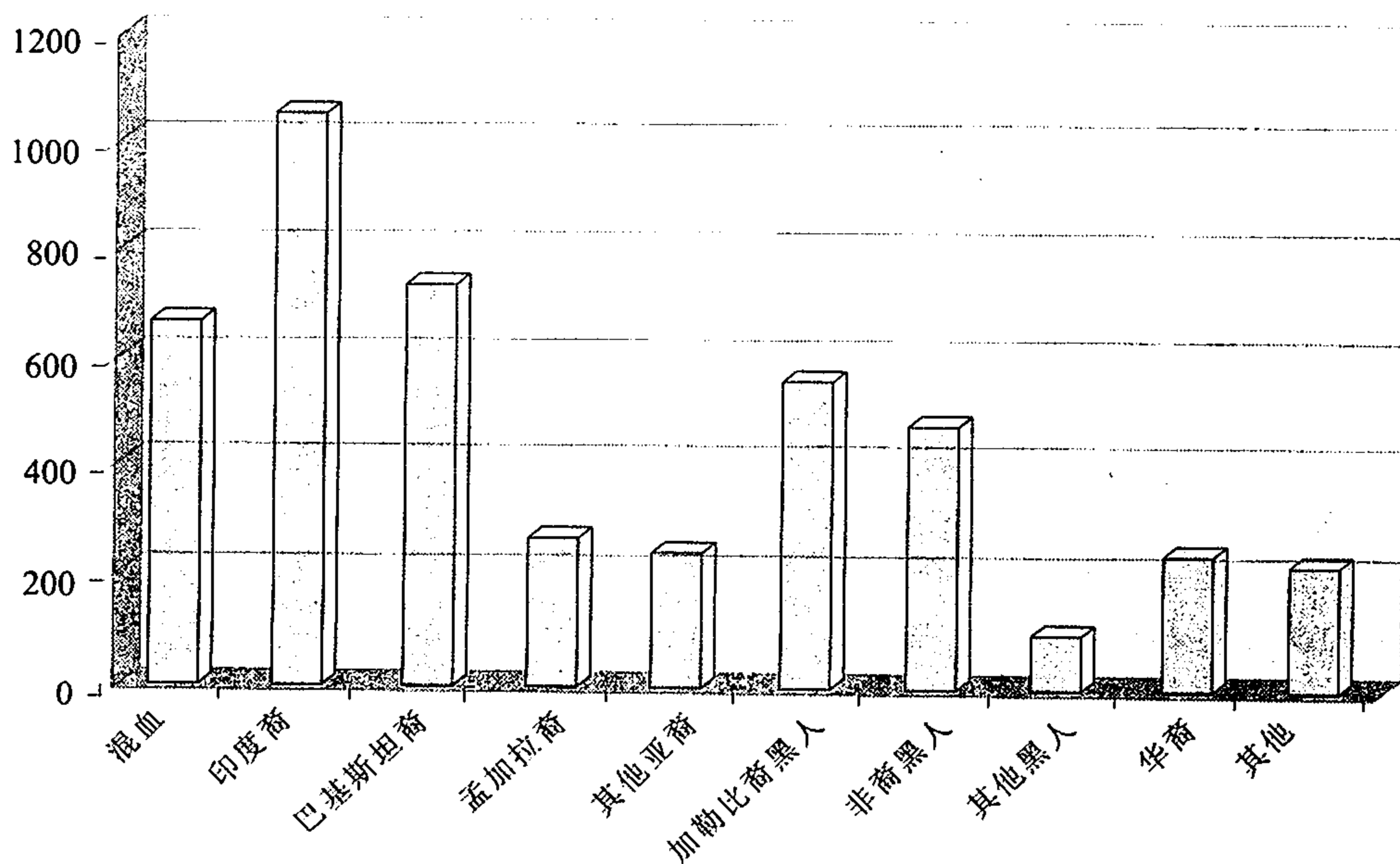


图 13.2 英国各非白人族群,2001年
资料来源:Census 2001;ONS (2003a)

① 这里指的是包含数郡的大区,不要与同名郡县相混。这几个区涵盖了英国的伦敦、伯明翰、利兹、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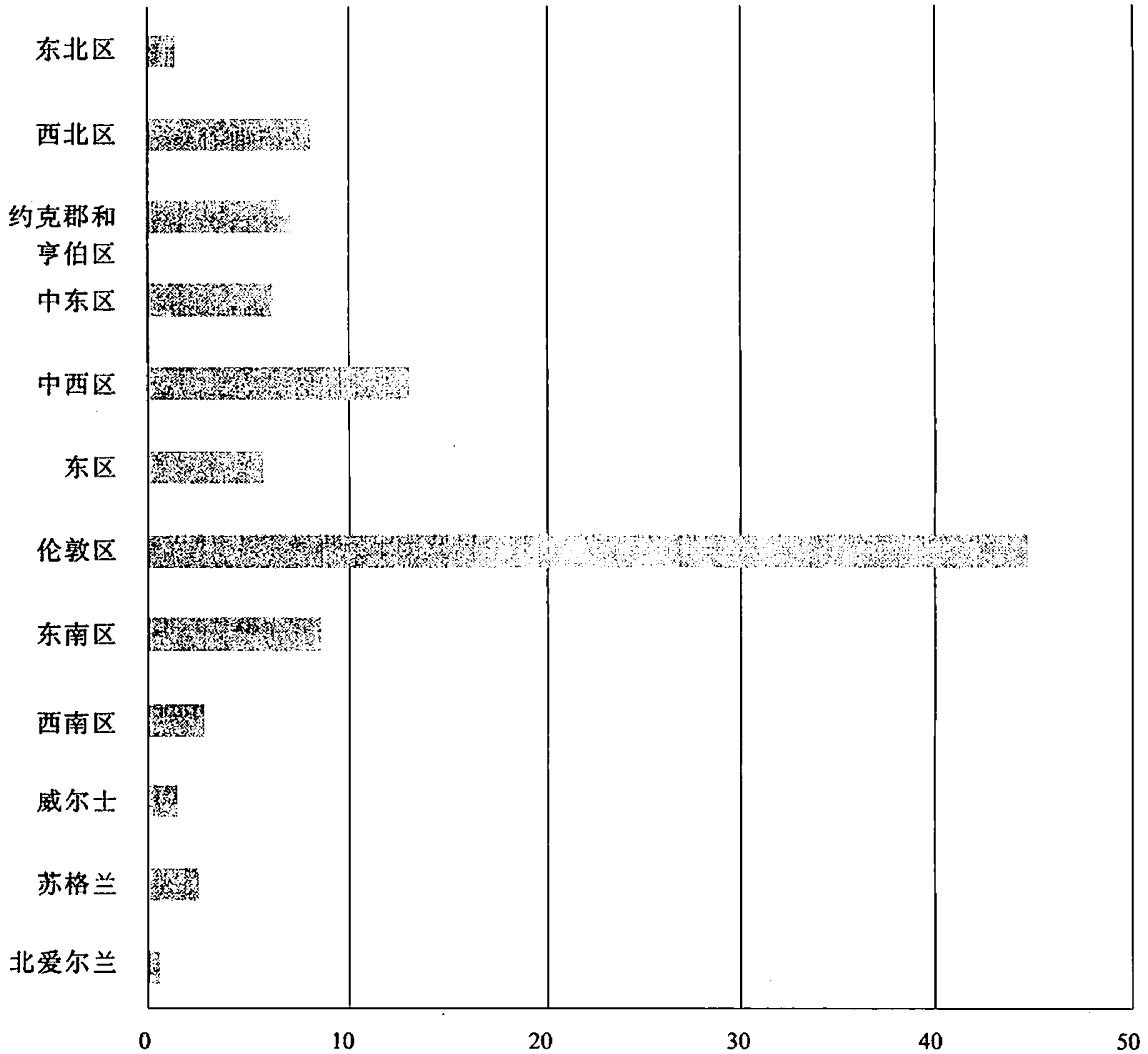


图 13.3 英国非白人人口的地区分布,2001 年 4 月 (%)
资料来源:ONS (2002b)

居民中的 29%是非白人。与此相反,英格兰东北和英格兰西南两个大区多为乡村,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不到 2%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2b)。少数民族的许多成员并不是自愿选择住在内城的,他们之所以迁入内城,是因为这类地区是白人最不喜欢的。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郊区化的进程,白人搬走了,留下了大批空置房产。

有关郊区化,详参第二十一章第二节第四小节。

2001 年的人口普查还显示,在英国,来自非白人族群的人口的年龄结构要比白人人口更为年轻。而最年轻的就是“混血”群体,有一半人不到 16 岁。“孟加拉裔”、“其他黑人”^①和“巴基斯坦裔”的年龄结构也很年轻,这些群体中年龄在 16 岁及以下的比例都超过了三

① 除了非裔黑人和加勒比裔黑人之外的黑人。

分之一 (ONS 2003a)。而就性别而言,大多数少数族群的性别构成都比从前更为平衡。以前的大批移民,特别是来自新英联邦成员国的移民,都是男性。后来的政策有利于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这一转变有助于平衡许多少数族群中的男女比例。

以上关于英国族群多样性的描绘,只能视作非常泛泛地标示了人口内部极为复杂多样的模式。社会学家和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越来越强调,需要把焦点放在英国各少数族群之间的差异上,而不是笼统地讲少数族群的经历。我们在接下来关于种族和不平等一节中将要看到,统而言之,在英国,与白人相比,黑人和亚裔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细而观之,就会发现少数族群之间的极大不同。

13.4.3 少数族群与劳力市场

要监测由于性别、年龄、阶级和族群性等

因素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劣势,就业是一块关键领域。研究少数族群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从职业分布、薪酬水平、雇用和晋升过程中受到的歧视以及失业率等方面,揭示了他们所处的劣势的模式。在本节,我们将考察其中一部分主题。

一 1960 年以来职业模式的趋势

关于英国的少数族群,最早的全国调查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政策研究所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PSI) 开展的,发现绝大多数的近期移民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产业的体力劳动职业上。甚至那些在祖国有资格证书的新移民,也往往从事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工作。基于族群背景的歧视是一种普遍存在而且不加掩饰的行为。一些雇主拒绝雇用非白人工人,或者只有在适合的白人工人短缺时才同意雇用他们。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就业模式略有变



英国的少数族群人口有相当大一部分不足 16 岁。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少数民族与“新经济”

许多观察者认为,由于少数民族的工人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和工业,所以工业经济的衰退对于这部分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工人的失业率更高,反映的是经济重构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类工人技术能力低,更容易受到打击。英国经济从以工业为本转到以技术和服务业(即所谓“新经济”)为驱动力,这对少数民族的工人是不利的,因为他们对于将这场转变调整为新职业的素质准备远不如其他群体。

然而,根据政策研究所等调查的结果,以及对劳动力调查和人口普查统计数字的比较(Iganski and Payne 1999),这种传统的观点已经受到质疑。这些研究表明,某些非白人群体通过与成功的白人工人差不多的方式,在近几十年间其实已经取得了高水平的经济和职业成功。他们认为,经济重构的过程实际上有助于缩小少数民族和白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距。这是因为,经济领域内的大规模转型往往会把少数民族和白人都卷入其中。

化。1974年政策研究所的第二份报告表明,虽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开始受雇于熟练技能型的体力劳动岗位,但大部分人继续占据半熟练技能型或非熟练技能型的体力劳动岗位。只有寥寥几个少数民族出现在专业性和管理性的岗位。研究发现,无论如何改变禁止雇佣中的种族歧视的立法,白人应聘者相比于具有同样资格的非白人应聘者,总能获得更多的面试和工作机会。

1982年,在政策研究所组织的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调查中发现,由于整体经济衰退的影响,特别是它对制造业的显著影响,除了亚非混血儿和印度裔男性,其他少数民族的失业率高达白人的两倍。但是,英语流利、有资格证

保罗·伊甘斯基和杰夫·佩恩利用30年来的劳动力调查和人口普查(1971年、1981年和1991年)数据,发现整体而言,与工业劳动力的其他部分相比,少数民族遭受的就业损失要更低。从1971年至1991年,非白人丧失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占1971年经济活动人口的12%,而在全部劳动力中这个数字是14.4%。伊甘斯基和佩恩注意到,在这一总体趋势中也存在着重大差别,例如男女之间,以及不同工业部门之间。但总的来说,他们发现,向“新经济”的转移往往同样席卷非白人和白人,从而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根据伊甘斯基和佩恩的看法,英国现在有一群人数可观的非白人,其职业结构变迁的方式与占人口多数的白人人口难以区别。

伊甘斯基和佩恩谨慎地指出(Iganski and Payne 1999),某些少数民族获得的可观收益不应被误解为是职业劣势的终结。相反,他们认为,这种“集体性的社会流动”表明,后工业重构的力量要强于种族歧视和长期劣势的力量。

书的非白人正逐渐进入白领岗位,而且总体来说,少数民族和白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印度裔和亚非混血儿,采取自我雇佣的形式,提高了收入,降低了失业率。

二 最近的发现

晚近关于英国的少数民族的一批调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地显示出不同族群在就业方面的不同演变轨迹。比如说,政府的战略资源室^①发现,平均而论,印度裔和华裔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比白人更优异。然而,其他群体的表现就不是那么好了:平均而论,巴

^① “Strategy Unit”:为英国贸工部下属单位,主管经济统计数据等项事务。

基斯坦裔、孟加拉裔和加勒比裔黑人比起白人，所遭受的失业和低薪要多得多 (Strategy Unit 2003)。

政策研究所的第四次调查报告于 1997 年发布, 不仅注意到不同少数族群之间的就业统计数据差异, 而且发现, 在非白人的女性中, 就业模式的差异也很大。与白人女性相比, 加勒比裔女性从事体力劳动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而印度裔女性, 像巴基斯坦裔女性一样, 往往会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加勒比裔女性和印度裔女性从事经济活动的水平更高, 而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较不活跃。虽然在印度裔女性中, 收入较高者和较低者的两极分化严重, 但平均来说, 加勒比裔女性和印度裔女性的全职收入比白人女性还稍高一些 (Modood et al. 1997)。从图 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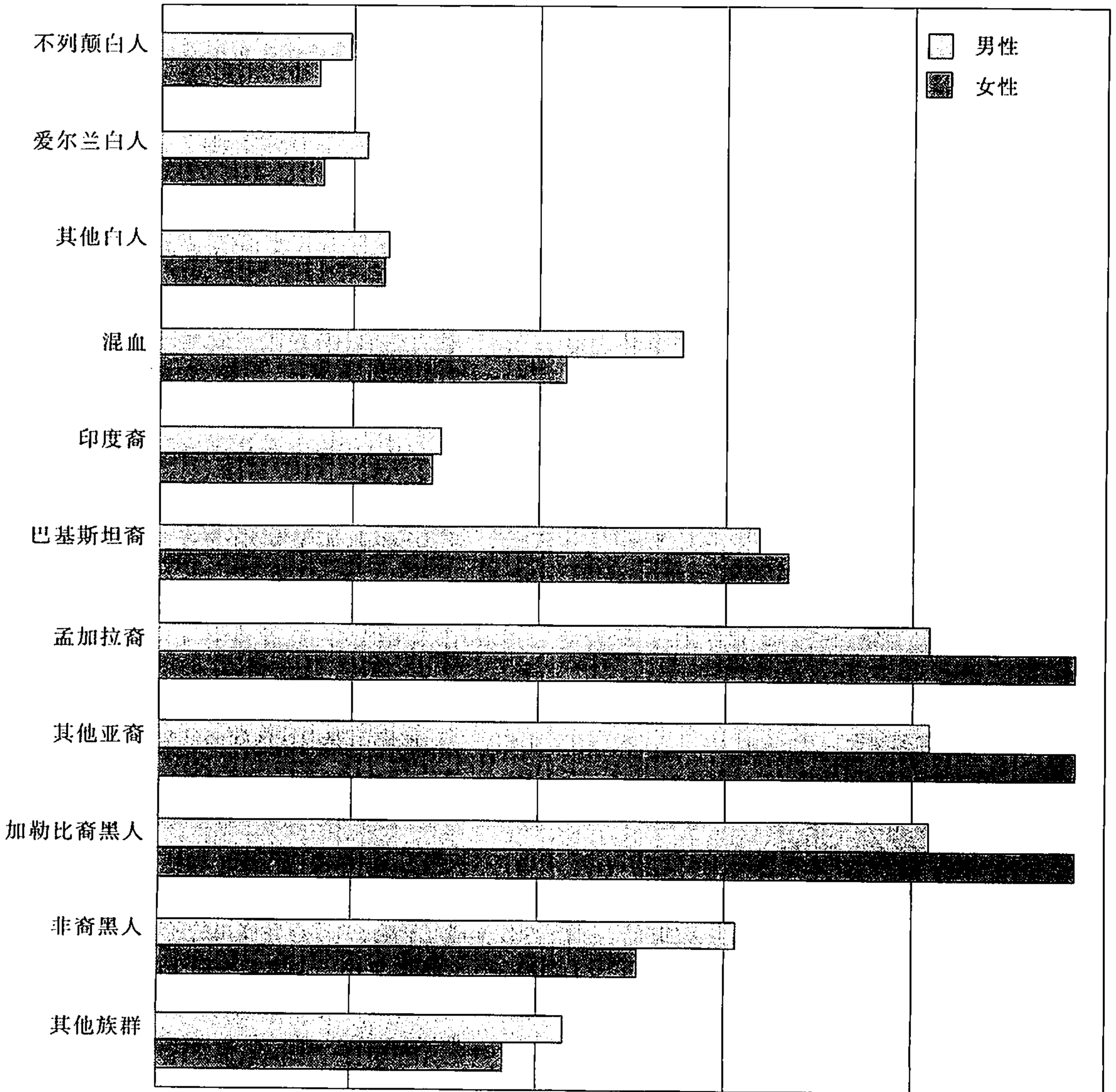


图 13.4 英国的失业率, 以族群和性别分组, 2001—2002 统计年度
资料来源: ONS (2002b), 页 12

社会资本与少数族群就业

晚近的一种思考群体与更大社群之间关联方式的思路,是从社会资本的概念发展而来的。

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详参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大致来说,社会资本的指标试图测量个体与其所在社群之间关联的密切程度,更广泛的是与其所在社会之间关联的密切程度。社会资本的测度分为两类,一是“外向联结式”的(bridging),一是“内向粘合式”的(bonding)。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在于将某一给定社会群体的成员与更大的社会相关联的网络;而内向粘合式社会资本是将社会群体的成员彼此关联(Putnam 2000)。

要想理解少数族群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遭际,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与内向粘合式社会资本之间的区分可能颇为重要。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可能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传媒之类的就业领域,因为这样的领域主要是通过口头推荐来招募人员的。如果一个少数族群成员处于社会孤立地位,几乎从定义上就可以说,缺乏这种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因此缺乏获得某些

就业机会的渠道。而缺乏这些外向联结式社会网络,将很有可能限制与白人雇主共事的机会。

另一方面,在地理上聚居的少数族群,比如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会发展出比较高水平的内向粘合式社会资本。这可以为成功的地方经济奠定基础,并有可能由此导致群体性的经济成功。这些少数群体的成员可以就此赢得同族群雇主的机会,而从白人雇主那里是难以得到的。在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当中,自主创业的比例相对较高。因此,内向粘合式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的匮乏。

不管怎么说,一方面是社会孤立和地理聚居,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两方面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总是很明确的。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的缺乏或许有助于说明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所处的普遍劣势。然而,事实上,加勒比裔黑人中也普遍存在这种劣势,而他们或许是所有可见的少数族群中与社会整合程度最高的(比如,他们与白人的相互通婚率即可标示),这又如何说明,却不很清楚。这种观点也很难说明华裔在经济上的相对成功。

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族群背景之间,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差别有多么大。

如果以收入水平为衡量标准,最成功的非白人是那些自我雇用或充当小雇主的南亚裔人。在过去20年里,属于这一类别的人数比例稳步增长。印度裔男性和女性自我雇用的可能性现在是白人的两倍多。研究表明,少数族群在自我雇用这一类中之所以人数特别多,原因之一就是拿薪资的就业者中的受歧视现象(Clark and Drinkwater 1998)。亚裔开设的街头小店,以及亚裔经营的其他形式的生意,已

经成为英国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有人提出,它们能够引导内城区的经济复苏。穆多德认为,勤奋工作,社群和家庭的支持,以及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明“印度裔的经济成功”(Modood 1991)。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南亚裔的小生意的繁荣及其潜在影响。许多自我雇用的亚裔为了获得相对较低的总收入,要工作很长的时间,长达每周60到80个小时。他们以自我雇用的身份注册,但实际上,他们是受雇于掌管生意的其他家族成员,而且他们连雇员们通常

可以享受的福利待遇也得不到,例如病假工资、带薪假期、雇主支付的国民保险。^①

职业结构中的提高并不总是伴随着在权力顶层中代表人数的增加。事实上,与以前的情况相比,有更多的少数族群走上了白领专业岗位,尽管如此,似乎总有一个“玻璃封顶”,只允许少数族群中的少数人晋升到大公司和组织的顶层位置。一般来说,在以权力、地位和收入衡量的最好的10%工作岗位中,少数族群男性,即使是素质相当强的人,人数也只有白人男性的一半 (Modood et al. 1997)。

13.4.4 住房

在住房市场上,英国的少数族群往往经受了歧视、骚扰和物质剥夺。自从要求控制移民开始,住房就已经成为族群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焦点,也是族群封闭趋势的前沿。理由之一,

住房是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东西,它标示出地位,提供安全感,并与总体生活状况紧密关联。与就业模式一样,在住房的质量和类型上的差距方面,各个族群之间也有差异。虽然,总的来说,非白人在住房上相比白人处于劣势,但这远不能一概而论。某些群体,如印度裔群体,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很高,而其他群体则大多数挤在法定标准之下的住处或公屋 (Ratcliffe 1999)。

造成非白人和白人之间以及非白人群体内部在住房方面差异的因素有很多。种族骚扰或暴力攻击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还频繁发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族群隔离式的住房模式。非白人家庭即使有能力进入更加富裕的以白人为主的住区,也可能因为族群敌意而打退堂鼓。另一个因素与住房的物质状况相关。总体而言,少数族群的住房往往比白人的住房更显破损。相当多的巴基斯坦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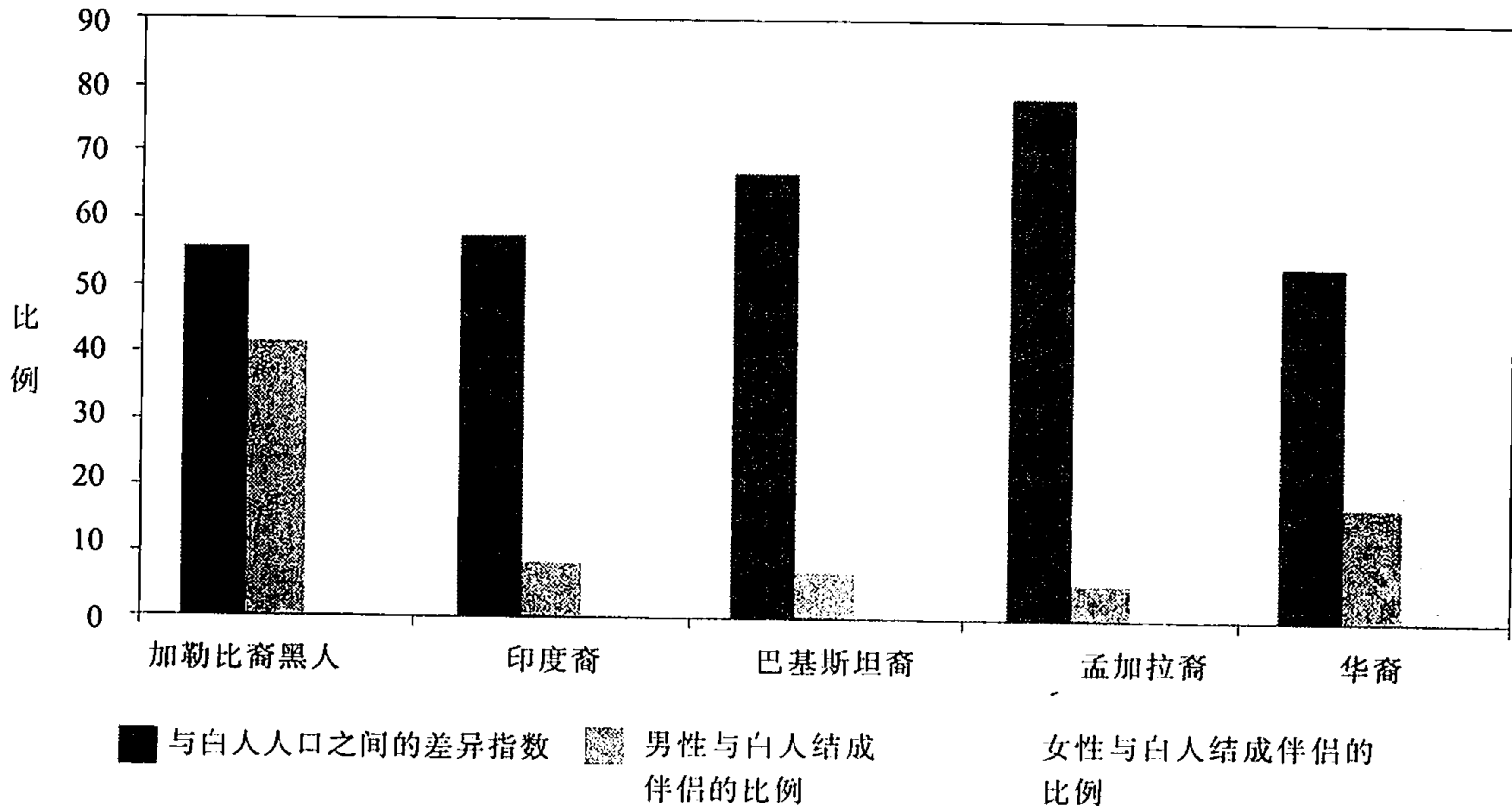


图 13.5 英国的社会隔离与地理隔离

^① “national insurance”: 英国的国民保险制度,以未到退休年龄的雇员和雇主每周缴纳的钱支付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及提供医疗保险。



伦敦举办诺丁山狂欢节的这片区域,是大批加勒比裔移民初到英国时的暂居之地。但诺丁山房价不断攀升,意味着许多非洲及加勒比裔现在要迁出该区域。

和孟加拉裔生活在拥挤不堪的住处内(由于他们一般都是大家庭);他们的房屋也更容易受潮,更可能缺乏集中供暖。^①

与此相反,印度裔住在独立或半独立的房子内的可能性与白人相当,而住在内城居民区的可能性又要比其他族群小。另一方面,加勒比裔黑人的家庭更可能租住公共住宅区的公寓,而不是成为自购房屋主。这可能与该族群内部单亲家庭的比例很高有关。

怎样理解住房方面的族群差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由于住房市场中的竞争过程,少数族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住房阶级”(Rex and Moore 1967)。在这一思路看来,少数族群面临着从经济劣势到种族歧视的诸多挑战。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机会对他们的住房地位进行控制。说到底,少数族群是被迫地应付住房不足的局面,因为他们在

这类事情上选择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过,虽然存在着许多约束性的情形,使少数族群在住房市场上处于劣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歧视性力量或种族主义力量的被动受害者。通过社会行动者的选择,这些模式和做法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歧视也能成为创造性活动的动力。

13.4.5 刑事司法系统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少数族群成员无论是作为罪犯还是作为受害者,都比以往更多。相较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分布,少数族群入狱的比例尤高。2002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男性囚犯中有16%来自少数族群(HMSO 2004)。

有理由相信,少数族群成员一旦进入刑事

^① 英国气候温凉多雨,因此防潮和供暖非常重要。

司法系统,就会受到歧视性对待。即使在很少或者没有前科的情况下,非白人被判处监禁的比例也更高。少数民族一旦被捕后,也更可能遭到歧视或种族攻击。一些学者指出,刑事司法系统的监督管理完全是由白人控制的。执业律师中黑人的比例很少,并且黑人只占警察总数的不到 2% (Denney 1998)。

非白人群体都容易遭受某种种族歧视,包括种族主义动机的攻击。虽然多数人逃此厄运,但对少部分人而言,这种经验是痛苦并且残酷的。据估计,针对少数民族的所有犯罪中有 12%带有种族主义动机(相比之下,针对白人的所有犯罪中只有 2%带有种族主义动机)(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2b)。根据英国犯罪调查(British Crime Survey),英格兰和威尔士带有种族主义动机的犯罪的估计发案数,从 1995 年的 39 万宗下降为 1999 年的 28 万宗。针对黑人、印度裔、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的种族主义动机罪案数也有下降,从 1995 年的 14.5 万宗下降到 1999 年的 9.8 万宗(同上引)。

英国犯罪调查还发现,对于种族主义动机的事件的情感反应,比起对于非种族主义动机的事件的情感反应,普遍要严重一些。1999 年,种族主义动机罪案的受害者中有 42%自诉受到事件的“严重影响”,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罪案的受害者中这一比例只有 19%。黑人受害者最有可能报告受到“严重影响”,占 55%,相比而言,亚裔和白人受害者的这一比例均为 41%(同上引)。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犯罪模式和受害模式?我们在第十九章(“犯罪与越轨”)中将会看到,犯罪在人口中的分布并不均衡。犯罪与受害的模式带有鲜明的空间元素。那些遭受物质剥夺的地区通常犯罪率更高,居住在那里的人会更危险落为犯罪受害者。

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所遭受的剥夺,既是造成内城区环境衰败的原因,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亦参第二十一章)。在这些地区,种族、

失业和犯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年轻男性往往成为问题的焦点。通过政治或传媒制造的对于犯罪的“道德恐慌”,形成了种族与犯罪之间众所周知的关联。

第十九章第二节第二小节讨论了“道德恐慌”的观念。

然而,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人,尤其是年轻男性,以其亲身经验感受到,在与白人接触时,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不幸的是,在与警察接触时,自己才是“野蛮剥削的目标”。

警方种族主义

社会学研究对于揭示警官中的种族主义态度是有帮助的。罗杰尔·格雷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做的一项关于警方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警方“对所有的少数群体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他注意到,警官在谈论少数民族时,会频繁使用刻板印象和种族诋毁 (Roger Graef 1989)。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几起引起广泛瞩目的事件,以任何研究都无法使用的方式,唤起了对警方种族主义的警觉。1993 年发生的劳伦斯命案(参看本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图文框),极大地改变了英国对于种族主义的争论,证明种族主义并非只限于某些个人,它可以蔓延到整个体制。

1999 年关于劳伦斯命案的《麦克弗森报告》发表后,时任内政大臣的杰克·斯特劳要求警方全力以赴,担当“多元文化社会的捍卫者”。报告发表后的一年内,提出的 70 条建议中已经有许多得到实施,尽管也有批评者指出,变化还不够快。在报告发表的第一年里,超过三分之一的警队并没有加雇任何黑人或亚裔警官。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43 个警队中,有 9 个警队的少数民族警官人数反而下降。在执法界的某些部门中,也有“反麦克弗森的强烈反弹”的迹象。他们认为,针对警察队伍的该

份报告有欠公允 (Fitzgerald 2001)。

透过类似劳伦斯命案之类的事件,再看到研究确认,对于警方的敌视是少数族群中的常见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 (Keith 1993)。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不过是他们亲身经历所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年轻黑人的态度,正是由于他们所遭遇到的警方应对策略造成的。政策研究所的第四次调查 (本章第四节第三小节讨论过) 发现,在此前一年遭受过种族性质的攻击的被访者中,只有四分之一选择报案。而那些求诸警方的报案者中,又有一半对自己所受到的待遇不满意。许多人觉得,警方的反应表明,他们没有真正的兴趣去了解或调查事件 (Modood et al. 1997)。

少数族群特别需要得到警方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保护,因为他们比白人更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者。但是,有迹象表明,执法的警察部门似乎有一种瞄准非白人的种族性特点。比如说,所谓的“拦截与搜查”政策往往不成比例地针对非白人。在 1999 年《麦克弗森报告》发布之后,针对少数族群的“拦截与搜查”程序数量下降,但随着各警队对恐怖主义风险更加敏感,数量又趋于上升。警方可以使用 2000 年的《反恐法》(Terrorism Act) 赋予他们的新的权力。这就导致了英籍亚裔人士,其中有些是穆斯林,遭到拦截与搜查的数量上升。

在伦敦,最近一项报告发现,遭到拦截与搜查的机会,黑人比白人高 6 倍,而亚裔比白人高 5 倍 (Metropolitan Police 2004)。

本书其他地方还有讨论英国的少数族群生活的其他有关方面。第五章第四节第四小节讨论了族群与老年化的关系;第八章第三节第三小节讨论了族群与健康的关系;第十七章第四节第二小节讨论了族群与教育的关系。

第五节 欧陆的外来移民与族群关系

在 20 世纪,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像英国一样,经历了由移民带来的深刻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头 20 年里,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地中海国家向北部和西部国家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来自土耳其、北非、希腊、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等地区的移民们,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得到那些严重缺乏劳力的迁入国的积极鼓励。瑞士、德国、比利时和瑞典都拥有数目可观的移民劳工。同时,那些昔日的殖民强国也接受了从各自的前殖民地涌来的大量移民,这主要是法国 (来自阿尔及利亚)、荷兰 (来自印度尼西亚) 以及英国。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随着战后的繁荣转为萧条,迁入西欧国家以及在西欧范围内的劳工迁移速度显著减缓。但在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和前苏联剧变之后,欧洲目睹了所谓新移民的诞生。这种“新移民”现象以两个重大事件为标志:首先,从 1989 年到 1994 年,东西之间边境的开放为欧洲带来了大约 500 万移民;第二,前南斯拉夫战争和族群冲突导致大约 500 万难民涌入欧洲其他地区 (Koser and Lutz 1998)。随着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欧洲迁移的地理模式也改变了。南欧和中欧的许多国家也已成为许多移民的迁入国,这与以往的移民潮流明显不同。

“新移民”的另一个特征是族群“离析”(unmixing)。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一些中欧国家,边界的变化、政权的更替或冲突的爆发导致了“族群亲和”(ethnic affinity) 原则下的移民。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苏联解体后,成千上万生活在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

兰等新独立国家的俄罗斯族人的处境。作为族群离析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选择迁回俄罗斯 (Brubaker 1998)。

迁移与欧盟

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许多以前妨碍商品、资本和雇员自由流动的障碍已经被消除了。这导致了欧洲国家内部地区迁移的显著增长。凡是欧盟国家,包括 2004 年 5 月加入欧盟的十个新成员国,大部分来自东欧,这些国家的公民现在都有权在其他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工作。具有高技能和高素质的专业人员加入寻求庇护者和经济移民的行列,它们是欧洲移民中最大的几个群体。随着这种转变,学者们也注意到,移民内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从非欧盟国家进入欧盟国家的移民已经成为欧洲许多国家政治议程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许多国家按照 1995 年生效的《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 的部分约定,废除了与邻国之间的内部边界。至今已有 15 个国家签署该协议,这意味着它们现在只监控它们的外部边界,允许从相邻成员国自由进入(参看图 13.6)。这样来重新构建欧洲的边境控制,对进入欧盟的非法移民和跨国界犯罪产生了重要影响。非法移民一旦有能力进入某一个《申根协议》国家,就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行于整个申根区域。

由于欧盟大多数国家现在都限制以家庭团聚为名义的合法移民,因此非法移民的情况逐渐增加。一些非法移民持学生签证或旅游签证合法进入欧盟后,逾期滞留。但是,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则采用跨境走私的办法。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

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估计,每年有 40 万人被走私进入欧盟。意大利的漫长海岸线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漏洞之一,吸引了来自附近的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非法移民。意大利自从加入《申根协议》以来,已经大大加紧了对其外部边界的控制。接受非法移民和庇护申请较多的德国,也开始与波兰及捷克共和国政府合作,强化对它们东部边境的控制。

与反移民情感相关联的种族主义已经在欧洲制造了一些颇具震撼力的事件。20 世纪 90 年代,在好几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和荷兰,都出现了极右翼政党的选情回潮的局势。而在英国,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的议员选举制度,即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胜出,阻碍了小党赢得下议院的议席。^①纵然如此,对于极右的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的支持达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它在地方议会已拥有一些席位。持反移民立场的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也在民意支持上取得飙升,在 200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 12 个席位。

话说回来,收紧对于“新移民”的控制并非毫无阻隔。对移民政策变化的非正式反应体现在非法贩卖和走私网络中。移民贸易已经成为欧洲增长最快的有组织犯罪之一。这类犯罪组织有能力跨境偷运毒品、武器和赃物,也同样能够通过多种手段走私非法移民。移民和走私者齐心协力,借鉴其他移民的知识和经验,以选择自己的活动方式。就此而言,政策限制似乎激起了新的抵抗形式(Koser and Lutz 1998)。

移民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甘冒风险,结局却常常是一场悲剧。比如说,2000 年 6

① 英国大选采取简单多数制,选民在全国 600 多个选区分别投票,每票只选一人,在各选区获得最多票数的候选人当选为该选区唯一的下院议员,而拥有最多议员的党派领袖将自动成为英国首相。这样形成的简单多数通吃其他票数的局面,小党很难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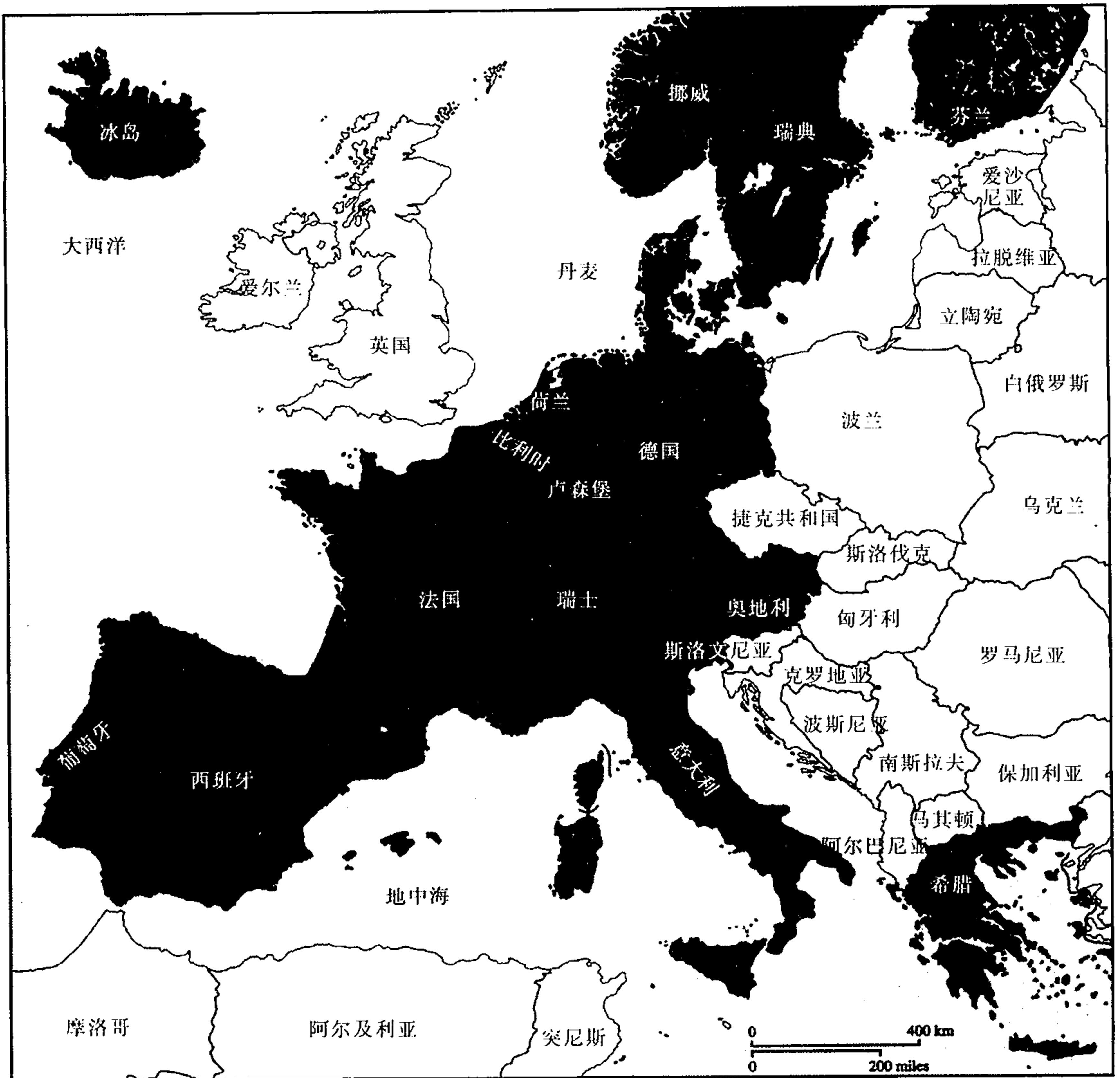


图 13.6 申根区域国家(深色标示)^①

月,在英国沿岸的多佛尔^②的一辆货车中,有58位中国人窒息而死。又如,2004年8月,至少有26人死在一艘拥挤不堪的黎巴嫩船上,当时它正试图停靠意大利南岸的西西里岛。由

于这种移民绝大多数属于非法,在试图进入西方世界^③的过程中死去的确切人数难测度。不过,最近有一项调查估计,每年为了逃离迫害或贫困而偷渡以致淹死在海中的移民多达

① 除了这些国家,截止2007年底,另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加入《申根协定》,申根区边界向中东欧、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东岸大大推进,对俄罗斯西侧渐呈包围之势。

② “Dover”:英国东南部港市,扼多佛尔海峡要冲。与法国加莱之间为整个英吉利海峡最窄之处。

③ 根据下文,这里不仅指相对于不属于申根区域的欧洲东部而言的欧洲西部申根区域,而且包括北美和澳洲的其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4000人。研究表明,每年大约有2000人在试图进入欧洲的过程中溺毙于地中海。而在非法越境进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过程中死去的人据信也有类似的数目,这是“船民”(boat people)^①的另外两个主要目的国。(Guardian, 2004年10月9日)

第六节 全球迁移

行文至此,我们一直在关注晚近进入欧洲的移民,但早在几个世纪之前,欧洲扩张主义就揭启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运动,当今世上的众多多族群社会,其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自从最初的这些全球移民浪潮以来,各人群始终保持着互动与融合,并由此从根本上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族群构成。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与全球迁移模式相关的概念。

13.6.1 迁移运动

虽然迁移不是一个新现象,但它作为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似乎在不断加快步伐。世界范围的迁移模式可以视为迅速变迁的国家间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一种反映。据估计,目前大约有1亿7千5百万人居住在自己出生国之外的某个国家,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02),并促使一些学者将这个时代称之为“移民时代”(Castles and Miller 1993)。

移入,即人口迁入一国定居的运动;移出,即人口离开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定居的过程。^②合在一起,产生了把输出国和输入国两者相结合的全球迁移模式。在许多社会里,迁移运动加强了族群和文化方面的多元性,因而有

助于增强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迁移的加剧已经使得外来移民成为许多国家中的一项重要政治议题。西方许多社会外来移民比例不断提高,挑战了普遍持有的国族认同的观念,并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公民权的概念。

为了描述1945年以来主要的全球人口运动,学者们已经分辨出四种迁移模式。移民的经典模式(classic model)适用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它们是作为“移民之国”发展起来的。在这类情况下,外来移民受到了相当的鼓励,承诺给予新来者公民权,尽管也有一些限制和配额来帮助约束移民的年度吸收量。法国和英国之类的国家实行的是移民的殖民模式(colonial model),往往更多地接纳来自前殖民地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入英国的移民中有大量来自英联邦国家,比如印度或牙买加,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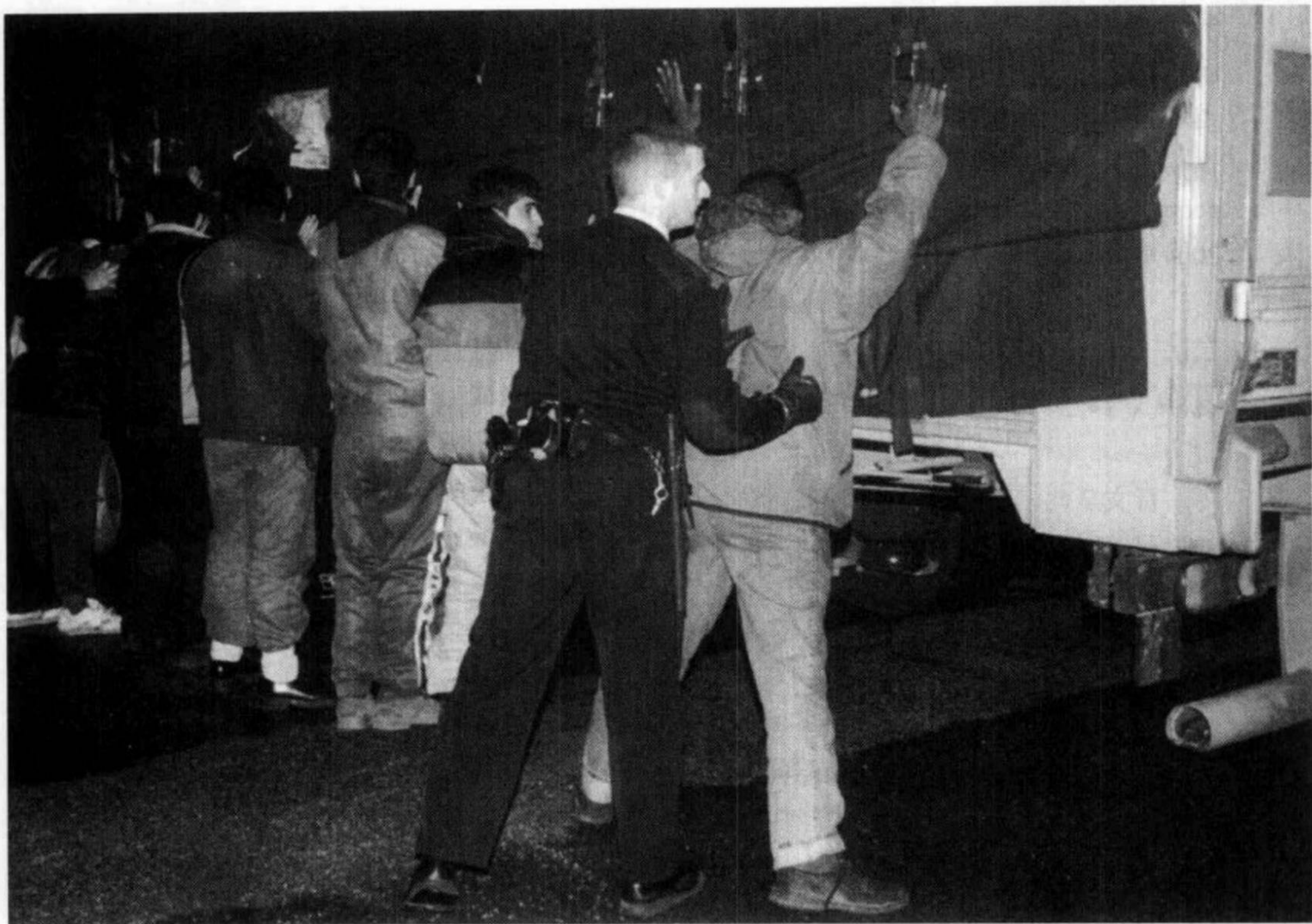
像德国、瑞士和比利时这类国家遵循的是第三条政策,即客居工人模式(guest workers model)。在这一体制下,外来移民被临时允许进入这个国家。这往往是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即便长时间定居,也不能获得公民权利。

最后,由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移民法规日益严格,非法形式(illegal forms)的移民越来越普遍。秘密地或假托“非移民”身份进入某个国家的移民,经常能够在官方社会之外非法地生存下来。这种例子有如美国南部许多州中大量存在的墨西哥“非法侨民”,以及日益增多的跨国界走私难民的国际贸易。

斯蒂芬·卡斯特斯和马克·米勒(Castles and Miller 1993)考察了最近全球迁移的趋势,分辨出四种趋势,认为今后若干年内的迁移模式将表现出这些特征:

① “boat people”:此词原指东南亚国家尤其越南乘船偷渡出国寻求庇护的难民,因此这里要打引号。

② 这两个词在全文中具体指人时,一般译为“外来移民”和“外迁移民”。



在英国,对于“冒牌寻求庇护者”的忧惧与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有关系,在“9·11”事件之后尤有甚之。照片上看到的是非法贩运进入英国的外来移民。

- 1 加速化 越界迁移的数量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 2 多样化 现在多数国家接受的移民都是多种类型的移民。相比之下,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特定形式的移民,如劳工移民或难民。
- 3 全球化 迁移变得更具全球性,更多的国家同时成为输入国和输出国(参见图 13.7 和图 13.8)。
- 4 女性化 移民中的女性越来越多,使得当代迁移的男性主导倾向比以往大为削弱。女性移民的增长与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包括家务劳工需求的增长、买春观光和“买卖”妇女的扩张(参阅第十二章第一节第四小节)以及“邮购新娘”(mail-order brides)的现象。

13.6.2 全球化与迁移

全球迁移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随着全球化而变化的?早期许多研究迁移的理论强调的是所谓的推拉因素。“推动因素”是指迫使人口外迁的输出国的动力,诸如战争、饥馑、政治压迫或人口压力。与此相反,“拉动因素”是那些吸引外来移民的输入国的特征,例如繁荣的劳动力市场、更好的整体生活状况,较低的人口密度,都可能把移民从其他地区“拉动过来”。

近来,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被批评为过于简单化地说明这个复杂多面的过程。研究迁移的学者越来越把全球迁移模式看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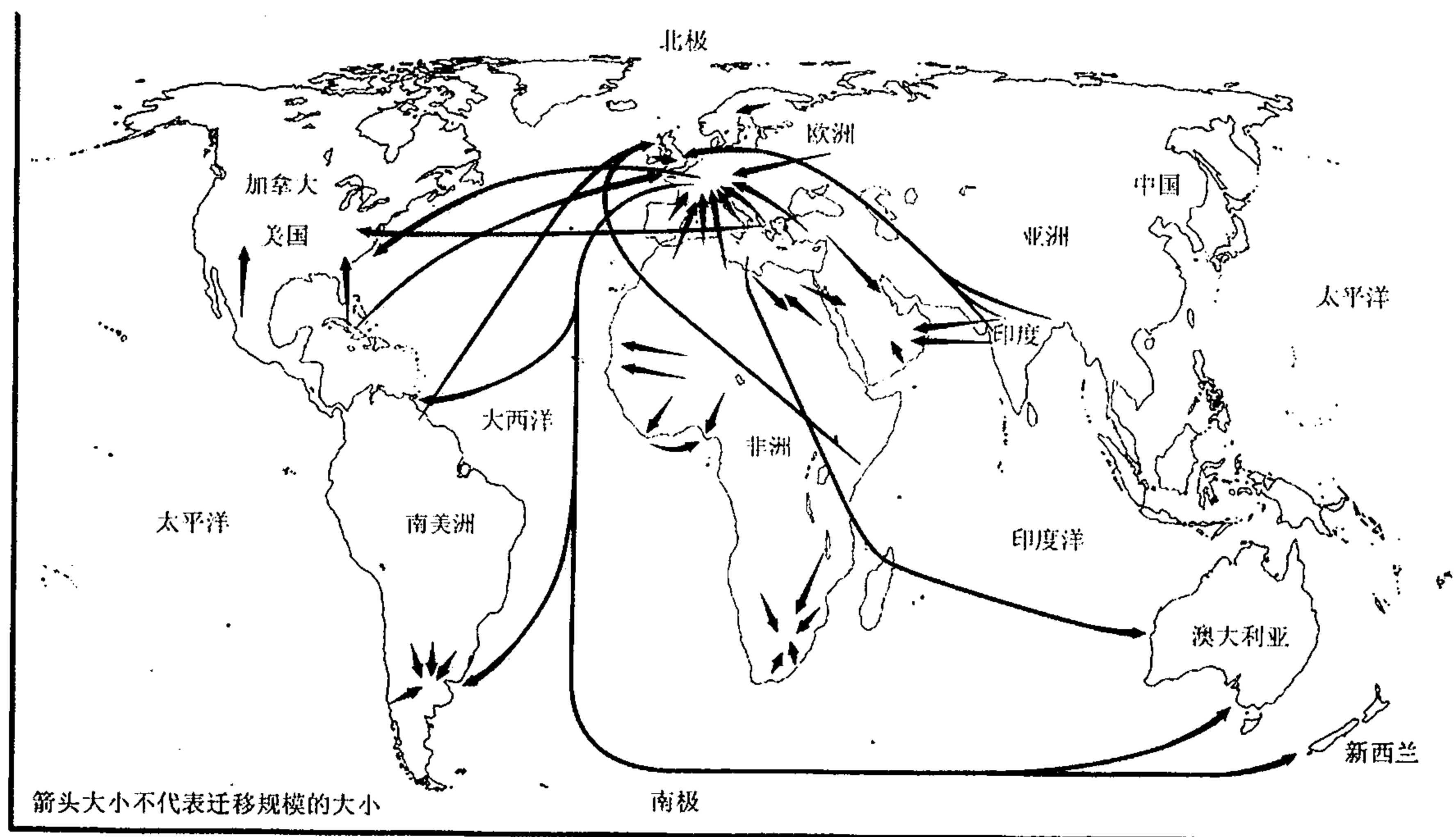


图 13.7 全球迁移, 1945—1973
资料来源: Castles (1993), 页 67

“系统”，是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虽然这个理念听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实际上却非常简单。宏观层面的因素指的是面上的重大问题，诸如某地的政治局势，控制移入和移出的法律规章，或者国际经济的变化；另一方面，微观层面的因素包括迁移人口自身所具有的资源、知识和处事能力。

在德国庞大的土耳其裔移民社群中，可以看到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的交叉。在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包括德国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欢迎外国“客居工人”的政策，以及土耳其经济状况不能让许多土耳其人得到理想报酬。而微观层面上的因素则包括在德国的土耳其裔社群中的非正式网络和互助渠道，以及与留在土耳其的亲朋好友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潜在的土耳其移民中，有关德国的知识和“社会资本”，即可资利用的人际资源或社群资源，使德国成为

最受推崇的目标国之一。支持移民系统论的人强调，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足以说明迁移过程。相反，每一项具体的迁移运动，比如土耳其和德国之间的迁移，都是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13.6.3 全球流散

理解全球迁移模式的另外一种方法是研究流散。这个词指的是一个族群的人口从祖国向外国的疏散。并且常常是在被迫的或受到创伤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常常以犹太人和非洲人的流散为例，描述这些人口是如何因为奴隶制和族群灭绝而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布。虽然从定义上说，流散的成员在地理上散居各地，但共享的历史，对祖国的集体记忆，或得到培育与维护的共同的族群认同等因素，仍把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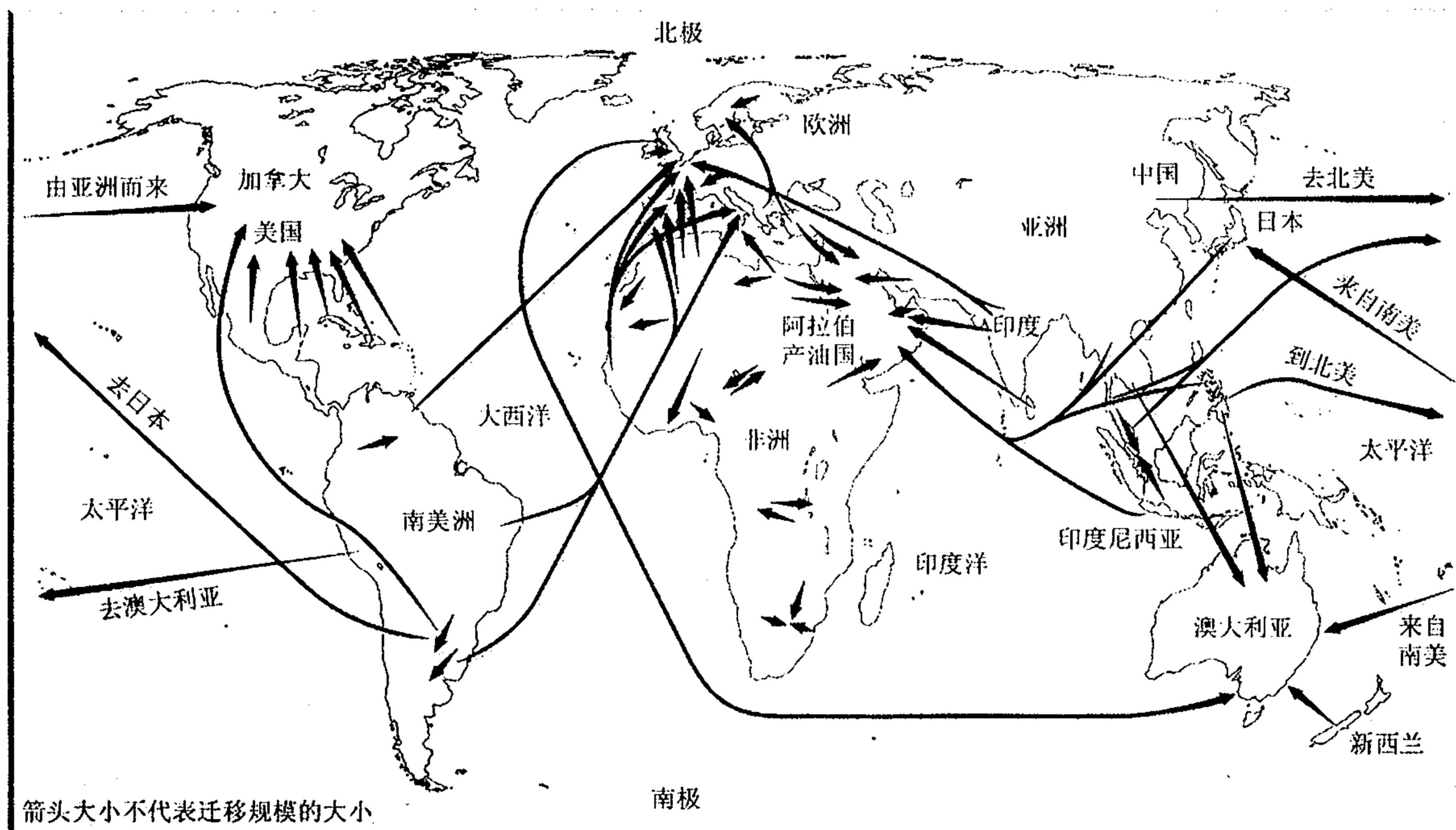


图 13.8 1973 年以来的全球迁移运动
资料来源:Castles and Miller (1993), 页 6

维系在一起。

罗宾·柯亨提出, 虽然最常引用的流散的例子是那些由迫害和暴力所导致的不情愿的流散, 但实际上它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在《全球流散》一书中 (Cohen 1997), 柯亨结合历史思路, 根据从祖国疏散的人口背后的力量, 分辨出五种不同类型的流散: 受害者 (例如非洲人、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帝国主义的 (英国人)、劳工 (印度人)、贸易 (华人) 和文化的 (加勒比人)。在以上某些情况中, 例如华人的案例, 大规模的人口运动均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而不是某种创伤性事件的结果。但柯亨也承认, 在现实中, 这些类型相互交叠, 流散的发生乃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

然而, 虽然形式多样, 但所有的流散都具有某些核心特征。柯亨认为, 所有的流散都符合以下标准:

- 出于被迫或自愿, 从祖国向一个或数个新地区迁移;
- 关于祖国的共享记忆、维护祖国存在的义务和对重归故里的可能性的坚信;
- 跨越时空而维持的强烈的族群认同;
- 与生活在流散地区的同一族群成员之间的团结感;
- 与寄居社会之间某种程度的紧张;
- 对多元主义的寄居社会有潜力做出有价值和创造性的贡献。

一些学者指责柯亨试图通过把流散的“类型”与特定族群相联系, 而将复杂而独特的迁移体验简化为狭隘的类型学。另有一些人则认为, 就柯亨所进行的分析而言, 他有关流散的概念阐述是不够精确的。然而, 尽管面临

这些批评,柯亨的研究仍然是有价值的,揭示了流散不是静止的,而是在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维持集体认同、保存族群文化的动态过程。

小 结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理念和民众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经历着跨界流动。这些过程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许多社会第一次成为族群多样化的社会。另外一些社会则发现现存的多族群模式发生了转型或者得到了强化。然而,在所有社会中,个人都开始频繁接触和自己不同想法、外貌和生活方式

的人。

有些人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种新的族群和文化的复杂性正是一个普世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要害。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它具有危险和威胁性。那些仍然以原教旨主义来看待世界的人,会在固有的传统中寻求庇护,拒绝与不同于他们的人对话(参阅第十四章^①)。今天在全球肆虐的诸多族群冲突,正可以视为这种原教旨主义思路的体现。我们的全球化世界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造就一个在本质上更具普世主义色彩的社会。正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不懈努力所表明的那样,缔造一个开放而互相尊重的交流论坛,是启动种族和解的艰难但却有效的第一步。

本章要点

- 1 种族指的是被某个共同体或社会的成员视为具有社会显著意义的体质等方面的特征,诸如肤色和智力。关于种族的许多流行看法是虚构的,不存在任何可以把人类明确划分成不同种族的特征。
- 2 人口内部各部分通过分享把他们与人口中其他人区别开来的共同文化特征而形成族群。族群性指的是使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文化差异。区分一个族群的主要特征有语言、历史或血统、宗教和服饰风格。虽然有时族群差别被认为是“天生的”,但实际上都是后天习得的。
- 3 少数群体即其成员被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口歧视的群体。少数群体的成员们通常具有比较强的群体团结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们被排斥的集体经历。
- 4 种族主义是指虚妄地认定,具有某种特定体征的个人必然具有一些遗传的人格或行为特征。一个种族主义者会相信,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明属于某个人种的人据说具有的劣等特征。
- 5 制度性种族主义是指已经纳入现存社会制度的歧视模式。
- 6 新种族主义描述了通过文化差异观念而不是生物劣等性来表达的种族主义态度。
- 7 多族群社会采取三种族群融合模式。在同化模式中,新移民群体接受主导社群的观念和语言。在熔炉模式中,同处一个社会的许多族群的不同文化和观点融合在一起。多元主义意味着族群各自独立存在,被视为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平等参与者。

^① 原文如此。

- 8 多族群国家可能是脆弱的,有时候会发生族群冲突的事件。族群清洗是族群冲突的一种形式,通过大规模驱逐其他族群,创建在族群方面同质化的地区。族群灭绝指的是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系统性消灭。
- 9 外来移民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族群。在英国,与白人相比,少数族群在整体上处于劣势,包括就业、收入、住房和犯罪等方面。不过,不平等的模式一直在变化。现在,在少数族群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一些群体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与白人相当的地位。
- 10 新移民是指由于冷战结束,前南斯拉夫长期的族群冲突,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在欧洲引发的变化了的移民模式。由于合法移民欧盟的机会逐渐受到限制,非法移民不断增加。
- 11 迁移就是以定居为目的,从一个地区或社会到另一个地区或社会的人口移动。全球迁移是指人口跨国界的移动,在二战以来不断增加,并进一步受到全球化的强化。流散是指某一族群人口从祖国向国外的散居,常常是出于被迫或面临创伤性情势。

思考建议

1. 社会学中应该剔除种族的概念吗?
2. 种族主义为何如此难以界定?
3. 为何英国有些人至今仍持有种族主义观念?
4. 一位没有偏见的人如何可能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包含有歧视?
5. 所有族群平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否可能?为什么?
6. 在英国有可能实现一种“熔炉”文化吗?
7. 你是否应当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

阅读指南

- Michael Banton, *Ethnic and Racial Consciousness*, 2nd edn (Harlow, New York: Longman, 1997). 《族群意识与种族意识》(第二版)
- Martin Bulmer and John Solomos (ed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今日族群与种族研究》
- Stephen Cornell and Douglas Hartmann,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8). 《族群性与种族:变迁世界中的认同塑造》
- Philomena Essed, *Everyday Racism* (Claremont, CA: Hunter House, 1990). 《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
- Liz Fawcett, *Religion,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0). 《宗教、族群性与社会变迁》

David Mas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现代英国的种族与族群性》

Michael Omi and Howard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 ed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美国的种族形态》(修订版)

Will Kymlicka, *The New Debate over Minority Right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7). 《少

数权利新辩》

Miri Song, *Choosing Ethnic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2003). 《选择族群认同》

网络导航

黑人和亚洲人历史地图 (Black and Asian History Map)

<http://www.blackhistorymap.com>

沃里克大学族群关系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in Ethnic Relations, Warwick University)

http://www.csv.warwick.ac.uk/fac/soc/CRER_RC

种族平等委员会 (Commission for Racial Equality)

<http://www.cre.gov.uk>

社会科学信息门户——种族与族群性社会学 (SOSIG on the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

<http://www.sosig.ac.uk/roads/subject-listing/World-cat/socrace.html>

联合国难民专员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http://www.ohchr.org/english/>

目录

第一节 有关的社会学理论与观念	436
14.1.1 社会学角度的宗教研究	436
14.1.2 有关宗教的理论	437
第二节 现实世界的宗教	441
14.2.1 图腾崇拜与泛灵论	442
14.2.2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442
14.2.3 远东宗教	444
14.2.4 宗教组织	445
14.2.5 基督教、社会性别与性	450
第三节 世俗化与宗教复兴	452
14.3.1 世俗化	452
14.3.2 宗教在欧洲	454
14.3.3 宗教在英国	457
14.3.4 宗教在美国	462
14.3.5 评估世俗化命题	465
14.3.6 宗教原教旨主义	467
本章要点	473
思考建议	474
阅读指南	474
网络导航	474



第十四章

现代社会中的宗教



莫妮卡·贝萨拉来自属于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北部^①，是一位五岁孩子的母亲，目不识丁。她去往加尔各答的天主教仁爱传教会 (Missionaries of Charity)，拜访那里的修女们，期望在自己死前得到她们的祈福。她认为，自己的胃部长了恶性肿瘤，而现代医学疗法已经无能为力。这是1998年9月5日，适逢德肋撒去世周年纪念。这位修女因其对于病者和穷人的事工，以及创建天主教仁爱传教会，而被授予诺贝尔奖^②。修女们为贝萨拉做了祈祷，将德肋撒祝圣过的一块圆章放在她的胃部。第二天，肿块就消失了。

贝萨拉回忆道，此前她一直苦于“一天到晚头痛得像要炸了，胃部的肿块疼得受不了”。她还记得教堂里的那次纪念德肋撒去世周年的礼拜仪式。她说：“我就是在那里看见显圣 (vision) 的。嬷嬷的遗像就挂在祭坛的旁边。我看见一道光，就像这个 (她指着一架照相机的闪光灯)，从画像里发出来。就我瞧见了。半夜一点，我醒过来，发现肿块已经消失了，头也不痛了。第二天早上，我走起来就和一般人一样了。”

对于贝萨拉和仁爱传教会的修女们来说，这是一桩奇迹 (miracle)。天主教会派去调查的一个医疗小队也赞同这一说法。修女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天主通过嬷嬷 (德肋撒) 成就了他的奇迹。我们都无比欣喜。”而教皇本人作为天主教会的教宗，也认可发生了奇迹，并颁布了德肋撒的宣福^③，这是封圣的最后一步骤，通常是在教皇认可第二项奇迹之后完成的。2003年10月，宣福发展到全世界各地的庆祝。在德肋撒的祖国阿尔巴尼亚，这一天被定为全国节日，而2004年被宣告为德肋撒年。而在她移居入籍的印度，教士们在全国各地举行了特别弥撒，儿童们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庆祝游行，举国电视现场直播在意大利梵蒂冈举行的仪式。在罗马，通过电影、音乐、卡通和展览等各种形式展示德肋撒的生平，并陈列她的圣徒遗物 (relics)。

但是，尽管天主教会力持己见，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说服，相信贝萨拉的康复是一项奇迹。普罗比尔·高希是印度科学与理性主义者学会 (Science and Rationalists' Society) 的创会者，专事揭露愚弄印度普通民众花钱购买奇迹治疗的圣人 (holy men)。他的组织号称有2万多成员，其使命在于“将印度穷人和文盲从迷信中解放出来”。高希对于贝萨拉的戏剧性康复有一种简单的解答：“所谓‘奇迹’发生之时，药物治疗刚好开始起效了。”在孟加拉各地多家医院曾经治疗过贝萨拉的医生们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怀疑那个赘生物是否确属癌样肿瘤，还是比较良性的。高希提出，“德肋撒的灵魂是伟大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把她的圣徒身份建立在虚构的奇迹的基础上，是对她留下的遗产的一种侮辱。她的圣徒身份应当维系于她在穷人当中的事工上。”

① 此处原文为“North Bengal in India”。孟加拉 (Bengal) 是印度次大陆东北部一历史地区名，现分属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英国殖民统治者将南亚传统地区孟加拉分划，东孟加拉地区归属巴基斯坦，后独立为现孟加拉国。

② “Mother Teresa”，又译特蕾莎嬷嬷、泰瑞莎修女等，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③ “beatification”：天主教中以教令宣告某死者因公德已升天并被列入“真福品位”。



德肋撒修女以其在印度最穷的民众中的事工而闻名于世。

有时,宗教和科学似乎是相互抵触的。有关贝萨拉见证的奇迹的争论显示出,在宗教的立场与现代理性主义的思维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安定的紧张关系。随着现代性的深化,理性主义的视角征服了我们的存在的许多方面;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的影响力似乎也不太可能被削弱。不过,对于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思维,始终还会出现一些反抗,因为在人生的意义和目的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它们未置一词。而这些问题却一直是宗教所关注的核心,它们激发人产生信仰的观念,即一次升华到坚定信念的情感跃迁。

数千年来,宗教对人类的生活一直有着牢固的影响。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当中,宗教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过。最早期的有记录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考古遗迹证实,但已经显露出宗教符号和宗教仪式存在的鲜明痕迹。洞穴岩画表明,早在4万多年以前,就已经存

在宗教性的信仰和仪轨。而在随后的历史中,宗教一直作为人类经验的一个核心部分,影响着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感知和反应。

为什么宗教一直是人类各个社会中具有如此渗透力的一个层面?在晚近的现代社会中,它的角色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什么条件下宗教能够统合共同体,又在什么条件下使其分裂?宗教如何能够对个体的生命有如此控制权,以至于他们准备为其理想而献身?这些就是我们在本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宗教究竟是什么,并看看宗教信仰和仪轨所采取的几种不同形式。我们也将关注社会学关于宗教的一些主要理论,分析可以区分出来的不同类型的宗教组织。最后,我们将考虑宗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命运。因为在许多观察者眼里,随着科学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当今的宗教同它在现代社会之前相比,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已经有所减弱。

第一节 有关的社会学理论与观念

14.1.1 社会学角度的宗教研究

研究宗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事业,它对社会学想像力提出了很特殊的要求。在分析宗教仪轨的时候,我们必须领会在人类各种文化中出现的众多不同的信仰和仪式。我们必须敏锐地看到在信徒心中激发起深切执信的那些理念,而同时又要对它们保持一种中立的观点。我们必须去面对追求永恒的观念,同时也要认识到,宗教群体也在推进一些非常世俗的目标,比如获取资助或招揽信众。我们不仅需要看到宗教信仰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也要探究作为一种一般现象的宗教的性质。

社会学家把宗教界定为由一些共享信念与仪式所组成的文化体系,通过创造出某种神圣的、涵盖一切的、超自然的现实观念,提供有关终极意义和宗旨的某种认识(Durkheim 1965; Berger 1967; Wuthnow 1988)。在这种定义中有三点关键要素:

- 1 宗教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包含了一系列共享信念、价值、规范和观念,能够在某个人群中创造出共有认同。所有这些特征宗教也都具备。
- 2 宗教包含了采取仪式化仪轨(ritualized practices)的信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都具备一种行为向度,即信众所参与的特殊活动,这使他们被识别为宗教共同体的成员。
- 3 或许最重要的是,宗教提供了一种目的感,就是觉得生活归根结底是有意义的。为此,它要以连贯一致而有说服力的方式,说明那些超越日常生活或遮蔽日常生活的东西,其方式是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教育体

系或对于民主的信念)一般无能为力的(Geertz 1973; Wuthnow 1988)。

社会学角度对于宗教的界定中,所缺失的东西与所包含的东西一样重要:它根本没提到上帝。我们常常认为,有神论,即对于一个或多个超自然神(deities,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上帝)的信仰,是宗教的基本要义。但这并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稍后将会看到,有些宗教,比如佛教,相信的是存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上帝。

社会学家如何思考宗教

社会学家在研究宗教的时候,是作为社会学家,而不是作为对于某一特定信仰的信徒(或不信者)。这种立场对于宗教的社会学研究有几点意义:

- 1 社会学家并不关注宗教信仰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不是把宗教视为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类的社会建构。其结果,社会学家在研究宗教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个人信仰暂搁一旁。他们关注的是宗教的属人的一面,而不是神圣的一面。社会学家问的是:宗教是如何组织的?它的主要信念和价值观是什么?它是如何与广大的社会相关联的?如何说明它在招揽和维系信众方面的成败得失?至于一种特定的信仰是否“好”或“真实”的问题,无论它对于所研究的宗教的信众可能会多么重要,也不是社会学家作为社会学家有能力处理的。(作为个人,他们可以对这个事情有坚定的意见,但作为社会学家,人们希望他们能够克制这些意见,避免使研究产生偏差)
- 2 社会学家尤其关注宗教的社会组织。宗教属于社会中最重要制度之一。它们是那些最根深蒂固的规范和价值的主要源泉之

一。与此同时,宗教一般又是通过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式来实践的。比如说,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宗教仪轨常常是发生在正式组织当中,像教堂(church)或会堂(synagogue)^①。但对于印度教和佛教之类的亚洲宗教,这就不是必需的。那里的宗教仪轨很可能发生在家中或其他某种自然场景。宗教社会学关注的是,不同的宗教制度和组织实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最早的欧洲宗教常常与广大社会不可分离,因为宗教信仰与仪轨就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世界许多地方直至今日依然如此。然而,在现代工业社会,宗教已经在分离的并且常常是科层性的组织中确立起来,因此,社会学家把焦点放在宗教为了维持下去而必须通过它运作的那些组织(Hammond 1992)。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这种建制化^②甚至使得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美国和欧洲的宗教类似于工商组织,为了吸引成员而彼此竞争(Warner 1993)。

- 3 社会学家常常把宗教看作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宗教为信徒提供了共同的一套规范和价值,因此,它们是社会团结的一种重要源泉。宗教的信仰、仪式和纽带有助于创造一个“道德共同体”,在其中,所有成员都知道如何相互交往(Wuthnow 1988)。如果有一种单一的宗教支配了一个社会,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源泉。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们各自遵循众多相互竞争的宗教,宗教差异就有可能导致去稳定化的社会冲突。社会中宗教冲突的晚近实例包括:在印度,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争斗;在波斯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其他区域,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在美国,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憎恨性犯罪”(hate crimes)。

- 4 社会学家在说明宗教的吸引力时,往往从社会力量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诉诸纯粹个人性、精神性或心理性的因素。在许多人看来,宗教信仰是一种个人性的深切体验,蕴含着强烈地感到与那些超越日常现实的力量之间的关联。社会学家并不追问这类情感和体验的深度,但他们也不太可能仅限于从纯粹精神性的角度来说明宗教担当。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是在看到上帝突然显灵后开始虔信宗教的,但社会学家就可能要寻找更为世俗性的说明。有些研究者提出,人们常常是在自己面临经济困境、孤独、失落或不幸、生理痛苦或健康不佳等处境,对于社会秩序的根本感知受到威胁,从而“变得虔信宗教的”(Berger 1967; Schwartz 1970; Glock 1976; Stark and Rainbridge 1980)。社会学家在说明宗教运动的吸引力时,更有可能把焦点放在社会秩序的问题上,而不是个人的心理反应。

14.1.2 关于宗教的理论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三位“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的思想,仍然强烈地影响着社会学思路的宗教研究。他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虔信宗教,而且都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的重要性将会下降。他们都相信,宗教究其根本是一种幻觉。三位思想家都认为,不同信仰的拥护者都有可能完全相信他们所持有的信仰以及所参与的仪式的有效性,然而,宗教是纷繁多样的,它们跟不同的社会类型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这就使得这些宣称从根本上难以成立。在澳洲的狩猎和采集社会出生的个体,其所持有的宗教信仰显然迥异于出生在印度种姓制度或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的个体。然而,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尽管经典社会学家在

① 这两个词根据突出的是仪轨发生的空间地点,还是组织共同体的意涵,或有不同的译法。

② “institutionalization”: 此处兼有“制度化”和“机构化”的意思。

这一点上取得共识,但在具体研究宗教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却各自发展出了相当不同的理论。

一 马克思:宗教与不平等

尽管卡尔·马克思对这个主题影响深远,但他本人从未详细研究过宗教。他的思想主要是来自于19世纪早期几位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之一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写下了著名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Feuerbach 1957)。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宗教是由人类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所构成的,但却被歪曲地投射到神圣的力量或众神身上。由于人类没有充分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就往往把社会创造出来的价值和规范归因于众神的活动。如此说来,上帝授予摩西十诫的传说,实际上是有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生活的道德戒律之起源的一种神话变形。

费尔巴哈提出,只要我们还没有理解自己创造出来的宗教符号的性质,就注定成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历史力量的俘虏。费尔巴哈用异化这个词来指与人类不同的众神或神圣力量的确立。本来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和观念,现在却被看成是由异己的(alien)或与人分离的存在物——即宗教力量和众神——创造出来的。根据费尔巴哈的说法,虽然说在过去,异化对人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如果理解了宗教是一种异化,则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一旦人类意识到,投射到宗教上的价值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就可能在此世得以实现,而不必等到来生。基督教中认为由上帝所具有的力量就能由人类自身来把握。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和博爱的,而人类自身却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然而,费尔巴哈相信,爱和善的潜力,以及控制我们自己生活的力量,只要我们理解了这些东西的真正性质,它

们就会在人类的社会制度中显现,并带来丰硕的成果。

马克思接受了宗教代表人的自我异化这一观点。人们往往认为马克思蔑视宗教,其实远非如此。他曾写道,宗教是“一个无情世界里的慰藉”,也就是远离残酷的日常现实的一处庇护所。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形式的宗教将会消失,而且应当消失;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宗教中的理念和价值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因为这些体现在宗教中的积极价值可以在此世成为改善人类命运的指导性理念。我们不应该畏惧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众神,我们也不应该再把我们自己可以认识到的价值赋予他们。

马克思在他的一句名言中宣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教诲人们顺从地接受此世的既有状况,并把幸福和报答推到来生。由于有来生的许诺,人们的注意力就从现实世界的平等和不公平上转移开去。宗教因此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宗教的信仰和价值经常被用来为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提供正当化理据。例如,“温顺者将继承世界”^①的教义就蕴含着要对压迫采取谦恭和不抵抗的态度。

二 涂尔干:功能主义与宗教仪式

与马克思不同,埃米尔·涂尔干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宗教,尤其注重研究小型传统社会的宗教。涂尔干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宗教社会学领域影响最大的研究之一[Durkheim 1976 (1912)]。他没有把宗教主要和社会不平等或权力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一个社会各项制度的整体性质联系在一起。他的著作基于对澳洲土著社会所实施的图腾崇拜的研究,认为图腾崇拜代表了宗教最“基本”或最简单的形式,这也是其书名的由来。

图腾最初是由一个群体视为带有特殊象

^①《新约·马太福音》5:7“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涂尔干认为,像加尔各答的普阇^①礼拜这样的仪式,从日常范畴中凸显出神圣范畴,但也由此增强了一些社会核心价值。

征意义的某种动物或植物。它是一个神圣的事物,受到尊崇,并以其为中心而展开各种各样的仪式性活动。涂尔干根据神圣和凡俗之间的区别来定义宗教。他认为,神圣的事物和象征被看成是与生活的例行活动相分离的东西,后者属于凡俗的领域。除了特殊的庆典场合,食用奉为图腾的动物或植物通常是被禁止的。而且,图腾作为神圣(sacred)之物被认为具有神的(divine)特性,这使它彻底有别于其他可猎杀的动物或可采食的植物。

图腾为什么是神圣的呢?根据涂尔干的观点,这是因为,它是群体自身的象征;它代表了

群体或团体的核心价值。人们对于图腾的尊崇实际上源于他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尊重。在宗教当中,崇拜的对象事实上就是社会本身。

涂尔干着重强调,宗教绝不只是一个信仰的问题。所有宗教都包括定期的庆典和仪式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信徒们聚集到一起。在集体庆典中,一种群体团结感得到了确认和强化。庆典使个人摆脱了对于凡俗社会生活的挂怀,而进入到一个升华了的层面,在其中人们会感到自己是在与更高等的力量相沟通。这些被赋予图腾、神圣感应或众神的更高等力量,其实体现的是集体对于个体的影响力。

在涂尔干看来,庆典和仪式是把群体成员维系到一起的关键因素。因此,它们不仅出现在定期的膜拜情境中,也出现在经历重大社会转变的各种人生危机中,譬如出生、结婚和死亡。在几乎所有社会,类似的场合都遵循着庆典和仪式程序。涂尔干推断说,当人们被迫做出调整以适应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时,集体仪式会重新巩固群体的团结。丧葬仪式表明,具体的个体虽已死去,群体的价值却仍长存,从而为失去亲友的人适应其变故后的环境提供了一条途径。哀悼(mourning)不是悲伤自然而然的表达,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仅仅是那些受到死亡直接影响的人的个人感受。哀悼其实是群体强加的一项义务。

涂尔干认为,在小型传统文化中,宗教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庆典既创造了新的观念和思维范畴,又重新肯定了已有的价值观。宗教不只是一系列情感和活动;它实际上限定了传统文化中的个人的思维模式。即使是最基本的思维范畴,包括如何思考时间和空间,最初也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考虑的。例如,“时间”的概念就是起源于在宗教庆典中计算间隔的长短。

涂尔干相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宗教的影响将逐渐衰微。科学思维将愈益取代宗教

① 普阇(音舍),Puja,即印度教的礼拜。

的说明,而庆典和仪式活动也将只占据个人生活的一小部分。涂尔干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即传统宗教——也就是有神圣力量或众神的宗教——正濒于消亡。他写道,“老旧的众神已死”。不过,他也认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宗教很可能会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活下去。即使是现代社会,为了自身的统合(cohesion),也得依靠仪式,因为它强化了社会的价值。于是,人们期待有新的仪式活动出现,以取代旧的仪式。至于这些新的仪式会是什么样的,涂尔干语焉不详,不过在他脑子里,似乎是对于诸如自由、平等和社会协作等等人文主义政治理念的颂扬。

三 韦伯:世界宗教与社会变迁

尽管涂尔干声称他的思想可以应用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但他的论证却只是基于范围非常有限的例证。与之相反,马克斯·韦伯着手对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开展了大规模研究。其规模之大,在学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兴趣大部分集中在他所称的世界宗教上,这些宗教都吸引了大批信徒,并对全球历史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对印度教、佛教、道教和古代犹太教进行了细致研究(Weber 1951, 1952, 1958, 1963)。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Weber 1976)等著述中,他全面论述了基督教对于西方历史的影响。不过,他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对于伊斯兰教的研究。

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关于宗教的研究集中在宗教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上。涂尔干对于这一点殊少关注。与马克思的研究相比,韦伯的著作也有所不同,因为韦伯认为,宗教不一定就是一种保守性的力量;相反,由宗教所激发的运动经常使得社会发生剧烈转型。如此看来,新教,特别是清教主义,就是现代西方所具有的资本主义世界观的源头。早期的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加尔文派教徒。他们渴求成功的动力有助于启动西方经济的发展,而最初这种动力就

是由侍奉上帝的愿望所激发的。对他们来说,物质上的成功只是蒙上帝恩宠的一个迹象。

韦伯把他对于世界宗教的研究看成是一项单一的计划。关于新教影响了西方发展的讨论只是他包罗广泛的研究中的一部分,最终他要做的是理解宗教在不同文化中对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韦伯在分析了东方宗教之后得出结论:东方宗教给类似于西方出现的那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并不是因为非西方文明是落后的;它们只是已经接受了某种价值观,不同于那些逐渐在欧洲占据支配地位的价值观。

韦伯指出,在传统中国和印度,在特定的一些时期,也曾经有过商业、制造业和城市化的显著发展,但这些并没有导致像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那些剧烈的社会变迁模式。抑制这种变迁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就是宗教。例如,印度教被韦伯称为“来世”的宗教,也就是说,它的最高价值强调摆脱物质世界的羁绊,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存在中去。印度教培育出的宗教感情和动机并不关心控制和塑造物质世界。相反,印度教把物质现实看作是一道帷幕,遮盖了应当引导人类真正去关心的东西。而儒教则像西方后来理解的那样,也是使人不要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强调与世界保持和谐的关系,不提倡积极地去主宰它。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上最发达的文明,但占支配地位的宗教价值观却阻碍了坚持以其本身为目的的经济发展的坚定立场。

韦伯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救赎宗教(salvation religion),它包含了这样的信仰:人类如果接受了这些宗教信仰,并遵循它的道德信条,他们便能得到“救赎”。在这里,重要的是罪和蒙上帝恩宠而得以赎罪的观念。它们产生了一种在东方宗教中本质上缺失的张力和情感动力。救赎宗教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东方宗教在信徒中培养了一种对于现存秩序的消极态度,而基督教则包含了与罪的持续争斗,

并由此可以激发起对事物的现存秩序的反抗。由此,像耶稣这样的宗教领袖便出现了,他以挑战通行权力结构的方式来重新解释既有的教义。

四 对于经典观点的评价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各自都指出了宗教的一些重要的一般性特征,他们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也是彼此补充的。马克思正确地声称,宗教经常带有意识形态的内涵,有助于为统治集团损害他人而牟利提供正当化理据。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比如,欧洲殖民者就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试图把其他文化纳入到他们的统治之下。传教士们力图使“异教”各民族皈依基督教信仰,无疑他们是很真诚的,不过他们的传教结果却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体,并巩固了白人强加的支配。直到19世纪,基督教各大宗派对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奴隶制还几乎都持宽容甚至支持的态度。有教义提出,所诉求的奴隶制乃是基于神法,奴隶如果不服从,罪孽深重,不仅冒犯主人,更是冒犯上帝。

然而,韦伯所强调的观点也肯定是正确的:宗教理想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将产生不稳定而且经常是革命性的影响。尽管教会在早期支持美国的奴隶制,但后来很多教会领袖在废奴斗争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宗教信仰激起了很多社会运动,旨在推翻不平等的权威体系,比如说,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它就起了显著的作用。宗教还会通过为宗教动机而战的武装冲突和战争来影响社会变迁,经常会导致大量的伤亡。

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对于宗教的这些在历史上如此显著的决定性影响,则是言之殊少。

涂尔干着重强调宗教在促进社会统合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过,不难改变他的观点的指向,除了用来说明团结,还可以用来说明宗教分化、冲突和变迁。不管怎么说,在宗教群体中可能产生的对抗其他宗教群体的情感,绝大部分力量还是来源于在每一个信徒共同体内部产生的对于宗教价值观的担当。

涂尔干的著作最有价值的部分中,就包括他对仪式和庆典的重视。所有宗教都包括信徒的定期集会,在集会上严格遵循仪式的规定。他正确地指出,仪式活动也标志着生活的重要转变,即出生、进入成年(在许多文化当中都能发现与青春期有关的仪式)、结婚和死亡等(van Gennep 1977)。

在本章下文我们将会利用所有这三位思想家提出的观点。首先,我们将简述各大世界宗教,以及不同类型的宗教组织。然后,我们将再看一看社会学关于世俗化过程的争论,指的是工业社会中宗教的势力日益衰微。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讨论对世俗化这一观念提出挑战的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即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起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力量。

第二节 现实世界的宗教

在传统社会,宗教通常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宗教象征和仪式经常同社会中的物质文化和艺术文化融合在一起,比如音乐、绘画或雕塑、舞蹈、讲故事和文学等。在小型文化中,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但是总有一些精通宗教(经常也包括巫术)仪轨知识的人。这类专业人士虽然五花八门,但有一类很常见,这就是萨满(shaman,一个源出北美印第安人的词语)。萨满是一个被认为有能力通过仪式

的手段指挥精灵或超自然力量的个体。然而,有时候从本质上说,萨满是巫师而不是宗教领袖,而且常常是那些对共同体的宗教仪式所能提供的东西感到不满足的个体才会去请萨满。

14.2.1 图腾崇拜与泛灵论

在较小的文化中经常出现的两种宗教形式是图腾崇拜和泛灵论。“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但已经得到广泛运用,指那些据信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动物或植物。一个社会当中的每个亲属群体或氏族,通常都拥有其独特的图腾,并有与之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对于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似乎难以理解图腾信仰,但是在某些相对细小的特定情景下,类似图腾崇拜的符号(symbols)并不少见,比如一个运动队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其徽章(emblem):吉祥物(mascot)就是图腾。

泛灵论是对精灵或鬼魂的一种信仰。人们认为,它们跟人类居住在同一个世界。这些精灵有时被看成是善意的,有时被看成是恶意的,并且还可能在很多方面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在一些文化中,人们相信精灵会带来疾病或疯狂,也可以缠住某人令其着迷,甚或直接附体取而代之,以此来控制人的行为。泛灵论信仰并不局限于小型文化中,一定程度上,它在许多宗教场景中都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的欧洲,那些被认为由邪恶精灵附体的人就经常被当作男巫或女巫而遭迫害。

小型的、看上去“简单”的社会经常会有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图腾崇拜和泛灵论在这些社会中固然要比在较大的社会中更为常见,但有些小型社会也有比此复杂得多的宗教。比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1956)所描述的苏丹南部的努尔人(Nuer),就有一套以一个“上帝”或叫“天神”为中心的精细

的神学观念。但不管怎么说,相对而言,在较小的传统文化中,一神教(只信仰一个神)的宗教倾向并不常见,绝大多数都属于多神教,也就是信仰多个神。

14.2.2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

在世界历史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三个最有影响的一神论宗教。它们都起源于中东,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影响。

一 犹太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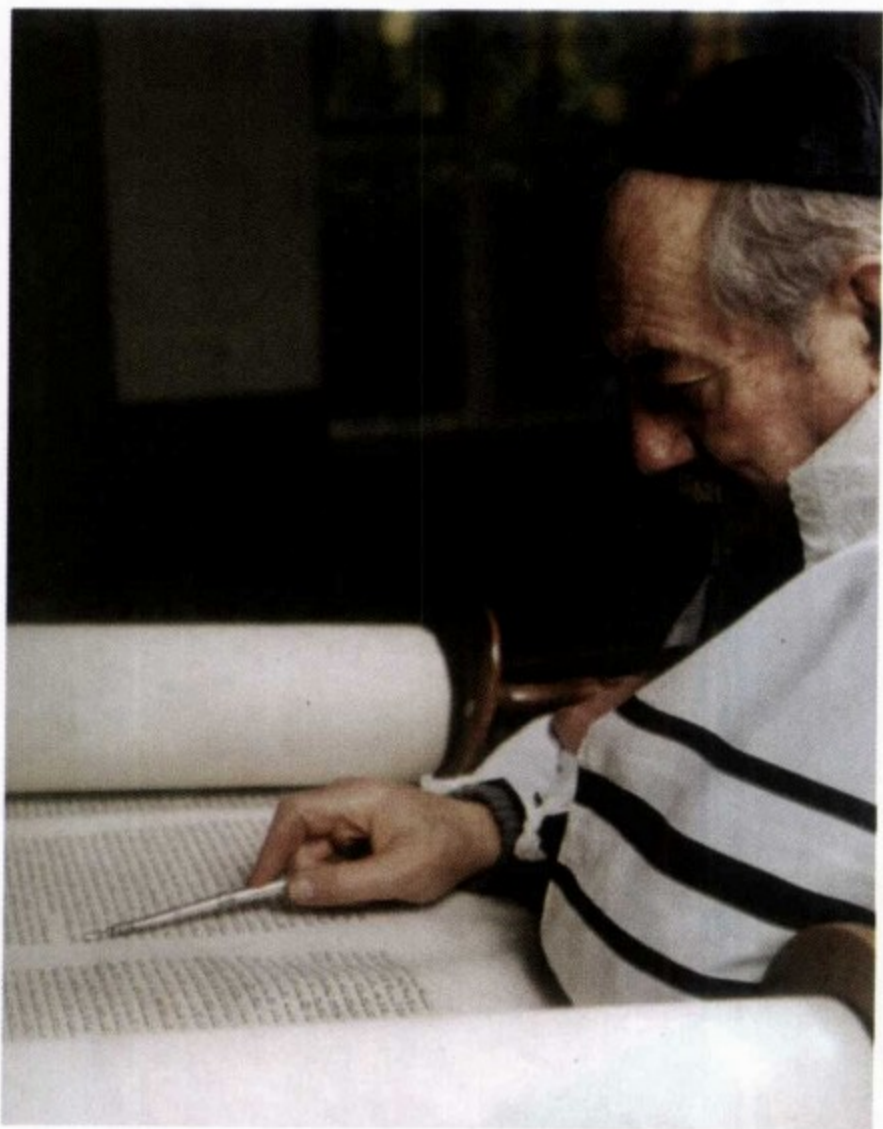
犹太教是这三个宗教中最古老的一个,其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早期的希伯来人是游牧部落,生活在古埃及及其周边地区。他们的先知,或者说宗教领袖,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个地区已有的宗教信仰中提炼出自己的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只信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上帝,而他们的邻居大多都是多神论者。希伯来人相信,上帝要求他们服从严格的道德准则,他们把自己的信仰当作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并以此声称惟有他们把握了真理(Zeitlin 1984, 198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以色列立国之前,没有任何国家曾经将犹太教定为国教。虽然犹太人经常遭到迫害,尤以二战期间纳粹在集中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为极致,但犹太人社群还是在欧洲、北非和亚洲存留了下来。

二 基督教

犹太教的很多观点被基督教接受并融为它的一部分。耶稣是一个正统派犹太人^①,基督教最初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耶稣当初是

^① “Orthodox Jew”:最严格地恪守传统信仰和礼俗的犹太教徒。



一位虔诚的犹太人在读《托拉》。^①

不是想建立一个自成一体的宗教，尚不清楚。他的信徒们渐渐把他看成是犹太人期盼之中的弥赛亚（Messiah），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救世主”（the anointed），在希腊语中的意思就是“基督”（Christ）。保罗，这位说希腊语的罗马公民，是传播基督教的主要先行者之一，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希腊广泛传教。尽管基督徒最初受到野蛮的迫害，但君士坦丁大帝^②最终还是将基督教接纳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此后的两千年中，基督教广为传播，成为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力量。

与其他任何宗教相比，基督教今天拥有的追随者都更多，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也更为普遍（参看图 14.1）。有 10 亿以上的人自视为基督徒，但是，在神学观念和教会组织方面也存在许多分歧，主要的分支是罗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

三 伊斯兰教

作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宗教的伊斯兰教（参见图 14.1），在起源上与基督教有重叠之处。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 7 世纪先知穆罕默德的教义。伊斯兰教的单一神安拉（Allah）据信能主宰万事万物。伊斯兰五功是穆斯林（这是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的五项基本的宗教义务。第一功是念功，念清真言（Islamic creed）：“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第二功是每天五遍，在行净礼（ceremonial washing）之后，诵经祈祷。不管距离有多远，祈祷者在念祷文的时候，都必须面朝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圣地麦加的方向。第三功是在伊斯兰教法中所规定的给予施舍（给穷人的钱），国家经常利用这条教规来收税。第四功是守斋月 [Ramadan（莱麦丹月）]，即一个月的斋戒，在此期间每日自日升至日落禁绝一切饮食。最后，还期望每个教徒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

穆斯林相信，在穆罕默德之前，安拉就已经通过较早的先知——包括摩西和耶稣——劝喻世人，但穆罕默德的教义最直接地表达了他的意愿。伊斯兰教现在传播很广，在全世界约有 10 亿左右的追随者。大多数集中在北非和东非，中东，还有巴基斯坦。

① 《托拉》（Torah）狭义上指《旧约》的首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诵读律法书是犹太教礼拜仪式的重要内容。托拉也指全部希伯来文《圣经》，甚至包括全部犹太律法、习俗及礼仪。因为托拉其实就是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道。

② 原文为“Emperor Constantine”，这里指罗马帝国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I，又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约 280—337]，第一位宣称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使帝国演变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14.2.3 远东宗教

一 印度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远东各宗教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当今世界上依然重要的所有大宗教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当属印度

教，其核心的信仰约在 6000 年前形成。印度教是多神论的宗教。它内部的差别极大，乃至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看作是众多相关宗教的群集，而不是单一的宗教取向；内中五花八门的地方性宗教崇拜和宗教仪轨，仅靠少数普遍持有的信仰维系在一起。

绝大多数印度教徒都接受了转世轮回的教义，即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生、死、再生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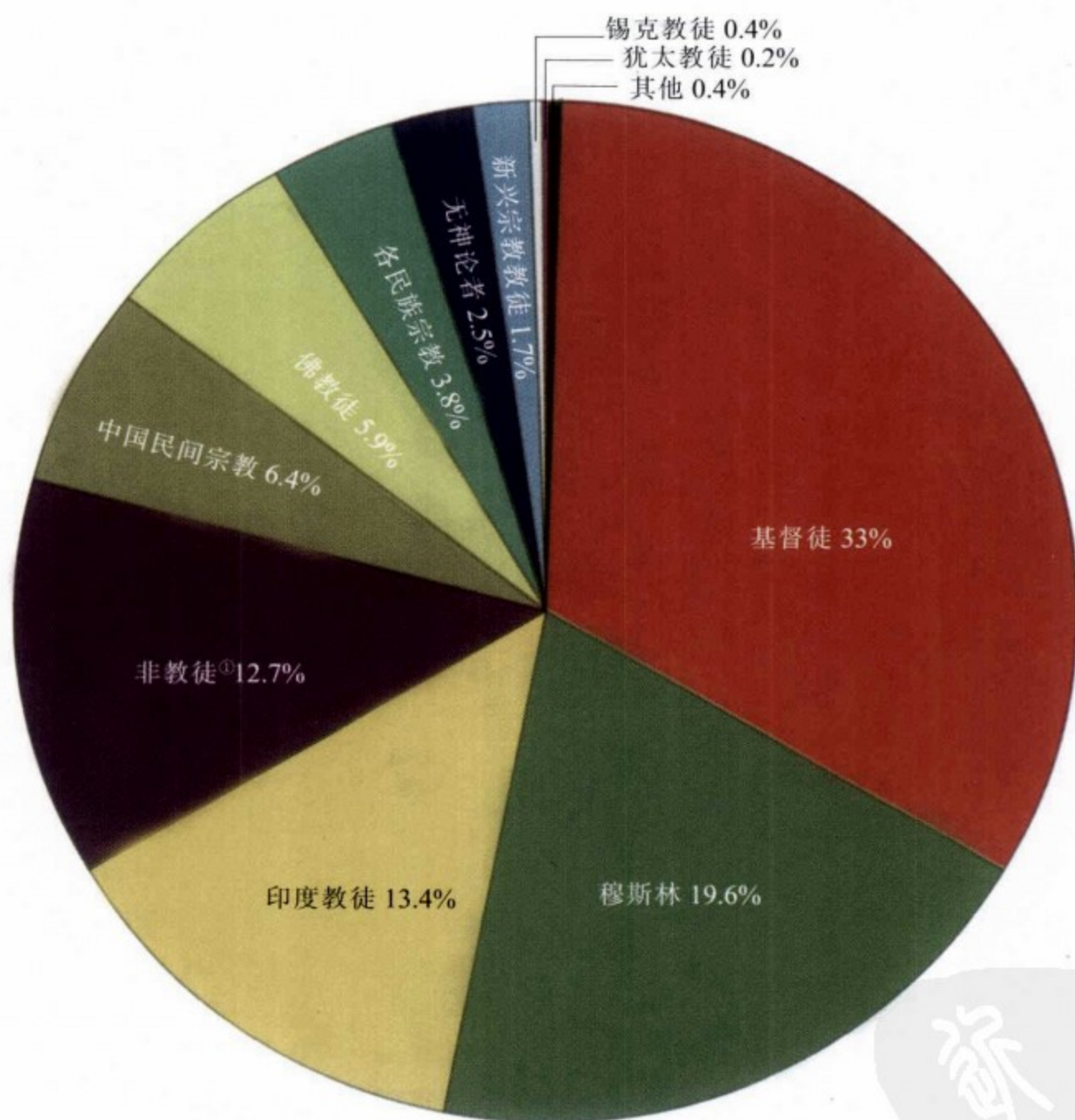


图 14.1 各宗教教众占世界人口的比例,2000 年

资料来源:Barrett, Kurian and Johnson,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页 4

① 原文为“non-religious”，或称“无宗教信仰者”，但要注意是与“无神论者”(atheists)分列并称的。

一个永恒过程的一部分。第二个关键特征是种姓制度,其所依据的信念是,根据其前世行为性质,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在社会和仪式等级中处于某个特定的地位。每个种姓都有一套不同的义务和仪式,一个人来生的命运主要是由他今生履行其义务的好坏决定的。印度教认为有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宗教立场,并不明确地区分信徒和非信徒。目前印度教徒超过 7.5 亿,几乎全部生活在印度次大陆。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印度教并不试图将其他人皈依,转变为“虔诚的信徒”。

二 佛教、儒教与道教

东方的伦理宗教包括佛教、儒教和道教。这些宗教中都没有神。相反,它们强调把信徒同宇宙的自然和谐统一联系在一起的伦理观念。

佛教源于乔达摩·悉达多^①即佛陀(“觉悟者”^②)的教义,他是公元前 6 世纪尼泊尔南部一个小王国的印度王子^③。根据佛陀的观点,人可以通过弃绝诸念而摆脱转世轮回。解脱之道在于过一种摆脱世俗身业(tasks)的正命(self-discipline)、正定(meditation)的生活。佛教的最终目标是证得涅槃(attainment of Nirvana),即精神的圆满寂灭(fulfillment)。佛陀拒绝印度教的仪式和种姓的权威。但佛教跟印度教一样,并不坚守单一的观点,对很多地方上的变异也是持宽容的态度,包括对地方神的信仰。今天,佛教在远东的几个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包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中国、日本和韩国等。

在传统中国,儒教是统治集团的文化基础。“孔子”(Confucius,是“孔夫子”的拉丁化写法)生活在公元前 6 世纪,与佛陀处于同一个时期。孔子开私学收徒讲学,而不是像中东那些宗教领袖那样充当宗教先知。孔子并没有被他的追随者当成一个神,而是被看成“至圣”。儒教试图调节人的生活以达到自然的内在和谐,并强调敬奉祖先。

道教遵循同样的原则,强调通过冥想和非暴力来实现更高等的生活。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他和孔子一样,也收徒讲学^④,在许多中国人的信仰和习俗中虽然仍保留着儒教和道教的一些要素,但是由于政府的坚决反对,它们在中国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

14.2.4 宗教组织

宗教社会学自其肇始于涂尔干和韦伯的著述以来,一向对非欧洲的宗教保持关注。不过,常常也有一种倾向,透过从欧洲的经验中生发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来看待所有的宗教。比如说,像宗派和教派之类的观念,就预设了存在正式组织化的宗教制度。而有些宗教强调不懈的精神修炼,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是追求将宗教与民事生活和政治生活彻底一体化,再用这类观念来研究,其效力值得质疑。近几十年来,有些学者努力打造一种更具比较性质的宗教社会学,力求透过各宗教传统自身的参照框架来理解它们(Wilson 1982, Van der Veer 1994)。

早期的理论家,比如马克斯·韦伯(Weber 1963)、恩斯特·特洛尔奇(Troeltsch 1931)以

① “Siddhartha Gautama”: 释迦牟尼的本名。

② “enlightened one”: 为佛陀的称号。原中译本译为“启蒙者”。

③ 佛陀出生于释迦族公国(今尼泊尔和印度接壤的边境地区),其父为净饭王,属刹帝利种姓。少时养尊处优。29岁时出城游玩,遇见老人、病人、死尸和婆罗门出家人,感人生苦恼,决心出家探索解脱人生痛苦之道。遂弃家苦行。

④ 原文如此。

及理查德·尼布尔 (Niebuhr 1929), 根据各种宗教组织的建制完备程度和遵循传统程度, 将它们描述成一个连续统: 一端是教会 (遵循传统, 建制完备), 另一端是崇拜 (两者皆不具备), 而教派居于其间。这些区别乃是基于有关欧洲和美国宗教的研究。至于它们对非基督教世界的适用性, 则是聚讼不已。

今天的社会学家都很清楚, 教派和崇拜这两个词具有负面的意涵, 而这是他们希望避免的。有鉴于此, 当代的宗教社会学家用新兴宗教运动这个短语来概括那些新兴的宗教组织, 它们缺乏那种由于建制悠久而产生的正派地位 (respectability)。

一 教会与教派

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信众的共同体, 但这些共同体的组织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韦伯和他的同行宗教史学家特洛尔奇首先提出了宗教组织的一种分类模式 (Troeltsch 1981)。韦伯和特洛尔奇区分了教会与教派。教会是一个规模较大、建制完备的宗教实体, 比如普世教会或英国教会。教派是一个较小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但立场坚定的信徒群体, 通常被建立起来以反对某个教会的现状, 就像加尔文派教徒 (Calvinists) 或循道派教徒 (Methodists) 所做的那样。一般来说, 教会具有一套正规的科层结构, 神职人员品等有序, 并且往往代表着宗教的保守一面, 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了现存的制度秩序。大多数追随者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成为教会的成员。

教派的规模相对要小, 它们的目标往往是去发现并追随“正道” (the true way), 并往往脱离它们周围的社会, 以组成它们自己的共同体。教派的成员把建制守成的教会看成是一种堕落。大多数教派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神职人员, 所有成员都被视为平等参与。很少有人一生下来就属于某个教派, 大多数人都是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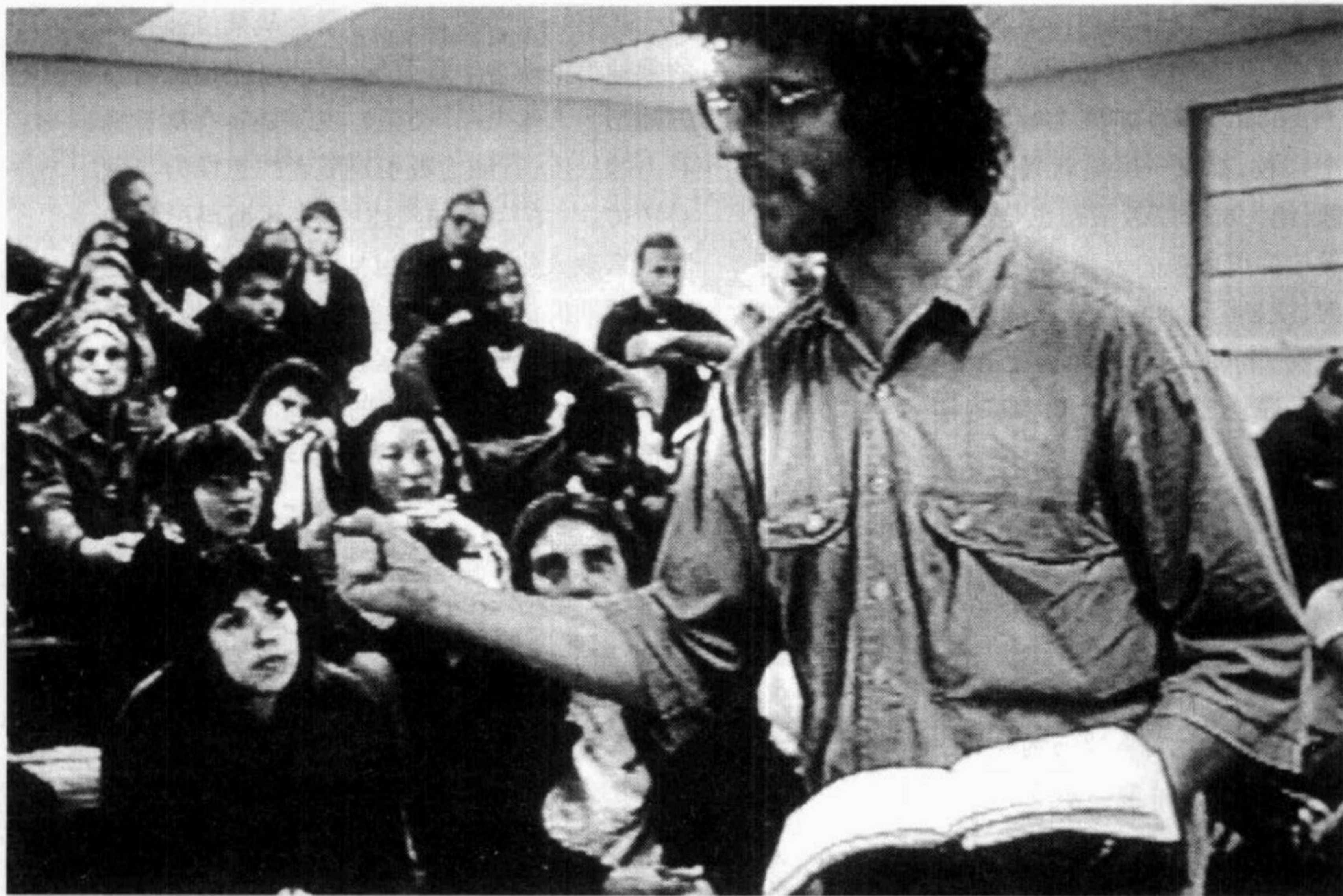
加入教派, 以深化自己的信仰。

二 宗派与崇拜

其他学者对韦伯和特洛尔奇最初提出来的“教会 / 教派”的分类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一位是霍华德·贝克尔 (Becker 1950), 他增加了两种类型: 宗派和崇拜。宗派是指已经“冷静下来”并且成为制度化实体的教派, 而不再是积极对抗的群体。教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存活下来后, 不可避免地都会成为宗派。加尔文派和循道派在形成之初, 激起信徒的极大狂热, 那时还属于教派; 但多年以后, 它们就变得更加“正派” (respectable) 了。宗派基本上被教会视为合法的, 与教会并存, 还经常和他们合作无间。

崇拜跟教派类似, 但着重点有所不同。崇拜的成员拒绝接受他们所认为的外部世界价值观。它们在所有宗教组织中, 联系最松散, 形态也最多变; 它们关注的是个体经验, 把思维相近的人集合在一起。人们不是正式加入一种崇拜, 而是信仰某些特定的理论或预先规定的行为方式。它通常允许其成员与其他宗教保持联系。跟教派一样, 崇拜通常是围绕着一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而形成的。在当代西方, 这类崇拜的例子包括相信通灵术、占星术或超验冥想的信徒群体。

以一位富有感染力的领袖为核心而打造起来的崇拜, 在 1993 年的美国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实例。大卫·考雷什领导着大卫庄园教, 自称是救世主。据说他还私藏了大量非法武器, 实行一夫多妻制, 并与生活在得克萨斯州韦科镇 (Waco) 的该教大院中的一些孩童发生了性关系。在经过双方长时期的武装对峙之后, 美国政府派出的公务人员进攻了该建筑群, 随即大火吞噬了整个大院, 多达 80 名崇拜团体成员 (包括 19 名孩童) 葬身火海。至于究竟是考雷什下令纵火 (据报道他选择集体自



录像定格中的大卫·考雷什,是大卫庄园教这一宗教崇拜蛊惑人心的领袖,许多信众死于一系列悲剧性事件。

杀而不是投降),还是联邦当局的行动导致了这场悲剧,至今存有争议。^①

显然,在一个国家属于崇拜的团体,到了另一个国家就很可能是建制化的宗教实践。当印度教的古鲁(gurus,即宗教导师)到英国传

授教义,在印度被视为建制化宗教,到了英国就被视为崇拜。基督教最初就是古代耶路撒冷的一种本地崇拜,而在今天的许多亚洲国家,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被视为从西方特别是美国舶来的崇拜。因此,不应

① 大卫庄园教(Branch Davidian Cult):大卫教派由保加利亚移民豪迪夫(Victor Houteff)于1934年在美国创立。豪迪夫原是基督教安息日会成员。1933年他自称是基督教的助手,将在基督复临时帮助重建新耶路撒冷。遂被安息日会视为异端而开除。于是他在得克萨斯州韦科镇的骆驼山庄建立自己的教派。教内实行财产公有,过公社式集体生活。1987年考雷什夺得教主职位,渐趋极端,并在英、澳、新等国发展组织,共有信徒二三千人。自称耶稣基督复临,甚至高于耶稣。他于1990年改名为大卫·考雷什。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而耶稣是大卫后裔。考雷什在圣经中则是解放犹太人的象征。教内实行军事专制和经济剥削,要求信徒每天进行长时间祈祷,声言只有追随他,在世界末日来临时才能得救。信徒入教后须将薪金存款全部交由教主,不准看电视和与外界通信。要求信徒禁欲,自己拥有19个妻子,并与无数女信徒包括男信徒之妻发生性关系,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考雷什以圣经中《启示录》和《但以理书》为依据,宣传世界末日很快来临,将在耶路撒冷圣地展开决战,美国将入侵以色列,并向上帝的选民即大卫教派进攻,但最终他本人将作为战神清扫大地,然后与一切信徒进入天堂,共享千年太平盛世。为此,大卫教派储备大量武器和足够几年的食粮,以对付末日来临时“敌基督”的进攻。并对信徒进行军训。这些举动被警方得知后,他预言说,一场大战将在得州爆发。信徒要固守庄园,等待世界末日。与魔鬼控制的联邦军英勇作战而不屈服者,死后将连同肉身复活,直接上天堂。1993年2月28日,美国联邦烟酒与军火管理局包围庄园。大卫教派进行武装抵抗。联邦调查局遂接手此案,调来450名军警,数十辆装甲车、坦克和直升机,包围庄园并断水断电。至4月19日,双方对峙51天,无一信徒投降。联邦调查局遂用坦克进攻庄园,施放催泪弹。(转下页)

当把崇拜视为“神秘怪诞的”(weird)。杰弗里·哈登是一位一线宗教社会学家,他就指出(Hadden 1997),人类曾经创设的大约10万个宗教,都有一度是新兴的;即使不是全部宗教,绝大部分宗教最初也是属于当时的正派宗教信仰所蔑视的崇拜。耶稣之所以被钉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他的观念极大地威胁了古代犹太王国(Judaea)受罗马人主导的宗教建制的既定秩序。

三 运动

宗教运动^①代表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运动的一种亚型。

有关社会运动的讨论,详参第二十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所谓宗教运动,就是一群人聚合在一起,传播一种新宗教,或提倡对于一种既有宗教的新解释。宗教运动比教派规模更大,在其成员资格方面排外意味也要弱一些,不过,这些运动和教派(崇拜)之间并不总能有明确的分别,就像教会与教派之间一样。事实上,所有的教派与崇拜都可以归类为宗教运动。宗教运动的实例包括:在公元一世纪最初创立并传播基督教的那些群体;在大约1500年以后分裂了欧洲基督教的路德改革运动;再到晚近,是伊斯兰革命运动中的有关群体(详参本章下文)。

宗教运动往往要经历某些特定的发展阶

段。在第一个阶段,运动常常会从某位强有力的领袖那里获得生命力与统合力。韦伯把这类领袖归为克里斯玛^②类型,也就是具有富于感召力的品质,有能力吸引追随者的想像力与献身精神。(在韦伯的阐述中,克里斯玛型领袖除了宗教人物,还可以包括政治人物)宗教运动的领袖们常常对宗教建制持批判立场,并力求宣扬一种新的预言。宗教运动在其初年总会灵活可塑,并不具备固定的权威体系。它们的成员通常能直接接触到克里斯玛式领袖,齐心协力,共倡新说。

而当领袖去世之后,就开始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很少会从大众之中涌现新的克里斯玛式领袖,因此这个阶段非常关键。运动现在面临着韦伯所称的“克里斯玛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 of charisma)。要想维持下去,它就得设立正式的规章制度,因为它不能再仰赖领袖在组织追随者时发挥的核心作用。许多运动就是在其领袖们去世或丧失影响力之后逐渐衰微的。换言之,运动将成为信徒们的正式组织,有固定的权威体系,固定的符号和仪式。而教会本身又会在日后某一时节孕育出其他运动,质疑其教义,奋起对抗,乃至彻底分裂。

四 新兴宗教运动

虽然在最近的数十年中,传统教会的成员数量正在减少,但其他形式的宗教活动却呈上升势头,我们可以从图14.3和图14.4看到这一点。社会学家用新兴宗教运动来概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与主流宗教并存的

(接上页)庄园突然起火,很快被大火吞没。考雷什以下86人葬身火海,被救出的9人中有人拼命挣扎要返回大火中受死。此事件立即引起各方面争议,关于警方是否能有更周全的解决方式,自然是众说纷纭。至于大火起因,警方称教徒们在3个地方放火,汽油四溅,大火蔓延;而被监禁的6名生还教徒互不见面却有相同的回忆:装甲车压扁一桶丙烷,丙烷随着横冲直撞的装甲车撒到四处。不巧一盏马灯被撞翻,引起大火。大卫教派在世界各地至今还有信徒,视考雷什之死为耶稣之死,并等待他复活。

① 此处原文格式如此,但术后的术语表并未收入该词条。

② 此处原文格式如此,但术后的术语表并未收入该词条。

各色宗教与灵修群体 (spiritual groups)、崇拜以及教派。新兴宗教运动涵盖的群体五花八门,从新纪元运动中的灵修与自助群体,到诸如黑天会这样的排他性教派 (全称为国际黑天觉悟会)。

新兴宗教运动中有很多是来源于我们讨论过的一些主流宗教传统,比如印度教、基督教和佛教,不过有一些却来自西方此前一无所知的传统。一些新兴宗教运动在本质上是领导这些运动的克里斯玛式领袖的新创造。文鲜明神父所领导的统一教团就属其中一例,其支持者视其为救世主,而其教团则号称有 450 万信众。新宗教运动中的信众大多数都是皈依者,而不是自幼成长于特定的信仰中。他们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中产阶级的背景。

英国的绝大多数新兴宗教运动都是起源于美国或东方,不过也有少数是在英国创立的,诸如 (1955 年创立的) 以瑟瑞斯会和 (1971 年创立的) 阿明基金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美国的宗教团体就遍地开花,远远胜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其中包括史无前例的一系列宗派合并与分裂。其中绝大多数只是昙花一现,但有一些却赢得了数量可观的信徒。

关于新兴宗教运动的盛行,已经有多个理论试图予以说明。一些研究者认为,新兴宗教运动应当视为是对整个社会乃至传统教会内部的自由化和世俗化的一种反应。有些人觉得传统宗教已经陷入仪式主义,丧失精神意义,而在规模较小、非人化意味也较少的新兴宗教运动中,却可以找到慰藉和更强烈的共同体感知。

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新兴宗教运动是社会急剧变迁的产物 (Wilson 1982)。随着传统的社会规范被打破,人们既要寻求说明,又要重建信心勇气。比如,许多强调个体灵修的群体和教派之所以兴起,表明很多个体在面对不

稳定、不确定时,感到需要重新与其价值观和信仰之间建立维系。

还有一个因素或许在于,新兴宗教运动吸引的都是那些感到疏离于主流社会的人。一些学者认为,教派与崇拜的集体性、公共性的取向可以提供支持和一种归属感。比如说,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从物质角度来说并没有被社会边缘化,但他们在情感上和精神上却可能感到孤立无依。成为崇拜的一员或许可以有助于克服这种疏离感 (Wallis 1984)。

新兴宗教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类别来理解:入世型运动、拒世型运动和顺世型运动。它们都是基于单个群体与广泛的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

入世型运动

入世型运动更像是自助性或疗治性的群体,而不是传统的宗教群体。这些运动往往缺乏仪式、教会和正统的神学理论,而是把焦点放在成员的精神健康上。顾名思义,入世型运动并不拒斥外部世界或其价值,而是力求释放其追随者的潜力,以提高他们在外部世界积极行动并赢得成功的能力。

科学论教会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它由哈巴德创建,从加利福尼亚的策源地发展壮大,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信徒。科学论教徒认为,我们全都是灵性的存在,但都忽视了自己的灵性。通过训练,让人们领悟到自己真正的灵性力,他们就可以恢复已经被遗忘的超自然力,清醒自己的头脑,发掘出全部的潜能。

所谓的新纪元运动的很多分支都可以归入入世型运动。新纪元运动始于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反文化思潮,涵盖了形形色色的信仰、仪轨和生活方式。异教徒的教义 (凯尔特人的、德鲁伊特人的^①、印第安人的,等等)、萨满教、各种亚洲神秘主义、巫术仪式 (Wiccan rituals),还有禅定,这些仅仅是被视为“新纪

^① 德鲁伊特人的 (Druidic): 德鲁伊特是古代凯尔特人中有学识的一批人,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史载最早见于凯撒《高卢战纪》。

元”的活动的一小部分。

表面上看,新纪元运动的神秘主义似乎与助其发展的现代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新纪元运动的追随者挖掘并发展另类生活方式,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不过,不应当把新纪元运动简单地解释成跟现时代的彻底决裂,而是应该认为它们属于一条更广阔的文化演变轨迹,这条文化演变轨迹恰恰例证了主流文化的诸多方面。在晚期现代社会,个体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主和自由来绘制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纪元运动的目标跟现代社会非常贴近:人们受到鼓励去超越传统的价值和期望,积极主动而富有反思地过自己的生活。

拒世型运动

与人世型运动相反,拒世型运动严厉地批评外部世界。它们往往要求其追随者的生活方式做出显著改变,有可能期望其成员过禁欲苦行的生活,改变自己的装束或发式,或者按一定的规定进食。与本质上倾向于包容性的人世型运动相反,拒世型运动常常是排他性的。一些拒世型运动表现出总体性制度的特征;其成员被要求把个体的认同归于集体的认同,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或规章,并停止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

从投入时间和献身程度来说,比起已经确立的老派宗教,大多数拒世型运动对其成员施加了更多的要求。据说一些群体还使用“感情攻势”^①的技巧来赢得个人的完全依附。一个潜在的皈依者会淹没在不加掩饰的情感关注与持续展示之中,直至他或她从情感上融入这一群体之中。实际上,一些新的运动已经受到指控对其追随者实施“洗脑”,即力图控制他们的思维,以此来剥夺他们独立决策

的能力。

很多拒世型崇拜和教派都已经处于政府当局、媒体和公众的严密审视之下。拒世型崇拜的一些极端个案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比如说,1995年,日本团体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向东京地铁系统施放了致命的沙林毒气,致使成千名乘客中毒,其中12人不治身亡。(该崇拜团体领袖麻原彰晃于2004年2月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至于美国的大卫庄园教(本节上文有所讨论),当它被指控虐待儿童和私藏武器,于1993年陷入了与美国政府当局的殊死对峙,也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拒顺世型运动

第三类新宗教运动跟传统宗教最为相似。顺世型运动往往强调,内在的宗教生活比世俗挂怀更为重要。这类运动的成员力图恢复他们相信已经在传统的宗教框架中失落的精神纯洁。人世型团体和拒世型团体的追随者往往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符合他们的宗教活动,而顺世型运动的许多追随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却看不出什么显著的变化。五旬节教派就是顺世型运动的一例。五旬节教派教徒相信,可以从那些被赋予了“说别国的话”(speaking in tongues)之天赋的个体那里听到圣灵(Holy Spirit)的声音。

14.2.5 基督教、社会性别与性

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教会和宗派是具有明确权威体系的宗教组织。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女性在这些等级体系中基本上被排斥在权力之外。这一点在基督教中很明

^① 感情攻势(love bombing):指采用重点突出的语词和意象,对有针对性选取的对象进行持久、重复、激情的宣讲,以达到拉拢门下、收服人心、左右思维的效果。在一些新兴宗教运动和传销之类日常生活活动中比较常见。

显,不过也是各大宗教所共有的特征。

大约 100 年前,美国女权运动分子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发表了一系列《圣经》评注,并冠名为《女性的圣经》(The Woman's Bible)。在她看来,神是把男人和女人作为同等价值的存在创造出来的,《圣经》应该充分反映这一事实。她认为,《圣经》中的“男性特质”的意味并没有反映上帝的真言,而只是反映出《圣经》由男人们写成这一事实。1870 年,英国圣公会成立了一个修订委员会,来修订和更新《圣经》文本。但斯坦顿指出,委员会中没有一个女性。她强调,既然《圣经》中很清楚地说明,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是男性的。在一次女权会议上,斯坦顿的一位同事以“吾主天母”(God, our Mother)的祈祷作为开场,引来教会当局的强烈回应。但斯坦顿不为所挠,在美国另组了一个女性修订委员会,由 23 名女性组成,帮助她一起完成《女性的圣经》,并于 1895 年出版。

100 年之后,安立甘教会^①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为男性所主导,虽说这一局面在最近已经开始转变。从 1987 年到 1992 年,圣公会允许女性担任教堂会吏^②,但还不能担任司铎^③。但在官方的角度上,她们仍属于在俗人员(laity),不允许主持一些基本的宗教仪式,譬如祝福和婚配。1992 年,在压力渐增之下,尤其是受到英国国教会内部的女性的压力,教务会(Synod,即管理裁决会议)投票决定,允许女性担任司铎。但安立甘教会中许多保守

分子依然反对这一决定,认为全面接受女性是对神启圣经真理的渎神背离,而且这也是离与普世教会的最终重新统一又远了一步。因为允许女性担任司铎这一决定,有些人决定退出英国国教会,并且大多转归天主教。十年之后,英国国教会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司铎是女性,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女性司铎的人数会超过男性。2005 年 7 月,英国国教会投票决定启动进程,逐步允许女性担任主教(bishop),不过,这个决定遭到国教会中几位资深要人的强烈反对。

普世教会对于女性的态度比英国国教会更为保守,坚持在形式上维持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有关授予女性圣职的呼吁不断遭到天主教廷当局的拒绝。1977 年,罗马的天主教信理部^④正式宣布,女性不允许担任天主教会中的司铎之职。所给出的理由是:耶稣从未选召任何女性做过他的使徒。2004 年 1 月,叛教者阿根廷主教罗慕洛·安东尼奥·布拉斯基授予司铎的 7 位女性,被天主教廷处以绝罚,^⑤其所授圣职被梵蒂冈废除。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20—2005)鼓励女性回归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抨击那些男女并无本质不同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给女性自由加上新的枷锁的禁止堕胎和避孕政策(Vatican 2004)。

近些年来,安立甘教会中的争议已经从性别问题转向同性恋和司铎职位的问题。同性恋者长期以来就在基督会^⑥中任职,但其性倾向要么被压制,要么被忽视,或是未被发现。(天主教会依然坚持 1961 年所阐明的立场:那些

① 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新教圣公会的别称,起初单指英格兰圣公会,后亦泛指各国圣公会。

② 会吏(deacon,女性为 deaconess):弥撒时可协助神父参与一定的礼仪,经过一定时日的历练,多数(这里默认指男性)皆可升为神父。天主教称助祭,圣公会称会吏。

③ 司铎(priests):又称“司祭”,“神父”系尊称,非正式品名。天主教和东正教中协助主教管理教务,通常负责一个教堂。原中译本译为“牧师”,系新教一些教派中对于相应职事的称法。圣公会虽系新教宗派,但基本保留了天主教教制。

④ 信理部(Sacred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罗马教廷下设九圣部之一,前身为名声不佳的罗马异端裁判所。现主要从正面宣传正统教义并保护被控偏离正统者的权利。

⑤ 绝罚(excommunication):教会制裁的一种形式,将某人从信徒团契中革除,不许参加教会圣礼,不得领受圣体,死后不得按教礼殡葬。

⑥ 基督会(Christian Church):基督教保守派别,主要存在于美国中西部和西南部。

受到对于同性恋的“变态倾向影响”的人,必须禁止其发愿或获授圣职) 其他新教宗派已经对同性恋采取了开明政策,在一些较小的宗派里,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神职人员也被允许担任牧师。1972年,荷兰的福音信义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在欧洲各基督教宗派中率先决定,男女同性恋者皆可任职牧师。其他一些宗派,比如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于1988年)和挪威信义会(Norwegian Church)(于2000年),也予以效仿。

2003年6月,有关是否允许同性恋者担任司铎职位的争论在英国走向前台。杰弗里·约翰博士过着独身生活,已经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时被任命为雷丁(Reading)主教。他的任命导致了国际圣公会内部的激烈争论,最终他拒绝履职。2003年8月,美国圣公会的基层教众投票选出了一位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为主教,他就是新罕布什尔的吉恩·罗宾逊神父。一个持保守立场的院外集团圣公宗主流(Anglican Mainstream)也已经创立,进行游

说活动,反对任命同性恋神职人员。此议题尚在争议之中。

第三节 世俗化与宗教复兴

14.3.1 世俗化

如前所示,早期的社会学思想家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认为传统的宗教将在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处于边缘。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相信,随着社会实现现代化,并更加依赖于科学和技术来控制 and 说明社会世界,就必然会出现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就是宗教丧失其对于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的影响的过程。

围绕世俗化命题的争论是宗教社会学中最错综复杂的领域之一。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支持世俗化命题的人同意社会学创建先贤们的观点,认为宗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力量和重要性趋于衰退;而反对这个概念的人则认为,宗教仍不失为一股显著力量,只是其表现形式



许多礼拜场所现在已经另作他用,比如位于英格兰北部阿姆利(Armley)的这家地毯折扣店。

常常会显得新鲜而陌生。

诸多新兴宗教运动广为流行,并且经久不散,就对世俗化命题提出了挑战。反对该命题的人指出,新兴宗教运动形式多样,活力无限,并提出,宗教与灵修依然是现代生活的一个核心方面。传统宗教固然已是风光不再,但宗教并未趋于消失,而是被导入新的方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一说法。支持世俗化观念的人也指出,虽然这些运动对于其追随者个人的生活来说,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就作为整体的社会而言,这些运动依然是边缘性的。新兴宗教运动各自为战,相对来说缺乏组织。由于成员会被这股运动吸引一时,而后又转投新的运动,因此新兴宗教运动也苦于人员像走马灯似的轮换。他们认为,跟严肃的宗教担当相比,参与一股新兴宗教运动仿佛更像是一种消遣或者生活方式的选择。

社会学角度之辩

世俗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概念,其原因部分在于,究竟如何来衡量这个过程,基本没有什么共识。不仅如此,很多社会学家所使用的宗教概念也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最好是参照传统教会来理解宗教;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更广泛一些,涵盖个人的灵修和对于某些价值的深切担当之类的维度。这些认知上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支持还是反对世俗化的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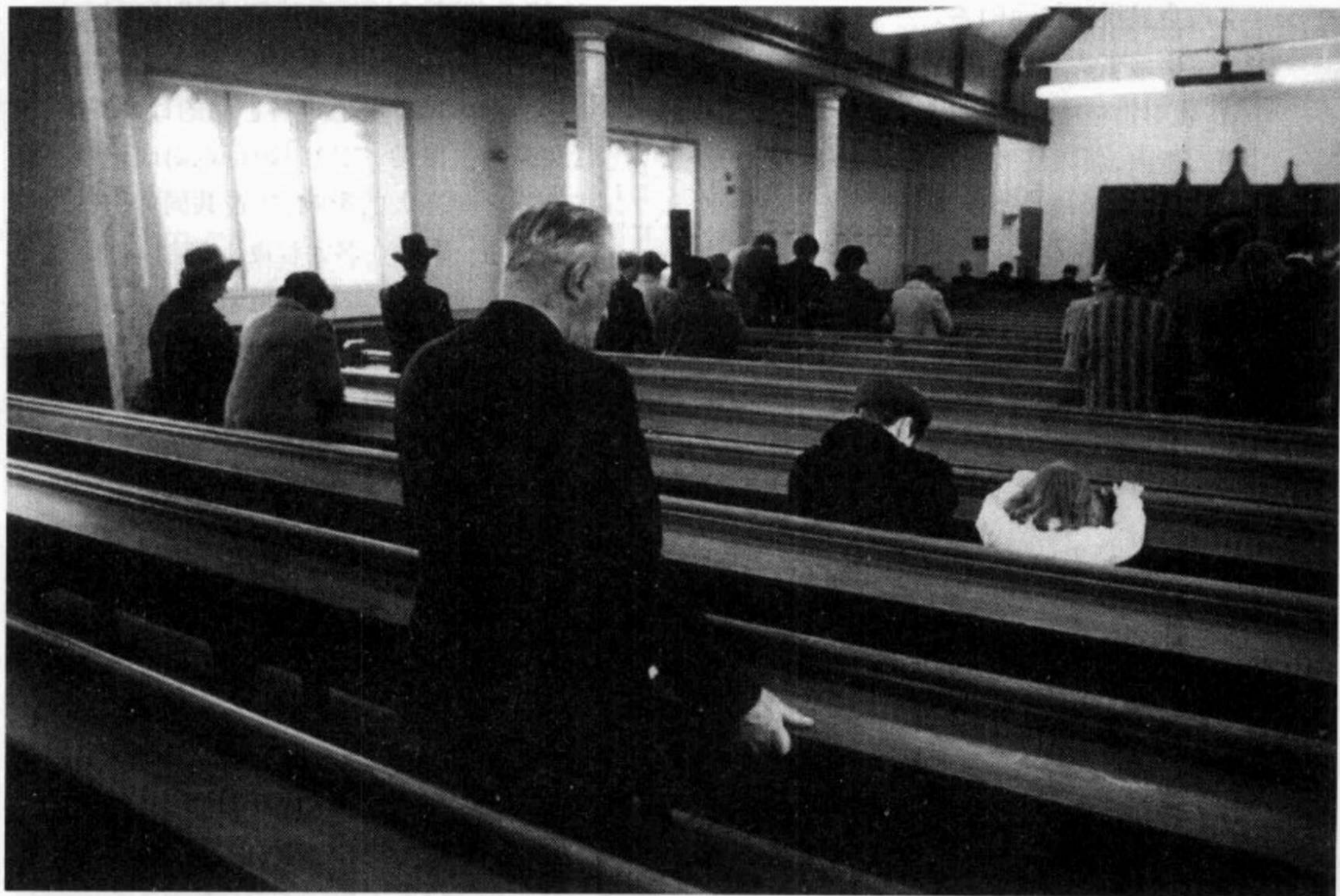
世俗化可以从多个方面或维度来评估。其中一些在本质上是客观的,比如宗教组织的成员规模。统计数据 and 官方记录可以表明,有多少人属于某个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又有多少人在积极参加礼拜或其他宗教仪式。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根据这一指标,除了美国,工业化国家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经历了世俗化。在英国出现的宗教衰退模式亦见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包括法国或意大利这样的天主教国家。意大利人比法国人更多地定期去教堂,参加重大的宗教仪式(如复活节圣餐仪式)。但在这两个国

家,宗教仪式式微的整体模式却是相似的。

世俗化的第二个维度是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它们的社会影响、财富和声望。以前,宗教组织可以对政府和社会机构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并在共同体中获得高度的尊重。现状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如此?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算我们把眼光限于上一个世纪,我们也会看到,宗教组织已经逐渐失去它们曾经拥有的大部分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而且这一趋势是世界性的,尽管有一些例外。教会领导人不再能理所当然地指望自己会有强大的影响力。虽然不管这么说,一些建制完备的教会依然富有,而且新兴宗教运动也可能会迅速集聚财富,但是,许多老资格的宗教组织的经济状况还是得不到保障。教堂和庙宇不得不被拿来出售,要不就是长年失修。

世俗化的第三个维度涉及信仰和价值观。我们可以称其为宗教虔信(religiosity)。很显然,去教堂的频率多少,教会的社会影响程度大小,并不一定直接表现出人们所持的信仰或理念。许多有宗教信仰的人并不是定期去做礼拜或参加公共典礼;反过来说,即使定期去做礼拜或参加公共典礼的人,也并不总是表明抱有强烈的宗教信念,而可能只是出于习惯,或是顺应其所在共同体对他们的期望。

至于世俗化的其他维度,我们需要对过去有准确的了解,以便知道今天人们的宗教虔信已经下降到什么程度。支持世俗化命题的人认为,过去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远比现在更重要。教会不仅处于地方事务的核心,并且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有强烈的影响。不过,批评世俗化命题的人则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人们更经常去教堂就认为他们更虔诚。在许多传统社会,包括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宗教信仰的投入可能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强烈和重要。例如,对于英国历史的研究表明,普通人对于宗教信仰普遍抱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在大部分文化中,尤其是较大的传统社会中,似乎也都能发现宗教怀疑论



在英国,上教堂的人数在过去一个世纪剧减,而教区会众(congregation)的平均年龄则显著上升。不过,近些年来,有些宗派的仪式出席人数有所回升。

者(Ginzberg 1980)。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今天宗教思想的控制力要弱于传统社会的整体状况,如果我们把人们所信仰的全部超自然因素都归入“宗教”这一术语,情况就更是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根本不再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充斥着神灵或精灵。当今世界上一些主要的紧张状态,譬如困扰着中东、车臣共和国和苏丹的那些紧张状态,主要或部分就是根源于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但是,当今大多数冲突和战争在本质上主要还是世俗的,与歧异的政治信条或物质利益有关。

记住世俗化的这三个维度,让我们来评述一下宗教在英国和美国近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看看它们如何支持或抵触了世俗化的观念。不过,我们首先来简述一下宗教在欧洲的发展状况。

14.3.2 宗教在欧洲

在欧洲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演进过程中,基督教的影响力是一个关键的要素。我们现在界定为欧洲的区域的一种可能边界,就是11世纪的时候欧洲基督教思想中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所划出的界限,在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在许多东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希腊、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东正教依然是主导宗教。

而在西欧,16世纪时这块大陆再一次分裂为天主教区域和新教区域,这是基督教思想中的第二次重大分裂。这个过程被称为宗教改革运动,西欧被分割成相对稳定的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杂然相陈,成了我们今天依然能够在地

图上看到的这个样子,与这个运动是分不开的。大致来说,西欧被分割为新教的北方(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苏格兰)和天主教的南方(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与法国,以及较远处北方的比利时和爱尔兰),还有几个多少有些宗派混杂的国家(包括英伦三岛与北爱尔兰、荷兰和德国)。

宗教改革运动在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但却都齐心协力,力求摆脱教皇与罗马天主教廷的控制。在欧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教宗派,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政教关

系。以下我们将简要勾勒一些主要西欧^①国家中的宗教状况。

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有一个国教会(北欧信义宗国教会[the Lutheran State Church of Northern Europe])。人口中属于教会成员的比例很高,但参与宗教活动和接受基督信仰的比例都较低。这些国家都被描述成“归属但不信仰”(belonging without believing)(如表 14.1 所示)。尤其是在瑞典,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也遭到质疑。许多人觉得,在一个族群和文化上都越来越多样

表 14.1 西欧各国的上教堂频率,1990 年(%)

	周均一次	月均一次 或更少	月均一次	圣诞节、复活节 等才去	年均一次	从不
欧洲平均	29		10	8	5	40
天主教国家						
比利时	23		8	13	4	52
法国	10		7	17	7	59
爱尔兰	81		7	6	1	5
意大利	40		13	23	4	19
葡萄牙	33		8	8	4	47
西班牙	33		10	15	4	38
混合国家						
大不列颠 ^②	13		10	12	8	56
荷兰	21		10	16	5	47
北爱尔兰	49		18	6	7	18
西德	19		15	16	9	41
路德宗 ^③ 国家						
丹麦		11				
芬兰		—				
冰岛		9				
挪威		10				
瑞典		10				

资料来源: Ashford and Timms 1992; 转引自 Davie 2000, 页 9

① 这里的西欧是相对于广阔的东欧平原(主要是原苏联部分和波兰等)而言的广义上的西部欧洲。

② 包含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数据可以证明,与北爱尔兰分开统计是很有道理的。

③ 路德宗即上文所称信义宗。强调“因信称义”,即人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全凭信仰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的礼仪、规条和善功。

化的国家里,国家政府给予一个教会特别优惠的观念显得格格不入。

德国仍然可以说明明显表现出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分割。尽管如此,首先是穆斯林人口的愈益增长(参看下文的图 14.2),其次是自称没有任何宗教效忠关系的人数越来越多,都对这一局面构成了挑战。造成后一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包括 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东西德重新统一,以及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的基督教政策。

法国基本上是个天主教国家,但它非常类似于北欧各新教国家,都体现出较低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活动水平(参看表 14.1)。在西欧各国中,法国的政教分离最为严格。国家政府严守世俗,拒绝优惠任何宗教或宗派。这就使得在所有国家机构中不得谈论宗教,包括禁止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这种严格的政教分

离导致 2004 年 9 月出台禁令,禁止在法国学校中出现“扎眼的”(conspicuous)宗教物品。此项禁令引起广泛争议,尤其影响到那些穿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基本上属于天主教。它们所展现出来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活动的水平,要高于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特别是高于那些北欧国家(参见表 14.1)。天主教廷的大本营就在意大利境内,^①对这几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意大利,天主教相比于其他宗派和宗教而享有特权待遇。在西班牙,天主教会内战中大力支持政治右翼,而内战导致了 1939 年至 1975 年佛朗哥将军的独裁。西班牙的国家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并无任何正式联系,但天主教会以其成员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得享优惠。在葡萄牙,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进行了某种宪政改革,但天主教会在法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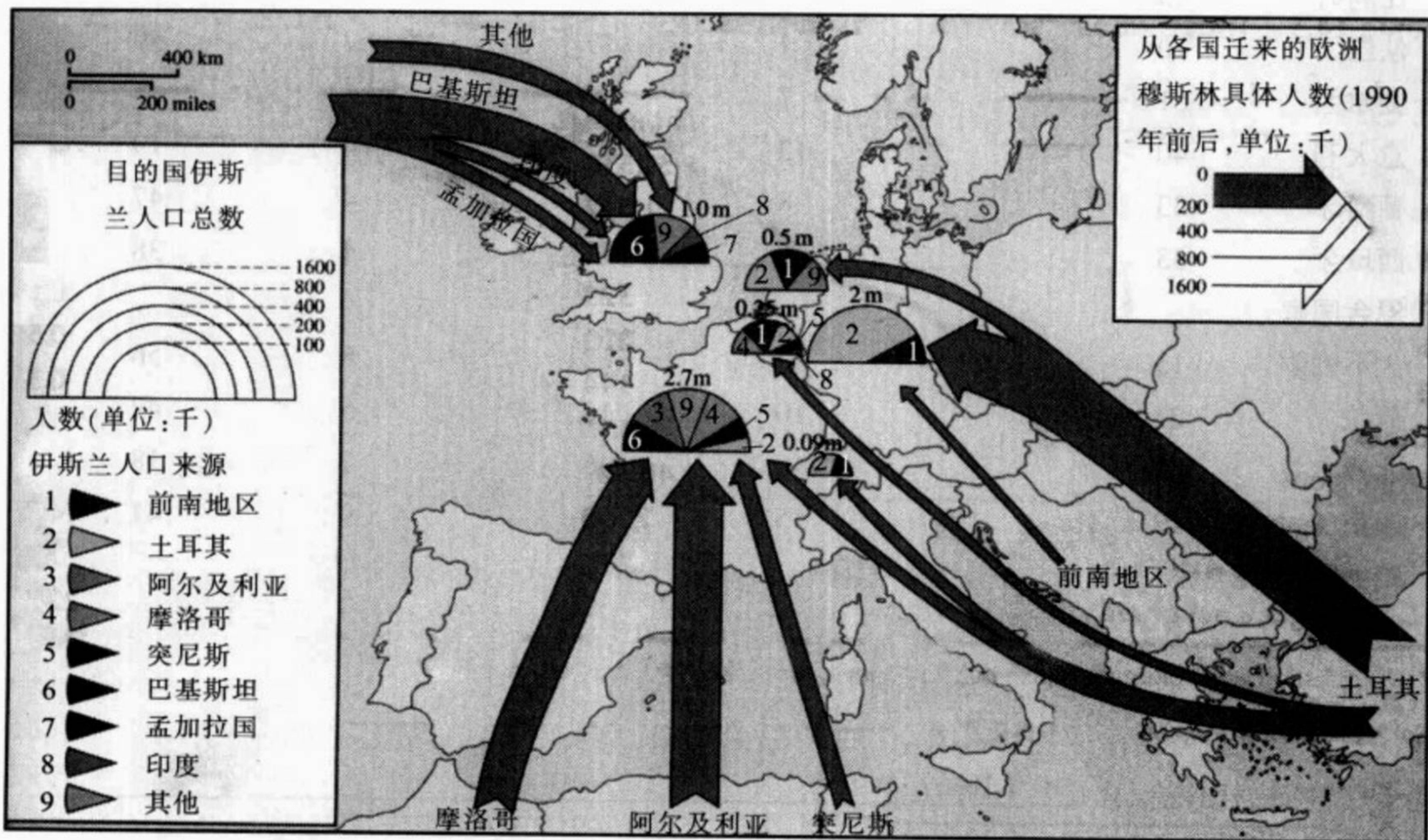


图 14.2 从各国迁来的欧洲穆斯林具体人数以及欧洲各目的国的伊斯兰人口总数
资料来源:Vertovec and Peach (1997);重印于 Davie (2000),页 128

① 梵蒂冈城国虽然被罗马城环绕,但毕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微型国家。

依然享有一定的影响力 (Davie 2000)。

宗教少数群体

欧洲也是规模可观的非基督教宗教少数群体的家园。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但他们的晚近历史却充满了反犹歧视乃至种族灭绝。

有关种族主义和歧视的讨论,详参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离开了欧洲,去往新创立的以色列国。这些因素意味着,在 20 世纪,在欧洲生活的犹太人数量锐减,从 1937 年的 960 万下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不到 200 万(如表 14.2 所示)。

在 20 世纪,部分是由欧洲的殖民历史所塑造的全球迁移,也导致了规模可观的非犹太——基督教少数群体第一次在整个欧洲大陆蓬勃发展。其中,伊斯兰教显然是最大的一种非基督教信仰,在欧洲至少有 6 百万教众,占欧洲人口大约 3%。(图 14.2 展示了穆斯林向欧洲迁移的输入国及输出国) 法国与北非之间历史上存在殖民关联,造成法国的穆斯林人口蔚为可观,多达 3 百到 4 百万。与此截然不同,德国的大量穆斯林移民劳工则是来自土耳其和东南欧。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大部分来自印度次大陆上前属英帝国的一些国家 (Davie 2000)。下面,我们就来展现一幅更为广阔的英国宗教图景。

14.3.3 宗教在英国

在 2001 年以前,150 年以来的人口普查中一直没有包括有关宗教的问题。因此,最近的这次普查就比此前历次评估远为精确地绘

制出英国的宗教状况,因为那些评估只是基于民调和个别宗派的报告。2001 年的普查发现,英国人口中大约 78% 报告自己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几乎有 72% 的人自述为基督徒。其他宗教在英国的信奉者远远少于基督教。第二常见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将近 3% 的人口自述为穆斯林。其他重要群体还包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犹太教徒和佛教徒,但每一种占总人口的比例都不到 1% (参看表 14.3)。

在整个英国,人们与某个宗教的认同程度有很大差异。北爱尔兰的民众更有可能说他们认同于某一宗教 (86%), 高于英格兰与威尔士民众 (77%) 和苏格兰民众 (67%)。鉴于此地历史上一向是宗教冲突之地,或许这并不让人吃惊。英国人口中大约有 16% 声称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这一类别中包含了不可知论者 (agnostics) 和无神论者 (atheists)。(还包括了多达 39 万人——虽然不到总人口 1%——自述其信仰宗教为“绝地武士”(Jedi)。根据媒体报道,这是受到一场恶作剧电邮宣传运动的激发,它煞有其事地声称,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其普查表上提及绝地武士,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核心的信仰体系就会得到政府的官方认可)

尽管英国人口中有超过 70% 的人自述为基督徒,但定期去教堂的人数就要少得多。根据 1851 年的宗教人口普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 40% 的成年人每个礼拜日都要去教堂做礼拜;到 1900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35%,到 1950 年已经下降至 20%,而到 2000 年,更只有 8%。(圣公会教会成员数的下降可见图 14.3)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各主要宗派平均失去了 5% 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其中最显著的下降是罗马天主教廷的成员(下降 8%)。不过,目前也有一些迹象表明,这种下降趋势正在转缓。比如说,在大伦敦郡,去圣公会教堂的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下降了 30%,但从 1989 年到 1998 年,又上升了 3%。而在英国国

表 14.2 欧洲的犹太人口,1937 年—1994 年

	1937	1946	1967	1994
奥地利	191,000	31,000 ^a	12,500	7,000
比利时	65,000	45,000	40,500	31,800
保加利亚	49,000	44,200	5,000	1,900
捷克斯洛伐克	357,000	55,000	15,000	7,600 ^b
丹麦	8,500	5,500	6,000	6,400
爱沙尼亚 ^c	4,600	—	—	3,500
芬兰	2,000	2,000	1,750	1,300
法国	300,000	225,000	535,000	530,000
德国	500,000	153,000 ^a	30,000	55,000
英国	330,000	370,000	400,000	295,000
希腊	77,000	10,000	6,500	4,800
匈牙利	400,000	145,000	80,000	56,000
爱尔兰(共和国)	5,000	3,900	2,900	1,200
意大利	48,000	53,000 ^a	35,000	31,000
拉脱维亚 ^c	95,000	—	—	18,000
立陶宛 ^c	155,000	—	—	6,500
卢森堡	3,500	500	500	600
荷兰	140,000	28,000	30,000	25,000
挪威	2,000	750	1,000	1,000
波兰	3,250,000	215,000	21,000	6,000
葡萄牙	n/a	4,000	1,000	300
罗马尼亚	850,000	420,000	100,000	10,000
西班牙	n/a	6,000	6,000	12,000
瑞典	7,500	15,500	13,000	16,500
瑞士	18,000	35,000	20,000	19,000
土耳其 ^d	50,000	48,000	35,000	18,000
苏联/独联体 ^d	2,669,000	1,971,000	1,715,000	812,000
南斯拉夫	71,000	12,000	7,000	3,500 ^e
总和	9,648,100	3,898,350	3,119,650	1,980,900

说明:这些数据是根据多种资料来源汇编而成的,信度不一,有些数据的误差幅度和解释空间较大。这一警示尤其适用于 1946 年的数据,该年的犹太人口运动规模可观。还必须记住,从 1937 年到 1946 年,许多欧洲国家的边界发生了变化。

n/a=无数据

a:包括“难民”。

b:捷克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合计。

c:波罗的海诸国自 1941 年至 1991 年被并入苏联。

d:亚洲区域数据扣除。

e:为前南斯拉夫地区合计。

资料来源:Wasserstein 1996;转引自 Davie 2000,页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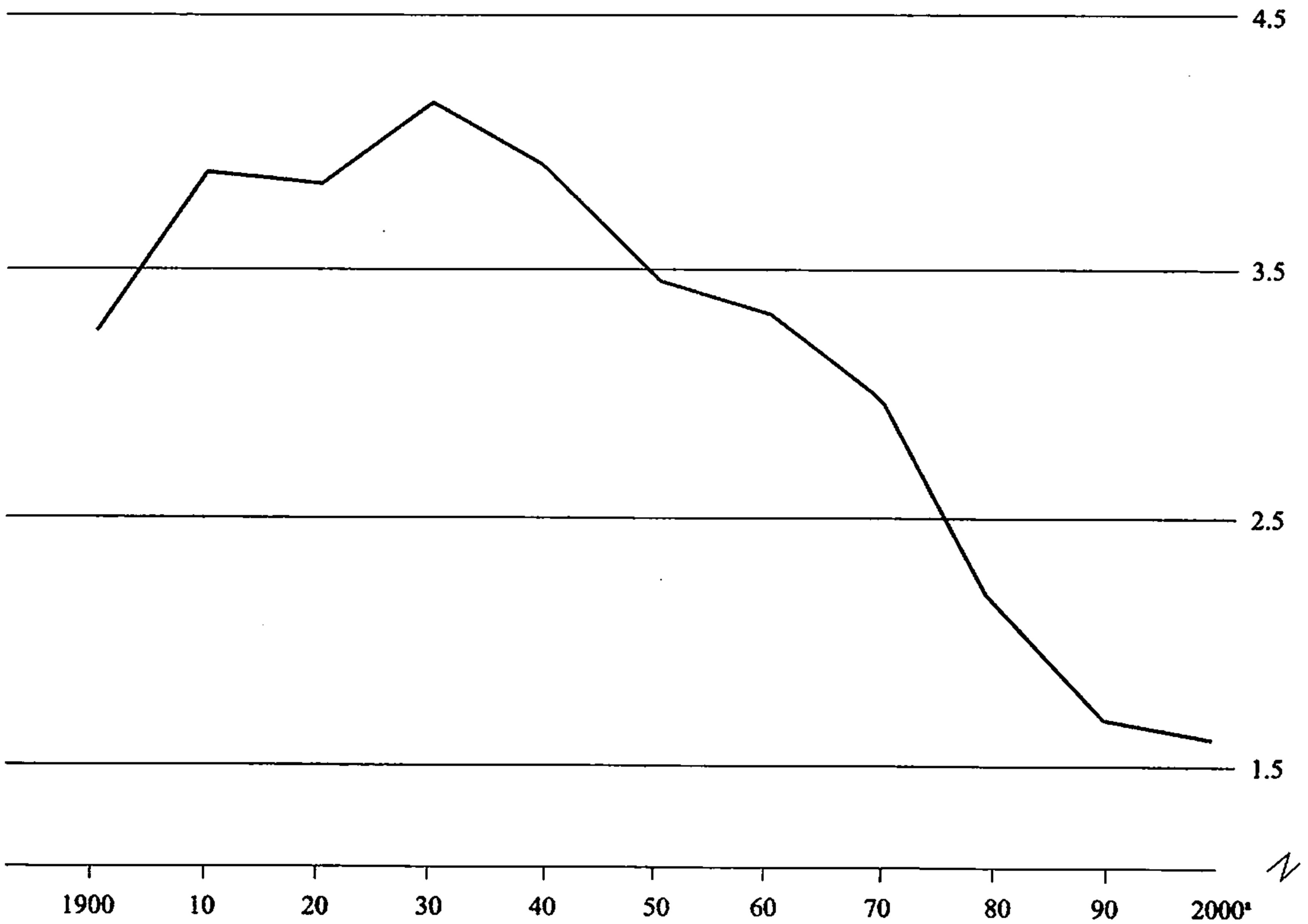


图 14.3 英国圣公会会众总数, 1900 年至 2000 年 (单位: 百万)

a: 估计数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2000 年 12 月 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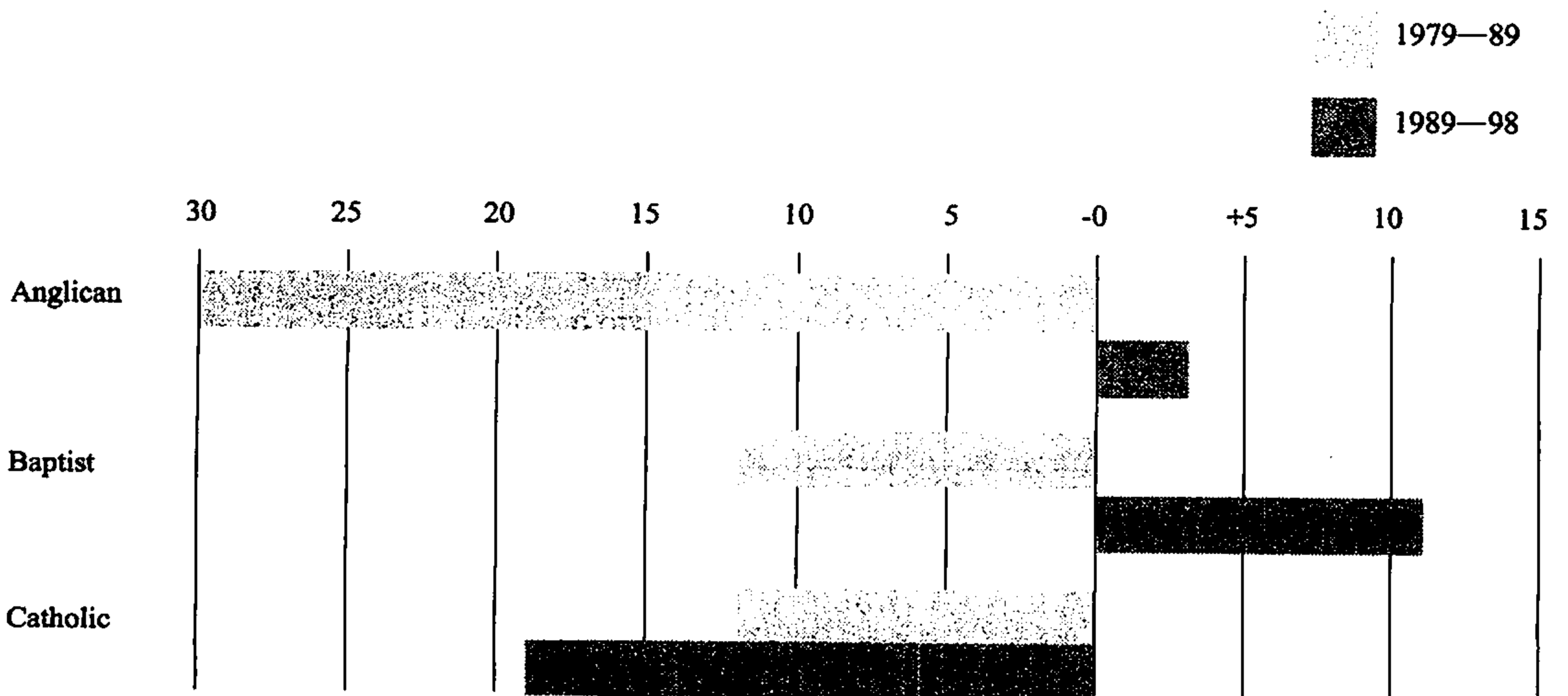


图 14.4 大伦敦区上教堂人数的比例变化, 1979 年至 1998 年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2000 年 12 月 21 日)

教会之外,浸礼会教徒(Baptists)上教堂的人数从1989年到1998年上升了11%,参看图14.4(The Economist,2000年12月21日)。

不过,这种上教堂人数下降的总体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平均的。比如说,在信奉三位一体论(Trinitarian)各教会与不信奉三位一体论(non-Trinitarian)各教会之间就存在着差异。信奉三位一体论各教会包括圣公会教徒、天主教徒、循道宗教徒和长老宗教友(Presbyterians)等等,这些教会都相信上帝的三位一体。信奉三位一体各教会的成员从1970年的880万下降到1994年的650万。然而,一些不信奉三位一体论的教会,比如摩门教徒(Mormons)与耶和华见证会成员(Jehovah's Witnesses),其成员数在同时期却有所增加(参见表14.4)。在少数族群中,上教堂和参与宗教仪式的人数也在上升。一些“新兴宗教运动”(参见本章第二节第四小节)在英国也吸引了

不少追随者。

在英国,宗教状况在年龄、性别、阶层和地理分布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的模式。一般来说,老年人要比年轻的年龄群体更信仰宗教。上教堂的年轻人在15岁年龄组达到顶峰;过了这个年龄,人数就下降很多;他们一直要到三四十岁,热情才会有所重振。在这以后,上教堂的频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涉入组织化的宗教。在圣公会各教会,这种情况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基督教科学派各教会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四比一。^①

一般而言,富人比穷人更多地参加礼拜和宣称有宗教信仰。英国国教会被称作“祷告者中的保守党”,这种说法颇有几分道理。天主教徒更多是工人阶级。这种阶级倾向也体现在投票模式中:圣公会教众往往投保守党的票,而天主教徒和许多循道宗会众则愿意投工党的票,循道宗起初就跟工党的兴起有密切的联

表 14.3 2001 年人口普查中英格兰与威尔士自述为“归属某一宗教”者^a

	万人	百分比
基督徒	3733.8	71.7
穆斯林	154.7	3.0
印度教徒	55.2	1.1
锡克教徒	32.9	0.6
犹太教徒	26.0	0.5
佛教徒	14.4	0.3
其他	15.1	0.3
所有宗教	4033.2	77.5
无宗教归属	770.9	14.8
未说明宗教	401.1	7.7
所有无宗教归属与未说明宗教	1172.0	22.5

a: 问题为自愿选答,备选框勾选,问题为“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资料来源:Social Trends 34(2004),页209

① 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由玛丽·贝克·艾梯夫人(Mary Baker Glover Eddy,1821—1910)于1879年在美国创立。以实行精神疗法闻名。认为耶稣的身份独特地表现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根据正统理解,这种身份是属于一切男人与女人的。该派中的女性大量担任开业师(专职治病的教友)和教务人员,被许多人视为推动了女权运动。艾梯本人主张,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应体现在政治和社会上。

系。^①人们的居住地不同,宗教参与也有很大的不同:在默西塞德郡(Merseyside)有35%的成年人、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有32%的成年人都是教会成员。相比之下,亨伯塞德郡(Humberside)只有9%的成年人、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有11%的成年人是教会成员。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外来移民——利物浦拥有大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好像伦敦

北部是犹太人聚居地,而布拉德福德(Bradford)聚居了很多穆斯林和锡克教徒。^②

从对日常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看,宗教差异在北爱尔兰要比英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明显。那里发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只有很少一部分源于双方各自的信仰,但却常常激烈尖锐,充满暴力。宗教在北爱尔兰的影响很难与敌对态势中涉及的其他因素相

表 14.4 英国宗教社群,1975—2005(单位为百万)

宗派群体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圣公会教徒	29.3 ²	29.0 ²	28.8 ²	28.6 ³	28.4 ²	28.3 ²	28.2 ²
罗马天主教徒	5.6	5.7	5.7	5.7	5.9	5.8	5.8
公谊会 ^③ 教徒	0.4	0.4	0.4	0.5	0.5	0.5	0.6
长老会教徒	3.4 ²	3.3 ²	3.2 ²	3.2 ²	3.1 ²	2.9 ²	2.9 ²
浸礼会教徒	0.5 ²	0.5 ²	0.5 ²	0.5 ²	0.5 ²	0.5 ²	0.5 ²
循道会教徒	1.7 ²	1.6 ²	1.5 ²	1.5	1.4 ²	1.3 ²	1.2 ²
所有其他教会教徒	1.0	1.2	1.3	1.2	1.3	1.4	1.3
信奉三位一体论各教会教徒合计	41.9	41.7	41.4	41.2	40.9	40.7	40.5
不信奉三位一体论各教会教徒合计	0.7	0.8	1.0	1.1	1.3	1.4	1.4
基督徒合计	42.6	42.5	42.4	42.3	42.2	42.1	41.9
穆斯林	0.4	0.7 ²	1.0 ²	1.3 ²	1.4 ²	1.6 ²	1.7 ²
印度教徒	0.4 ²	0.5 ²	0.5 ²	0.5 ²	0.5 ²	0.6 ²	0.6 ²
锡克教徒	0.1 ²	0.1 ²	0.2 ²	0.2 ²	0.3 ²	0.3 ²	0.4 ²
犹太教徒	0.4	0.3	0.3	0.3	0.3	0.3	0.3
佛教徒	0.0	0.1	0.1	0.1	0.1	0.2	0.2
其他宗教	0.1	0.1	0.1	0.1	0.2	0.2	0.2
所有宗教合计	44.0	44.3	44.6	44.8	45.0	45.2	45.3
占人口百分比:							
基督徒	76	76	74	74	73	72	70
穆斯林	1	1	2	2	2	3	3
其他所有宗教	1	2	2	2	2	2	3
所有宗教合计	78	79	78	78	77	77	76

a: 估计数; b: 修正数; c: 此前包括佛教徒。^④

资料来源: UKCH Religious Trends 4(2003/4), 页 2.2

① 循道宗本身就是 18 世纪约翰·卫斯理为使英国圣公会重获活力而开创的运动。1795 年正式与英国圣公会决裂。在 19 世纪取得重要成功, 主要是在英国新兴工业地区, 循道宗人士一方面帮助劳动民众以精神方法克服经济困难, 又往往鼓励他们节俭生活, 提高自身经济地位。当代的循道宗礼拜仪式从简, 教牧人员与平信徒都参加教会礼拜和管理。关怀权利低薄的人们, 注重改善社会条件。成立小型团体在信仰上互相促进。

② 默西塞德郡和兰开夏郡南北相邻, 共处英格兰西北部、爱尔兰湾东岸, 利物浦为该地区最大城市。亨伯塞德郡和诺丁汉郡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此处的布拉德福德指的是靠近利兹的那一个。

③ 原书此处的“Orthodox”并非东正教, 而是公谊会, 亦称教友会、资格会。

④ 原书此表排印错误, 原表中圣公、长老、浸礼、循道诸会和穆斯林、印度、锡克诸教教徒的数据注有上标符号 2, 但未分别替换成 a、b、c。

区分。天主教徒普遍认为,爱尔兰^①和北爱尔兰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即“统一的爱尔兰”,而新教徒却反对这一主张。但是,除了宗教信仰,政治方面的考虑和民族主义的观念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14.3.4 宗教在美国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公民相比,美国人的宗教性显得不同寻常。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合众国是基督教世界中最虔信上帝、最遵行宗教、最恪守教旨、最具宗教传统立场的国度,(在这里)孕育出的新宗教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Lipset 1991)。根据民调,大约有五分之三美国人宣称,宗教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无论在哪一个特定的时点调查,都大约会有40%的美国人在此前一周去过教堂(Gallup 2004)。根据报告,有压倒性多数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并宣称他们会定期祈祷,其中大多数每天都会祈祷一次或多次(Center 1994, 1998)^②。有十分之七的美国人自述他们相信来生(Roof and McKinney 1990; Warner 1993)。

美国政府并没有官方搜集的宗教归属数据,不过,依据一些零星的政府调查、民调报告和教会记录,还是可以勾画出一幅图景。这些资料显示出,美国是全世界最具宗教多样性的国家,拥有超过1千5百种的独立宗教(Melton 1989)。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多样性,多项调查也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自认为基督徒,所归属的宗派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多。

大约有52%的美国人将自己归为新教徒,另有24%将自己归为天主教徒。其他不容忽视的宗教群体还包括摩门教徒、穆斯林和犹太

教徒(Pew 2002)。天主教会迄今已经表现出是成员规模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其原因部分在于从墨西哥和中南美洲迁入的大批天主教徒。不过,近年来天主教会成员的增长势头也有所放缓,因为有些教众流失,要么不再把自己归为天主教徒,要么转投新教。

尽管天主教徒在数量上依然在增长,但上教堂的人数比例在过去几十年中却显示出锐减态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稍趋稳定。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1968年颁布了教皇通谕,再次确认禁止天主教徒使用避孕措施。对于那些自觉使用避孕良心无愧的人来说,这道通谕使他们无可周旋。他们不得不违逆教会。而许多天主教徒正是这样做的。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属于天主教徒的育龄妇女中,有四分之三使用了避孕措施,而在发生过性行为的所有女天主教徒中,更有96%在其一生中的某一时节曾经使用过避孕措施(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1995)。不仅如此,最近一项民调发现,美国天主教徒中有50%拒绝认为,在节育和堕胎之类的道德问题上,教皇的教诲是不会有错的(Gallup 2003)。相当一部分天主教徒就此开始怀疑乃至藐视教会对于自己生活方方面面所施加的权威。

如果我们把新教徒这一庞大的类别分解为一些主要的子群体,就能获得有关美国的宗教生活的更清晰的图景。根据一些调查,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是浸礼会教徒,大约占人口的16%,在所有新教徒中约占三分之一。其他较为显著的新教群体还包括循道宗教徒(7%)、信义会教徒(5%)、长老会教徒(3%)、五旬节教派会众(2%)、美国新教圣公会会众^③(2%),还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ARIS 2001)。

① 吉登斯在这里使用的是“Eire”,这正是爱尔兰语的“Ireland”。

② 原书书目中没有这两项文献。

③ 美国新教圣公会(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是安立甘宗在美国的自主教会。其前身为美洲拓殖地的英格兰圣公会。

有几项研究已经指出,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新教教会的构成中,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那些开明的或主流的美国教会,比如信义宗、新教圣公会(即安立甘宗)、循道宗和长老宗,其成员人数都趋于下降。而比较保守或非传统的新教教会的成员,比如五旬节教派成员和南方浸礼会成员,人数却在上升(Roof and McKinney 1990; Jones et al. 2002)。

这些数字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反映出美国的保守派新教徒的势力愈益壮大。保守派新教徒强调严格遵照经文解释圣经,在日常生活中谨守道德,通过福音传道使人皈依。他们截然不同于历史更为悠久的一些开明派新教教会的会众,后者往往在宗教实践中采取更为灵活、更具人文主义色彩的取向。而在这两方之间,则是温和派新教徒。

保守派各宗派激起了深切的忠诚与担当,在招募新成员尤其是年轻教友方面也是成效斐然。归属保守派新教群体的人是归属开明派新教群体的人的两倍,很快也有可能超过温和派的教众(Roof and McKinney 1990)。开明派新教受冲击尤其严重。开明派新教各宗派的年长教友们未能被新鲜的年轻教友取代,担当的程度也较低,现在的有些教友开始转投别的信仰。至于黑人新教各教会,随着他们的成员进入中产阶级,取得了比较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在美国蓬勃发展(Roof and McKinney 1990; Finke and Stark 1992)。

美国新教教会也看到了福音派的大规模兴起,即信仰精神重生(所谓“再生”)。福音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在回应愈益加剧的世俗主义和宗教多样性,整体而言,也就是

在美国人生活中一度居于核心的新教价值观念的衰微(Wuthnow 1988)。近些年来,福音派各宗派增长迅猛,与此同时,是更为主流的新教宗教归属趋于衰落。许多新教徒明显是在寻求福音派宗派所承诺的那种更具直接性、私人性和情感性的宗教体验。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就是一位经历再生的基督徒,他曾经坦言,正是他的信仰帮助他克服了早年的酗酒问题,重获新生。在2001年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之后,他将美国的国际使命比作以战争对抗邪恶势力。布什的再生基督徒身份也体现在他对于同性恋婚姻和堕胎问题的保守立场上。他的福音派宗教价值观念大大有助于他在2004年11月赢得总统连任,当时他获得了美国绝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道德话题都是至关重要的。^①

有关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引起的争议,参见第十二章引语部分的讨论。

福音派各组织擅长动员各方资源以协助实现其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各项目标,2004年的总统大选就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宗教经济学家们(参见下文图文框)所使用的做生意一般的语言,它们已经在“宗教市场”上证明自己是极具竞争力的“精神企业”(Hatch 1989)。广播和电视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市场营销新技术,有些福音派人士用它们来触及宽泛得多的受众,其规模是从前不可能指望的。有些牧师之所以被称为“电视福音布道者”(televangelists),就是因为他们在电视上履行其牧师布

^① 2004年美国大选除了伊拉克战争的话题,国内有关同性恋和堕胎的“文化战争”也是共和党与民主党激辩的焦点。身为天主教徒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本人却支持堕胎,认为这是女性的权利,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在辩论时屡屡使其不能直言。而克里所属的正是2004年在法律上承认同性恋婚姻的马萨诸塞州(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开篇)。科罗拉多州主教公开宣布不给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克里领圣餐的权利。大选之时,美国有十一个州将禁止同性恋婚姻作为捆绑式公投议题印在总统选举的选票上,并全部获得压倒性多数而通过。其中就包括最后帮助布什凑够选举人票数的俄亥俄州,而这个州有大量产业工人失业,原本应该支持民主党的贸易保护政策。最终,道德问题战胜了经济问题。

当代思路：“宗教经济”

对于宗教社会学，最新近并颇具影响的思路之一适用于西方社会，特别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因为美国提供了众多不同的信仰以供挑选。喜欢宗教经济思路的社会学家借鉴了经济学理论，认为可以不无裨益地将宗教理解为彼此竞揽追随者的组织（Stark and Bainbridge 1987; Finke and Stark 1988, 1992; Moore 1994）。

这些学者就像研究工商业的当代经济学家一样，也认为要想确保宗教生命力，竞争优于垄断。这种立场与经典社会学家恰恰相反。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认定，当宗教受到不同的宗教立场或世俗立场的挑战时，就会遭到削弱。而宗教经济学者则认为，竞争会增加现代社会的宗教参与的整体水平。宗教经济学者相信这种说法成立的理由有两点。其一，竞争使得每一个宗教群体都更难以赢得追随者。其二，宗教林立的局面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信仰。在文化多样化的社会里，单一一种宗教将只可能吸引有限的一些追随者，不过，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以及印度教的古鲁和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的（fundamentalist）布道者，很可能促成比较高的宗教参与程度。

这种分析是基于工商界的情形并有所调整，在工商界，竞争被认为有助于形成高度专门化的产品，以吸引非常具体的市场。事实上，宗教经济学者借用了工商业的语言，用来描述导致某一特定宗教组织成功或失败的具体条件。根据罗格·芬克和罗德尼·斯塔克的观点（Finke and Stark 1992），一个成功的宗教群体，必然是组织有素以利竞争，布道者口才出众，足称得力的“推销员”，不过传播的是口号，提供的是信仰和仪式，打包销售，作为有吸引力

的产品，并且摸索出一些卓有成效的市场营销技术。由此看来，宗教就是一种和别的工商业没太大不同的生意。电视福音布道者就是特别成功地销售其宗教产品的商人。

因此，芬克和斯塔克之类的宗教经济学者并不认为竞争会破坏宗教信念，从而助长了世俗化。相反，他们提出，现代宗教通过积极主动的市场营销和成员招募，不断地自我更新。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所谓竞争有利于宗教这一观念（Stark and Bainbridge 1980, 1985; Finke and Stark 1992），但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得出这一结论（Land et al. 1991）。

宗教经济思路高估了人们面对不同宗教而以理性方式挑选的程度，仿佛他们是在挑选购买一辆新车或一双鞋。可是，在那些具有深切担当的信徒当中，尤其是在那些缺乏宗教多元主义的社会当中，宗教并没有明确表现为一种理性选择。在这样的社会中，就算允许人们在不同的宗教中间挑选，绝大多数人也很可能履行他们儿时所遵循的宗教，甚至不会去追问，是否存在更具吸引力的替代选择。即使是在孕育出宗教经济思路的美国，社会学家如果只是假定宗教买方始终处在精神血拼^①之中，也有可能忽视了宗教的精神面向。对于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年里出生的那一代）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一依然恪守自己儿时的信仰，另有三分之一虽然继续承认自己儿时的信念，但已经不再归属某一个宗教组织。因此，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还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宗教，进行着宗教经济思路所假定的那些选择（Roof 1993）。

① 这里的精神血拼（on spiritual shopping sprees）是指任性惬意地购买精神产品。

道的工作。这些牧师与先前许多福音派人士分道扬镳，因为他们宣讲的是“富足福音”（gospel of prosperity）：相信上帝是希望让信徒在财政上兴旺富足，而不是牺牲受难。这种思路截然不同于传统保守派新教信仰当中，以苦行的立场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辛勤劳作和自我弃绝（Hadden and Shupe 1987; Bruce 1990）。罗伯特·H·舒勒在加州嘉登格罗夫（Garden Grove）的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就是礼拜场所气派奢华的典型例证。^①这些气派的场所为电子教会（electronic churches）提供了可作电视转播的背景。而参加这些宗教集会的人可以散居各地，主要借助电子技术的手段统合起来。宣讲神学与募集资金是电视福音的基本内容，不仅必须支撑电视布道的牧师本人，而且还有中小学、大学、主题公园，有时还有其布道者奢侈的生活方式。

电子化的宗教布道在拉丁美洲已经变得特别流行，那里能收到北美的电视节目。其结果，大部分属于五旬节教派的一些新教运动对智利、巴西这样盛行天主教的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尽管一些福音派人士将彻头彻尾属于现代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但其他人却断然拒绝许多当代的信念和实践。所谓基要主义者，就是持有许多反现代的信念、吁求严格的道德与行为准则的福音派人士。这些准则中往往包括严禁饮酒、吸烟及其他“浊世罪恶”；坚信《圣经》绝无谬误，特别强调基督将复临于世（Balmer 1989）。他们的“守旧宗教”明确区分善恶和对错（Roof and McKinney 1990）。本节第六小节将讨论基督教基要主义的兴起。

在有关世俗化的争论当中，对于宗教在西方各社会都趋于衰微的观点，美国代表了一个

重要的例外。一方面，美国是“现代化”最彻底的国家之一，但它同时又以全世界宗教信仰最大众化、人数最多而著称。斯蒂夫·布鲁斯是世俗化命题的一位重要倡导者，他提出，宗教在美国之所以持续强盛，可以从文化过渡（cultural transition）的角度来理解（Bruce 1996）。布鲁斯认为，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人口或经济变迁的社会中，宗教可以大大有助于人们调节自身以适应新环境，挺过动荡生存下去。他认为，工业化在美国起步较晚，而发展却非常迅速，并且是在纷繁复杂的族群所组成的人口中发展的。在美国，宗教对于平衡人们的认同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促成了一种更为顺利的文化过渡，以融入美国这个“熔炉”。但正如图 14.5 所示，绝不只是美国特别强调宗教的重要性。

14.3.5 评估世俗化命题

现在社会学家们都达成了共识：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传统教会里，宗教都已经衰退，只有美国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世俗化的那三个维度上，宗教的影响都减弱了，这跟 19 世纪社会学家的预测几乎一模一样。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此定论，这些经典社会学家和日后支持世俗化命题的人都是正确的？是不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入，宗教的诉求已经失去了它的控制力？这样的结论是值得质疑的。理由有下面几点：

其一，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宗教现在的位置远比支持世俗化命题的人所认为的来得复杂。虽然很多人不再选择通过传统教会的组织框架正式礼拜，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宗教性、精神性的信仰仍然强大有力，鼓舞人心。一些学者指出，现在出现了一种“信仰但不归

^① 该教堂起初估价 700 万美元，舒勒博士开始募捐，最终造价 2000 万美元（1980 年建成），全部为美国民众和团体捐助，是美国梦的某种体现。以白手起家之精神，打造了一座人间伊甸园——一座通体剔透的玻璃大教堂。



美国的福音派人数已经有了显著增长。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帮助了小布什上台执政。

属”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的趋势 (Davie 1994), 正像我们在讨论英国的宗教信仰时看到的, 人们还维持着对于上帝或者某种更高力量的信仰, 但是却在制度化的宗教形式之外实践与发展他们的信仰。

其二, 不能仅仅根据信奉三位一体论的各主流教会的成员数量来衡量世俗化。否则的话, 就忽视了国际层面以及各工业社会内部的诸多非西方信仰与新兴宗教运动的重要性正在愈益增长。例如, 在英国, 虽然传统教会依然活跃的教众数量正在减少, 但是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犹太教徒、福音派“再生”信徒和公谊会基督徒的宗教参与依然充满活力。

其三, 非西方社会似乎并无多少世俗化的证据。在中东、亚洲、非洲和印度的许多地区, 生气勃勃、充满动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化形成了挑战。当罗马教皇巡游南美, 数百万的天主教徒满怀热诚地跟随他行进。由于共产党的领导, 东正教的教会萧条了几十年, 而今也被前苏联许多地方的民众热情地迎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 世界各地这种对于宗教的

热忱支持也体现在由宗教激起的冲突之中。宗教既是抚慰和支持的源泉, 也是并且还将会是剧烈的社会斗争和冲突的肇因。

无论是证明世俗化还是反驳世俗化, 人们都能够找到证据。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 那就是世俗化作为一个概念, 用来说明今日之传统教会发生的变化, 无论是其权力和影响的减弱, 还是教会内部世俗化对于女性和同性恋角色等方面的影响, 都是十分有用的。在很多传统的宗教机构当中, 也都可以感觉到整个社会当中的现代化力量。

不过, 最重要的是, 应该参照变化快、不稳定、多样化的背景, 来评估晚期现代世界的宗教。就算传统形式的宗教有所衰退, 宗教也依然是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中一股关键力量。宗教的吸引力, 不管是传统的方式还是新颖的方式, 都很有可能长存不衰。宗教为很多人提供了洞彻人生复杂问题的见解, 也为他们提供了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无法得到满意解答的意义。

如此看来, 在这些急剧变迁的时代, 有那么多人都在宗教中寻找并且找到了答案与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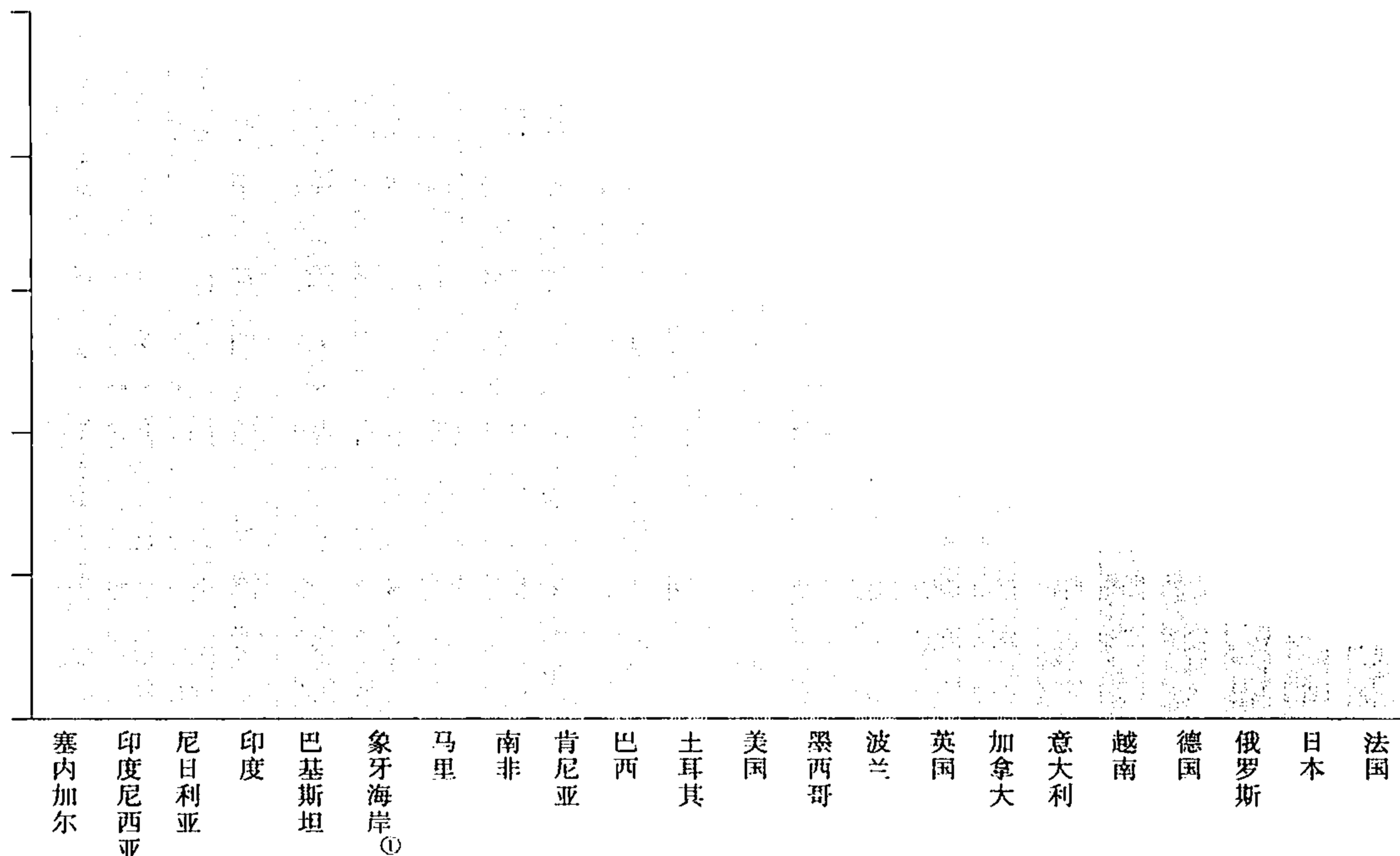


图 14.5 一些国家赋予宗教的重要性(成年人口自述宗教在其生活中“很重要”的比例)
资料来源: Pew Research Centre (2002)

静,也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可能是这种现象最明显的例证。不过,宗教应对变迁的方式,越来越是新鲜的,令人陌生的:新兴宗教运动、崇拜、教派和各种“新纪元”活动。这些群体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像”宗教形式,但很多批评世俗化假说的人相信,它们代表了宗教信仰在社会深刻变迁中的转型。

14.3.6 宗教原教旨主义

宗教原教旨主义是世俗化没能在现代世界中获胜的又一证明。原教旨主义这个概念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情境中,^②说的是严格奉行一套规则或信仰。所谓宗教原教旨主义,指的是某些宗教群体采取的方式,它们呼吁严格遵

循基本经文或文献的字面来解释,并且相信从这些解读中获得的教义应该被运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原教旨主义相信,只可能有一种关于世界的观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没有丝毫模棱两可或多重解释的余地。在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中,确切的经义被限制在一批享有特权的“释经者”手中,比如祭司、神职人员或其他的宗教领袖。于是这些领袖们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威,并且不限于圣事,更延至俗务。无论在反对运动中,在主流政党内(包括在美国),还是作为国家领袖(比如在伊朗,参见第二十章第二节第一小节),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成为了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宗教原教旨主义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

① 原文如此,“ivory coast”带有殖民意味(15世纪时掠夺象牙和奴隶而来),1986年就改称科特迪瓦(即法语 Côte d'Ivoire)。

② 在基督教中译为基要主义。

这个词开始成为常见用语,还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它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全球化的回应。随着现代化的力量一步步地侵蚀社会世界的传统要素,比如核心家庭和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原教旨主义就起而捍卫传统的信仰。在一个正在经历全球化并需要理性推理的世界,原教旨主义坚持以信仰为基础,来解答和诉诸仪式中的真理:原教旨主义就是以传统的方式来捍卫的传统。原教旨主义更关注怎样捍卫信仰,怎样为信仰辩护,而不是信仰本身的内容。

原教旨主义虽然把自己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上,但它也使用现代的手段来宣扬自身的信仰。比如说,美国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就是最先利用电视作为媒介来传播教义的团体之一。在车臣,跟俄罗斯军队作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还建立了网站来传播他们的观点;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好战分子(Hindutva)则用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来提高对于“印度特性”^①的感认。

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讨论两种最突出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最近30年当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教基要主义势力皆有增长,塑造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格局。

一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在早期的社会学思想家中,只有韦伯可能预见到,像伊斯兰教这样一个传统的宗教体系会经历一场重大复兴,并会在20世纪晚期成为一些重要政治发展的基石。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局面就确实实在伊朗出现了。近些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revivalism)广泛传播,对其他国家造成了重大影响,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和尼日利亚。这场规模浩大的伊斯兰教复兴趋势该如何说明?

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既要关注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的各个方面,也必须看到它已经对具有普遍影响的那些现代国家带来了众多世俗变迁。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也是一种不断激发人们积极行动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中,充斥着要求信徒们“进行圣战”的教诲。这场战斗既针对不信者,也针对将腐化带入穆斯林共同体的人。许多世纪以来,穆斯林改革者层出不穷,伊斯兰教也像基督教一样内部派别林立。

什叶派(Shiism)就是在伊斯兰教历史的早期阶段,从其正统主体中分离出来的,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从16世纪起,什叶派就一直是伊朗(早先称为波斯)的国教,而且是伊朗革命背后的思想源泉。什叶派将其起源追溯到伊玛目阿里,这是7世纪时的一位宗教和政治领袖,人们相信他在当时的尘世统治者中表现出全心奉神的品质,德行卓尔不凡。阿里的后裔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合法领袖,因为人们坚信,他们属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而不像实际掌权的王室。什叶派相信,穆罕默德的合法承袭者的统治最终会被建立,并且要废除现有政权的暴政和不公。穆罕默德的后继者将是一个直接受神指引的领袖,其统治将符合《古兰经》的经义。

在中东其他国家也有大量的什叶派教徒,包括伊拉克、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然而,在这些国家中,伊斯兰教的领导权掌握在多数派逊尼派(Sunni)的手中。逊尼派穆斯林奉行“常行之路”(Beaten Path),这是一系列源于《古兰经》的传统,它允许相当多样化的观点。相比之下,什叶派教徒要遵循更为严格的信仰。

伊斯兰教与西方

在中世纪,在欧洲基督教控制地区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大小战争几乎不断。这些穆斯林

^① “Hindu identity”:也就是印度身份、印度认同。



伊朗伊斯兰革命三位最显要的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最前端)、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当时任总统的哈希米·拉夫桑贾尼,从德黑兰街头的一幅招贴画上俯视着人们。

国家控制着后来成为西班牙、希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广大区域。欧洲人后来收复了被穆斯林征服的大部分土地。而且,在18和19世纪,随着西方的力量日益强大,穆斯林在北非的许多领土最后也成为西方的殖民地。这些倒转趋势对于穆斯林宗教和文明来说是灾难性的,伊斯兰教信徒曾经坚信他们的宗教和文明至高无上,最为发达,要超出其他的所有文明。到19世纪晚期,穆斯林世界已经无法有效地抵挡西方文化的扩张,其结果就是一些改革运动,试图恢复伊斯兰教最初的纯洁和强大。一个核心观念是,伊斯兰教必须通过肯定其自身信仰和实践的同一性,来回应西方

的挑战。

在20世纪,这个观念通过多种方式取得了发展,并形成了1978年到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的一个背景。这场革命最初肇始于国内反对国王^①的运动,因为他接受并试图推行以西方为样板的一些现代化模式,比如土地改革、扩大选举权到女性、推广世俗教育等等。这场颠覆国王的运动把利益各异的人联合到一起,可以肯定,其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关,但这中间有一位主导人物——阿亚图拉·霍梅尼,他对什叶派的思想作了一种激进的新解释。

在革命之后,霍梅尼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教法组建了政府。正如《古兰经》中所确立的,宗教成为了所有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直接基础。根据复兴了的伊斯兰教法(sharia)的规定,男人和女人要严格地隔离开来,女性在公共场合必须把自己的身体和头部遮住;实施同性恋者会被交给行刑队处死;通奸者则会被用石块砸死。与严刑峻法相伴而来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尤其是跟西方的势力相对峙。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是使国家伊斯兰教化,即组织政府和社会,让伊斯兰教的教义在各个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个过程根本没有完成,而且还冒出一些与之相对的力量。祖贝达(Zubaida 1996)区分了三类目前陷入相互争斗的群体。激进派(radicals)希望继续贯彻并深化伊斯兰革命。他们还认为,这场革命应该积极地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输出。保守派(conservatives)基本上都是宗教神职人员,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已经走得够远了。革命给予了他们所期望拥有的社会中的权势地位。实用派(pragmatists)则热衷于市场改革,主张经济向外资和外贸开放。他们反对有关女性、家庭和法律体系的伊斯兰教规的苛刻规定。

1989年霍梅尼去世,这对伊朗的激进势力和保守势力都是一个打击;他的继承者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继续得到伊朗有势力的

^① 原文为“Shah”,音译为“沙”或“沙阿”,是伊朗(或波斯)国王的称号。

毛拉们(宗教领袖们)的拥护,但他却渐渐失去了伊朗普通国民的支持,他们对一味镇压的政权统治和延续不绝的社会病患表示反感。在穆罕默德·哈塔米贯彻改革思维的总统任内(1997—2005),伊朗社会中实用派与其他派别之间的种种分歧大为凸显。哈塔米的任内,政府与保守派争论不休,后者基本上成功地阻挠了哈塔米改革伊朗社会的种种尝试。极端保守的德黑兰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于2005年当选总统,缓解了这个国家的宗教领袖与政治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与西方的关系却更趋紧张。

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传播

虽然支撑伊朗革命的思想据称是要把整个伊斯兰世界统一起来对抗西方,但在什叶派教徒占少数的国家,那些政府并没有紧跟伊朗的局势。不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已经吸引了众多的信徒,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多种形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是受到了它的刺激。

虽然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已经在北非、中东和南亚的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影响,但却只是在另两个国家成功掌握政权。苏丹自1989年以后被哈桑·图拉比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所控制,而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政权则在1996年巩固了他们对阿富汗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控制,不过在2001年末,又被阿富汗反对力量和美国军队赶下了台。在其他很多国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都颇具影响,但都受阻没能掌权。举例来说,埃及、土耳其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起事就被国家或军队扑灭了。

许多人担心,伊斯兰世界正越来越与世界上不信伊斯兰教的那些地区形成对抗。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1996)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扩张,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在观念上的斗争可能会成为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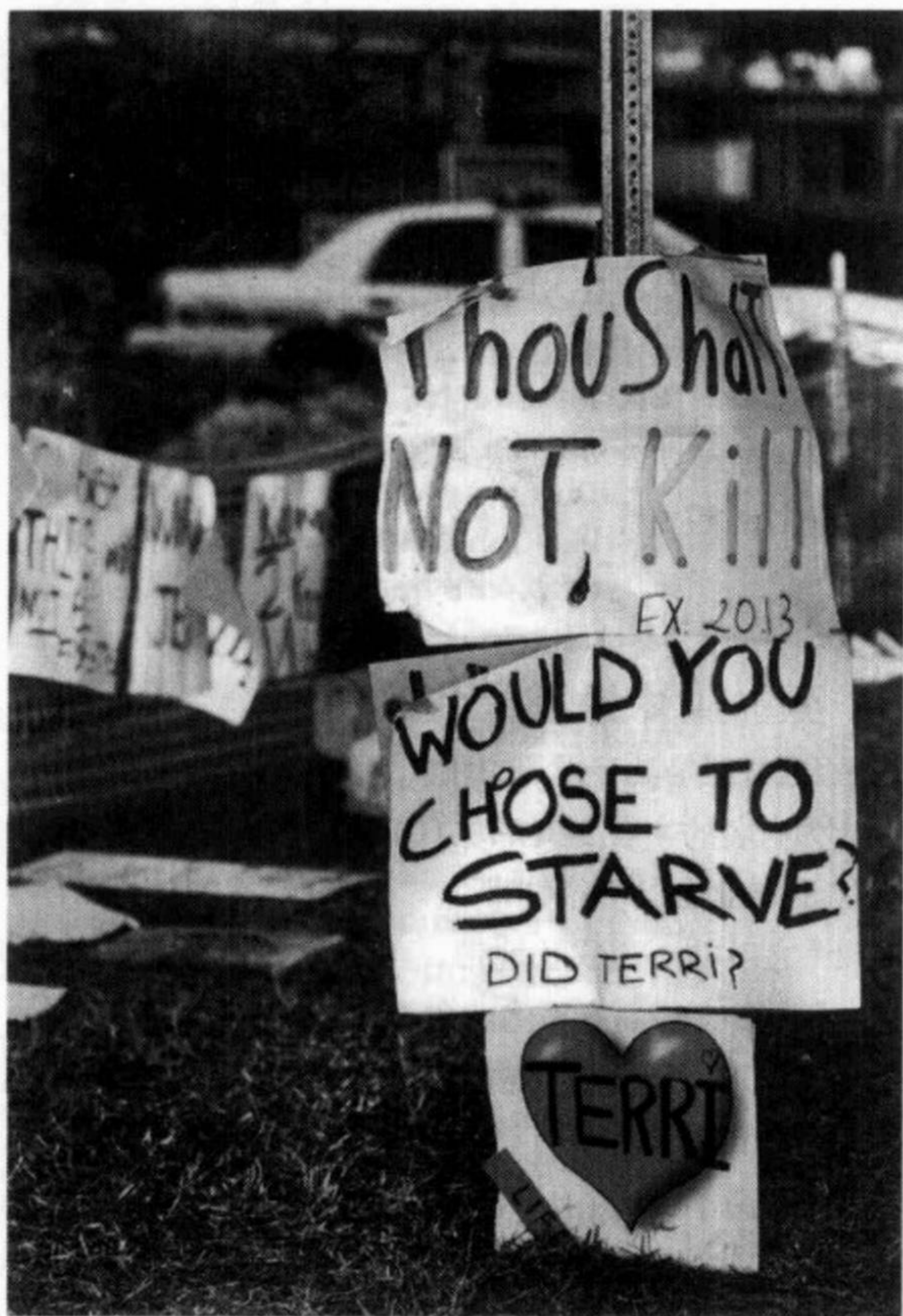
tions)的一部分。根据亨廷顿的看法,民族国家不再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各种对抗和冲突就此将会在较大的文化或文明之间产生。

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所发生的冲突就是这样一种类型。在那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人与代表东正教文化的塞尔维亚人展开斗争。这些重大事件使穆斯林更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存在。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言:“波斯尼亚已经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中穆斯林的汇聚点……(它)创造并凸显了各穆斯林社会对于两极分化和激进化的意识,同时也增强了作为一个穆斯林的意识。”(Ahmed and Donnan 1994)

有关前南地区的战争,详参第十三章
第三节第二小节。

无独有偶,在美国2003年入侵(invansion)伊拉克之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也成为激进穆斯林的汇聚点。2001年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美国推翻阿富汗的伊斯兰政权的决定,以及美国2003年后在伊拉克的势力存在(presence)遭到重振旗鼓的宗教抵抗,作为对于这些事件的起因的一种说明,亨廷顿的命题赢得了传媒的广泛关注。

21世纪伊始,伊斯兰反对派仍然在诸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积攒力量,尼日利亚的几个省近期颁布了伊斯兰教法,车臣战争也吸引了伊斯兰好战分子的加入,他们支持在高加索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本·拉登的基地(al-Qaeda)恐怖组织成员来自整个穆斯林世界。而伊斯兰的符号体系和服饰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以外与日俱增的穆斯林重要的认同标志。诸如海湾战争和针对纽约与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之类的事件等重大事件都在伊斯兰世界激起了不尽一致但却激烈有加



2005年,一些基督教团体举行抗议,试图阻止给大脑严重受损的佛罗里达妇女特里·夏沃提供流食和水分的输液管。

的反响,要么是直接对峙西方,要么是对西方的回应。

伊斯兰复兴运动不能简单地完全从宗教的方面来理解;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对西方冲击的反击,是一场民族或文化确认(assertion)的运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即使是其最具原教旨主义色彩的形式,究竟是否应当完全视为传统所持观念的某种复兴,还是值得怀疑的。实际所发生的事情要复杂得多。传统的实践和生活方式确实重获生机,但它们也已经融入了与当今时代特别相关的一些关注。

二 基督教基要主义

过去几十年来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是,

基要主义立场的基督教宗教组织在英国和欧陆迅速增长,而在美国尤为显著。基要主义者相信,“圣经,非常坦率地说,是政治、管理、商业、家庭乃至人类所有事务的有用指南”(Capps 1990)。圣经在基要主义者眼中是绝无谬误的,其内容表达的是神圣真理。基要主义基督徒信奉基督的神性,相信个人的灵魂通过接受基督作为肉身救世主而有可能得到救赎。基要主义基督徒承诺要传播他们的信念,并让那些尚未接受这些信念的人皈依他们。

基督教基要主义所针对的是自由神学和支持“世俗人文主义”的人,他们“主张解放理智、欲望和本能,这一切跟信仰和遵守上帝的训诫截然相对”(Kepel 1994)。基督教基要主义反对现代化所造成的“道德危机”,即传统家庭的衰落,个人道德面临的威胁,以及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弱化。

在美国,从杰里·福尔韦尔牧师领导的道德多数运动(Moral Majority)开始,一批基要主义群体开始愈益深入国家政治中被称为“新基督教右翼”的运动,尤其是共和党的保守一翼(Simpson 1985; Woodrum 1988; Kiecolt and Nelson 1991)。福尔韦尔指出,“有道德观念的美国人应当准备面对五个具有政治后果的重大问题:堕胎、同性恋、色情作品、人文主义和破裂的家庭”(转引自 Kepel 1994)。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在采取具体措施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是全国的学校,他们游说学校课程内容的立法者,并试图取消在学校不得祈祷的禁令。然后,该运动迅速转向支持抢救行动组织(Operation Rescue),一个封锁堕胎诊所的激进组织。持基要主义立场的宗教组织是美国的一股强大力量,已经在里根政府和老小布什政府期间,协助塑造了共和党的政策与论调。

福尔韦尔一开始是把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归咎于美国国内的“罪人”。他在电视直播中发表了如下评论:“我确实相信,异教徒、保护堕胎权利者、女性主义者,还有那些正在积极尝试搞成另一种可替代

的生活方式的男女同性恋者,‘美国公民自由权利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争取美国道路民众联盟(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两个都是自由派的组织),这些团体都在竭力使美国世俗化。我要当面指责它们,说‘这事的发生也有你们的份’”(CNN,2001年9月14日)。尽管他后来为这些言论做了道歉,但又公开说“穆罕默德就是个恐怖分子。我读过很多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东西,足以(做出判断)他是个嗜好暴力的人,一个嗜好战争的人。”(BBC,2002年10月13日),为此引出了更多的争论。他又一次为自己的言论道歉,但为时已晚,未能阻止在印度西部的绍拉布尔(Solapur),印度教徒与抗议其主张的穆斯林之间爆发的教派骚乱,至少导致八人死亡。自然,他的言论招来了全世界伊斯兰领袖的广泛谴责。

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中的一些重要布道者已经建立了一些大学,以此来培养新一代的“中流砥柱”(counter-elite),接受基要主义基督教信仰的培育,并且能够在传媒、学界、政界和文艺界占据要职。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福尔韦尔创办)、奥罗·罗伯茨大学(Oral Roberts University)、鲍博·琼斯大学(Bob Jones University)等大学都可以授予规范的学科里的学位,而这些学科是在认定圣经之绝无谬误的框架内讲授的。在校园里,学生的私人生活中恪守严格的道德标准,只能通过婚姻来疏导性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在自由大学校园度过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这都是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观。宿舍楼是男女分开的,并且有严格的监控,实施强制和自律相结合。禁止法国式的亲吻^①。在未婚学生之间发生任何性的关系都将处以开除。(已婚夫妇住在城里)但允许亲

吻脸颊,夫妻虽不可以相互搂腰,但牵手还是允许的。如果有陌生访客问及此事,学生们会很自愿地为这种性的自律作辩护;他们认为完全的压抑必然会导致越轨行为,特别是同性恋。(他们认为)同性恋在跟他们相竞争的另一所基要主义大学中很盛行,那里禁止一切调情。另一方面,表现性欲是与大学教育目标的精神相悖的。

(Kepel 1994)

美国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所赢得的支持遍及全国,但是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美国南方已经成为有名的“圣经地带”(Bible belt)——它是位于农业上的“养牛带”、“玉米带”和“棉花带”之下的一道狭长地带。美国很多最为著名、最具影响的福音派人士的基地都在南部和中西部一些州,比如弗吉尼亚、俄克拉荷马和北卡罗来纳。美国最有影响的基要主义团体是南方浸礼联合会、神召会^②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三 结语

在亟需相互理解和对话的全球化时代,宗教原教旨主义也许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原教旨主义处在潜在的暴力边缘。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基督教基要主义来说,由宗教热忱所引发的暴力冲突绝不罕见。就在过去的几年间,在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伊斯兰教团体和基督教团体之间就发生了多起暴力冲突。然而,在普世主义色彩愈益浓厚的世界里,传统和信仰相互对立的人们彼此之间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接触。随着对于传统观念不加质疑的接受不断减少,我们都应该以更开阔的、更具反思性的方式来生活——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展开讨论和对话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控制或解决暴力冲突的主要方式。

① “French kissing”:将舌头深入对方嘴中的深吻。

② 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五旬节派最大教会。于1914年在美国成立。

本章要点

- 1 宗教存在于所有已知的社会中，只是宗教信仰和仪轨随文化不同而各见差异。所有宗教都包括一套蕴含敬畏情感的象征符号，并与信徒共同体所实施的仪式相维系。
- 2 社会学思路的宗教研究深受三位“经典”思想家的影响，即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他们都认为，究其根本而言，宗教就是一种幻觉。他们相信宗教所创造出来的“彼岸”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是被宗教象征体系的透镜歪曲的世界。不过，他们各自对于宗教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有很大差异：
 - 对马克思来说，宗教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要素：宗教为社会中存在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提供了正当化理据。
 - 对涂尔干来说，宗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统合的功能，尤其是确保人们定期聚集在一起以确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
 - 对韦伯来说，宗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 3 在小型文化中，图腾崇拜和泛灵论是常见的宗教类型。在图腾崇拜中，某种动物或植物被视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泛灵论意味着相信精灵或鬼怪的存在，它们与人类同居一个世界，有时候还附体上身。
- 4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历史上三种最有影响的一神论宗教（只信仰一个神的宗教）。多神论（信仰几个或许多神）在其他宗教中则很常见。在有些宗教中，比如儒教，不存在任何神祇或超自然存在。
- 5 教会是建制完备的大型宗教团体，通常都有一套正规的科层结构和神职人员等级秩序。教派是规模较小、不太正式的信徒群体，通常是为了使一个业已确立的教会重振活力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一个教派经历一段时间而不消亡的话，就会变得制度化，被称为宗派。崇拜与教派相似，但它的联系更为松散，遵循的仪轨也很相似，但不是在正式的组织中。
- 6 世俗化指的是宗教影响力的衰落。对世俗化程度的衡量十分复杂，因为它包括了几个变迁的维度：宗教组织的成员规模、它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们的个人宗教情感。虽然宗教的影响确实是降低了，但宗教本身肯定没有濒临消亡，仍继续在现代世界中联合和分化着人们。
- 7 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定期去教堂的人口比例较低；相反，在美国，定期去教堂的人口比例要高得多。无论是在英国、欧陆还是美国，声称自己信仰上帝的人要远远多于定期去教堂的人。
- 8 最近几十年来，各传统教会的成员正大为减少，而很多新兴宗教运动在主流宗教之外兴起。新兴宗教运动涵盖了形形色色的宗教群体和灵修群体、崇拜和教派。这些团体可以大致分为人世型运动，它们跟自助群体相类似；拒世型运动，它们想退出并批判外部世界；顺世型运动，它们更关注内在的宗教生活而不是世俗的关怀。
- 9 原教旨主义在全世界不同宗教群体的一些信徒中已经比较普遍。之所以称他们为“原教旨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相信应该回到宗教教义的基本要义上。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建立了一个受宗教激发的政府，此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了中东的很多国家。而美国的基督教基要主义是对美国社会中的世俗价值和人们所认识到的道德危机的一种回应。持基要主义立场的基督徒为了让不信上帝的人皈依，率先发起了“电子教会”（electronic church），即运用电视、收音机和新技术来吸引信徒。

思考建议

1. 在现代世界可能发生奇迹吗?
2. 如何区分宗教和政治体系或道德信仰体系?
3. 宗教对于女性与对于男性的意义有可能不同吗?
4. 宗教如何可能既是一种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又是一种引发社会变迁的力量?
5. 把英国或美国的宗教性的特征概括为“信仰但无归属”是否有道理?
6. 现代世界的哪些特性引发新兴宗教运动增长?

阅读指南

- Alan Aldridge, *Relig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0). 《当代世界中的宗教:社会学角度的介绍》
- Eileen Barker and Margit Warburg (eds), *New Religions and New Religiosity*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新兴宗教与新宗教情感》
- Grace Davie, *Religion in Modern Europe: A Memory Mu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现代欧洲的宗教:记忆的嬗变》
- Malcolm Hamilto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1) 《宗教社会学:理论视角与比较视角》
- Stephan J. Hunt, *Religion in Western Society* (New York: Palgrave, 2002). 《西方社会中的宗教》
- Hugh McLeod, *Religion and the People of Western Europe, 1789-198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89—1989年西欧的宗教与民众》
- Philip Sutton and Stephen Vertigans, *Resurgent Islam: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Polity, 2005). 《重获生机的伊斯兰:一种社会学的思路》
- David Westerlund (ed.), *Questioning the Secular State: The Worldwide Resurgence of Religion in Politics* (London: C. Hurst 1996). 《探问世俗国家:宗教在政治领域中的世界性复兴》

网络导航

宗教类学术信息门户 (Academic Info Religion Gateway)

<http://www.academicinfo.net/religindex.html>

美国宗教数据档案库 (American Religion Data Archive)

<http://www.thearda.com/>

文化与宗教理论期刊(在线) (Journal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heory (online))

<http://www.jcrt.org>

英国广播公司宗教网页 (BBC Religion P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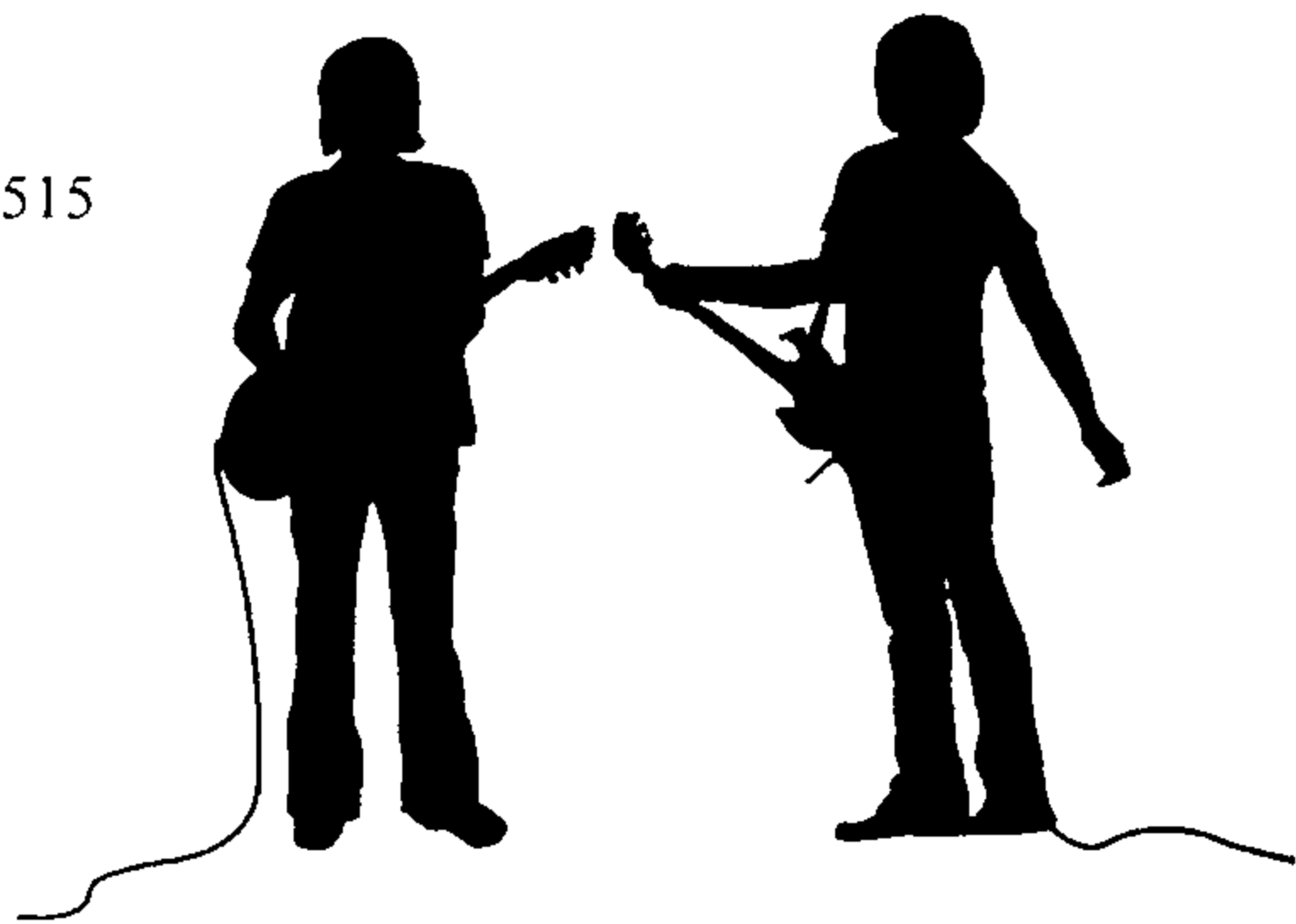
<http://www.bbc.co.uk/religion>

宗教宽容组织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

目录

第一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480
15.1.1 传统媒体	480
15.1.2 新媒体	485
第二节 有关传媒的理论视角	491
15.2.1 功能主义	491
15.2.2 冲突理论	491
15.2.3 晚近学说	492
第三节 偏差与传媒: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小组	498
电视新闻	498
第四节 受众与传媒效应	500
15.4.1 受众研究	500
15.4.2 传媒效应	501
第五节 传媒控制	504
15.5.1 政治控制	504
15.5.2 全球传媒与民主	508
第六节 全球时代的传媒	508
15.6.1 音乐	509
15.6.2 电影	511
15.6.3 传媒“超级企业”	512
15.6.4 传媒帝国主义?	514
15.6.5 对于全球传媒的抵抗与替代	515



小 结 516

本章要点 519

思考建议 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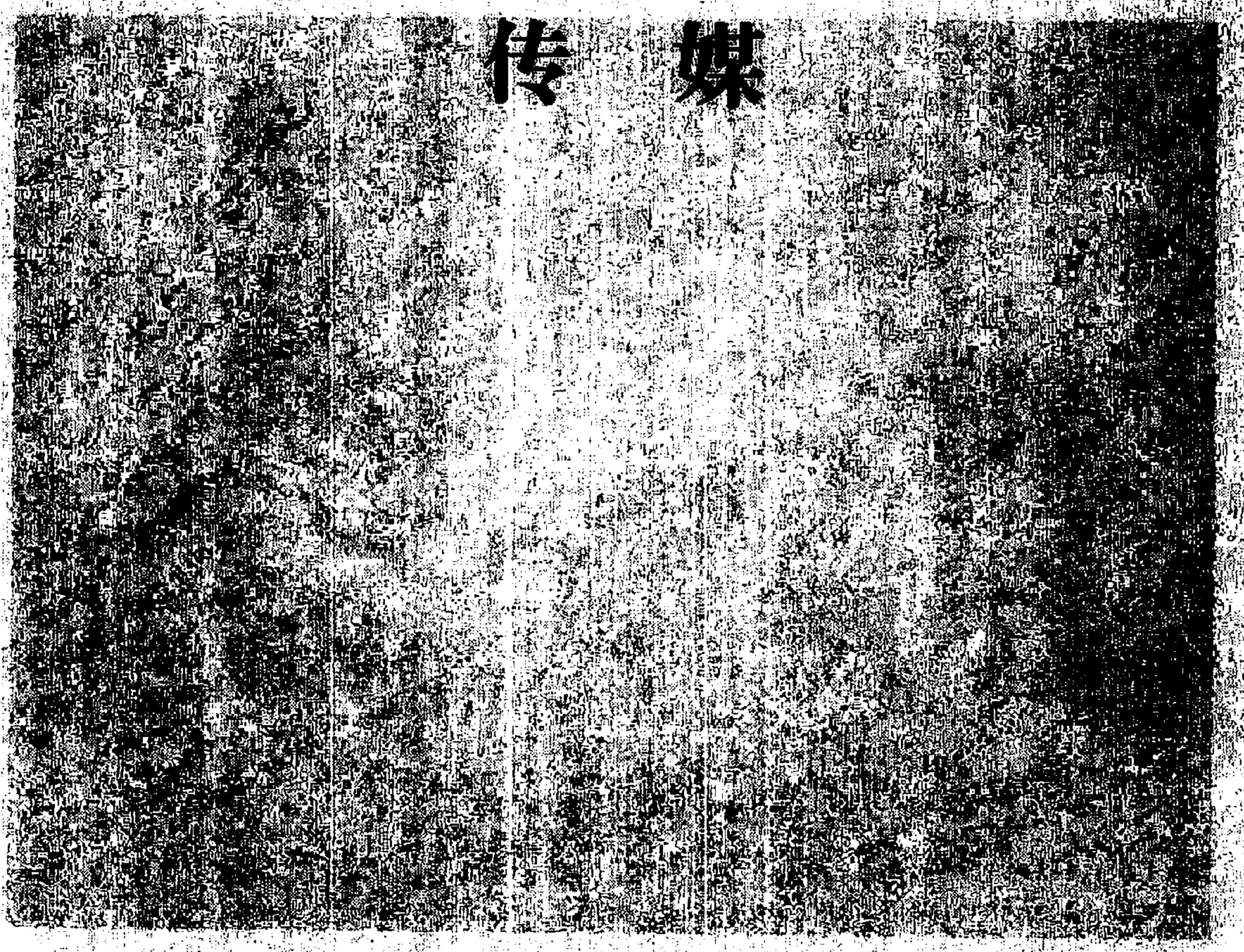
阅读指南 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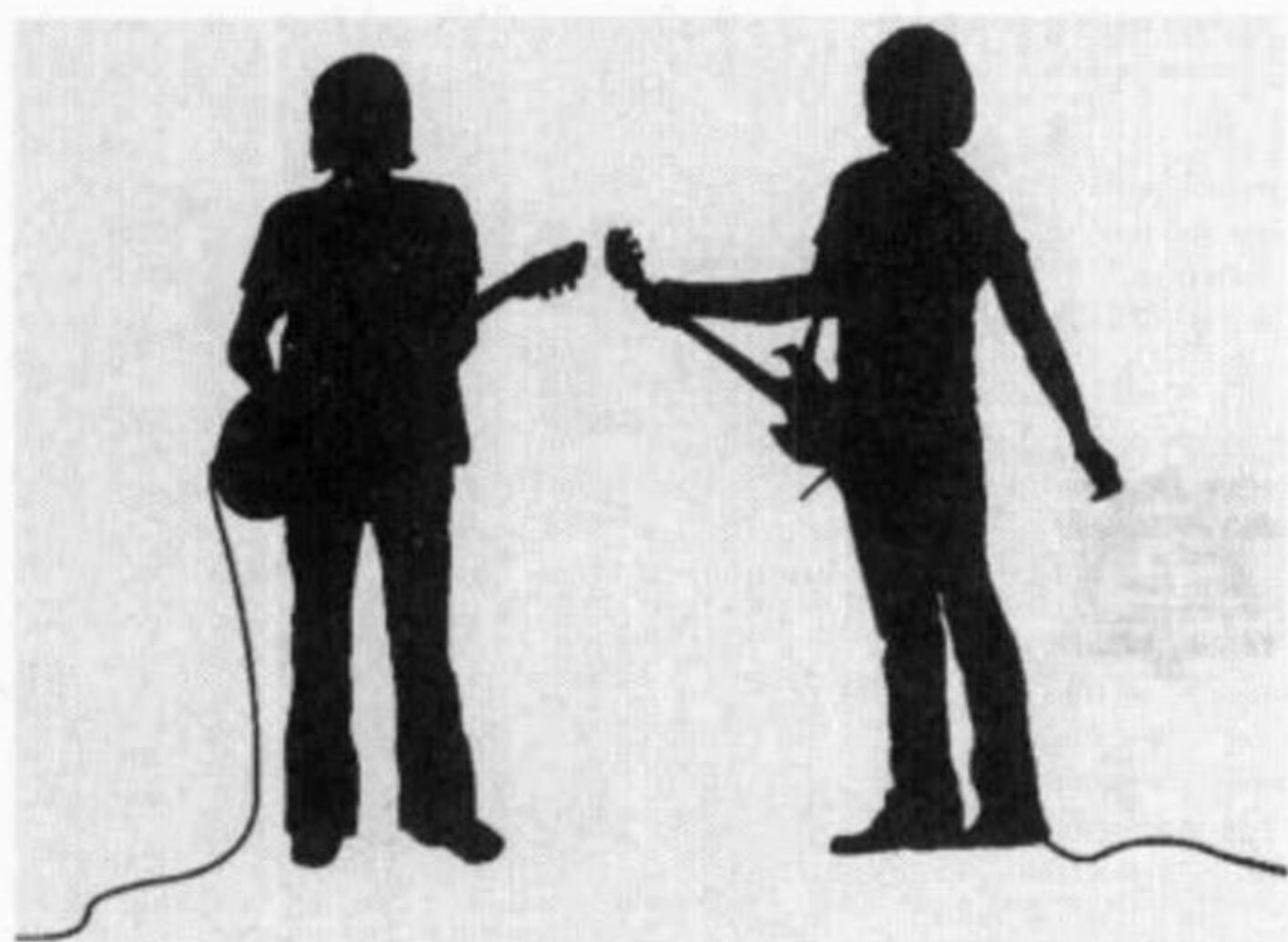
网络导航 521



第十五章

传 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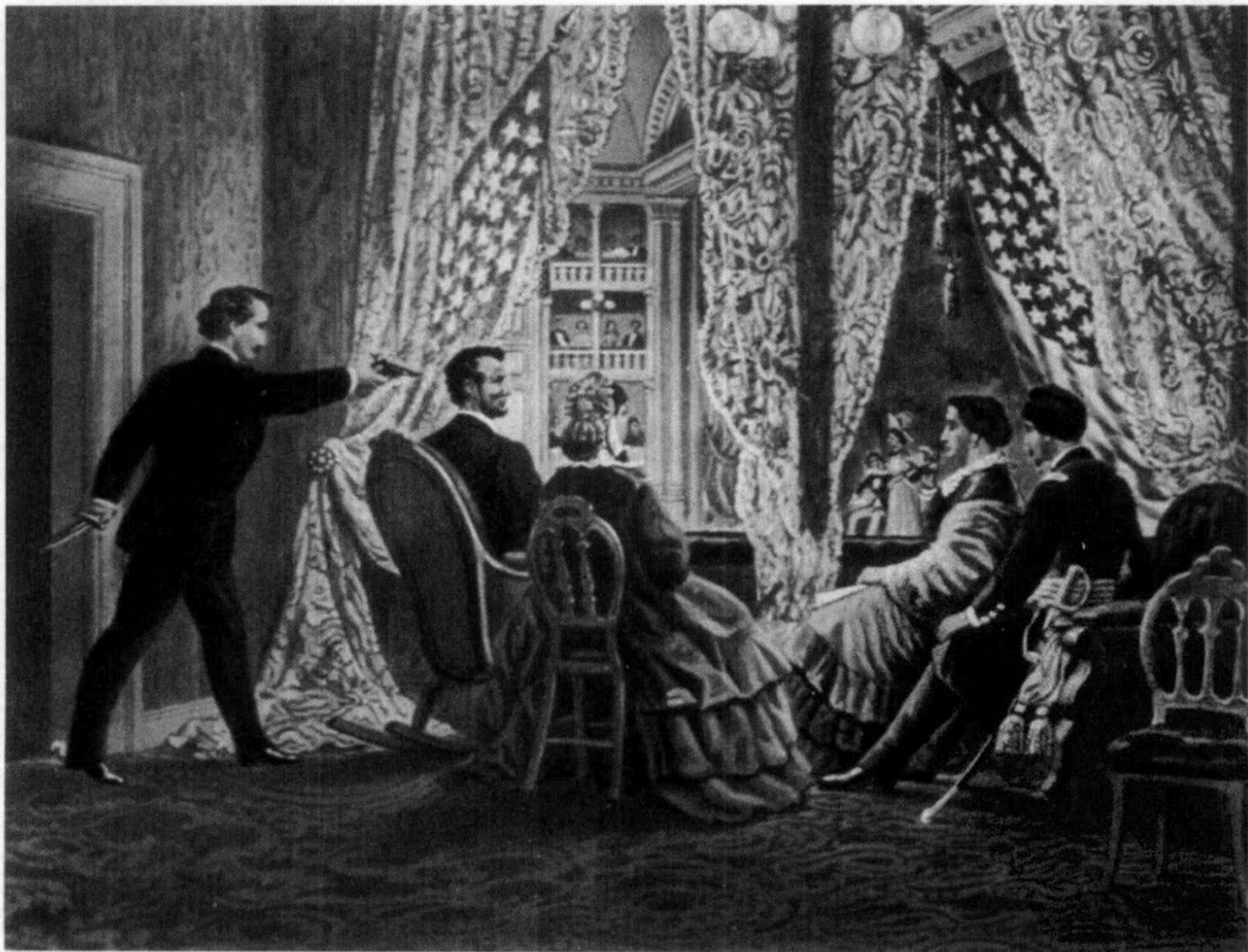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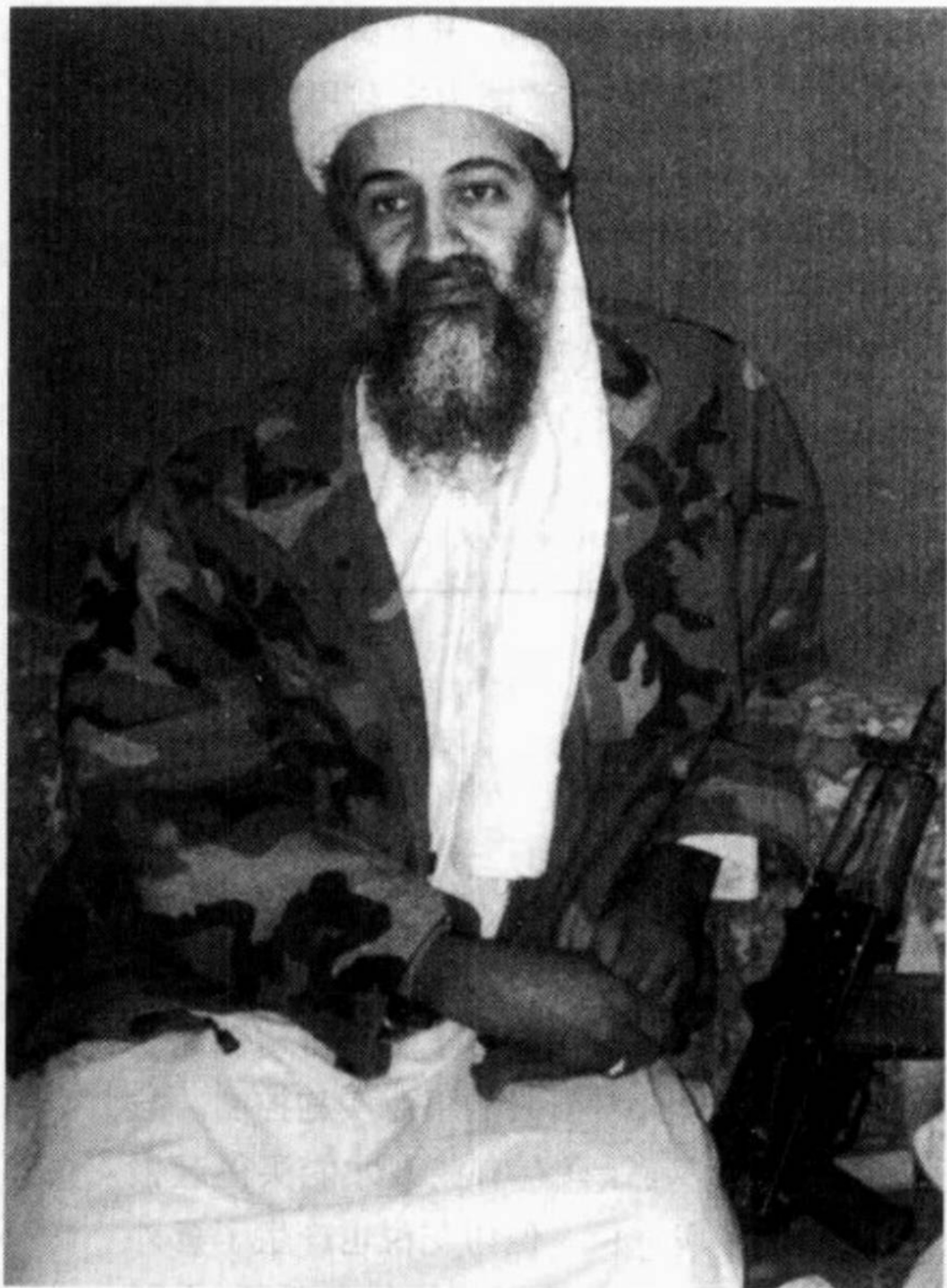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三架飞机,并用它们袭击了华盛顿和纽约的一些地点。袭击的时机把握精准,在纽约世贸双塔的第一座大楼遭到撞击后二十分钟,一架飞机又撞进了第二座大楼。据估计,全球约有20亿

观众在电视上实时观看了这一事件。而几乎是在140年前的1865年,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在华盛顿一家剧院里刺杀了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过了整整12天,消息才传到伦敦。携带信息的轮船从美国东行,在爱尔兰岛南岸遇上一艘小船,消息通过电报,从科克^①传到伦敦,不过这也比大船最终到达伦敦快了三天。(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铺设了一道精密的越洋电缆,在大西洋两岸即时传送电报。不过,早在20世纪初期,就可以在两块大陆之间进行长波广播传输)

在21世纪,传播技术已经能够实现即时信息共享,并且是几百万人即时共享。对于任何社会来说,传播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传播,就是信息从一个人或群体传递到另一个人或



① 科克(Cork):爱尔兰南端港口城市。



对于奥萨马·本·拉登的脸孔，你是否比自己隔壁邻居的模样还要熟悉？

群体，不论是通过言说，还是通过现代的大众传媒。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一位有影响的早期传媒理论家。根据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也就是说，传媒的类型比它所传播的内容或讯息更能影响一个社会。例如，一个卫星电视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显然不同于依赖远洋班轮携带的印刷品上的消息的社会。在一个电视扮演重要角色、将地球一端的消息即时传送到另一端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的体验是不同于依赖

马匹、轮船或电报线的社会的。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电子传媒正在创造一个地球村，即世界各地的人一起观看着事件的逐步发展，从而共同参与这些事件。对于全世界的几十亿人来说，奥萨马·本·拉登，这位被认为对于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幕后策划，比他们各自的隔壁邻居还更有可能被他们一下子认出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个世界里经历着同样的事件。由于全球化以及传播技术的力量，从加拉加斯^①到开罗，人们都能够接收到相同的流行音乐、新闻、电影以及电视节目。24小时新闻频道不但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实时报道，而且还随时播发事件进展，以便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观看。好莱坞或香港制作的电影在全世界都有观众，而像大卫·贝克汉姆^②和泰格·伍兹^③这样的名人在全球已经家喻户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已经目睹了信息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不断趋于汇同。如果说在从前，像印刷品、电视以及电影这样的传播手段还处在相对独立的领域的话，那么，现在它们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传播形式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确：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电话都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虽然报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居于核心地位，但从组稿编辑的形式到提供服务的方式都正在发生改变。报纸可以在网上阅读，手机的使用呈爆炸式发展，数字电视和卫星电视广播服务为观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选择。然而，互联网才是这场传播革命的核心。随着语音识别、宽

① 加拉加斯(Caracas):南美洲委内瑞拉首都。

② 耐人寻味的是，吉登斯在这里替换掉的第四版中的例子，正是小贝妻子维多利亚所在的辣妹组合(Spice Girls)。体育没有取代音乐，只是现在更可能听见的从“那个唱歌的人的老公”换成了“那个踢球的人的老婆”。其次，英国人吉登斯此时还不及得知，前英格兰国家队队长最终登陆美国，去踢一种和美式足球不一样的足球，而且正是在好莱坞与贝弗利山庄所在的洛杉矶。无论体育还是音乐，娱乐还是职业，都体现在本章的主题——大众传媒。

③ 他更为人熟知(即使从来不看、不打高尔夫球)的“名字”是形神兼备、音义俱佳的“老虎伍兹”。

带传输、网络播放以及光缆接入等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有可能消除传统媒体形式之间的差异,而成为给传媒受众提供信息、娱乐、广告和商业等服务的渠道。

在本章中,我们将把影响大众传媒与传播的变迁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来研究。大众传媒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电视、报纸、电影、杂志、广告、电子游戏和光盘等。这些之所以被称为“大众”传媒,是因为它们触及大群受众,即包括庞大人群的受众。

我们研究大众传媒,首先是探讨它所采取的一些形式。我们先讨论一些历史较长、较为传统的传媒形式,比如报刊、电影、广播和电视。然后,我们来看看互联网之类新式媒体的晚近发展。其次,我们将探究有关传媒的一些核心理论视角。接下来,我们谈的是与大众传媒和社会有关的一些话题,比如偏差、传媒效应和受众。最后,我们将探讨大众传媒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第一节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15世纪中期印刷机的发明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前兆,它使得文本的高速复制第一次成为可能。然而,尽管技术进展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也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只有社会

中拥有比较自由的报刊业,并且拥有一个具备足够的教育程度和财政能力来利用传媒的人口,才能发展起大众传媒。最近几年来,互联网之类的新技术使大众传媒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新式媒体的发展。首先,我们通过简述报刊、电影、广播和电视,来谈谈大众传媒在英国的兴起。

15.1.1 传统媒体

一 报纸

英国的报纸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当时正是政治多变、社会动荡的时代。政府为了防止政治上的不安定,制定了有关诽谤和煽动的严格法规,以此对新兴的报业实施控制。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报纸,又加征了印花税。但印花税也产生了意外后果,冒出来许多非法而廉价的小册子,在新兴产业工人阶级当中传播激进观念。这些小册子里销量最好的,比如威廉·柯贝特的周刊《政治纪事报》,^①比那些官方的、“盖上花儿的”^②报纸要多卖出许多倍(Hall 1982)。

反对印花税的人谴责它等于“知识税”。这个税在经过一连串的减税之后,终于在1855年废止了。这使得众多笔杆子欢呼英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而其标志便是“从

① 威廉·柯贝特(1763—1835)是英格兰深受欢迎的新闻记者,提倡保持传统乡村风貌,反对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1802年创办《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提倡新闻自由,抨击印花税法,不断揭露政府营私舞弊、卖官鬻爵等腐败行为,为此曾被以诽谤罪判徒刑二年,并课以巨额罚款。但在狱中继续指导周报的工作,使该报坚持出版。《政治纪事报》曾于1816年开始出版廉价版,持续二三年之久,是英国早期重要的政治性廉价报纸。它以劳工大众为对象,宣传议会改革,售价只有两便士,凡成批购买报纸的可获优惠。报纸全国发行量超过4万份(1817年《泰晤士报》发行量才7000份)。柯贝特也成了人所共知的平民领袖。英国政府十分恐慌,不得不对贩卖这种不经纳税的周报者加重罚款,并规定治安法官对于贩卖激进报刊者可予逮捕审讯。1817年政府又宣布终止人身保护法案的施行,声称对任何人有不经审判便长期监禁的权力。柯贝特被迫逃亡美国,但报纸仍然出版,从美国寄给英国读者。1819年英国议会通过新的印花税法,规定凡每月出版一期以上的报刊售价不得低于6便士。柯贝特的这份廉价周报也被迫改售6便士,结果因读者无力负担而未能继续。

② 原文为“stamped”,作者在此用引号,一是指其原意即交过印花税的,二是指没人看而被踩在地下的。

官方控制转向民众控制”(Koss 1973)。而詹姆斯·柯伦和简·西顿在有关英国报业的历史阐述《没有责任的权力》(Curran and Seaton 2003)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对上一种观点形成挑战。他们认为,印花税的废止恰恰是要瓦解激进报纸的流行局面,刺激更为“正派”的报纸的销量。柯伦和西顿认为,印花税的废止并没有开启一个报业自由的新时代,而是一段充满压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时期,只是这个时期是由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来实施控制。(本章第五节将讨论有关传媒控制的话题)

在现代传媒的历史中,报纸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发展,因为它以篇幅不大而容易复制的版式,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将有关时事、娱乐和消费品的各类信息合并打包。廉价的日报首先出现在美国。

每份售价一美分的日报最早创办于纽约,之后,美国东部其他各大城市也开始效仿。到了20世纪初,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性或地方性的报纸。与幅员较小的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美国没有发展起全国性的报纸。而廉价新闻纸的发明则是19世纪末以来报纸传媒大规模普及的关键。

柯伦与西顿指出,来自广告的额外收入使得报纸的标价在这一时期锐减,使报纸人人买得起。他们还认为,广告逐渐消解了激进报纸,因为登广告的人往往会选择他们在政治上同情的报刊刊登商讯,所以选择的都是些发行量较小但读者群较为富裕的报纸,而不是那些激进报纸,因为它们的流通量虽大,但卖给读者却不太可能买得起广告中的产品(Curran and Seaton 2003)。

到了20世纪早期,英国出现了新型的全国性报纸,比如《每日邮报》(*Daily Mail*)、《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镜报》(*Mirror*)和《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将新闻、娱乐和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向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读者群兜售。而《泰晤士报》(*The Times*)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则为比较阔绰的读者提供更为严肃的新闻分析。到了这一阶段,大部分新闻媒体的所有权都集中到少数富裕的企业家手中。再到20世纪30年代,比弗布鲁克男爵、凯姆罗斯勋爵、凯姆斯利勋爵和罗瑟米尔子爵^①就拥有英国50%的全国性和地方性日报,以及30%的周末报纸。批评者们指出,时人所称的这些“报业大亨”^②利用了他们对于全国性报纸的所有权,推进自己的政治事业和野心(Curran and Seaton 2003)。(我们在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还将讨论媒体所有权的话题)

报纸在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向公众迅速而全面地传递信息的首要方式。随着广播和电影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电视的兴起,并且逐渐又有了互联网的兴起,报纸的影响力也就衰落了。关于报纸读者人数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阅读某一份全国性日报的人数比例业已下降。在男性中,日报读者的比例从1981年的76%下降到1998年至1999年的60%;在女性中,读者数的规模本身就要低些,但仍出现了类似的比例下降,从68%下降到51%(HMSO 2000)。

在线传播很可能进一步吞噬报纸的发行量。现在,新闻信息可以在网上几乎即时获取,并且从早到晚不断更新。许多报纸也可以免费

① 比弗布鲁克男爵(Beaverbrook, 1879—1964,原名艾尔肯)是加拿大金融家,英国政治家和报业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任职内阁大臣。拥有《每日快报》、伦敦《星期日快报》及其它多种报纸。罗瑟米尔子爵(Rothermere, 1868—1940,原名哈姆斯沃思)与其兄诺思克利夫子爵(“Northcliff”,即俗称“北岩”)共建了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报业王国,开创通俗报业道路。拥有《每日邮报》、《每日镜报》、《星期日画刊》等。贝瑞(Berry)兄弟于1901年创办《广知世界报》,接着买下《星期日泰晤士报》,1926年取得原属罗瑟米尔报团的最大杂志公司,1928年购得《每日电讯报》。1937年兄弟分家。哥哥W.贝瑞受封凯姆罗斯勋爵,旗下《每日电讯报》等组成凯姆罗斯报团;弟弟J.贝瑞受封凯姆斯利勋爵,旗下《星期日泰晤士报》等组成凯姆斯利报团。

② 原文为“press barons”,事实上,这些人也大多获授爵位。

在网上访问并阅读。

二 电影

首部向购票的观众放映的影片出现在1895年的法国巴黎，吕米埃兄弟的《火车到站》(Arrival of the Train in La Ciotat Station)在放映时，当屏幕上出现一辆慢慢驶近的蒸汽机车并逐渐占满整个屏幕，观众们纷纷逃离座位。^①英国的报界在过去几十年发展缓慢，但电影和电影院的发展步伐却要快得多。英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于1896年开张，到1914年，仅伦敦一地的电影院就超过了五百家。电影票是各个阶层都负担得起的，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工作时间的缩短与失业人数的增多都意味着，上影院看电影的人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大众观众群。

观众的需求很快就导致电影院每周搞两次新片放映，每次有两部电影，一部是小成本副片，一部是主打正片。而对于新片的需求又促使电影制片厂日夜赶工，粗制滥造。这些影片往往落入程式，由高度专业化和分工化的科层组织制作而成。

有关科层制，详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讨论。

随着这门产业越来越商业化，出现了一种“明星制”(star system)，制片厂鼓励人们关注像玛丽·璧克馥和鲁道夫·瓦伦蒂诺^②这等演员的个人生活，他们出演一部影片就是票房大热的保证。



保罗·朱利叶斯·路透于1849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新闻服务机构的原型，在其通讯网络中，既使用电报，又使用信鸽。到了1923年，他所创办的这家企业，也就是路透社，开始通过广播电台传输新闻。

到了1925年，在英国上映的影片中有95%出自美国。拥有影片分配权的美国制片厂越来越控制了电影院。制片厂可以强迫电影院

① 一般认为世界上公开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工厂大门》(全称为《工人们离开吕米埃工厂》)。不过，吕米埃兄弟一开始拍了几十部类似的反映日常生活场景的短片。

② 玛丽·璧克馥(1893—1979)是加拿大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默片时代的“美国大众情人”，最早的电影明星之一，曾在百老汇演艺十年。主演《暴风雨之乡的苔丝》、《太阳溪农庄的吕蓓卡》、《可怜的小姑娘》等。鲁道夫·瓦伦蒂诺(1895—1926)是意大利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被崇拜为20世纪20年代的“情圣”。初到美国时曾做过园林工和洗碟工。到好莱坞后被迅速包装成星，演过《酋长》、《碧血黄沙》、《鹰》等。他的去世引起世界性的歇斯底里，有人为此自杀，瞻仰其遗容的人堵塞了纽约11处街口而引发骚动。

包购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出品,从而有效地淘汰了竞争者。就像在报界的情况那样,所有权不久便在很大程度上积聚到少数几家大企业手中。美国的电影生产引出了有关文化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的问题,我们下文还将论及(参见本章第六节第五小节)。

三 广播与电视

作为受众,我们与广播和电视的互动方式不同于与电影的互动方式。广播和电视以一种电影所不能为的方式直接进入了千家万户。这两种媒体都不需要电影所需要的那种关注。特别是听广播,是其受众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其它活动融合在一起完成的事情,大多数广播就是在早上听的,成了为一天做准备的仪式的一部分。电视和广播也具有电影所不具备的那种即时性:在事件发生时,它们可以从几乎世界各地向广大受众报道事件,就像2001年9月它们报道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那样。

在英国,广播很快就被一家公立垄断机构所控制。到1926年,这家机构被称为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BBC)。^①广播奠定了英国的电视播放的组织模式,BBC至今依然是一家公立组织,通过对每户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收取注册费来维持。^②在一段时期里,BBC是唯一一家获准在英国播放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公司。随着1950年代引入了商业电视,即其收入依靠广告而不是注册费,稍后又发展出了一大堆商业电台,这项政策便有所松动。

BBC的第一任总监是约翰·里思(日后受

封里思勋爵),这位谨严的长老会基督徒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严格贯彻于组织之中。在里思看来,BBC的宗旨就在于“知事、晓理、娱情”。还可以加上一句:规范。史学家A. J. P. 泰勒尝言,里思运用“垄断的横蛮暴力,给英国民众打上基督教道德的印记”(转引自Curran and Seaton 2003)。^③BBC作为公共性广播电视公司的独特角色,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有关公共性广播电视公司在英国的未来,在本章第五节第一小节将进一步讨论)

在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视机的台数和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都大大增长了。电视现在压倒其它其他媒体。如果目前看电视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现在出生的孩子到18岁的时候,看电视的平均时间要超过除睡觉以外的其他所有活动。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电视机。在英国,大约有85%的成年人每天都会看电视(HMSO 2004)。每台电视机平均每天打开3到6小时。而在西欧其他国家,还有美国,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英国,4岁及4岁以上的人每周收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25小时。大人收看电视的时间是儿童的两倍,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用上学,晚上睡觉也晚些。而来自较低社会阶级的人看电视的时间要多于来自最高的三个社会阶级的人(参看图15.1)。

四 电视与社会生活

看似不断增加的电视“一日三餐”,究竟给整个人口产生了多大效应,有几位传媒理论家已经对此提出了怀疑。有两套论述广为人

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922年创办时名为英国广播有限公司。后来才改为完全公立。

②过去它还要对拥有收音机的用户收取收听费。

③约翰·里思男爵(1889—1971)自1922年起任BBC总经理,1927年起任BBC总监,直至1938年改任帝国航空公司董事长。在此期间,他将无线电广播发展到遍及不列颠诸岛,创办世界上第一个高清晰度电视广播业务。

知,一是罗伯特·普特南在最近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的著述中提出的,一是尼尔·波斯曼(1931—2003)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书名很吸引人,《自娱至死:娱乐业^①时代的公共话语》(Postman 1985)。

在波斯曼看来,电视作为娱乐,引发了一些严肃的话题,因为如他所言,“形式排斥了内容。”他这么说的意思是,电视作为“形式”,是一种无法维持严肃“内容”的媒介。他认为,理性的论辩最好是通过印刷文字的形式来传递,因为这种形式能够维持复杂而严肃的内容。他回顾了19世纪,称之为“理性时代”,因为那时候占主导地位的是印刷文字。波斯曼的主张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参看本章引语)颇有几分相似,只是对于电子传媒,

波斯曼的怀疑态度远比麦克卢汉明确。对波斯曼而言,报纸媒介创造了一群理性的人,而电视媒介创造了一群娱乐的人。在一个被电视主导的社会里,新闻、教育和政治都被化简为娱乐,所以,正如其书名所示,我们目前所做的无非是“自娱至死”。

尽管波斯曼的书雄辩有力,但也被批评为基于印象而不是经验研究。不过对于美国政治理论家普特南的著作,这种批评意见就不适用了。

普特南有关“社会资本”之削弱的命题,详见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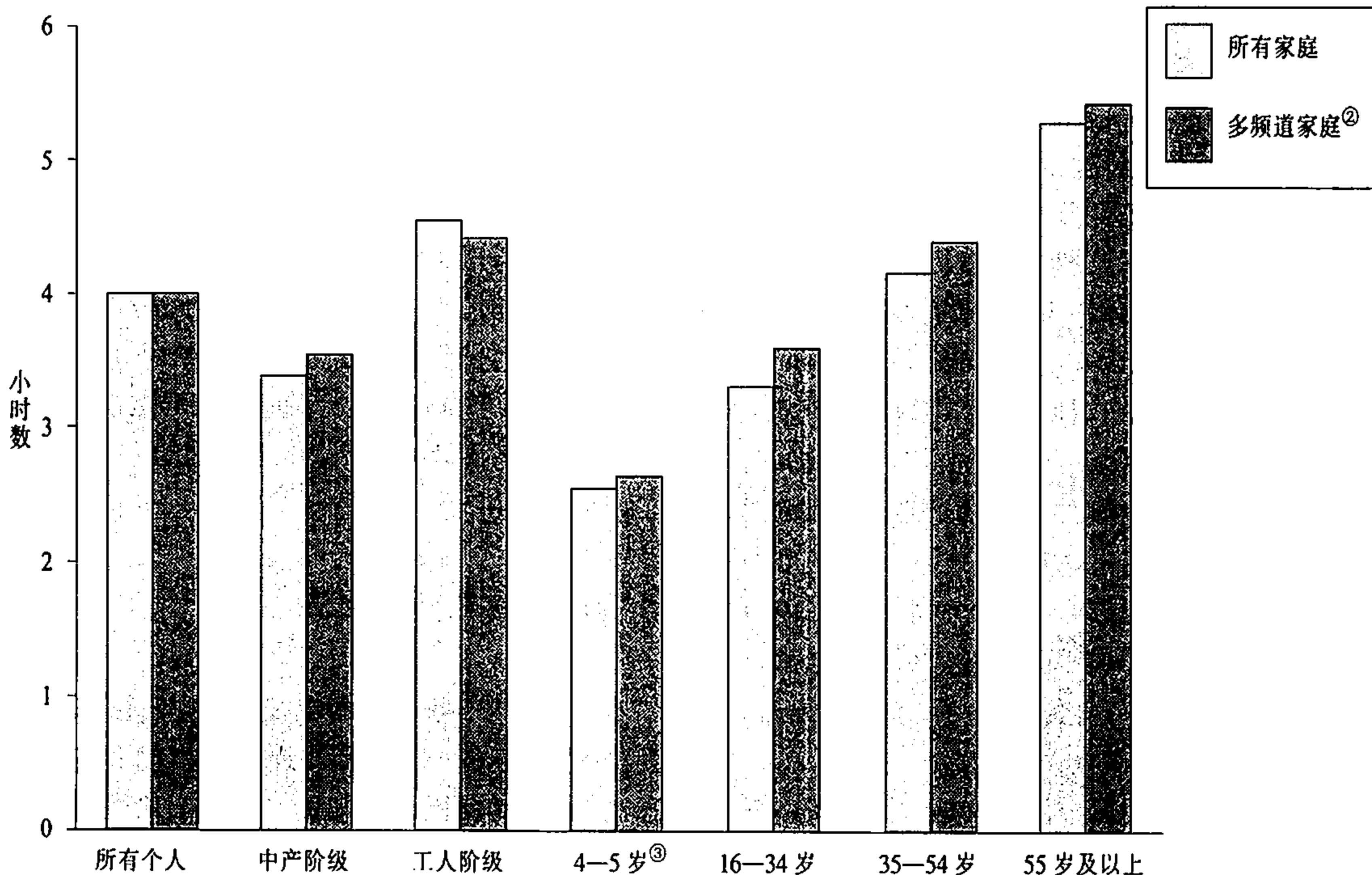


图 15.1 每日每户看电视时间,以年龄和社会阶级分组,2003年1月至3月

资料来源:转引自 Ofcom (2003), 页 32

① “show business”通译“娱乐业”、“娱乐界”。但译成“秀业”甚至“骚业”显然更符合这个娱乐时代的精神。

② 此处原文为“multichannel homes”,指能收看卫星电视的家庭。

③ 此处原文如此,疑为“4—15岁”。

我们已经看到, 普特南所谓社会资本, 指的是有用的社会网络, 一种相互义务和信任感, 对于主导有效行为的规范的理解, 以及整体来说, 使人们有能力有效作为的其他社会资源。普特南在他的《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以及别处提出的阐述, 乃是基于在美国的研究, 发现在最近几十年里, 社会资本大大削弱。普特南 (Putnam 1996) 提出了造成这种削弱的一种原因: 电视。

普特南指出, 1950年, 也就是社会资本各项指标达到巅峰的时间前后, 家里有电视机的美国人仅仅只有10%。到了1959年, 这个数字飙升到90%。一些研究估计, 美国人现在平均每天看大约4小时的电视 (并且不包括电视光开着没看的时间)。对于美国看电视的保守估计意味着, 单这一项活动现在就占去了美国人空闲时间的平均大约40%。普特南指出, 美国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安排方式的这种巨变, 恰恰就在社会资本大幅削弱的时期。

普特南提出, 大众都来看电视与社会资本受侵蚀, 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并非偶然。如果综合考虑其他因素, 比如教育、年龄和性别, 看电视与社会信任和群体成员身份之间具有强烈的负相关。基于同样标准, 读报纸与社会信任和群体成员身份之间具有正相关。

至于看电视为什么会侵蚀社会资本, 普特南提出了一点原因, 就是节目内容对于观众的效应。比如说, 一些研究表明, 看电视上瘾的人会特别怀疑别人的善意, 比如说会高估犯罪率。普特南的结论是: “只有在含氯氟烃^①大量排放许多年之后, 才发现它导致了臭氧层受侵蚀; 同样, 只有在潜在的过程已经开始几十年

之后, 美国的社会资本受侵蚀才凸显出来。”虽然普特南也警告不能只是怀旧20世纪50年代, 但他仍然提出, 该是就各种技术对于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效应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时候了 (Putnam 1995)。

15.1.2 新媒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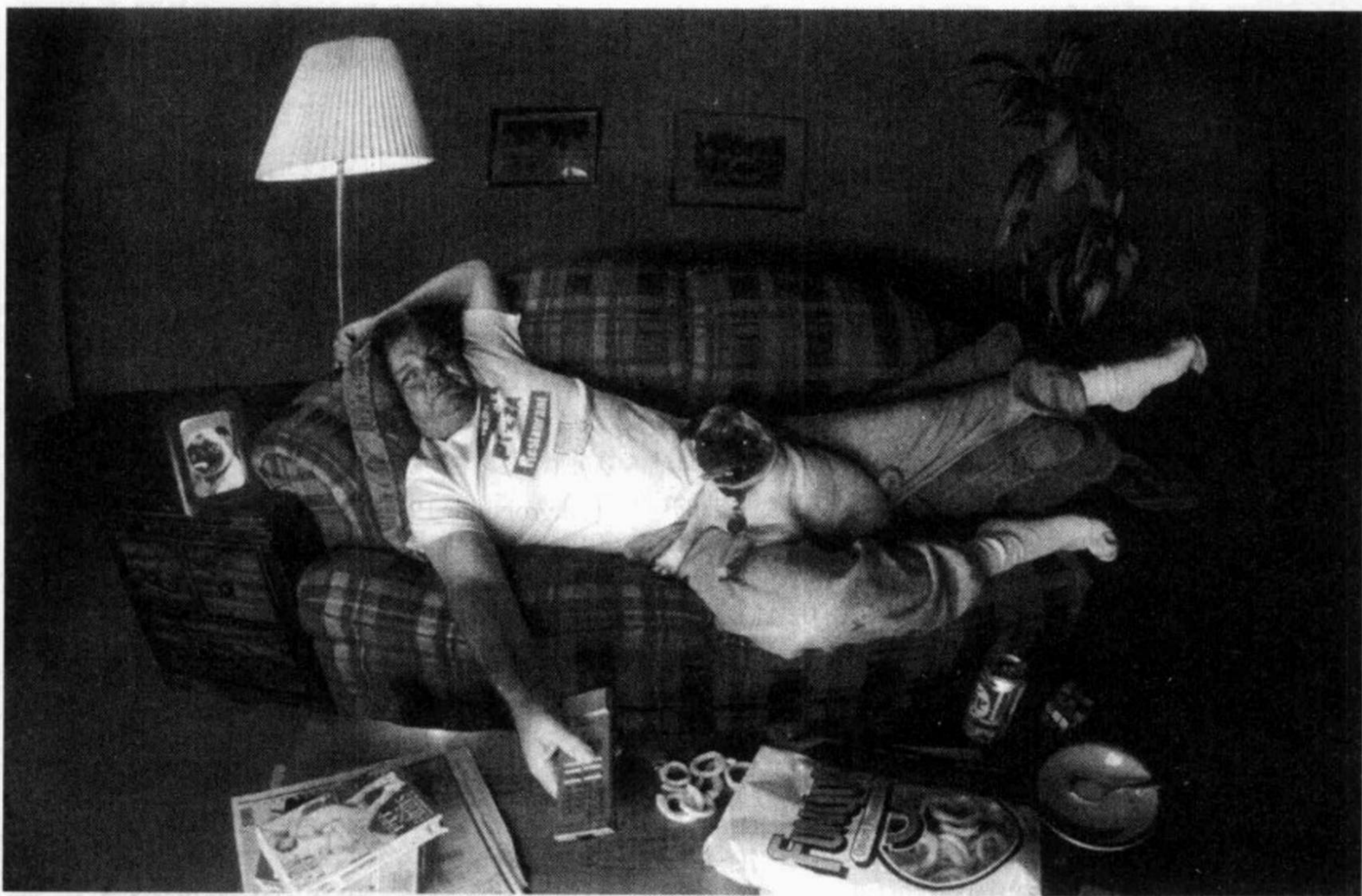
麻省理工学院传媒实验室的创立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在其《数字化生存》一书中 (Negroponte 1995), 分析了数字化数据在目前传播技术中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任何信息片断, 包括图片、视像以及声音都可以通过二进制转换成“比特”(bits)。一个比特或是1或是0。例如, 1、2、3、4、5的数字化表示分别是1、10、11、100、101, 如此类推。数字化以及速度是多媒体发展的基础。过去不同的传媒通常需要不同的技术 (例如视像与声音), 现在它们可以被整合成单一媒介 (DVD、PC^②等等)。近些年来, 每过18个月,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就会提高一倍。这意味着许多进展, 比如现在有可能通过互联网看电影、听音乐。数字化也促进了互动式媒体的发展, 可以让个体主动参与或组织他们在看、在听的东西。在这一节中, 我们将考察数字化给媒体带来的深切影响。

一 数字电视

21世纪伊始, 电视播放技术经历了一场革命, 节目传输从模拟式转为数字式。模拟电视是一种“陈旧的”播放系统, 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用以向全国的电视机播送信号。它

① 原文为“chlorofluorocarbon”。其商品名更为人所知, 即“氟利昂”(Freon)。20世纪70年代以后, 人类逐渐发现了具有很高商业和工业价值的氟利昂在大气中长期聚集之后, 成为环境的严重威胁, 是臭氧层空洞的重要致因。

② 和上文的CD一样, DVD也已经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词, 虽然有很多人其实搞不清并且不需要搞清技术、内容、基质与机器之间的差别。DVD也就是“digital videodisk”, 即数字影碟。PC在原中译本里译为计算机, 现在我们已经无法体会, 从当初的计算机发展到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PC), 这种技术进步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多大变化。为保持与日常生活习语的一致, 以下有些地方也译作电脑。



数字电视和卫星电视让观众似乎有了无穷无尽的观看选择。

把声音和图像转换为载波，通过无线电发送，由房顶上或电视机顶上的天线接收。

数字电视的工作原理是将声音和图像转换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信息。数字传送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接收：通过电视天线和解码器（通常是一个机顶盒），通过圆盘式卫星接收天线，或者通过光缆。而电视机的工作就像一台计算机，将这种信息重新转换回图像和声音。广播电视台和服务供应方坚称，数字电视不仅意味着增加频道数，而且意味着提高声音和图像的质量，并能提供额外的服务。比如说，数字电视使互动式电视、网上购物、网上银行、家庭购物、家庭银行等服务成为可能。数字电视的到来也创造了将个人计算机与电视融为单一装置的可能性，尽管这类设备尚未广泛使用。

在英国，政府希望所有电视观众在 2012 年以前都从模拟式电视转为数字式电视。到那一年，基于模拟频率的电视传送预计将要停

止。自那以后的所有转送都将是数字式的。截止到 2004 年，英国家庭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转为数字电视。

随着卫星、光缆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英国观众能够看到的电视频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在 2003 年，仅一家服务供应商，即天空卫视，就提供一种包月定制服务，可供观众选择的频道多达 187 个。1998 年数字电视引入英国商业市场后，大大增加了订购付费电视的观众比例。2003 年，有 26% 的英国家庭订购了卫星电视，9% 的家庭订购了有线电视（Ofcom 2003）。

二 互联网

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报纸、电影和电视，但是不能仅仅从这些领域来讨论传媒。传媒最根本的属性之一就在于信息传播

和交换的基础设施。20 世纪下半叶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进步已经完全改变了电信/远程传播的面貌,也就是在相当距离内通过技术媒介传播信息、声音或图像。

例如,新的传播技术给世界的货币体系和股票市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货币不再是黄金,也不是你口袋里的现金。货币已经日益电子化,储存在全世界银行的计算机里。碰巧装进口袋的现金的价值是由以电子链接的货币市场中交易者的活动决定的。这种市场的出现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它们是计算机和卫星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据说,“技术正在迅速把股票交易变成一个毫不间断的全球市场,全天 24 小时开放”。(Gibbons 1990)

四种技术趋势促成了这些发展:首先,计算机能力不断改进,成本日益降低;其次,数据的数字化(参见上文有关其与电视关系的讨论^①)使计算机和电信技术的整合成为可能;第三,卫星传播的发展;第四,可以通过一束细缆而传递各种讯息的光纤技术。近年来的通信传播呈爆炸式增长,毫无放缓迹象。

互联网的源起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人们就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未来不会是个人的天下,而在于一个由相互联结的计算机组成的全球系统,即互联网。虽然当时的许多电脑用户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个人电脑只不过是一个接入点,由此了解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就是发生在范围遍及整个星球的一个网络中,这个网络不为任何个人或公司所占有。

有关互联网对于国际激进行动主义的加剧所具有的潜力,参阅第二十章

第四节第二小节的探讨。

互联网起源于 1989 年前的冷战时期。从 1969 年开始,基于美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部五角大楼所使用的一个系统,发展出来“网”(Net)。该系统最初被命名为阿帕网(ARPA net),即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ARPA)的网络。起初的联网宗旨很有限。阿帕网希望让散布于美国各地为军方合同工作的科学家们能汇聚各自的资源,共享他们所使用的昂贵的设备。几乎是事后的额外想法,阿帕网的创始人也想到一种传送信息的新方式,于是电子邮件(electronic mail),即所谓伊妹儿(email),也随之诞生。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五角大楼的互联网已经联结了 500 台计算机,但都位于军方各实验室和各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随后,大学里的其他一些人也开始入网,为各自的目的使用这一系统。到了 1987 年,互联网已经扩展到包括 28000 台电脑主机,分布于众多大学和实验室。

越来越多的商业性网络服务供应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s)提供通过调制解调器(modems)接入而拨号上网的服务,后来又有宽带服务,这大大激发了上网家庭的比例增长。网上服务、电子公告牌、^②聊天室和软件图书馆,这一切都被人搬上了网络。这些人五花八门,最初主要是在美国,现在则遍及世界。公司也加入到这一风潮。1994 年,公司超过大学,成为互联网的主要用户。

互联网最广为人知的应用就是万维网(World Wide Web, www)。实际上,就像鸟巢中的杜鹃鸟一样,很可能会反客为主。^③万维网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多媒体图书馆。它是由一

① 原文此处标注页码有误,仍为旧版页码。

② 这个中文词在大陆的普及程度远不如它的原文简称——BBS(bulletin board system)。同样,上文那个技术性很强的“调制解调器”,人们更熟悉它的首字母音译——“猫”。

③ 实际上,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区分这两样东西。这正是网络普及的效应。

名在瑞士物理实验室工作的软件工程师于1990年发明的。^①后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发明了一种软件,从而使万维网风靡全世界。用户们在互联网“浏览器”(browser)的帮助下浏览^②网络。这种软件程序可以帮助用户搜寻信息、定位特定网址或网页,并标注这些网页以备日后查询。通过网络,可以下载到各式各样的文件和程序,从政府政策文件、反病毒软件到电脑游戏。随着网站逐渐增多并完善,它们已经成为感官的盛筵。许多网站页面精美,辅以精致的图表和照片,或者内嵌视听文件。网络也充当了“电子商务”即在网上进行的商业交易的主要界面。

随着家用个人电脑的日益普及,英国的互联网接入点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增长。截止到2004年第二季度,英国52%的家庭(1280万户)可以在家上网,相比之下,在1998年的同一季度,这一比例仅为9%(220万户)。参看图15.2。

根据国家统计署(National Office of Statistics)的调查,在过去三个月中曾经使用过互联网的英国成年人中,最常见的用途是电子邮件(85%)、查询商品或服务信息(82%)。而最常用的接入点是自己家中(82%),接下来是自己的工作场所(42%)。但到2004年7月,仍有37%的成年人从未使用过互联网(HMSO 2004)。

全球范围内究竟有多少人联结到网络上,这是无法确知的事情。但据联合国估计,到

2000年,世界人口的大约10%是网民(Internet users),这个数目正在迅速增长。然而,互联网的接入分布极不均衡(参看表15.1)。2002年,西欧或北美等高收入国家中有45%的人被归为网民,但在低收入国家,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方,大约只有1.3%的人属于这一类。

互联网的影响

在一个技术变迁速度令人眩晕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确知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许多人认为,互联网典型地展现了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型全球秩序。互联网中的交流发生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③里。所谓网络空间,指的是由组成互联网的全球计算机网络形成的互动空间。在网络空间里,我们不再是“人”,而是出现在另一个人的电脑屏幕上的信息。^④其他人是什么身份,是男是女,身在何处,互联网不能提供任何确定信息。有一幅关于互联网的著名漫画:一只狗坐在电脑前,屏幕上写着:“互联网最棒的好处,就是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给社会学家提出了重大的问题。互联网正在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模糊了全球性和地方性^⑤之间的界限,为沟通与互动提供了新的途径,并且使越来越多的日常事务可以在网上完成。然而,互联网一方面带来了探索^⑥社会世界的令人振奋的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和社群。虽然所谓“信息时代”尚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有许多社会学家开始讨论互联网在晚期

① 第四版为1992年。实际上,这是设在日内瓦的欧洲核研究组织的科学家从1989年开始开发的,1992年初向外公布了基于文本的浏览器。

② “浏览”的英文“navigate”本意是“导航”,也就是通过搜索定向自由航行/飞翔。

③ 大量以“cyber”为前缀的词从仅仅10年前开始大举进入汉语,起初的翻译五花八门,许多采以音译“赛博”、“赛伯”之类。此词乃是控制论(cybernetics)的简写。

④ 在第四版中,吉登斯注明这是布希亚的思想。当然,现在人人都会说这样的话,它也就不是什么“思想”了。第四版接下来原本是“只有在发电子邮件时,用户会确定自己的身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这句话很不可靠了。

⑤ 这里的“global”和“local”不仅限于地理涵义,因此也作“全局性”与“局部性”解,正如网络中的全局网与局域网。

⑥ 原文为“explore”。而最常用的网页浏览器就是微软捆绑的IE(Internet explorer)。

表 15.1 世界各地每千人中网民数(2002 年)

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	40.9
最不发达国家	2.8
阿拉伯国家	28.0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60.9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	81.2
南亚	14.9
非洲撒哈拉以南	9.6
中东欧与独联体	71.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	383.1
高收入经合组织成员国 ^①	450.5
人类发展指数 ^② 高档国家	382.6
人类发展指数中档国家	37.3
人类发展指数低档国家	5.9
高收入国家	445.8
中等收入国家	59.5
低收入国家	13.0
世界平均	99.4

资料来源:UNDP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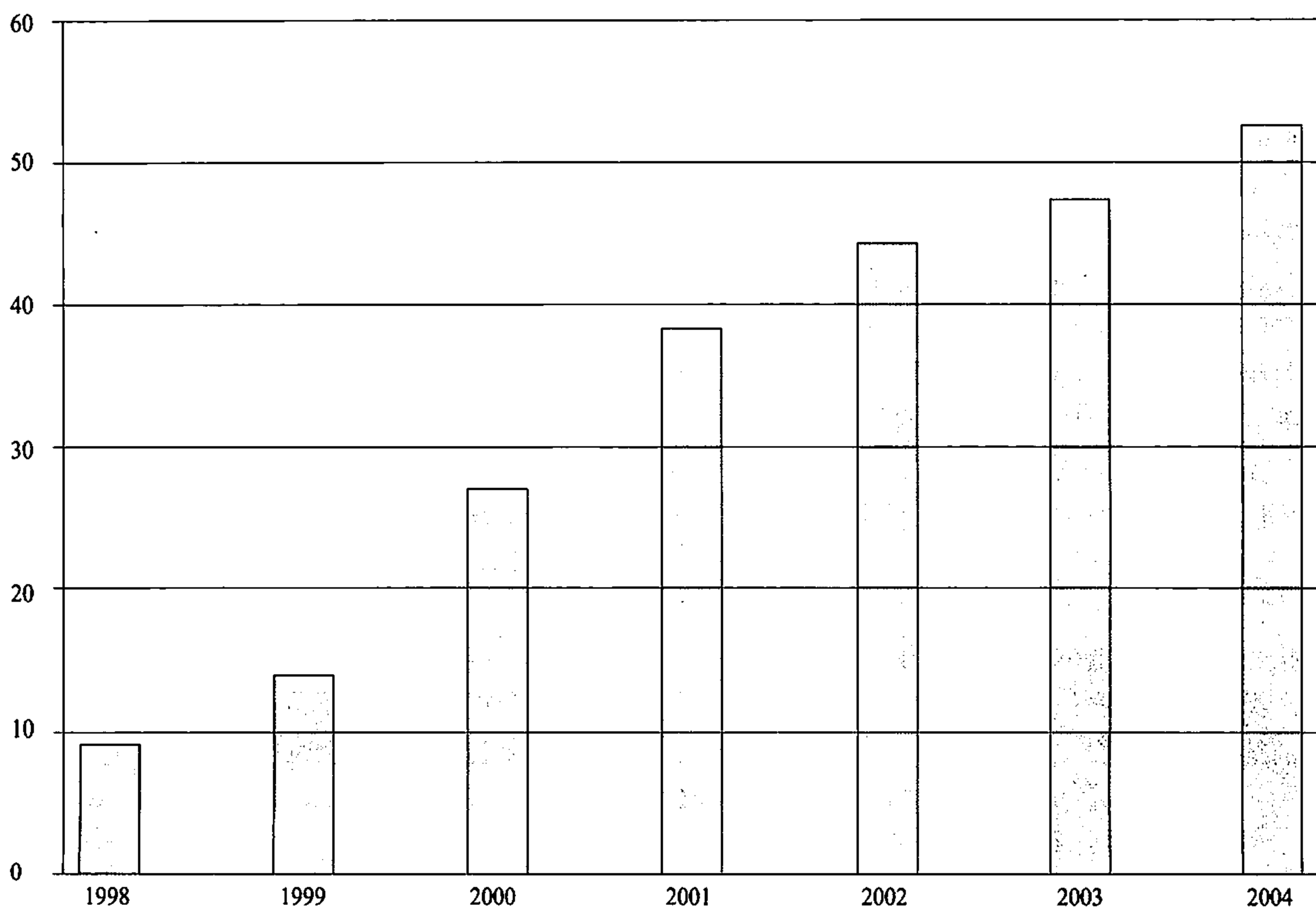


图 15.2 英国互联网接入户的家庭比例,1998 年至 2004 年(%)

资料来源:National Statistics Online (2004)

① 经合组织中也包括土耳其、爱尔兰、葡萄牙等收入相对其它成员国而言较低的国家。

② “human development”, 这里指人类发展指数的高、中、低三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 1990 年开始评估该项指数, 主要以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为测量指标。这就比高、中、低收入国家这种分类更为全面。其中的经济发展水平测量的是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即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收入。

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复杂意义。

关于互联网对社会互动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方面,一些观察者认为,网络世界孕育了新的电子关系的形式,增进或补充了现有的面对面式互动。当一个人在国外旅行或工作的时候,可以通过互联网定期与在家的亲朋好友联系。纵然相隔遥远,也更可以忍受了。互联网也促进了新的关系类型的形成。“匿名的”在线用户可以在“聊天室”见面,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这种网上接触会演变成充分发育的网友关系(electronic friendships),甚至导致面对面的网友会面。许多网民融入了生机勃勃的网上社群,迥异于他们在物质世界中所在的那些社群。认为互联网对人类互动具有积极补充作用的学者们认为,互联网扩大和丰富了人们的社交网络。

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持有这种热烈欢迎的态度。如果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网上交流,在网络空间处理日常事务,就可能减少在物质世界里与其他人互动的的时间。一些社会学家担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会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atomization)。他们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入互联网,就会产生一种效应,人们与亲朋好友呆在一起的“质量时间”^①就会减少。随着工作与居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互联网也就逐步侵入了家庭生活:许多人下班后在家里继续工作,比如查阅电邮,或者做完他们在白天没有完成的任务。人际接触减少了,人际关系受到损害。看戏和读书之类传统的娱乐形式也被挤到一边,社会生活的结构被削弱了。

互联网还对有关个人认同的问题提出了挑战,创造出新的社群形式,新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这些话题在第五章第五节第五小节有所讨论。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基本上可以肯定,争论的两方都有一些道理。毫无疑问,互联网正在拓展我们的视野,并且为与他人的接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然而,互联网的发展步伐异常迅猛,也对人类互动的传统形式提出了挑战,构成了威胁。互联网是否会在根本上把社会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缺乏人情的世界,人们几乎足不出户,丧失沟通能力?这似乎不大可能。大约50年前,当电视刚刚闯进媒体舞台的时候,人们也流露出如出一辙的担心。《孤独的人群》(1961)这本书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进行了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分析,大卫·里斯曼及其同事们明确关注电视对家庭和社群生活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担忧有一些确属事出有因,但电视以及大众传媒也通过多种方式丰富了社会世界。

与此前的电视一样,互联网也同时激发了希望和担忧。我们会在网络空间中失去我们的身份认同吗?计算机化的技术将会主宰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它吗?人类会后退到反社会的网络世界中吗?幸运的是,对以上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几乎都可以肯定是“不”。正像我们在前文第五章结语有关“接近的冲动”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如果可以通过一种普通的方式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一般不会开视像会议。商业主管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多形式的电子沟通方式,但与此同时,面对面的商业会议也在迅速增加。

社会学家卡斯特提出,互联网还将继续成长,因为它会使得各种网络蓬勃发展。在卡斯特看来,网络是确定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组织结构。

有关卡斯特的作品,详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小节。

相比于较为陈旧的理性化、等级化的组

① “质量时间”(quality time)是指为了培养感情、加深关系而与他人相处的时间,尤指与家人共度的时间。

织,网络所固有的弹性和适应性使它们具有巨大的优势。卡斯特认为,互联网使得工商界有能力对去中心化、极其复杂的活动进行全球协调。对个人来说,互联网将有助于工作与自我雇用、个人表现、协作与社交的新型融合。而对于政治活跃分子,互联网则促成了各种个人组成的网络相互融合、协作,并将各自的讯息传遍全世界。借用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念,卡斯特提出,现在则是“网络即讯息”(the network is the message, Castells 2001)。

第二节 有关传媒的理论视角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大众传媒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两种思路,即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并介绍晚近对于这场争论的一些重要的论述。

15.2.1 功能主义

在20世纪中期,查尔斯·赖特和哈罗德·拉斯威尔之类的功能主义理论家集中考察了媒体以哪些方式履行其整合社会的功能(Wright 1960; Laswell 1960)。^①

第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介绍了功能主义思想。

根据传媒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的说法(McQuail 2000),传媒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中有以下几项:

- 1 信息 (Information) 传媒提供给我们有关世界的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从提醒我们注意交通拥堵的网络摄像头和电台广播,到滚动式的天气报告、股票行情以及涉及我

们个人的相关话题的新闻报道。

- 2 关联 (Correlation) 传媒对给予我们的信息提供说明,帮助我们理解其意义。它支持了既定的社会规范,并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关社会化,详参第六章)
- 3 延续 (Continuity) 传媒的功能亦在于表达主导文化,认识社会发展新趋势,塑造共同价值。
- 4 娱乐 (Entertainment) 传媒提供娱乐消遣,减少社会张力。
- 5 动员 (Mobilization) 刺激经济发展、工作、宗教或战时支援,传媒可以发动宣传攻势,动员社会满足这些目标。

近几十年来,功能主义的传媒理论已经衰微。具体来说,它们被批评说将受众视为传媒讯息的被动接收者而不是积极解释者。(有关受众反应的更为新近而成熟的论述,参阅本章第四节第一小节的讨论)不仅如此,功能主义还被贬为只限于描述传媒而不是做出说明。随着功能主义的传媒理论渐趋落伍,其他分析形式走向前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冲突思路。

15.2.2 冲突理论

在欧洲,研究大众传媒的各种冲突思路一向比较流行。以下,我们来看看来自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两种最重要的传媒理论,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思路和文化工业思路。在这一框架内其他颇具影响的思路还包括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我们将在第三节来讨论)。

政治经济学思路

政治经济学思路将传媒视为一门工业,

^① 这两份文献在书后的文献目录中分别标注为1940年和1948年。

并考察了主要的传播方式通过哪些方式逐渐被私人股权所占有。传媒的所有权常常集中在极少数富裕的传媒巨头手中,例如战前的英国报界被报业大亨们主导的情形(本章第一节第一小节有所讨论)。到了全球时代,传媒的所有权跨越了国家边界。下文中,我们将会简述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传媒大王鲁珀特·默多克的生平,他是天空卫视及其他传媒机构的所有者(参见本章第六节第五小节)。

倡导政治经济学观点的人会认为,经济利益的作用会排除掉那些缺乏经济力量的声音。不仅如此,确实存活下来的声音就是那些最不可能批判通行的财富分配的声音(Golding and Murdock 1997)。美国激进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其《传媒控制:叹为观止的宣传成就》一书中,明确倡导这种观点,影响广泛(Noam Chomsky 1991)。乔姆斯基大力批判大公司对于美国乃至全球传媒的主导。在他看来,它们的主导导致了公众被赋予的信息受到了严格控制。在冷战期间,这些公司控制了信息以创造一种恐惧苏联的气氛。而根据乔姆斯基的看法,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公司所拥有的传媒又创造出新的恐惧,例如全球恐怖主义,这些恐惧妨碍了人们讨论切实的话题,比如公司的不负责任,或美国的缺乏民主。

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比如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猛烈批判大众传媒对于人口大众所造成的效应。(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包含了一群结构松散的理论家,他们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但也都主张,马克思的观点需要从根本上修正。其

中就有一条,他们认为马克思未能充分重视文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影响。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提出,休闲时间也已经被工业化了。他们深入研究了其所称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意思是说,电影、电视、流行音乐、^①广播、报纸和杂志等娱乐工业(Horkheimer and Adorno 2002)。他们认为,文化的生产已经被标准化,受着追逐利润的欲望的主宰,就像其他工业一样。在一个大众社会里,休闲工业被用来在公众当中诱发合适的价值观念:休闲不再是工作的暂停,而是工作的准备。

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认为,文化工业以其粗制滥造的标准化产品普及开来,逐渐破坏了个人进行批判思维、独立思维的能力。艺术趋于消亡,而吞噬它们的正是商业化,比如“莫扎特金曲精选”^②。文化退场,娱乐上位。正如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的评价:“经济力量似乎已经减少了直接的剥削,而转向更加精微的心理剥削。”(转引自Curran and Seaton 2003)

15.2.3 晚近学说

一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

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是与社会思想上的“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在一起的。他接过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一些主题,但另辟蹊径加以发展。他分析了从18世纪初直到今日的传媒演进过程,勾勒了所谓“公共领域”的兴起而后衰退的轨迹(Habermas 1989)。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公共论辩的竞技场,可以在此讨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并达成

① 被阿多诺归为流行音乐(或通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重点分析的爵士乐,而今已然成为众多标榜远离流行音乐的“小资”的重要文化资本。这种转变蕴涵着诸多文化传媒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② 原文为“Mozart's Greatest Hits”,原中译本译为“莫扎特最伟大的成功”。“Greatest Hits”其实满大街都是,所谓“爆棚金曲”、“打榜力作”、“白金精选”,很可能只是各领歌坛风骚三五月的“艺术家”(一概被称为“artist”)和唱片工业合作“鼎力打造”之下的“倾情奉献”。



鲁珀特·默多克的公司新闻集团的业务遍及六大洲,旗下包括《世界新闻》、《太阳报》、20世纪福克斯(部分)、哈泼柯林斯和天空卫视,以及其他众多重要媒体。

一定的意见。

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首先是在伦敦、巴黎及其他欧洲城市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发展起来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有一幅插图描绘了其中一家沙龙)。当时,人们经常在这些地方聚会,讨论时事话题。政治论辩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贝马斯认为,沙龙尽管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参与,但对民主制度的早期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引进了通过公开讨论来解决政治问题的观念。公共领域至少在原则上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大家平等地聚在一个论坛里进行公共辩论。

但是,哈贝马斯总结说,公共领域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提出的一些目标后来并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现代社会中的这种民主辩论已经被文化工业的发展所窒息。大众传媒和大众娱乐的扩张使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变得虚有其表。在议会和传媒中,政治有如走台做秀,商业

利益击败了公共利益。“舆论”(public opinion)也不再是通过公开、理性的讨论而形成,不过是操纵和控制的产物,比如广告中的情形。

有关哈贝马斯的著述,详参第四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二 让·布希亚:超级现实的世界

法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布希亚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传媒理论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受本章早前讨论过的麦克卢汉思想(参阅本章引语)的影响。布希亚认为,现代大众传媒的影响与其他技术的影响迥然不同,并且远为深刻。大众传媒,尤其是像电视这样的电子传媒,它们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根本性质。电视不单单是把世界“再现”(represent)在我们面前,还

越来越界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

以辛普森 (O. J. Simpson) 案为例,这是 1994 年至 1995 年在洛杉矶逐步庭审的一个著名案例。辛普森最初成名是作为美国橄榄球明星,后来因为在几部包括《裸枪》(*Naked Gun*) 系列在内的通俗片中出镜而再战出名。他被指控谋杀了妻子尼科尔。经过了漫长庭审,他被判无罪。

这个案子成了整整 9500 万美国人欲罢不能的电视看点,他们眼看着辛普森驾车,在加州高速公路上狂飙 60 英里^①以逃避拘捕。不仅他的被捕过程在电视上播放,而且美国电视还实况转播了庭审过程,并被包括英国在内的全球观众所看到。在美国,有 6 个电视频道对庭审进行了跟踪报道。超过 90% 的美国电视观众自称看过庭审节目。而在 1995 年 10 月 3 日,更有 1.42 亿人听见了所做出的“无罪”判词。两千多名记者报道了这场审判,另有八十多本书以此为主题。

用媒体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世纪之审。审判不仅是在法庭上进行,它还成了一起联系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和媒体评论员的电视转播事件。它生动体现了布希亚所称的“超级现实”。这个“现实”不再是电视让我们看到的(即法庭上发生的一切),而是由全世界电视屏幕上—连串图像构成的另一种被定义为一起全球性事件的“现实”。

就在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战事爆发前夕,布希亚写了一篇题为“海湾战争不会发生”(“The Gulf War cannot happen”)的报刊

文章。后来战争爆发,一系列的血腥冲突发生,看来布希亚显然是估计错了。但绝非如此。战争结束后,布希亚又写了第二篇文章,题为“海湾战争没有发生”(“The Gulf War did not happen”)。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这场战争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其他战争不同。这是一场发生于传媒时代的战争,是一种电视转播的景观(spectacle)。在这场战争中,老布什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是与全世界的其他观众们一起,通过观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来了解究竟正在“发生”什么的。

布希亚认为,事实上,在这个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年代,已经创造出一种由人们的行为和传媒图像混杂而生的新的现实,即超级现实。这个超级现实的世界是由拟像所建构的。所谓拟像,就是一些只能从其他图像那里获取自身意义的图像,因此在“外在现实”中毫无客观基础。例如,著名的“Silk Cut”香烟系列广告就根本不指涉香烟,只指涉其一长串广告中此前出现过的广告。^②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如果不在电视上频频露面,就没有哪一个能胜选。领导人的电视形象就等于大多数观众所了解的“那个人”。

三 约翰·汤普森:传媒与现代社会

汤普森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哈贝马斯的著述,分析了传媒与工业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Thompson 1990; 1995)。他指出,传媒从早期的印刷形式到现在的电子通信,一直在各项现

① 折合约 97 公里。

② 由于法规不允许做试图说服公众吸烟的广告,这种暗示性的联想对香烟推销十分重要。“Silk Cut”烟的一个广告在画面上只出现一幅紫红色丝绸(silk),中部沿着对角线加上一条卵形的切割线(代表“cut”)。广告本身没有出现任何与其品牌或香烟有关的字样,但附加的“政府敬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字样已经成为广告的注解。在该牌子广为人知之后,公司做广告甚至不必再亮出丝绸与切割线之类图形。1992 年推出的一幅广告只在白底上绘出一只犀牛,犀牛头顶紫色帽子,帽子中部有个洞,露出犀牛角来。帽子未必是丝绸的,洞也只是或许和切割或切口有关。可是广告利用互文指涉调动了人们的知识背景,使之联想到这是该品牌的广告。据说,如果受众经过一番玩味才悟出广告的奥秘,那这种解谜的快感可能增强广告的说服力,因为这会解除他们出于自我防御机制对广告之诱导的抵抗。



我们对于政界人士之所知,绝大部分来自电视或报纸。

代制度的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汤普森认为,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在内,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都忽视了传媒在塑造现代社会的发展甚至是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汤普森虽然对哈贝马斯的一些观点表示理解,但还是对他有所批评,同时,他对法兰克福学派和布希亚的观点也都有所批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立场过于负面。汤普森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并没有消除我们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可能性。事实上,现代传媒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以前不可能获得的信息形式。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相似,也过多地强调了我们将作为传媒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的问题。用汤普森的话来说:

人们在接收媒体信息的过程中以及在此之后,一般都会对其有所议论……[这些信息]在讲述与复述、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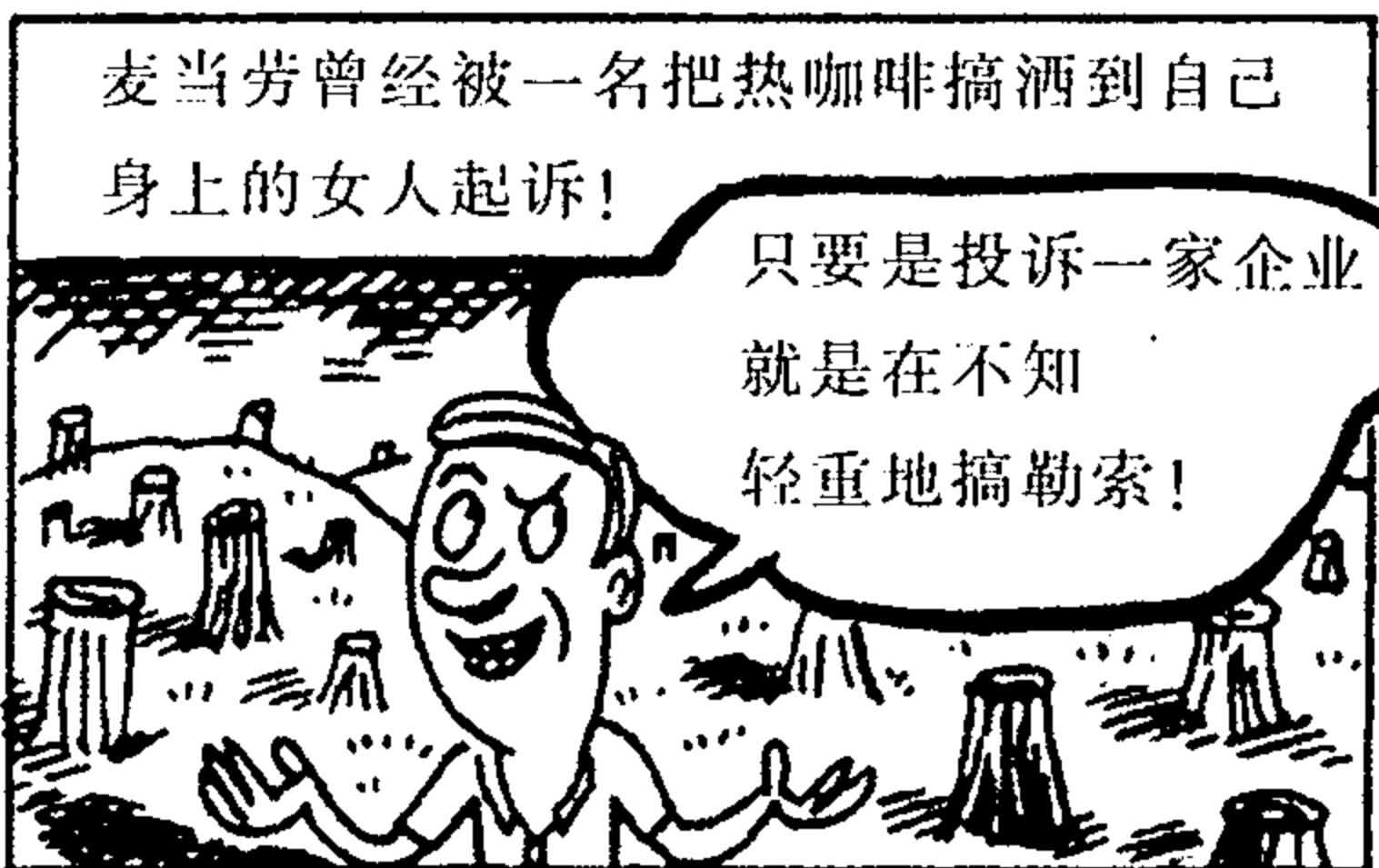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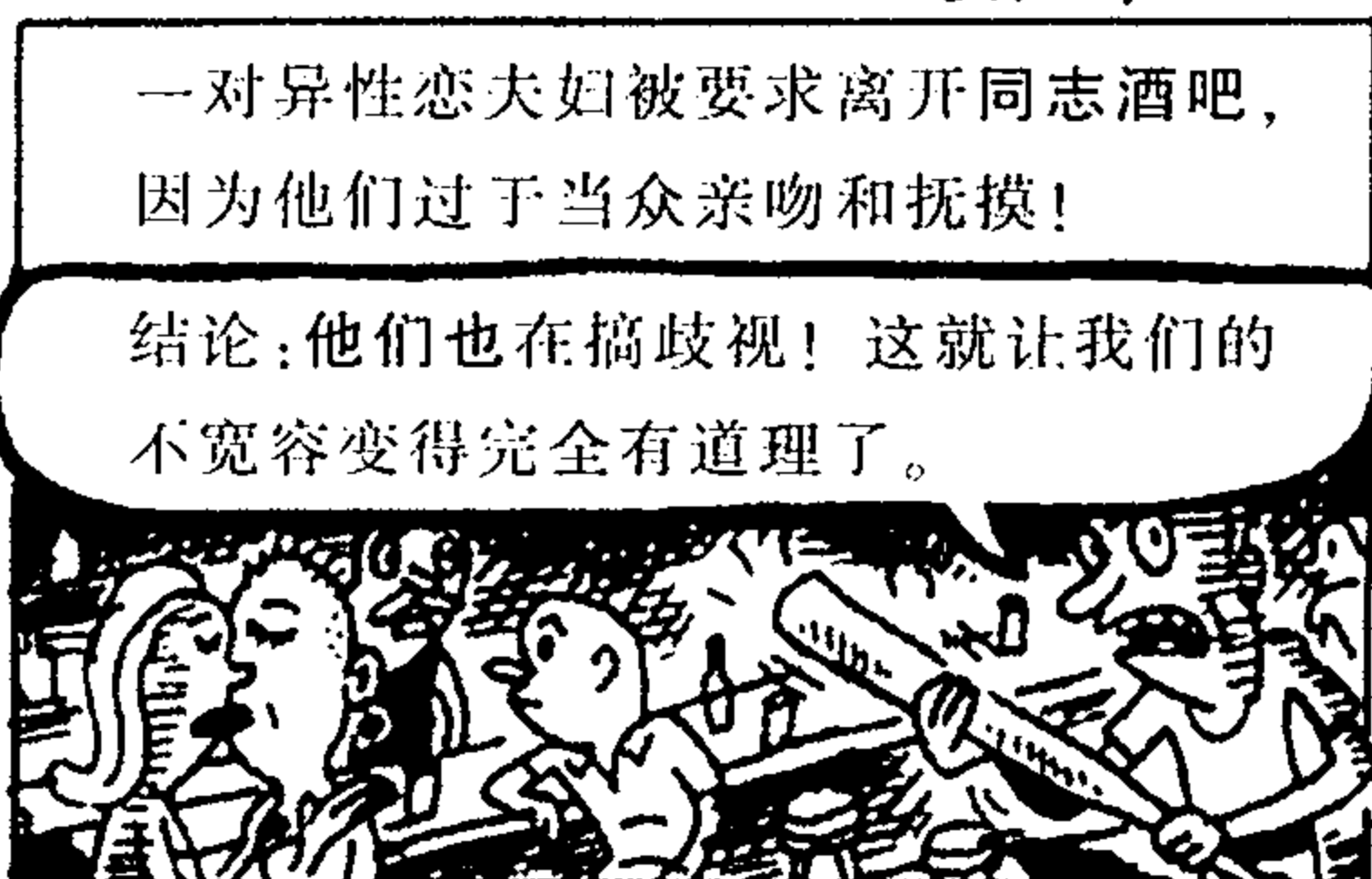
释与重新解释、评论、嘲笑和批评的持续过程中传播。……通过获取信息并习惯性地将它们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断地塑造和重新塑造我们的技能与知识储备,检验我们的情感和品味,拓展我们的经验视野。

(Thompson 1995: 页 42—43)

汤普森的传媒理论乃是基于他对三种互动类型的区分(参见表 15.2)。一种是面对面对式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比如人们在聚会上的谈话。在这种互动中,每个人都要利用大量线索以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参见第五章)。第二种是中介式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即以纸张、电路连接、电子脉冲等传媒技术为中介的互动。中介式互动的特点是能跨越远距时空,因此能大大超越日常的面对面对式互动的范围。中介式互动也是个体之间直接的

风波城

BY LLOYD DANGLE



互动,例如两个人通过电话进行交谈,不过,它不具备面对面的互动那么丰富的线索。

第三种类型的互动是中介式准互动 (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它是指由大众传媒创造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互动也能超越时空,但它并不直接联结个体,所以才会用“准互动”这个词。前面介绍的两种类型是“对话式”的 (dialogical),即个体之间可以进行直接沟通。而中介式准互动是“独白式”的 (monological),比如电视节目就是一种单向

的交流方式。当人们在看电视时,也许会对电视节目进行讨论,甚至对着电视机发表评论。但是,显然,电视机是不会给予任何回应的。

汤普森并不认为第三种互动类型会主导前两种互动类型,否则的话,基本上就是布希亚的观点。相反,这三种互动方式会交融共存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之中。汤普森指出,大众传媒改变了我们生活中公共性与私密性之间的平衡关系,和过去相比,现在更多的领域进入了公共性的范围,并常常引发辩论和争议。

① 此处原文为“bite-sized”,暗指身材尺码。

表 15.2 互动的类型

互动的特征	面对面式互动	中介式互动	中介式准互动
时空构成	共同在场的情境	情境分离	情境分离
	共享同一时空参照系统	扩大的时空可得性 (availability in time and space)	扩大的时空可得性
符号性线索的范围	符号性线索丰富多样	符号性线索有限	符号性线索有限
行动取向	指向特定的他者	指向特定的他者	指向不确定的潜在接收者
对话式/独白式	对话式	对话式	独白式

资料来源:Thompson 1995,页 465

意识形态与传媒

传媒研究与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观念对人们的信仰和行动的影响。这一概念在传媒研究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不过它本身一直颇具争议。这个词最早是由 18 世纪末的一位法国作家德斯蒂·德·特拉西所创造的,他用这个词来意指一门“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

不过,后来的一批学者以更具批判性的方式使用了这一术语。例如,马克思就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权势集团能够控制流布于社会的主导观念,以此使自己的地位正当化。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就经常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宗教教导穷人安于自己的命运。社会分析家应该去揭露这种由意识形态造成的对现实的歪曲,从而使那些弱势群体对自身的生活有一种真实的认识,进而采取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汤普森将德·特拉西的用法称为中立的意识形态概念,而将马克思的用法称为批判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立的概念是指“当把某些现象描述成意识形态或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时候,

并不是指这些现象都必然是误导性的、虚幻的,或是符合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则“传递出一种否定的、批判的或贬抑的意味”,并附着着某种“隐含的批判或谴责”(Thompson 1990: 页 53—54)。

汤普森认为,批判性的意识形态观更胜一筹,因为它把意识形态与权力联系在了一起。意识形态反映的是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的运作,即观念是如何被用来掩盖社会秩序中支配群体的利益,并使其正当化或合法化的。

而下文将要讨论的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Glasgow Media Group)成员们的研究,其实就是在分析电视新闻报道中的意识形态性质,报道是如何有所偏差的。他们发现,新闻往往会牺牲罢工者而有利于政府和资方。汤普森相信,整体观之,大众传媒,不仅包括新闻,还包括各种内容及样式的节目,都大大扩展了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之所及。用汤普森自己的术语来说,它们基于“准互动”而触及广大受众,但受众却无法对其做出直接回应。

第三节 偏差与传媒：格拉斯哥大学研究小组

电视新闻

有关电视的社会学研究在电视的新闻报道问题上着力甚多。由于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已经不再读报，因此电视新闻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现况的主要信息来源。格拉斯哥大学的传媒研究小组做了一些关于电视新闻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极为著名，但也极具争议。在过去30年间，该小组出版了一系列批评新闻报道方式的研究，包括《坏消息》(*Bad News*)、《更多的坏消息》(*More Bad News*)、《真正的坏消息》(*Really Bad News*)、《战争与和平的消息》(*War and Peace News*)等。这些研究虽然考察焦点有所变换，但研究策略基本一致。

《坏消息》(Glasgow Media Group 1976)是其中问世最早也最具影响的一部著作。该书分析了英国1975年1月至6月间可以看到的所有3个地面频道^①的新闻广播。这一研究旨在对新闻的内容及其报道方式进行系统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分析。《坏消息》集中研究新闻报道中如何描述劳资纠纷。以后的几本著作则更多地集中于政治新闻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②的新闻。

《坏消息》得出的结论是，对劳资关系进行的新闻报道具有典型的选择性和倾向性。所使用的诸如“麻烦的”、“过激的”以及“目标不清的罢工”这类措辞，带有反工会的意味。传媒更多的是报道罢工给公众造成的混乱和

不便，而很少去报道罢工的起因。所使用的画面片段常常使抗议者的活动显得缺乏理智并富于攻击性。例如，当出现罢工者阻挡人们进入工厂的镜头时，总是重点捕捉任何可能发生的对峙，尽管这种对峙其实很罕见。

《坏消息》还指出，电视新闻的制作者担任的是类似“看门人”的角色，他们只报道那些干扰进程的事件，换言之，只报道公众有所听闻的东西。例如，只有在劳资双方之间形成了激烈对峙的罢工才可能得到广泛报道，而另一类更深远、更持久的劳资纠纷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媒体忽略。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认为，新闻记者的立场往往反映了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支持了社会中的支配群体的立场，从而必然将罢工者视为危险并且不负责任的人。

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的研究在传媒圈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些新闻制作者指责这些研究者无非是在贯彻他们自己的偏差，即站在罢工者一边说话。他们指出，《坏消息》一书中有“工会与传媒”这一章，却没有“资方与传媒”的章节。批评传媒研究小组的一方提出，这一点原本是应该进行讨论的，因为新闻记者经常被各组织的资方指责为在报道罢工时针对他们，而不是针对罢工者。

学界的批评者也有类似的意见。马丁·哈里森(Harrison 1985)拿到了原始研究所涵盖的那段时期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 ITN)的新闻广播文字稿。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研究中所分析的那五个月并不具备代表性。由于劳资行动久拖不决，损失的日子特别多。新闻要想报道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往往会把焦点放在一些情节更跌宕的事件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① 原文为“terrestrial channel”，专业上译作“陆上信道”，与卫星电视频道相对。

② 这是一个各说各有理的领土争议问题。阿根廷这边的领土要求依据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地理邻近、去殖民化需求等理由，英国则依据最先拓殖、长期事实管理、居民全民公决等理由。我们在此不对是非曲直和战争过程作对错评论。只需要了解，鉴于最后英方取胜，以及能接触到的文献基本都是英语，因此这种“报道”有更大的可能倾向英方，包括本书的“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 阿方称马尔维纳斯群岛)。

哈里森认为,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不应该指责新闻报道过于关注罢工所造成的影响。无论如何,受到罢工普遍影响的人,要比参与罢工的人多得多。有些时候,数百万计的公众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就这么被一小群人的行动扰乱了。最后一点,按照哈里森的分析,传媒研究小组的某些断言纯属虚言。例如,与研究小组所声称的正相反,新闻通常都会提到卷入纠纷的工会组织,而且也会点明罢工是否经过官方批准。

作为对上述批评的回应,研究小组的成员指出,哈里森的研究得到了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部分资助,这一点可能会影响他的学术中立性。哈里森所考察的新闻报道文字稿并不完备,其中的很多资料实际上在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上根本就没有播报过。

近些年来,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的成员进行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研究。《坏消息》系列的最新一本,《来自以色列的坏消息》(*Bad News from Israel*, Philo and Berry 2004),考察了有关以巴冲突的电视新闻报道。研究进行了两年,得到几位资深电视新闻播报员和新闻记者的支持,和一个800人受众样本的成员一起进行小组讨论。作者们观看了有关冲突的电视报道,关注的是报道与观众的理解、信念和态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冲突的电视新闻报道迷惑了观众,大大凸显了以色列政府的立场。研究发现偏向官方的“以方视角”,BBC一套尤其如此。在那个频道上,对于以方的访问或报道是对于巴方的两倍多。此外,支持以方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常常成为主角。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巴方的死伤情况,新闻非常强调以方的死伤情况(尽管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比以色列人多两到三倍)。记者在描述以方和巴方的攻击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有差异。比如

说,记者常常把巴方的举动说成是“恐怖主义”,但在报道一个以色列小组企图对一所巴人学校实施炸弹袭击时,却说他们是“极端分子”或“私刑分子”(vigilante)(Philo and Berry 2004)。

《来自以色列的坏消息》一书还指出,对于冲突的历史或起源,报道的比重很少。绝大部分观众都依赖这种新闻作为自己主要的信息来源。而他们知识上的鸿沟也非常类似于新闻中的“鸿沟”。调查认为,这又一次不利于巴方,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问题是由巴方的行动“挑起”的(Philo and Berry 2004)。

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在早前的一本文集《获取讯息》(*Getting the Message*)中,将他们近期对新闻播报的研究汇编在一起。该书编者约翰·埃尔德里奇指出,由该研究小组最初的著作所引发的争论仍在继续(Glasgow media Group 1993)^①。要说出新闻报道如何才算客观始终都会是很困难的。但为了反对那些认为客观性观念毫无意义的说法(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埃尔德里奇肯定了始终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传媒制品的重要性。新闻报道的精确性是能够研究的,而且也是必须研究的。毕竟,当我们在听关于足球比赛结果的报道时,我们期望它是精确的。埃尔德里奇认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提醒我们,新闻报道始终涉及有关真实性的问题。

不过他也指出,新闻从来就不只是对在某一天或某一周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新闻”是一种复杂的建构,有规律地影响着它所“报道”的东西。例如,当某个政治家出现在一档新闻节目中,并评论某个有争议的事件,比如经济现状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那么在随后的节目中,这个评论本身就成为了“新闻”。

① 书后书目中无此文献。

第四节 受众与传媒效应

意识形态偏差对于受众造成何等效应,有赖于采取何种理论立场来看待受众在大众传媒中的角色。这里,我们将简要分析受众研究,以此转向这一问题。

15.4.1 受众研究

皮下注射模式 (hypodermic model) 是最早出现也最直言不讳的受众反应模式之一。这种模式把传媒讯息比作通过皮下注射器注入体内的药品。该模式基于一种假设:受众(患者)被动并直接地接受了讯息,没有以任何批判性的方式介入它。皮下注射模式还假定,社会全体成员接收和解释讯息的方式,大致都是相似的。麻醉作用的概念 (narcotization) 与法

兰克福学派分不开(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它就借鉴了皮下注射模式。基于这种观点,传媒被视为“麻痹”受众,破坏其对广大世界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Marcuse 1964)。皮下注射模式现在已经不再流行,常常只是大众传媒早期研究者的著述中未经明言的假设。然而,当代有些论家对大众传媒对于现代社会的效应颇感疑虑,他们的著述当中仍然体现出该模式对于传媒的假设。

批评皮下注射模式的人指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不同的受众对于传媒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而是视之为同质性、被动性的。绝大多数的理论家现在都主张,受众反应会历经多个不同阶段。卡茨与拉扎斯菲尔德借鉴了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政治广播的有关研究,认为受众反应是历经二级传播而形成的:当传媒触及受众时,是为第一步;当受众通过他们与有影响的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来解释传媒,是为第二步。



皮下注射模式假定,观众会被动地接收传媒讯息。在有关电视对于儿童的效应的论点中,常常隐含着这样的观念。

这些有影响的人即所谓“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能够进一步塑造受众反应(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后来的一些模式设定受众在对传媒做出反应时,扮演的角色要积极得多。满足模式(gratification model)关注的是,不同的受众通过哪些方式,利用传媒来满足各自的需求(Lull 1990)。受众可以利用传媒来更多地了解他们所居处其中的世界,比如了解天气情况或股市行情。其他受众也可以利用传媒来促进自己的交往关系,自感属于某一个虚构的(fictional)共同体(比如从看肥皂剧中得此感受),或是能够明白看同样节目的朋友同事们在说什么。(我们将在下一个图文框里来讨论肥皂剧)批评这一模式的人则提出,它假设了手中的需求已经存在,而不是被传媒创造出来的。

再往后的一些受众反应理论讨论的则是人们如何积极地解释传媒。斯图尔特·霍尔所阐述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关注的是受众的阶级背景和文化背景如何影响了对于不同的传媒“文本”(text)的领会方式。这里用的“文本”这个词,涵括了形形色色的传媒形式,从书刊报章,到电影唱片。受众群体中的某些成员可能只是简单地接收文本生产者“编码”(encoded)在文本中的那种被推荐的^①(preferred)解读,比如新闻简报的做法。但霍尔指出,这种被推荐的解读很可能是反映了主导的或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与格拉斯哥传媒研究小组的结论一致,参阅本章上文第三节的讨论)。不过,霍尔也提出,对于一份文本的理解也有赖于解释者本人的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受众群体中的另一些成员就可能对文本采取“对立的”解读,因为他们的社会位置使她们与被推荐的解读发生了冲突。比如说,一个

卷入罢工行动的工人或一个少数民族群的成员,面对劳资关系或种族关系方面的新闻报道这样的文本,就很可能采取对立的解读,而不是径直接受文本生产者编码在文本中的主导解读(Hall 1980)。

晚近的一些理论继承了霍尔的思路,关注受众如何通过各自的经历来过滤信息(Halloran 1970)。受众有可能将不同的传媒“文本”(比如节目或样式)联系起来,或用一种传媒与另一种传媒相结合(Fiske 1989^②)。这种思路下的受众享有强有力的角色,与皮下注射模式已是天壤之别。在这种解释模式(interpretative model)看来,受众反应会通过支持或拒绝传媒产品而塑造传媒。

15.4.2 传媒效应

人们所理解的传媒的效应面目复杂。传媒曾经被指责为异化,模仿抄袭的动人情节,在民众中制造冷漠,增强了偏见,使重大话题琐屑化(Watson 2003)。当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传媒产生了负面的效应,取决于认为受众有多么积极或多么消极,就像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那样。以下这部分,我们来看看据说传媒带来了负面效应的两块领域:暴力与色情。

一 传媒与暴力

关于电视节目中暴力的出现频率,已有大量的研究。其中最为深入的研究是由乔治·格布纳和他的合作者们实施的。他们对1967年以来每年美国各大电视网在黄金时间和周末日间播出的电视进行了抽样分析。他们将各种暴力行为及情节出现的数量及频率按电视节目的不同类型分表列出。在这项研究中,暴

^① 原文为“preferred”,这里其实融合了生产者的“推荐”、受众方的“合意”和传媒产品本身的“可取”三重相互构建的意涵。

^② 原文此处误作“1988”。

样式、受众反应与肥皂剧

所谓的“肥皂剧”^①这一样式，是由广播和电视创造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在英国，每周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几乎都是肥皂剧，如《伦敦东区人》(Eastenders)、《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以及其他许多剧目。至少就英国电视上播放的肥皂剧而言，肥皂剧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或亚样式(subgenre)。由英国制作的肥皂剧，如《加冕街》，往往勇于面对现实平凡的人生，常常关注贫民百姓的生活。第二类是一些美国舶来品，其中许多描绘的角色都过着刺激奢华的生活，比如《达拉斯》(Dallas)或《豪门恩怨》(Dynasty)。第三类是从澳大利亚引进的，比如《邻居》(Neighbours)，这类剧集往往属于低成本制作，主要描写中产阶级的家庭及其生活方式。

肥皂剧就像电视机一样是个整体：浑然一体。剧中某些独立的故事可能会结束，各种不同的人物来来去去，但肥皂剧本身没有结尾，除非电视台停止播放。各集之间通过所谓的“悬念”造成一种紧张感。每一集总是在某些关键事件将启未启之时戛然而止，而观众若是欲知后事如何，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

肥皂剧这种样式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要使所有收看者都能够一直看下去。而单凭一个简单的情节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肥皂剧虚构出一种历史，只有忠实的观众了解：他们逐渐熟悉上剧中的每一个人物，熟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生活经历。而创

造出这种历史的线索勾连，首先是个人性的、情感性的。肥皂剧基本上不关注宏大的社会与经济背景框架，因为这只属于外部世界。

肥皂剧目前正风靡全世界，不仅在英美，而且在非洲、亚洲和拉美都非常流行。为什么肥皂剧会如此流行？社会学家们见解各异。一些研究者认为，肥皂剧提供了一种逃避(escape)的方式，对于那些自感生活乏味或压抑的女人们(她们看肥皂剧的人数多于男人)来说尤其如此。不过，考虑到许多肥皂剧中人物的生活也同样存在着各种问题，这种说法就不是特别有说服力。另一种观点似乎更有道理，认为肥皂剧涉及个人生活和情感生活中的一些共性。它们探讨了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的困境，甚至有可能帮助一些观众更积极主动地思考自身的生活。社会学家多蕾西·霍布森在其《肥皂剧》一书中写道，肥皂剧之所以风行不衰，并不是因为它们有逃避主义的意味，而是“因为受众非常熟悉剧中人物及其生活。肥皂剧必须透过它的这些人物角色与其受众的体验相联系，而它的剧情也必须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Hobson 2002)。

问题：

- 1 你看肥皂剧吗？从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说明看或不看的原因。
- 2 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如何说明肥皂剧之广为流行？

① 肥皂剧英文为“soap opera”，20世纪30年代宝洁公司开始在剧集中插入肥皂广告而得名。日后众多日化公司大力投放洗涤、家居、化妆用品的广告在此时段，正是针对日间场(尤其下午场)家庭妇女这一庞大的肥皂剧受众群的消费需求。许多肥皂剧连演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历经多年发展，肥皂剧已从日间场发展到夜间场，从清一色白人主角发展到多元文化，从和谐至上、皆大欢喜发展到类似《越狱》这样一点也不“肥皂”的多“季”剧集。

力被定义为对自我或他人使用或威胁使用强力,并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电视剧具有比较高的暴力倾向:这类节目中平均有 80% 包含有暴力,平均每小时出现 7.5 个暴力情节。在儿童类电视节目中虽然凶杀的场面相对少些,但暴力出现的频率却更高。动画片中的暴力行为及情节是所有电视节目类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Gerbner 1979, 1980; Gunter 1985)。

如果说暴力镜头确实影响了受众,那又是怎么影响的呢? F. S. 安德森搜集了 1956 年至 1976 年 20 年间 67 项有关电视暴力对儿童攻击倾向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其中有大约四分之三的研究声称发现了某种关联;而有 20% 的研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另有 3% 的研究,调查者的结论是观看电视暴力镜头其实会减少儿童的攻击性 (Anderson 1977; Libert et al. 1982)。

不过,细察安德森所调查的这些研究,在所使用的方法,据说揭示的关联的强度,以及对于“攻击性行为”的定义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在凸显暴力的犯罪片(和许多儿童动画片)中,根本的主题是正义和报应。犯罪片中歹徒被绳之以法的比例远远超出现实生活中警察办案的结果。而在动画片中,那些有危害或有威胁的角色往往也会“罪有应得”。频繁出现的暴力场面并不一定会造成观众们的直接效仿趋势,他们倒有可能更多地受到其中蕴含的道德主题的影响。总的来说,关于电视对受众的影响的研究往往将观众无论男女老少,都一视同仁,对所看到的东西的反应都只是消极被动,照单全收。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尚未发现在电视暴力与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之间有什么关联,但这个话题仍然聚讼不已。在美国,根据 1996 年《电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的一项修正案的强制规定,1999 年以后生产的几乎所有电视机^①都装有一个内置“童锁”(V-chip,其中“V”代表“暴力”[violence])。这种电子装置使父母能够从自己孩子在电视上看到的节目当中,过滤掉暴力和直接描绘性 (sexually explicit) 的内容。电视行业被要求建立一种分级体系,类似于电影方面所使用的分级体系,以配合童锁的使用 (Signorielli 2003)。然而,已经有研究发现,尽管家长们表示非常关注自己孩子在电视上看到了什么,但却很少有父母费心启用自家电视机里的童锁 (Annenberg Center 2003)。流传着这么一则笑话:父母们要没有自己年幼的儿女演示给他们看,就没有能力搞清楚怎么开启童锁。

二 色情作品

有关色情作品效应的争论,与有关媒体的暴力效应的讨论有颇多相似之处。对于直接描绘性的图像的法律规定由来已久。在美国的法律当中,19 世纪晚期通过了著名的康斯托克法^②,禁止性暴露的材料,而其定义是将会令少女感觉受到冒犯的材料 (Grossberg et al. 1998)。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色情作品与针对女性的性暴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争论,特别是在女性主义者当中。有人提

①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修正案规定,从 2000 年 1 月 1 日开始,美国所有 13 英寸以上的电视机中都被要求安装一种节目过滤芯片。

② 也可意译为“妨害善良风俗法”或“风化法”。康斯托克 (Anthony Comstock, 1844—1915) 是美国极有影响的道德改良运动领袖。毕生领导运动,反对他认为的文学及其他文艺形式中的诲淫内容。“Comstockery”成为道德主义的书刊检查制度的代名词。1873 年促使国会通过康斯托克法,禁止诲淫书报及其他资料通过邮政传播。当然,这位邮政部特派员还干了一些更为人称道的事情,比如查禁银行和邮政系统的诈骗案件,取缔兜售假药活动。

出,色情作品将女性物化,色情作品的使用者相比于非使用者,更有可能对女性实施性暴力。女性主义作家罗宾·摩根精辟地概括了这种观点:“色情为理论,强奸乃实践。”(Morgan 1994)

有关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观点,详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二小节。

社会学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试图评估,在色情作品的使用与性侵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提交给全美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一份报告发现,在成年人当中,如果所观看的那些材料虽然含有色情或直接描绘性的内容,但并不展示对于女性的暴力或贬损,那么不会产生任何反社会的效应。但与此同时,假如长期接触色情化的暴力,则确实会让使用者对于强奸的严重性变得麻木,对所描绘的受害者的情感反应会淡化许多(Huston et al. 1992)。随着互联网的扩张,色情材料和暴力材料也越来越唾手可得,有关受众反应和传媒效应的追问也就愈益重要。

第五节 传媒控制

15.5.1 政治控制

一 公共播放与 BBC

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直接介入电视播放的管理。在英国,最早制作电视节目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便是一个公立组织,其资金来源于向拥有电视机的每一户家庭收取注册费,这一点我们前文已经看到。多年以来,BBC

是唯一一家有权在英国播放广播或电视节目的机构。但是现在,除 BBC 的两个地面电视频道 BBC 一套和 BBC 二套之外,还有三个地面传送的商业性电视频道(第三频道^①、第四频道和第五频道)。只有 BBC 靠注册费维持资金来源。商业频道则依靠广告收入。而广告的播放频率及时间也有法律控制,每小时不能超过 6 分钟。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各卫视频道,这类频道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已经拥有很多订户。(有关 BBC 的发展前景,下面的图文框将有讨论)

在美国,为首的三大电视机构,即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全都是商业性的广电网。根据法律规定,各广电网所拥有的注册电视台数目不能超过 5 个,而这正是三大广电网在一线大城市的实际势力。这“三巨头”通过自己的电视台,共覆盖了全美四分之一以上的家庭。此外,每个公司还分别拥有约 200 个附属电视台,占全美约 700 个电视台的 90%。这些广电网的收入依赖于出售广告时间。全美广播电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是一个非官方团体,它制定有关广告播放时间应占整体播放时间的比例:“黄金时段”为每小时 9.5 分钟,其他时段为每小时 16 分钟。各电视公司根据定期收集的统计数据[即收视率(ratings)],了解有多少人在观看特定的节目,以此决定特定时段的广告收费。当然,收视率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某类电视节目是否继续播出。

多频道电视机、影碟机和录像机出现之后,更加上天空加强型卫星接收器(Sky)这样的服务开始运作(一个数字视频录像机[Digital Video Recorder, DVR]和卫星接收器终端,观众可以搜索并录制自己感兴趣的节

^① 亦称“独立频道”(ITV)。

BBC的前景

与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广电机构类似，BBC的地位正在受到冲击，并且引来诸多争议。BBC的前景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观众的分流。数字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会有数百个商业性有线频道和卫视频道供人选择，威胁到BBC的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商业性电视之前，BBC一直垄断了英国电视观众。但到了2003年，BBC对于即使是地面电视的观众的占有率也下滑到大约36%。随着BBC观众人数的下降，更多的人开始质疑，他们为什么还得付注册费，尤其是他们现在根本就不看BBC的电视，不听BBC的广播。

在20世纪90年代，BBC和国民保健服务之类的其他一些公营垄断机构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要提高运营效率，加强市场导向。从1992年到1999年担任总监的约翰·伯特爵士引入了一套内部市场机制，让节目制作人有权从BBC外部自由筹组资源，比如摄制组。他还拓展了BBC的商业活动，并大力削减节目制作成本，而且常常是借助裁撤工作岗位的手段(Born 2004)。

批评公营垄断机构的人士指出，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大力建议将BBC私有化，比如说，在最近由保守党委托的一份报告中，第五频道前任执行总监大卫·艾尔斯坦主张，BBC应当成为想要使用的用户的订购服务，从而应当废除注册费(Elstein et al. 2004)。但到目前为止，全面私有化的想法已经遭到了抵制。

许多人认为，对BBC来说，保持其公有制

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些评论者也已经指出，在运营环境的放权和财政压力的加剧双重作用下，BBC已经变成了一个只保存其最初一些公共服务要素的商业体系。而力挺BBC的人士则认为，随着电视部门已经放权，BBC的角色会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因为它能维持节目的高水准，而且BBC的服务可以覆盖到人口中遭受社会排斥的群体，比如现在75岁以上的人群可以免收注册费。正如BBC一位前任政策与规划部主任所言：

确实存在着诸多担心：频道越多将意味着质量越糟，竞争将分流观众，投资将更趋分散，风格趋于通俗小报的思路，国民分成欢迎新服务的一拨儿和付不起或不想付的一拨儿。而对于公共政策的挑战就在于：鱼和熊掌都要兼得，既要驱动增长，又要维持质量。(Currie and Siner 1999)

尽管2004年的休顿调查(Hutton Inquiry)带来了负面影响(参见下一个图文框)，致使BBC的几位高层引咎辞职，但政府还是力保BBC的前景，至少短期看来是这样。作为政府的传媒行业管制机构，传监会^①的一份报告强调，BBC的重要性乃在于其提供的节目具有“高质量、原创性、创新性、挑战性、吸引力和普及性”，并建议注册费的收取至少延续到2016年(Ofcom 2003)。

① 以前，英国政府机构中有贸工部管理电信政策、颁发电信执照，电信管理局负责电信监管，文化媒体体育部负责传播政策，独立电视委员会、广播标准委员会以及广播局、无线电管理局则负责具体执行中的一些事务。2002年英国议会通过《传播监管委员会法》(Office of Communication Act 2002)，从法律上确定成立传监会(简称Ofcom)，2003年新版《传播法》(Communication Act 2003)明确传监会将逐步整合上述各(转下页)

伊拉克文件之争

2002年9月,为了动员支持战争,首相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文件,汇编了对于伊拉克的种种指控。其中有一点是声称伊拉克有能力在45分钟内实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简称“大杀器”[WMD])。

然而,在随后的战争进程中,伊拉克军队并没有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有任何此类武器被发现。文件的真实性遭到了质疑。文件中的一条指控,也是小布什在其2003年国情咨文中谈到的一点,被情报来源认为不可信。此后,2003年6月,BBC的一位记者指责布莱尔的首席公关顾问阿里斯泰尔·坎贝尔违背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愿望,将文件“搞刺激了”(sexed up)(尤其是插入了“45分钟”的说法)。

国会特别调查澄清了对于坎贝尔先生的

这一指控(他已于2003年8月辞职)。但BBC拒绝让步,与政府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一名政府科学家(大卫·凯利博士)被揭露是BBC这种说法的主要来源后,选择了自杀,使事态顿成悲剧。他的自杀在2004年1月被曝光,其后的有关调查洗清了政府把文件“搞刺激了”这一说,并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证明这名科学家的雇主即国防部并无不当。各路批评于是纷纷转向BBC,促使其总监和董事长引咎辞职。

另一项由巴特勒勋爵主持的针对情报失误的相关调查,在2004年7月明确了政府并无任何蓄意误导议会的企图。不过调查也指出,布莱尔先生倒是有准备把看来相当薄弱的证据夸大成支持开战的理据。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2005年4月5日

目,这实际上等于创建了一个个人化频道),公共电视台的势力开始减弱。今天的电视观众,只要付出订购费或一次性付清数字机顶盒,就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频道和节目。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自主编排“节目单”,构建自己的收视节目表,而不再听命于广电网预先的节目安排。

几乎在所有地方,数字电视、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都正在改变着电视的性质。随着这些方式开始侵入到传统地面电视频道的地盘,政府再要想像以前那样控制电视的内容,就不那么容易了。比如说,西方传媒的势力似乎就在引发1989年东欧剧变的情势中发挥了作用。

(接上页)单位有关职能,并将BBC也纳入管理。下设“内容委员会”(Content Board)、“消费者委员会”(Consumer Panel)、“规范委员会”(Regulatory Assessment Committee)等。《传播法》界定传监会功能为“增进与传播事务有关的公民福祉,透过促进市场竞争增进消费者福祉”。具体包括:确保传输设备普及全英国、确保高质量广播电视服务普及、维持传播内容多元、确保受众不受不当内容侵害、确保受众免于不公平或隐私被侵害等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法》中同时提出“公民”与“消费者”两种服务对象的概念,管制是为了鼓励竞争,而鼓励竞争是为了促进“公民—消费者”利益。在传监会的宗旨下,公民—消费者利益与产业利益并不互斥,但产业利益并不具有优先性。英国近年来逐渐形成公共媒体与商业媒体双元发展模式。天空卫视后来居上。但即使财团的经济渗透力量锐不可挡,立法精神仍是将民众普遍共同利益置于特定产业利益之上。由于言论自由系民主社会的崇高价值,更要妥善管理各种传播言论的广电媒体而不引发争议,传监会的设立简化了管理机制,公开管制原则(网上公开会议记录),使管制过程透明。

有关全球化传媒的效应,详参本章第六节。^①

二 反垄断措施

正如《坏消息》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参看本章第三节),那些构造新闻的人就是为顺利实施各项议程而充当“看门人”。得以成功播出或出版的新闻报道并不总是基于某种简单的标准或新闻价值来选择的。新闻记者始终意识到,他们的故事必须切合自己工作的组织的议程,而这些新闻组织也可能有各自的政治议程。但他们做的生意并不只是售卖货品,而是影响舆论。有鉴于此,传媒企业家和大型传媒公司的兴起及其势力令很多人感到不安。这些企业的产权所有者,比如默多克(参看本章第六节第五小节的图文框),毫不讳言他们的政治立场,这势必引起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党派及团体的关注。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各国都制定了一些规则,试图控制传媒所有权。但是,这种控制应当如何掌握松紧宽严?而考虑到传媒企业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各国政府又有多大把握控制住它们?

传媒管制的问题远比乍看上去的复杂。为了公众的利益,传媒机构应该多样化,惟有如此才可能保证很多不同的团体及政治观点都有发言的机会。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如果限制谁可以拥有什么,可以使用何种形式的传媒技术,就有可能影响传媒部门的经济繁荣。因为传媒产业是现代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之一,所以一个国家如果对传媒的管制过多,很快就会落伍于时代。

一方面,批评传媒集中化的人认为,那些大传媒公司的权力过大。另一方面,传媒界则

反驳道,如果服从管制,他们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商业决策,因而会在国际竞争中输掉。而且,他们会问:由谁来执行这些管制?谁来管制这些管制者?

传媒管制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大致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如果由二三家大传媒公司主宰市场,不仅威胁了正当的经济竞争,同时也威胁到民主制度——因为传媒的所有者不是选举产生的。在这一点上,现有的反垄断法案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欧洲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彼此之间在这类法案上差别很大。

竞争意味着——或者说应该意味着——多元主义,而多元主义又被认为是有利于民主的。但是,仅仅多元主义就够了吗?许多人在争论中以美国为例,指出其众多的电视频道并不能保证节目内容的质量和精确性(上文讨论的乔姆斯基的批评意见即可证明)。有人认为,维持一个强大的公共广电部门,对于制约大传媒公司的主宰地位至关重要。然而,公共广电系统(在英国是以BBC为首)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公共广电系统形成了垄断,而且很多国家把它变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在这里,谁来管制管制者的问题变得特别突出。

而另一个问题则使传媒管制问题愈发复杂,这就是技术变迁的速度过快。技术上的创新使传媒不断转型,曾经是各自独立的技术形式现在被整合在一起。比如说,如果通过互联网观看电视节目的话,应该采用哪一种传媒管制形式?在欧盟各成员国中,传媒与电信结合的问题已是讨论的焦点。一些人注意到,虽然立法将能够协调欧洲的电信、广电以及信息技术,但协调立法谈何容易。欧盟在传媒管制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微弱。目前的“电视无国界”^②(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的政策性

① 原文误作“详参第二十章”(但页码正确)。

② 必须注明的是,这个所谓的无国界,其实是在巩固另一种边界。20世纪80年代,随着媒体技术的飞跃发展和美国视听文化的全球扩张,当时的欧共体认识到,要想维护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加强欧洲在世(转下页)

文件原本应在 2002 年修订,但由于争议悬而未决,故此延宕至今。

15.5.2 全球传媒与民主

爱德华·赫尔曼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有关全球传媒的著作中(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探讨了国际传媒对于民主国家的运作所产生的效应。一方面,全球传媒来源的扩散能够成功地对威权主义政府施加压力,放松它们对于国家控制的各级广电机构的主宰。随着将传媒产品限制在国界之内变得越来越困难,许多“封闭”的社会正逐渐认识到,传媒可以成为一种支持民主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在印度这样的一种多党制政治体制下,我们也看到了电视的商业化是如何促进了对立的政治人物更能大声宣告自己的观点。全球传媒使得个体主义、尊重人权和促进少数群体权利之类的观点广为传播。

不过,赫尔曼和麦克切斯尼也强调了全球传媒秩序所蕴含的危险,强调了它对于民主的功能健康运转所造成的威胁。随着全球传媒越来越集中化,越来越商业化,它们以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方式,侵入了意义重大的“公共领域”的功能运作(参见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他们指出,商业化的传媒倚重广告收入的力量,不得不偏好可以保证高收视率和销售额的节目内容。其结果,娱乐必然会战胜争议与论辩。传媒的这种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削弱了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潜在地破坏了人们对于公共问题的理解。根据赫尔曼和麦克切斯尼的看法,全球传媒无非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型传教士”:非商业性的传媒空间正逐步受到渴望用它们谋求“最佳经济

用益”的人的接管(Herman 1998)。在他们眼里,由传媒机构所倡导的“娱乐文化”正在逐步侵蚀公共领域,并破坏了民主的运行。

第六节 全球时代的传媒

就像我们在这本书中不断看到的,互联网是当前种种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主要标志之一。然而,全球化也正在改变其他传媒形式的国际覆盖面与影响力。在这一节中,我们将考察全球化环境下影响大众传媒的一些变化。

尽管传媒一直就具有国际性的维度,例如新闻报道的采集以及电影的海外发行等,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绝大多数的传媒公司还是按照国家政府的规定,在特定的国内市场内运作。传媒行业也分化为不同的部门,而且绝大多数部门,比如电影、纸质传媒、广播以及电视,都是各自独立运作。

然而,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传媒行业内部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一个流动的全球性市场已经取代了国内市场,同时,各种新技术使以前彼此独立的传媒形式融合在一起。到 21 世纪初,全球传媒市场被大约 20 个跨国企业所支配。几乎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些跨国企业在新闻和娱乐的生产、发行以及市场营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赫尔德及其同事们在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Held et al. 1999),指出了有助于形成全球化传媒秩序的五种主要转变:

- 1 产权的日益集中 全球传媒现在被一小群强大有力的企业所支配。小规模、独立的

(接上页)界媒体市场的竞争力,发展泛欧视听空间势在必行。1984年,欧共体委员会发表《电视无国界》绿皮书,明确主张开发欧洲影视业、创造单一的欧洲内部节目市场。《电视无国界指令》于1991年10月正式施行,规定欧共体各成员国应确保其广播电视节目全部播送时间的一半以上用来播放欧洲本土制作的节目,同时应有10%以上的节目时间或预算属于欧洲独立制片人制作的节目。上述所指节目中不包括新闻、体育、广告和电视购物等内容。

传媒公司已经逐渐被兼并到高度集中化的传媒集团当中。

- 2 从公共产权到私人产权的转变 几乎所有国家的传媒和电信公司都曾部分地或全部地为国家所有。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里工商环境的自由化与管制的渐趋宽松,导致了传媒公司的私有化(以及商业化)。
- 3 跨国企业结构 传媒公司不再严格限于国家边界而展开运作。同样,对于传媒产权的管控也已放松,允许跨国投资和购并。
- 4 传媒产品经营的多样化 传媒行业已经变得多样化,远不像以前那样条块分割。巨型传媒集团,比如(下面将要简介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制作并发行多种传媒产品,包括音乐、新闻、纸质传媒以及电视节目等。
- 5 日益增加的传媒公司合并 分处传媒行业不同部门的公司之间相互合并,已成一股独特趋势。随着传媒形式日益整合,电信公司,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传媒“内容”生产商,都日益参与到企业合并中来。

传媒的全球化迫使原本“横向分割”的各种传播形式汇聚中心。如果说传统的传媒形式能够确保传播以“纵向传递”的方式,发生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部,那么全球化则正在引导传播的横向整合。人们不仅可以身处最基层就相互联系,而且由于更加协调的新型调控架构、产权政策以及跨国市场营销战略,传媒产品得以广泛传播。现在,传播和传媒可以更容易地跨越单个国家的疆域而扩展(Srebrenny-Mohammadi et al. 1997)。

然而,与全球性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新的信息秩序的发展也不平衡,也体现出发达社会与欠发达社会之间的分隔。在本文这一部分,我们首先来探讨传媒全球化的一些维度,然后来谈谈一些评论者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新的全球传媒秩序更适合被形容为“传媒帝国主义”。

15.6.1 音乐

赫尔德及其同事们在对传媒与传播全球化的考察中指出,“相比于其他形式,音乐更有效地走向了全球化”(Held et al. 1999: 页 351)。这是因为,音乐有能力超越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限制,触及并吸引庞大的受众。由一小部分跨国公司所支配的全球唱片业的立业之本,就是它有能力针对成千上万名乐人的音乐能力,面向世界各地的受众,进行开发、制作、推广与发行。从随身听到音乐电视(例如 MTV)再到光盘^①,技术的发展为音乐的全球发行提供了更新颖、更精致的手段。近几十年来,由于音乐制品的全球营销和发行,已经形成了多个公司之间的“机构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

唱片制品的全球行业是集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五大公司,环球[Universal, 1998年它兼并了宝丽金(Polygram)],时代华纳(Time Warner, 本章第六节第三小节将予讨论)、索尼(Sony)、百代(EMI)以及贝塔斯曼(Bertelsmann),控制了国际音乐销售总额的80%到90%(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2000年1月,百代宣布与时代华纳合并,在此之前,五大公司中唯有百代一家不隶属于某个更大型的传媒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

^① 原文为“compact disc”,在进入我国大陆地区流行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区别:以“CD”指音乐光盘,而“光盘”多指非音乐光盘,比如电影、各类工具软件或游戏软件,甚至暧昧地特指MP。另外,技术手段的演进和融合使得今日在谈音乐的接受对象时,有了更多的理由必须用“受众”而不是“听众”。如同电影中的“大片”对于声效的强调,“视听”密不可分。关于MTV,详见下文。

音乐工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销售表现尤其强劲。这促使许多一线公司与更多的当地乐人签约,以期推进市场增长。然而,我们将在下文看到,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唱片业已经受到挑战,因为互联网使人们有可能比以往更便捷、更广泛地以非法手段免费共享音乐。

二战以后全球唱片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大多源于美国和英国的流行音乐的成功,还有认同流行音乐的青年文化以及亚文化的发展(Held et al. 1999)。①因此,音乐的全球化是在各国受众中推广美英的风格及音乐样式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流行音乐的出口方面,美国和英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其他国家的国内音乐生产规模则要低得多。有些批评者提出,这两个国家唱片业的支配地位潜在地破坏了地方性的音乐风格与传统。尽管如此,我们还很有必要记住,全球化是一种双向过程。“世界音乐”日益流行,例如拉丁风的音乐就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证明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扩散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与唱片业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从闲暇活动,到商业活动。对于“传统的”传媒公司,例如唱片业,互联网除了带来巨大的机会,也形成严重的威胁。

尽管唱片业越来越集中在几个跨国集团的手中,但是一些观察家认为,它还是“文化工业”中最脆弱的部分。这是因为,互联网使音乐可以以数码方式共享和下载,而不是到当地影音行购买。目前的全球唱片业主要包括一

个复杂的网络,由工厂、发行链、影音行及营销人员组成。如果互联网能够使音乐直接市场化,直接下载,那么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再需要了。果真如此,唱片业还会剩下什么?

唱片业目前正在奋力应对数字化所造成的影响。从2000年到2004年,全球音乐销售总额从400亿美元(约合220亿英镑)下降到300亿美元(约合170亿英镑)。这个部门出现了大幅过剩,不得不重组结构。唱片业的许多人宣称,MP3之类的音乐文件的非法交流,是造成这种收入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唱片公会(British Phonographic Industry, BPI)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有800万人自称现在有下载音乐的行为,而其中92%是通过非法网址(BBC, 2004年10月7日)。尽管人们试图严格控制复制合法购买的音乐制品,但是技术的迅速变迁却正在削弱这个行业打击盗版的能力。

2000年,有一桩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即纳普斯特(Napster)案。纳普斯特是一个软件程序,可以使人们能够在互联网上交换文件,包括其他共享者电脑上被复制为文件的那些音乐。唱片行业对纳普斯特背后的小公司②提出了几桩诉讼,并最终迫使其停止提供文件共享软件。然而,自从告赢纳普斯特以来,唱片业针对支持互联网文件共享的其他一些公司所采取的法律行动却是命运各异。2003年,一名美国法官裁定,格洛克斯特(Grokster)和莫菲斯(Morpheus)这两个文件交流网络,对于通过其系统交换的文件的法律地位并不承担责任。不过,法律上的交锋仍在持续。③

唱片业除了攻击那些创造出文件共享软

① 反流行音乐的摇滚音乐中,某些后来流行起来的抗议音乐或地下音乐也是流行音乐。

② 这可能是小公司,但纳普斯特的注册用户最高峰时达到8000万。

③ 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裁决其不负法律责任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其需负法律责任——“即使此类技术意在繁荣唱片业”。因此目前P2P服务器基本不敢放在美国。但是,什么是繁荣唱片业?本归贝塔斯曼所属的格洛克斯特和莫菲斯为何被裁定为非法?这对iPod之类产品的普及会有什么影响?英特尔或苹果这样的公司与唱片业是什么关系?

件的公司,也在追踪非法共享音乐文件的个人电脑用户。2004年,英国唱片公会发布一项声明,宣称将对那些通过互联网交换歌曲文件的个人乐迷提出起诉。全美唱片业协会(Record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 RIAA)随后也有类似的行动跟进,截止到2004年底,已有超过5700名下载者遭到起诉。2003年,全美唱片业协会对美国密歇根州的一名大学生采取了行动,他掌管运行的网络提供的文件超过65万个,相当于43000多张唱片(BBC,2004年10月7日)。

除了攻击非法文件共享,唱片业还开始提供合法的下载服务,以适应互联网所带来的挑战。这种下载活动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向唱片公司和乐人支付了歌曲的版税。随着便携式MP3播放器^①的出现,尤其是苹果公司的iPod^②的问世,随着越来越多的网上公司提供可以合法购买和下载的歌曲,互联网深受激励,增长巨大。截止到2004年底,经过合法购买的歌曲下载已经超过1.25亿次,而官方的“音乐下载榜”(music download chart)也已经设立。唱片业最初拒绝了互联网,但到了2000年代的中叶,许多业内人士已经认识到,它能否通过合法下载来售卖音乐,从而成功适应互联网,是决定整个行业未来的关键(BBC,2004年6月28日)。

15.6.2 电影

评价电影的全球化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考虑电影的产地以及资金的来源。

根据这种标准,毫无疑问,在电影业中存在着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的研究,许多国家都具有生产电影的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大约25个国家年生产电影达到50部或者更多,而少数国家或地区,像美国、日本、韩国、香港以及印度,电影的年产量超过150部,领先于其他国家(Held et al. 1999)。

评价电影全球化的另一条途径是考察一个国家的电影出口水平。当20世纪20年代出现第一部故事片的时候,好莱坞生产的电影占全世界上映的电影总数的五分之四。今天,美国依然是电影业中的龙头老大。(排在美国之后的电影出口大国依次是印度、法国以及意大利)许多国家政府提供资助来扶持本国的电影业,但是作为故事片的出口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竞争得过美国。表15.3显示,历史上国际(美国之外)票房最叫座大片全是美国电影。比如,在2003年,美国电影主宰了英国的票房市场,占了收入总额的62%。与此相反,纯粹的英国片仅占收入的2.5%(UK film Council, 2003)。

好莱坞各大制片厂所获得的收入中,来自海外电影发行的部分大大超过了50%。为了进一步扩大海外观众的规模,这些制片厂在世界各地参与建设多厅影院(multiplex cinemas)。随着观众数的增加,全球票房收入到2010年预计将上升到256亿美元(140亿英镑),比1995年的总数将近翻了一番。而录像机以及更晚近的影碟机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也使越

① 在翻译这一章时,中译者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不仅是因为出现许多未收入辞典的“新词”,而且因为这些新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英语的形式普遍流通,译成中文反而像是“外语”(包括上面一些软件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传媒和互联网的效果。至于MP3,恐怕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是指一种机器而不是格式。

② iPod是苹果公司推出的一种大容量MP3播放器,以40GB容量计,可存放多达1万首CD质量的MP3音乐,还有完善的管理程序和创新的操作方式,还可作为高速移动硬盘使用,以及阅读或收听电子书。外观独具创意,乃至成为与手机、Zippo等类似的时尚标志。微软方面与此竞争的产品是Zune,增加了FM功能。

来越多的人现在能够经常观看到好莱坞电影。

15.6.3 传媒“超级企业”

2000年1月,世界上最具影响的传媒公司中的两家合并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集团。在一份价值3370亿美元的合作中,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与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 AOL)宣布,它们意欲缔造“面向互联网世纪的全世界第一家充分整合的传媒与传播公司”。这项合并使时代华纳所拥有的巨量传媒“内容”,

包括报刊杂志、制片厂和电视台,与美国在线强大的互联网发布能力相结合。在合并的时候,整个公司在15个国家的订户已经超过2500万户。

这种合并缔造了全世界第四大公司,也因此大大刺激了金融市场。但是令人感兴趣的不只是它的规模,更引人关注的是,它是“旧媒体”与“新媒体”的第一次重大结盟。时代华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亨利·鲁斯创办了《时代》周刊(*Time*),这是一份周刊,对各种日报所包含的庞杂信息进行简明概括或深入解释。《时代》一炮走红,之后,1930年创办的商业杂志《财富》

表 15.3 历史上国际(美国之外)票房最叫座大片,截止到2004年4月^①

排名	美国电影	发行年份	出品国家	收入总额(亿美元)
1	《泰坦尼克号》(<i>Titanic</i>)	1997	美国	12.35
2	《魔戒三·王者归来》(<i>Lord of the Rings: The Return of the King</i>)	2003	美国	6.96
3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i>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i>)	2001	美国	6.51
4	《哈利·波特与密室》(<i>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i>)	2002	美国	6.04
5	《魔戒二·双塔奇兵》(<i>Lord of the Rings: The Two Towers</i>)	2002	美国	5.81
6	《侏罗纪公园》(<i>Jurassic Park</i>)	1993	美国	5.63
7	《魔戒一·魔戒现身》(<i>Lord of the Rings: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i>)	2001	美国	5.47
8	《海底总动员》(<i>Finding Nemo</i>)	2003	美国	5.13
9	《独立日》(<i>Independence Day</i>)	1996	美国	5.05
10	《星战前传1·魅影危机》(<i>Star Wars: Episode I: The Phantom Menace</i>)	1999	美国	4.91
非美国电影				
44	《千与千寻》(<i>Sen to Chihiro no Kamikakushi</i>)	2001	日本	2.54
69	《光猪六壮士》(<i>The Full Monty</i>)	1997	英国	2.11
86	《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i>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i>)	1994	英国	1.91
96	《BJ单身日记》(<i>Bridget Jones' Diary</i>)	2001	英国	1.83

资料来源:“网络影视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http://www.imdb.com/Top/>);UNDP 2004,页97

^① 由于电影译名难以统一,特别是大陆地区与港台地区往往不一致,所以附出原文。另外,给出一份截止到2009年2月的全球票房榜前十位榜单,一则它包括了美国的票房,二则可以感受一下最近几年更能凸显大成本特效制作优势的奇幻片、动画片或灾难片的流行对于大片票房规模的刺激程度。它们分别是(1)《泰坦尼克号》18.35亿(美元,下同);(2)《魔戒三·王者归来》11.29亿;(3)《加勒比海盗二》(*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Dead Man's Chest*,2006年发行,美国)10.26亿;(4)《蝙蝠侠前传二·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2008年发行,美国)9.97亿;(5)《哈利·波特与魔法石》9.69亿;(6)《加勒比海盗三·世界尽头》(*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At World's End*,2007年发行,美国),9.58亿;(7)《哈利·波特与凤凰令》(*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2007年发行,美国),9.37亿;(8)《星战前传1:魅影危机》9.22亿;(9)《魔戒二·双塔奇兵》9.187亿;(10)《侏罗纪公园》9.20亿。资料来源:www.mdbchina.com。

(*Fortune*) 以及 1936 年创办的图片杂志《生活》(*Life*) 也相继获得成功。历经整个 20 世纪,时代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传媒企业集团,拥有电视台与广播电台,唱片业,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这一大型影视动画帝国,以及全世界第一家 24 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CNN)。在合并的时候,时代华纳的年营业额是 260 亿美元,它出版的杂志每月的读者量达到 1.2 亿,并且拥有一个有 5700 部电影的档案馆的版权,以及一些非常流行的电视联播节目。

如果说时代华纳的历史紧密扣合了 20 世纪^①传播的发展大势,那么,美国在线的兴起就是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典型体现。美国在线创立于 1982 年,最初提供按小时收费的拨号上网服务。到 1994 年,它已经拥有 100 万缴费用户;1996 年,实行了缴纳标准月租费即可无限制上网的包月政策后,用户猛增到 450 万人。到 1997 年,有 800 万人在使用美国在线。随着用户数量的持续增加,该公司开始进行一系列合并、收购和结盟,以巩固它作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龙头老大的地位。康普服务(CompuServe)以及网景(Netscape)公司都被美国在线所收购。1995 年,又与德国公司贝塔斯曼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从而诞生了欧洲的美国在线。此外,与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②的联合使美国在线开始进入电子商务领域。

两大公司之间的合并创造出了一个拥有 3 千 5 百亿市值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AOL-Time Warner),^③将 2 千 4 百万美国在线用户,1 亿 2 千万杂志读者,以及 CNN、HBO^④和时代华纳等电视频道,统统归

于一个企业旗下。然而,合并至此却遭受了重大困难。特别是美国在线再也没有能力实现其雄心勃勃的订户目标或收入目标,而融合电影与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重组也未能迅速落实。随着投资者们调整了对于企业业绩的期望值,这个传媒巨人也深感祸到临头,有可能被迫散伙。2002 年,公司宣布亏损将近 1 千亿美元。这种规模的亏损导致了该公司 2003 年从公司名称中去掉了美国在线的字号。

美国在线的颓势现在据信已趋于稳定,公司正忙着宣称在有线电视和电影之类更为传统的传媒领域赢得成功。然而,公司在 2002 年之后的短期成就当中,有大部分来自电影《魔戒》三部曲的大热。可是目前在时代华纳的影片生产线上没有任何有票房保证的流行大片,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行业竞争又日趋激烈,有些分析家不免疑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是否前景堪忧。

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的意义将不会有定论,但是分歧已经产生。有些人认为,这个协议会释放出激动人心的技术创新的潜力;而另一些人则担心,传媒会被大公司所支配。热心支持者把合并看成是打造传媒“超级企业”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人们需要的时候,把人们所需的所有新闻节目、电视节目、电影以及音乐直接送到家里。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传媒超级企业的观念值得推崇。热心支持者满怀欣喜的美梦寄望,批评反对者却只感到噩梦一场。随着传媒企业变得越来越集中化、集权化和全球化,人们有理由担心,传媒作为自由言谈、自由表达、自由论辩之论坛的重要角色

① 第四版、第五版皆作“21 世纪”,疑为吉登斯笔误,否则下文的“新媒体”之新无从谈起。

② 即“Sun Microsystems”,这是其在大陆地区的名称,在台湾地区的中文译名为“升阳电脑公司”。

③ 这次合并,美国在线占 55%,冠名在前,鲁氏的画像也被搬进了美国在线的总裁办公室,一时被奉为“新传媒战胜旧媒体”的划时代开端。随后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网络经济泡沫了。

④ 24 小时循环播映的家庭影院频道。

会被削弱。如果一个公司不仅控制内容,包括电视节目、音乐、电影以及新闻来源,同时还控制发行渠道,那么它就会大权在握。它可以推销自己的人才(它包装出来的歌手与明星),可以进行自我审查(删掉那些从负面来描绘公司资源或者说企业拥趸的新闻报道),而且可以让自己帝国内部的产品“相互认证”,而牺牲帝国外部产品的利益。

如果认为互联网被掌握在少数几个传媒集团手中,这种观点就与仅仅数年前互联网的热心支持者所持有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互联网是一个自由的、不受拘限的电子世界。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人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个体主义的领域,用户可以自由漫游,寻找并共享信息,进行联系,并且在企业势力领域之外互动。然而,逐渐浮出水面的巨型传媒企业与广告商已经对此构成了威胁。批评者们担心,企业对于互联网的权力的上升将会淹没一切,只留下“企业讯息”,导致互联网成为一个只对订户开放的有限领域^①。

评价这些互相对立的意见很难,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两种观点都有些道理。传媒合并以及技术进步确实拓宽了传播与娱乐的组织 and 放送方式。正像早期的电影与音乐传媒先驱受到电视网和唱片业兴起的影响一样,互联网时代也将会促进大众传媒更多的重大变迁:稍待时日,受众便可以对消费的内容以及时间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但是,对于企业支配传媒的担心并没有错。已经有报

道说,传媒集团回避报道对其伙伴公司不利的新闻。希望保持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的主张,乃是基于一些重要的信念:必须有一个不受拘限的公共空间,可供分享和争论各种理念。

有必要记住,在社会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试图完全控制信息来源以及传播渠道是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有致力于阻止垄断的反托拉斯立法,或是因为努力寻求可替代的信息传播途径的传媒用户始终在做出创造性的反应。传媒消费者并不是可以被企业利益轻易操纵的“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s)。随着传媒形式与内容的范围和容量的扩大,个体在解释和评价他们所接触到的讯息和材料时,只会变得愈益熟练,而不是日趋笨拙。

15.6.4 传媒帝国主义?

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传媒的制作和扩散中享有至高地位。这使得很多观察家开始谈论所谓传媒帝国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一个文化帝国已经确立。欠发达国家据说特别容易受到侵害,因为它们缺乏资源来维护自身文化的独立性。

全世界前20家最大的传媒集团的总部都设在工业化国家,而其中的大多数又都在美国。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美国广播公司^②以及维亚康母^③等传媒帝国的总部都在美国。除了下面的图文框将予简

① 这里的领域不是前文出现过的“area”、“realm”之类,而是“domain”,除了具有地理的划分区域、权力的势力范围、思想的活动领域这样的意思之外,在互联网的点击时代,它有了一个新的意思——“域名”。

② 迪斯尼公司于1996年花19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广播公司(ABC),但后者在美国三大广电网中一直遥遥落后于冠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因此迪斯尼又陆续在出售ABC的一些资产,比如广播业务。

③ 英文是“viacom”,就是通过(via)传播(communication)的意思。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通过大型的收购与兼并,从一家小小的汽车影院公司发展到如今规模正在超越迪斯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的传媒帝国。《财富》杂志2003年评选维亚康母为全球最有价值、最受欢迎以及管理最好的传媒公司。组合资产优良,现金流充足,收入来源多元。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旗下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9年用370亿美元收购)、派拉蒙电影、派拉蒙主题公园、MTV(全球音乐电视网,在69个国家有24小时频道,并创造了(转下页))

述的默多克帝国外,其他大的传媒公司还包括拥有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的日本索尼集团^①;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拥有 RCA 录音公司^②和一批总部在美国的大出版公司^③;以及由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拥有的电视集团所控股的蒙达多里(Mondadori)出版社(贝鲁斯科尼本人也位列世界富豪榜前四十位,参见第十一章引语)。④

通过电子传媒,西方的文化产品当然就可以在全球广泛扩散。我们已经看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美国电影,也可以听到西方流行音乐。1999年,迪斯尼宣布在香港修建一个迪斯尼主题公园的计划。该公园预计将耗费35亿美元,于2006年初开始运营。^⑤它将基本上复制美国的魅力,而不是反映当地的风情。正像迪斯尼主题公园的主席所指出的,这可能只是个开始:“如果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却只有一个迪斯尼主题公园的话,相比于美国只有2.8亿人口却拥有5个主题公园,就不太相称了。”^⑥(转引自 Gittings

1999)

然而,引起广泛争议的还不仅是比较通俗化的娱乐业。还有人指出,西方各大通讯社^⑦控制着世界的新闻,这意味着信息的传递会以“第一世界的观点”为主导。因此有学者指出,只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灾难、危机或军事冲突的时候,新闻播报才会予以关注。它们保留有关工业化世界的其他类别新闻的日常资料,但却不保留发展中世界的类似资料。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扩散已经在某些地区招来了怨恨,也加剧了世界上许多地方高涨的反美情绪。

15.6.5 对于全球传媒的抵抗与替代

全球传媒力量强大,影响广泛,这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如此,所有国家内部都存在一些力量,有助于减缓传媒的大举入侵,让传媒产品的性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的传统、文化以及优先考虑。宗教、传统以

(接上页)《幸存者》、《真实世界》等真人秀节目)、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户外广告和大型的广播网。中国观众所熟悉的MTV(在中国已成为音乐电视的代名词),实际有七个频道,在中国许多地方落地的只是流行音乐频道。2006年与试图成为国内最大正版MTV搜索的百度达成协议,为中国互联网用户提供视频娱乐音乐内容,尝试新的视频节目网络销售形式。对应的是,谷歌以16.5亿美元收购视频网站Youtube。

- ① 略去哥伦比亚集团自身早期的并购活动不谈,1968年日本索尼入股CBS集团的唱片业,改组成CBS/Sony唱片公司(其港台译名其实先前在大陆也很流行——新力音像)。1988年在盛田昭夫主导下,日本索尼陆续并购CBS的电影与音乐部门,使CBS/Sony为Sony完全控股,并更名为“Sony Music”,中文正式全名为“索尼哥伦比亚音乐娱乐”。2004年11月,又与贝塔斯曼集团旗下的音乐部门(BMG Music)以各持股50%方式合并成为索尼BMG音乐娱乐股份有限公司(SONY BMG Music Entertainment)。
- ② 原隶属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 ③ 其中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就 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
- ④ 部分由于意大利政治体制的某种特殊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贝鲁斯科尼曾经先后当过三任意大利总理。因此原书第四版和原中译本称“前总理”,第五版则称“总理”,此中译本又得改称“前总理”。中国读者恐怕最熟悉他的AC米兰老板身份,但这位传媒大王旗下却是行业繁多(原中译本误将蒙达多里当成电视公司),在富豪榜上最高曾到过第14位,当然也曾在总理任上受到法律审判。
- ⑤ 香港迪斯尼公园已于2005年9月12日开园。
- ⑥ 事实上,上海浦东要兴建比香港迪斯尼主题公园大3倍的中国第二个也是内地第一个迪斯尼主题公园,而上文提到的派拉蒙主题公园也已进军中国,将在天津滨海新区兴建比上海迪斯尼建成后更大的主题公园,后续更可能在武汉或广州考虑选址。
- ⑦ 原中译本译为“大型代理机构”。当然,不仅是西方,就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通讯社,在报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闻时,也是作为“代理机构”(agencies)来进行报道的。

及公众的认识都是传媒全球化所面临的严重阻碍。同时,地方管制以及国内传媒机构也会对限制全球传媒资源在本国的影响发挥一定的作用。

阿里·穆罕默德调查了伊斯兰国家对传媒全球化势力的反应(Mohammadi 1998)。跨越国界的国际电子帝国的发展被看作是威胁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利益。根据穆罕默德的看法,对于外部传媒侵犯的反抗形式多种多样,从对西方卫星传播的温和批评到明令禁止。各国对于传媒全球化的反应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它们对西方殖民主义遗产以及现代性入侵的总体反应。穆罕默德在分析伊斯兰国家对传媒全球化的反应的时候,把这些国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现代型、传统型以及混合型。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伊斯兰世界的绝大部分电视节目都是由国内的机构或者通过阿拉伯卫星通讯署(Arabsat)制作和放送的,该组织是由21个国家组成的泛阿拉伯地区卫星放送网络。广电放送的自由化以及全球卫星电视的力量已经改变了伊斯兰世界的荧屏形态。1991年,海湾战争使中东成为全球传媒业的关注中心,而且也对该地区内电视节目的播放与收看产生了深刻影响。到1993年,卫星电视迅速推广,巴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迪拜^①、突尼斯以及约旦都开设了卫星频道。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卫星频道,并能接收全球传媒节目。

半岛电视台(Aljazeera)是中东规模最大也是最具争议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一天24小时提供新闻报道。半岛新闻网创办于

1996年,总部设在卡塔尔,在阿拉伯各共同体中,在世界各地阿拉伯语民族中,是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广电网。有些批评者认为,半岛电视台过于追求轰动效应,展现了太多暴力和情感冲动下的战地长镜头,对原教旨主义者和极端主义团体的报道过多。它的政论节目收视率最高,不过也有文化、体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节目,有助于增加频道的受众份额。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西方电视所播放的主题与内容已经造成了张力。与性别和人权有关的节目尤其引起争议。例如,因为对于人权问题的报道表示关注,沙特阿拉伯不再支持BBC阿语频道。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马来西亚这三个伊斯兰国家已经禁止了收看西方电视的卫星接入。伊朗反对西方传媒的态度最为坚决,视之为一种“文化污染源”,是在倡导西方消费价值观。

然而,做出这种过激反应的国家毕竟还是少数。穆罕默德的结论是,尽管通过抵制或提供其他选择,伊斯兰国家已经对传媒全球化做出了反应,但是大多数国家发现,为了保护自身的文化认同,有必要接受对于这些文化的某些改变。在他看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所偏爱的那种“传统思路”正逐步让位于以调适和现代化为基础的反应(Mohammadi 1998)。

小 结

就个人而言,我们无法控制技术的变迁。这种变迁的速度之快,甚至有可能淹没我们的生活。人们常常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概念倒是

^①“Dubai”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成员国,面积、人口均占第二位。与其他酋长国不同的是长期鼓励发展贸易。迪拜城已经成为全球目前建设最为兴旺、生活最为兴旺奢华的城市之一,以其梦幻七星酒店闻名。

传媒企业家：鲁珀特·默多克

鲁珀特·默多克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企业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帝国之一。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旗下，拥有分布在六大洲的九种不同传媒行业。2001年，新闻集团的年营业额为165亿英镑，雇员达3万4千人(BBC, 2001年7月16日)。2004年10月，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ABC News)^①报告年营业额为290亿英镑。

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英美市场之前，默多克就已经在澳大利亚建立了他的新闻集团。默多克最初于1969年收购了英国的《世界新闻》(News of the World)和《太阳报》(The Sun)，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收购了《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这几项收购为日后一系列收购中的迅猛扩张铺平了道路。仅在美国，新闻集团旗下目前就包括超过130种报纸。默多克改变了其中许多报纸的新闻报道风格，转而追求轰动效应，主打性、犯罪和体育三大主题。比如《太阳报》就获得了巨大成功，是全世界所有英语日报中发行量最高的，在2004年中期，大约是每天340万份。

1980年代，默多克开始进军电视领域，创建了天空卫视(Sky TV)，这是一个卫星加有线的电视联营机构。天空卫视最初虽经一些反复，最终还是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默多克还拥有总部设在香港的星空卫视(Star TV)网络的64%股份。其宣扬的战略是通过卫星传送“控制天空”。目前的传送范围覆盖了从日本到土耳其的广大区域，进入了印度和中国的巨大市场。它传输5个频道，其中一个转播的就是BBC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 News)。

1985年，默多克收购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Twentieth Century Fox)的一半股份。这是一

家拥有两千多部电影版权的电影公司。1987年，他的福克斯广播公司(Fox Broadcasting Company)开播，成为美国继ABC、CBS和NBC之后的第四大电视网。默多克现在拥有22家美国电视台，覆盖了美国电视家庭用户的40%。他控制着25家杂志社，其中包括深受欢迎的《电视指南》(TV Guide)，并在1987年获得了总部设在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社(Harper and Row)，现更名为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最近一些年，默多克更多地投资在能够获得丰厚利润的数字卫星电视领域，特别是通过他对天空卫视的所有权以及篮球和英超联赛等体育赛事的直播报道。在默多克看来，体育报道是新闻集团“撞开”新的媒体市场的“连发重槌”(battering ram)(Herman and McChesney 1997)。因为体育赛事最好是观看现场直播，适合“按次付费”的模式，这既使默多克大有钱赚，也便于广告商有的放矢。对于重大赛事的播放权争夺往往使得新闻公司与其他媒体帝国之间关系紧张，因为全球瞩目的赛事势必使其他类型的事件黯然失色。



^① 原文如此，疑为吉登斯笔误，应为它旗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目前已是全美最大新闻频道。

政府可能给默多克造成麻烦。这是因为,它们至少可以在本国之内通过立法,限制传媒领域的跨行业扩张,即同一家公司拥有好几家报纸和电视台。欧盟也已经表示了对于一些巨型传媒企业的关切。但是,默多克的权力在全球扩张,要想限制谈何容易。他的权势已经足以影响政府。不过,电信产业的特点就是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默多克的权力基础既是庞然大物,却又难以捉摸。

在1994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默多克回击了那些认为其传媒帝国威胁到民主和论辩自由的人。他指出,“因为资本家们总是在背后相互攻击……所以自由市场不会导致垄断。从根本上说,垄断只有在得到政府支持时才可能存在。”默多克接着说:“我们新闻集团的人是开明的。”他发现,在印度,哪里能接收到星空卫视转播,哪里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投资于卫星接收天线,非法出

售星空卫视节目。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默多克的观点是:热烈欢迎!他总结说,新闻集团期待着“与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Murdoch 1994)。

有一段时期,默多克是世界上最大的传媒组织的领袖。不过在1995年,迪斯尼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宣布合并,取代了他的龙头地位。当时的迪斯尼公司总裁迈克尔·埃斯纳明确表示,他要在迅速膨胀的亚洲市场与默多克一争高低。而默多克对这次合并的反应是:“它们现在是我公司的两倍大。”但他接着补充道:“这是一个更大的赶超目标。”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为默多克树立了另外一个目标,但他看起来显然不会因此而退缩。迪斯尼、时代华纳和维亚康母的公司总裁们都认为,默多克是他们最为敬佩和畏惧的传媒业者。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们细致入微的研究(Herman and McChesney 1995)。



半岛电视台已经成为中东收视率最高的频道之一。

蕴涵着一张秩序井然的路线图,但新技术的影响却往往令人感到混乱无序,具有破坏性。

但是,迄今为止,联网世界的到来并没有产生任何像一些怀疑论者所预测的那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负面场景。互联网并没有造成“老大哥”的出现^①。相反,它促进了非集权化和个体主义。在千年之交的时候,尽管大肆渲染全球计算机基础设施存在所谓的“千年

虫”,有可能全盘崩溃,但这一时刻最终还是比较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最后,书籍及其他“前电子”传媒看来也不大可能会消失。就像这本书,它虽然是个大部头,不过却可能比电子版更方便。就连比尔·盖茨也发现,如果要描述他所期望的高科技新世界,也必须写一本书。^②

本章要点

- 1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大众传媒是以广大受众为目标的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录像、光盘及其他多种形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传媒不仅提供娱乐,而且还提供并塑造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事所依据的大部分信息。
- 2 在早期的大众传媒当中,报纸是最重要的,至今依然很重要。但是其它一些新传媒,尤其是电视和互联网,填补了报纸的许多地盘。
- 3 在过去的40年中,电视是传媒领域仅次于互联网的最重要的发展。在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直接参与电视播放的管理。卫星和光缆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电视的性质。公共电视广播逐渐失去观众份额,取而代之的是多频道的选择。政府对于电视节目内容的控制趋于减弱。
- 4 近些年来,新传播技术的进步极大改变了电信传播,即通过某种技术媒介,向远方传送文本、声音或者图像。数字化、光纤以及卫星系统共同促生了多媒体以及互动媒体,前者指的是把不同传媒形式都整合在单一媒介中,而后者是指个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视听。目前手机处于电信领域的创新前沿。
- 5 互联网使相互联系和互动可以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万维网用户日趋增加,而且能够在网上完成的活动也越来越多。互联网正在提供激动人心的崭新可能。不过也有一些人担心,这会助长社会孤立和匿名化,可能削弱人际关系及社群。
- 6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传媒产业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可以注意到几种趋势:传媒产权日益集中于少数大型传媒集团;传媒的私人产权正在侵蚀公共产权;传媒公司开始跨国经营;传媒公司的活动已经开始多样化;并且传媒并购已经变得更加频繁。音乐、电视、电影、新闻等全球传媒产业被少数跨国企业所支配。
- 7 今天,人们之所以更觉得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传媒通信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信息秩序,是指一种信息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体系。许多人都认为,在世界信息秩序中,工业化国家地位至高,所以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臣服于新出现的传媒帝国主义。许多批评家担心,如果传媒力量都集中在少数几家传媒公司或巨

^① “Big Brother”:请比照阅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② Bill Gates 等,《The Road Ahead》, Viking 1995。

头手中,将会威胁到民主制度的运转。

8 已经提出了许多有关传媒的理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认为,传媒更多的是通过其传播的方式而不是传播的内容来影响社会的。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就是“媒介即讯息”。比如电视之所以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就在于电视与报纸或书籍等其它传媒有着相当不同的性质。

9 其他重要的理论家还包括哈贝马斯、布希亚和汤普森。哈贝马斯指出,传媒的作用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公共领域”,即一个发表公共舆论和进行公共论辩的领域。布希亚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认为新的传媒,特别是电视,确实改变了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而汤普森则认为,大众传媒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互动,即“中介式准互动”。它是指一种比日常社会互动更有限也更狭窄的单向互动方式。

思考建议

1. 政府应该通过限制卫星和有线电视来保护民族文化吗?
2. 互联网是否破坏了威权主义的政府? 在这一点上它与旧的传媒有所不同吗?
3. 如果你的信息来源只有肥皂剧,你看待自己国家的观点会受到怎样的扭曲或窄化?
4. 唱片业的产权集中是否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机会?
5. 传播的全球化是增进了我们对于文化差异的了解还是消灭了这些差异?

阅读指南

Chris Barker, *Televis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电视、全球化与文化认同》

Timothy E. Cook,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通过新闻来治理:作为政治机构的新闻传媒》

David Croteau and William Hoynes, *Media Society*, 3rd edn (London: Sage, 2003). 《传媒社会》

David Deacon, Michael Pickering,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Researching Communica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Methods in Media and Cultural Analysis* (London: Arnold, 1999). 《研究传播:传媒与文化分析方法实用指南》

Lawrence Grossberg, Ellen Wartella and D. Charles Whitney, *Mediamaking: 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① (London: Sage, 1999). 《做媒体:通俗文化时代的大众传媒》

Denis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n (London: Sage). 《大众传播理论》

James Slevin, *The Internet and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互联网与社会》

John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1995). 《传媒与现代性:关于传媒的社会理论》

James Watson, *Media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ocess*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3). 《媒介传播:理论与过程概论》

网 络 导 航

[英国]信息政策研究基金会 (Foundation for Information Policy Research [UK])

<http://www.fipr.org>

现代主义杂志项目 (The Modernist Journals Project)

<http://www.modjourn.brown.edu>

新闻观察 (News Watch)

<http://www.newswatch.org>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信息与传播技术主页 (OECD ICT Homepage)

http://www.oecd.org/topic/0,2686,en_2649_37409_1_1_1_1_37409,00.html

理论 (Theory.org)

<http://www.theory.org.uk>

第一节 组织 525

16.1.1 作为科层机构的组织 526

16.1.2 组织的物理环境 532

16.1.3 跨越世界的组织 536

16.1.4 经济组织 539

第二节 超越科层制? 546

16.2.1 组织变迁:日本模式 547

16.2.2 管理的转型 548

16.2.3 网络研究 551

第三节 组织和网络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554

16.3.1 社会资本:联结的纽带 554

16.3.2 独自打保龄球:社会资本衰减的例证? 555

小 结 557

本章要点 558

思考建议 5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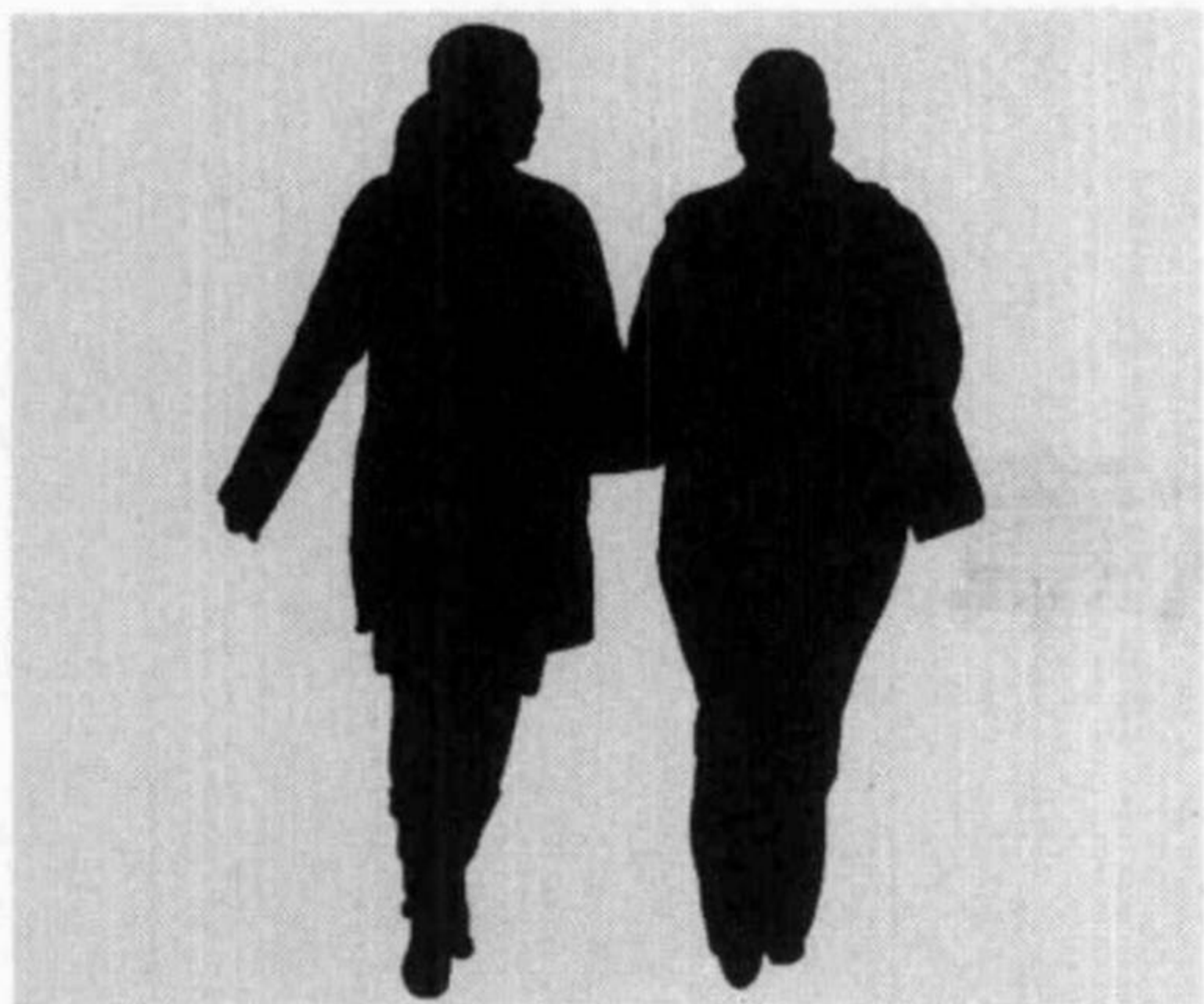
阅读指南 559

网络导航 560



第十六章

组织与网络



你 在麦当劳吃过吗？你有很多机会的。下一次你去那儿，研究一下餐厅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你会注意到，相比于其他餐馆，它最明显的差别之一就在于整个过程是多么富有效率，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你可以饥肠辘辘地进去，转眼之间就撑得饱饱的出来。你只需径直走向柜台，取走你的食物，而不需要坐在餐桌边，等待应生过来招呼你点菜。如果你选择堂吃，桌上根本不铺桌布，餐具也精简到不能再少。除了托盘，你吃东西时所需要的其他所有东西，包括食物送到你手中时的包装，都是可以丢弃的。吃完以后，你就把包装袋丢到垃圾箱里。事实上，麦当劳里的食物和服务都很容易量化计算。麦当劳的目标就是“物超所值”（more bang for the buck），让你买“超值套餐”（value meals）、“巨无霸”（Big Macs）或“大（份）薯条”（large fries）。而服务也是可以测量的快捷。麦当劳的创始人雷伊·克罗克的目标就是要在五十秒钟之内让顾客吃到一个汉堡和一份奶昔。

如果你去柜台后面看看，很可能看到员工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个人炸薯条，另一个人翻肉饼，第三个人把肉饼夹到小圆面包里，再加上沙拉。你还有可能注意到，这个过程是相当自动化的：奶昔是按一下按钮就做出来

的，炸薯条有固定的温度，食物做好后计时器会告诉员工们。就连出纳机上每一样食物都有特别的按钮，这样员工都不用知道价钱是多少。

如果你在国内和在国外都去过麦当劳餐厅，就会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非常小。内部的装修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说的语言各国也会不同，但是餐厅的布局、菜单、订餐程序、员工制服、餐桌、食品包装以及所谓“微笑服务”却基本一致。光顾麦当劳的经验就是要设计得无论你在伦敦还是在利马^①，都是千篇一律的，可以预见的。在全世界 119 个国家的三万多家麦当劳餐厅，无论这些门店坐落何处，顾客都



^① 利马是南美秘鲁的首都。在本书前一版的相关行文（不同位置）中，这个对比举的是巴格达和北京。当然，现在在巴格达很难想像会有这种体验了。

知道可以期待得到迅捷的服务,能够吃饱和口味一致的食物 (McDonald's 2004)。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 (Ritzer 1983, 1993, 1998) 提出,麦当劳生动地体现了工业化社会中所发生的转型。他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根据瑞泽尔的观点,麦当劳化是指“快餐店的原则正在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中主宰越来越多领域的过程”。瑞泽尔使用了麦当劳餐厅基本的四项原则,即富有效率 (efficiency)、可以计算 (calculability)、统一不变 (uniformity) 以及自动控制 (control through automation), 来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化”。(瑞泽尔的观点深受韦伯的影响,有关后者的理性化理论,详参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讨论) 瑞泽尔敏锐地指出,他之所以挑选麦当劳来分析,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愿望,只是因为麦当劳是这一进程最明显的例证。他还指出,除此之外,相比于“汉堡王化”(Burger Kingization) 和“星巴克化”(Starbuckization),“麦当劳化”更为简明易记。

瑞泽尔和在他之前的经典社会学家韦伯一样,也担心理性化的不良效应。他提出,麦当劳化孕育了一系列非理性,他称为“理性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这些非理性包括对于我们的健康的损害 (“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盐分、高糖分”的膳食),对于环境的损害——想想单单一餐要扔掉的所有包装。瑞泽尔指出,最严重的是,麦当劳化正在“去人性化”。我们排队前行依次取汉堡,犹如身在传送带上,而柜台另一边的员工也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同样的专门化动作,就像装配线上的机器人。

有关组织的研究和理论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它也是经典社会学家韦伯(瑞泽尔借鉴了他的观念)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社会学家有关组织的说法,并看看在以松散网络为特征的世界里,这

些理论,比如韦伯的理论,是否还依然成立。

第一节 组织

人们常常集合在一起,以进行某些他们单靠自己不容易实现的活动。而实现这类合作行动的首要方式就是组织,这个群体具有可识别的成员资格,投入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以实现某种共同目标 (Aldrich and Marsden 1988)。组织可以是彼此面对面熟识的一小群人,但更可能是更大的、非人身性的群体,从大学、宗教团体到工商企业(比如本章开头所讨论的麦当劳),都属于组织。这类组织是所有社会所共有的关键特性,对于它们的研究也是今日之社会学的核心关注。

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组织往往是相当正式的。所谓正式组织,就是用理性的方式设计以期实现其目标,常常是借助明确的规则、规章和程序。本章稍后将要讨论的现代科层组织,就是正式组织的首要范例。韦伯在 20 世纪 20 年代首先认识到(参看 Weber 1979),在欧洲和北美,有一种趋向正式组织的长期趋势愈益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正式性常常是法律地位的必然要求。比如说,一所学院或大学要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就必须满足主导一切的明确的书面标准,从评分政策、教员表现到防火规章。今天,正式组织在全世界都是主导性的组织形式。

在传统世界中,绝大多数的社会体制都是风俗习惯长期发展而成的。而组织则大部分是人为设计的,是基于所设想的目标创立起来的,落脚在特别建造以有助于实现那些目标的建筑物或物理环境内。医院、学院或工商企业所在的高楼大厦绝大多数都是按业主要求定制的。

目前,组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从前的实际状况重要得多。它们不仅把我们接生到这个世界上,还给我们在这个世

界中的每一步进展加上标志,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甚至在我们出生前,我们的母亲,或许还有我们的父亲,也要参加在医院和其他医疗组织里进行的培训课程、孕期体检等等。今天,由政府组织登记每一个出生的孩子,并收集从出生到死亡的资料。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死在医院里,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死在家中,而且,每一个人的死亡也都要由政府进行正式登记。

组织为什么在今天对于我们如何重要,原因不难看出。在前现代世界里,家人、亲友和邻居能够满足绝大部分需求,从食物、孩童教育到劳动与休闲活动。而在现代时期,人口的大多数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远远强于从前。我们的许多要求都是由我们从未谋面的人所满足的,事实上,他们有可能与我们相隔天涯。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各类活动与资源进行大量的协调,而这正是组织所提供的。

但是,并不能把组织已经开始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都看成是有益的。组织经常具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就是使我们失去对某些事情的控制,转由我们基本无法左右的官员和专家控制。比如,我们都被要求去做政府告诉我们的某些事情,如依法纳税、遵纪守法、当兵打仗,要不就得接受惩罚。因此,组织作为社会权力的根源,能够使个体接受自己也许无力抵抗的命令。

16.1.1 作为科层机构的组织

马克斯·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了系统解释。他认为,所谓组织,就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手段。韦伯强调,组织的发展依赖于对信息的控制,并且他强调书写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个组织为了其功能的顺利运转,需要书面的规章制度以及储存其“记忆”的档案。韦伯认为组织具有鲜明



科层制——侏儒挥舞下的巨人之力？

的等级性,权力倾向于集中在顶层。韦伯说的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很重要。因为韦伯发现,现代组织和民主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冲撞,他认为这对社会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根据韦伯的看法,所有大规模的组织都往往具有科层制的性质。“科层制”这个词是某位德·古尔内先生在1745年首先使用的。他把既指办公室又指写字桌的“bureau”和“cracy”加在一起,后者源于一个希腊语动词“统治”(to rule)。因而,科层制指的就是职员的统治。这个术语最初只是用来指政府职员,但是后来它逐渐延伸,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大型组织。

从一开始,这个概念的使用就带有贬义。德·古尔内把职员手中日益发展的权力称为“一种叫做‘科层癖’(bureaumania)的病”。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把科层制看作是“侏儒挥舞着巨人之力”。捷克作家弗朗兹·卡夫

卡^①在其 1925 年初版的小说《审判》中,刻画了一幅恶魔般的场景:缺乏人性、不可理解的科层制。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今天。科层制经常让人联想到官样文章^②、缺乏效率以及浪费。然而,另有些学者已经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科层制,视之为细致、精确而有效的行政管理典范。他们认为,因为科层制下的所有任务都由严格的程序规则来控制,所以它其实是由人类设计出的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韦伯对科层制的看法介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韦伯指出,在传统的文明中,只存在数量有限的科层组织。比如,在中华帝国,一个科层制的官场负责全部政府事务。但是只有到了现代,科层制才得以充分发展。

在韦伯看来,科层制在现代社会中的扩张实属必然。科层权威是应对大规模社会系统的管理要求的唯一方式。然而,韦伯也相信,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科层制显露出许多重大缺陷。它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研究科层组织之扩张的根源和性质,韦伯建构了科层制的一种理念型。[这里“理念的”(ideal)并不是指最值得想望的东西,而是指科层组织的一种纯粹形式。所谓理念型,就是强调实际个案中的某些特性,由此建构某种抽象描述,以便凸显实际个案之最本质的特征。]关于科层制的理念型,韦伯列举出下列几项特点(Weber 1979):

- 1 有一个界限明确的权威等级,使得组织中的各项任务都作为“公务”分派。科层制体系仿佛是一座金字塔,享有最高权威的位置处在塔尖。一条命令链自上而下延伸,从而使协调性的决策成为可能。在这个等级



在商业圈以及其他类型的组织里,在工作之余一起聚会的人们可能创造出非正式网络。

制中,每一个更高一级的岗位控制和监督它下一级的岗位。

- 2 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都有成文的规章制度主导着职员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层制的职责只是例行常规。职位越高,规章制度往往包含越多的复杂情况,在解释上需要更为灵活。
- 3 职员全职工作,领取薪俸。等级制中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同它相联系的明确、固定的薪俸。个体被期望在组织中打造职业生涯。晋升或基于能力高低,或基于资历深浅,或者

① 卡夫卡出生在现捷克布拉格,卒于现奥地利维也纳,在他所处的时代都属于奥匈帝国,布拉格此前是波希米亚王国的首都,后来才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更后来的捷克共和国的首都。

② “red tape”,指旧时用来捆扎公文的红带,比喻作繁文缛节,拖沓费时的公事手续。

两者结合。

- 4 职员在组织内的任务与其在组织外的生活两相分割。职员的家庭生活与他在工作场所的活动是分开的，并且在物理空间上也是相互分离的。
- 5 组织中的任何成员都不拥有他们所调配的物质资源。根据韦伯的观点，科层制的发展使工人失去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在传统共同体中，农民和手工业者通常能够控制他们的生产过程，并且拥有他们所使用的工具。而在科层制中，职员并不拥有他们在其间工作的办公室、所使用的桌椅或者办公设备。

韦伯相信，一个组织越是接近科层制的理念型，就越能有效地完成创立时定下的目标。他经常把科层制看作是精密的机器，以理性^①原则（参看第一章）运作。但他也认为科层制可能会缺乏效率，并承认许多科层工作单调乏味，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施展创造性的能力。不过，尽管韦伯担心，社会的理性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后果，但他最终的结论仍然是，科层的例行惯例，官场对于我们的生活所具有的权威，是我们为追求科层组织的技术效力所付出的代价。从韦伯所处的时代以来，社会的理性化愈发普遍。批评这一发展趋势的人与韦伯最初的关注相同，比如瑞泽尔，本章引言讨论了他有关社会的麦当劳化的阐述。他们质疑的是，为追求理性组织的效率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超出了韦伯曾经的设想。

一 科层制内部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

韦伯对于科层制的分析主要是针对组织内部的正式关系，即组织的规章制度所陈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韦伯很少讨论在所有组织中都有可能存在的非正式的联系和小群体关

系。但是在科层制中，非正式的做事方式经常会具有其他途径所无法获得的灵活性。

彼得·布劳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探讨了一个政府机构中的非正式关系。这个机构的任务是调查可能存在的逃避所得税行为。办事员在遇到不确定如何处理的问题时，应该同他们的直接上司进行讨论。程序规章规定，他们不应该向同级别的同事咨询。然而，绝大多数职员都不敢贸然接触自己的上司，感到这样做有可能表示他们缺乏能力，并因此减少他们的提升机会。所以，他们经常违背官方规则，互相咨询。这么做不仅有助于获得具体的建议，而且也缓解了单独工作的焦虑。在同一层次工作的人之间发展出来的小群体中，常常能看到一组有凝聚力的忠诚关系。于是布劳得出结论：这么做的结果是，这些工作人员所遇到的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有效的处理。这个群体能够逐渐形成非正式的程序，从而实现组织的正式规则所无法提供的更大的主动性和责任心。

在组织的所有层次都可能发展出非正式网络。在最高层，人际纽带和联系可能比理应制定决策的正式情境更加重要。比如，应该是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来决定工商企业的各项政策，但实际上，常常是少数几位董事会成员真正在经营企业，以非正式的方式制订他们的决策，并且希望董事会表示赞同。这种非正式网络也可能横跨不同的企业。来自不同企业的商界领导也常常以非正式的方式相互咨询，并有可能属于同样的俱乐部和休闲设施。本章稍后（第二节第三小节）还将进一步详细讨论非正式网络。

约翰·梅耶和布莱恩·罗恩提出，组织中的正式规则和程序通常与组织成员实际所采取的做法相去甚远（Meyer and Rowan 1977）。在他们看来，正式规则常常只是“神话”，人们公开说要遵守，但在现实中却殊无实效。这些规则只是用来将执行任务的方式合法化，也就是

^① 原文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的词条是“理性化”，这在韦伯笔下颇有差别。

正当化,哪怕这些方式迥异于根据规则“应当如何做”事情的设计。

梅耶和罗恩指出,正式程序常常具有某种典礼性或仪式性。人们会表现出遵从正式程序的样子,以使用其他更为非正式的方式搞定他们实际的工作。比如说,医院里管理病房程序的规则有助于使护士对待病人的方式正当化。例如,护士可能会忠实地填写挂在病人床尾的查房单,但又以其他非正式的标准来检查病人的病情,看看病人脸色如何,看起来是否清醒,是否有生气。如果严格遵照查房单,病人会印象深刻,医生也会满意,但对于护士的评估来说却并不总是不可或缺的。

要想确定非正式程序在何种程度上提高或妨碍了组织的效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同韦伯的理念型相似的体制往往也会孕育一系列非官方的做事方式。其原因部分在于,以非正式的方式糊弄正式规则,最终也就实现了所缺乏的灵活性。对于那些从事单调工作的人来说,非正式程序也常常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而职位较高的职员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许可以协助整个组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职员可能更加关心提高或者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增进整个组织的利益。

二 科层制的功能失调

功能主义学者罗伯特·默顿考察了韦伯的科层制理念型,得出的结论是,科层制中的几个内在因素将对其自身的功能平稳运转产生有害的影响(Merton 1957)。他称此为科层制的功能失调(dysfunctions of bureaucracy)。

有关功能主义,详参第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

首先,默顿注意到,官吏们被训练要严格遵守成文的规则和程序。灵活可变,运用自己

的判断做出决策,或者寻求创造性的解决之道,这些都是不受鼓励的。科层制是按照一系列客观标准处理事情的。默顿担心,这种刻板将导致科层制仪式主义(bureaucratic ritualism),即无论是否存在更适合整个组织的另一种解决办法,仍不惜一切代价固守规则。

默顿的第二个关注焦点在于,遵守科层制的规则可能最终导致程序优先于根本性的组织目标。因为过于强调正确的程序,可能会导致失去对大局的把握。例如,一个负责处理保险索赔的职员可能会因为某一份表格缺失或者填写不当,而拒绝补偿投保人的损失。换句话说,正确地处理索赔可能变成程序优先于遭受损失的客户的需要。

默顿预见到,这种情况下公众与科层制之间可能产生张力。这一关注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大多数人都要与大的科层机构定期打交道,从保险公司、地方政府到(英国)国内税务局(Inland Revenue)。我们经常会遇到公务员和官吏们对我们的要求似乎漠不关心的情况。科层制的主要弱点之一,就是难于应对需要特殊对待和考虑的情况。

三 作为机械体制的组织与作为有机体制的组织

科层制的程序能否有效地应用于所有类型的工作?一些学者认为,科层制带来了处理例行工作的一种逻辑感。但在工作的要求出现不可预见的变化的情形下,这种体制则是有问题。汤姆·伯恩斯和斯托克研究了电子企业内的革新和变化,发现科层制在强调灵活可变、把握前沿的行业中效用有限(Burns and Stalker 1996)。

伯恩斯和斯托克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组织:机械型(mechanistic)和有机型(organic)。所谓机械型组织,就是带有等级制命令链的科层体制,其中的信息沟通通过明确的渠道垂直传递。每一位员工都负责特定的工作。一旦工作

完成,责任就转交给下一位员工。在这一体制中,工作是匿名的,顶层的人和下层的人很少沟通。

与此相反,有机型组织的特征则是松散的结构,其中组织的整体目标优先于狭隘的责任。信息沟通流和命令指示更具发散性,沿循众多轨道,而不只是垂直轨道。组织中的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合法的既有知识和输入信息以供解决问题。决策并非顶层的人的禁脔。

依照伯恩斯和斯托克的观点,有机型组织更适合应对电讯、计算机软件或生物技术等创新性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更具流变性的内部结构意味着它们可以对市场的变化做出更加快速而恰当的反应,并更富创新性、更迅捷地提出解决办法。机械型组织更适合于不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的更为传统、稳定的生产形式。虽然他们的研究首发于40年前,但与目前关于组织变革的讨论依然密切相关(参看本章第二节)。伯恩斯和斯托克预见到的许多问题,在今天有关全球化、弹性专门化和去科层制的讨论中仍然占据核心位置。

四 科层制对抗民主?

即使是在像英国这样的民主政制下,政府组织也拥有大量关于我们的信息,从我们的出生日期、中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记录,到征税用的收入资料,颁发驾照及分配国民保险号码时所需的有关信息。既然我们并不始终了解自己什么信息被保存,又是什么机构在保存这些信息,人们就会担忧,这样的监控活动会侵害民主原则。这些担忧奠定了乔治·奥威尔的名著《一九八四》的基础,他在书中直陈,“老大哥”通过对其公民的监控,对在任何民主政制下都属正常的内部批评和意见分歧进行压制。

最近出台了一些建议方案,从2008年开始在英国引入身份证制度,并于2013年使其成为强制制度。它们的焦点就在于上述问题。

新的证卡很可能包含持证人的照片、姓名、地址、性别、出生日期,还嵌有一个微型芯片,可以储存生物特征方面的信息,比如人的指纹、虹膜图像和面部尺寸。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已经表达了对此的关注,认为收集民众身份信息的数据中心数据库不会是安全无虞的,并会威胁到民众的隐私权和免受歧视的自由。而支持身份证的人则提出,有些类型的监控其实可以保护民主原则。倡导身份证政策的人士辩称,建立身份证卡制度将更方便对恐怖分子之类的人群实施监控,从而将保护民主政制,促进其功能运转。

随着现代组织形式的发展,民主政制开始出现逐渐衰微的趋势,这使韦伯忧心忡忡。尤其令他困扰的是没有面目的科层职吏统治的前景。面对科层组织正向我们施加的不断增长的权力,民主如何能够避免沦为毫无意义的口号?韦伯分析道,说到底,科层制必然是专门化、等级制的。那些处于组织底层的人,势必会发现自己只能去做平凡无味的工作,并且无权过问自己的工作,而权力则转移给处于高层的人。韦伯的学生罗伯特·米歇尔斯创造了一个现在已经很有名的短语,来指这种权力的丧失(Michels 1967):在大型组织中,或者更一般地说,在一个由组织主导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寡头统治铁律(寡头统治意味着统治权属于少数人)。根据米歇尔斯的观点,权力向顶层的流动只不过是日益科层化的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因此就有了“铁律”这个术语。

米歇尔斯说得对吗?当然,确实可以说大型组织就蕴含了集权趋势。但是,完全有理由认为,所谓“寡头统治铁律”并不像米歇尔斯声称的那样颠扑不破。寡头统治与科层集权之间的关联比他所认为的更加暧昧不清。

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权力不平等并不只是米歇尔斯所假定的规模使然。即使在规模适度的群体中,权力的差异也可能非常明显。比如说在一家小企业里,员工的活动是领导直接可见的,所能实施的控制远比大型组织的办公

科层制真的很糟糕吗？

社会学家保罗·迪盖明言，“科层制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自从“科层制”这个术语问世以来，它就被以负面的方式来应用。迪盖在晚近一本颇具影响的书《科层制之颂》(Paul du Gay 2000)中反驳了这种攻击。他固然承认，科层制可能有并且也确实有某些缺陷，但他力图帮助科层制反击最常见的一些批评意见。

首先，迪盖反驳了认为科层制观念具有伦理上的问题的说法。他举出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有关大屠杀的书，作为这种观点的重要阐述。鲍曼认为，只有在与现代社会相维系的科层制度的发展之下，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屠杀这样可怖的行径才有可能出现。纳粹在“最后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下，对数以百万计的

人进行了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这只有在使人们不再为自己行动担负道德责任的各项制度到位之后，才有可能发生。鲍曼提出，大屠杀并不是一种野蛮的暴力爆发，它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理性的科层制度业已出现，将各自具体的任务与其后果相分离。德国的官员们，尤其是党卫军，会尽其全力完成各自分派的任务，满脑子只想着遵从一个个传来的命令，比如确保把铁路线造好，确保把一群人从国家的一个区域转送到另一个区域，而不会质疑大规模屠杀背后的整个理据(Bauman 1989)。

我们已经看到，鲍曼认为，责任在科层制下是被淡化了。而迪盖的意见则恰好相反。迪盖提出，要使大屠杀得以发生，纳粹就必须战胜科层制所内涵的合乎法律、合乎伦理的程序。他认



奥斯威辛是科层组织的终极表现吗？

为,科层机构具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包括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无论其高低贵贱。在迪盖看来,大屠杀的发生,正是纳粹的种族主义信念战胜了无所偏倚的规则应用,而后者正是科层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迪盖还力图从第二个角度捍卫科层制,反驳在他看来是当下很流行的一种论调,即需要

室中来得严格。随着组织的规模扩大,权力关系其实往往会更趋松散。固然,那些处在中层和低层的人可能对顶层制定的整体政策施加不了什么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有鉴于科层机构中所包含的专门化和专业技能,位居顶层的人们也会丧失对于下级负责处理的许多行政决策的控制。

在许多现代组织里,权力也经常是由上级公开下放给下级。在许多大公司里,企业领导整天忙着协调不同部门,应对危机,分析预算,预测数据,基本没有时间进行创新思维。他们把政策话题的考虑交给那些层级比自己低的人,后者的任务就是提出相关建议方案。许多企业领导坦承,他们基本上只是照单接受提交给他们的结论。

16.1.2 组织的物理环境

绝大多数的现代组织都在特别设计的物理环境中活动。一幢容纳某一组织的建筑物具有与组织活动相关的特殊性质,不过,它也具有与其他组织的建筑物相类似的重要建筑特征。例如,医院的建筑物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工商企业或学校的建筑物。医院中有各自隔开的病房、诊室、手术室和办公室,赋予整幢建筑物以确定的布局;而学校则可能包括教室、实验室和体育馆。然而也有大体相似之处:两者可能都包括门户大开的大厅、走廊,以及到处都使用标准的装修和家具。除了穿梭于走廊的人们的衣着不同外,现代组织通常寓身于中的建

对科层机构,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科层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革。他强调指出,科层制的无所偏倚的精神正在遭到越来越政治化的公务员队伍的破坏,他们做事情时热衷于取悦政客,而不是遵循科层框架,确保对于公共利益和宪政合法性的行政责任(du Gay 2000)。

筑物具有明确的相似性。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看,它们往往都千篇一律。如果路过一栋建筑物,有人问“这是所学校么?”,答曰“不,是家医院。”也是常有之事。

一 米歇尔·福柯的组织理论:对于时空的控制

福柯指出,一个组织的建筑风格,同它的社会构造和权力体系直接相关(Foucault 1971, 1979)。通过研究组织的物理特征,我们就能以新的角度来思考韦伯所分析的问题。韦伯以抽象的方式讨论过的办公室也是一种组织内部的建筑环境,即被走廊隔开的一系列房间。有时候,大公司的建筑物实际上就是以空间上的等级秩序来建造的。一个人在权力等级上的位置越高,他的办公室就越靠近建筑物的顶层。有时“顶层”(the top floor)这个术语就用来指在组织中拥有最高权力的人。

一个组织的空间布局还能从其他许多方面影响其功能的发挥,在系统十分依赖非正式关系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物理空间上的接近会更加容易形成群体,而空间上的距离可能使群体两极化,在不同部门之间产生“我们”和“他们”的立场。

二 组织中的监控

在一个组织的建筑物中,房间、过道以及开放空间的布局都可以为了解组织的权威体



图为 20 世纪 40 年代的打字组,这样的物理组织方式意味着,工人们始终处在严密监控之下。而在现代组织中,监控往往会采取新的形式。

系运作提供基本线索。在一些组织中,一群人在开放的环境中集体进行工作。因为某些特定行业的工作具有单调、重复的特性,比如流水线生产,所以需要定期监督,以确保工人的劳动节奏。同样的情形也常常见于其他一些类型的例行工作类型,比如客服中心的接线员所做的工作,她们的主管就常常监管其受呼和应答情况。福柯特别强调在现代组织的建筑环境中,可见性或者缺乏可见性是如何影响和表达权威模式的。可见性的程度决定了下级会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福柯所谓的监控,也就是组织中对于活动的监督。在现代组织中,每一个人,甚至是处于较高权威位置的人,都会受到监控。但是,一个人的位置越低,其行为就越容易受到密切审视。

监控有好几种形式。一是上级直接监督下级的工作。试以一间学校教室为例。学生一般

坐在按行排列的桌子或课桌前,所有人都在老师的视线之中。要求孩子们要么专心听讲,要么埋头自己的功课。当然,这种情况实际发生的程度,有赖于老师的能力,以及儿童服从这些期望的意愿。

第二种监控的类型比较隐微,但是同样重要。它包括保存与一个人的职业生活有关的卷宗、记录和个案历史。韦伯注意到了书面记录(现在一般已经电脑化了)在现代组织中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充分讨论如何用它们来调控行为。雇员记录一般会提供完整的职业履历,登记个人的详细情况,并经常给出性格评价。这类记录被用来监督雇员的行为,并且用于评价提升的建议。在许多工商企业,组织中每个层级的人都要为那些比自己低一级的人准备年度业绩报告。当一个人在组织中流动时,也用中小学和大学的成绩来监管他们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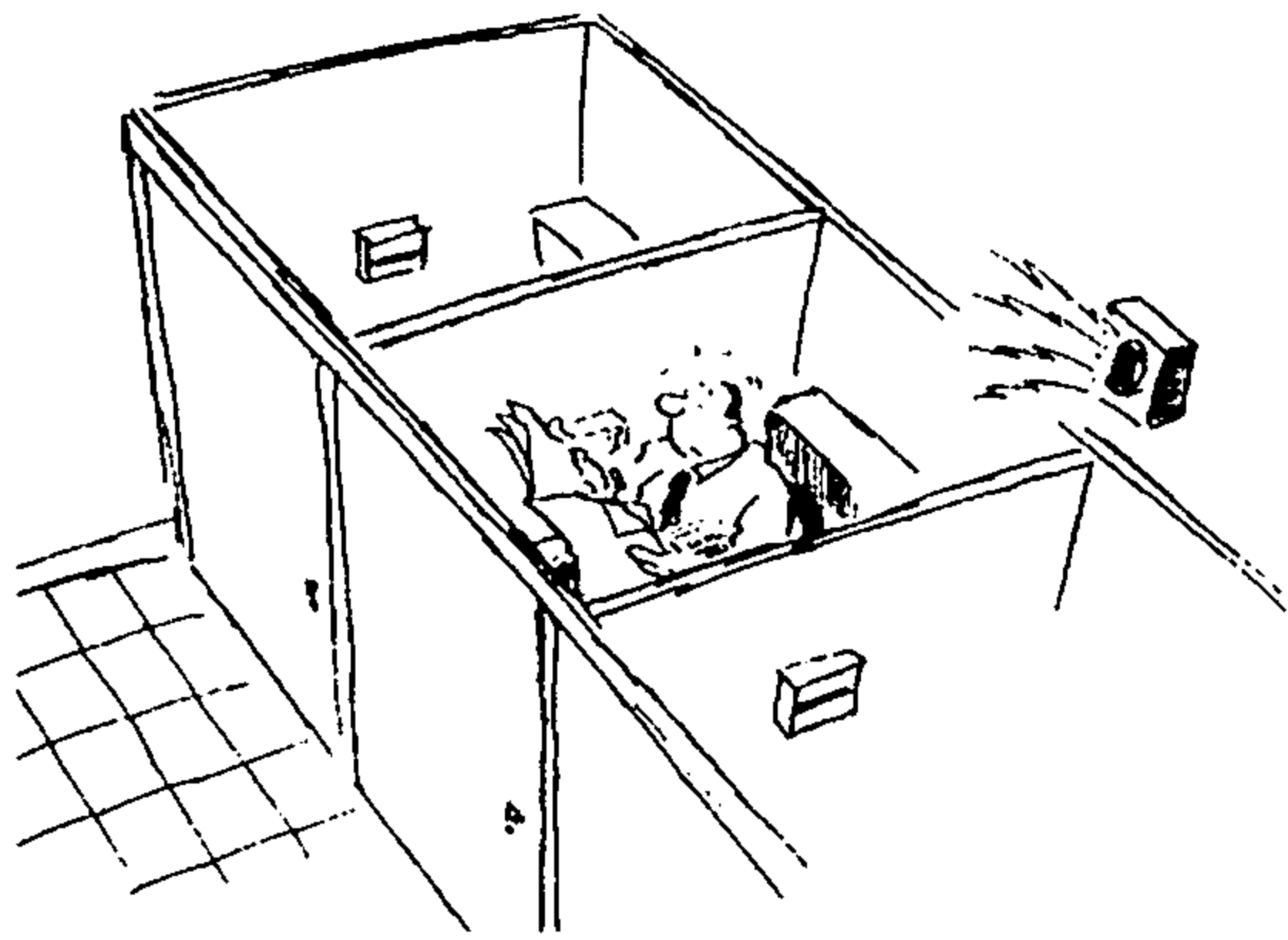
漫画^①

最后,还有一种自我监控,假定其他人在监控自己,就会改变某人的行为举止,^②限制其所作所为。再以上文所举客服中心的接线员为例。接线员往往不知道此次呼叫是否正被监听,或主管是否经常监听电话交谈。然而,接线员很可能假定,她们正受到管理方的监控,因此会尽量使呼叫简短、实效、正式,符合公司的准则。

如果员工随意而为,组织就不能有效地运转。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在工商企业中,人们被期望按固定钟点工作。活动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一致,有时通过组织的物理环境和详细时间表的精确安排两方面的协助。时间表使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规律化,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围绕着组织“有效地分配身体”。时间表是维护组织纪律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们把众多人的活动组合安排在一起。例如,如果一个大学不严格遵守课程表,它很快就将陷于一片混乱。时间表使得时间和空间有可能被充分利用。每个时间和空间都可能充斥着许多人和许多活动。

三 监控之下:监狱

福柯对监狱这样的组织相当关注,其中的个体从身体上与外部世界分离很长时间。在这种组织中,人们被监禁起来,与外部社会环境相隔绝。监狱细致刻画了监控的性质,因为它力求尽可能扩大对于犯人行为的控制。福柯问道:“监狱类似于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它们都和监狱相似,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感应器显示,2号隔间已占用18分钟。您是否需要帮忙?”

① 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是美国目前最红的漫画家兼作家。呆伯特(Dilbert)系列企管书和上班族漫画书均高居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美国《时代》杂志曾把他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以及国际金融炒作高手乔治·索罗斯等并列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呆伯特是基于作者自身办公室经验跟读者来信的讽刺职场现实的系列漫画,主人公呆伯特是一个倒霉透顶却总是忍气吞声的工程师,整天沉溺于网络冲浪。他的世界里满是日常生活的荒诞不经,是后工业时代白领生活的写照。工程师们蜗居在格子间里,愤世嫉俗、互耍阴谋,还得听命于一个笨蛋老板(就叫“Boss”)。“猫伯特”(Catbert)这位邪恶的人事主管在裁员前会狠狠地捉弄员工。华利(Wally)是呆伯特的工程师同事,颇具办公室生存知识,喜欢捉弄呆伯特等同事为乐,但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顺便说一句,“Wally”在英俚中的意思就是“笨蛋”、“傻老冒”。

② 原文此处为“ones behaviour”,应为“one's behaviour”。



图为依照边沁的圆监模型铸造的一座监狱。

(Foucault 1979)

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监狱源于圆形监狱(Panopticon),它是由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杰里米·边沁在19世纪设计的一种组织形式。“圆形监狱”是边沁给他设计的一种理想监狱所起的名字。他在多种不同场合都试图说服英国政府采用这一监狱形式。这种设计从来没有充分贯彻过,但它的一些主要原则融入了欧洲和美国在19世纪建造的监狱。圆形监狱是环状的,各囚室沿外环修造。在中心则是监视塔。每个囚室开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向监视塔,另一扇朝外。这种设计旨在使狱卒任何时候都能够看见犯人。监视塔本身的窗户装有百叶帘,这样一来,狱卒始终可以观察犯人,而犯人却看不见狱卒。

四 监控的局限

福柯对监狱的阐述所言非虚。即使今天,绝大多数的监狱看起来都很像圆形监狱。他还正确地揭示了监控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这个话题现在甚至更显得重要,因为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后果愈益严重。我们生活在有些人所称的监控社会中(Lyon 1994),在这种社会里,有关我们生活的信息被各种各样的组织所收集。

韦伯和福柯都认为,要经营一个组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扩大监控,也就是说,有明确而连贯的权威划分。但他们都错了。至少这种思路不能应用于工商企业,它们并不是(像监狱那样)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对人们的生活进行全面的控制。实际上,监狱对于整体而言的组织并不是一个范例。如果像在监狱那样,有关的人对那些控制他们的权威根本上充满敌意,不想呆下去,那这种直接的监督可能会被忍受而运作良好。但是在管理者希望与其他人共同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组织中,情况就不同了。太多的直接监督可能会造成雇员的疏远。他们会感到没有机会投入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Sabel 1982; Grint 2005)。

基于韦伯和福柯所阐述的那些原则而创建的那些组织,比如包含流水线生产和严格的权威等级的大型工厂,最后之所以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工人们不愿意在这种环境中投入地工作。事实上,需要有连续不断的监督,让他们比较努力地工作,但是这只会加剧怨恨和对立。

至于福柯所提到的第二种意义上的监控,即收集有关人员的书面信息,人们也往往会抗拒高度的监控。这也是导致苏联式的共产体制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受到常规的监视,监督者要么是秘密警察,要么是被秘密警察收买的人,甚至是亲戚和邻

居。为了压制可能产生的对统治的反抗,政府也保存公民们的详细信息。其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在政治上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并最终导致经济上的低效。事实上,整个社会几乎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一切由监狱所引发的不满、冲突和反抗模式,这个社会也都齐备。最终,民众将挣脱这个社会。

16.1.3 跨越世界的组织

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规模。信息技术使得国家边界不再那么意义重大,因为它们不再能够作为包容并遏制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重大活动的容器。有鉴于此,人们期望国际组织的数量将持续增多,作用也将愈发重要,在这个各国不再作为过去那种全能行动者的世界上,提供一种具有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手段(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1996—97)。

因此,社会学家会研究国际组织,以便更好地理解,如何可能创造跨越国家边界的制度与机构(institutions),而其效应又将如何。有些社会学家甚至提出,全球性组织将会促使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似(Thomas 1987; Scott and Meyer 1994; McNeely 1995)。

然而,国际组织并非新鲜事物。比如说,旨在管理跨界贸易的组织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汉撒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就是德意志商人与各城市之间结成的商业联盟,从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主宰了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但是,直到1919年创建短命的国联(League of Nations)之前,尚未形成真正具有全球性的组织,具备完善的科层体系和世界范围的成员国。1945年创建的联合国可能是全球性组织最显著的现代实例。

社会学家已经把国际组织区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国际政府组织由各国政府组成,而国

际非政府组织则由各私人组织组成。我们将分别来谈谈这两种类型。

一 国际政府组织

第一种类型的全球性组织即所谓国际政府组织(IGO),是通过政府之间缔结条约而创立的一类国际组织,旨在便利各成员国之间的事务往来。这类组织之所以会兴起,有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国联和联合国都是在极具破坏性的世界大战之后创建的),有的是为了贸易调控(比如世贸组织),也有的是社会福利、人权或目前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问题。

当今最为强势的国际政府组织当中,有些组织的创建是为了将各国经济统一成为规模大、力量强的贸易集团。欧盟(European Union, EU)就属于最为发达的国际政府组织之一,自2004年5月始,它的辖域涵括欧洲25个成员国。^①欧盟的创建乃是为了打造一个欧洲单一经济体,在此范围内,各种生意可以跨越国界自由运作,以寻找市场和劳力。而劳工也可以自由流动以寻找工作。欧盟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经济政策,自2002年始,其中12国更是使用单一流通货币[即欧元(euro)]。不过,并不是所有欧洲人都欢迎这种发展趋势,认为这意味着各成员国最终将会放弃各自绝大部分的经济决策权,奉送给作为整体的欧盟。

国际政府组织也有能力行使可观的军事力量,只要它们的成员国愿意如此。比如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北约(NATO)]和联合国,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调用各成员国组成的联军全力打击伊拉克。在1999年的前南地区,即科索沃,又如法炮制。然而,由于各国对自己军力的使用具有最终控制权,哪

^①自2007年1月1日开始,又增加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成员国。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夕阳企业还是朝阳企业？

“世界已经变了。我们的顾客已经变了。我们也不得不有所变化。”麦当劳(前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吉姆·坎塔卢波如此坦言,(已于2004年去世的他)向投资人承诺,……全世界最大的快餐连锁店将不再努力做到最大,而只想做到最好。

这就是公司将致力于信守的诺言。(2003年)1月份,麦当劳公布了自1965年公开财务以来的首次季度亏损。可比较的美国国内店面销售,在过去十年中稳定不变,但在过去一年中却不断下降。麦当劳曾经是优质服务的代名词,但在最近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却始终位列全美顾客满意度最差的企业,甚至还低于健康保险公司和银行。集团的股价也从1999年的每股超过48美元直线下降,徘徊在十年来的最低值每股12美元……

更令人沮丧的是,坎塔卢波先生和查利·贝尔先生(坎塔卢波的继任者,但自己又于2005年因患癌症而盛年早逝),他的二把手,也是当然继承人,在大部分公开讲话中都在承诺改善餐厅经营的基本条件——卫生、服务和员工效率,只为了把老顾客们拉回来。在格林伯格先生管理下,麦当劳甚至没有一套监督标准的体系,以避免和各特许经营店(franchisees)之间产生纠纷。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一套评定体系和“神秘顾客”^①政策,集团也承诺加强对于自主加盟店(owner-operators)的监管。

食谱本身也是一团糟。据说,它将会朝瘦身的方向发展。^②将会减少令人困惑的套餐选择,增添更加健康的、优质的制品,比如沙拉、酸奶、水果切片之类。尽管麦当劳早就否认其食品容易导

致肥胖,但这是一家与形象息息相关的企业,它最终还是意识到,自己的品牌受到其不健康的名声的威胁。集团曾经令人困惑地试图做到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坎塔卢波先生说自己希望避免这一点),而现在则计划提供“物美价廉”的食品(offer “champagne taste on a beer budget”),并推出新的优惠食品,甚至宣称价格本身就是“品牌遗产的一部分”。广告宣传和店面格调也在彻底变革。集团辖下更为豪华的法国式门店或许是一种模式,而不那么奢华的是贝尔先生的想法,把罗纳德·麦克唐纳,集团的吉祥物(似乎是美国第二广为人知的形象,仅次于圣诞老人),推向青年,这是继孩童之后的又一个“重要人群”。

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投资人搞不清楚麦当劳是否真的“弄明白了状况”,就像坎塔卢波先生在其公开讲话中不断强调的那样。随着美味三明治店(gourmet sandwich shops)之类的“休闲快餐”(fast casual)式餐厅的崛起,麦当劳提供的东西就显得越来越落伍了。集团最近一次货真价实的食谱新品还是1983年推出的麦乐鸡(Chicken McNuggets)。各特许经营店过去往往有10%到15%的年度增长,利润丰厚,现在则已经感受到保持利润的压力,而总部的种种执行糟糕的动议,类似于强制购买昂贵的新款“为您订制”厨房之类,又把大家弄得离心离德……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年克罗克一方面通过购买和租用资产,一方面通过售卖汉堡包,不仅创建而且扩大了麦当劳,给集团留下了一座可待开发的金矿。美林^③的分析师彼得·奥克斯指出,集团在其所分布的3万处地点中,对其中75%的建筑

① “神秘顾客”(mystery shopper)是指餐馆、零售商等雇来评测其服务质量的匿名兼职评议员。

② 原文此处的“slimed”意带双关。

③ 美林(Merrill Lynch)是和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等并称的世界顶级投行,不过这是2008年下半年世界金融海啸前的事情了。



在销售额下降之后,麦当劳近年来一直在努力重塑自身。这片新款外观的伦敦门店,现在看起来几乎与一家酒吧或咖啡店没什么两样了。

物和 40%的土地拥有产权。根据他的计算,仅土地一项,账面价值为 40 亿美元,而今天的市值高达 120 亿美元(税前)。这样的价值可以通过售后回租 (sale-and-leaseback) 的规划来利用……

把这些统统加起来,麦当劳可以轻易给予其投资人几十亿美元的回报。考虑到肥胖诉讼案的前景不乐观,对于向儿童推销“不健康”食品的攻击日盛,给予股东优厚的返还看来是眼光长远之举。唉,要想栽好这株特别的摇钱树,恐怕顶层还

得多做些调整。

“有人抱怨受损了吗?”, *The Economist*

(2003 年 4 月 10 日)

问题:

- 1 为了打造更具调适能力的企业网络,“去麦当劳化”的过程是否已经开始?
- 2 麦当劳是否忽视了它的“指导原则”,即富有效率、可以计算、统一不变、自动控制?

怕是最为强势的国际政府组织,其权威也会有所限制,因为其力量源于各成员国的自愿参与。比如说,面对波斯尼亚以及索马里与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的暴力内乱,联合国的维和努力证明基本无效。

国际政府组织往往也会体现出各成员国

之间权力的不平等。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是联合国内最具强势的组织。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包括英国、美国、中国、法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对于安理会的行动享有重大控制权。其余还有十个国家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每两年一任,

因此权力不如常任理事国具有持续性。^①

在 20 世纪初,全世界仅有大约 30 来家国际政府组织,当然,那时的数据资料有欠系统。而到 1981 年,开始采用连贯的报告标准,当时有 1039 家国际政府组织。到 1996 年,增加到 1830 家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1996—1997)。至于今日的情况,国际政府组织据估计已多达 5500 家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02)^②。

二 国际非政府组织

第二种类型的全球性组织即所谓国际非政府组织 (INGO),是根据各成员个体或私人组织之间的协定所创建的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社会学协会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国际妇女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环保团体绿色和平 (Greenpeace)。和国际政府组织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近年来也呈爆炸性增长。20 世纪初还不到两百家,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则已飙升到大约 1 万 5 千家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1996—1997)。今天,据估计已有 31100 家国际非政府组织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02)。

总体而言,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增进各成员的全球性关怀与利益 (interest),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联合国、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或个别政府。它们也投入研究和教育,借助国际会议、会谈和期刊传播信息。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成功地影响了强势国家的一些政策。

国际禁雷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 就是一个表现活跃 (也非常成功) 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该运动及其创建人乔迪·威廉斯于 1997 年被授予诺贝尔和

平奖,表彰其成功地说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同意签署一项条约,禁止破坏性地使用地雷。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该运动改变了“对于可行现实的想法”,并且指出,“此项工作的发展已经令人信服地例示了一项卓有成效的和平政策,证明对于国际裁军努力影响重大。” (ICBL 2001)

国际禁雷运动与大约六十个国家的其他一千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有联系。它们共同努力,提请公众关注一亿多颗杀伤性地雷给平民带来的危险,那是欧洲、亚洲和非洲此前历次战争留下的致命遗产。这些地雷与其他武器不一样。即使一场战争结束了几十年,它们还是一触即发,使整个人口终日心怀恐惧,如同置身陷阱。比如,在柬埔寨,昔日肥沃的耕地都被布了雷,农民们要是不愿意冒险去耕作,让自己甚或全家都化为齑末,就有忍饥挨饿的危险。在该运动的努力下,订立了一项条约,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运杀伤性地雷。1999 年 3 月,该条约获得国际法地位,现已得到 150 个国家的支持。

尽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远远多于国际政府组织,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其影响力还是要小得多,因为法律力量 (包括执行力) 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政府。以禁雷努力为例,虽说世界各大国中大多签署了该项条约,但美国以担心朝鲜地区安全为由,拒绝加入该条约,俄罗斯也是这样。不过,像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和绿色和平这样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还是发挥了相当可观的影响。

16.1.4 经济组织

现代社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资本主义

① 即所谓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按地区分配,即亚洲 2 个、非洲 3 个、拉美 2 个、东欧 1 个、西欧及其他国家 2 个。不能连选连任,每年更换 5 个。吉登斯此处未曾提及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

② 此款文献在书后书目中未及增补。

性质的。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具有以下重要特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利润作为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出售产品、获取廉价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无休止的扩张和投资以积累资本。资本主义是随着19世纪早期工业革命的成长而开始扩张的,远比历史上此前任何经济体制都更加充满活力。尽管有许多人,包括马克思,批判这种体制,但它现在是全世界最为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

本章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是从职业和员工的视角来看劳动的。我们已经考察了各种劳动模式和影响工会发展的一些因素。而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劳动力受雇的工商企业本身的性质。(当然,也应当认识到,当今有许多人是政府组织的雇员,只是我们这里不予考虑)那么,今天的工商企业现状如何?它们是如何运转的?

一 企业与企业权力

自20世纪以来,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就越来越受到大型工商企业^①(corporation)的兴起的影响。最近一项对于世界企业前200强的调查表明,从1983年到1999年,它们的销售总额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从25%上升到27.5%。同一时期,这些企业的利润总额则增长了362.4%,而雇用的员工总数却只增长了14.4%(Anderson and Cavanagh 2000)。

当然,在英国的经济体系中,还有数千家较小的工商企业。在这些公司里的企业家^②(entrepreneur),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其形象决不是老式的。但对于大企业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自从阿道夫·贝勒和加德纳·米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其著名研究

《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以来,人们就普遍认为,绝大多数大企业的经营者并非其所有者(参看Berle and Means 1997)。从理论上说,大企业是它们的股东的财产,有权制定一切重大决策。但贝勒和米恩斯提出,鉴于股权极其分散,实际控制转入日常经营企业的管理者手中。因此,企业的所有权与其控制权相分离。

无论是由所有者经营还是管理者经营,大企业的权力都是非常广泛的。如果某一特定行业仅由一家或几家公司所主导,这些公司就常常会以协定价格来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自由竞争。因此,石油巨头们通常会相互仿效汽油定价。如果有一家公司在某一行业中占据了足以发号施令的地位,我们就说它处于垄断位置。更常见的情形则是寡头垄断,其中有一小群巨型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寡头垄断的情形下,公司从作为其供应商的小公司那里购买货品或服务时,多少有能力规定具体条件。

二 企业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

在工商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大致有三个阶段,虽说各个阶段相互有所重叠,直至今日依然共存一时。第一个阶段体现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特征,以家族资本主义为主导。经营大公司的要么是个别企业家,要么是同一家族的其他成员,然后又传给他们的后代。那些著名的企业王朝,比如英国的桑斯博里家族或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个人和家族并不只是拥有一家大企业,而是有着多样化的经济利益,高居经济帝国的顶峰。

企业家族所创建的那些大公司,绝大多数现在都成了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ies),也就是说,它们的股份在开放市场上交易,控制权也转入管理方。但家族资本主义的一些重要元素还保存下来,甚至在全世界^③最大的一些

① 原文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无此词条。

② 原文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无此词条。

③ 原文此处为“word's”,应为“world's”之误。

企业中也是如此,比如福特汽车公司,其总经理是小威廉·克莱·福特,正是公司创办人亨利·福特的曾孙。而在小公司里,比如由业主经营的本地商铺、小型房屋管道和油漆公司之类,家族资本主义依然是主导类型。其中有一些公司,例如在同一个家族手中传承了两三代的商铺,也算得上小规模王朝。不过,小型企业属于相当不稳定的部门,经济上的失败乃是司空见惯之事,由同一个家族的成员长时期拥有的公司比例可谓微不足道。

在大型企业部门,家族资本主义逐渐被管理资本主义所取代。随着巨型公司的成长,管理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由此取代了企业家族。其结果就被说成是公司本身取代了公司中的家族。企业逐渐形成一个更为确定的经济实体。迈克尔·艾伦研究了美国的制造业两百强企业,发现当利润趋于下降时,家族控制的企业不太可能撤换其总经理,但管理者控制的公司就能迅速换人(Allen 1981)。

毫无疑问,管理资本主义已经给现代社会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大型企业不仅引领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模式,而且推动着当代社会的就业经验。难以想像,如果没有那些大型的工厂或企业科层机构,许多英国人的工作生活会有多么大的不同。而社会学家们已经指出了大企业给现代制度留下印记的另一块领域。所谓福利资本主义,指的就是致力于使企业——而不是国家或工会——成为现代工业生活中种种市场不确定情况的首要庇护的做法。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公司就开始为其员工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包括儿童保育、娱乐设施、分红方案、带薪休假、失业保险和人寿保险等等。这些方案常常具有家长式的作风,比如支持针对员工的“道德教育”的“家访”。从不那么善意的角度来看,福利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矫正,雇主施展种种策略,包括暴力手段,以避免工会化。

桑福德·雅各比在其有关美国劳工运动的研究中提出(Jacoby 1997),传统史学一般都会认为,福利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年代里遭遇到其衰亡,因为工会的影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New Deal)之施政又开始确保原本由公司提供的许多福利。但与这种标准解释截然不同,雅各比主张,在劳工运动如日中天之时,福利资本主义并未死亡,而是潜入地下。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这段时间,在那些避免了工会化的公司,比如总部设在美国的柯达(Kodak)、西尔斯(Sears)、汤普森制品(Thompson Products),福利资本主义开始现代化,去除了那些不加掩饰的家长式作派,将福利方案例行化。工会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声势渐衰,这些公司就开始成为其他许多公司的榜样,这时候它们有能力利用自己相对于处在侧翼的工会的优势地位,重新确立了公司作为“工业领主”(industrial manor)的角色。

尽管管理资本主义在塑造现代经济的过程中意义极其重大,但许多学者现在已经看到,企业演进的另一个阶段,也就是第三阶段,已是轮廓乍现。他们提出,今日之管理资本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资本主义所取代。这个术语指的是工商领袖的稳固网络的形成,他们不仅关注各自公司的决策,而且关注单个公司之外企业权力的发展。制度资本主义乃是建立于企业在其他公司中持有股份的做法的基础上。实际上,放眼当今企业世界,大部分都是由连锁董事会^①实施控制的。这就倒转了管理方控制力的增长趋势,因为相比于其他企业所拥有的大宗股票,管理者的股份就相形见绌了。制度资本主义普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去30年间所发生的投资模式的转换。个人现在不是通过购买某个企业的股票而对其直接投资,而是投资货币市场、信托基金、保险基

^① 连锁董事会(interlocking boards of directors): 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中的成员们同时兼任其他一些公司的董事,最终形成一些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同一群人的控制之下的局面。

金和养老基金,这些都是由大型金融组织所控制的,再经过它们将这种集体储蓄投资到工业企业中去。

三 跨国企业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绝大多数大企业现在都在国际经济框架中运作。当它们在两个或几个国家设立了分部,我们就称之为多国企业或跨国企业。用跨国这个词可能更好些,表示这些公司的运作跨越了许多不同国家的边界。

那些最大的跨国企业犹如巨人。它们的财富超过了许多国家。当今之世,经济单位前百强中只有一半属于国家,而另一半都是跨国企业。这些公司的运作规模令人吃惊。跨国企业前六百强占据了全球经济中工农业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强,仅最大的大约 70 家跨国企业在全世界销售总额中就占据了半壁江山(Dickens 1992)。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最大的两百家公司的收入总额上升了十倍,在 2001 年达到 9.5 万亿美元之巨。2003 年,据估计世界制药企业前十名控制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53%。在过去 20 年间,跨国企业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1950 年时,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中只有 3 家在 20 个以上的国家设有制造子公司,而今天拥有此等规模的公司大约有 50 家。这还只是占少数。绝大多数跨国企业在两个到五个国家设有制造分公司。

在 2000 年度的前两百强公司中,美国企业主导了榜单,占据 82 席(总数的 41%),日本公司排第二,为 41 席(Anderson and Cavanagh 2000)。话说回来,从 1960 年以来,美国公司在前两百强中的份额已经显著下降,那时仅有五家日本企业上榜。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正好相反,在直接对外投资中有四分之三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不过,跨国企业也广泛涉入处在发展中世界的各个国家,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的外资程度最高。迄今为止,企业投资的最

快增长率出现在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若是没有交通运输和传播沟通方面的进展,近几十年来跨国企业所达到的势力范围就是不可能的。航空旅行现在使人们非常迅捷地进行全球流动,其速度即使在 60 年前也是不可想像的。远洋巨轮(超级货轮)的发展,伴之以能够直接从一种运载工具转到另一种运载工具的集装箱的发展,促成了大宗货物的便捷运输。

电信技术现在也使世界各地之间的沟通变得多少可以是即时性的。自 1965 年以来,卫星已经被用于商业电信,第一颗投入使用的卫星可以同时传输 240 路电话,而现在的卫星至少可以同时传输 12000 路电话!较大的跨国企业现在都拥有自己的卫星传播系统。比如三菱商事株式会社(Mitsubishi corporation),就拥有一个庞大的通讯网络,每天往来其东京总部的传送量高达 500 万个单词。

四 跨国企业的各种类型

随着 20 世纪的逐步推进,跨国企业也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们在国际分工中举足轻重。所谓分工,就是为世界市场生产货品的专门化,将各地区划分为工业生产或农业生产的各个区域,或者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的各个区域(Frobel, Heinrichs et al. 1979; McMichael 1996)。正如各国家经济体已经变得越来越集中化,由少数一些巨型公司来主导,世界经济也是如此。就英国和其他几个为首的工业化国家而言,在国家层面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那些公司也具有非常广泛的国际势力。世界生产的许多部门(比如农业综合经营)都是寡头垄断性质的,整个生产由主导市场的三到四家企业控制。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在汽车、微处理器、电子等行业,以及其他一些全球行销的货品生产领域,已经形成了国际寡头垄断。

珀尔马特把跨国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 (Perlmutter 1972)。一是民族中心式跨国企业 (ethnocentric transnationals), 其公司政策乃是尽可能从设在源发国的总部制定并予以推行。母公司在世界各地所拥有的公司和工厂只是源发公司的文化延伸, 其实践做法在全球都是标准化的。第二类是多中心式跨国企业 (polycentric transnationals), 其海外各分部是由设在各自国家的本地公司负责经营的。位于主公司源发国的总部只是确立大致方针, 各本地公司可以在此框架内经营自己的事务。最后一种是地理中心式跨国企业 (geocentric transnationals), 其管理结构是国际性的。管理体系在全球性基础上整合起来, 高层管理人员流动性很强, 根据需要, 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①

在所有的跨国企业中, 日本公司往往最具有珀尔马特所谓的民族中心式的性质。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通常是在母公司的严格控制之下, 有时候还有日本政府的密切介入。日本通产省 (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对于总部设在日本的外国企业的监管, 远比外国政府来得直接。在过去 20 年间, 通产省提出了一系列发展规划, 以协调日本公司的海外扩张。有一种类型的跨国企业尤其具有日本特色, 就是巨型商贸公司, 或称综合商社 (sogo shosha)。这些巨型企业集团主要关注的是对于贸易的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它们向其他公司提供金融、组织和信息服务。日本的进出口事务大约有一半是通过前十大综合商社来进行的。^②其中一些商社, 比如三菱, 也有自己的大型制造业。(下文第二节第一小节还将进一步讨论日本的企业)

五 全球层面上的运筹

全球性企业已经成为第一批有能力在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层面上进行运筹的组织。比如说, 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广告就触及了全球几十亿人。少数几家公司拥有发达的全球网络, 有能力影响多个国家的商业活动。理查德·巴尼特和约翰·卡瓦纳提出 (Barnet and Cavanagh 1994), 在新型世界经济中, 有四套相互关联的商业活动网: 一是全球文化集市 (Global Cultural Bazaar), 二是全球购物广场 (Global Shopping Mall), 三是全球工作场所 (Global Workplace), 四是全球金融网络 (Global Financial Network)。全球文化集市是四套网络中最新出现的一种, 但已经成为触角最广泛的一种。种种全球性图像和全球性梦想,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出售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录像、游戏、玩具、T 恤等而广为流传。全球各地, 甚至在发展中世界的最贫困国家, 人们都在用着同样的电子设备, 观看或收听商业化制作的同样的歌曲和表演。

根据巴尼特和卡瓦纳的说法, 全球购物广场是一座“全球性的超级市场, 种种吃喝玩乐的东西光怪陆离, 层出不穷。”它比文化集市更具有排斥性, 因为穷人缺乏资源去参与其间, 他们只能做浏览橱窗的旁观者。在构成世界人口的 55 亿人^③中, 有 35 亿人缺乏现金或信用来购买任何消费品。

第三套全球网络, 即全球工作场所, 就是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愈益复杂的全球劳动分工。它包括了数量庞大的办公室、工厂、餐馆, 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生产和消费货品或是交流信息的场所。这套网络与全球金融网络有密切关联, 既为后者提供燃料, 又受到后者的资助。全球金融网络包括了数十亿的信息比特, 储存

① 以上三个术语原文格式如此, 但第一和第三个在书后术语表中并无有关条目。

② 其中就有中国读者熟悉的三菱、丸红、野村、伊藤忠、岩井、三井、住友等名号。

③ 原文如此, 大概指的是此书做研究时的人口。目前世界人口总数约 65 亿。



黎巴嫩城市的黎波里街头,百事可乐广告与可口可乐广告比邻而居。^①

在计算机中,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它牵涉到几乎无穷无尽的通货兑换、信用卡交易、保险计划、债券和股票的买卖。

六 大企业:形同实异

21世纪头十年的大企业与20世纪中叶的那些大企业之间有着重大差异。许多企业的名称还是沿承不变,比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国际商用机器(IBM),但这类企业的行列中已经加入了其他一些巨型企业,基本上在20世纪50年代是不曾听闻的,比如微软和英特尔。它们都拥有巨大的力量,其顶层高官们都还呆在主宰众多城市中心的大型建筑物中。

但在今日与半个世纪前,尽管表面上多有

相似之处,也已经发生了某些深刻的转型。至于这些转型的根源,正是我们在本书中常常遇到的那个过程:全球化。在过去50年间,巨型企业变得越来越卷入全球竞争,其结果,它们的内部构成,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它们的性质本身,已经有所改变。

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曾经写道:

究其实质,一切皆在改变。美国的骨干企业不再筹划并贯彻大宗货物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不再投资各式各样的工厂、机器、实验室、库存,以及其他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它不再雇用大批的生产劳力和中层经理……事实上,核心企业甚至不再是美国的。它越来越像

^① 的黎波里居民以穆斯林为主,曾两次爆发反对基督教领导的中央政府的暴动,也曾为巴解总部所在地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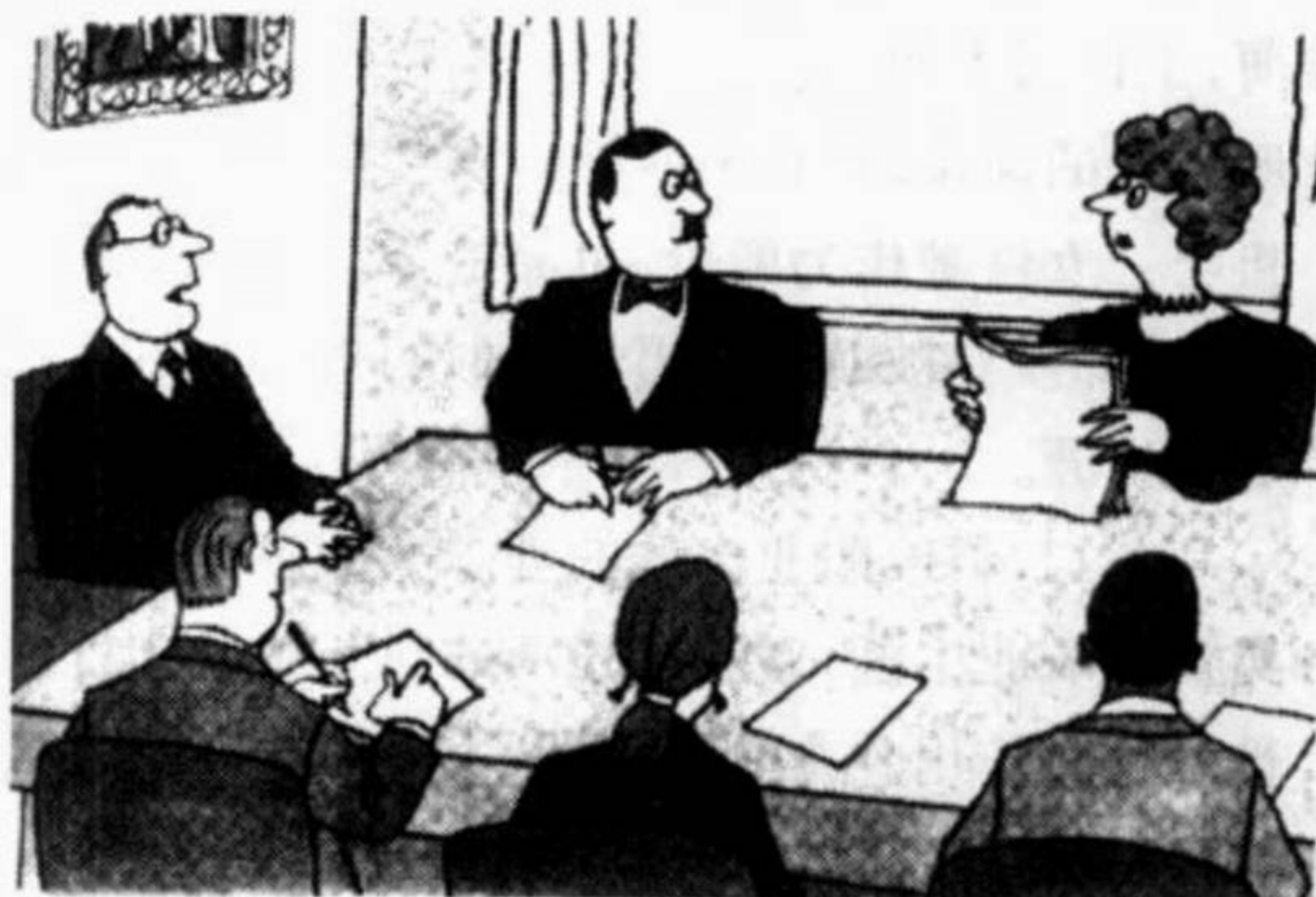
是一种虚饰的外表，背后充斥着各种全无中心的群体和亚群体，持续不断地与世界各地同样零散的工作单元相互接触。(Reich 1991)

大企业越来越不是一家大型企业，而更像是一个“企业网络”，是将较小的公司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核心组织。以 IBM 为例，过去它总是谨慎提防，属于自足程度最高的大企业之一，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融入了几十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以及 80 多家总部设在外国的公司，共同开展战略筹划，应对生产问题。

有些企业还保持着明显的科层特征，并常常以最初创建时所在的那个国家为中心。然而，绝大多数企业已经不再有什么明确的所在地了。老式的跨国企业往往主要从其国家总部为中心来展开工作，从那里控制其海外各生产工厂和子公司。而现在，随着空间和时间的转型（参看第五章第五节第一至三小节的讨论），位于世界任何地区的群体都有能力通过电信和电脑与其他群体合力工作。各个国家还在试图影响信息、资源和货币等跨越其边界的流动。但现代传播技术使得这种努力就算不是无法实现，也是越来越困难了。随着电子讯号以光速移动，知识和资金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输。

与此类似，跨国公司的产品也具有国际特性。如何判断一样东西是不是属于“英国制造”或其它哪一个国家制造的呢？再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答案了。

在第二章第三节第一小节，我们讨论了芭比娃娃这个完全美国风格产品的例子。



“这份报告很好，芭芭拉。不过，因为男女各有各的语言，我恐怕完全不明白它在说什么。”

芭比娃娃的包装上说它系“中国制造”，但正如该章所言，它的躯干和衣饰的产地遍及全球，从中东到远东，最后才在美国被卖出去，或再一次被运往别的地方销售。

七 女性与企业

直到二三十年前，组织研究一直不太关注性别问题。无论是韦伯关于科层制的理论，还是随后这些年对于韦伯理论众多有影响的回应，都是出自男性的手笔，并且都假设了男性位于中心的同一种组织模型。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兴起，引发了对社会中所有主要制度的性别关系的研究，其中也包括组织和科层制。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不仅关注组织中性别角色的不平衡，也探索现代组织本身是如何以一套特定的社会性别化方式发展起来的。

女性主义者认为，现代组织和科层职业生涯的出现有赖于某种特定的性别形态。她们指出了两种使性别嵌入现代组织结构的方式。其一，是以社会性别化的职业隔离为特征的科层制。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逐渐被隔离在某些特定的职业范畴，报酬微

薄,工作属于例行常规。这些岗位附属于男性所占据的岗位,并且不能够为女性提供晋升的机会。女性被作为廉价、可靠的劳动力资源来使用,却没有被赋予与男性相似的机会去打造职业生涯。

其二,科层职业生涯的理念实际上是一种男性的职业生涯,女性所扮演的只是一种关键性的辅助作用。在工作场所,女性承担的工作属于例行常规,比如职员、秘书和办公室主管,从而让男人解放出来,发展他们的事业。正是因为女性辅助人员承担了大部分繁杂事务,男性才能够专心于自己获得提升或搞定一份大合同。而在家庭领域,女性也通过照顾家庭、孩子和男人的日常起居而支持了科层职业生涯。女性通过使男性职员有可能长时间的工作、出差,专注于工作而不必操心个人和家庭问题,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早期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由于这两个趋势的作用,现代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块由男性主导的保留地。在那里,女性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失去了发展职业生涯的机会,并且由于性骚扰和性别歧视而成为基于自身性别的受害者。虽然早期女性主义者的分析大多集中在一系列共同的主题上,像报酬的不平等、歧视和男性揽权,但是对于怎样才能最好地争取男女的平等,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两本关于女性和组织的顶尖女性主义研究著作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歧。

罗莎贝斯·摩斯·坎特的《企业男女》是自由主义视角的重要研究,是最早研究科层制环境中的女性的著作之一(Kanter 1977)。坎特调查了女性在企业中的职位,分析了阻止她们获得权力的方式。她重点研究了“男性同性社交”(male homosociability)。男性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将权力保持在一个小圈子内,只允许同一个小圈子内的成员接近权力。这就有效地剥夺了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晋升机会,切断了对于提升而言至关重要的社会网络和个人

人关系。

虽然坎特对现代企业中的这些性别不平衡持批评态度,但她对未来并不完全悲观。在她眼里,问题是权力,而非性别。女性之所以处在劣势,并非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在组织中没有掌握充分的权力。根据坎特的观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承担有权力的角色,这种不平衡就会被打破。因为她主要关注机会平等,要确保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当的职位,所以她的分析是一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路。

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凯茜·弗格森在《女性主义诉科层制案》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思路(Ferguson 1984)。弗格森认为,即使把更多的女性提升到有权力的职位上,也并不能解决组织中的性别不平衡。在弗格森看来,现代组织在骨子里就被打上了男性价值观和支配方式的印记。在这种结构中,她认为女性总是会被发落到从属性的角色。对女性而言,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创建她们自己的组织,其原则非常不同于由男性创立、为男性创立的那些原则。她提出,女性有能力以比男性更民主、更富参与性和合作精神的方式组织起来,而男性则更倾向于威权独断的策略、僵化的程序和缺乏敏感的管理风格。

有关组织内部的冲突和权力的一些争论是组织社会学的一项重要议题。

在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一小节,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这项议题的一个方面,即工作场所中的性别不平等。

第二节 超越科层制?

科层机构在西方仍然大量存在,而一些社会学家,比如我们在本章开头讨论其社会“麦当劳化”命题的瑞泽尔,认为科层制仍然是西方社会中的组织的标志。不过,另一些学者则

认为,尽管在一段时期里,在福柯理论中得到鲜明反映的韦伯的科层制模型依然有效,但现在已经开始显得过时了。众多的组织正在努力减弱而不是加强自身的等级色彩。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伯恩斯和斯托克就得出结论,认为传统的科层制结构有可能妨害前沿产业的革新和创造性(参看本章第一节第一小节)。在今天的电子经济中,没有几个人会对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提出异议。许多组织正在摆脱严格的纵向命令结构,转向“横向”协作模式,以求增加灵活性,更能对波动的市场做出反应。本节当中,我们将考察这些转变背后的一些主要动力,其中包括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且考察在这种变迁环境下,晚期现代的组织是如何再创自身的。

16.2.1 组织变迁:日本模式

今天可以看到的全世界众多组织所经历的变化,有许多都是日本一些大型制造企业开风气之先,比如日产^①和松下。虽然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遭遇困境,但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它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这种经济成功常常被归结为日本大企业的一些特性,与西方大多数工商企业非常不同。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近些年来,日本企业的许多组织特性已经被其他国家所吸收和调适。

日本企业的组织与后福特主义的趋向颇有重要的重叠之处,参看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二小节的讨论。

日本公司在下述几个方面都与韦伯所提到的科层制的特点不同:

1 由下而上的决策 日本大企业并没有形成如韦伯所描述的那种权威金字塔,即每一

层次只对其上边的一个层次负责。相反,管理者在考虑政策的时候,会请教处于组织下层的工人,甚至高层主管也会定期与他们见面。

- 2 淡化专业化 在日本的组织中,雇员的专业区分程度要大大低于他们的西方同行。进入公司管理培训岗位的年轻员工,第一年时间一般是要用来学习公司的不同部门是如何运转的。然后,他们将在地方分支机构和全国总部的许多职位之间进行轮换,以便获得各方面的公司业务的经验。到作为实习生开始工作的 30 年后,他们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精通所有重要的工作。
- 3 工作保障 日本的大企业对它们雇用的人承诺终生雇用。雇员保证会得到一份工作。薪俸和职权所对应的都是资历,即工人在公司中工作了多少年,人们不会为了提升而你争我夺。
- 4 群体取向的生产 在企业的各个层次上,人们都参与小的合作“团队”,或者说工作群体。评价的是群体而非个体成员的绩效。与西方同行不同,日本公司的“组织一览表”,即权威系统的图示,标示的只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位置。
- 5 工作和个人生活相融合 在韦伯关于科层制的描述中,人们在组织中的工作和他们在外面的活动之间存在明确的界线。这对大多数西方企业来说确实如此,在那里公司与雇员之间只是一种经济关系。相反,日本的企业满足了雇员各方面需要中的许多方面,以期获得对于公司的高度忠诚作为回报。工人从公司那里得到的物质福利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比如说,根据罗纳·多尔的研究(Dore 1980),东芝电子公司为所有未婚工人和将近一半已婚的男性雇员提供住房。而孩子教育费以及婚丧嫁

^① 此处的“Nissan”在指日产汽车的同名品牌时,更多译为“尼桑”。

娶费也可以从公司贷款。

针对设在英国和美国但由日本人经营的工厂的研究表明,“由下而上的”决策在日本以外的地方也行得通。工人们对这些工厂所提供的更大程度的参与似乎反应热烈(White and Trevor 1983)。因此,似乎有理由得出结论,日本模式确实对韦伯式的科层制观念有所教益。那些非常类似于韦伯理念型的组织,其效率可能远不如它们在理论上的表现,因为它们不允许下级雇员对其工作任务培养出一种参与意识、自主意识。

直到最近,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工商研究学者还把日本企业看成是英美公司应当效仿的榜样(Hutton 1995)。然而,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衰退,导致许多专家对这种假设提出了质疑。许多日本公司传统上对其职员持有并认同一种义务,这固然有可能促进忠诚,但也被批评为缺乏灵活性和竞争力。我们已经看到,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公司中的骨干工人能够指望在同一家公司中工作一辈子,开除或裁员是很罕见的,而求得晋升的雄心也不是特别受到鼓励。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整个国家一直面临着种种经济问题,到现在才有所缓和,但也意味着日本工商业的未来左右为难:一端是传统主义,致力于维护旧有体制;另一端则是彻底的资本主义,支持以更具竞争性、个体主义性的工商模式为方向的改革(Freedman 2001)。

16.2.2 管理的转型

上面描述的“日本模式”中的大部分要素都可以归结为管理问题。尽管说不可能忽视日本人在生产层面上发展出来的一些特殊做法,但日本思路的主体内容还是在于关注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确保各级员工都对公司有一种个人化的依恋。强调团队工作,贯彻营造共识的思路,扶持基础广泛的雇员参与,这些

做法与更具等级性和威权性的西方传统管理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许多西方组织开始引进新的管理技术。有两股流行的管理理论分支,也就是人力资源管理思路和企业文化思路,表明日本模式已经进入了西方的视界。人力资源管理(HRM)是一种管理风格。它把一个公司的劳动力看作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雇员对公司及其产品不是完全的忠诚,公司就不可能成为其领域的领袖。为了激发起雇员的热情与认同,整个组织文化必须重组,以使工人感到他们对工作场所和工作过程会有所贡献。根据人力资源管理的观点,人力资源问题不应该是专职“人事官员”的专属领域,而应当成为所有公司管理成员的首要考虑。

人力资源管理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公司内部的雇员与雇主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重大冲突,因此也基本不需要工会来代表员工。相反,人力资源管理把公司刻画成一个整合的整体,唯一的对立存在于与其竞争的公司之间。公司不是通过与工会之间的谈判来和自己的员工打交道,而是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通过提供因人而异的合同和与绩效挂钩的薪俸,将其员工队伍予以个体化处理。不过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员工固然会遵从工作中人力资源管理的要求,但许多人在私下里却对支撑这种思路的企业和谐一体之假定颇感怀疑(Thompson and Findlay 1999)。

第二种管理趋势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与人力资源管理也是紧密相关的。为了增进对于公司的忠诚,并且对公司的工作感到自豪,公司的管理人员与雇员一起工作来营建一种组织文化,包括公司本身所独有的仪式、事件或传统。设计这些文化活动的宗旨,就是要把公司的全体成员,从资历最深的管理人员,到初来乍到的新进员工,都维系在一起,使他们彼此可以齐心协力,加强群体团结。公司野餐或“轻松一日”(fun days),“便装星期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的计算机化

对于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企业来说，在计算机和传播设备等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可谓必不可少。金融领域的公司非常倚赖计算机来从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制造业厂商依靠传播设备来协调全球生产过程，而消费者服务企业的客户们则要求全天 24 小时都能通过电话或互联网处理自己的账户。简言之，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工商业的基本设施。

这些技术中有些已经使劳动者的生活变得轻松了些，尽管如此，人们仍有理由担心，新型的高科技工作场所会侵蚀劳动者的权力与权利。首先，工商业对于信息技术的倚赖有可能破坏劳动者之间的联合。今天对于雇员的高科技技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那些没学会多少此类技能就已经结束学业或不再进行继续教育的人，会发现所能胜任的职位非常有限。在公司里，雇员之间越来越分化出两个“阶级”：一个是具有高科技技能的特权阶级，另一个是被贬到低级工作的阶级。但是，当雇员与资方就工资、工时、福利之类的问题进行谈判时，雇员团结一体是获得让步的关键。而在工作场所的纠纷中，具有高科技技能的劳动者是与技能较低的雇员站在一边，还是更有可能支持资方？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劳动者权利和福利在未来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新型传播技术使得多国企业的各个分支办事处和生产设施能够彼此沟通方便，这也部分促成了比例越来越高的制成品在跨国基础上生产出来，这种情形有可能使个体劳动者更容易被替换。克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就举了下面这个全球生产过程的例子：

“Precision”牌冰球运动装备的设计是在瑞典，融资是在加拿大，装配是在克利夫兰^①和丹麦，以便分别在北美和欧洲分销。而用来装配的合金的分子结构是在特拉华州研制并获得专利，^②在日本制造的。广告造势的策划是在英国，镜头在加拿大拍，在英国配的音，在纽约编辑合成。(Reich 1991)

尽管在生产过程的许多方面都需要熟悉高科技、拥有高技能的劳动者来执行，但当劳方与资方对峙谈判的时候，这些技能可能不再会赋予这些劳动者像往昔的熟练工匠曾经具有的那种讨价还价力量。这是因为，制造过程现在已经分解为许多细小要素，而这些要素每一个都分别在不同的生产厂家执行，任何一个劳动者所必须具备的技能数量都远远少于过去的情形。这就使公司更容易替换掉劳动者中的刺儿头。而传播技术也因此据说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哈里·布雷弗曼所说的“劳动的去技能化”过程(Braverman 1974)。

再次，随着信息技术对于工商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工作场所的监控很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雇主始终密切注视着自己的雇员，监督其表现，力求提高效率，检查他们，以确保没有偷奸耍滑。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份额是由计算机来完成的，管理者核查其雇员行为的能力也有所增长。电脑化的绩效评估，审查雇员电邮，增进资方对于雇员个人信息的了解，这些奥威尔式的图景会随着信息技术在工作场所中的角色不断扩张而愈发成为可能。

① 克利夫兰(Cleveland)是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港市，隔伊利湖与加拿大南北相望。

② 特拉华州是美国面积倒数第二的小州，但位于华盛顿、纽约、费城等大城市中间地带的该州化学工业极其发达，其北部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素称世界化工之都，为杜邦公司等大化工企业总部所在地。

问题：

1 你是认为切实存在这些危险，还是认为信息技术对于组织所带来的后果本质上有利于雇员？

2 如果你认为可以采取对抗这些趋势，那么有哪些措施呢？



在诸如此类的现代开放式设计的办公室里，雇主们仍然可以严密地监控员工。

五” (casual Fridays, 即雇员可以“脱下正装”的日子)，以及由公司赞助的社区服务计划，这些都是营建企业文化的技术范例。

近些年来，许多西方公司已经基于上述管理原则来创建。美国的土星 (Saturn) 汽车公司等不再基于传统的科层模式来打造自己，而是根据这些新的管理原则加以组织。比如说，在土星公司，为了更好地了解整个公司的

运营情况，所有层次的雇员都有机会与公司其他部门的人轮替。车间工人会与营销小组一起工作，分享关于如何制造汽车的见解。销售人员在服务部门之间轮换，以进一步了解可能与潜在买主有关的常见维修问题。来自于销售与车间的代表也参加设计团队，以商讨管理层在早期的模具阶段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注重友好并且懂行的客户服务的企业文化凝聚了



这是一次商业会谈吗？

公司雇员,增进了雇员对于公司的自豪感。

16.2.3 网络研究

一 社会网络

常言道,“重要的不是你认识什么,而是你认识谁。”这句老话体现出“交际广泛”的价值所在。社会学家把这种交际称为网络,也就是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与其他人或群体相联结的所有直接和间接交际。因此,你的人际网络既包括你直接认识的人(比如你的朋友),也包括你间接认识的人(比如你朋友的朋友)。人际网络当中所包含的人常常属于相似的种族、阶级、族裔或其他类型的社会背景,虽说也会有例外情况。比如说,如果你加入了一份电邮列表(online mailing list),那么你就成为列表中所有人组成的一个网络的一部分,

而这些人或许来自不同的种族或族群背景,有着不同的性别。由于群体和组织也可以网络化,比如都是某一所大学的校友,属于这类群体就能大大拓展你的活动范围和影响领域。

社会群体是获得网络的重要来源,但并不是所有的网络都是社会群体。许多网络缺乏共享期待,也没有共同的认同感,而这些都是社会群体的标志。比如说,你不太可能与电邮列表上的参加者有共享的认同感,对于大多数的办公室同事,你也不太可能知道他们的邻居是谁,但这些人也会构成你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

网络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帮助。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揭示道,弱关系(weak ties)也可以具备巨大的力量,在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尤其如此。格拉诺维特指出,属于上层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雇员,很可能会从远房亲戚或泛泛之交之

类的关系那里听闻新的工作机会。这类弱关系可能会大有裨益,因为亲戚或熟人的交际往往与关系更密切的朋友的交际非常不同,后者的社会交往很可能与某人自己的交往圈差不多。格拉诺维特又提出,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里,弱关系并不一定会联结到其他网络,因此不会真的拓展机会(Marsden and Lin 1982; Wellman et al. 1988; Knoke 1990)。从大学毕业后,你可能要靠一个不错的学位和强劲的简历去找工作。但如果你的大学朋友恰好和你求职的那家组织的面试官是同学,那就有利得多了。

绝大多数人都依赖各自的私人网络以获取便利,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同等机会接触到强有力的网络。比如说,有些社会学家提出,女性的商界网络和政界网络都要比男性弱,因此女性在这些领域的权力就被削弱了(Brass 1985)。英国最著名的几所公学,比如伊顿(Eaton)公学和哈罗(Harrow)公学,都只接收男童就读,因此也就使女性无法获得学生们在其求学期间形成的强有力的交际圈。整体而言,社会学家已经发现,女性在找工作的时候,她们的就业市场网络所包含的关系要比男性的网络少,这就意味着女性认识的人较少,分布的领域也较少(Marsden 1987; Moore 1990)。贫乏的网络往往会把女性分流到具有女性特色的工作中去,而这些职位通常薪俸较少,晋升机会也较小(Ross and Reskin 1992; Drentea 1998)。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升迁到较为高层的职位,所形成的网络也会孕育进一步的晋升。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更容易被聘用或提升到已有较多女性的那些工作层级(Cohen et al. 1998)。

网络所提供的还不只是经济上的好处。你可能依赖你的网络进行各式各样的交往,从接触你所属选区的国会议员,到订一个约会。与此类似,当你去另一个国家旅行时,你的朋友、学校或宗教组织都有可能引导你去找他们的海外关系,后者又会帮助你从容应对陌生的环

境。当你从学校毕业或继续求学,你的校友群体也能进一步拓展你的社会支持网络。

二 网络与信息技术

我们已经看到,网络是非常古老的人类实践形式。但在社会学家卡斯特看来,由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所推定的网络,是确定我们这个时代面貌的组织结构。网络固有的灵活性和调适性使它们相对于较老的组织类型具有莫大的优势。在过去,韦伯所描述的那种理性的、等级性的科层组织,在运用各种资源满足组织的目标的时候,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与此相反,网络就不能像科层组织那样,协调各项职能,集中关注特定目标,或实现给定的任务。但在卡斯特看来,计算机应用与技术在20世纪最后25年所取得的进展创造了他所称的“互联网星系”(Castells 2001),改变了这一切。互联网的问世意味着,数据现在可以在全世界几乎任何地方得到即时处理,根本不需要有关方面在物理上相近。其结果,新技术的引进使许多公司有可能“重组”其组织结构,逐渐去中心化,巩固企业小型化、灵活化的趋势。(这些变化也导致了在家办公的兴起,参见第十八章第三节第三小节)

在传统上,识别组织的边界一向非常容易。组织一般都定位于明确的物理空间,像一座办公楼,一套房子,或者像一所医院或大学那样,在于整座校园。一个组织旨在完成的使命或任务一般也是非常清楚的。例如,科层制的重要特征就是遵循一系列明确的责任以及履行这些责任的程序。韦伯眼中的科层组织,就是组织是一种自足的单位,只在有限和固定的点上与外部单位相联结。

我们已经看到,组织的物理边界是如何被超越国家和时区的新型信息技术的能力所破坏的。但是,同样的过程也正在影响着组织的做事方式以及协调方式。许多组织不再像从前那样作为独立的单位来运行。越来越多的组织



贝纳通的全球运作乃是基于网络原则。

发现,如果融入其他组织和公司的复杂关系网络,它们会运行得更加有效。在组织与外部群体之间不再存在明确的界限。全球化、信息技术以及职业模式方面的发展趋势意味着,组织边界要比它们从前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变。

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提出(Castells 1996),“网络企业”是最适应全球性信息经济的组织形式。他的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厂商,如果不属于某一个网络,要想生存下去是越来越不可能了。促成网络化过程发生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全世界的组织都可以相互定位,方便接触,并且通过电子媒介协调协同行动。卡斯特举了组织网络化的几个例子,并且强调它们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然而,根据卡斯特的观点,它们都代表着“一个基本过程的不同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理性的科层制的解体。

尽管作为网络的组织有很多实例,但我们在此只举一个鲜活的例子。社会学家斯图尔特·克莱格考察了服装销售商贝纳通(Benet-

ton)。初看起来,你可能并不觉得,在世界各地拥有 5000 家专卖店的贝纳通,与其他任何全球时装品牌有特别的不同。但事实上,贝纳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网络组织,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才可能出现。世界各地的贝纳通专卖店都属于个人管理的特许经营店,这些人并非直接受雇于贝纳通,而是属于负责制造和销售贝纳通产品的一个较大体系。

整个运作都是以一种网络原则为基础的。位于意大利的贝纳通企业总部根据全球特许店的需求,把产品定单转包给许多制造商。网络的不同部分通过计算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只需按一下按键,莫斯科的专卖店就可以把它所需要的货物反馈到意大利总部。其他的国际时装零售商向全世界所有的经营店介绍同样的产品系列。而贝纳通的结构则使它能够为各个特许店提供个性化定单。贝纳通不是与供应商签署定期合同,而是对市场做出反应,在需要时调动各合作伙伴的松散网络(Clegg 1990)。

信息技术与网络组织相结合,会使我们彻

底走出韦伯对于科层制未来的悲观预见吗?一些人认为会是如此,但是我们应该对此持谨慎的态度。从内部来说,科层制要比韦伯所认为的更加易变,并且日益受到来自不太强调等级的其他组织形式的挑战。但是,正如瑞泽尔在其社会麦当劳化的命题中所揭示的那样,科层组织可能不会像恐龙那样全部消失。在不久的将来,在组织的大规模、非人格化以及等级制与其对立趋势之间,可能会出现一种持续的双向运动。

第三节 组织和网络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16.3.1 社会资本:联结的纽带

人们参加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培养交际,增加影响。投入某一组织的时间与精力能够换回令人满意的收获。比如说,属于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父母,相比那些不在会中的父母,会更有可能影响学校的政策。会员们知道该找谁说话,该说什么话,该如何对学校官员施加压力。

社会学家把这些组织成员资格的收益称为社会资本,也就是使人们能够实现其目标、扩展其影响的那些社会知识和交际。尽管社会资本的观念可以回溯到古代,但这种表达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进入主流学术讨论。在欧洲,这个概念尤其让人想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第九章第四节第五小节讨论了他对于这个术语的用法)。最近十年“社会资本”这个术语的应用骤然兴盛,而其首创者,便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颇具影响的著作(Putnam 1995, 2000)。

社会资本包括了有用的社会网络,一种相

互之间的义务感和信任感,对于主宰实际行为的规范的理解,以及整体而言,促成人们有效作为的其他社会资源。比如说,大学生们常常积极参与学生会或自办报刊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学习社会技能,营造交际圈子,在毕业的时候就会有所获益。比如说,他们会与教师或管理人员往来互动,在找工作或申请攻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些人就会支持自己。

社会资本上的差异反映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例如,总的说来,男性的资本比女性多,白人比非白人多,富人比穷人多。就读于一所公学,比如英国的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①从这样的教育经历而得来的社会资本,正是许多父母送自己孩子上那些学校的一点重要原因。但是,正如英国这些学校的状况一样,学校是单一性别的,是付费的。资本仅限于男性富家子弟。能够就读这些学校,就使得学生接触到往后的人生用得上的强有力的社交、政界和商界资源,并进而有助于他们拓展自身的财富与势力。在国与国之间也能够发现社会资本方面的差异。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World Bank 2001),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其中的工商人士能够有效地营建“信任网络”,以培育健康的经济,这样的国家就更有可能取得经济增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东亚经济体取得了迅速的增长,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增长就是由强劲的工商网络所推动的。

普特南对美国的社会资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区分了两类社会资本:一是外向联结式(bridging)社会资本,是目光向外、立场包容的;二是内向粘合式(bonding)社会资本,是目光向内、立场排斥的。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使人们跨越社会分裂而统合起来。像把黑人与白人统一到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之中的民权运动,像跨宗教联合团体,这样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统合人们的能力。而内向粘合式

^① 英国的这种地位尊贵的所谓公学,其实就等于其他国家中的私立学校或俗称贵族学校。详参第十七章第二节第二小节。

社会资本则增进了排斥性的认同和同质性的群体,可见于族群性的联谊组织、以属于同一教会为基础的女性读经班,以及蔚为时尚的乡间俱乐部(Putnam 2000)。

那些积极主动地归属组织的人,更有可能觉得“有关系”:他们觉得有所寄托,有能力“发挥些影响”。从大范围的社会立场来看,社会资本,尤其是外向联结式社会资本,使人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广泛的社群,并且社群中包容了与自己不同的人。当社会资本强劲时,民主制度也就兴盛。事实上,跨国调查的证据表明,在普特南的研究所针对的美国,其公民参与程度在全世界尚属最高之列(Putnam 1993,2000)。但是,同样有确凿证据表明,在过去的30年左右,政治参与,社团成员资格,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参与与公民参与,这些将美国人彼此维系的纽带已经大大削弱。那么,民主制度是否正因此而遭受侵蚀?

16.3.2 独自打保龄球:社会资本衰减的例证?

普特南指出,参与组织给许多美国人提供了众多社会资本,比如以互利为目的而与他人展开协作的能力,归属较大社会的感受。这种社会资本是切实有效的公民资格的基本要义。不过,普特南认为,这些社会纽带在美国社会正处于迅速削弱之中(参看表16.1)。这种衰减有一个虽然微妙但却意义重大的迹象(Putnam 1995,2000),那就是美国的保龄球道上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人现在是独自打保龄球。普特南指出,结伙来打保龄球的人每次消费的啤酒和比萨,要比独自来打保龄球的人多两倍。在他看来,这个事实意味着,前一种人花在社交上的时间更多,甚至是在讨论公民话题。根据普特南的说法,独自打保龄球正是当今社群失落的征象:

表 16.1 政治参与和社群参与在 20 年间的衰减,1973/74 年度至 1993/94 年度

活动	衰减百分比
担任某会社或组织的官职	42
为某个政党工作	42
担任某个地方组织的委员会成员	39
参加有关市镇事务或学校事务的公共会议	35
参加政治集会或演讲	34
发表演讲	24
给众议员或参议员写信	23
联署请愿书	22
参加某个“改善政府管理”群体	19
担任或竞选某个政治官职	16
给报纸写信	14
给杂志或报纸写文章	10
以上 12 项活动中至少参加一项	25

资料来源:Putnam 2000,页 45

有关当代美国的社会不参与趋势,我所发现的最奇特但又令人困惑的证据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是独自打保龄球,而结伴去打保龄球的人在过去十年左右数量遽减。从1980年到1993年,美国打保龄球的人总数增加了10%,但结伴去打的人数却下降了40%。(为了避免这一点被视为琐屑至极的事例,我必须指出,1993年,有将近8000万的美国人至少打了一次保龄球,比参加1994年国会选举投票的选民还多了三分之一,与自称定期上教堂的人数大致相当……)

在20世纪头三分之二的的时间里,一股强大的潮流推动美国人更加深切地参与所属社群的生活。但从近几十年来看,潮流已然逆转,并且是静悄悄的,没有警示的,我们被变幻莫测的退潮所裹挟。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起初的不经意之间,我们已经彼此分离,并与我们所属的社群相分离。

普特南指出,不仅结伴去打保龄球的人数下降,而且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类组织成员资格的下降幅度多达25%。在美国,家长教师联谊会、妇女俱乐部全国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妇女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和红十字会(Red Cross)等团体,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都经历了成员数量的下降,大致下降了50%。根据普特南的报告,在1974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定期自愿奉献自己的时间参与此类团体,而在今天,这个比例将近为五分之一。像狮子俱乐部和共济会这样的社会组织,^①也经历了成员数的下降。伴随着这些组织的衰落,在美国,自述与自己邻居有交往或觉得大多数人都可以信赖的人数也在下降。

组织成员数量、邻里交往和整体上的信任等方面的这些削弱趋势,已经带来了与此相应的民主参与方面的削弱趋势。美国的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此后出现显著下降(尽管在2004年小布什和约翰·克里对决这一场高度两极分化的总统选举中,投票率又有所上升)。与此类似,教育或公民事务等方面的公共会议的出席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

① 狮子俱乐部(Lions Club),全称为国际狮子俱乐部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ons Clubs),最早是191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成立的平民福利俱乐部。旨在全世界人民中培养“宽宏尊重”的精神,促进好政府、好公民和积极关注公民活动、社会事务、工商实业、道德风纪等方面。议题广泛,包容性强,会员遍布约150个国家。

共济会(Mason),全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共济会宪章》(初版于1723年)声称其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为该隐的后人,通晓天地自然以及宇宙的奥秘。通过对《创世记》的借用和独特解读,特别是石匠们建造所罗门神殿、巴别塔的传说,我们看到了一批散居世界各地的石匠,通晓宇宙天文、人体解剖学、几何学,见面有暗号,互称兄弟,同舟共济。近代共济会于1717年创立于英国。初期属于秘密结社,允许持有各种宗教信仰的没有残疾的成年男子加入。近代共济会借鉴柏拉图《理想国》中对造物主的阐述,认为神是一位理性的工匠,而宇宙是神这一宇宙的伟大建筑者的创造物。如果人能够以理性为准绳,以道德为工具,不断修正自身精神缺陷,那么最终人能凭自己的努力完善自身,也就是完成“内在神殿”的建造,成为完美的“石工导师”。会员建设神殿的过程象征着人追求理性和自身完善的过程。通过奉行理神论的理想,共济会在不到50年时间里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达芬奇、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加里波第等皆为会员。共济会员几乎参与18世纪和19世纪所有重大事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美国独立。签署《独立宣言》的56人中有53名会员。共济会现约有600万名会员,其中英国约100万、美国约400万。会员来自社会各行业各阶层。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学术有广泛影响。现代共济会除内部各级别的接头暗语仍保密外,其余活动基本公开。共济会今天在美国囊括政经学界众多名人,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举足轻重。

呈锐减之势。今天的美国人中有四分之三会告诉民调人员,他们要么“从不”信任政府,要么只是“有时候”信任政府(Putnam 1995)。

普特南提出,即使是那些成员数呈增长态势的组织,比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有3300万会员),统计数据也带有欺骗性:这些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只是缴缴年费,收收简报。很少有会员会积极参与,因此也不能培养起被普特南视为民主制度之重要支撑的社会资本。当今最流行的许多组织,比如瘦身计划群体或减肥监督小组,注重的是个人的成长与健康,而不是造福整个社会的集体目标。

造成这些衰落的原因无疑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妇女在传统上是志愿组织的积极分子,但现在相比往日更有可能自己有一份工作要做。另外,人们对于政府越来越有一种幻灭感,不太可能认为自己的一票会有什么作用。不仅如此,人们现在花在上下班通勤上的时间更长,把原本可以用来从事公民活动的时间和精力都耗掉了。但是,按照普特南的看法,公民参与的衰落的首要原因很简单:电视。在美国,人们独自在家看电视的大把时间已经取代了对于社群的社会参与。

那么,欧洲是否也经受着同样的社会资本衰减呢?大卫·哈尔彭在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时,曾经考察了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Halpern 2000),然后提出,如果认为所有国家都遵循美国的社会资本衰减趋势,则是一种错误的假定。哈尔彭强调,社会资本方面的演变趋势在国与国之间颇有不同,以不同的指标测度,就会给出不同的图景。哈尔彭发现,整体而言,瑞典、荷兰和日本的社会资本水平保持稳定或趋于上升,而德国与法国的各项指标更显得涨跌互现。但不管怎么说,哈尔彭的结论是,英国的社会资本和澳大利亚与美国一样,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显著衰减。

英国的社会资本的衰减趋势有多种多样的证据。最近几十年来,英国几个重要协会的

成员数量都显著减少。具体来说,各大工会,各传统妇女组织,比如妇女研究所(Women's Institute),各教会,各青年组织,以及各服务组织,也都经历了成员数量的下降。还有证据表明,政治参与方面也呈稳定下降趋势。大选的投票率从最高值1951年的82%,下降到2001年的仅仅58%(2005年略有回升)。在2004年的欧盟选举中,合格选民中仅有46%投了票。正如哈尔彭所注意到的那样(Halpern 2005),与过去相比,英国的民众捐给慈善事业的钱也少了。把自己邻居说成是“一起做事、努力互助的人”的人数比例也从1984年的43%下降到1996年的区区28%。

以欧洲整体观之,社会资本之衰减的证据喜忧参半,远比美国来得复杂。普特南作为最具影响的社会资本理论家,并没有满怀希望。他写道:“一些证据表明,欧洲将要重蹈美国的模式,无非迟个几十年。欧洲也许已经得了社会资本‘感冒’,但还没有充分发展到美国式的‘肺炎’。”

小 结

人们所属的组织与网络对于他们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在本章已经看到,传统风格的群体似乎已经丧失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根基。比如说,今日的学生比起他们的父母,参与公民群体或组织甚至去投票的可能性更小,这种衰减趋势很可能标示着对于各自社群的担当(commitment)程度降低。有些社会学家担忧,这种状况预示着社会本身的衰微,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

正如我们所见,全球经济与信息技术正在重新界定群体生活的面貌,其方式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体会到。比如说,老一辈的劳动者很可能大半职业生涯都耗在相对较少、长久延续的科层组织中,而年轻一代的劳动者大有可能属于数量更多的网络化、“弹性化”的组织。今

天的许多群体联系是通过互联网或其他仍在随时发展的沟通形式缔结的。与这个地球上任何地方想法相似的人相接触将会越来越容易，这就在地理空间的角度上创造出散布全世界的群体，其成员或许永远不会以面对面的方式彼此相见。

那么，这些趋势将会如何影响社会关系的性质呢？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绝大多数

的人都是完全与就在身边的人互动的。工业革命促进了非人身化的大型科层机构的兴起，里面的人们即使相互认识，也只是点头之交。而在今天，信息革命再一次正在改变人类的互动。明日的群体与组织将能提供一种对于沟通和社会亲密关系的崭新认识——抑或进一步导致离群索居和社会距离。

本章要点

- 1 所有现代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科层制的性质。科层制的特征包括一套明确的权威等级；成文规则主导着职员（挣薪俸而全职工作的人）的行为；职员在组织内部的工作与其在组织外的生活相互分离。组织成员并不拥有他们用来工作的物质资源。韦伯认为，现代科层制是把大量人员组织在一起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确保了决策依照普遍标准执行。
- 2 非正式网络往往会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各个层次上发展。研究这些非正式纽带与研究韦伯所关注的更为正式的特性同样重要。
- 3 组织的物理环境强烈地影响着它们的社会特征。现代组织的建筑风格同监控紧密联系。监控这种手段乃是确保服从处在权威位置上的人。监控既是指对于人的活动的监管，也包括保存与他们有关的档案和记录。自我监控指的是人们由于假定正处在监控之下而限制自身的行为。
- 4 韦伯与米歇尔斯捕捉到了科层制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存在决策集中化的长期过程。另一方面，过去两百年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趋向民主的压力越来越大。两种趋势相互冲突，势均力敌。
- 5 现代组织已经发展成为社会性别化的机构。女性传统上被隔离在某些辅助性的职业类别，以支持男性更有能力发展其事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走上专业和管理岗位，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为了在顶层取得成功，女性不得不采用传统的男性管理风格。
- 6 近些年来，大型组织已经开始对自身进行重组，以使其变得不太科层化，更加具有灵活性。许多西方公司已经在许多方面采用了日本的管理体制：经理主管更多地与基层工人磋商；报酬和责任与资历相挂钩；绩效的评价针对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
- 7 有两种重要的全球组织形式，一是国际政府组织（IGOs），一是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两种形式的组织在当今世界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愈益加快，国际政府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可能成为关键的组织行动者。

- 8 现代经济被大企业所主导。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对某个行业起到发号施令般的影响,它就处在垄断位置。当一些公司发挥此类影响时,就出现了寡头垄断的局面。巨型企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商品消费,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后果。
- 9 近些年来,由于整个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或者说就是全球化,企业经历了深刻的转型。现代企业愈益成为由许多小公司维系起来的企业网络,而不是一家单一的大企业。
- 10 多国企业或跨国企业的运作跨越了许多国家的边界。其中最大的企业有着巨大的经济力量。世界经济体前百强中有一半并非国家,而是私有公司。
- 11 新型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组织工作的方式。现在有许多的工作可以完全通过电子形式来完成,这使组织可以跨越时空。组织的物理边界正在被新技术的能力所侵蚀。现在许多组织作为松散的网络开展工作,而不再是自足的独立单位。
- 12 网络构成了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广泛来源,包括在经商和从政时可能极其重要的一些交际。在英国,相比于男性,女性、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一般较少能够接触到最具影响的那些经济和政治网络。
- 13 社会资本指的是使人能够彼此协作以求互利并扩展影响的那些知识和交际。一些主要研究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提出,自197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呈衰减之势,他们担心,这个过程标示着对于公民参与的担当趋于衰落。

思考建议

1. 以科层方式处理问题有什么优势?
2. 为什么组织中的人如此频繁地背离正式程序?
3. 学校、医院以及监狱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4. 大型组织“在骨子里”打上了男性价值观的“印记”了吗?
5. 网络组织如何做到又无处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的?
6. 为什么在科层制与民主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复杂关系?

阅读指南

-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2003). 《现代性与大屠杀》
-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网络社会的兴起》
- Stuart Clegg, *Moder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tudi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Sage, 1990). 《现代组织:后现代社会的组织研究》

Paul Du Gay, *In Praise of Bureaucracy: Weber, Organization, Ethics* (London: Sage, 2000).《科层制之颂:韦伯、组织与伦理》

David Lyon,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电子眼:监控社会的兴起》

网络导航

组织社会学中心 (Center for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 CNRS, 巴黎)

<http://www.cso.edu>

激进主义组织理论电子杂志 (Electronic Journal of Radical Organization Theory), 包括在线过刊回溯

<http://www.mngt.waikato.ac.nz/research/ejrot/>

福柯网站 (Foucault site)

<http://www.qut.edu.au/edu/cpol/foucault/links.htm>

社会资本门户网站 (Social Capital Gateway)

<http://www.socialcapitalgateway.org/>

目录

第一节 教育的重要性	566
第二节 英国的教育	566
17.2.1 起源与发展	567
17.2.2 中等教育与政治	570
17.2.3 高等教育	576
17.2.4 从比较视角看英国教育	579
第三节 有关学校教育与不平等的理论	581
17.3.1 伊凡·伊利奇:隐性课程	582
17.3.2 巴希尔·伯恩斯坦:语言符码	583
17.3.3 皮埃尔·布迪厄:教育与文化再生产	584
17.3.4 学做工:保罗·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分析	585
17.3.5 有关教育的后现代思路	587
第四节 不平等与教育	588
17.4.1 性别与学业成绩	588
17.4.2 族群与教育	593
17.4.3 智商与教育	594
第五节 教育与新型传播技术	599
17.5.1 教室中的技术	599
17.5.2 网络大学的来临?	599



小结:教育的未来 602

本章要点 603

思考建议 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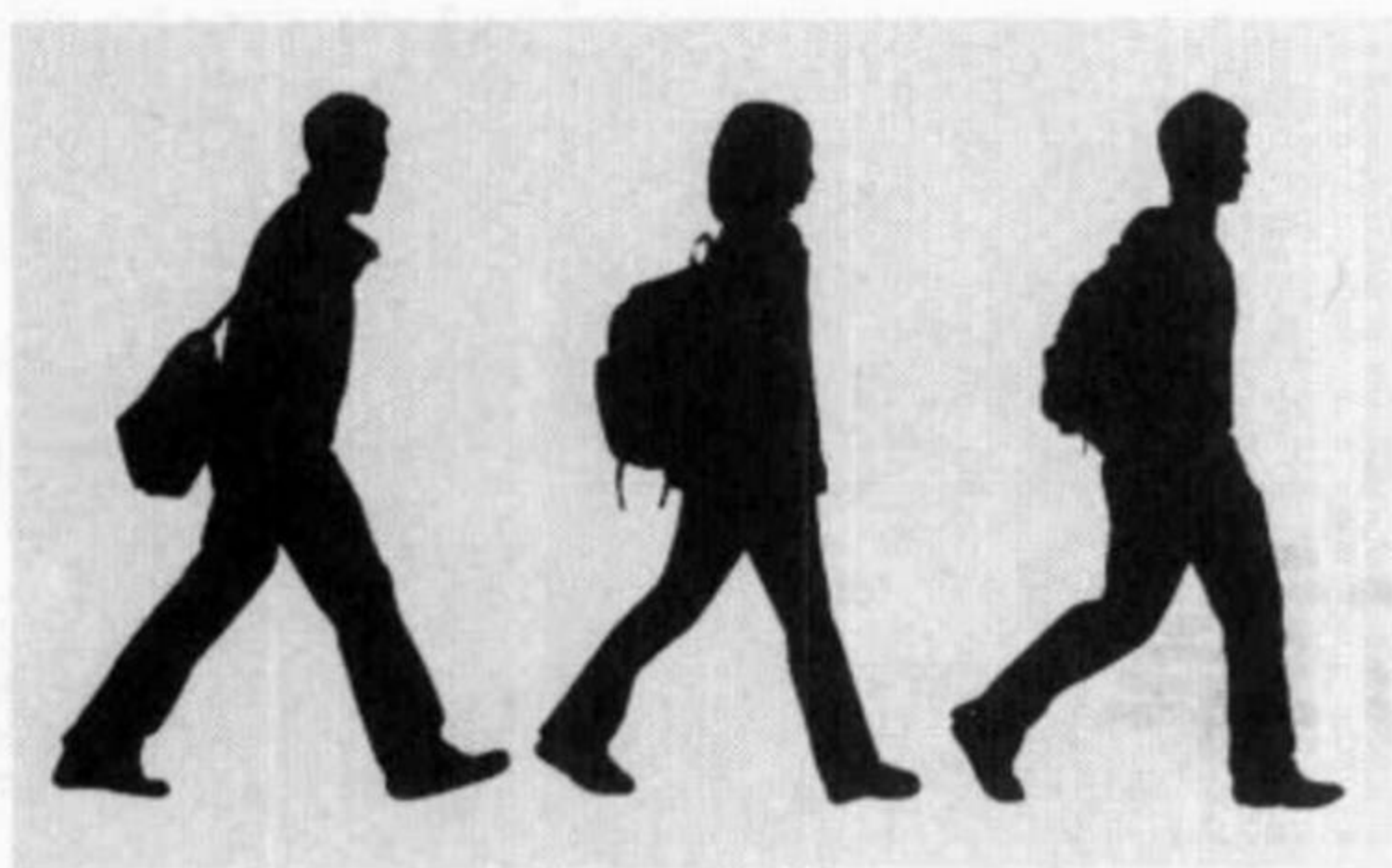
阅读指南 605

网络导航 605



第十七章

教 育



1998年,肖恩(Shaun)还有两年就小学毕业了。他学习勤奋,家境贫寒,出身白人工人阶级家庭,对自己的中学教育有明确的想法:“我想上韦斯特伯里(Westbury),因为我的伙伴马克(Mark)要去那儿,还有我女朋友……萨顿男校(Sutton's Boys)像是这附近最糟糕的一类学校,混混儿(tramps)才去那儿呢。”一年以后,肖恩就不那么确定了:“我可

能进不了韦斯特伯里,因为学校要看兄弟姐妹,要看你住得有多远。我没有一个兄弟姐妹上过那儿,住得也有点儿远,所以我可能得上候补名单(waiting list)。……我也可能上萨顿男校,因为我所有的伙伴都上那儿。”

肖恩所在学校的校长韦提克夫人(Mrs Whitticker)已经告诉他,指望上韦斯特伯里风险很大,因为他住在该校学区(catchment area)的边缘。肖恩和他母亲放弃了,退而申请萨顿男校。肖恩的母亲颇为失望,但她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想到他上萨顿,我就很伤心,可我们又能怎样?韦提克夫人不是都说了,我们没得选择么?”肖恩母子俩都担心萨顿男校的名声。按照肖恩的说法:“我妈和我都觉得标准可能太低了,因为他们把什么烂人都送到萨顿了。”



在上中学之前,肖恩母子围绕肖恩应该如何 在萨顿排除糟糕名声的影响,依然表现出色,进行了“大量严肃的讨论”。母亲莫拉(Maura)说:“我们有过一些真正的交心。他表面上满不在乎,但我看得出来,他非常担心。我都说过,如果你上这样一所学校,而不是别的地方,像韦斯特伯里什么的,那就只能加倍努力地学习,那些地方的孩子们都想着专心学习,可不会成天瞎逛。”肖恩也下了决心,不能“掉队”,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因为这是中学,这是你一辈子最要紧的一段在学校的日子,你得努力拿到自己那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肖恩始终面临着张力:是做操场上的粗犷棒小伙,还是当教室里的勤奋乖学生?在上中学之前,肖恩之所以接受萨顿男校,觉得这学校对自己来说还算过得去,主要理由就是自己一大帮朋友也上那儿。到了中学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肖恩说他和一些人的友情变了。他说他再不能和大卫做朋友了,这可是和他从小学一起上来的最好的朋友,原因是在以前:

每次大卫打架碰上麻烦,我总会在那儿帮他。我俩总是互相帮忙,要不就有什么人需要我们一起上。但现在在这儿,我不想再打架了。打架只能带来麻烦,所以我只想躲开……打架是那些不想学习、不想在学校里学好的小伙儿的事儿。我可不想那样。

肖恩在小学的时候就由于打架被停学了两次,在当地素有“不好惹”的名声。在他看来,自己如果想在萨顿男校混下去,维持这种名声是非常关键的。然而,为了在学习上表现出色,肖恩又刻意远离他的同龄玩伴:“其他小伙儿都在往纸上吐口水,搓成球扔老师,我只管自己坐着,就当没看见。”另外只有两个男孩“一直低着头,努力继续学习”,他们都属

于就当地男性工人阶级文化而言的“局外人”。一个是美国人,用肖恩的话来说,“聪明得要死”。另一个是葡萄牙人,他爸妈正积极活动给他转学。肖恩不停地向他的同龄玩伴们证明,自己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伙儿”,以避免被重新归类为“不合群的怪人”(geek)。

结果,在社区里,在操场上,肖恩就重新回到过去的自我,与他在教室里爱学习、不合群的表现截然不同。他重新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身份,一个“健壮粗犷”的“足球高手”,弥补了大多数时间里,他在教室中表现出的那种“不合群”。但这又使肖恩和他母亲发生了冲突,后者担心他和一帮坏家伙混在一起。在中学里,学业和合群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肖恩有时候真想回到童年:

越来越难做了,因为有些男孩儿,呃,就像我的几个朋友,呃,他们就说“哦,你可讨老师喜欢”,这就决定一切了。对吗?什么意思?我讨老师喜欢,就因为我喜欢学习,老师在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们在说话,我就叫你们这帮人闭嘴?他们会说“呃,那么你就还是讨老师的喜欢。”好吧,你要是不喜欢这样,那就走开,是不是?

肖恩的故事来自于1997年到2001年,与社会学家戴安娜·蕾伊所作的系列访谈。从中引出了许多话题,是我们在本章所要集中关注的。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还将有几处回头来谈肖恩。具体来说,肖恩对于从小学到中学的转变的阐述,提出了有关教育与阶级和社会性别之类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之间关联的话题(Reay 2002)。

本章我们首先提出一个宽泛的问题:“教育是为了什么?”然后再来考察英国的教育体制的起源和发展,并且思考晚近由教育所引发的政治论战,包括影响到肖恩的几项话题,比如父母对于中学的“择校”,学校的标准,如何

应对弱校。然后,我们来评点研究教育的几种主要思路,还要谈到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思考这种不平等与性别、族群和阶级之间的关联。我们还将考察,在技术变革和全球知识经济的新需求之下,教育是如何发生转型的。本章最后将来谈谈关于智力的本质,以及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第一节 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为什么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对社会学的创建先贤之一涂尔干来说,教育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介绍了涂尔干对于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思路。

在涂尔干看来极其重要的是,儿童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学习历史,开始理解社会中众多相互分离的个人统合起来的共有价值观。这些共有价值观包括宗教信念和道德信念,也包括一种自我纪律(self-discipline)的认识。涂尔干相信,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将有助于社会功能运行的社会规则内化。

涂尔干提出(Durkheim 1925),在工业社会里,教育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还有一项功能:教给孩童履行专门行业所需的技能。而在传统社会里,行业技能可以在家庭中习得。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物品生产中出现劳动分工,也发展出了一套教育体制,能够传承履行各种专门化、行业性角色所需的技能。

在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著作里,能看到对于教育的另一种功能主义思路。涂尔干关注的是19世纪的法国社会如何变得越来越具有个体主义性质,认为教育创造了社会团结。而到了20世纪中期,帕森斯则相信,教育的功能是要把个人成就的价值观灌输给

孩童。这种价值观对于工业化社会的功能运作至关重要,但却不能在家庭中习得。家庭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对待孩子的。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先赋的,基本上自出生伊始即已限定。与此相反,孩子在学校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获致的。在学校里,评价孩子们的标准是普遍主义的,比如考试。在帕森斯看来,教育的功能就是让孩子们能够从家庭的特殊主义标准转向现代的成人社会所需要的普遍标准。根据他的说法,学校和广泛的社会一样,基本上乃是基于能力至上的基础来运作。孩子们获得他们的地位,靠的是个人品质(或价值),而不是性别、种族或阶级(Parsons and Bales 1956)。尽管如此,我们将会看到,帕森斯认为学校是基于能力至上制原则运作的观点已经饱受批评。受社会冲突理论影响的社会学家强调了先赋不平等是如何通过教育体制再生产出来的。

关于教育和同龄关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详参第六章第一节第二小节的讨论。

第二节 英国的教育

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前,甚至还要更晚,富家子弟还是由私人导师教育的。绝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任何学校教育的经历,直到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开始建立小学体系。

工业化的进程和城市的扩张扩大了对于专业化学校教育的需求。人们现在在许多不同的行业里工作,而工作技能已经不再可能由父母直接传授给子女。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基于抽象的学识(例如数学、科学、历史、文学以及其他类似科目),而不是专门技能的实际传承。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必须具备阅读、写作、计算等基本技能,以及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



在现代中学^①,男孩女孩接受不同层级的职业培训。

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大体知识。此外,知道如何学习也很重要,惟有如此才能掌握新型的有时是技术性很强的信息。

17.2.1 起源与发展

虽然绝大多数西方社会都是在 19 世纪早期最初形成了现代教育体系,但是就建立全国统一体系而言,英国远比大多数国家迟缓。

到 19 世纪中期,荷兰、瑞士和德意志诸邦^②几乎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但是英格兰和威尔士还远达不到这个目标,倒是苏格兰的教育更为发达一些。

在 1870 年(英国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届政府都增加了教育投入。受完义务教育可离校就业的最低合法年龄(minimum school-leaving age)从 10 岁提高到 14 岁,并且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学校,但是教

① 这是英国教育体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参见后文译者注。

② 原文为“German states”。根据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时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德意志的众多封建诸侯取得实际上的完全主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在名义上保有宗主权。拿破仑战争于 1806 年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得意志诸邦被迫实行全面改革。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版图重新绘制,39 个德意志邦国统一成“德意志邦联”,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各成员国政府保留大部分主权。但整个邦联受到奥地利的控制。1862 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分步联盟,1871 年形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育并没有真正被政府看作是一块应该干预的重要领域。绝大多数学校都是在地方政府有关局署的监督下,由私营或教会机构进行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政府的这种态度。军队的新兵接受了能力和知识测试,而测试的结果证明他们的教育技能水平低下,令当局震惊。考虑到战后复兴的前景,政府开始重新思考现行的教育体系(Halsey 1997)。

在1944年以前,英国大多数儿童在14岁前都要上一所免费学校,即小学。初等教育体系之外也有中学,但是父母必须支付学费。这种体制沿着社会阶级的界限把儿童清晰区分开来:来自于较贫困家庭的儿童几乎都只能接受初等教育。全国只有不到2%的人可以进入大学。1944年的《教育法》(Education Act)出台了几项重大改革,包括向所有人提供免费的中学教育,合法离校年龄提高到15岁,以及承诺受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成为经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

1944年的《教育法》的成果之一,是大多数地方教育当局根据学业择优录取的原则,满足儿童接受中学教育的需要。择优录取考试在孩子11岁时举行,也就是从小学升中学的年纪,旨在依照学生的能力而不是社会背景来选出更具能力的孩子。对于绝大多数小学生来说,所谓“11岁分流”考试^①的结果将决定他们是继续攻读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提供更具学术取向的课程),还是去现代中学^②(兼有通识学习和职业学习)。少部分儿童也会去上技术学校或职业学校。所有考试合格并希望继续求学的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待到17岁。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11岁分流体制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959年的《克罗瑟报告》表明,只有12%的小学生会 在学校里待到17岁,而较早离校的儿童也更多地是因为阶级背景而不是学业成绩的缘故。1964年重新掌权的工党政府致力于建立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s),取消文法学校和现代中学的划分,从而也废止了11岁分流考试。不同阶级背景的儿童就此混合在一所学校。然而,人们还不明确综合中学应当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它应该是“一所面向所有人的文法学校”,还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当时没有找到任何一种解决方案,因此,不同的学校和地区都在摸索各自的思路。一些地方当局抵制这种改革,在少数地方,文法学校依然存在。

自20世纪70年代初,一种巨变深刻影响着公立教育:从劳动力供应短缺,要求学校提供经济所需要的技能,转到劳动力供应过剩,进入失业率上升、政府收入减少的时期。整个战后阶段显著表现出的教育扩张突然被经济收缩以及削减政府开支的种种努力所取代。教育在政府总开支中所占的比例,从1953年的7.3%稳步上升到1973年的13.3%。但是,到了197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2.2%,在1980年代中期更掉到11%。不过除此之外,教育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份额在1979年后仍一直维持在大约12%。(但是,这一数据掩盖了近年来教育开支的增加,因为整个福利开支增加了。参看下文第二节)。

① 原文为“eleven-plus”,也译为“11岁升学甄别考试”等。

② 原文使用了英国人口语中的“secondary modern school”,正式名称为“modern school”,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种中学形式,英国人一般认为这类学校的入学对象是考不上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的孩子,因缺乏特色和明确培养目标而不受社会重视。

“公”学

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s)在不少方面有些怪异。这些机构根本就不是“公”立的,相反,是私立的、收费的。它们高度独立于教育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并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使它们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体系。在西方各个社会,都有一些常常同宗教各教派相联系的私立学校,但是没有任何社会的私立学校像英国这样排他,又如此重要。

公学名义上归国家管理,但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几项重大教育法规会影响到这些机构。1944年的《教育法》对公学没有触动,综合学校的设立也没有影响到公学。而且直到最近,大多数公学仍然是男女分校的。在英国大约有2千3百所收费学校,为约6%的人口提供教育。它们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从伊顿、拉格比或查特豪斯^①之类久负声望的机构,到大多数人不曾听闻的所谓小(minor)公学。

一些教育学家认为,“公学”这个词只限于指一组重要的收费学校。它们是1871年最初形成的校长联合会(Headmasters' Conference, HMC)的成员学校。这个联合会最初只有50所学校,现在已经扩展到超过240所。像上面列举的这些学校,包括伊顿、拉格比,以及其他一些学校,都是其成员。校长联合会成员校的



伊顿公学的男生们穿着非常传统的校服。

毕业生往往在英国社会中占有较高的位置。例如,1991年发表的由伊万·里德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84%的法官,70%的银行董事,以及49%的高级公务员,都曾经上过校长联合会成

^① 伊顿学院(Eton College)又译伊顿公学,是英格兰最大也最有名望的公学之一。建于1440年,创办人亨利六世还创办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因此伊顿毕业生可以径往深造。伊顿每年根据12—14岁男生参加考试的成绩,选录70名领取皇家奖学金的男生,在校内有特别住所。另有校外寄宿生。学生一般来自英格兰最富有、最知名的家庭,其中许多是贵族。拉格比(Rugby)也是英格兰著名的公学,系创立于1567年的男校,也是橄榄球发源地。查特豪斯(Charterhouse)是英格兰著名的学校和慈善机关,创建于1611年,为穷苦但有天资的年轻人提供教育。英国有代表性的大的公学通常系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晚期由某个捐助人创建的学校演变而来。一般认为公学培养的是预备升入牛津或剑桥的学生,将来可以担任政府公职,这是公学名称的另一来源。公学所培养和传播的精神气质并不专注于学术性,而是在行为、言谈和仪表方面,注重其合乎阶级意识的规范,对于大英帝国影响深远。最著名的九所公学还包括温切斯特、圣保罗、什鲁斯伯里、威斯敏斯特、麦钱特·泰勒、哈罗。

员校(Reid 1991)。

1988年的《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的成果之一,就是所有国立学校都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课程体系,包括学生分别在7岁、11岁、14岁和16岁时接受测验。而来自收费学校的代表们也参与了全国课程体系的

制定。然而,这些学校并不一定非要遵循这种课程体系。收费学校可以教任何东西,而且没有对孩童进行测验的义务。大多数学校已经选择采用全国课程体系,但是也有一些学校对此完全不予理会。

17.2.2 中等教育与政治

长期以来,教育始终是一块政治的战场,而且至今依然如是。围绕着综合性学校教育的后果,也就是有关教育的标准,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的不平等现象,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最初,综合教育得到政治上左右两翼的支持。然而,正如前文所示,是工党政府开始实行综合教育体制的,因而是政治左翼而不是右翼更多地支持综合教育。综合教育的设计者们相信,这种新型学校可能比选拔性教育提供更平等的机会。他们没有过多考虑课程本身的问题,只是更为关注获得渠道的平等。

一 保守党政府治下的教育政策,1979—1997

借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成为首相的时机,保守党更加直言不讳地批评综合学校教育。他们认为,并不能因为引入了综合体制就允许文法学校基本上就此消失。尽管工党的许多人在战后一直主张,文法学校具有社会分割的后果,但保守党人士一心要在中等教育的层次上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学校形式,以便让父母们有更加宽泛的范围来选择自己孩子所受教育的性质。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夫人开始呼吁对学校的管理进行“革命”。之所以有这场革命,是因为拆解了庞大的综合学校体制,并且削减了负责管理它们的地方教育当局的

权力。要理解撒切尔政府的教育“革命”,可以结合她及其许多支持者眼中的背景: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明显暴露的英国生活中广泛的经济衰落和道德衰落。她认为,综合体制未能提倡“家庭”价值,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备创造一个富有生机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社会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她还相信,综合体制常常是受着冗赘的政府科层机构的低效管理。

1988年通过的《教育法》推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其中有一些阻力重重。此时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课程体系,为公立教学规定了一个普适框架。全国性课程体系的推行遭到教育界一些群体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这种整齐划一的试验,觉得没有必要对课程进行限定。1993年夏,教师们举行了罢课活动以抗议这类试验。

1988年的《教育法》还引进了一种新型学校管理体制,称为“学校的自我管理”。学校管理的权力下放是为了平衡由全国性课程体系所必然带来的集中化。同时,还建立了一批新的城市技术学院(City Technology Colleges, CTCs)和受中央政府资助的学校(grant-maintained schools)。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可以选择“脱离”地方当局的控制,直接接受国家的资助,实质上变成了受政府资助的一个企业。它们也有权根据学生的能力自主选择高达50%的学生。批评者们声称,这将会加剧学校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削弱综合学校的平等主义原则。1992年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机构,逐步接管选择脱离地方当局的学校。政府在细陈该

机构任务的白皮书中表明,希望“以后所有的学校都将变成政府拨款的学校”,也就是说,全部脱离地方当局的控制。然而,截至1995年,在总数23000所的公立学校中,只有1000所学校这么做了。

二 评价

保守党政府力图通过1988年的《教育法》,把市场竞争的因素引入教育,就像在其他领域的努力一样(参看第十章第三节第二小节)。学校将受制于供需规律、竞争法则和消费者选择。总体来说,这些变革旨在增加教育的“消费者”(父母和孩子)相对于“生产者”(教师)的力量。学校领导被赋予更大的财政责任,并且允许学校“脱离”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成为“独立的公立学校”。还引入了排名榜,给各学校的表现分等评级,认为这将鼓励竞争,使父母们在选择自己孩子就读的学校时,能够做出有根有据的决策。

格维尔茨等人(Gewirtz et al. 1995)考察了教育体系的市场化情况,涉及伦敦三个相互毗邻的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LEAs)辖下的15所学校。他们发现,保守党政府的教育改革是在推动教育体系内部从综合价值观转向市场价值观。比如说,他们认为,学校特别愿意招揽那些可能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考出好成绩的孩子,以提升学校在排名榜上的总体等级。学校还加大努力进行市场宣传,比如编印华美浮夸的介绍小册子,哪怕这种做法意味着从不那么有利可图的领域抽取资金,比如对于有特殊教育需求^①的孩子的教学。

格维尔茨等人的研究集中关注的是父母如何选择自己孩子就读的学校。研究发现,与

帕森斯的理解不同,教育系统并不是能力至上的(见上文本章第一节的讨论),因为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关于自己孩子上什么学校的选择是非常受限制的,正像我们在本章引语中看到肖恩母亲的处境那样。研究者们提出,学校选择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社会阶级和文化资本。

第九章第四节第五小节介绍了“文化资本”这个术语。

他们提出,根据父母们选择学校的能力,可以大致区分出三组家长:

- 1 优势的/熟练的选择者(Privileged/skilled choosers)有能力花时间寻找并研究不同的选择方案,并与老师和其他家长进行广泛的商讨。这些家长即使自己孩子没能被首选学校接收,也很自信可以利用申诉制度。这个群体有时候会未雨绸缪,确保自己孩子上的小学就属于中学名校的摇篮。
- 2 半熟练的选择者(Semi-skilled choosers)也会积极主动地选择学校,但不能像前一组家长那样投入市场。他们没有像前一组家长那么多的文化资源可以依赖,比如有消息灵通的朋友,知道体制是如何运作的,所以也就不自信能够利用运作流程。就群体的层面来说,相比于第一组家长,他们即使首选被拒,也不太可能去申诉,而更有可能接受关于学校的新闻报道和街谈巷议。
- 3 脱节的选择者(Disconnected choosers)尽管也关心自己孩子的前途,但往往认为所有学校都大致差不多,常常把最终选择权交给孩子。他们没有很多能力介入教育市场,

^① 原文为“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SEN)”。特殊教育就是对智力或身体上有缺陷、情绪或行为上有问题的学生所提供的教育。

并经常选择最为近便的学校。如果父母没有车,公共交通又不完备,那么这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三 新工党治下的教育政策,1997年以来

令某些人包括教师工会感到惊讶的是,保守党的教育改革中的一些成分,到了新工党治下却依然保留。比如说,维持下来的文法学校未受触动。这一决定在一些学者与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了质疑,他们认为文法学校吸收了最有能力的学生,从而大大降低了地方综合学校的绩效。新工党还同意保守党人的做法,应该取消把不同能力的学生合校教学的模式,转而支持分流或分班。(采取分流的学校是根据学生的能力,把学生分成几个等级群体。而分班则意味着把能力相近的学生编在一起教授特定的课程,比如说,对于数学和对于英语,可以有不同的高级班和低级班。)这样做的理论依据在于,能力不同的孩子都可以取得最快的进步(有关对于这种理论的批评,参看下文本章第四节第三小节吉尔伯恩和扬代尔有关“新智商主义”的讨论)。在新工党治下,最初由保守党人设立的受中央政府资助的学校现在成了基金学校(Foundation Schools),重新接受各自所属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不过,这些学校此前拥有的相对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独立性,还是大部分保留下来了。

托尼·布莱尔1997年成为首相之后,宣称“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将成为他政治议程表上的首要任务。布莱尔承认,根据国际比较的测量(参看本章第二节第四小节),英国学校教育的水平并不高,推进教育改革乃属当务之急。新工党在1997年上台后不久即发布了一份白皮书,题为《学业优异》(*Excellence in Schools*),致力于捍卫综合学校,并要实现综合学校的现代化。该白皮书呼吁,对于那些有成功办法、创新之道来获得优良成效的学校,应该减少干预,但又承认,对于教育水准常年

不达标的学校,也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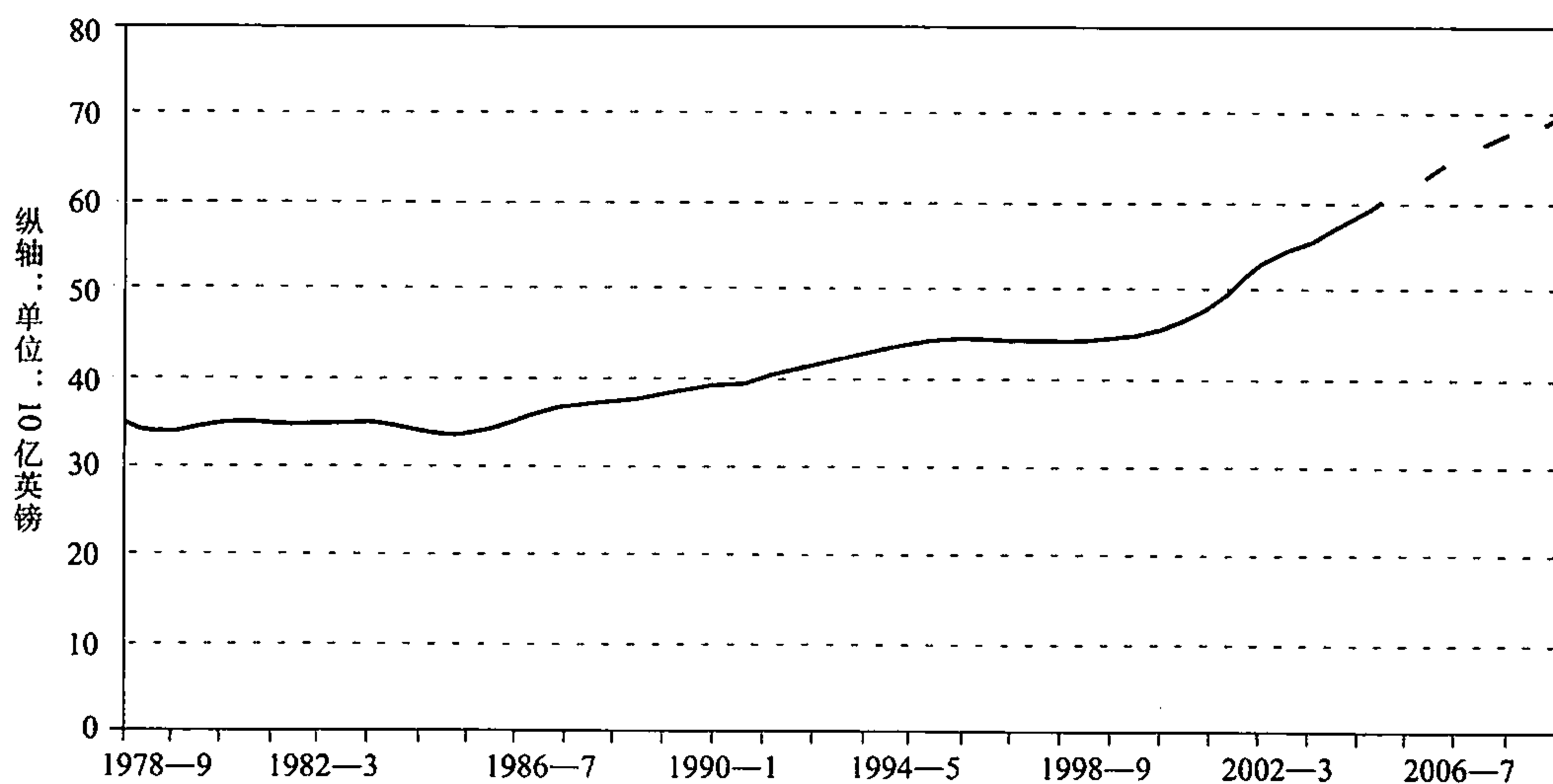
新工党也推行了一些常常引发争议的新举措,旨在提高英国公立学校的绩效。尽管自1997年以来,国家对于教育的资金投入已有增长(参看图17.1),但新工党拒绝接受来自教师工会和左翼评论家的许多传统观点,即认为教育绩效之所以乏善可陈,显然是因为投入不足,处于劣势的学生在某些学校里高度集中。为了提高教育水准,已经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思路。新工党强调,优良的教学方法非常重要,校长的坚强领导是教育改革的关键。2000年11月正式创办了国家学校干部学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旨在为志向远大的现有学校领导队伍提供职业生涯发展和支持。

在小学里,引入了语数能力战略(Literacy and Numeracy Strategies),以确保所有孩童都能在核心科目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这项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设立了每日识字计数学习时间,培养阅读和数学的技能。语数能力战略现在已经扩展为初等教育战略(Primary Strategies),制定了英语、数学和科学等科目的标准。

还出现了一种趋势,鼓励学校之间的竞争性与多样性,以提升教育水准。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已经变成基金学校,并维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又开始设立专门学校(specialist schools),把重点放在特定的课程领域,比如技术学校、艺术学校或数学学校。这些学校被允许根据学生在这些专门领域的的能力,选择至多占招生数10%的学生。

在一些贫困地区,还设立了一批城市学院(City Academies),选修人数大大超额。在2004至2005学年开学时,全英国已有17所这样的学院。来自私营部门或慈善团体的捐助者负责提供学院开办费的20%,具体数额最多达200万英镑。国家负责其余部分的费用。捐助者随后负责学院的运营,资金则来自纳税人。有好几种团体,包括私立学校和宗教群体,都

图(a)1978/79年度—2007/08年度教育开支的历史演变与未来预测,以2004/05年度价格折算实际值



图(b)1978/79年度—2007/08年度教育开支的历史演变与未来预测,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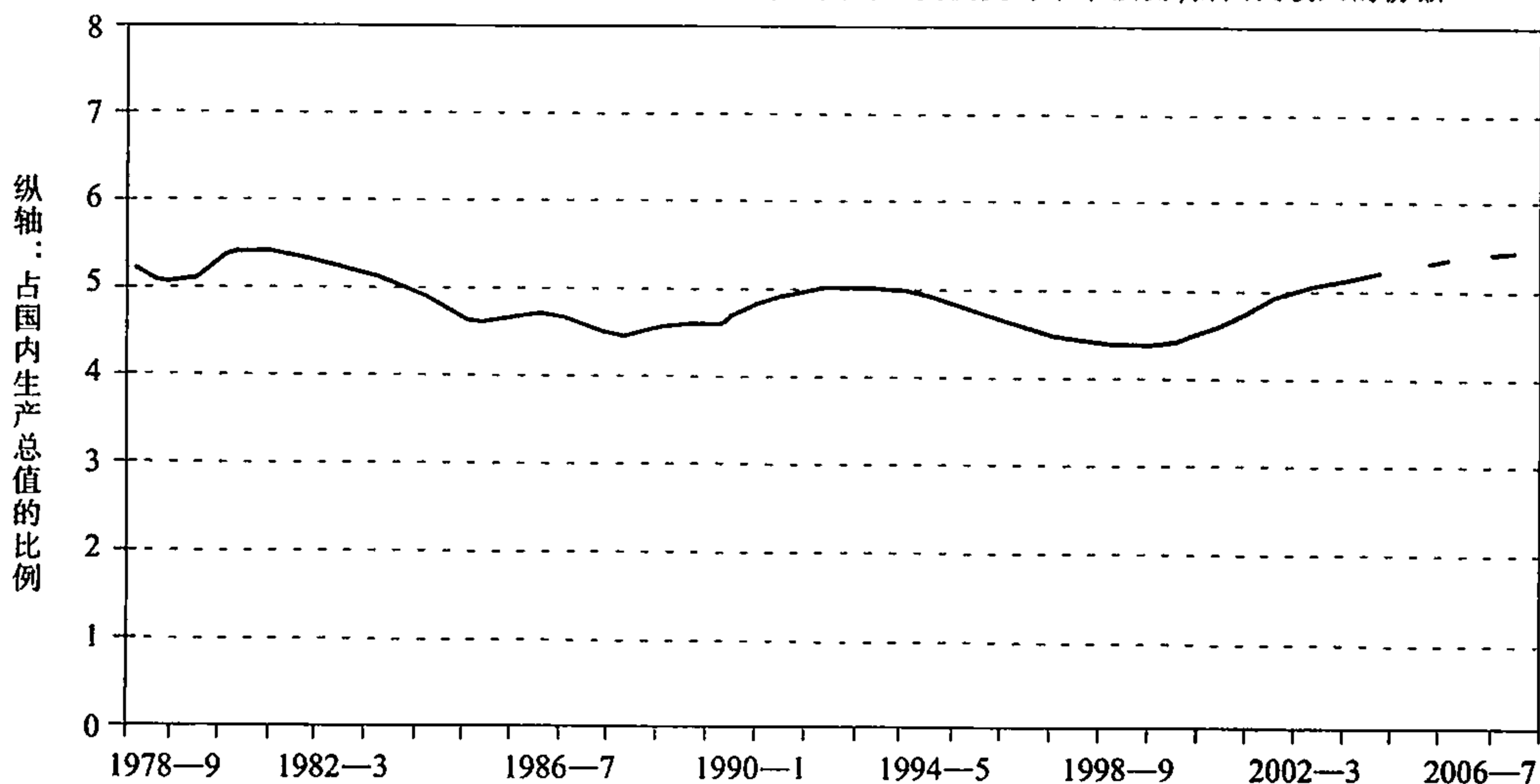


图 17.1 英国 1979 年以来的教育开支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5* (2005), 页 37

表示有兴趣负责学院运营。这些学校不向学生收取费用,但学生必须来自本地社区。不过,有批评者认为,政府对于这类学院慷慨资助,也就抽取了其他学校的资源。新工党还严格执行督学政策。对于那些被视为差校的学校,政府机构可以直接干预,接管学校运营。在有些情

况下,差校会作为城市学院重新开办。

一些原本旨在消灭贫困的措施也对教育产生了效应。比如说,在一些非常贫困的地区,设立了教育行动特区 (Education Action Zones)。在这项方案中,要求学校、地方当局和本地企业协商如何应对贫困地区学业成绩不佳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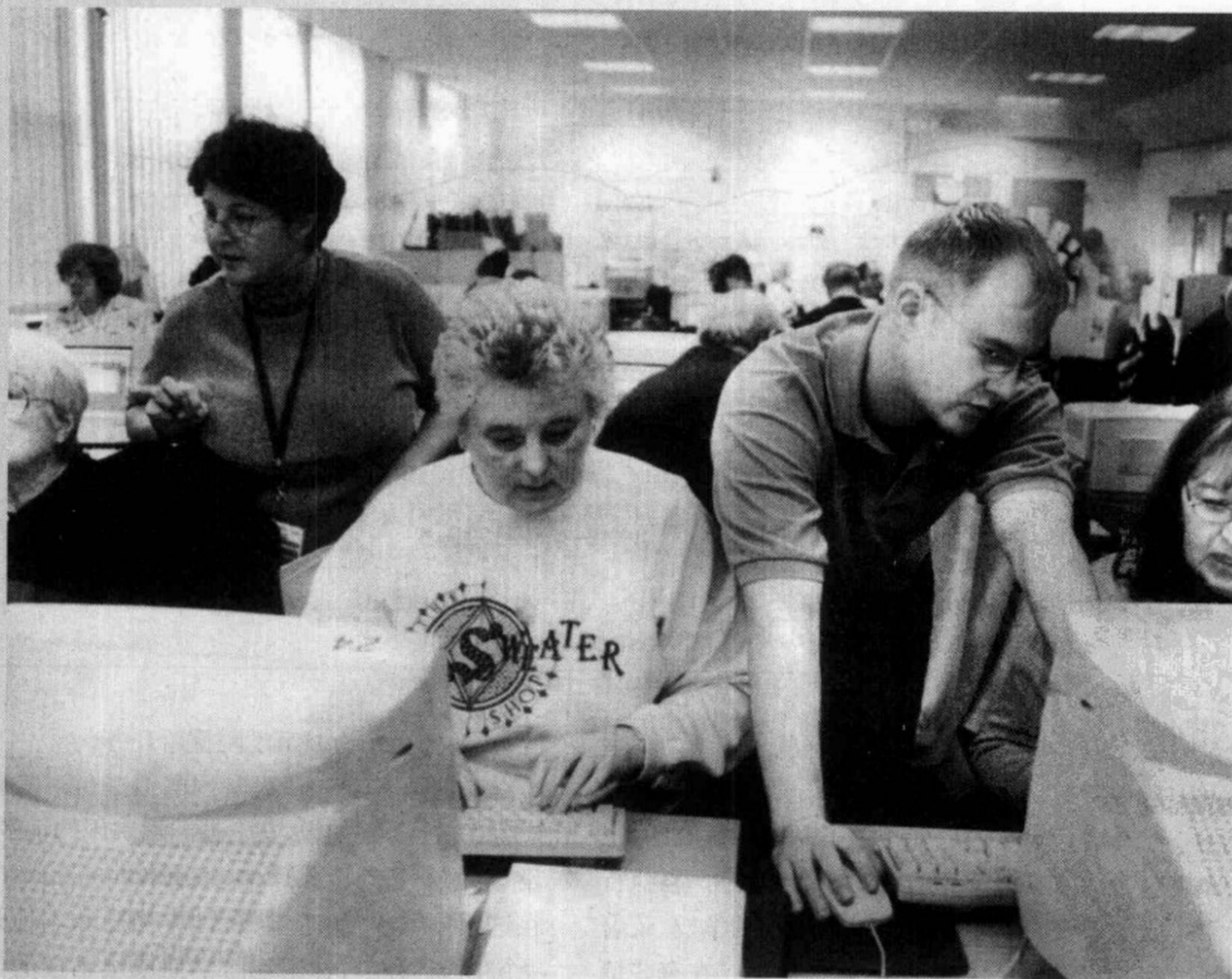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终生学习

新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崛起正在改变关于劳动与教育的传统观念。技术变迁步伐迅猛,使工作岗位的流转轮替之快前所未有。我们在本章已经看到,在第十八章也将要看到,培训和获得资格证书现在正贯穿人的一生,而不仅仅是早期生活的事情。处在职业生涯中的专业人员们正在选择通过继续教育计划或基于网络的学习形式来更新自己的技能。现在许多雇主都允许员工参加在职培训,并以此作为一种手段,增进员工对于公司的忠诚,提高公司的技能基础。

随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变革,支撑它的传统信仰和制度也正在发生变迁。人们曾经认为,教育意味着在正规的机构里,以固定的结构传承知

识;这种观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更为广泛的、发生在多种背景中的“学习”观。由“教育”向“学习”的转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学习者是积极、好奇的社会行动者,能够从多种来源中获得见识,而不再局限于机构性的背景。如果强调学习,也就是承认,技能与知识是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接触来获得,比如与朋友和邻居,在研讨会或者博物馆里,在当地小酒吧的谈话当中,通过互联网及其他媒体,如此等等。

从学校内部也已经可以看到,强调重点正在转向终生学习。在学校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供学生在课堂之外进行学习。学校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正在坍塌,不仅经由网络空间,而



且在客观世界中也是如此。比如说,“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已经成为许多美国中学的重要项目。作为毕业要求的一部分,学生需要用一定的时间参与社区志愿者工作。在美国和英国,与当地工商企业的合作办学也已经司空见惯,促进了作为成人的专业人员与学生之间形成互动和指导关系。

在向知识社会的转换中,终生学习应该而且必须发挥作用。对于培养一支训练有素、富有动力的劳力大军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如此,

还应当看到,学习关系到更广泛的人类价值观。为了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理解,学习既是发展全面和自主的自我教育的一种手段,也是其目的所在。这个观念并不存在丝毫的乌托邦意味。事实上,它反映了教育哲学家提出的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一个现有的例证就是“老年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老年大学给退休人员提供了选择自我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发展。

题。在这些特区,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金可以用于提供高薪来吸引更多的教师,并应对与社会排斥有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截至2004年,在全英国已经设立47处教育行动特区。

在本章第四节第二小节还将详细讨论社会排斥和教育的关系。社会排斥也是第十章的主题。



图为一所新的城市学院,这是新工党学校政策的一部分。

17.2.3 高等教育

在高等教育(中小学之后的教育,一般在大学或学院里进行)的组织方面,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一些国家,所有大学和学院都是公立机构,直接由政府拨给经费。例如在法国,高等教育几乎与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一样明确由国家组织,由中央集权控制。所有课程结构都必须得到对高教部长负责的全国管理机构的核准。学生可以获得两种类型的学位。一种是由各个大学授予的,另一种则是由国家授予的。因为国家颁发的学位被认为是符合有保障的统一标准,所以一般要比各大学的学位更具声望,更有价值。政府中某些领域的职业只对获得国家学位的人开放,而且这种学位也得到大多数产业界雇主的偏爱。法国中小学、学院和大学的几乎所有教师都是国家雇员。工资标准和教学责任的主要框架都是由中央政府规定的。

在发达国家中,就私立学院和大学的高比例而言,美国最为突出。在美国,私立院校在高教机构中占了54%。其中包括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比如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然而,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公立和私立之间的区分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泾渭分明。私立大学的学生有资格获得公共的资助和贷款,而且这些大学也接受公共的研究资助。公立大学也经常拥有大把馈赠,并且可能得到私营公司的捐款,它们也经常从私营产业来源中获得研究资助。

一 英国的体系

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远比法国的体系分散,但是又比美国来得统一。大学和学院得到政府的资助,而且教育体系中各级教师的工资都是根据全国工资标准制定的。然而,在机构和课程的组织方面,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截至战前,英国有21所大学。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那时候大部分大学的规模都很小。1937年,英国各大学的本科生总人数只是略高于1981年专职的大学教学研究人员数(Halsey 2000)。在1945年到1970年之间,英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增加了3倍。古老的大学扩大了规模,而以“红砖”为标志的新大学陆续建立[例如苏塞克斯(Sussex)、肯特(Kent)、斯特林(Stirling)以及约克(York)等大学]。随着理工专科学校(polytechnics)的建立,也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双重体系。高等教育的第二层次相对扩大了,包括了大约四百所大学,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同大学相比,理工专科学校更集中于职业教育。还建立了全国学位授予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作为一个核准机构,以确保学位的统一标准。

今天,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具备了有时所谓的“如出一辙”(standard coinage)。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莱斯特(Leicester)或利兹(Leeds)大学的学位水平,与剑桥、牛津或伦敦大学的学位水准相当。然而,牛津和剑桥以严格挑选学生而著称,大约有一半学生来自于收费学校。比起从其他大多数大学拿到一张文凭,牛津或剑桥的学位获得者有更多机会赢得收入可观的职业生涯。百年以来,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长。在1900至1901学年,只有区区25000名学生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到了1971年,这个数字增长了18倍还多,达到了457000人。自那以后,这一数字继续呈现出显著增长的态势(如图17.2所示)。截至2001至2002学年,英国高等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总数将近120万名。而就读高等教育机构本科生和研究生非全日制课程的学生人数也有巨大的增长。

社会阶级背景影响了一个人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虽然已经由1991至1992学年的11%上升到2001至2002学年的19%,但仍然大大低于来自非体力劳动阶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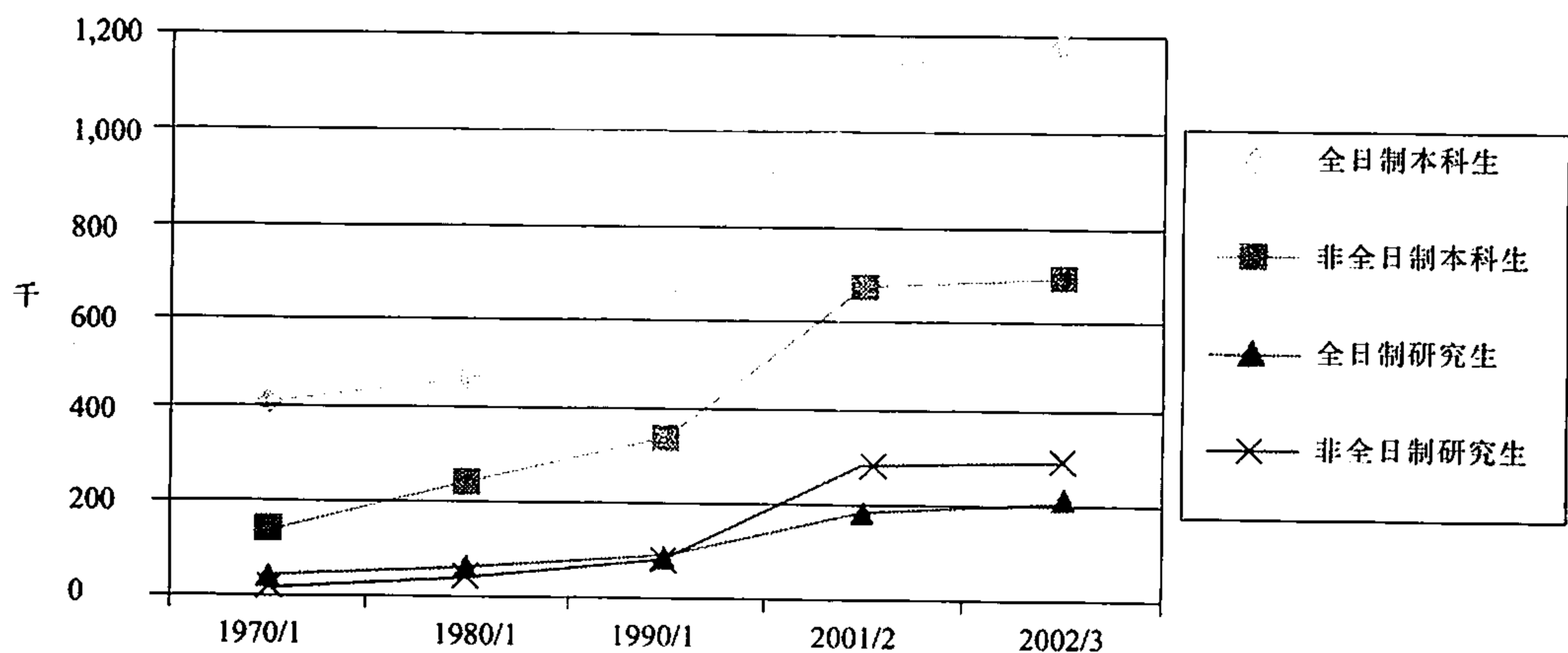


图 17.2 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学生数,以课程类型分组,1970年至2003年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44

庭的学生。在同一时期,出身非体力劳动的各社会阶级的学生的相应比例从 35% 上升到 50% (参看图 17.3)。关于父母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受教育机会的争论,是如何资助高等教育的争论的核心。

二 资金之辩

尽管高教学生人数已经有了巨大扩张,但政府的投入却没有相应迅速的增长。结果就导致了高等教育资金的危机 (参见图 17.4)。从 1976 年到 1989 年,以实际价值计算,英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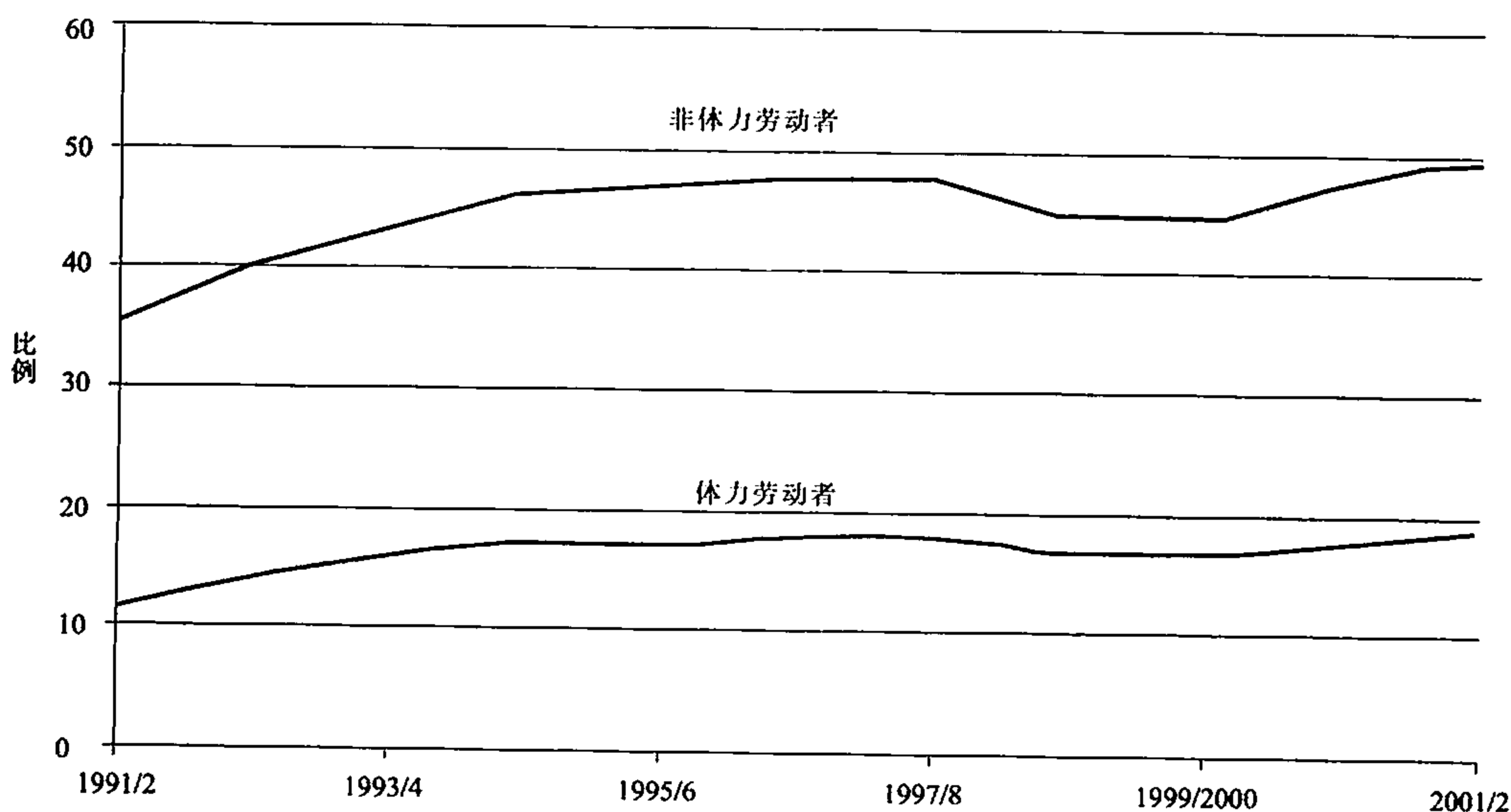


图 17.3 英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以社会阶级分组,1991年至2002年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2004), 页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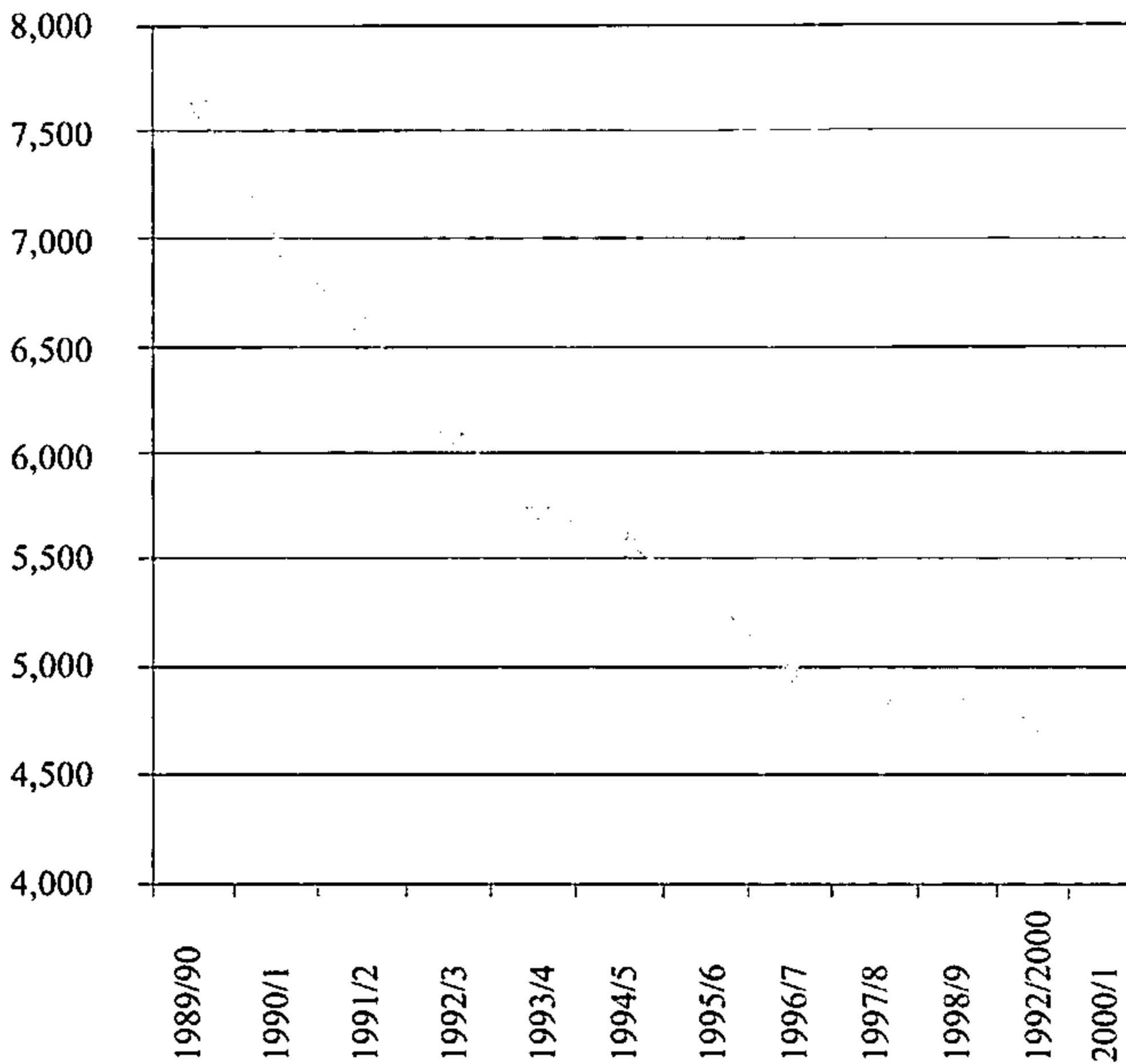


图 17.4 英格兰公立计划内全日制高等教育学生人均经费, 1989 年至 2001 年(以 1999 至 2000 统计年度价格折算)

资料来源: <www.planning.education.gov.uk/pub/English_public_funding.htm>

学中生均经费下降了 29%，而从 1989 年到 1999 年，又下降了 38%。国家高教调查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igher Education) 在 1997 年发布报告，结论是：在现有资金条件下，高等教育不可能取得扩张和改进。

有关高教资金的争论的核心在于，该谁来买单。对于大学的大规模投入可能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全体纳税人，一是接受并受惠于高等教育的那些人，也就是学生。有些人提出，鉴于高等教育给予社会的社会经济利益，大学资金缺额应当由纳税人承担。试想，要是没有那些经过大学培训的专业医疗人员和教师，我们该会怎样？

但另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当有所限制，让那些不想上大学的纳税人不必为那些上大学的人买单。本科毕业生享有非本科毕业生所没有的许多职业生涯上的优势，无论是否与金钱有关。晚近一项调查发现，英国的本科毕业生比非本科毕业生的收入要高 59%，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属于获得一个学位能带来最

多好处的国家之一 (OECD 2004)。尽管新工党政府已经加强了从全体纳税人那里抽取高教资金，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观点：学生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受惠者，必须为其大学开支承担更大的份额。

政府决定，从 1998 至 1999 学年开始，要求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为自己的学费开支承担一笔费用（当时确定为每学期 1000 英镑）。尽管如此，许多人认为，如果上大学时必需缴纳一笔费用，就会阻碍那些出身贫寒的学生申请入学，同时也会使许多中产阶级的家长心怀怨气，他们讨厌不得不一次拿出那么大一

笔钱。

其结果，英国现在已经废止了预付学费的政策。从 2006 年开始，允许大学为本科生课程收取最多每年 3000 英镑的“补充费” (top-up fees)。学生可以申请实质利率贷款 (real interest loans)，并且是免税的，在毕业后挣到一定数量以上的钱时再还贷，这个定额目前定为 15000 英镑。学生还可以贷款支付生活费，这些也和学费贷款一起还。一个本科毕业生如果过了 25 年还没还贷，债务就一笔勾销了，这样就能够保障那些没有工作或从事低薪职业的人。

有些人批评道，不应当认为有些大学有权收取比其他学校更高的学费。他们提出，富有声望的大学有能力收取更高的费用，吸引更好的教员，添置更好的设备，担心两级体系就此愈发巩固。他们认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会选择比较便宜的大学和课程。许多批评这种政策的人并不相信，最具声望的那些大学的学费会长久维持在 3000 英镑这种水平。

而面对这种批评，部长们的回应则是允

诺,至少在 2009 年以前,不提高年费 3000 英镑的限制,即使到那时要有调高,也需要经过上下两院的投票。政府还设立了机会公平办公室 (Office for Fair Access, Offa), 以确保没有任何大学可以索取高昂学费,而不扩大工人阶级和少数族群家庭的学生的机会。已经重新恢复了针对最贫困的三分之一学生所提供的资

助,减免了他们的大部分费用。政府还做出承诺,三年后将就补充费做出独立评估。

17.2.4 从比较视角看英国教育

英国的教育体系与其海外对手相比如何? 由于在一般期望儿童入学就读的年数,以及教

表 17.1 各国青少年阅读、数学和科学领域能力排名(2002 年)

各国阅读能力得分 降序排名	平均分	各国数学能力得分 降序排名	平均分	各国科学能力得分 降序排名	平均分
芬兰	546	日本	557	韩国	552
加拿大	534	韩国	547	日本	550
新西兰	529	新西兰	537	芬兰	538
澳大利亚	528	芬兰	536	英格兰	533
爱尔兰	527	澳大利亚	533	英国	532
韩国	525	加拿大	533	加拿大	529
英国	523	瑞士	529	新西兰	528
英格兰	523	英国	529	澳大利亚	528
日本	522	英格兰	529	奥地利	519
瑞典	516	比利时	520	爱尔兰	513
奥地利	507	法国	517	瑞典	512
比利时	507	奥地利	515	捷克	511
冰岛	507	丹麦	514	法国	500
挪威	505	冰岛	514	挪威	500
法国	505	瑞典	510	美国	499
美国	504	爱尔兰	503	匈牙利	496
丹麦	497	挪威	499	冰岛	496
瑞士	494	捷克	498	比利时	496
西班牙	493	美国	493	瑞士	496
捷克	492	德国	490	西班牙	491
意大利	487	匈牙利	488	德国	487
德国	484	西班牙	476	波兰	483
匈牙利	480	波兰	470	丹麦	481
波兰	479	意大利	457	意大利	478
希腊	474	葡萄牙	454	希腊	461
葡萄牙	470	希腊	447	葡萄牙	459
卢森堡	441	卢森堡	446	卢森堡	443
墨西哥	422	墨西哥	387	墨西哥	422
经合组织各国均值	500	经合组织各国均值	500	经合组织各国均值	500

资料来源: PISA 2000

全球视野下的读写能力

读写能力是教育的“底线”。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学校教育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在西方世界,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民众的大多数都是识字的,但正如前文所示,在西方历史上,这只是一种晚近的发展成就。而在前朝往世,人口中具备起码的读写技能的从来也没有超过一小部分人。

在有些国家里,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具备一些阅读或写作技能。其原因部分在于,一些国家缺乏大众普及教育。然而,即使小学教育的规模能够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文盲的大量减少也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因为很大一部分文盲属于成年人。实际上,那些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的绝对数目正在呈上升趋势。

文盲具有明显的性别维度,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体现得尤为显著。在那里,女性当中的高文盲率与贫穷、婴儿死亡率、高生育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低等因素有密切关联。在传统文化和经济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许多女孩儿被迫失学:农村家庭往往更为传统,更不愿意支持妇女接受教育。而在大家庭里,要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教育实在太昂贵了——为了使男孩子接受教育,女孩子总会成为牺牲品。

尽管有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提高读写能力方案,但对于这样一个波及广泛的问题,这些方案的贡献甚微。电视、广播及其他电子传媒只要可资利用,都可以用来跨越学习读写能力的阶段,直接向成年人传递教育节目。但是,教育节目通常不会像商业娱乐节目那么广受欢迎。

在殖民主义时期,殖民政府会带着几分疑虑不安来看教育。在20世纪以前,绝大多数人还认为原住民人口太过原始,不值得教育。再往后,教育被视为一种手段,让本地精英更加受到欧洲利益、关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

上,教育的结果却是孕育不满和反叛,因为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大多数领导都来自受教育的精英,上的正是欧洲的中小学或大学。他们能够将欧洲各国的民主制度,与各自出生地的民主阙如的状况直接比较。

殖民者所引入的教育往往是针对欧洲的,而不是针对殖民地本身。在英属殖民地中受过教育的非洲人知道英格兰的国王和女王,读过莎士比亚、弥尔顿及一千英国诗人,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或往昔的文化成就几乎一无所知。而在殖民主义终结以后,甚至到了今天,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也尚未彻底改变这种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不以民众主体为对象的殖民教育遗产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体系显得头重脚轻:相对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过于庞大。其相应的结果,便是一群读过大专院校的人教育资历过高,找不到白领或专业性职位。鉴于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绝大多数薪酬优厚的职位是在政府,但其数量显得僧多粥少。

近些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从殖民主义传承下来的课程体系有所欠缺,已经尝试以乡村穷人为对象,重新确定其教育方案的方针。但它们并未取得可观的成就,因为通常缺乏充裕的资金以支付必不可少的大规模创新。其结果,印度等国家已经开始实行自助教育方案。各社区依靠现有的资源,而不产生新的资金需求。那些有能力阅读和写作的人,或许拥有工作技能的人,都被鼓励招揽其他人作为学徒,利用空闲时间教授所学。

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也讨论了读写能力与发展之间的关联。

育体系的组织方式方面,各国之间颇见差异,因此很难直接进行国际比较。

与同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富裕国家相比,英国的幼童受教育率较高(3至4岁年龄组达81%)。就每一位学龄前儿童的开支而言,英国也是名列前茅(生均每年7595美元,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平均为4187美元)。不过,学龄前阶段的师生比在英国是1比27,在整个经合组织中是最低的(其平均数仅为1比15)。

在小学阶段,生均开支略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但另一方面,小学生们的在校时间又长于其他国家(比如说,就9至11岁年龄组学童而言,在英格兰为889学时,在苏格兰为1000学时,远远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9岁年龄组为752学时,11岁年龄组为816学时)。英国教育体系中该阶段的师生比依然较低(英国为1比20,而经合组织平均为1比17)。

到了中学阶段,生均开支依然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英国为5933美元,平均水平为6510美元)。不过,在此阶段与小学阶段不同,师生比上升到1比15,仅仅略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1比14。

遵照上文所讨论的保守党政府在1979年以后的政策,以及新工党1997年以来的政策(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英国的学校拥有比较多的发言权。根据计算,调查者所分析的所有决策中有82%是在学校一级做出的,而经合组织就要低得多,平均仅为42%(OECD 2004)。

那么,在与相似国家进行比较时,这些统计数据与教育成就之间又有何关联?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在经合组织各国对15岁年龄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发现就阅读、数学和科学等领域的能力而言,英国的青少年与其他国家的同龄人相比,表现颇为出色。比如说,在阅读方面,英格兰学生的成绩与澳大利亚、日本和瑞典的学生相近,而比法国和德国高许多。只有芬兰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其15岁年

龄组的得分要显著高于英格兰(PISA 2000)。

英格兰学生在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方面也显著高于经合组织均值,分别取得529和533的平均分,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和新西兰的得分相仿。只有日本和韩国在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上均显著高于英格兰。相比于丹麦、爱尔兰、美国和德国之类国家的学生,英格兰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领域的表现都要好得多。

在英格兰,女生在阅读能力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这个结果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都是如此(有关英国在教育成就上的性别差异,详参本章第四节第一小节的讨论)。男生的相对劣势在英国要小于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性别差异并不能体现一个国家在整体评估上的得分高低。男生与女生之间差距最小的两个国家是韩国和墨西哥,前者的得分与英格兰相似,而后者是所有调查国中得分最低的。在数学和科学领域,性别差异都要大大小于阅读领域的情况。在英格兰,男生的平均得分略高于女生,但差距很小(PISA 2000)。

第三节 有关学校教育与不平等的理论

我们从本章开篇肖恩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教育与不平等相互关联。肖恩来自贫困的背景,不能就读他母亲希望他上的学校。然后,他不得不努力适应班里的情况,当时他的大部分朋友对学业成绩都不感兴趣,甚至心怀憎恨。本节将评述社会学家尝试说明教育中的社会不平等的一些思路。它们都可以视为关注以教育为场所和渠道的“社会再生产”,只是具体方式颇为不同。伊凡·伊利奇强调通过其所谓的“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而发生作用的非正式过程;巴希尔·伯恩斯坦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意义;皮埃尔·布迪厄考察了学校的文化与家庭的文化之间的关联;而保罗·威

利斯则讨论了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塑造学生对于教育和劳动的态度的。本节稍后还将讨论的两位思想家，罗宾·厄舍尔和理查德·爱德华兹，以不同的方式借鉴了所有这些观念，但是基于现代世界中的文化，以及认同建构（包括性与族群性）的复杂性，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应当注意到，各类文化议题都密切围绕着这些不同的思路。

17.3.1 伊凡·伊利奇：隐性课程

伊凡·伊利奇（1926—2002）在教育理论方面属于最有争议的作者之一。他以批评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著称。他认为，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以前自给自足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技能，不得不在健康上依赖医生、在教育上依赖教师、在娱乐上依赖电视、在生存上依赖雇主。

第八章第二节第一小节讨论了伊利奇有关健康的观点。

伊利奇指出，义务教育这个观念虽然现在已经被全世界普遍接受，但其本身是应该追问的（Illich 1973）。他强调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对纪律和等级制度的要求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学校的发展已经能够应对四项基本任务：提供监护、分配人们的职业角色、习得主导价值观，以及获取为社会所赞许的技能和知识。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因为上学是强制性的，要保证儿童在童年早期到参加工作之间“不要跑到大街上去”，所以学校已经变成了一个监护机构。

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多东西同课程的正式内容没有多少关系。由于学校中的纪律和管制



儿童的行为如果得到理由和说明，就更有可能掌握学校里所使用的精密的语言符码，而这是学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的性质,学校往往灌输伊利奇所说的“被动摄取”(passive consumption),也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现有社会秩序。这些课程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传授,而是隐含在学校的程序和组织中。隐性课程教给儿童,他们在生活中的角色就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并老实呆在那儿”(Illich 1973)。

伊利奇倡导取消传统学校教育的(de-schooling)社会。他指出,义务教育只是一个比较晚近的发明,没有理由把它作为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来接受。既然学校并没有促进平等或者个人创造力的发展,那么为什么不放弃目前的教育形式呢?伊利奇这么说,并不是指应该全盘废除各种形式的教育组织。每一个想学习的人都应当有机会接触到可利用的资源,但应该是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候,而不只是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这种教育体制应该促成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分享,而不是只限于专业人员。学习者不应该只能接受标准的课程体系,而应该对自己学习的东西做出个人的选择。

至于这些说法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还不完全清楚。然而,伊利奇提出了代替学校的几类教育框架。正规学习的物质资源都将保存在图书馆、租赁机构、实验室和信息存储银行中,任何学生都可以使用。将建立“沟通网络”,提供有关信息,了解不同的人所具备的技能,以及是否愿意培训他人或互帮互学。还将向学生提供教育券(vouchers),使他们能够按照需要,随时使用教育服务设施。

这些方案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吗?很多人会说是的。然而,如果有可能在未来大幅度减少或重组付酬工作,那么伊利奇的这些方案似乎也不是那么不切实际。如果有薪就业对社会生活来说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人们就有可能从事更为多样化的活动。考虑到这一层背景,伊利奇的一些思想就变得很有道理了。教育将不再只是限制在专门机构里的一种早期训练形式,而是谁想从学习中受益,谁就可以利用学习资源。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伊利奇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这些观点又开始变得时兴起来。正如我们所见,有些学者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将会使教育发生一场革命,并且将减少其中的不平等状况。

17.3.2 巴希尔·伯恩斯坦:语言符码

与伊利奇类似,社会学家巴希尔·伯恩斯坦(1924—2000)关注的也是教育如何再生产出社会中的不平等。伯恩斯坦借鉴了冲突理论(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通过分析语言技能,考察教育中的不平等(Bernstein 1975)。在20世纪70年代,伯恩斯坦就提出,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在他们的早期生活中发展出不同的符码(codes),或者说是言语的形式,而这会影响他们以后的学校体验。伯恩斯坦并不关心通常提到的人们在词汇或者口头表达技能上的差别。他关注的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方式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尤其是穷人孩子和富家子弟之间的差异。

伯恩斯坦认为,工人阶级孩子的言语代表的是一种有限符码(restricted code),也就是一种特定的语言运用方式,包含了说话者期待他人已经知道的许多未经言明的假设。有限符码作为一种言语类型,维系着说话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生活在亲密的家庭或邻里文化中。在这种文化里,价值观和规范被视为理所当然,不需要通过语言表达。父母往往通过奖励或惩罚,直接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矫正,以使孩子社会化。表现在一种有限符码中的语言更适合于有关实际经验的沟通,而不是讨论更加抽象的观念、过程或者关系。因而,有限符码的言语明显属于较低阶层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玩耍的同龄群体。言语指向的是群体的规范。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轻松地说明,为什么他们要遵循自己这种行为模式。

根据伯恩斯坦的观点,中产阶级孩子的语言发展则与此相反,习得了一种精密符码(elaborated code),这种言说风格使词语的意义个别化,以适应特定情境的要求。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孩子,学习使用语言的方式较少受到专门情景的限制。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概括并表达抽象观念。因此,中产阶级的母亲在管教孩子时,经常会对孩子说明,自己之所以对于孩子行为有这种反应,是出于哪些原因和原则。一位工人阶级的母亲在制止老想吃糖的孩子时,可能只是简单地说“再没有糖给你吃了!”而一位中产阶级的母亲就可能说明,糖吃得太多,对一个人的健康和牙齿都不好。

伯恩斯坦提出,孩子如果习得了言语的精密符码,相比于那些只会有限符码的孩子,更能够应对正规学校教育的要求。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孩子使用的是“低等的”言语类型,或者说他们的语言符码是“受剥夺的”,而是说他们使用言语的方式同学校的学术文化是相冲突的。而那些已经掌握精密符码的人,融入学校环境就要容易得多。

虽然伯恩斯坦的理论的有效性仍然值得讨论,但也已经得到了证据的支持。琼·塔芙研究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孩子的语言,发现了系统性的差别。她支持伯恩斯坦的观点,即工人阶级的孩子一般较少体验到自己提出的问题别人还会给予解答,或者得到别人的想法由来的说明(Tough 1976)。芭芭拉·蒂泽德和马丁·休斯随后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Tizard and Hughes 1984)。

伯恩斯坦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来自某些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在学校里往往属于“差等生”。下面的特性已经同有限符码言语联系在了一起,所有这些都限制了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机会:

1 孩子可能在家里提的问题都得不到多少回应,因而对于广阔的世界,可能比掌握精密

符码的孩子知道得少,并且缺乏好奇心。

- 2 孩子会发现,他们难以理解校规校纪的一般原则,并且对教学中使用的非情绪化的抽象语言不知该如何回应。
- 3 教师使用语言的方式是孩子所不习惯的,因此孩子也许不能理解教师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孩子可能需要把教师的语言转译成自己所熟悉的语言,但这样做又可能无法真正掌握教师希望表达的原义。
- 4 孩子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或“填鸭式”学习可能不会遇到多少困难,但却可能难以把握涉及概括和抽象的概念区分。

17.3.3 皮埃尔·布迪厄:教育与文化再生产

要把上述理论视角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最富启发性的方式或许就是通过文化再生产这个概念(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7; Bourdieu 1986, 1988)。文化再生产指的是学校与其他社会制度一道,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代代相传。这个概念使我们注意到,学校是通过伊利奇所说的“隐性课程”(参见上文),影响了价值观、态度和习惯的习得。学校强化了生命早期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上的差异。当孩子离开学校时,这些差异的结果是限制了一些人的机会,而促进了另外一些人的机会。

布迪厄有关阶级和社会资本的观点,详见第九章第四节第五小节的讨论。

伯恩斯坦区分的语言运用模式,无疑是与广泛的文化差异相联系的,而这类差异又支撑着人们在兴趣和品味方面的差别。来自较低阶级背景的孩子,特别是那些来自少数群体家庭的儿童,他们的言谈举止与学校中的主流方式相抵触。学校把纪律的原则强加给学生,而教

师们的权威则导向知识学习。工人阶级的孩子进入学校时,所体验到的文化冲突要比家庭背景更为优越的孩子尖锐得多。前者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文化环境。他们不仅不大可能被激励取得优良的学业成绩,而且正像伯恩斯坦所说,他们习惯的言行举止无法同教师的模式相协调,即使各方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沟通也于事无补。

孩子们要在学校度过很长的时间。正像伊利奇所强调的,他们在那里学到的要比正式教授的课程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孩子们在这里初步了解到工作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并且知道了要守时,并努力完成权威所布置的任务等(Webb and Westergaard 1991)。

17.3.4 学做工：保罗·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分析

保罗·威利斯根据他在伯明翰的一所学校中完成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一项有关文化再生产的著名讨论(Willis 1977)。虽然这一研究是在30年前进行的,但仍然是一项经典的社会学调查。

他致力于考查的问题是:文化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按照他的表述,“工人阶级的子女是如何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的”。人们经常认为,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来自较低阶层或少数族群背景的孩子,只能是认识到他们“还不够聪明”,无法指望在未来的工作生涯中得到高报酬或高地位的工作。换言之,学业失败的经验教会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智力上的局限,接受了自己是“差等”的,然后就开始投身没什么职业前途的行当。

根据威利斯的说法,这种解释根本就不符合人们生活和经验的现实。来自贫困住区的人的“街头世故”同学业成就可能没什么关系,抑或毫不相干,但是,其中所涉及的一系列能力,其精细、娴熟和复杂,与学校里所教授的智力技能不相上下。孩子们离开学校时,即使真

有人会想到,“我太笨了,整天在一个工厂里糊纸盒,对我来说也是公平的,合适的”,这样的孩子也是很少的。如果来自不太优越的家庭背景的孩子接受了干些粗活,却没有因此感到自己的一生是一种失败,那么一定另有原因。

威利斯集中考察了学校里一个特定的男生群体,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同他们在一起。这伙自称为“哥儿们”(lads)的团体成员都是白人。学校里也有许多加勒比裔和亚裔的儿童。威利斯发现,“哥儿们”对于学校的权威系统有一种敏锐的理解,但是他们运用这种理解来同这个制度做斗争,而不是与其合作。他们把学校看作是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但也可加以操纵,以利自己的目的。他们与教师之间冲突不断(他们通常把这种冲突控制在小打小闹的范围内),并从中得到快乐。他们敏于发现声称具有权威的教师的弱点,以及教师作为个人方面的软肋。

例如,孩子们在班上被要求端坐不动,保持安静,专心功课。但是这些“哥儿们”都动个不停,只有教师的瞪视会使他们当中的某一个人暂时收敛;他们可能会偷偷地说闲话,或者公开地讲一些处于反抗边缘的话语,不过一旦受到质问,也都可以搪塞过去。

这些“哥儿们”也认识到,职场将会同学校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仍积极地盼望着工作。他们并不指望从工作环境中获得直接的满足,只是迫不及待地盼望能自己挣钱。他们绝不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例如装轮胎、铺地毯、修管道、刷油漆以及搞装修等而感到低人一等,他们对工作满不在乎,正像他们对学校那样。他们享受工作所带来的成人地位,但是对为自己“打造职业生涯”不感兴趣。根据威利斯的说法,蓝领环境中的工作所包含的文化特征,常常与这些“哥儿们”在其反学校文化中创造出来的特征非常相似:相互逗笑,急中生智,颠覆权威人物的要求的技巧。只有在更往后的生活中,他们才可能发现,自己已经陷于艰苦乏味而薪酬微薄的工作中了。结婚成家以后,他

学不做工 (learning not to labour): “小男子汉”

在威利斯对伯明翰的“哥儿们”进行研究 20 多年以后,另外一位社会学家,麦尔丹·麦克安海尔在西米德兰兹^①的帕奈尔学校 (Parnell School),调查了来自工人阶级的男学生的经历 (Mac an Ghail 1994)。麦克安海尔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些男生是如何在学校中就形成了特定形式的男性特质,作为向成年男人过渡的一部分。他的阐述对于蕾伊影响很大,本章开篇就是后者描述的肖恩从小学到中学的过渡。麦克安海尔想要搞清楚,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工人阶级男生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向成人生活的过渡以及未来前途的。与威利斯笔下的“哥儿们”不同,帕奈尔学校的男生们生长在一片阴影之中:失业率居高不下,地区制造业萎靡不振,提供给年轻人的政府补贴屡遭削减。

麦克安海尔发现,对于帕奈尔学校的小伙子们来说,向成年人的过渡远比 25 年前威利斯的“哥儿们”所体验到的破碎。从学校到有薪劳动不再有明显的转变轨迹。学校里的许多男生都发现,离开学校以后的日子特点就是依赖别人(尤其是依赖家人),接受“没什么用的”政府培训项目,进入不利于年轻体力劳动者的、缺乏稳定的劳动力市场。许多学生都很迷惘,不知道教育与他们的前途有什么关系。这种迷惘也表现在对于学校教育的不同反应当中,当一些男性同龄人试图以学习尖子或“业界新锐”的身份奋力向上流动时,其他一些人则公开表示对于整个学校教育的敌意。

麦克安海尔在学校里划分出四个同龄群体。“小男子汉”是学校里最具传统色彩的工人阶级



① 原文为“West Midlands”,既指英格兰的“中西区”,也指该区的都市郡“西米德兰兹郡”,本区和本郡的中心都市正是世界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工业中心之一,也是威利斯研究的所在地——伯明翰。

群体。“小男子汉”在刚成为青少年时就抱成一团；这一群体的成员在所有科目上都处于学习成绩最差的两“组”。他们对待教育公开表现出敌意，都认为学校属于威权体系的一部分，向自己俘获的学生提出许多毫无意义的学习要求。威利斯的“哥儿们”找到了办法操纵学校环境，以使其有利于自己；而“小男子汉”却是向自己在学校中的角色发出挑战。

在帕奈尔学校中，“小男子汉”被学校管理层看作是最“危险的”与学校作对的同龄群体，并鼓励教师们使用比对待其他同学更具威权意味的手段对付他们。“小男子汉”对于工人阶级男性特质的符号展示，例如特定的服饰、发型和耳饰，是被学校管理者所禁止的。教师们不断地在过道里监督他们，训导他们“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看着我”，告诉他们“顺着走廊好好走”，参与对于学生的“监控”。

对于“小男子汉”来说，中学就是他们学习粗犷强健的“学徒期”。学校不仅是有关三个“R”读[书(reading)、写字(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的，还是有关三个“F”的[打架(fighting)、泡妞(fucking)与踢球(football)]。“罩着哥儿们”和“团结一心”是“小男子汉”们的社会世界中的核心价值。学校宛如街头，正是你争我夺的地盘。“小男子汉”们看待教师就像看待警察(公开厌恶)，并且相信，教师就是使他們与学校发生矛盾的主要

根源。他们拒绝承认教师在学校环境中的权威，而且确信自己一直是由老师“树立起来”，供惩罚、规训(disciplined)或者羞辱的目标。

与威利斯的“哥儿们”类似，“小男子汉”们也把学习和成绩看成是低等的，娘娘腔的。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被贴上“书呆子”(dickhead achievers)的标签。学校作业被径直拒绝，因为被认为不适合男人。正如一位“小男子汉”莱昂(Leon)所言：“你在这儿做的是女孩儿干的活儿，那不是真正的工作。它是给小孩儿干的。她们(老师们)就想让你把你怎么想的写下来。这关她们他妈的什么事儿。”(Mac an Ghail 1994: 页 59)

麦克安海尔的工作展现出，“小男子汉”经历了比其他男性同龄群体更为严酷的某种“男性特质危机”。这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发展一种“过时了的”工人阶级男性特质，而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那些有薪体力劳动者。可到了这时候，体力劳动者的稳定而有保障的未来已经不见踪影。根据麦克安海尔的观点，“小男子汉”们继续幻想着他们父辈曾经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充分就业”的社会。虽然他们的某些行为让人觉得过分男人气，因而显得戒心重重，但他们是坚定地以前辈传下来的工人阶级世界观为基础的。

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小节讨论了男性特质的形成。

们可能会回过头来追忆教育，并把它看作是唯一的解脱之路，虽然并无多少希望。如果他们试图把这个观点告诉给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很可能并不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成功。

17.3.5 有关教育的后现代思路

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开始

从社会冲突理论转向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背后的一些主要观念，参看第四章第三节的介绍)后现代主义对于教育意味着什么？一项重要的阐述来自英国社会学家厄舍尔和爱德华兹。在厄舍尔和爱德华兹看来，基于功能主义理论或冲突理论的各种教育学说都是属于“现代主义的”。它们接受了一种“元叙事”(meta-narrative)，就是教育传播各种理性信

念,以取代前现代的迷信。在这种教育观下,隐含着一种进步观。教育使个人有能力以自由而理性的方式思考,促成社会进步与创新。作为后现代主义者,厄舍尔与爱德华兹拒绝接受这种元叙事。他们怀疑所谓科学与理性能够解答人类所有问题的主张,怀疑存在某种真理的主张。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说为什么就应当教授这种而不是那种课程体系,或者为什么某些科目就比其他科目更为重要。

厄舍尔和爱德华兹对于现代教育的批评导出了一个问题:“一种后现代的教育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尽管他们讨论了好几种可能性,但最支持的还是发展一种体系,能够接受作为后现代思想家关注核心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多样性。这种体系将赋予个人以自由,塑造自己的教育规划,比如通过终生学习或探索文化差异(Usher and Edwards 1994)。

我们现在转向讨论教育中的不平等,包括性别、族群性和阶级,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关于成绩的一些进一步的理论。

第四节 不平等与教育

除了参加运动,在学校的正规课程中,不会再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区分男孩子和女孩子。然而,也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切入口”在引导着教育中社会性别差异的发展。它们包括教师的期望,学校的仪式,以及上文伊利奇所指出的隐性课程的其他方面。虽然正在逐渐放宽规定,然而学校强迫女孩子穿套裙或短裙的规定仍然非常明显地反映了社会性别类化(gender typing)。其后果不仅仅是造成了外表的差异。一个女孩由于所穿的衣服,会失去席地而坐的

自由,参加需要跌打滚爬的粗犷游戏的自由,有时候甚至无法尽其所能地快跑。

学校课本虽然也在发生变化,但仍有助于延续社会性别的意象。直到最近,小学的故事书还是经常会把男孩子描写成是具有创新性和独立性的人,相反,女孩子即使在故事书中出现,也都更为被动,在旁看着她们的兄长。专门为女孩子所写的故事虽然也时常描写她们的冒险行为,但这通常是指在家庭或学校的背景中,搞点小阴谋或者小秘密。男孩的冒险故事涉及的范围更广,主人公会游历远方,或者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坚毅自强。到了中学,绝大部分的科学和数学课本都倾向于让女性“隐形”,更加强化了这些课程是“男性的科目”这一观点。

如果看看学校中的选课方向,也能很明显地发现教育中社会性别的差异。所谓有些科目更适合男孩,有些科目更适合女孩,这样的观念已是司空见惯。社会学家贝姬·弗朗西丝就曾提出,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被鼓励选修学术声望较低的科目(Francis 2000)。在他们真正选修的科目方面,当然有着明显的差异。2001至2002学年,在英国参加物理学和计算机研究领域高级考试^①(或类似性质的考试)的年龄在16岁至18岁的年轻人当中,大约有75%是男生;而参加数学领域高级考试的有60%是男生。相比之下,选考社会研究和英语文学的70%是女生,而选考家政学的女生比例更是高达95%。具体差异参见图17.5。

17.4.1 性别与学业成绩

多年以来,女生一般会在中等教育的中期以前保持比男生好的学习成绩,但随后她们便

^① 高级考试:原文为“A-level”,系“advanced level”的缩略。英国全国考试制度规定,中学生年满16周岁可参加一次普通考试,及格者可在两年后参加高级考试,其难度大致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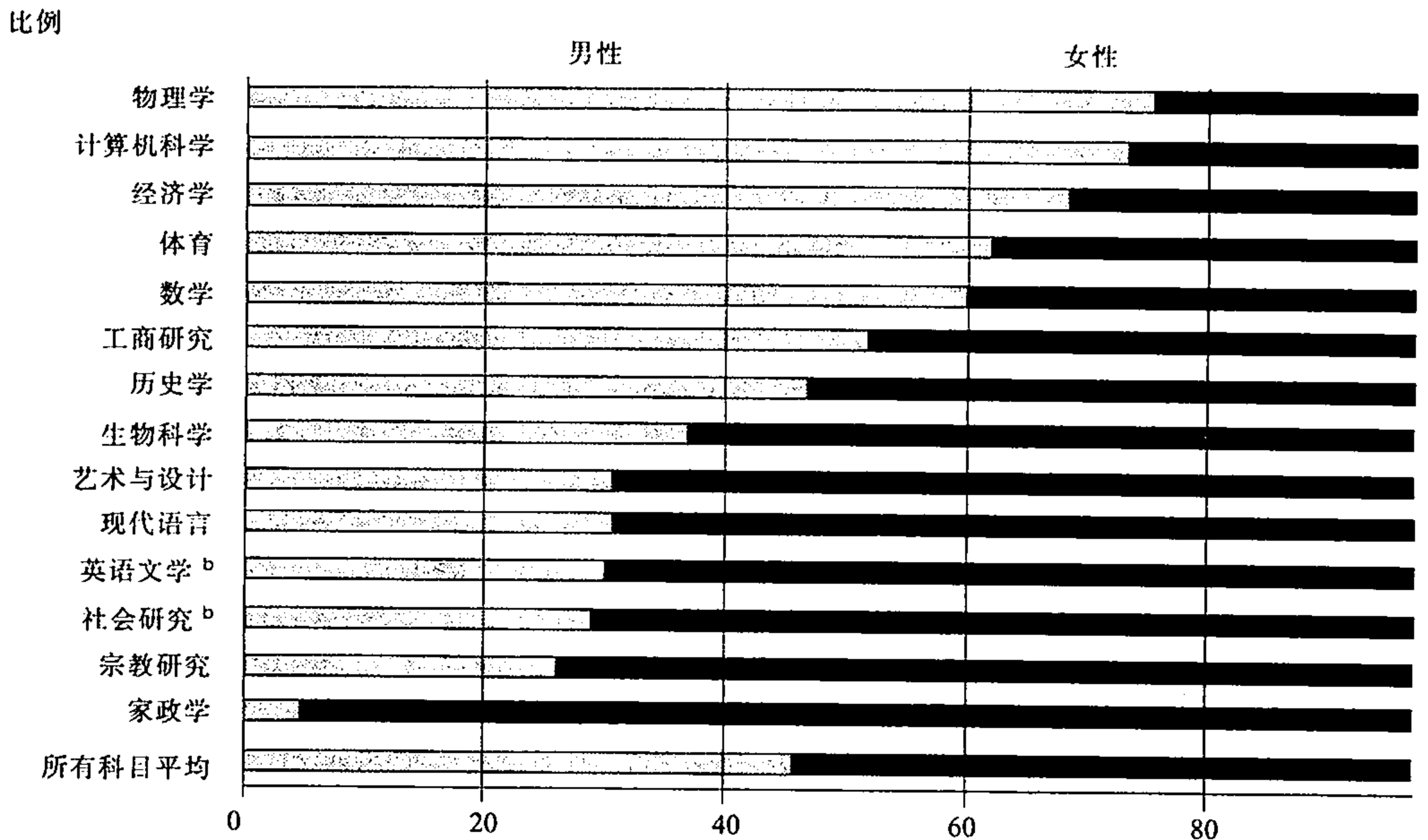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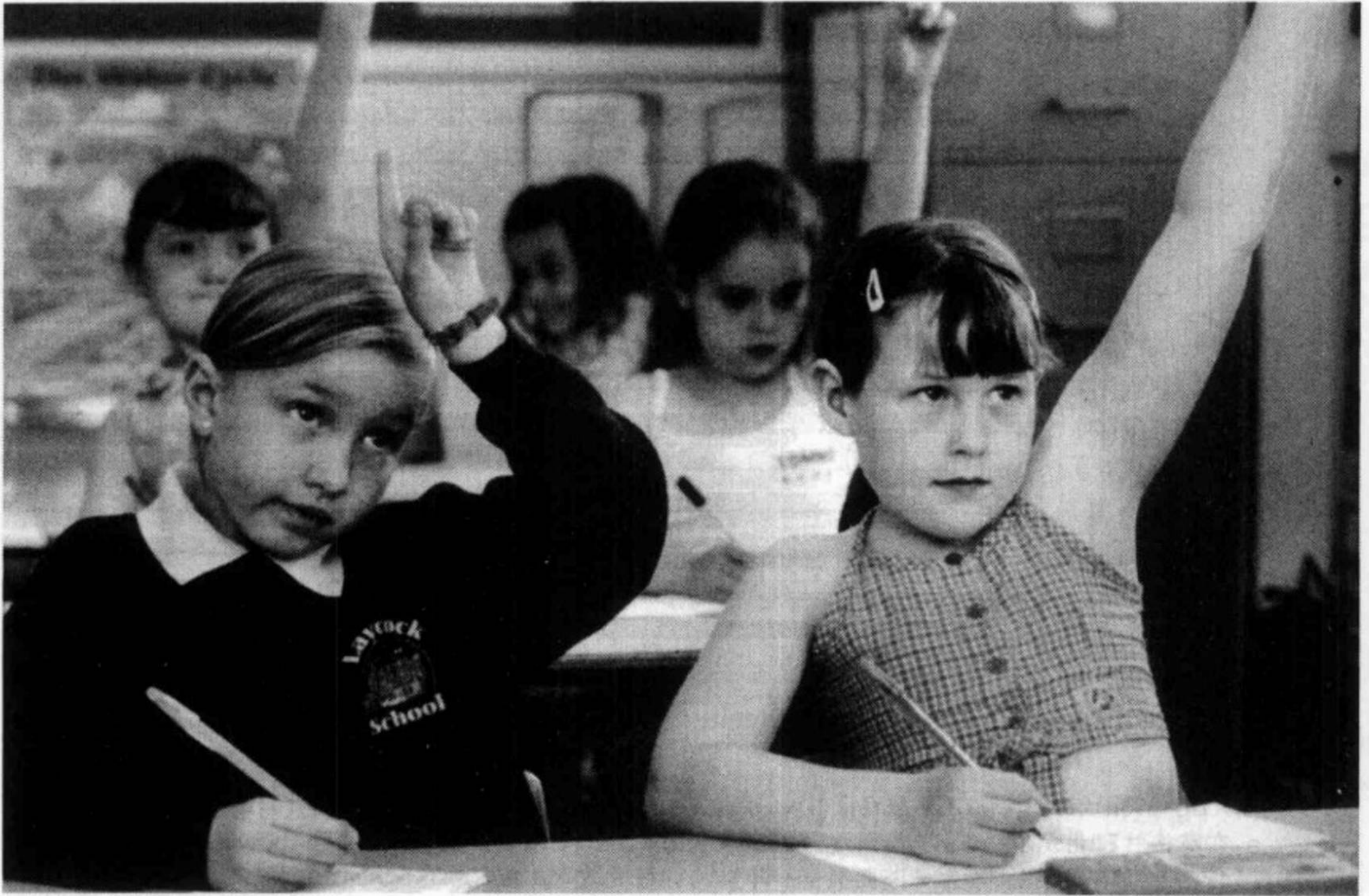
图 17.5 英国年轻人参加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或类似科目考试的比例,^a以某些科目分组,2001/02 年度(%)
 a: 在英格兰和北爱尔兰,是学年开始时中小学学生和各类继续教育机构中 16 至 18 岁的学生,在威尔士是 17 岁。而在苏格兰,学生一般要提早一年参加苏格兰教育高级证书(Highers)考试,其成绩将影响进入中五、中六两个年级的学生数。
 b: 仅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44

落在后面了。男生在 16 岁、18 岁的两次考试以及在大学里都表现得更为出色。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女生通过进入大学所必需的三门高级考试的可能性仍然比男生小,并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比男生少。考虑到这些不平等现象,女性主义研究者进行了一些重要研究,以考察性别如何影响学习过程。她们发现,学校课程常常是以男性为主导,而且教师在课堂上对男生也比对女生更加关注。

然而,近年来,关于学校中性别的争论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成绩差的男生”现在已经成为教育工作者与政策制定者普遍谈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在英国教育体系中的所有领域和所有层级上,女生的表现开始持续超过男生(如表 17.2 和图 17.6 所示)。美国也报道有类似的发现。

在美国,年轻女性要比年轻男性更愿意一直上完中学,然后上大学,并继续攻读研究生(如图 17.7 所示)。

“失败的男生”的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是因为它似乎关系到一系列更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犯罪、失业、吸毒以及单亲家庭等问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人们所称的“男性特质危机”(参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小节),麦克安海尔在前文也有探讨。较早辍学或者学业很差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找到好些的工作,建立稳定的家庭。随着英国经济情形的不断变化,提供给教育背景较差的年轻男子的非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岗位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由于服务行业的快速增长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女性占有很大比例——高达 70%。



在各级教育层次,以及大多数科目领域,女生的表现现在正全面超越男生。

表 17.2 英格兰 2004 年达到或超过预期水准的学生比例,以关键阶段和性别分组(%)

	教师评估		考试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关键阶段一				
英语				
阅读	81	89	81	89
写作	78	88	76	87
数学	88	91	89	92
科学	88	91		
关键阶段二				
英语	69	80	72	83
数学	75	76	74	74
科学	82	84	86	86
关键阶段三				
英语	62	77	64	77
数学	72	76	72	74
科学	69	72	65	67

资料来源:Social Trends 35 (2005),页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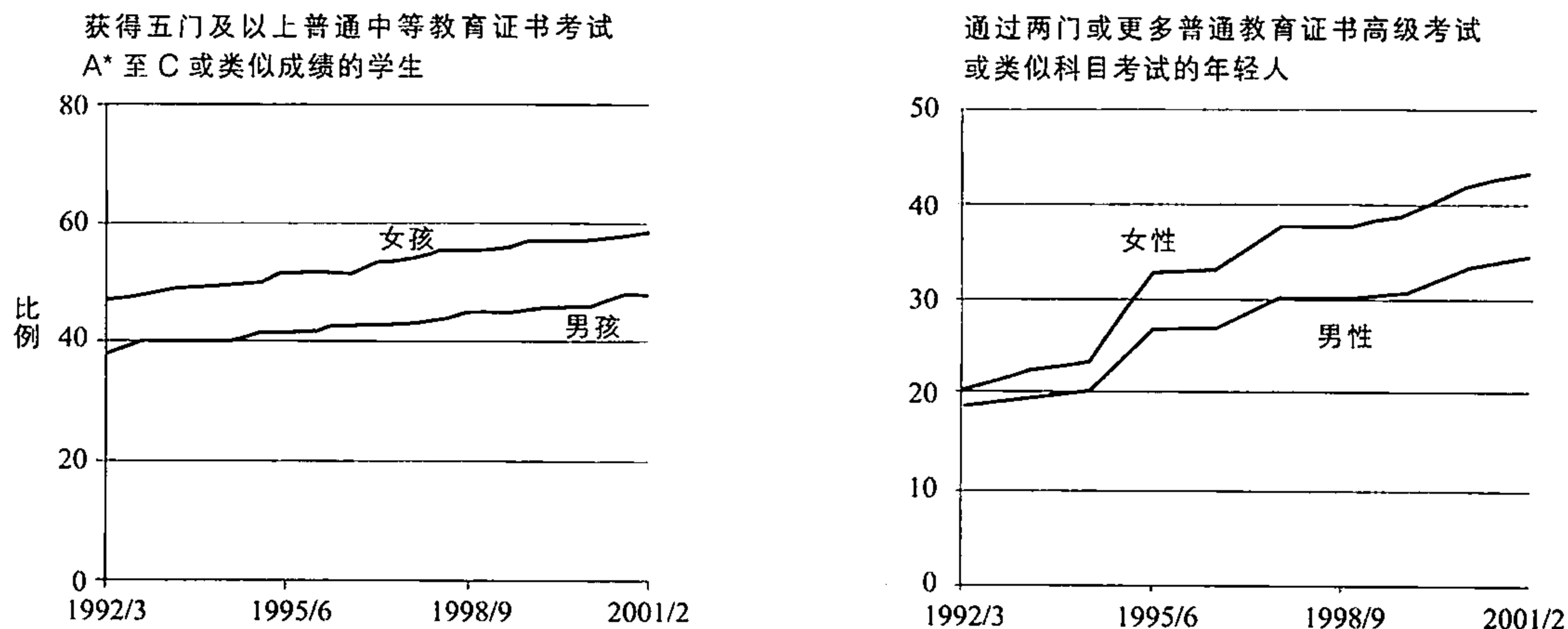


图 17.6 英国教育成就的男女性别差异, 1992/1993 年度至 2002/2003 年度
资料来源: ONS (2004c), 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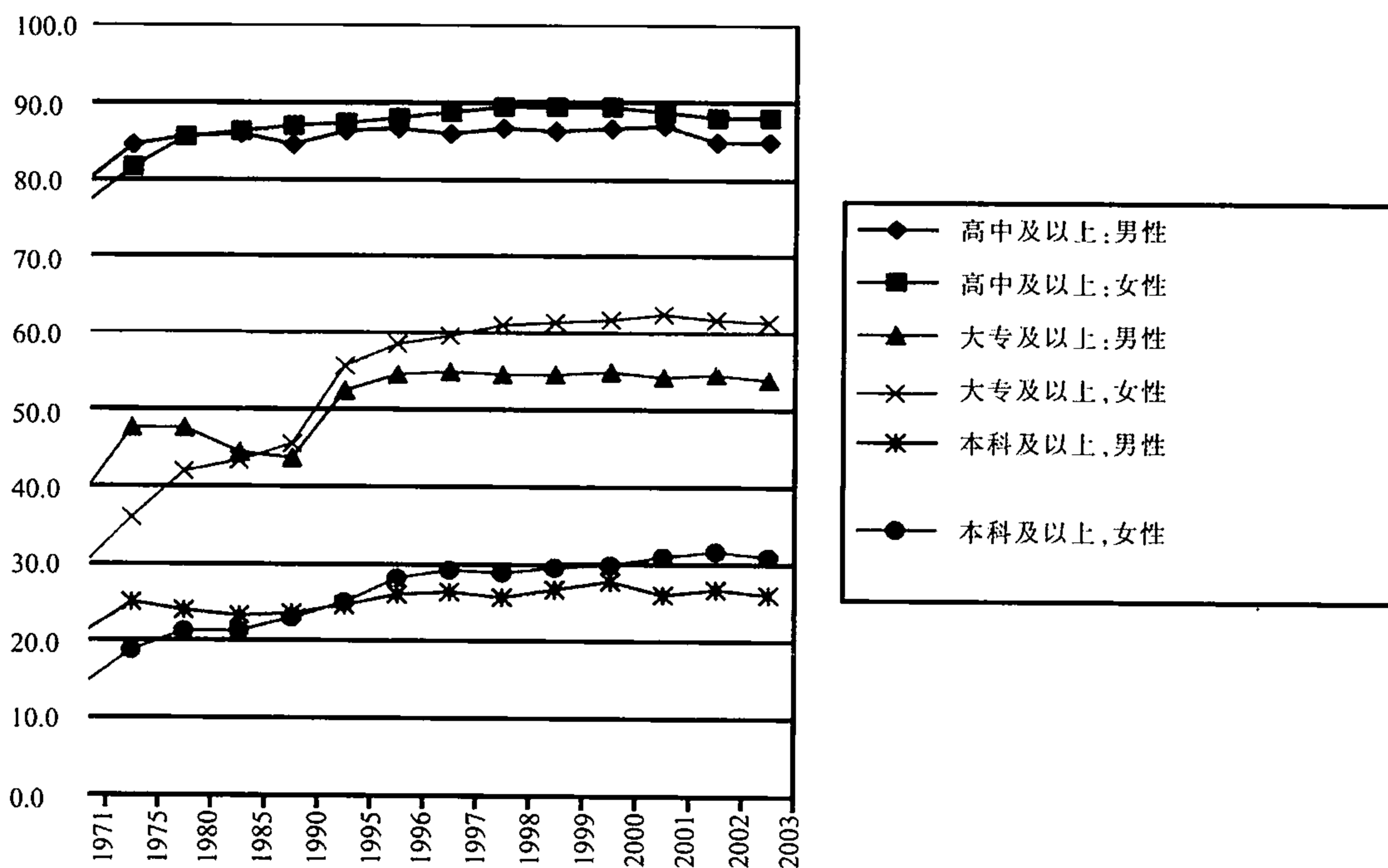


图 17.7 美国一些年份 25 至 29 岁年龄组最终教育层次比例, 以性别分组, 1971 年至 2003 年
资料来源: Child Trends (<www.childtrendsdatbank.org/pdf/6_PDF.pdf>)

一 对性别差距的解释

对于过去十年里出现的性别表现的逆转现象, 已经提出了多种说明。在说明女生于学校中取得的这些成就时, 有一个因素必须考

虑, 就是妇女运动对于女生的自尊和自我预期的影响。现在正在求学的许多女孩子都成长在一个充斥着职业女性的环境里。事实上, 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的母亲就是走出家庭去工作的。与这些积极的角色类型的接触增加了女孩子

们对事业机会的认识,并敢于挑战妇女应当是家庭主妇这一传统上的刻板印象。女性主义还有另一个结果,就是使教师和教育家们逐渐认识到了教育体系内的性别歧视问题。近些年来,许多学校都采取措施,以避免课堂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化,鼓励女生们去探索传统上属于“男性”的科目,并推广去除性别偏差的教育材料。

一些说明学校中的性别差距的理论把焦点放在男女生之间学习风格的差异上。女生们通常被认为比男生更容易组织,更容易激励,并且也被认为成熟得更早些。表现之一就是女生往往通过交谈和运用言谈技巧彼此进行联系。相反,男生参加社交活动的方式则更具行动性,例如体育运动、电子游戏或在学校操场上厮混;而且在教室里,男生也往往更具破坏性。这些大体而言的行为模式似乎在课堂上得到教师们的重新确认。教师对男生的期望不如对女生高,而且由于更多地关注男生而滋长了他们的破坏活动。

另外一种思路则关注“哥儿们精神”,即由许多男生所共享的一系列对抗教育和学习的态度与看法(上文第三节第四小节讨论的威利斯和麦克安海尔所作的研究,为这些理论提供了证据)。许多人认为,男生当中之所以出现高比率的被开除和逃学,根源在于他们认为学习“不够酷”。时任教育大臣(schools minister)的斯蒂芬·拜尔斯在1998年曾说:“我们必须挑战近年来被纵容肆虐的这种哥儿们式的对抗学习的文化,而不应该无可奈何地表示接受,说男孩子毕竟是男孩子。”

二 成绩差真的与性别有关吗?

一些学者认为,对于成绩差的男生所投入的关注以及资源未免过多。他们提出,在全世界都能发现语言技能方面的性别差距。那些过去常常被归之为男孩子“无伤大雅的懒散”(healthy idleness)的差异,现在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以及要提高男孩成绩的疯狂努力。作

为国家教学成绩的目标,各类学校排行榜与国际读写能力比较层出不穷,把性别差异公之于众,使教育中的“结果平等”成为第一要务。

批评者们认为,所有这些针对男孩子的关注都掩盖了教育中其他形式的不平等。虽然女孩子们在许多领域都在稳步前进,但是她们在学校里依然较少像男孩一样,选择那些通往技术、科学和工程等职业生涯的科目。男孩子们在11岁左右就在理科方面领先,并且直到大学都比女孩子的成绩好。例如在被认为是当前经济增长中心的化学和计算机等学科领域,男孩继续占据统治性地位。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与教育资格处于同等层次的男性相比,女性在就业市场上仍处于劣势(Epstein 1998)。

一些学者提出,比性别更有过之,阶级与族群性等因素才导致了教育体系中最大的不平等。例如,比较来自各社会阶级的学生的成绩,可以看到,70%来自高级专业人员家庭的孩子能够考过五门或更多科目,相比之下,工人阶级背景的孩子这一比率只有14%。批评者说,把注意力集中在“失败的男孩”身上带有误导性,因为男性仍然主宰着社会中的权势位置。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孩子之所以成绩不佳,与其说与性别有关,不如说与他们所属社会阶级的劣势有关。

三 性别与高等教育

正如我们前文所见(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最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的学生数有了实质性的增长。高教中这种扩张有一个显著特性,就是女生的人数增多。2001至2002学年,高等教育中的全日制学生及非全日制学生中,女性占了56%。这与仅仅几十年前的状况正好相反,那时男生远多于女生(如图17.8所示)。截至2001至2002学年,高等教育中女生的数量是1970至1971学年的六倍,而同期男生的数量只是后一学年的两倍半。

在英国以及其他的地方,妇女组织经常抨

击中小学及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在学院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有限。2002至2003学年,尽管女性占了教研人员的39%,但在全部高级教研人员当中只有26%是女性,有1860位女教授,刚刚超过总数的14%。尽管如此,高教领域还是呈现出性别愈益平等的趋势。这里引用的数据表明,仅在过去的一年中,女性教研人员的数量上升了5.7%,女教授的数量跃升了10.4%(HESA 2004)。

鉴于男性占据了高教机构更为高级的职位,女性平均薪酬也远低于男性。最近一项调查发现,在英国的所有大学里面,女性的平均薪酬都要少于男性。以整个大学部门合而观之,女性的平均所得比男性少五千多英镑。而在有些机构中,薪酬上的性别差异还要更大(THES^①,2004年9月3日)。

17.4.2 族群与教育

社会学家对于少数民族群在英国的受教育

际遇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政府也已经资助了一系列的调查,其中就包括1985年斯万委员会(Swann Committee)提交的报告《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斯万报告发现,不同族裔背景的群体在教育成就的平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以正式学习成绩为标准来衡量,来自加勒比裔黑人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往往表现最差。当然,他们这10年来已经开始进步了。尽管一般说来,亚裔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如白人孩子的家庭,但他们的表现一样出色(Swann Committee 1985)。

然而,随后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特雷弗·琼斯所做的研究表明,来自于所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孩子,在16岁到19岁的时候,要比白人孩子更有可能继续自己的全日制教育。在1988年至1990年期间,只有37%的白人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接受继续教育,相比之下,加勒比裔黑人家庭的孩子这一比例为43%,南亚裔孩子有50%,而华裔更高达77%。尽管情况似乎令人振奋,但是琼斯却对此提出一个负面的理由。少数民族的许多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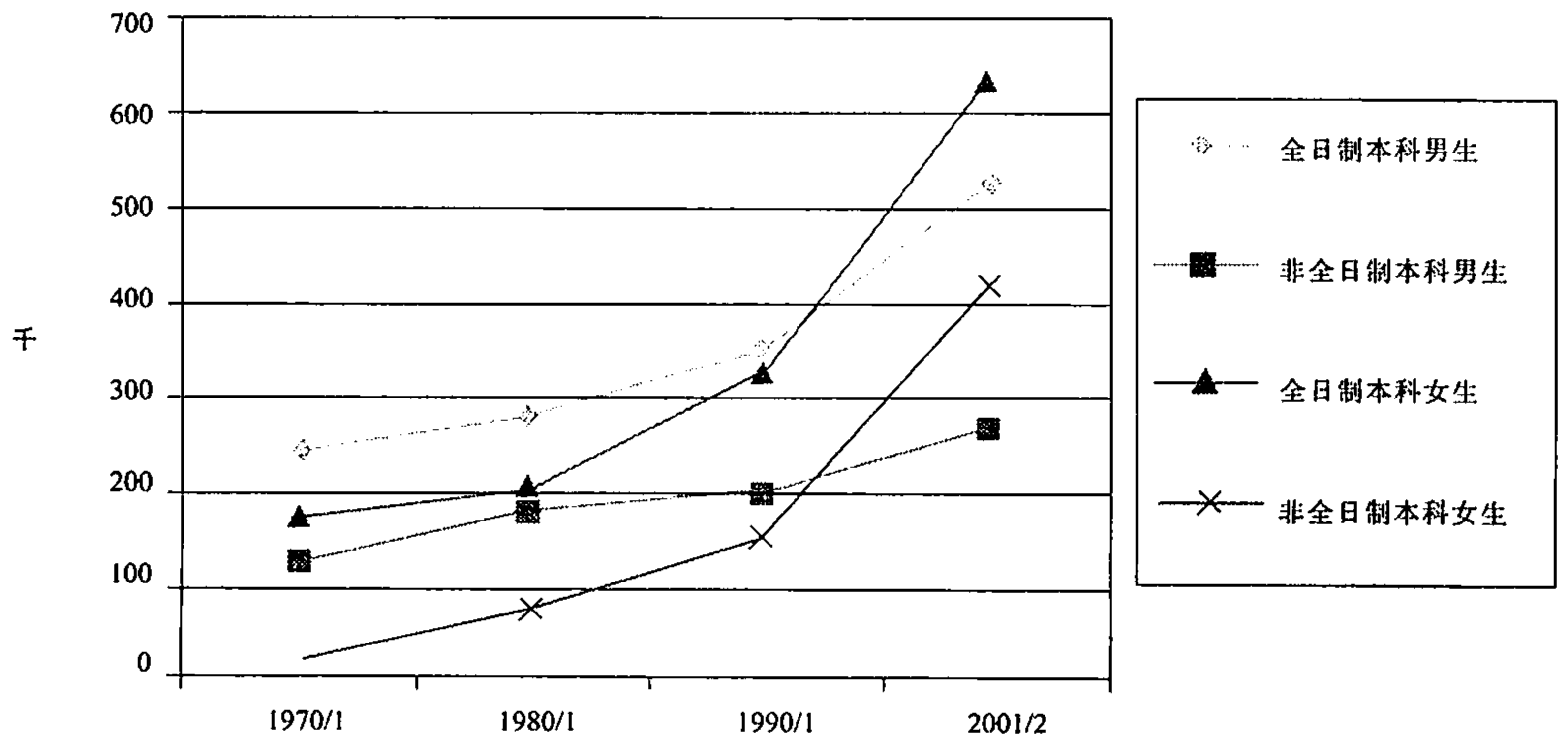


图 17.8 高等教育学生数,以性别分组,1970/71 年度至 2001/02 年度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44

① 书后书目无此文献,似应为“*The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之所以还在接受教育,正是因为找工作有困难(Jones 1993)。

从整体上看,少数民族的成员接受英国高等教育的比例并不低。平均而言,具有印度裔和华裔背景的人相比其他族裔背景的人,获得学位证书的可能性要高得多,获得的学位也更可能高得多。而自我界定为“混血儿”的男性,以及自我界定为“黑人/英籍黑人”和“亚裔/英籍亚裔”的女性,获得一项学位或高等资格证书的可能性要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HMSO 2004)。

社会排斥与学校教育

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社会排斥(exclusion)已经成为过去十年里社会学家极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并关注到教育体系外的众多孩子。在教育社会学中,经常将被学校开除(exclusion)联系到其他现象,例如逃学、少年犯罪、贫穷、父母有欠监护,以及对教育的认同低等等。

近些年来,开除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01至2002学年,整个英国有超过1万名孩子被学校永久开除(不过这标志着从1996至1997学年以来已有下降,当时被永久开除的孩子超过1.3万名)。2001至2002学年,被永久开除的男孩远远多于女孩,将近五比一。开除率还因族群的不同而不同(参见图17.9)。2002至2003学年,在英格兰各族群中,永久开除率最高的群体是加勒比裔黑人及其他黑人学生,在每万名义务教育年龄学童中,该项比例分别达到37名和32名。(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大致仅为1996至1997学年的一半,当时每万名义务教育年龄学童中被开除的分别达到78名和71名)印度裔和华裔学生的永久开除率最低。针对美国学校的研究发现,开除率在黑人学生和来自其他族群背景的学生中的分布也存在类似的差异。

在美国,经过一系列的校园枪击案,超过80%的美国学校对滋事的学生采取了“严打”

的政策。对这种政策结果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显示,黑人学生被学校开除的比率与他们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份额不成比例,并且高到不大可能单单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捣蛋滋事。在旧金山,黑人学生占被开除学生总数的52%,而他们只占学校注册学生总数的16%。在菲尼克斯(Phoenix),黑人仅占总人口4%,而黑人学生却占被开除学生总数的21%。如何说明黑人男性学生被开除的比例高这一现象?这有可能涉及许多因素。在个人层面上,开除政策有可能以种族歧视的方式实施。

有关社会排斥与族群之间的关联,详参第十章第一节第三小节的讨论。

也有必要考虑,学校开除率如何有可能反映社会中更广泛的排斥与弱势模式。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看到,许多年轻人的成长条件艰辛困苦,充满挑战,缺乏成年人的指导和支持。传统的男性特质观念受到威胁,展望未来又前途未卜。在这种动荡背景下长大的年轻人看来,学校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或者显得过于权威,而不是一处充满机遇、拓展进步的场所。

17.4.3 智商与教育

讨论至此,还没有考虑能力的遗传差异问题,也没有考虑一些人的断言:教育成就和随后的职业地位以及收入方面的差异直接反映了智力的差异。据说,在这类情形中,事实上学校体系的机会是平等的,人们各自找到与自己的先天潜能相当的层次。

一 什么是智力?

心理学家已经讨论了许多年,是否存在可以被称为智力的单一的人类能力。而且,如果存在的话,这种能力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先天确定的差别。之所以很难给智力下定义,是因为它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经常是互不相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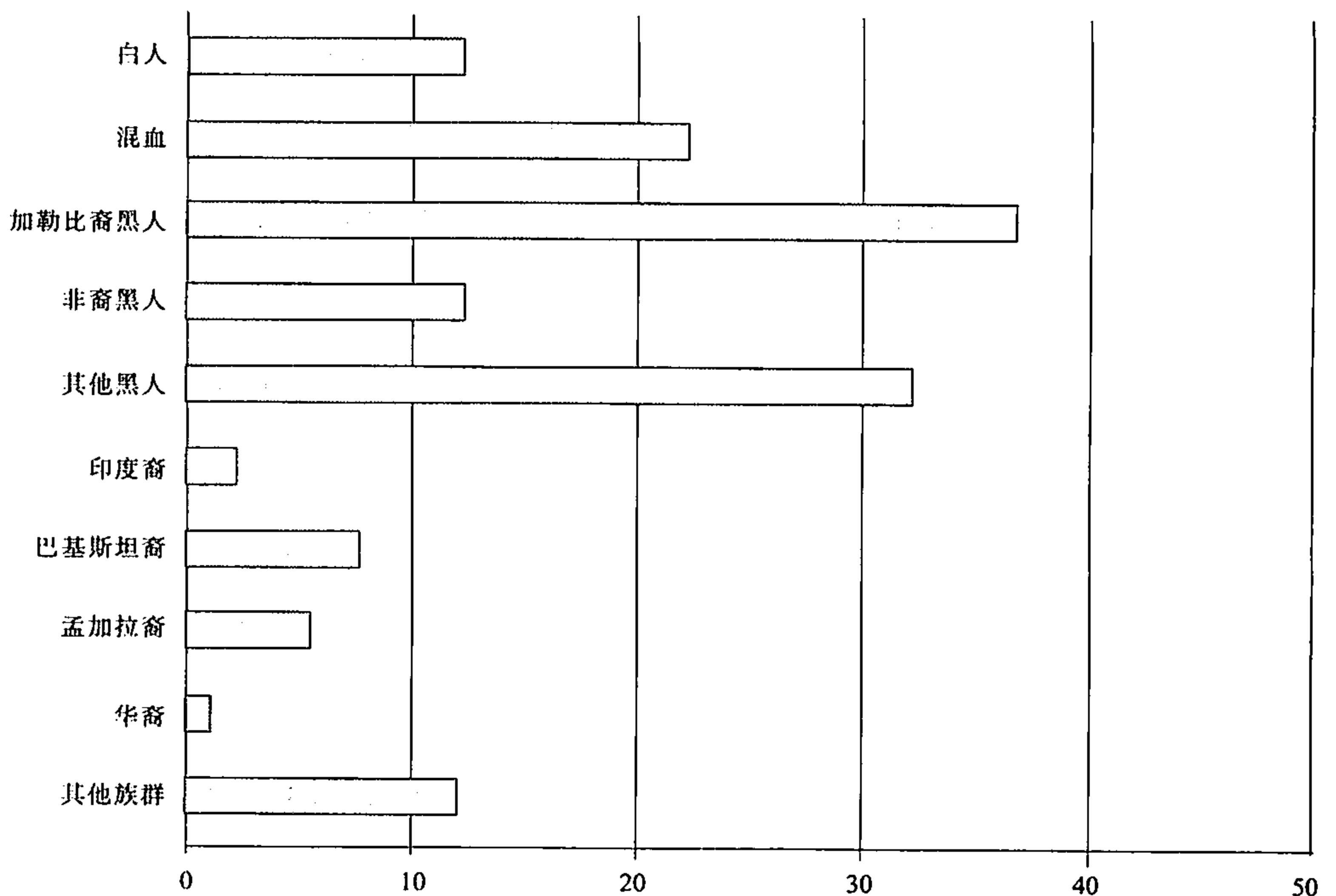


图 17.9 英格兰各族群被永久开除的比例,2002/03 年度。

a: (调查中)各族群义务教育年龄组在小学、中学和专门学校每 1 万名学生中被永久开除的人数(扣除在专门学校重复注册的人数)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2004), 页 42

特性。例如,我们可以假设,智力的“最纯粹的”形式是解决抽象数学问题的能力。然而,非常擅长解决这种问题的人,有时在其他领域的能力却很低,比如在领会历史叙事或者理解艺术方面。由于这个概念已被证实很不符合人们已经接受的定义,所以一些心理学家假设(并且许多教育者也给予默认),智力只能是被看作由“智商测验测量出来的东西”[智商(IQ),即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一种智力测试手段]。这种说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样一来,对智力的定义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同义反复。

绝大多数智商测验都兼有概念性问题和计算性问题。这类测验设计要求的平均分是 100,因而得分低于 100 的人,就被标定为“智商低于平均水平”,而得分在 100 以上的人就是“智商高于平均水平”。尽管在测量智力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但智商测验还是被广泛

应用于学术研究,以及中小学校和工商企业。

二 智商与遗传因素

智商测验的分数的确与学业成就密切相关(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测验的初衷就是预测被测试者在学校的成功程度)。因此,分数也与社会、经济和族裔方面的差异紧密相关,因为这些差异与教育成就的层级高低是有关系的。平均来说,白人学生的得分要高于黑人或其他弱势少数民族群的成员。阿瑟·詹森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商差别部分地归因于遗传差别,从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Jensen 1967, 1979)。

到了晚近,心理学家理查德·J.赫恩斯坦和社会学家查尔斯·莫里以一种有争议的方式,重新揭启了一场有关智商和教育问题的讨论。他们在其著作《钟形曲线:美国人生活中

的智力和阶级结构》(Herrnstein and Murray 1994) 中提出,已经积累了大量证据,充分表明智商跟遗传基因有关。他们认为,不同的种族和族群之间的智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定与遗传有部分关系。他们引用的绝大部分证据来自于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根据赫恩斯坦和莫里的观点,这些证据表明,平均而言,一些族群要比其他族群的智商高。亚裔美国人,特别是日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在总体上要比白人的智商高,虽然差异并不是很大。然而,亚裔和白人的平均智商要比黑人高许多。赫恩斯坦和莫里总结了 156 项研究的发现后提出,在这两类种族群体之间,智商平均得分差 16 点。两位作者认为,这类遗传智力的差别对于美国社会中的社会区分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人越聪明,在社会层级中上升的机会就越大。那些站在顶层的人之所以在那儿,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要比人口中的其他人更聪明。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有些人之所以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就是因为平均来说,他们不够聪明。

批评赫恩斯坦和莫里的人否认种族和族群之间的智商差异源于遗传。他们认为,智商的差别来自于社会和文化差异。他们指出,智商测验中所提出的问题,例如有关抽象推理的问题,更可能是较为富裕的白人学生的经验的一部分,而不属于黑人和少数族群学生的经验。影响智商测验分数的因素,也可能与据说要测量的那些能力毫无关系,例如是否在测验时感到紧张。研究已经证明,当测验主持者是白人时,非裔美国人的得分要比测验主持者是黑人时低 6 分 (Kamin 1977)。

观察其他国家被剥夺的少数族群,诸如印度的“不可接触者”、新西兰的毛利人以及日本的部落民,结果强烈地意味着,非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在智商上的差异源自社会和文化差别。所有这些群体的孩子,他们的智商分数要比主要族群的孩子平均低 10 到 15 分。这种结论充分表明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别来自于社会和文化的差别。一项对于 14 个国家(包括美国)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证

实了这个观点。该研究表明,总人口的平均智商分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呈显著上升。智商测验是定期更新的。如果对同样的人群按照测验的新旧两个版本进行测量,他们在旧测验上的得分明显更高。现在的孩子接受 1930 年代版本的智商测验时,要比当时的测验群体平均高 15 分,正好等于目前把黑人和白人区分开来的平均差别。今天的儿童在智力上并不天生高于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据推测,这种转变可能来自于经济的愈益繁荣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在社会和经济上的平均差距,至少与不同时代之间的差距不相上下,并且足以说明智商分数的变化。同时,依据整个群体的平均得分,并不能预测该群体任一特定成员的智商水平。个体之间的遗传差别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智商测验分数,但是因此就说一些种族在总体上比其他种族更聪明,仍然未经证明,不大可信。

钟形曲线之战

在《钟形曲线之战》一书中 (Fraser 1995),许多著名学者合力研讨赫恩斯坦和莫里的观点。该书的编者把《钟形曲线》说成是“过去十多年中出现的最具有煽动性的社会科学作品”。书中的主张和断言“招致信函如雪片般涌向各大报刊杂志的编辑,更不用说在广播和电视中展开的成篇累牍的直播讨论了”(Fraser 1995:P.3)。

根据《钟形曲线之战》的作者之一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 (Gould, 1941—2002) 的观点,赫恩斯坦和莫里在四个主要论点是错误的。他反对他们的主张:智力可以用一个单独的智商分数来描述;可以在单一一份智力量表上对人们进行有意义的排序;智力大部分来自于遗传;而且它是不能被改变的。他表示,所有这些假设都有问题。

另一位作者霍华德·加德纳也提出,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人们已经逐渐不再把智力看做是一个一般范畴的观念。只存在“多重智力”,即实践的、音乐的、空间的、数学的等

等。《钟形曲线之战》的其他作者也主张,智商分数与以后的工作表现之间并没有系统的联系。他们共同反对的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古尔德总结说:

我们之所以必须同“钟形曲线”的学说做斗争,既因为它是错误的,也因为如果它付诸实践,就将切断根据每个人的智力进行适当培养的一切可能。当然,我们不可能都成为航天科学家或脑外科医生,但是那些不可能成为这类人的人却有可能成为摇滚乐手或者专业运动员(并因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和薪酬待遇)。(Fraser 1995:页 22)

三 新智商歧视

大卫·吉尔伯恩和德波拉·扬代尔在他们合撰的文章《新智商主义:智力、“能力”与教育资源配置》中提出(Gillborn and Youndell 2001),尽管晚近的教育中很少公开应用各种智商测试指标,但教育学家现在用“能力”(ability)这个术语的方式也基本差不多。吉尔伯恩和扬代尔认为,“能力”这个术语的应用方式,是系统地将学校中的黑人学生和工人阶级学生置于弱势地位。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位作者对伦敦两所学校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他们对中学的教师以及三年级和毕业班的中学生进行了访谈与观察。两位作者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两所学校里,教学的型态都受到所谓“中等以上经济”(the A-to-C economy)的深刻影响。他们用这个术语的意思是,学校的核心目标就是尽可能提高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获得五门及五门以上中等以上成绩的学生比例。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政府每年公布的官方学校排行榜中,达到这一标准的学生比例是一项关键评级指标。其中一所学校的校长在致教职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最值得我们去做的就是尽可能扩大达到五门高分水准的学

生比例。”

尽管这似乎是一项值得赞许的目标,但吉尔伯恩和扬代尔发现,它使教师们倍感压力,在那些她们认为有能力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考出五门或更多门中等及中等以上成绩的学生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样做的结果,“两所学校都越来越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投放不同的时间和精力。”教师必须做出选择,决定什么学生有能力考出五门不错的中学会考成绩,然后给予这些学生最多的关注。两位作者发现,在两所学校里,教师们对于何谓一个学生的“能力”的观念,决定了她们是否认为某个学生有可能考过五门或更多门的中学会考。根据他们对于教师和学生的访谈与观察,吉尔伯恩和扬代尔更清晰地了解到教师们对于这个词的想法。他们发现,“能力”被认为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决定了不同学生的潜能(按照一位校长的话来说:“你不能把能力给某个人,不是吗?你不能完成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不是吗?”)。调查还发现,教师们常常相信,能力能够以客观的方式测量出来。在一所学校,学生们一进校就参加了一次所谓“认知能力”测验,教师们视之为日后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表现的有效标示。

吉尔伯恩和扬代尔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两所学校里,学生们都抱怨说,“都是同龄人,有些人更受宠些”。这些受宠的就是被视为有能力的学生。而他们往往来自白人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吉尔伯恩和扬代尔访谈了一位教师,她认为那些比较贫困的、失业的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期望,比不上那些“中产阶级”或人们说的那种上向流动的工人阶级的父母。“就这样,阶级和父母的期望融入了教师对于一位学生“能力”的评估。两位作者还指出,他们“观察到许多情形下,黑人学生比来自其他族群背景的同龄伙伴来,似乎受到的对待更为粗鲁,而得到的期待也更低些。”作者们认为,有关什么学生具有能力的这些信念,构成了对于来自黑人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的一种无意之中的歧视。

教师对于哪些学生具有能力的这些非官方评估意味着,来自黑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相比于来自白人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报名参加较高级别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这种级别的考试才能授予最高分数)。教师对于学生能力的看法也深深影响了确定学生最终进入哪一种教学班,来自黑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即使完成学业的水平与来自白人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相当,也更有可能会落到慢班。其结果也就顺理成章,来自黑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中学会考中较少考出五门中等及以上成绩,也因此增强了教师对于他们能力的评估。比如说,在一所学校里,黑人学生中有16%在中学会考里考出了五门或更多中等或以上成绩,相比之下,白人学生中这一比例为35%。这些结果典型地体现出全国的模式,显示出来自黑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在学业上表现低于平均水平。

吉尔伯恩和扬代尔认为,正是以这种方式,有关“能力”的预设无异于此前数代有关智力的那些信念,即认为英国中学存在上中下“三级”划分(文法学校、技术学校、现代学校)。作者们还指出,这类信念也渗透到新工党的教育思维当中。自工党1997年经选举上台执政以来,它继续支持学校中的“分班”,根据学生的能力加以分组。两位作者提出,对于不同阶级和不同族群之间的学业成就水平差异,这些有关能力的预设扮演了重要角色。

吉尔伯恩和扬代尔的结论是,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尽管对于《钟形曲线》之类书中提出的所谓智力基本上是遗传的这种观念,绝大多数教育学家都明确表示反对,但“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遗传论者已经获胜。没有任何切实的辩论,英国的教育体系正逐渐回归一种政策和实践,想当然地接受赫恩施坦和莫里之类的智商论者所提出的那些预设。”在吉尔伯恩和扬代尔看来,人们熟知的那些社会区分(尤其是种族和阶级方面的那些区分)正通过一种特定的语言而重新浮现,似乎是要强调学生们的个人“能力”,但其实是基于有关群体特性的偏见。

四 情感智力与交际智力

丹尼尔·戈尔曼在其《情感智力》一书中(Goleman 1996),试图让讨论不再纠缠于智商之辩。戈尔曼提出,“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在决定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方面,可能至少与智商同样重要。所谓情感智力,指的是人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情感,也就是激励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具有自控、热情和坚韧的能力。一般来说,这些特性都不是遗传的,而且儿童在这方面所受的教育越多,他们利用自身智力能力的机会也就越多。根据戈尔曼的观点,“我们中间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有可能因为抑制不住巨大的热情和冲动而遭受失败。高智商的人在个人生活中,可能是个非常糟糕的领航员”(上引书,页34)。这就是为什么普通智力的测度同以后的成就关系不是很契合的一个原因。

一项研究随后就此展开,跟踪调查95名在20世纪40年代毕业的哈佛学生。到他们年届中年时,那些在大学里智商测验分数高的人同得分低的学生相比,就事业而言只是稍微成功一点点。另一项研究则考察了智商量表的另一端,研究了450名男孩,他们全都来自哈佛附近的一个贫民窟地区,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于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这个群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智商低于90。同样,智商同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只有很弱的关联。比如说,智商低于80的男性有7%失业,但是智商高于100的男性中也有7%的人失业。儿童时期的一些能力,例如把握情绪的能力,同其他人友好相处的能力,则是更好的预测因子。正像加德纳所指出的:

交际智力(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是理解其他人的能力:激励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如何工作,如何与他们合作。成功的销售人员、政治家、教师、临床医生和宗教领袖都很可能是有着高水平交际智力的人。交际智力……就是为自己

塑造一个精确、真实的模式,并且能够让该模式在生活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能力。(Gardner 1993:页 9)

我们必须修改关于智力的观念,以便涵括生活中带来成功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教育本身也应如此。教育这个观念远比正规学校教育更为宽泛。它也不再仅仅被视为个人进入工作生涯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随着技术的变迁,必需的技能也在发生变化,即使单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待教育,说它是为人们提供与工作相关的技能,绝大部分评论者也都相信,将来需要的是终生接受教育。

第五节 教育与新型传播技术

信息技术的推广一直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对教育发挥影响。知识经济需要的是会运用电脑的劳动者,因此越来越明确的是,教育能够而且必须在满足这一需求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个人拥有电脑的比率在近些年大幅度上升,但是仍然有许多孩子的家里没有电脑。有鉴于此,学校就成为年轻人学习并习惯运用电脑和网络技术的重要平台。

17.5.1 教室中的技术

正如我们在本章前文所见,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的兴起是与 19 世纪发生的其他许多重大变迁相联系的。一个就是印刷术的发展和“书籍文化”的到来。书籍、报纸和其他印刷媒体的大众传播,同机器和工厂一样,都是工业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教育使人们拥有了文字能力和计算技能,从而能够进入印刷媒介的世界。再没有什么能比课本或教材更具有学校的特征了。

在许多人眼中,随着现在的教育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以前的这些观念统统都会发生变化。那么,数字媒体会逐

步代替课本吗?如果孩子们变成打开计算机去学习,而不是听教师讲课的话,学校还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存在吗?据说,新技术并不只是对现有课程进行补充,还会打破并改变这些课程的形态。对于成长在信息和传媒社会的现代青年来说,相比于大多数成年人,包括他们的教师,他们对于这类技术要熟悉得多。

近些年来,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方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英国,已有一系列的全国行动方案,旨在使英国的学校实现现代化和电脑化。图 17.10 至图 17.13 揭示了英格兰学校中的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扩张,意味着截至 2002 年,几乎所有学校都已经接通了互联网。

有些评论家在谈一场“教室的革命”,即“桌面虚拟现实”(desk-top virtual reality)的出现,没有围墙的教室的到来。似乎没有人会怀疑,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计算机使孩子们有机会独立工作,在网络资源的帮助下研究课题,以及从教育软件中受益,因为这些教育软件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学习。然而,让儿童完全通过个人电脑进行学习,这样一种教室图景(或者是噩梦)尚未实现。事实上,“没有围墙的教室”似乎还有待时日。

即使是学校或家里有足够的计算机周转(尽管每台计算机需要服务的学生数正在迅速下降,但这依然未成现实,参看图 17.11),绝大多数的教师仍然把计算机看成是对传统授课的补充,而不是一种替代。学生可以在标准课程的范围之内利用计算机完成任务,例如制作研究计划或者调查时事动态等。但是,很少有教育工作者会认为,作为一种媒介的信息技术能够替代由作为人的教师提供的教学与互动。对于教师来说,挑战在于要学会把新的信息技术融入课堂,其应用方式既要有意义,从教育上说又扎实有效。

17.5.2 网络大学的来临?

回到 1971 年,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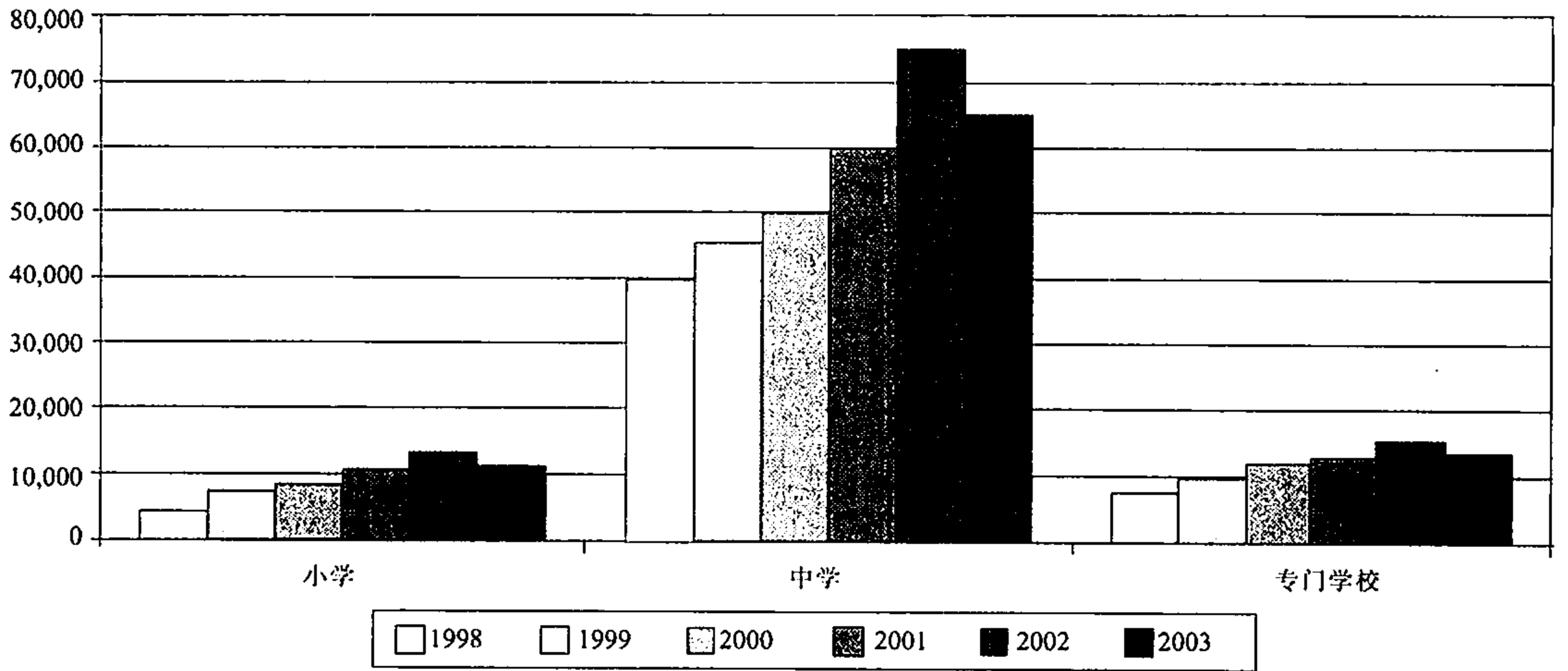


图 17.10 信息与计算技术方面的校均经费,以学校类型分组,1998 年至 2003 年
资料来源: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页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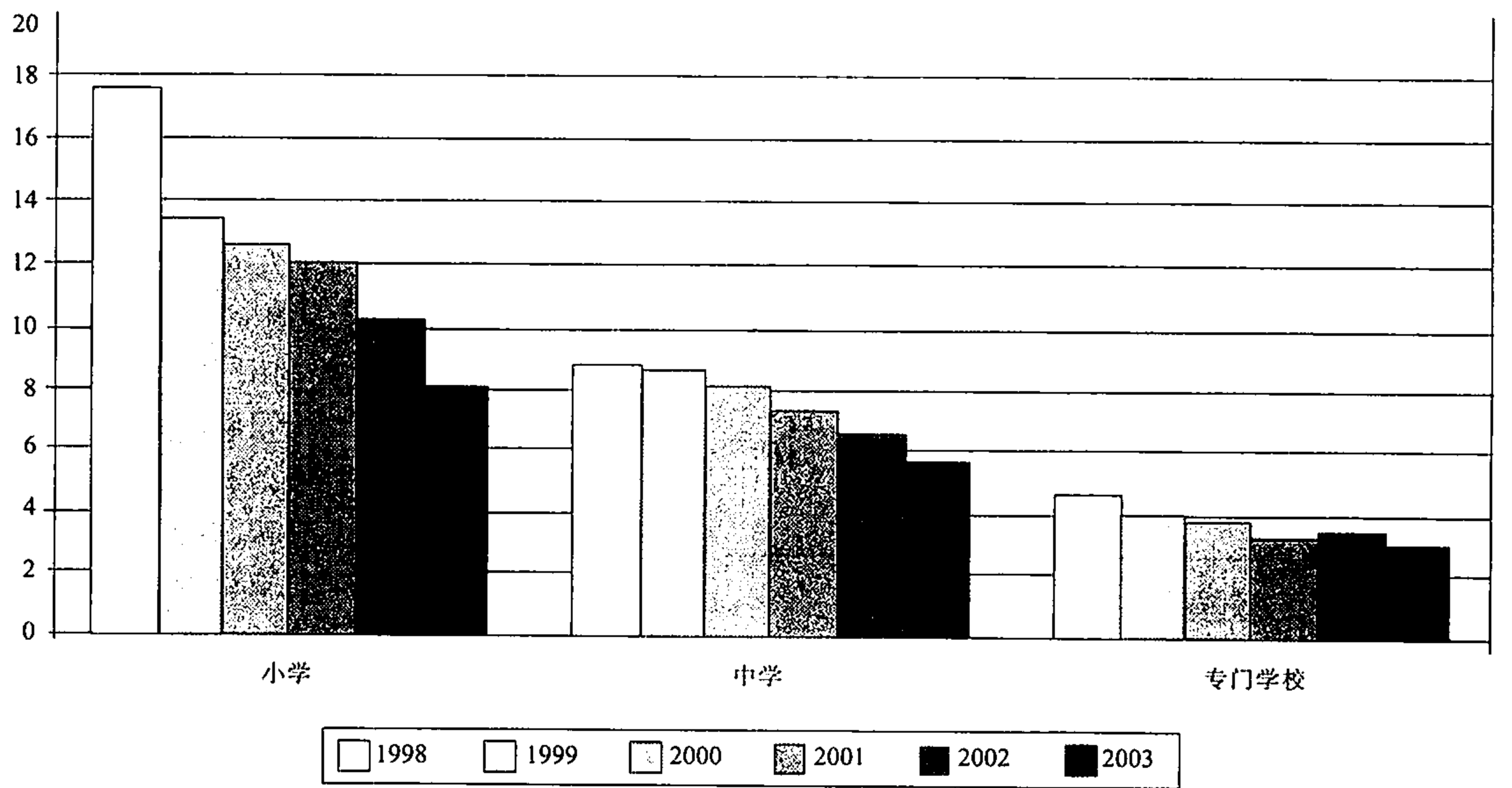


图 17.11 每校人机比(每台计算机使用人数),以(英格兰)学校类型分组,1998 年至 2003 年
资料来源: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页 5—7

University) 在高等教育中率先使用电视进行远程学习。它的课程节目由 BBC 在早间和夜间播出。学生把这些节目与书面材料相结合,通过函授进行学习,与个人导师会面,在暑期课程中和其他学生见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在家里修习高质量的学位课程,并且常常

还是在职学习。现在,开放大学已经成为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了,并且正逐渐纳入网络教学,但依然坚持保留与学生见面的内容。

而现在的互联网对于教育的转型作用,比起三十年前的电视更为深刻。这种思路的开路先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的凤凰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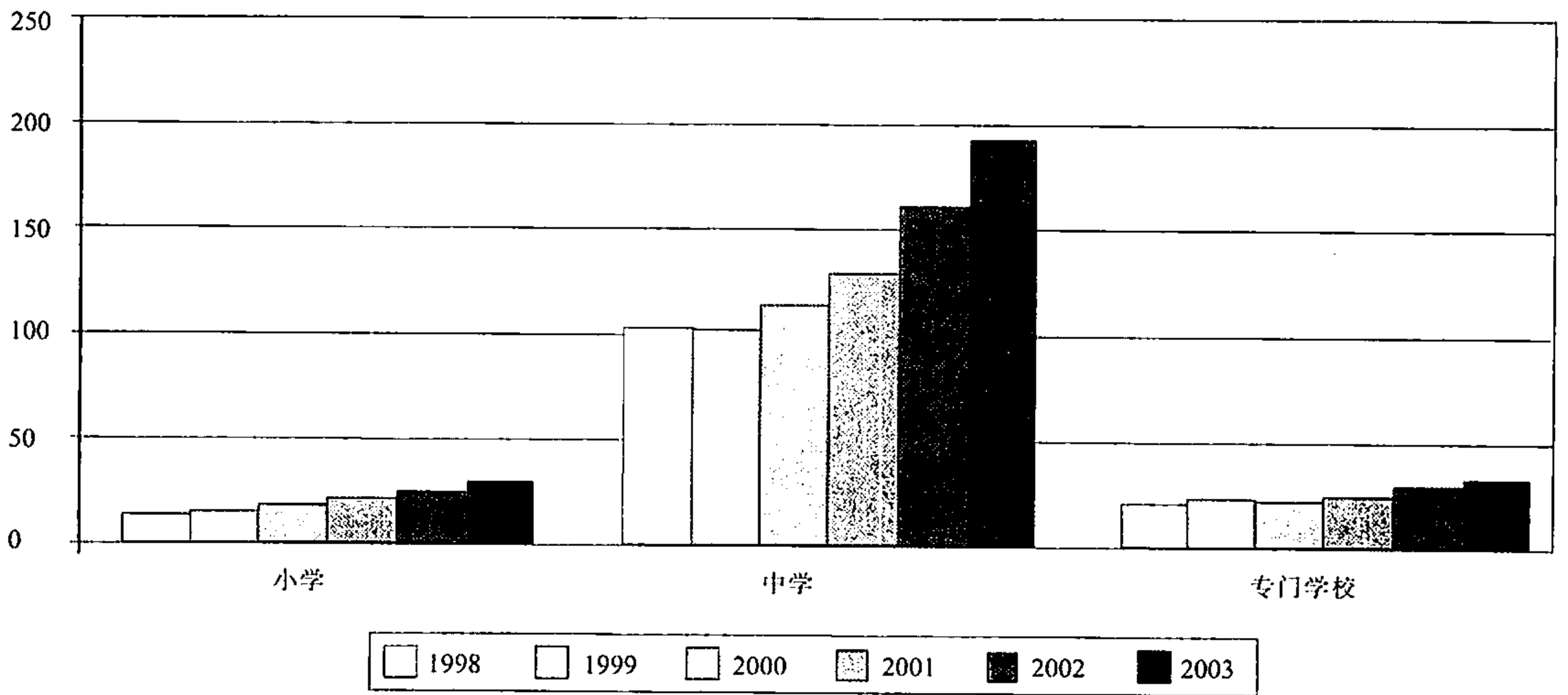


图 17.12 (英格兰) 每校主要或纯粹用于教学科研目的的计算机平均台数, 1998 年至 2003 年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 页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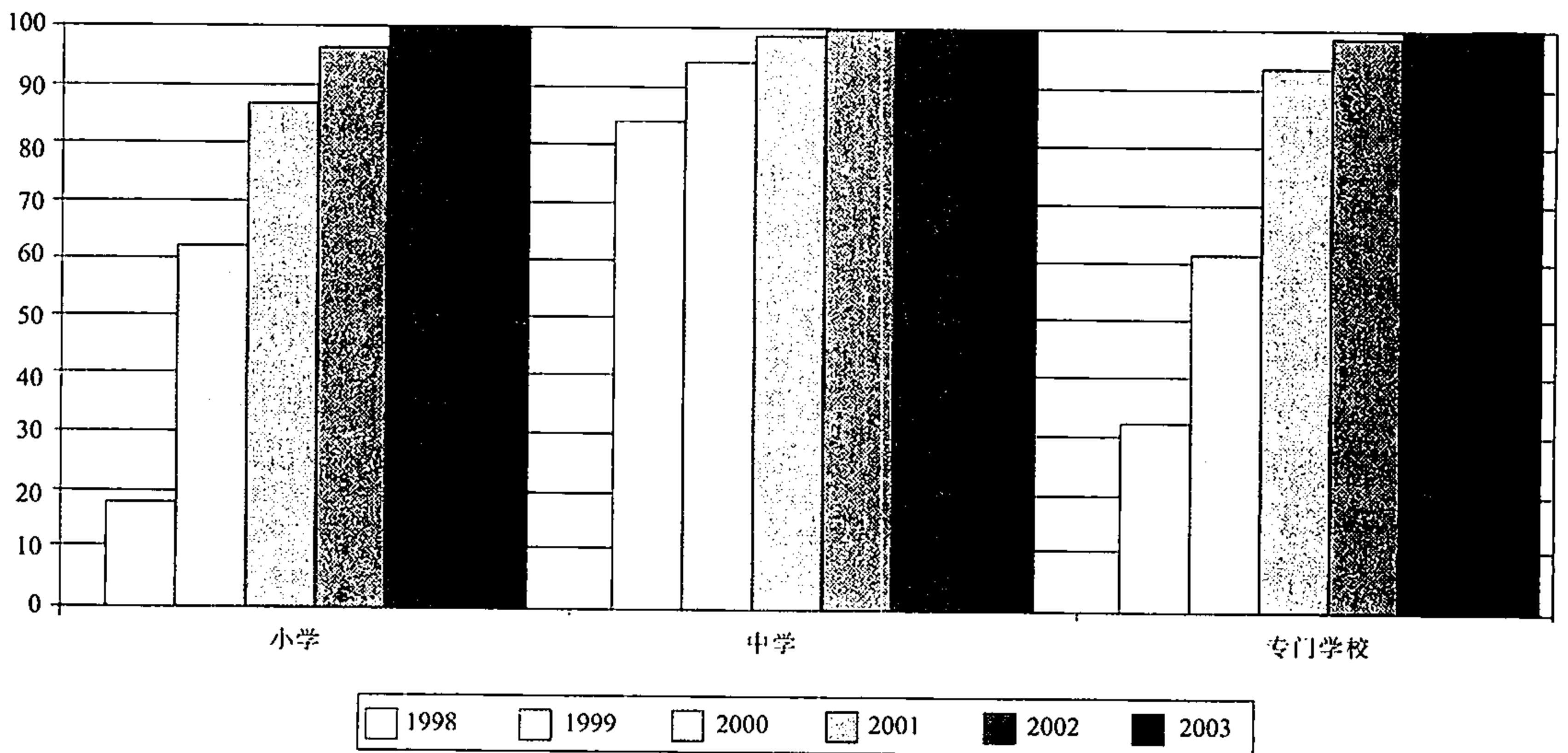


图 17.13 (英格兰) 互联网接入学校的比例, 1998 年至 2003 年
资料来源: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 页 5—7

(University of Phoenix)。该大学始建于 1989 年, 是美国经鉴定为合格的大学中规模最大的。然而, 与绝大多数其他大型的美国大学不同, 它既没有绿草如茵的校园、规模庞大的图书馆可以自诩, 也没有足球队或者学生活动中心据以自傲。在这所大学注册的 68000 名学生主要是在互联网上见面和互动——这就是凤

凰城大学的“网上校园”, 或者是分别在坐落于北美各大城市的五十多个“学习中心”见面。

凤凰城大学提供的可以完全在网上完成的学位计划有十多套, 从而使学生们实际所在的地理位置变得无足轻重。网络上的“邮件组”代替了具体有形的教室; 学生们不再需要亲自出场来做口头报告或讨论问题, 而是把作

业在电子课堂上公布,以便其他学生和导师阅读。还有一座电子图书馆,可以供学生们完成研究和阅读作业。每周开始时,该门课程的导师就以电子方式公布本周的阅读书单和讨论主题。学生们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可以在白天或者晚上的任何一个时间进入“电子教室”——完成导师布置的作业,同时导师会批改作业,并且把批注了评语的作业反馈给学生。

在凤凰城大学,别具特色的不仅仅是学习的媒介。这所大学只招收年龄在23岁以上、并且在某一工作场所就业的在职人员。这所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从结构到内容都面向成年专业人员。这些人需要新的技能和资格证书,但在完成这种继续教育的时候,又不能与其繁忙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相冲突。因此,各门课程都是集中为五到八周的强化学习板块,并且全年滚动进行,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学期课程表授课。

凤凰城大学与传统大学的不同之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是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机构,为一个名叫阿波罗传播(Apollo Communications)的公司所拥有。创办10年后,凤凰城大学每学季^①的平均利润已经高达1280万美元。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城市学院(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时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有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由私人运营,而非公共运营。拥有管理专家、技术生产及传播方面的专家的外界组织,开始作为咨询顾问或者管理者进入教育体系。

不可否认,基于互联网的学习虽然具有灵活性和便利性的特点,但是这种思路也并非没有受到批评。许多人都认为,没有什么形式可以替代真正的互动环境中的面对面式学习。未来各代的学习者是否只是知道自己同学在网上用户名,而不再了解这些同学的其他情况?技能取向的实用性学习是否会削弱“以学习本身为目的”的抽象推理和学习的重要性呢?

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已经促成了高等教育

领域的一个全球市场。诚然,由于留学生、跨国研究项目与国际学术会议发挥的作用,高等教育向来就拥有一种国际性的维度,但是,全新的机会正在大量涌现,让学生、教研人员以及教育机构之间实现全球性合作。通过基于互联网的学习,以及“网络大学”的形成,全球性受众能够更方便地获取教育与资格证书。现在,文凭、证书以及学位都可以在具体有形的教室和传统教育设施之外获得。一些有竞争力的机构和公司,其中一些还是以商业目的为基础进行运作的,正在涌入全球教育市场。知识与学习比以往更加“方便易得”。

即使是传统的大学,也正在采取步骤向“网络大学”迈进,各教育机构组建的联合体正逐步通过网络共享学术资源、研究设施、教学队伍和学生。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日渐了解到,与存在优势互补的其他机构保持这些伙伴关系,好处多多。随着学术知识的突飞猛进,技术革新的日新月异,即使是最为精英的院校,也不可能所有领域都始终处于最前沿。通过在线合作,它们可以把各自的专长集中共享,并且使联合体内的学生和研究者都能够获得这些资源。例如,伦敦的学生可以从网上直接进入旧金山的在线图书馆,通过电子邮件与其他地方的专业教研人员通信,以澄清问题,并且在研究项目上进行合作。

小结:教育的未来

新传播技术在教育领域创造出巨大的新机会。它们使正规教育有可能摆脱教室或讲演厅的局限,触及世界任何地方的新学生,无论其年龄高低、性别男女、阶级贵贱。尽管如此,仍有批评者指出,新兴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并不是一种给人带来解放和平等的力量,而是会强化教育中的不平等现象。教育除了再生产出

^① 原文为“quarter”,一年约四期,每期约12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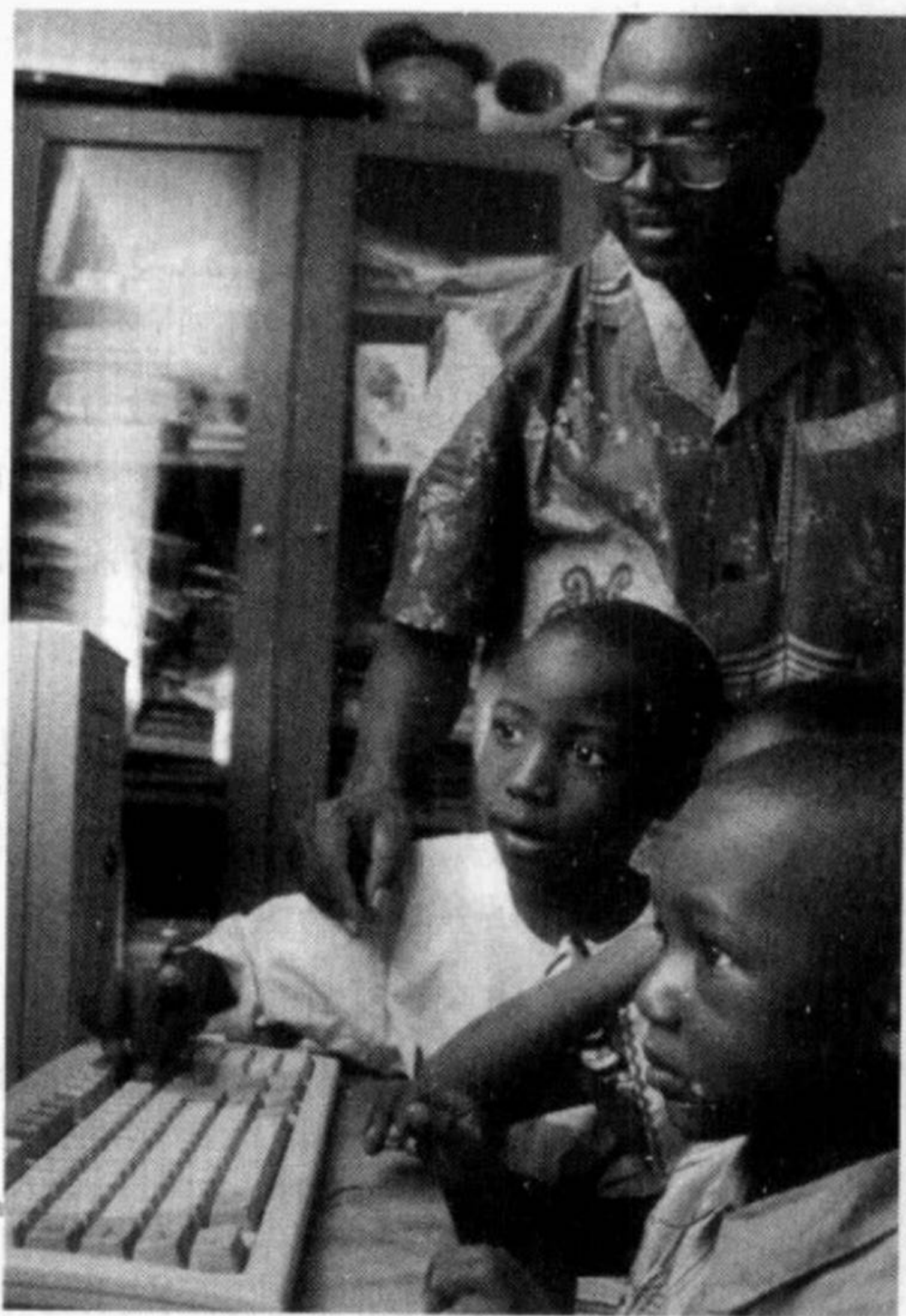
物质剥夺和不平等,还有可能再生产出信息贫困,这也是本章所讨论的内容。技术变迁步伐迅猛,雇主愈益需求掌握电脑技术的工人,或许意味着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可以“蛙跳般地超越”几乎没用过计算机的人。技术能力上合格的人和技术能力上不合格的人有可能形成截然区分,这种危险使得更有必要投入终生学习(参看本章第二节第三小节的讨论),以应对信息时代生活的新挑战。

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心,在西方社会中会出现所谓“电脑底层阶级”(computer underclass)。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以知识为基础,这种由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造成的鸿沟确实有可能使较为贫困的国家变得更加边缘化。

有些人提出,能否上网已经成为富人与穷人之间新的分界线。在拉美、东亚、东欧、阿拉伯诸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网民占这些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4%,而同一年度美国的总人口中54%是网民(UNDP 2001)。

而热情支持信息技术的人则认为,计算机未必会加剧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的不平等——它们的力量在于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一起,从而开拓新的机会。亚洲和非洲那些缺乏教材和合格教师的学校,据说可以从互联网中受益。远程学习项目,以及与海外同事的合作,都会成为克服贫困与弱势的关键手段。他们认为,技术一旦被富有才智和创造性的人所掌握,就将爆发出无限的潜力。

虽然技术可能让人心动不已,带来重要的机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解决一切”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的。欠发达地区正在努



在比较贫困的国家,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电脑底层阶级”?

力应对大规模文盲率、电话线铺设和电力供应不足的状况。在真正从促成远程学习项目的新技术中受益以前,它们最需要的是先改善自己的基础教育设施。正如我们在本章通篇所见,教育体系会再生产出种种不平等,比如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新型信息传播技术可能激化这些区分,同时更创造出新的不平等。不过,如果处置得当,新型技术仍能为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提供激动人心的机会,不断趋向解放与平等。

本章要点

1 随着印刷材料的普及,以及人口中具备读写能力的比例提高,开始出现现代形式的教育,在具有专门设计的校舍内指导学生。知识可以由更多的人在更多场所保存、复制和消费。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作变得愈益专业化。越

来越多的人不仅掌握了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实际技能,还掌握了抽象的知识。

2 20世纪教育的发展,与人们意识到需要一支识文断字、遵守纪律的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随着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教育将变得愈发重要。提供给缺乏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机会

- 减少了,劳动力市场将需要适应新技术、能够获得新技能、并且可以创造性地工作的工人。
- 3 根据 1944 年英国的《教育法》,英国的每一个人都有免费接受中学教育的机会,合法离校年龄提高到 15 岁。国立中学教育包括文法学校、现代中学和少量的技术学校。11 岁分流考试成为按照能力把学生分流到不同类型的国立学校的手段。
 - 4 20 世纪 60 年代,综合学校体系被引入中学教育。11 岁分流考试的制度同大多数文法学校和所有现代中学一起被废除了。近些年来,综合学校体系本身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们觉得,综合性学校并没有达到提倡者所预期的教育水准。
 -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发展:建立了新的机构(“红砖”大学),而且,学生的入学数尤其是女生的入学数有所上升。然而,英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资金危机。许多学生现在可以申请贷款,以便支付高等教育费用。
 - 6 有许多种社会学理论影响到如何去解释教育和学校培养。根据伯恩斯坦的理论,已经获得精密言语符码的学生,比那些局限于有限符码中的学生更能适应正规教育的要求。
 - 7 正规的学校课程体系只是更一般性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再生产会受到学习、教育和学校环境等许多非正式因素的影响。所谓“隐性课程”在文化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8 学校的组织方式及其教学往往会维护性别不平等。具体规定男孩和女孩穿着不同服装的规则强化了性别类化,包含固定性别意象的教科书也起到了这种作用。尽管这些趋势难以根除,但在过去十年中,女生们的表现已经在教育体系的所有层次上持续超过了男生。对“失败的男生”的关注牵涉到更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犯罪、失业、单身母亲等等,但是也有些人认为,这种关注是一种误导。
 - 9 因为很难给智力下定义,所以围绕这个主题引发了许多争论。一些人主张,基因决定群体的平均智商;另一些人则相信,它是由社会影响决定的。而现有的证据似乎支持主张社会文化影响的一派。
 - 10 新技术与知识经济正在改变我们对教育与学校培养的理解。终生学习的观念正在替代正规教育的观念。对于个人来说,在一生中,在传统的课堂之外进行学习与接受培训的机会越来越多。
 - 11 信息技术正在被整合到教育过程当中:在课堂里,通过创建“网络大学”,以及普及基于互联网的学习形式。有人开始担心,那些不会使用电脑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掌握新技术的人,有可能会遭受某种形式的“信息贫困”的困扰。

思考建议

1. 教育的目的何在?
2. 教育能够克服社会不平等吗?

3. 应当采取哪些政策促进更广泛地参与高等教育?
4. 现代技术是否使得社会有可能或者有需要趋于非学校化?
5. “隐性课程”在电子课堂中会如何表现出来呢?
6. 中小学和大学是否应该更多地强调情绪智力的发展?

阅读指南

- Caroline Benn and Clyde Chitty, *Thirty Years On: Is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live and Well or Struggling to Survive?* (London: David Fulton, 1996). 《综合教育 30 年:生机勃勃还是挣扎求存?》
- Ken Jones, *Education in Britain: 1944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 2002). 《英国战后教育史》
- R. Moore, *Education and Society: Issues and Explana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4). 《教育与社会:教育社会学的问题与求解》
- A. H. Halsey et al.,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从文化、经济与社会看教育》

网络导航

21 世纪学习行动计划 (21st Century Learning Initiative)

<http://www.21learn.org>

英国教育与技能培训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UK)

www.dfes.gov.uk

教育哲学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ttp://www.educacao.pro.b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主页 (UNESCO education Homepage)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

老年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http://www.u3a.org.uk/>

英国教育与技能培训部——终生学习 (DfES—Lifelong learning)

<http://www.lifelonglearning.co.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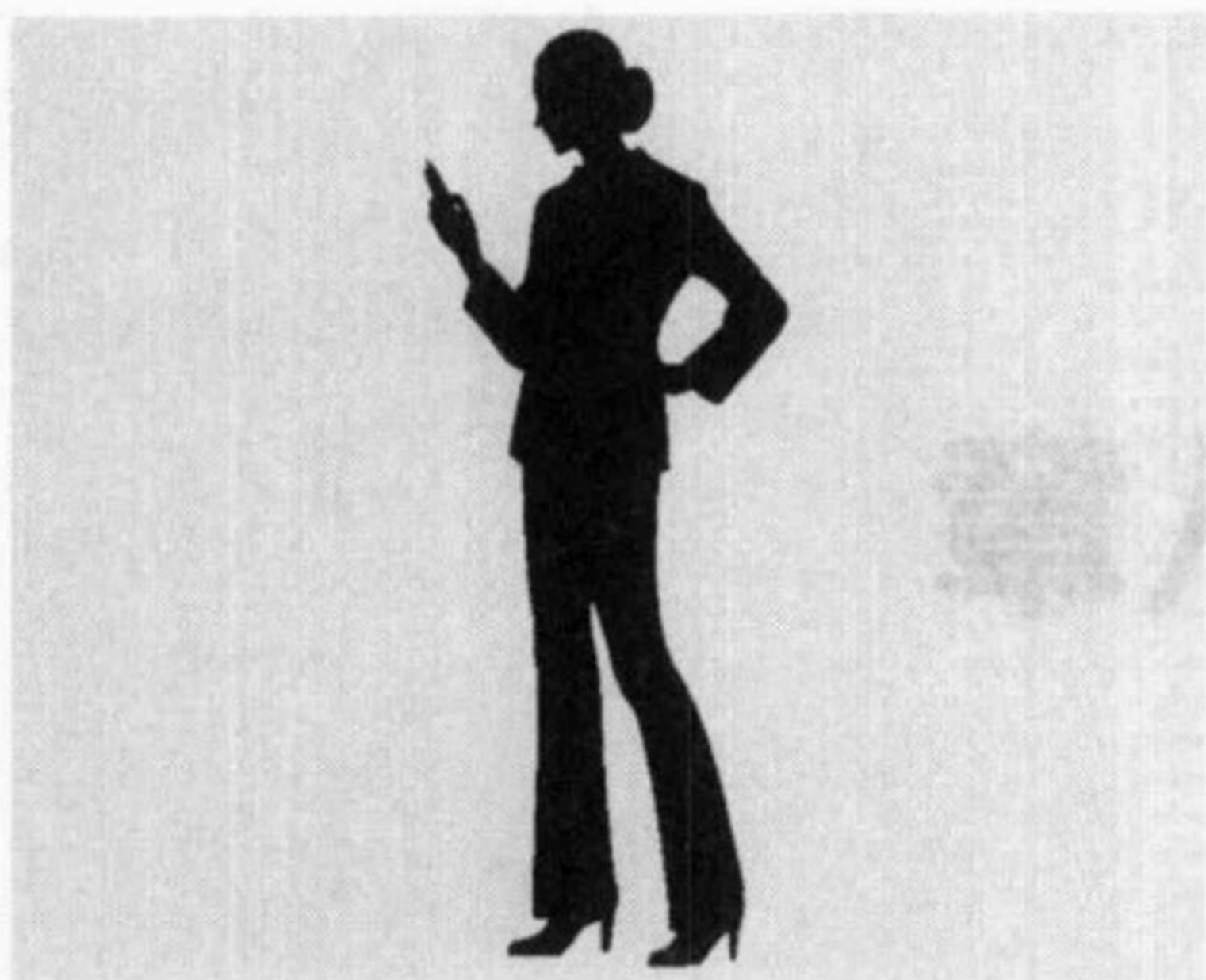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一节 何谓劳动？有薪劳动与无薪劳动	609
第二节 劳动的社会组织	609
18.2.1 泰勒制与福特制	612
18.2.2 泰勒制与福特制的局限	613
第三节 劳动与劳动过程的性质变迁	614
18.3.1 女性与劳动	614
18.3.2 后福特制	625
18.3.3 当前职业结构趋势	628
第四节 工作无保障感、失业与劳动的社会意义	636
18.4.1 劳动的社会意义	638
18.4.2 工作无保障感的加剧	638
18.4.3 失业	641
小结：“品格的消蚀”？	645
本章要点	646
思考建议	647
阅读指南	647
网络导航	648



第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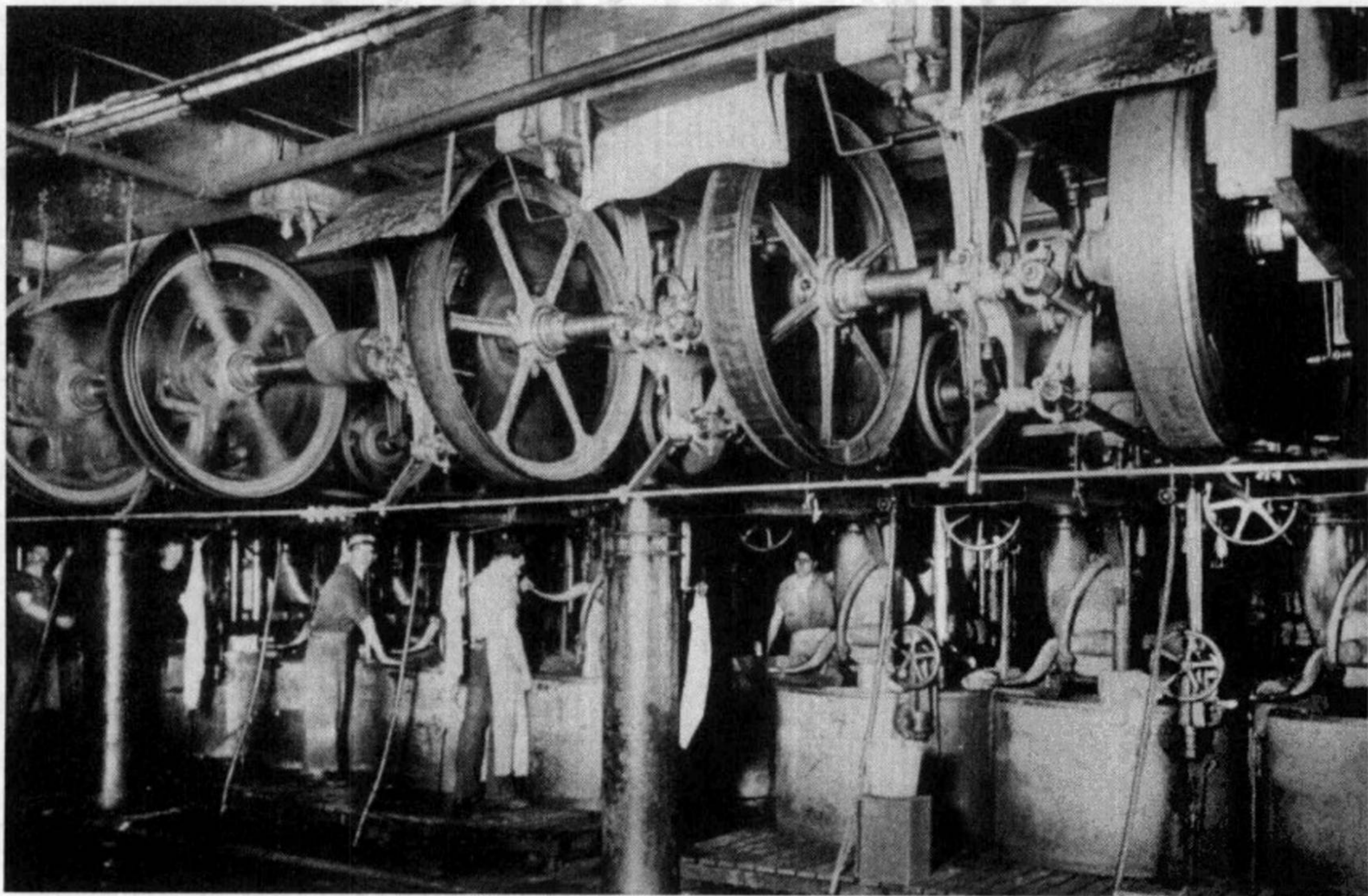
劳动与经济生活



1885年1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六点零五分,乔奇(Jockey)做出了他平生第一个铜铸阀。工头指点他该怎么做:“现在把这些凸饼子好好搁到车床上,脚底下站稳喽,然后使劲儿捶。”乔奇就用力捶击这些凸形铸件。火

花四溅,吱嘎作响,一个安装在蒸汽机上的铜铸阀落在铸件槽中。乔奇懵懵懂懂地问:“我得做多少件?”工头答:“就像天上有多少星星。”说完便走了。

乔奇那一年刚15岁。这活计算是一种升职,原先他就在曼彻斯特索尔福德^①(Salford)的这家工厂,不过只干些端茶送水的跑腿杂活。在往后的整整61年,乔奇从未干过其他的活儿。干了几年之后,他加入了工会。25岁上,他的脚把站的这块地板搞破了。修理工过来修理。乔治表示对不起:“你瞧,我老站在上面,把它踩破了。”修理工说:“不用道歉,这该死的地板不是我的。”1907年,地板又破了。再下一次,是1916年。1918年,乔奇歇了三天,理由是“流感”,“头都抬不起来。”^②1935年他又歇了两天,因为老婆死了。在厂子里干了61年,他总共误了五天工。



① 索尔福德(Salford)紧靠曼彻斯特市中心西面,从18世纪末开始成为重要的棉纺织业中心,同时有机床和机车制造业。19世纪末更成为人口密集的工人贫民住区。

② 原文是“Spanish ‘flu’”,指1917—1918年蔓延全世界的那次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流感,短短数月间2000万人丧生(一半以上是在印度,连美国也有55万人病死),染病者更为此数的50倍以上。数十年如一日工作的乔奇纵然强悍,染病亦属难免。这就是我们从个人生活史上看到的宏观社会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乔奇 76 岁,在做完第一百万个阀门后一周^①,破旧不堪的地板又一次在他脚下坍塌。他说:“我一直在等着这一下。”他关上车床,去找工头,这时的工头是个小年轻,足以当他的孙子。他透过车间嘈杂的声音喊道:“乔治(George),我这个周末就算干完了。”走的时候,人们给他拿来一张扶手椅:“您要是把这椅子也给坐穿了,我们会送到修理工那儿,给打上点儿板子!”上一个星期五下午,工头给他带来个新徒弟:“领他上路吧,成吗您?”工头问道。乔奇笑了,对那个小伙子说:“待那儿吧,没什么难的。现在把这些凸饼子好好搁到车床上,脚底下站稳喽,然后使劲儿捶!”

罗伯特·罗伯茨对 20 世纪最初 25 年索尔福德一个贫民区的生活做了第一手的刻画,已成经典之作,其中描述的正是乔奇的工作生活(Roberts 1971)。自那个时代以来,劳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乔奇的劳动生活与我们自己的劳动生活之间的差异难以察觉。本章将探讨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看看现代各经济体系的结构。然后,我们要考察劳动领域一些更为晚近的趋势。不过,我们首先得来更细致地看看,当我们使用“劳动”这个术语时,实际是怎么理解的。

第一节 何谓劳动? 有薪劳动与无薪劳动

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劳动就相当于拥有一份有薪的工作(paid job)。就像“没工作”(out of work)这种观念所意味的那样。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无薪的劳动(例如家务劳动或修理自己的汽车)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类型的劳

动并不属于有薪就业的正规范畴。例如,非正式经济中的大多数工作,并没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被记录在官方的就业统计中。非正式经济这个术语是指在正常就业范围之外的交易,有时包括用现金交换所提供的服务,但也经常指商品或服务的直接交换。

比如说,四处揽活修理管漏的人,可能会得到现金支付的酬劳,但不会给出任何收据,也不会有任何工作细节的记录。人们与朋友或同事交换“便宜的”(顺来的或偷来的)物品,以换取其他的好处。非正式经济不仅包括“隐性的”现金交易,还包括人们在家庭内外从事的各式各样自助式(self-provisioning)活动,像自己动手修理家用器械和家用工具,自己动手准备否则必须要去购买的商品和服务(Gershuny and Miles 1983)。家务劳动传统上大部分是由女性完成的,而这一般是无薪的。但这也是劳动,而且常常十分繁重,让人精疲力竭(参看图文框)。为慈善事业或其他机构而做的志愿劳动也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尽管根据上面列出的理由,^②拥有一份有薪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劳动”的范畴所及却要宽广得多。

我们可以将劳动,不管是有薪的还是无薪的,定义为进行需要付出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活动,其目标是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而职业(occupation)或工作(job)就是用来交换一份稳定的工资或薪水的劳动(work)。在所有文化中,劳动都是经济的基础。经济系统是由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机构/制度(institutions)所组成的。

第二节 劳动的社会组织

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便是存在高度复杂的分工,即已经把劳动划分成

^① 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休息日,每天都算工作日,乔奇在 61 年间每天铸造了大约 45 个阀门。

^② 原文如此,但吉登斯在本版中已经把第四版中前面列举的六点理由挪到了后面,参见本章第四节第一小节。

家务劳动

目前这种形式的家务劳动是随着家庭和劳动场所的分离而出现的(Oakley 1974)。由于工业化,家庭成为商品的消费场所,而不是生产场所。随着所谓“实际劳动”越来越被界定为拿到直接酬劳的劳动,家务劳动也就“不可见”了。家务劳动传统上被看作是属于女性的领域,而家庭外“实际劳动”的领域是为男性保留的。在这种传统模式中,家庭分工,也就是家庭成员分享居家责任的方式,是相当简单的。女性即使不是承担全部的家务劳动,也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而男性则通过挣一份工资来“抚养”家庭。

从单个“家庭”的发展阶段也会看到其他一些变化。在由工业化所提供的种种发明和设施对家庭产生影响之前,家务劳动是非常繁重、非常辛苦的。例如,每周一次的洗衣、洗澡就是一项艰巨而又需要耐性的任务。冷热管道水的入户解除了许多耗费时间的劳动。以前必须要把水运到家里,而且需要热水时要加热。通过管道输送电力和煤气,就使得煤炉和炭炉过时了。定期劈柴、运煤以及不断清除炉道之类的杂活儿基本上没有了。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即使引入了吸尘器和洗衣机之类节省劳力的设备,女性用在家务劳动上的平均时间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没有参加有薪就业的英国女性用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仍然相当稳定。家庭设施消除了一些较繁重的杂务,但又产生了新的事情。人们在照顾孩子、居家购物以及准备饭菜上所用的时间都增加了。

无薪的家务劳动对于经济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据估计,家务劳动占工业化国家所创造财富的 25%到 40%。根据 2002 年发布的一项全



女性常常“两班倒”,一班在家里劳动,一班是有薪劳动。

国时间使用调查结果,如果英国的家务劳动是有薪的,那么将为英国经济贡献 7 千亿英镑的价值(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2)。通过给许多有薪工作的人提供所需要的免费服务,家务劳动也刺激了经济的其它部分。

然而,家务劳动本身也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安妮·奥克利做过的有关调查已成经典(Oakley 1974),她把家务劳动看作是一种劳动形式。调查表明,全职从事家务劳动可能会使人感到被孤立、被疏远,并缺乏内在满意感。在她的研究中,家庭主妇觉得家务劳动单调至极,而且她们给自己的劳动设立了某种标准,难以摆脱一定要达到

这些标准的自加的心理压力。

家务劳动对于整体经济的贡献表明,种种有薪劳动和无薪劳动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女性越来越多地卷入劳动

力市场,这种趋势是如何影响家庭分工的。如果家务劳动的数量没有减少,同时现在全职做家庭主妇的女性越来越少,那么,今天对于家务劳动的安排方式必然会大有不同。

人们各有专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在传统社会中,非农业劳动需要精通一门手艺。手工技能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学徒期掌握的,而且劳动者一般要完成从开始到结束的生产过程的所有方面。例如,一个制造犁的铁匠要负责熔铁、煅型,最后组装好整件工具。随着现代工业生产的兴起,绝大多数传统的手工艺已经完全消失,而继之而起的技能,只是作为更大范围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本章开篇讨论的乔奇的一生,就是一个例证。他整个的工作生涯都只是在干一样高度专门化的任务,而工厂里的其他人则处理其他的专门任务。

现代社会也见证了劳动场所的转变。在工业化以前,绝大多数劳动会在家里进行,并由家庭的所有成员共同完成。工业技术的进步,比如依靠电力和煤炭的机械化操作,促进了劳动和家庭的分离。企业家所拥有的工厂成为工业发展的中心。机器和设备集中在这里,而且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开始超出以家庭为基础的小规模手工业。去工厂找工作的人。比如乔奇,会受到培训,以从事某项专门化任务,并为此挣得一份工资。雇员的绩效受到管理者的监督,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推行某些技术,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增进工人的纪律性。

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劳动分工的对比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即使在最大的传统社会中,通常也不会有超过二十或三十种的主要的手工业,以及像商人、士兵和牧师等一些专门化的角色。而在一个现代工业体系中,不夸张地说,有数千种不同职业共同存在。英国的人口普查列出了英国经济中约有两万种不

同的职业。在传统共同体中,大多数人在农田里劳动,并且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吃的、穿的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都是自己生产。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互赖性的巨大扩张。我们都要依赖大量其他的劳动者(今天已是遍及全世界)的生产和服务,以此来维持生活。除了极个别的例外,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吃的食品,住的房子,或者所消费的物质商品,都不是自己生产的。

早期社会学家广泛讨论了分工对于单个工人和整个社会的潜在后果。马克思等一批思想家最早提出,现代工业的发展会使许多人的劳动沦为单调乏味的任务。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分工使人类与自己的劳动相疏离。所谓异化,指的是不仅对于劳动,而且对于资本主义背景下工业生产的整体框架,都抱有一种冷漠感乃至厌憎感。他指出,在传统社会里,劳动常常让人筋疲力尽,农民有时不得不起早摸黑地在地里干活。但农民对于其劳动依然有相当程度的控制,而他们的劳动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技能。与此相反,许多产业工人对于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控制,对于整个产品的创造只是贡献了一点零碎,对于最终的出售方式或对象完全没有影响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于像乔奇这样的工人来说,劳动就像是某种外在疏离的东西,是一种必须去实施的任务,以便挣回一份收入,但在本质上不能令人满足。

涂尔干对分工的看法更为乐观,尽管他也承认其潜在的有害影响。根据涂尔干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增强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而彼此联系,而不是作为孤

立、自足的个体生活。团结会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多方向关系得到增强。涂尔干认为,这种安排具有高度的功能作用;当然他也意识到,如果变化发生得太快,社会团结就可能被扰乱。他把这种由缺乏规范所导致的感受称为失范。

看看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中有关涂尔干与马克思的著作概述,会对你有所助益。

18.2.1 泰勒制与福特制

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前的著作中,从提高生产率的角度说明了分工的好处。他最著名的著作《国富论》(Smith 1776)开篇即描述了一家制针厂的分工。单独工作的一个人一天或许可以制造出20根针。然而,通过将工人的工作分解为许多简单的操作,执行专业化工作的10个工人互相合作,一天总共可以生产出48000根针。换句话说,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从20根针增加到了48000根针,每个专业操作员的效率是单独工作时的240倍。

一个多世纪以后,这些思想在一位美国管理顾问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65—1915)的著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泰勒把自己的思路称为“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即对工业过程进行详细研究,从而将它们分解成简单的操作,可以进行精确计时和组织。科学管理后来被称为泰勒制。泰勒制并不只是一项学术研究。它是一种旨在使工业产出最大化的生产体制,不仅对于工业生产和技术的组织方式,而且对于劳动场所的政治策略,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泰勒的时间与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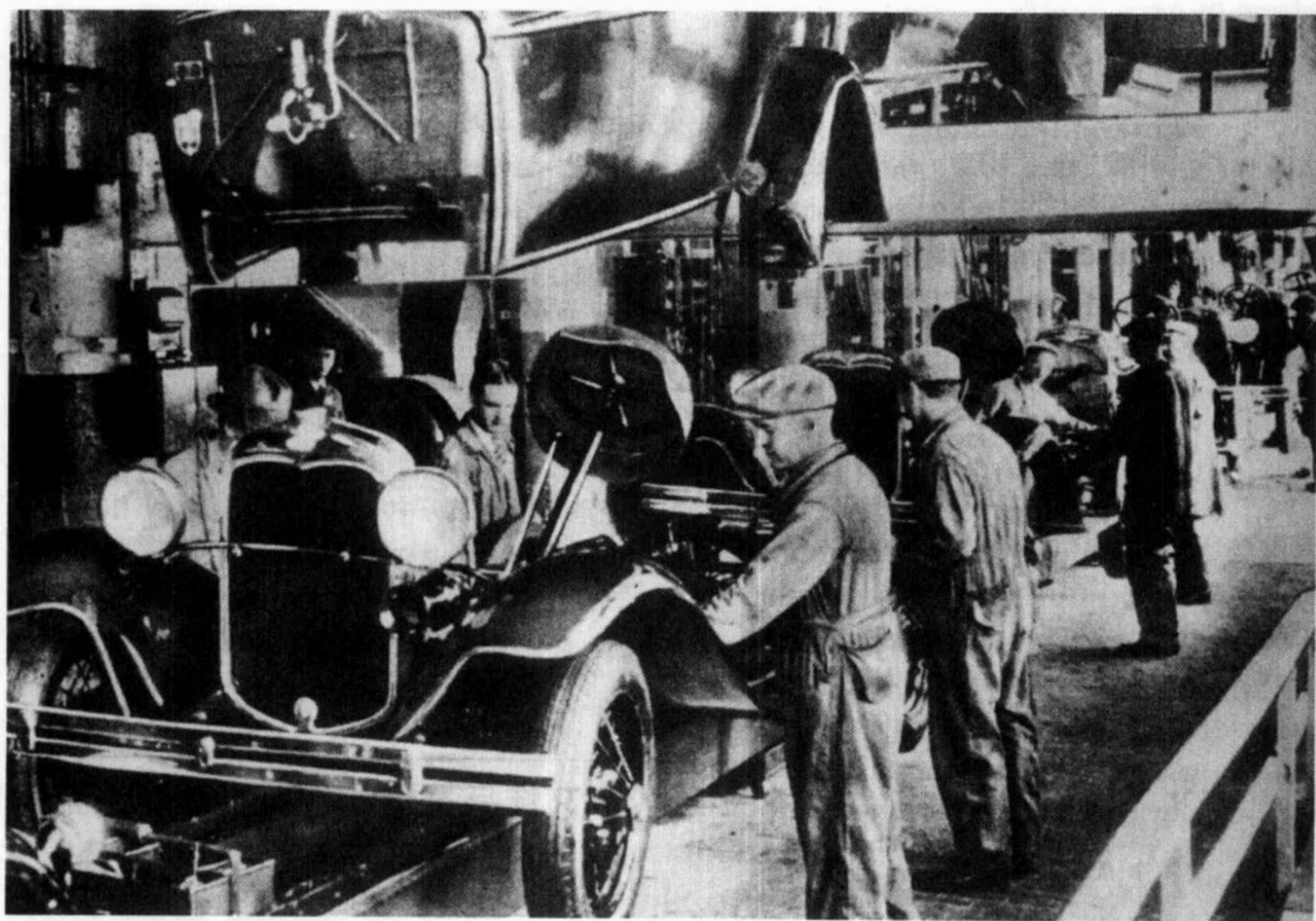
研究(time-and-motion studies)剥夺了工人对于生产过程的知识的控制,并将这类知识牢牢掌控在管理者手中,从而侵蚀了手工业者赖以维持相对于雇主的自主性的基础(参看Braverman 1974)。由此,泰勒制普遍让人联想到劳动的去技能化和退化。

泰勒制的原则得到了产业家亨利·福特(1863-1947)的应用。1908年,福特在密歇根的海兰帕克^①组建了他的第一家汽车制造厂,并且只生产一种T型福特牌汽车,引进了经过专门设计的工具和机器,以实现迅速、精确和简捷的操作。福特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引入了生产流水线。据说这是受到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启发,在那里,牲畜在一条流水线上被逐个部位地分解。在福特的生产流水线上,每个工人都被指定承担一项专门的任务。比如,当车身在流水线上经过自己时,负责安装左边门的把手。截至1929年T型汽车停产,已经生产出1500多万辆。

福特属于最早认识到大规模生产要求大规模市场的人之一。他认为,如果像汽车这样的标准化商品的生产规模会不断扩大,那么也应当确保存在有能力购买那些商品的消费者。1914年,福特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单边提高了他在密歇根迪尔伯恩^②的工厂的工资,每个八小时工作日可得五美元。这在当时算得上一份优厚的薪酬,确保了一种能够拥有这种汽车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正如哈维所言:“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天都挣五美元,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确保工人顺从于严格的纪律,那是极具生产力的生产流水线体系运作起来所需要的。它同时意味着使工人们拥有了充裕的收入,能够消费公司注定会以愈益庞大的规模提供的大规模生产的商品。”

① 海兰帕克(Highland Park):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为底特律所环抱,20世纪初福特在此设立起第一家汽车厂,开始以组装方式生产T型汽车。现仍有克莱斯勒公司的研发中心和福特公司的制造工厂。

② 迪尔伯恩(Dearborn):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毗邻底特律,是福特的诞生地和福特汽车公司研发总部。1917年建立福特公司所属汽车厂。



福特的生产线设计宗旨就是提高效率。

(Harvey 1989) 福特甚至还招募了一支社会工作者队伍,派他们到工人家里去,教育他们养成适当的消费习惯。

所谓福特制,就是与大规模市场的培育紧密关联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在某些场合下,这个术语还有更具体的意义,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与大规模生产相伴随的,是稳定的劳资关系和高度的工会化。在福特制下,企业给予工人长期许诺,工资与生产率增长密切相关。由此,集体谈判协定(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s)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所谓集体谈判协定,就是企业与工会之间协商达成的正式协定,具体规定工资、工龄权益、福利之类的工作

条件。这种协定确保工人同意遵守自动化劳动体制的规章制度,以及对于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充足需求。一般认为,这种体制到了1970年代已经瓦解,导致工作条件方面更具弹性,也更不安定。

18.2.2 泰勒制与福特制的局限

福特制的衰微原因很复杂,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随着多种行业中的企业采纳了福特制的生产方法,这种体系也遇到了某些局限。曾经一度,福特制似乎代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未来。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种体系只可能成功应用于为大市场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工业,

例如汽车制造。建立机械化生产线是相当昂贵的,并且,一旦建立一套福特制体系,就很难予以调整。例如,为了改变一种产品,就需要追加大量投资。如果有建立工厂所需要的足够投资,福特制的生产线还是很容易复制的。但是,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国家的很多公司发现,很难同工资更低廉的国家竞争。这也是最初导致日本汽车工业兴起的因素之一(虽然今天日本的工资水平已经不再低廉),并且也是随后韩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然而,福特制和泰勒制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是昂贵的设备。福特制和泰勒制都被一些工业社会学家称为低信任体制。工作是由管理方确定的,并且要服从机器。那些执行劳动任务的人受到严密监督,没有多少行动自主性。为了保持纪律和高质量的生产水准,员工们持续受到各种监控系统的监视。

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二小节讨论了工作及其他组织中的监控。

然而,这种持续监督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工人的投入和士气经常受到损害,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对于如何完成工作,没有多少决定权。在存在许多低信任职位的劳动场所,工人很不满意,旷工现象严重,劳资冲突司空见惯。

与此相反,高信任体制是在整体指导方针下,允许工人控制他们劳动的速度甚至是内容。这种体制通常是集中在工业组织的较高层次上。我们将会看到,最近几十年,高信任体制在许多劳动场所已经变得更加普遍,并正在改变我们关于劳动的组织和实施方式思考的路数。

第三节 劳动与劳动过程的性质变迁

经济生产的全球化,伴之以信息技术的扩散,正在改变绝大多数人工作的性质。正如第九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工业国家中,从事蓝领工作的人数比例已经逐步下降。现在在工厂里劳动的人们比从前要少。在办公室里,在超市和空港之类的服务中心,创造出了新的工作岗位。这些新工作中许多是由女性担任的。

第十六章第一节第四小节进一步讨论劳动场所中的性别不平等。

18.3.1 女性与劳动

纵观历史,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就漫长的历史时期而言,男性和女性都对周遭社会世界的生产和再生产做出过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的性质以及其中的责任分担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直到最近,在西方各国,有薪劳动主要是男人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上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加入劳动力的行列。今天,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女性在家外工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大约少四分之一。不过,来自英国的报道表明,在女性劳动人口中,有四分之三从事的是非全日制、薪酬微薄的工作,如办公文书、卫生保洁、财会出纳、餐饮招待等(Women in the Workplace 2004)。

劳资冲突

在工人与对他们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威的人之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冲突。在18世纪欧洲的城市地区,农业歉收时经常爆发反抗横征暴敛的骚乱。在一些国家,这些“前现代”形式的劳动冲突一直延续到一百多年以前。比如说,1868年,在意大利的几个大城镇爆发了食物骚乱(Geary 1981)。这类传统形式的对峙并不只是零星骤发的非理性暴力,暴力的威胁或使用确实能够平抑谷物及其他基本食品的价格(Rudé 1964; Booth 1977)。

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劳资冲突起初往往会追随这些古老的形式。在对峙的情境下,工人常常离开他们的就业场所,聚集在大街上;他们会通过不服管教的行为,或参与针对当局的暴力行为,将自己的不满公诸于众。19世纪晚期法国有些地方的工人就威胁要将遭人厌恨的雇主吊死(Holton 1978)。而使用罢工作为一项武器,今天通常让人想到劳资双方有组织的谈判,却只是通过不成系统的缓慢进程发展而来的。

罢工

我们可以把罢工^①界定为一群雇员暂时停止劳动,以表达某种抱怨或推行某项要求(Hyman 1984)。要想使罢工有别于其他对立和冲突形式,这一定义的所有要素都很重要。罢工是暂时的,因为工人还打算回到同一雇主手下做同一工作。而如果工人彻底退出,罢工这个词就不合适了。罢工作为停工,有别于拒绝加班或“消极怠工”。并且必须涉及一群工人,因为罢工涉及集体行动,而不是某一个工人的个人反应。而那些参与

者是雇员这一点,则使罢工有别于佃户或学生可能实施的抵抗。最后,罢工涉及寻求公开表达某种不满或强力推动某种要求,为了看一场足球赛而旷工的工人就不能说是在罢工。

罢工所体现的只是劳资双方可能产生的冲突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其他密切相关的有组织冲突的表现形式还有关厂(lock-outs,实施停工的是雇主而不是工人),限产(output restrictions),以及合同谈判中的针锋相对。而不那么有组织的冲突表现形式还可能包括频繁更替雇员(雇主不时对员工实施新老交替),无故旷工或长期旷工,以及破坏生产机器。

工人们之所以选择罢工,具体原因可能有很多。他们可能是要寻求提高工资,预防拟议中的减薪,抗议会使其劳动变得更加单调乏味或导致裁员的技术变革,或改善就业保障。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罢工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机制,是在劳动场所相对无权无势者所使用的一种武器,他们的劳动生活受到资方决定的影响,而他们对此却很难控制,甚至根本无能为力。这种武器通常属于“最后一招”,是在其他谈判都归于失败时才使将出来的,因为罢工的工人要么失去全部收入,要么得依靠工会津贴,而这可能很有限。

工会

所有西方国家中都存在工会组织,尽管它们的成员多少和权力大小相差悬殊。西方各国也都在法律上承认,工人有为追求经济目标而罢工的权利。工会为什么会变成西方社会的一种基本特性?在工业背景下,工会与资方之间爆发冲突的

^① 原文标示如此,但书后术语表中并无此条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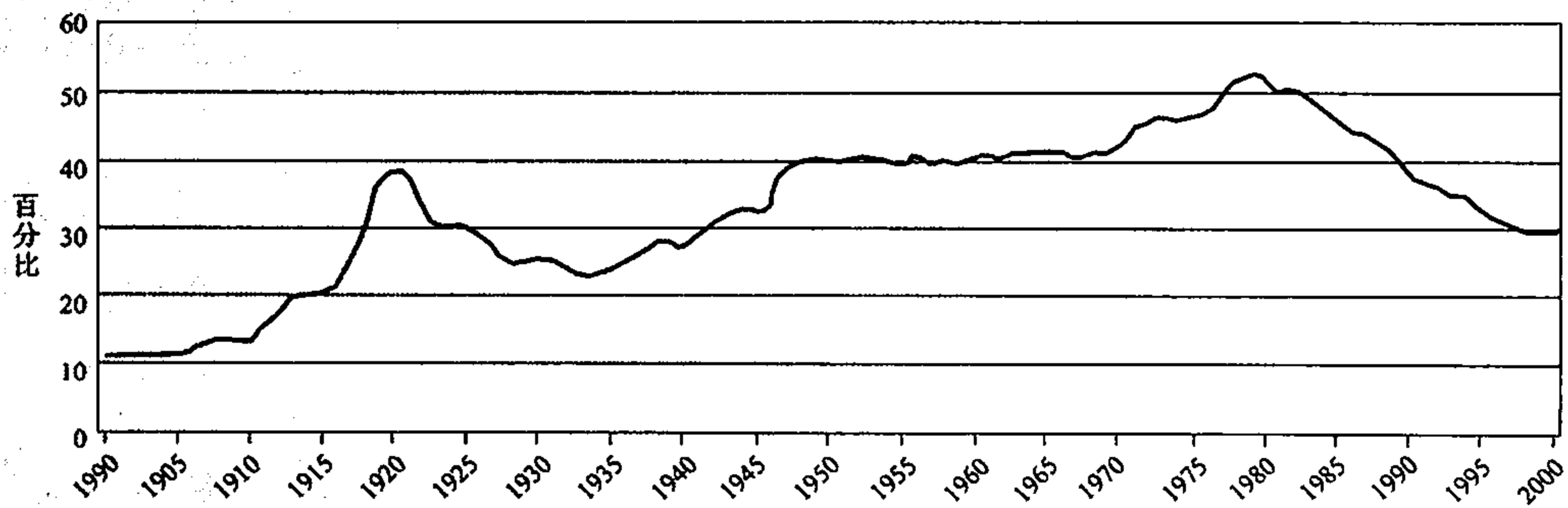


图 18.1 英国雇员中属于某个工会成员的比例, 1900年至2000年^a

a: 1975年以后的数据来自, 不包括北爱尔兰。有关数据来源, 详参技术说明。附注: 数据未经调整, 不能反映2001年后人口普查估计数。

资料来源: ONS (2003c), 页 139

可能性为何看似多少有些挥之不去?

在现代工业的早期发展阶段, 绝大多数国家中的工人丝毫没有政治权利, 也基本不能影响自己所处的劳动条件。工会就是作为一种补救手段而发展起来的, 以平衡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权力态势。尽管工人作为个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但通过集体组织, 他们的影响力就大大增强了。雇主可以不需要任何一位工人的劳动, 但不能没有一家工厂或车间的全体或绝大多数工人的劳动。工会起初主要是“防御性”的组织, 工人依靠工会, 可以抗衡雇主对其生活所施加的压倒性的权力。

今天的工人们在政治领域享有投票权, 也有了与雇主谈判的固定形式, 由此可以强力诉求经济福利, 公开表达不满。然而, 无论是在工厂局部, 还是在全国范围, 工会的影响力主要还是体现为某种形式的否决力。换句话说, 工会运用其可以支配的资源, 包括罢工权, 只能够阻搁雇主已有的政策或动议, 而不能在第一时间协助筹划。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说工会和雇主谈判涵盖工作条件的定期合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会定位有了巨大转变。在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

从1950年到1980年的这段时期, 工会的密度稳步增长, 这项统计指标体现的是工会成员的数量占工会可能成员人数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 英国劳动力中超过50%加入了工会。工会的高密度之所以普遍体现于西方各国, 原因有几点。首先, 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创造了劳工组织发展的有利条件。其次, 企业与工会之间的谈判在全国层面上得到协调, 而不是在行业层面或地方层面上散漫进行, 缺乏中心权威。再次, 是工会而不是国家在直接管理失业保险, 这就确保了丢掉饭碗的工人不会脱离劳工运动。有些国家具备其中几点原因, 但不是三者兼备, 工会的密度就显得低一些, 占劳工人口的比例从五分之二到三分之二不等 (图 18.1 揭示了20世纪工会成员人数的盛衰起落)。

自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之后, 工会开始在各发达工业社会都呈现衰减之势, 在英国也是如此。对于1980年以后工会所面临的困难, 有几种重要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或许就是说, 较为老旧的制造业趋于衰微, 服务业继之兴起。而在传统上, 制造业一向是工会的大本营, 而服务业的那些岗位对工会化更持抵触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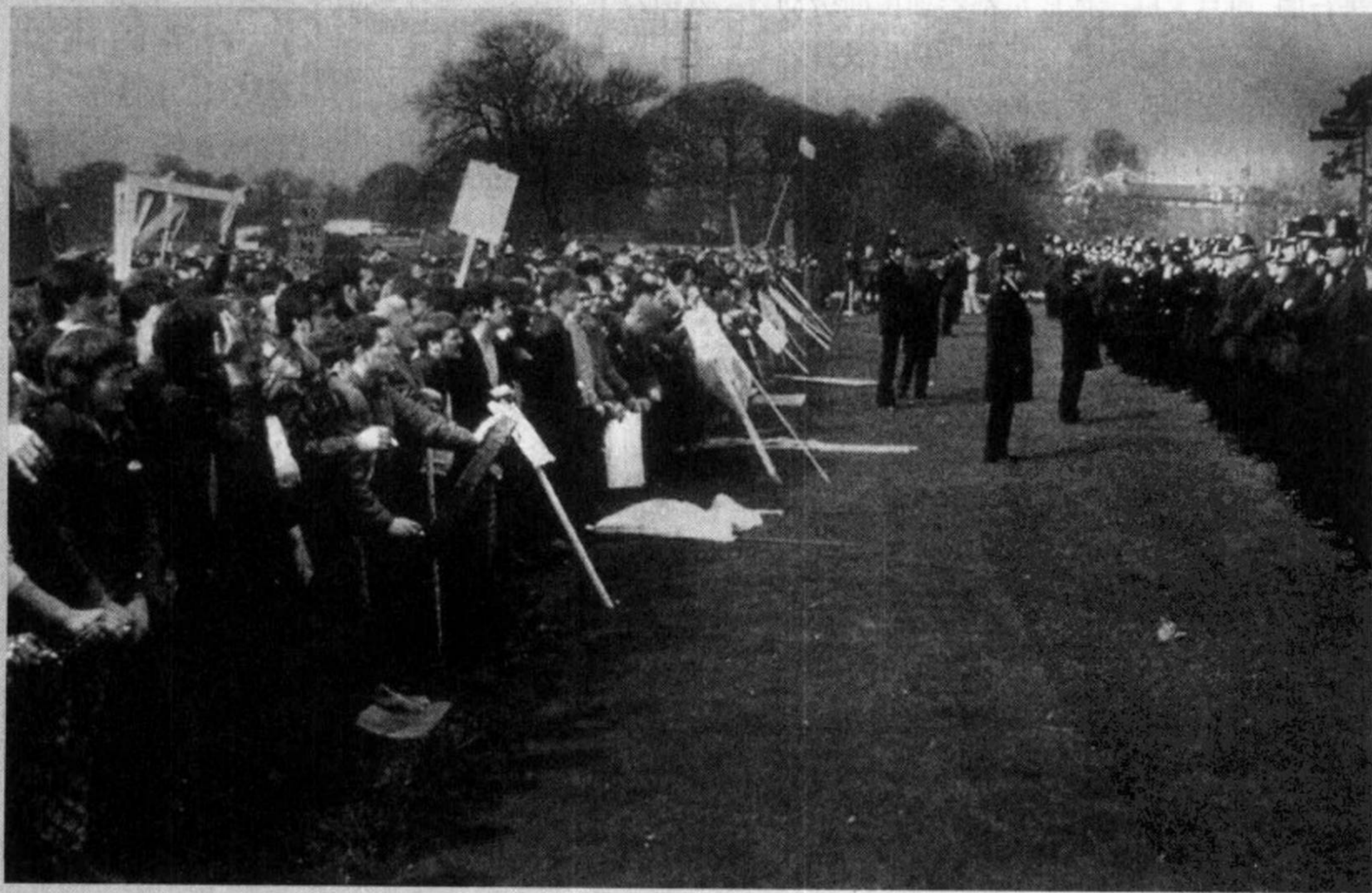
然而, 这种说明也遭到了细究。社会学家布

鲁斯·韦斯顿(Western 1997)主张,诸如此类的说明不能阐释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那一段大致说来是工会的美好岁月(尽管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却也突出地体现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迁。与此类似,服务部门就业的增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社会服务业领域,主要是公共部门的工会岗位。韦斯顿就此提出,制造业当中工会化的衰减之势或许比其他部门更为显著。

对于工业内部以及各产业之间工会密度的下降,有几项说明还是符合的。首先,世界经济活动的衰退与高失业率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如此,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其次,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尤其是来自远东各经济体的竞争,其工资常常低于西方各国,这也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力量。第三,在许多国家中,右翼政府上台执政,比如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保守党在

1979年上台执政,并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对于工会的猛烈攻击。在几次重大罢工行动中,工会相继落败,特别是1984年英国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rs)遭遇惨败。过去25年间,在几个重要行业领域,受工会保护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均遭破坏。

工会成员人数和影响力的下降是工业化国家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不能完全说成是因为右翼政府对于工会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期,工会通常会有所式微,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英国就属于这种情况。2003年6月,男女合计的工会成员数占到29%(*Social Trends*,卷35,2005)。转向更具弹性的生产的趋势也易于削弱工联主义的力量,后者在有許多人于大工厂里共同劳动的地方会更为普及。不过,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工联



1984年,英国矿工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反对关闭煤矿。

主义依然是一股强大势力。在 2002 年和 2003 年的英国消防员大罢工里,人们见识了工会为其成员争取优厚条件的力量。在那场争端中,消防队工会(Fire Brigade Union)的加薪要求得到了满

足,正好碰上新工党政府同样强烈地要求提高劳动实践的弹性。(劳动实践的弹性是本章后半部分的关键主题)

在以下几节中,我们来考察这种现象的起源和意义。这是现代社会目前正在发生的最为重要的转型之一。我们也会考察随着福特制和泰勒制的衰微,在劳动世界中已经出现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来讨论劳动社会学中一些最重要的当代话题。

一 女性与劳动场所:历史的观点

对于前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以及今天发展中世界的许多人来说,生产活动和家务活动并不是互相分开的。生产就是在家里或是在附近进行的,而且家庭全体成员都参加田间劳动或从事手工业。由于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被排除在男性的政治和战争领域之外,她们在家庭内部常常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工匠和农夫的妻子经常要管记账,而寡妇拥有并打理生意的情形也相当普遍。

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场所和家庭相分离,使得上述的情况大为改观。生产转为机械化工厂可能是最大的影响因素。个体受雇于专门的工作任务,按照机器的步调完成劳动,因而,雇主逐步开始跟作为个人的工人而不是家庭签订合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业化的进程,家庭和劳动场所之间的分离已经越来越明显。民众的立场中开始牢固确立起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相分离的观念。由于在家庭外就业,男性会在公共领域花更多时间,并且更多地参与地方

事件、政治和市场。而女性则开始与“家庭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并负责照顾孩子、打理家务、购物做饭之类的任务。在社会不同层次上,“女人就该呆在家里”的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富贵人家的女性享用着侍女、保姆和仆佣的服务。而穷苦人家的女性则是不堪重负,她们不得不应付家务杂活,同时也要从事工业劳动,以补充丈夫的收入。

进入 20 世纪之后很久,对于所有阶级来说,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就业率还是非常低的。甚至迟至 1910 年,在英国从事有薪就业的女性中,仍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侍女或仆佣。女性劳动力中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单身女性。当她们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时,她们的工资经常是由雇主直接送抵她们的父母。一旦结婚,她们一般就会退出劳动力队伍,专注于家庭责任。

二 女性经济活动的发展

在上个世纪,女性加入有薪劳动力的人数几乎持续上升。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在战争期间,女性完成了许多以前被视为只应由男性从事的工作。男性从战场回来后,又接管了大部分工作,但是以前建立的模式已经被打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性别分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 1971 年到 2004 年,英国的女性就业率,即女性就业人口占女性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从 56% 上升到 70%。相反,同期的

英国男性就业率从 92% 下降到 79%。因此,男性就业率与女性就业率之间的差距从 1971 年的 35%^① 下降到仅仅 9% (如图 18.2 所示)。在未来几年,性别差距的这种缩小趋势看起来还将持续。不过,下文我们将会看到(本小节),女性经济活动的增加大多出现在非全日制工作。

近几十年来,男性和女性之间在经济活动比例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这里有好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传统上与女性和“家庭领域”相维系的工作任务的范围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出生率下降,同时平均生育年龄提高,现在有许多女性在生孩子前从事有薪劳动,生

完孩子后又重新投入劳动。家庭规模减小也意味着,许多女性以前在家里照顾年幼孩子的时间趋于减少。许多家务劳动的机械化也有助于减少需要用于打理家务的时间量。洗碗机、吸尘器和洗衣机使家务负担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了。还有证据表明,男性与女性的家庭分工正在稳步淡化,尽管女性仍然要比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参见下文)。

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传统的核心家庭模式是男性挣钱养家,女性当家庭主妇,再加上受抚养的子女。现在这种模式只占英国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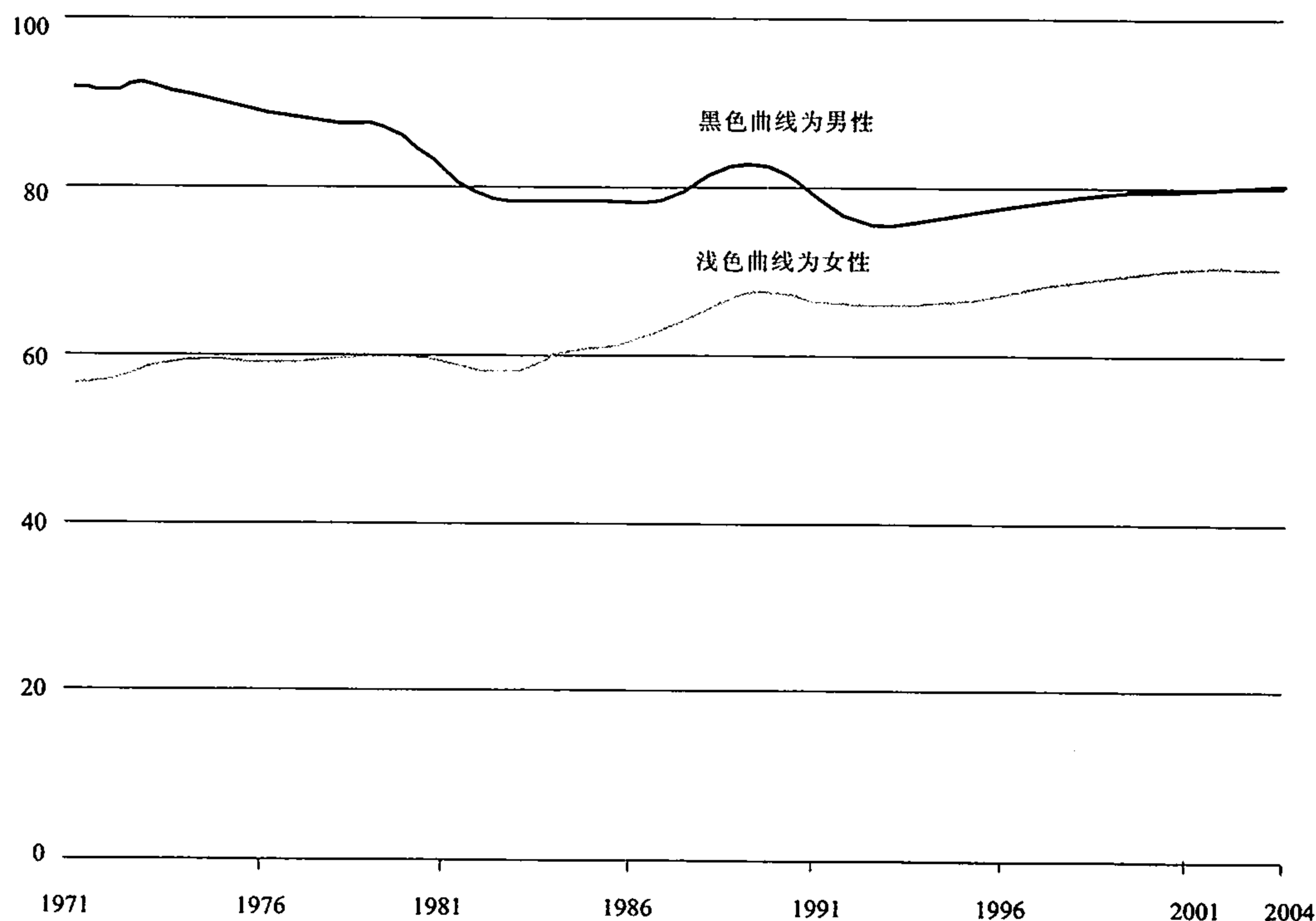


图 18.2 英国的就业率,以性别分组(%)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5 (2005), 页 4

① 原文如此,大概有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因素。

的四分之一。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包括男性失业的增加,已经促使更多的女性寻找有薪劳动。许多家庭发现,为了维持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需要双份收入。家庭结构的其他变化,包括单身母亲家庭的增加,以及独身和无孩家庭比例增高,都意味着传统家庭之外的女性也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不管是自愿选择还是出于无奈。此外,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晚近改革福利政策的努力都致力于支持女性,包括单身母亲,以及已婚但孩子尚幼的母亲,从事有薪劳动。

最后,应该注意到,许多女性是为了满足个人成就的欲望,响应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妇女运动所倡导的平等号召,而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在法律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以后,许多女性把握机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这些权利。我们已经提到,劳动是当代社会的中心,而且就业几乎总是过上一种独立生活的先决条件。最近几十年,女性在与男性平等的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而日益增加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这一过程的核心 (Crompton 1997)。

三 性别与劳动中的不平等

尽管拥有与男性的形式平等,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要面对不少不平等的待遇。本节我们将考察女性在工作中的三种主要的不平等:职业分隔,集中于兼职就业,以及工资差距。

职业分隔

女性从业人员传统上主要集中在薪酬微薄的日常例行职业。这些职业中有许多都是高度社会性别化的,也就是说,它们一般被看作是“女人的工作”。文秘性、照顾性的工作(比如看护、社工和保育)绝大多数都由女性从事,而且一般被看成是“女性化的”职业。职业性别分隔是指根据对合适的“男性”工作与“女性”工作的通行理解,男性和女性会集中在不同的工作类型上。

职业分隔表现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面。垂直分隔 (vertical segregation) 是指女性往往集中到没有多少权威与提升机会的工作上,而男性占据着更具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水平分隔



女性主导的职业往往薪酬最低。

(horizontal segregation) 是指男性和女性趋向于从事不同类型的工作。例如,女性基本上主导了家务和日常文秘的职位,而男性集中在半熟练技能型和熟练技能型的体力劳动岗位上。水平分隔可能是显而易见的。1991年,英国女性从业人员中超过50%的人属于四种职业类型:文书、秘书、个人服务(personal services)以及“其他类型的简单工作”(相比之下,男性这一比例是17%)。(Crompton 1997) 1998年,26%的女性从事日常例行的白领工作,而男性只有8%;同时17%的男性从事熟练技能型体力劳动,而女性只有2%(HMSO 1999)。

就业组织的变化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化都有助于形成职业分隔。“文书”^①的声望和工作任务的改变堪为范例。在英国,1850年时99%的文书都是男性。文书这个职位常常负有责任,包括具备簿记技能,有时候还要承担管理职责。即使是最低级的文书,在社会上也享有一定的地位。办公室工作在20世纪普遍机器化(从19世纪晚期引进打字机开始),使得“文书”和另一相关职业“秘书”的技能和地位有了明显的下降,成为一种地位低下、薪酬微薄的职业。随着它们所维系的报酬和声望下降,女性开始从事这些职业。1998年,英国几乎90%的文书和98%的秘书都是女性。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从事秘书工作的人的比例已经减少了。计算机代替了打字机,现在许多管理者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完成他们大量的书信写作以及其他工作。

集中于兼职工作

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家庭外从事全职工作,但是,大部分女性还是集中于兼

职就业。最近几十年来,兼职工作的机会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鼓励弹性就业政策的劳力市场改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服务业的发展(Crompton 1997)。

兼职工作被认为要比全职劳动提供给雇员更大的灵活性。有鉴于此,努力平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女性常常偏爱兼职工作。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可以成功做到这一点,否则将放弃就业的女性就此在经济上更为积极主动。然而,兼职劳动也带来了某些弊端,例如报酬微薄,工作缺乏保障,提升机会有限等。

兼职劳动对许多女性都有吸引力。战后女性经济活动的增长大部分都归功于此。到2004年,英国有520万女性属于兼职就业。相比之下,只有120万男性属于兼职就业(HMSO 2005)。在这方面,英国有点与众不同。在工业化国家中,英国是女性兼职就业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社会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讨论女性兼职就业这一现象,并且试图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说明英国这种模式的优势。调查已经表明,兼职工作报酬微薄,缺乏保障,而且这种弹性往往更适合雇主而不是雇员!然而,大多数女性兼职人员在被问及时会说,她们对兼职就业感到满意。被问到的那些人对于为什么做兼职劳动所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事实上,她们不愿意做全职劳动。

一些学者指出,女性也分为不同“类型”:一种是一心要走出家庭去工作的女性,一种是并不一心要工作的女性,她们把传统的性别分工看成是可以接受的(Hakim 1996)。根据这种方法,为了履行传统的家庭义务,许多女性乐于选择兼职劳动。然而,也有一种重要观点认为女性没有什么选择可言。男性在很大程度

① “clerk”一词所指代的职事曾经享有较高的地位,抛开下面所讲的“文书”职业地位下降不谈,这个词在历史上还指英国议会中的高级职员,教堂或教区的执事,教牧人员,乃至泛指读书识字的学者等。显然,大众识字摧毁了这个词的权威性。

对养育孩子并不承担主要责任。而承担这一义务（以及其他家庭义务，如我们在前文[本章第一节]图文框中所见）的女性如果同时仍然想或者需要从事有薪工作，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兼职劳动是一种更加可行的选择。

工资差距

英国就业女性的平均薪酬远远低于男性，尽管在过去30年间，这种差距已经有所缩小。1970年，假设一位全职劳动的男性挣1英镑的工资，一位全职劳动的女性就只能挣63便士。到1999年，后者已经增加到84便士。在兼职劳动的女性中，同样时间段中差距亦有减少，所得从51便士增至58便士。^①在向与男性平等迈进方面，逐步缩小“工资差距”的普遍趋势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步。

有几个过程左右了这些趋势。一个显著的因素是，与以前相比，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报酬较高的专业性职位。现在文凭高的年轻女性会像与她们文凭相当的男性一样，从事报酬优厚的工作。然而，在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中，从事报酬微薄的兼职工作的女性数量激增，抵消了职业结构上层发生的这一进步。

由性别引起的职业分隔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工资差距持续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女性在报酬更低的工作领域中所占比例过高，超过45%的女性每周所挣的工资不到100英镑，而男性中这一比例只是刚过20%。女性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尽管有一些增长，也仍然不成比例。10%的男性每周挣500多英镑，而女性中这一比例只有2%（Rake 2000）。

1999年开始实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每一位年满22岁的劳动者，每工时收入不得低于3.60英镑），也有助于缩小男性与女性之间

的工资差距，因为许多女性集中在美容美发、餐饮招待之类的职业，其薪酬长期低于所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据估计，在开始设立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将近二百万人的工资几乎提高了30%。最低工资标准自从设立以后还在定期上调（从2006年10月开始，每一位年满22岁的劳动者将拿到每工时不少于5.35英镑），使从事薪酬微薄的职业的女性进一步受益。然而，最低工资标准的好处并不能否定，事实上，相当高比例的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其所得仅仅相当或略略高过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仍然有许多男性和女性（非法）就业者的工作所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靠这样的收入生活是非常拮据的，如果再加上有孩子要抚养，就更是难以为继。

这种现象的一个表现就是，事实上，在英国有相当比例的女性生活在贫困中。如果女性是户主，情况就更是如此。近些年来，女性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呈稳定上升。对需要时刻照顾幼童的女性来说，贫困往往尤为严重。这里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原本可以获得报酬不错的工作的女性，可能由于必须要为抚养孩子付费，而在经济上受到损害，然而如果她开始兼职工作的话，其收入就会下降。她可能有的任何职业前景都会消失，而且她会失去其他方面的经济福利，例如只有全职工作者才能获得的养老金等。

以女性之一生合而观之，工资差距累积成整体收入的显著差别。20世纪90年代所作的一项晚近研究（Rake 2000）发现，以一位具备中等技能的女性为例，在她的一生中会付出超过24万英镑的“作为女性的损失”（female forfeit）。所谓作为女性的损失，指的是一位女性在一生中比文凭相当的男性少挣的收入总

^①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吉登斯此处举出了1970年的数字，但显然已经调整为新币制。从1971年开始，英国币制由以前的每镑换算20先令或240便士，改为十进制的每镑100便士。

数,即使她没有孩子。女性一生可能挣的收入总数随文凭而变化。例如,一位没有文凭、没有孩子的女性可能在她的整个就业生涯中挣得51.8万英镑,而如果她大学毕业,挣的钱可能超过这个数额的两倍,她的“作为女性的损失”会比较低,而且不会承受“作为母亲的差距”(mother gap),也就是没有孩子的女性和有孩子的女性在收入上的差距(参看图18.3)。与此相反,有两个孩子的、缺乏技能的母亲“作为女性的损失”较高,她可能会有将近28万5千英镑的“作为母亲的差距”(与一位条件类似的男性可能挣得的钱相比较),而中等技能的女性这一差距是14万英镑,富有技能的女性是1.9万英镑。然后还得加上她

的“作为女性的损失”。后两种类型的女性更可能很快返回到工作中,在孩子小的时候把孩子送进日托服务机构(Rake 2000)。

四 家庭分工的变化

更多女性从事有薪劳动的结果之一,就是某些传统的家庭模式正处于重新协调安排之中。“男性挣钱养家”的模式已经成为例外而非通例,而女性的经济独立性日渐增加,意味着她们更有能力在自己愿意的情况下,摆脱家庭中社会性别化的角色。无论从家务劳动还是从经济决策的角度来看,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尽管女性继续要为大部分

所得分隔	某位缺乏技能的女士没有任何文凭证书就离开了学校,干了个售货员。她21岁结婚,23岁生了第一个孩子,26岁上有了第二个孩子。整整9年时间完全离开劳力市场,然后的28年时间从事兼职劳动。	某位中等技能的女士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中过了几门,成绩平平。做了份文秘工作。26岁结婚,28岁生了第一个孩子,31岁上有了第二个孩子。仅有2年时间完全离开劳力市场,然后的12年时间从事兼职劳动。	某位富有技能的女士有研究生文凭,是一位专业人员,具体说是一位教师。28岁结婚,30岁生了第一个孩子,33岁生了第二个孩子。仅有一年时间从事兼职劳动,其他整个劳动生涯完全从事全日制劳动。
三类“典型女性”			
三类中的所得损失			
作为女性的损失——女性一生中将会比拥有同等文凭的男性少挣多少钱,即便她没有孩子。	19.3万英镑	24.1万英镑	14.3万英镑
作为母亲的差距——女性一生中将会比拥有同等文凭但没有孩子的女性少挣多少钱。	28.5万英镑	14万英镑	1.9万英镑
成家生育的差距——女性将会比拥有同等文凭的男性少挣多少钱,即作为女性的损失加上作为母亲的差距。	48.2万英镑	38.1万英镑	16.2万英镑

图 18.3 女性一生收入中的“作为女性的损失”、“作为母亲的差距”和“成家生育的差距”(parent gap)
资料来源:Guardian (2000年2月21日);Rake 2000

家务劳动承担主要责任,但在许多家庭中似乎都趋向于更加平等的关系。这一点似乎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家里的零碎修缮更多的是由男性来完成。调查发现,女性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将近3小时(不包括购物和育儿),相比之下,男性花的时间为1小时40分钟(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3)。

研究表明,走出家庭就业的已婚女性比其他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要少,尽管她们几乎一直承担着打理家务的主要责任。她们的活动模式当然非常不同。她们要比那些全职家庭主妇在晚上承担更多家务,并在周末为家务忙上更长的时间。

有关这一话题,详参第七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的讨论。

然而,有证据表明,甚至这个模式可能也在变化。同过去相比,男性对于家务劳动

的投入更多了,尽管研究该现象的学者提出,这个过程属于“滞后适应”(lagged adaptation)。(Gershuny 1994)这个术语表明,在男性与女性之间重新协调家务劳动,要比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慢得多。研究发现,家庭内部的分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阶级,比如女性从事有薪劳动的时间量。较高社会阶级的夫妇往往分工更加平等,女性从事全职劳动的家庭也是如此。总的来说,男性对于家务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但仍然谈不上男女平均分担。

沃德和希瑟林顿在曼彻斯特进行的一项调查(Warde and Heatherington 1993)表明,年轻夫妇的家庭分工要比他们的前辈更加平等。两位作者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正在松动。年轻人如果是在父母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更可能贯彻这种做法。

沃格勒和帕尔(Vogler and Pahl 1994)研究了家庭分工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家庭财务



的“管理”制度。他们的研究试图搞清楚,随着女性就业的增加,女性对于金钱的支取和对于开支决策的控制是否变得更加平等。他们访谈了生活在英国六个不同社区的夫妇们,发现总的来说,财务资源的分配确实要比过去更加公平,但是它仍然与阶级问题有关联。在收入较高的夫妇中,“集合”资金往往是共同管理的,同时,在金钱支取和开支决策方面更加平等。一位女性在财务上对家庭的贡献越大,她对于财务决策的控制程度就越高。

而在收入较低的家庭中,女性经常负责家庭资金的日常管理,但是未必负责预算和开支的战略性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沃格勒和帕尔注意到一种趋势,也就是女性为了不让丈夫支取金钱,也剥夺了自己的这种权利。也就是说,在女性对于日常财务的控制与她们对于金钱的支取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脱节。

18.3.2 后福特制

近几十年来,弹性做法已经引入许多领域,例如产品开发、生产技术、管理风格、劳动环境、雇员参与以及市场营销。群体生产(group production)、攻关小组(problem-solving teams)、多重任务(multi-task),以及小众营销(niche marketing),只是公司试图在变迁条件下重组自身而采用的众多策略中的一些实例。一些评论家指出,这些变化合而观之,表明已经彻底摆脱了福特制原则。他们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最好理解为后福特制阶段。这个术语是米歇尔·皮奥里和查尔斯·萨贝尔在《第二次工业分水岭》(*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iore and Sabel 1984)一书中提出的,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为了满足市场对于多种多样的定制产品的需求,弹性和创新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后福特制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这个术语被用来指一系列互相交叉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工作与经济生活领

域,而且发生在整个社会。一些学者提出,向后福特制方向发展的趋势可以在多种领域看到,比如党派政治,福利计划,以及消费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尽管当代社会的观察者经常提到许多这样的变化,但对后福特制的精确意义并没有达成共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否正是理解我们所见证的现象的最佳方式。

尽管后福特制这个术语还有一些含糊之处,但是最近几十年,在劳动领域里出现的一些明显趋势似乎呈现出明确摆脱早先福特制的做法。这些趋势包括,将劳动分散到没有等级性的团队中,弹性生产和大规模客户定制的观念,全球生产的扩散,更具弹性的职业结构的引入。我们首先来考察前三股趋势的例子,然后来看看对于后福特制命题的一些批评意见。接着,在“当前职业结构趋势”一节里将讨论弹性劳动模式。

一 群体生产

群体生产,即以劳动群体的协作来代替生产流水线,有时候会同自动化结合在一起,作为重组劳动结构的一种方法。其根本的想法在于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办法就是让工人群体在团队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而不是要求每一个工人成天从事一个单调重复的任务,比如说把螺丝钉安装到一辆汽车的门把手上。

质量管理小组就是群体生产的一个实例。由5到20名工人组成群体,定期碰头,研究并解决生产问题。属于质量管理小组的工人将接受额外的培训,使他们能将技术知识运用到生产问题的讨论中。质量管理小组起源于美国,后来被不少日本公司采用,然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又重新盛行。它们代表了对于泰勒制假设的一个突破,因为它们认识到工人拥有专业技能,有助于明确并实施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

群体生产对于工人具有不少正面效应,包括掌握新技能,增加自主性,减少资方监管,提

高对于自己生产的货品及提供的服务的自豪感。然而,一些研究也已经发现,团队生产同样有一些负面的后果。尽管直接的资方权威在团队过程中不太明显,但仍存在其他形式的监管,比如团队中其他工人的监督。美国社会学家劳里·格拉汉姆研究了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家日资企业,斯巴鲁—五十铃(Subaru-Isuzu)轿车厂,发现来自其他工人的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同事压力从不停息。

有关日本的工商组织模式,详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一小节。

一位工友告诉她,最初对团队概念满怀热情,但后来发现,同事监督只是管理的一种新手段,试图激励人们工作“到死”。格拉汉姆还发现(Graham 1995),斯巴鲁—五十铃公司利用群体生产概念,作为抗衡工会的一种手段,

它们的观点是:如果劳资双方处在同一“团队”,那么彼此之间就不会产生任何冲突。换句话说,一个善于合作的“队员”是不会抱怨的。在格拉汉姆所研究的斯巴鲁—五十铃工厂,要求提薪或减轻职责会被视为缺乏员工合作精神。格拉汉姆这样的研究已经导致社会学家得出结论:尽管基于团队的生产过程给工人们提供了机会,减少单调乏味的工作形式,但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和控制体系依然未变。

二 弹性生产与大规模客户定制

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变迁之一,就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弹性生产。尽管泰勒制和福特制在为大众市场生产大规模产品(也是标准化产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它们还不能为小订单生产少量的商品,更不用说为单个客户生产专门制造的商品



即使生产已经趋向客户定制化,也依然保留着一些生产流水线的成分。

了。福特在谈论第一部大规模生产的汽车时说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俏皮话,就体现出泰勒制和福特制体系生产客户订制产品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说:“人们想要什么颜色的T型汽车都行——只要它是黑色的。”而计算机辅助设计,伴之以其他类型的基于计算机的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斯坦利·戴维斯讨论了“大规模客户定制”的兴起:新的技术可以大规模地生产为特定客户设计的物品。在生产流水线上每天可以制造五千件衬衫,但现在可以为其中每一件衬衫进行定制,速度和制造五千件同样的衬衫一样快,成本却也未见增高(Davis 1988)。

尽管弹性生产已经为客户乃至整个经济带来了收益,但对于工人的影响却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工人们确实学会了新的技能,工作也不那么单调乏味了,但弹性生产也会创造一系列全新的压力,因为需要与复杂的生产过程进行细致协调,又要反应敏捷地完成生产。格拉汉姆对于斯巴鲁—五十铃工厂的研究记载了这样的情形:工人们到最后一刻还在等待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部件。其结果,员工们不得不以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投入工作,以保持生产进度,却没有额外的补偿。

互联网之类的技术也能够用来征求个别客户的信息,以便针对其精确的特别要求而制造产品。对此表示热心支持的人们认为,大规模客户定制无异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这场发展趋势之重要性,堪比于上个世纪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引入。不过,持怀疑态度的人则很快指出,按照目前的做法,大规模客户定制只能创造出选择的幻觉;而在现实中,互联网客户所能利用的选择并不比典型的邮购商品目录所提供的品种更为丰富(Collins 2000)。

戴尔计算机公司(Dell Computer)是在大规模客户定制方面走得最远的制造商之一。客户要想从制造商那里购买一台计算机,就必须上网浏览戴尔的网站,因为公司并不开

办零售专卖店。客户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各种部件属性的精确配置。一旦下了订单,就会根据具体指定的要求定制一台计算机,然后发货,一般几天之内就会送到客户手中。这样一来,戴尔就已经彻底倒转了做生意的传统方式:企业一般首先把产品做出来,然后再操心如何把它卖出去;而现在,像戴尔这样的大规模客户定制生产商是先卖后做。这种转变对工业产生了重要后果。随时储存部件以备所需,原本是制造商的一项主要开支,现在这种需求已经大大削减。不仅如此,生产中属于外包外购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因此,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是否能迅速交换信息,就是大规模客户定制能否成功推行的关键所在,而互联网技术也促成了这一点。

三 全球生产

工业生产中的变迁不仅包括产品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还包括产品是在哪里制造出来的。我们在芭比娃娃的例子中就看到了这一点(第二章第三节第一小节)。这是因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最重要的工商组织就是那些既控制货品制造又控制最终销售的大型制造厂商。像美国的福特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巨型汽车企业,就是这种路数的典型体现。这类企业雇用数以万计的工厂工人,制造从零部件到成品车的一切,然后在制造商的展示厅里销售。这样一种以制造为主导的生产过程被组织成大型科层机构,并且常常是由单一一家厂商所控制。

不过,在最近二三十年,另一种生产形式已经越来越重要,是由巨型零售商来控制。在零售主导的生产中,像美国零售商沃尔玛这样的厂商——2000年它是全世界第二大企业——从制造商那里购买产品,制造商又通过独立拥有的工厂安排这些产品的制造。

美国社会学家埃德娜·波纳奇与理查德·

阿佩尔鲍姆 (Bonacich and Appelbaum 2000) 告诉世人,在服装制造业,绝大多数制造商实际上根本没有雇用任何制衣工人,而是利用遍布全世界的数千家工厂来做它们的衣服,然后它们再把这些成衣放到百货商店或其它专卖店进行销售。服装制造商并不拥有其中任何一家工厂,因此也无需为这些衣服是在什么条件下制造出来的负责。在美国销售的所有衣服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以外的工厂制造出来的,而那些工厂里的工人所得仅为美国工资的一个零头。波纳奇与阿佩尔鲍姆指出,这样的竞争已经导致一种全球性的“底价竞赛”,零售商和制造商会在全世界寻找能够出到最低工资的地方。结果之一,就是我们今天买到的衣服大多是由童工——或许才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在血汗工厂里制作出来的。做一件衣服或一双运动鞋,所得不过几便士,但最后卖出去却要几十英镑甚至几百英镑。

第二章第三节第一小节讨论了生产的全球化,第十章则探讨了全球不平等。

四 对于后福特制的批评意见

虽然一些批评家承认劳动领域正在发生一些转变,但是他们拒绝采用“后福特制”这个标签。有一种批评比较常见,认为主张后福特制的分析家夸大了福特制做法被放弃的程度。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像倡导后福特制的人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一场大规模的转型,而是将一些新的路数融入到传统的福特制技术中。这种观点已经被有些学者采用,他们声称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一个“新福特制”(neo-Fordism)阶段,也就是说,是对传统的福特制技术作一些调整改造(Wood 1989)。

有些人提出,如果认为从福特制技术到后福特制技术的转变是一个平滑的线性过渡,那么这种观点在过渡的两头都对劳动的真实性说了过头话。安娜·波勒特指出(Pollert 1988),福特制技术从来不像一些人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根深蒂固。她并且指出,如果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已经过去,让位于完全的弹性,也是言过其实。她指出,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仍然主导着许多行业,尤其是那些针对消费者市场的行业。根据波勒特的看法,经济生产的特征始终是多种技术并存,而不是一种标准化的统一路数。

18.3.3 当前职业结构趋势

自从20世纪以来,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的职业结构都已经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在20世纪初,蓝领制造业工作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主导态势已经转向服务业中的白领职位。图18.4表明,自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英国的制造业工作逐步衰落,而各服务行业正在兴起。1900年,英国的就业人口中有四分之三以上从事体力劳动(蓝领)。这些人中,大约28%是熟练技能型工人,35%是半熟练技能型工人,还有10%是非熟练技能型工人。白领和专业性工作的数量相对很少。而到20世纪中期,体力劳动者在从事有薪劳动的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到三分之二,非体力劳动已经有了相应的扩张。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有着广泛的争论。原因似乎有几点。一个是近些年来,在工业中不断引入节省劳力的机器,而其巅峰便是信息技术的普及。另一个是在西方以外,尤其是在远东,制造业也已兴起。西方社会的陈旧行业已经有大幅削减,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同劳

劳动与技术

长久以来,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我们的劳动体验如何受到所涉及的技术类型的影响?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技术在劳动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从工厂自动化到办公室工作的计算机化。目前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技术可以带来更大的效率和生产率,但是,它是怎样影响使用它的那些人对于劳动的体验方式的?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向更加复杂的系统的转变是如何影响劳动的性质以及展开劳动的制度的。

自动化与技能之辩

19世纪中叶,美国人克里斯多弗·斯潘塞发明了自动化机器,也就是制造螺丝、螺母和齿轮的一种程控车床。这时才引入了**自动化或程控机器**的概念。自动化影响的行业起初还比较少,但随着工业机器人的设计进展,它的影响显然愈益扩大。所谓机器人,就是执行通常由人类劳动者来完成的功能的一种自动化装置。“机器人”(robot)这个词来源于捷克语“robota”,或者说“农奴”,大约50年前,剧作家卡雷尔·恰彼克使这个词广为流行。^①

全世界工业中所使用的机器人大部分是在汽车制造业。机器人在生产中的用处至今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它们识别不同物体、操纵笨拙形体的能力仍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在未来的岁月里,自动化生产会迅速扩展,机器人正变得愈发精致,而它们的成本却在下降。

自动化的扩展引发了社会学家和劳资关系专家的激烈争论,讨论新技术如何影响工人,工人的技能,以及他们对于劳动的投入程度。罗伯特·布劳纳在《异化与自由》这本非常有影响的书中(Blauner 1964),考察了四个技术水平不同的行业中工人的体验。布劳纳采用了涂尔干和马克思的思想,对**异化**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以无力感(powerlessness)、无意义感(meaninglessness)、孤立感(isolation)以及自我疏离感(self-estrangement)的形式,测量各个行业中的工人体验到的异化程度。他的结论是: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是所有行业中异化程度最高的,但是在使用自动化设备的劳动场所,异化程度要低一些。换句话说,布劳纳认为,将自动化引进工厂,有助于**扭转**否则将稳步加剧的异化趋势。自动化有助于整合劳动力,并且赋予工人一种对他们的工作的控制感,而这是其他技术形式所缺乏的。

哈里·布雷弗曼在著名的《劳动与垄断资本》(Braverman 1974)中,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命题。在布雷弗曼看来,自动化是工业劳动力整体“去技能化”过程的一部分。管理者通过实行泰勒制组织技术,并且把劳动过程分解为专门化的任务,能够对劳动者实施控制。无论在工业环境中,还是在现代办公室里,技术的引入限制了对于创造性人力投入的需要,从而导致了劳动的整体退

^① 这里的机器人更准确的译法是自动装置,可能外表并不像人,也不以人类的方式操作,只是可以代替人力自动工作。恰彼克[Karel Čapek 1890—1938]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捷克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早期短篇小说主要描写人为了冲出命运狭小的樊笼而作的努力,另一类作品表现的是恰彼克的“黑色乌托邦”,描绘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如何迫使人们进行大规模反抗。1920年的剧作《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人制造了一个叫做“robot”的机器人,能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比人更准确、更可靠,不久就控制了人,以死亡相威胁,当然,人最后得救了。

化。因而,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无须思考、无须反思的身体,能够没完没了地完成单调重复、没有技能的工作。

布雷弗曼有关劳动的去技能化的作品,在瑞泽尔有关低技能的“麦当劳工作”^①的阐述中有所回应。参见第十六章开场白。

更晚近的一项研究为这场争论又提供了一种思路。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Sennett 1998)研究了在一间面包房里工作的人,这家店被一家大型食品集团收购,并引入高科技机械加以自动化改造。电脑控制的烘焙流程彻底改变了制作面包的方式。面包房的工人们不再用双手来混合配料,揉捏面团,不再需要用自己的鼻子和眼睛来判断面包是否已到火候。他们现在与那些配料或一条条的面包完全没有物理接触。事实上,整个过程就是通过电脑屏幕来进行控制和监督。电脑来决定烤炉的温度与烘焙时间。这些机器有时候也能制作出优质的面包,但有时候做出来的面包也会烤糊发黑。这间面包房里的工人(如果称他们为面包师就错了)是否被雇用,看的是他们是否熟悉电脑,而不是他们是否知道怎么烘焙面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工人基本也用不上什么电脑技能。整个生产过程涉及的电脑操作只不过是撒撒电脑上的按键。其实,一旦电脑化机器崩溃,整个生产过程就中止了,因为面包房里的“技术型”工人没有一位受过培训或有权,能够修复这类问题。森内特所观察的工人倒是想出力帮忙,让机器重新运转起来,但他们无能为力,因为自动化已经使他们的自主性大为削弱。将电脑化技术引入工作场所,已经导致全体劳动者的技能普遍增加,但也导致劳动力的两极分化:一小群人是高度技能型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工作具

有很高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一大群人是文秘岗位、服务岗位和产业工人,他们的工作缺乏自主性。

不管怎么说,要彻底解决技能之辩是很困难的。无论是技能的概念理解,还是技能的测度指标,都存在问题。女性主义研究者已经指出,构成“技能”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建构的(Steinberg 1990)。根据这种看法,习惯上对于“技能型”工作的理解所反映的,往往是这种工作的典型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从客观角度评价的工作任务的难度。纵观职业史,一旦女性进入该领域,一模一样的工作任务就被派定为不同的技能水平(甚至重新定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Reskin and Roos 1990)。当然,对于其他地位低下的劳动者,比如少数民族的工人,情况亦是如此。即使在性别偏差和种族偏差不起作用的场合下,技能也具有多重维度:同样一种工作,在这个维度上可能让人退化,在另一个维度上却可能促人提高(Block 1990)。因此,如果考虑自动化是否使劳动去技能化,要看考虑的是技能的哪一种维度。斯彭内尔(Spenser 1983)对技能之辩进行了全面评述,然后指出,那些从工作任务的实质复杂性角度来考察技能的研究,往往会支持“提高技能”(upskilling)的立场;而那些从工人所具备的自主性和/或所施加的控制角度来考察技能的研究,则往往会发现,通过自动化,工作确实是“去技能化”了(Zuboff 1988; Vallas and Beck 1996)。

信息技术

上面所讨论的布劳纳和布雷弗曼对于自动化影响的视角可谓针锋相对,在今天讨论信息技术对于工作场所的影响时又一次出现。互联网、

^①“McJobs”:此词现在已用来泛指简单机械、无须多少技能的活计。

电子邮件、电话会议以及电子商务正在改变公司经营业务的方式,这一点当然没有什么疑问。但它们也在影响着雇员日常工作的方式。像布劳纳这样持乐观思路的人提出,信息技术促成了更具弹性的新型工作方式,将使工作世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些机遇会让我们超越工业劳动的例行与异化的一面,进入到一个更具解放性的信息时代,让工人对劳动过程有更大的控制和更多的投入。技术进步的热情倡导者有时候被称作“技术决定论者”(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s),因为他们相信,技术的力量决定劳动本身的性质和面目。

但也有人不相信信息技术会给劳动带来一种完全积极的改变。索莎纳·祖波夫研究了信息技术在公司中的使用情况(Zuboff 1988),并总结道,管理者选择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可能非常不同。信息技术如果作为一种创造性、分散化的力

量来使用,就可能有助于打破僵化的等级制,使更多雇员参与决策,并且让工人更加密切地参与公司的日常事务。另一方面,它同样也很可能被作为强化等级制和监督手段的一种方式。在工作场所使用信息技术,可能会减少面对面的互动,阻隔问责渠道,把办公室变成一个由自足自闭的单元组成的网络。在这种思路看来,信息技术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要看它的使用目的,以及使用它的人如何理解它所扮演的角色。

信息技术的扩展确实会给某些部分的劳动力带来令人振奋的提升机会。例如,在传媒、广告以及设计领域,信息技术提高了专业领域的创造力,并且把灵活性融入个人的工作风格之中。对于那些具备资格、受到器重、担负要责的雇员,实现“连线员工”(wired workers)和“远程办公”^①的前景仿佛近在眼前。然而,在劳动者处境系列的



在劳动场所使用信息技术,其实是否使得员工去技能化,比如这些客服中心的员工?

① 远程办公(telecommuting):指运用计算机网络、传真机、电话等设备在家办公,省却物理意义上的上下班通勤(commute),实现电子远距信息往返交流。

另一端,则有成千上万在客服中心和数据录入公司工作的人,报酬微薄,没有专门技能。这些职位主要是近些年来电子通信发展的产物,其孤立感和异化感的程度,与布雷弗曼笔下那些去技能化的工人不相上下。在客服中心处理旅行预定与金融交易工作的雇员,依据严格的标

准化格式,雇员可自由处置或创造性投入的空间很小,甚至毫无余地。雇员受到严格监督,她们与客户之间的互动会被录音以备“质量管理”。信息革命似乎已经产生大量例行化的非熟练技能型工作,其规模堪比于工业经济中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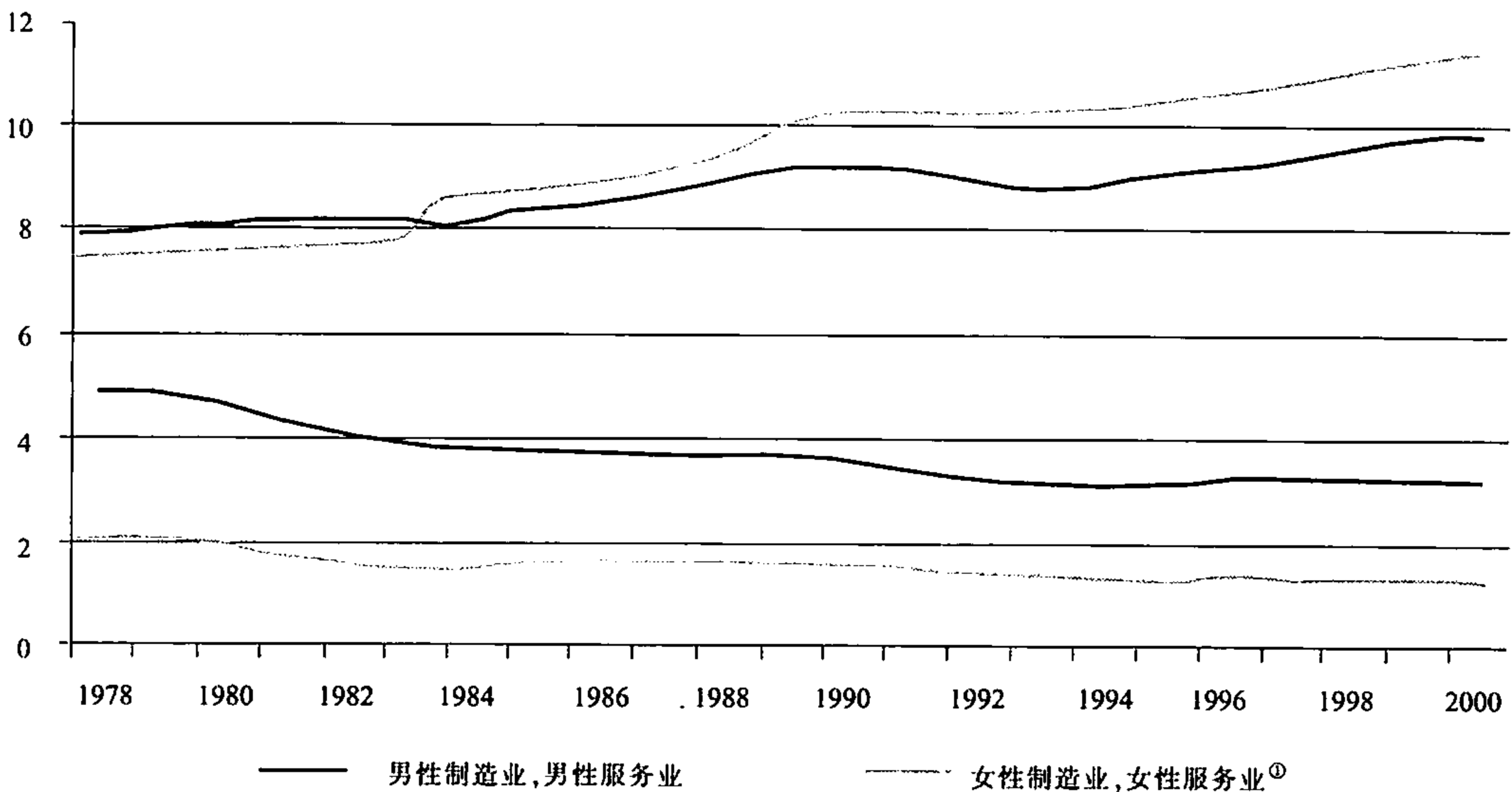


图 18.4 就业岗位数,以 1978 年至 2000 年每年 6 月的产业和性别分组(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ONS (2002a)

动力成本较低,更有效率的远东生产商进行竞争。

第十章第三节第一、二小节讨论了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有关问题。

一 知识经济

综合考虑这些数字,一些观察家提出,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向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转变。

这种新的社会类型不再主要以工业主义为基础。他们声称,我们正进入完全超出工业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人们创造出众多术语来描述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比如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以及新经济(new economy)。然而,真正进入日常用语的术语则是知识经济。

我们难以就知识经济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大致说来,它是指观念、信息和各种形式的知识支撑了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一种经济。在

① 原书仅区分了男性和女性的曲线颜色,但未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曲线颜色或形状。

知识经济中,大多数劳动力并不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或流通,而是负责其设计、开发、技术、营销、销售和服务。这些雇员也可以称为知识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s)。信息和意见的持续流动,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潜能,主导了知识经济。正像查尔斯·利德比特所观察到的那样:

我们中大多数人生产的东西没有重量,无法触摸,也不易测量,但我们却仿佛凭空赚钱。我们的产品并没有堆积在港口,储存在仓库,或者通过火车货运。不管是在客服中心、律师办公室、政府机关,还是科学实验室,我们大多数人通过提供服务、判断、信息和分析谋生。我们都处在这样一种仿佛子虚乌有的生意当中。(Leadbeater 1999: 页 vii)

站在 21 世纪的起始,知识经济的传播有多广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做了一项研究,试图测量各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产出中,可以归于知识产业的比例,以此估测这些国家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参见图 18.5)。广义来说,知识产业包括高科技行业、教育与培训行业、研发行业,以及金融与投资部门。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所有经合组织国家整体而言,知识产业占有所有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当时的西德的比例高达 58.6%,而美国、日本、英国、瑞典和法国也都高于 50%。

通过公共教育、软件开发以及各类研发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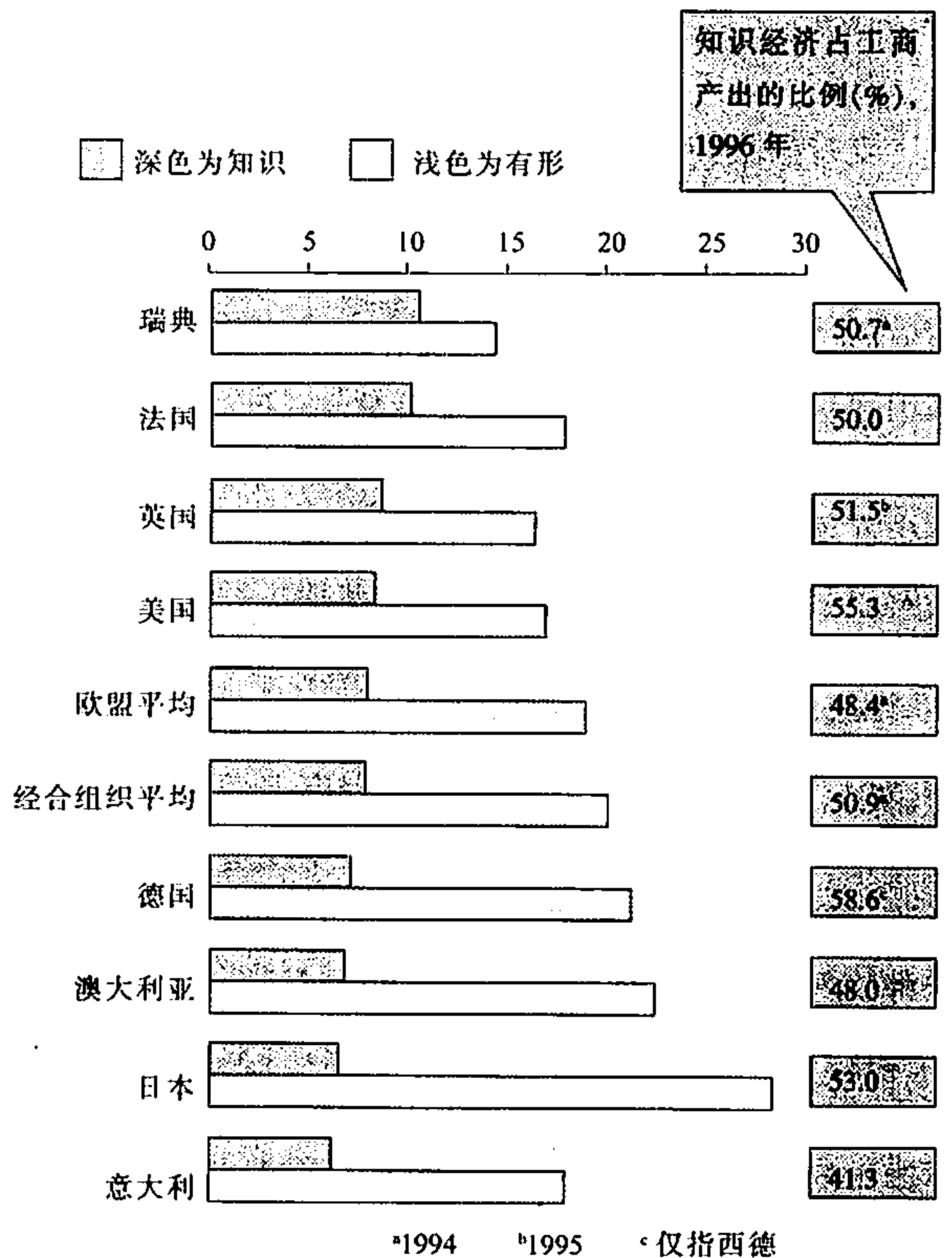


图 18.5 经合组织各国的工商产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95 年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1999 年 10 月 14 日)

式,对知识经济进行投资,现在构成许多国家预算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1995 年,瑞典把它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 10.6%用于发展知识经济。法国则凭借其在公立教育上的巨大开支而紧随其后。

应该承认,无论是从定量方面还是从定性方面,知识经济仍是一个难以研究的对象。衡量物品的价值,要比评估“没有重量的”^①观念容易一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西方社会各经济体来说,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正变得越来越关键。

① 原文为“weightless”,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这些“没有重量的”观念显然不是“无足轻重的”。

二 技能多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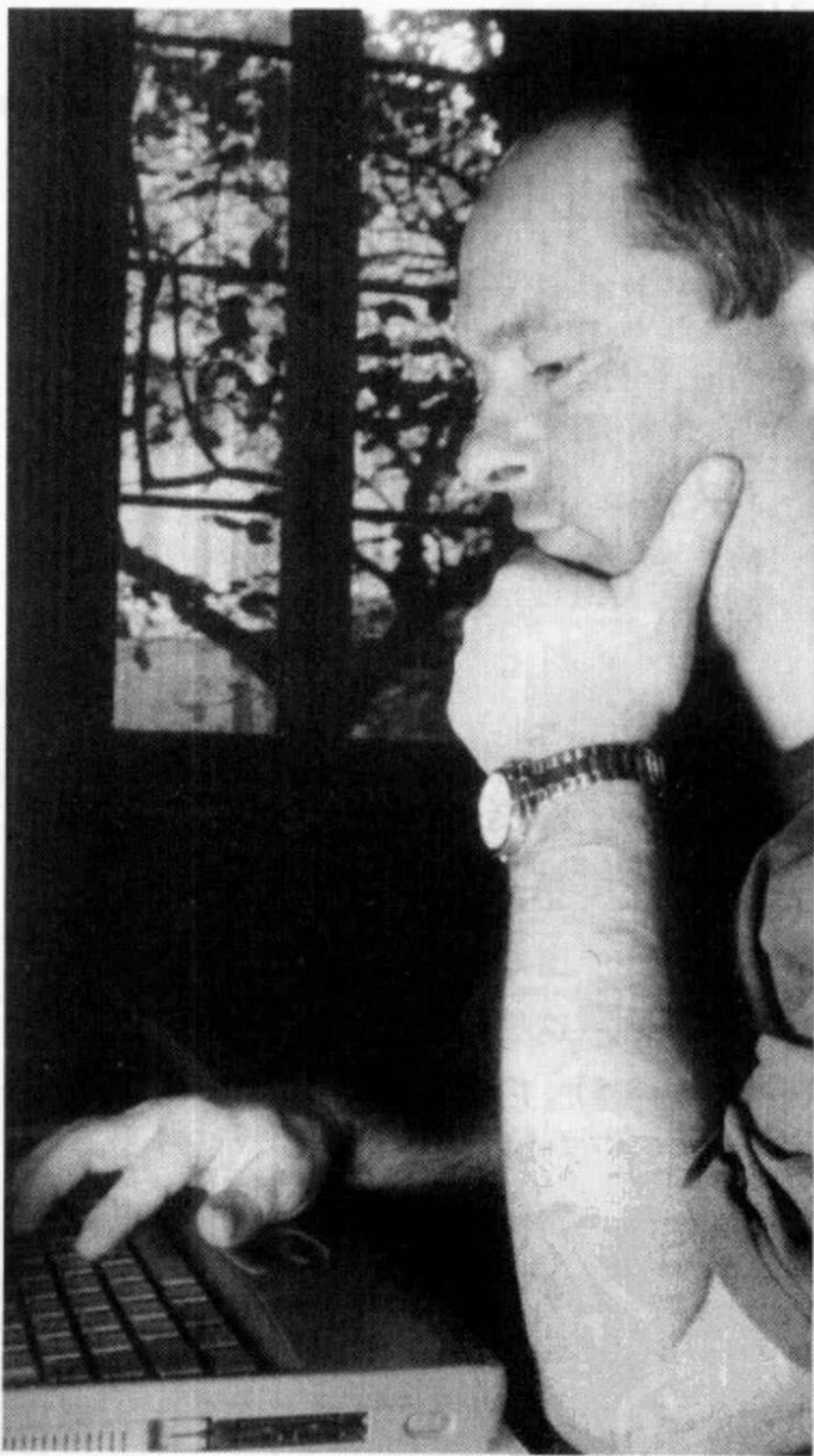
支持后福特制的评论者的信念之一,是相信新的工作形式使雇员有可能通过从事多种多样的任务,拓展自身技能的范围,而不是周而复始地从事一项专门的任务。群体生产与团队工作被认为促成了“技能多样化”的劳动力,能够执行更为多样化的职责。而这又能提高生产率,改进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雇员如果能够以多种方式促进自己的工作,在解决问题和提出创造性思路方面也会更加成功。

“技能多样化”的趋势也影响到了雇用程序。如果说以前的雇用决策在很大程度上看的是教育和文凭,现在的许多雇主则是要找适应性强、能够快速学习新技能的人。因而,掌握某一种软件应用的专业技能,可能就不如证明你能迅速领会观念的能力那么受到重视。专业知识固然也是一种资本,但是如果雇员难以创造性地把有限的技能用于新环境的话,到了灵活多变、富于创新的工作环境,它们可能就不会被看作是一种优势。

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就“劳动的未来”做了一项研究,其同名报告(Meadows 1996)考察了现在雇主所寻求的技能类型。该项研究的作者们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在熟练技能型职业部门还是非熟练技能型职业部门,“个人技能”都愈来愈受到重视。协调工作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面对挑战能够积极应战或采用创造性方法的能力,这些就是一个人可能带到工作中的最佳技能。对从服务部门到金融咨询的一系列背景下的雇员来说,在愈来愈迎合消费者个人需要的市场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在工作场所中利用“个人技能”。根据该研究作者们的看法,对于那些长期从事单调重复工作的工人来说,“个人技能”毫无用武之地,技术技能的“退化”后果可能最为严重。

三 在职培训

技能多样化是与员工培训和再培训的观念密切相连的。许多公司宁愿雇用能够在工作中培养新技能的有能力的非专业人员,而不是专业狭隘的专家。随着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应该根据需要重新培训自己的员工,而不是延聘昂贵的顾问,或用新员工代替已有的人员。投资培养有望成为有价值的终身劳动者的骨干员工,被认为是紧跟快速变化的时代的一种战略性措施。



互联网、笔记本电脑和家用电脑使得一些劳动者有可能在家工作。不过,把办公室带回家也有它的缺陷。比如说,有些员工觉得不得不比从前工作更长的时间,而有些雇主则不相信自己的员工工作足够努力,未能充分评价他们的表现。

一些公司通过工作分担团队 (job-sharing teams) 来组织在职培训。这种手法使得可以一边进行工作,一边进行技能培训与辅导。一名信息技术专家可能要与一名公司管理者搭档工作几个星期,以便让每个人都能相互学习一些技能。这种形式的培训节省开支,因为它并没有明显减少工作时间,并且可以使所有相关员工都拓展了他们的技能基础。

对劳动者来说,在职培训可能是开发他们的技能和职业前景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有必要指出,并非所有劳动者都能平等获得培训机会。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对 1958 年和 1970 年出生的两组年轻人进行了同期群研究,发现已经获得文凭的雇员远比没有文凭的同伴更有可能接受在职培训 (ESRC 1997)。这种研究表明,公司对那些拥有最高文凭的人会连续投入更多资金,而那些没有文凭的人则没有多少机会。培训对工资水平也有影响:在 1970 年出生的这一组人中,以工作为基础的培训增加了雇员 12% 的收入。

四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允许员工在家完成部分或所有的工作,常常是借助计算机上网进行。在不要求与客户或同事经常接触的工作中,比如像计算机平面设计或广告文案写作,雇员发现在家工作可以平衡工作以外的责任,而且工作效率更高。随着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在未来几年里,“连线员工”肯定会普及起来。

这些变化在实践中的一个例证,就是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第一小节所讨论的赫尔辛基虚拟村。

尽管近些年来,在家工作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它不一定得到所有员工的偏爱。当员工不在办公室的时候,监督他们的工作要困难得多。因此,为了保证员工并没有滥用他们的“自由”,公司经常对在家工作者采取新的控制类型。例如,可能要求这些员工与办公室随时保持联系,或者比其他员工更经常地汇报有关工作的最新进展。

有关劳动场所里的监控,详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二小节。

虽然人们对“家庭办公室”^①的潜力怀有巨大的热情,一些学者还是警告,在家里从事挑战性、创造性项目的专业在家工作者,与在家里从事文字录入或数据录入等单调工作的没有技能的在家工作者,两者之间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真的出现这种分化,女性最可能集中到较低层次的在家工作者中 (Phizacklea and Wolkowitz 1995)。

五 终身职业的终结与复合型劳动者的兴起

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于“弹性”劳动力的需求,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提出,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复合型劳动者。他们将拥有“复合型技能” (skill portfolio),也就是有许多不同的工作技能和文凭证书。他们可以借此在工作生涯中,在不同的工作以及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进行流动。将来只有较小一部分工人能够拥有目前意义上的连续性的“职业生涯”。实际上,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们认为,“终身职业”的观念正在成为往事。

一些人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种向复合型

① “home offices”,一般习称的“SOHO一族”,即“在家办公一族”,“SOHO”就是“small offices/home offices”的简称。

劳动者的转变:劳动者可以不再长年从事同样的工作,并且能够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筹划自己的工作生活(Handy 1994)。其他人则认为,“弹性”在实践中其实意味着组织多少可以随意地雇用和解雇职员,使员工完全没有安定感。雇主对他们的劳动力只有短期的承诺,并且将可能使额外的补助金和退休金的发放降到最低程度。

最近在加利福尼亚硅谷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该地区的经济成功是与其劳动力的复合型技能为基础的。硅谷公司的倒闭率非常高:每年大约有300家新公司建立,但同时也有相同数目的公司破产。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占有很高的比例。他们已经学会如何适应这种局面。作者们说,结果是人才和技能迅速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另一家公司。人们对此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技术专家变成顾问,顾问变成经理,雇员变成风险投资者,反之亦然(Bahrami and Evans 1995)。

在年轻人中,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顾问和专家,似乎确实表现出一种日益强烈的复合型工作的倾向。根据一些估测,英国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可能从事使用三种不同技能成分的11种不同的工作。然而,这种情况依然是一种例外而非通例。就业统计数据并非显示雇员更替率有大幅上升,可以指望出现趋向复合型工作的大规模转型。1990年代进行的一些调查揭示道,英国和美国虽然拥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为放权的劳动力市场,但其全日制劳动者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待的时间同10年前是一样的(*The Economist*, 1995年5月21日)。原因似乎是管理者们认识到,员工如果频繁更替,成本较高,也有损士气。而且,他们更愿意重新培训自己的员工,而不是招募新人,哪怕这意味着要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拉斯在他们的书《打造持久》中(Collins and Porras 1994),分析了18家美国公司,它们在股票市场上的业绩自1926年以来一直高于平均水

平。他们发现,这些公司不会随意雇用和解聘人员,相反,对它们的员工采取了高度保护性的政策。在研究期间,这些公司中只有两家从外面引进了一位主管。相形之下,本项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太成功的那些公司引进了13位主管。

这些发现并没有否定那些认为复合型劳动者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人的观点。组织规模缩小是一个事实。成千上万曾经以为自己有一份终身工作的人被抛向了劳动力市场。为了重新找到工作,他们可能被迫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技能。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再也无法找到同他们以前的工作相当的工作,甚或无法再找到有薪工作。

第十六章讨论了现代劳动的其他特性,包括与现代工商组织的管理有关的问题,比如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对于企业文化的关注。

第四节 工作无保障感、失业与劳动的社会意义

当新的劳动方式给许多人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时,它们也可能给那些认为自己陷入一个失控世界的人带来巨大的暧昧不定感。我们在本章已经看到,作为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导向的经济转变的一部分,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也正在改变着组织安排自身结构的方式,所使用的管理风格的类型,以及分配和贯彻劳动任务的方式。迅速的变迁可能会造成不稳定。许多不同职业类型的劳动者现在产生了工作无保障感,既担忧他们的工作岗位在未来的稳定性,也操心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工作无保障感现象成为劳动社会学中一项重要的争论话题。许多评论者和

劳动的重要性在下降吗？

长期失业、工作无保障感、企业裁员、复合型职业生涯、兼职工作、弹性就业模式、工作分担……似乎有前所未有的众多人士正在以一种非标准的方式劳动，或者根本就不从事有薪劳动！也许该是重新思考劳动的性质的时候了，尤其是重新思考劳动常常对人们的生活所起的主导作用。

因为我们把“劳动”与“有薪就业”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很难发现，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法国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安德烈·高尔兹在其分析中提出，未来有薪劳动在人们的生活中将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高尔兹的观点乃是基于对马克思著作的评析。马克思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盟工人阶级，导致一场革命，引向一种更具人性化的社会类型。在这种社会里，劳动将是生活必须提供的满足感的核心来源。尽管高尔兹是一位左翼作家，但他认为蓝领工人现在已经成为劳动力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并且是仍在衰微中的一个少数群体。

在高尔兹看来，认为工人可以接管他们所属的企业已经没什么根据了。几乎不存在改变有薪劳动性质的切实希望，因为劳动是依据技术方面的考虑加以组织的。如果想让经济保持效率，这些考虑便是不可避免的。按照高尔兹的说法：“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Gorz 1982, 页 67）。如果劳动是沿循泰勒制生产流水线组织起来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需要，否则劳动就会变得令人压抑或单调乏味。

高尔兹提出，在那些处于稳定就业中的人旁边，失业率的上升连同兼职工作的扩展，已经产生了一个他所说的“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事实上，绝大多数

人都处于这个“非阶级”中。这是因为，如果我们逐一排除了年轻人，退休人员，病人，家庭主妇，以及从事兼职工作或失业的人，那么，从事稳定的有薪工作的人口比例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有限的。高尔兹相信，信息技术的扩展会进一步减少可获得的全职工作的数量。其结果可能是开始拒绝西方社会的“生产主义”观点，也就是一味强调财富、经济成长和物质产品。在不久的未来，大多数人将走出持久的有薪劳动领域，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根据高尔兹的观点，我们正在趋向一个“双重社会”（dual society）。这个社会的一个领域将会组织起生产和政治机构，追求效率最大化；而在另一个领域，个人将会忙于从事许多非劳动性质的活动，能给他们带来快乐或个人成就感。也许越来越多的人将进行人生规划（life planning）。根据这种规划，他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将会安排不同的劳动方式。

提出这样的观点理据有多么确凿？在工业化国家，劳动的性质和组织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越来越多的人确实有可能将不再迷恋“生产主义”（productivism），也就是强调持续的经济成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正如高尔兹所言，不要完全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待失业，而是要把失业看成为人们提供追求自己的兴趣、发展自己的才智的机会。这种思路确实很有价值。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进展还非常小。我们似乎离高尔兹所设想的情形还有很大的距离。随着女性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积极谋求确保有薪就业的人数是在上升而非下降。对许多人来说，要想生成维持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源，有薪劳动依然是必经之路。

传媒提出,30多年来,工作无保障感逐渐加剧,而在工业化国家,这种无保障现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声称,年轻人可能不再指望靠一家雇主提供一份稳定的职业生涯,因为迅速全球化的经济正在导致更多的企业并购以及公司“瘦身”,产生许多裁员现象。效率和利益的驱动意味着,没有多少技能或技能“无用武之地”的那些人,会被贬黜到那些不稳定、边缘性的工作岗位,容易遭受全球市场变迁的影响。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尽管劳动场所因为具有弹性而可以获得一些好处,但目前我们生活在一种“雇用与解雇”(hire-and-fire)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终身职业”的观念不再适用。

18.4.1 劳动的社会意义

对于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占据的份额要大于其他任何单个类型的活动。劳动的观念经常让我们想到单调乏味的苦活,想到一系列任务,我们最好能少干点活就少干点活,并且如果可能,最好什么都不用干。然而,劳动不只是苦役,否则,当人们失业时,他们就不会感到如此的失落和彷徨。设想一下,如果你永远找不到一份工作,会是什么感受?在现代社会,拥有一份工作对于保持一个人的自尊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劳动环境令人不快,工作任务单调乏味,劳动也往往是塑造人们的心理及其日常活动周期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在这里,有几点劳动的特征是值得提出的。

- 1 **金钱** 工资或者薪水是许多人赖以满足自身需要的主要资源。如果没有一份收入,就会大大增加应付日常生活的焦虑感。
- 2 **活动水平** 劳动常常为技能与才干的获取和历练奠定基础。即使劳动就是例行公事,它也提供了一个人可以发挥潜力的结构化环境。没有这样一种环境,就可能会减少这

些技能与才干的历练机会。

- 3 **多样性** 劳动使人们有可能接触到与家庭迥异的情景。在劳动环境中,即使工作任务比较乏味,人们也可能乐于做些与家务杂活不同的事情。
- 4 **时间结构** 对于持续就业的人来说,一天通常是围绕着劳动的节奏来组织的。有时候这可能令人感到压抑,但它提供了一种日常活动的方向感。那些不参加劳动的人经常发现无聊是一个主要问题,并且对时间有了一种无动于衷的感觉。
- 5 **社会接触** 劳动环境常常提供了获得友谊以及参与共同活动的机会。离开了劳动环境,可能就会缩小一个人的朋友和熟人的圈子。
- 6 **个人认同** 人们之所以重视劳动,通常是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认同感。尤其对于男人来说,自尊经常同他们为维持家庭所做出的经济贡献紧密相连。

面对这一份令人生畏的列举,不难看出,为什么没有工作可能会削弱个人对于自身社会价值的自信。

18.4.2 工作无保障感的加剧

1999年,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发布了“工作无保障感与工作紧张感调查”(Job Insecurity and Work Intensification Survey, JI-WIS)的结果,依据的是对于340名英国人进行的深入访谈,从普通工人到高级经理。该项研究旨在评价工作无保障感的程度,衡量它在劳动场所以及家庭和社区中的影响。报告的作者们发现,自1966年以来,工作无保障感在英国始终呈现出上升趋势,最集中的增长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的蓝领工人中间。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普遍有所复苏,但工作无保障感却继续加剧。该研究得出结论,现在工作无保障感是二战以

来的最高峰 (Burchell 1999)。

该调查也研究了过去曾经不同程度体验过无保障感的劳动者类型。作者们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工作无保障感的激增发生在非体力劳动者中间。从 1986 年到 1999 年,专业人员从最有保障的职业群体变成最无保障的职业群体,而与此同时,体力劳动者所体验到的工作无保障感则相对程度较轻。这种无保障感的主要来源之一似乎是对资方缺乏信任。当询问资方是否留意员工的最佳利益时,44% 的被调查者回答他们“只留意一点点”或“完全没有留意”(Burchell 1999)。

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工作无保障感并不是一种新兴现象。近些年来,围绕工作无保障感所达到的程度的争论已经变得更加明显,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劳动人口中的哪一部分所体验到的工作无保障感最为尖锐。一些批评者指出,“工作无保障感与工作紧张感调查”之类的研究项目,只不过是对于中产阶级所感受

到的工作无保障感的一种小题大做的反应。

一 “无保障的中产阶级”:工作无保障感是言过其实吗?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英国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后来证明对于传统制造业打击尤甚。在此期间,像钢铁、造船和采煤等行业,大约有 100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进入到 90 年代,专业和管理人员才第一次大规模体验到工作无保障感。公司并购和裁员已经影响到了银行和金融部门。信息时代的发展使许多公务员失去了工作,因为通过使用电脑技术,体系可以提高效率。

如果说制造业工人变得有点习惯于忍受裁员威胁的话,那么白领工人对于影响他们职业的变化则比较缺乏准备。专业人员中的这种焦虑使得一些人开始谈论所谓“无保障的中



对于这位失业工人来说,“毕生的工作”这种想法成了一种神话。

产阶级” (the insecure middle)。这个表达用来指一些白领劳动者,他们对自己工作稳定性的信心意味着他们接受了重要的财务承诺,比如数额可观的抵押贷款,送自己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养成很费钱的业余爱好。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想到过裁员,突然降临的失业这个幽灵使他们体验到了巨大的焦虑和无保障感。工作无保障感开始成为传媒和专业人士圈内的一个“热议”话题。不过,也有些人觉得,相比于工人阶级所经历的挥之不去的无保障感,这未免有些反应过度。

二 工作无保障感的危害

“工作无保障感与工作紧张感调查”发现 (Burchell et al. 1999),对于许多劳动者来说,工作无保障感远不仅限于担心被裁员。它还包括担心劳动本身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于员工健康和个人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

该研究揭示道,随着组织结构变得不那么科层化,而且决策会普遍渗透于整个劳动场所,劳动者在工作中正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然而,在对于他们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同时,许多劳动者却发现他们的提升机会正在减少 (参见图 18.6)。两相结合,导致劳动者们感到,他们正在对自己工作的重要属性“失去控制”,例如工作的节奏,以及对于整个职业生涯进步的信心。

社会学家保罗·迪盖提出,科层制的重要作用还在于提供问责渠道和道德责任,以抗衡越来越富于竞争性和灵活性的工作实践。有关他的观点,详见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讨论。

工作无保障感的第二点危害可以在工人的个人生活中反映出来。研究发现,在工作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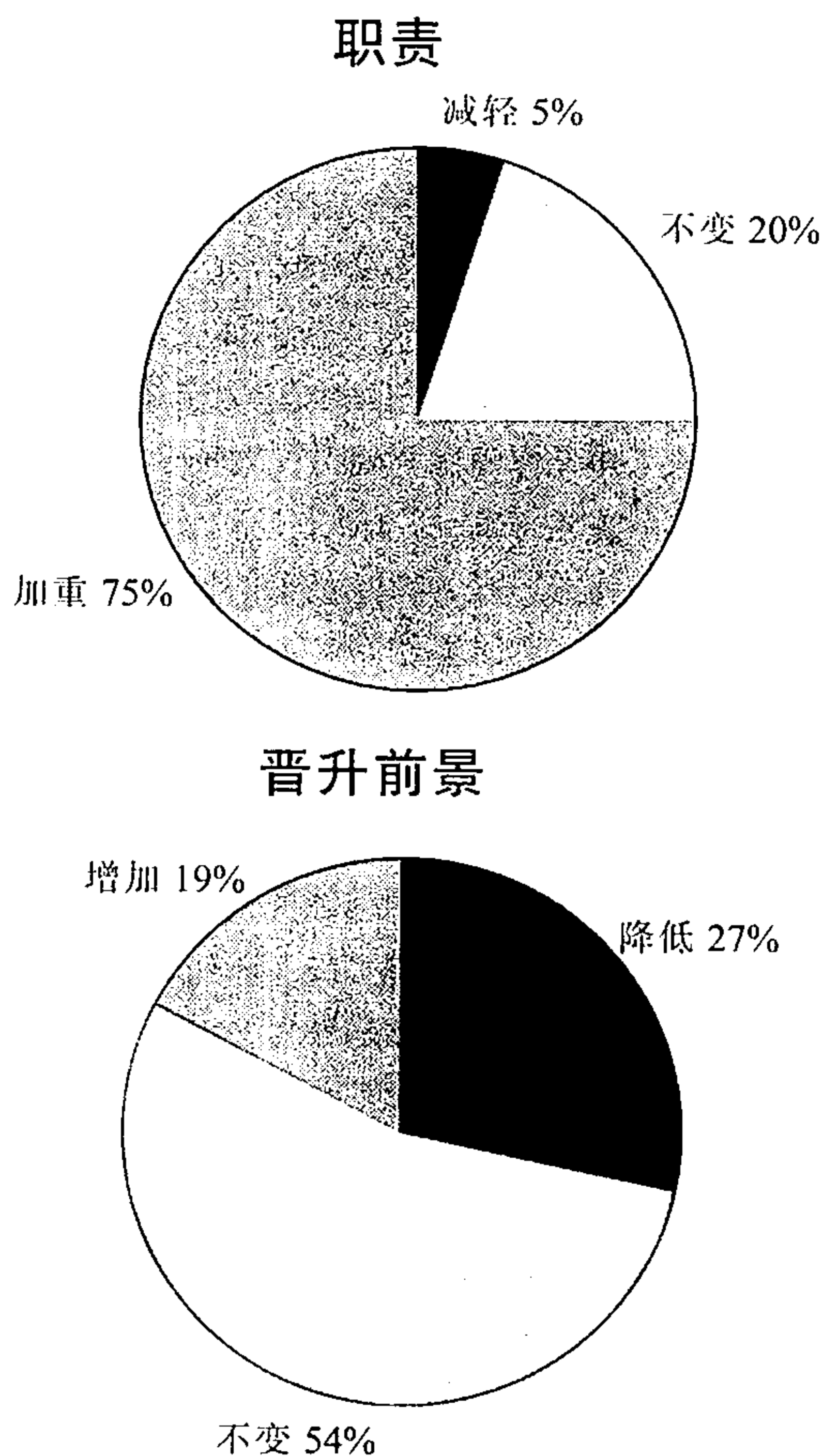


图 18.6 员工们正在经历一场劳动职责和晋升前景方面的变迁
资料来源: Burchell et al. (1999)

保障感与整体健康状况糟糕两者之间存在强相关。来自“英国家户追踪调查”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的资料证实了这种关联。该调查表明,长期持续的工作无保障感使人们的身心健康持续恶化。劳动者始终感到焦虑,处于持久的压力中,但无法进行调整以适应无保障的环境。这种来自于工作的压力似乎转移到了家庭环境中: 自述体验到高度的工作无保障感的人,在家里往往也会感到紧张 (Burchell et al. 1999)。

18.4.3 失业

在20世纪^①，失业率波动的范围相当大。在西方各国，失业率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在英国，20%的劳动力失去了工作。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和美国的公共政策。凯恩斯认为，失业是由于缺乏

充裕的购买力以购买商品，乃至生产没有得到刺激，需要的工人也就减少。政府可以通过干预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需求规模，从而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许多人开始相信，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管理意味着高失业率已经成为过去。在几乎所有西方社会，对于充分就业的承诺都纳入了政府的政策。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些政策似乎也很成功，并且使经济多少可以保持持续增长。

为工作而生活还是为生活而工作？

在某些分析家看来，上一个千年的终结本应该见证工作模式的巨大变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工作的缺失，乃至不再有任何经济刺激可以带来人口迁移。根据詹金斯和谢尔曼在1979年提出的主张：“即将到来的危机无论如何强调都不算夸大其辞……现在我们有通货膨胀、经济疲软、失业攀升。而再过15到20年，我们将迎来经济繁荣、最低通胀、高速增长，以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失业潮……这是一场对于工作岗位的大屠杀……”(Jenkins and Sherman 1979, 页182)

可现在，我们当然没有进入一种劳动者锐减的经济。然而，我们是否已经处在这样一种境地，我们与劳动的关系类型业已面目全非，乃至无法辨认？

将(詹金斯和谢尔曼之类作者的)悲观预测指为笑谈当然是容易的，但当代对于工作无保障的感知之深切广泛，却几乎与他们所预测的工作无保障的幻景不相上下。比如说，史密斯(D. Smith 1997, 页39)比较了两种情况。1986年时，有关无保障的新闻报道还比较零散琐碎(而那时英国的失业率要比十年后高得多)，而

在1996年，有关工作无保障的报道已是成篇累牍，增加了100倍。据《观察家报》(1996年6月16日)报道，英国就业人员中有40%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担忧，更有60%的人认为无保障感一直在加剧……

然而，尽管有这些说法，但实情却与此相反，从1975年到2000年，工作合同期只是略微缩短(从6年缩短为5年半)，女性的合同期实际上还在延长(Gregg and Wadsworth 1999; Nolan 2000, 页3; Green 2000则认为，20世纪70年代，工作的平均合同期为10年，到2000年仍保持在9年半)。实际上，即使在据称最糟糕的时期，即“精神焦虑的20世纪90年代”(neurotic nineties)，相比于“变幻不定的20世纪80年代”(erratic eighties)，合同期其实也有所延长。……80%的英国就业者依然持有固定工作，而28%的就业者在同一雇主手下工作已过十年。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或许能够指望在同一雇主手下工作至少四五年。

资料来源：Grint 2005, 页325—327

^① 原文为“在这个世纪”，应系修订旧版时遗漏未改。

但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期间，许多国家已经证明很难控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作为试图调控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了。在二战之后将近 25 年的时间里，英国的失业率不到 2%。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它上升到高达 12%。然后下降，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又开始回升。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末期，英国的失业率又一次开始下降。截至 2005 年，它维持在略高于 5% 的水平。

一 失业分析

然而，解释官方的失业统计数字并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参见图 18.7）。对失业下定义也不容易。它指的是“不参加劳动”。但“劳动”在这里是指“有薪劳动”，是指“在一个公认的职业里劳动”。即使被正确地登记为失业

者的人，也有可能从事许多形式的生产性活动，比如油漆房子或修葺花园。许多人从事兼职性的有薪劳动，或者只是打点零工。此外，退休人员也没有被当作“失业人员”。

许多官方统计数据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使用的失业定义来计算的。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标准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现在没有工作，如果有工作半个月内即可上岗，并且在上一个月内曾试图求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标准失业率应该用其他两项指标来补充。“丧失信心的劳动者”（discouraged workers）是指一些人想要一份工作，但是屡屡受挫，并因此绝望而不再觅职。“非自愿的兼职劳动者”（Involuntary part-time workers）是指即使想找也无法找到一份全职工作的人。

事实上，总体失业统计数据包含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失业，因此愈发复杂。一类是摩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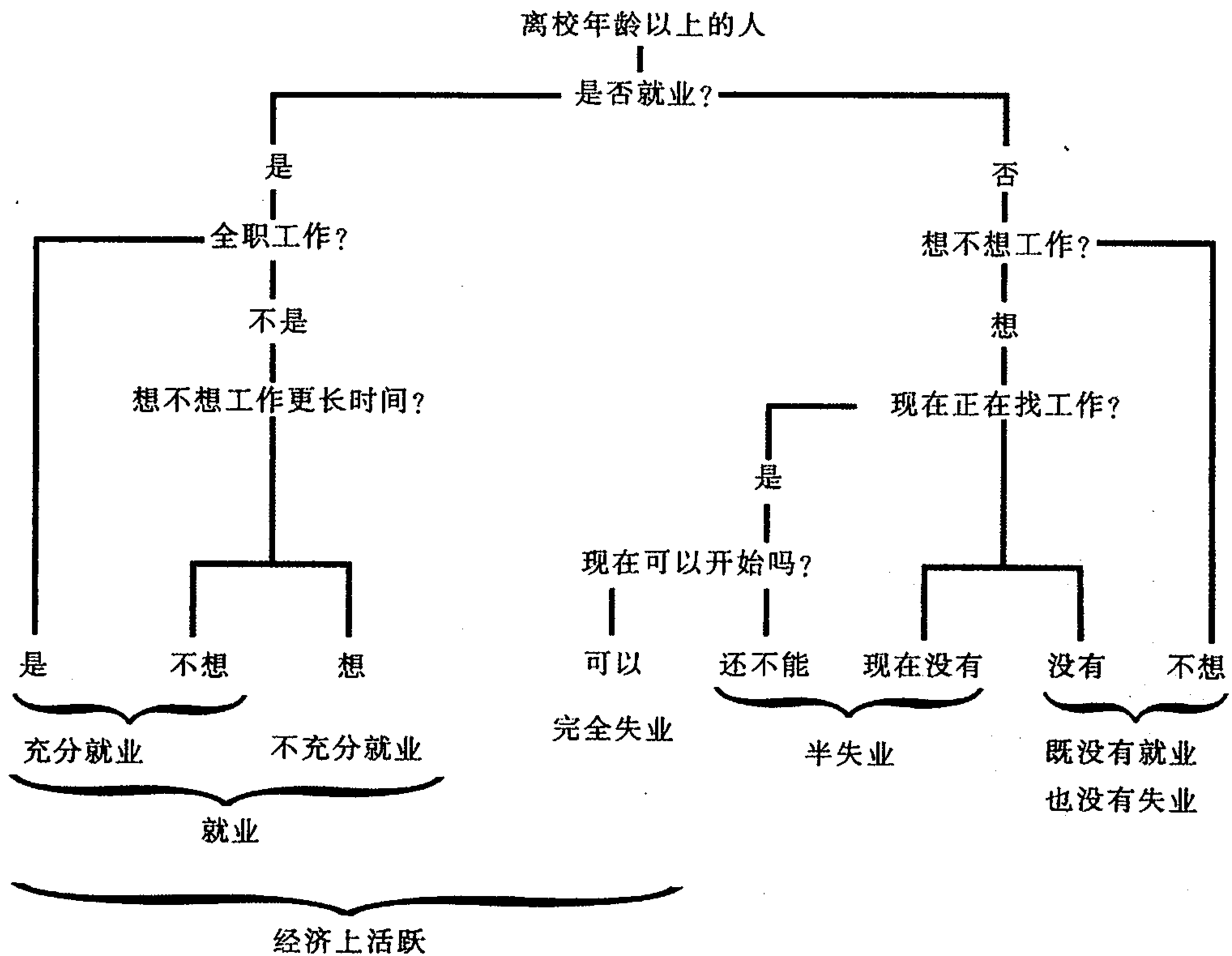


图 18.7 就业、失业和非就业之诸种可能状况的分类
资料来源:Sinclair (1987), 页 2

失业 (frictional unemployment), 有时候也称为“暂时性失业”, 指的是由于工作跳槽、毕业求职或者一段时期内健康不佳等原因, 使得个人自然地、短期地进入或脱离劳动力市场。与此相反, 结构性失业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指的是由经济的大规模转变而产生的岗位匮乏, 而非是影响特定个人的状况。例如, 英国重工业的衰退就导致了较高级别的结构性失业。

二 英国的失业趋势

在英国, 关于由政府所界定的失业分布变化有详尽的记录。男性的失业率要高于女性。截至 2002 年末, 有 89.2 万名男性登记失业, 而女性的这一数字则为 62.2 万名, 即如图 18.8 所示。以前有工作的人登记失业的, 男性几乎是女性的两倍。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或打理家务而登记失业的女性则可能比男性多 10 倍。

一般来说, 少数族群的失业率要高于白人。少数族群的长期失业率也远比人口中的其他群体要高。然而, 这些一般趋势掩盖了大量的多样性 (参见图 18.9)。在 2003—2004 统计年度, 白人失业率保持在不足 5%, 最低的是英国南部录得的 3.8%。而对印度裔人群来说, 这一比例仅仅略高, 大约 7%, 这也是导致一些人提出英国的印度裔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几乎与白人相当的因素之一。至于其他所有少数族群, 失业率要比白人高 2 至 3 倍。失业率最高的是孟加拉裔, 男性为 20%, 女性为 24%。

年轻人, 尤其是少数族群中的年轻人, 尤其会受到失业的影响。在 2001—2002 统计年度, 英国不到 25 岁的孟加拉裔男性青年中, 有超过 40% 处于失业。而在其他少数族群当中, 年轻男性的失业率介于 25% 至 31% 之间。相比之下, 白人同龄男青年的失业率为 12%。

相当比例的年轻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 尤其是少数族群的成员。在不足 20 岁的男性青少年失业人口中, 超过一半以上失业 6 个月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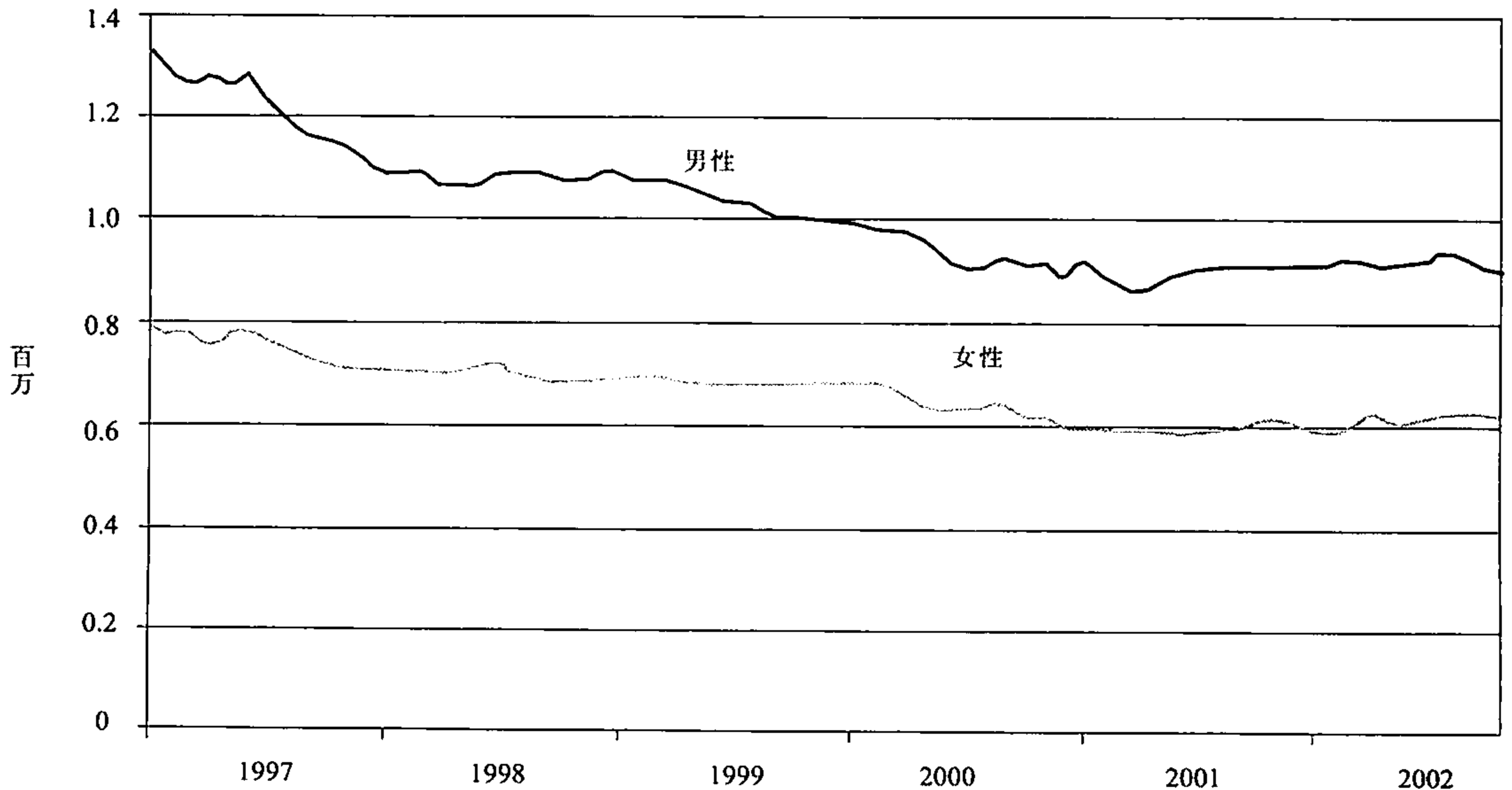


图 18.8 失业人数, 以性别分组, 英国, 1997 年至 2002 年
资料来源: ONS (2004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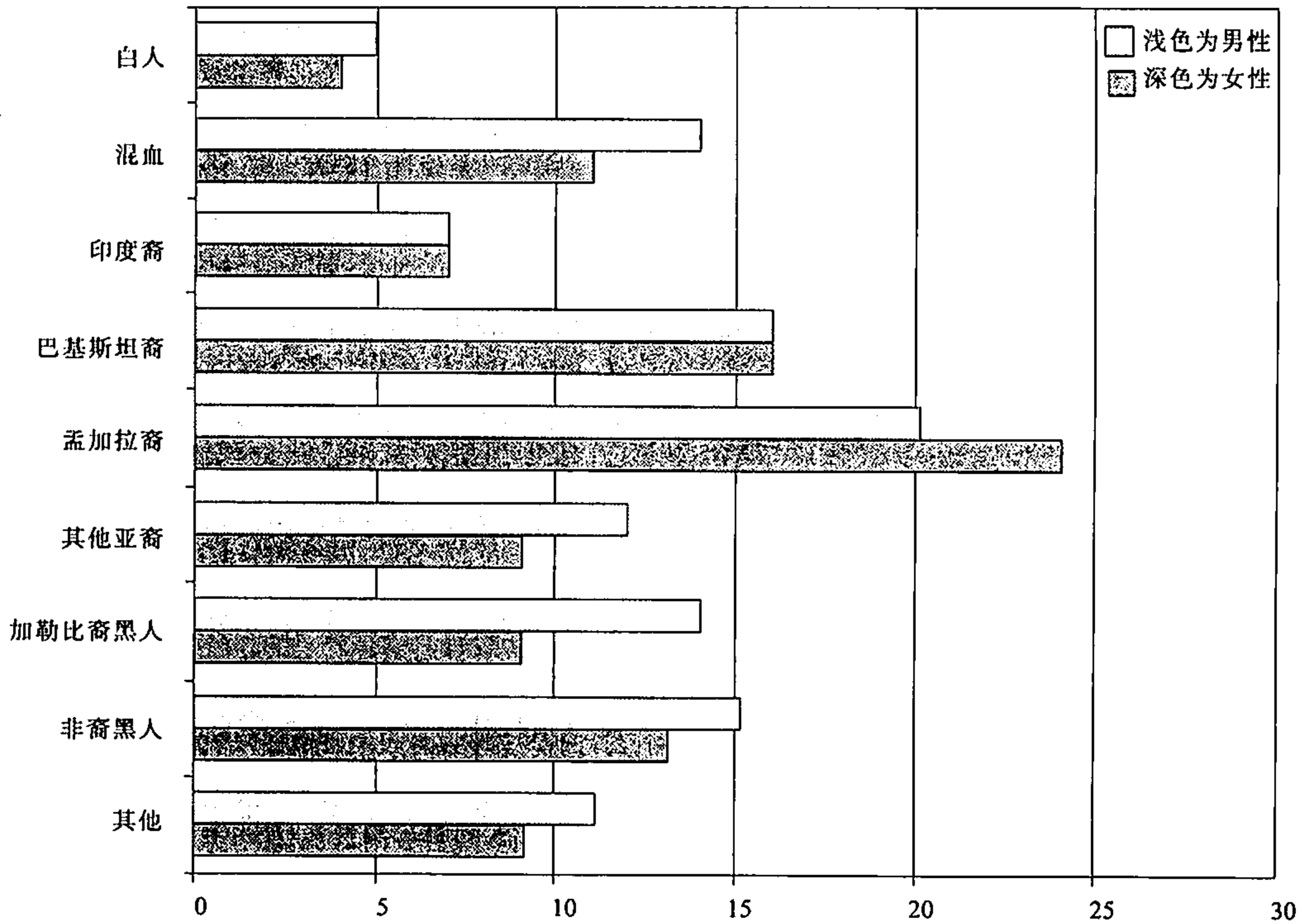


图 18.9 失业率,以族群和性别分组,英国,2001/02 统计年度(%)
资料来源:ONS (2004d)

6个月以上。新的政府措施针对的就是那些申领求职补贴超过6个月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现在是向长期失业者提供技能培训、求职指导以及从事补贴劳动的机会。

社会阶级与失业率是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对1970年出生的年轻人的同期群研究,父亲来自于社会阶级一或社会阶级二的人失业率最低。而父亲来自社会阶级五的人,或被单身母亲抚养的人,则失业率最高,其中相当比例的人从来没有工作过(ES-RC 1997)。^①

失业率也与教育文凭有关。英国的调查表明,文凭等级越高,失业率越低。2003年春天,没有文凭的人的失业率是有学位或相当学历

的人的4倍(*Regional Trends* 卷38,2003)。

三 失业体验

对那些习惯于有稳定工作的人来说,失业的经验可能是非常让人不安的。很明显,最直接的后果是失去了收入来源。由于失业救济金发放数额上的差异,这个影响是因国家而异的。在保健与其他福利补助有保障的国家,失业者可能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仍然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失业救济金发放的时间较短,而且医疗保健并非全民覆盖。对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来说,经济上的压力相应地就要大一些。

^① 这里借用的是戈德索普的社会阶级分类图式,参看本书表9.1。

对失业的情绪影响的研究注意到,当失业人员适应他们的新地位时,常常会经历一系列的阶段。当然,这种体验人人各异,但刚刚失业的人往往会感到震惊,然后会乐观地期待新的机会。一旦那种乐观没有得到回报,这也是经常出现的情况,个体就可能陷入抑郁消沉,对自己及其就业前景极为悲观。如果失业阶段长久延续,调适过程最终结束,个体会安于自己的现实处境(Ashton 1986)。

共同体与社会纽带的力量可能会被高失业率所削弱。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项经典社会学研究中,玛丽·雅霍达与她的同事们研究了玛丽安瑟尔(Marienthal)的个案,这个奥地利小镇在当地工厂关闭后,经历了大批工人失业(Jahoda et al. 1972)。研究者注意到了长期失业经验是如何最终削弱了共同体的许多社会结构和网络。人们对于公民事务的热情淡了,彼此社交的时间短了,甚至去市镇图书馆的次数也少了。

注意到失业体验也随社会阶级而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处在收入等级较低层的人来说,失业的后果可能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人们提出,中产阶级所感受到的失业危害主要是在他们的社会地位上,而不是经济地位上。遭到裁员的一位45岁的讲师,^①在失业阶段一开始,可能日子还很优裕,但可能会艰难地去体会,就作为专业人员的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和个人价值而言,失业究竟意味着什么。

小结：“品格的消蚀”？

30年前,社会学家森内特在对美国波士顿蓝领工人的一项研究中,描述了一位意大利

移民恩里克(Enrico)的生平。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市中心一栋办公楼里当看门人。尽管恩里克没有从贫困处境和微薄薪酬中获得乐趣,但他的工作给了他一种自尊感,一种供养妻儿的“正当”方式。整整15年里,他日复一日地扫厕所、拖地板,最后终于能够在市郊买下一栋房子。尽管他的工作并不荣耀辉煌,但却稳定而有保障。他的工作受到工会的保护。恩里克和他的妻子可以自信地筹划他们的未来以及他们孩子的未来。恩里克早就清楚地知道他什么时候退休,他有多少钱可供自己消费。依照森内特的说法,恩里克的工作“有一个唯一而又持久的目的,那就是挣钱养家”。尽管恩里克为他诚实辛劳的工作感到自豪,但他并不希望自己孩子也子承父业。对恩里克来说,重要的是为孩子创造出上向流动的条件。

15年后,森内特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遇见了恩里克的儿子里克(Rico),孩子的工作确实变得更加具有流动性了。里克先是拿到了工学学位,然后去纽约继续上商学院。在毕业之后的14年里,里克打造起了报酬优厚的职业生涯,跻身到薪酬量表最高5%的行列。里克与他的妻子珍妮特(Jeanette)为了发展各自的事业,婚后已经搬了不下四次家。里克与珍妮特敢于迎接风险,乐于接受变化,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并最终变得富有。然而,尽管取得了成功,这个故事并不是完满的。里克夫妻俩担心他们即将“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控制”。里克作为一名顾问,感到不能完全控制时间和工作:合同不明确,而且总在变化,他没有固定的角色,自己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网络的兴衰成败。珍妮特同样感到很难控制自己的工作。她管理一个会计师团队。团队成员的工作地点很分散:有些在家

^① 英国大学的“lecturer”远非中国的“讲师”可比,否则,不必等到被裁员,45岁的讲师已经有足够的压力了。英国大学职称等级分别是:Professor, Reader, Senior Lecturer, Lecturer。其中 Professor 和 Reader 相当于北美的 Full Professor (正教授), Senior Lecturer 相当于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Lecturer 相当于 Assistant Professor [(高于讲师低于副教授的)助理教授]。

里工作,有些在办公室工作,还有一些在数千里的分公司工作。在管理这种“弹性”的团队时,珍妮特在把握个人工作时不能依靠面对面的互动以及亲身了解,而只能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远程管理。

在国内四处迁移的过程中,里克和珍妮特半道儿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友朋亲谊。新的邻居和社区完全不清楚他们的过去,他们从哪里来,或者他们是什么人。正像森内特所言:“友朋亲谊和本地社区变动不定,这种状况构成了里克内心焦虑的最重要的背景——他的家庭”。在家里,里克与珍妮特发现,他们的工作使自己无法成为理想父母。他们一天到晚忙于工作,担心会因此忽视了孩子。然而,比勉力应付繁忙的时间和日程更麻烦的是,他们担心自己就在给孩子树立一个迷失方向的典型。当夫妻俩试图教给孩子努力工作、坚守承诺以及长远目标的价值观念时,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告诉孩子们的是一个不同的故事。里克和珍妮特典型地体现出,在当代社会,短期而灵活的工作方式日益为人们所偏爱。他们的工作史的特征就是不断流动、暂时责任以及对所做工作的短期投入。夫妇俩认识到,在我们目前的失控社会里,“事业成功和做人成功的标准难以两全”。

在森内特看来,里克夫妻俩的经历生动地展现出弹性工作方法对于从业者的个人生活

和为人品格的一些影响。他写了一本书叫《品格的消蚀》(Sennett 1998),书中指出,越来越强调灵活可变的 behavior 和工作风格可能会带来成功,但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和伤害。这是因为,现在对于劳动者的期望是灵活可变、适应性强、能够流动、愿担风险。这就直接冲撞了为人品格坚定的许多核心特征,比如立场忠诚、目标长远、坚守承诺、可为人托、意向明确。

森内特认为,在这个新的弹性时代,这些类型的紧张势所难免。尽管人们倡扬弹性,因为它给予员工更多的自由,以塑造个人生活的轨迹,但是森内特指出,这也施加了新的严格约束。现在要求员工能够流动工作,进出不同团队,转手多种任务,而不再是恪守某种终生职业生涯。忠诚成为一种缺陷而不是长项。当生活成为一堆互不连续的工作任务,而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职业生涯,长期目标会受到逐步侵蚀,社会纽带难以培养,信任关系也会短暂即逝。人们不再可能判断出哪种风险终有所报,同时晋升、解雇以及回报等方面的旧有“规则”似乎也不再适用。在森内特看来,当代成年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一个注重短期目标的社会中,过一种具有长期目标的生活。在他眼里,“新资本主义”的种种特征侵蚀了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许多个人品格要素。

本章要点

- 1 所谓劳动,就是需要耗费脑力和体力的任务执行,目标是提供满足人类需要的商品与服务。许多重要的劳动,比如家务劳动或志愿劳动,都是没有薪酬的。所谓职业,就是用来换取一份稳定工资的劳动。在所有文化中,劳动都是经济制度的基础。
- 2 现代社会经济制度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发展

起一套高度复杂和多样化的分工。分工意味着把劳动分为要求专业化的不同职业。其结果之一便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为了维持生活,我们都要互相依赖。

- 3 随着泰勒制或科学管理的引入,工业生产变得更有效率。泰勒制坚信:所有工业过程都可以被分解成简单任务加以计时和组织。福特制则把科学管理的原则扩大到同大规模市场相维系的大规模生产。福特制和泰勒制可以视作加

剧工人异化的低信任体制。而高信任体制则允许工人控制他们劳动的步调和内容。

- 4 工会组织与承认罢工权配合起来,成为所有西方国家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工会初起之时乃属于防御性组织,关注的是提供给工人一种手段,以控制自身的劳动条件。而在今天,工会常常在全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 5 近些年来,在许多工业化国家,福特制的实践已经被更具弹性的管理技术所取代。有些人偏爱“后福特制”这个术语,用来描述目前经济生产所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为了满足对客户定制的多样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尽可能地强化了弹性和创新。
- 6 一些人在谈论“职业生涯的终结”,以及“复

合型劳动者”的出现,也就是劳动者具备复合型的多种技能,并且很容易地就从一项工作转换到另一项工作。这样的劳动者确实存在。但对职场上的许多人来说,所谓“弹性”可能更多的让人想到职业前景黯淡、工作报酬微薄的岗位。

- 7 失业是工业化国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因为工作是一个人生活中的结构性要素,因此失业的心理体验经常会使人感到茫然失措。
- 8 工作无保障感的结果可能与失业的实际体验一样具有破坏性。所谓工作无保障感,是员工对于自己的工作,对于其在劳动场所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未来的安全性,感到某种忧虑。工作无保障感在中产阶级中明显上升,尽管一些人认为,对工作无保障的焦虑明显言过其实。

思考建议

1. 没有分工,现代社会可以运转吗?
2. 为什么一些活动被认为是劳动而其他活动则不是?
3. 如果泰勒制和福特制如此有效,为什么它们最近在衰退呢?
4. 如果你是一名复合型劳动者的话,你的技能组合是不是足够丰富,能够让你保住工作?
5. 里克的生活与恩里克的生活为何如此不同?

阅读指南

Keith Grint, *The Sociology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3rd edn (Cambridge: Polity, 2005). 《劳动社会学概论》

Keith Grint, *Work and Society: A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2000). 《劳动与社会读本》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经济社会学手册》

P. Thompson and C. Warhurst (eds), *Workplace of the Futur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Macmillan Business, 1998). 《未来的劳动场所》

网络导航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www.ilo.org>

劳动基金会 (The Work Foundation)

<http://theworkfoundation.com/>

社会科学信息门户——劳动社会学 (SOSIG Sociology of Work)

<http://www.sosig.ac.uk/roads/subject-listing/world-cat/sociowork.html>

苏黎世大学劳动社会学连线 (University of Zurich Sociology of Works Links)

http://socio.ch/arbeit/index_arbeit.htm

目录

第一节	基本概念	654
第二节	说明犯罪与越轨:社会学理论	655
19.2.1	功能主义理论	655
19.2.2	互动理论	658
19.2.3	冲突理论:“新犯罪学”	661
19.2.4	控制理论	663
19.2.5	理论总结	666
第三节	英国的犯罪模式	668
犯罪与犯罪统计		669
第四节	犯罪的受害者与施行者	671
19.4.1	性别与犯罪	671
19.4.2	青少年与犯罪	675
19.4.3	白领犯罪	677
19.4.4	有组织犯罪	680
19.4.5	网络犯罪	682



第五节 监狱：犯罪之解？ 684

小结：犯罪、越轨与社会秩序 686

本章要点 689

思考建议 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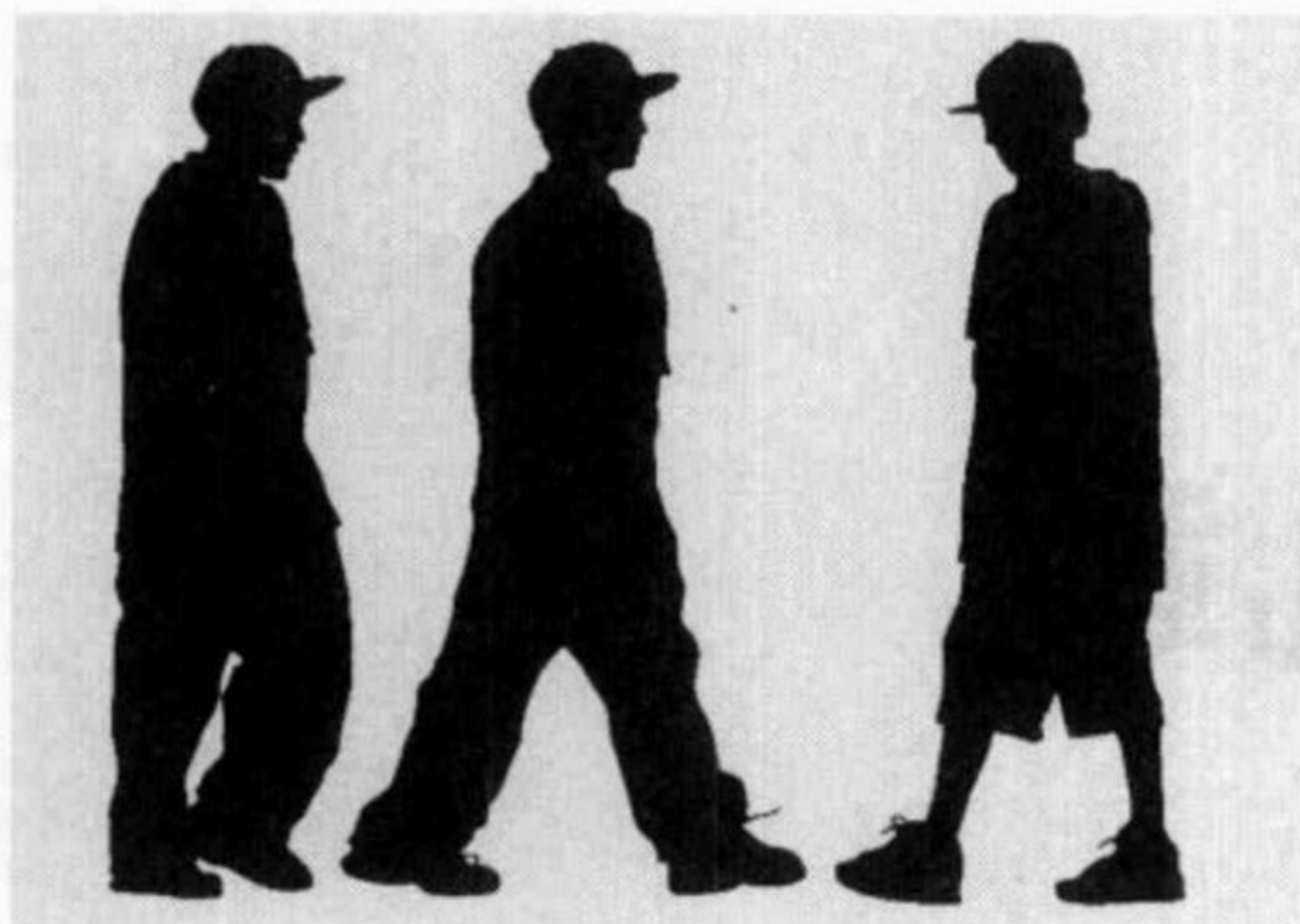
阅读指南 690

网络导航 691



第十九章

犯罪与越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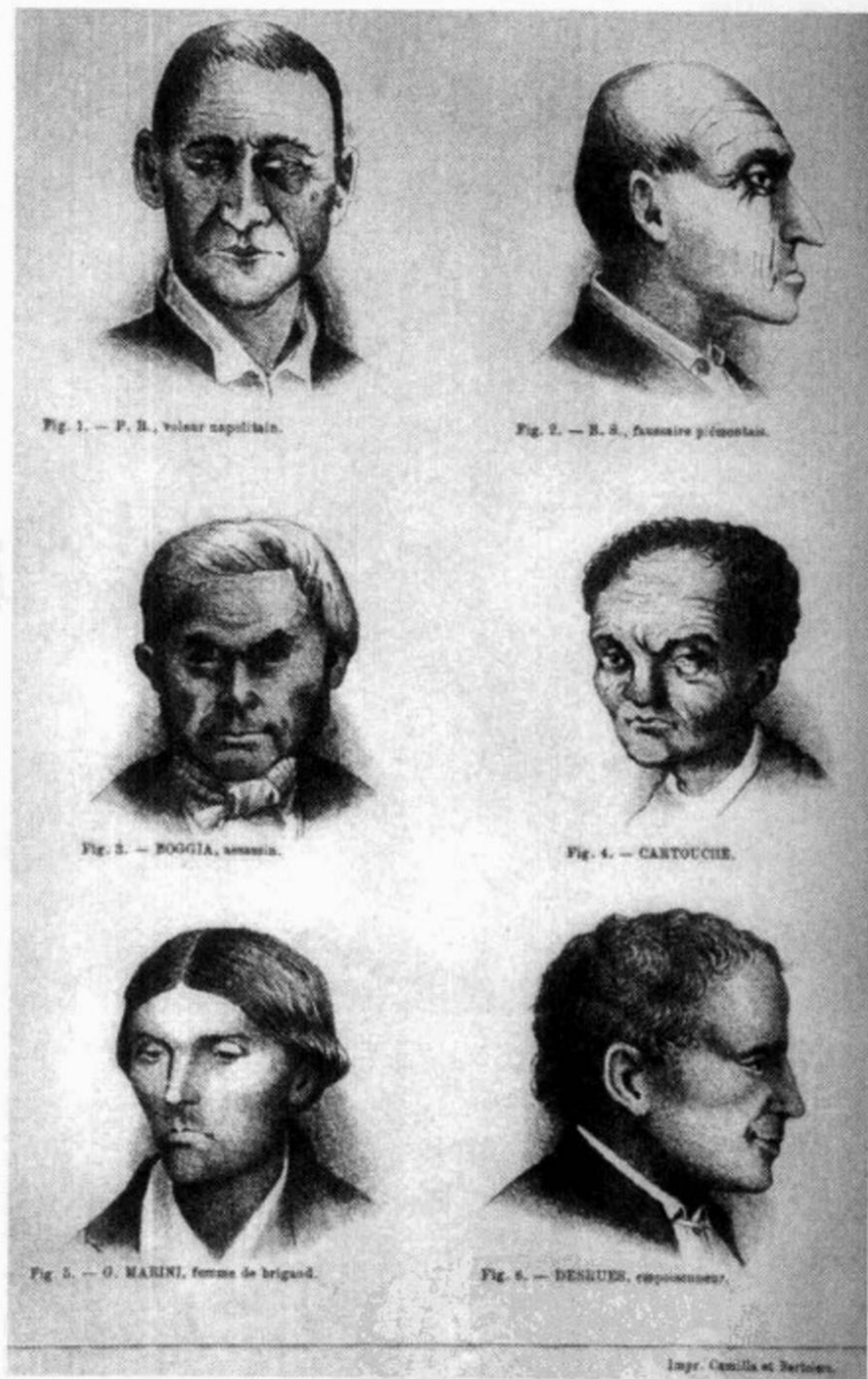


人们为什么犯罪？100年前，思考这一问题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一些人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就是罪犯。在19世纪70年代从事研究的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甚至认为，可以根据某些解剖特征来识别罪犯类型。他调查了罪犯的外貌和体格特征，诸如颅骨和前额的形状，下颚的大小，以及手臂的长度，结论是它们显示出了由人类进化早期阶段延续下来的特征。这里展示了一些龙勃罗梭所绘制的肖像，体现出罪犯的体格特征。

龙勃罗梭的观点已经被彻底批驳，今天我们再听起来，仿佛是一场笑谈。但他对于犯罪的生物学说明经过比较精致化的改装，却在上一个世纪一再浮现。后来的一种理论区分出三种主要的人类体格类型，并宣称其中一种体型与过失行为 (delinquency) 有着直接联系。这一理论认为，肌肉发达、活跃好动 (即中胚层型) 的人比瘦削体型 (外胚层型) 或丰满体型 (内胚层型) 的人更好斗，更粗蛮，因而更有可能成为犯过失者 (Sheldon 1949; Glueck and Glueck 1956)。^①

这样的观点也已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即使在体型和过失行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面上的联系，这也不能说明遗传的任何影响。肌肉型的人可能会被吸引去从事犯罪活动，因为这

些活动给他们提供了机会，来展现自己运动员一般的体格。此外，这一领域中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仅限于少年管教所中的犯过失者，而事实可能是，更为健壮、看起来像运动员的少年犯，相比于较为瘦削、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少年犯，更容易被送到这种地方。有些人可能容易被激怒，富于攻击性。这一点可以在对别人进行身



切萨雷·龙勃罗梭 (1836—1909) 所著《犯罪人》(L'Homme criminel) 中所刻画的犯罪类型：那不勒斯的一个强盗，皮埃蒙特^②的一个造假者，一个刺客，卡图什——没具体说明他的犯罪倾向，一个土匪老婆，还有一个犯人。

① 美国心理学家谢尔登提出的一种体格分类法。中胚层型 (mesomorphs)：又译体育型、粗壮体型，肌肉发达，超出常人，头部方大，胸肩宽厚，与通过健身使肌肉发达者显著不同。外胚层型 (ectomorphs)：又译细长体型，瘦脸高额，胸腹瘦窄，四肢瘦长，即使长胖也保持比例。内胚层型 (endomorphs)：倾向圆型，头圆腰圆，四肢较短，臂股多脂，腕踝纤细，即使节食也保持体型。

② 皮埃蒙特 (Piedmont) 是意大利西北区一大区名。

体攻击的犯罪活动中反映出来。但是,没有任何确定的证据表明,有什么人格特质是以这样的方式遗传的。而且,即便它们是以这种方式遗传的,它们与犯罪行为之间至多也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

如果说对于犯罪学的生物学思路不能令人满意地解答我们的问题“人们为什么犯罪?”,那么心理学是否更成功一些?对于犯罪行为的心理学思路在个人身上而不在社会当中寻找对于越轨行为的说明。但生物学思路把焦点放在使个体先天易于产生犯罪倾向的体格特征,而心理学思路则集中研究人格类型。早期的犯罪学研究大多是在监狱或收容所一类的其他机构中开展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精神病学的方法很有影响力。研究的重点在于罪犯的特征,包括“意志薄弱”和“道德退化”。比如汉斯·艾森克就认为,不正常的精神状态是遗传而来的,既可能使个体有犯罪的先天倾向,也可能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问题(Eysenck 1964)。

有些人认为,在一小部分个体中,会发展起一种不辨道德是非的^①(amoral)或心理变态的人格。心理变态者(psychopaths)是具有内向和冷漠的性格特征的人,他们行为冲动,很少有负罪感。有些心理变态者以暴力本身为乐。诚然,具有心理变态特质的个体有时候确实会实施暴力犯罪行为,但心理变态这一概念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心理变态特质是否必然会导致犯罪,这一点尚有待研究。几乎所有针对据说具有这些特征的人进行的研究,研究的都是已经被判有罪的犯人,而这些人的人格特征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们对同样的特质进行正面的表述,人格类型听起来就会大有不同,而且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推断,为什么这种类型的人天生就应

该是罪犯。

关于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至多只能说明犯罪的某些方面。尽管有些罪犯的人格特征可能与人口中其他成员明显不同,但大部分罪犯却很可能并非如此。犯罪行为五花八门,认为所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定的心理特征似乎是不合情理的。

无论是关于犯罪的生物学思路还是心理学思路,都假定越轨行为标示着个人的而非社会的某些“错误”。它们认为,犯罪是由不受个体控制、深植于身体或头脑中的某些因素引起的。所以,如果科学的犯罪学能够成功地识别犯罪的致因,人们就有可能处置这些致因。有鉴于此,关于犯罪的生物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的。我们在第一章关于奥古斯特·孔德的讨论中已经了解到,实证主义坚信,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研究社会世界,就能够揭示社会的根本真理。而在实证主义犯罪学中,这种立场使研究者们相信,经验研究可以找出犯罪的致因,并进而针对如何根除犯罪提供建议。

早期的实证主义犯罪学受到了后世数代学者的强烈批评。他们主张,任何关于犯罪本质的令人满意的阐述都必须是社会学的,因为犯罪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我们上文所看到的这些个体主义的犯罪说明,转向强调犯罪和越轨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社会学理论。

本章我们将看看对于犯罪和越轨行为的几种社会学说明。不过,我们首先来更细致地谈谈,我们说的“越轨”和“犯罪”之类的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还将考察英国的犯罪情况。最后,我们将转向有关犯罪的受害者与施行者的一些重要话题。

^① 原文为“amoral”,是与道德无关的或不能与论道德的,故有此译。“immoral”才是指不道德的,邪恶的(但并非不知道道德界限何在)。

第一节 基本概念

越轨可以定义为对某一社群或社会中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套给定规范的不遵从(non-conformity)。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区别出哪些是偏离规范的人,哪些是遵从规范的人。^①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偶尔都会逾越那些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例如,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小偷小摸:在商店里偷挟东西,把工作单位里笔墨纸张之类的小东西公物私用等等。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候,可能会超速行驶,打恶作剧电话,或是吸食大麻。

虽然越轨和犯罪在很多情况下互有重叠,但它们并不完全等同。越轨的概念比犯罪宽泛得多,因为后者仅指触犯了法律的不遵从行为。许多形式的越轨行为并不受到法律约制。因而,越轨研究可以考察的对象纷繁多样,从自然主义者(裸体主义者)、^②锐舞(rave)文化到新纪元驴友^③。

越轨概念既适用于个体行为,也适用于群体活动。例如黑天会,这是一个宗教群体,其信仰和生活模式与英国的大多数人不同。20世纪60年代跋蒂吠檀多从印度来到西方,传播黑天觉悟的真言,建立起这种崇拜。他尤其针对吸毒的年轻人提出了自己的训示,声称如果一个人遵从他的教义,就可以“快感永续,极



黑天会的信徒在伦敦大街上且歌且舞。

① 这里“正如已经强调”的内容,是第四版本章开场白里的,第五版中已经删掉了,因此显得突兀。

② 又称天然主义者或天体运动分子。其活动场所称天体营(nudist colony/camp)。

③ 新纪元驴友(New Age travelers):这里直接采用了从中国旅游论坛上流传开来的“驴友”一词。它本身即符合新纪元旅游者的追求:崇尚与自然亲近,多采用自助旅行,在吃苦耐劳的户外运动中体验人文,简化自我,涤荡心灵(因此“驴友”并不只是“旅游”的转音)。

乐永享”(stay high all the time, discover eternal bliss)。人们对黑天会信徒已经见怪不怪,他们在大街上且歌且舞,经营素食餐馆,向过路人分发教义宣传材料。尽管他们的信仰显得颇有些怪异,但大多数人一般仍以一种宽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黑天会信徒们代表了一种越轨亚文化。尽管他们现在的成员人数相较其几年前的巅峰时期已经有所衰减,但他们仍能在广阔社会中相当不错地维持存在。这个组织很富有,其资金来源于成员与支持者的捐赠。他们的地位不同于另一种越轨亚文化,即长期无家可归者。之所以提到这些人,主要是用来进行对比。这些穷困潦倒的人们,白天生活在大街上,在公园或公共建筑物里消磨时间,晚上可能露宿街头,或者在收容所中找到栖身之地。大多数长期无家可归者是在广阔社会的边缘上勉强维持其艰难的生活。

有两门各具特色但互有关联的学科在研究犯罪和越轨行为。犯罪学关注的是受刑律制裁的各式行为。犯罪学家感兴趣的往往是犯罪的衡量技术,犯罪率的变化趋势,以及旨在减少社区犯罪的政策。而越轨社会学借鉴犯罪学的研究,同时也考察超出刑律范围之外的行为。社会学家之所以研究越轨行为,是为了理解为什么某些行为会被广泛认为是越轨,而这些越轨的观念又是如何被有区别地运用到社会成员身上。

因此,对于越轨行为的研究既引导我们关注社会阶级即贫富分化的影响,也引导我们关注社会权力。当我们考察对于社会规则或规范的越轨或遵从时,我们必须牢记一个问题:谁的规则?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社会规范深受权力和阶级划分的影响。

第二节 说明犯罪与越轨:社会学理论

在社会学的一些领域中,某一种理论视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此不同的是,在越轨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许多种重要的理论取向。在简要讨论了生物学角度和心理学角度的说明后,我们现在来看看越轨社会学中颇有影响的四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功能主义理论、互动理论、冲突理论和控制理论。

19.2.1 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犯罪和越轨是由社会中的结构性张力和缺乏道德调控所导致的结果。如果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抱负与可获得的报酬不符,这种欲望和满足之间的差距将使一些社会成员产生越轨的动机。

一 犯罪与失范:涂尔干与默顿

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失范这个概念,最初是由涂尔干引入的。他提出,在现代社会,传统的规范和标准遭到了破坏,又还没有新的来替代。在社会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中,如果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指导人们的行为,失范就会出现。涂尔干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觉得迷失了方向,感到焦虑不安;因此,失范是影响自杀倾向的社会因素之一。

涂尔干把犯罪和越轨视为社会事实。他认为,两者都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必要成分。根据涂尔干的观点,现代人比传统社会中的人受的约束要少些。由于现代社会中个人有更多

规范 (norms) 与约制 (sanctions)

我们之所以遵从社会规范,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社会化使我们习惯于如此。所有的社会规范都与约制相伴,因为约制鼓励遵从行为,防止不遵从行为。约制是指其他人为了保证个人或群体遵从某项特定的规范,而对该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反应。约制可以是肯定的(对遵从行为提供酬报),也可以是否定的(对不遵从行为施加惩罚)。约制的施加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正式的约制由特定的一群人或一个机构执行,以确保某一套特定的规范被遵从。在当代社会,正式约制主要是指以法庭和监狱为

代表的那些类型。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正式约制,作为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则或原则,用来对付不遵从这些规则或原则的人。

非正式约制是对不遵从行为做出的组织性较弱、自发性更强的反应。比如,一个好学的学生会因太用功而遭同学取笑,或因拒绝晚上外出而被称为“书呆子”,这个学生所经历的就是一种非正式约制。再如,当某人发表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言论时,会遇到来自朋友或同事的反驳,这也是非正式约制。

的选择空间,所以势必会存在一些不遵从的行为。涂尔干认识到,任何社会中都不会对统治该社会的规范和价值存有完全的共识。

在涂尔干看来,越轨对社会而言也是必需的。它履行了两项重要的功能。首先,越轨具有一种调适功能。越轨把新的观念和挑战引入社会,从而成为一种创新的力量。它带来了变化。其次,越轨促进了社会中“好”行为和“坏”行为的界限维持。一件罪案能激发起集体反应,从而强化群体团结,阐明社会规范。例如,面对毒品贩子这一问题的住区的居民们,在一宗与毒品相关的枪击案发生后,可能会团结起来,致力于把本地区变成无毒品区。

涂尔干关于犯罪和越轨的思想很有影响,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从个人层面的说明转移到社会力量。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借鉴了他的失范观念,构建了一套极具影响的越轨行为理论,将犯罪的根源定位到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本身(Merton 1957)。

默顿调整了失范这一概念,用以表示当个体所接受的社会规范与社会现实相冲突时,个体行为所承受的压力。在美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其他工业社会中也一样——人们

所普遍持有的价值观强调物质上的成功,而获取成功的手段据说是靠自律和努力工作。据此,人们无论在生活中的起点如何,只要真正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但这种观点事实上并不成立,因为弱势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得到的进步机会很是有限,仅限常规习俗,甚或毫无机会。然而,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人却发现,他们被指责为仿佛没有能力取得物质上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承受着巨大压力,试图采取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来获取成功。因此,根据默顿的观点,越轨行为是经济不平等和缺乏机会平等的一种副产品。

对于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与实现它们的有限手段之间的张力,默顿区分出五种可能的反应类型。遵从主义者(conformists)无论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既接受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也接受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惯常手段。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型。而革新主义者(innovators)继续接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但采取不合法或非法手段来追求这些价值观。通过非法活动获取财富的罪犯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仪式主义者(ritualists)遵从社会所认可的标准,尽管已经看不到这些标准背后的价值

观。他们出于义务而遵从这些规则,但仅仅因为这些是规则,而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目标。仪式主义者会将自己奉献给枯燥无味的工作,哪怕它毫无职业前景,报酬也十分微薄。退却主义者 (retreatists) 完全放弃了竞争的态度,因此既拒绝了主流价值观,也不接受社会所认可的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手段。自给自足的群居村 (commune) 中的成员即属此例。最后一类是反叛主义者 (rebels), 既拒绝现存的价值观,也拒绝实现它们的手段,但他们积极地希望用新的价值观和实现手段来替代,并重建社会体系。激进政治群体中的成员就属于这种类型。

默顿的著作讨论了犯罪学研究中的主要难题之一: 当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富裕时,为什么犯罪率还会继续上升? 默顿通过强调愈益提升的欲求和持久的不平等之间的反差,指出相对剥夺 (relative deprivation) 感是越轨行为中的一个重要成分。

第十章第一节第一小节讨论了相对剥夺的观念。

二 亚文化的说明

后来的研究者从亚文化群体的角度来定位越轨,这些群体所采纳的规范鼓励或奖励犯罪行为。与默顿一样,阿尔伯特·科恩也认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但默顿强调个体由于价值观和实现手段之间的张力而做出越轨反应,而科恩则认为,越轨反应是通过亚文化群体而以集体性的方式发生的。科恩在《不法男孩》一书中声称 (Cohen 1955), 处于较低层的工人阶级中的有些男孩,对自己的生活处境灰心丧气,经常会一起加入不法亚文化,比如帮派。这些亚文化拒绝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取而代之的规范鼓励挑衅,诸如过失行为和其他不遵从行为。

理查德·A. 克洛尔德和劳埃德·E. 奥林 (Cloward and Ohlin 1960) 同意科恩的说法:

绝大多数不法青少年都来自较低层的工人阶级。但他们认为,“危险”最大的那些男孩,恰恰是已经内化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并被鼓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努力争取到一份中产阶级的未来。当这些男孩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就特别容易产生过失行为。在对男孩帮派的研究中,克洛尔德和奥林发现,不法帮派一般产生于那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成功的机会很小的亚文化社群,比如被剥夺的少数民族群。

三 界定越轨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一个结构良好的社会,就应该设计得能够使越轨行为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追随涂尔干的那些功能主义者却有相反的主张。涂尔干相信,即使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里,越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提出,通过界定越轨,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的那些标准。因此,我们并不一定非得彻底清除越轨。社会更有可能需要保持越轨,当然,是在可以接受的限制以内。

在涂尔干的作品问世 70 年以后,社会学家凯伊·埃里克松出版了《捉摸不定的清教徒》,研究了 17 世纪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越轨行为。埃里克松试图“检验 (涂尔干的) 观念: 一个社区能够认可的越轨者数量很可能长期保持稳定。”他通过研究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不妨说,要看一个社区应付越轨的能力,可以计算它有多少囚室和病床,有多少警察和精神病医生,有多少法院和诊所……控制机构似乎往往把它们的工作界定为将越轨维持在界限之内,而不是彻底清除越轨。(Erikson 1966)

埃里克松进一步假设: 社会需要一定量的

越轨,但会通过特定的功能运转方式,使社会保持完好。

那么,当越轨行为的量超出了控制,社会又会如何应对? 横跨学界政界的美国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 1993 年,也就是他去世前十年,写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题为《定低越轨》(Defining Deviance Down)。他在文章中提出,美国社会的越轨规模已经增长到超出它有能力认可的程度。其结果,我们已经“重新界定了越轨,将从前会被污名化的许多行为给豁免了”,从而在不知不觉之中,降低了“正常”的标准,^①使得根据此前的标准被视为不正常的行为不再被视为如此了。

美国社会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莫伊尼汉给出了一个实例,就是精神健康职业内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去机构化运动。有精神疾病的人现在不再被强制送进治疗机构,而是在服用安定药以后放回去。结果,纽约一地的精神病人数量从 1955 年的 93000 人下降到 1992 年的 11000 人。

那么其他那些精神病人又怎样了呢?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我们看见在纽约露宿的无家可归者。通过“定低越轨”,那些露宿街头的人不再被界定为精神错乱,而是住不起房子的人。与此同时,犯罪的可接受的“正常”标准也降低了。莫伊尼汉指出,在 1929 年的圣瓦伦丁节大血案中,7 名帮派分子被杀,事后,整个美国都义愤填膺。^②而今天,暴烈的帮派拼杀已如家常便饭,几乎不再激起什么反应。莫伊尼汉还认为,新闻对于犯罪小事不报、大事小报,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正常化”。他的结论是:“我们逐渐习惯了对于我们有害的大量行为。”

四 评价

功能主义理论正确地强调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遵从和越轨之间的联系。从广阔社会的角度来看,缺乏成功机会是区分从事犯罪行为与不从事犯罪行为的人的主要因素。但是,我们不当贸然认为,较贫困社群中的人渴望达到像较富足的人那样的成功。绝大多数人往往根据他们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认识,来调整自己的抱负。默顿、科恩、克洛尔德和奥林都假定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因此都可以遭到批评。而如果认为欲求与机会不相匹配的情形只发生在较为弱势的人群之中,那也是错误的。在其他群体中,也同样存在着趋向犯罪活动的压力,这一点可以从我们稍后将探讨的贪污、欺诈和逃税这些所谓的白领犯罪中表现出来。

19.2.2 互动理论

秉承互动论传统研究犯罪和越轨的社会学家们强调的是,越轨是一种通过社会建构出来的现象。他们拒绝接受有些行为类型内在具有“越轨的”性质这样一种观念。相反,互动论者问的是:有些行为最初是如何被定义为越轨的,为什么某些群体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而其他群体却没有。

一 标签理论

理解犯罪行为最重要的思路之一即所谓标签理论。标签理论家把越轨行为解释成越轨者和非越轨者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而不是个

① 这里及下文出现的“降低”,原文为“rise”,其实说的是我们对于“不正常”行为的承受“阈限”上升了,按照汉语的理解习惯,也就是“正常”的标准下降了。

② 圣瓦伦丁节大血案(St. Valentine's Day massacre):发生在 1929 年 2 月 14 日圣瓦伦丁节(情人节),美国芝加哥 6 名非武装的贩运私酒帮派成员(莫兰帮)及 1 名造访者,被化装成警察的艾尔·卡彭帮分子赶到一间汽车房中靠墙站成一排,集体杀害。此事反映了美国禁酒时代争夺非法的私酒贩运控制权的惨烈程度。

人或群体所具有的一套特征。在他们看来,我们若想理解越轨行为本身的性质,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

在贴标签过程 (labelling) 中出力最多的,就是代表法律和秩序这类力量的人,或者说是能够把有关传统道德的定义施加在其他人身上的。因而,创造了各类越轨行为范畴的那些标签,表达的正是社会的权力结构。总的来说,从越轨行为定义的角度来看,规则是由富人为穷人制定,男性为女性制定,年长者为年轻者制定,主要族群为少数族群制定。例如,许多小孩会逛进别人家的花园,会偷吃水果,会逃学。在富裕的住区,这些行为可能会被父母、老师和警察看成是孩子年少无知的娱乐。而在贫困地区,它们就可能被看成是青少年犯罪倾向的迹象。一旦一个孩子被贴上少年犯的标签,就被烙上了罪犯的污名,并可能被老师和未来的雇主看成是难以信赖的人。这两种情形中的行为是一样的,但却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霍华德·贝克尔是与标签理论联系最紧密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所关注的是要揭示,越轨者的身份是如何通过贴标签过程而不是通过越轨动机或越轨行为产生的。根据贝克尔的观点,“越轨行为就是被人们贴上如许标签的行为。”他猛烈抨击那些认定“正常”与“越轨”之间泾渭分明的犯罪学思路。对贝克尔而言,越轨行为并不是成为“越轨者”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与行为本身不相关的一些过程,对一个人是否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产生着重大影响。一个人的衣着服饰,言谈举止,或者出生国家,都可能成为决定其是否适用于越轨者标签的关键因素。

标签理论让人想到贝克尔关于大麻吸食者的研究 (Becker 1963)。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

期,吸食大麻是不少亚文化中的一种临界性 (marginal) 行为,而不像现在一样是整个生活方式的选择。贝克尔发现,一个人是否吸食大麻,取决于他对亚文化的接受程度,与长期吸食者的关系密切程度,以及他对非吸食者的态度。

贴标签过程不仅影响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看法,也影响该人的自我意识。埃德温·勒默特 (Lemert 1972) 提出了一种模式,来理解越轨如何能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共存,或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核心。勒默特认为,与我们可能的想法不同,越轨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人们通常能逃脱处罚。例如,像交通违章这类越轨行为很少被发现,而其他诸如从工作地点小偷小摸的行为也经常被“忽视”。勒默特把最初的逾越行为称为初级越轨。在大多数情况中,这些行为对个人的自我认同而言仍然是“临界性的”,只是一个越轨行为被加以规范化^①的过程。但在有些情况中,规范化并没有发生,这个人就被贴上了罪犯或犯过失者的标签。勒默特使用次级越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类人逐渐接受这一标签并把自己看成是越轨者的情形。在这类情况中,标签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并导致越轨行为的延续或强化。

以卢克 (Luke) 为例,他在一个周六晚上与朋友到城里去玩时,打碎了一家商店的橱窗。这一举动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嬉闹过头的意外后果,是小伙子常犯的可恕之失。卢克可能会遭到一通训斥,再交上一点儿罚款,就没事了。如果他有一个“体面”背景,结果可能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年轻人被认为平素品行良好,只是这一次过于粗暴,那么打碎窗户就还停留在初级越轨的层面上。但另一方面,如果警方与法庭处以缓刑,并要求卢克向社会工作者定期报告,这一事件就可能成为通向次级越轨的第一步。正是那些据说为了矫正越轨行为而建

①“规范化”原文为“normalized”,亦可译为“正常化”。这里说的是初级越轨者重归“正常”人行列。但我们不妨将“规范化”未能发生的情形理解为初级越轨者的越轨行为被“正常化”、“常态化”了,即初级越轨者被“常态化”地贴上越轨者的标签,这是一种反向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前者相反相成的——正常化/规范化过程,也就连通到了次级越轨。



这位衣饰怪异的人会不会比蹦极的那位更容易被界定为“越轨”？

立起来的组织，即监狱和社会机构，往往强化了这种“学做越轨者”^①的过程。（本节节末的图文框还将进一步讨论勒默特有关“圣人帮与烂仔帮”的研究）

二 评价

标签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始于这样一种假设：没有任何行为具有内在的犯罪性质。对于犯罪性质的界定是由权势群体确立的，是由警察、法庭和矫正机构通过立法与释法完成的。批评标签理论的人有时会提出，有些行为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都是一贯受到禁止的，比如杀人、强奸和抢劫等。这种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比如在英国，杀人（killing）并不总

是被看成是犯杀人罪（murder）。在战争时期，奋勇杀敌是受到积极鼓励的。直到最近，英国法律才把丈夫强迫妻子性交认定为强奸。这也表明贴标签过程是会随时间而变的。

我们可以基于其他理据，对标签理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批评。首先，标签理论者在强调贴标签这一主动过程的时候，却忽略了导致行为本身被界定为越轨行为的过程。这是因为，给某些特定的活动贴上越轨行为的标签并不完全是武断的；在社会化、态度与机会上的差别，影响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从事可能被贴上越轨标签的行为。例如，来自被剥夺背景的儿童，就比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可能从商店里偷东西。这并不是贴标签过程导致他们开始偷东西，而是他们所来自的社会背景使然。

^① 这里的“学做越轨者”（learning to be deviant），可参照本书第十七章和第十二章讨论过的“学做工”和“学不做工”。

越轨放大

莱斯利·威尔金斯关注的是“经营”某种越轨身份并将之整合进某人日常生活的衍生后果(Wilkins 1964)。他认为,这一过程的结果常常是越轨放大。意思是说,当一个控制机构给某项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它实际上激发了更多类似的越轨行为,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意外后果。如果被贴标签的人通过次级越轨行为,把该标签整合进其身份认同,则很可能促使控制机构做出更多的反应。换句话说,恰恰是不希望发生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而那些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也变得越来越抗拒改变。

斯坦利·科恩在其重要研究《民间恶人与道德恐慌》(Cohen 1980)中,刻画了越轨行为放大的广泛效应。科恩在这项经典研究中,考察了20

世纪60年代,警方是如何试图控制某些青少年亚文化,即所谓的摩登派与老客派,^①结果却使这些亚文化更加惹人瞩目,并使其在青少年中更为流行。给一个群体贴上出局者(outsiders)和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s)标签的过程,原本为的是控制他们,但结果适得其反,反倒给执法带来更大的麻烦。媒体对摩登派和老客派的报道连篇累牍,近乎煽情,导致了一场道德恐慌,社会学家用这个词语来描述由媒体引发的对于某一群体或行为类型的过度反应。道德恐慌经常围绕被视为社会普遍失序征象的公共话题出现,近些年来,围绕着青少年犯罪和“冒牌”寻求庇护者^②等话题,也出现了道德恐慌。

其次,贴标签过程是否确实具有滋长越轨行为的效果,这一点还不清楚。过失行为在被定罪之后,往往会不减反增,但这是贴标签过程本身导致的结果吗?其他因素,比如与其他犯过失者互动的增加,或是对新犯罪机会的习得,可能也与其有关。

19.2.3 冲突理论:“新犯罪学”

泰勒、沃尔顿和扬在1973年发表的《新犯罪学》一书,标志着对于早期各越轨理论的重大突破。该书作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分,认为越轨是被有意选择的,其本质常常是政治性的。所谓越轨受生物特征、人格特征、失范、社会解组或标签之类因素“决定”的种

种观念,他们一概予以舍弃,转而主张,个体之所以积极地选择从事越轨行为,是为了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不平等。所以,诸如黑人权力(Black Power)或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支持者等反文化群体成员,就会被认为是“越轨的”,因为他们正在从事的就是挑战社会秩序的明显的政治行为。新犯罪学理论家们从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权力维持的角度,构造他们分析犯罪和越轨的框架。

《新犯罪学》一书提出的广阔视角,被其他学者在具体的方向上进一步发展。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霍尔等人开展了一项重要研究,考察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引起重大关注的一种现象,即“袭

① 摩登派(Mods)指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现的青少年帮派,穿着整洁时髦,常骑小轮摩托。老客派[Rockers(并非乍眼看去让人想到的亚文化群体——摇滚乐手)]也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现的青少年帮派,身穿皮上装和牛仔裤,也成群结队骑摩托车呼啸过市。

② 参看本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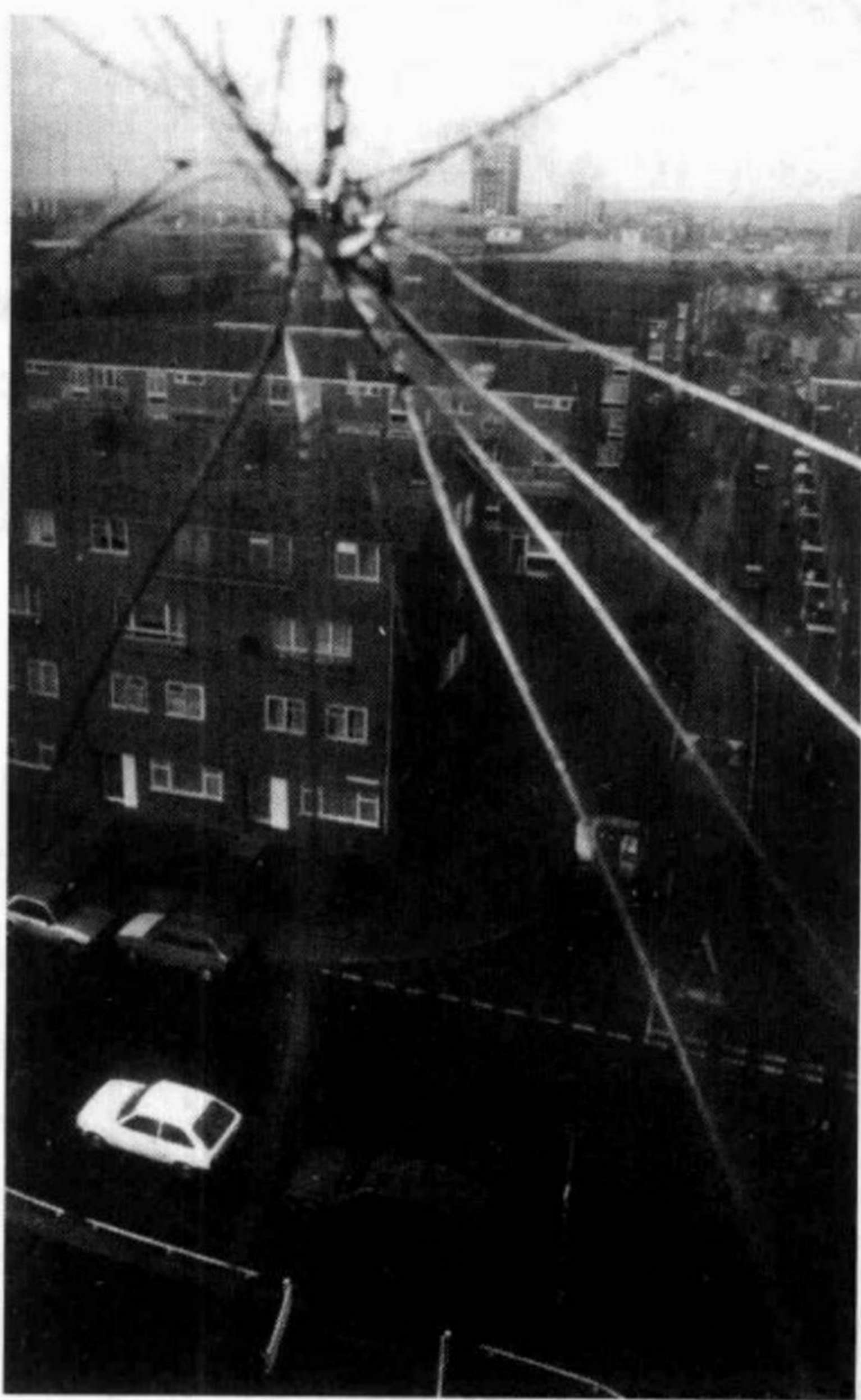
劫”^①犯罪。数起抢劫案件被广泛宣传,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公众对于街头犯罪盛行的普遍关注。劫匪绝大多数都被描绘为黑人,这更加使人们认定,移民应该为社会的崩溃负主要责任。霍尔和他的同事们在《治理危机》(1978)一书中提出,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关注不断攀升的失业率,日益下降的工资,以及社会中其他深层的结构性缺陷,无论政府还是媒体都在强化对于抢劫案件的道德恐慌。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其他犯罪学家也考察了社会中法律的形成与使用,认为法律是权势群体用来维持其特权地位的工具。他们拒绝认为法律是“中立的”并被公平施用于所有人的观点。相反,他们宣称,随着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越来越不平等,法律成为权势群体维持秩序更为重要的工具。从刑事司法系统的运作方式中就可以看到这一动力机制,该系统越来越压迫来自工人阶级的“违法者”;或者也可以看看特别有利于富人的税收立法。这种权力的不平衡并不仅限于法律的创制。学者们指出,权势群体也违反法律,但却很少被抓获。整体而言,这些犯罪比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日常犯罪和过失行为严重得多。但由于担心追查“白领”罪犯会遇到麻烦,执法力量转而专心对付那些权轻势微的社会成员,比如妓女、吸毒者和小偷(Pearce 1976; Chambliss 1978)。

这些研究以及与“新犯罪学”相关的其他一些研究,对于把关于犯罪和越轨的争论扩大到包括社会公正、权力和政治的问题非常重要。它们强调犯罪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只有置于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与利益竞争的背景才能理解。

左派现实主义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犯罪学的一股新流派。它被称为新左派或左派现实主义,吸收了上面讨论过的新犯罪学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又将自己和“左派理想主义者”区分开来,认为左派理想主义者对越轨的态度过于浪漫,忽视了许多人对于犯罪的切实恐惧。很长时间以来,许多犯罪学家面对官方公布的犯罪率不断攀升这一实情,往往极尽轻描淡写之



左派现实主义者承认,犯罪的建构方式可能是社会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产物,但强调它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有害后果,并且常常是落到最穷困的那些人和社区头上。

^① 原文为“mugging”,这里特指从后面以兜头、掐脖等方式袭击路人,将其击昏后实施抢劫,路人多不知行人面目,危险随时从背后袭来,故此远比正面或前方而来的拦路抢劫更令人心慌。

能事。他们试图表明,是媒体引起了公众对这一问题不必要的忧虑,或者主张,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都是一种经过改头换面的反抗不平等的形式。左派现实主义摆脱了上述立场,强调犯罪行为的增加是实实在在的,公众对之产生焦虑也是理所当然。左派现实主义者认为,犯罪学需要更多地研究犯罪控制和社会政策这些实际问题,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它们(Lea and Young 1984; Matthews and Young 1986)。

左派现实主义提请人们关注犯罪的受害者,认为受害者调查可以比官方统计数据更有效地刻划犯罪行为的程度(Evans 1992)。这类调查揭示出犯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贫困的内城地区。左派现实主义者指出,犯罪和受害集中在边缘化的街区,社会中受剥夺的群体遭受犯罪的风险要比其他群体大得多。这一思路吸收了默顿、克洛尔德、奥林等人的观点,旨在表明犯罪亚文化在内城地区得以发展。这种亚文化并非来自于贫困本身,而是源于更大共同体对他们的排斥。例如,被罪犯化的年轻人群体在“体面社会”的边缘活动,与这个社会势不两立。近年来黑人犯罪率增加这一事实就是由种族融合政策的失败造成的。

第十章讨论的相对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观念,为左翼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支撑。

左派现实主义在探讨这些犯罪趋势的时候,提出了改变治安程序的“现实主义”建议。它主张,执法部门需要更敏锐地关注各社群,而不能一味依赖会使公众撤回支持的“武力治理”技术。左派现实主义者提出了“极小治理”(minimal policing),即由当地选出的警察当局对市民负责,使市民在确定本地治安轻重缓急的问题上有更大发言权。此外,警方可以多花些时间调查犯罪、清理积案,少花些时间处理日常工作或行政事务,从而可以重新获得

当地社区的信任。总的来说,左派现实主义与此前的犯罪学研究思路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注重实效和政策取向的理论。

批评左派现实主义者承认,强调受害一方很重要。但是他们指出,左派现实主义把焦点放在受害者个体身上,却依然处在受政治和传媒驱动的讨论“犯罪问题”的狭隘格局之中。对于犯罪的狭隘定义关注的只是最为可见的那些犯罪形式,比如街头犯罪,却忽视了其他违法行为,比如政府或企业犯下的那些违法行为(Walton and Young 1998)。

19.2.4 控制理论

控制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是犯罪行为的冲动与遏止它的社会控制或物理控制之间不平衡的结果。它对个人犯罪的动机不甚感兴趣。相反,它假定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假如有机会,人人都会有越轨行为。它认为,许多犯罪类型都是“情境决策”(situational decisions)的结果,一个人看到有机会就会受到激发而产生行动。

最著名的控制理论家之一特拉维斯·赫尔斯奇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讲是自私的生物,通过权衡潜在的利益和可能的风险,精心计算,以做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决定。赫尔斯奇在《过失行为的致因》一书中(Hirschi 1969)声称,有四种纽带将人们同社会和守法行为维系在一起:依附(attachment)、责任(commitment)、投入(involvement)与信念(belief)。如果这些要素足够牢固,会让人无法随意违反规则,从而有助于维持社会控制和遵从。然而,如果与社会之间的这些纽带比较脆弱,过失行为和越轨就会发生。赫尔斯奇的思路认为,犯过失者往往是由于在家里或在学校社会化不充分而导致自控能力低的人(Gottfredson and Hirschi 1990)。

一 右派现实主义者

20世纪70年代晚期,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上台执政,里根在美国就职掌权,导致这两个国家的犯罪研究出现强有力的“法律与秩序”思路,并常被称为右派现实主义。这种犯罪研究思路至今仍深具影响,在小布什总统任下的美国尤其如此。犯罪和过失行为据认为不断攀升,被联系到道德退化,联系到由于依赖福利国家和放任教育^①而导致的个人责任衰微,家庭和社群的解体,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广泛消蚀(Wilson 1975)。公共论战和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以危及社会的暴力冲突猖獗、非法活动泛滥的危机状况为焦点。

在右派现实主义者笔下,越轨被描绘成某种个人病理现象,是由于个人自私、缺乏自我控制、道德观念淡漠,从一系列破坏性的非法行为中做出积极主动的选择并加以实施。他们拒绝接受本章上文所讨论过的犯罪研究中的各种理论“思路”,特别是那些将犯罪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在右派现实主义的影响下,英美两国的保守派政府开始强化执法活动。警力得到壮大,刑事司法系统的资金得到充实,并越来越诉诸长期监禁作为对抗犯罪最有效的手段。

对于“情境”犯罪的预防,比如目标加固^②和监控体系,已经成为“管控”犯罪风险的常见思路(Vold et al. 2002)。这类措施常常受到政策制定者的追捧,因为它们比较容易引入,与现有政策措施相配合,并且让市民们深切感到,对抗犯罪的决定性行动已经展开,从而消除了疑虑。然而,批评者们指出,由于此类措施

并未触及犯罪的深层致因,比如社会不平等、失业和贫困,所以它们的成功充其量不过是保护某些人群对抗犯罪,而将过失行为赶到其他领域里去。

有一个例子就展现了这种动力机制:人口中的某些范畴在物理意义上被排斥出一些公用空间,以期减少犯罪,减少预想中的犯罪风险。为了应对总体人口中弥漫的不安全感,社会中的一些公共空间,比如图书馆、公园甚至某些街角,正越来越转变为“安全罩”。^③风险管控的措施,比如警方监控、私营保安团队和监控体系,旨在保护公众抗御潜在风险。比如说,为了招揽顾客并发展常客,企业必须确保其客户的安全舒适。年轻人往往会更多地被排斥出这类空间,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对安全的威胁更大,在统计学意义上比成年人更有可能违法犯罪。为了打造顾客们的“放心场所”(locations of trust),年轻人发现向他们开放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了。

警力队伍也已壮大,以应对愈益增多的犯罪。如果犯罪率节节攀升,公众几乎必然会强烈要求有更多的警力“上街”^④。政府如果急于显得有决心打击犯罪,往往愿意增加警方的人手和资源以遏制犯罪。大众普遍认为,警方治安是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基石。然而,警方对于犯罪的实际控制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增加警力是否必然能够降低犯罪率,尚有待观察。在英国,官方对于犯罪率和警力规模的统计数据就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构成了质疑。如果警治增强并不能防止违法犯罪,那么公众又为什么要求公开宣示警力?警力展示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① 原文为“permissive education”,以中立立场而言,是指强调自主选择、立场多元、破除权威的“宽容”教育;以右派立场来看,这是一味强调“政治正确”、“文化多元”所导致的“纵容”教育;而“permissive society”也从“性开放社会”变成了“性放纵社会”。

② 由于此小节是新版加入的,前后照应脱节,关于目标加固的介绍请参见下文。

③ 原文为“security bubble”,“bubble”多指透明罩,也指虚妄的泡影,隔绝了其他种族、阶级、宗教背景的“透明同质空间”,给人们带来安定的虚幻图景。

④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所谓“提高见警率”。

二 控制犯罪

有些控制理论家认为,犯罪之所以增长,是因为现代社会中犯罪机会和犯罪目标日益增多。随着人们变得更富裕,消费主义更加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小偷最喜欢下手的电视、录像设备、电脑、汽车和高档时装等商品。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家就业,更多的住家在白天空无一人。对犯罪感兴趣的“伺机而动的违法者”(motivated offenders)有着广泛的“合适目标”可供选择。

针对这些变化,近些年来,有关遏止犯罪的许多官方思路把焦点放在限制犯罪发生的机会。这类政策的核心就是目标加固的观念,即直接干预潜在的“犯罪情境”,以此达到使犯罪更不容易发生的目的。例如,法律要求所有新车都配备方向盘锁,以减少窃车贼的机会。在有些地区,公用电话上安装了更加坚固的投币盒,以阻止投机的破坏者。在城市中心和公共场所安装的闭路电视(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s, CCTV)系统是阻止犯罪行为发生的另一种努力。控制理论家们提出,最好的政策并不是改造罪犯,而是采取实际的措施来控制犯罪者实施犯罪的能力。

近年来,目标加固措施再加上严打治安已经赢得了政界人士的支持,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也成功地限制了犯罪。严打治安针对的是轻微犯罪和各种破坏行为,比如破坏他人或公共财物(vandalism)、游荡(loitering)、搭讪乞讨(accosting people for money)以及在公共场所醉酒。据认为,警方对于轻微越轨施以重拳打击,对于减少更为严重的犯罪形式产生了积极效应(我们在下文有关“破窗理论”的讨论中就会看到这种思路)。但这种思路也有值得批

评的地方。目标加固和严打治安都没有触及犯罪的深层致因,而是意在保护和防止社会中的某些特定部分不受犯罪的侵犯。私人安全服务、汽车报警器、住宅报警器、看门狗以及封闭式社区越来越普遍,使得一些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装甲社会”(armoured society)中,某些人群不得不防备其他人。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这一趋势。不仅如此,在特权阶层中已经出现“堡垒心态”(fortress mentality)的前苏联、南非及等国家和地区,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这类政策还产生了另一意外后果:当容易受袭击的犯罪目标得到“加固”时,犯罪模式可以简单地转移领域。例如,英国强制要求所有的新车都安装方向盘锁,但对旧车不作要求,结果是窃车贼由主要偷新款车转为偷旧款车。目标加固和严打的思路有把犯罪行为由保护较好的地区引向防范较差的地区的风险。当富裕区域加强了防护,那些贫穷或缺乏社会凝聚力的街区就很可能会出现犯罪活动和不法行为的增多。

三 “破窗”理论

目标加固与严打治安乃是基于一种所谓“破窗”的理论(Wilson and Kelling 1982)。这种理论的基础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他把汽车的牌照取下,车罩打开,丢弃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一个是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富人区,^①另一个是纽约布朗克斯^②的一个街区。在两个街区,一旦行人路过,无论其阶级或种族如何,觉得这车是被废弃了的,“没人在意”,就会肆意破坏它(Zimbardo 1969)。依据这项研究进一步推

① 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位于美国西海岸,为斯坦福大学所在地,电子和电脑工业集中地。

② 布朗克斯(Bronx)位于美国东海岸,纽约五区之一,黑人、波多黎各人等聚居,族群冲突频繁,贫民区随处可见。



根据“破窗”命题,社会失序的有形迹象可能会诱发更为严重的犯罪。

论,“破窗”理论的作者们提出,一个街区中只要出现任何社会失序的迹象,甚至只要出现一扇破窗,就会鼓励更为严重的犯罪大量滋生。一扇无人修葺的窗户就是一种无人关注的迹象,这样的话,打碎更多的窗户,即犯下更为严重的罪行,也就成了罪犯对于这种社会失序情境的理性反应。结果,轻微的越轨行为就会导致犯罪和社会败坏的螺旋递进(Felson 1994)。

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破窗”理论就奠定了新治安战略,对在公共场所酗酒或吸毒、交通违章之类的“轻微”犯罪施以严厉打击。纽约市长鲁道尔夫·朱利亚尼在其1994年至2001年的市长任内,率先在纽约实施严打治安,成功地减少了犯罪。此后,严打治安已经被广泛引入美国各大城市。纽约警察局起初是主动出击,恢复城市地铁的秩序,随后更把严打思路进一步运用到大街上,强化对于乞丐、无家可归者、街头小商贩和成人书店及俱乐部老板的限制。不仅是一般犯罪(如抢劫和盗窃)的发生率大幅下降,甚至连

谋杀案的发案率也下降到了几乎一个世纪里的最低水平。

“破窗”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警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定义“社会失序”。由于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失序界定,警方有权把几乎任何东西都视为无序的迹象,把任何人都视为一种威胁。事实上,当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时,对于警察滥权和骚扰的投诉率却上升了,这些投诉主要来自于符合潜在罪犯“形象”的城市黑人小伙子。

19.2.5 理论总结

根据以上关于各种犯罪理论的考察,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我们必须回想一下前面所讨论过的一个观点:尽管犯罪只是越轨行为整体中的一个子范畴,但它包含的活动形式也是五花八门,小如在商店里偷一块巧克力,大如大规模杀戮,所以我们不太可能提出一种能够阐释所有犯罪行为形式的理论。

融贯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圣人帮与烂仔帮”

威廉·钱布利斯在一项著名的研究“圣人帮与烂仔帮”中(Chambliss 1973),关注了越轨行为发生过程与更大的阶级结构之间的关联。钱布利斯研究了一所美国学校中的两个过失群体,一个来自中上阶级家庭[“圣人帮”(Saints)],另一个来自穷苦家庭[“烂仔帮”(Roughnecks)]。圣人帮总是卷入一些轻微犯罪,比如酗酒、蓄意破坏他人或公共财物、逃学、偷窃,但团伙成员没有一个被抓进局子的。而烂仔帮参与的也是类似的一些犯罪活动,但总是被条子找麻烦。钱布利斯的结论是:这两帮人的越轨程度不相上下。然后,他开始寻找其他的因素,可以说明警方和更大的社区对这两帮人的反应为何不同。

比如说,钱布利斯发现,出身上等阶级的团伙自个儿有车,所以有能力远离社区成员的眼光所及。而出身低等阶级的小伙儿们必然得聚集在周边地区,社区里人人都经常能瞧见他们。钱布利斯由此认为,这种差异反映出社会的阶级结构,赋予比较富裕的群体某些优势,不太容易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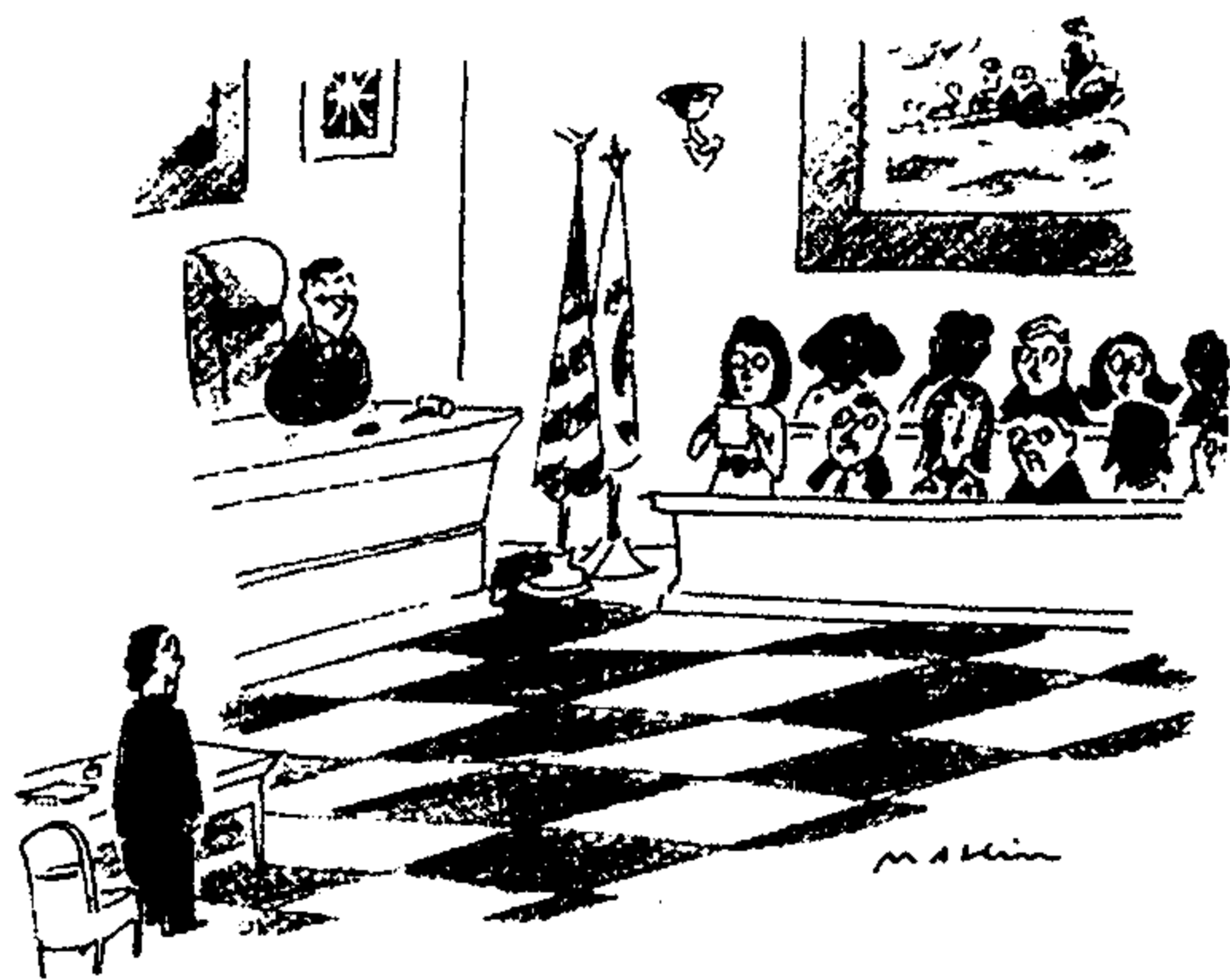
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例如,圣人帮的父母们认为自己公子们的犯罪只是些没有大碍的玩闹,而烂仔帮的爹妈们就只好默然接受警方将自己儿子的行为贴上犯罪的标签。整个社区似乎也赞同这些不一视同仁的标签。

这些小伙子还将始终背着这种标签谱写他们的人生,圣人帮将过上中产阶级的传统生活,而烂仔帮则继续和法律过不去。我们在本章前文已经看到(本节第二小节),这种后果与勒默特所称的“次级越轨”维系在一起,因为据说它是由于一个人一旦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就失去了继续做一个“正常”人的能力。

钱布利斯的研究被社会学家广泛引证,用来揭示社会阶级之类的宏观社会学因素与人们如何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等微观社会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通过实例展现出,在越轨的社会建构过程中,微观层面的因素与宏观层面的因素是多么难以相互隔离。

有关犯罪的社会学理论做出了两方面的贡献。首先,这些理论正确地强调了犯罪行为与“体面”行为之间的连续性。某些类型的活动是否会被法律认定为犯罪并应该进行惩罚,其具体的背景差异很大。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与社会中的权力和不平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其次,大家都同意,具体背景在犯罪活动中很重要。一个人是真正从事了犯罪活动,还是碰巧被当作了犯罪者,从根本上来说受到社会习得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尽管标签理论有其缺陷,但它可能是理解犯罪与越轨行为时最常用的一种思路。这一理论不仅促使我们注意到特定个体与法律发生冲突时的情况,而且有助于我们敏锐地关注一



“我们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受谴责,但只有被告是有罪的。”

些活动是如何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应该受惩罚的,形塑该定义的权力关系又是怎样的。

对犯罪的理解方式直接影响着与其斗争的政策。例如,如果犯罪被视为被剥夺或社会解组的产物,那么制定出的政策就会以降低贫困、加强社会服务为目标。而如果犯罪行为被视为出于意愿的或由个人自由选择的,那么对抗犯罪的努力就会采取不同的形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英国最近的犯罪趋势,以及应对犯罪的一些政策。

第三节 英国的犯罪模式

根据警方接报的罪案统计资料估测,英国的犯罪率在整个 20 世纪呈现出巨大的增长。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接报的违法行为不到 10 万起。到了 1950 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50 万起,而到 1992 年则飙升到 560 万起。在 1977 年至 1982 年之间,报案数翻了一番多。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的发案总数似乎已趋稳定。英国犯罪调查(在本节第一小节讨论)等测量指标表明,发案总数呈现显著下降(参看图 19.1),根据晚近的数据,成为犯罪受害者的风险是 20 多年来最低的(Clegg et al. 2005)。犯罪数据的攀升势头终究告结束,使许多专家大跌眼镜。至于这背后的原因,以及这种趋势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则尚待观察。

尽管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出晚近呈现下降,但民众仍然普遍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越来越多发,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Nicholas et al. 2005)。最近,有报道说,对于主要犯罪类型的担忧正在下降,但对于反社会行为的焦虑仍保持在相当水平(Clegg et al. 2005)。如果说犯罪曾经一度被视为某种临界的或例外的情况,那么在最近几十年,它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中越来越凸显的事物。调查表明,人们现在远比以往更害怕犯罪,对于夜间外出、家居被盗和遭受暴力侵害更感焦虑。

有多少犯罪行为真正存在?人们有多么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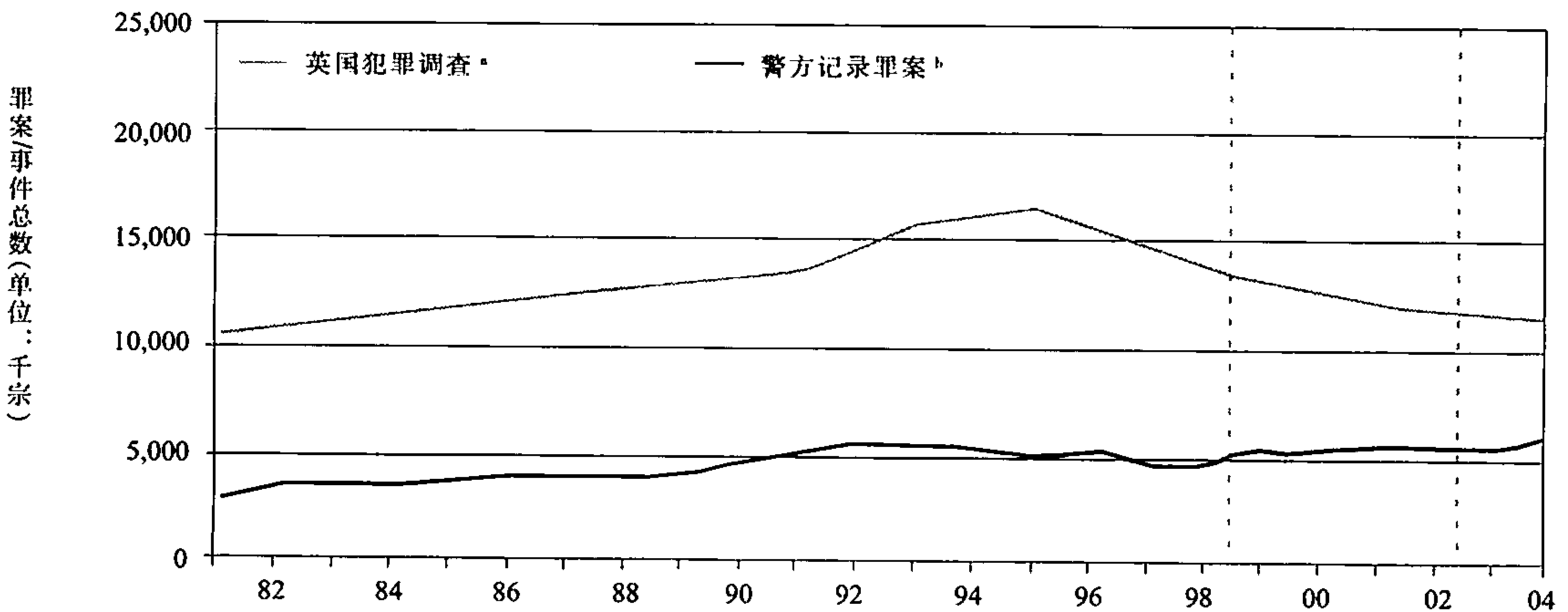


图 19.1 1981 年至 2004 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罪案记录数

a: 英国犯罪调查记录的是访谈公众时提到的事件数

b: 报案数是警方记录的接报罪案总数

深色虚线: 内政部在 1998 年/99 统计年度变更了统计口径。

浅色虚线: 2002 年设立了新的犯罪登记标准。

资料来源: BBC (2005)

易受到犯罪的伤害? 怎样做才能遏制犯罪?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随着公众对犯罪越来越愤慨, 媒体对犯罪的报道越来越多, 以及历任政府都做出“严打犯罪”的承诺,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也变得极为激烈。但事实已经证明, 要搞清楚犯罪的性质和分布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更不要说制订解决它的政策了。

犯罪与犯罪统计

要想确定犯罪的程度和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形式, 思路之一是考察有关警方接报罪案数

的官方统计资料。由于这类统计资料是定期公布的, 因此要评估犯罪率似乎没有什么困难。但这个假设是相当错误的。在官方公布的所有关于社会问题的数据中, 关于犯罪和过失行为的统计资料可能是最靠不住的。许多犯罪学家强调, 我们对官方的统计数字不能信以为真。

首先, 基于报警案件的统计数据最根本的局限在于, 大部分犯罪行为从未向警方报告过。人们之所以决定不报案, 原因有很多 (如表 19.1 所示)。即使是受害者身体受伤的案件, 也有超过一半并未报警。受害者会声称那是私人事务, 或者自己能够处理。不将犯罪报

表 19.1 不向警方报案的原因, 2003 至 2004 统计年度 (%)^a

	蓄意破坏他人或公共财物	入室行窃	偷窃车内财物或未遂 ^b	其他入室盗窃	其他人身盗窃	BCS所列暴力行为	相似行为范畴 ^c	BCS所列所有行为
轻微/无损失/警方会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 ^d	82	72	85	78	71	47	71	72
私人事务/自己处理	16	20	12	19	16	46	24	22
不方便报警	5	4	8	6	9	5	6	6
向其他权威机关报告	2	4	1	2	17	8	4	5
与警方有关的原因 ^e	3	3	3	2	1	3	3	2
担心遭报复	2	4	1	1	0	6	3	2
其他	1	2	1	1	1	2	2	2
未加权基数	1377	284	926	818	377	545	3544	4739

a: 可以提供多个原因。

b: 窃车案未显示, 因为极少有案例不报警。

c: 相似行为范畴包括蓄意破坏他人或公共财物、入室行窃、窃车、偷自行车、伤害、单纯暴行 (common assault)、抢劫 (robbery)、偷抢与偷窃 (snatch and stealth theft)。

d: 考虑到它们定义相似, 将轻微/无损失/警方会无动于衷或无能为力等情况归并统计。

e: 与警方有关的原因包括: 对警方感到讨厌或担心, 从前与警方或法院打交道有过不好的经验。

资料来源: Nicholas et al. 2005

警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有些形式的违法暴力相比其他更为“隐蔽”。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是在家里、看护机构或监狱里关起门来进行的。受害者可能会担心警方不相信自己的话,或者报案后虐待会变本加厉。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向警方报案时,往往犹豫再三。有些人自己假定罪行太轻微,警方根本不会立案,或者认为警方也无能为力。不过,大部分的窃车案被报警,因为车主需要这么做,以便诉求保险条款。

其次,即使在确实报告警方的犯罪行为之中,也有许多并未纳入统计资料。据估计,大约有 43% 的犯罪行为被报警,但只有 29% 记录在案;话说回来,这个数字根据罪行的类型不同而有相当差异(BCS, 2002/3)。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原因也有不少。警方可能怀疑一些有关信息是否可靠,认为属于一面之辞,或者受害者可能不想提出正式的控告。

只有部分犯罪行为被报警,而这其中又只

有一部分被记录在案,这样做所造成的总体效果,就是官方犯罪统计资料只能反映一小部分的违法犯罪。未在官方统计资料中捕捉到的违法行为被称为未记录罪案的隐性数据。

关于英国的犯罪,更为精确的描绘或许始于每年一度的英国犯罪调查(British Crime Survey, BCS)。它通过询问被访者是否在上一年曾经经历过犯罪,来估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程度。这样一来,英国犯罪调查就包括了那些没向警方报告或者没被警方记录在案的犯罪行为,因此可以视为对于警方记录的重要替代。调查乃是基于对生活在自家居所里的人进行访谈,问他们在过去十二个月里面经历过什么样的犯罪。每一年,该调查都会对英国各地大约 4 万名成年人进行有代表性的调查(参见图 19.2)。尽管不同类型的违法行为涨跌互见,幅度不一,甚至有一些数据显示,暴力犯罪在晚近呈上升之势,但无论是英国犯罪调查,还是记录在案的犯罪数量,自 20 世纪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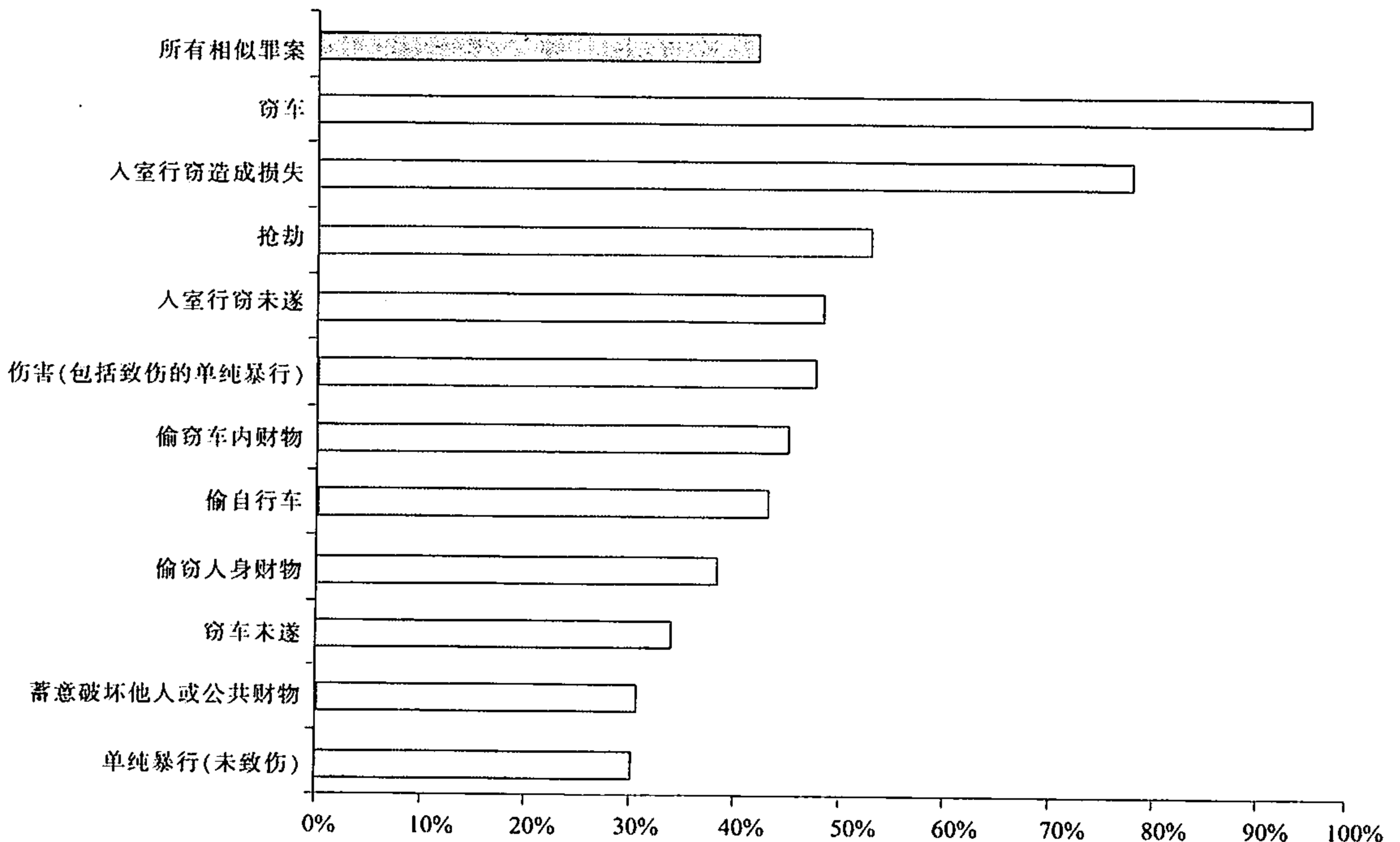


图 19.2 实际报案数占实际发案数的比例估计

资料来源: Nicholas et al. (2005)

年代中期以来皆呈下降趋势。

像英国犯罪调查这样的调查类型被称为受害研究。虽然这些调查是很有价值的测量指标,但对来自受害研究的数据必须谨慎对待。在某些情况下,研究方法本身可能会导致显著漏报。英国犯罪调查通过在被访者家中进行访谈来获得资料。这可能意味着,比如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如果碰到施暴者在场,或者就在虐待发生的地点,可能就不会举报暴力事件。不仅如此,调查未曾包括 16 岁以下的人,无家可归者,或是居住在某种机构中的人,比如看护机构。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其他研究已经表示,这些群体特别容易成为犯罪的受害者,我们下面就会发现这一点。

有关犯罪的另一种重要信息源就是自诉研究 (self-reporting studies), 请求人们如果自己干过什么违法的勾当,可以以匿名方式予以承认。当然,这些研究也会遇到大量漏报的问题,参与者可能由于担心后果而不愿意报告违法行为。多报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或许因为记忆有误,或是由于自我炫耀的欲望。

第四节 犯罪的受害者与施行者

是否有些个人或群体更可能犯罪,或者更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呢? 犯罪学家说,“的确如此”。相关研究和犯罪统计数据都显示,犯罪与受害在人口中并不是随机分布的。例如,男性比女性更可能犯罪;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卷入犯罪。

某人成为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与其生活的地区密切相关。物质越匮乏的地区,犯罪率通常就越高。生活在内城街区的人相比于生活在更为富裕的城郊地区的居民,成为犯罪受害者的风险要大得多。少数族群集中聚居在内城地区,似乎是他们受害率较高的主要因素。

19.4.1 性别与犯罪

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犯罪学的研究在传统上也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女性主义者中肯地批评犯罪学,说它是一门以男性为主导的学科,无论是在理论考虑上,还是在经验研究中,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见的”。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女性主义立场的重要著作提请人们注意,女性是如何在不同于男性的背景下违法犯罪的,女性对于刑事司法系统的体验又如何受到某些关于男性和女性适当角色的社会性别化假定影响。女性主义者在凸现家庭内部及公共场合针对女性的暴力何其普遍方面,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一 男性和女性的犯罪率

关于性别与犯罪的统计资料令人震惊。根据最近的数据,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已知违法分子当中,女性仅占大约 19% (Home Office 2003)。不仅是在英国,而且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监狱中的男女犯比例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尽管近些年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在押女犯数量已有增长,在 1992 年至 2002 年期间上升了 173%,但在全部囚犯当中,女性依然只占很小比例: 大约为全部犯人的 6% (Home Office 2003)。而男女两性所从事的犯罪类型也是截然不同。如图 19.3 所示,女性犯罪很少涉及暴力,更多的是小偷小摸,通常是在商场里顺手牵羊。

当然,事实上犯罪率方面的性别差异可能小于官方统计资料所显示的情形。奥托·波拉克 (Pollak 1950) 就声称,女性所为的某些犯罪类型往往不被记录在案。在他看来,女性以家庭为主的角色给她们提供了在家里和在私人领域犯罪的机会。波拉克认为女性天生善于掩饰,十分擅于掩盖罪行。据他说,这一点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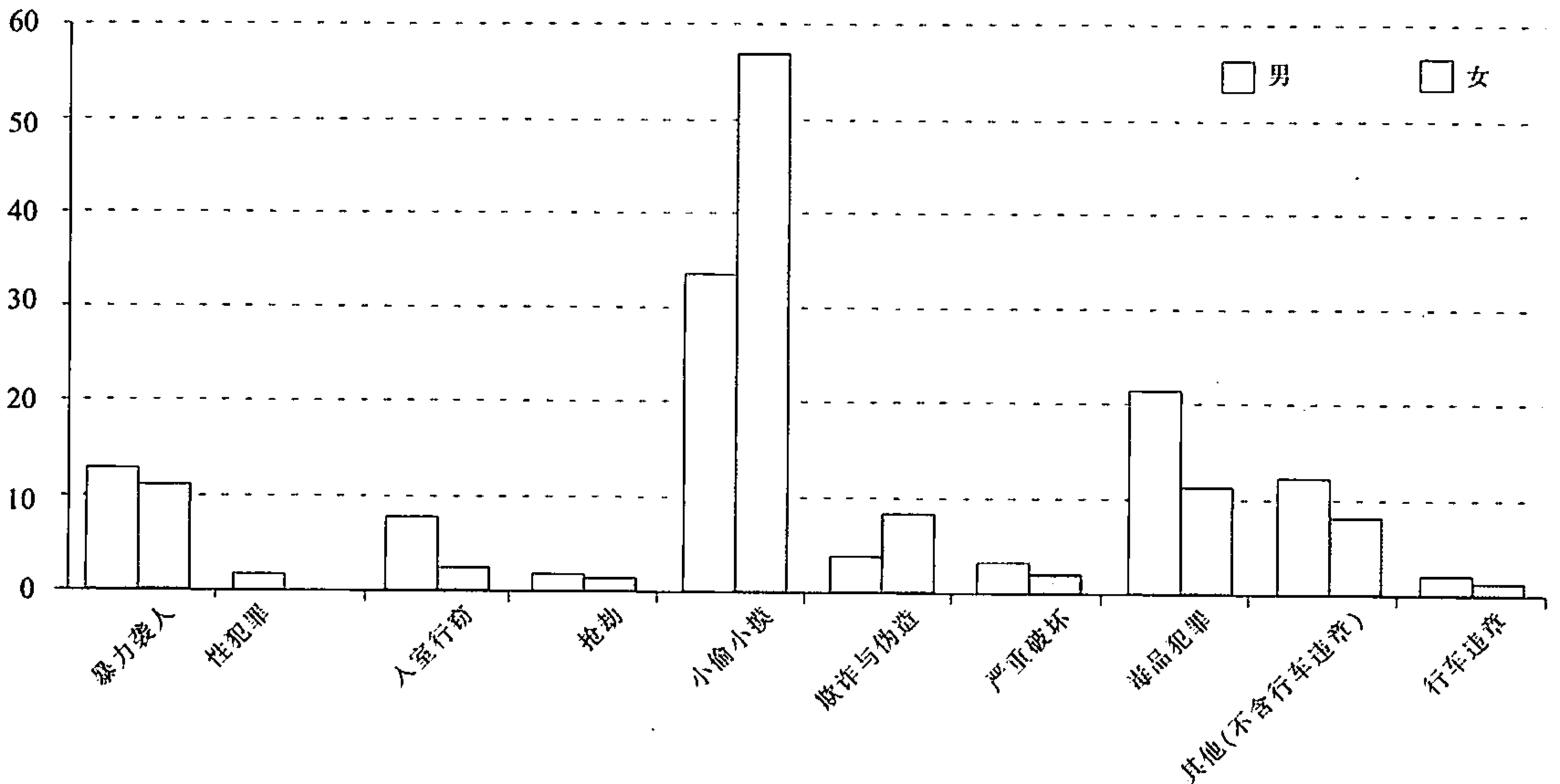


图 19.3 在各级各类法庭上被判有罪或被警告有可起诉罪行的案犯, 2002 年 (%)
资料来源: Home Office (2004)

物学上的根据, 因为女性已经学会了对男人隐瞒例假的痛苦和不适, 也能以某种男人无能为力的方式伪装对于性交的兴趣。波拉克还认为, 由于男性警官往往会采取一种“骑士风度”般的态度来对待女性违法者, 所以她们所受到的处置更为宽容 (Pollak 1950)。

波拉克把女性描绘成受人纵容、擅长欺骗, 这固然是基于毫无根据的刻板印象, 然而, 他说女性受到刑事司法系统更为宽容的处置, 这种提法却引起了许多争论和考察。骑士风度命题 (chivalry thesis) 的应用方式有两种。首先, 警察和其他部门的官员可能认为, 女性违法者不像男人那样危险, 因而有一些活动, 如果男性做了就会被逮捕, 而女性做了却会被放过。其次, 在对违法犯罪的量刑宣判上, 女性被判入狱的可能性远低于男性。为了检验骑士命题, 已经开展了不少经验研究, 但仍然未有定论。主要的困难之一在于如何评估性别与年龄、阶级、种族等其他因素相比而言的影响有多大。例如, 老年女性违法者似乎往往比老年男性违法者所受到的处置更为宽容。其他研究也已显示, 黑人女性在警察手里受到的处置要

比白人女性糟糕。

另有一种视角被女性主义者用来考察社会对“女性特质”的理解如何影响女性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经历。弗兰塞斯·海登松认为 (Heidensohn 1985), 女性如果被认为偏离了女性性规范, 就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置。例如, 被认为性乱交的年轻女子会比男青年更可能受到拘押。在这类案例中, 女性被视为“双重越轨者”, 不仅违反了法律, 也是对“适当的”女性行为的藐视。这种案例对她们的审判较少依据违法行为本身的性质, 而更多地依据她们对“越轨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海登松和其他人都指出, 刑事司法系统存在着双重标准: 男性的攻击和暴力被视为自然现象, 而在对女性违法行为给出说明时, 却是从“心理的”不平衡方面去寻找的。

为了使女性犯罪更加“可见”, 女性主义者开展了许多关于女性犯罪的详细调查, 从少女团伙、女性恐怖主义者直到监狱中的女犯。这些研究显示, 暴力并非只是男性犯罪的特征。女性参与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的确远比男性要小, 但也的确会做出类似的暴力行为。

那么,为什么女性的犯罪率要比男性低得多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违法的女性常常能够免于上法庭,因为她们能够说服警方或其他权威机关,对她们的行为另眼相待。她们求助于被称之为“性别契约”(gender contract)的东西,这是男女之间隐含的契约,根据这个契约,作为女性,一方面反复无常,易于冲动,而另一方面又是需要保护的(Worrall 1990)。根据这一观点,据说警方和法庭都以骑士风度行事,有些在男性那里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在女性身上他们就不打算予以惩罚了。另有研究也表明,某些女性,比如不符合女性特质规范的女性,就可能会遭到更为严厉的处置。比如说,被视为“不配为人母”的女性,就可能受到法庭更为严厉的量刑(Carlen 1983)。

然而,男女所受到的不同处置几乎不能阐释两性犯罪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问题的原因与说明其他领域性别差异的原因是一样的。当然,也存在某些特有的“女性犯罪”,最显著的就是卖淫。这是因为,女性会由于卖淫而被判有罪,而她们的男性顾客却不会。“男性犯罪”之所以一直是“男性的”,是因为社会化的差异,因为同大多数女性相比,男性的活动和参与仍然更多是非家庭方面的。正如我们用波拉克的思路来讨论问题时所看到的一样,关于犯罪行为上的性别差异,人们过去往往是根据假定内在的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的,例如男女体力上有大小、被动性有强弱或女性更专注于生育等。现在,与“男性”特质一样,“女性”特质也被认为主要是在社会中生成的。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许多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注重的品质(如关照他人和发展个人关系)与男性所注重的品质不同。同样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意识形

态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关于“乖女孩”的观念的影响,女性的行为常常会受到某些不会施加在男性活动上的束缚与控制。

早在19世纪末,犯罪学家就已经预言,性别平等将会降低或消除男女之间的犯罪差异。但到目前为止,犯罪仍然是个社会性别化的现象。女性和男性犯罪率之间的差异是否有一天会消失,我们仍然不能确定。

二 犯罪与“男性特质危机”

大城市内较贫困地区的高犯罪率尤其与男性青少年的活动有联系。为什么在这些地区会有这么多小伙子走向犯罪呢?有些答案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男孩子常常从小就参加团伙,在这种亚文化当中,某些形式的犯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一旦团伙成员被当局贴上犯罪者的标签,他们便开始经常从事犯罪活动。尽管今天也存在着少女团伙,但这类亚文化基本上还是男性特质的,融入了冒险、刺激和哥儿们义气^①等男性价值观。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讨论了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男性特质危机”的观点。如果说曾几何时,男青年们充满信心地期望着找到终身职业,扮演挣钱养家的稳定角色,那么现在对于许多男人而言,这种角色已经极为渺茫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已经使失业和工作无保障成为看得见的威胁,而女性在经济上、职业上以及其他方面却正变得越来越独立。康奈尔关于“霸权式男性特质”的观点(见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小节)已经被许多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所运用,以说明暴力和攻击如何能够被视为男性身份的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方面。

^① 原文为“comradeship”,即同志关系、伙伴情谊等。这里为了突出亚文化精神,故有此译(“姐们儿义气”其实就是“哥儿们义气”,而“同志情谊”现在已经有了另一种特定含义)。

三 针对女性的犯罪

在某些类型的犯罪中,男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攻击者,而女性是受害者。家庭暴力、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都是男性利用其优越的社会力量或身体力量而对女性实施的犯罪。尽管女性对男性也实施过以上任何一种行为,但它们仍然几乎完全是针对女性而实施的。据估计,有25%的女性在其一生中的某一刻会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但所有妇女都直接或间接地面临着这些犯罪的威胁。

许多年来,刑事司法系统忽视了这些犯罪。受害者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获得对于违法者的追诉权。即使在今天,起诉对妇女实施的犯罪也远不是那么简单。然而,女性主义犯罪学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提请人们关注针对女性的犯罪,并将这类犯罪并入关于犯罪的主流争论之中。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强奸犯罪,把关于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讨论放在其他章节(参见第七章和第十八章)。

对于强奸发生的程度很难进行精确的估计。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强奸案件会受到警方的注意并被记录在统计资料中。1999年,警方将7809起违法行为作为强奸记录在案。但根据英国犯罪调查的估计,实际的数字其实远高于此。但是,出于上文讨论过的一些原因,英国犯罪调查也有可能并未精确估测强奸案发数。

我们已经指出过,直到1991年,婚内强奸的罪名才在英国得到承认。马修·黑尔爵士的裁决称丈夫“不可能对自己合法的妻子犯下强奸罪,因为根据他们相互的婚姻承诺与契约,妻子在这类行为方面已把自己委身于丈夫,这是她所不能反悔的”(转引自Hall et al. 1984: 页20)。这种说法一直保留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中,直到十多年前,上院才裁定,

丈夫有权强奸自己妻子的观念在现代是不可接受的。

女性之所以不愿向警方报告性暴力事件,原因可能有许多。大部分遭到强奸的女性,要么希望把此事彻底忘记,要么不愿意参与医疗检查、警方问讯和法庭盘诘这样一个令人羞辱的过程。这种法律过程常常要花费很长时间,并且会令人生畏。审判程序是公开进行的,受害者还必须与被告进行面对面的对质。强奸时阳物插入的证据,强奸者的身份,以及这种行为是在没有得到女方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都必须一件件摆出来。女性可能会觉得她也是受审的人,尤其是在她自己的性生活史受到公开审查的时候,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在过去的几年里,妇女团体强烈要求法律和公众改变对强奸的看法。她们强调,强奸不应被看成是一种性犯罪,而应该被看成是暴力犯罪的一种类型。它不仅仅是一种身体攻击,而且还是对一个人的人格完整与尊严的侵犯。显然,强奸与男性特质和权力、支配及强壮的联系有关。强奸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性欲不可遏制,而是性与权力感和优越感相联系的结果。与对女性的贬损相比,性行为本身的意义并不显著。这一宣传攻势在改变立法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效果。现在,强奸在法律上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暴力犯罪。

从某种意义说,所有女性都是强奸的受害者。即使是从未受到过强奸的女性,也经常体验到与受到过强奸的女性相类似的焦虑感。她们可能害怕晚上独自外出,即使是到人群拥挤的大街上去,独自在家或在公寓里时她们也可能同样感到害怕。苏珊·布朗米勒强调,强奸与男性正统的性特质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她认为,强奸是使所有女性处于恐惧之中的男性威胁体系的一部分。那些未遭强奸的人受到由此而引发的焦虑感的影响,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

面,都需要比男性更加的小心谨慎(Brown-miller 1975)。

四 针对同性恋者的犯罪

女性主义者已经指出,对于暴力的理解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别化性质,并且受到对风险和责任的“常识”感知的影响。因为女性一般被认为不大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暴力攻击,所以常识认为,她们应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减少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危险。例如,妇女不仅不应该晚上独自在不安全地区行走,而且应该小心避免穿着惹火,或行为举止有失检点,引人浮想。达不到上述要求的妇女就会被指责为“咎由自取”。在法庭上,当考虑施行者的暴力行为时,这些妇女的行为会被当作减刑因素(Dobash and Dobash 1992; Richardson and May 1999)。

有人已经指出,类似的“常识”逻辑也存在于针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暴力行为中。受害研究揭示道,同性恋者经历暴力犯罪和骚扰的发生率很高。一项对4000名男女同性恋者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在过去的5年中,33%的男同性恋者和25%的女同性恋者曾经至少一次成为暴力攻击的受害者。占总数三分之一的人经历过某种形式的骚扰,包括威胁或蓄意破坏财物行为。多达73%的人曾经在公开场所受到辱骂(Mason and Palmer 1996; Richardson and May 1999)。

黛安娜·理查德森和黑兹尔·梅认为,由于同性恋者在许多社会中仍然被污名化和边缘化,所以更容易被当成“活该”遭受犯罪侵害的人,而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同性恋关系仍被视为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异性恋则是在公共空间中占绝对优势的规范。根据理查德森和梅的观点,有些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者在公众

场合显示其同性恋者身份,从而与这种公私分隔的约定相偏离,经常会被指责为自己招惹犯罪。人们仿佛觉得,如果把同性恋引入公共领域,就代表着一种挑衅。针对同性恋者的犯罪导致了许多社会团体呼吁要采纳“憎恨罪”(hate crime)的立法,以保护社会中仍然遭受污名化的群体的人权。这些呼吁在2003年颁布的《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中得到了落实,它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官们对那些受同性恋恐惧症驱动的攻击从重量刑。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类似的法律也已经进入立项审议。

19.4.2 青少年与犯罪

公众对犯罪的担忧集中在偷窃、入室行窃、攻击和强奸等违法行为,也就是基本上被视为工人阶级小伙子的地盘“街头犯罪”。媒体对节节攀升的犯罪率的报道经常集中在年轻人当中的“道德崩解”上,突出肆意破坏他人及公共财物、逃学和吸毒等问题,以此说明社会中日渐增长的“纵容”。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将年轻人和犯罪行为等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年轻人经常被认为是社会自身健康与幸福的指标。

官方关于犯罪率的统计数字确实反映出年轻人中的犯罪率很高。根据自诉研究,自承曾经干过一次违法行为的少女要少于小伙子,如图19.4所示。(但我们在本章第三节节末已经看到,基于自诉数据的研究是难以信赖的)对于小伙子来说,违法犯罪的年龄往往是18岁左右。而对于少女而言,这个年龄还要小一些,往往在15岁左右达到最高值(参看图19.5)。

根据这一数据,出自年轻人的违法犯罪似乎已是一个大问题。但正如约翰·芒西已经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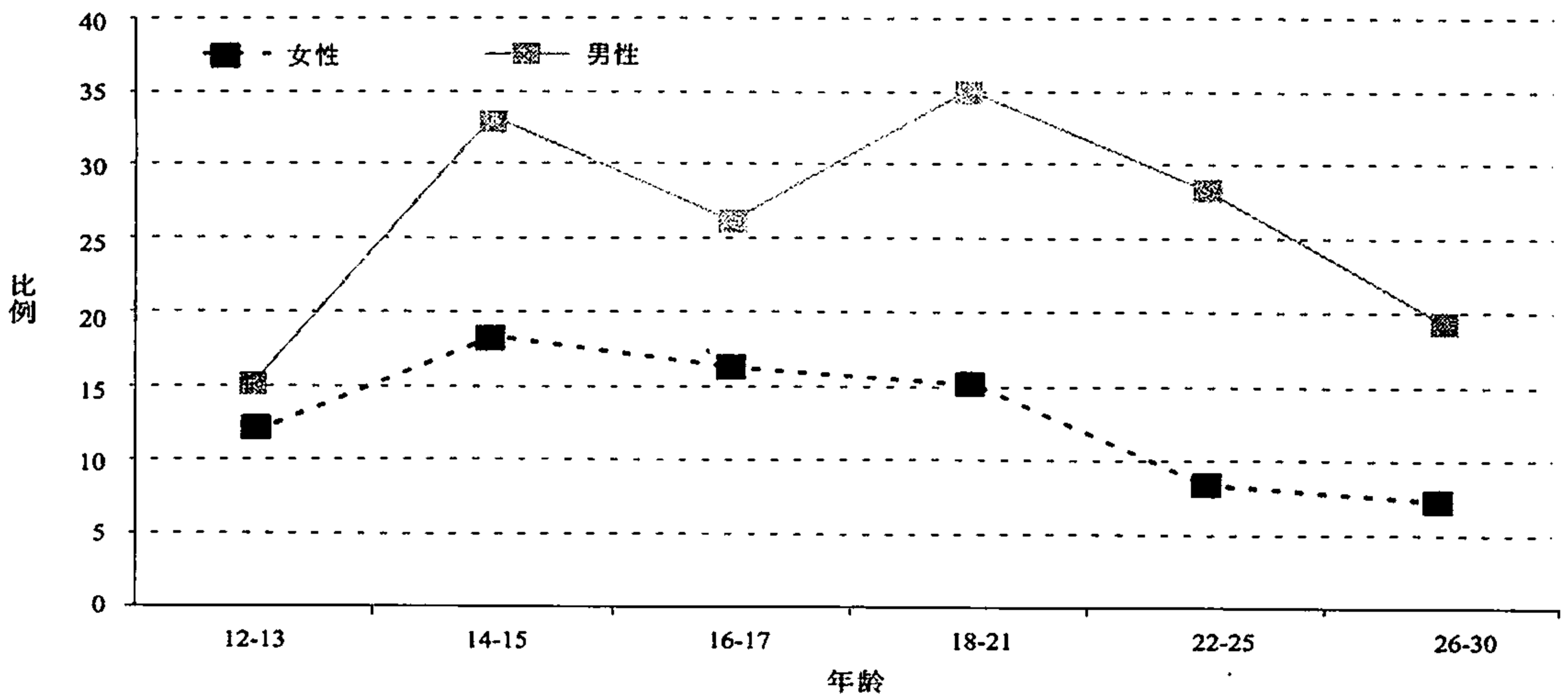


图 19.4 以年龄与性别分组的犯罪率(%)
资料来源:Home Office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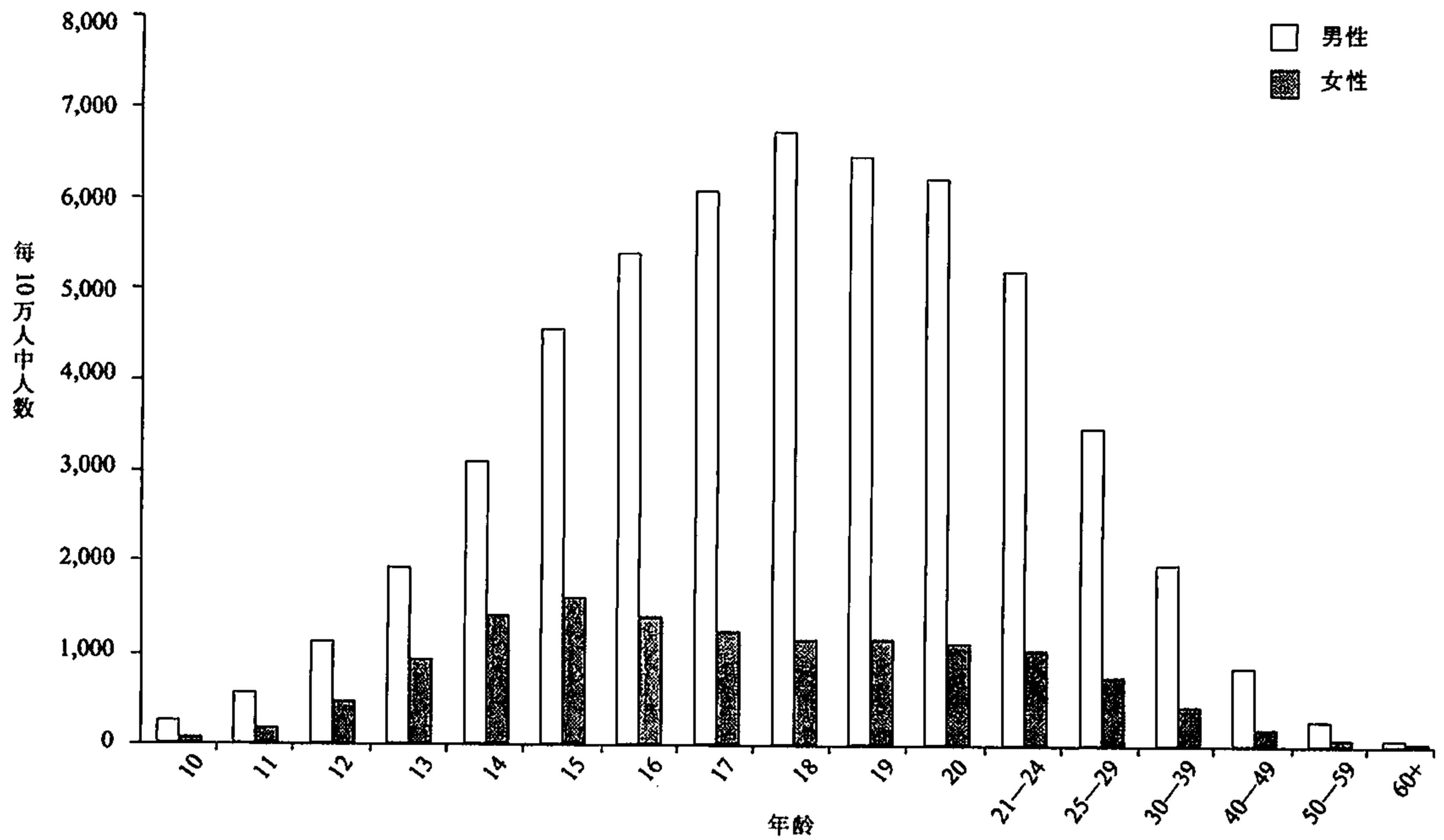


图 19.5 2003 年各年龄组每 10 万人中被定罪或警告有可起诉罪行的人数
资料来源:Home Office (2004)

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对有关青少年和犯罪的假设多加小心(Muncie 1999)。他认为,有关青少年犯罪行为的“道德恐慌”可能没有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涉及年轻人和犯罪的一个孤立事件能够被转化为全面的“儿童期危机”的标志,从而需要采取严厉的“法律和秩序”的措施。1993年,两个10岁男孩搭档,谋杀了两岁的詹姆士·巴尔杰,这一案件广受瞩目,就是道德义愤如何吸引注意力从更大的社会问题上转移开来的范例。在巴尔杰一案中,一家购物中心的闭路摄像镜头录下了那对大男孩牵着小男孩的手的图像,将此案铭刻在了公众的意识之中。根据芒西的看法,这桩残忍的谋杀事件在政界和传媒对青少年犯罪的描述中都是一个分水岭。甚至连半大小孩也被视为潜在的暴力威胁。那两个10岁的男孩被贴上“魔鬼”、“妖怪”和“禽兽”的标签。但很少有人关注违法者的个人历史,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其中一个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暴力和自我攻击倾向,但没有人进行任何干预(Muncie 1999)

至于所谓绝大多数青少年犯罪都与毒品有关的流行之见,芒西也表达了同样的谨慎态度。芒西已经注意到了人们普遍假定,年轻人是为了找钱养毒瘾而实施抢劫等犯罪行为的。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年轻人中的吸毒和酗酒已经相对“正常化”(Parker et al. 1998)。2003年一项为英国卫生部所作的调查,涉及了11岁至15岁的1万多名学童。调查显示,9%的学生经常吸烟,25%的学生在过去一周内喝过酒,21%的学生在过去一年内用过药,更有4%的学生曾经服用过“A类”毒品,比如可卡因或海洛因(DoH 2003)。

毒品的使用趋势已经从海洛因这类“烈性”毒品转向安非他明、酒精和摇头丸^①之类的合成毒品。尤其是摇头丸,已经成为和锐舞

与夜店(rave and club)亚文化相关的一种代表“生活方式”的药物,而不再是通向耗资昂贵的成瘾行为。芒西认为,“禁毒战争”所起的作用,就是把青少年人群中相当一部分大致还算遵纪守法的人给罪犯化了(Muncie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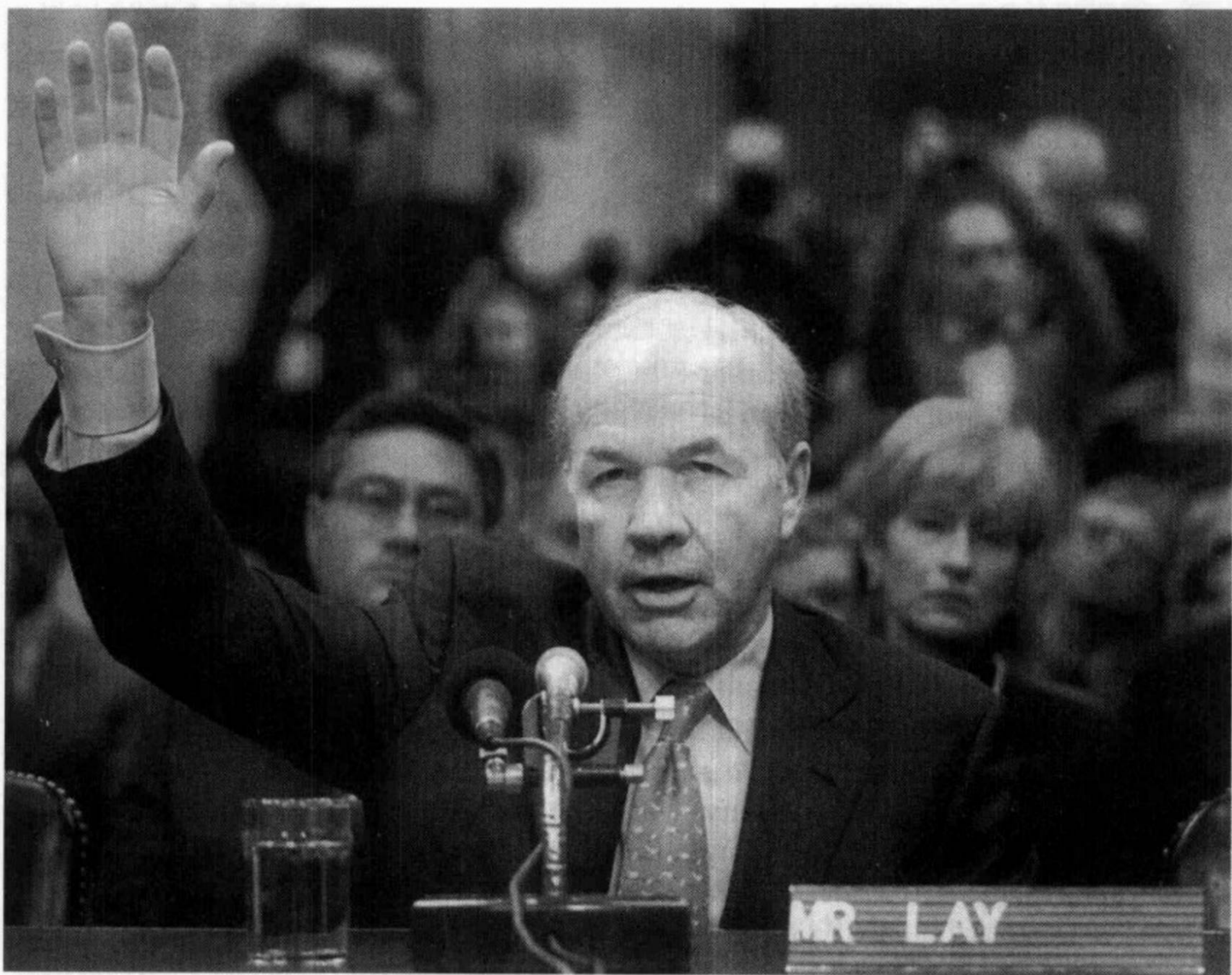
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分析很少能够简单明了。尽管犯罪意味着对法律的逾越,但青少年犯罪活动常常涉及一些严格来讲不属于犯罪的活动。年轻人中的反社会行为、亚文化和不遵从行为或许可以视作不良行为,但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批评者们指出,最近设立的“反社会行为条令”(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s, ASBOs),将会使在许多人看来属于成长过程中正常现象的琐碎平常的临界行为被犯罪化。

19.4.3 白领犯罪

虽然人们往往把犯罪与年轻人,特别是较低阶级的男性联系在一起,但从事犯罪活动的绝不仅限于这部分人。世界最大的能源贸易公司安然公司(Enron)在被揭露做假账以掩盖巨额债务之后,于2001年宣布破产。公司的破产导致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消失。它的几位高级职员,包括公司创办人肯尼斯·雷被拘捕。2002年,传媒巨人世界通信(World-Com)又爆出另一桩丑闻,表明许多富人和权势群体也从事犯罪活动,其影响会比穷人所犯的常常很轻微的罪深远得多。

白领犯罪这个术语最初是由埃德温·萨瑟兰(Sutherland 1949)提出的,指的是社会中比较富有的那些人所从事的犯罪活动。这一术语涵盖了许多类型的犯罪活动,除了赤裸裸的盗窃,还包括税务欺诈、非法销售、有价证券和土地交易欺诈、侵占公款,以及制造或销售

^① 摇头丸的原文是“Ecstasy”,兼取其“狂喜”、“迷醉”、“出神”、“昏厥”等义。



像安然公司创建者肯尼斯·雷这样的权势人物,很少会出庭受审,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相比于法庭通常处理的那些类型的罪案,潜在的后果会严重得多。

危险产品。当然,绝大多数的白领犯罪并不像安然公司或世界通信那样数额惊人。与其他类型的犯罪行为相比,白领犯罪的分布甚至更难测量,因为这种犯罪的大部分形式根本不会在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出现。我们可以在白领犯罪与权势群体犯罪之间做出区分。白领犯罪主要是指利用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员的位置来从事非法活动。而权势群体犯罪是指以犯罪的方式来利用其职位所赋予的权威,比如当一位官员接受贿赂以支持某一特定政策时,就属于此类犯罪。

尽管当局对白领犯罪所持的态度要比对弱势群体犯罪宽容得多(安然丑闻中被判有罪的几个人侥幸逃脱了坐牢),但白领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对于白领犯罪的研究,美国要比英国多得多。在美国,根据计算,白领犯罪(被界定为税务欺诈、保险欺诈、居宅装修欺诈以及汽车维修欺诈)所涉及的金钱数额,是普通财产犯罪(抢劫、盗窃、非法侵占财产、伪造制假和窃车)的40倍之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Organized Crime 1986)。

企业犯罪

有些犯罪学家用企业犯罪来指由大企业在社会中所实施的各种类型的犯罪。污染、贴错标签、违反健康和安全法规等,比小的犯罪行为影响到的人要多得多。大企业的权力和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快速向全球扩张,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会受到大企业的影响。这些大企业参与生产我们所驾驶的汽车,我们所吃的食物。它们还深深影响了自然环境,金融市场,以及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加利·斯莱泼和史蒂夫·图姆斯(Slapper and Tombs 1999)回顾了关于企业犯罪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有大量企业并未遵守与它们有关的法律条规。他们指出,企业犯罪并非仅限于少数“害群之马”(bad apples),而是普遍渗透,广泛流传。研究揭露了六类与大企业有关的违规行为:行政上的(伪造文书或违约行为)、环境上的(污染、许可证违规)、金融上的(税收违规、非法支付)、劳工上的(工作条件、雇用活动)、制造



“索要回扣,挪用公款,操纵价格,行贿受贿……这是一块犯罪率奇高的地方”,经 Sidney Harris 授权复制。

上的(产品安全、标识),以及不平等贸易手段上的(反竞争、虚假广告)。

企业犯罪中的受害模式不是很清楚了。有时会有“明显的”受害者,如像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漏所造成的环境灾害,^①或者硅胶隆

① 这个案例涉及环境保护、企业犯罪、国际经济法中的平等与不平等等诸多问题。1984年12月3日午夜,印度中央邦博帕尔(Bhopal)市郊的联合碳化杀虫剂厂发生甲基异氰酸盐剧毒气体泄漏事故,1小时后有毒烟雾向这个城市(当时人口约80万),形成方圆25英里的毒雾笼罩区。近邻两个小镇首当其冲,数百人在睡梦中死亡。随后,火车站里的一些乞丐死亡。一周后,有2500人死于这场事故。有15万人因受污染危害而陆续入院就诊,最后这次事故还使20多万人双目失明,近20年后导致2万人死亡(各种数字逐年增长)。该化工厂由美国联合碳化公司的印度子公司直接所有和经营。最初的索赔数额高达31.2亿美元,而印度子公司的全部净财产也只有9530万美元。印度政府遂出面代表所有原告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国联合碳化公司对印度的受害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该公司当时仅不动产就约有65亿元,但它声称印度子公司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一切法律责任以及赔偿义务只能由它承担。1987年博帕尔地方法院要求美方支付临时救济金2.7亿美元,美方提起上诉。1989年美国联合碳化公司与印度政府达成赔偿协议,支付4.7亿美元作为事故最后处理办法,并得到印度最高法院的确认。大多数幸存者只得到了25000卢比(约合580美元),而有的受害者至今仍未得到任何赔偿。在对博帕尔事故责任人的处理上,除9名低层管理人员(都是印度血统者)被判刑外,美方在博帕尔的高层管理人员无一人坐牢,公司前总裁安德森一直逍遥法外。几年后该公司被美国陶氏化学公司购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它仍然从联合碳化的资产中收益,却拒绝为以前的过失承担责任。但印度博帕尔事件的民间请愿团仍经常组织集会游行,并求助国际组织向印度政府和美国方面施压。每年12月,印度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要举行研讨会,将博帕尔事件作为学术问题研究讨论,认为博帕尔事件是发达国家为洁净自身环境提高环保标准,致使跨国公司将危险品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案例;谴责美国联合碳化公司一个企业两个标准:它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化工厂远离人口稠密区,并有电脑监控设施,而设在博帕尔的厂却只有一般的设备,且没有对工人进行系统的应急安全教育。可以对比的是,美孚石油公司迄今为止为1989年阿拉斯加瓦尔迪兹石油漏油事件付出50亿美元惩罚性赔偿金,那次事件中没有一个人死亡,美孚公司为清洗每一只被石油污染的水獭花费940美元。

胸术对妇女健康造成危险的系列事件。最近,在火车相撞中的受伤者或死者的亲属要求负责轨道和火车的企业高层出庭受审,因为这些企业玩忽职守。但是,企业犯罪的受害者经常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这是因为,在“传统”犯罪中,受害者与违法者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遭到了背后袭击你还浑然不知,这是很困难的!在企业犯罪的情况中,受害者与犯罪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要远得多,受害者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伤害,或者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寻求犯罪的赔偿。

在社会中,人们对企业犯罪影响的感受经常是不平等的。由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而处于劣势的人们,其受害就要深重得多。例如,工作场所中的安全风险和健康风险,在低收入职业中最高。许多来自保健产品和药品的风险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大,比如避孕或治疗不孕症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Slapper and Tombs 1999)。

企业犯罪在暴力方面不像凶杀和攻击那样明显,但也同样真实存在,而且有时候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例如,违背有关新药研制、工作场所安全或污染方面的法规,可能会给大批人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乃至死亡。尽管很难获得有关工伤事故的精确统计资料,但由于工作危险而造成的死亡,在数目上远远超过谋杀。当然,我们并不能认为,所有——或者说就是大部分——这些伤亡都是因为雇主忽视安全因素造成的,对此他们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根据认为,许多这样的事故都是由于雇主或管理者忽视了受法律约束的安全规则而造成的。

19.4.4 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是指具有许多正统生意的特征但实际上却是非法的活动形式。有组织犯罪包括走私、非法赌博、毒品交易、卖淫、大规模盗窃以及收取保护费等行为。它常常仰仗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来实施其活动。虽然从传统上来看,有组织犯罪是在单个国家中,以特定的文化方式发展起来的,但现在在空间范围上已经越来越超越国界了。

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能感觉到有组织犯罪的存在,但从历史上看,它在少数国家特别盛行。比如说,在美国,有组织犯罪是一门庞大的产业,不逊于经济企业中任何主要的正规部门,例如汽车工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犯罪组织为大量消费者提供非法商品与服务。针对赛马、彩票、体育赛事的非法赌博是美国有组织犯罪的最大收入来源。有组织犯罪在美国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要,可能是因为它在早期与19世纪末期工业化“强盗大王”^①的活动有关系,而且还是对这种活动某种程度上的模仿。许多早期的产业家通过剥削移民的劳动而赚取了大量财富,他们基本上无视有关工作条件的法律规定,经常利用贪污与暴力相结合的手段,来建立自己的产业王国。

尽管我们对英国的有组织犯罪不掌握什么系统性的信息,但众所周知,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地区存在着广泛的犯罪网络。其中一些还具有国际性的联系。尤其是伦敦,它是以美国和其他地方作为基地的一个犯罪活动的中

^① 原文为“robber baron”,这里指19世纪后期美国靠强取豪夺和残酷剥削迅速致富的强盗资本家,包括所谓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等等。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毒品贩卖

买到大麻有多么容易？还有什么流行音乐节是与毒品无染的吗？在英国，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触到非法毒品，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令人悲哀。

在你所在的社群里，有哪些因素决定着非法毒品的可得性？当然，警方执法的力度很重要，当地需求的程度也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有毒品走私者的网络，从而能够把毒品从产地国运到你的家乡。而这些网络之所以活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全球化。

虽然大麻的种植可能只是某人后花园的事，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柯^①作物和罂粟都在第三世界种植。每年有数十亿美元被用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根除毒品的种植，但是尽管花费巨大，却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些根除或禁止毒品种植的努力明显减少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中的非法毒品供应。为什么这些努力失败了呢？

一种答案是说利益动机实在是太强烈了。从玻利维亚或秘鲁艰苦谋生的农民，经过哥伦比亚贩毒集团(cartels)的成员，到活跃在我们身边的街头上和夜店里的低端贩子，他们都从各自的非法活动中获得了丰富的金钱回报。这些回报强烈地刺激着他们去设法对付反毒品行动，去甘冒被

抓获的风险。

最近，在由八大工业化强国首脑参加的峰会上，又讨论到了另一个答案，即毒品贩子已经可以利用全球化提供的便利条件。首先，为了躲开当局，走私者使用了在这个全球时代可以获得的所有通信技术。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言，毒品贩子“现在可以使用像信号截听器(signal interceptors)这样的尖端技术以标绘雷达位置并避开监控……[并且]他们可以使用传真、电脑和手机来协调行动，使他们的生意运转通畅”。其次，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创造了便利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大量金钱在数秒之内通过电子设备在世界范围内转移，使“洗”毒品钱(也就是说，使毒品钱看似来自合法的商业投机)变得相对容易了。第三，为了允许人员和合法商品更为自由地跨国界流动，近来各国政府的政策有些变化，这也增加了走私的机会。

不过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有可能创造出各国政府共同与毒品走私做斗争的新机遇。事实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最近就发出呼吁，在麻醉品控制方面要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强调有必要共享信息与联合执法行动。

心。“三合会”(中国帮派，最初来自于香港和东南亚)^②和“亚迪”(Yardies，与加勒比各国有联系的贩毒集团)是两个最大的犯罪网络，但来自东欧、南美和西非的其他犯罪团体也在从事洗钱、毒品贸易以及诈骗活动。

在英国，有组织犯罪比几年前更为复杂。虽然没有一个单一的全国性组织把不同的犯罪团伙联系起来，但这类犯罪同以前相比已经越来越老练。例如，尽管设立了旨在阻止洗钱的程序，一些较大的犯罪组织仍然能够通过大

① 古柯(coca)：其叶为药物可卡因(cocaine)的原料，非洲、南美北部、东南亚和中国台湾皆有栽培。在人体内的生理学作用有如鸦片。第四版中译本译作可可(cocoa)。

② 英文为“Triads”，“天地会”的别称，源于清代民间组织，对内自称“洪门”。

型的清算银行来洗赃款，然后再把“洗干净了”的钱投资到合法的生意中。警方相信，每年有价值 25 亿到 40 亿英镑源于犯罪的钱曾经在英国银行过户。

有组织犯罪形式的嬗变

卡斯特在《千年终结》一书中认为 (Castells 1998)，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在空间范围上正越来越国际化。他指出，在新兴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跨境犯罪活动的协同合作正成为新的全球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现在是在机动灵活的国际网络中，而不仅仅是在他们自己所属的领土范围内，所涉及的活动从麻醉品贸易到造假币，再到走私移民和人体器官。

根据卡斯特的看法，犯罪集团互相联系建立起了战略联盟。国际麻醉品贸易、武器走私、核原料销售和洗钱都跨越了国界，将犯罪集团“联系了起来”。犯罪组织往往将“低风险”的国家作为活动基地，在那里他们的行动较少受到威胁。近年来，前苏联成为国际有组织犯罪的主要集中地之一。这种网络化犯罪机动灵活，使犯罪集团能够比较容易地逃避执法行动的打击。即使某个犯罪“安全港”风声趋紧，“组织构造”也能够转而形成一种新的模式。

在英国也能感受到犯罪的国际化特征。日本的“野寇崽”^①以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成员都已经在英国确立了他们的地位。在最新到来的犯罪团伙中，有来自前苏联的犯罪者。一些评论家指出，新兴的俄罗斯黑手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有组织犯罪联合体。俄罗斯犯罪网络积极参与洗黑钱活动，将其活动与基本上不受控制的俄罗斯的银行联系起来。有人认为，俄罗斯团伙有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犯罪网络。他们在充斥着黑手党的俄罗斯有自己的

基地，在那里，地下“保护”对许多企业来说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最让人担心的是，俄罗斯的新匪徒可能正在国际范围内走私从苏联核武器库中弄出来的核原料。

尽管政府和警方开展了频繁的禁毒运动，但麻醉品贸易仍然是扩展最为迅速的国际犯罪行业之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它的年增长率超过了 10%，并拥有极高的利润。海洛因网络一直延伸到远东，尤其是南亚，而且在北非、中东和拉丁美洲也有网点。供应路线也经过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毒品一般是从那里被供应到英国。

19.4.5 网络犯罪

不仅信息技术的新近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国际上的有组织犯罪，而且看起来，信息和电信革命也肯定会从根本上改变犯罪的面貌。技术进步带来了令人激动的新机会和新收益，但也增加了遭受犯罪危害的可能性。网络犯罪，即在信息技术协助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其程度难以量度，尽管如此，却可以概述它似乎正在采取的一些主要形式。戈拉博斯基和拉塞尔·史密斯 (Grabosky and Smith 1998) 分辨出基于技术的犯罪的九种主要类型：

- 1 电信系统的非法拦截表明，窃听已经更加容易了。这里包含的活动从“配偶监控”到间谍活动。
- 2 人们更容易遭受电子破坏行为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西方社会越来越依赖计算机系统；对这类系统的干扰，比如黑客攻击或人为电脑病毒之类，会对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 3 偷窃电讯服务的能力意味着人们可以从事违法生意而不被侦知，或者仅仅是通过操纵

^① “Yakuza”，日语中指黑社会帮派成员。

未来的犯罪

想像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不再存在有形货币,所有的个人财产均以电子货币定价,你的个人身份是你最有价值的资产。根据英国贸工部(DTI 2000)发表的一份题为《行将到来》的报告,技术进步不久将彻底改变犯罪。报告认为,在20年之内,诸如汽车、相机和电脑之类的许多物品对盗贼来说将成为没多大吸引力的目标,因为这些东西的程序设计使它们只有在合法主人的手

里才能工作。诸如计算机芯片、个人识别密码(Personal Identification Number, PIN)和安全代码之类的个人化“身份”将变得无所不在。如果要进行在线交易、使用“智能卡”(虚拟货币)和通过安全系统,这些东西都将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这份报告,随着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方面逐渐以高技术为基础,“身份欺诈”和偷窃个人身份的案件将大量出现。

电信和手机服务,以获得免费或打折电话。

- 4 电信隐私问题越来越严重。通过拷贝素材、计算机软件、电影和唱片,侵犯版权变得比较容易。
- 5 人们难以控制网络空间里的色情材料和令人不快的内容。赤裸裸的性材料、种族主义的宣传以及制作纵火装置的说明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上传与下载。“网络骚扰”^①不仅能给网民带来虚拟的威胁,也能带来真实的威胁。
- 6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电话推销欺诈行为的增多。欺诈性的慈善计划和投资机会难以管制。
- 7 人们面临着更大的电子转账犯罪的风险。由于广泛使用取款机与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增加了一些交易被中途拦截的可能性。
- 8 为了掩饰其来源,来自某一犯罪的非法收益可以使用电子洗钱来进行“转移”。
- 9 犯罪阴谋可以利用电信不断推进。因为有了精密加密系统和高速数据传输,执法机构很难截获关于犯罪活动的信息。这一点尤其与新的国际犯罪活动有关。

有迹象表明,网络犯罪已呈上升之势。基于互联网的欺诈是英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最快的犯罪种类。1999年截止到9月份,欺诈和伪造行为上升了29%,即一年间大约增加了7万宗案件,其原因被认为是基于互联网的犯罪增加。

电信犯罪的全球泛滥对执法提出了特别的挑战。发生在一个国家的犯罪行为,其受害者有可能遍及全球。正如戈拉博斯基和史密斯所言(Grabosky and Smith 1998),这对侦查和起诉犯罪有不利的影 响。来自多个相关国家的警察必须要确定犯罪行为发生时所在的管辖范围,必须就引渡违法者和为起诉提供必要的证据达成一致意见。虽然随着网络犯罪的增加,警方可能会改进跨国界合作,但现在网络罪犯仍然有大量的活动空间。

当世界各国的金融、商业和生产系统走向电子一体化之时,互联网欺诈,未授权的电子侵入,以及挥之不去的电脑病毒的威胁,这些东西程度愈益加剧,就成为现有计算机安全系统脆弱性的有力警示。从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到日本

^① “Cyberstalking”,指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等骚扰乃至威胁他人。

政府新建立的反黑客警队 (anti-hacker police-force), 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应对难以捉摸的新型跨国电脑活动。

第五节 监狱: 犯罪之解?

现代监狱的根本原则是对个体进行“改造”, 为他们出狱后在社会中能起到健康、适当的作用而做准备。监狱以及长期徒刑也被视为是对犯罪的有力威慑。因此, 面对犯罪率的日益上升, 很多急欲“强硬”对待的政治家们支持提高司法体系的惩罚性, 扩充监狱设施。那么, 监狱确实起到了人们所希望的“改造”被判刑的罪犯和遏制新的犯罪的效果吗? 我们将会看到,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似乎有证据表明, 它们并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

近些年来, 英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变得更具惩罚性。如图 19.6 所示, 在押犯人的数量稳步上升, 2003 年,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监狱设施中

在押 73000 人, 自 1990 年以来增加了 25000 多人。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在押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 (每 10 万人中有 139 人在押), 在 2004 年欧盟新增 10 个成员国之前, 比欧盟当时其他所有国家都高。(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数据是另行统计的, 都比英格兰和威尔士低。) 相比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 德国的在押人口比例仅为每 10 万人中 96 人在押, 而法国更低至每 10 万人中 85 人在押 (Home Office 2003)。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庭相比,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也往往会判处更长的监禁。一些批评者担心, 英国正在紧步美国的后尘, 而美国是迄今世界上最具惩罚性的国家 (参见以下图文框)。

以前囚犯经常会受到身体的虐待, 现在不会再这样了, 但他们确实受到了其他许多类型的剥夺。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自由, 也被剥夺了适当的收入、家人和从前朋友的陪伴、异性恋的关系、属于自己的衣物和其他个人物品。他们的居住条件经常过于拥挤, 而且不得不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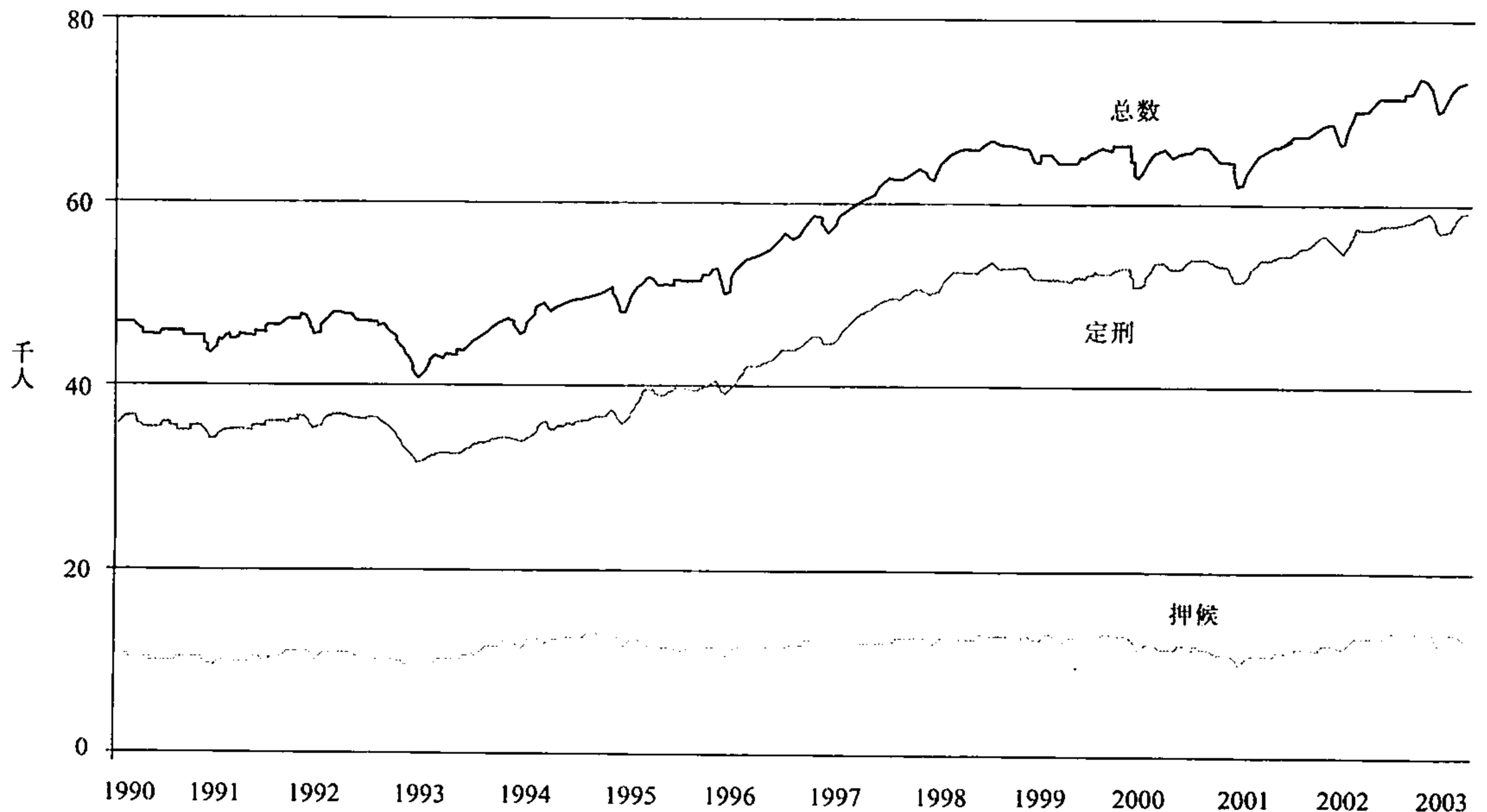


图 19.6 1990 年至 2003 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在押犯人数
资料来源: *Social Trends* 34 (2004), 页 144

惩罚性司法：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司法制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具惩罚性的。全世界在押囚犯总数为大约 875 万人，其中将近 200 万人目前关押在美国的监狱中。在美国，每 10 万人中就有 686 人在狱中服刑

(Home Office 2003)。

美国的监狱体系雇用了 50 多万人，每年需要花费 350 亿美元维持运转。它还被部分私有化了，现在私营公司能够赢得政府合同，建造和管



加州死囚区中的一名犯人

理监狱，以容纳日渐增多的入狱者。批评者们指责已经出现了“监狱——产业联合体”，大量的人，包括官僚、政客和监狱雇员，在监狱体系的存在和进一步扩展上拥有既得利益。

在美国极刑（即“死刑”）很受支持。2004 年，成年被调查者中有 71% 回答说支持死刑，26% 的被访者表示反对。这显示出自 1966 年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当时有 38% 的被调查者支持死刑，而 47% 的被访者表示反对（盖洛普数据）。自从 1977 年美国最高法院核准州级死刑法以来，等待执行死刑的人数大幅度攀升（参见图 19.7）。截止到 2003 年底，有 3 千 3 百多名囚犯处于“死囚区”中。在这些入当中，99% 为男性，56% 为白人，42% 为黑人

死囚区中的犯人，1953 年至 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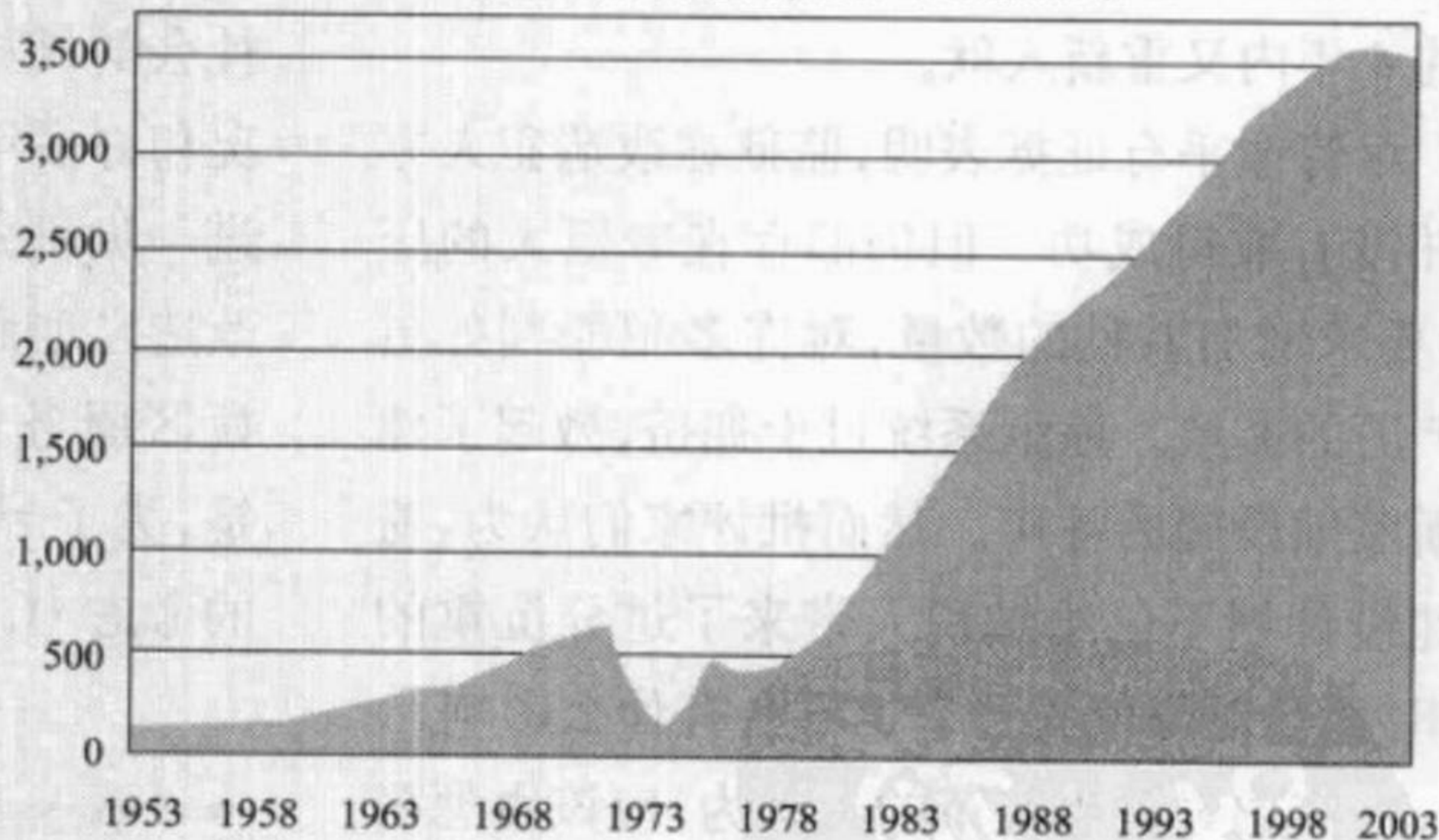


图 19.7 1953 年至 2003 年美国被判死刑的人数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Justice (2004)

(US Bureau of Justice 1998)。

支持严刑峻法的人指出，美国的犯罪在过去 10 年间整体有所下降，即为监狱发挥效力的明证。批评者们则不同意，认为犯罪的减少可以

用其他因素来说明,比如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走低。他们认为,高监禁率正在不必要地破坏家庭和社区。超过四分之一的非裔美国男性要么在监狱中,要么处于刑事体系的控制之下。在美国

大约 60% 的入狱者是由于与毒品有关的非暴力犯罪。批评者们指责说,这样明显的不平衡证明,监禁不再是“最后一招”,监狱现在成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方法。

严格的纪律约束以及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严密管制 (regimentation)。(Stern 1989)

生活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往往会使在押犯人与外部社会分离,而不能使他们的行为适应那个社会的规范。囚犯不得不屈服于与“外部社会”相当不同的环境,而且,他们在监狱中所学到的习惯与态度,常常与人们期望他们学到的恰恰相反。例如,他们可能会对普通公民逐渐产生怨恨,学会视暴力行为为正常,与惯犯发生接触,并在获释后仍与之保持联系,并获得他们以前所知甚少的犯罪技能。有鉴于此,监狱有时被称为“犯罪大学”。因此,以前曾坐过牢的人又重新犯罪,累犯的比例高得令人不安,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英国,那些服刑期满被释放的男性中,有超过 60% 的人在初犯之后的 4 年内又重新入狱。

尽管似乎有证据表明,监狱在改造犯人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但仍旧存在着巨大的压力,要求增加监狱的数量,对许多犯罪判处更为严厉的监禁。监狱系统过于拥挤,激起了建造新监狱设施的呼声。然而批评家们认为,监狱建设计划不仅给纳税人带来了过分沉重的负担,而且对降低犯罪率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些倡导刑事改革的人认为,应该由惩罚性司法转向恢复性司法的形式。“恢复性司法”寻求通过在社区内“服刑”,来增强违法者对其犯罪行为后果的认识。违法者可能会被要求为社区服务项目出力,或参与和受害者调解和解的会议。罪犯必须以有意义的方式直面犯罪的后果,而不是与社会隔离开来,使之看不到其犯罪行为的后果。

监狱是否“有效”,关于这一争论,没有简单的答案。虽然监狱在改造犯人方面似乎并没

有取得成功,但是却可能阻止人们犯罪。尽管那些实际上被监禁起来的人并未被威慑住,但监狱生活的不舒适却可能会对其他人起到很强的威慑作用。对狱政改革者来说,这里有一个几乎难以处理的问题。把监狱变成彻底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可能会有助于威慑潜在的违法者,但却使得监狱的改造目标很难实现。(监狱生活的艰苦也会产生意外后果,比如下一个图文框中所讨论的约瑟夫·斯科尔斯的悲剧性死亡)但是,监狱的条件越不艰苦,监禁就越会失去它的威慑作用。

虽然监狱确实让一些危险的人离开了街头,但有证据表明,我们需要另寻良方来遏制犯罪。关于犯罪的社会学解释清楚地说明,一招见效的东西只能是权宜之计。犯罪的原因与社会的结构状况有关,包括贫穷、内城区的情况和许多年轻人的恶劣生活条件。虽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短期的措施,例如旨在把监狱办成改造之地而不仅仅是拘禁之地的改革,和利用社区服务计划等方式来替代监狱的实验,但是,为了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就必须有长远的考虑 (Currie 1998)。

小结:犯罪、越轨与社会秩序

如果完全从一种消极的角度来看待犯罪与越轨行为的话,那将是一个错误。任何社会只要承认人类具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与兴趣关注,就都必须为其活动与大多数人所遵从的规范不相符合的个人或群体找到一席之地。在政治、科学、艺术或其他领域中提出新观点

监狱中的自残与自杀：约瑟夫·斯科尔斯之死

约瑟夫幼时生活动荡，少年岁月又躁动不安。据说，他很早就遭受了性虐待，在被捕时，正在看精神病医生，并接受药物治疗。约瑟夫心情抑郁，开始自残，间或还有自杀的念头。

2001年11月30日，他自愿接受社会福利机构的照顾，被安置在一处儿童之家。六天以后，他和一群孩子一起离开儿童之家，参与了一系列手机抢劫案件。然后他被逮捕了，并被控以抢劫罪。无论是直接受害者还是其他目击者，都认为约瑟夫在这些事件中只是个边缘角色，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使用过或威胁使用过暴力。

随着抢劫案审判的日子日渐迫近，约瑟夫也变得愈益消沉，烦躁不安。在出庭之前两周的一天，他用一把小刀在自己脸上划了三十多道。其中最深的一道划过了鼻子，直刺骨头。他的房间满墙血迹，不得不重新粉刷。

在约瑟夫宣判之前，曼彻斯特刑事法庭(Manchester Crown Court)的法官得到提醒，要注意到约瑟夫脆弱而易受伤害，曾有过受性虐待的经历，有过自杀和自残行为的历史。

不幸的是，约瑟夫受审之时，正逢公众对街头犯罪的焦虑日趋加剧。英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Lord Chief Justice)已经发布了判罪方针，被广泛解读为对于此类犯罪即自动判处监禁。2002年3月15日，约瑟夫被判处两年羁押教养。法官在公开法庭中宣布，他希望有关约瑟夫的自残和受性虐待历史的警示“非常明确地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宣判以后，对于约瑟夫的照看责任转由青少年司法署(Youth Justice Board, YJB)负责，并告知其约瑟夫的历史，特别是他的自杀企图和自残

行为。与照看约瑟夫有关的人士促请青少年司法署，将约瑟夫妥当安置在地方当局所属拘留所，能够让他得到必要的深度照看和援助。但是，尽管约瑟夫易受伤害，青少年司法署还是把他送到了位于斯托克赫斯青少年教养所(Stoke Heath Young Offender Institution, YOI)的监狱拘留所，声称找不到其他任何合适的安置处。约瑟夫的母亲伊冯(Yvonne)随后打电话给斯托克赫斯青少年教养所，告诉他们，约瑟夫曾经遭受性虐待，情绪抑郁，意志不稳定，曾有自残和自杀行为的历史。

约瑟夫一进斯托克赫斯青少年教养所，立即被剥掉原先所穿的衣服，包括内衣，套上一件像马毯(horse blanket)一样的东西，上面有坚固的维可牢^①搭扣。在后来聆讯时，当这件东西被呈上法庭，陪审团成员和验尸官显然都大感震动，照一位儿童照看专家的说法，这件服饰是“非人化的”。

在斯托克赫斯青少年教养所的短暂期间，约瑟夫处在几乎独自隔绝的状态，没有被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活动。他被告知，不久将被送进主楼，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这个前景使他惊恐万分，因为他曾经遭受过性虐待。就在2002年3月，约瑟夫自杀了。

约瑟夫的囚室缺乏密切察看，并不安全，这就使他有可能把一条床单绑在囚室窗栏上，然后上吊自尽。此时离他开始服刑仅仅七天……

2004年4月，对约瑟夫之死展开了为期两周的调查，……调查约瑟夫之死的(人员)一致认为，监狱拘留所完全不适于安置约瑟夫，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处置这类易受伤害者的资源和设施。

^① 维可牢(Velcro):一种尼龙搭扣，两面相合即相扣，一扯即分开，以替代服装上的纽扣。

资料来源: *Inquest*, 2004年11月 (<<http://inquest.gn.apc.org/pdf/joseph%20Scholes%20Inquiry%20briefing%2004.pdf>>)

霍华德刑罚改革联盟 (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 是一个旨在改革刑罚体系的压力集团, 开展刑事司法方面问题的研究, 包括分析监狱状况。该联盟发现, 仅在2003年, 就有94名男女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中自杀:

- 有14名女囚自杀: 这是单年自尽女犯最多的纪录;
- 31名不足25岁的青少年犯人自杀: 其中三分之一的犯人处在候审期间, 3%的囚犯属于移民羁押;
- 2003年, 有5所监狱的囚犯自杀达到或超过4起: 伯明翰(4起); 布莱肯赫斯特 (Blakenhurst, 5起); 诺丁汉(4起); 温切斯特(4起); 斯泰尔 (Styal, 4起)。

霍华德联盟主任助理安妮塔·多克莉说道:

那么多的男女犯人在狱中自杀, 令人蒙羞。更令人可悲的是, 随着监狱在押犯人的数量不断增多, 狱政体系始终面临巨大压力, 霍华德联盟并不指望自杀数据会有下降。只有当在押人数大大减少, 应对自杀和自残的诸般措施得到妥善落实, 狱中自杀的数量才会下降。我们吁请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以减少狱中羁押人数。

当然, 必须更加重视在狱中贯彻预防措施的能力, 尤其是因为有证据表明, 全国范围内的自杀率呈下降之势, 而在预防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 易受伤害的有精神病的犯人情况已有改进。

资料来源: 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 2004

问题:

- 1 对于惩罚青少年违法者, 监狱是否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 2 社会应当如何处置轻微犯罪?
- 3 为什么近些年来英国在押犯人数量上升?

的人, 常常会被遵从正统方式的人抱以怀疑或敌视的眼光。例如, 美国革命中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理念, 即个人自由与机会平等, 在当时受到了许多人的强烈抵抗, 但现在已经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接受。与社会的主流规范相偏离需要勇气和决心, 但是为了确保发生日后看来对大众有利的变迁过程, 这样的举动常常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如果给不循规蹈矩的人提供相当大的空间, 就必须同时承受“有害越轨行为”的代价吗? 例如, 为了换取其公民所享有的个人自由权利, 社会就必须付出高暴力犯罪率的代价吗? 有人确实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 如果社会不对服从进行严格的定义, 暴力

犯罪就无法避免。但是,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 这种观点并不怎么站得住脚。在一些承认广泛的个人自由并容忍越轨活动的社会 (如荷兰) 中, 暴力犯罪率很低。相反, 在个人自由范围受到限制的国家 (如一些拉美社会) 里, 却可能表现出很高的暴力水平。

一个对越轨行为宽容的社会, 并不一定会经历社会混乱。然而, 只有在个人自由权利与社会公正相结合的社会, 才有可能实现好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秩序中, 不平等状况并不悬殊, 所有人都有机会过上充实而满意的生活。如果自由与平等之间并未取得平衡, 如果许多人发现自己的生活远未达到自我实现的程度, 越轨行为就可能朝着破坏社会的方向发展。

本章要点

- 1 越轨行为是指逾越人们所普遍遵循的规范的行为。至于什么样的行为会被看成是越轨,可能会因时而变,因地而异;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属于“正常的”行为,到了另一种文化背景中便可能会被贴上“越轨”的标签。越轨行为的概念要比犯罪的概念更为宽泛,后者仅指触犯法律的非遵从行为。
- 2 无论是正式的约制还是非正式的约制,都是被社会用来强化社会规范的。法律则是由政府界定并强制执行的规范。
- 3 人们曾经提出过生物学与体格学方面的理论,认为犯罪与其他形式的越轨行为一样是由遗传决定的;但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站得住脚。社会学家认为,遵从与越轨行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有不同的界定。社会中财富与权力的差异强烈地影响着不同人群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活动会被看成是犯罪。违法犯罪与遵纪守法的活动都是以极其相似的方式习得的,并且一般说来,也是为了同样的需求。
- 4 功能主义理论把犯罪和越轨看成是社会结构性张力和道德调控缺乏的结果。涂尔干引入了“失范”这一术语,用来指现代社会中由于传统生活的瓦解而带来的焦虑感和茫然感。罗伯特·K.默顿扩展了这一概念,使之包括一旦规范与社会现实相冲突时个体所感受到的紧张。亚文化角度的说明把注意力放在诸如帮派团伙一类的群体上,这些群体抵制主流价值,替之以倡导越轨行为、不良行为或不遵从行为的规范。
- 5 标签理论(它假定给某人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会强化其越轨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假设:没有任何行为在本质上属于犯罪(或正常)。标签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某些行为会被定义为越轨,为什么有些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被贴上了越轨者的标签。
- 6 冲突理论从社会结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精英们对其权力的维护这几个角度出发,来分析犯罪和越轨行为。
- 7 控制理论认为,当社会控制或物理控制不足时就会出现犯罪。犯罪的增长与现代社会中犯罪的机会和目标的生长有关。破窗理论认为,社会出现无序与出现犯罪之间有直接联系。
- 8 任何社会中的犯罪程度都难以估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会被记录在案。未记录的犯罪被称为“隐性数据”,指那些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的违法案件。受害研究(调查系向被访者询问他们是否在前一年受到过某种犯罪行为的伤害)显示了官方统计的犯罪率和人们的实际经历之间的差距。
- 9 女性的犯罪率要比男性低得多,这可能是由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在社会化方面存在的整体差异,加之男性更多地参与了家庭外的领域。失业和“男性特质危机”也与男性犯罪率相关。在某些类型的犯罪中,女性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强奸比官方统计资料所揭示的要普遍得多。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女性都是强奸受害者,因为她们不得不格外谨慎地保护自己,并生活在对于强奸的恐惧之中。同性恋男女成为犯罪受害者和遭受性骚扰的可能性更高,然而因为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所以经常被视为“活该”如此,而不是无辜的受害者。

10 公众对犯罪的担心大多集中在街头犯罪上，比如偷窃、入室行窃和攻击。这些领域的罪犯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男青年。官方统计数字显示，青年人的违法比例较高。不过，我们应该谨慎对待关于青年犯罪的道德恐慌。青年人中的许多越轨行为，诸如反社会行为和不遵从行为，事实上并不是犯罪。

11 白领犯罪与企业犯罪指的是由社会中较富裕的那部分人所从事的犯罪活动。这类犯罪可能比穷人的轻微犯罪后果更为深远，但却较少受到执法部门的关注。有组织犯罪是指具

有制度化形式的犯罪活动，呈现出许多正规组织的特征，但从事的活动却是系统性地违法的。网络犯罪指的是借助信息技术实施的犯罪行为，诸如电子洗钱和网络诈骗。

12 我们之所以建造监狱，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社会，另一方面是为了“改造”罪犯。但是监狱似乎没能遏止犯罪，其改造罪犯使之面对外部世界而不重新犯罪的能力也值得怀疑。累犯是指以前坐过牢的人再次违法犯罪。监狱的替代形式也有所讨论，比如基于社区的判决。

思考建议

1. 人们对贴有“越轨者”标签的人行动的解释与对“正常”人行动的解释可能有哪些不同？
2. 为什么受害者调查要比官方的统计数据能够提供有关犯罪程度的更为可靠的情况呢？
3. 随着女性日益进入公共领域，必然会引起女性犯罪状况的改变吗？
4. 与一位失业的年轻人相比，企业高管更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罪犯吗？
5. 犯罪如何受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

阅读指南

- H. Croall, *Crime and Society in Britain* (New York: Longman, 1998). 《英国的犯罪与社会》
- Erich Goode, *Deviant Behaviour*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7). 《越轨行为》
- Simon Holdaway and Paul Rock (eds), *Thinking about Criminology* (London: UCL Press, 1998) 《犯罪学探析》
- J. Muncie and E. McLaughlin (eds), *Controlling Crime*, 2nd edn (London: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2001). 《控制犯罪》
- J. Muncie and E. McLaughlin (eds), *The Problem of Crime*,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2001). 《犯罪问题》
- Paul Walton and Jock Young (eds), *The New Criminology Revisited* (London: Macmillan, 1998). 《新犯罪学再论》
- Robert Reiner,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治安政治》

网络导航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org>

《英国犯罪学学刊》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http://www3.oup.co.uk/crimin>

英国内政部 (Home Office, UK)

<http://www.homeoffice.gov.uk>

霍华德刑罚改革联盟 (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

<http://www.howardleague.org>

NACRO——关注犯罪预防和违法者福利网站 (NACRO-concerned with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welfare of offenders)

<http://www.nacro.org.uk>

联合国犯罪与司法信息网络 (United Nations Crime and Justice Information Network)

<http://www.uncjin.org/>

目录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之辩	694
20.1.1 政治、政府与国家	694
20.1.2 权力	696
20.1.3 威权制与民主制	698
第二节 民主的全球扩散	700
20.2.1 共产运动的变革	700
20.2.2 民主何以广受欢迎	703
20.2.3 民主面临困境?	704
20.2.4 全球治理	705
第三节 英国的政党政治	708
新工党	709
第四节 政治变迁与社会变迁	714
20.4.1 全球化与社会运动	714
20.4.2 技术与社会运动	716
第五节 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的理论	717
20.5.1 民族主义与现代社会	717
20.5.2 没有国家的民族	718
20.5.3 少数族群与欧盟	720
20.5.4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720
20.5.5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722
20.5.6 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全球化	723
第六节 恐怖主义	723
20.6.1 恐怖与恐怖主义的起源	725
20.6.2 新旧恐怖主义	727
20.6.3 恐怖主义与战争	731
本章要点	732
思考建议	733
阅读指南	733
网络导航	734



第二十章

政治、政府与恐怖主义



2003年2月,为了反对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全球抗议浪潮(参看本章第二节末的图文框)。在伦敦,有100多万人走上了街头,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而在罗马和巴塞罗那,也爆发了规模相当的游行。从纽约到孟加拉国,世界各地的多个城市更有规模较小的众多游行发生。^①粗略估计,全球抗议浪潮总共有60个国家的近1000万人参加[《卫报》(*Guardian*),2003年2月13日]。

是什么促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同一天走上了世界各地众多城市的街头?正是传媒的发展。此次抗议浪潮之前的几个月里,电视和报纸上连篇累牍满是关于战争可能性的讨论,而反战示威的计划也事先在媒体上流传。反战组织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站告示,就有能力动员到方方面面的支持者。

在2003年2月参加游行的人们,虽然走在一起,却是各有关怀。有些人指出,尽管民主乃是最佳模式,但仰仗武力向中东输出西方式的民主,却违背了民主的根本价值。另有些人则认为,中东的战争只不过是西方世界为了攫取稳定的石油来源,提出的一种其实不难看穿的借口。而在英国,许多人担心一旦被拖进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战争,就会使英国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目标的可能性增大而不是降低,就像

2005年7月7日伦敦人所遭受的系列攻击(参见本章第六节引语)。另一项动员起支持反战的力量话题在于,那些主战的政府未能说服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明确允许它们使用武力对付伊拉克,因为它不遵守此前的联合国有关决议。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终于爆发,此时并无任何来自联合国的明确授权。批评者们认为,伊战是不合法的。

本章将要讨论这些示威抗议及其后的战争中凸显出来的许多主题。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政治社会学当中一些十分重要但众说纷纭的概念,尤其是要考察权力这个概念。然后,我们要谈谈过去二十年间令人瞩目的民主的全球扩散,以及全球治理的问题。再往下,我们将重点讨论近几十年来英国政党政治中的一些关键变化,包括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工党的兴起。然后我们再从政党政治转向更宽泛意义上的政治,讨论一些社会运动,比如上面说到的反战示威背后的那些社会运动,并看看这些运动是如何受到全球化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影响的。在许多情况下,要求增进民主的压力与民族主义运动携手并进,以缔造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我们接着还要讨论民族主义。最后,我们将讨论今日政治社会学的重大主题之一:恐怖主义。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之辩

20.1.1 政治、政府与国家

许多人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也没什么意思,认为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威斯敏斯特、布鲁塞尔或华盛顿的那些中年男人们的

^① 原文如此,吉登斯似乎是把孟加拉当作一个城市来看。



2003年2月,上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

领地。如果这样来看,那么所谓政治,关注的就是借助什么样的手段,使用权力来影响政府活动的范围与内容。然而,政治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政治的领域很可能远远超出政府本身。我们在本章开头所介绍的反战运动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就像本书其他地方所讨论过的其他许多群体、网络和组织一样(比如环保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的组织)。

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政治领域中所发生的事态,即使是最狭义的政府活动,也都影响着我们的方方面面。政府对非常私人化的活动也有影响,在战争期间,甚至能够命令我们为了它们认为必要的目标而献出生命。政府/治理(government)的领域就是政治权力的领域。一切政治生活都是有关权力的:谁持有权力,他们如何实现权力,他们用权力来干什么。下文中我们还将更细致地看看权力这个概念。

一旦有一套政府治理的政治机器(类似议会或国会这样的机构,加上公务员)统治一块给定的领土,其权威受到法律制度和用武力执行其政策的能力的支撑,我们就可以说存在一个国家。所有现代社会都是民族国家。也就是说,它们是这样一些国家,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自视为某一单一民族(nation)的公民。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形成民族国家的时代各有不同(比方说早如1776年的美国,迟如1993年的捷克共和国)。它们的主要特点与类似第二章(“全球化与变迁世界”)所描述的那些非工业文明或曰传统文明的特征形成鲜明对照。这些特征如下:

- **主权(sovereignty)** 传统国家所统治的领土总是界限不清。中央政府所行使的控制程度相当微弱。所谓主权,就是指政府对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地域拥有权威,并且在这一地域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样的主权观念对于传统国家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意义。与此相反,所有民族国家都是主权国家。

- **公民权(citizenship)** 在传统国家中,

由国王或皇帝统治的大多数人对统治他们的人很少有意识或兴趣。他们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或影响力。一般说来,只有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或比较富裕的群体会对整个政治共同体有一种归属感。相反,在现代社会中,在某个政治体系的边界内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公民。他们具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视自己为整个民族的一部分。虽然有一些人是政治难民或“没有国籍”,但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是某个确定的国家政治秩序中的一员。

-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民族国家同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关。民族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系列的符号和信念,它使人们感知自己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因而,一个人对于作为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或俄罗斯人,或其他什么人,会感到有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正是这样的情感,推动着东帝汶人寻求独立。人们很可能总是对某种形式的社会群体,比如他们所在的家庭、村庄或宗教共同体,具有某种认同感。然而,民族主义只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而出现的。它主要表达了对一个具有明确主权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在本章末尾,我们将更加详细地探讨民族主义现象。

20.1.2 权力

权力的意义、性质和分配是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话题。社会学的创建者之一马克斯·韦伯(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简单介绍了他的著述),将权力大致界定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即使遭到参与行动的其他人的抵抗,也能通过命令行动来实现自己意志的机会”(Gerth and Mills 1948)。在韦伯看来,权力就是即使别人不想你这么做,你也能坚持自己的方式做下去。

许多社会学家追随了韦伯的思路,区分了强制性的(coercive)权力形式和具有权威的权力形式。比如说,质疑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人常常批评以美国主导的侵入,因为它并没有

得到联合国授予的明确权威,所以这些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是强制性地使用权力。绝大多数的权力形式并不只是基于强力,而是依据某种形式的权威而得到合法化。

韦伯在讨论权力时,把焦点放在区分不同的权威类型,或者说是“理念型”。在韦伯看来,权威有三种来源:传统的、克里斯玛的和法理的。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就是通过敬重长久确立的文化模式而得到合法化的权力。韦伯举出的例子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世袭家族统治。

与此相反,克里斯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往往会破坏传统。这种权威源于一位领袖的臣属者们对领袖所感到的忠诚献身之情,他们相信领袖拥有一些激发起忠诚献身的非凡特性。韦伯认为,“克里斯玛”是一种人格品质。耶稣基督和阿道夫·希特勒常常被作为拥有克里斯玛型权威的个人范例。不过,克里斯玛型权威也可能是以非常平常的方式实施,比如某些老师的权威也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克里斯玛性质。在韦伯看来,传统型权威的结构,不时地被克里斯玛的爆发打断,这就是过去绝大多数社会的特征。

韦伯提出,在现代世界,传统型权威逐渐被法理型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所取代。这是一种通过依法实施的规章条令而得到合法化的权力。它存在于现代组织和科层机构(参看第十六章的讨论),以及政府,韦伯把政府说成是指导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的正式组织(Gerth and Mills 1948)。

一 史蒂文·卢克斯:激进的替代

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替代性的权力观念(Lukes 1974)。卢克斯提出了权力的“三重维度观念”,这套阐述如今

已成经典。第一个维度在讨论权力时,看的是在可观察到的冲突中决定坚持贯彻自己行动的能力。比如说,如果政府改变了支持武装干涉伊拉克的立场,以回应2003年2月的反战示威,那就证明了示威者拥有权力。不过,卢克斯认为,权力概念要比这宽泛得多。

权力的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控制选择哪些论题做出决策的能力。卢克斯这么说的意思是:拥有权力的群体或个体在实施权力的时候,可以不是通过决策,而是通过限制其他人可以利用的替代选择。比如说,威权政府(例如亚洲国家新加坡,参看本节第三小节)实施自身权力的一种方式就是限制新闻可以报道的范围。这样一来,它们就常常可以将某些不满,比如国际上对于它们司法上使用肉刑的谴责,预先排除在政治过程中的话题之外。

但卢克斯提出,权力还有第三个维度,他称之为“欲望的操弄”(manipulation of desires)。他问道:“让另一个人或一些人拥有你希望他们拥有的欲望,也就是说,通过控制他们的思想和欲望来确保他们的遵从,这难道不是最高级的实施权力的方式吗?”(Lukes 1974)。不过他指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洗脑。我们的欲望也可以通过更为微妙的方式加以操弄。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会提出,资本家借助传媒以及其它社会化手段,塑造工人承担劳动者和大众消费者的角色的欲望,以此对其实施权力。

卢克斯区分了权力的不同维度,就能够提出比韦伯更为宽泛的权力界定。在他看来,“当甲方以某种有违于乙方利益的方式影响了乙方,就对乙方实施了权力。”(同上引)但这还是留下了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乙方的利益是什么?卢克斯承认,这归根结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他的权力概念已经深具影响,提醒社会学家注意到权力的实施所蕴含的多种维度。

二 福柯与权力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也提出了一种广泛流传的权力论述,与韦伯更为正式的界定相去甚远。福柯主张,权力并不集中于某一种制度/机构(institution),比如国家,或是由哪一群人占有。他认为,这些旧有的权力模式,包括卢克斯的权力模式,都依赖于固定的身份认同。占有权力的群体,其身份认同是很容易识别的,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统治阶级或(女性主义者眼中的)男性。而福柯则主张,权力的运作体现在社会互动的所有层面,渗透于所有的社会制度/机构,所有人都有份。

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介绍了福柯的思想;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二小节讨论了他有关组织中的权力的阐述。

在福柯看来,权力与知识密切维系,相互巩固。比如说,一名医生对于知识的宣称,如果在像医院这样的制度/机构背景里付诸实践,也就是对于权力的宣称。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知识的增长也就赋予了医生以权力,可以宣称对于患者具备权威。福柯描述了“话语”(discourse)的发展,话语提供了讨论权力和知识的方式,比如说,一个“福柯主义者”(Foucauldian,即支持福柯主张的人)就会讨论“医学话语”(参看第八章第二节第一小节)。

随着政治社会学逐渐摆脱简单直接的冲突理论(参看第一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解释,转而趋向以社会性别或性等方面的认同为基础的政治斗争形式,福柯的观念也就广为流行(Foucault 1967, 1978)。福柯的论述打破了(本小节)前文所

介绍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这两种权力形式的简单区分,因为权力被理解为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中,而不是由支配群体实施的某种东西。因此,福柯的权力观也扩展了有关政治范畴的概念。不过,批评福柯的人则认为,尽管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日常社会互动中的权力运作方式,但这个术语的概念语意含糊,低估了军事武装或社会阶级之类的结构中权力的集中程度。

现在,谈完了这些相互竞争的权力概念,我们在本章来集中讨论权力在正式政治中的实施方式。下一小节,我们将考察两种形式的政治体制,从讨论政治权力本身转向它们的实际运用。

20.1.3 威权制与民主制

纵观整个历史,社会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多种多样。甚至在21世纪伊始的今天,世界各地的国家也仍然根据不同的模式和配置来组织自己。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社会都声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也就是说它们属于民治,但政治统治的其他形式仍旧存在。我们在这一小节将简要描述政治体制的两种基本类型:民主制与威权制。

一 威权制

如果说我们在下面要考察的民主制是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事务,那么,在威权制国家,民众参与则受到否定或严格限制。在这些社会中,与普通公民的需要和利益相比,国家的需要与利益被放在优先的位置,而且没有建立任何法律机制,可以反对政府或者罢免领导人。

今天,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威权制政府,其中一些还自称是民主国家。2003年以前,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就是威权制国家的一个典型。在这个国家,持不同政见者会受到

压制,国家资源的分配偏向于特定的少数人的利益。在有些威权制国家公民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并且不参与政府事务。

亚洲国家新加坡经常被作为所谓“温和威权制”(soft authoritarianism)的一个典型。这是因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①虽然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通过干预社会几乎所有的方面,为该国公民提供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新加坡以其安定、文明秩序和对所有公民的社会包容而著称。新加坡的经济十分成功,街道整洁,人皆有业,贫困几乎闻所未闻。从物质角度上来说,生活的水准很高,对像在公共场所扔垃圾或抽烟这种细小违规,也要处以严厉罚金;对于传媒、互联网接入和装配卫星接收天线有严格的管制;警察的权力特别大,可以拘留被怀疑违法的公民,肉刑和死刑的司法处罚也很常见。但是,尽管存在着这种威权主义的控制,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却相当高,而且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社会不平等程度非常低。虽然新加坡可能缺少民主制的自由,但这个国家的威权风格不同于那些更加独裁的政权,这使得作家威廉·吉布森把这个岛国称为“保有死刑的迪斯尼乐园”。

二 民主制

民主制一词起源于希腊语“demokratia”,由“demos”(民众)和“kratos”(统治)两部分组成。因此,民主的基本含义是由民众而不是王室或贵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体制。这听起来简单明了,其实并非如此。什么是民主的统治?根据对这个概念的不同解释,民主统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民众”(the people)就被分别理解为所有男性、有产者、白人男性、受过教育的男性、成年男性与女性等内容。在某些社会,官方接受

的民主制只限于政治领域,而在其他社会,民主则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

在某一特定情境中所采取的民主制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价值观和目标如何理解,如何权衡其轻重缓急。民主制通常被看作是在所有政治体制中,最能够确保政治平等,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捍卫共同利益,满足公民需要,促进道德的自我发展,并做出顾及每个人利益的有效决策(Held 1996)。至于这些不同目标孰轻孰重,则可能会影响到民主制是否首先被视为一种公众权力(自我治理与自我调控)的形式,或者它是否可以被视为支持由其他人(比如一群选出的代表)做出决策的一种结构。

参与民主制

在参与民主制(或直接民主)中,决策是由受决策影响的那些人共同做出的。这是在古希腊实行的民主的原初类型。那些作为社会中的小部分的公民,定期聚会商议政策,并且做出重大的决策。在大部分人拥有政治权力的现代社会中,参与民主制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而且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的所有决策的制订也不大可能。

然而,参与民主制的一些方面在现代社会中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小社区仍然有一年一度的“市镇会议”的传统做法。在这些指定的日子里,全体城镇居民聚集在一起,就不属于国家或联邦政府管辖的地方事务进行商议并投票表决。参与民主制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人们就特定议题表达意见时所举行的公民投票。通过把议题简化到可以回答的一两个问题上,就有可能实现数量庞大的民众的直接咨商。在一些欧洲国家,会在全国定期举行公民投票,以此让民众广泛了解重要的决策。2005年,几个欧洲国家就是否签署加

^① 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尽管也有其他几个政党竞选议会席位,但自1959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始终在一切选举中占据绝对优势。

人拟议中的《欧盟宪法》(European Constitution)举行了公投。英国原本也同意举行投票,但2005年5月,草案在法国和荷兰遭到否决,使得条约毫无希望立即获得通过,也导致英国的公投计划被悬置一旁。它们也曾被用来决定民族主义高涨的族群地区内有争议的分​​离问题,如加拿大主要操法语的省份魁北克。

代议民主制

在实践上,除了少数情况(如特别公投),参与民主制很难在大范围内实施。当今更为普遍的是代议民主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影响一个团体的决策是由被选举出来的人而不是所有成员来做出。在国家政府的领域里,代议民主制采取了选举的形式选出代表大会、议会或类似的全国性机构。代议民主制也存在于其它需要做出集体决策的层面,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省或州、市、县、镇以及其他地区。许多大型组织采用代议民主制,选出一个小型的执行委员会来做出重大决策,以此管理其事务。

选民可以在两个或更多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并且大多数成年人拥有选举权,这样的国家通常被称为自由民主制国家。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属于这种类型。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例如印度,也拥有自由民主制的体制。我们将会看到,这类国家还在不断增多。

第二节 民主的全球扩散

未来的政治社会学家们如果回眸20世纪80和90年代,有一股历史发展趋势尤其显得突出,那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比如智利、玻利维亚和阿根廷,都经历了从威权主义军人统治,转向茁壮成长的民主制

度。与此类似,1989年以后,许多东欧国家,比如俄罗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都转为民主制。而在非洲,一批从前不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包括贝宁、加纳、莫桑比克和南非,也都开始热情欢迎民主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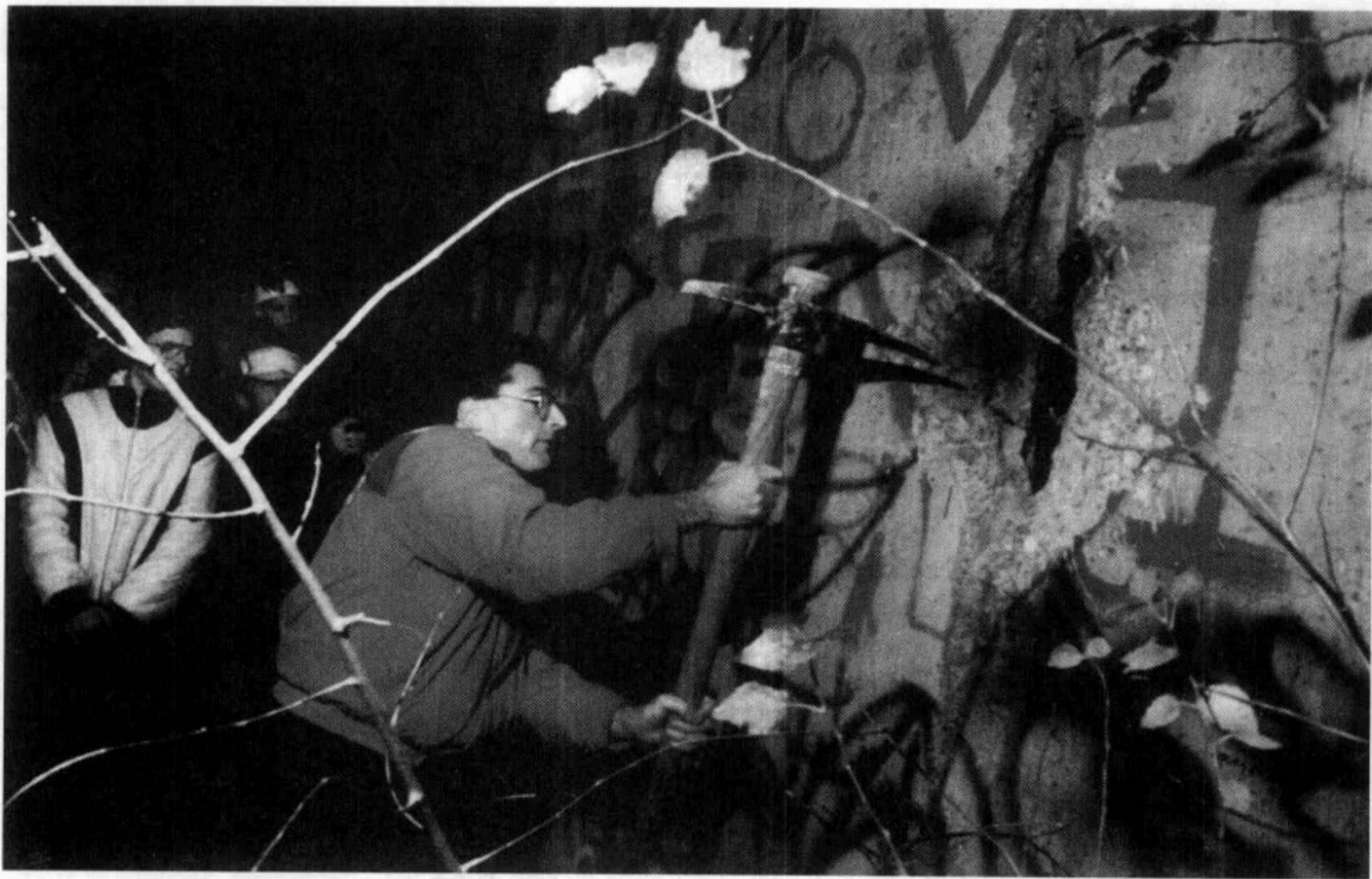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上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社会可以被视为威权社会。但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现在实际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社会仍属于威权社会。民主制不再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现在,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把民主制度,至少是民主制的原则,作为值得想望的政府形式。正如大卫·赫尔德已经指出的,“在当今时代,民主制已经成为衡量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Held 1996)。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自由民主制在全球的扩散,并且提出一些可能说明它何以广为流行的原因。然后,我们将谈谈在当代世界民主制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

20.2.1 共产运动的变革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有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取向的政治体制下。1883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百年间,似乎证实了他有关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革命在全球扩散的预测。

西方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从训练有素的学者,到普普通通的公民,都曾经相信社会主义体制防御坚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一种持续特征。但从1989年开始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也就是共产党政权在一连串“柔性革命”中接连瓦解,能够预测到这种局面的人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整个东欧,曾经看似牢固确立的统治体制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倾覆。从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到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在这些曾经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国家以加速度相继丢掉了权力。最后,苏联



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这一刻标志着两个德国的合并,自由民主制度传播之广,史无前例。

本身的共产党也失去了对于权力的控制。1991年,当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便成了一位“没有国家的总统”。

自苏联解体以来,民主化的进程依然在扩张。甚至在世界上某些最具威权性的国家也可以发现民主化的迹象。阿富汗在1979年被苏联军队入侵以后,就被苏联所控制。在伊斯兰圣战者(mujahidin,也就是穆斯林游击战士)的强硬抵抗之下,苏联的占领在十年之后宣告结束。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个国家陷入了圣战组织各派别的军阀混战之中。到了1996年,塔利班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并开始创建“纯正伊斯兰国家”。他们开始以极端严格的立场来解释伊斯兰教法,实施公开处

决和斩肢的刑罚,禁止女童上学,禁止妇女外出工作,严禁“轻浮”的娱乐。“9·11”事件之后,美国成功地领导了推翻塔利班的各方努力,把它和恐怖主义袭击联系在一起。2001年末,哈米德·卡尔扎伊被选为阿富汗过渡权力机构(Interim Authority)的主席,并于2002年6月成为总统,着手寻求对于新宪法的支持。2004年1月宪法获得通过,规定了一套强势的行政机构,为伊斯兰教赋予了一种比较温和的角色,并提供了人权的基本保护。2004年10月阿富汗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卡尔扎伊赢得五年总统任期。

这种趋向民主的总体趋势并非一锤定音。对于前苏联阵营的某些国家,比如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罗的海诸国^①,自由民主制

^① 波罗的海诸国(Baltic States)广义上可以指1992年成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的成员国,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德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俄罗斯和波兰。这里是狭义上所指的前三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民主制的胜利：历史的终结？

学者福山的名字几乎已经和“历史的终结”这个术语画上了等号。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这一观念已成经典之论，并且聚讼不已，其依据正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胜利。福山认为，历经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其他地区的多党制民主运动，早先的那种意识形态斗争已然属于往昔。所谓历史的终结，也是替代方案的终结。没有人能够继续捍卫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也已经成为过去。与马克思的预测相反，资本主义已经在它与社会主义的漫长争战中获胜，自由民主制现在已经天下无敌。福山断言，我们目前已经到达“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西方民主制作为人类政府/治理的最后形式，将一统天下”(Francis Fukuyama 1989)。

虽然福山的论点遭到了批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也点出了我们时代的一种关键现象。目前，还没有多少选民或大众运动能够想像出超越

市场与自由民主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然而，尽管目前情况似乎如此，但难道就因为可能替代自由民主制的其他方案已经被我们尝试殆尽，历史的发展就告一段落了吗？很有可能并非如此。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政治或文化秩序的新形式，又有谁能够具体陈说？正如中世纪的思想家无法想像伴随封建制的衰退会出现工业社会一样，我们目前也不能预测，在正在展开的这个世纪，世界将会如何变化。

问题：

1.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个术语说的是什么意思？
2. 福山认为我们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这种主张是否正确？
3.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苏东体制转型之后的时代，那么还有什么政治替代方案？

似乎已经站稳了脚跟。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前苏联的中亚诸加盟共和国^①、南斯拉夫，甚至包括俄罗斯，民主制则还比较脆弱。实际上，在历史的不同时点上，民主的政治制度都曾经表现得脆弱而易受攻击。比如伊朗公众对于强势掌权的毛拉(mullahs, 即宗教领袖)普遍不满，导致改革派的哈塔米在1997年赢得超过70%的选票而获选总统。一时间，似乎民主制已经开始进入伊朗。哈塔米认识到，即使对大众对于民主制的渴求不理不睬，这种渴求也将导致体制本身瓦解，作为这样一位领导人，他一直被比做戈尔巴乔夫。然而，随着宗教保守

分子重新把持了议会，哈塔米只能成功地推行有限改革。2005年6月，保守派中的内贾德当选总统，使得进一步推进民主改革的前景变得十分黯淡。伊朗最近的历史表明，我们不应该假定民主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然而，民主化确实与更大的全球化力量维系在一起，这使人们有理由对民主制的未来抱持乐观态度。

有关塔利班、恐怖主义及其给民主制度所带来的风险，详参本章第六节。

^① 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

20.2.2 民主何以广受欢迎

为什么民主变得如此广受欢迎?人们经常引用的一种说明是,其他的政治统治类型经过尝试基本都宣告失败,也就是说,民主制已经表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相比于威权制,民主制显然是一种更好的政治组织形式,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晚近的几波民主化浪潮。要充分说明这些发展,就需要详细分析每一个国家中导致转向民主制的那些社会政治情势。不过,基本可以肯定,全球化过程在这种趋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全球化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跨国文化接触,激励了许多国家中的民主运动。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展,全球化的传媒向许多非民主国家的居民展示了民主的理念,增加了政治精英要求举行选举的内部压力(参看下文有关民主化与互联网的图文框)^①。当然,这种压力并不会随着大众主权的观念扩散而自动产生。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全球化,有关民主革命的新闻和引发民主革命的动员过程的报道会在区域层面上迅速传播。比如说,1989年,有关波兰革命的新闻报道很快就传向匈牙利,为那

里的民主派活跃分子提供了适合本地区的有用模式,以指引自己的工作。

其次,联合国和欧盟之类的国际组织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给那些非民主的国家施加了外部压力,要求趋向民主。(欧盟的情况在下文的图文框中会有简要介绍)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组织有能力使用贸易禁运,为经济发展和稳定提供附加条件的贷款,以及各式各样的外交运作,以推动威权政体的解体。

再次,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促进了民主化的进程。尽管一些跨国企业与独裁者大做交易,为此臭名昭著,但一般来说,企业还是更愿意在民主国家里做生意,这并不是因为对于政治自由和平等有什么内在固有的哲学偏好,而是因为民主政体往往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加稳定,而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正是利润最大化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军事精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的这些精英,常常渴望扩大国际贸易的规模,招徕跨国企业来其国家做生意。因此,他们有时会制定自己的某种民主行动规程,导致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Moore 1966)曾经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革命”。

当然,如果说全球化是最近这次民主化浪

全球化与日常生活:互联网与民主化

互联网是一种强有力的民主化力量。它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边界,推动了观念的全球传播,并且使人们能够在网络空间上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世界各国都有越来越多的人经常上网,视之为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环。不过,互联网的强劲扩散却被政府,尤其是那些威权政府,视为威胁,认识到网上的活动有可能颠覆国家权威。尽管在绝大多数国家里,互联网多

少还是被允许自由存在的,但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约束公民对于互联网的使用。

问题:

1. 互联网作为一种民主化力量,与旧有的技术形势有何不同?
2. 如果说互联网正在推动全球民主的扩散,那么它是否也在推动全球文化的扩散?

^① 后括号为原文所无,根据句意添加。

潮的唯一原因的话,那么当今之世,所有国家都该是民主制的了。这使得有些社会学家主张,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趋向民主制。

20.2.3 民主面临困境?

随着民主制日益普及,我们或许希望它的实际运作也能够大获成功。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几乎在所有地方,民主制都处于某种困境。即使在民主制的主要起源国,它似乎也陷入了困境,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参加欧洲选举、全国大选和地方选举的人数都有显著下降(参看表20.1)。

有学者提出,投票率的下降表明,西方世

界的民众似乎对那些掌权者已经失去了信任。学界和政界都有一些人士在谈论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某种“信任危机”。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 Neill2002)如此概括这一观点:

不抱信任,满怀疑虑,这样的情绪已经扩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被认为还很有根据。据说,公民们不再信任政府、政客、部长、警察、法院直至监狱。据说,消费者不再信任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也不再信任它们的产品。据说,我们中没有人再信任银行、保险人、养老金提供方。据说,病人不再信任医生……特别是不再信任医院或医疗顾问。简言之,“信任的丧失”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陈词滥调。

表 20.1 英国大选:选民数与投票率, 1945年至2005年

年份	投票率 (%) ^a
1945	72.8
1950	83.9
1951	82.6
1955	76.8
1959	78.7
1964	77.1
1966	75.8
1970	72.0
1974年2月	78.8
1974年10月	72.8
1979	76.0
1983	72.7
1987	75.3
1992	77.7
1997	71.5
2001	59.4
2005	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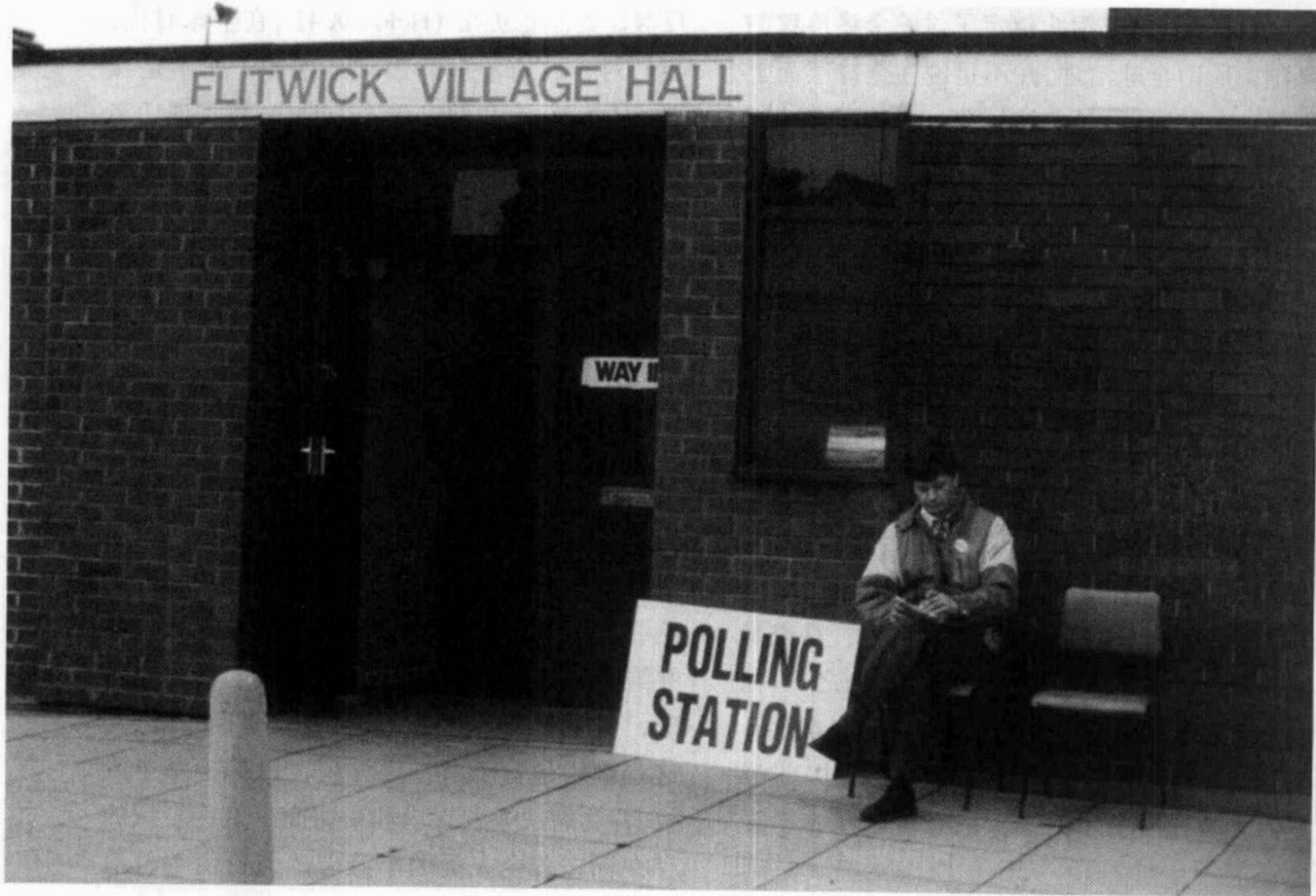
a: 总有效票数占选民总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 <<http://www.electoral-reform.org.uk/publications/statistics/turnouts.htm>>, 2005年6月30日

已有证据似乎也证实了信任的丧失,至少对于政党政治的态度是如此。以英国为例,在大选年做了许多调查,问投票人是否信任政府会“随时随刻或在绝大部分时候”,将全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s)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回答不会信任政府的人数从1987年的47%,下降到1992年的33%,到2001年更降至28%(转引自Skidmore and Harkin 2003)。

有些人指出,诸如此类的趋势也已表明,民众对于传统的权威形式越来越抱持疑虑。与此相关的是,民族国家中的政治价值观已经从“稀缺时代价值观”(scarcity values)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post-materialist values, Inglehart 1997)。这就意味着,一旦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水准,选民们就开始不怎么关注经济话题,而是更多地关注(相对于集体的)个人生活方式的质量,比如要求工作得有意义。其结果,选民们对于全国性政治一般都不怎么感兴趣,除非有关议题涉及个人自由权利。

最近几十年,在几个西方国家,福利国家制度一直遭到攻击。经过长期奋战得来的种种



选民越来越冷漠该如何说明?

权利和福利已经受到诸多非议,屡遭削减。右翼政党,比如英国的保守党或美国的共和党,已经尝试在各自国家削减福利开支的规模。这种政府收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可供政府调配的岁入减少。然而,怀疑主义的情绪也似乎日益增长,不仅是某些政府,而且是这些国家的许多公民,都怀疑依赖国家提供许多必需品和服务是否富有效力。这种怀疑态度的依据就在于相信,福利国家属于官僚作派,令人疏远,缺乏效率,各类福利补助的后果可能适得其反,破坏了它们原本旨在实现的目标。

20.2.4 全球治理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国家政府已经变得太小,无法应对大问题,比如全球经济竞争的影响或世界环境的破坏等。与此

同时,这些政府又变得太大,无法应对那些影响特定城市或地区的小问题(Bell 1997)。例如,政府没有多少权力干预作为全球经济主要行动者的巨型工商企业。一家英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更加有效地跟其他企业竞争,就可能会决定关闭它在英国的制造工厂,把生产转移到马来西亚。吸尘器制造商道伊森(Dyson)在2002年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例。结果便是英国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可能希望政府出面干预,但是国家政府并没有能力控制与世界经济密切维系的这些过程。政府所能做的仅限于比如提供失业补贴或再就业培训,以尽可能减缓冲击。

全球化也创造出诸多新的风险,比如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污染、恐怖主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扩散。这些议题都不能由民族国家单独应对,因此才会创建各种国际政府组织,比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来协力共

担全球风险。这些组织奠定了讨论全球治理的基础。所谓全球治理,并不是说在全球层面上创建一个政府,而是关注打造一套处理全球问题所需的规则框架,以及确保这套规则框架的各种机构(既包括国际组织,也包括各国政府)。然而,许多负责处理这类问题的全球性组织缺乏民主的问责渠道。比如说,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十五个成员国,其中五个是常任理事国,即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和俄罗斯,也就是全世界最为强大的几个国家。任何决议案要想在安理会获得通过,需要获得九票,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全体同意。在2003年的时候,联合国并没有明确支持允许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决议,因为法国威胁要行使否决权。这也是批评战争的许多人所举出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谴责这场战争属于非法滥权,我们在本章开头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在这种辩论中,世界上大多数比较穷困的国家的意见则基本上无足轻重。

我们在第十六章中讨论了国际政府组织的兴起。

那么,在这个国家层面上的民主治理似乎不足以处理这类发展中的事件的时代,民主制的命运又会怎样?一些观察家指出,政府其实并不能做多少事情,政府不能指望控制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迅猛变革,最审慎的行动方案就是减少政府的作用,让市场力量来引导方向。

英国社会学家赫尔德对这一观点提出了

反驳。赫尔德提出(Held 2004),在全球时代,我们对于政府治理的需求是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然而,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要实现切实有效的治理性,就需要不仅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而且在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和民族国家内部的层面上,全面深化民主制。赫尔德主张,需要建立一种全球社会民主制(global social democracy),^①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挑战。这就涉及使全球性组织更具问责能力,类似于在各国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能够对其选民负责。赫尔德认为,全球社会民主制的基础已经具备。国际刑事法院^②已经设立,以便对那些为最恶劣的全球性犯罪(例如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负责的人提出起诉并绳之以法。它和联合国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说后者尚需进一步提高民主问责能力。这些机构孕育了某种世界观,以保护基本人权,并为解决争议谋求和平协商。这些组织的存在标志着全人类的平等尊严与价值等价值观念不可撼动。

在赫尔德看来,通过多层面的治理,即许多组织在地方、国家和全球等不同层面上协同运作,将能够实现全球社会民主制。尽管国家曾经通过其领导人物和外交部长,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动者,但现在的主要行动者还包括行政机构、法庭和立法机构。比如说,可以想想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国际政治中有多么关键。赫尔德还提出,乐施会^③(Oxfam)和大赦国际之类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新兴社会运动,也能在打造全球社会民主制的过程中扮演

① 原文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中并无此词条。

② 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于2002年7月正式成立的,将对批准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案件进行审理,但只审理成立日以后发生的案件。与现有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它是一个永久性国际司法机构。设有18位法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必须来自不同国家。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但是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介入。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

③ 乐施会(Oxfam):即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1942年在牛津创立,宗旨是为世界上陷于贫穷或遭受灾害侵袭的社区提供救济及援助其发展。

欧盟

欧盟的历史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想出了欧洲一体化(European integration)的观念,认为这能预防诸如此类的破坏再度发生。英国的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提出了“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呼吁。而趋向欧洲统一体的最初的实际措施,则是由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在1950年5月9日的一次演讲中提出来的。这个日子也就是今日所知的欧盟(European Union, EU)的“生日”,作为“欧洲日”而每年庆祝。

一开始,欧盟^①仅仅包括六个国家,即比利时、德国^②、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于1973年加入。希腊于1981年加入。西班牙与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而奥地利、芬兰与瑞典则于1995年才加入。2004年,迄今最大的一次扩盟发生,十个新成员国同时加入,它们主要来自东欧。^③未来几年内,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预期也将加入欧盟。而与土耳其之间的入盟谈判也已经启动。^④

早年间,欧盟各国之间的协作大都限于贸易和经济,但现在欧盟也处理许多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而重要关系的问题。欧盟各机构的事务领域广泛多样,从公民权利、安全保障、就业机会、地区发展一直到环境保护。欧盟各成员国都采取民主制,并且必须共同致力于和平与繁荣。

有些人,特别是英国民众,担心加入欧盟会

损害现存各国的国家主权,也就是自我治理的独立地位和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认为,欧盟无非就是另一个国际实体,类似于联合国或世贸组织。

支持欧盟的人士则指出,上面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准确的。他们主张,欧盟是这样一种组织,其成员国设立了一些共同机构,并将自身的某些权力授予这些机构,以便在欧洲的层面上,以民主的方式,就利益共同相关的一些特定议题做出决策。欧盟的所有决策和程序都建立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基础上,欧盟各国都签署了条约,这种主权部分共享(pooling)也称为“欧洲一体化”。

目前欧盟有五大机构,每一个都扮演着专门的角色:

-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 由成员国民众选举产生);
- 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代表各成员国的政府);
-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常设执行机构);
- 欧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确保遵从法令条约);
- 欧洲审计院(Court of Auditors, 保障欧盟预算的审慎、合法管理)。

另有五大重要机构作为辅翼:

① 准确地说,1957—1958年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1967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组成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 EC)。1991年12月签订《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起该条约生效,欧共体发展成为欧盟。

② 这里其实仅指西德。东德作为统一德国的一部分于1990年加入。

③ 塞浦路斯、马耳他为地中海岛国,其余8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皆来自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中东欧。

④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于2007年元旦加入欧盟。与土耳其类似的还有克罗地亚。

- 欧洲经社委员会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表达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对于经济社会方面问题的意见);
- 欧洲地区委员会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表达各地区和地方当局的意见);
- 欧洲中央银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负责货币政策和管理欧元);
- 欧洲监察使 (European Ombudsman, 处理公民有关任何欧盟机构或实体之不当举措的申诉);
- 欧洲投资银行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通过自主投资项目来协助实现欧盟各项目标)。

再加上一批机构及其他实体, 将这一体系打造完善。

欧盟的成长让欧洲领导人们有机会全面更新该组织的基本文件。2002年, 在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主持下, 开始启动立宪会议。会议所提出的欧盟宪法, 或称“制宪条约”, 将各式各样的条约汇聚成一部单一文件, 并要求各成员国在许多事务尤其是防卫和移民问题上更加密切地合作, 接受一位欧盟总统的统一领导。但在2005年, 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投相继否决了这部宪法 (参看本章第一节第三

小节), 似乎已经使那些支持欧洲更加政治一体化的人的希望在目前暂告终结。

支持欧盟的人认为, 它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稳定、和平与繁荣。它已经推动了生活水准的提高, 打造了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 启动了单一的欧洲货币, 即欧元, 并增强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发言地位。欧盟培育了欧洲各族民众之间的协作, 促进了一体性, 同时也维护了多样性, 并确保各项决策尽可能地贴近公民。在21世纪这个愈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 甚至更加需要每一位欧洲公民都能够秉持求新 (curiosity)、宽容与团结的精神, 和来自其他国家的民众相互协作。

资料来源:《略谈欧盟》, *The Economist*
(2005年6月3日、23日)

问题:

- 1 欧盟是否比民族国家更适于应对全球时代的政治?
- 2 欧盟是否像某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 存在“民主欠缺”?
- 3 欧盟的成员资格是否对民族认同构成挑战?
- 4 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资格对英国是否有利?

重要角色。下面, 我们将从全球性问题转到英国的政党政治, 考察近几十年来英国政治中的一些主要变化。

第三节 英国的政党政治

在过去的30年间, 英国的选举政治发生了显著变化。工党与保守党都愈益面临成员下降、资源减少以及投票支持者流失的压力。1997年, 工党成

功地进行了改革, 重新上台执政, 并于2001年和2005年两次在大选中获胜。而保守党则继续面临成员数屡创新低以及支持者老龄化的问题。

要想理解过去30年间各大党的经历, 有几个因素非常重要。第一个因素是结构性的: 经济活动中属于传统蓝领职业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毫无疑问, 这侵蚀了支持工党的一些传统资源, 比如工人阶级的社群和工会。

第二个因素是20世纪80年代初工党内部发生分裂, 成立了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1988年,社会民主党又与自由党(Liberal Party)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在最近几次大选中,英国的“第三党”已经获得了可观的支持,从两大党那里拉走了不少选票。在战后大部分时期,自由党在议会里的席位寥寥无几(最少时仅有6席,1983年达到顶峰时也不过23席)。但在1997年以后,这个数字已有上升。2005年的大选中,自由民主党在下议院赢得了(总数646席中的)62席,并在全民投票中赢得超过21%的票数。

第三个因素是从1979年到1990年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位的影响。由撒切尔夫人及其内阁推行的强有力的改革方案表明,保守党早先秉承的托利党哲学(Tory Philosophy)发生了重大转变。“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非常强调限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坚信市场是个人自由和经济成长的基础。国家从经济中撤出的一种方式,就是对公开招股公司实行私有化,其中有许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国有化的。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英国煤气(British Gas)、英国钢铁(British Steel)、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和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的股份出售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据称,这种私有化有几个方面的好处。它可以重新引入健康的经济竞争,以替代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的公共科层体制,减少公共开支,并且在管理决策时杜绝政治干预。由撒切尔夫人开始的私有化政策已经形成了持久的影响力。起初工党强烈反对这些政策,但后来也放弃了敌对立场,开始接受这一趋势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在1987年选举中获得决定性胜利后,撒切尔夫人在全体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开始急剧下降。究其主要因素,一是对“人头税”[官方称为社区费(Community Charge),不是

根据收入或财产而是“按照人头”缴纳的一个税种]普遍不满,一是经济陷入衰退。1990年,约翰·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成为首相,而在1997年大选中,保守党被工党彻底击败,梅杰也宣布辞职。在梅杰的领导下,保守党继续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即便这类计划在选民当中并不怎么受欢迎。比如说,英国铁路被私人投标瓜分并购买,但当时的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并不支持该方案。

理解过去30年大党经历的第四个因素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工党”的出现。新工党标志着英国政治的一条颇具新意的途径。我们下面就来谈谈这一点。

新工党

工党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撒切尔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回应全球经济竞争加剧等更为广泛的全球性事件,开始转变其意识形态立场。这个过程是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启动的。工党在1992年的大选中失利后,金诺克引咎辞职。此后,在约翰·史密斯的领导下,工党继续其改革进程,直到史密斯英年早逝。托尼·布莱尔在1994年成为该党领导人,并立即实行进一步的内部广泛改革。布莱尔把经过改革的工党命名为新工党,并在党内进行了一场成功的运动,废除了“第四条款”,而党章中的这一款正是承诺推行工业的广泛国有化。

就这样,工党正式承认撒切尔夫人曾下定决心要提高的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同时,新工党也发生了一些与西欧其他大多数社会党相似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便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工党的观点一直同共产主义理论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企业的国有化程度要比工党曾经设想的大得多。现代经济可以通过国家直接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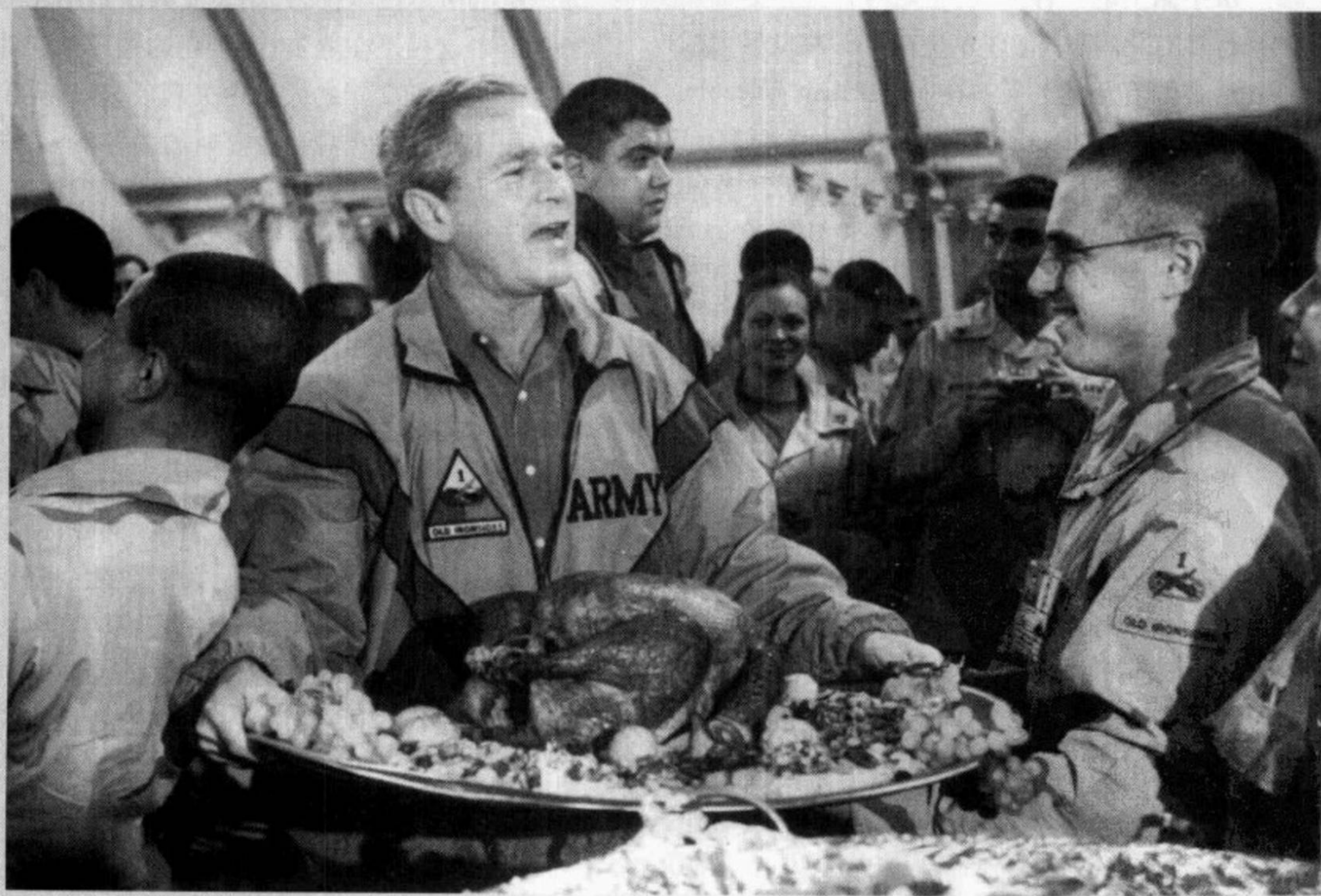
伊拉克战争的来龙去脉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遭受了联合国施加的制裁和武器核查。但萨达姆·侯赛因在1998年11月拒绝了联合国核查人员,导致了美英两国武力对于伊拉克的四天轰炸。联军此前已经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的“禁飞区”巡逻飞行,以阻止对于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族群的攻击,此时又开始持续进行比较克制的空袭,以遏止伊拉克的防空炮火。

制裁最终未能撼动萨达姆的位置,他的强劲韧性使西方世界一筹莫展。但陷入灾难性后果的却是伊拉克的普通民众,即使在1996年以石油换食品的妥协方案出台之后依然如此(而在2001年9月11日对于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之后,他们的处境就愈发悲惨了)。美英两国试

图对伊拉克实施“灵巧制裁”(smart sanctions),但这些努力都归于失败。2002年5月,联合国稍稍放松了对于伊拉克的制裁。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对于萨达姆的想法。(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他于2001年初入主白宫)……力图迫使萨达姆下台,他并郑重宣告,即使联合国不欲出手,他也要有所行动。经过反复的外交辩论,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措辞强硬的决议,要求萨达姆允许进行不带附加条件的武器核查。萨达姆接受了决议,2002年11月,核查员开始工作。但美英两国的结论是:萨达姆正在藐视安理会(尽管战争结束后,发现他根本没有积极的非法武器计划),并不顾法国等国的反对,于2003年3月20日开战。三个半星期之



小布什与驻伊美军共度2004年的感恩节。

后,联军获胜,布什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遥遥无期而耗资巨大的重建工作。

联军在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开始致力于重建伊拉克的秩序……原本指望逮捕了萨达姆,又了结了他两个儿子的性命,就会使局势平定下来,但事实证明,这种希望并无根据。美军的虐囚证据曝光,使许多人疑惑他们的驻扎是否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在制造问题。但伊拉克部队又还不能肩负起保境安民的重担。

2004年6月,伊拉克主权的控制权从临时管理委员会(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转交伊亚德·阿拉维领导的过渡政府。过渡政府尽管能够仰仗外国军事力量和财政援助,但要改善伊拉克的安全状况,却是煞费苦劲。伊拉克在2005年1月举行了大选,规模庞大,大体和平,向着打造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民主政体迈出了一步。新政府将由作为多数派的什叶派主导,只是要想立法顺畅,还需要与库尔德族人乃至作为少数派的逊尼派合作共事。会有一年的时间来起草一部宪法,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把整个国

家维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国家的基础设施正在得到修复和改善,将该国半死不活的国营产业私有化的各项计划也已经逐步展开。但是,在暴力活动有所缓和,法律框架安定就位之前,私人投资者不太可能贸然解囊。除非伊拉克的借贷责任问题得到明确解答,否则国际贷方就会按兵不动。

资料来源: *The Economist*

(2004年10月18日,2005年3月10日)

问题:

- 1 西方世界应当以什么样的政策对待伊拉克这样的国家?
- 2 抢先攻击伊拉克的行为是否有正当理据(justifiable)?
- 3 伊拉克的战争是加剧还是减少了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 4 能否通过传统战争的形式与恐怖主义作战?

来进行“管理”,这曾是共产主义理论和“旧工党”式的社会主义都推崇的重要观念。

1997年的大选使新工党上台执政,是20世纪英国选情变易最大的选举之一。10.3%的人从保守党转向工党,结束了保守党长达18年的统治。工党获得了419个议会席位(而保守党仅为165席),超过其他各政党席位总数达179席,多数优势前所未有的。保守党在英国全民投票中的选票份额(30.7%)则是1832年以来最低的。它表明,保守党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还相当稳定的支持率开始大幅下跌。例如,1992年,保守党还获得了41.9%的选票。2001年和2005年的两次大选中,工党继续胜选,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保守党的失败,工党

将其选票份额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2001年的大选中,工党以超出其他政党席位总和166席的优势再一次获得压倒性胜利。相比于1997年的大选,最显著的差异或许就是投票率的降低,仅有59.4%的合格选民实际投票(Young 2001;亦参图20.1)。布莱尔立即承诺,继续执行新工党从1997年开始的重振公用事业的方案。尽管布莱尔希望将焦点放在英国的投资上,但在2001年议会开会期间,辩论却大多围绕着支持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这个引起广泛争论的决策上,而布莱尔和这项决策显然脱不开干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围绕侵入的理据问题所展开的辩论,使得布莱尔和新工党的声望在这段时期趋于下降。

“您对布莱尔先生作为反对方领袖/首相的表现是否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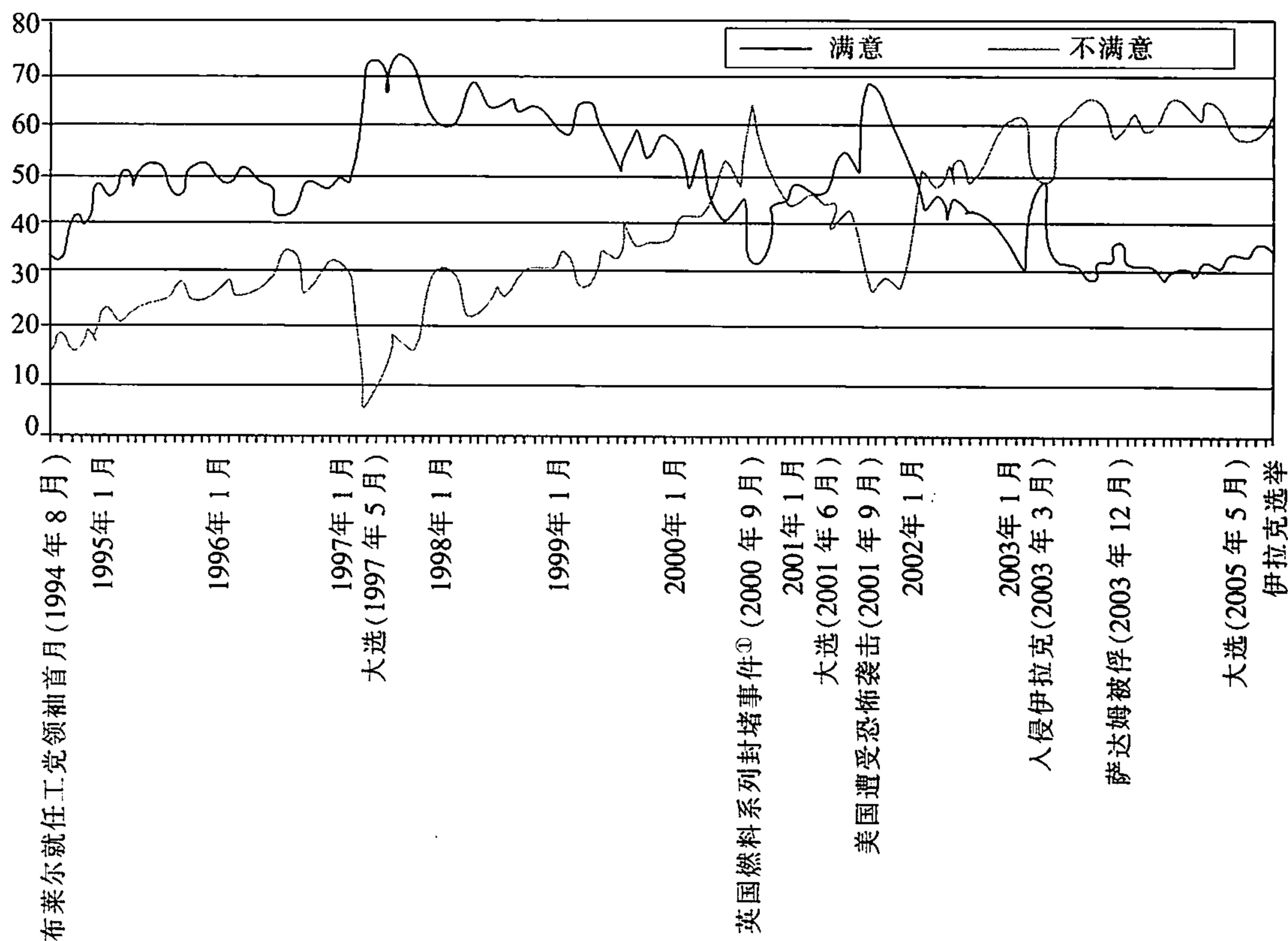


图 20.1 1994 年至 2004 年重大事件与对托尼·布莱尔满意率的关联
资料来源: MORI Political Monitor: Satisfaction Ratings, 1979—2005

有关伊拉克战争，详参上一个图文框。有关 2001 年对于美国的攻击，参见本章第六节第一、二小节。

在 2005 年 5 月的大选中，工党第三次上台执政，但这一次仅比其他各政党席位总数多了 65 席。投票率保持低迷，仅为 61.5%。有迹象表明，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倾向使工党丧失了许多席位。该党的投票支持份额主要所在的选区，穆斯林人口的比例颇高，而这个群体又特

别反战。这些票数往往转向自由民主党，它与两大党截然不同，明确反对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贝瑟纳尔·格林和鲍选区^②，前工党议员乔治·加洛维使工党的影响大为削弱，以其反战立场，为创党伊始的尊重党 (Respect Party) 赢得一个席位。保守党仅仅赢得了英国全部选票中的 32.3%，离他们在台上执政时曾经赢得的票数相去甚远。选举落定，保守党领袖迈克尔·霍华德即于 2005 年 12 月宣布辞职，由大卫·卡梅隆接任（这是该党短短八年内的第四

① 2000 年 9 月，欧洲多国因为燃油价格迅速上涨等因素，导致各地民众封堵交通要道（如英法海底隧道）、炼油厂、加油站等以示抗议。

② “Bethnal Green and Bow”，众议院选区名，位于伦敦东区。

任领袖)。在学生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十个选区当中,工党在九个选区里落败,反映出许多学生对于学费政策(参看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四小节)的抗拒。而自由民主党在这十个选区中都大有斩获(Mellows-Facer et al. 2005)。不过,布莱尔因为赢得了第三次大选,追平了撒切尔夫人的三次胜选,已经是工党史无前例的成就。布莱尔并且已经承诺,他的第三任期将是做为首相的最后一任。

一些评论家,包括笔者在内,把新工党的政策纲领归入某种“第三条道路”(Giddens 1998)。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支撑第三条道路的一些核心观念。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

新工党在上台执政之后,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政治改革与现代化进程。政府一方面维护了社会正义与团结的价值观,同时力图与全球新秩序的现实接轨。它认识到,在新时代的诸般挑战之下,旧的政治观已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众多政府一样,新工党希望超越左派与右派的传统政治范畴,并采取中间偏左的新政治风格。因为这种思路试图避免通常的政治分界,所以它经常被称作第三条道路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有六个主要维度:

- 1 政府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要想适应迅速变迁的世界的需要,就得打造一个积极主动的政府。然而政府不应只是让人想到自上而下的科层机构以及全国性政策。活力灵动的行政与管理就像有时在工商领域中的表现那样,可以与政府携手捍卫和重振公共领域。
- 2 公民社会的培养 (the cultivating of civil society)
单凭政府与市场,尚不足以应对晚期现代社会出现的众多挑战。必须加强国家与市场之外的领域,也就是公民社会,并

且让它与政府和工商业相贯通。在解决从犯罪到教育等社区问题方面,志愿团体、家庭和公民团体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 3 经济的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y)
第三条道路构想了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其特点就是兼顾政府调控与政府放权。它反对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放权乃是确保自由与发展的不二法门。
- 4 福利国家的改革 (reform of the welfare state)
诚然,通过提供有效的福利服务来保护弱势群体是至关重要的。但为了提高效率,也必须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希望建立一个“关怀社会”(society of care),但也承认,旧的福利形式常常不能很好地减少不平等,对于穷人只是控制、约束,而不是培力、增权。
- 5 生态的现代化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拒绝接受所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相契合的观点。奉行环境保护的路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经济发展。
- 6 全球体系的改革 (reform of the global system)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注意到了全球治理的新形式。跨国团体可能会使民主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而且能够使人们更有可能改善对于变化莫测的国际经济的治理。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是在双重政治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前文已经指出,1989年的一系列巨变固然使世人认识到,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富有生机活力的经济组织思路,但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保守派所倡导的那种不受约束地热忱追捧自由市场的路线,却也有很多缺陷。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所采纳的第三条道路政治的现代化议程,是对全球化的各种力量所做出的一种创造性反应,试图借此让社会民主制重焕生机。它还致力于驾驭支撑这些转型的能量,以重振政府和民主制的运作。

支持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人指出,它现在已经超越了最初孕育出它的那种双重政治危机。在许多支持者看来,对于美国的布什总统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行动议程,这种政治充当了主要的挑战,对于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这种政治则是成功应对的唯一道路。

不过,在政治上寻求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也已经遭到广泛的批评。许多保守党成员认为新政治内容相当空洞,与其说是一套货真价实的政治方案,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姿态。另一方面,更具传统左派立场的有些人则认为,第三条道路对解决不平等和无保障等问题几乎无所作为。他们认为,“旧工党”仍要比新的派别好。(有关第三条道路的阐述,参见 Giddens 1998, 2001, 2002)

第四节 政治变迁与社会变迁

上文的讨论显示,政治生活的运作绝不仅限于常规框架,即立法机构与政府机构中的政党、选举以及代表。各类群体往往会发现,自己的目标或理念不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实现,或者受到这个框架的积极阻碍。尽管有上述的民主制的扩散,但是威权政制仍旧延续,提醒我们注意,要想在既存的政治结构中引发变迁,并不总有这种可能性。有些时候,只有诉诸非常规的政治行动形式,才能实现政治与社会变迁。

最具有戏剧性、影响最为深远的非常规政治行动的例子就是革命,也就是通过大众运动,使用暴力,来推翻既存的政治秩序。革命是这样一些事件:紧张激烈,令人激动,吸引人心。自然,它们会引起相当大的关注。然而,革命尽管高潮骤起,剧情跌宕,却只是偶尔发生。最常见的非常规政治活动的类型还得借助社会运动,也就是通过在既存制度/机构(institution)领域外的行动,以推动某种共同利益或

确保某个共同目标而付出的集体努力。在现代社会中,除了那些导向革命的社会运动,还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运动,有的经久不衰,有的短暂即逝。它们与其时常反对的那些正式科层组织一样,都是当今世界的鲜明特色。许多当代社会运动都具有国际性,并十分借重于使用信息技术,将地方运动者与全球问题联系在一起。

20.4.1 全球化与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千差万别。有些非常小,成员不到几十名;另有一些的成员可能数以千计,甚至数以百万计。有的社会运动是在它们所在社会的法律框架内开展活动的,另有一些社会运动则是作为非法群体或地下群体开展活动。然而,抗议运动的特点就是,它们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在政府法律许可的边缘进行活动。

社会运动的兴起宗旨,常常是就某一个公共议题推动变迁,例如扩大人口中某一部分的公民权。为了回应社会运动,有时候也会出现对抗运动(countermovements),以捍卫现状。例如,女性堕胎权运动就受到主张堕胎违法的反堕胎运动者(“支持生命权者”)的强烈反对。

法律或政策常常因为社会运动的行动结果而发生改变。法律上的这些变化可能产生深远的效果。例如对于工人群体来说,号召他们的同伴罢工曾经被认为是非法的,并且在不同国家,罢工受处罚的程度也是轻重不一。然而,法律最终被修正,使罢工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一种被允许的战术。

社会运动是集体行动最强有力的形式。如果组织有序,持之以恒,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效果。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就通过重要的立法议案,成功使得学校与公共场所中的种族隔离成为非法行为。女权运动在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方面已经为女性赢得了重要的利益。近些年



近些年来,有些社会运动引起广泛瞩目,比如1999年西雅图爆发的这次针对世贸组织的抗议。^①

来,环保运动人士已经迫使政府和企业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比如布伦特石油采集装置等(Brent Spar oil installation,参看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第四小节图文框的简介)。

新兴社会运动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国迅猛发展。这些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女权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的反核运动和生态运动,再到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的同性恋权利运动,都常常被评论者称为新兴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 NSMs)。这种描述力图把当代社会运动与先于它们几十年的那些社会运动区分开来。许多观察者认为,新兴社会运动是晚期现代社会的独特产物,在方法、动机以及取

向上大大不同于以前的集体行动形式。

近些年来新兴社会运动的崛起,反映了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变动不居的风险。随着传统政治制度/机构越来越不能应对所面临的挑战,社会运动的条件也趋于成熟。传统政治制度/机构发现,它们不可能创造性地应对自然环境的负面风险,比如来自核能,矿物燃料的燃烧,或是生物技术或纳米技术领域的实验。这些新的问题是现存的民主政治制度/机构所不能指望解决的。其结果,这些挑战经常被忽视或回避,直到延误时机,危机积重。

这些新型挑战与风险的效应日积月累,使人们感觉置身迅猛变迁,对于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个人感到缺乏保障,并且更加孤立,两相激荡之下,无力感油然而生。相比之下,企业、政府和传媒似乎主导了人们生活越来越多

^① 图中标语上书:“抵制世贸;让自由化全球化,而不是企业权力全球化”。

的方面,强化了世界失控的意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依其自身逻辑发展下去,将会给公民们的生活带来愈益加剧的危害。

参看第二十二章第三节第三小节
至第四节有关全球化与风险的讨论。

我们可以从“民主的悖论”(paradox of democracy)的角度来思考新社会运动。当对于传统政治的信任似乎正在减弱的时候,新兴社会运动的成长就证明,晚期现代社会的公民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对于政治态度冷漠或不感兴趣。相反,有一种立场坚信,直接的行动和参与要比依赖政客和政治体系更为有效。人们越来越把社会运动当作是凸显复杂的道德问题,并将其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有鉴于此,在许多国家,新兴社会运动正在促进民主重焕生机。它处于强大的公民文化或公民社会的中心,也就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领域,由家庭、社区团体以及其他非经济机构组成。

20.4.2 技术与社会运动

近些年来,晚期现代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两种因素,即信息技术与社会运动,两相结合,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遍布全球的社会运动能够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地区性和国际性网络。这个网络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与人道主义群体、人权团体、消费者保护倡导者、环保积极分子,以及其他推行公共利益的人士。现在,一旦事件发生,这些电子网络具备空前的能力做出即时反应,接触并共享信息资源,以及作为运动策略的一部分,对企业、政府以及国际机构施加压力。例如,在2003年2月,全球各地多座城市爆发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抗议浪潮,声势浩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组织起来的。又如2001年日内瓦世界首脑峰会会场外的抗议,再如1999年西雅图爆发的反对世贸组织

的抗议,皆是如此(参看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有关互联网和民主化的图文框)。

尽管手机、传真机以及卫星传播也加快了这些变化的发生,但互联网仍然处于变迁的最前沿。只需敲打键盘,地方性事件便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开来。从日本到玻利维亚,世界各地的基层积极分子可以相聚在网上,共享信息资源,交流经验,并协调联合行动。

最后这一点,也就是协调国际政治运动的能力,既使政府忧心忡忡,也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倍感振奋。在最近二十年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际性社会运动”的数量稳步增长。从支持减免第三世界债务的全球性抗议,到要求禁雷的国际性运动(它的成就巅峰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互联网已经证明了它有能力跨越国家与文化边界来联合运动者。一些观察家提出,在信息时代,我们正在见证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新的非政府联盟(alliances)或同盟(coalitions)。

有些智囊团,比如(美国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其政策顾问已经在讨论网络战争(netwars),即以信息和舆论而非资源或领土为争夺焦点的大规模国际冲突。网络战争的参与者使用传媒和网上资源来塑造某些特定人群所知道的社会世界。这些网上运动的目的是向受众传播有关企业、政府政策或国际协定的效果等信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对许多政府甚至民主制的政府来说,网络战争是一种令人恐惧、难以控制的威胁。美国军方的一份报告警告:“新一代革命者、激进分子和活动家正开始创造信息时代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认同和忠诚可能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性公民社会的跨国族层面上”(转引自*Guardian*,2000年1月19日)。

这些担心是否夸大其辞?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些年来,社会运动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Castells 1997),考察了三种社会运动的案例。尽管它们在关注的问题和目标上完全不同,但由于有

效利用了信息技术,都引起了国际范围内对于其事业的注意。无论是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的反叛,^①美国的“国民军”运动(militia),还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为了传播反对全球化危害的观念,并表达他们失去对于自己命运的控制的愤怒,都使用了传媒技巧。

根据卡斯特的看法,这些运动都依赖信息技术作为其组织基础。比如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萨帕塔主义者就还是墨西哥南部一股孤立的游击队运动。然而,1994年1月他们发起武装起义,数小时之内,本地、国内乃至国际上各种声援群体纷纷现身网络,倡扬叛乱分子的事业,谴责墨西哥政府对叛乱的严酷镇压。萨帕塔主义者利用电信、录像和传媒访谈,将他们对于某些贸易政策的反对意见晓之于世,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因为这将使瓦哈卡和恰帕斯^②已经身处贫困的印第安人进一步被排斥在全球化的益处之外。由于萨帕塔主义者的事业直抵社会运动者的在线网络最前沿,他们有能力迫使墨西哥政府谈判,并引起国际上关注自由贸易对于本地人口所造成的危害。

第五节 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的理论

当今之世,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中有一些是民族主义运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思想家对民族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或关注。马克思与涂尔干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

一种破坏性的倾向,同时提出,由现代工业所导致的经济愈益整合,会使民族主义迅速衰退。只有韦伯投入大量的时间分析了民族主义,或者准备宣布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即便是韦伯也没有估计到,民族主义和民族观念在20世纪会变得如此的重要。

在21世纪初,民族主义不但依然活跃,而且日渐兴盛,至少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是如此。尽管世界内部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尤其如此,但是这种互赖性并没有敲响民族主义的丧钟。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有助于强化民族主义。

第十三章第三节第二小节描述了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主义复兴。

近期的思想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关民族主义、民族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阶段,也是众说纷纭。它们的起源在一些人眼中远远早于另一些人的看法。

20.5.1 民族主义与现代社会

民族主义首屈一指的理论家,或许要算是厄内斯特·盖尔纳(Ernst Gellner, 1925—1995)。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民族以及民族国家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感情(feelings)或情感(sentiments),并没有深植于人性的根源。它们是工业主义创造出来的新的大规模社会的产物。在盖尔纳看来,正如民

^① 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 萨帕塔(Emiliano Zapata, 约1879—1919)是墨西哥革命领袖,曾组织农民游击队。长期影响墨西哥政坛,左右内战走向。曾提出“土地与自由”的口号,把夺回的种植园土地分配给部下来耕种。有时能集合几千游击队员,从联邦军队手里缴获武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是位于墨西哥东南部恰帕斯州的一支农民武装,也把争取“土地与自由”作为行动口号,1994年1月发动武装暴动,此后与政府军冲突不断。墨西哥先后两届政府同其多次谈判,但双方一直未能就全面解决恰帕斯州冲突达成协议。2006年底,福克斯总统宣誓就职后下令从恰帕斯州部分撤军,并释放了部分在押的萨帕塔组织成员,表达了新政府早日与这一武装组织恢复和谈、达成真正和平协议的愿望。

^② 瓦哈卡(Oaxaca)和恰帕斯(Chiapas)是墨西哥南部两个州,为印第安人大量聚居之地。

族的观念一样,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在传统社会是不为人所知的(Gellner 1983)。

现代社会的几个特征导致了这些现象的出现。首先,现代工业社会是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复杂的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盖尔纳指出,现代工业主义需要远比此前更为有效的国家与政府体系。其次,在现代国家,由于社会的基础不再是地方村落或城镇,而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所以个人必须随时与陌生人打交道。大众教育建立在学校传授的“官方语言”基础上,是大规模社会得以组织起来并保持统一的主要途径。

盖尔纳的理论已经在不少方面遭到批评。批评者指出,它是一种认为教育有助于产生社会团结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功能主义思路的普遍倾向类似,这种观点往往会低估教育在产生矛盾与分隔上的作用。盖尔纳的理论并没有真正说明民族主义能够引起并且确实常常引起的情感。民族主义的力量可能不只与教育有关,而且与为人们创造一种认同的能力有关,没有这种东西,个体便活不下去。

认同的需要当然不只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才产生的。批评者就此提出,盖尔纳如此绝对地把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前现代时代分开是错误的。虽然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是相当现代的,但是它也吸收了不少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符号体系的情绪和形式。根据当代最著名的民族主义学者之一安东尼·史密斯(Smith 1986)的看法,民族往往是直接源于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或他所称的族群。所谓族群,就是共享同宗同祖、共同的文化认同以及与特定的家乡相联系等观念的群体。

史密斯指出,许多民族确实具有前现代连续性,而且在以前的历史阶段,也已经存在类似于民族的族裔共同体。例如,两千多年来,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族群。在某些时期,犹太人集中聚居,形成具备某些民族特征的共同体。只是在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以后,才创立了以色列

国,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达到巅峰,因为这股运动的宗旨就是要给散居全世界的犹太人创建一个家园。而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少数群体,则将自身的起源追溯到十分不同的族裔背景,声称以色列国的创建把巴勒斯坦人赶出了他们的古老家园。这也造成了他们与以色列的犹太人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以及以色列与周围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局势。

与族群相比,不同民族遵循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一些国家,包括西欧的大多数国家,一个单一的族群通过扩张除掉早期的对手。因而,在17世纪的法国,人们说好几种语言,而且具有不同的族群历史。后来,法语成为主要的语言,大多数对手随后便消失了。但它们仍在少数地区残存。一是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巴斯克地区(Basque)。巴斯克语与法语和西班牙语都大为不同。巴斯克人声称具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历史。有些巴斯克人还希望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完全独立于法国和西班牙。虽然我们在东帝汶、俄罗斯南部的车臣等地区所看到的那种规模的暴力冲突在巴斯克地区并不存在,但其分离主义团体偶尔也会使用炸弹攻势来推动他们谋求独立的目标。

20.5.2 没有国家的民族

在既有民族中如果有界定鲜明的族群持久存在,就会导致没有国家的民族。在这些情境中,民族的许多基本特征都会得到体现。但是,组成这个民族的那些人缺乏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类似于车臣和巴斯克地区的那些分离主义运动,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的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比如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Kashmir)的情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受到建立一个自主和自治的国家的愿望所驱动。

根据族群与它置身于其中的更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确认出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没有国家的民族(Guibernau 1999)。第一,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民族国家可能会接

受它内部一个或多个少数族群当中的文化差异,并且允许它们有某种程度的积极发展。因而,在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就被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自己的制度/机构。例如,苏格兰的大多数人都是长老会教徒,而且长期以来苏格兰一直拥有不同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独立的教育体系。1999年,随着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和威尔士议会(Welsh Assembly)的成立,苏格兰和威尔士在作为整体的英国内部获得了进一步的自治地位。与此类似,巴斯克地区与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西班牙北部巴塞罗那附近的区域)在西班牙都被承认为“自治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议会,并具有一定的权利和权力。然

而,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西班牙,大部分的权力仍旧掌握在分别坐落于伦敦和马德里的全国政府和议会手中。

第二类没有国家的民族拥有更高层次的自治权。在魁北克(Quebec,加拿大的法语省份)和佛兰德(荷兰北部的荷兰语地区),地区性政治实体有权做出重大决策,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独立。如前面第一类中的个案一样,它们也容纳了挑动彻底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

第三,有一些民族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容纳他们的国家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拒绝承认少数族群,较大的民族国家会使用武力。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就是这种群体的一例。其它例子还有家园散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Kurds)。



车臣叛乱分子制造了俄罗斯别斯兰学校的人质事件,导致大批人员丧生。

库尔德人把自己的文化史追溯到好多个世纪以前。在库尔德人当中,主要以海外为基地的几股独立运动则宣称以暴力为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库尔德人在布鲁塞尔设有“流亡议会”,但它并没有得到全体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

在库尔德人的例子里,要想实现哪怕是有限自治的目标,也基本没有什么机会,除非有关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朝一日会决定改变它们的现行政策。但在其他例子中,国内少数民族群倒是有可能选择在所在的国家内自治,而不是完全独立。比如在巴斯克地区、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人口中仅有一小部分现在还支持完全独立。在魁北克,1995年就是否从加拿大独立举行的全省公投未能获得必需的多数票,就此流产。

20.5.3 少数民族群与欧盟

对于欧洲各国的少数民族群,欧盟起着重要的作用。欧盟是通过西欧主要国家所缔造的联盟而形成的。然而,欧盟的哲学中关键的一点是将权力下放到各地方和区域。它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多区域的欧洲”。这种强调得到绝大多数巴斯克人、苏格兰人、加泰罗尼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的热烈支持。这些群体的成员经常对他们的一些文化或制度的丧失耿耿于怀,并且希望能够重新找回。他们希望欧盟能够扶持他们的独特认同。他们有权利直接与欧洲议会或欧洲法院等欧盟组织进行联系。这可能会使他们有足够的自治权来控制自己的命运。因而,至少可以相信,欧盟的存在将意味着,少数民族群为了与自身所属的更大的国家以及欧盟保持合作关系,有可能会放弃完全独立的理念。(有关欧盟的基本作用和功能,参看本章第二节第四小节的介绍)

20.5.4 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与各工业社会相比,在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民族主义、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不同的。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曾经是欧洲人的殖民地,并且在20世纪后半叶才获得独立。在许多这类国家,殖民地当局之间的边界是通过在欧洲随意达成的协议划分的,并没有考虑人口中存在的经济、文化或种族差别。殖民大国战胜或征服了在非洲次大陆、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存在的王国和部落群体,成立了自己的殖民政府或保护国。其结果,每一个殖民地都是“各类人群与旧有国家的集合或碎片,并在共同的边界内聚在一起”(Akintoye 1976: 页3)。大多数殖民地区是由斑驳繁杂的族群以及其他各类群体所组成的。

昔日的殖民地一旦独立,往往会发现很难形成一种民族意识和民族归属感。尽管民族主义在谋求殖民地独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一小批积极分子。民族主义观念并没有影响到人口中的大多数。甚至今天,许多后殖民国家还在不断受到内部对抗的威胁,受到谋取政治权力的众多彼此竞争的诉求的威胁。

非洲是一块完全被殖民化的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支持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使这里的殖民地摆脱了欧洲的控制。这个目标实现后,新的领导人在实现国家统一方面遇到了许多问题。20世纪50和60年代的许多领导人是在欧洲或美国接受的教育,与其国民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这是因为,大部分国民不通文墨,生活贫苦,并不熟悉民主制的诸般权利和义务。在殖民统治下,一些族群要比其他族群更为繁荣。这些群体的利益和目标不同,并顺理

蔡美儿：“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制度是如何孕育族群仇恨和全球动荡的”

许多评论者提出,要想减少族群冲突,比如前文所讨论的那些族群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他们认为,这将使得人人皆在国家管理中有发言权,通过与其他各方的贸易往来,有机会走上致富之路,这样就能促进和平。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在《燃烧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制度是如何孕育族群仇恨和全球动荡的》中力驳此见,引发热议(Chua 2003)。

蔡美儿的出发点是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个少数族群会享有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经济力量。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白人少数族群对于非白人族群的剥削即为明证。蔡美儿提出,无论是1994年在卢旺达,胡图族对于图西族的大屠杀,还是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人对于克罗地亚人的仇恨,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图西族和克罗地亚人在其各自国家所享有的经济优势地位有关系。蔡美儿常常援引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少数族群。^①

前印度尼西亚独裁者苏哈托将军(General Suharto)推动了支持市场的系列改革,对该国的华裔少数族群尤为有利。因此,印尼华人往往支持苏哈托的独裁政权。1998年爆发了支持民主

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迫使苏哈托下台。而此时的印尼华人控制着印尼70%的私有经济,却仅占其总人口的3%。苏哈托政权的终结随即带来对于华裔族群的暴力攻击,华裔族群被视为“窃取”了国家的本土财富。蔡美儿写道:“在原住民多数族群中盛行这样的观点,^②宁可丧失十年的成长,也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华人问题。”

随着苏哈托将军的独裁政权解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呼吁引入民主选举。然而,蔡美儿指出,“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族群”,比如印尼的华人,如果把民主引入他们所在的国家,不太可能带来和平。相反,蔡美儿认为,民主政体下对于票数的竞争很可能导致该国多数族群的强烈反弹。政治领导人将出自这样一些人,他们力求以遭怨恨的少数族群为替罪羊,怂恿多数族群为“真正的”民族主人“重新诉求”国家财富,就像印尼的原住民多数族群对华人少数族群的所作所为一样。

蔡美儿的阐述告诉我们,尽管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在原则上是善意的力量,但必须根植在有效力的法律体系和公民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像发展中世界许多地方的现状,那么就会出现新的尖锐的族群冲突。

成章地把对方视作敌人。

非洲的许多后殖民国家都爆发了内战,比如苏丹、扎伊尔和尼日利亚。同时,在非洲和亚洲的其他许多地区,也都存在着族群纷争与对抗。以苏丹为例,大约40%的人声称源于阿拉伯民族。而在该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绝大多数的人是黑人,在宗教信仰上属于基督教或万物有灵论。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后,就制定了一项方案,要以阿拉伯语为国家语言,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全国整合。这种努力只在一定

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由此产生的紧张和压力却相当明显(我们在第十三章第三节第二小节讨论族群冲突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卢旺达或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非洲大陆自从独立以来所发生的大部分战争,就是由诸如此类的困难造成的直接结果。

尼日利亚是有关问题的另一个例子。这个国家拥有大约1.2亿人口,差不多每4个非洲人中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尼日利亚以前是英属殖民地,在1960年10月1日获得独立。

^① 蔡美儿属于新一代的美籍华裔女学者,父母是菲律宾华侨,后移居美国。

^② 印度尼西亚直到1998年才废除“原住民”(pribumi)和“非原住民”(non-pribumi)的称呼。

全国由三个主要的族群所组成,即约鲁巴族(Yoruba)、伊博族(Ibo)和豪萨族(Hausa)。1966年,该国独立后不久,不同族群之间就爆发了武装战斗,成立了军人政府。从此,文官政府就与军人统治交替更迭。1967年,由于比夫拉地区谋求独立,爆发了一场内战。分离主义运动受到了武力镇压,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接替的政府试图围绕“尼日利亚祖国”这一主题,宣传一种明确的民族认同意识,但是建立国家统一和共同事业的有关概念仍然比较困难。这个国家虽然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深陷贫困,并依旧处于威权统治的控制之下。

总之,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的民族形成过程与工业化世界中的民族形成过程有所不同。许多国家是在先前很少有文化和族裔一致性的地区依靠外部力量的强行施加而建立起来的,有些则更导致了独立之后的内战。要么在从来没有成为殖民地的地区,要么在几乎已经取得文化一统化的地区,比如日本、韩国或泰国等,最有效地兴起了现代国族(nation)。

20.5.5 民族主义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如何影响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尔金顿考察了这一问题(Pilkington 2002)。他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一种相当新的现象,尽管许多倡导民族主义的人也确实宣称,自己属于历史极为久远的民族的成员。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人们长期生活在较小的聚居住区,对于自己群体之外的事态基本无所听闻,至于作为一个较大的民族的成员,这种观念对于他们似乎也是十分陌生的。直到比较晚近的时候,情况才有所改变。皮尔金顿提出,只是到了后来,从18世纪开始,随着大众传播和媒介的发展,民族共同体的观念才得以发展和扩散。

在皮尔金顿看来,正是在这一时期,民族认同被“建构”出来。

第五章第五节第四小节讨论了社会建构论。

皮尔金顿认为,在发展一种关于民族性的感觉的过程中,关键是某种“它者”的存在,民族认同就是针对这种“它者”而形成的。皮尔金顿指出,在形塑(新教的)英国认同时,关键在于(天主教的)法国的存在。皮尔金顿记录了有关英国性的感觉是如何随着全体人口中读写能力的普及,随着沟通技术促成了观念的传播,自上而下,从这个国家的精英扩散到社会中其他人群的。

如果按照皮尔金顿的说法,民族认同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那它也就有可能继续变化和发展。皮尔金顿提出,当今改变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全球化。在他看来,全球化导致了集权与放权之间相互冲突的诸多压力。一方面,有些工商组织和政治单元(比如多国企业或欧盟这样的跨国组织)的权力变得愈益集权化,而另一方面,又有放权的压力(试想苏联的倾覆和分裂,或在西班牙建立分立的巴斯克国的欲求)。其结果,皮尔金顿认为,全球化给民族认同带来了双重威胁:集权化带来了自上而下的压力,欧盟的权力不断壮大尤为甚;而放权则通过少数族群认同的强化,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压力。在英国,对于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重新确认一种更为狭隘的对于英国性的理解。皮尔金顿以约翰·汤森为例。这位前保守党议员提出了一种新的英国民族认同观,是明确的反欧洲的、白人的、习英语的。皮尔金顿提出,在英国国内的一些少数族群的成员中,也能发现类似的反应,他们觉得被某种英国认同所排斥,强化了自己的局部认同,确认自身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差异。

皮尔金顿明确相信,对于全球化的第二种反应更为健康。它承认有多重的认同,比如认为可以同时作为英格兰人(English)、英国人(British)和欧洲人。皮尔金顿认为,在英国的

少数族群中新出现的“混杂认同”(hybrid identities),就是这种思路的明证,这样的认同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在皮尔金顿看来,我们必须以族群包容的方式来表现民族,鼓励归化认同^①,例如亚裔英国人,以此挑战对于全球化的第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它往往会导致倒退到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

20.5.6 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全球化

在非洲的一些地区,还没有充分形成国族与民族国家。然而,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全球化形势下的“民族国家的终结”。根据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观点,由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里,民族认同正趋于衰弱(Ohmae 1995;亦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这种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所有国家确实都正在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没有国家的民族”的兴起很可能与全球化有关。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经常通过复兴局部认同来做出反应,以此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由于全球市场的扩展,国族自身的经济力量要比过去为少。

然而,据此认为我们正在见证民族国家的终结是不准确的。就某些方面而言,情况恰好相反。今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要不就是民族国家,要不就是渴望成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形式。而直到不久以前,它曾经还有对手。在几乎整个20世纪,殖民地区和帝国与民族国家并存。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直到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最后一个帝国才消失。而其他一些人则仍把美

国视为一个帝国(Ferguson 2004)。苏联是包容其东欧各卫星国的帝国的有效中心。现在,所有这些地区,再加上原先属于苏联的许多地区,都已经成为独立的国家。实际上,当今世界要比20年前拥有更多的主权国家。

在上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民族主义和与没有国家的民族有关的问题常常关系到使用恐怖主义作为某种政治武器。下面我们就来讨论恐怖主义,看看这个概念近年来有何变化。

第六节 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5分左右,一架横穿美国东西海岸的例行航班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撞入纽约世贸中心的北塔。几分钟之后,另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又撞击了南塔。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两幢建筑相继倒塌,数以千计刚刚开始上班的人丧生。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第三架飞机又撞进了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军事总部,又夺去了数百人的生命。至于第四架飞机,据信是以位于华盛顿的白宫为攻击目标的,那是美国行政权力之所在。机上的乘客与劫机者进行了搏斗,飞机最后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田地里。9月11日这一天被劫持的所有飞机都是由美联航或美航(United or American Airlines)这两家美国公司所属。世贸中心、五角大楼和白宫,劫机者所选择的目标都是出于同一个目的:攻击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的核心。

小布什总统对于袭击的反应是宣布展开“反恐战争”。一个月以后,这场“战争”中第一次重大军事反击发生了:2001年10月,多国部队攻击了位于亚洲的阿富汗。我们前文已经看到,当时统治阿富汗的是持原教旨主义立

^① 归化认同(hyphenated identities)特指归化入籍者,但其字面上也就表现为连字符复合形式(hyphenated)。

场的伊斯兰教政府,即塔利班,它常常支持基地组织^①(al-Qaeda)的行动,正是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执行了“9·11”的系列攻击,并且它的许多成员也是在阿富汗受训的。

在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发生后的这些年来,世人又看到几项恐怖主义的野蛮行径是基地组织宣布负责的。2002年10月对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Bali)一家夜总会的袭击杀死了二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从相近的澳大利亚过来度假的年轻观光客。2004年3月,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列火车上,早高峰时的炸弹爆炸造成大约200名通勤者丧生。而在伦敦,2005年7月,三列地铁和一辆公共汽车上发生了协调行动的系列爆炸,造成52人丧生,另有几百人受伤。“9·11”之后的恐怖主义体现出一种新的安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种新型的恐怖主义,比以往更为致命的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就来谈谈“恐怖主义”的

概念。

20.6.1 恐怖与恐怖主义的起源

恐怖主义这个词起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基本都是贵族,不过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平民,遭到政治当局的追捕,并被送上断头台。“恐怖”这个词并不是由革命党人自己发明的,倒是由反对革命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厌憎法国大革命及其意蕴,相信流血杀戮的持续就是使全体人口陷入恐怖的一种方式(Laqueur 2003)。就使用暴力来恐吓这个意义来说,“恐怖”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比如德国的纳粹。然而,这种对于暴力的使用要早于法国大革命时这个术语的使用。

尽管人们直到18世纪才创造出“恐怖”这个词,但诉诸暴力来恐吓民众的现象却是由来已久。在古代文明中,一旦一支军队攻入敌



2005年7月伦敦遭受系列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宣布对此负责。

^① 原文格式如此,但书后术语表中并无此项词条。



巨型混凝土障碍物被设置在议会大厦^①前,试图防御恐怖袭击。

方城池,往往会屠城焚池,将全城男女老少统统杀光。这种举动的关键并不只是在于从身体上消灭敌人,而是在那些生活于其它城市的人当中制造恐怖,展示那种恐怖所代表的权力。因此,基于恐吓民众尤其是平民的考虑而使用暴力的现象,显然要比这个词本身来得古老。

“恐怖主义”这个词是否是个有用的概念,也就是说,是否能够以比较客观的方式来运用,社会科学家意见不一。此词素以难以界定而著称。问题之一在于,人们对于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道德评价变来变去。常常有人说,“在一个人眼里的恐怖分子,到另一个人眼里就成了自由战士。”同样,众所周知,曾经

作为恐怖分子的人,自己到后来也会同样猛烈地谴责恐怖主义。比如可以略带保留地说,以色列国的早期历史不时会有恐怖主义活动,但到了21世纪,以色列领导人自称已加入“反恐战争”,并将恐怖主义视为其首要之敌。仅仅几十年以前,南非前领导人曼德拉还被广泛斥为潜在的恐怖分子,但他现在已经成为最受尊敬的政治人物之一。要想让恐怖主义成为一个有用的术语,就必须使其尽可能地摆脱会随时而变或因人而异的道德评价。

要寻求有用的恐怖主义概念,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的角色。能不能说国家在实施恐怖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所造成的人命死伤

① “Houses of Parliament”: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两者均列入世界遗产。这座庞大建筑群具有壮丽的维多利亚风格,拥有多座哥特式尖塔,是英国民主制度的象征,世界议会政治的发源地。始建于11世纪,原名威斯敏斯特宫,1547年后成为国会所在地。

比其它任何类型的组织都要多。国家残酷地杀害了大量平民人口。在现代,国家所做的一些事情,堪比于传统文明中所发生的那些屠城事件。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盟军的空袭基本上摧毁了德国城市德累斯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轰炸。^①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空袭德累斯顿发生在战争期间,当时盟军毫无战略优势。而批评盟军行动的人则指出,毁灭德累斯顿的目的是要给德国社会带来恐怖和惊惧,由此削弱德国公民继续战争的决心。

将恐怖主义的概念限制在国家之外的群体与组织,还是合乎情理的。否则的话,这个概念就会变得太接近更一般层面上的战争概念。尽管存在以上提及的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是认为,能够找到一种中立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把恐怖主义界定为“(由非国家组织所实施的)任何行动……旨在造成平民或非作战人员的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而这类行为的目的,以其性质或背景观之,是为了恐吓某群民众,或迫使某个政府或国际组织做或不做某项行为”(Anand Panyarachun et al. 2004)。换句话说,恐怖主义包含了对于平民的攻击,旨在敦促一个政府改变其政策,或损害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20.6.2 新旧恐怖主义

正如上文所述,可以把恐怖主义与前朝历代旨在制造恐怖气氛的暴力行径区分开来,比如古代的屠城。恐怖主义是与传播技术的变迁分不开的。要想恐吓分布广泛的人群,有关暴力的信息就必须非常迅速地传递到有关人群。只是在18世纪晚期现代传播技术兴起之后,

才能做到这一点。随着电报的发明,即刻传播成为可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在此之前,信息的传播扩散耗时需要几天乃至数月。比如我们在第十五章引言中所看到的事例,林肯被刺的消息花了许多天才传到英国。一旦即刻传播成为可能,颇具象征意义的恐怖主义暴力行为就可能远距传散,而不仅仅是当地人才知道。

一 旧式恐怖主义

我们可以区分出旧式恐怖主义与新式恐怖主义。旧式恐怖主义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很盛行,今天也依然存在。我们前文讨论过(参看本章第五节第五小节),民族主义兴起,将民族创建成独立自主、边界分明的实体,是欧洲18世纪后期以来的流行趋势,旧式恐怖主义基本上与它们是分不开的。

在所有民族中,边界的划定都带有一定的任意性,要么只是像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和亚洲曾经做过的那样,凭着地图画一些界线,要么是通过殖民征服或大小战争。以爱尔兰为例,它于1800年被纳入联合王国,引发了独立斗争,并导致这个国度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殖民官员通过地图划线或武力创建的国家如同百衲拼贴,在许多情况下,形成了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民族声称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却没有民族通常应当拥有的地域和国家机器。绝大多数的旧式恐怖主义都与没有国家的民族有关系。

旧式恐怖主义的关键在于,要在民族对于该地域的国家机器没有控制权的地方,创建国家。比如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就是这样,像爱

^① 1945年2月13日至14日,英美空军出动800架飞机对德累斯顿(Dresden)进行大规模轰炸,城市几乎全部被毁。空袭持续到4月17日。结果,欧洲最美丽城市之一的德累斯顿大部消失,死难人数在35000人到135000人之间。

尔兰共和军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还有巴斯克民族主义者, 像埃塔组织^①。主要的问题是在国家的形成中确立地域的一体性和认同。在没有国家的民族那里, 在恐怖分子准备以暴力手段实现其目标的地方, 就会发现旧式恐怖主义。但究其根本, 旧式恐怖主义还是地方性的, 因为它的企望就是地方性的。它只是希望在一块特定的民族区域创建一个国家。

近些年来, 随着旧式恐怖主义从外界各国寻求支持, 也常常带上国际性的成分。比如说, 利比亚、叙利亚和一些东欧国家, 以及美国国内的一些群体, 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北爱的爱尔兰共和军与西班牙的巴斯克分裂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活动。然而, 尽管旧式恐怖主义可能会有一个广泛的全球网络支持其资金, 或透过该网络走私武器或毒品以换取军火, 但它的企望还是地方性的。

旧式恐怖主义不仅企望有限, 而且在暴力的使用上也是有所节制的。比如说, 尽管北爱的冲突已经导致了许多人丧生, 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重新抬头的“暴乱”^②以来, 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加上英军阵亡数, 其平均比例尚不及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率。就旧式恐怖主义而言, 尽管死伤人数颇为可观, 但暴力的使用却还算有限, 因为这种恐怖主义的目标也比较有限 (当然, 这种暴力还是令人生畏和可怖的)。

此外, 民族认同产生了牢固的道德强制力, 使得旧式恐怖主义难以遏制, 英国政府最近几十年在北爱地区就遇到了这种局面。我们已经看到, 民族主义蕴含着强烈的能量生成要素。只要存在没有国家的民族, 民族认同的迷思 (myth) 就能够持续激发虔信者前赴后继, 推动创建一个国家。历史经验表明, 如果对于同一片地域存在诉求争议, 妥善的解决方案往

往是极难达成的。北爱的长期争端就属于这种情况, 希望留在联合王国内的统一党支持者 (unionists) 和力求并入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团体各自施加了相互冲突的压力。

在旧式恐怖主义和新式恐怖主义之间, 可以做出根本性的区分 (Tan and Ramakrishna 2002)。传播技术的变迁不仅推动了全球化, 也使新式恐怖主义成为可能, 而新式恐怖主义也向全球扩散。这种恐怖主义让人联想到的最著名的就是基地组织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参看图文框), 虽说它绝不仅限于此。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新式恐怖主义。

二 新式恐怖主义

新式恐怖主义与旧式恐怖主义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首先, 是其诉求的范围宽窄。比如说, 基地组织的世界观的一个独特之处, 就在于其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目标。它力求重构世界社会。基地组织的部分领导人企图重新打造一个伊斯兰教的社会, 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欧洲。这项计划将包括在整个中东创建伊斯兰教政府, 重新夺取北非。基地组织的支持者们提出, 在上一个千年里, 西方世界把伊斯兰团体驱逐出了上述地区, 而伊斯兰团体对它们有合法的占有诉求。这些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 以及西班牙曾经被摩尔人 (Moors, 最早从北非迁来的穆斯林, 在 8 世纪到 15 世纪控制了西班牙的大片区域) 统治过的那些区域。我们现在认为是欧洲的这片土地, 有大片区域曾经属于伊斯兰世界, 由奥斯曼帝国或来自北非的力量所统治。基地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在这些区域和地区重新创建伊斯兰教的全球统治。所以说, 旧式的民族主义是地方性的, 是与特定的国家相维系的, 通常还是很小的国家, 而新式

① 埃塔组织 (ETA): 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巴斯克祖国与自由”(巴斯克语 Euzkadi Ta Azkatasuna, 英语 Basque Homeland and Liberty) 的首字母缩写, 采取暴力手段谋求巴斯克独立。源于 1894 年成立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② “暴乱”(Troubles): 特指 1919 年至 1923 年间爱尔兰及 1970 年代初北爱尔兰的连续不断的暴力事件。

基地组织的起源与网络

基地组织 (Al-Qaeda, 意思是英语的“the base”), 是在苏联军队 1989 年撤出阿富汗时创建的, 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同伙开始寻求新的圣战 (jihads, 这个词大致可以译为神圣的战斗或战争)。20 世纪 80 年代有大批阿拉伯志愿者来到阿富汗, 高举伊斯兰之旗而战, 来对抗苏联, 从这个网络中逐渐发展形成该组织。在反苏圣战中, 本·拉登和他的战士们受到了美国和沙特的资助。有些分析家相信, 本·拉登本人就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安训练。这些后来被世人知晓的“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 个个久经沙场, 充满斗志。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 基地组织是在苏丹活动的。1996 年以后, 它将总部和大约一打的训练营迁往阿富汗, 本·拉登在那里开始与塔利班发展起密切关系。美国从 2001 年下半年开始发动对于阿富汗的战役, 驱散了该组织, 迫使其转入地下, 成员受到攻击, 基地和训练营遭到破坏。

遍布世界的支部

基地组织的运作被认为散布在多达 40 到 50 个国家, 不仅在中东和亚洲, 而且在北美和欧洲。在西欧, 人们已经知道或者怀疑, 它在伦敦、汉堡、米兰和马德里均设有支部。这些支部都是重要的中心, 负责招募新手、筹集资金和策划行动。

为方便训练, 基地组织喜欢挑选缺乏管制的地区, 以便自由行动, 保持秘密。这些地区据信除了阿富汗的山区, 还包括索马里、也门和车臣。还有一些报道记述了印尼某个岛屿上的秘密训练营。

不同于过去那些组织严密的团体, 比如意大利的红色旅或中东的阿布·尼达尔组织, 基地

组织结构松散。它的活动遍及各大洲, 像是一条相互链接的网络。各个团体或支部似乎有很高的自主性, 常常通过干些小勾当来自筹资金, 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才与其它团体联系。

如何界定基地组织?

团体之间的关联这样松散, 使得如何界定成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基地组织的时候, 指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组织, 还是在谈某种更近似于理念的东西?

2003 年 5 月在利雅得 (Riyadh) 的系列爆炸, 2002 年在蒙巴萨 (Mombasa) 针对以色列旅游者的袭击, 这类攻击被普遍归于基地组织。然而, 这些攻击真的是本·拉登或者据信他仍在领导的那个组织以某种方式策划、资助或组织的吗?

有些分析家提出, 基地组织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仅仅靠共同的宗旨、理念和方法关联起来的各式团体。然而, 我们确实知道, 有几个激进团体现在或曾经与基地组织之间有正式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埃及团体伊斯兰圣战者组织 (Islamic Jihad) 中的激进派, 其成员以阿富汗为庇护所, 和基地组织合流。它的领导人名叫艾曼·扎瓦赫里, 这个冷酷无情的埃及人被认为是基地组织背后的策划者, 是该组织最臭名昭著的许多活动的幕后主使。其中包括 1998 年对两家美国驻非洲使馆的袭击, 以及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9·11”袭击。

克什米尔武装团体,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运动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或简称 IMU), 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团伙, 阿尔及利亚的武装伊斯兰团 (Armed Islamic Group, 简称 GIA), 及其激进支派, 世人称之为萨拉菲斯特组织, 简称 GSPC, 以上这些也都被认为与基地组

织有关联。

“反恐战争”

作为“反恐战争”的组成部分,西方警察部门和情报机构已经在摧毁基地组织支部、关闭伪装性门面公司、冻结有关资产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基地组织的一些首要领导人物已经被击毙或逮捕,而在关塔那摩湾对于一些成员的审讯则进一步削弱了该组织。尽管如此,要想

彻底铲除基地组织,还是一项极其复杂、屡有挫折的任务。

牛津研究小组(Oxford Research Group)在最近一份关于伊拉克和反恐战争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基地组织的许多成员遭到羁押,它“仍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让人极为沮丧的是,本·拉登本人存亡与否,行踪何处,仍是一团神秘。

资料来源:BBC(2004年7月20日)

的恐怖主义则具有全球性的企图,想要扭转世界权力的趋势。

在基地组织和其他类似恐怖主义的世界观,存在着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鲜明张力。它们力图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广阔区域里重新创建昔日存在过的伊斯兰统治,在此过程中大量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来批判现代性,试图扭转它们眼中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趋势(Gray 2003)。

其次,新式恐怖主义与旧式恐怖主义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组织结构。社会学家玛丽·卡尔多指出,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新式恐怖主义团体,与乐施会或地球之友(Friends of Earth)之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基础结构上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当然她也注意到,不要贸然将这种类比推得太远。

有关非政府组织,详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三小节的讨论。

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基地组织铺设了与许多非政府组织类似的全球组织形式。无论是新式恐怖主义组织,还是像地球之友这样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受某种使命感和担当感驱动的。这种使命感和担当感使得一种颇为松散的全球组织仍能蓬勃发展(Galsius et al. 2002)。

非政府组织和新式恐怖主义组织都是基

于卡斯特所讨论的那种网络(参看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三小节)。它们的结构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在各地方支部的层面上有高度的自主性,不一定需要来自中心的明确导向,就可以复制这些支部。2001年美国对于阿富汗的攻击大大削弱了基地组织的领导,但这个组织却凭借其道德信念而依然强大牢固。这就驱动了某种使命感,能够使各支部即使在整个组织的某些方面遭受削弱乃至重创的时候,也依然能够运转良好。

恐怖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全球扩散,支持者分布在许多国家。2001年在美国主导下攻击了阿富汗之后,基地组织究竟还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生存下来,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对此意见不一。但是根据估计,在大约60个国家还有基地组织的支部活动,吸收了大概两万人,他们都愿意为了事业而壮烈赴死,而绝大部分支部与中心都保持着准自主的状态。

还可以指出,新式恐怖主义团体与非政府组织都与国家有所合作。没有任何非政府组织是纯粹作为非国家组织而发展壮大的。它们都与国家有所接触,也都得到国家的某些支持。而卡尔多提出,新式恐怖主义组织也是这样。1988年,一架客机发生爆炸,坠毁在苏格兰村庄洛克比(Lockerbie),与利比亚政府有关系,这就算是一例。当然,新式恐怖主义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类比不能推得太远,但就其组

织结构和对于显然迥异的使命的共同感受而言,基地组织可以视作某种恶意的非政府组织。

旧式恐怖主义与新式恐怖主义之间差异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是在于手段。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旧式恐怖主义的目标比较有限,因此所使用的暴力一般也就比较有限。而新式恐怖主义就其预备使用的手段而言,似乎远为残酷。比如说,基地组织的网站会以极具破坏性的语言谈论其“敌人”,最主要就是美国,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西方世界。这些论调常常赤裸裸地指出,应当实施恐怖主义行动,尽可能多地杀死人命。例如,在1998年基地组织的创建宣言中就宣示了这种冷酷无情,声称:

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平民还是军人,这一规定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人义务,无论身处何国,只要有可能履行,就要去履行,以便将(穆斯林圣地)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和圣寺(Holy Mosque,在麦加)从他们的手里夺回来,将他们的军队赶出所有伊斯兰的土地,彻底击溃它们,让它们再也没有能力威胁任何穆斯林。

(转引自 Halliday 2002, 页 219)

旧式恐怖主义在使用暴力手段时一般比较有限,相比之下,差异很大。不过在有些情况

下,两者有所重叠,比如前苏联的车臣,它就从一种分离主义的斗争,转变成新式恐怖主义的重聚之地。

20.6.3 恐怖主义与战争

面对新式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在2001年9月11日人们所看到的这种恐怖主义,给政治社会学家们提出了难题。能够像传统战争那样与恐怖主义作战么?2001年联军攻击阿富汗,确实是摧毁了至少一部分基地恐怖分子的网络。然而,尽管通过传统战争也能够取得对于新式恐怖主义的一些胜利,但批评者们完全有理由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新式恐怖主义团体的暴力规模、宗旨与组织结构使它们有别于传统敌人,比如心怀仇视的民族国家。这就使得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反恐战争”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参看本章第三节第一小节的图文框),由于担心伊拉克正在发展将被用来供应恐怖主义组织的武器,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尤其是在美国。关于恐怖主义是否能够通过传统战争来应对,存在着争论,而这又进一步引出了有关恐怖主义与像阿富汗这样支持它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难题,进而导向有关全球治理的问题。在一个全球时代,需要有什么样的国际支持和预防,以防止某种遇见中的威胁?而要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什么样的制度和机构(institutions)才是最好的?

本章要点

- 1 “政府”这个术语指的是官员制定和实施决策的政治机构。而“政治”则是使用和争夺权力以影响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内容的方法。
- 2 只要有一个政治机构统治一块领土,其权威受到法律体系的保障,得到用武力执行其政策的能力的支撑,就存在一个国家。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其特征一是公民权的观念,二是承认人民拥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并意识到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三是民族主义,即感到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
- 3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权力是一个人即使遭到其他人的抵制也能够实现目标的能力,并且常常涉及使用暴力。在韦伯之后,针对这一概念又提出了几种替代理解。当一个政府可以合法地使用权力,就说它具备了权威。这种合法性来自于那些被统治者的合意。最常见的合法政府形式是民主制,同时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合法形式。
- 4 在威权制国家,公众参与被剥夺或受到极大限制。国家的需要和利益要优先于普通公民的需要和利益,而且没有任何合法机制能够反对政府或罢免某位领导人。
- 5 民主制是人民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参与民主制(或直接民主)中,决策是由受决策影响的人做出的。而自由民主制则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其中的全体公民都具有投票权,在至少两个党派中挑选一个。
- 6 近些年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大众传播以及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影响,具有民主政
- 7 府的国家数量迅速上升。但是,民主制并非没有问题。各地的人们都开始对政治家和政府解决问题、管理经济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选举制度中的政治参与正在衰落。
- 7 英国政治受到过撒切尔主义的强烈影响,这是一系列与撒切尔夫人有关的学说,她从1979年到1990年担任保守党政府的首相。撒切尔主义相信应该削弱国家的作用,扶持自由市场式企业。
- 8 工党在过去的25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在布莱尔的领导下,“新工党”已经脱离了过去的社会主义观念,包括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企业。在1997年执政以后,新工党继续推行超越传统的“左派与右派”政治的政治改革和现代化方案。这种新型的中左政治经常被看作是“第三条道路”政治。2001年新工党以绝对多数连任,并于2005年再次连任,只是领先优势有所下降。
- 9 社会运动是指在既定制度范围之外通过协同行动以增进共同利益的一种集体努力。而“新兴社会运动”这个术语则用来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是针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不断变化的风险而做出的反应。与早先的社会运动不同,新兴社会运动是指向非物质目标的单一议题运动,并且跨越阶级界限来寻求支持。对于许多新兴社会运动来说,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组织工具。
- 10 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系列象征和信念,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它伴随现代国家的发展而出现。尽管社会学的创立者认为民族主义将在工业社会里消失,但是在21世纪初,它似乎仍然兴旺发达。

“没有国家的民族”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在声称属于自己的地区没有政治主权的情况。

牵连。新式恐怖主义有赖于全球化，在其范围、组织结构和手段等方面有别于旧式恐怖主义。

11 旧式恐怖主义几乎总是与没有国家的民族有

思考建议

1. 为什么社会学应当研究政治?
2. 为什么自由民主制与资本主义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
3. 如果说西方国家坚定奉行民主制,为什么在许多国家只有那么少的人参加投票?
4. “新工党”“新”在什么地方?
5. 社会运动如何利用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6.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减弱吗?
7. 全球化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阅读指南

- Robert A. Dahl, *O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论民主》
- Elaine Ciulla and Joseph S. Nye, (eds), *Democracy.com? Governance in a Networked World* (Hollis, N.H.: Hollis, 1999). 《民主.com? 网络世界中的治理》
- F. Halliday, *Two Hours That Shook the World: September 11, 2001: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Saqi Books, 2002). 《震惊世界的两小时: “9·11” 前因后果》
- P. Griset and S. Mahan, *Terrorism in Perspective* (Thousands Oaks, CA: Sage, 2003). 《审视恐怖主义》
- M.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2001). 《新旧战争——全球时代的有组织暴力》
- Alberto 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89). 《现时的游牧民: 当代社会的社会运动与个体需要》
- Cornelia Navari,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国际主义与 20 世纪的国家》
- A. Tan and K. Ramakrishna (eds), *The New Terrorism: Anatomy, Trends and Counter Strategies* (Singapore: Times Media, 2002). 《新式恐怖主义: 结构解剖、演变趋势与对抗战略》

网络导航

原子能科学家通讯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http://www.thebulletin.org/index.htm>

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

<http://www.idea.int/>

网上现代历史手册: 民族主义 (Internet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nationalism)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modsbook17.html>

牛津研究小组 (Oxford Research Group)

<http://www.oxfordresearchgroup.org.uk/>

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国际政策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www.iiss.org/>

目录

第一节 都市风格的理论阐述	738
21.1.1 芝加哥学派	739
21.1.2 都市风格与创生环境	743
21.1.3 评估	744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	745
21.2.1 传统社会中的城市	746
21.2.2 工业化与城市化	746
21.2.3 现代城市的发展	748
21.2.4 英美晚近城市演变趋势	749
21.2.5 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化	757
第三节 城市与全球化	760
21.3.1 全球性城市	763
21.3.2 不平等与全球性城市	764
21.3.3 全球时代的城市治理	764



小结:城市与全球治理 770

本章要点 770

思考建议 771

阅读指南 772

网络导航 773



第二十一章

城市与都市空间



伦敦与纽约和东京比肩，属于世界上的“全球城市”之一，是世界经济的指挥中心，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国界（Sassen 2001）。这些全球城市是大型跨国企业的总部所在地，汇聚着大量的金融、技术和咨询服务。英国的首都拥有大约 340 万的居民劳动力，更有大量的通勤者加以补充。伦敦还拥有无以伦比的文化遗产和艺术传统，使这座动感十足、活力无限的首都地位愈发坚固。

英国的首都还是大约 700 万人口的居家所在，所操的语言超过 300 种。过去 20 年来，每年平均增加大约 19000 人。伦敦的移民规模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年龄在 20 岁至 44 岁之间的人口比例远远高于英国其它任何地方（ONS, Focus on London, 2003）。年轻人出于多种原因而迁入伦敦这样的城市，寻找工作、接受教育、浸染文化，哪怕只是为了摆脱城市之外生活的那种循规蹈矩和目光狭隘。

然而，大城市虽然能够提供丰富的机会，许多人却还是觉得这些地方让人孤独，欠缺友情。现代都市生活的一个特征就是陌生人之间的频繁互动。即使住在同一邻里或公寓，人们对自己的邻居也不太可能很熟悉。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城镇或城市，想想你一天要和自己不认识的人打多少次交道。这个名单中可能包括公车司机、商铺店员、其他学生，甚至是在街上相互一瞥的路人。单凭这一事实，就使今天城市里的生活不同于别处的生活或早先历史上的生活。

第五章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互动。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将探讨提出来理解这一过程的一些主要的都市风格理论。然后，我们将讨论城市的起源，以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城市居住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一些重要趋势。全球化自然也对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部分讨论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

第一节 都市风格的理论阐述

早期社会学家中有许多对城市和都市生活特别感兴趣。经典社会学家韦伯甚至写了一本叫做《城市》的书（在他去世后于 1921 年出版），书中将促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回溯



城市的日常生活充斥着扑面而来新的影像、印象和感觉，让人目不暇接。

到西方中世纪城市。其他早期理论家更关注城市的发展是如何既改变了物理环境也改变了社会环境。齐美尔和滕尼斯的著述为城市社会学提供了两份最重要的早期贡献,我们会在下面的图文框中予以讨论。这些思想家深刻影响了日后的城市社会学家。比如罗伯特·帕克,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位核心成员,就曾在19、20世纪之交负笈德国,在齐美尔手下学习过。

21.1.1 芝加哥学派

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系的一批学者,特别是罗伯

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和路易斯·沃思,创见迭出,多年以来一直是城市社会学理论和研究的重要基础。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芝加哥学派创立的两个概念:一是城市分析中所谓的生态学思路;另一个是沃思提出的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括(Wirth 1938; Park 1952)。

一 城市生态学

生态学是从自然科学中借用的术语,它是指研究植物和动物有机体如何适应其环境。“生态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用在一般性的环境问题的探讨中(参看第十九章)。在自然界,有机体往往系统地分布在地表,从而实现

探讨城市生活的早期理论家

格奥尔格·齐美尔与“城市的心智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是研究城市生活的最早一批理论家之一,阐述了城市如何形塑了其居民的“心智生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现代生活”(Simmel 1903)中主张,城市生活中,大量的图像、印象、感觉和活动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这与小城镇或村庄“更为缓慢、习惯性的、平稳流动的节奏截然不同”。齐美尔认为,城市居民会变得越来越世故和冷漠,以此在“出乎意料的猛烈刺激”和“变幻不定的图像”的冲击面前求得自我保护。他们屏蔽了周遭的许多杂音,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上,这样才能应付过来。在齐美尔看来,这种老于世故的厌烦态度(*blasé*)的结果就是,尽管城市居民置身“都市洪流”(metropolitan crush),但在情感上却彼此相隔遥远。齐美尔通过这样来阐述现代大

都市的生活,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明了那些人为什么会抱怨城市生活欠缺友情或令人孤单。

费迪南德·滕尼斯:从共同体到社会体

滕尼斯是齐美尔的同时代人,也关注城市生活对于个体所产生的效应。他提出,都市化是与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他不无感怀地勾勒了其所谓共同体(*Gemeinschaft, community*)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失落,他认为这种共同体的特点就是基于密切关联的传统纽带,邻里朋友之间有着人身化的稳定关系,并且对某人的社会位置有着清晰的理解(Tönnies 1887)。

滕尼斯进一步提出,共同体正被社会体(*Gesellschaft*)逐渐取代。按照他的概括,社会体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或社团,^①是基于变动

① 因此我们没有按照中文常见的译法“共同体”与“社会”。费孝通先生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译法也只是从一个角度选择了这两种类型的典型特征。滕尼斯此书的英译本书名旧译为“Community and Society”,新译为“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凸显的也就是今日之“社会”无非近世以来“市民社会”这一特定的类型。

不定的工具性关系。从以共同体为核心的社会生活转到以社团为核心的社会生活，这是现代转向更具个体主义的社会趋势的一部分。在这种社会里，关系一般专属于特定的场景和意图，只考虑人的某一部分。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城市

里搭乘公车，我们与司机之间的互动就可能仅限于上车买票时的简短交流，他对于我们的用场也将仅限于有能力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滕尼斯的看法和齐美尔一样，都认为城市是一处充满陌生人的场所。

不同物种之间的某种平衡或均衡状态。芝加哥学派认为，主要城市居民区的位置，以及其中不同街区类型的分布，都可以根据类似的原理来理解。城市并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而是对于环境中的有利特征的反应。例如，现代社会的大城市区域往往是沿着河岸，在富饶的平原地区，或者在商路或铁路的交汇处发展起来的。

用帕克的话来说，“城市一旦建立起来，就好像一套巨大的筛选机制，……准确无误地从人口总体中筛选出最适合在某个特定区域或环境（milieu）生活的人”（Park 1952, 页79）。通过同时发生在生物生态系统中的竞争（competition）、侵入（invasion）以及继替（succession）的过程，城市被安排成有序的许多“自然区域”。假如我们考察一下自然环境中一片湖泊的生态系统，就会发现，各种鱼类、昆虫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竞争会达到一种相当稳定的平衡状态。如果新物种侵入，并试图在湖中安家，这种平衡就会被扰乱。一些习惯于在湖中心繁殖的生物，可能会被驱赶出来忍受较不稳定的湖边生存环境，而侵入的物种则成为中心区域的继任者。

根据生态学的观点，城市中的定位、迁移以及重新定位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城市居民在努力谋生的过程中会做出适应性调整，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街区。城市可以被看成是一幅地图，由各种社会特征不同甚至互相对立

的区域所构成。在现代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业集中在可以很方便地获取所需原材料和靠近供给线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居民与日俱增，工作场所也越来越多样化，并各自成为核心发展起人口群集。与此相应，生活福利设施的发展也更具吸引力，而对它们的需求则又引发了更多的竞争。除了那些因为环境拥挤或房屋破败而租金低廉的地方以外，土地价值和财产税飙升，从而使家庭在城市中心区难以维持生活。中心区开始被商业和娱乐行业所占据，同时，更富裕的私有住户开始迁移到城市周边新形成的郊区。这个过程是沿着交通路线进行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减少花在上班路上的时间；而在这些路线之间的地区发展得就比较慢一些。

城市可以被看成是由若干同心圆环（concentric rings）所组成的，每个同心圆环又被分成若干分区（segments）。在中心是内城区，由大型商业地产和衰败的居住区混合组成。在这之外是旧城区，居住着从事稳定的体力劳动职业的工人。再向外是郊区，往往由收入较高的群体居住。侵入和继替过程发生在同心圆环的不同分区内。因此，当中心或近中心地区的地产衰退时，少数族群就可能开始向内迁移。当他们这样做时，更多以前在这里居住的人就开始迁出，加速了向城市中其他地区或郊区的全面迁移。

尽管城市生态学方法有一段时间声名不再,但后来它又在一批学者的著作中重焕生机,被重新阐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莫斯·霍利(Hawley 1950,1968)。霍利的观点与他的前辈不太一样,他并没有特别关注稀缺资源的竞争,而是强调不同城市区域之间的互赖(interdependence)。人类适应其环境的主要方式是分化(differentiation),就是指群体和职业角色的专门化。那些被更多群体依赖的群体将拥有支配性角色,并常常体现于它们所处的中心地理位置。例如,对社区的很多人来说,像大银行和保险公司这样的商业群体提供了很多关键性的服务,因而它们通常位于住区的中心。但是霍利指出,在城市地区里所发展出来的区域(zone)并不仅仅源于空间上的关系,也源于时间上的关系。例如,商业的主导地位不仅表现在土地使用的模式上,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节奏上,比如上下班所形成的交通高峰就是一例。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秩序就反映了城市中街区的等级高下。

生态学思路对于经验研究所起的促进作用,如同它在理论上的价值一样重要。对于整体城市以及具体街区的众多研究,就是由生态学思维所促成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侵入”和“继替”过程。然而,对此也可以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批评。生态学视角往往低估了有意识的设计和规划在城市组织架构中的作用,把城市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由帕克、伯吉斯及其同事们所提出来的空间组织模型是从美国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并且只适合美国的某些城市类型,更不用说欧洲、日本和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了。

二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风格

沃思有关都市风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提法的重点所在,与其说是城市内部的分化,不如说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的都市风格的内涵。沃思注意到:

当代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都市的”,单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能做出充分的或准确的衡量。城市对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因为城市不仅日益成为现代人的居住空间和工作场所,而且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发动中心和控制中心,把世界上最遥远社区的人也拉入它的轨道,把这些千差万别的地区、人群和活动编织到同一个宇宙中来。(Wirth 1938,页 342)

沃思指出,在城市里,大量的人毗邻而居,但对其他大多数人却并没有切身的了解,这与小型的传统村落有着根本不同。城市居民之间的绝大多数接触是短暂的、局部的,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令人满意的关系本身。与商店售货员、银行出纳员、列车检票员的交往,只是短暂的邂逅;人们介入其中并不是为了关系本身,而是把它们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由于在都市区域里生活的人往往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所以他们之间的纽带比较微弱。人们每天都出现在很多不同的活动与场所之中,“生活步调”要比乡村地区快。竞争要比合作更为普遍。沃思也承认,城市中社会生活的密度导致了有着显著特色的邻里的形成,其中有些可能保留了小社区的特点。例如,在移民区可以发现传统类型的家庭间关系,即大多数人都对另外大多数人有切身的了解。然而,这些地区越是被纳入广阔的城市生活模式,这些特点保存下来的就越少。

沃思的观点获得了应有的广泛认同。不可否认,现代城市中的许多日常接触都是非人身化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也确实如此。沃思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认识到都市风格并不只是某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体现和影响了更广大的社会系统

的性质。都市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是整个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而不是那些碰巧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的特殊行为。然而,沃思的观点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同生态学思路一样,沃思的理论也主要是基于对美国城市的观察,但却推论到各个地方的都市风格。都市风格并不是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致的。比如,如前所述,古代城市在很多方面都迥异于现代社会中的那些城市。对早期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城市生活并不比在村落社区中更具匿名性或非人身化。

沃思也夸大了现代城市的非人身化特征。在现代城市社区中,由亲密的朋友或亲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要比他所设想的更为持久。沃思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埃弗雷特·休斯如此评价他的伙伴:“沃思常常谈到城市是如何如何非人身化,同时却生活在显然基于人身化基础的一大堆亲朋好友之中。”(转引自 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 在现代城市中,如赫伯特·甘斯所说的“都市里的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也很普遍(Gans 1962)。他的“都市里的村民”概念是指居住在波士顿内城区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在美国城市中,这种“白人族群”社区的地位或许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重要,但是它们正被容纳新移民的内城社区所取代。

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似乎经常是积极主动地创造出了包括亲密的亲属关系和人际联系的邻里关系;它们不只是以前在城市生活中曾经存在过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克劳德·菲舍尔曾进一步解释(Fischer 1984),为什么大规模的都市风格实际上往往会促进多种多样的亚文化,而不是把所有人都吞噬到一团无名的大众之中。他指出,那些在城市中生活的人,能够与其他具有相似背景或兴趣的人合作,发展出地方性的联系;而且他们可以参与各具特色的宗教、族群、政治和其他亚文化群体。一座小镇或村庄就不可能发展出如此多样的亚文化。例如,那些在城市中形成族群社区的人,可能原本对他们出生地的其他人很少

了解或根本就不了解。但在移居城市之后,他们往往会聚居到来自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所生活的地区,于是新的亚社区结构就形成了。一个艺术家很少有可能在一个村子或小城上发现可以联系的人,而在大城市中,则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和思想亚文化群体中的一员。

大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然而它支持并创造了人身关系。这并不是自相矛盾。我们必须把都市体验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与陌生人相遇的公共领域,另一个是家庭、朋友与同事之间的更具私人性的世界。当一个人第一次到大城市的时候,“结识人”可能是很困难的。但是当你移居一个已经定型的农村小社区,你可能会发现,居民的友好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公开场合的礼貌。你可能要经过许多年才会被“接受”。而城市中就不至于这样。正如爱德华·克鲁佩特所言:

城市蛋……不是那么容易破壳而出的。因为缺乏结识的机会和环境,很多人日复一日地在公共汽车站或地铁站、在咖啡馆或工作时经过的门厅相遇,但他们从来也只限于“熟悉的陌生人”。一些人因为缺乏社交技巧或动力,也可能完全被排斥在外,然而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因为陌生人的多样性——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朋友,同时还有城市生活方式和兴趣上的广泛性,人们确实能从外部进入到城市中来。而且,一旦他们进入到一个群体和网络中,扩展他们关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其结果,有证据表明,城市中正面的机会似乎经常超过限制性的力量,以允许人们发展和维持令人满意的关系。(Krupat 1985, 页 36)

沃思的观点依然有一些根据,但是基于日后的论著来看,它们显然过于泛化了。现代城

市经常包括非人身的、匿名的社会关系,但它们也是多样性的来源,而且有时也是亲密关系的来源。

21.1.2 都市风格与创生环境

关于都市风格,更晚近的一些理论强调,它并不是一个自主的过程,必须结合政治和经济变迁的主要模式来综合分析。城市分析的两位领军学者大卫·哈维(Harvey 1973, 1982, 1985)和曼纽埃尔·卡斯特(Castells 1977; 1983)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一 哈维:空间的重构

哈维广泛借鉴了马克思的观念,强调都市风格是由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张所带来的创生环境的一个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城市和乡村是明确分化的。而在现代世界,工业模糊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区别。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并且正如工业生产一样,是单纯根据价格和利润方面的考虑来经营的,这个过程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在社会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哈维指出,在现代城市风格中,空间被不断重构。这个过程不仅取决于大公司选择在何处安置它们的制造工厂和研发中心,还取决于政府对土地和工业产品的控制,以及私人投资者买卖房产和土地的行为。比如说,工商企业不断权衡新地点与已有地点的比较优势。一旦出现更廉价的生产场地,或者当公司转产新产品时,办公处所和制造工厂就会在一地关张而另外择地开办。因此,当一段时期里预期利润很可观时,在某个大城市中心就可能会出现写字楼的骤然增多。一旦写字楼建成,城市中心区被“重新开发”,投资者又会开始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投资和建设机会。但是如果金融气候发生变化,在一个时期可以赢利的东西,到了另一个时期就未必还能如此。



现代城市看起来或许颇为悖谬,有着自相矛盾的潜力,既有可能是非人身性的,同时又是高度群居性的。伦敦的中国城就很好地例示了,一个织造紧密的族群社区是如何能够在城市中打造亲密,同时又有助于其多样性。

私人购房者的行为深受工商业界购置土地的程度与地点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所规定的购房贷款利率和契税额度的影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各大城市的郊区急剧扩张,这部分是由于族群歧视以及白人从内城区迁走所造成的。然而,哈维提出,这种扩张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有了政府向购房者和地产商提供的税收减免,以及金融组织所设立的特别信贷。这些措施为在城市边缘地区建造和购买新房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对汽车这样的工业产品的需求。在英格兰,南部大小城镇在战后规模扩大,日渐繁华,

是直接和北部老工业的衰落以及投资随之转向新的工业机会相联系的。

二 卡斯特：都市风格与社会运动

同哈维一样，卡斯特也强调，社会的空间形式是与它的整体发展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理解城市，我们就必须把握创造和转变空间形式的过程。城市和街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和冲突。换言之，城市环境是更广大的社会力量的符号和空间呈现。例如，建设摩天大楼可能是期望它们能带来利润，但是巨大的建筑物也“通过技术和自信象征了金钱在城市中的力量，是上升期中的法团资本主义^①的大教堂。”(Castells 1983, 页 103)

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不同，卡斯特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独特的地点，也就是城市区域，而且把它看作是集体消费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过程又成为工业资本主义一个内在的方面。学校、交通服务和休闲设施都是人们集体性地“消费”现代工业产品的方式。税收体制影响了谁能够在哪里买房或租房，以及谁能在哪里建房。大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为建筑项目提供了资金，因而也就对这些过程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是政府机关通过修建道路和公有房屋，规划作为新开发项目不得逾越的红线的绿化带等，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因而，城市的物质面貌是市场力量和政府权力两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

但是，创生环境的本质并不只是有钱人和有权人活动的结果。卡斯特强调了弱势群体改变自身生活条件的斗争的重要性。城市问题刺激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包括改进居住条件、抗议空气污染、保护公园和绿化带、反对破坏特定区域性质的建筑开发等。例如，卡斯特研究了旧金山的同性恋运动。该运动成功地围绕

自身的文化价值来重构街区，允许众多同性恋组织、俱乐部和酒吧出现，而且在地方政治中获得了显著地位。

哈维和卡斯特两个人都强调，城市几乎完全是人类自己建造的人工环境。甚至大部分农村地区也逃避不了人类干预和现代技术的影响，因为人类活动已经对自然界进行了重新塑造和安排。食物并不是为本地居民生产的，而是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生产的。此外，在机械化农业中，土地被精确地分割成块，各有专用，并被整理成与环境的自然特征没多少关系的形状。那些在偏僻的乡村以农为生的人，不管其行为方式与城市居民有多么不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也是与更大的社会相联系的。

21.1.3 评估

哈维和卡斯特的观点引起了广泛争论，而且他们的著作对于为城市研究重新定向也起了重要作用。同生态学家的思路截然不同，它不是强调“自然的”空间过程，而是关注土地和创生环境如何反映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权力体系。这标志着研究重点的重大转移。然而，哈维和卡斯特的思想常常是以高度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所以并没有像芝加哥学派的著作那样激发各式各样的经验研究。

哈维和卡斯特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之间，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有益互补的，可以结合起来，为各类都市进程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图景。城市生态学所描述的城市区域之间的明显差别确实存在，而城市生活总体上的非人身化也是如此。但实际情况比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们所认定的更富于变化，并且主要是受到哈维和卡斯特所分析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支配。约翰·罗根和哈维·莫洛奇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把哈维和卡斯特等学者的视角与生态学立场

^① 本书前文为求上下文统一，曾译“企业资本主义”。



和其他东西一样,土地和房产也是可以买卖的,反映着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权力体系。

的某些特性直接联系起来(Logan and Molotch 1987)。他们同意哈维和卡斯特的观点,即在各国范围和全世界范围发生的经济扩张的整体特性相当直接地影响了城市生活。但是他们也指出,这些范围广泛的经济因素,也是集中在地方性组织的渠道,包括街区的工商企业、银行和政府机构,以及个人购房者的活动。

罗根和莫洛奇认为,场所(包括土地和建筑物)就像现代社会中的其他商品一样,是可以买卖的。但是构造了城市环境的市场却为不同群体如何使用这些买卖的地产业的意愿所左右。这个过程酿成了许多紧张和冲突,而这些紧张和冲突正是塑造城市街区结构的关键因素。例如,罗根和莫洛奇指出,在现代城市,大型金融和工商企业不断试图提高在特定地段的土地利用率。土地利用率越高,就越有可能

进行土地投机,也就越有可能从事有利可图的新房开发。这些公司并不怎么关心它们的活动对于一个既有街区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比如富有魅力的古旧房屋是否被毁灭,为新的大型写字楼群腾出空间。由大型地产开发公司推动的经济增长,经常是与当地工商业或居民的利益相违背的,而后两者也有可能积极尝试进行抵制。人们会聚集在街区团体旗下,捍卫他们作为居民的利益。这类地方团体发动宣传攻势,要求扩大区域限制,阻止在公园用地上建设新建筑,或争取更有利的房租制度等等。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

尽管在古代城市里也有大城市,比如欧洲的雅典和罗马,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城市生活

是与前朝往时所经历的城市生活相当不同的。就像齐美尔和滕尼斯等早期社会学家所揭示的那样,现代城市的发展改变了人们感觉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彼此互动的方式。本节中,我们来看看城市的进展,从传统社会中的城市肇始,到城市发展最晚近的一些趋势,既有西方世界的,也有全球性的。

21.2.1 传统社会中的城市

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在埃及的尼罗河河谷,现在位于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今天属于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传统社会中的城市是非常小的。比如巴比伦,作为最大的古代近东城市之一,占地面积也仅有 3.2 平方英里,在其顶峰时期,即大约公元前 2000 年,人口或许也不超过 1.5 到 2 万人。公元前 1 世纪奥古斯都皇帝治下的罗马,仅以大约 30 万居民之数,就轻易成为前现代时期中国之外最大的城市,这大致相当于今天英国的考文垂 (Coventry) 或唐克斯特 (Doncaster) 的人口规模。

古代世界的绝大多数城市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它们通常环绕着高墙,充当某种军事防御,并凸显了城市社区与乡间的分离。占据城市中心区域的,通常是神庙,王宫,政府和商业建筑,还有一座公共广场。这块典礼、商贸和政治中心有时还会被裹绕在第二道内墙之中,通常非常狭小,只能容纳一小部分臣民。尽管中心通常包含一座市场,但与我们在现代城市中心所看到的商业区大为不同,因为主要建筑物几乎始终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 (Sjoberg 1960, 1963; Fox 1964; Wheatley 1971)。

统治阶级或精英的居所往往会聚在中心

近旁。而弱势群体则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或干脆是在城墙外,在城市遭到攻击时才避往城内。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社群常常被分配到各自分离的街区,其成员在各自区域中生活和工作。有时候,这些街区也被街墙所环绕分隔。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是难以确定的。由于缺乏任何印刷机器,公共官员不得不尽可能高声喊叫,传递告示。所谓“街道”,常常只是尚无任何人建造房屋的条状地。有几个传统文明自诩拥有连接各大城市的成熟的道路体系,但这些道路主要是用作军事目的,其中大部分地方的交通十分缓慢,条件有限。民众之中,只有商人和兵士定期长途旅行。

虽然城市是科学、艺术和普世文化的主要中心,但它们对于本国其他地方的影响始终是很有限的。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城乡之间保持着明确的分离。绝大多数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小型社区,很少会遇到城里来的国家官员或商人。

21.2.2 工业化与城市化

人现代最大的城市和前现代文明中最大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照。工业化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城市大约有 2 千万人口。而都市丛,即许多城市和城镇聚集在一起,形成连绵网络,可以容纳的人口还要多。当代城市生活的极致形式表现为所谓的特大城市,即“众城之城”(city of cities)。这个词最初产生于古希腊,指的是一个梦想成为所有文明羡慕对象的城邦,但现在的用法与这个乌托邦没有太大关系。在现代,它首先被用来指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大约 450 英里长的大都市区,北起波士顿,南到华盛顿。这里居住着 4000 万人口,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英里 700 人。



特大城市——天堂抑或地狱？

英国是最早经历工业化的国家,这个过程开始于18世纪中期。工业化的过程也带动了愈益增强的城市化,也就是人口离开乡村土地,迁入城镇和城市。1800年,英国人口中只有不到20%居住在居民超过1万人的城镇或城市里。而到1900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74%。英国首都伦敦在1800年大约有110万人口,而到20世纪初,它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700万。那时伦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是庞大的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中心,处在扩张中的不列颠帝国的中心。

在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以及美国,城市化发生得要晚一些。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一旦城市化起步,它的发展速度甚至会更快。在1800年,美国与同时期的欧洲领先国家相比,更称得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的人口只有不到10%居住在规模超过2500人的社区。而今天,

超过四分之三美国人符合这一标准。从1800年到1900年,纽约的人口从6万猛增到480万。

城市化现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愈益被卷入这一进程。在1950年,世界人口中仅有30%是城市居民,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达到47%,合29亿人。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60%,合50亿人。依照目前的变化速度,到2007年,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数将超出居住在乡村地区的人数。现在绝大多数的城市化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从2000年到2030年,较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增加超过20亿,从大约20亿增加到大约40亿。与此相反,如表21.1所示,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的预计增加数要缓慢得多,仅从2000年的9亿增加到2030年的10亿(UN 2001)。

表 21.1 按照发展水平分世界各地的城市化,1950、1975、2000 及 2030 年(预测)的数据

	人口(单位:10 亿)			
	1950	1975	2000	2030
总人口				
世界	2.52	4.07	6.06	8.27
较发达地区	0.81	1.05	1.19	1.22
较不发达地区	1.71	3.02	4.87	7.05
城市人口				
世界	0.75	1.54	2.86	4.98
较发达地区	0.45	0.73	0.90	1.00
较不发达地区	0.30	0.81	1.96	3.98
农村人口				
世界	1.77	2.52	3.19	3.29
较发达地区	0.37	0.31	0.29	0.21
较不发达地区	1.40	2.21	2.90	3.08

资料来源:UN (2001)

21.2.3 现代城市的发展

只是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统计学家和社会观察家才开始区分城镇与城市。拥有大量人口的城市被认为通常会比较小的人居中心更具有普世性质,其影响超出了它们所属的国内社会。

城市的扩张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长,以及外部人口从农场、村庄和小镇迁移到城市。这些迁移常常还是国际性的,一些人从农村地区直接迁往他们所去国家的城市。大量的欧洲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迁移到美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跨国迁入城市在欧洲内部的国家之间也很常见。由于在乡村地区缺乏发展的机会,而相比之下城市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吸引力,据说那里的大街上简直是“遍地黄金”(“paved with gold”,工作、财富、丰富的商品和多样的服务),这使得农夫和村民纷纷迁往城镇(今天,大规模的同类迁移正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此外,城市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力量汇聚

之地,有时候创业者们几乎是平地打造起新的城市。

现代城市的发展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方式,而且对思维和感受方式也有影响。从 18 世纪最初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聚结开始,有关城市对社会生活影响的观点就已经呈现两极分化。一些人认为,城市代表了“文明的美德”,是生机活力和文化创造的源泉。在这些人看来,城市使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机会,而且提供了令人舒适满意的生活条件。其他人则把城市看作是一座冒烟的地狱,到处是寻衅滋事、互相猜疑的人群,到处是犯罪、暴力、腐败和贫困。

随着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张,许多人倍感震惊,发现不平等和城市贫困似乎也相应加剧了。城市贫困的程度,城市街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带动了早期有关城市生活的社会学分析。最初有关现代城市状况的重要社会学研究以及理论出自芝加哥,这并不让人惊奇,因为这座城市正是以发展速度惊人闻名,1830 年代时它还是一片几乎无人居

住的区域,到了1900年,它的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两百万。同样闻名的还有它显著的不平等。

21.2.4 英美晚近城市演变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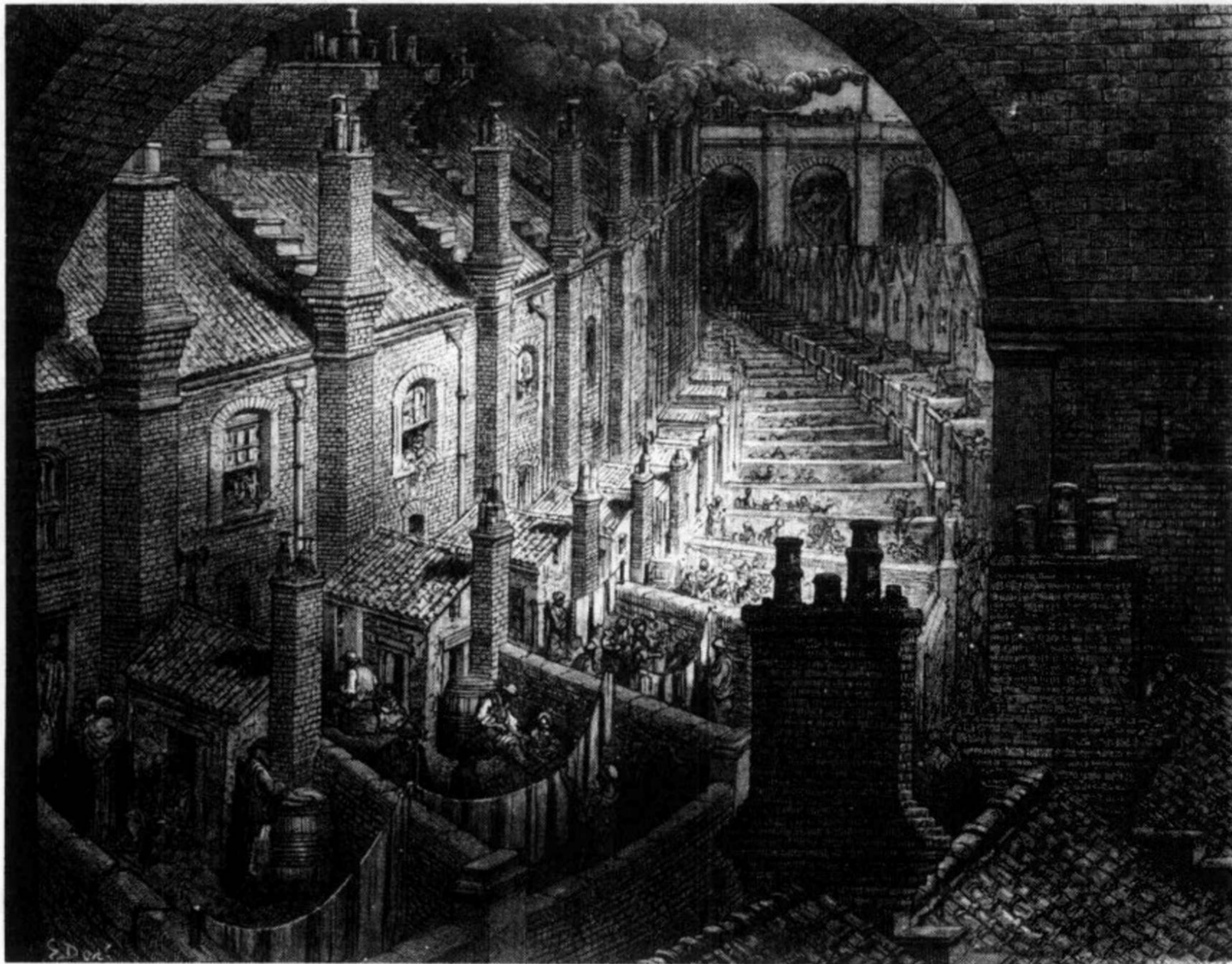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以英国和美国为例,考虑战后西方城市发展的一些主要模式。我们将重点关注郊区的兴起、内城区的衰落以及旨在城市更新的策略。

一 郊区化

在美国,郊区化过程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达到高峰。在那几十年间,美国城市的中心区扩张幅度在10%左右,而郊区则达到了

48%。绝大多数迁往郊区的人口来自白人家庭。在学校推行种族融合政策是促使许多白人决定从内城撤离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那些希望把孩子送到全是白人的学校里去的家庭,迁往郊区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直到今天,美国的郊区人口仍然以白人占绝大多数。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开始迁入美国的城市郊区,白人原有的统治地位正在被削弱。根据2000年度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少数种族或少数族群占了郊区人口的27%,而1990年时这一比例仅为19%。和20世纪50年代开始避往郊区的人们一样,迁往郊区的少数族群成员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员。他们迁往郊区,也是在追求更好的住房、学校和生活设施。根据芝加哥住房当局负责人



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作家认为,曼彻斯特和利兹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城市乃是堕落之集聚,罪恶之渊藪。

的说法：“现在，郊区化不再与种族有关了，而与阶级有关。没有人愿意与穷人为邻，因为所有问题都是与穷人联系在一起的：破旧的学校，危险的街道，还有黑帮。”（转引自 De Witt 1994）。

在英国，伦敦周围的许多郊区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它们集中在新铺设的道路两边，以地铁相互连接，可以把通勤者送到城市中心区。有些都市生活的忠实信徒对于郊区的大规模扩张，对于那些散落在英国城市边缘的半独立别墅和它们精致的花园表示蔑视；而另一些人，比如诗人约翰·贝奇曼（1906—1984），则欣赏郊区建筑那种别具一格而又不失分寸，以及把城市的就业机会与郊区生活方式结合起来的冲动，这种生活方式从实际角度是与自有房产和私家轿车分不开的，

而在价值角度上则维系着传统的家庭生活。

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人口外迁到周边的郊区和睡城（dormitory towns，即主要由在城里工作的人居住的位于城市边界外的城镇），甚至是村庄，使得这一时期大伦敦区的人口减少了50万左右。在这一时期，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镇，制造业迅速衰落，也减少了不少内城区的人口。但与此同时，许多小城市和城镇却迅速发展，比如剑桥、伊普斯威奇（Ipswich）、诺里奇（Norwich）、牛津和莱斯特。“郊区潮”（flight to the suburbs）对于英美城市中心的健康和活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在下面的图文框中将会看到，郊区化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城市的“社会性别化”

有几位作者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考察城市是如何反映了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并寻求破解之道。

乔·比尔（Beall 1998）曾经指出，如果说社会关系，在这里就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由权力支撑的，那么城市就展现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关联：该建造什么，在哪里建造，要如何建造，又为谁建造。比尔写道：“城市简直就是有关社会过去曾经如何、现在实际如何和未来应当如何的观念的具体写照。”

城市在19世纪的成长是和社会性别的分离相维系的。公共生活和空间由男性支配，他们可以在城市里随心所欲地旅行。而在绝大多数公共场所都应当不太可能有女性出现，如果真有，很可能被视为妓女或“流莺”（street walkers）。

随着郊区化过程的开始，社会性别的分离变

得更加明显。男性户主每天通勤，去城里上班，而女人（妻子）则被认为应当呆在家里，打理家务。在郊区和中心城区之间有交通设施以便出行，但其男性设计者们却很少考虑郊区之间的交通，这就使得女性更难外出了（Green 1994）。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威尔逊提出，城市的发展对于女性也并非百无一利。她认为，有些女性主义者把女性在城市里的角色化简为单纯的牺牲品。但威尔逊指出，事实上，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非城市的生活形式所不能提供的机会。随着城市里女性白领工作的兴起，以及稍后服务业的扩张，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场。城市为女性提供了就业岗位，以摆脱家中的无薪劳动，而这些岗位在城市生活之外是不存在的（Wilson 2002）。

二 内城区的衰败

在美国,所有大城市在过去几十年中突出表现了内城区的严重衰败,这是郊区发展的直接结果。高收入群体从城市中迁出,意味着地方税收的损失。那些留下来或取代他们的人大多是穷人,因此弥补这些收入损失的机会不大。而如果在中心城区提高税率,那么较富裕的群体和工商企业就会更进一步向外迁移。

当中心城区的建筑变得比郊区更加破败,犯罪率上升,失业率增高时,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因而,必须在福利事业、学校、建筑维护、警察和消防服务方面有更多的花费。郊区越扩展,城市中心的问题就会越严重,因而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美国许多城市地区,特别是纽约、波士顿或华盛顿等老城市,其结果令人震惊。在这些城市的某些街区,地产的衰败程度可能要比工业化世界中的其他任何大城市地区都要严重。破败的公寓楼、封闭的空楼以及烧毁的建筑群矗立在布满瓦砾的空地中间。

在英国,内城区的衰败程度没有美国那么显著。但是有些城市的内城区则与美国城市的许多街区一样破败。英国国教会一份重要报告《城市中的信仰》用黯淡的语气形容内城区:

灰暗的墙壁,肮脏的街道,封死的窗户,涂鸦,拆毁的建筑物和废墟,这些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教区和堂区令人绝望的标准形象……内城区的建筑比别处的更旧。全英格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住宅建于1919年以前,而在内城区,这一比例高到40%至60%。(Church of England 1985)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已经影响了许多这类地区的财政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政府就对地方当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限制其预算,削减其本地服务,即使在

衰败最严重的内城区也是如此。如果地方当局超过了全国统一制定的开支水平,就会受到惩处。这就导致政府和许多负责经管困顿中的内城区的市政会之间产生了激烈冲突,如果按照既定的预算,它们难以应付。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引入的人头税(官方称为社区费)更进一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虽然由于招致广泛的反对呼声,包括1990年在几座城市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人头税最终被取消,但许多市政会还是发现自己岁入减少,因而不得不削减许多曾被广泛认为是基本服务的项目。

英国的内城区衰败也与全球经济的变化有关系。近年来,新加坡、中国台湾或墨西哥等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常常远远低于英国这样的国家,这使其成为制造业眼中富有魅力的选址。为了回应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些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和(联邦)德国,实行经济转型,其活动类型需要高投资,需要一支教育良好的高技能劳力队



伍。保罗·哈里森在其经典研究《内城之内》中(Harrison 1983),考察了这些全球变迁对于哈克尼区(Hackney)的影响,该市仍属于伦敦最贫穷的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国性的衰退,哈克尼区的制造部门也经历了严重衰退。区内的制造业职位数量从1973年时的45500个,下降到1981年时的27400个,下降了40%。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哈克尼市的男性失业率大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到了1981年,这个比率已经上升到17.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0%)。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工作,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哈里森如此概括这种弱势人群汇聚的效应:

地方政府资源匮乏,有时候也缺乏合格的职员;卫生服务糟糕,因为医生不能找到体面的住所,要不就很像是私人开业;教育成就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低下,学业能力平均较低;最后,犯罪、破坏他人或公共财物以及家庭破裂的比率都很高,只要来自不同文化的社群比邻而居,就会产生基于宗教或种族的冲突。

有时候,这些多重劣势相互重叠并达到一定强度,就会爆发公开的城市冲突和暴乱。

有关内城区衰败所导致的问题,详参第九章第四节第四小节讨论“底层阶级”,第十章第二节讨论社会排斥。

骚乱

在这个全球化、人口迁移和迅速变迁的时代,大城市已经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诸多问题集中并深化的体现。在城市中许多“不可见”的断层之间,经常经历着类似于地震的社会动荡,一般是由失业和种族张力所制造的。长久酝酿的张力冲出了表面,有时候演化成暴烈的

骚乱、劫掠和大规模的破坏。

1992年春天,在美国就发生了这种状况,骚乱吞噬了洛杉矶的一些地区。时任住房与城市开发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亲自飞往该城调查事态发展,他这样描述道: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四处冒烟的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烧糊了的电线和塑料的气味。浓烟甚至模糊了在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的光线。消防车队从一个着火点向另一个着火点呼啸而去,警笛每隔几秒钟就响起一次。实际上由20辆车组成的加州公路巡警队护送,要用巡警车来保护消防队员……那个星期四晚上,洛杉矶真正是一场都市大灾难(apocalypse),就像一支正在燃烧的橙子;一种全方位、全身心的冲击;人们双眼茫然,完全疯狂,只有一种声音在远处轰鸣。(Cisneros 1993)

骚乱同样困扰着英国的街区;比如1981

漫画^①



① 屋宅铭牌文字为:“1872年建造,1976年富人化”



2001年7月在布拉德福德爆发的骚乱,导火索就是当地白人社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

年、1985年和1995年在伦敦南部的布瑞克斯顿(Brixton),1991年在加的夫(Cardiff)的厄利(Ely),以及2001年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欧德海姆(Oldham)、伯恩利(Burnley)和里奇特格林(Lidget Green)。2001年的骚乱涉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族群背景的成员之间的冲突,他们攻击警察,破坏财产。

在2001年的骚乱之后,政府成立了一个社区结合评估小组(Community Cohesion Review Team),由泰德·康特勒领头,就骚乱的起因提出一份报告。报告发现,在英国的城市地区,不同族群社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极化对立。报告提出,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加剧了这种分裂。比如说,教育安排、志愿团体、就业模式、礼拜场所和所操语言都是各自分开的。报告所访谈的一位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如此概括这一状况:“我和你会完这次面,就会回到家里,直到下个礼拜回到这儿,这中间看不

到另一张白人的脸。”报告指出:

在这种氛围下,没有做出什么尝试,要努力探索明确的价值观念,把重点放在作为一位生活在现代多种族聚居的英国的公民意味着什么;许多人依然在回味属于单一文化社会的那些据说幸福宁静的日子,要么就求诸他们的祖国,以获得某种形式的认同。

报告建议,需要增强社区结合,其基础是共同构成英国的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接触和相互尊重。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确立更明确的公民权意识,其基础是社区的所有部分所分享和遵守的(几条)共同原则。这种公民权概念也将更为尊重文化差异。”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报告诉诸受到年青人深刻影响的资讯翔实的全国讨论,并明确希望这场争论

将会导向新的公民权概念,创造更为协调一致的思路来探讨教育、住房、复兴和就业等议题。报告还提议,起草地方“社区结合计划”,促进跨文化接触,以便培育尊重,戳穿文化迷思,并设立新的社区结合任务队伍(Community Cohesion Task Force),以监管这些进展(社区结合评估小组的独立报告,Community Cohesion Review Team 2001)。2005年下半年,在法国的许多城市,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破败失修,激化了族群张力,导致了骚乱,在整个欧洲重新引发了有关移民和族群关系的讨论(参看第十三章第三节)。

三 城市更新

地方、地区乃至全国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应对严重困扰内城区的种种复杂问题?城市郊区的迅速扩张应当如何控制,才能使绿地和乡间免遭侵蚀?制定一项成功的城市更新政策是颇具挑战的,因为它要求多线协调行动。

在英国,政府引入了一系列全国性方案,包括像提供给业主的房屋修缮贷款,或者税收优惠以吸引企业,试图使内城区起死回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启动了一系列政府计划,探索城市复兴的不同方法。比如说,1988年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城市行动”(Action for Cities)计划,更多的是寻求私人投资和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改善,而不是通过国家干预。然而,来自商界的反应远比预期的来得淡漠。因为内城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似乎难以克服,所以一旦不能速见成效,这些计划往往半途而废,或是另起新政。

研究表明,除了零散的样板工程外,靠提供激励机制并指望私营企业去解决内城区的社会问题,成效并不理想。在内城区中,众多困顿情势交织在一起,一旦走向衰败,要扭转这一过程,无论如何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些关于内城区衰败的研究报告,比如调查1981年布

瑞克斯顿骚乱的《斯卡曼报告》(Scarman Report, Scarman 1982)就指出,在内城区问题的解决上缺乏协调的思路。政府一时半会儿不太可能提供强大的公共开支,没有这个基础,根本改进的可能性事实上是非常渺茫的(Macgregor and Pimlott 1991)。

1997年当选上台的工党政府启动了两项重大复兴资助:一是社区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一是街区更新基金(neighbourhood renewal fund)。其他资助来源是以特定活动为核心的,在协助城市更新方面也很重要,包括来自国家彩票的分成,资助卫生、就业和教育方面的行动特区,住房公司(Housing Corporation)为新建社会房屋发放现金,其中60%用来支持复兴计划。目前的计划与早先的计划之间有一点重大差异,就是早先的项目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复兴的物质性质,尤其是住房,而后来的方案则试图同时激励社会复兴和经济复兴。

社区新政是工党政府树为旗舰的复兴计划。它于1998年启动,目前在全英国已有39个社区开展有关项目。迄今为止,已有大约20亿英镑被承诺在十年内投放到这些项目上。方案的主要目标在于减少最贫困地区的劣势,办法是重点关注以下五项特定议题:穷人的工作前景,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教育成就低下,健康卫生糟糕,以及住房和物质环境方面的问题。

2001年启动的街区更新基金将会针对最贫困的地区。到2005年,已有大约18.75亿英镑注入该项基金。提供的资金特别有助于实现政府消减不平等的目标。街区更新基金旨在帮助88个最贫困的地方当局,在地方战略伙伴关系(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的行动中展开协作,改进服务设施,缩小贫困地区与英格兰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Neighbourhood Renewal Unit 2004)。

不过,有关复兴计划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着一一些质疑。自上而下的政府计划如何能够

获得对于计划成功而言常常至关重要的地方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公共资金确实能够刺激地方经济并创造工作岗位吗? 复兴计划如何能够预防把问题从一个地区置换到另一个地区 (Weaver 2001)?

四 富人化和“城市再造”

城市再造, 也就是翻修或置换老旧建筑, 将此前开发的土地用于新的用途, 这在大城市已经变得相当普遍。有时这是计划项目的一部分; 但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富人化^①的结果, 即高收入群体为了某种用途对破旧城区的建筑进行翻修, 并建设其他的生活设施来服务自己, 如商店和餐馆等。内城区的富人化在英国、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都已出现, 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看来还将继续下去。

在美国, 社会学家伊莱贾·安德森在其所著《街头世故: 一个城市社区中的种族、阶级与变迁》一书中, 讨论了富人化的后果 (Anderson 1990)。尽管街区的翻新一般会增加其地价, 但对于现有的低收入居民来说, 他们的生活水准却很少能够就此提高, 不得不迁出此区。在安德森所研究的费城街区, 许多黑人住户被依法征地, 上千人被迫迁离。虽说他们曾被告知, 自己的房产会被用来建造经济房, 他们拥有优先购买权, 但现在, 那里矗立着一些大公司和一所中学。

继续生活在街区的穷人们会得到一些好处, 学校有所改善, 治安也见好转, 但相应的增税与提租最终迫使他们迁离, 转到比较负担得起的街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是迁入更具社会排斥性的地区。安德森访谈的黑人住户流露出对于“雅皮”的大举迁入的怨恨, 认为就是他们带来的变化造成了穷人的迁离。

新迁来的白人来到城市, 是要找寻廉价的

“古式”住房, 离他们在城里的工作更近便, 同时也是为了时尚的都市生活方式。对于种族差异和族群差异, 他们口头上是表示“没有成见”的。然而, 在现实当中, 新老住户之间很少会结成伙伴, 除非他们来自同一个社会阶级。由于黑人住户大多贫困, 白人住户则大多属于中产阶级, 因此族群差异与阶级差异相互叠加。尽管有些中产阶级黑人住在同一地区, 但他们只要负担得起就会选择更具郊区色彩的生活方式, 担心不这样的话, 白人就会像对待底层阶级黑人那样对待他们。长此以往, 街区就逐渐转变成白人中产阶级的一小块专属之地了。

富人化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人口上的。年轻的专业人员逐渐趋向于晚婚晚育。其结果, 更多的住房需求来自于单身人士和无子女夫妇, 而不是传统的家庭。在英国, 政府预估, 从 1996 年到 2021 年, 将新增 380 万户家庭 (Urban Task Force 1999)。由于年轻人更晚生育子女, 而他们的职业又常常要求他们在内城区的办公楼里长时间工作, 因而生活在郊区变得弊大于利。富裕而无子女的夫妇能够负担得起内城区经过翻修的高价住房, 甚至更偏爱围绕城市中心区所能提供的高质量的文化、饮食和娱乐选择, 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子女已经离家独立生活的老年夫妇也可能因为类似的原因被吸引回到内城区。

有必要指出, 与富人化的过程并行的还有前文讨论过的另一股趋势: 城市经济从以制造业为基础转向以服务业为基础。如何应对这些经济变迁的牺牲品所关注的问题, 是城市维持生存的关键所在。

在伦敦, 码头区 (Docklands) 已经成为“城市再造”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伦敦东区的码头区占了泰晤士河岸边大约 8.5 平方英里的地区, 但由于码头关闭, 工业衰落, 它被剥

① 又译“贵族化”、“绅士化”、“中产阶级化”等。

夺了经济上的功能。码头区靠近伦敦城^①金融区，但是另一边也毗邻贫困的工人阶级居住区。从1960年代以来，在这个地区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就有激烈的意见冲突，并且延续至今。很多在码头区里面或周边生活的人都赞成通过社区发展项目来进行再开发，这样会保护贫困居民的利益。然而到了最后，随着1981年码头区开发公司（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成立，该地区被纳入保守党政府鼓励私人企业在城市复兴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发展战略，成为该战略的核心部分。政府特意放宽了对这一地区的规划要求和管制。今天，该地区到处是现代建筑，并且常常是设计前卫。仓库被改建成豪华公寓，并在其周边建设了新的街区。一个巨大的写字楼开发项目已经在加纳利码头（Canary Wharf）建起来，在伦敦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它。然而在一片鲜亮辉映之间，也有破败的建筑物和废弃的空地。办公楼大多经常是闲置的，那些以其最初设计的价格无法售出的新住宅也是一样。码头区的一些街区有这个国家最差的住房，但生活在这些房子中的人却指出，他们从自己周围进行的建设中获益甚微。



伦敦的码头区已经成为“城市再造”的范例。

机的城市中心区几条马路之遥，贫困的街区毫无好转。

森内特在其城市史著作《眼睛的良心》（Sennett 1993）中，批判了伦敦码头区式的城市发展。森内特指出，城市设计者应该努力保护或回到他所称的“人性化城市”（the humane city）。许多城市中充斥着庞大的非人身化建筑物，使人们变得内向，彼此疏离。但是城市可以使人变得外向，让他们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出不仅不令人感到受威胁、而且“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街道，“不再是挤满车辆的交通动脉”。郊区新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它那些标准化的过道与店铺，与高速公路一样远离了“人性化城市”。森内特提出，我们应该转而从老城区中获取灵感，就像意大利许多城市的中心区一样，它们既适合人的尺度，同时又把优雅的设计与多样性融合在一起。

在本章第三节第三小节的图文框中，我们将以曼彻斯特主办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为例，看看体育运动在城市复兴中的作用。

而在美国，开发商正在大量收购从米尔沃基到费城的众多城市中的废弃工业仓库，然后将它们改建成昂贵的住宅楼和单身公寓。在巴尔的摩和匹兹堡衰落的市中心建造富有活力的公共空间，已经被视为城市更新运动胜利的前奏。然而，难以遮掩的是：就在离这些重焕生

^① 伦敦城（City of London）是英格兰大伦敦郡下面的自治体，呈弧形沿泰晤士河岸分布，东至伦敦塔，区内有英格兰银行、皇家交易所（不再运转）、股票交易所及金融区其他部分，还有市政厅、报业中心舰队街等。

21.2.5 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化

到 203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将达到将近 50 亿。根据本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表 21.1 所示,联合国估计,这些城市居民中将近 40 亿会居住在发展中世界的城市。正如世界“巨型都市”分布图所示(见图 21.1),在 2015 年人口预计将超过 1000 的 22 个城市中,绝大多数位于发展中世界。

卡斯特把巨型都市看作第三个千年的城市化现象的主要特征之一(Castells 1996)。尽管巨型都市都汇聚了庞大的人群,但巨型都市的衡量标准不仅仅是规模,还在于它们作为庞大人口与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结点的角色。巨型

都市容纳了密集的人类活动,政治、传媒、通信、金融和生产等活动经由它流动。按卡斯特的说法,巨型都市就像它所处的国家或地区的一块磁铁。人们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被吸引到巨型都市,而在巨型都市中,有些人成功地融入了全球体系,另一些人则没有。除了担当全球经济枢纽的角色,巨型都市同时也是“所有这些努力谋生的人口的集散地”。

为什么在世界上较不发达的地区,其城市成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呢?这里尤其必须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要高于工业化国家(参看第二十二章)。已经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的高生育率进一步加速了城市的成长。

第二,从乡村到城市的大量国内人口迁移。下一个图文框要谈的正在发展中的粤港巨



图 21.1 2015 年预计将拥有 1 千万或以上居民的 22 个城市
资料来源:UN (2003)

型都市就是一例。发展中国家的人被城市吸引,要么是因为他们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打破,要么是因为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乡村的贫困促使许多人到城市中一试身手。他们原本的打算可能只是暂时移居城市,等到赚够了钱就会返回乡村。有些人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人发现自己不得不留在城市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在原来社区中的位置。

一 发展中世界城市化的挑战

经济的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中心,城市中的正式经济常常需要花很大力气来把人流吸纳进劳动队伍。在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城市,大量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人通过非正式经济来谋生。从制造业和建筑业中的零工,到小买卖,不受管制的非正式部门为贫穷或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提供了赚钱的机会。

非正式经济机会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在城市环境中生存下来,但它们自身也有问题。非正式经济不履行纳税义务,也不接受监管,并且它的生产效率要低于

正式经济。有些国家的经济活动集中在这一部门,就无法通过税收获得急需的国家岁入。低效率的生产方式也伤害了整体经济,即由非正式经济活动创造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参与这个部门的人口比例。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25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需要创造10亿个新的就业岗位来维持预估的人口增长。要靠正式经济来提供所有这些就业岗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发展分析人士指出,应当更加重视如何管制庞大的非正式经济或将其正式化,因为在未来的若干年中,那里将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主要的汇集之处。

环境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快速扩张的城市地区与工业化世界的城市有着显著的不同。尽管所有的城市都面临着环境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已经面临相当严峻的风险。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水供应不安全都是欠发达国家城市长期面临的问题。

住房是许多城市地区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像加尔各答和圣保罗这样的城市已经拥挤不堪,国内移民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其提供住房的能力。移民聚集在城市边缘雨后春笋般冒

一座巨型都市的诞生

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城市聚落之一现在正在亚洲形成。它从香港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包括珠江三角洲以及澳门,占地5万平方公里。尽管这个区域还没有正式的整体命名和行政结构,但是到1995年为止,它已经容纳了5000万人口。在卡斯特看来,这里将成为这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

卡斯特指出,有几点相互关联的因素有助于说明这一巨大的城市丛何以会兴起。首先,中

国正经历着一场经济转型,而香港则是将中国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最关键的“枢纽”之一。其次,随着香港的经济基础逐渐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它作为全球商业和金融中心的角色也愈益增强。最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香港的企业家们在珠江三角洲掀起了一次工业化的热潮。超过600万人受雇于2万间工厂和1万家公司。这些过程交迭在一起,就产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爆炸”(Castells 1996)。



污染使得城市生活越来越危险,特别是对于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

出的低矮棚户区。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新来者一般会选择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而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往往正好相反,在那里移民栖息在被称为城市“腐烂边缘”的地方。由麻袋片和硬纸板搭成的棚屋在城市边缘见缝插针,随处搭建。

在圣保罗,1996年时的宜居住房缺口据估计有540万人。一些学者则估计,如果“宜居住房”的界定被解释得更为严格的话,这个缺口可能高达2000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圣保罗长期的住房短缺甚至造成了一股私自“占用”空置建筑的风潮。无家可归的家庭聚集起来,“集体侵占”那些废弃的旅馆、办公楼或者政府建筑。许多家庭认为,就算在这里与上百人共用有限的厨房和卫生设施,总好过

住在大街上或是“法维勒”里,即城市边缘的临时棚户区。

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政府一直面临着满足扶摇直上的住房需求的巨大压力。在像圣保罗这样的城市,住房当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对于如何解决住房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最可行的方法是去改善“法维勒”的居住条件,包括提供电力和自来水,铺设道路、编制邮政地址。其他人则担心,临时棚户区根本就不适合居住,应该彻底拆除,腾出空间来为贫困家庭建设适宜的住房。

在许多城市地区,市中心的拥挤和过度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墨西哥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城市94%的土地被建筑物所占据,只有6%的空地。所谓的“绿色空间”,包

括公园和开放式绿地,其比例甚至与北美或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相比都远远不如。污染是一个大问题,主要来自塞满城市不敷使用的道路的轿车、公汽和卡车,还有工业污染。据估计,生活在墨西哥城相当于每天抽40支烟。1992年3月,墨西哥城的污染指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通常情况下,空气中的臭氧含量在100以下被视为“适于”健康,而在这个月,墨西哥城的臭氧含量攀升到398。政府不得不下令工厂暂时关闭,学校停课,40%的轿车禁止在某一天上路行驶。

社会的后果

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城市地区都存在着人口过多和资源不足的问题。贫困普遍存在,现有的社会服务无法满足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咨询、学校教育和就业培训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更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困境。和工业化国家相比,发展中世界1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要大得多。年轻的人群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教育,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缺乏资源来提供普及教育。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得不从事全日工作,要不就得以街头流浪开始自己的人生,随便乞讨些什么。而当这些街头流浪儿成年之后,绝大多数都面临着失业,或者无家可归,或者两者皆是。

二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未来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多种多样,难以看到变革与发展的前景。世界上许多最大城市中的生活条件在未来的几年中很可能将进一步下降。但是,前景也并非完全是悲观的。

首先,尽管很多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未来几年出现下降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人口增长的减缓反过来又会使城市化本身逐渐放慢速度。例如在西非,城市化的速度将从过去30年以来

一直保持的年均6.3%的增长率下降到2020年的年均4.2%。

第十一章第四节进一步讨论了人口增长问题。

其次,全球化将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带来重要的机遇。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城市将能够进入国际市场,作为投资和发展基地来提升自身,建立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经济联系。全球化为发展中的城市中心提供了最具活力的开放机遇,使它们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和创新中的重要力量。事实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其实已经加入了世界上“全球性城市”的行列。

第三节 城市与全球化

在前现代时期,城市是自足的实体,与它周围广阔的乡村地区彼此分离。在重要的城市地区之间,有时候会有道路系统相互连接,但是城市之间的旅行只是商人、士兵和其他一些需要经常长途跋涉的人的特殊事情。城市之间的沟通非常有限。而到了21世纪初的最初十年,景象可谓有了天壤之别。全球化增强了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促进了城市之间跨越国界的横向联系蓬勃发展,从而给城市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现在,城市之间充满了各种现实的和虚拟的联系,全球城市网络正在成形。

有些人预言,全球化和新兴传播技术将使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形式走向解体,下一个图文框中所介绍的赫尔辛基虚拟村(Helsinki Virtual Village)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是因为,许多传统的城市功能现在可以脱离拥挤不堪的城市区域,在网络空间执行。例如,金融市场已经电子化,电子商务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城市中心区的依赖,而“电子通勤”(e-commuting)则使越来越多的雇员可以在家里而不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赫尔辛基虚拟村

雅利·米耶洛宁及其同事有一句口号：“Sanoista tekoihin”，大致可以翻译为“行胜于言”(Don't talk, make it happen)。米罗恩是索尼拉(Sonera)公司的技术总监(Chief Technology Officer)，这是芬兰最大的电信公司，也是无线市场上欧洲最具进取性的厂商之一。他说：“人人谈的都是可能性，就没有一个能说，‘就这个，按按看，感觉感觉，试一试！’”

就因为这个，他和一群商界、学界人士以及城市规划者合作，在芬兰湾(Gulf of Finland)杂

草丛生的海滩上进行崭新开发，把它建成全世界第一个无线社区。这个想法看似简单，却吊人胃口：让赫尔辛基的这片新郊区的工人和住户们得到一套最先进的无线基础设施和最新颖的无线接收设备。当地人要想登录入网，根本不需要电脑，只要一部手机。然后你综观全局，看看属于未来的信息时代城镇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这块地方地势平坦，风力强劲，旷野寂寥，被称作“阿拉伯海滩”(Arabianranta, Arabia shore)，得名于曾经矗立在那里的陶制品。甚至



使用手机是否是现代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米耶洛宁及其同事开始筹划将此地区改造成无线仙境(wireless wonderland)之前,赫尔辛基市已经把它标定为技术中心来开发。如果计划一切顺利,到2010年,此地将会容纳大约12000名居民,700家信息技术公司,大约8000名雇员,另外还有4000名学生就读于当地大学。它还将通过社区联网,进行一项真实生活中的实验,以解决有关联通无极限(pervasive connectivity)之社会后果的一些亟待回答的问题。如果无线连接随时可以接入,是会使社区更加结合致密,还是趋于离群索居?人们会如何权衡对于私密性的关注与广泛延伸的无线网的明显便利?这种可联通性一旦成为现状,人们会真的需要这样吗?

第一波新办公楼和住宅的建造工程已经启动……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间,索尼拉公司及其合作者们正在这里建造不那么可见的另一套框架,合作者中包括IBM,本地软件商“Digia”,以欧洲为中心的“Symbian Alliance”,这是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松下、宝易昂(Psion)等公司合作达成的。它们正在联手打造所谓的赫尔辛基虚拟村,这是一个覆盖整块阿拉伯海滩郊区的无线互动社区。赫尔辛基虚拟村将包括一个局域网,以及通过宽带光缆和无线连接使用的一系列服务,随时随地可以接入。使用者通过任何一部无线话机、电脑或数字电视,都可以加入虚拟村。比如说,居民们无论是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在家看电视,还是在路上打手机,都可以处理个人日程。所提供的可视菜单将会使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社会组织,办公网络,或是移动商贸机会。而文档结构系统将使他们能够随时随刻控制并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

现在,虚拟村正在将四处流动变成随处融合,让沟通轻松惬意,无拘无限。IBM北欧部的库尔特·伦奎斯特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移动技术

的世界里长大,相信芬兰社会的变化已是无可挽回。他说,年轻人有能力自发做出社会规划。在大街上,他们一刻不停地与朋友交换着短信:“你在哪儿?”“碰碰吧。”“我们酒吧见。”伦奎斯特认为,他的孩子们会比自己这一代更加自由地决定如何生活。“他们天天都在流动中生活,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赫尔辛基科技大学(Helsink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社会学家蒂莫·科波马尝试追溯芬兰社会中的这些变化。他说:“自发性看来会保持下去。伴随着这些设备成长起来的是新一代,他们的生活中将充满了这些玩意儿。”他研究了一群手机用户,注意到生活方式上的某些差异。当今社会或许更加轻松自在,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纽带就此消失。事实上,他发现,手机正以一些新的方式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年轻的“电子冲浪者”(telesurfers)比起那些不用手机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社会交往圈子。亲朋好友几乎可以始终保持联系,往往会随时分享体验。对于朋友,则带来了一种新的电子亲密感,而对于父母,这让他们重新放下了心。

科波马相信,新的无线亲密性也同样会影响工作场所。他说:“手机使工作日的结构变得温和轻松。员工们不再被迫严格计划,一旦需要,确定了会面,每一天都可以随时开始。”

资料来源:Shaw(2001)

问题:

- 1 赫尔辛基虚拟村的计划者们把这个城镇描述成一个技术乌托邦。你认为手机联通会以他们所说的那些方式彻底改变生活吗?手机已经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效应?
- 2 手机使用可能有什么样的意外后果?
- 3 人们真的会因为使用手机而联系更加紧密吗?手机技术如何会使人更加离群索居?

是城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工作。

然而,至少到现在为止,诸如此类的预言并未变成现实。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城市,而是正在把城市转变成全球经济中的关键枢纽。城市中心在协调信息流、管理工商活动和服务与科技创新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各地的一些城市里,同时发生着活动与权力的分散和集中这两个过程(Castells 1996)。

21.3.1 全球性城市

城市在全球新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吸引众多社会学家的注意力。全球化现象通常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分离的层面上被讨论,然而事实上,全球化得以实现的主要通道是由一批世界最大城市组成的(Sassen 1998)。全球新经济的运转是建立在一系列中心地点之上的,它们拥有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其他“高度集中”的服务设施。正是在这些节点上,全球化的“运作”得到了实施和指引。随着工商业、生产、广告和营销开始扩展到全球规模,必须有巨量的组织行为来维持和发展这些全球网络。

萨斯基亚·萨森是在城市与全球化的讨论中贡献卓著的学者之一。她用全球性城市这个词来指那些大型跨国企业总部所在地的城市中心,那里也有着数量惊人的金融、技术和咨询服务公司。萨森的《全球性城市》(Sassen 1991)一书,是以她对三座此类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研究为基础的。她指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为重要城市创造了新的战略角色。大多数这类城市长期以来都是国际贸易中心,但是现在它们具有了四个新的特点:

- 1 它们已经发展成全球经济的“指挥所”,也就是规划和决策中心。
- 2 这类城市是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核心基

地。与制造业相比,这些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

- 3 它们是这些新兴产业的生产和创新基地。
- 4 这些城市是金融和服务业“产品”的购买、售卖或处置市场。

纽约、伦敦和东京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然而,我们可以回顾它们的性质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所发生的相似变化。在今天高度分散的世界经济中,这类城市为关键运作提供了核心控制。然而,全球性城市远不只是起协调作用的场所,城市也是生产的背景。这里重要的不是生产物质产品,而是生产工商组织管理遍布世界的办公机构和制造工厂所必需的专业化服务,形成金融创新与市场。服务和金融产品是全球性城市生产出来的“东西”。

全球性城市的中心城区提供了全体“生产者”可以在紧密的互动之下工作的集中场所,这类互动常常包括个体之间的接触。在全球性城市中,地方企业与全国性企业以及跨国企业杂处,包括各式各样的外企。仅在纽约城,就有350家外国银行设立了分支机构,外加2500家外国金融公司;在纽约,每4个银行雇员中就有1个在外国银行工作。全球性城市彼此竞争,但是它们也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它们所处的国家相分离。

其他学者在萨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了纽约、伦敦和东京的行列而成为“全球性城市”。卡斯特描述了世界各大城市的一种层级秩序的形成过程。在这个层级秩序中,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法兰克福、洛杉矶、米兰、苏黎世和大阪等地充当了商业和金融服务的全球重要中心;在其下一级,一系列新的“地区中心”正在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枢纽。马德里、圣保罗、莫斯科、首尔、雅加达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正在成为所谓“新兴市场”的活动的枢纽。

21.3.2 不平等与全球性城市

新的全球经济在许多方面问题重重。全球性城市中可以最清晰地看到新的产生不平等的动力机制。萨森和其他学者都提醒我们注意,在许多全球性城市中,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和贫困的内城区的并存应当被视为相互关联的现象。新经济的“增长部门”,如金融服务、市场营销和高科技,其获利的能力远远高于任何传统经济部门。随着高收入群体的薪酬和红利持续攀升,那些被雇来为他们打扫和看守办公楼的人的收入却在不断减少。萨森指出,我们同时见证着位于全球新经济最前沿的那些工作在“获得稳定收入”(valorization),而在辉煌景象背后,另外一些工作则在“失去稳定收入”(devalorization)。

第十章讨论了剥夺与社会排斥,而第十一章讨论了不平等问题。

获利能力的差异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全球新经济之下的巨大失衡正在给整个社会从住房到劳动力市场的许多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在金融和全球服务行业工作的人薪酬优厚,他们生活的地区出现了富人化。与此同时,正统的制造业岗位逐渐收缩,富人化的过程又在餐馆、旅馆和服饰店之类的地方产生了大量低薪岗位。由于在富人化地区平价住房非常稀缺,迫使低收入者的街区进一步扩张。大量的地产、开发和电信投资被注入中央商务区,而被边缘化的地区没剩下多少资源。

在全球性城市,一种“中心与边缘”的地理学正在成型。与炫亮多彩的富裕携手而来的,是刺人眼目的贫困。然而,尽管这两个世界比

邻共存,它们之间的实际接触却少得惊人。正如麦克·戴维斯在他对洛杉矶的研究中指出的,城市的地表针对穷人采取了一种“故意的硬化”(Davis 1990, 页 232)。开放的公共空间被高墙大院、电子监控负责保安的街区和“企业禁地”代替。用戴维斯的话说:

为了减少与贱民的接触,城市再开发把曾经充满活力的人行道变成了交通管道,把公共绿地变成了无家可归者和乞丐的临时收容所。美国城市……正在被系统地由内向外,或者说由外向内,翻转过来。巨型建筑和超大型购物中心组成的稳定空间被集中在中心地带,街道两侧变得空无一物,公共活动被分类安排在具有严格功能定义的房间单元里,流通被室内化到由私人保安注视之下的走廊过道之中。

在戴维斯看来,对于洛杉矶最穷困、最边缘化的居民来说,城市已经变得彻底“无法生活”。公共车站的长凳被设计成圆桶状,以防止人睡在上面;公共卫生间的数量比北美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少;多数公园里都安装了喷洒设备,以防止无家可归者在公园里居住。警方和城市规划者试图把无家可归者限制在城市里的某些特定区域。然而,通过定期清理和没收临时棚屋,他们已经有效地制造出了一批“城市游牧民”。

21.3.3 全球时代的城市治理

与全球化一样,城市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着自身的矛盾。它既对城市产生创造性的

作用,也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一方面,它促成了人力、物资、服务和机遇的高度集中。但与此同时,它却分裂和削弱了地方、传统和现存网络的完整性。与集中化和经济增长所创造的新潜力相伴而来的是边缘化所造成的危险后果。不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工业化国家,都有大量的城市居民生活处于边缘状态,在正规就业、法律制度和市民文化以外谋生(Borja and Castells 1997)。

一 应对全球性因素

尽管全球化使世界各地城市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愈益加剧,但它同时也为城市和地方政府重新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提供了空间。随着民族国家越来越不能充分应对全球化趋势,城市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诸如生态危机和金融市场的跌宕这样的问题,所运作的层面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能力范围,单个的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与这些力量抗衡时也显得太“小”了。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在处理普世主义城市中丰富多样的需要时,又显得太“大”了。在民族国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地方和城市政府却有可能是“应对全球化的更为灵活的形式”(Borja and Castells 1997)。

关于为了回应政治与社会变迁而兴起的社会运动,亦可参阅第二十章第四节。

霍尔迪·博尔雅和卡斯特指出,地方当局能够在三个主要领域有效作为,应对全球性力量(Borja and Castells 1997)。第一,城市可以通过管理地方“人居环境”(habitat),提供构成经济生产力之社会基础的条件和设施,来提高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新经济中的经济竞争力有赖于高效率、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而劳动力的效率又依赖强有力的学童教育体系、良

好的公共交通、充足的平价住房、得力的执法、有效的急救服务和有活力的文化资源。

第二,城市在推动各具差异的多种族之间社会文化整合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全球性城市中聚集了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的人群,他们有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和语言背景,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如果普世主义城市中的高度多元化没有有效的整合力量来平衡的话,就可能导致碎片化和不宽容。尤其是当民族国家促进社会结合的能力由于历史、语言及其他原因而有所削弱的时候,各个城市就可以成为推动社会整合的积极力量。

第三,城市是政治表达和管理的重要场所。在应对全球性议题方面,地方当局与民族国家相比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们在为所代表的人群代言时,享有更强的合法性;另外,它们在具体运作中比全国性的行政结构更为灵活,也更有腾挪空间。我们在第二十章中已经了解到,许多公民觉得国家政治体系无法充分表达他们的利益和关注。当民族国家因为高高在上而不能充分表达特定的文化利益或地区利益时,城市和地方当局则能够成为更方便参与的政治活动论坛。

二 作为政治、经济和社会行动者的城市

在城市中,大量的组织、机构和团体相互发生着关系。国内和国际工商企业、潜在的投资者、政府机构、市民组织、专业团体、工会等等都在城市地区彼此接触,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可能会发展成某种集体协同行动,而城市则可以在其中担当政治、经济、文化和传媒领域的社会行动者。

近些年来,城市充当经济行动者的例子越来越多。在欧洲,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开始,各城市之间就联合起来,促进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989年发起的“欧洲城市运动”(The Eurocities movement)如今已经包括了欧洲最大的50个城市。首尔、新加坡和曼谷

等亚洲城市由于认识到,有关国际市场的信息急需及时,而生产和贸易结构也必须灵活,从而在担当经济行动者方面卓有成效。

一些城市制定了中长期的战略规划,来应对它们面临的复杂挑战。根据这些规划的指导,地方政府当局、市民团体和私有经济实体就可以共同合作,翻新城市基础设施,组织世界级的活动,或者将就业基础从工业企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企业。伯明翰、阿姆斯特丹、里昂、里斯本、格拉斯哥和巴塞罗那都是欧洲城市中依据战略规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的成功例子。

巴塞罗那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1988年启动的“巴塞罗那2000经济社会战略规划”(Barcelona 2000 Economic and Social Strategic Plan),把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汇聚在一个共同的宏图和行动规划之下来实施城市转型。巴塞罗那市政府与另外10个团体(包括商会、大学、城市港务当局和工会)负责监督规划所确立的三项主要目标的完成情况:通过改善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把巴塞罗那与欧洲城市网络连接起来;提高巴塞罗那市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现有工业和服务部门的竞争力,并推动有潜力的新兴经济部门的成长。

巴塞罗那2000规划的重要基础之一是1992年在这座城市举办的奥运会。奥林匹克的舞台使巴塞罗那得以将自己“国际化”;它把这座城市的价值和前景展示给了全世界。对于巴塞罗那来说,组织世界级的活动在两个方面至关重要:它改进了城市在世人眼中的整体形象,并且激发了城市居民完成城市改造的更多热情(Borja and Castells 1997)。体育运动目前在城市复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aylor et al. 1996)。伦敦成功申办2012年奥运会,申办中赋予城市复兴的重要性打动了国际奥委会成

员。伦敦的2012年规划把重点放在伦敦东区斯特拉福(Stratford)地区大约500英亩土地的重建上,这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下面的图文框中所介绍的是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是如何催化了曼彻斯特的城市复兴。

三 市长的角色

随着城市在全球体系中体现出新的重要性,市长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大城市的市长可以展现一种个人化的领导形式,而这对于推动城市行动议程和提升城市国际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在城市成功转变形象的几个著名实例中,市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比如里斯本和巴塞罗那的市长,他们是将这两座城市提升到世界主要中心城市之列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样,在提高城市国际知名度和吸引新的经济投资方面,小城市的市长也能发挥关键作用。

在英国,市长显然也越来越重要。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宣布将把管理伦敦事务的权力下放给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市长。自从撒切尔夫人在1986年废除了大伦敦市政会^①之后,伦敦就一直没有自己的地方行政机构。肯·利文斯顿于2000年5月成为伦敦首位民选市长。上台之后,他执行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政策,包括对于公共交通的投入(一部分是通过向工作日白天上班时间进入伦敦中心区的大部分车辆收取拥堵费来偿付的),给教师和护士等“关键工种”增加平价住房供应。利文斯顿坚定支持伦敦成功申办2012年奥运会。他相信奥运会将会为城市的“变革和复兴提供强效催化剂”。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2002年曼彻斯特英联邦运动会中,城市复兴都成为一项核心话题(London Plan 2004)。至于曼彻斯特英联邦运动会在城市复兴方面是

^① 原文为“Greater London Council”。大伦敦其实是一个城市丛,包括32个区(borough,或称自治市),其中12个组成内伦敦,20个组成外伦敦。

否成功,参见下面图文框的讨论。

最近几十年以来,美国的市长们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随着涉枪暴力在美国城市愈演愈烈,二十多位市长不再指望联邦政府通过枪支管制法案,转而代表他们的城市开始起诉枪支制造商。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推行强硬的“法律与秩序”政策,旨在降低犯罪率,激起广泛的争议,但也赢得了许多人无可奈何的尊重。在20世纪90年代,纽约的暴力犯罪发案率显著减少;针对无家可归人群的严

厉的“生活质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纽约闹市街道的面貌。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朱利安尼的领导坚毅果敢,影响了世界传媒的论调,获选2001年《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

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市长作为城市和地区代言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市长还经常能够通过与大都会区的各个社区达成协议,来影响城市市界之外周边地区的政策议程。这些伙伴通过与大都会区的各个社区达成协议,来影响

运用你的社会学想像力:体育运动与城市复兴

为什么曼彻斯特有可能在赢得英联邦运动会时感到后悔?

英联邦运动会首次面世是在1930年,为了颂扬大英帝国的荣光。但对于曼彻斯特的市民来说,运动会却正在向他们抽取不受欢迎的现代开支,他们现在面临着市政税单的加重和市政服务的削减,因为该城要努力为明年夏天它将主办的这次盛事填补4500万英镑的资金亏空。

组织者们今天在为运动会的开幕揭启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宣称他们将会再造曼彻斯特,留下一笔体育运动的遗产,包括最先进的设施。但与此同时,居民和市议员们却抗议他们正在付出伤筋动骨的代价:基层的设施和服务面临着关闭。

一些居民团体,以及工党控制的曼彻斯特市政会中的反对派政界人士,宣称削减开支已经开始产生恶果,导致至少14处住宅办公室关闭,市政府职员本身也出现了裁员。在曼彻斯特东区,两家游泳池被关闭,而威森肖(Withenshaw)的一家拳击俱乐部由于资金被撤回,也不得不另寻新址。人们越来越担心,市政会由于允诺承担运动会的全部开支,正在面临巨大的财

政风险。

曼彻斯特市政会确认,它将贷款1000万英镑,并启用珍贵的财政储备,以充实运动会的资金,填补任何亏空。根据某些报告的说法,曼彻斯特机场的所有利润都由地方当局所有,也能够挪来作为运动会的资金。

市议员和居民们宣称,由于市政会债台高筑,市政税负最终只会增加。合计起来,市政会要花费8000万英镑来举办这次英联邦运动会,而最初它只承诺要花费3500万英镑。尽管如此,政府还是在上个月宣布追加投入4500万英镑,因为事已显然,将会出现巨大亏空。

身为百万富翁的商人帕特里克·卡特被任命来考察运动会的财政收支,他提交的这份得到政府支持的报告发现,资金缺额为11000万英镑。最终的决定是:政府拨出3000万英镑,掌管体育彩票收入分配的英格兰体育运动委员会(Sport England)拿出另外3000万英镑,剩下的4500万英镑就得由曼彻斯特市政会承担了。

曼彻斯特市政会中的自由民主党团领袖西蒙·阿什利说:“曾经有人向我们担保,说英联邦运动会不会影响市政服务或市政税负,但实情并非如此。我们非常担心运动会的财政管理,担心



曼彻斯特英联邦运动会是否会作为“复兴运动会”而被后人铭记？

这将给本城带来的后果。”

“市政会必须得筹措另外的 4500 万英镑，而这笔钱又必然是挪自其它什么地方，总数又必须要达到 8000 万英镑。这是市政会在财政上冒的巨大风险，可这本来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大型体育赛事的资金。”

“游泳池和住宅办公室被关闭了，市政服务被削减了。如果你正在往运动会上砸数以百万计的钱，当然就没有能力再承担其它什么开支了……”

资料来源：Vivek Chaudhary, *Guardian*

(《卫报》), 2001 年 7 月 25 日

曼彻斯特主办英联邦运动会的得与失

- 曼彻斯特东区的复兴；
- 旅游业的兴旺——运动会期间大概会引

来 100 万游客；

- 17000 万英镑的新场馆建设投资，包括日后供曼城足球俱乐部 (Manchester City FC) 使用的一座新体育场，以及曼彻斯特东区的新游泳馆；
- 500 万英镑的市容美化投资；
- 5000 个新就业岗位，其中绝大多数是临时性的；
- 在全世界提升城市形象；
- 增加市政税负；
- 1000 万英镑的商业贷款；
- 两座游泳池和一家拳击俱乐部被关闭；
- 14 处住房办公室被关闭；
- 56 名雇员被裁；
- 曼彻斯特机场的利润被挪作运动会资金；
- 未来可能进一步出现市政开支削减。

复兴运动会?

在曼彻斯特那座令人叹为观止的英联邦运动会体育场的周边角落,是一列成排的房屋。盛夏的阴郁之中,闪烁着红砖的色调。事实上,这些房屋曾经是内城北部社区——历史上的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标志。但是现在的本街(Ben Street)的主要特征已经是阴森森的金属百叶窗,和一片鬼城般的怪异沉寂。

与举办大部分英联邦运动会赛事的城市体育中心(Sports City complex)仅仅半英里之遥,就有着天壤之别。现在,许多居民很想知道,一年前举办时受到广泛称赞誉为成功的运动会,长远看来,是否也能证明同样成功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当然,市政会看来就是这样认为的。就在上一周,它宣布运动会已经新创造了6300个全日就业岗位,全年旅游收入激增到1800万英镑,而曼彻斯特东区的改建资金达到57000万英镑。但对于已经在克莱顿(Clayton)郊区住了27年的比尔·布思来说,问题并没有消失……

沿着运河河岸,现在正在建造一片全新的住宅区。但布思先生说,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表示:“新的工作岗位是百分之百要欢迎的,我也不介意建造新的公寓,这会给这地方带来新人。但我很担心,这些新的房产对本地人来说太贵了。整个这些改建复兴,是为了已经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人吗?”

吉姆·拉津住在克莱顿的河沿街(Bank Street),也有着类似的担忧。他说:“我能够看到比较穷的人不得不搬到比较穷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有的问题,又原样搬到了其它地方。我只是

希望,运动会带来的整个感觉还能不断扩大。”

这两位都提到了运动会是几十年来曼彻斯特东区发生的最棒的事情。在贝西克,芭芭拉·泰勒经营着一个家庭护理团体,像她这样的人基本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她说:“它把贝西克印到了地图上,让人们都认识到,我们再也不是土匪窝了。已经有大把大把的钱花在了私人房产和市政房产上,以后会转交给社会住房协会。还有,虽说我不太肯定,人们这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自豪感,但他们再也不提搬走的事儿了。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儿孙,他们都能看到未来的前景。”

维罗尼卡·鲍威尔,74岁,一辈子住在贝西克,也是同样的乐观。她说:“我们争到了英联邦运动会,这绝对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地方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十年前,我们的日子才真叫糟糕,因为我们住着可怕的公寓和小屋,很担心犯罪。他们在做的重建,还有不断冒出来的旅店,会带来不一样的人,但也会给这地方带来钞票。我们这儿要是通了地铁,去曼彻斯特城里上班就方便多了。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有赚头。”

资料来源:David Green, *BBC News Online*, 曼彻斯特,2003年7月28日

问题:

- 1 现有居民在城市改建中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角色?
- 2 谁应当支付城市改建的开支?
- 3 曼彻斯特申办2002年英联邦运动会是否正确?

城市市界之外周边地区的政策议程。这些伙伴关系可以用在吸引更多的外资或者申请主办世界级活动等事务上。

小结：城市与全球治理

城市之间的合作并不局限在地区层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能够并且应当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全球化力量把分散在世界各处的元素更加紧密地聚合在一起，城市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网络也开始成形。世界大城市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根植在全球经济、国际迁移、新贸易模式和信息技术力量这些更大的背景之中。

本章要点

- 1 城市社会学的早期思路主要是以芝加哥学派的著作为主导，该学派成员用源于生物学的生态学模式来探讨城市化过程。路易斯·沃思提出了都市风格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认为城市生活产生了非人身性和社会距离。尽管这些思路还没有被全盘抛弃，但也已经受到了挑战。批评家指出，城市生活并不总是非人身化的：在城市街区中依然可以形成并维持很多亲密的个人关系。
- 2 大卫·哈维和曼纽埃尔·卡斯特在最近的著作中，把都市风格的模式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它看成自我封闭的过程。不同街区的布局方式，以及人们在城市中所形成的生活模式，表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特征。

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指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正在要求发展民主化的国际治理新形式。城市网络应该在这些新机制中大显身手。诸如此类的架构其实已经出现了：在联合国召开人居大会（Habitat conference）的同时，就召集了一个“城市与地方政府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f Cities and Local Authorities）。像世界大会这样的组织应当会推动城市组织逐步融入目前由各国政府组成的架构。

提高城市的参与度，有望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它也许还可以使国际关系更有效率。由于全世界城市人口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和改革方案需要针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城市政府将成为这些过程中必要和重要的参与者。

- 3 在传统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生活在城市地区。而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有60%到9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都市风格在发展中世界也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 4 郊区和睡城的扩张，导致了内城区的衰落。较富裕的群体往往迁出市中心，搬到郊外邻里更具同质性的低层住宅区。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郊区越是扩张，在内城区生活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越大。城市再造，包括翻修旧建筑以作新用，在很多大城市都变得很普遍。
- 5 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开发。这些社会中的城市面貌与西方城市有着重大差异，常常充斥着非法的临时住所，生活条件极度恶劣。非正式经济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城市都非常突出。政府常常无法满足城市人口对于教育、医疗和计划生育的愈益增加的要求。

6 城市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诸如纽约、伦敦和香港这样的全球性城市是众多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也容纳了大量金融、科技以及咨询服务。其他一批地区性城市,比如首尔、莫斯科和圣保罗,也正在逐步发展成全球经济的重要枢纽。

7 随着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位置日趋重要,它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城市与它们所处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联系不再紧密,而与其他全球性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则日益重要。全球性城市显著表现出高度的不平等。豪富与赤贫相邻共存,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接触却微乎其微。

8 城市作为政治经济行动者的作用日益重要。

城市政府比国家政府更适于处理某些全球性问题的后果。城市能够有助于提高经济生产力和竞争力,推动社会文化整合,以及提供政治参与的方便舞台。一些城市做出战略规划,通过举办世界级的大型活动,或者实施城市更新和经济开发计划,来提升整个城市的形象。市长正在成为推动城市规划的重要政治力量。

9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也在增长。这是因为大城市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全球性话题,比如经济一体化、移民、贸易、公共卫生和信息技术。城市之间的地区网络和国际网络开始成形,并且可能在目前主要由民族国家政府参与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思考建议

1. 为什么说城市是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地方?
2. 芝加哥学派对于晚近关于城市生活的思考有哪些影响?
3. 为什么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会因为资源发生冲突?
4. 英国的城市更新的尝试是否取得了成功?
5. 第三世界的“巨型都市”是否应当考虑到城市化产生了难以忍受的社会状况而停止其步伐?
6. 为什么近来人们对民选市长的理念抱有很高的热情?

阅读指南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London: Verso, 1982).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Roger Bocock and Kenneth Thompson (eds),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 《现代性的社会文化形式》

James Donald, *Imagining the Modern City* (London: Athlone, 1999). 《想像现代城市》

Nan Ellin, *Postmodern Urbanism* (Oxford: Blackwell, 1995). 《后现代都市风格》

David Frisby, *Cityscapes of Modernity: Critical Explor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01). 《现代性城市景观探析》

Richard Le Gates and Frederic Stout (eds), *The Cit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城市研究读本》

Philip Kasinitz (ed.), *Metropolis: Centre and Symbol of Our Tim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 《大都市：我们时代的中心与象征》

Peter Marcuse and Ronald van Kempen (eds), *Globalizing Cities: A New Spatial Order?* (Oxford: Blackwell, 2000). 《城市的全球化：空间新秩序？》

Mike Savage and Allan Warde (eds), *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3). 《城市社会学、资本主义与现代性》

John Rennie Short, *The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Cities, Culture and Power* (Oxford: Blackwell, 1996). 《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

Fran Tonkiss, *Space, the City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2005). 《空间、城市与社会理论》

网络导航

可持续性建筑与文化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building and culture)

<http://www.sustainableabc.com>

莱斯特大学城市史中心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Centre for Urban History)

<http://www.le.ac.uk/urbanhist/index.html>

政府街区更新部门 (The Government's Neighbourhood Renewal Unit)

<http://www.neighbourhood.gov.uk/>

市长网站 (City Mayors)

http://www.citymayors.com/features/euro_cities.html

城市史讨论区 (H-Urban Discussion Site)

<http://h-net.msu.edu/~urban/>

激进城市理论网站 (Radical Urban Theory)

<http://www.rut.com/>

虚拟城市资源中心 (Virtual Cities Resource Centre)

<http://www.casa.ucl.ac.uk/vc/welcome.htm>

目录

第一节 作为社会学问题的环境	777
第二节 我们共同的环境	778
22.2.1 是否有增长的极限?	778
22.2.2 可持续发展	779
22.2.3 消费、贫穷与环境	779
22.2.4 威胁之源	781
第三节 风险、技术与环境	786
22.3.1 全球变暖	787
22.3.2 转基因食品	792
22.3.3 全球“风险社会”	796
展望未来	797
本章要点	799
思考建议	799
阅读指南	799
网络导航	800



第二十二章

环境与风险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英国时间2004年的节礼日，^①印度洋底发生了4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地震。地震使海床移位，带动了几百立方公里的海水。震动导致了巨大的波浪，即所谓海啸（tsunami），以每小时大约

500 英里的速度，从震中开始席卷印度洋。当波浪逼近海岸的时候，海啸速度骤减，仅为每小时 30 英里，但高度开始增加。初震仅仅一刻钟之后，海啸抵达最近的一块陆地，即印度尼西亚北部的亚齐（Aceh），在许多地方，摧毁了所经之处一切东西，并深入内陆几百米，所到之处一片废墟。90 分钟之后海啸袭击了泰国。两个小时以后轮到了斯里兰卡，三个半小时之后是马尔代夫，最后，海浪抵达距震中数千英里之遥的非洲海岸，此时距产生海浪的地震已有大约七个小时。

这场悲剧的规模乍看并不明显。节礼日结束时，据报道已有 1.2 万人丧生，包括几位度假的西方游客。然而几周之后，联合国估计，死亡人数超过 17.5 万人。绝大多数的罹难者出自印尼，据推测有大约 16 万人丧生。至于整个



^① 节礼日（Boxing day）是英国法定假日，在圣诞节的次日，如遇星期日则推迟一天，按照习俗，这一天要向雇员、仆人、邮递员等赠送匣装节礼。2004年12月26日其实正是周日。

环印度洋地区的死亡总人数,各种推估相差甚远,但英国红十字会估计的死亡总数已经接近惊人的100万。在斯里兰卡,死亡人数超过3万,当一列80吨重的火车被掀出轨道,没入水中,有1000多人被淹死。在印度,据认为死亡人数将近1万人。再往西,海浪给远至非洲的地方也带去了灾难,夺取了非洲东海岸大约140人的生命,在整个环印度洋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家。

节礼日的海啸是一次全球性的灾难,展现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发生在数千英里之外的事件是如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在此次海啸中丧生的绝大多数人是当地人,但也有几百人是西方人,其中有许多是正在该地区享受如诗如画的圣诞假期。海啸共夺去了149位英国公民或与英国人有密切关联的人的生命,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人在单一一次意外事故中的最大损失,比死于2001年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的英国人还要多。如此多的西方人丧生也反映了全球化的进程。泰国是旅游者死亡最多的地方,但它只是在最近20年,随着富裕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打算远游度假,才成为大规模旅游的目的地。救援努力也是全球规模的。灾难发生之后,全世界的新闻频道不断将有关灾情的图像和报道放送到整个地球。在富裕国家中,民间与政府捐赠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同意暂缓受灾最重的那些国家偿还债务,并向该地区派遣了救援部队和专家。2005年1月初,欧洲各地数百万人停下手头的工作,一起默哀三分钟,纪念罹难者。

第一节 作为社会学问题的环境

社会学家为什么应当关注这类事件?海啸真的完全是一种天灾,是自然界巨大力量的某

种例证吗?社会学家能够并且必须直接关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与我们所生存其间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社会学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环境威胁是如何被分配的。尽管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亚洲海啸的死难者来自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死难者是居住在印度洋沿岸的当地人。如果它发生在比较富裕的环太平洋国家,总部设在美国夏威夷州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Pacific Tsunami Warning System)就会迅速向受威胁各国的应急部门发出警告,各项基础设施将有序就位,在海浪来袭之前,撤离沿岸民众。(现在要在环印度洋区域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其资金来自西方捐赠)来自环境的风险之分配会随环境威胁的类型不同而各见差异。比如说,尽管全球变暖将会影响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但它的影响方式是不一样的。(本章第三节第一小节将讨论全球变暖及其潜在效应)相比于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洪水在孟加拉国这样的低地穷国造成的死难人数要多得多,那里的房屋建筑条件和应急基础设施比较缺乏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而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比如美国,全球变暖给决策者带来的问题很可能与其间接效应有关,比如移民规模扩大,因为人们试图从更直接受影响的国家迁出来。

其次,社会学家能够提供一种说法,看看人类行为模式如何制造了对于自然环境的压力(Cylke 1993)。虽然节礼日的海啸并不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许多环境挑战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比如说,工业化国家所产生的污染,如果以同等规模在世界上更穷的非工业国家再现,就会导致灾难。(我们在下文讨论增长极限和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会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贫困地区要赶超富裕地区,那么富裕世界的公民就必须调整他们对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期待。一些“绿色”(环保主义)学者主张,如果要避免全球生态灾难,富裕国家的人们必须抵抗消费主义,回归简朴生活方式(比如可以参看 Schu-

macher 1977; Stead and Stead 1996)。他们提出,所以说,要拯救全球环境,将意味着不仅是技术变迁,还是社会变迁。考虑到存在巨大的全球不平等,发展中世界的穷国不会有多少腾挪空间,能够为了主要是富国制造的环境问题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增长。社会学使我们能够去研究,环境问题是如何与改变社会趋势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章,我们将考察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些非常广泛的威胁,其中绝大多数并不像海啸,而就是人祸。我们要问,当前的消费水平是否是可持续的,并且考察对于我们环境的一些主要威胁,包括污染、浪费和资源耗竭。然后,我们来看看当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环境风险。

第二节 我们共同的环境

有关人类对于自然界所造成的有害后果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和世界各地热带雨林遭砍伐,被称为环境生态学。公众对于环境的关注导致了“绿色”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形成,比如“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运动,它们围绕环境问题开展活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绿色哲学,但它们都有共同的方向,采取行动保护世界环境,保存而非耗尽它的资源,保护现存的动物物种。

22.2.1 是否有增长的极限?

绿色运动之所以兴起,公众对环境问题之所以关注,有一个重要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首次面世的一份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由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a)公布(Meadows et al. 1972)。罗马俱乐部由意大利首都的一群实业家、工商顾问和公务员组成。它委托的一项研究是使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增长、污染和自然

资源衰竭的后果进行预测。计算机模型能够显示,如果1900年至1970年间的趋势持续到2100年,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依据所考虑因素的不同增长率,计算机预测出了各种可能的结果。研究者发现,每次他们改变一个变量,最终都会产生一种环境危机。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主要结论是,相比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这一行星对人口增长及吸纳污染的承受力,工业增长的速率是不协调的。这份报告指出,“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衰竭”等方面,当前的增长水平不具有可持续性。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遭到了广泛的批评,甚至原作者们后来也承认,某些批评是有理有据的。研究者使用的方法集中于物质的限制,并假定了现存的增长率和技术创新保持不变。报告没有充分考虑人类通过技术进步或政治手段回应环境挑战的能力。此外,批评指出,市场力量能够限制对于资源的过分剥夺。例如,如果镁矿开始变得稀缺,它的价格将会上涨。而随着价格的上涨,对它的使用就会减少,如果成本大幅上升,生产者甚至可能会寻找一种完全替代这种材料的方法。但不管它有哪些局限,这份报告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使许多人意识到工业发展和技术可能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并对纵容不同形式的污染所带来的危险提出了警告。报告催化了方兴未艾的各种环境运动,参见第二十章第四节的讨论。

《增长的极限》的基本理念在于,社会影响与自然影响限制了地球承受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口持续增长的能力。许多群体利用罗马俱乐部报告的调查结果倡议,为了保护环境,应当严格控制经济发展。然而这种观点受到另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既无理据,亦无必要。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能够也应当得到促进,因为它是增加世界财富的手段。如果欠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增长进程中受到某种形式的阻碍,它们将永远别指望赶上富国。

22.2.2 可持续发展

新近的进展不是呼吁遏止经济增长,而是转向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首先提出这一用语的,是1987年联合国委托的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这也被称作布伦特兰报告,因为提交这份报告的组织委员会由时任挪威首相的吉洛·布伦特兰夫人担任主席。报告的撰稿人们指出,当代人对于地球资源的使用是不可持续的:

在整个20世纪,人类世界与维持着它的地球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在大气、土壤、水文、植物、动物,以及所有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出乎意料的重大变迁。变迁的速度超出了各门科学的能力,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评估和建议能力。各政治经济制度/机构本身是在一个与前不同的更加碎片化的世界里发展出来的,它们所做的种种调整、应对的努力效果令人沮丧……要想为子孙后代留下机会,当代人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展开全国的合作,全世界的合作。

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利用可更新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保护动物种类和生物多样性,并承诺保持空气、水文和土地的清洁。布伦特兰委员会把可持续发展视为“既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子孙后代满足他们自己需要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至少在理想层面,应该通过一种循环利用而非耗尽物质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尽可能地减少污染。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出版后,无论是环保主义者还是政府都在广泛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用语。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地球峰会(UN Earth Summit)上也采用了该词,并不断出现在此后联合国组织的其他生态

峰会中,比如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可持续发展也是千年发展目标之一,此方案已经得到世界各地191个国家和地区的签署,旨在未来几十年消减许多形式的贫困。在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将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原则融入各国政策和方案,扭转环境资源的丧失态势,将没有可持续渠道获得清洁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显著改善至少1亿贫民窟住民的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

有关千年发展目标,详参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四小节。

就像大约25年前的罗马俱乐部报告一样,布伦特兰报告也招来了许多批评。批评认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语焉不详,而且忽视了贫穷国家的特殊需求。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往往把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较富裕的国家;它没有考虑到,富裕国家高层次消费的满足是以其他民众的牺牲为代价的。例如,要求印度尼西亚保护其热带雨林是不公平的,因为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印尼更加需要那些如果答应保护就必须舍弃的收入。

22.2.3 消费、贫穷与环境

围绕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论大多以消费模式为核心。消费指的是被人、机构或社会消耗的商品、服务、能量和资源。它是一种有着积极与消极两面性的现象。一方面,世界各地消费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好。消费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当生活水准上升,人们能够负担更多的食品、衣物、个人用品、休闲时间、假日、汽车等等。另一方面,消费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消费模式能够破坏环境的资源基础,使各类不平等进一步恶化。

历经20世纪,世界消费的变化趋势令人

表 22.1 以地区分组的消费开支与人口,2000 年 (%)

地区	占世界人口份额	占世界私人消费开支份额
美国与加拿大	5.2	31.5
西欧	6.4	28.7
远东太平洋地区	32.9	21.4
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	8.5	6.7
东欧与中亚	7.9	3.3
南亚	22.4	2.0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0.4	1.5
中东与北非	4.1	1.4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10.9	1.2

资料来源:Worldwatch Institute 2004

惊讶。截至 20 世纪末,私人与公共消费支出额达到了大约 24 万亿美元,这是 1975 年的 2 倍,更是 1950 年的 6 倍。在 1900 年,世界消费水平仅为 1.5 万亿美元 (UNDP 1998)。在过去的 30 年间,消费水平迅猛上升。在工业化国家中,人均消费以年均 2.3% 的速度递增;在东亚,上升速度更快,达到了年均 6.1%。相反,非洲今天的户均消费比 30 年前下降了 20%。人们普遍关注到,所谓消费爆炸遗漏了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世界人口。

世界上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在消费上的不平等是非常显著的。北美和西欧仅占世界人口的 12%,但他们的私人消费,也就是花在家庭层面的各类商品和服务上的额度,超过了世界总额的 60%,与此相反,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也就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拥有全世界人口总数的大约 11%,却仅占世界私人消费的 1.2% 份额 (参见表 22.1)。

环保主义者认为,目前的消费模式不仅极不平等,而且对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比如说,自 1960 年以来,对洁净水的消耗增加了一倍。在过去 50 年间,被烧掉的矿物燃料——这也是造成下文将要讨论的全球变暖的主要

原因——几乎增加了 5 倍,而木材的消费在过去的 25 年中也上升了 40%。鱼类的储量一直在下降,野生物种濒于灭绝,水供应量在减少,森林面积也在缩减。消费模式不仅在逐渐耗尽现存的自然要素,而且还因为废弃物和有害物的排放而导致其品质的下降 (UNDP 1998)。

最后,虽然富人是世界的主要消费者,但消费增长所引发的环境破坏却对穷人造成了最严重的影响。我们在讨论全球变暖时会看到 (本章第三节第一小节),有钱阶层处于较好的位置享受消费的诸多好处,而不用承担其负面后果。从地方层面上看,富裕的群体通常能够花钱搬离有问题的区域,让穷人承担大部分的代价。化工厂、电站、主要道路、铁路和机场通常邻近低收入地区。从全球层面来看,我们也能看到相似的过程在发生:土壤退化、森林砍伐、水资源短缺、铅的排放和空气污染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也加剧了对于这些环境的威胁。资源匮乏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能够获取的资源。其结果,人口的增加对于愈益减少的资源基础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22.2.4 威胁之源

我们已经看到,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不同的全球环境威胁。它们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可再生资源的衰竭。

一 污染物与废弃物

空气污染

向大气排放有毒物质导致空气的污染,据说每年夺去的人命超过 270 万。空气污染可以明确划分为两种类型:主要由工业污染物和汽车排放物所产生的“室外污染”,以及在室内为了取暖和烹饪而燃烧燃料所导致的“室内污染”。在过去,因为工业化国家拥有更多的工厂和机动车辆,空气污染被看作是困扰它们的难题。然而近年来,第三世界“室内污染”的危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据认为,发展中世界 90% 以上的死亡与空气污染有关。这是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燃烧的许多燃料,比如柴火和粪便,不如煤油和丙烷等现代燃料清洁。

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英国普遍烧煤,向空气中释放出的二氧化硫和浓烟成为空气污染

的主要原因。煤被广泛用于家庭取暖,工业用煤也相当普遍。1956 年,为了减少烟雾,通过了《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以管制烟囱排放。煤油、丙烷和天然气等无烟型燃料得到大力提倡,现在已经在英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广泛使用。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机动车辆的使用增长成为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汽车排放是特别有害的,因为与烟囱排放相比,汽车排放进入空气的高度要低得多。如图 22.1 所示,不同类型的车辆产生的排放范围是相当大的。在欧洲,80% 的旅行由轿车完成,而轿车对环境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因此,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减少空气污染的努力就把重点放在使用低排放的交通工具,比如旅客列车,大容量公共汽车,以及轿车拼车。

空气污染关系到众多的人体健康问题,包括呼吸困难、癌症和肺病。虽然室外污染长期与工业化国家相联系,但它也在发展中世界迅速增长。这些国家正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工厂排放在增加,道路上汽车的数量也在增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含铅汽油仍在使用,尽管在发达世界已经逐渐淡出。在东欧和苏联的许多地区,空气污染程度非常高。

空气污染不仅影响了人类和动物种群的健康,还对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产生了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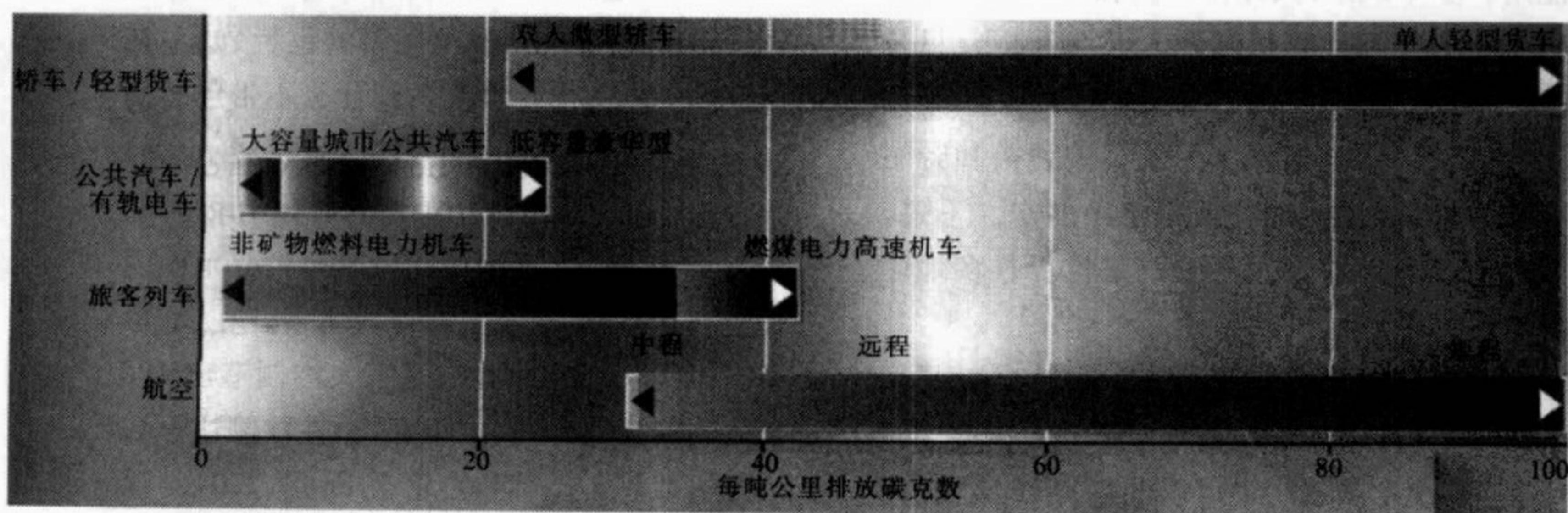


图 22.1 每吨公里排放量

资料来源:IPPC, 转引自《卫报教育增刊》(Guardian Education, 2000 年 1 月 25 日), 第 11 版;《图片报》(Graphic), Michael Agar, Jenny Ridley, Graphic News

性的影响。酸雨就是空气污染的有害后果之一。通常是一个国家排放的一氧化硫和一氧化氮飘越国界,在另一国家降下酸雨。酸雨对于森林、庄稼和动物的生命都造成危害,并导致湖泊的酸化。尤其是加拿大、波兰和北欧诸国受到了酸雨的沉重打击。例如,在瑞典,总共9万个湖泊中有2万个已经酸化。

酸雨与许多环境威胁一样,也很难防治,因为它的起源与后果都跨越了国界。例如,据认为,在加拿大东部的酸雨大多与纽约州的工业生产有关,它越过了美加边界。其他遭受酸雨的国家也同样发现,它们不能在自己的控制下解决问题,因为酸雨的来源在本国边界之外。有些国家已经达成了双边或地区性的协议,以减轻酸雨的危害。然而,在某些地区,工业废气排放量仍然很大,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尤其迅速。

下面有关布伦特石油平台的实例展现了环保行动主义是如何挑战并改变了污染的做法。

水污染

有史以来,人们一直依赖水来满足很多重要需求,比如饮用、做饭、洗衣、灌溉、养鱼,以及其他种种事务。尽管水是最为珍贵和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之一,它却遭到人类的肆意滥用。多年以来,人体排泄物和人工制造的废物被不假思索地直接倾倒入江海河川。只是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许多国家才开始努力保护水质,保护依赖水而生存的鱼类和野生生物,并确保人类能够获得洁净的水。不过,尽管有这些努力,水污染仍是世界很多地区的严重问题。

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到2015年,“将无法获得清洁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广义上的水污染可以理解为对水源的污染,它来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矿物质,杀虫剂,或是未经处理的污水。它对发展中世界的威胁最大。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口无法获得

清洁用水,更有超过20亿人口缺乏卫生设备。在世界上许多最贫困的国家,卫生系统依然十分落后,人体排泄物常常直接倒入江河湖泊。未经处理的污水滋生了大量细菌,并导致各种水传染疾病,例如腹泻、痢疾和肝炎。每年有大约20亿腹泻的病例是由被污染的水引起的;每年有500万人死于腹泻类疾病。在获得世界的水资源的机会方面正在逐步改进。在20世纪90年代,将近有10亿人用上了清洁的水,并有同样多的人用上了卫生设备(UNDP 2002)。

在工业化国家,水污染通常是由农业地区过度使用肥料而引起的。经过数年积淀,化学杀虫剂中的硝酸盐会渗入地下水水源;在欧洲,将近25%的地下水的污染程度超过了欧盟的许可标准(UNDP 1998)。部分污染最严重的水来自前工业区的周边,在那里,汞、铅和其他金属的残留物积淀在沉积物中,在多年内慢慢地对水源释放出污染物。

近些年来,在西方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河流的水质在逐步得到改善。但是,在东欧和前苏联,河流的污染仍然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在前苏联的200条河流中采集的水样有五分之四的污染已经达到高危程度。

固体废弃物

你下次逛超市、玩具店或快餐厅的时候,留意一下你看到的产品所附带的包装数量。在我们这个年代,你几乎买不到什么不带包装的东西。虽然包装有明显的好处,可以展示商品的魅力,防止物品受损,但它同时也有很大的缺陷。消费增长最显著的指标就是世界范围内倒进我们的垃圾箱的家庭垃圾增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人均制造出100至330公斤的家庭固体废弃物,在欧盟这一数字是414公斤,而在北美则是720公斤(UNDP 1998)。世界各国无论在所产生的废弃物的绝对总量上,还是在人均产生量上,都有所上升。

环保行动主义：绿色和平、壳牌与布伦特储油装置

近些年来，环保团体已经卷入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运动。其中一例显著的成功就是1998年，绿色和平组织反对跨国石油企业壳牌公司将其布伦特储油装置^①沉入海床。

在最后时刻获得延期使用三年之后，布伦特储油装置被拖往她的水葬之地，昨天，她的末日终于到来，这座储油装置已经成为一场环境大战的战场。它原本是注定要沉没在大西洋中，但绿色和平组织发动的大规模运动成功阻止了这次沉海企图。

无论如何，在昨天，已经开展了第一批拆卸操作，让它能够被回收利用。在作为北海油田浮式装卸储运装置22年之后，如今它成为挪威的一座渡船码头。这个重达1600吨的“水上设备”(topside)，也就是整个装置中能够在水面上看到的部分，被世界上最大的起重船之一“提亚浮号”(Thialf)成功起吊。它将被拖往海岸，在斯塔万格(Stavanger)东北部耶尔默兰(Hjelmeland)附近的维坎赛(Vikanaset)。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这个储油装置将被吊出水面，它的壳体相当于一个竖立着在水上漂浮着的足球场，将会被一圈一圈地切割下来。它们

将会被清洗，然后放在梅克雅未克(Mekjarvik)的海床上，填上压舱物，最后浇筑一层混凝土表面，就成了新的码头。

以对于环境友好的方式来拆解石油平台，将会花掉壳牌公司4300万英镑，相比之下，把它沉入海底却只需要450万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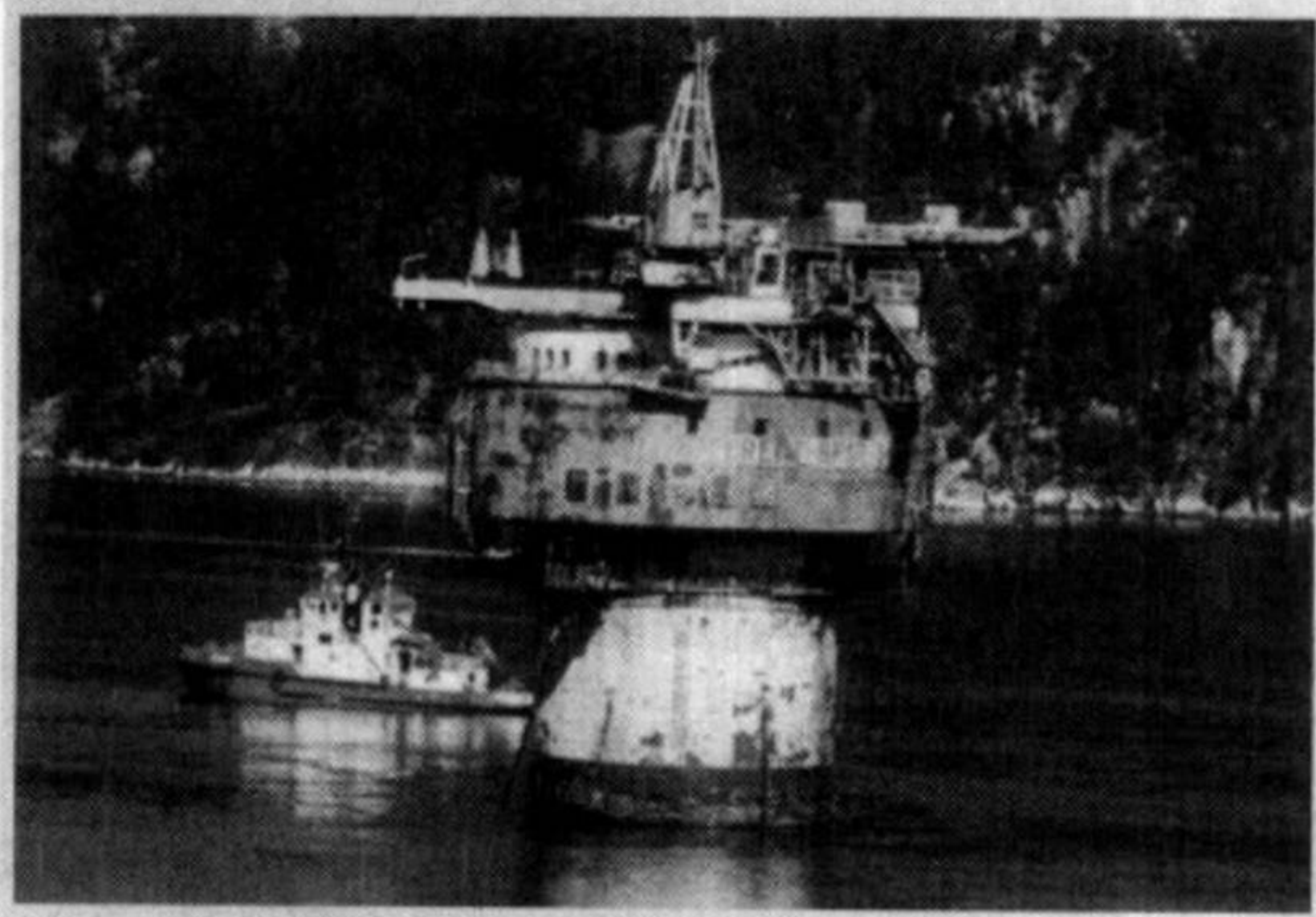
绿色和平组织的行动分子们于1995年占据了被废弃的石油平台，它当时停泊在北海，预备拖往大西洋。他们起先被驱离平台，但在平台驶往预定目的地的旅途中，又登上了平台。绿色和平组织的攻势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壳牌公司的加油站遭到抵制，在欧洲大陆，甚至还遭到燃烧弹和枪弹的袭击（对于这种行径，绿色和平组织给予了强烈谴责），最终公司方面放弃了他们的计划……

明年开春，同样为希瑞马公司^②旗下所有的一艘特别改装的大型驳船“H851号”，将会去往瓦茨(Vats)，将该石油平台垂直吊起，以利切割。切割出来的圆环将被运往梅克雅未克，在那里，提亚浮号将会把它们放置到位，建设新的码头。该码头预计将于明年底完工。

资料来源：Graeme Smith,《开始终结布伦特平台：生态战场被拖往终点》(“Beginning of end for Brent Spar; Eco-battleground to be ferry terminal”), 刊于《格拉斯哥先驱报》(The Herald)1998年11月26日

问题：

- 1 新社会运动能影响跨国企业的行动吗？还是说像如何处置布伦特平台的案例其实无关大局？
- 2 跨国企业对谁承担责任？



① 原文为“Brent Spar”, “Spar”的意思是浮式油轮装卸储运装置，即在海底油井口上集浮式油库和装卸转运油库于一体的石油工业浮动装置。

② “Heerema”, 荷兰著名海洋工程公司。

工业化社会有时被称为“一次性使用的社会”(throw-away society),因为被理所当然丢弃的东西在数量上是如此庞大。根据政府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家庭每户每周产生22公斤的废弃物。1997至1998年度共产生了2700万吨废弃物,其中90%来自家庭。大约85%的固体废弃物被填埋处理(HMSO 2000)。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几乎普遍实行废弃物收集服务,但处理大量的垃圾变得日益困难。垃圾填埋地很快就被填满,许多城市地区已经没有处理家庭废弃物的空间。

在英国,政府制定了到2005年对40%城市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的目标。然而,在1996至1997年度,只有7%的家庭废弃物得到循环利用,相比之下,2001至2002年度这一比例也只有12%。而就在同一时期,英格兰每户人家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增加了17%(HMSO 2004)。虽然这样的循环利用量与家庭废弃物总量相比似乎很少,但废弃物中很大一部分是很难被重新加工或利用的。食品包装中广泛使用的许多塑料制品只能成为不可用的垃圾:人们找不到可以循环利用的办法,只得把它们埋在垃圾倾倒地,让它们在那里呆上几个世纪。表22.2展示了废弃物在英格兰是如

何被处理的。

在发展中世界,当前家庭废弃物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垃圾收集服务。据估计,发展中世界20%到50%的家庭废弃物没有被收集起来。落后的废弃物管理系统意味着垃圾堆积在街道上,助长了疾病的传播。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中世界很可能将会面临的垃圾处理问题,甚至比工业化国家的现状更为尖锐。随着社会渐渐变得富裕,废弃物的主要种类将逐渐从诸如食物残渣之类的有机废弃物,转变为包装袋等塑料以及人工合成材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分解。

二 资源的耗竭

人类社会依赖的许多资源来自自然世界,比如水、木材、鱼类、动物和植物。这些东西常常被称为可再生资源,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它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动地更替。然而,如果对于可再生资源的消费打破了它们的平衡,或者实在过度,那么它们将有被消耗殆尽的危险。一些证据表明,这样的过程可能正在发生。可再生资源的恶化引起了许多环保主义者的极大关注。

表 22.2 英格兰对于城市废弃物的处理,以方法分类^①

	1996-1997	1998-1999	2000-2001	2001-2002
填埋	20631	21534	22039	22317
垃圾焚烧热能发电	1446	2117	2391	2459
循环利用/堆肥 ^a	1750	2525	3446	3907
其他 ^b	761	160	182	140
合计	24588	26337	28057	28823

a: 包括用作循环利用或集中堆肥的收集上来的家庭废弃物及非家庭废弃物。此项总数中不包括家庭堆肥的估计数。
b: 包括不用作热能发电的垃圾焚烧,燃料生产过程中制造的废料,但不包括填埋之前的任何处理过程,也不包括直接送往废品回收站的东西。

资料来源:HMSO (2004)

^① 原书无单位,据上下文推算应为“千吨”。

水

你可能没有把水看成是一种可以消耗完的资源,毕竟水能通过降雨不断自我补充。如果你生活在欧洲或者北美,除了在夏季的月份偶尔会限制用水,你可能根本不会在意水的供应。然而,对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得到持久稳定的水源是一个更为长期、严峻的问题。在某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可以利用的水源不能满足对于水的大量需求。例如,在北非和中东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水的供应面临严重压力,缺水已然成为家常便饭。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趋势在将来还会更加恶化。

之所以如此,有几点原因。首先,在今后25年内,预期的世界人口增长大部分可能集中在已经存在缺水问题的地区(详参第十一章第四节)。此外,这种增长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城市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扩张的人口在用水和卫生设备方面的需求。

全球变暖也对水源的枯竭产生了潜在的影响。随着气温的上升,就需要更多的饮用和灌溉用水。然而,地下水不太可能像从前那样迅速地自我补充,并且蒸发的速度也在加快。最后,伴随全球变暖,气候模式的变化有可能影响现有的降雨模式,从而以很难预测的方式改变水的供应。

土壤退化与沙漠化

依据联合国1998年度的《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多或少直接依赖土地而生存。他们依靠从土地上种植或采集食物、捕捉猎物生活。由于他们非常依赖于土地,所以那些影响其利用土地谋生之能力的变化,也就很容易伤害到他们。在亚洲和非洲的很多地区,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土壤退化的问题对数以百万计的人口造成了威胁,使他们陷入赤贫的境地。土壤退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土地的质量恶化,土地中有价值的自然元素由于过

度使用、干旱或肥力不足而流失。

土壤退化的长期效应极为严重,难以扭转。在土壤已经退化的地方,农业产量下降,人均耕地减少。由于缺少草料,人们很难甚或根本不可能饲养牛或其他牲畜。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得不迁移,去寻找更加肥沃的土地。沙漠化是指土地极度退化,并导致大片区域形成类似于沙漠的状况。已经受到这种现象影响的地域总面积相当于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面积之和(参见图22.2),它使110多个国家面临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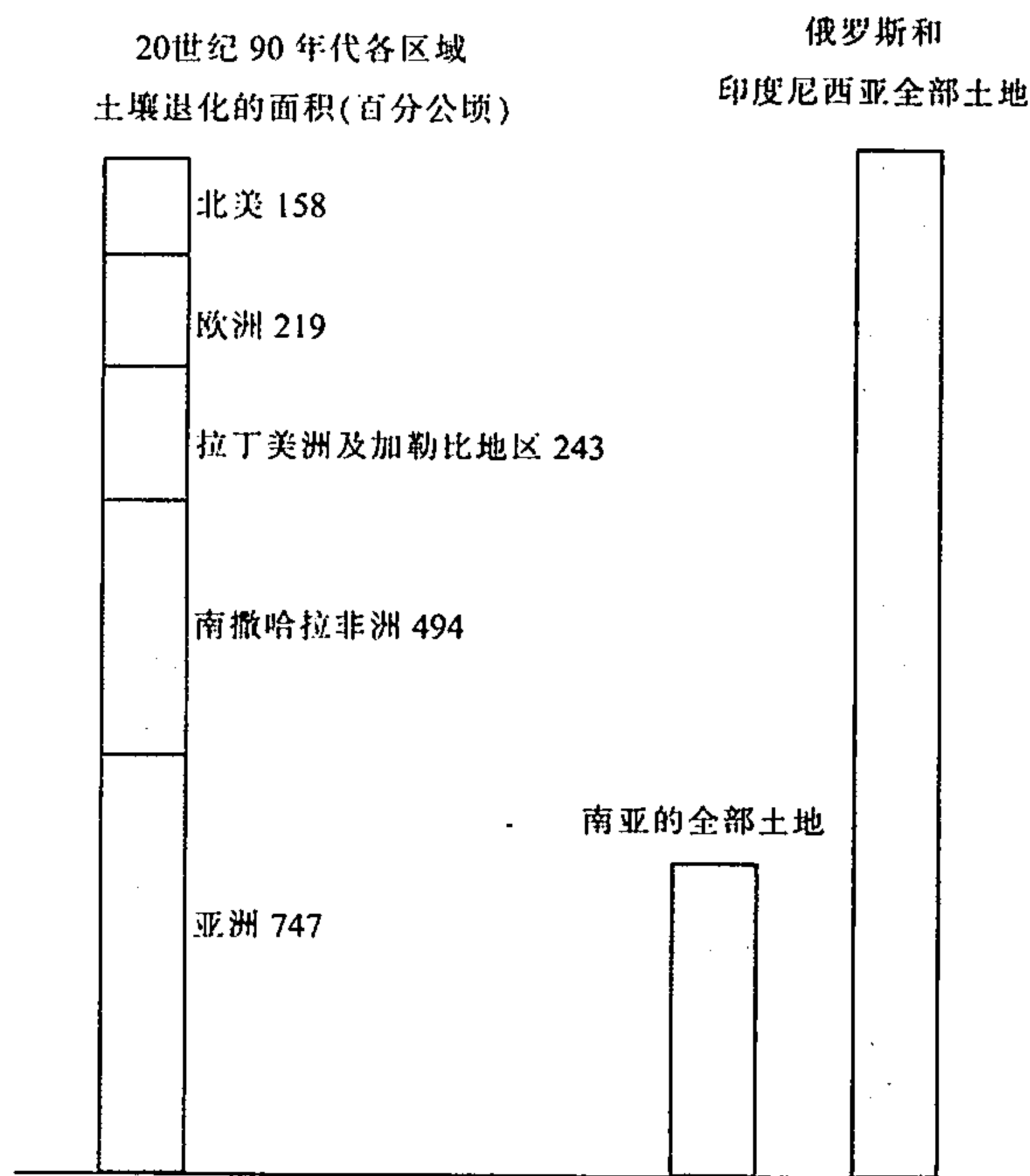


图 22.2 土壤退化的程度
资料来源:UNDP (1998), 页 74

滥伐森林

森林是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它们有助于调节水供应,向大气释放氧气,并防止土壤流失。森林为许多人的生活提供了资源,包括燃料、食物、木材、油料、染料、香草和药物。然而,

尽管它们非常重要,目前地球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原始森林却已经消失了。滥伐森林指的就是林地遭受破坏,常常是因为商业性砍伐。在20世纪80年代,滥伐森林破坏了1500万公顷土地,绝大部分发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丧失了740万公顷)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丧失了410万公顷)。

虽然遭到滥伐的森林有许多类型,但是其中热带雨林的命运最受人们的关注。热带雨林覆盖了地球表面将近7%的面积,那里的动植物物种最为丰富,保持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也就是生命形式的物种多样性。那里还拥有可以提炼药物的多种植物和植物油。然而目前,热带雨林正以每年约1%的速度缩减,如果眼下这一趋势不加遏止,那么到了本世纪末,它们就很可能彻底消失。在热带雨林分布最为广阔的南美洲,许多地方的雨林却被焚烧,以便有更多的空间放牧牛群。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西非和南太平洋地区,国际上对于珍贵硬木的需求加速了雨林的破坏。消费的增长趋势促使发展中国家出口它们的天然商品,这个过程既破坏了环境,又有损于生物多样性。

滥伐森林使人类和环境都付出了代价。就人类的代价而言,一些贫穷的社区在过去能够通过森林维持或补充生计,现在却不再如此。滥伐森林加剧了边缘化人群的贫困化,他们在出让砍伐权和出售木材获得的巨额收入中所得甚少。至于环境的代价,则包括土壤流失和洪水。完好的山林能吸收并循环利用大部分的降雨。一旦森林趋于消失,雨水沿坡而下,洪水就会暴发,并继而引发干旱。

第三节 风险、技术与环境

迈克尔·克莱顿^①是《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等畅销小说的作者,也是通俗电视连续剧《急诊室的故事》(ER)的创作者。他在2002年写的小说《纳米猎杀》(*Prey*),其广告宣传中如此呼唤:“人类啊,跪下吧。”(*The Economist*,2002年12月5日)。在《纳米猎杀》中,克莱顿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次科学实验的意外后果导致了灾难。从实验室中逃出来一大群纳米粒子,也就是微型机器人,每一个都比大多数的尘埃还小。这群纳米粒子自我维持,自我再生,并能总结经验,有所习得。这种粒子原本的程序设计就是用作掠食者,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它每分钟都会变得更加致命。想要捕获或摧毁这群粒子的种种尝试均告失败,更糟糕的是,它的掠食对象正是人类。

克莱顿有关微型机器人的小说属于科幻小说。但纳米技术却是科学与技术中一块激奋人心的新兴领域。一纳米(nanometre)相当于十亿分之一米,而广义上的纳米技术就包含了任何可以用小于100纳米的量度精确制造的东西(人的一根发丝就有大约8万纳米粗)。迄今为止,纳米技术的影响还算有限。比如说,目前它被用来使护肤霜更加明净,雪板蜡更加润滑。

有些论者对纳米技术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风险忧心忡忡。除了像克莱顿这样的科幻小说作家所提出的警示之外,有些科学家还担心,

① 迈克尔·克莱顿(1942年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和影视制片人。以“高科技惊险小说之父”名世。他的书已被译成36种语言,几乎本本被好莱坞搬上银幕,在全世界拥有亿万忠实读者和影迷。其作品还包括《天外细菌》(*The Andromeda Strain*)、《回到中世纪》(*Timeline*)、《恐惧之邦》(*State of Fear*)、《刚果惊魂》(*Congo*)、《深海圆疑》(*Sphere*)等[美剧《迷失》(*Lost*)被观众怀疑改编自《纳米猎杀》],除了想像惊人、叙事高超、情节精彩、人物生动,还擅长融入深刻的社会内涵,对人类及社会进行多方面的思辨;展示了一幅幅高新科技的生动景象,对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如果技术可以使得纳米粒子自我复制,那么它们“就可能像花粉爆发一样传播,数日之内,便可以使生物圈成为一团尘埃。危险的复制基因很容易变得强健异常,肉眼不及,传播迅速,以至于无法遏止——至少,如果我们毫无预防的话。”这种威胁已经被称为“灰雾问题”^①。还有人担心纳米技术被用作军事或为恐怖分子所用。纳米技术设备或许有朝一日确实能够制成,但只是有选择地针对某些地理区域,或是具有特定基因的某些特定人群(Joy 2000)。另一种担心在于,纳米化的粒子会进入呼吸道,导致身体受损,或许会像石棉纤维一样在肺里累积起来。

如果这些灾难确有可能,那么如果让纳米技术进一步发展下去,它的负面效应似乎远远大于其正面效应。然而,热心支持纳米技术的人则正在探讨,是否能够用它来改善抗癌药物的投送,或者是否能够用纳米级的碳精棒来提高计算机电路的速度与能量。诺贝尔得主化学家理查德·斯莫利甚至提出,有朝一日,纳米技术可以用于太阳能电池板,以解决世界能源问题。

有关纳米技术和科学技术中的其他创新的讨论,向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科学与技术的变迁越来越使我们面临多种风险,从灰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安全能源,有好有坏,也有难以一概而论的。

人类一向不得不面临各式各样的风险,但

今日之风险与往昔之风险有着质的差异。威胁人类社会的以往一向是外部风险,像旱灾、地震、饥荒和暴风雨等来自自然界、与人类行为无关的风险,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各种人为风险,即由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我们将会看到,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环境和健康风险就是人为风险的例证,它们是我们自己干预自然的结果。我们上文所谈的纳米技术的问世就是人为风险如何扩散的一例。接下来,我们将再考察两个案例:围绕全球变暖和转基因食品的有关争论。

22.3.1 全球变暖

2003年8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北半球最热的一个八月。许多人认为,炎热的天气就是全球变暖过程如何影响地球气候的一个例证。炎热的效应是灾难性的。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是一个环境问题智囊库,据它估算,热浪在欧洲夺去了超过3万5千人的生命。法国的灾情最为惨重。据估计,有14802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原因,其中以老年人最容易受到伤害(*New Scientist*, 2003年10月10日)。科学家们最近估计,全球变暖每年夺去16万人的生命,其中风险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据估测,死于气候变化的所谓“副作用”——比如疟疾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到2020年可能会将近翻一番(*New Sci-*

^①原文为“grey goo problem”。“灰雾”是一个网络流行的术语,用于描述一种假定情况下,我们星球上的自我复制机器人或者纳米级计算机不再受人类的控制,并且开始将人类的生命耗尽作为它们自己的能量需要,这样的趋势以不可遏止的方式发展。该词首次出现于K. Eric Drexler关于纳米技术的处女作《创世机器》(*Engines of Creation*)中。克莱顿的《纳米猎杀》也属于描写灰雾灾难的科幻小说。虽然无论是由于意外还是由于机器人的企图,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灰雾的无生命混合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在纳米级的自我复制中需要一些能量源,与生命型所使用的资源或者来自生命型自身的资源是一样的(就如同人类通过吃其他的动物获得能量,那些动物又是从其他低级生命型那里获得能量的)。在与纳米级计算机进行能量的竞争中,人类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能足够快速的适应自然界的进化,最终导致掠食同类。该词亦有见译“灰胶”、“灰色粘质”等。还有一些变体,如黑雾或红雾,指那些恐怖分子或者虚无主义者使用纳米级计算机来摧毁所有或部分人性,或者人类自身的前景,将人类看作是有充满现有空间之趋势的自我复制的实体。绿雾,指遏制灰雾蔓延的趋势,或者说是限制其再生的能力的想法。

entist, 2003年10月1日)。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气候变化是“长远来看,我们作为全球共同体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话题”(2004年4月27日在气候集团^①的演讲)。这里,我们来更详细地看看全球变暖的成因以及可能的后果。

一 什么是全球变暖?

许多人认为,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挑战。如果许多科学预测准确无误,那么全球变暖就可能不可逆转地改变地球气候的运行,对环境造成一系列世界范围内的灾难性后果。全球变暖指的是由于大气化学成分的变化,地球平均气温逐渐上升。全球变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引起的,因为在地球大气层中聚集并改变大气层的气体正是由人类的大量活动而产生的。

全球变暖的过程与温室效应——地球大气层内阻挡热量外溢的温室气体的聚集——这一概念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原理很简单。来自太阳的热量穿透大气层,使地表变热。尽管大部分的太阳辐射被地球直接吸收,但还有一部分被反射回来。而温室气体作为障碍物阻挡了这种外溢的能量,像温室的玻璃板一样,把热量保留在地球的大气层中(参见图22.3)。这种自然的温室效应把地球的温度保持在大致的舒适温度,即华氏60度左右。^②如果没有温室气体维持热量,地球将会冷得多,平均温度约为华氏0度^③。

然而,如果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含量增加,温室效应会加剧,并产生更高的温度。自从工业化开始,温室气体的含量已经显著上升。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含量增长最多,自

188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将近30%。甲烷(Methane)的含量增加了一倍,而一氧化二氮^④的含量则上升了大约15%。人类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非自然形成的温室气体(参见下一个图文框)。大部分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的大幅增长可以归因于燃烧矿物燃料和其他人类活动,比如工业生产、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滥伐森林、采矿、垃圾填埋和汽车尾气排放。

图22.4通过把1961至1990年间英格兰中部和全球的平均气温制成图线,显示了19世纪晚期以来地表温度的上升趋势。在整个20世纪当中10个最热的记录年份,竟有7个出现在90年代,1998年则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二 全球变暖的潜在后果

如果全球变暖的确正在发生,那么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全球天气模式的变化在局部——比如在英国——所产生的效应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有一些全球性的潜在的有害效应,包括:

1 海平面上升 全球变暖可能导致极地冰帽融化,使海洋温度上升,海水膨胀。如果冰河和其他形式的陆地冰川融化,海平面将会上升。沿海或低地城市将会被淹没,成为不可居住的地方。如果海平面上升一米,那么孟加拉国、埃及和荷兰各自会失去本国陆地总面积的17%、12%和6%(UNDP 1998)。如果海平面比今天更高,那么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讨论的印度洋海啸就会导致更大的破坏。

① 气候集团(Climate Group)是一家国际性的独立非盈利组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致力于提高商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能力。

② 约折合摄氏15.6度。

③ 约折合摄氏零下17.8度。

④ “nitrous oxide”,又称氧化亚氮或笑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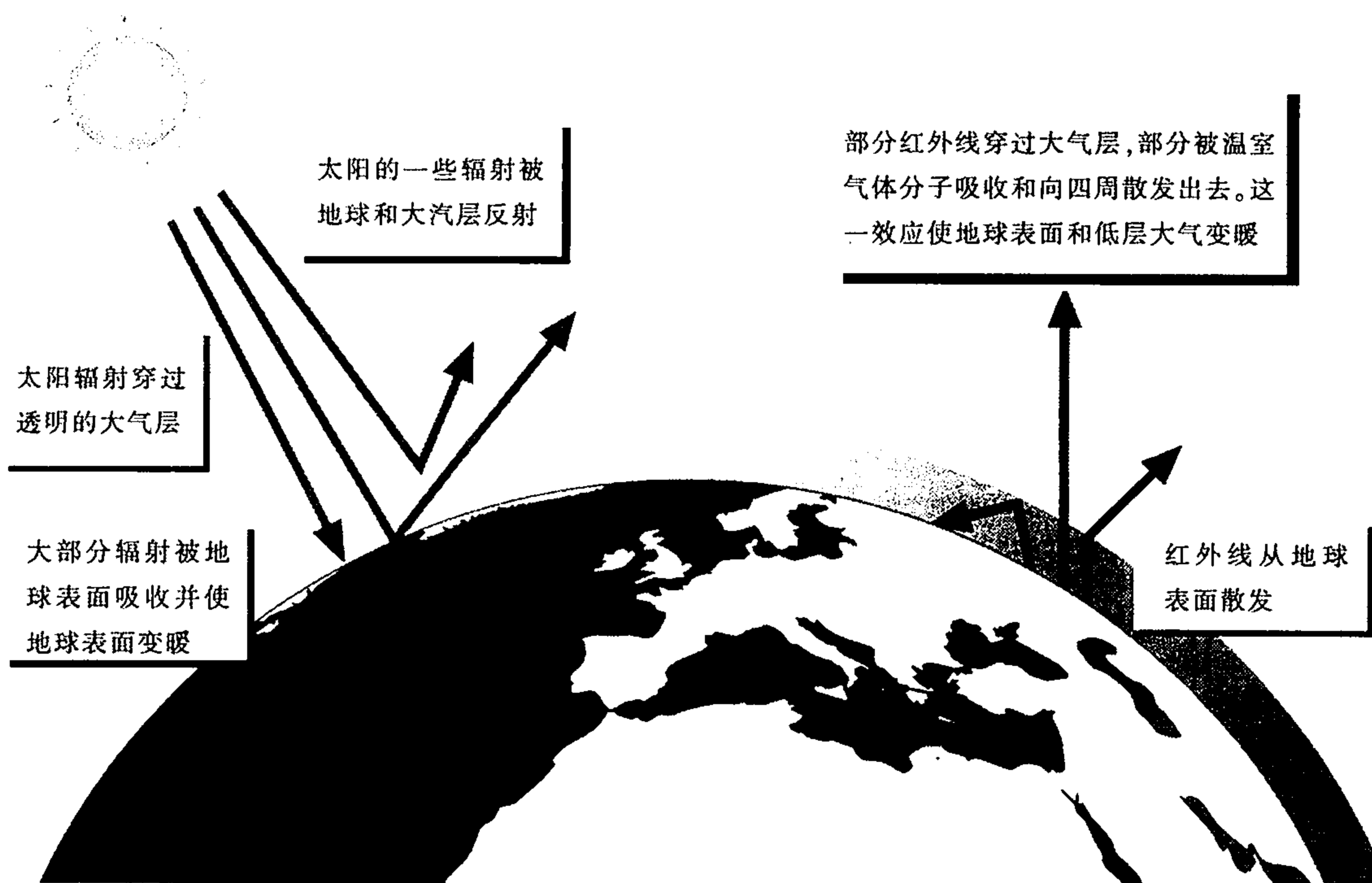


图 22.3 温室效应

资料来源: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ebsite

什么是温室气体?

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中有一部分是在大气层中自然产生的,另一部分则源自人类的活动。自然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臭氧。然而,由于人类的一些活动,绝大多数这类自然产生的气体的含量提高了。

二氧化碳是在燃烧固体废弃物、矿物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木头和木制品的时候被释放到空气中的。

甲烷是在生产和运输煤、天然气与石油时被散发出来。固体废弃物填埋地的有机垃圾分解和饲养牲畜也会产生甲烷。

一氧化二氮是在农业和工业活动中以及燃烧固体废弃物和矿物燃料的时候释放出来的。

非自然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泡沫塑料产品、冰箱和空调的副产品,被称作氯氟碳(chlorofluorocarbons, CFCs),还有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氢氟碳(hydrofluorocarbons, HFCs)和全氟化碳(perfluorocarbons, PFCs)。

资料来源: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全球变暖问题网站, <http://www.epa.gov/globalwarming/climate/index.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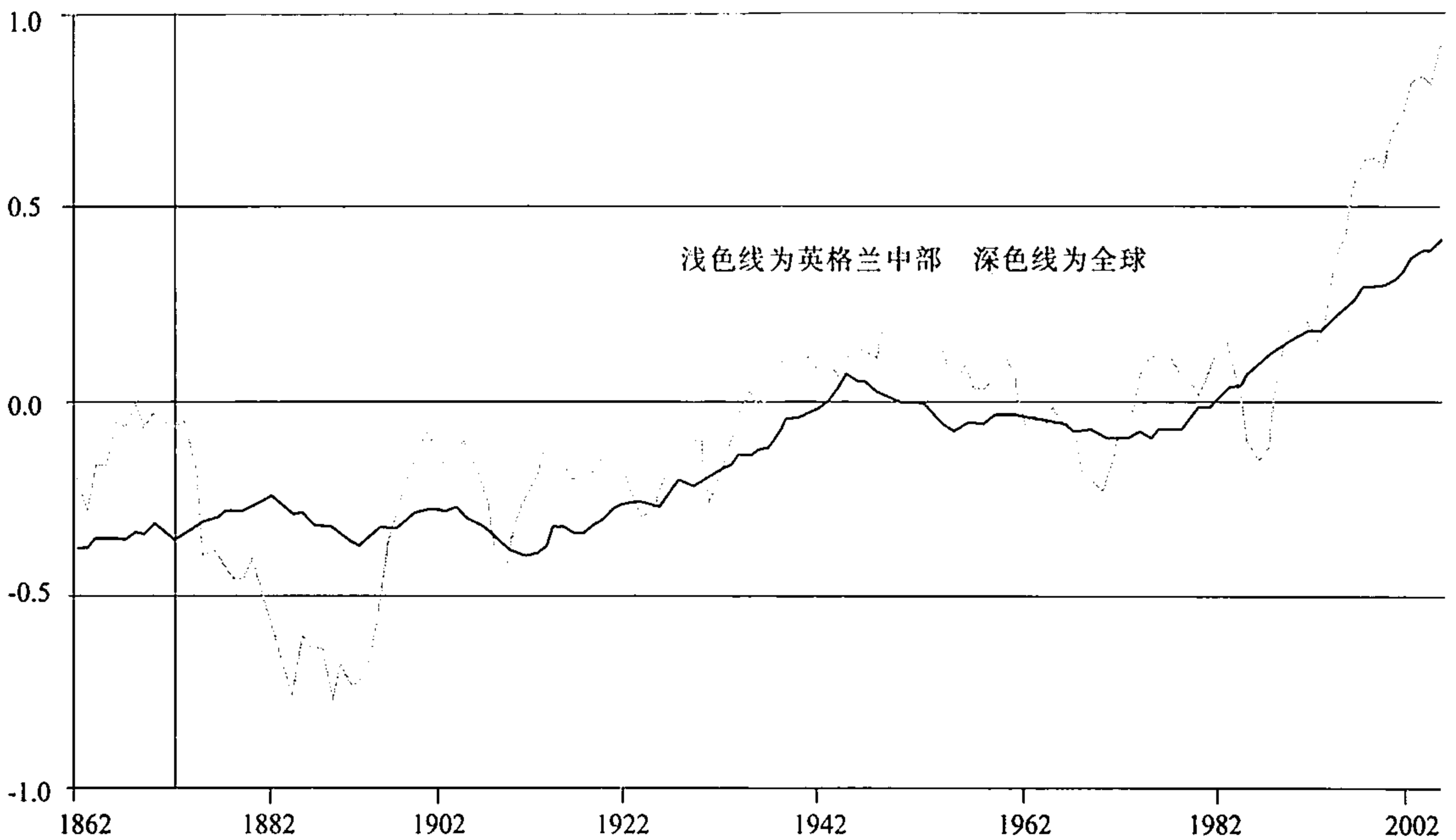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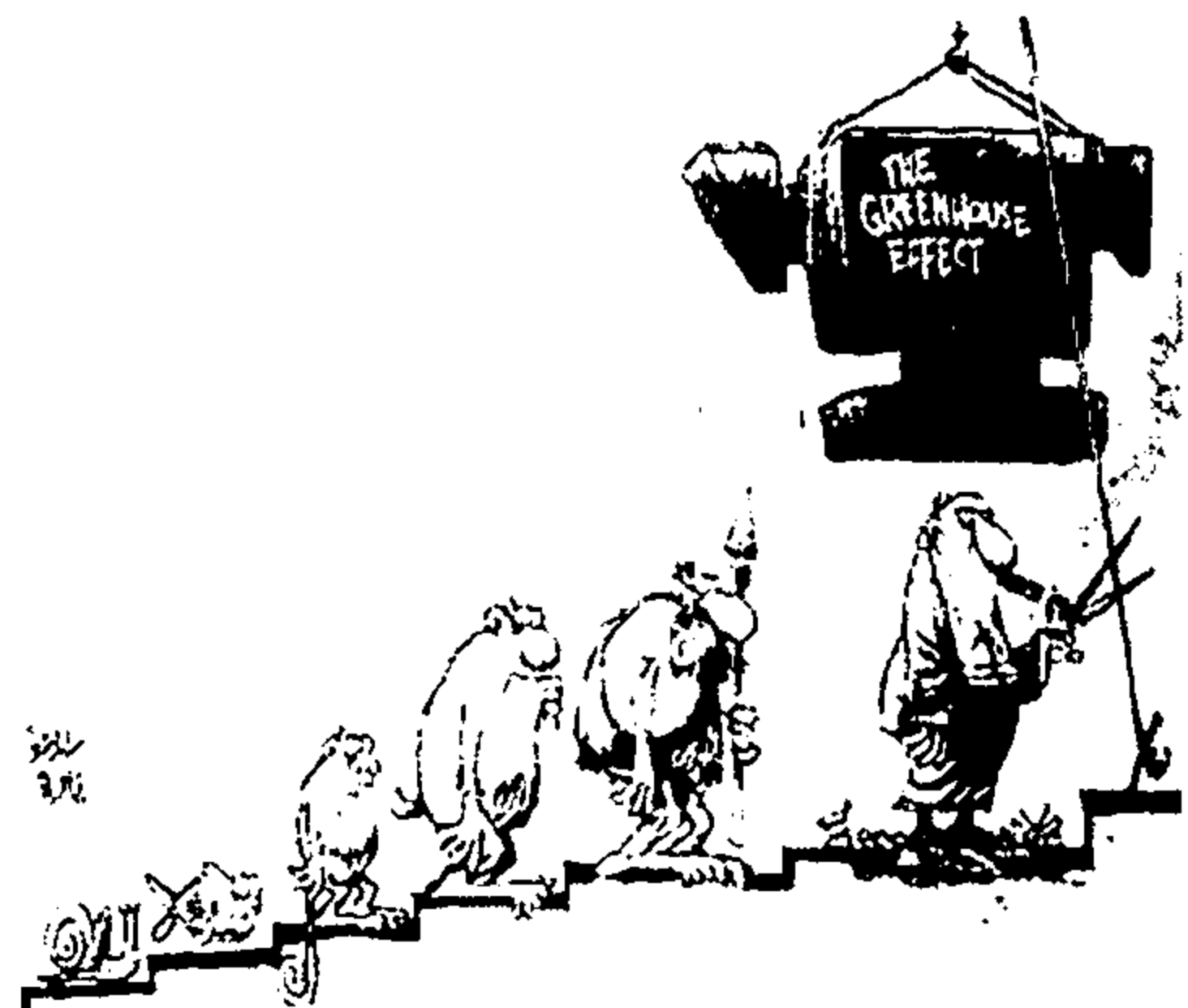


图 22.4 全球及英格兰中部 1861 年至 2002 年地表均温变异，与 1961 年至 1990 年均值相比(摄氏度)
资料来源:ONS

- 2 沙漠化 全球变暖可能导致千顷良田变成大片沙漠。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东和南亚将更严重地受到沙漠化和严重的土壤流失的影响。
- 3 疾病的传播 全球变暖可能扩大传播疟疾和黄热病的蚊子等生物体的生存地理范围，延长其生存季节。如果气温上升 3 到 5 摄氏度，每年疟疾患者的数目将增加 5000 万到 8000 万。
- 4 农业歉收 如果全球变暖继续下去，世界上最为贫穷的许多地区的农业产量可能会下降。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可能最受影响。
- 5 改变气候模式 由于全球变暖，千万年来相对稳定的气候模式经历着急剧的变动。目前有 4600 万人生活在可能受到海洋风暴破坏的地区，而另外许多人则可能遭受洪

水和飓风的袭击。

- 6 地缘政治动荡 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上面讨论的气候变化的效应就其极致而言，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争吵甚至战争，因为它们都想保护各自越来越有限的农业资源、饮水资源和能源。报告警告，



随着人们试图搬到那些拥有资源以适应气候变化的地方，就会发生大规模迁移 (Schwartz and Randall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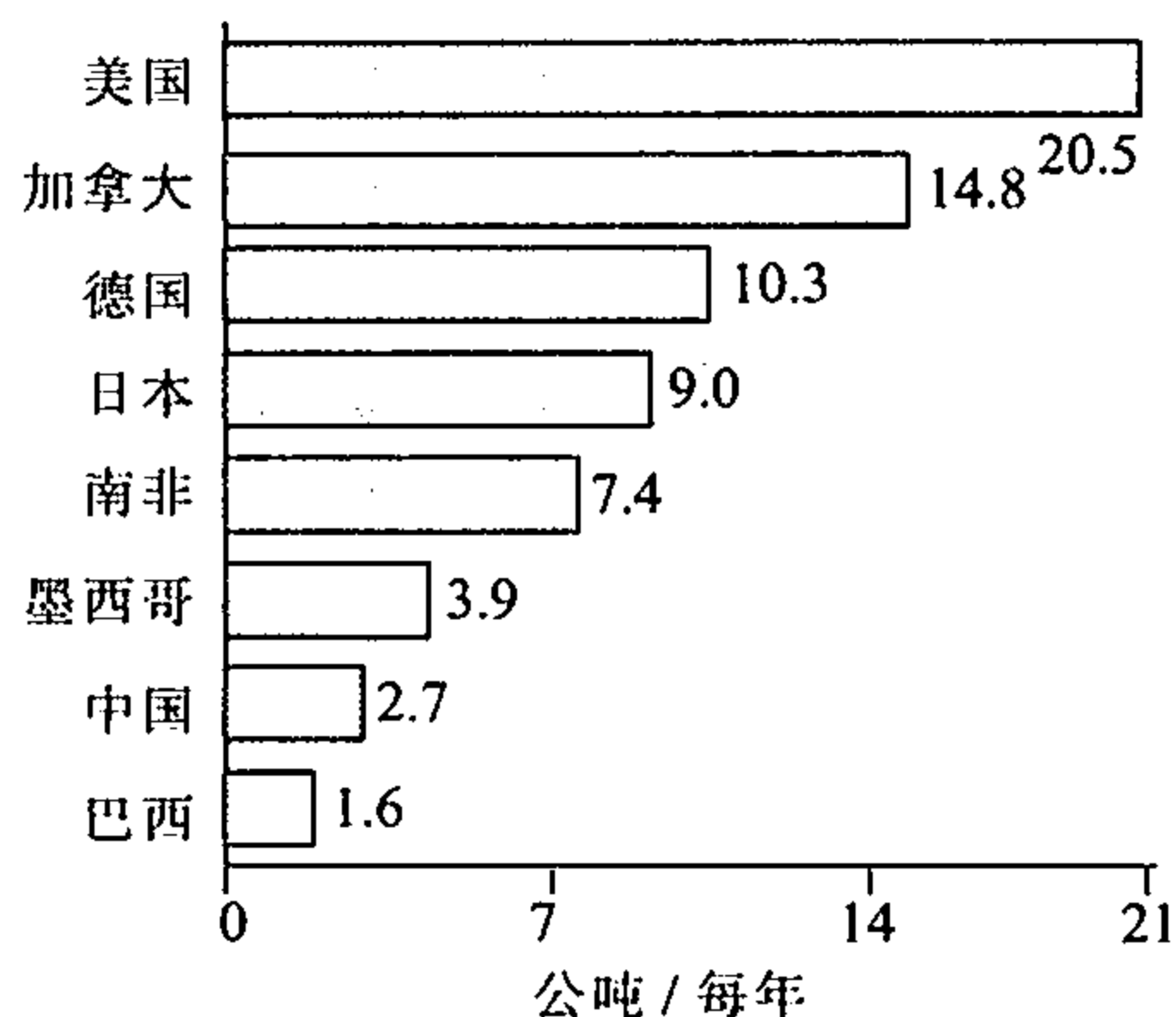
与全球变暖相联系的一些变化趋势似乎比科学家最初的预测发展得更快。例如，在 1999 年 12 月，一项卫星研究显示，北极冰帽的缩减速度远远快于科学家以前的预测，今后这一过程可能会对世界气候产生显著的效应。无独有偶，在 2002 年初，南极洲的两座巨大冰架 (ice shelves)，即拉尔森 B 冰舌和新开地冰舌 (Larsen B and Thwaites glacier tongue)，发生了崩塌，数日之内，散裂作上千座冰山。冰体的缩减可能是自然变化的结果，但无论其起因是什么，冰体似乎都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融化。测量数据表明，最近几十年间，夏秋两季的北极海冰缩减了 40%，自 1950 年代以来，春夏两季的海冰缩减了 10% 到 15%。自 1960 年代以来，全球雪面已经缩减了 10%，山地冰川也大大回撤了。

三 对于全球变暖风险的反应

长期以来，关于全球变暖的说法遭到驳斥。一些科学家怀疑所宣称的效应是否确实存在，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世界气候的变化可能是自然趋势的结果，而不是人类干预的后果。然而在现在，已经达成某种明确的共识：全球变暖确实正在发生，温室效应难逃其咎。在 2000 年 1 月，由 11 名来自不同科学领域的气候专家组成的小组发表了一份报告，是迄今有关这一问题最为全面而深入的报告之一。所有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小组的总结表明，在上个世纪，地表的温度上升了 0.7 到 1.4 华氏度 (折合 0.4 到 0.8 摄氏度)。在过去 20 年中，温度升高得特别快。

如图 22.5 所示，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目前工业化国家产生的温室气体远远多于发展中世界，其中，美国

1995年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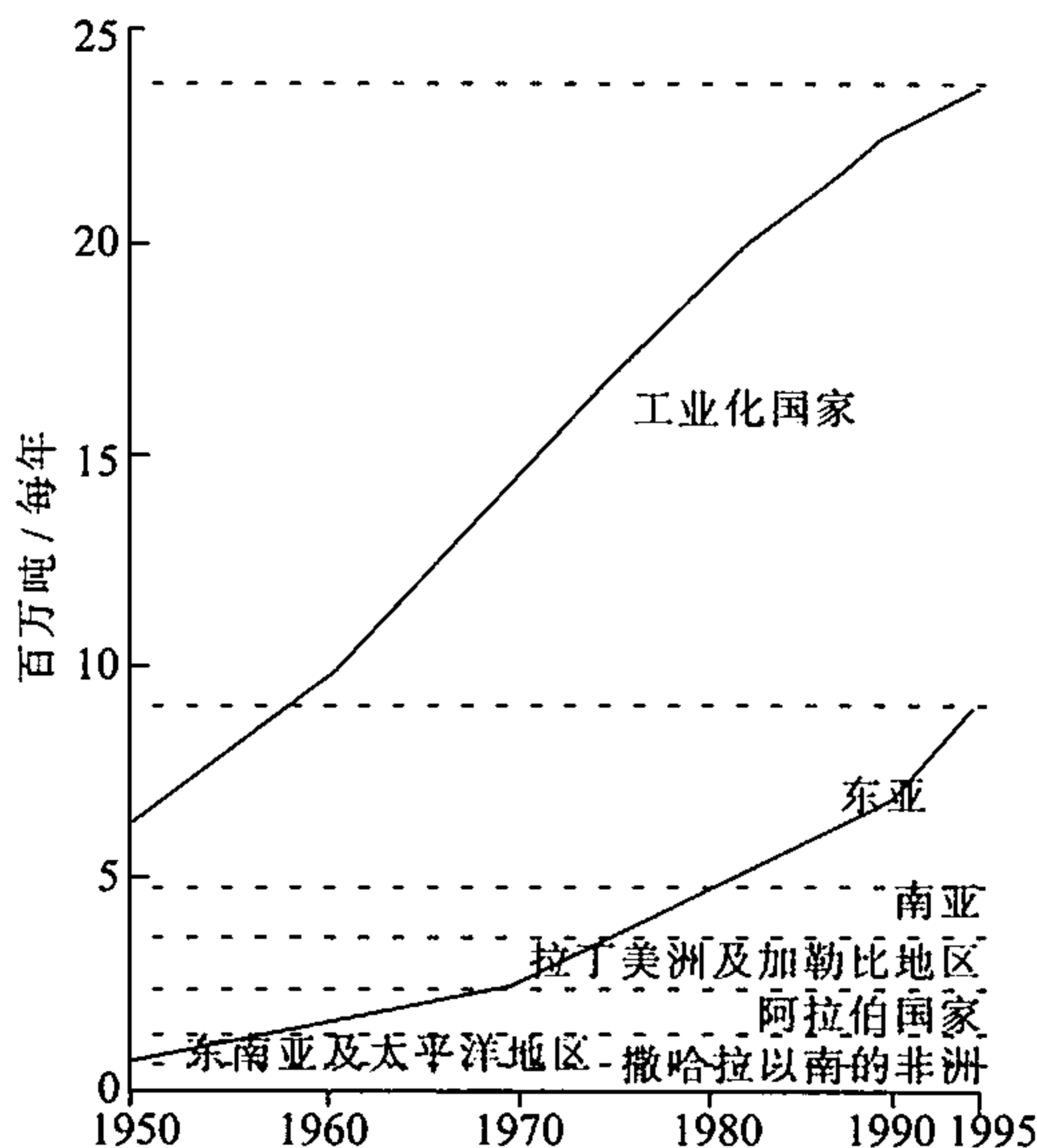


图 22.5 世界工业化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

资料来源:UNDP (1998), 页 3

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然而，温室气体的产生并不限于发达世界。发展中世界，特别是在正经历着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其排放量也在迅速增长，预计到 2035 年将与工业化国家的排放量持平。

1997 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生态峰会达成协议，计划到 2010 年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根据议定书的条款，工业化国家同意执行从 1990 年这一基准年到 2010 年的

一系列减排目标。世界各地的目标不尽一致,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平均减排 8%,到爱尔兰的最多增加 10%和澳大利亚的最多增加 8%。(美国起初承诺减排 7%)许多科学家声称,这一目标其实还太温和。他们提出,如果要避免气候上的严重后果,排放量必须减少多达 70%到 80%。而且,无论政府怎样减排,都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改变全球变暖效应。要花上一个多世纪,才能让二氧化碳通过自然过程从大气层中散发出去。

2001年,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认为它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几番辩论之后,其他大多数国家同意,丢开美国,继续推动方案,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经过2001年的德国波恩会谈,以及稍后的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ch)会谈,最终通过了越来越复杂的议定书决案,督促各签署国在2002年底由其各自的立法机构批准此案。近些年来,几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已经成功减排,包括英国、德国、中国和俄罗斯,尽管说俄罗斯的减排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经济的衰退。

面对许多新形式的人为风险,没有人能够确信全球变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它的致因如此分散,其确切的后果也难以计算。“高”排放量真的会导致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吗?保持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稳定能保护世界上大多数人免遭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吗?目前的全球变暖过程有可能进一步引发一系列的气候灾难吗?我们不能确信无疑地回答这些问题。地球的气候相当复杂,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将会在地球上不同地点的不同国家中产生不同的后果。

22.3.2 转基因食品

我们在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五小节)已经

看到,全球有 8.3 亿人每天忍饥挨饿。全球变暖的过程可能加速了不断恶化的沙漠化和农业歉收,并导致人们担心,食品短缺可能变得更加普遍。在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人们高度依赖大米之类的谷类粮食生存,而这类粮食储备正日渐减少。很多人担心现在的农业技术不能生产出足够的大米以供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同诸多环境挑战一样,受饥荒威胁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工业化国家有大量的谷物盈余。但恰恰是在预计人口增长最快的贫穷国家,谷物短缺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有些人坚信,要避免潜在的粮食危机,关键或许在于近来的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进步。通过操纵稻米之类的基本作物的基因组合,现在有可能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率,从而增加作物的产量。这个过程就是基因改造^①;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作物被称作转基因生物。之所以要实施基因改造,可能有各式各样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了提高庄稼产量。例如,科学家已经发明出高于正常维他命含量的转基因生物;另一些转基因作物能够抵抗通常用来杀死庄稼周围的杂草、昆虫、真菌及病毒的除草剂。由转基因生物制成或含有少量转基因生物成分的食品被称为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作物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们涉及不同生物之间的基因移植。与已经使用很多年的老式杂交方法相比,这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干预自然。通过能够在动物之间或者植物之间移植基因的基因剪接(gene splicing)技术,人类能够生产出转基因生物。例如,在最近的实验中,人类的基因被注入到猪之类的牲畜的基因当中,试图最终为人类器官移植提供替代品。人类的基因甚至已与植物基因进行剪接,虽说迄今为止,市场出售的转基因作物中还不涉及此类极端的生物工程。

科学家们声称,一种转基因品种的“超级大米”能够增产多达 35%。另一种被称作“金

^① 原文为“genetic modification”,亦译作“基因修饰”、“遗传修饰”等。

米”的品种含有添加的维生素 A,能够在世界范围内 1.2 亿多的儿童中减少维生素 A 缺乏症。你可能认为,这种生物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热烈欢迎。然而,实际上,基因改造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基因改造使得科技创新的益处与环境破坏的风险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别更加显著。

一 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

转基因食品的传奇故事仅仅始于几年前,当时,世界上一些顶尖的化学与农业公司确信,有关基因机制的新知识能够改变世界的食品供应。这些公司此前一向生产杀虫剂和除草剂,但它们想转入一个自认为是未来主要市场

的领域。美国的孟山都 (Monsanto) 公司曾经引领这项新技术的大部分发展。它买进种子公可,在出售它的化学部门之后,再花大部分财力把新的作物投放到市场。在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夏皮罗的领导下,孟山都公司发起了庞大的广告宣传活动,向农场主和消费者宣传转基因作物的好处。早期的反应正如这个公司满心期望的一样。到 1999 年初,美国生产的 55% 的大豆和 35% 的玉米都包含了基因改变。此时,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世界各地的 3500 万公顷的土地上种植,这个面积是英国国土的一倍半。除了北美,中国也在广泛种植转基因作物。

孟山都公司的销售攻势强调了转基因食品的诸多优点。公司声称,转基因作物能够帮助养活世界上的穷人,还能够减少使用有污染的化学药剂,特别是杀虫剂和除草剂中的化学



绿色和平近些年来领导了一些反转基因食品的抗议活动,比如图中这次攻击诺福克(Norfolk)^①的转基因玉米地。

^① 此处指英格兰东部郡名,为富庶农业区。

物质。例如,据称转基因土豆所需要的化学杀虫剂比传统耕作技术的需要量减少了40%。根据孟山都公司的说法,生物技术使我们能够种植更高产、更优质的作物,同时又维持和保护了环境。

因为转基因作物从根本上说是全新的,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一旦它们被引入环境,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采用这种很大程度上未经检测的技术所具有的潜在风险,使得许多生态保护团体和消费者团体开始担忧。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关注在欧洲尤为广泛。在英国,供职于苏格兰一家政府实验室的国际著名遗传学家阿帕德·普斯陶伊博士的发现,激发了人们对转基因作物的商业性种植的敌对情绪。普斯陶伊博士在研究中测试了一种加入自然杀虫剂基因的土豆,这种基因是一种叫做植物血凝素的蛋白质,它是从一种花当中提取的。结果显示,老鼠吃了转基因土豆以后,免疫系统受到明显的破坏,器官发育迟缓。普斯陶伊博士的发现遭到其他著名科学家的批评。在通过电视讲话表达了自己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忧虑之后,普斯陶伊博士被政府实验室解聘。

至此,转基因食品几乎每天都成为新闻的头版报道。电视和收音机中的辩论,各种谈话节目和听众参与的广播节目,连篇累牍,都围绕着这个话题来组织。英国许多民众签名反对转基因作物,一些人甚至参加“直接行动”,拔除了全国各地官方试验田中的转基因作物。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反应。这种反应最终传回到先前很少有争论的美国。在英国,八大超市连锁店中就有七家改变了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经营方针。其中有五家在其自有品牌产品中完全禁止使用转基因成分,并坚持到现在。八大连锁店全都坚持在店面进行更好的标注。联合利华(Unilever)和雀巢(Nestlé)这两家大公司宣布,它们将收回过去对于转基因食品原料的接受立场。美国一些曾经大规模耕种转基因作物的农场主重新开始生产传统作

物。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59%的英国人明确同意,应当禁止转基因食品(HMSO 2005)。

环保主义者和消费者团体的抗议对孟山都公司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股票市值暴跌。夏皮罗在电视中公开承认,他的公司犯了大错。他说:“被我们激怒并与我们对抗的人,可能比被我们说服的人还要多。我们对于这项技术的信心,以及为此所投入的热情,普遍被看作自以为高人一等,事实上目中无人,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就在几个月前的讲话中,他还充满着一种天下无敌的自信。孟山都公司被迫彻底取消了一项极具争议性的计划:使用一种叫做“终结者”(the terminator)的基因。这种基因使孟山都卖给农场主的种子经过一代后便失去繁殖力,农场主将不得不每年都向公司订购种子。批评孟山都公司的人指出,该公司正试图把农场主诱导为一种“生物奴隶”。

在欧洲,在非洲的大片区域,转基因食品仍在激发争论。从1998年到2004年,欧盟拒绝了转基因作物的新专利申请。2004年提出了彻底禁止的问题,当时进口一种进一步转基因化的玉米作物的申请获得了批准。又有一项计划提出,要求标注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尽管如此,对于大宗转基因生产商,尤其是美国的生产者来说,欧盟的行动过于迟缓。2003年5月,它们向世贸组织投诉欧盟未能授权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声称欧盟的立场毫无科学依据,违背了自由贸易法规(Toke 2004)。

在非洲,转基因食品援助也遇到了麻烦。2002年,赞比亚拒绝接受美国的食品援助,因为捐赠的这批玉米和大豆大部分都经过了基因改造。赞比亚总统利维·姆瓦纳瓦萨称这批进口货物为“毒药”。截至2004年,又有津巴布韦、马拉维、莫桑比克、莱索托和安哥拉加入了赞比亚的行列,拒绝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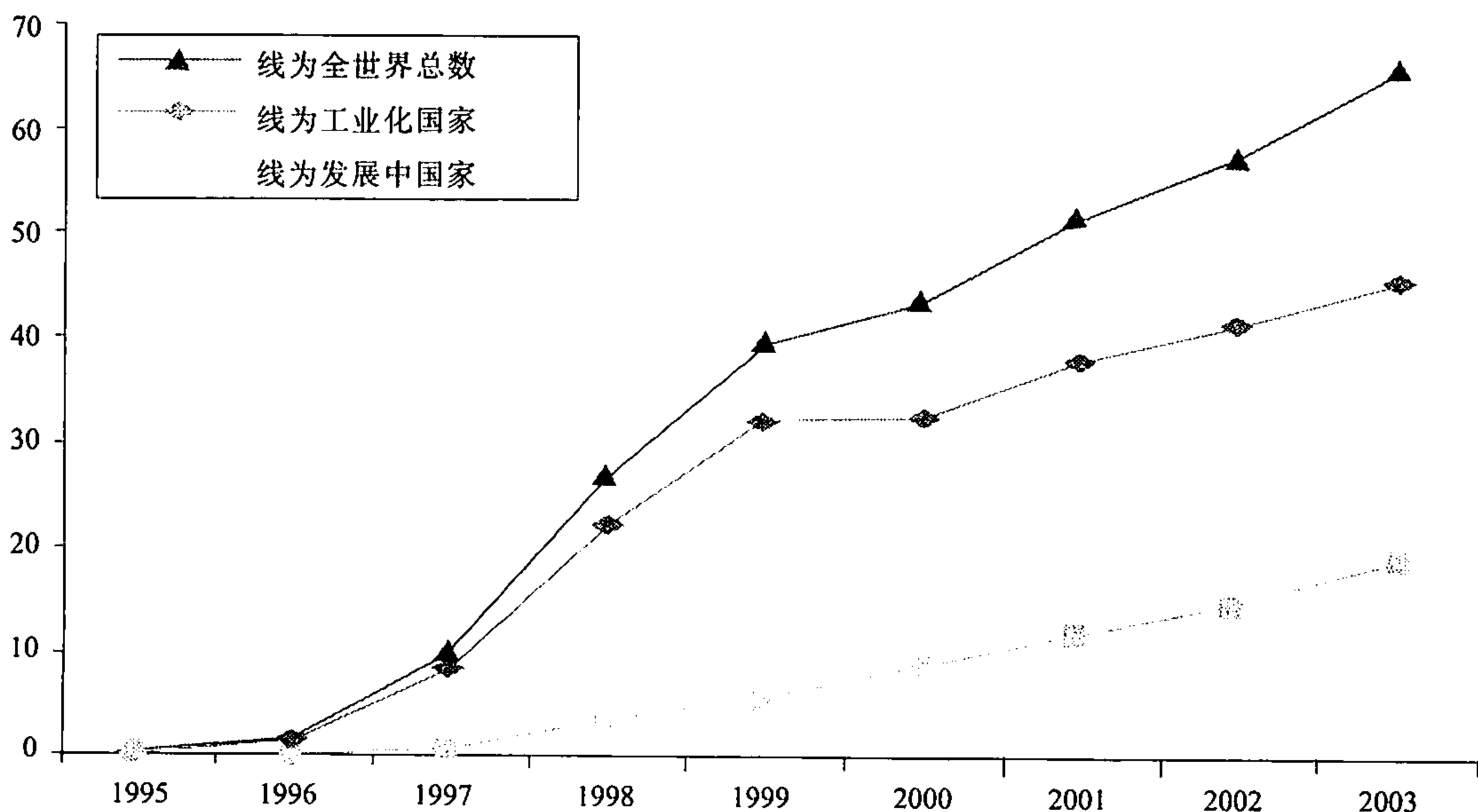
二 评估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尽管转基因生产商言之凿凿,但没有任何人能够确认,转基因作物没有风险。基因代码高度复杂,把新的基因加入植物或生物,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疾病或其他有害的后果。由于该技术基本属于未知领域,新的研究结论和新的发现层出不穷。在2000年5月,英国政府承认,农民种植的数千英亩传统油菜籽事实上已经被“污染”,因为转基因作物为周边的作物授了粉。数星期后,德国发表研究报告声称,通常用于改变油菜籽的基因已经跃过物种的障碍,进入了蜜蜂的内脏。在这两份令人震惊的报告的短暂间歇期间,孟山都公司自己承认,它的转基因大豆,一种为了商业目的已经得到十分广泛的种植的转基因生物,含有未曾预料到的基因碎片,但先前并没有查出。

这些发现强化了许多环保积极分子一段时间以来提出的警告。虽然基因改造有巨大的

潜在利益,但其中的风险不可预料且难以计算。一旦进入环境中,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一连串难以监测和控制的间接后果。面对这种两难处境,许多环保主义者赞成通常所谓的预防原则。该原则提出,如果对新开端可能蕴含的风险有充分的怀疑,那么最好是坚持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然而,尽管环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担忧,近些年来,转来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土地面积始终保持猛增态势,在发展中世界尤其如此,那里的环保运动不那么根深蒂固,限制转基因作物发展的法规一般也不那么严格(参看图22.6)。

一些论者业已指出,在转基因食品和(本章前文讨论的)纳米技术之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美国学者杰弗里·松浦提出,纳米技术产业应当从围绕转基因食品的公众抵制中有所借鉴。松浦认为(Matsuura 1984),生物技术产业早期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企图忽略公众关注,然后又试图通过纯理性的论辩应对这些关



从2002年到2003年,增长了15%,即900万公顷,或2200万英亩。

图22.6 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栽种面积

资料来源:ISAAA (2003)^①

① 原书此图纵轴无单位,应该是百万公顷。另外,此图和下图的ISAAA,在书后文献中均为ISSA,年份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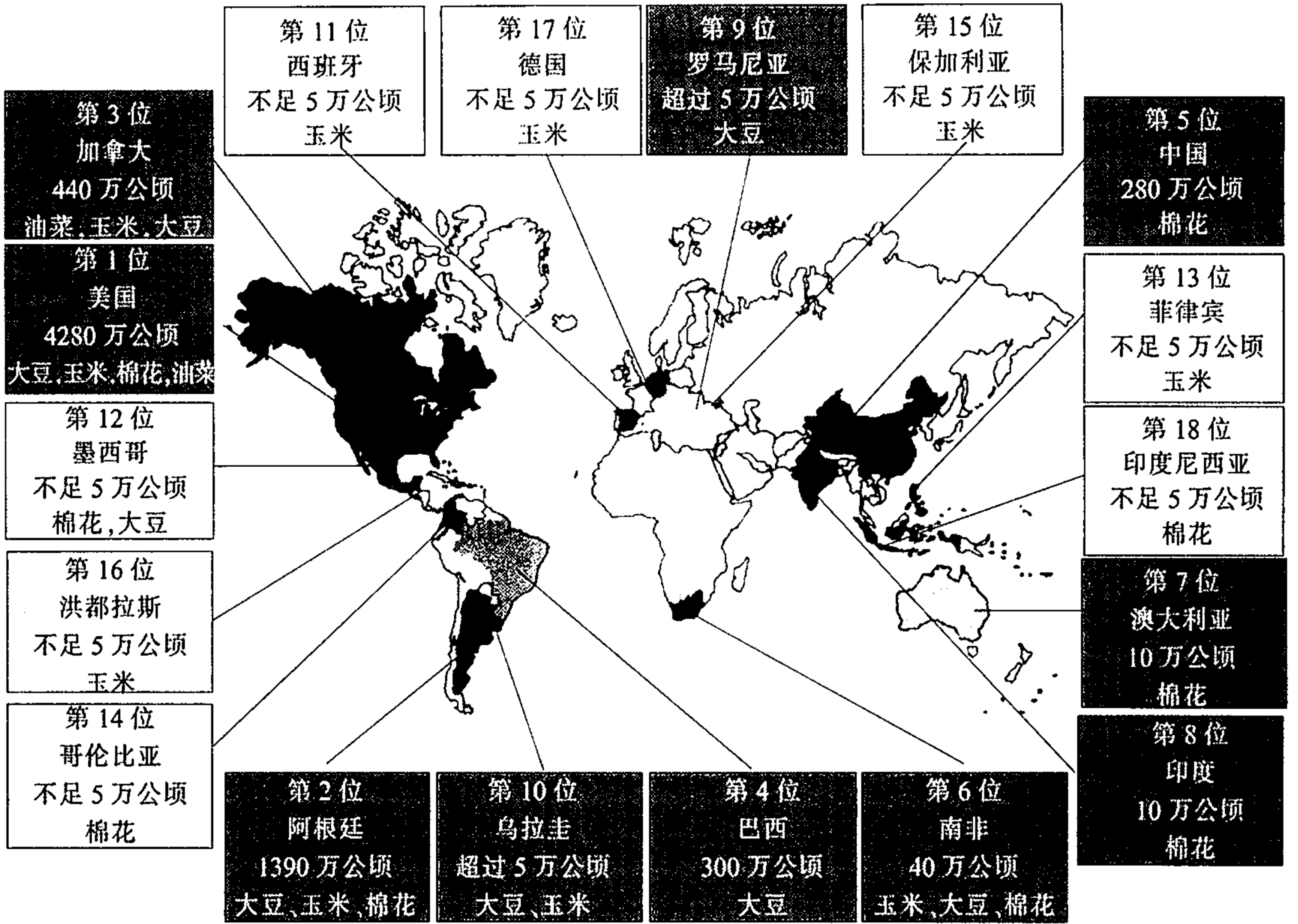


图 22.7 2003 年转基因作物主要栽种国
资料来源: ISAAA (2003)

注。松浦指出, 纳米技术产业目前就是重蹈覆辙。他认为, 支持纳米技术的人应当主动出击, 发动一场公关攻势以求支持, 既要以理服人, 也要以情动人。他主张, 为了避免遭到强烈的公众抵制, 以至于阻碍技术发展, 导致重大经济损失, 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 倡导纳米技术。不过, 松浦的主张避而不谈新技术有可能带来的负面风险, 片面强调了它们的潜在好处, 主要是经济上的利益。下一节里, 我们来看看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有关风险概念的一种更宽泛的思路。

22.3.3 全球“风险社会”

纳米技术、有关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全球变暖及其他人为风险, 已经使个人在各自的日

常生活中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由于没有应对这些新危险的进程计划, 个人、国家和跨国组织在就如何生存做出决策时, 就必然会面临风险。因为不知道这类风险确切的原因和后果, 所以每个人都不得不自己决定预备冒何种风险。这将令人十分为难。如果某些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或消费会对我们的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是否应当使用它们? 甚至对于吃什么这样“简单”的决定, 我们也必须在权衡关于产品相对优缺点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信息和意见后方能做出。

贝克 (Beck 1992) 就风险和全球化有过广泛的论述, 他认为这些风险促进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随着技术变迁的进程愈益加快, 新的风险形式随之产生, 我们必须不断依据这些变革做出回应和调整。他认为, 风险社会并

人为风险与人类生存

2003年,英国皇家天文学家^①马丁·里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一语惊人,叫做《我们的最后一个世纪》。副标题则是一个问题:“人类会挺过21世纪而继续生存吗?”里斯认为,科学与技术爆炸性进展,比如在生物科技、电脑科技、纳米科技和空间探索等领域的景象,并不单是给未来带来了令人欣悦的前景,而且也蕴含着他所说的黑暗一面。

我们已经看到,科学进展可以带来意外的后果。里斯的书考察了人类文明灭绝这一灾难性景象的可能性。里斯描述了可能伴随21世纪的新科学而来的一些世界末日般的风险,包括由恐怖分子或国家造成的核能大屠杀(holo-

caust),由于恐怖分子使用生化武器或实验室失误所制造的新的疾病。

里斯的结论还是清醒冷静的。他区分了远期与近期。就近期而言,他说的是未来20年,里斯准备打赌会有一场重大灾难夺取超过100万人的生命(尽管他强烈希望自己的估计落空)。回到此书的副标题,里斯提出,在下一个百年间,也就是他所称的远期,人类挺过21世纪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只有一半。

这种预测似乎显得过于悲观,但里斯认为,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激发世人来讨论,如何(尽可能)防御最糟糕的风险,同时还能施展最能造福于人类的新知。

非仅限于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而且包含着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革:就业模式的转换,工作无保障感的加剧,传统和习俗对于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家庭模式受到侵蚀,以及个人关系的民主化。因为个人的未来远不如在传统社会中那样“确定”,所以各式各样的决策都给个人带来了风险。比如说,结婚在今天就比婚姻是终身大事的时候所冒的风险要大。在选择拿什么样的教育文凭、走什么样的职业道路时,我们也会觉察到风险的存在,因为在一种像我们这样变化迅速的经济体中,我们很难预测何种技能将会是有价值的。

根据贝克的说法(Beck 1995),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的危险不会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空间、时间或社会。今天,风险影响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阶级。它们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而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我们在

前文已经看到,许多形式的人为风险,比如与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关的人为风险,是跨越国界的。在这一点上,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厂的爆炸就是一例明证。生活在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的所有人,无论年龄大小,阶级高低,也不管性别男女,地位尊卑,都遭到了危险浓度的核辐射。与此同时,事故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切尔诺贝利本身,在整个欧洲,乃至更远的地方,爆炸发生很久以后,都还能测到偏高的辐射量。

展望未来

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还不能预见即将到来的百年将会是一个社会经济和平发展的百年,还是一个全球问题与日俱增、

^① 原文为“Astronomer Royal”,是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的称号。

或许超出人类解决能力的百年。与两百年前著书立说的社会学家不同,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工业、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后果绝不都是有益的,就像有关里斯对于 21 世纪的悲观预测的讨论所展现的那样(参看上一个图文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创造出一个特殊的世界,它所蕴含的诸般风险促成了巨大的收益,也促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在发达世界,民众比以往更加富裕,但整个世界也更加趋近了生态灾难。

我们应该持一种自暴自弃的绝望态度吗?当然不是。如果说有一点是社会学为我们提供的,那就是使我们深刻意识到人类对于社会制度的创制权。我们看到了控制自己的命运、打造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其程度对我们的祖辈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前面讨论过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有助于推进环境领域的一些重要改革。其中尤其包括生态效率和生态现代化的概念。生态效率意味着发展这样一些技术,既能够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又尽可能减少环境的代价。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布伦特兰报告》出现之前,人们还普遍认定,绝大多数形式的工业发展同生态保护是格格不入的。而生态现代化命题中的核心观念正在于:这一认定是虚设的。使用富有生态效率的技术,能够产生经济发展的某些形式,把经济增长与积极的环保政策结合起来。

生态现代化所提供的可能性可以用废品处理产业来说明。废品处理产业是一种去除各行业以及消费者每天产生的数以吨计废品的产业。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直到最近,绝大部分废品都还只是经过简单的处理和掩埋。然而今天,整个产业正在发生转变。技术的发展使得用回收纸生产新闻纸比过去用木浆生产廉

价得多。因此,除了环保原因,也有很好的经济原因反复利用纸张,而不是无休止地砍伐树木。不只是单个公司,而且是整个产业都在积极地追求“零浪费”的目标,也就是说,所有的废品都得到完全的循环利用,投入未来的工业使用。丰田和本田两家汽车制造企业在所使用的汽车部件方面的再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85%。在这种状况下,废品不再是有害的材料垃圾,而是工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推动技术进一步革新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回收利用的一些重大贡献,因此也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重大贡献,正是来自信息技术产业高度集中的区域,比如加利福尼亚的硅谷。与许多旧式的工业生产不同,信息技术从环境的角度上说是清洁的。它在工业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越大,就越可能减轻对于环境的有害影响。这种考虑对于世界上较贫穷社会的未来发展或许有所借鉴。因为信息技术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此至少在某些生产领域,可能既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同时又能避免旧式工业经济所造成的污染。

就连最坚定地倡导生态现代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拯救全球环境可能需要改变当今世界不平等的现状。我们已经看到,目前工业化国家只占有世界人口的大约五分之一,但是在污染大气层、加速全球变暖的气体排放量中,它们却占了 75%。发达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消费量是欠发达国家的 10 倍。在贫困国家,贫困本身就是导致环境破坏的那些活动的首要原因。生活在经济困苦状态中的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可以得到的当地资源。因此,讨论可持续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不平等。

本章要点

- 1 自然界的几乎方方面面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所有的社会现在都面临着对于环境生态的担忧,即面对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冲击,怎样最好地应对和遏止对于环境的破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流行的“增长的极限”观念,是指工业的增长和发展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相抵触。相反,可持续发展坚持认为,应该有增长,但其方式应当是通过循环利用资源,而不是耗尽资源。
- 2 世界范围内消费模式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但它们也破坏了环境资源,并加剧了全球不平等。西方国家的能量消费和原材料消费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由消费增长引起的环境破坏却对穷人造成了最严重的影响。
- 3 使环境受到威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些与释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与废弃物有关,包括空气污染、酸雨、水污染和不可回收的固体废弃物。其他环境威胁包括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衰竭,比如水、土壤和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
- 4 生态效率是指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得经济增长的技术。生态现代化是指相信工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并不相互抵触。
- 5 绝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与风险密切相关,因为这些问题是科学与技术扩张的结果。转基因作物通过对植物基因组合的操纵而生产出来。全球变暖是指大气当中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浓度上升,导致地球温度逐渐升高。全球变暖的潜在后果是严重的,包括导致洪水泛滥、疾病传播、极端天气状况出现和海平面上升。全球变暖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了潜在的风险,但是,由于它的致因和潜在的后果极其分散,因此难以组织起抵制它的努力。
- 6 转基因食品富有争议:基因改造可能对缓解饥饿和营养不良有很大帮助,但是,有关的技术是全新的,或许会给人类和自然环境带来风险。预防法则指出,如果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有足够的怀疑,那么最好是维持现状而不是继续推进。

思考建议

1. 环境破坏是应该归咎于科学还是社会?
2. 在一个全球风险时代,个人可能产生影响吗?
3. 当西方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时,把“增长的极限”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是否公平?
4. 考虑到温室效应,核能是否是一种可以承担的风险?

阅读指南

- Bill Devall, *Simple in Means, Rich in Ends* (London: Green Print, 1990).《简单生活 丰富追求》
- Andrew Dobson,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3rd ed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绿色政治思想》
- Steve Hinchliffe and Kath Woodward (eds), *The Natural and the Social: Uncertainty, Risk,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自然范畴与社会范畴:不确定性、风险与变迁》

David Pearce and Edward Barbier, *Blueprint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 (London: Earthscan, 2000).

《可持续经济展望》

Jonathon Porritt, *Seeing Green: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xplained* (Oxford: Blackwell, 1984).《绿色

论:生态政治学剖析》

Mark J. Smith, *Ecologism: Towards Ecological Citizenship*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生态主义:建设生态公民权》

G. Tyler Miller, Jr,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Principles, Connections and Solutions* (London:

Brooks/Cole, 2000).《生活在环境中:原则、关系与对策》

Steven Yearley, *The Green Case: A Sociology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rguments and Politics*

(London: Unwin Hyman, 1991).《绿色法案:环保问题、主张与政治的社会学》

网络导航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http://www.defra.gov.uk/environment/index.htm>

环保组织网站名录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Web Directory)

<http://www.webdirectory.com>

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

<http://www.foe.co.uk>

绿色和平组织 (Greenpeace)

<http://www.greenpeace.org.uk>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www.undp.org>

参考文献

- Abbott, D. (2001) 'The Death of Class?', *Sociology Review* 11 (November).
- Abeles, R. P. and M. W. Riley (1987) 'Longevity, Social Structure, and Cognitive Aging', in C. Schooler and K. W. Schaie, eds,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Over the Life Course* (Norwood, NJ: Ablex).
- Abel-Smith, B. and P. Townsend (1965) *The Poor and the Poorest: A New Analysis of the Ministry of Labour's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of 1953—54 and 1960* (London: Bell).
- Ahmed, A. S. and H. Donnan (1994) 'Islam in the Age of Postmodernity', in A. S. Ahmed and D. Hastings, eds,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Akintoye, S. (1976) *Emergent African States: Top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n History* (London: Longman).
- Albrow, M. (1997)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drich, H. E. and P. V. Marsden (1988)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in N.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Alexander, Z. (1999)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Study of Black, Asian and Ethnic Minority Issues* (London, DoH).
- Allen, M. R (1981) 'Managerial Power and Tenure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Social Forces* 60.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2) 'State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27 February.
-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rols Tighten as Internet Activism Grows', 28 January.
- Amsden, A. H.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sden, A. H., J. Kochanowicz and L. Taylor (1994) *The Market Meets Its Match: Restructuring the Economies of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E. (1990) *Streetwise: Race, 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erson, F. S. (1977) 'TV Violence and Viewer Aggression: Accumulation of Study Results 1956—1976',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1.
- Anderson, S. and J. Cavanagh (2000) *Top 200: The Rise of Corporate Global Power*, 4 December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 Anheier, H., M. Glasius and M. Kaldor, eds (2002)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nenberg Center (2003) 'Parents', Use of the V—Chip to Supervise Children's Television U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Appadurai, A.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ppelbaum, R. P. and B. Christerson (1997) 'Cheap Labor Strategies and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Los Angeles Apparel Conn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2).
- Appelbaum, R. P. and J. Henderson, eds (1992)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 Apter, T. (1994) *Working Women Don't Have Wives: Professional Success in the 1990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rber, S. and J. Ginn (2004) Ageing and Gender: Diversity and Change', *Social Trends* 34 (London: HMSO).
- Arber, S., K. Davidson and J. Ginn, eds (2003) *Gender and Ageing: Changing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Aries, P. (1965) *Centuries of Childhoo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ARIS (2001) *American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Survey 2001*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 of Our Times* (New York: Verso).
- Ashton, D. N. (1986) *Unemployment Under Capitalism: The Sociology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abour Markets* (London: Wheatsheaf).
- Ashworth, A. E. (1980) *Trench Warfare, 1914—1918* (London: Macmillan).
- Askwith, R. (2003) 'Contender', *Observer*, 6 April.
- Atchley, R. C. (2000) *Social Forces and Aging: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Gerontology* (Belmont, CA: Wadsworth).
- Back, L. (1995) *Ethnicities, Multiple Racisms: Race and Nation in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London: UCL Press).
- Bahrami, H. and S. Evans (1995) 'Flexible Recycling and High-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2.
- Bailey, J. M. (1993) 'Heritable Factors Influence Sexual Orientation in Wome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0.
- Bailey, J. M. and R. C. Pillard (1991) 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8.
- Baker, D. and M. Weisbrot (1999) *Social Security: The Phony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lmer, R. (1989) *Mine Eyes Have Seen the Glory: A Journey into the Evangelical Subculture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lswick, J. O. (1983) 'Male Inexpressive-ness', in K. Solomon and N. B. Levy, eds, *Men in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rap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Baltes, P. B. and K. W. Schaie (1977) 'The Myth of the Twilight Years', in S. Zarit, ed., *Readings in Aging and Death: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amforth, A. (1999) 'The Restive Season', *Guardian*, 15 December.
- Barash, D. (1979) *The Whisperings Withi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arker, M. (1981) *The New Racism: Conservatives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Tribe*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 Barker, R. (1997) *Political Idea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rnes, C. (1991) *Disabled People in Britain and Discrimination* (London: Hurst and Co).
- Barnes, C. (2002) *Disability Studies* (Cambridge: Polity).
- Barnes, C. (2003) *Disability Studies: What's the Point?* (University of Lancaster).
- Barnet, R. J. and J. Cavanagh (1994)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Barret-Ducrocq, F. (1992) *Love in the Time of Victoria: Sexuality and Desire Among Working-Class Men and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Harmondsworth: Pen-

- guin).
- Barth, F.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Basu, A., ed. (1995)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Women's Movements in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 Baudrillard, J. (1988)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Polity).
- Bauman, Z.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 Bauman, Z.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Cambridge: Polity).
- BBC (2001) *Murdoch Heads Media Power List*, 16 Jul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1441094.stm>>.
- BBC (2002) *Falwell 'Sorry' for Mohammed Remark*, 13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2323897.stm>>.
- BBC (2004) *Official Downloads Chart Launches*, 28 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music/3846455.stm>>.
- BBC (2004) *Q&A: Will I Be Sued for Music-Swapping?*, 7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music/3722622.stm>>.
- BBC (2004) *UK Music to Sue Online 'Pirates'*, 7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1/hi/entertainment/music/3722428.stm>>.
- BBC (2005) *Violent Crime 'Rise' Sparks Row*, 21 April.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news.bbc.co.uk/1/hi/uk_politics/vote_2005/frontpage/4467569.stm>.
- Beall, J. (1998) 'Why Gender Matters', *Habitat Debate* 4(4).
- Beasley, C. (1999) *What Is Feminism?* (Thousand Oaks, CA, and London).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ck, U. (1995) *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 (Cambridge: Polity).
- Beck, U. and E. Beck-Gernsheim (1995)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Cambridge: Polity).
- Becker, H. (1950) *Through Values to Social Interpret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Bell, A., M. Weinberg and S. Hammersmith (1981)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 (1997)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 *Daedalus* 115 (Summer).
- Beresford, R and J. Wallcraft (1997) 'Psychiatric System Survivors and Emancipatory Research: Issues, Overlaps and Differences', in C. Barnes and G. Mercer, eds, *In Doing Disability Research* (Leeds: The Disability Press).
- Berger, P. L. (1963)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Berger, P. L. (1967)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 Berger, EL. (1986)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Fift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 Equality, and Lib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rger, P. L. and T.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Berle, A. and G. C. Means (1997)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Buffalo, NY: Heim).
- Bernstein, B. (1975)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Bertelson, D. (1986) *Snowflakes and Snowdrifts: Individualism and Sexuality in America*.

-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Berthoud, R. (1998) *The Incomes of Ethnic Minorities*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 Birren, J. E. and K. W. Schaie, eds (2001)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5th edn* (San Diego, CA,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 Blackburn, R. (2002) *Banking on Death* (London: Verso).
- Blair, T. (2004) Speech by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e Launch of the Climate Group, 1 August 2005 (<<http://www.number-10.gov.uk/output/page5716.asp>>).
- Blanden, J., A. Goodman, P. Gregg, et al. (2002)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Centre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Blankenhorn, D. (1995)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Blau, P. M. (1963)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lau, R. M. and O.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launer, R. (1964)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lock, F.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A Critique of Economic Discour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ondet, C. (1995) 'Out of the Kitchen and Onto the Streets: Women's Activism in Peru', in A. Basu, ed.,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Boulder, CO: Westview).
- Bobak, L. (1996) 'India's Tiny Slaves', *Ottawa Sun*, 23 October.
- Boden, D. and H. Molotch (1994) 'The Compulsion of Proximity', in D. Boden and R. Friedland, eds, *Nowhere Space, Tim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nacich, E. and R. R. Appelbaum (2000) *Behind the Label: Inequality in the Los Angeles Garment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nney, N. (1992) 'Theories of Social Class and Gender', *Sociology Review* 1.
- Booth, A. (1977) 'Food Riots in the North-West of England, 1770-1801', *Past and Present* 11.
- Borja, J. and M. Castells (1997) *Local and Global: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 Born, G. (2004) *Uncertain Vision: Bin, Dyke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he BBC* (London: Seeker & Warburg).
- Boswell, J. (1995) *The Marriage of Likeness: Same-Sex 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 (London: Fontana).
- Bourdieu, P. (1986)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ements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ourdieu, P. (1988)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Polity).
- Bourdieu, R.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 Bourdieu, P.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and J.-C. Passeron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 Bowlby, J. (1953) *Child Care and the Growth of Lov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oyer, R. and D. Drache (1996) *States against Markets: The Limit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Brannen, J. (2003) 'The Age of Beanpole Families', *Sociology Review* 13(1).
- Brass, D. J. (1985) 'Men's and Women's Net-

- works: A Study of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Influence in an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8.
-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Bread for the World Institute (2005) *Hunger Bas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bread.org/hunger_basics/>.
- Breen, R. and J. H. Goldthorpe (1999) 'Class Inequality and Meritocracy: A Critique of Saunders and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 Brennan, T. (1988)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and Feminist Debate', in N. Segal and E. Timms, eds,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Psychoanalysis New Have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ewer, R. M. (1993) 'Theorizing Race, Class and Gender: The New Scholarship of Black Feminist Intellectuals and Black Women's Labor', in S. M. James and A. R. A. Busia, eds, *Theorizing Black Feminisms: The Visionary Pragmatism of Black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 Brisenden, S. (2005) *Poems for Perfect People* (<<http://www.leeds.ac.uk/disability—studies/archiveuk/brisenden/Poems.pdf>>).
- Brown, C. and K. Jasper, eds (1993) *Consuming Passions: Feminist Approaches to Eating Disorders and Weight Preoccupations* (Toronto: Second Story Press).
- Browne, K. (200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3rd edn (Cambridge: Polity).
- Browne, K. and I. Bottrill (1999) 'Our Unequal, Unhealthy Nation', *Sociology Review* 9.
- Brownmiller, S. (1975)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London: Seeker and Warburg).
- Brubaker, R. (1998) 'Migrations of Ethnic Unmixing in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2.
- Bruce, S. (1990) *Pray TV: Televange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 Bruce, S. (1996) *Religion in the Modern World from Cathedrals to Cul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mberg, J. J. (1997) *The Body Project* (New York: Vintage).
- Brundtland, C. (1987) *Our Common Futur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Bryson, V. (1993) 'Feminism', in R. Eatwell and A. Wright, ed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y* (London: Pinter).
- Bull, P. (1983) *Body Movement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Wiley).
- Burchell, B. et al. (1999) *Job Insecurity and Work Intensification: Flexibility and the Changing Boundaries of Work* (York: YPS).
- Burgoon, J. et al. (1996)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e Unspoken Dialogue*, 2nd edn (New York: McGraw-Hill).
- Burleigh, M. (1994) *Death and Delive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ns, T. and G. M. Stalker (1966)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London: Tavistock).
-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 (2004) *Undoing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T. and M. Savage (1995)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don: UCL Press).
- Bytheway, B. (1995) *Ageism* (Buckingham and Bristol, P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Cabinet Office (1999) *Sharing the Nation's Prosperity. Variation in Economic and Social*

- Conditions across the UK* (London: HMSO).
- Cabinet Office (2003)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Final Report, March* (London: HMSO).
- Cahill, S. (2004) 'The Interaction Order of Public Bathrooms', in Cahill, ed., *Inside Social Life: Readings in Sociological Psychology and Microsociology*, 4th edn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 Cantle, T. (2003) *Independent Report of the Community Cohesion Review Team* (London: Home Office).
- Capps, W. H. (1990) *The New Religious Right: Piety, Patriotism, an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Cardoso, F. H. and E. Faletto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len, P. (1983) *Women's Imprisonment: A Study in Social Control*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arrington, K. (1995) 'Postmodernism and Feminist Criminologies: Disconnecting Discour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22.
- Carrington, K. (1998) 'Postmodernism and Criminologies: Fragmenting the Criminological Subject', in P. Walton and J. Young, eds, *The New Criminology Revisited* (London: Macmillan).
-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London: Edward Arnold).
- Castells, M.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 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Edward Arnold).
- Castells, M. (1992) '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 R. Appelbaum and J.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 (1997) *The Power of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 (1998)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Blackwell).
- Castells, M. (20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n W. Hutton and A. Giddens, eds, *On the Edge: 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Cape).
- Castells, M. (2001)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stles, S. and M. J. Miller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acmillan).
- Chamberlain, M. (1999) 'Brothers and Sisters, Uncles and Aunts: A Lateral Perspective on Caribbean Families', in E. B. Silva and C. Smart, eds, *The New Family?* (London: Sage).
- Chambliss, W. J. (1973) 'The Saints and the Roughnecks', *Society*, November.
- Chambliss, W. J. (1978) *On the Take: From Petty Crooks to President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arlton, J. I. (1998)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Disability Oppression and Empower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ase-Dunn, C.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y* (Oxford: Blackwell).
- Cherlin, A. (1999) *Public and Private Famil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Chodorow, N.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ress).
- Chodorow, N. (1988)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Feminism* (Cambridge: Polity).
- Chomsky, N. (1991)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 Chua, A. (2003)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hurch of England (1985) *Faith in the City: The Report of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Commission on Urban Priority Areas* (London: Christian Action).
- CIA (2000/4) *The World Factbook*.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 Cicourel, A. V (1968)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New York: Wiley).
- Cisneros, H. G. (1993) *Interwoven Destinies: Cities and the Nation* (New York: Norton).
- Clark, K. and S. Drinkwater (1998) 'Self—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in D. Leslie, ed., *An Investigation of Racial Disadvanta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T. N. and V. Hoffman—Martinot (1998)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Boulder, CO: Westview).
- Clegg, M., A. Finney and K. Thorpe (2005)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Quarterly Update to December 2004* (London: Home Office).
- Clegg, S. (1990) *Moder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tudie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London: Sage).
- Cloward, R. and L. Ohlin (1960)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CNN (2001) *Falwell Apologizes to Gays, Feminists, Lesbians*, 14 September (<<http://archives.cnn.com/2001/US/09/14/Falwell.apology/>>).
- Cohen, A. (1955) *Delinquent Boys* (London: Free Press).
- Cohen, L. E., J. R. Broschak and H. A. Haveman (1998) 'And Then There Were More? Th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ex Composition on the Hiring and Promotion of Manag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5).
- Cohen, R.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CL Press).
- Cohen, S. (1980)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Cole, T. R. (1992) *The Journey of Lif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ging 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lins, J. (2000) 'Quality by Other Mean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Collins, J. and J. Porras (1994) *Built to Last* (New York: Century).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 Connell, R. W. (2001) *The Men and the Boy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Allen and Unwin).
- Connell, R. W. (200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 Cook, R. (2001) Robin Cook's 'Chicken Tikka Masala Speech'. Extracts from a Speech by the Foreign Secretary to the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in London, Guardian, Thursday 19 April.
- Coontz, S. (1992)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rbin, J. and A. Strauss (1985) 'Managing

- Chronic Illness at Home: Three Lines of Work', *Qualitative Sociology* 8.
- Corsaro, W. (1997) *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Coward, R. (1984) *Female Desire: Women's Sexuality Today* (London: Paladin).
- Cox, O. C. (1959) *Class, Caste and Race: A Study in Social Dyna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rick, B. (2004) *Is Britain Too Diverse? The Responses*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HtmlPages/replies.asp>>).
- Crompton, R. (1997) *Women and Work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mpton, R. (1998)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urrent Debates,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 Crow, G. and M. Hardey (1992) 'Diversity and Ambiguity Among Lone-Parent Households in Modern Britain', in C. Marsh and S. Arber, eds,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Divisions and Change* (London: Macmillan).
- Cumings, B. (1987)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F.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 (1997)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Cumming, E. and W. E. Henry (1961) *Growing Old: The Process of Disengag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Curran, J. and J. Seaton (2003)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Currie, D. and M. Siner (1999) 'The BBC Balancing Public and Commercial Purpose', in *Public Purpose in Broadcasting Funding the BBC* (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 Currie, E. (1998) 'Crime and Market Society Less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P. Walton and J. Young, eds, *The New Criminology Revisited* (London: Macmillan).
- Cylke, F. K. (1993)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Dahlburg, J.-T. (1995) 'Sweatshop Case Dismays Few in Thailand', *Los Angeles Times*, 27 August.
-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Davie, G. (1994)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Oxford: Blackwell).
- Davie, G. (2000) *Religion in Modern Europe: A Memory Mu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es, B. (1991) *Frogs and Snails and Feminist Tales*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Davis, M. (1990)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 (London: Vintage).
- Davis, S. M. (1987) *Future Perfec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Davis, S. M. (1988) *2001 Management: Managing the Future Now*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 De Beauvoir, S. (1949) *Le Deuxieme Sexe* (Paris: Gallimard).
- De Witt, K. (1994) 'Wave of Suburban Growth Is Being Fed by Minorities', *New York Times*, 15 August.
- D'Emilio, J. (1983)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nney, D. (1998) 'Anti-Racism and the Limits of Equal Opportunities Policy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C. J. Finer and M. Nellis.

- eds, *Crime and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Blackwell).
- Dennis, N. and G. Erdos (1992) *Families without Fatherhood* (London: 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 *Surve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 School* (London: HMSO).
-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2002) *Disabled for Life? Attitudes Towards, and Experiences of, Disa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HMSO).
-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0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0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1998) *New Ambitions for Our Country: A New Contract for Welfare* (London: HMSO).
-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 (London: Athlone Press).
- Devault, M. L.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yo, F. C. (1989) *Beneath the Miracle: Labor Subordination in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HSS (1980) *Inequalities in Health* (London: DHSS).
- Dicken, R (1992) *Global Shif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London: Chapman).
- 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 (2002) *Briefing, October*.
- Dobash, R. E. and R. R Dobash (1992) *Women, 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DoH (2003) *Smoking, Drinking and Drug Misuse among Young People in England*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publications.doh.gov.uk/public/sddsurvey2003.pdf>>.
- Dore, R. (1973)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Diversit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Doyal, L. (1995) *What Makes Women Sick: Gender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alth* (London: Macmillan).
- Drentea, P. (1998) 'Consequences of Women's Formal and Informal Job Search Methods for Employment in Female-Dominated Jobs', *Gender and Society* 12.
- Drexler, K. E. (1992) *Engines of Cre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TI (2000) *Just Around the Corner* (London: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 Du Gay, P. (2000) *In Praise of Bureaucracy: Weber, Organization, Ethics* (London: Sage).
- Duncombe, J. and D. Marsden (1993) 'Love and Intimacy. The Gender Division of Emotion and "Emotion Work": A Neglected Aspect of Sociological Discussion of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Sociology* 27.
- Duneier, M. (1999)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Duneier, M. and H. Molotch (1999) 'Talking City Trouble: Interactional Vandalism,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Urban Interaction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 Durkheim, E. (1952)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Durkheim, E. (1961 [1925]) *L'Education morale* (Paris: Alcan).
- Durkheim, E. (1976 [1912, 196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Durkheim, E. (1982 [1895]) *The Rules of Soci-*

- ological Method* (London: Macmillan).
- Durkheim, E. (1984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Duster, T. (1990) *Backdoor to Eugenics* (New York: Routledge).
- Dutt, M. (1996) 'Some Reflections on US Women of Color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NGO Forum in Beijing, China', *Feminist Studies* 22.
- Dworkin, R. M. (1993) *Life's Dominion: An Argument About Abortion, Euthanasia, and Individual Freedom* (New York: Knopf).
- Dyer, C. (1999) 'Let's Stay Together', *Guardian*, 25 October.
- Eating Disorders Association (2000) *Eating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Review of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Men with Eating Disorder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dauk.com/sub_some_statistics.htm>.
- The Economist* (2000a) 'All-Clear?', 13 April.
- The Economist* (2000b) 'Paradise Regained', 21 December.
- The Economist* (2002) 'Trouble in Nanoland', 5 December.
- The Economist* (2004)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26 February.
- The Economist* (2005a) 'Backgrounder: The EU Constitution', 3 June.
- The Economist* (2005b) 'Backgrounder: EU Enlargement', 23 June.
- The Economist* (2005c) 'Backgrounder: The Iraq Dossier Row', 5 April.
- Efron, S. (1997) 'Eating Disorders Go Global', *Los Angeles Times*, 18 October.
- Ehrenreich, B. and J. Ehrenreich (1979) 'The 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 in P. Walker, ed.,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 Eibl-Eibesfeldt, I. (1973) 'The Expressive Behaviour of the Deaf-and-Blind Born', in M. von Cranach and I. Vine, eds,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Movem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kman, P and W. V Friesen (1978)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New York: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 Elder, G. H. J. (1974)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ectoral Reform Society (2005) *UK General Elections: Electorates and Turnout 1945—2005*, 1 August.
- Ell, K. (1996)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with Serious Illness: The Family Conne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2.
- Elshtain, J. B. (1987) *Women and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stein, D., D. Cox, B. Donoghue, et al. (2004) *Beyond the Charter: The BBC after 2006* (Lond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 Emmanuel, A. (1972)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Employers' Forum on Disability (2003) *Briefing for CSR Practitioner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mployers-forum.co.uk/www/csr/sttn/labstandards/labstand1.htm>>.
- Epstein, D. (1998) *Failing Boys Issues in Gender and Achievement*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S. (2002) 'A Queer Encounter: Sociology and the Study of Sexuality', in C. L. Williams and A. Stein, eds, *Sexuality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 Erikson, K. (1966) *Wayward Puritans: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Wi-

- ley).
- Erikson, R. and J. Goldthorpe (1993)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 ESRC (1997) *Twenty-Something in the 1990s: Getting on, Getting by, Getting Nowhere. Research briefing*. (Swindon: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 Estes, C. L. and M. Minkler, eds. (1991)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ging: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Economy of Growing Old* (Amityville: Baywood).
- Estes, C. L., E. A. Binney and R. A. Culbertson (1992) 'The Gerontological Imagination: 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rontology, 1945–Present',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5.
- Estes, C., S. Biggs and C. Phillipson (2003) *Social Theory, Social Policy and Age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U (2005) *The European Union at a Glanc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europa.eu.int/abc/index_en.htm](http://europa.eu.int/abc/index_en.htm)>.
- Evans, D. J. (1992) 'Left Realism and the Spatial Study of Crime', in *Crime, Policing and Place: Essays in Environment Criminology* (London: Routledge).
- Evans, M. (2000) 'Poor Show', *Guardian*, 6 March.
- Evans, R.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vans-Pritchard, E. E. (1956) *Nuer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ysenck, H. (1964) *Crime and Personal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Faludi, S. (1999) *Stiffed: The Betrayal of the Modern Ma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Featherstone, M and A. Renwick, eds (1995) *Images of Ag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ater Lif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Felson, M. (1994) *Crime and Everyday Life: 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Ferguson, K. E. (1984) *The Feminist Case against 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erguson, N. (2004)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London: Allen Lane).
- Feuerbach, L. (1957) *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Fielder, H. G. (1946) *Textual Studies of Goethe's Faust* (Oxford: Blackwell).
- Finke, R. and R. Stark (1988) 'Religious Economies and Sacred Canopies: Religious Mobilization in American Cities, 190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 Finke, R. and R. Stark (1992)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Finkelstein, V (1980) *Attitudes and Disabled People* (New York: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 Finkelstein, V. (1981) 'To Deny or Not to Deny Disability', in A. Brechin et al., eds, *Handicap in a Social World* (Sevenoaks: Hodder and Stoughton).
- Firestone, S.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London: Cape).
- Fischer, C. S.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2nd edn* (New York: Harcourt).
- Fischer, S. (2004) 'Penn World Tables', *The Economist*, 11 March.
- Fiske, J. (1989) *Reading the Popular* (London: Unwin Hyman).
- Fitzgerald, M. (2001) 'Ethnic Minorities and Community Safety', in R. Matthews and J. Pitts, eds, *Crime, Disorder and Community*

- Safety: A New Agenda* (London: Routledge).
- Flaherty, J., J. Veit-Wilson and P. Dornan (2004) *Poverty: The Facts*, 5th edn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 Flour Advisory Bureau (1998) *Pressure to Be Perfect Report: Bread for Life Campaign* (London: Flour Advisory Bureau).
- Forbes (2000)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29 June).
- Forbes (2004)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orbes.com/billionaires/>>.
- Ford, C. S. and F. A. Beach (1951) *Patterns of Sexual Behaviou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Foucault, M. (1967)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 (1971)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Penguin).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oucault, M.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L. H. Martin, H. Gutman and P. H. Hutton, ed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Fox, O. C. (1964) 'The Pre-Industrial City Reconsidere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
- Francis, B. (2000) *Boys, Girls and Achievement: Addressing the Classroom Issues* (London: Routledge).
- Frank, A. G.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18.
- Frank, A. G.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Frank, D. J. and E. H. McEneaney (199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State Policies on Same-Sex Sexual Relations, 1984—1995', *Social Forces* 7' (3).
- Fraser, N. (1989) *Unruly Practices: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 Fraser, S. (1995) *The Bell Curve Wars Race,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Free the Children (199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freethechildren.org/aboutus/history_ftc.htm>.
- Freedman, C., ed. (2001) *Economic Reform in Japan: Can the Japanese Chang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Freidson, E. (1970) *Profession of Medicine: 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Applied Knowledge* (New York: Dodd, Mead).
- Fremlin, J. H. (1964) 'How Many People Can The World Support?' *New Scientist*.
- Friedan, B.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Friedlander, D. and G. Burtless (1994) *Five Years After: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Welfare-to-Work Program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Fries, J. F. (1980) 'Aging, Natural Death, and th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03.
- Frobel, E., J. Heinrichs and O. Kreye (1979)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 Gagnon, J. H. and W. Simon (1973) *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 (Chicago: Aldine).
- Gallie, D. (1994) Are the Unemployed an Underclass? Some Evidence from the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 *Sociology* 28.
- Gallup (2004) *Poll Topics and Trends: Religion*, 1 August.
- Gamble, A. (1999) *Marxism after Communism: The Interregnum. Controversies in World Politics 198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 J. (1962) *The Urban Villagers: Group and Class in the Life of Italian-Americans*, 2nd edn (New York: Free Press).
- Gardner, C. B. (1995) *Passing by Gender and Public Harass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rfinkel, H. (1963) 'A Conception of, and Experiments with, "Trust" as a Condition of Stable Concerted Actions', in O. J. Harvey, ed.,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Ronald Press).
- Geary, D. (1981) *European Labor Protest, 1848—19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lder, L. van (1996)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Electronic Lover', in R. Kling, ed.,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Inc.).
- Gelles, R. and C. P. Cornell (1990) *Intimate Violence in Famil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Gerbner, G. (1979) 'The Demonstration of Power Violence, Profile No. 10',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
- Gerbner, G. (1980) 'The "Mainstreaming" of America: Violence Profile No. 11',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0.
- Gereffi, G. (1995) 'Contending Paradigms for Cross — Regional Compariso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Commodity Chains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n R. H. Smith, e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Approaches to Methods and Analy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ershuny J. (1994) 'The Domestic Labour Revolution: A Process of Lagged Adaptation', in M. Anderson, F. Bechofer and J. Gershuny, eds,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ouseho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shuny, J. I. and I. D. Miles (1983) *The New Servic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Frances Pinter).
- Gerth, H. H. and C. W. Mills, eds. (194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 Gewirtz, S., S. Ball and R. Bowe (1995) *Markets, Choice, and Equity in Educa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Gibbons, J. H. (1990) *Trading around the Clock Global Securities Market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US Cong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93)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Love, Sexuality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ed. (2001) *The Global Third Way Debate*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2002)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 Profile).
- Gillan, A. (1999) 'Shelter Backs Rethink on Homeless', *Guardian*, 15 November.
- Gillborn, D. and D. Youdell (2001) 'The New IQism: Intelligence, "Ability" and the Rationing of Education', in J. Demaine, 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day* (London: Palgrave).
- Gilleard, C. and P. Higgs (2005) *Contexts of Ageing: Class, Cohort and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nn, J. and S. Arber (2000) 'Ethnic Inequality in Later Life: Variation in Financial Circumstances by Gender and Ethnic Group', *Education and Ageing* 15(1).
- Ginzburg, C. (1980)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ittings, D. (1999) 'Mickey Mouse Invasion', *Guardian*, 3 November.
- Gittins, D. (1993) *The Family in Question: Changing Households and Familiar Ideolog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Glasgow Media Group (1976) *Bad News* (London: Routledge).
- Glasius, M., M. Kaldor and H. Anheier, eds (2002)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ass, D. (1954)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offman, E. (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 Goffman, E. (1968)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 Goffman, E. (1971)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London: Allen Lane).
- Goffman, E. (1973)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 Goffman, E. (1981)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Gold, T.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Miracle*. (Armonk, NY: M. E. Sharpe).
- Golding, P. and G. Murdock, eds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Ltd).
- Goldscheider, F. K. and L. J. Waite (1991) *New Families, No Famil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thorpe, J. H. (1968—9)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 H. (1983)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 *Sociology* 17.
- Goldthorpe, J. H. and C. Payne (1986)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England and Wales 1972—1983', *Sociology* 20.
- Goldthorpe, J. H. and G. Marshall (1992) 'The Promising Future of Class Analysis', *Sociology* 26.
- Goldthorpe, J. H., C. Llewellyn and C. Payne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nd edn 1987).
- Goleman, D. (1996)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London: Bloomsbury).
- Goode, W. J. (1963) *World Revolution in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Free Press).
- Goode, W. J. (1971) 'Force and Violence in the Famil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3.

- Goodhart, D. (2004) 'Too Diverse? Is Britain Becoming Too Diverse to Sustain the Mutual Obligations Behind a Good Socie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Prospect Magazine*, February.
- Gordon, D., R. Levitas, C. Pantazis, et al. (2000)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York: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 Gorz, A.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 Gottfredson, M. R. and T. Hirsch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bosky, E. N. and R. G. Smith (1998) *Crime in the Digital Age: Controlling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yberspace Illegalit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Graef, R. (1989) *Talking Blues* (London: Collins).
- Graham, H. (1987) 'Women's Smoking and Family Healt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5.
- Graham, H. (1994) 'Gender and Class as Dimensions of Smoking Behaviour in Britain: 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Mother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8.
- Graham, L. (1995) *On the Line at Subaru-Isuzu*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Gray, J. (2003) *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 (Chatham, Kent: Faber and Faber).
- Greed, C. (1994) *Women and Planning: Creating Gendered Re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Green, E. A. Felstead and B. Burchell (2000) 'Job Insecur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gaining Employ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Unemployment Expectation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2 (Special Issue).
- Gregg, E. and J. Wadsworth (1999) 'Job Tenure, 1975—98', in R. Gregg and J. Wadsworth, eds, *The State of Working Brit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rint, K. (2005) *The Sociology of Work* 3rd edn (Cambridge: Polity).
- Grossberg, L., E. Wartella and D. C. Whitney (1998) *Mediamak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rusky, D. B. and R. M. Hauser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 Guardian (2004) Refugees in Britain, 9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guardian.co.uk/Refugees_in_Britain/Story/0,2763,1323311,00.html>.
- Gubrium, J. (1986) *Oldtimers and Alzheimer's: The Descriptive Organization of Senility* (Greenwich, CT; London: Jai).
- Guibernau, M. (1999) *Nations without States: Political Communities in a Global Age* (Cambridge: Polity).
- Gunter, B. (1985) *Dimensions of Television Violence* (London: Gower).
- Habermas, J. (1986—8)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s (Cambridge: Polity).
- Hadden, J. (1997)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Mission Statemen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religiousmovements.lib.virginia.edu/welcome/mission.htm>>.
- Hadden, J. and A. Shupe (1987) 'Televangelism in America', *Social Compass* 34(1).
- Hakim, C. (1996) *Key Issues in Women's Work: Female Heterogeneity and the Polarisation of Women's Employment* (London: Athlone Press).
- Hall, E. T. (1969) *The Hidden Dimension* (New York: Doubleday).
- Hall, E. T. (1973) *The Silent Language* (New York: Doubleday).

- Hall, R., S. James and J. Kertesz (1984) *The Rapist Who Pays the Rent*, 2nd edn (Bristol: Falling Wall Press).
- Hall, 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9* (London: Hutchin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Hall, S. and M. Jacques (1988) 'New Times', *Marxism Today*.
- Hall, S. et al.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 Hall, S. et al. (1982)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London: Hutchinson).
- Halliday, F. (2002) *Two Hours That Shook the World: September 11, 2001: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London: Saqi Books).
- Halloran, J. D., ed. (1970)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London: Panther).
- Halpern, C. T. (2000) 'Smart Teens Don't Have Sex (or Kiss Much Either)',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6(3).
- Halpern, D. (2005)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 Halsey, A. H., ed. (1997)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sey, A. H. and J. Webb, eds (2000)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Social Trends* (New York: Macmillan).
- Hammond, P. E. (1992) *Religion and Personal Autonomy: The Third Disestablishment in America*.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Handy, C. (1994) *The Empty Raincoat: 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 (London: Hutchinson).
- Harkin, J. and P. Skidmore (2003) *Grown up Trust* (London: Demos).
- Harris, J. R. (1998) *The Nurture Assumption: 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 (New York: Free Press).
- Harris, M. (1978) *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Harrison, M. (1985) *TV News: Whose Bias?* (Hermitage: Policy Journals).
- Harrison, E. (1983) *Inside the Inner City: Life under the Cutting Ed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artley-Brewer, J. (1999) 'Gay Couple Will Be Legal Parents', *Guardian*, 28 October.
- Harvard Magazine* (2000) 'The World's Poor: A Harvard Magazine Roundtable', *Harvard Magazine* 103 (2).
-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 Harvey, D. (1985)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asler, F. (1993) 'Developments in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in J. Swain, ed., *Disabling Barriers, Enabling Environments* (London: Sage).
- Hatch, N. (1989)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wley A. H. (1950) *Human Ecology: A Theory of Community Structure* (New York: Ronald Press).
- Hawley, A. H. (1968) *Human Ecology* (Glencoe: Free Press).
- Healy M. (2001) 'Pieces of the Puzzle', *Los Angeles Times*, 21 May.
- Heaphy, B., C. Donovan and J. Weeks (1999)

- 'Sex, Money and the Kitchen Sink: Power in Same—Sex Couple Relationships', in J. Seymour and R. Bagguley, eds, *Relating Intimacies: Power and Resistan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Heath, A. (1981) *Social Mobility* (London: Fontana).
- Hebdige, D. (1997) *Cut'ri Mix: Culture, Identity, and Caribbean Music* (London: Methuen).
- Heidensohn, F. (1985) *Women and Crime* (London: Macmillan).
- Heise, D. R. (1987) 'Sociocultural Determination of Mental Aging', in C. Schooler and K. Warner Schaie, eds,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over the Life—Course* (Norwood, NJ: Ablex).
- Held, D. (1996) *Models of Democracy*,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 Held, D. (2004)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ambridge: Polity).
- Held, D. et al.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 Henderson, J. and R. R. Appelbaum (1992) 'Situating the State in the Asian Development Process', in R. R. Appelbaum and J. Henderson, 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 Sage).
- Hendricks, J. (1992) 'Gener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Theory in Social Gerontology',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5.
- Henslin, J. M. and M. A. Biggs (1971) 'Dramaturgical Desexualization: The Sociology of the Vaginal Examination', in J. M. Henslin, ed.,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Sex*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Henslin, J. M. and M. A. Biggs (1997)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The Sociology of the Vaginal Examination', in J. M. Henslin, ed., *Down to Earth Sociology: Introductory Readings*, 9th edn (New York: Free Press).
- Hepworth, M. (2000) *Stories of Age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eritage, J. (1985)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Herman, E. (1998) 'Privatising Public Space', in D. K. Thussu, ed., *Electronic Empires Global Media and Local Resistance* (London: Arnold).
- Herman, E. S. and R. W. McChesney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Cassell).
- Herrnstein, R. J. and C. Murray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HESA (2004) *Increase in Female Academics*,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hesa.ac.uk/press/pr76/pr76.htm>>.
- Hexham, I. and K. Poewe (1997) *New Religions as Global Cultur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Hills, J. (1998) 'Does Income Mobility Mean That We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Poverty?' in A. B. Atkinson and J. Hills, eds, *Exclusion, Employment and Opportunity* (London: 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irst, P. (1997) 'The Global Economy: Myths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3.
- Hirst, P. and G. Thompson (1992) 'The Problem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Trading Blocs', *Economy and Society* 24.

- Hirst, P. and G.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rev. edn (Cambridge: Polity).
- Hite, S. (1994) *The Hite Report on the Family: Growing up under Patriarchy* (London: Bloomsbury).
- HMSO (1992) *Social Trends 22* (London, HMSO).
- HMSO (1999) *Social Trends 29* (London, HMSO).
- HMSO (2000) *Social Trends 30* (London, HMSO).
- HMSO (2004) *Social Trends 34* (London, HMSO).
- HMSO (2005) *Social Trends 35* (London, HMSO).
- Ho, S. Y. (1990) *After a Long Silence* (Hong Kong: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
- Hobson, D. (2002) *Soap Opera* (Cambridge: Polity).
- Hochschild, A.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 Hodge, R. and D. Tripp (1986) *Children and Television: A Semiotic Approach* (Cambridge: Polity).
- Hogge, B. (2005)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Available online at <[www.opendemocracy.net / media-edemocracy/china_internet_2524.jsp](http://www.opendemocracy.net/media-edemocracy/china_internet_2524.jsp)>.
- Holton, R. J. (1978) 'The Crowds in History: Some 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thod', *Social History* 3.
- Homans, H. (1987) 'Man—Made Myth: The Reality of Being a Woman Scientist in the NHS', in A. Spencer and D. Podmore. *A Man's World: Essays on Women in Male-Dominated Professions* (London: Tavistock).
- Home Office (2002) *Secure Borders, Safe Haven: Integration with Diversity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Home Office).
- Home Office (2003) *World Prison Population List, 4th edn* (London: Home Office).
- Home Office (2004) *Criminal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2003* (London: Home Office).
- hooks, b. (1997) *Bone Black: Memories of Girlhood* (London: Women's Press).
- Hopkins, T. H. and I. Wallerstein (1996) *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Zed Books).
- Horkheimer, M. and T. W. Adorno (200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7).
- Hotz, R. L. (1998) 'Boomers Firing Magic Bullets at Signs of Aging', *Los Angeles Times*.
- Howard, J. H. (1986) 'Change in "Type A" Behaviour a Year after Retirement', *Gerontologist* 26.
- 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howardleague.org/press/2004/060104a.htm>>.
- Hughes, E. C. (1945) 'Dilemmas and Contradictions of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 Hughes, G. (1991) 'Taking Crime Seriousl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New Left Realism', *Sociology Review* 1.
- Humphreys, L. (1970) *Tearoom Trade: A Study of Homosexual Encounters in Public Places* (London: Duckworth).
- Hunt, R, ed. (1966) *Stigma: The Experience of Disability* (London: Geoffrey Chapman).
- Huntington, S. R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Huston, A. C, E. Donnerstein, H. Fairchild, et al. (1992) *Big World, Small Screen: The Role of Television in American Societ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Jonathan Cape).
- Hyman, R. (1984) *Strikes, 2nd edn* (London: Fontana).
- ICBL (2001)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 Mine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icbl.org>.
- Iganski, P. and G. Payne (1999) 'Socio-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Employment: The Case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 Illich, I. (1975) *Medical Nemesis: The Expropriation of Health* (London: Calder and Boyars).
- Illich, I. D. (1973) *Deschooling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 ILO (1999) *C182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ipecc/ratification/convention/text.htm>.
- ILO (2000)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Monitoring Programme on Child Labour (SIMPOC) Overview and Strategic Plan 2000—2002*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Elimination of Child Labour (IPEC) and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
- ILO (2004)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March.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employment/strat/download/trendsw.pdf>>.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 Inquest (2004) *Why Are Children Dying in Custody? Call for a Public Inquiry into the Death of Joseph Schole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inquest.gn.apc.org/pdf/Joseph%20Scholes%20inquiry%20briefing%2004.pdf>>.
- IPPR (1999) *Unsafe Streets: Street Homelessness and Crime*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ISSA (2003)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Transgenic Crops: 2003'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saaa.org/kc/CBTNews/press_release/briefs30/es_b30.pdf>.
- Jacoby, S. (1997) *Modern Manors: Welfare Capitalism Since the New De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hoda, M., P. F. Lazarsfeld and H. Zeisel (1972 [1933]) *Marienthal: The Sociography of an Unemployed Community* (London: Tavistock).
- James, C. (2003)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Transgenic Crops*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 Jencks, C. (1994) *The Homeless Cambridge*. (Harvar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enkins, C. and B. Sherman (1979) *The Collapse of Work* (London: Eyre Methuen).
- Jensen, A. (1967) 'How Much Can We Boost IQ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29.
- Jensen, A. (1979) *Bias in Mental Tes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 Jobling, R. (1988) 'The Experience of Psoriasis Under Treatment', in M. Bury and R. Anderson, eds,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 The*

- Experience o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London: Unwin Hyman).
- John, M. T. (1988) *Geragogy: A Theory for Teaching the Elderly* (New York: Haworth).
- Johnson, M. R. (1995) 'Patriarchal Terrorism and Common Couple Violence: Two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US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 Johnston, C. (2004) 'Women Suffer? 5k Pay Gap',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3 September.
- Jones, D. E., S. Doty, C. Grammich, et al. (2002)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An Enumeration by Region, State and the County Based on Data Reported for 149 Religious Bodies* (Nashville, TN: Glenmary Research Centre).
- Jones, T. (1993) *Britain's Ethnic Minorities*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Joy, B. (2000)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Wired* 8 (4).
- Judge, K. (1995)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A Critical Appraisal',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1.
- Kamin, L. J. (1977)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Harmondsworth: Penguin).
- Kanter, R. M.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Kasarda, J. D. and M. Janowitz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 Katz, E. (1959)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
- Katz, E. and P. Lazarsfeld (1955) *Personal Influ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Katz, S. (1996) *Disciplining Old Age: The Formation of Gerontological Knowledge*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 Kautsky, J. (1982)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Keith, M. (1993) *Race, Riots, and Policing: Lore and Disorder in a Multi-Racist Society* (London: UCL Press).
- Kelly, M. P. (1992) *Colitis* (London: Tavistock).
- Kemp, A. et al. (1995) 'The Dawn of a New Day: Redefining South African Feminism', in A. Basu, ed.,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Boulder, CO: West-view).
- Kepel, G. (1994) *The Revenge of Go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Polity).
- Kerr, A. and T. Shakespeare (2002) *Genetic Politics: From Eugenics to Genome* (Cheltenham: New Clarion).
- Kiecolt, K. J. and H. M. Nelson (1991) 'Evangelicals and Party Realignment, 1976-1988',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2.
- Kinsey, A. C. (1948) *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 Kinsey, A. C. (1953) *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 Kirkwood, T. (2001) *Ageing Vulnerability: Causes and Interventions* (Chichester: Wiley).
- Knoke, D. (1990)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orr-Cetina, K. and A. V. Cicourel (1981)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s an Interpretation of Micro—and Macro—Soci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Kohn, M. (1977) *Class and Conformity*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Kollock, R (1999) 'The Production of Trust in Online Markets',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6).
- Koser, K. and H. Lutz (1998) 'The New Migration in Europe: Contexts, Constructions and Realities', in K. Koser and H. Lutz, eds, *The New Migration in Europe: Social Constructions and Social Realiti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 Koss, S. E. (1973) *Fleet Street Radical: A. G. Gardiner and the Daily News* (London: Allen Lane).
- Krupat, E. (1985) *People in Cities: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Its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ulkarni, V. G. (1993)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Rising Output, Stagnant Living Standards', *Business Week*, 8 February.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Review* XLV(1).
- Lacan, J. (1995) *Lacan's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aming (Lord) (2003) *The Victoria Climbié Inquiry*, January.
- Land, K. C., G. Deane and J. R. Blau (1991)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Church Member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 Landes, D. S. (1969) *The Unbound Promethe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pe, F. M. (1998.) *World Hunger: 12 Myths* (New York: Grove Press).
- Laqueur, W (2003) *No End to War: 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errorism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ntinuum).
- Laslett, P. (1996) *A Fresh Map of Life: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Ag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Laswell, H. (1948)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Laumann, E. O. (1994)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Sexual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zarsfeld, P. E., B. Berelson and H. Gaudet (1948)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a, J. and J. Young (1984) *What Is To Be Done about Law and Order?* (London: Penguin).
- Leadbeater, C. (1999) *Living on Thin Air: The New Economy* (London: Viking).
- Lee, R. B. (1968) 'What Hunters Do for 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 in R. B. Lee and I. De Vore, eds,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Press).
- Lee, R. B. (1969) 'Kung Bushman Subsistence: An Input-Output Analysis', in A. P. Vayda, ed.,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Behavior*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 Lee, R. B. and I. De Vore, eds (1968) *Man the Hunter* (Chicago: Aldine Press).
- Leisering, L. and S. Leibfried (1999) *Time and Poverty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mert, E. (1972) *Human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ontrol*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Levin, W. C. (1988) 'Age Stereotyping: College Student Evaluations', *Research on Aging* 10.
- Liebert, R. M., J. N. Sprafkin and M. A. S. Davidson (1982) *The Early Window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Children and Youth* (London: Pergamon Press).
- Lim, L. L. (1998) *The Sex Sect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ases of Prostitution in Southeast Asi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Lipset, S. M. (1991) 'Comments on Luck -

- mann', in R Bourdieu and J. S. Coleman, eds, *Social Theory in a Changing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 Lipset, S. M. and R. Bendix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ster, R., ed. (1996) *Charles Murray and the Underclass: The Developing Debate* (London: 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Sunday Times*).
- Lloyd-Sherlock, P. (2004) *Living Longer* (London: Zed Books).
- Locke, J. and E. Pascoe (2000) 'Can a Sense of Community Flourish in Cyberspace?' *Guardian*, 11 March.
- Logan, J. R. and H. L.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e London Plan (2004)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London: Mayor of London).
- Lorber, J. (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aven, CO: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ukes, S.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 Lull, J. (1997) 'China Turned on Revisited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A. Sreberny-Mohammadi, ed., *Media in Global Context: A Reader* (London: Arnold).
- Lull, J. (1980) *Inside Family View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elevision's Audiences* (London: Routledge).
- Lyon, C. and R de Cruz (1993) *Child Abuse* (London: Family Law).
- Lyon, D. (1994) *The Electronic Eye: 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 Lyotard, J.-F. (1985)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c an Ghail, M.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cgregor, S. and B. Pimlott (1991) 'Action and Inaction in the Cities', in *Tackling the Inner Cities: The 1980s Reviewed. Prospects for the 1990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ck, J. and S. Lansley (1985) *Poor Britai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Mack, J. and S. Lansley (1992) *Breadline Britain 1990s: The Findings of the Television Series* (London: 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
- McKeown, T. (1979) *The Role of Medicine Dream, Mirage or Nemesis?* (Oxford: Blackwell).
- McKnight, A. (2000) 'Earnings Inequality and Earnings Mobility, 1977-1997: The Impact of Mobility on Long Term Inequality', *Employment Relations Research Series No. 8* (London: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cMichael, P. (1996)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 McNeely, C. L. (1995) *Constructing the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Prescriptive Ac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Macpherson, S. W. (1999) *The Stephen Lawrence Inquiry* (London: HMSO).
- McQuail, D. (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 Makino, M., K. Tsuboi and L. Dennerstein (2004) 'Prevalence of Eating Disorders: A Comparison of Western and Non-Western Countries', *Medscape General Medicine* 6 (3).
- Malthus, T. (1976 [1798])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New York: Norton).
- Marcuse, H.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Marsden, P.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 Marsden, P. and N. Lin (1982)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arshall, G. (1988) *Social Clas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 Marshall, G. and D. Firth (1999) 'Social Mobility and Personal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Ten Coun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0.
- Marshall, T. H. (1973)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estport, CN: Greenwood).
- Martin, D. (1990)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lackwell).
- Martineau, H. (1962 [1837]) *Society in America*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Marx, K. and F. Engels (2001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Electric Book Co.).
- Mason, A. and A. Palmer (1996) *Queer Bashing: A National Survey of Hate Crimes against Lesbian and Gay Men* (London: Stonewall).
- Mason, D. (1995) *Race and Ethnici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suura, J. H. (2004) 'Commercial Tools, Processes and Materials Anticipating the Public Backlash: Public Relations Lessons for Nanotechnology from the Biotechnology Experience', *Nanotech* 2004 3.
- Matthews, R. and J. Young (1986) *Confronting Crime* (London: Sage).
- Maugh, T. H. and N. Zamichow (1991) 'Medicine: San Diego's Researcher's Findings Offer First Evidence of a Biological Cause for Homosexuality', *Los Angeles Times*, 30 August.
- McFadden, D. and C. A. Champlin (2000) 'Comparison of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s in Heterosexual, Homosexual, and Bisexual Males and Females',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Otolaryngology* 1.
- Meadows, D. H.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 Meadows, P. (1996) *The Future of Work: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York: YPS).
- Mellows-Facer, A., R. Young and R. Cracknell (2005) *General Election 2005*, 17 May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 Melton, J. G. (1989)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Religions* (Detroit: Gale Research).
- Merton, R.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edn* (Glencoe: Free Press).
- Metropolitan Police Authority (2004) *Report of the MPA Scrutiny on MPS Stop and Search Practice*, May (London: MPA).
- Meyer, J. W. and B.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 Michels, R. (1967 [1911])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Miles, R. (1993) *Racism after 'Race Rel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Mills, C. W. (1970)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Milne, A. E. H. and T. Harding (1999) *Later Lifestyles: A Survey by Help the Aged and Yours Magazine* (London: Help the Aged).
- Mirza, H. (1986) *Multinationals and the Growth of the Singapor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ission Frontiers (2000)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by Religious Adherent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issionfrontiers.org/2000/03/overview.htm>>.
- Mitchell, J. (1966) *Women: The Longest Revo-*

- lution. Essays i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Virago).
- Mitchell, J. (1975)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Modood, T. (1991) 'The Indian Economic Success', *Policy and Politics* 19.
- Modood, T. (1994) 'Political Blackness and British Asians', *Sociology* 28.
- Modood, T. et al. (1997) *Ethnic Minorities in Britain: Diversity and Disadvantage* (London: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
- Mohammadi, A. (1998) 'Electronic Empires an Islamic Perspective', in D. K. Thussu, ed., *Electronic Empires Global Media and Local Resistance* (London: Arnold).
- Moore, B.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Moore, G. (1990)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
- Moore, L. R. (1994) *Selling God: American Religion in the Marketplace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R. (1995) *Ethnic Statistics and the 1991 Census* (London: Runnymede Trust).
- Morgan, R. (1994) *The Word of a Woman: Feminist Dispatches* (New York: Norton).
- MORI (2000) *Britain Today: Are We An Intolerant Nation?* 23 Octo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ori.com/polls/2002/refugee.shtml>>
- MORI (2002) *Attitudes Towards Asylum Seekers for 'Refugee Week'*, 17 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ori.com/polls/2002/refugee.shtml>>.
- MORI (2004) *Can We Have Trust and Diversity?* 19 Janua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mori.com/polls/2003/community.shtml>>
- Morris, L. (1993) *Dangerous Classes: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Citizenship* (London: Routledge).
- Mullan, P. (2002) *The Imaginary Time Bomb: Why an Ageing Population Is Not a Social Problem* (London: I. B. Tauris).
- Mumford, L. (1973) *Interpretations and Forecasts* (London: Seeker and Warburg).
- Muncie, J. (1999) *Youth and Crim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 Murdoch, R. (1994) 'The Century of Networking'. Eleventh Annual John Bonython Lecture. Australia,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 Murray, C. (1990)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Murray, C. A.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Narayan, D. (1999) *Can Anyone Hear Us? Voices from 47 Countries, December*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overty Group, PREM).
- National Statistics Online (2004) *Internet Acces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ccil/nugget.asp?id=8>>.
-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1995),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Nature (2000) *Atlas of a Thirsty Planet: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Access to Safe Water by Country 2000*.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ature.com/nature/focus/water/map.html>>.
-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 Neighbourhood Renewal Unit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eighbourhood.gov.uk/>>

- ourprogs.asp? pageid =4>.
- Nettleton, S. (2006)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 New Internationalist (2000) 'Love, Hate and the Law', *New Internationalist* 328.
- Newman, K. S. (2000) *No Shame in My Game: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Inner City* (New York: Vintage).
- Nicholas, S., D. Povey, A. Walker, et al. (2005) *Crime in England and Wales 2004/2005* (London: Home Office).
- Nielsen, E (1994)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ualism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October).
- Nolan, P. (2000) 'Labouring Under an Illusion', *THES Millennium Magazine* 22(29), December.
- Oakley, A. (1974)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 Oakley, A. et al, (1994) 'Life Stress, Support and Class Inequality: Explaining the Health of Women and Children',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
- OFCOM (2003) *Hours Viewed Per Household Per Day by Age, Social Class and Platform*.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ofcom.org.uk/research/industry_market_research/m_i_index/tv_radio_region/ite_market_info/tv_overview/industry_info_june03.pdf>.
- Ohmae, K. (1990)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London: Collins).
- Ohmae, K. (1995)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London: Free Press).
- Oliver, M. (1983) *Social Work with Disabled Peopl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Oliver, M. (1990)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Basingstoke: Macmillan).
- Oliver, M. (1996)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Oliver, M. and G. Zarb (1989) 'The Politics of Disability: A New Approach', *Disability, Handicap & Society A*.
- Omi, M. and H. Winant (1994)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 2nd edn (New York: Routledge).
- O'Neill, O. (2002) *The Reith Lectures: A Question of Trust*.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bbc.co.uk/radio4/reith2002/>>.
- O'Neill, R. (2002) *Experiments in Living: The Fatherless Family, September* (London: Civitas).
- ONS (2001)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Health – Decennial Supplement*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downloads/theme_health/DS16/DS16_capl2.pdf>.
- ONS (2002a) *Labour Force Survey, Spring*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ccinugget.asp?id=11>>.
- ONS (2002b) *Focus on Ethnicity and Identity*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downloads/theme_compendia/foe2004/Ethnicity.pdf>.
- ONS (2003a) *Ethnicity: Population Size: 7.9% from a Minority Ethnic Group*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ccinugget.asp?id=273>>.
- ONS (2003b) *Focus on London*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 ONS (2003c) *A Century of Labour Market Chang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nationalstatistics.org.uk/articles/labour_market_trends/century_

- Jabour_rmarket_change_mar2003.pdf>.
- ONS (2004a) *Focus on the Labour Market 2002*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CCI/nugget.asp?ID=697&Pos=2&ColRank=1&Rank=310>>.
- ONS (2004b) *Travel Trends*, 17 December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 ONS (2004c) *Focus on Gender*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 ONS (2004d) *Social Focus in Brief: Ethnicity 2002*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downloads/theme_social/social_focus_in_brief/ethnicity/ethnicity.pdf>
- ONS (2005) *Focus on Ethnicity and Identity, March* (London: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 Pahl, J. (1989) *Money and Marriag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Pakulski, J. and M. Waters (1996)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 Sage).
- Palmore, E. B. (1985) *Retiremen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Springer).
- Panyarachun, A. (2004) *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Parekh, B. (2004) *Is Britain Too Diverse? The Responses*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HtmlPages/replies.asp>>).
- Park, R. E. (195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ker, H., J. Aldridge and F. Measham (1998) *Illegal Leisure: The Normalization of Adolescent Recreational Drug Us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Parry, N. and J. Parry (1976) *The Rise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London: Croom Helm).
- Parsons, T. (1952) *The Social System* (London: Tavistock).
- Parsons, T. (1960) 'Towards a Healthy Maturit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1.
- Parsons, T. and R. F. Bales (1956)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earce, F. (1976) *Crimes of the Powerful: Marxism, Crime and Deviance* (London: Pluto Press).
- Perlmutter, H. V (1972) 'Towards Research 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s, Unions, and Firms as Worldwide Institutions', in H. Gunter, ed., *Trans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eterson, R. G. (1999) *Gray Dawn: How the Coming Age Wave will Transform America—an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Pew Forum on Religion and Public Life (2002) *Americans Struggle with Religion's Role at Home and Abroad*, 20 March (Washington, DC: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 Philo, G. and M. Berry (2004) *Bad News From Israel* (London: Pluto Press).
- Phizacklea, A. and C. Wolkowitz (1995) *Home-working Women: Gender, Racism and Class at Work* (London: Sage).
- Piachaud, D. (1987)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2).
- Piachaud, D. and H. Sutherland (2002) *Changing Poverty Post-1997* (London: 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Pierson, C. (1994)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lkington, A. (2002)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Changing Ethnic Identities in a Global

- Age', in M. Holborn, ed., *Developments in Sociology* (Ormskirk: Causeway Press).
- PISA (2000) *Student Achievement in England: Results in Reading,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among 15-Year-Olds* (Londo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OECD).
- Pollak, O. (1950) *The Criminality of Wom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Pollert, A. (1988) 'Dismantling Flexibility', *Capital and Class* 34.
- Postman, N. (1986)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London: Heinemann).
-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Organized Crime (1986) *Records of Hearings, June 24-26, 198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Putnam, R.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3.
- Putnam, R.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 Putnam, R. (1996)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American Prospect* 7' (24).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Quah, D. (1999) *The Weightless Econom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 Radway, J. A.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Rake, K. ed. (2000) *Women's Incomes over the Lifetime* (London: HMSO).
- Ranis, G. (1996) *Will Latin America Now Put a Stop to 'Stop-and-Go?'*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 Rapoport, R. N., M. P. Fogarty and R. Rapoport, eds, (1982) *Families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Ratcliffe, P. (1999) 'Housing Inequality and "Race": 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 Exclus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 Rawstone, S. (2002) 'England and Wales', in R. W. Summers and A. M. Hoffman, eds, *Domestic Violence: A Global View*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Reay, D. (2002) 'Shaun's Story: Troubling Discourses of White Working-Class Masculinities', *Gender & Education* 14.
- Redman, P. (1996) 'Empowering Men to Disempower Themselves: Heterosexual Masculinities, HIV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Anti-Oppressive Education', in M. Mac an Ghail, ed., *Understanding Masculinities*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Rees, M. (2003) *Our Final Century: Will the Human Race Surviv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 Regional Trends 38 (2003) *Unemployment: By Highest Qualifica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ssdataset.asp?vlnk=7705&More=Y>>. Reich, R.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Knopf).
- Reid, I. (1991) 'The Education of the Elite', in G. Walford, ed., *Private Schooling Tradition, Change and Diversity* (Oxford: Chapman).
- Reisman, D. (1961)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skin, B. and P. A. Roos (1990) *Job Queues, Gender Queues: Explaining Women's Inroads*

- into Male Occupatio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ex, J. and R. Moore (1967)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A Study of Sparkbr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 A. (1981)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London: Onlywomen Press).
- Richardson, D. and H. May (1999) 'Deserving Victims? Sexual Statu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Violence', *Sociological Review* 47.
- Riley, M. W, A. Foner and J. Waring (1988) 'Sociology of Age', in N.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Riley, M. W, R. L. Kahn and A. Foner (1994) *Age and Structural Lag: Changes in Work, Family, and Retirement* (Chichester: Wiley).
- Ritzer, G. (198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6(1).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Pine Forge Press).
- Ritzer, G. (1998) *The McDonaldization Thesis: Explorations and Extensions* (London: Sage).
- Roberts, R. (1971) *The Classic Slum: Salford Lif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Centu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Roof, W. C. (1993) *A Generation of Seekers: The Spiritual Journeys of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 Francisco).
- Roof, W. C. and W. McKinney (1990) *American Mainline Religion: Its Changing Shape and Future Prospect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ose, S., L. Kamin and R. C. Lewontin (1984) *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Rosenau, J. N. (1997) *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 P. and B. Reskin (1992) 'Occupational Desegregation in the 1970s: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Equ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5.
- Rossi, A. (1973) 'The First Woman Sociologist: Harriet Martineau', in *The Feminist Papers: From Adams to De Beauvoi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ostow, W. W. (1961)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wling, J. K. (1998)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London: Bloomsbury).
- Rubin, L. (1990) *The Erotic Wars: What Happened to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 Rubin, L. B. (1994) *Families on the Fault Lin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Rude, G. (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New York: Wiley).
- Ruspini, E. (2000)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Research Update* 28.
- Rusting, R. L. (1992) 'Why Do We Age?' *Scientific American* 267.
- Rutherford, J. and R. Chapman (1988) 'The Forward March of Men Halted', in R. Chapman and J. Rutherford, eds, *Male Order: Unwrapping Masculinit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Sabel, C. E. (1982)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Indus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chs, J. (2000) A New Map of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22 June.

- Saks, M. (1992) *Alternative Medicine i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alter, H. (1998) '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Celebrating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Progress', 25 June, US AID Press Release.
- Sassen, S.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 (199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York: New Press).
-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 (2004) *Is Britain Too Diverse? The Responses, 23 November*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HtmlPages/replies.asp>>).
- Saunders, R. (1990) *Social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 Saunders, P. (1996) *Unequal But Fair? A Study of Class Barriers in Britain* (London: IEA Health and Welfare Unit).
- Savage, M. et al. (1992) *Property, Bureaucracy and Culture: Middle Class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Sayers, J. (1986) *Sexual Contradiction: Psychology,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London: Tavistock).
- Scarman, L. G. (1982) *The Scarman Repo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 Schaie, K. W. (1979) 'The Primary Mental Abilities in Adulthood: An Explo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metric Intelligence', in P. B. Baltes and O. G. Brim,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aie, K. W. (1990)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in J. E. Birren and K. 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5th edn (San Diego, CA,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2001).
- Schumacher, E. F. (1977) *Small Is Beautiful: A Study of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London: Abacus).
- Schwartz, G. (1970) *Sect Ideologies and Social Stat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wartz, P. and D. Randall (2003) *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October* (New York: Pentagon).
- Schwarz, J. and T. Volgy (1992) *The Forgotten Americans* (New York: Norton).
- Scott, J. (1991) *Who Rules Britain?* (Cambridge: Polity).
- Scott, S. and D. Morgan (1993) 'Bodies in a Social Landscape', in S. Scott and D. Morgan, eds, *Body Matters: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London: Falmer Press).
- Scott, W. R. and J. W. Meyer (1994)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Individual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edlak, A. and D. Broadhurst (1996) *Third National Incidence Study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Segura, D. A. and J. L. Pierce (1993) 'Chicana/o Family Structure and Gender Personality: Chodorow, Familism, and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Revisited', *Signs* 19.
- Seidman, S. (1997) *Difference Troubles: Queering Social Theory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nnett, R. (1993) *The Conscience of the Eye: The Design and Social Life of Citie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Sennett, R.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 New Capitalism* (London: Norton).
- Seymour-Ure, C. (1998) 'Leaders and Leading Articles Characterization of John Major and Tony Blair in the Editorials of the National Daily Press', in I. Crewe, B. Gosschalk and J. Bartle, e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Why Labour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97* (London: Frank Cass).
- Shakespeare, T. and N. Watson (2002) 'The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 An Outdated Ideology?'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 and Disability* 2.
- Sharma, U. (1992) *Complementary Medicine Today: Practitioners and Patients* (London: Routledge).
- Shaw, W. (2001) 'In Helsinki: Virtual Village', *Wired, March*.
- Sheldon, W. A. (1949) *Varieties of Delinquent Youth* (New York: Harper).
- Shelton, B. A. (1992) *Women, Men, and Time: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id Work, Housework, and Leisure* (Westport, CT: Greenwood).
- Shelton, B. A. and D. John (1993) 'Does Marital Status Make a Difference?: Housework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ing Men and Wome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4(3).
- Signorielli, N. (2003) 'Prime—Time Violence 1993—2001: Has the Picture Really Changed?'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7.
- Simmel, G. (1971 [1903])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D. N. Levine, ed.,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of Georg Simm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mpson, G. E. and J. M. Yinger (1986)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impson, J. H. (1985) 'Socio—Moral Issues and Recen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27.
- Sinclair, P. (1987) *Unemployment: Economic Theory and Evidence* (Oxford: Blackwell).
- Sjoberg, G. (1960) *The Pre-Industrial City: Past and Present* (New York: Free Press).
- Sjoberg, G. (1963) 'The Rise and Fall of Citie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Sage).
-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apper, G. and S. Tombs (1999) *Corporate Crime* (Essex: Longman).
- Smart, C. and B. Neale (1999) *Family Fragments?* (Cambridge: Polity).
- Smith, A. (1991 [17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 Smith, A.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Smith, D. (1990) *Stepmothering* (London: Harvester).
- Smith, D. (1997) 'Job Insecurity and Other Myths', *Management Today*.
- So, A. (1990)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s Theor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Social Exclusion Unit (1998) *Rough Sleeping* (London: HMSO).
- Sokolovsky, J. (1990)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Aging: Worldwide Perspectives* (New York: Berghi and Garvey).
- Spenner, K. (1983) 'Deciphering Prometheus: Temporal Change in the Skill Level of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 Stanton, E. C. (1985 [1895]) *The Woman's Bible: The Original Feminist Attack on the Bible* (Edinburgh: Polygon Books).
- Stanworth, M.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 *Sociology* 18.
- Stark, R. and W S. Bainbridge (1980) 'Towards a Theory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
- Stark, R. and W S. Bainbridge (1985) *The Future of Religion: Secularism, Revival, and Cult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ark, R. and W S. Bainbridge (1987) *A Theory of Relig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Statham, J. (1986) *Daughters and Sons: Experiences of Non-Sexist Childraising* (Oxford: Blackwell).
- Stead, W. E. and J. G. Stead (1996) *Management for a Small Planet: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Environment* (Thousand Oaks, CA, and London).
- Stern, V (1989) *Bricks of Shame: Britain's Pris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 Stiglitz, J. E. (2002)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Allen Lane).
- Stone, L. (1980)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trategy Unit (2003)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Available online at: <[www.number10.gov.uk/su/ethnic% 20 minorities / report / downloads / ethnic_ minorities.pdf](http://www.number10.gov.uk/su/ethnic%20minorities/report/downloads/ethnic_minorities.pdf)>.
- Straus, M. A. and R. J. Gelles (1986) 'Societal Change and Change in Family Violence from 1975 to 1985 as Revealed by Two National Survey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8.
- Sullivan, A. (1995) *Virtually Normal: An Argument About Homosexuality* (London: Picador).
- Sullivan, O. (1997) 'Time Waits for No Woma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Gendered Experience of Domestic Time', *Sociology* 31.
- Sutherland, E. H. (1949)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Chicago: Lippincott).
- Swann Committee (1985) *Education for Al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into the Educ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Children* (London: HMSO).
- Tan, A. and K. Ramakrishna, eds (2002) *The New Terrorism*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Taylor, I., K. Evans and P. Fraser (1996) *A Tale of Two Cities. Global Change, Local Feeling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A Study in Manchester and Sheffield*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I., P. Walton and J. Young (1973) *The New Criminology for a Social Theory of Devia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Tempest, R. (1996) 'Barbie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s Angeles Times*, 22 September.
- Thomas W I. and F. Znaniecki (1966 [1918–20])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Monograph of Our Immigrant Group, 5 vols* (New York: Dover).
- Thomas, C. (1999) *Female Forms: Experiencing and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 C. (2002) 'Disability Theory: Key Ideas, Issues and Thinkers', in C. Barnes, L. Barton and M. Oliver, eds, *Disability Studies Today* (Cambridge: Polity).
- Thomas, G. M. (1987)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onstituting Stat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Newbury Park, CA: Sage).
- Thompson, J. 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

- 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 Thompson, P. and P. Findlay (1999) 'Changing the People: Social Engineer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kplace', in A. Sayer and L. Ray, eds, *Culture and Econom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London: Sage).
- Thompson, W S. (1929) 'Pop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 Thome, B. (1993) *Gender Pl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1995) 'Globalization Threatens Labor's Right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47.
- Tizard, B. and M. Hughes (1984) *Young Children Learning, Talking and Thinking at Home and at School* (London: Fontana).
- Toke, D. (2004) *The Politics of GM Foo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K, USA, and EU* (New York: Routledge).
- Tonnies, F. (2001 [1887])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ugh, J. (1976) *Listening to Children Talking* (London: Ward Lock Educational).
- Townsend, I. (2002) 'The Burden of Taxation', 9 July,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Research Paper 02/43.
- Townsend, R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armondsworth: Penguin).
- Toynbee, R (2003) *Hard Work: Life in Low Pay Britain* (London: Bloomsbury).
- Treas, J. (1995) 'Older Americans in the 1990s and Beyond', *Population Bulletin* 5.
- Troeltsch, E. (1981 [1931]) *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UK Christian Handbook (2004) *Religious Trends No. 4*, Christian Research.
- UK Film Council (2003)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3*.
- UN (2003a)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Highlights* (New York: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UN (2003b) *World Urbanis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 Highlights* (New York: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UNDP (199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UNDP (2002) *Are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easibl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undp.org/dpa/choices/2002/september/Choices0902 p7.pdf>>.
- UNDP (2003)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UNDP (200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Cultural Liberty in Today's Diverse World*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 UNFAO (2001) *The Impact of HIV/AIDS on Food Security*.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Conferenc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 UNFPA (2004) *Stat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unfpa.org/swp/2004/pdf/en_swp04.pdf>.
- UNICEF (2000)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1996—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y Year and by Type, 1909—1996',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96—97.
- Union, T. E. (2005) *The European Union at a Glanc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europa.eu.int/abc/index_en.htm](http://europa.eu.int/abc/index_en.htm)>.
- UNWFP (2001) *News Release: WFP Head Releases World Hunger Map and Warns of Hunger 'Hot Spots' in 2001, January 8*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me).
- UPIAS (1976)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isability* (London: Union of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 Urban Task Force (1999)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Final Report of the Urban Task Force, Chaired by Lord Rogers of Riverside (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 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2nd edn 2001).
- US Bureau of Justice (1998) *Capital Punishment 1997, Statistics Bulleti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 Bureau of Justice (2004) *Capital Punishment 2003*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 www.ojp.usdoj.gov/bjs/glance.dr.htm](http://www.ojp.usdoj.gov/bjs/glance.dr.htm)>.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0) *Child Maltreatment 1998: Reports from the States to the National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Data Syste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Usher, R. and R. Edwards (1994) *Postmodernism and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Vallas, S. and J. Beck (1996)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Revisited: The Limits of Flexibility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Social Problems* 43(3).
- Van der Veer, P. (1994) *Religious Nationalism: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Gennep, A. (1977 [1908]) *The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Vatican (2004) *Letter to the Bishop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Church and in the World*.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20040731_collaboration_en.html>.
- Vaughan, D. (1990) *Uncoupling: 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New York: Vintage).
- Vidal, J. (2003) '10 Million Join World Protest Rallies', *Guardian*, 13 February.
- Vincent, J. (1999) *Politics, Power, and Old Ag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Vincent, J. (2003) *Old Age* (London: Routledge).
- Viorst, J. (1986) And the Prince Knelt Down and Tried to Put the Glass Slipper on Cinderella's Foot, in J. Zipes, ed., *Don't Bet on the Prince: Contemporary Feminist Fairy Tal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ngland* (New York: Methuen).
- Vogler, C. and J. Pahl (1994) 'Money,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Marriage', *Sociological Review* 42.
- Void, G. B., T. J. Bernard and J. B. Snipes (2002)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gar, W (199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Fu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lby, S.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lackwell).

- Walby, S. A. (1986) 'Gender,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toward a New Approach', in R. Crompton and M. Mann, eds, *Gender and Stratification* (Oxford: Blackwell).
- Walker, C. (1994) 'Managing Poverty', *Sociology Review* (April).
- Wallerstein, I.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erstein, I. (1990)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lis, R. (1984)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New Religious Lif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Warde, A. and K. Heatherington (1993) A Changing Domestic Division of Labour? Issues of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7.
- Warner, S. (1993) 'Work in Progres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 Warren, B. (1980)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Watson, J. (2003) *Media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oces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Weaver, M. (2001) 'Urban Regeneration -the Issue Explained', *Guardian*, 19 March.
- Weber, M. (1958 [1921]) *The C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Weber, M. (1958) *The Religion of India* (New York: Free Press).
- Weber, M. (1963)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MA: Beacon).
- Weber, M. (1976)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Weber, M. (1979)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eks, J. (1977)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Quartet).
- Weeks, J. (1986) *Sexuality* (London: Methuen).
- Weitzman, L. (1972) 'Sexual Socialization in Picture Book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
- Wellman, B. S., P. J. Carrington and A. Hall (1988)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B. Wellman and S. D.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stergaard, J. (1995) *Who Gets What? The Hardening of Class Inequalit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 Western, B. (1997) *Between Class and Market: Postwar Unionization in the Capitalist Democrac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eatley, P.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Wheeler, D. L. (1998) 'Global Culture or Culture Clash: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Islamic World—a View from Kuwai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4).
- White, M. and M. Trevor (1983) *Under Japanese Management: The Experience of British Workers* (London: Heinemann).
- WHO (2001) *Rethinking C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bled Peopl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nference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August.
- Wilde, O. (1960)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Brown, Watson: London).
- Wilkins, L. T. (1964) *Social Deviance: Social Policy Action and Research* (London: Tavistock).
- Wilkinson, H. (1994) *No Turning Back* (London: Demos).

- Wilkinson, H. and G. Mulgan (1995) *Freedom's Children Work, Relationships and Politics for 18—34 Year Olds in Britain Today* (London: Demos).
- Wilkinson, R. (1996)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Will, J., P. Self and N. Datan (1976) 'Maternal Behavior and Perceived Sex of Infan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6.
- Williams, S. J. (1993) *Chronic Respiratory Illness* (London: Routledge).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Class Kids Get Working—Class Jobs* (London: Saxon House).
- Wilson, B. (1982) *Relig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E. (2002) 'The Sphinx in the City: Urban Life, the Control of Disorder', in G. Bridge and S. Watson, eds, *The Blackwell City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 Wilson, E. O. (1975)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 J.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the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Knopf).
- Wirth, L.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 Wood, S. (1989)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Skills, Flexibility and the Labour Process* (London: Unwin Hyman).
- Woodrum, E. (1988) 'Moral Conservatism and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7.
- Woolgar, S. and D. Pawluch (1985) 'Onto—logical Gerrymandering the Anatomy of Social Problems Explanations', *Social Problems* 32.
- World Bank (1995) *Workers in an Integrat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96) *Poverty Reduction: The Most Urgent Task*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199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0—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1) *PovertyNet: Topics Relevant to Social Capita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3)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Making Services Work for Poor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Atlas (2003) *World Bank Atlas 200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Group (2002) 'Dis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Conference marks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Disabled.
-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4) *State of the World 2004: Consumption by the Number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worldwatch.org/press/news/2004/01/07/>>.
- Worrall, A. (1990) *Offending Women: Female Law-Breaker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 Wright, E. O.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Wright, E. O.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Wright, E.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 O. (2000) *Class Counts: Student Edi-*

- 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C. R. (1940)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
- Wrigley, E. A. (1968) *Population and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 Wuthnow, R. (1988)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N.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Young, I. M. (1990)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J. (1998) 'Breaking Windows: Situating the New Criminology', in P. Walton and J. Young, eds, *The New Criminology Revisited* (London: Macmillan).
- Young, J. (1999) *The Ex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Crime and Difference in Late Modernity* (London: Sage).
- Young, M. and P. Willmott (1973) *The Symmetrical Family: A Study of Work and Leisure in the London Reg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Zammuner, V. L. (1986) 'Children's Sex-Role Stereotype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in P. Shaver and C. Hendrick, eds, *Sex and Gender* (Beverly Hills, CA: Sage).
- Zammuner, V. L. (1987) 'Children's Sex-Role Stereotypes: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in R. S. C. Hendrick, eds, *Sex and Gender* (London: Sage).
- Zeitlin, I. (1984) *Ancient Judaism: Biblical Criticism from Max Weber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
- Zeitlin, I. (1988) *The Historical Jesus* (Cambridge: Polity).
- Zerubavel, E. (1979)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erubavel, E. (1982)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ime 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 Zhang, N. and W. Xu (1995) 'Discovering the Positive within the Negative: The Women's Movement in a Changing China', in A. Basu, ed., *The Challenge of Local Feminisms* (Boulder, CO: West-view).
- Zimbardo, P. G. (1969)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in W. J. Arnold and D. Levine,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Zimbardo, P. G. (1972)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Society* 9.
- Zubaida, S. (1996). 'How Successful is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Islamizing Iran?' in J. Beinen and J. Stork, eds, *Political Islam Essays from the Middle East Repo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Zuboff, S. (1988)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术语汇编^①

A

IQ: 智力商数(intelligence quotient)的缩写,指在一组包括概念性与计算性问题的测验中获得的分数。

B

霸权式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由 R. W. 康奈尔首先提出的术语,指在性别等级序列中男性特质的主导形式。尽管霸权式男性特质压制了其他类型的男性特质以及女性特质,但也会受到它们的挑战。在当今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霸权式男性特质通常与白人、异性恋、婚姻生活、权威、身体强健等特性联系在一起。

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由那些从事白领职业或专业工作的人进行的犯罪活动。

半边陲国家(Semi-peripheral countries):这些国家向核心工业化国家和世界经济体提供劳动力和原材料,但本身并未充分工业化。

比较性问题(Comparative questions):出于社会学理论或研究的目的,抽取同一社会中的不同情境或不同社会中的实例进行比较的问题。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将一个社会中的一系列研究结论与另一些社会中的同类研究结论相对比的研究。

边陲国家(Peripheral countries):在世界经济体中扮演边际角色,因此依赖于与核心生产性社会之间保持的贸易关系。

变量(Variable):能够据之对一种事物、个体或

群体加以分类的一个维度,如收入或者体重。变量使不同事物或不同时间之间的特定比较成为可能。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一种研究越轨的思路,认为人们之所以成为“越轨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政治权威和他人贴上了特定的标签。

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一种用来计算一组统计数据的差异幅度的方法。

病理(学)(Pathologies):字面意思是指对于疾病的性质、起因、过程、发展及后果的科学研究。

病人角色(Sick role):与美国功能主义者塔尔科特·帕森斯有关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病人所采取的行为模式,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其疾病对他人造成的干扰。

剥削(Exploitation):一种社会关系或制度关系,关系中的一方通过权力的不均等,牺牲另一方而获取利益。

C

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中,调查者要参与到被研究群体或社区的活动中去。

参与民主制(Participatory democracy):一个群体或社区中的所有成员集体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度。

残障的个体模型(Individual model of disability):这种理论认为,个体的局限是残障人士所经历的问题的主要原因:身体方面的“不正

^① 原书的术语汇编以英文首字母为序编排。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本版中译改以术语中译首字汉语拼音为序重新编排,分组为译者所加。第五版删掉了第四版中的 33 个术语,增添了 112 个术语,共 493 条,对部分术语做了扩写,并微调了若干术语的辞目拼写形式。

常”被视为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残障”或功能局限。这种功能局限被看作是将个体更宽泛地归为“病人”的基础。残障的个体模型已经受到了残障的社会模型支持者的批评。

残障的社会模型(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这种理论将残障的致因归为社会而不是个体。导致残障的并非个体的局限,而是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充分参与所设置的障碍。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研究在日常社会互动中,人们如何理解他人言行的意义。常人方法学探讨的是“常人的方法”(ethnomethods),人们借此来维持与他人之间有意义的交流。

超级现实(Hyperreality):法国学者让·布希亚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电子传播的普及导致电视节目和其他文化产品所指涉的独立“现实”的消亡。事实上,我们所认为的“现实”是由这些电子传播本身所建构的。因此,新闻报道的内容并不仅仅是一系列独立的事件,其本身即界定和建构了那些事件的内涵。

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通过循环利用土地和现有建筑,改善城市环境,在本地居民的参与下提高当地的管理水平,以及通过公共基金去振兴该地区和进一步吸引私人投资等办法,改善日渐衰败的住区。

城市化(Urbanization):城镇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一种研究城市生活的思路,其基础是与植物和有机体同物质环境求得调适的特点加以类比。根据生态学理论家的观点,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住区和区域都是城市人口在竞争资源时的自然调适过程的结果。

城市再造(Urban recycling):通过鼓励更新旧建筑,和在已经开发的土地上建造新建筑,来修复日益恶化的居住环境,而不是扩展到新场地。

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ies):一种关注人类社会中呈现的张力、分裂和竞争性利益的社

会学视角。冲突理论家认为,社会中的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会产生冲突,因为各群体会为获得和控制这些资源而进行斗争。许多冲突理论家都深受马克思的著述的影响。

崇拜(Cult):一种零散的宗教集合,个体松散地依附于它,缺乏任何持久的结构。崇拜经常是围绕着一个得到神灵感应的领袖而形成的。

抽样(Sampling):从一个更大的总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个体或事例作为整个总体的代表来进行研究。

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孩童通过这个过程了解他们出生的社会的文化规则。初级社会化主要发生在家庭里。

初级越轨(Primary deviance):在越轨社会学中,指犯罪或越轨的初始行为。根据埃德温·勒默特的观点,初级越轨行为的活动处在个体自我认同的边缘。但越轨行为常常会被正常化。

传播(Communication):信息从一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传递。传播是所有社会互动的必要基础。在面对面的情境中,传播既通过语言来进行,也通过个体用来解释对方言行的许多身体线索来进行。随着书写和诸如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传输系统等电子传媒的发展,传播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超出了面对面社会关系的无中介情境。

传媒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由传播技术的发展促成的一种帝国主义模式。有些人宣称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帝国,它把工业化国家生产的媒体内容强加给了缺乏资源来维护其文化独立性的欠发达国家。

传媒管制(Media regulation):运用合法的手段控制媒体的所有权和媒体传播的内容。

创生环境(Created environment):由于应用技术而创造的物质世界的特性。城市就是一种创生环境,即人类为满足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建筑设施——例如公路、铁路、工厂、办公楼、私宅和其他建筑物等。

垂直流动(Vertical mobility):在一个社会分层系统的位置等级序列中的上升或下降运动。

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具有性方面和情感上的平等的关系。

次级越轨(Secondary deviance):一个与美国犯罪学家埃德温·勒默特有关的观念。初级越轨是指触犯规范或法律的初始行为,例如从商店里偷窃一件物品。而次级越轨就是把一个标签贴到做出该行为的个体身上,如那个从商店偷东西的人就被标定为“商店扒手”。

从夫居(Patrilocal):妻子预期会住在丈夫父母邻近的家庭体制。

从妻居(Matrilocal):丈夫预期会住在妻子父母邻近的家庭体制。

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一种统计测量,反映给定人口每年出生人数,通常计算的是每千人中的出生人数。尽管粗出生率是一种有用的指标,但只是一种粗略的测量,因为它并未结合年龄分布具体说明出生人数。

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一种统计测量,反映给定人口每年发生的死亡人数,通常计算的是每千人中的死亡比例。粗死亡率给出了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中的死亡水平的一般指标,但效度有限,因为未曾考虑年龄分布。

D

大规模客户定制(Mass customization):通过应用新技术大批量生产为特定客户设计的产品。

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运用机械力长期生产产品。大规模生产是工业革命的一个产物。

大众传媒(Mass media):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可以通达大量受众的传播形式。

代表性样本(Representative sample):取自较大总体中的一个样本,它对于总体来说,具有统计上的代表性。

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在社会分层等级上的上升或下降。

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一个人一生之内在社会分层等级中的上升或下降。

代议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一种政治制度,在做出影响整个共同体的决策时,并非由该共同体全体成员作为整体来做,而是由全体成员为此选出的成员代表来做。

单偶婚(Monogamy):一种婚姻形式,其中只允许婚姻各方在任一时候有一个配偶。

党派(Party):基于共同的背景、目标、利益而在一起工作的一群个体。根据韦伯的观点,党派同阶级、地位一样,都属于塑造社会分层模式的因素。

道德恐慌(Moral panic):由斯坦利·科恩推广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由媒体引发的过度反应,从而把某个群体或某类行为看作是社会普遍失序的症候。激起道德恐慌的事件,就其行为的性质以及所涉及的人数而言,常常是非常琐碎的。

等级制(Estate):与法律上所确立的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有关的一种分层形式。

低信任体制(Low-trust systems):一种不允许个体对工作任务负多少责任或有多少控制的组织或工作框架。

底层阶级(Underclass):位于阶级体系底层的个体阶级,常常由那些来自少数民族背景的人们组成。

地球村(Global village):由加拿大作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的一种观念。他认为电子沟通的传播将世界结合成一个小社区。由此,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视节目跟踪相同的新闻事件。

地位(Status):某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被社会

其他成员所认可的荣誉或声望。一般说来,地位群体有其鲜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该群体的成员所遵循的行为模式。地位特权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贱民”地位群体是被大多数人所鄙视的,或被看作是弃儿。

地位丛(Status set):一个个体所享有的一组社会地位。

第二世界(Second world):东欧及苏联等前共产体制工业化社会。

第三龄(Third age):是指人们的晚年,这时人们已经摆脱了作为父母的责任和劳力市场。在当代社会里,第三龄要比以往更长,使得老年人可以积极独立地生活。

第三世界(Third world):工业生产几乎完全不存在或者发展颇为有限的欠发达社会。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Third way politics):一种政治哲学,由新工党提倡,并得到其他奉行中间路线的民主领袖赞同,致力于在赞同创造财富、消除经济不平等的市场政策的同时,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第一世界(First world):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拥有成熟的工业化经济体系的民族国家群体。

电信/远程传播(Telecommunications):通过技术媒体实现信息、声音或影像的远距离传播。

都市丛(Conurbation):将一群城镇或城市聚合起来形成连片城市环境。

都市风格(Urbanism):路易斯·沃思用来标定城市社会生活的明显特征的一个术语,如城市生活的非人身性。

多媒体(Multimedia):将过去常常需要不同技术的不同媒体(例如视像与声像)集成为单一媒体,例如可以在计算机中播放的光盘。

多偶婚(Polygamy):一种婚姻形式,其中一个人可同时拥有两个或多个配偶。

多神教(Polytheism):信仰两个或更多神。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各族群独立生存,并平等共享经济政治生活。

多中心跨国企业(Polycentric transnationals):跨国企业的行政管理结构是全球性的,但企业运作根据当地情境进行灵活调适。

F

发展性问题(Developmental questions):社会学家探究社会制度从过去到现在的起源与发展路径时所提出的问题。

翻番时间(Doubling time):一定水平的人口增加一倍所需要的时间。

凡俗(Profane):属于尘世、日常世界的东西。

反抗的女性特质(Resistant femininity):与R. W. 康奈尔关于社会中性别等级秩序的著述有关的一个术语。体现反抗的女性特质的女性拒绝接受社会中对于女性特质的传统规范(即“受强调的女性特质”),奉行解放洒脱的生活风格和身份认同。例如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都是反抗的女性特质的表现形式,不臣属于霸权式男性特质的主导角色。

反思性(Reflexivity):这个术语描述了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我们所获得的关于社会的知识能够影响我们在社会中的行事方式。例如,某人读到一份关于某一政党高支持率的问卷调查,可能会使他也支持该党。

反应性惊呼(Response cries):个体在吃惊、不小心掉了东西或表达愉快时仿佛是不由自主的喊叫,在常人方法学家和谈话分析家的研究中,属于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细节的有节制的管理。

犯罪(Crime):指任何触犯由政治权威设置的法律的行动。尽管我们往往可能把“罪犯”看成是人口总体中特殊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几乎很少有人不曾以某

种方式触犯过法律。尽管法律是由国家当局制定的,但它们决不会不知道在某些特定的背景下,自身也在从事着犯罪行为。

犯罪学(Criminology):对于由刑律所制裁的行为模式的研究。

泛灵论(Animism):认为世间万物都受神灵的活动驱使的一种信仰。

非言语沟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个体之间的沟通乃是基于面部表情或身体姿势,而不是使用语言。

非正式关系(Informal relations):群体和组织中基于私人关系发展起来的关系;其行事方式不同于正式认可的程序模式。

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在正规的有薪就业范围外进行的经济交易。

分工(Division of labour):把生产系统划分成专门化的工作任务或职业,从而创造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所有的社会都至少具有某种初级形式的分工,尤其是分配给男人和由女人执行的任务的分工。然而,随着工业主义的发展,分工变得比以前任何类型的生产体系都更为复杂。在现代世界,分工的范围已经国际化。

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有关的一个概念。贝克认为,工业社会创造了许多在以往各时期不为人所知的蕴含危险的新风险,与全球变暖有关的风险就是一例。

符号(Symbol):用以代表或反映另一事项的某一事项,比如用一面旗作为符号来象征一个国家。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社会学中由米德提出的一种理论思路,特别强调符号和语言作为所有人类互动的核心要素的作用。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种为公民提供广泛多样的福利补助的政治体制。

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指福利待遇的享受者,如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将享受福

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努力求取一份有报酬的工作。

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大企业保护其雇员不受市场变幻影响的措施。

福特制(Fordism):由亨利·福特所开创的体系,涉及到引入流动装配线,而关键在于把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与为所生产的物品开发大规模市场相联系。在福特这里,特别著名的是他推出的T型福特汽车。

福音派(Evangelicalism):新教的一支,其特点是信仰精神重生(“再生”)。

父系的(Patrilineal):通过父方谱系关联到、基于或追溯到祖先世系。

复合型劳动者(Portfolio worker):拥有多种技能或素质,因而能够方便地转换工作的人。

富人化(Gentrification):新搬入的富裕人群把衰败的老房屋加以重新整修的城市更新过程。

G

感觉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儿童在这个人类认知发展阶段上对于其所处环境的意识主要是知觉和触觉。

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中学水平以上的教育,在大学或学院中进行。

高信任体制(High-trust systems):允许个体对工作任务有极大的自主性和控制度的组织或工作框架。

革命(Revolution):一种政治变迁过程,涉及对于大众社会运动的动员。通过使用暴力,成功地推翻现存政权,并组建一个新的政府。革命有别于军事政变,因为它包括群众运动和整个政治体制发生的重大变迁,而军事政变是指个人通过使用武力攫取权力,然后取代现存的政治领袖,但没有对政府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革命也有别于叛乱,后者涉及对现存的政治权威提出挑战,但其

- 目标也只是人事的更替,而不是政治结构本身的转型。
- 个人空间(Personal space)**:个体与他人之间保持的物质空间。它可以多种多样,从密切关系所拥有的亲密距离、正式接触的社会距离到面对受众时的公众距离。
-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大致是由那些从事蓝领行业或手工行业的人们构成的社会阶级。
- 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围绕着现代工业形式的发展而发生的社会和经济的广泛转型。工业革命引发了工业化过程。
- 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现代工业形式即工厂、机器和大规模生产过程的发展。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工业化已经成为影响社会世界的主要过程之一。那些业已工业化的社会与欠发达国家的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说,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这一点与工业化前的国家有重大差异。
- 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ies)**:大多数劳动力参与工业生产的社会。
- 工作无保障感(Job insecurity)**:雇员对于其工作位置的稳定性以及在工作场所中所发挥作用的忧虑感。
-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有关的一个概念。公共领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展开公共论辩和商谈的领域。
- 公民(Citizen)**: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拥有与其成员身份相维系的权利和义务。
-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活动领域,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和非经济机构。“公民社会”或公民文化对于有活力的民主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一种理论视角,认为要想说明社会事件,最好的切入点是根据它们所履行的功能,即为一个社会的延续所做出的贡献。这种视角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以一种有必要理解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 共产主义(Communism)**:一组与马克思相关联的政治理念,尤其是经过列宁的发展之后,在中国以及1990年以前的苏联和东欧被制度化。
- 共谋的男性特质(Complicit masculinity)**:与R. W. 康奈尔论社会中性别等级秩序的著作有关的一个术语。社会上有许多男性都体现出这种共谋的男性特质,他们自己并不符合霸权式的男性特质的理念,却因为这种特质在男权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获益。
- 共享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s)**:人们所持有的共有假定,使他们得以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彼此互动。
- 寡头垄断(Oligopoly)**:某一特定产业中少数公司取得支配地位。
- 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由韦伯的学生罗伯特·米歇尔斯所创的术语,指的是大型组织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样使得民主化更为困难。
- 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由经营管理人员而非所有者负责日常运作的资本主义企业。
- 规范(Norms)**:反映或体现一种文化的价值观的行为规则,规定或是禁止一种特定类型的行为。规范始终需要某种约制为支撑,从非正式的不赞许到对于身体的惩罚乃至处决。
- 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GOs])**:依照属于其成员的个体或私人组织之间的协定建立的国际组织。
- 国际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GO])**:依照政府之间条约建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处理其成员国家之间的事务。
- 国家(State)**:统治一个特定地域的政治机器(政府机构加上公务员),具有受到法律支撑的权威和使用强力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社会都表现出存在国家的特征。狩猎和采

集文化,较小的农耕社会,就都没有国家机构。国家的兴起标志着人类历史的显著转型,因为国家形成中包含的政治集权为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动力。

国家中心理论(State-centred theory):这种发展理论主张,适度的政府政策并不是干预经济发展,而能够大大促进经济发展。

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国内生产总值加上净资产收入(利息、租金、股息、利润)。**[GNI 这个术语现在比 GNP 更常用,后者即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一种与此类似但比较陈旧的测量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一国经济在某一年中生产的所有有记录的物品与服务,而不论是谁占有。

H

合法性(Legitimacy):当绝大多数的被统治对象认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秩序是公正有效的时候,该政治秩序就获得了合法性。

核心国家(Core countries):根据世界体系理论,最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就是核心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利润的最大份额。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母亲、父亲(或其一)和受抚养子女组成的家庭群体。

黑人女性主义(Black feminism):女性主义思想的一支,强调是性别、阶级和种族等多重劣势塑造了非白人女性的经历。黑人女性主义拒绝认为所有的女性都同样经历着单一的性别压迫,指出早期的女性主义分析反映的只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特殊关怀。

宏观社会学(Macrosociology):关于大规模群体、组织或社会系统的研究。

后福特制(Post-Fordism):这个通用术语是用来描述从福特制方法所代表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转到强调创新的弹性生产方式,旨在适应市场对于客户定制产品的需要。

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倡导这种观念的人,相信社会变迁的过程正引领我们超越工业化秩序。后工业社会是建立在信息生产而非物质产品生产的基础上。根据后工业主义者的看法,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着的一系列社会变迁,其重要性就像大约两百年前开启工业时代的那些社会变迁一样深远。

后台(Back region):根据戈夫曼的概括,是远离“前台”表演的区域,个体在这里可以得到放松,并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行事。

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后现代女性主义沿承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性,拒斥单一说明或单一哲学的观念。在女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内涵中,包括对抗本质主义(相信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是先天固有的,而不是在社会或经验的角度上建构出来的),并对更加多元化的知识保持信念。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认为社会不再被历史或者进步所统治的信念。后现代社会是高度多元、高度离散的,没有任何“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能指导它的发展。

互联网(Internet):经由计算机链接的全球性/全局性(global)体系,它使人们能相互沟通,并且在万维网上通过视频、音频以及文本的形式找到信息,其方式不受时间、空间、成本、距离的限制,也不受区域性政府的控制。

话语(Discourses):社会生活某一特定领域中的思维框架。例如,关于犯罪的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谈论犯罪的。

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al ecology):面临现代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有害后果,关注维护自然环境的完整健全。

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犯罪司法的一个分支,它拒绝使用惩罚手段而赞成基于共同体的审判,意在提高罪犯对其行为

后果的认识。

婚姻 (Marriage): 两个个体之间被社会所认可的性关系。婚姻几乎始终是指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某些文化中,也容忍了同性之间的婚姻。婚姻通常构成了一个生育家庭的基础,也就是说,人们期望婚姻双方能够生育并抚养孩子。许多社会允许多偶婚,其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几个配偶。

获致地位 (Achieved status): 基于个体努力而不是生物因素指定的属性所获得的社会地位,“退伍军人”、“研究生”或“医生”等皆属此类。

J

基于互联网的学习 (Internet-based learning): 以互联网为媒介链接的教育活动。

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 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形式,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由男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占据控制地位造成的。

极限寿命 (Life-span): 某一物种的成员在生物学角度上最大可能的生命长度。

集体消费 (Collective consumption): 曼纽埃尔·卡斯特所用的一个概念,表示由都市促成的对公共物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例如交通服务和休闲设施等。

集中趋势测量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y): 计算平均数的几种方法,其中三种最常见的是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技术 (Technology): 知识在物质世界生产中的运用。技术包括创造人类与自然互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工具(如机器)。

家庭 (Family): 个体之间以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相互联系起来的群体。他们形成了一个经济单元,其中的成年人有责任抚养儿童。所有已知社会都包含某些形式的家庭制度,尽管家庭关系的性质千差万别。而在现

代社会中,主要家庭形式是核心家庭,形形色色的扩大家庭关系也常常出现。

家务 (家务劳动) (Housework, domestic labour): 通常由女性在家中执行的无薪酬的工作,包括做饭、打扫、购物等家务杂事。

家族资本主义 (Family capitalism): 企业家族所占有并管理的资本主义企业。

价值观 (Values): 由人类个体或群体所秉持的,确定什么是可取的、恰当的、好的或者坏的观念。不同的价值观是人类文化差异的核心表现。个体认同的价值观受到他们恰巧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的强烈影响。

假设 (Hypothesis): 关于某种事态的一种观点或有根据的猜测,为经验检验提供一个基础。

监控 (Surveillance): 由他人对一些个体或群体的活动进行监管以确保行为顺从。

监控社会 (Surveillance society): 个体受到定期监察、其活动被记录的社会。在公路、街道和商业中心普遍设置摄像头就是监控延伸的一种表现。

健康转型 (Health transition): 在一个社会里,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从急性传染病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在已经发生这种转型的工业化社会中,结核、霍乱和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实际上已经被根除了,而癌症和心脏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

交谈 (Talk): 日常社会生活中谈话或言语交流的实际开展,社会学家尤其是常人方法学家越来越把交谈看作是仔细考察的对象。

郊区化 (Suburbanization): 在郊区即内城外部的低层住宅区的发展。

教会 (Church): 属于一个既定宗教组织的一大群人。教会一般有某种正式结构,包括宗教人员等级制度在内。这一术语也被用来指称举行其宗教仪式的建筑物。

教派 (Sect): 从正统宗教中脱离出来的一种宗教运动。

教育(Education):知识通过直接教学的方式从一代人传递到另一代人的过程。尽管教育的过程存在于所有社会,但只是在现代,大众教育才采取了学校教育的形式,也就是说,在专门化的教育环境下进行教学。在这个环境中,个体要花费他们一生中数年的时间。

阶级(Class):尽管这是社会学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但是对如何更好地界定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共识。马克思认为,阶级是指与生产资料拥有共同关系的一群人。韦伯也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经济类别,但是强调它与社会地位以及“党派”归属之间的相互影响。最近,一些社会科学家广泛运用职业作为划分社会阶级的一个指标,而其他人则强调财产和其他财富的所有权,还有人关注的是生活方式的选择。

接触(Encounter):两个或多个个体在一个面对面互动的情境中的会面。可以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看作是在一天的过程中串联起来的一系列不同的接触。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同他人的许多接触涉及的都是陌生人而非熟人。

接近的冲动(Compulsion of proximity):在面对面的场景中,个体所体验到的同他人互动的需要。

结构化(Structuration):一种双向过程,一方面我们作为个体的活动塑造着我们所处的社会世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被社会再塑造。

经济(Economy):为生活于某个社会中的个体提供物质需要的生产与交换体系。经济制度在所有社会秩序中都是至关重要的。经济的运行通常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使得现代经济已经迥异于传统经济。

经济互赖性(Economic interdependence):这是专业化和分工的结果。当自给自足被取代,个体要依赖于他人来生产为了维持自身生

存所需的多数乃至大多数商品。

经验调查(Empirical investigation):在某一个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进行的事实性考察。

精密符码(Elaborated code):一种言说形式,在词语的使用上精心构建,以指称确切意义,适应多种文化背景。

精神变态(Psychopathic):一种特殊的人格类型,这类人缺少大多数正常人所拥有的道德感和对于别人的考虑。

巨型都市(Megacities):曼纽埃尔·卡斯特喜欢用这个术语来描述那些在全球经济中处于枢纽地位的高度密集的大型都市空间。预计到2015年,会有36座拥有800万以上人口的巨型都市。

拒世型运动(World-rejecting movements):一种宗教运动,本质上具有排它性,对外部世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对其成员要求严苛。

具体运演阶段(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皮亚杰所概括的认知发展的一个阶段,该阶段中儿童的思维主要基于对于世界的物理感知,儿童尚无能力处理抽象概念或假设情境。

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以维持健康生存所必需的最低要求来界定的贫困。

君主制(Monarchies):由一个人领导的政治制度,权力通过其家庭成员代代相传。

均数(Mean):一种对于集中趋势或平均水平的统计测量,即用总数去除以个案的数目。

K

科层制(Bureaucracy):一种强调等级、采取权威的金字塔形式的组织。“科层制”这一术语因马克斯·韦伯而普及。依据韦伯的观点,科层制是最有效的一种大规模人类组织。他认为,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不可避免地走向科层化。

科学(Science):就自然科学而言,是指对物质世界的系统研究。科学——以及作为一项

科学事业的社会学——是指对经验数据进行有规则的整理，并同可以阐明或说明这些数据的理论思路及理论的建构相结合。科学活动就是把新思维模式的大胆创造同假设或观念的细心论证相结合。把科学同其他观念体系类型（例如宗教中所包含的观念体系）区分开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预设所有的科学观念都要公开面对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相互批评及修正。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这一观念认为，自然资源能够循环使用而不是被耗尽，生物多样性得到维持，清洁的空气、水以及土地得到保护，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维持经济成长。

可塑的性 (Plastic sexuality): 摆脱生育需要、由个体自主形塑的性。

刻板印象 (Stereotype): 一群人的一种固定的、不易改变的特征。

控制 (Controls): 一种统计方法或实验方法，为了检查其他因素的因果性影响，而使一些变量保持恒定。

控制理论 (Control theory): 这种理论认为犯罪是犯罪行为的冲动与对于犯罪冲动的控制之间失衡的结果。控制理论家认为，罪犯也是有理性的人。会积极行动，以使自己所获的回报最大化，只能通过社会控制或身体控制，使其无法如此行事，才可以阻止他们。

口述史 (Oral history): 与人们就其生活中早先见证或经历的事件进行的访谈。

库兹涅茨曲线 (Kuznets Curve): 一个公式，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平等的程度先是增长，然后下降，最终在一个较低水平趋于稳定。由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提出。

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 酷儿理论主张，社会学及其他学科都偏好异性恋，必须将非异性恋的声音带到前台，以便挑战支撑大多数当代思维的那些异性恋假设。

跨国企业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设立在两个或更多国家的工商企业。即使跨国公司明确以一个国家为基地，也是面向全球市场及全球利润。

扩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 不仅包括一对夫妇及其子女、并且包含一些近亲的家庭群体，他们生活在同一家户，或者彼此保持经常性的密切关系。

L

滥伐森林 (Deforestation): 常常由于商业性砍伐而导致的林区被破坏。

浪漫之爱 (Romantic love): 与激情之爱 (passionate love) 相区别的浪漫之爱观念肇始于 18 世纪，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相互吸引，而不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这是纯粹关系的观念的序曲，但也有所冲突。

浪子之爱 (Confluent love): 积极主动、偶遇而生的爱，与浪漫之爱的“永恒”性相对。

劳动 (Work): 人类从自然世界谋取生产并以此来维持生存的活动。不能把劳动仅仅看作是有薪就业。在传统文化中，只有一种初级的货币体系，很少有人是为了货币报酬而工作。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仍然有许多类型的劳动是不涉及工资或薪水等直接报酬的（比如家务劳动）。

老龄化 (Greying): 这个术语用来表示一个社会的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

老年化 (Ageing): 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影响他们的生物过程、心理过程与社会过程的综合。

累犯 (Recidivism): 先前被发现有犯罪前科的犯人重新犯罪。

冷战 (Cold war): 指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1990 年，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盟国之间的冲突局面。之所以被称作“冷战”，是因为双方之间并没有进行过实际的军事对抗。

离散度 (Degree of dispersal): 一组数字的范围

或者分布。

理论(Theory):概括一般特性以说明有规律地观察到的事件的努力。理论构成了所有社会学工作的某种基本要素。尽管理论往往与更为宽泛的理论思路相维系,但也受到它们推动产生的经验研究结果的强烈影响。

理论性问题(Theoretical questions):社会学家在试图说明某一特定范围内所观察到的事件时提出的问题。理论性问题的提出对于我们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至关重要。

理念型(Ideal type):一种“纯粹”类型,通过强调某一特定社会事项的某些特质而构造出某种分析模型,这种类型并不必然存在于现实中的某个地方。这些特质是界说性的,并不一定值得想望。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组织的理念型即为一例。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韦伯所用的一个概念,是指精确计算的模式和组织,包括抽象规则和程序等,在社会世界中日益占支配地位的过程。

流散(Diaspora):某一族群从最初的家园分散到异国他乡的过程,经常是被迫的,或者遭受创伤。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关于疾病在人群中分布和发生的研究。

垄断(Monopoly):单一企业主导某一产业的情形。

乱伦(Incest):家庭近亲之间的性活动。

伦理宗教(Ethical religions):这些宗教依赖于“大师”(像佛陀或孔子)的伦理感召力,而不是依赖于对于超自然体的信仰。

M

马尔萨斯主义(Malthusianism):这一观念由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前首次提出,认为人口增长有超出可利用资源的支持能力

的趋势。马尔萨斯认为,人们势必减少性生活,以避免人口过度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灾难和饥饿。

买春观光(Sex tourism):这个术语过去通常用来描述以买春为目的的国际旅游。它在远东各国高度发达,成群的外国男人为获得与妇女及幼童进行廉价性交往的机会而旅游。

卖淫(Prostitution):性特许权的出售。

没有国家的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s):当一个民族的成员在宣称是自己的领地内缺乏政治主权时即属此例。

民主制(Democracy):允许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一种政治制度,其渠道常常是为统治机构选举代表。

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现代世界所特有的一类国家。在这类国家中,政府在一块限定的领地中享有主权,而其属民大众则是自知属于一个单一民族的公民。民族国家同民族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尽管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并不总是符合现存特定国家的边界。民族国家最初是作为源自欧洲的新兴民族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如今已遍及全球。

民族志(Ethnography):通过参与观察或访谈对人进行第一手的研究。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组表达与某个特定国家共同体相认同的信仰和符号。

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孩童在生命早期与其母亲之间缺乏一种稳定而深情的关系。约翰·鲍尔比认为,母爱剥夺会导致孩童在日后的生活中产生心理疾病或越轨行为。

母系的(Matrilineal):通过母方谱系关联到、建基于或追溯到祖先世系。

目标加固(Target hardening):遏止犯罪发生的技术,目的在于通过直接干预潜在的犯罪条件,使得犯罪难以发生。比如在某些地方要求为汽车安装方向盘锁,以减少偷车的诱惑。

N

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制造电子元件与设备的科学与技术,其大小广义上小于100纳米(1纳米等于1米的十亿分之一)。

男权制(Patriarchy):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所有已知社会都是男权制的,虽然男性同女性相比所掌握的权力有程度和性质的差异。在现代社会,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与已有的男权制度进行斗争。

男性表达无能(Male inexpressiveness):男性在向他人表达或谈论自己的感情时遇到的困难。

男性特质危机(Crisis of masculinity):一部分人所具有的一种观念,认为男性特质的传统形式被当前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所削弱,从而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在此阶段的男性对自己以及在社会中的角色都不确定。

男性挣钱养家(Male breadwinner):直到最近,在许多工业化社会中,男性的传统角色仍然是受雇于家庭之外的工作以养活家庭。但是,随着家庭模式的变化,随着进入劳动市场的女性人数稳步增长,这种“男性挣钱养家模式”已经大大削弱了。

能力至上制(Meritocracy):根据个人品质或业绩,而不是继承的财产、生理性别或者社会背景等先赋标准,来确立社会位置的一种体制。

拟剧论分析(Dramaturgical analysis):基于运用源自戏剧的比喻来研究社会互动的一种思路。

拟像(Simulacra):在由法国学者让·布希亚提出的一个虚拟现实的世界中,拟像就是没有母本的摹本。比如,一座“仿都铎式”房屋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原初的都铎式建筑。

年龄等级(Age-grade):在小型传统文化中可以发现这种体制,根据这种体制,属于类似年龄群体的人们被划归一级,享有类似的权利与义务。

年龄歧视(Ageism):出于年龄原因而对一个人的歧视或偏见。

农耕社会(Agrarian societies):生存方式基于农业生产(作物种植)的社会。

奴隶制(Slavery):使一些人实际上被另一些人当作是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社会分层形式。

女同性恋(Lesbianism):女性之间的同性恋活动或依恋。

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ies):一种社会学视角,强调性别在分析社会问题时的核心地位,尤为强调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女性主义理论有许多分支,但都希望说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并致力于克服这些不平等。

P

偏差(Bias):泛指某种偏向或倾向,特指有碍于公正无偏的评判的因素。在统计抽样或检验中,指系统地偏好某类结果而导致的某种谬误。

偏见(Prejudice):对一个人或群体持有先入之见,即使面对新的信息也难以改变。偏见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贫困化(Pauperization):字面意思就是制造贫困或使之陷入贫困。马克思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工人阶级相比于资产阶级愈益陷入贫困的过程。

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由奥斯卡·刘易斯推广的一个命题,认为贫困并不是个体匮乏的结果,而是基于更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结果,儿童们世代相袭都被这种氛围所社会化。“贫困文化”指的是生活在物质剥夺条件下的人们所共有的价值、信念、生活方式、习惯与传统。

贫困线(Poverty line):由政府使用的一种官方计量方法,将生活在这个收入水平以下的人界定为生活贫困。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一条固定的贫困线,不过英国没有。

破窗理论(Theory of broken windows):认为砸破窗户或者恶意破坏之类的不当行为与真正的犯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普遍补助(Universal benefits):无论收入水平或经济地位如何,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到的福利。例如:英国的全民健康服务就是一种普遍补助,所有英国人都有权利用它,以获得定期的保健。

Q

歧视(Discrimination):阻止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分享其他人可以获得的资源或报酬的行为。尽管歧视和偏见通常联系密切,但必须加以区别。对他人有所偏见的个体有时并不会真正做出歧视的举动,反之,有时候人们对某些人并无偏见,却以歧视待之。

企业犯罪(Corporate crime):社会上的大企业所犯的罪行。企业犯罪的例子包括污染、虚假广告,以及侵害健康与安全规则等。

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支,它通过创造涉及公司全体成员独特的组织文化,力图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一种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包括公司盛事、仪式以及传统,据说可以提高雇员的忠诚,促进群体的团结。

前台(Front region):一种社会活动的场景,在这里个体力图为他人进行特定的“表演”。

前运演阶段(Pre-operational stage):在皮亚杰的理论中,这个认知发展阶段中的儿童已经充分发育,可以把握基本的逻辑思维类型。

潜功能(Latent functions):功能所发生的那个社会系统的成员并不想要或并未认识到的功能后果。

亲属制度(Kinship):通过血缘、婚姻或收养把个体连接起来的某种关系。在定义上,亲属关系被限定在婚姻和家庭之中,但远远超出了这些制度。在绝大多数现代社会中,亲

属关系中牵涉的社会义务极少超出最亲近的家庭的范围。不过,在其他许多文化中,亲属制度对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说都至关重要。

情感性个体主义(Affective individualism):相信浪漫依恋是订立婚姻纽带的基础。

情感智力/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个体运用自己的情感来培养同情、自控、热情以及恒心等能力。

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划分时间与空间,可以用来在某个地方或国内层面为活动“分区”,或者将较大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生活,在大于或小于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划分成区域框架(settings)或分区(zone)。

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由国家设施照料的个体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庭或社区中的住所的过程。

去科层化(Debureaucratization):在当今社会,韦伯式的科层制度已经逐渐不复作为一种主导的典型组织形式。

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在福利供应的情况下,福利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市场的影响。在以去商品化为主的体制中,例如教育和健康保健等福利服务提供给每一个人,与市场过程没有联系。而在商品化体制中,福利服务被作为商品,像其他货物或服务一样在市场上出售。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地球温度的逐渐升高。之所以发生全球变暖或者“温室效应”,是因为不断积聚的二氧化碳吸收了太阳的辐射而使地球变热。全球变暖的影响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会导致洪水、干旱以及世界气候的其他变化等问题。

全球化(Globalization):随着社会和经济联系延伸到世界各地,世界上不同的人群、地区和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

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产生最终产品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的世界网络。

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y):像伦敦、纽约或者东

京等已经成为新型全球经济组织中心的城市。

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 处理全球问题所需的规则框架, 以及确保这套规则框架运转所需的各式制度 (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各国政府)。

权力 (Power): 实现个体或群体成员的目的或推进他们所持利益的能力。权力是普遍渗透于所有人类关系的一种特性。社会中的许多冲突都是围绕权力的斗争, 因为一个个体或群体能够实现多少权力, 主导了他们有多少能力能够以牺牲别人的愿望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权威 (Authority): 许多社会学家追随马克斯·韦伯的思路, 主张权威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对于另一个人或群体所享有的合法权力。合法性的要素对于这样来理解权威至关重要, 是将其区别于权力这一更一般性的概念的主要方法。权力是通过使用强力或暴力来施加的。而权威则与之相反, 依赖于下属接受上级有权利对他们发号施令。

缺席父亲 (Absent father): 由于离婚或其他原因, 与子女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联系的父亲。

群体封闭 (Group closure): 一个群体通过为自身确立一道明显的界限而同其他群体隔离开来。

群体生产 (Group production): 通过小群体而非个体组织的生产。

R

人格稳定化 (Personality stabilization): 根据功能主义者的观点, 家庭可以从感情上极大地协助其成员。成年男性与女性的婚姻是支撑成年人的人格和保持健康的安排。

人口学/人口统计学 (Demography): 关于人口总体特征的研究, 包括其规模、构成以及变化。

人口转变 (Demographic transition): 对于人口变

迁的一种解释, 认为当经济繁荣达到一定水平, 出生率与死亡率会达到一个稳定的比例。根据这个观念, 在前工业社会里, 受到食物匮乏以及疾病或战争对于人口增长的遏制, 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平衡。相反, 在现代社会里, 这种人口平衡是因为家庭受经济因素的推动而有意限制孩子的数量。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管理理论的一个分支, 认为雇员的热情和奉献是经济竞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管理思路力求使得雇员感到, 他们在公司产品以及工作过程本身中也有一份投入。

人为风险 (Manufactured risk): 人类的知识和技术对于自然界的有害影响而产生的风险。全球变暖、转基因食品都属于人为风险。

认同/身份 (Identity):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特征中, 关系到他们是谁, 以及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那些明确特性。认同的一些主要来源包括性别、性取向、国籍或族群性, 以及社会阶级。个体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记就是名字。命名对于群体认同也很重要。

认知 (Cognition): 人类的思维过程, 包含感知、推理和记忆。

熔炉 (Melting pot): 认为可以融合族群差异, 以创造出来自多种文化源泉的新行为模式的观点。

入世型运动 (World-affirming movement): 一种宗教运动, 力求通过帮助信徒释放自身潜能, 提高信徒在外部世界获得成功的能力。

S

撒切尔主义 (Thatcherism): 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相关的主张, 强调经济企业一方面需要结合对于国家权限的遏制, 同时又要维持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核心角色。

萨满 (Shaman): 被认为有特殊魔力的个体, 如

巫师或巫医。

三角测量法 (Triangulation): 运用多重研究方法, 从而获得比单一方法得出的更可信的经验数据。

沙漠化 (Desertification): 严重的土地退化, 导致大面积区域出现类似沙漠的状况。

上层阶级 (Upper class): 大致是由社会上较为富裕的成员所组成的社会阶级, 尤其是那些继承财产、拥有大生意或持有大量股票和股份的人。

少数群体 (Minority group): 在一个社会中属于少数的人群, 由于自身独特的体质或文化特征, 而使自己在该社会中面临不平等的处境。这样的群体也包括少数族群 (ethnic minorities)。

社会 (Society): 社会的概念是所有社会学观念中最重要的之一, 指一个结构化了的社会关系体系, 依据某种共享文化, 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有些社会规模很小, 像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仅有几十人。有的社会又非常大, 包括数以百万计的人口, 例如现代的中国社会, 就有十几亿的人口。

社会变迁 (Social change): 社会群体或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转变。社会变迁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始终存在的现象, 在现代时期变得尤为剧烈。现代社会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们力求理解打破传统世界并推进新的社会秩序形式的剧变。

社会分层 (Social stratification): 社会中各个群体就其获得物质报酬或者符号报酬的渠道而言, 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尽管所有的社会都存在某些形式的分层, 但只是随着以国家为基础的系统的发展, 才出现了财富和权力方面的广泛差异。在现代社会中, 最突出的分层形式就是阶级的划分。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 个体之间任何形式的社会接触。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是由某种类型的社会互动构成的。社会互动是指人们相互谋面的正式与非正式情境。正

式社会互动情境的一个例证是学校教室; 而非正式互动的例子是街上或聚会上相遇的两个人。

社会化 (Socialization): 儿童培养出对于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的意识, 并获得一种独特的自我感的社会过程。尽管社会化过程在婴儿期和儿童期格外重要, 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延续一生的。任何人类个体都不能避免接触周围其他人的反应, 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这种反应都会影响和矫正自身的行为。

社会化中介 (Agencies of socialization): 发生社会化过程的群体或社会背景。例如家庭、同龄群体、学校、传媒以及工作场所都是发生文化习得的领域。

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onism): 一种认为社会现实是诸个体或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的理论。

社会角色 (Social role): 占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个体受到期待的行为。社会角色的观念最初来源于戏剧, 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在每一个社会中, 根据人们活动场景的变化, 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许多不同的社会角色。

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模式。社会生活并不是随机发生的, 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都是结构化的: 它们以一种有规律的、反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尽管把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比作支撑并维系一幢建筑的桁梁容易引起误解, 这也是一种方便理解的类比。

社会老年学 (Social gerontology): 关于老年化和老年人的研究。

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个体或群体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位置之间的运动。纵向流动是指在一个分层体系的等级序列里上升或下降的运动。而横向流动是个体或群体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物理运动。在分析纵向流动时, 社会学家区分了两种指标: 个

体在其一生中流动的程度，以及其所达到的位置与其父母辈所实现的位置之间的差异。

社会年龄(Social age):在文化上与某个特定的时序年龄相维系的规范、价值和角色。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多重剥夺的结果，使得个体或群体无法充分参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

社会群体(Social group):彼此以系统的方式相互交往的个体集合。群体的规模各异,从非常小的结合到大规模的组织或社团。但无论规模大小，群体的一个规定性特征是其成员意识到某种共享认同。我们绝大部分的生活是在群体性的接触中度过的。现代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同时属于形形色色的群体。

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它是指社会生活中塑造我们作为个体的行动的那些特性。涂尔干认为,可以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社会事实。

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个体在某个特定群体或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身份。社会位置可以是一般性的(与性别角色有关的那些社会位置),也可以是特殊性的(职业位置)。

社会性别(Gender):社会对不同生理性别的人的恰当行为的期望。社会性别并非是指男女生理特征上的差异,而是指由社会所界定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尽管在很长时间内,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很少受到关注,但是近年来,它已经成为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社会性别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在群体、集团和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在地位、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差异。

社会性别的社会化(Gender socialization):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是如何发展不同的社会性别特征的。

社会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男性与女性

之间社会模式化的相互关系。

社会性别角色(Gender roles):赋予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被标称为男性特质的和女性特质的。

社会性别体制(Gender regime):学校、家庭、社区等特定框架内社会性别关系的构型。

社会性别秩序(Gender order):社会性别秩序是与 R. W. 康奈尔的著作相关联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在整个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

社会学(Sociology):关于人的群体和社会的研究,特别强调对于工业化世界的分析。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群体中的一员,该群体中还包括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划分并不明确,并且都具有一定范围的共同旨趣、概念和方法。

社会学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运用想像性思维提出和解答社会学问题。社会学想像力要求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摆脱”他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惯例。

社会约制(Social constraint):这个术语指的是,事实上,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群体和社会对于我们的行为施加着一种调节性影响。社会约制被涂尔干看作是“社会事实”的特性之一。

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一大群人集合起来力求实现或阻止某种社会变迁的过程。社会运动一般存在于目标和观点常常对立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关系中。然而,成功挑战权力的运动一旦变得制度化,就可能会发展成为组织。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相信女性被视为男权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二等公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女性的社会体验都需要转变,因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乃在于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许多社会主义者在理解阶级时无视性别因素。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使人得以实现其目标并扩展其影响的社会知识与社会关系。

社会自我(Social self):根据 G. H. 米德的理论,社会自我是人类个体身上的自我意识的基础。社会自我是由他人的反应授予某人的身份。通过意识到这种社会身份,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意识。

身体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body):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关注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社会的作用所影响的。比如,健康和疾病就是由社会和文化的的作用所决定的。

神圣(Sacred):在一套宗教观念中引起信仰者敬畏或崇敬的部分。

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在马克思主义里,指一个社会基于其主导性的社会经济体系而具有的构成性特征,比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在一个社会中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方式,不仅仅包括技术,而且包括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生活方式选择(Lifestyle choices):个体就其商品、服务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所做出的决定。许多社会学家将生活方式选择看作阶级位置的重要反映。

生活史(Life histories):对于个体总体生活的研究,常常基于自述和信件等文献。

生理性别(Sex):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学差异。社会学家常常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作对照,生理性别是指身体的生理特征,而社会性别关注的是社会习得的行为方式。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划分方法是不同的。比如所谓易装癖者,在生理上是男性,但有时却呈现出女性的社会性别。

生命历程(Life course):人在其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转变。

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包含积极的环境政策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生态现代化的支持者相信,工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是不相容的。

生态效益(Eco-efficiency):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对环境损耗最小的技术的发展。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生命物种的多样性。

生物医学健康模式(Biomedical model of health):它是一组支持西医体系和实践的原理。这种生物医学康复模式依照观察出现的症状,客观地确定疾病,并确信通过基于科学的医疗处理,能够恢复健康的身体。人的身体就像一台机器,能够通过适当的维修而恢复正常工作。

生育技术(Procreative technology):干预人类生育过程的技术。

生育力(Fecundity):对于一位女性在生物学角度上可能生育的子女数量的测量指标。

生育率(Fertility):某一特定社会中育龄妇女活产子女平均数。

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指当雇主付清包括雇佣工人的费用之后,个体劳动力“剩存”下来的价值。

失范(Anomie):涂尔干使用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由现代世界的变迁过程所引发的茫然感和绝望感,从而导致社会规范丧失其对于个体行为的控制。

失业(Unemployment):失业率测量的是那些“在经济活动上是积极的”,也有能力工作,却不能得到有薪工作的人的比例。“没有工作”的人并不一定是无事可做。比如家庭主妇,虽然没有薪酬,但通常劳动得非常辛苦。

实验(Experiment):在研究者建构的人工情境中或自然发生的框架下,对假设进行系统化的受控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Positivism):在社会学里,指对于社会世界的研究应该根据自然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的观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路认为,客观知识可以通过细致观察、比较和实验获得。

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开创的这种理论,强调国与国之间以某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不断

扩张为基础的相互关联。这种经济体包括核心国家、半边陞国家和边陞国家。

世界主义的/普世主义的(Cosmopolitan): 该术语用来描绘人们或社会由于始终不断接触新的观念和价值而共享许多社会品质。

世俗化(Secularization): 指宗教影响的衰落过程。尽管现代社会已变得日益世俗,但是描绘世俗化的程度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世俗化可以指参与宗教组织的程度(如去教堂参加礼拜的比例), 宗教组织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与物质影响力,以及人们的宗教信仰的程度。

市场导向理论(Market-oriented theories): 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 假定如果个体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 不受政府约束的限制,就有可能获得最佳的经济后果。

事实性问题(Factual questions): 由事实情况(而不是理论的或道德的议题)引发争议的问题。

试点研究(Pilot studies): 在调查研究中进行的尝试。

受害研究(Victimization studies): 这种调查研究旨在揭示一定时期内受到犯罪侵害的人口比例。受害者调查试图通过直接关注人们实际的受害经历,补充“未记录在案的隐性数据”

受强调的女性特质(Emphasized femininity): 与 R. W. 康奈尔论社会中性别等级秩序的著述相关的一个术语。受强调的女性特质是霸权式男性特质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倾向于适应男性的兴趣和需要。传媒和广告中对于女性的许多表征都体现了受强调的女性特质。

狩猎和采集社会(Hunting and gathering societies): 以打猎、捕鱼和采集可食植物为生存方式的社会。

双核家庭(Binuclear families): 一种家庭结构, 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双方在分居后各有其家,但共同负责抚养孩子。

双性的(Bisexual): 对男女两性都会产生性活动或情感的取向。

水平流动(Lateral mobility): 个体从国家的某地移动到另一地甚至是跨国的移动。

顺世型运动(World-accommodating movements): 一种宗教运动, 强调内心的宗教生活以及精神的纯洁比世俗的关怀更重要。

死亡率(Mortality): 一个人口中的死亡数。

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是一种针对所犯罪行值得以死亡作为惩罚手段的人的刑罚, 由国家实施制裁。死刑通常被称为“处死”(death penalty)。

随机抽样(Random sampling): 一种保证总体中全体成员都有同样的被选可能性的抽样方法。

T

塔利班(Taliban): 一个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伊斯兰军事组织。1996年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并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政府,推行严苛的穆斯林行为守则。2001年,在和为2001年9月针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攻击负责的群体扯到一起之后,他们被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所推翻。

泰勒制(Taylorism): 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的一套观念,也称作“科学化管理”。他认为通过将工业生产任务分解为一系列简单操作,可以精确测时,实现优化配合,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

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运用取自常人方法学的技术而对谈话进行的经验研究。谈话分析试图通过考察谈话中自然发生的细节,揭示交谈的组织原则,以及它在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

弹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 通过计算机设计面向大众市场的定制产品的过程。

特大城市(Megalopolis): 这个术语源于古希腊的“众城之城”,是指规划出来让所有文明

都羡慕的城邦。而在现代则用来表示庞大乃至臃肿的大都市集群。

替代医疗 (Alternative medicine): 也称作辅助医疗 (complementary medicine)。这种治病和防病的思路包括广泛的治疗技术, 与正统的医疗措施有所交叉乃至另行一套。替代医疗或辅助医疗体现出一种整体健康的思路, 同时强调个体安康包含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因素。

同化 (Assimilation): 是指一个少数群体被多数人口所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少数群体接受了主导文化的价值和规范。

同居 (Cohabitation): 两个人没有结婚就以某种长久的性关系生活在一起。

同龄群体 (Peer group): 具有类似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个体组成的朋友群体。

同性恋 (Homosexuality): 在性活动或性情感上倾向于同性。

同性恋的男性特质 (Homosexual masculinity): 根据 R. W. 康奈尔的性别关系模型, 同性恋的男性特质被污名化地定位于男性的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底层。在通行的社会性别秩序中, 同性恋被看作是由霸权式男性特质体现的“真男人”的对立面。

同性恋恐惧症 (Homophobia): 对于同性恋者的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或鄙视。

图腾崇拜 (Totemism): 一种将神圣属性归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动物或植物的宗教信仰体系。

土壤退化 (Soil degradation): 由于过度使用、干旱或不适当的施肥, 导致土地质量不断恶化, 有价值的天然成分流失的过程。

团结 (Solidarity): 涂尔干眼中社会结合的内在力量。更宽泛的说, 这个术语常常被左派用来描述一个反抗压迫的新兴阶级的政治意识, 比如工人阶级的团结。

推拉因素 (Push and pull factors): 在有关全球迁移的早期研究中, 推拉因素就是被认为影响迁移模式的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推

动因素”指源出国的推动力, 例如失业、战争、饥荒或者政治迫害。而“拉动因素”是指目标国的吸引力, 例如兴旺的就业市场、较低的人口密度以及高标准的生活。

脱离理论 (Disengagement theory): 一种功能主义的老年化学说, 认为当人们步入老年, 便移除其传统角色, 就此将其转移给别人, 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具有功能作用的。

W

外部风险 (External risk): 指那些源于自然世界、并且与人类行为没有联系的危险。外部风险的例子包括旱灾、地震、饥荒或者风暴。

网络 (Network): 将人们彼此联结的一系列非正式和正式的社会纽带。

网络犯罪 (Cybercrime): 借助电子网络或者应用新信息技术进行的犯罪活动。新兴的网络犯罪形式包括电子洗钱、盗窃个人身份、使用电子手段恶意破坏以及监控电子通信等。

网络空间 (Cyberspace): 处在不同电脑终端的个体之间进行互动的电子网络, 将人们链接在一个层面上, 一种维度上, 而不考虑地域界限或物理地点。

威权制国家 (Authoritarian states): 一种视国家的需要和利益优先于普通公民的需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 严厉限制乃至拒绝民众参与政治事务。

微观社会学 (Microsociology): 有关面对面互动情境中的人类行为的研究。

唯物史观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马克思提出的观点, 根据这种史观, “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因素在确定历史变迁中起到首要作用。

温室效应 (Greenhouse effect): 在地球大气中吸取热量的温室气体的积聚。“自然”产生的温室效应能使地球的温度保持在一个适宜

的水平,但是人为导致的高密度温室气体的增加则会导致全球变暖。

文化(Culture):某个群体所特有的价值观念、礼节惯例和生活方式。像社会这个概念一样,文化观念非常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文化是人类社会团体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在某一社会中几种亚文化以平等的关系共存。

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传递。文化再生产指的是使文化经验的延续性可以经久不衰的机制。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便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文化再生产并非仅仅是通过正规教学课程所教授的内容来实现,还可以通过隐性课程,以更深刻的方式获得,即个体虽然在学校但却是以非正规的方式习得行为的某些方面。

问卷调查(Survey):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方法,通常包括把问卷分发给被研究的人群,对他们的回答进行统计分析,并从中找到模式或规律。

污名(Stigma):任何被认为具有贬损意义的生理特征或社会特征。

无产阶级(Proletariat):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阶段下的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无家可归者(Homeless):这类人没有地方睡觉,并且要么呆在免费的收容所里,要么睡在不适合居住的公共场所。

无焦点的互动(Unfocused interaction):出现在同一框架中、但并未进行直接的面对面沟通的人们彼此之间发生的互动。

X

先赋地位(Ascribed status):基于生物因素的社会地位,诸如种族、性别或年龄。

先知(Prophets):通过解释圣经文本来动员信徒的宗教领袖。

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参与某类社会活动的个体知晓并意欲的该类活动的功能。

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一种市场导向的发展理论,主张低收入的社会只有放弃传统方式,采纳现代经济制度、技术,以及注重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文化价值观念,才能取得经济上的发展。

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参照某一特定社会中总体生活标准而界定的贫困。

相关(Correlation):通常以统计术语来表达的两个维度或变量之间的规律关系。相关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当一个变量的升高有规律地伴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升高,两个变量之间就存在正相关。反之,当一个变量的升高有规律地伴随着另一个变量的降低,就存在负相关。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一种量度。

新犯罪学(New criminology):犯罪学思想的一个分支,1970年代在英国很有名。它把越轨行为看作是精心选择,并且实际上经常是带有政治意义的。“新犯罪学家”认为,只能在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理解犯罪和越轨行为。

新工党(New Labour):托尼·布莱尔担任英国工党领袖后引入的改革。他试图藉此把工党转向新的方向。尤其是在早些时候,曾经成功地废除了第四条款,该条款声明工党奉行广泛的产业公有制政策。

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这一通用术语是用来描述朝向内心灵修的各种信仰和实践。异教信仰、东方神秘主义、萨满教、替代治疗形式以及占星术等,都是“新纪元”活动的事例。

新居制(Neo-local residence):每当一个孩子结婚或成年,在经济上可以自主,就择新地分家另过。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例如巴西和新加坡等第三世界

经济体，它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已经开始发展起强大的工业基础。

新兴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为了应对人类社会变化所面临的风险的变化,从1960年代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例如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反核运动、抵制转基因食品,以及“反全球化”的集会等。新兴社会运动不同于早先的社会运动,属于单一议题的运动,以非物质目标为取向,并且跨越阶级界限广泛寻求支持。

新兴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s):与主流宗教并存的各种宗教与灵修群体、崇拜与教派。新兴宗教运动的范围包括从新纪元运动中崇尚灵修与自助的群体,到黑天会这样的排它性教派。

新移民(New migration):关于1989年以后欧洲移民模式变化的一个术语。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前南地区族群冲突不休,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都对“新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着传统的“源出国”和“目的国”之间的动态关系。

新种族主义(New racism):基于文化差异或宗教差异而不是生物差异的种族主义观点,也称作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一种经济信念,认为通过政府尽量减少对于工商企业的约束,将使自由市场的力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基于处理和获取信息的微电子系统的技术形式。

信息贫困(Information poverty):“信息穷人”是指很少乃至没有机会接触计算机之类信息技术的人们。

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一个社会不再主要基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而是基于知识的生产。信息社会的观念与信息技术的兴起密切相关。

形式运演阶段(Formal operational stage):根据皮亚杰的理论,这个认知发展阶段中正在

成长的儿童开始有能力处理抽象概念和假设情境。

性(Sexuality):泛指人类的性特征以及性活动的一个术语。

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某人对于性魅力或浪漫魅力的倾向。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出的非后者所愿的性挑逗、言论或行为,即使后者明显反抗,前者却仍坚持进行。

蓄意破坏互动(Interactional vandalism):对谈话的默含规则的蓄意颠覆。

血汗工厂(Sweatshop):对于某些工厂或工场的负面指称,其中的雇工工时长、报酬低、工作条件差。

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由于担心在祖国遭到宗教或政治迫害而在外国申请庇护的人。

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为不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所做的错事而谴责该个体或群体。

Y

亚文化(Subculture):人口中某一部分以其文化模式有别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

严打治安(Zero tolerance policing):预防和控制犯罪的一种思路,强调维护秩序是减少严重犯罪的关键。严打治安针对的是轻微犯罪和较小妨害,反映了破窗理论的根本原则。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用以搜集经验性(事实性)材料进行考察的各种方法。社会学有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最常用的或许是实地考察(或参与观察)和问卷调查。出于多种原因,在一项研究计划中最好结合两种或更多的方法。

样式(Genre):传媒研究中使用的一个概念,表示传媒产品或文化项目的一种独特类型,例如,在电视业中,不同的样式包括肥皂

- 剧、喜剧、新闻节目、体育和戏剧等。
- 一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 乔治·赫伯特·米德理论中的一个概念, 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 接受了某个特定群体或社会的一般价值观。
- 一夫多妻制(Polygyny)**: 一种婚姻形式, 其中的男性可以同时拥有不止一个妻子。
- 一妻多夫制(Polyandry)**: 一种婚姻形式, 其中的女性可以同时拥有两个或多个丈夫。
- 一神教(Monotheism)**: 只信仰一个神。
- 医学凝视(Medical gaze)**: 在现代医学中, 医学专家在观察和治疗病人时采取的超脱与价值无涉的方法。
-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认为低收入国家的贫困的直接起因就在于受到富裕国家及以富裕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的剥削。
- 依赖比(Dependency ratio)**: 处于依赖年龄的人(孩子和老人)与处于经济活动年龄的人们的比例。
- 依赖文化(Dependency culture)**: 由查尔斯·莫里推广的一个术语, 用来描述那些依赖国家福利供给而不进入劳力市场的个体。依赖文化被看作是“保姆国家”的结果, 这种国家削弱了个体的进取心和人们的自助能力。
- 仪式(Rituals)**: 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的成员定期参与的正式化的行为形式。宗教是执行仪式的主要背景之一。但是仪式行为的范围远远超出这一特殊领域。绝大多数群体都具有某种仪式实践。
- 移出(Emigration)**: 人们从一个国家迁出而到另一个国家定居。
- 移入(Immigration)**: 人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以求定居的迁移。
- 移置(Displacement)**: 观念或感情从其真正的起源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
- 异化(Alienation)**: 我们自己作为人类所具有的能力被其他实体取代的一种感受。马克思最初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将人的力量投射到神的过程。后来, 他用这个术语表示工人丧失了对其劳动任务的性质及其劳动产品的控制。费尔巴哈用这个术语指神祇或有别于人类力量的神圣力量的确立。
- 异性恋(Heterosexuality)**: 在性活动或性情感上倾向于异性。
- 意识形态(Ideology)**: 旨在为支配群体的利益提供正当性论证的共享观念或信仰。只要社会中存在着群体之间系统全面、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就会发现存在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体系试图将各群体拥有的程度不同的权力予以合法化, 所以, 意识形态概念与权力概念密切相关。
- 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被另外一个变量或因素(自变量)因果性地影响着的一种变量或者因素。
- 因果/因果机制(Causation)**: 一种因素对另一种因素的因果影响。社会学上的因果性因素包括个体就其所行给出的理由, 以及影响其行为的外部力量。
- 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 一种事态(果)是由另一事态(因)引起的一种关系。
- 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 在学校中不经由正式课程而习得的行为或态度特质。隐性课程属于学校教育中“未予明言的议程”, 比如传达社会性别差异的特性。
- 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的观念, 指的是当人们在见到他人时, 通过有选择的隐藏或表露来“管理”或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
- 婴儿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每千例活产儿中在出生第一年死亡的婴儿数量。
- 游牧社会(Pastoral societies)**: 这类社会以饲养家畜维持生计, 并常常需要根据季节变迁或为了寻找新鲜草场而在不同地区之间迁移。
- 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 根据埃米尔·涂尔干的观点, 一个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所

产生的社会结合作为一个整合一体的总体而运作。

有焦点的互动(Focused interaction):彼此间从事共同活动或直接交谈的个体之间的互动。

有礼貌的不关注(Civil inattention):处于相同物质交往场景中的个体,借此过程既彼此表现出已经注意到相互的存在,又不相互威胁或过分友善。

有神论(Theism):对于一神或多神的信仰。

有限符码(Restricted code):以高度发达的文化理解为基础的一种言说模式,使得许多观念并不需要也确实没有用词语来表达。

右派现实主义(Right realism):在犯罪学中,右派现实主义源于控制理论和政治保守主义。它将人们所意识到的犯罪和越轨行为的激增联系到个体责任的衰微和道德堕落。右派现实主义者认为,犯罪和越轨是某种个体病理,是由于个体的自私、缺乏自控和道德感所主动选择的一系列破坏性的违法行为。右派现实主义者对犯罪研究的那些“理论”思路不屑一顾。

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一种假设,认为只要对新举措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了足够的质疑,那么最好是保持现状而不是改变它们。

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人们出生时平均预期能够生活的时间长度。具体而言,此概念指一个新生婴儿预期能够生活的年数,假设该新生儿出生时的通行死亡率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不考虑性别因素。

元叙事(Metanarratives):有关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性质的君临一切的宏大理论或信念。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属于社会学家用来说明世界如何运行的元叙事。后现代主义者拒绝承认此类“宏大理论”,认为不可

能确立支撑人类社会的任何基本真理。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一种回归到经籍原文字意的信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或许是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反应,坚持根据信仰回答问题,并通过利用传统理据来维护传统。^①

约制(Sanction):强化对于社会所期望的行为模式的奖赏或惩罚的形式。

越轨(Deviance):不遵从一个群体或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所认同的规范或价值观的行动模式。何谓“越轨”行为的定义与规范、价值观一样,因文化与亚文化的不同而有广泛差异。许多在一种情境中或被一个群体受到高度尊重的行为方式,到了另外的情境或群体中也许会受到负面的评价。

越轨放大(Deviancy amplification):当标定某种行为是越轨行为时所导致的意外后果,即这种控制作用实际上激起了更多的类似行为。例如,警察、媒体和公众对所认为的越轨行为的反应能够“放大”越轨行为本身,从而产生一种“越轨的螺旋上升”。

越轨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iance):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越轨行为,以及有些行为为何被确定为越轨。

越轨亚文化(Deviant subculture):其成员在价值观念上迥异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一种亚文化。

Z

正式关系(Formal relations):群体和组织中按照“官方的”权威体系的规范或规则建立起来的关系。

政党(Political party):某种组织旨在通过选举赢得统治权力,并使用这种权力来贯彻特定规划。

政府/治理(Government):一个政治机构中的官

^① 在基督教中译作基要主义。而所谓“基本教义派”,可以泛指社会政治等领域中固守某一信念,不计其余后果。

- 员对于政策、决策以及国务的日常执行。我们可以将“government”视做一个过程 [治理], 或者是视做官员监督其政策实施的政治权威[政府]。过去几乎所有的政府都由君主或帝王所掌管;而在大多数现代社会中, 政治权威经由选举产生, 其官员是基于专长和资历任命的。
- 政治(Politics):**通过运用或抵抗权力来影响政府行为的性质和内容的手段。“政治的”领域既包括那些政府中的人的活动, 也包括其他许多群体和个体的活动及相互竞争的利益。
-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一个社会不再主要以物质产品的生产为基础, 而是以知识的生产为基础。知识经济的兴起主要是适应一群新型消费者的发展, 他们精通技术, 把计算机技术、娱乐以及电子传媒等方面的新进展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 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信息社会的另一个常用术语, 指一个社会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 and 消费为基础。
- 职业(Occupation):**个体以常规方式参加工作并获得某种薪酬的就业形式。
- 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根据对适合“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工作的通行理解, 将男性与女性汇聚于不同类型劳动的方式。
- 殖民主义(Colonialism):**西方国家在世界上远离其母国界域的地方确立其统治的过程。
- 制度性种族歧视(Institutional racism):**以族群为基础的歧视模式, 已经结构化入既存的社会制度。
- 制度资本主义(Institutional capitalism):**基于制度性股权而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企业。
- 质量管理小组[Quality circle (QC)]:**工业化群体生产类型, 其中的工人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决策。
- 智力(Intelligence):**思维能力的水平, 尤其以智商(智力商数)测验来测量。
-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工作于多种职业中的广泛人群, 从服务业雇员到学校教师, 到医学专业人员。由于发达社会中专业性、管理性以及行政性职业的不断扩展, 中产阶级可以说涵盖了英国这类国家的大部分人口。
- 中位数(Median):**居于一系列数值中间位置的数值, 系计算集中趋势的方法之一, 有时比计算均数更有效。
- 终生读写能力(Lifelong literacy):**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 终生学习(Lifelong learning):**这种观点认为, 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掌握不仅存在于生命早期的正规教育体系中, 而且应该贯穿个体一生的各个阶段。成人继续教育计划、在职培训、基于互联网的学习机会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学习银行”, 都是人们进行终生学习的方式。
- 钟表时间(Clock time):**用钟表计量的时间, 即用时、分或秒来估算的时间。在钟表发明之前, 时间的计量乃是基于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 例如太阳的升落等。
- 种姓制(Caste):**一种使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在其出生伊始就固定下来不可变易的分层形式。不同种姓群体的成员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通婚。
- 种族(Race):**基于生物性特征, 使得个体和群体得以定位并被赋予各种品性和能力的一组社会关系。
- 种族隔离(Apartheid):**1948年在南非建立的一种正式的种族分离制度, 一直实行到1994年。
- 种族化(Racialization):**按照对于种族的理解, 对个体或者群体进行分类的过程。种族差异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人类的差异, 而且是权力模式和不平等模式之再生产的重要因素。
- 种族灭绝(Genocide):**有计划地系统毁灭一个种族、政治或者文化群体。
- 种族主义(Racism):**把共同具有某种生理遗传特征的人群进行优等和劣等的属性划分。种族主义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身体差异

的特殊形式的偏见。种族主义态度确立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但同时似乎也有赖于在人类社会许多情况中常见的偏见与歧视的机制。

众数(Mode):在所给的一组数据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数据，它有时是一种描述集中趋势的有效方法。

重组家庭(Reconstituted family):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以前的家庭里有孩子，他(她)或住在家里，或住附近。重组家庭也被称为“继亲家庭”。

主导地位(Master status):通常优于其他社会位置指标、并且决定个体在社会中的总体位置的一个或几个地位。

主权(Sovereignty):一个王室、领袖或政府对具有明确边界的一块领域享有至高权力的资格。

专业服务与公务人员阶级(Service class):约翰·H·戈德索普所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那些以服务规则而不是劳动契约为雇佣基础的人，其工作也因此包含着高度的信任与自主。根据戈德索普的描述，专业服务与公务人员阶级(他概括为阶级一)指的是专业人员、高级行政人员和高级管理雇员。(专业服务与公务人员阶级的成员并不是那些受雇于服务行业的人。)

转基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转基因生物是指通过改变构成植物或作物的基因而生产出来的植物或作物。

转世(Reincarnation):灵魂借另一个身体或形式重生。这种信念最常与印度教和佛教相关。

资本家(Capitalists):那些拥有公司、土地或股票和股份，并用它们来生成经济回报的人。

资本主义(Capitalism):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经济企业体系。“资本”指的是包括货币、产业和机器等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资产。它可以用来生产商品以销售，或投资到市场，而希望实现一定利润。今天几乎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具有资本主义的取向，它们的经

济体系都是建立在自由企业和经济竞争的基础上的。

资产测查补助(Means-tested benefits):这类福利服务只适用于某些公民，他们的资格标准不仅基于需要，而且基于收入和积蓄水平。

资产阶级化命题(Embourgeoisement thesis):资产阶级的欲求、生活标准与生活方式逐渐在工人阶级中制度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这种现象破坏了工人阶级的意识，严重打击了工人阶级创造社会变迁的努力。

资料来源(Source):所引证的出版品、出版品中的行文或其他信息。

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不同的社会资源和物质资源如何在各社会群体或者其他社会元素之间分享和利用。

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能作为原因影响另一个变量或因素(因变量)的变量或因素。

自动化(Automation):由机器监视并控制的生产过程，出于人的监督管理被减至最低限度。

自然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nature):我们通过这一过程，对被视为“自然的”的生育等现象实施控制。

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实现自我的发展和确定个人的身份，从而形成一种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同周围世界关系的独特感觉的持续过程。

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觉察到某人独特的社会身份，即作为不同于他人的一个人。自我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早期社会化获得了对于自我的觉知。在儿童学习成为一个具备自我意识的存在的过程中，语言的习得至关重要。

自我中心性的(Egocentric):根据皮亚杰的看法，这是儿童在其早年的典型特征。自我中心性思维就是仅仅从儿童自身的位置出发来理解环境中的客体和事件。

自由民主制 (Liberal democracy):以议会制度为基础的一种民主制度,并在经济生产领域同自由市场体系相结合。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 (Liberal feminism):女性主义理论的一种形式,认为导致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原因是妇女和少女所享有的公民权利以及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某些社会资源被减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倾向于通过改变立法以确保个人权利得到保障。

宗教 (Religion):由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所追随的一套信仰,包括令人畏惧或惊异的象征符号,还有共同体成员参与的仪轨。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包含对超自然实体的信仰。尽管很难区别宗教和巫术,但是巫术基本上是由个体执行的,而不是作为共同体仪式的焦点。

宗教经济 (Religious economy):宗教社会学中的一种理论框架,主张宗教可以有效地理解为彼此竞夺信徒的组织。

宗派 (Denomination):失去其奋兴动力的宗教派别,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团体,要求数量可观的追随者遵从。

总体 (Population):在社会研究领域,指作为研究和调查对象的人群。

总体性制度/机构 (Total institutions):由欧文·戈夫曼推广的一个术语,指的是诸如收容所、监狱、修道院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强加给其居住者一套强力管制的生活体制,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

族内婚 (Endogamy):禁止与某人所属社会群体

之外的人发生通婚或性关系。

族群 (Ethnie):安东尼·史密斯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有共同祖先观念、共同文化认同以及同特定家乡相联系的一个群体。

族群清洗 (Ethnic cleansing):通过大量驱逐其他族群人口而人为创造族群同质区域。

族群性 (Ethnicity):使特定群体的成员区别于其他人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属于一个族群的成员分享一种共同的关于共有文化认同的鲜明意识,从而区别于周围其他群体。在几乎所有社会中,族群差异都是与权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差异相联系的。如果族群差异也被视为种族差异,那么这种区分有时就会特别凸显。

族群中心主义的 (Ethnocentric):根据自己文化的观念或实践理解另一种文化的观念或行为。族群中心主义的判断无法认识其他文化的真正品质。持有族群中心主义的人是指不能或不愿从这种文化自身的角度看待该文化的人。

组织 (Organization):权威关系明确的一大群个体的组合。工业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它们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虽然不是所有的组织在形式上都采取科层制,但是在组织的发展和科层制趋势之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左派现实主义 (Left Realism):犯罪学的一支,1980年代由约克·扬的著述所推广,注重研究犯罪的受害者,呼吁犯罪学研究实际参与犯罪控制和社会政策的议题。

致 谢^①

The publisher and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llowing fo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copyright material:

5 © Corbis; 6©(1) Corbis, (r)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9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BPK; 11© Getty-Images; 12 ©Corbis/Bettmann; 14 © Corbis/Bettmann; 17 © Topfoto; 20 © Corbis/Bettmann; 32 © Christopher Anderson; 34 © Powerstock; 36 © Panos Pictures/Paul Weinberg; 38 © Still Pictures /Fredrick Stark; 47 © Istockphotos; 51 ©Rex Features; 53 © Panos Pictures/Dermot Tatlow; 55 © Emma Longstaff c/o Polity Press; 58 © Rex Features; 74 © Getty-Images; 79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81 © UPS; 83 © United Media; 87 © AnthroPhoto/Edward Tronick.

102 © Getty-Images; 108© ASA; 112 © Gezette; 116©(t) Corbis, (b) © Corbis/Bettmann; 118 © ASA;119 © Isolde Ohlbaum; 122 © Nigel Stead/ LSE; 128 © Rex Features; 129 © Magnum/Martin Parr; 132 © Paul Ekman; 140 © David Hoffman; 144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151 © Alamy/Don Jon Red; 156 © Polity; 162© Aquarius; 176 © Rex Features; 178 © Empics; 181 © Photofusion/Jackie Chapman; 183©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188 © Photofusion/ Paul Baladesau 195 © Katherine Lamb 196 © Photofusion/Paule Solleway.

204 © Rex Features; 206 © BBC; 207 © Empics / EPA; 210 © Panos Pictures/Gisele Wulfsohn; 214 © Magnum/David Hurn; 217 ©

Photofusion/Ulrike Preuss; 228 © Corbis/ Tim Graham; 231© Empics; 237 © Corbis/ Peter M. Fisher; 252©(1) Corbis/Viviane Moos, (r) Sally& Richard Greenhill; 253 © The Toilet of Venus, c. 1613 (oil on canvas) Rubens, Peter Paul (1577-1640) ,Private Collection, Giraudon/Bridgeman Art Library; 255 © Sally & Richard Greenhill; 257©Photofusion/ Caroline Mardon; 261 © Getty-Images; 265 © Rex Features;

P.267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275 © Alamy/Janine Wiedel Photo Library; 284 © Empics; 285© Vicky Lucas; 288 © Empics; 294 © Empics; 299 © Panos Pictures/Eric Miller.

313 © Empics; 321 (1)©Eddie Mulholland/Rey Features; (r)©Paul Grover/Rex Features; 326 © Corbis/Bettmann; 340 © Photofusion/ Ulrike Presse; 343 © (t) Panos Pictures / Chris Sattlberger, (b) Photofusion/Joanne O' Brien; 350 © Courtesy of Campaign for Racial Equality; 360 © Alamy/Photofusion; 362 © Corbis/Ashley Cooper; 364 © Rex Features; 369 © Popperfoto; 371© Empics; 386©(t) Rex Features, (b)United Media; 387©Corbis / Andrew Holbrooke; 398 © Corbis/Peter Turnley; 399 © Panos Pictures/Pietro Cenini.

400©(1) Corbis/Dean Conger, (r) Corbis/ Danny Lehman; 417 © Panos Pictures/ Sean Sprague; 422 © Still Pictures/Ron Gilling; 426 ©Panos Pictures/Chris Sattlberger; 434 ©Corbis/C J Gunther/Suma; 438 ©Ancient Art& Architecture; 439©Alamy/Frank

① 此处涉及的页码为英文原书中的页码。

Herbholdt; 444 ©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452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455 © Corbis/Lynn Goldsmith; 461 © Corbis/T & G Baldizzo; 472 © Roger Scruton; 482 © Corbis/David Turnley; 484 © Empics/EPA; 486 © Empics/EPA 489 © Empics 491 © Rex Features; 492 © Empics/Associated Press; 498 © Food Features.

501 © Panos Pictures; 502 © Fabrica; 503 © Popperfoto; 510 © Alamy/Janine Wiedel Photo Library; 516 © Rex Features; 522 © Empics; 533 © Rex Features; 538 © Rex Features; 543 © Photofusion/Don Gray; 548 © Rex Features; 554 © Roger Scruton; 556 © Network Photographers / Barry Lewis; 568 © Rex Features; 573 © Empics/Associated Press; 576 © Empics/EPA; 584 © Corbis; 585 © Corbis/Reuters; 589 © Corbis; 593 © Rex Features.

600 © Rex Features; 603 © Corbis/Orjan F. Ellingvag; 604 © Loyd Dangle; 609 © Photofusion/Lisa Woollett; 627 © Fro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629 © Reuters Picture Library; 636 © Rex Features; 639 © Rex Features; 640 © Rex Features; 645 © Rex Features; 647 © Rex Features; 649 © United Media; 650 © Corbis/H. Armstrong-Roberts; 653 © Rex Features; 661 © Emma Longstaff c/o Polity Press; 663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668 © Alamy/Image State; 670 © Corbis; 672 © Impact Photos/Rupert Conant; 684 © Corbis/LWA-JDC; 689 ©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690 © Network Photographers/Homer Sykes; 696 © Photofusion/Sam Appleby; 697 © Photofusion/Ulrike Preuss.

709 © Rex Features; 713 © Photofusion/Paul

Baldesare; 716 © Sally & Richard Greenhill; 733 © Panos Pictures; 740 © Corbis / Michael Maslan Historic Photos; 742 © Alamy/Janine Wiedel Photo Library; 746 ©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750 © Rex Features; 756 © Photofusion/Melanie Friend; 761 © UPS; 764 © Rex Features; 769 © Alamy/Jeff Morgan; 773 © Alamy/Sarkis Images; 779 © Network Photographers / Mike Goldwater; 792 ©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795 © Rex Features.

801 © (1) Alamy/Janine Wiedel, (r) Rex Features; 805 © Photofusion/Gary Simpson; 808 © Rex Features; 810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823 © Empics/EPA; 824 © Sidney Harris; 831 © Rex Features; 843 © Rex Features 849 © Rex Features; 851 © Magnum/Gilles Peress; 856 © Network Photographers/Martin Meyer; 861 © Empics / EPA; 869 © Rex Features; 874 © Rex Features; 880 © Rex Features; 881 © Rex Features; 883 © Empics; 895 © Impact Photos/Mark Henley; 897 © New Yorker Cartoonbank.com.

900 © Photofusion/Bob Watkins; 903 © Rex Features; 905 © Alamy/TNT Magazine; 909 © 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911 © Alamy/ S.T. Yiap; 912 © Punch; 913 © Rex Features; 916 © Alamy/Travel-Shots; 922 © Magnum/ Martin Parr; 925 © Polity; 930 © Photofusion/ Peter Olive; 938 © Empics/EPA; 947 © Rex Features; 961 © Rex Features.

BBC News for 'Why I Want You to Look Me in the Face', *BBC News Magazine*, 6 August, 2003; Al-Qaeda's origins and links', *BBC News Online*, 20 July, 2004; David Green, 'The Regeneration Games', *BBC News Online Manchester*, 28 July, 2003; BBC News for

‘China’ s Ageing Population’ , *BBC News Online*, 1 September, 2000; ‘and Africa’ s Economy’ , *BBC News Online*, 2005;

- Elsevier for van Gelder, L (1996),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Electronic Lover’ in Kling, R. (ed), *Computerization and Controvers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Inc., pp. 364-375, Copyright ©1996 by Academic Press, Inc.; and Kollock P. (1999), ‘The Production of Trust in Online Markets’ ,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6;

The Economist for ‘Did Somebody Say a Loss?’ , Copyright © 10 April, 2003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The Iraq War’ . Copyright © 18 October, 2004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Reconstructing Iraq’ , Copyright ©10 March, 2005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and ‘The Iraq Dossier Row’ , Copyright ©5 April, 2005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for Vivek Chaudhary, ‘Why Manchester May Rue the Day it Won the Commonwealth Games’ , *The Guardian*, 25 July, 2001. Copyright © 2001 by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INQUEST for ‘Self-harm and Suicide in Prison: The Death of Joseph Scholes’ , *INQUEST*, November 2004. Copyright © 2004 by INQUEST;

Newsquest (Herald and Times) for Graeme Smith, ‘Beginning of end for Brent Spar; Eco-battleground to be Ferry Terminal’ , *The Herald* (Glasgow), 26 November, 1998, p. 11.

Copyright ©1998 by The Herald (Glasgow);

open Democracy for Becky Hogge (2005),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independent online magazine www.opendemocracy.net.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openDemocracy;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for Hepworth, M (2000), *Stories of Ageing*, pp. 124-125. Copyright © 2000 by Open University Press;

Philip Allan Updates for Abbott, D., ‘The Death of Class?’ , *Sociology Review* (November 2001). Copyright©2001 by Philip Allan Updat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for Cahill, S. E, Distler, W., Lachowetz, C., Meaney A., Tarallo, R., Willard, T (1985), ‘Meanwhile Backstage: Public Bathrooms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 *Urban Life*, 14: 33-58. Copyright © 1985 by Sage Publications, Inc.;

William Shaw for ‘In Helsinki Virtual Village’ , *Wired 9.03* (March 2001). Copyright © 2001 by William Shaw.

The Controller of Her Majesty’ s Stationery Office for **Fig. 6.1** from *Sociology Review* 8.2 (Nov 1998); **Fig. 6.2** from 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 **Figs. 6.3, 6.4, 6.5**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 7; **Figs. 6.6, 7.1, 7.3**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p. 17, 31, 33; **Fig. 8.2** from ‘Geographic Variations in Health’ , *Statistics* 2001, Ch.12; **Fig. 8.4** from *Social Trends* 35 (2005); **Fig. 8.5** from *From Exclusion to inclusion: Final Report of the Disability Rights Task Force* (1999); **Table 10.6** from

Social Trends 29 (1999), p. 98; **Fig. 13.2** from 'Census 2001', *National Statistics* (2003); **Fig. 13.3** from *National Statistics* (2002), p.3; **Fig. 13.4** from 'Focus on Ethnicity', *National Statistics* (2002), p.12; **Fig. 13.5** and accompanying text from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Labour Market*, Strategy Unit (2003), pp. 36-7; **Fig. 15.2** from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4 September, 2004); **Fig 17.2**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 44; **Fig. 17.3**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 45; **Fig. 17.4** from DfES; **Fig. 17.6**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44; **Fig. 17.7** from 'Focus on gender', *National Statistics* (2004), p. 5; **Fig.17.9**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 44; **Fig. 17.10** from DfES; **Figs. 17.11, 17.12, 17.13, 17.14** from *Surve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nnology in Schools* (2003), DfES, PP. 5-7; **Fig. 18.1** from 'A Century of Labour Market Change', *Statistics* (March 2003), p.139; **Fig 18.3**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5), p.4; **Fig. 18.5** from *Statistics* (2000); **Fig. 18.9** from 'Focus on the Labour Market 2002', *Statistics* (2004); **Fig. 18.10** from *Social Focus in Brief. Ethnicity2002* (2004), p. 9; **Fig. 19.1** from Home Office; **Fig. 19.2** from *British Crime Survey* (2003-4), p.34; **Fig.19.3** from *Statistics on Women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ome Office (2003), p. 4; **Fig. 19.4** from *Youth Lifestyles Survey* (2000); **Fig. 19.5** from *Criminal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2003*, Home Office (2004); **Fig. 19.6**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Fig. 22.5** from National Office of Statistics; and **Tables 7.1, 7.2**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p. 28, 31; **Table 7.3** from *Social Trends* 30 (2000), p. 37; **Table 7.4**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 32; **Table 8.2** from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4a; **Table 9.2** from *Social Trends* 35 (2004), p. 80; **Table 12.1** from *Social Trends*

30 (2000), p. 41; **Table 14.3** from *Social Trends* 34 (2004), p. 209; **Table 19.1** from *British Crime Survey* (2003-4), p. 43; **Table 22.2** from HMSO 2004; Crown copyright material is 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ntroller of HMSO ana the Queen' s Printer for Scotland.

Philip Allan Updates for **Fig 7.2: The Family Tree and The Beanpole Family** from Brannen, J., 'The Age of Beanpole Families', *Sociology Review* 13:1 (September 2003);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Francois Nielsen for **Fig. 9.1** from Nielsen, F.,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ualism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October 1994), Fig 1, p. 656;

Blackwell Publishing for **Fig. 18.8** from Sinclair, p. (1987), *Unemployment: Economic Theory and Evidence*, p. 2;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CPAG) for **Tables 10.1, 10.5** from Flaherty et al (2004), *Poverty. The Facts*, 5th ed, pp. 43, 188;

Child Trends for **Fig. 17.8** from Child Trends http://childtrendsatabank.org/pdf/6_PDE.pdf

Christian Research for **Figs. 14.3,14.4** from *Religious Trends*; and **Table 14.4** from *Religious Trends* 4 (2003/4), p. 22;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Inc. for **Table 11.4** from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Copyright©2006 by The World Bank;

The Economist for **Fig. 2.4**, Copyright ©11

September, 2003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Fig. 11.1**, Copyright ©11 March, 2004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Fig. 13.6**, Copyright ©16 October, 1999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and **Fig. 18.6**, Copyright ©14 October, 2003 by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London;

Electoral Reform Society for **Table 20.1** from <http://www.electoral-reform.org.uk/publications/statistics/turnouts.htm>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for **Fig. 18.4**. Copyright ©21 February, 2000 by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and **Fig. 22.1**, Copyright ©25 January, 2000 by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Fig. 14.2** from Davie, G. (2000), *Religion in Modern Europe: A Memory Mu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23. This tab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Wasserstein, B. (1996), *Vanishing Diaspora: The Jews in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 Hamish Hamilton;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for **Fig. 17.1** from IFS (2004), p. 22;

ISAAA for **Fig. 22.7** from ISAAA (2003);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for **Fig. 22.2** from <http://www.nature.com/nature/focus/water/index.html> Copyright ©2005.

Mission Frontiers and Todd Johnson for **Fig. 14.1** from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by

Religious Adherents' in Barrett, Kurian, and Johnson (2001),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4;

New Internationalist for **Fig. 12.2** from New Internationalist Magazine, 'Out South', Issue 328, (October 2000). Copyright ©2000 by New Internationalist, www.newint.org;

News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 Ltd for **Table 11.1** from *The Sunday Times*, 18 April 2004;

Ofcom for **Fig. 15.1** from Ofcom (2003), p. 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able 14.1** from Davie, G. (2000), *Religion in Modern Europe: A Memory Mu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9. This tabl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Ashford, S., and Timms, N. (1992), *What Europe Thinks: A Study of West European Values*. Aldershot: Dartmou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for **Table 15.1** fro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 Identity Diversity and Globalizati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Table 12, p.183. Copyright ©2004 by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lgrave Macmillan for **Figs. 13.7, 13.8** from Castles and Miller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Macmillan, pp. 67,6; and **Table 8.3** adapted from Oliver, M. (1995),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 34. Copyright ©1995 by Palgrave Macmillan;

Palgrave Macmilla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Fig 14.2** from Davie, G. (2000), *Religion in Modern Europe: A Memory Mu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28. This figur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Vertovec, S., Peach C. (1997), *Islam i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and Community*, p.17;

The Penguin Group (UK) for **Table 10.2**, from Townsend (1979), *Poverty in the UK*, p. 250; Copyright ©1970 by Peter Townsend;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Fig. 14.5** from Pew Research Centre (2002);

Polity for **Table 9.1** adapted from Crompton, R. (1998),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2nd ed, p. 67. Copyright ©1998 by Rosemary Crompton;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for **Fig. 18.7** from *Findings: Job Insecurity and Work Intensification* (1999), and **Tables 10.3, 10.4, 10.7** from Gordon et al (2000),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Britain*, pp. 14, 18, 58;

Sagalyn Literary Agency for **Table 16.1** from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Table 1. p. 45;

Transaction Publishers for **Fig. 2.1** from Lee, R. B., DeVore, I. (1968), *Man the Hunter*, Aldine Press;

John Quarterman for **Fig. 2.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Fig. 2.3** fro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pp 32,41; **Fig. 2.5** fro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and **Fig. 17.5** fro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2001 data); **Fig. 22.3** fro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p. 74; and **Fig. 22.6** fro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p. 3;

The World Bank for **Fig. 11.6** from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3), and **Fig 18.2** from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8);

Worldwatch Institute for **Table 22.1** from *State of the World*, 2004;

译后记

这本书英文本共 1120 页,重约 5 斤,现在被我“消灭”了。此刻我咬牙切齿地抚摸着它,更尖锐地感受到一名“体力”劳动者的光荣。

参加原书第四版中译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尤其是赵旭东的统稿校对,是我大部分工作的基础。无论在智力的启发上还是体力的节省上,我都应该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不过,鉴于我已经逐词进行了校对和增删,现在这一版中译所有可能存在的错误,则完全由我负责。如果有翻译上的疑虑或文风上的质疑,请致 linran@pku.edu.cn。全书所有注解均为本次添加的译者注,其中有许多必须感谢网络资料,但我只能笼统地对那些塑造着新型知识产权观念的无名英雄致敬,比如百度百科的作者们。

英文本排印的错误或疑点,以及对于吉登斯本人一些行文的疑惑,已经全部见于译者注。译者注的主要内容还包括一些有可能帮助阅读的背景注释和专名说明,以及无法找到中英一一对应的对译时的补充。地名方面尤须指出,我在最后校对到一半时不得不返工,逐一核对全书的“英国”,区分出作者或者统计口径属于泛指“英国”(联合王国),具体指“英伦三岛”(不包括北爱尔兰),还是更具体的专指“英格兰”(大部分情况下是英格兰和威尔士联合统计)。在地名、族群、教规、民俗等方面,类似的微妙陷阱肯定还会有。敬待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诸葛蔚东编辑的细致工作,还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的举荐,他们对我的信任让我上了“这条贼船”并欲罢不能。这个“修订”的工作量和所需精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两版不一致的情况有

以下几种:(1) 新版增加内容或扩充表述;(2) 新版删除内容或精简表述;(3) 新版修改说法或更新数据;(4) 因新版篇章结构前后调整而造成的表述修改;(5) 原中译本误译或漏译;(6) 原中译本术语、专名或表述前后不一致;(7) 译者本人对于某些术语或中文表述的选择偏好;(8) 文风统一考虑;(9) 许多反映全球化时代或网络时代社会生活变化的新词新语在近几年有了相对固定的中文译名,甚至有了新的含义。前三种情况占全书篇幅约四分之一,后面的情况各章参差不齐。第 9 种情况尽管我努力使用了网络检索(传统工具书基本无用),但对于我这个已经超过 35 岁的网络时代“老年人”来说,肯定会暴露出自己的“老土”之处。

第五版增加了许多前后参照的指示,删掉了所有成段引文的引证出处中的具体页码。有大量改写或新写篇幅的有第六、七、八、十、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章。总的来看,改动的篇幅约有三分之一。

本书确实是一本优秀的教材,但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准确地说是英国特色,第五版相较于第四版更是如此,进一步删除了原本就很少的美国的案例。书中许多地方也明显反映出作为新工党重要思想家的吉登斯本人对于这几年新工党执政成就及问题的关注。

本书也确实在紧跟时代。比如第十五章,上一版讲的新媒体不惜篇幅的大谈 IP 电话和手机,这一版则是数字电视。短短数年间,我们深切体会到社会学中所谓的陌生化和习以为常化,有助于发现许多新鲜的东西。但本书也坚持了对于现实的批判性介入立场——这些都是社会学想象力不变的内核。几乎每一章都

有对自己所处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的反思性批判——哪怕作为布莱尔的“guru”和新工党政治顾问。批判需要建设性,但不能以此消抹坚定的怀疑精神、宽容态度和多元视角,对于青年学子尤其如是。

原书中的斜体字表示强调或一些局部性的重要概念,中译本中以黑体字标示。原书中的红色粗体字表示书后术语表中出现的重要术语,书后附有术语汇编,在中译本中以楷体标示,可在书后译者重新编排的汉英术语汇编中查考。原书的前后参照指示和成段引文在中译本中以仿体标示。原书的图文框、表、图、插图(包括照片、漫画、视频画面),一概保留并尽量译出说明文字。原书的参考文献和书中某些文献出处均保留原文,以利查考。由于原书材料形式多样,编排生动,中译本无法准确通过页边码给出原书页码,也因此许多同书前后参引的地方将具体页码改成了大致的章节对应,并调整了索引方式。

我在先后就读、执教以及所谓访学的一些大学的所见所闻,所交所识,使我很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不是个天才。在这个“学术共同体”里,不仅有勤勉精益的天才迭出,也更有长袖善舞的“天才”纵横。自知不是天才其实并不难,但要安于、乐于并善于做一个傻子,却要困难得多。为此我要感谢所有在我博士毕业留校这么多年以后还忍受我做着这些事情的人,我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

感谢我在远方的父母,年迈的他们本应享受子女的报答,却还得倾力资助业已成年的我,使我能够在北京和北大这个所谓的“精神家园”找到自己物质上的家园,能够坐在客厅里而不是阳台上或厨房里进行我的工作,能够把工具书摊在桌子上而不是膝盖上。他们应该不太指望我会成为一个天才大家,因为我的生

命、生活和生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三十六年前我周岁时,或十八年前父亲送我走出家庭的荫护去外地上大学时,他们对我的预期。但他们为此肯定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普通教师要如此“辛苦”。而今他们双双年过七十,我却依然不敢把书献给他们,倒不是因为这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因为他们肯定会认为我是在不惜身体地挣钱。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牛可,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心的王巍,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周湘,武汉大学古籍所的于亭(就是这个家伙教给我“令人发指”的用法,还有以学术的名义不务正业的许多方法),还有吴飞、郭金华,还有龙先生龙太太,诸多有缘在异国共处一年的朋友,恕我不能一一提及。是你们从各个方面帮助了我(既包括冷风中的热饭让我不禁心暖情动,也包括热讽下的冷嘲让我学会意气沉潜),捱过了坎布里奇的漫天风雪,挺过了整个冬季的斗室独处,那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我站起来,过去了……

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他们在不断地付出,不断地成长,和我一起。感谢这部书的原版编辑提供了如此多的精美插图,让不断来到我身边叨扰的孩子一次次从中得到暂时的满足,然后可以原谅父亲的疏忽乃至暴躁,转身离去,继续他的社会化历程。作为父亲,不忍看他那么容易满足,却也唯有真心愿他长大后仍能如此容易满足……

最后感谢我自己,为了能够写这样一个实在是很自恋的后记,去感谢这些人,居然就这么把这件“事”做完了。做好一个傻子,谨以此自嘲、自警、自勉。

2008年2月 猪年岁末
于京北西二旗 爆竹声中